C E N T E A L & E M P I R E

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

（财政密码，哲学密码，军事密码）



以技术化方式，从财政、哲学、军事角度，完整解读中央帝国从秦朝到清末两千多年的历史脉络。

读懂“帝国密码三部曲”，就明晰了朝代更替、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CENTEAL&EMPIRE

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

（财政密码，哲学密码，军事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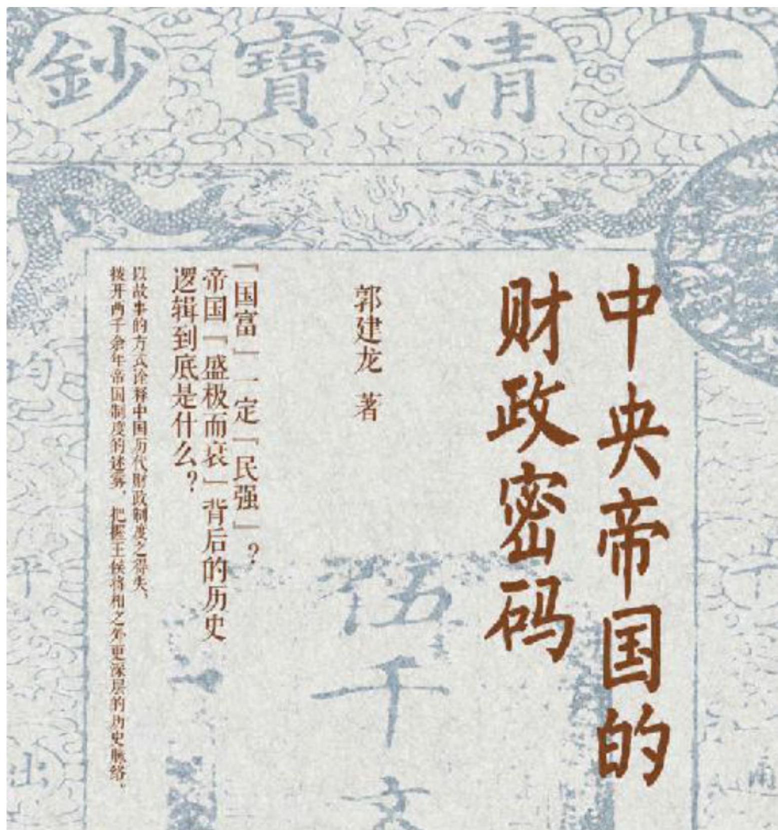


以技术化方式，从财政、哲学、军事角度，完整解读中央帝国从秦朝到清末两千多年的历史脉络。

读懂“帝国密码三部曲”，就明晰了朝代更替、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总目录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入选《新京报·书评周刊》年中榜好书！

掌握了财政，就掌握了国家的兴亡命脉！以财政新视角解读中国2000年财政史！

三国竞争时期，曹操最早发现了战争的财政秘密？
备受称赞的王安石变法居然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饱受内忧外患的清朝如何能维持财政平衡？

林达/刘苏里/吴晓波/鄢烈山/刘军宁/戴立宁/王小明/唐学鹏/张明扬

等22位知名学者/作家　**盛赞推荐**

洞悉政权机构的治理手段，探寻历代王朝的兴衰秘密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郭建龙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2017年·厦门

目录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
消失的小政府
统一的代价？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第三章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王莽：改革派的复古式集权
梦想家的币制幻想曲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当皇权受到抵制

制度的惯性之重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三国：财政为王
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
西晋：道不尽的禅让制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尽的户籍
南朝：漫长的终曲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
第六章　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当皇帝出逃时
战争时期的加税经济学
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
沦为守财奴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
六世纪的“大跃进”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
第八章　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盛世王朝的终结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
岳阳楼上叹革新
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
官买官卖遍天下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
第十章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纸币猛于虎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
最隐蔽的敛财术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溃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
南宋的金融崩溃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
第三部　最完美的集权机器
第十二章　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
宰相脱脱：蒙古人的凯恩斯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
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
飞转的印钞机和社会崩溃
第十三章　明代：最严密的集权皇朝
玩不转钞票的皇帝
亏本的对外贸易
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
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
加税直到灭亡
第十四章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探花不值一文钱
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
赔款与借债
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
后记
附录
参考史料及著作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郭建龙著.—厦门：鹭江出版社，2017.4（2017.6重印）

ISBN 978-7-5459-1109-1

I.①中… II.①郭… III.①财政史-中国-古代 IV.①F81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9821号

ZHONGYANG DIGUO DE CAIZHENG MIMA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郭建龙 著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22号

印　　刷：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361004

地　　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北门口民族工业园9号　邮政编码：101102

开　　本：710mm×1000mm 1/16

插　　页：4

印　　张：26

字　　数：408千字

版　　次：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9-1109-1

定　　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国策，到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财税、国企改革，到如今第五代领导人的癸巳新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要想继续改革，必须触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政府将这三者全面放弃的迹象。国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会修修补补，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政府从而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

有人认为，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也称为三大基础。从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到垄断经济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

1.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2.对于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有其古代版本，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种现象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支柱的来龙去脉，并围绕着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最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都俯首听命。

周代虽然建立了诸侯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们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人民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了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最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国有企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立国有企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是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IT行业。汉武帝围绕着盐铁资源，垄断了经营权，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

除了建立国有企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建立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在1978年之后，中国农村也曾经实行过类似的分地制度。

另外，与现代中国类似，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也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也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盈利，要么只能实行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反而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唐玄宗在盛世时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

得节度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再扩大成为一个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则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膨，中央政府突然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发现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最近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也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大制度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实验。而它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有特殊性，却又有许多规律可以追寻。本书在叙述这些中国古代的经验教训时，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区隔划分，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过时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导致著作中充满了一股腐臭的德国味儿。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却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选择史料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志》《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部。引子介绍了中央帝国形成之初最重要的

财政事件：汉武帝建立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部，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1949年之后的流行观点将大一统时期的历史统称为封建时代。但严肃的学者大都已经指出这样划分的错误，大一统之后形成的是一个集权式政权，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僚机构对全国进行控制。这样的政治结构绝非欧洲式的“分封建制”，秦汉之前的周代反而是符合封建特征的，但在流行观点中，又将这个时期硬称为奴隶时代，显得不伦不类。

本书对秦汉之后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往往是从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却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最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诸侯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了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武帝时期，由于战争财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带着计划经济色彩的财金改革，但由于政府干预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了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为板结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到影响政权的存续，最终被更加有活力的北朝所

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了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成了政权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第一周期终于在建立八百年之后，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土地公有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公有制。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却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但当有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给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了下去。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目却在减少，土地随即被从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得到满足。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了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大发展，但财政却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国有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宋代，因为战争成本、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实验。纸币最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的巨大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最早的一系列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

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人民的生活却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才开始了近代化的路程，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最终被迫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1]

汉武帝是中国集权财政模式的开创者，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

后世的人们往往敬畏汉武帝的赫赫战功，却没有看到，他的战争将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国库储蓄全部耗空，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

在汉代，一场战争的花费，就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战争可谓消耗巨大的游戏。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应付战争开支，为此，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从卖官鬻爵，到发行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最终汉武帝财政需求的，是垄断自然资源、开办国有企业。为此，汉代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国有制体系。

汉武帝的做法使得政府的角色从收税变成了参与经济的实际运营，也由此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变化，破坏了原来的小政府模式。

汉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一场发生在马邑（今山西朔州）的战役决定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的走向。

这场战役的一方是汉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

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马邑之战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它却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

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战争又破坏了汉初健康的财政，迫使武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这套新体系又延绵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这次战役的原因和经过如下。[2]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了中原的分裂，建立了汉帝国。

刘邦统一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大汉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位于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从此以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由皇帝认作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论。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

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争论的两极以两个人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燕地，即现在的北京、河北一带，与蛮族接壤。他本人也担任过边吏，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制造新的麻烦，所以不如拒绝和亲，准备打仗。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和广阔，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即便打胜

了，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得不偿失，不如继续和亲政策。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拥有监察百官的权力，是朝廷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而大行令（最早称典客，景帝时改称大行令，武帝后期改称大鸿胪）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匈奴事务与他负责的领域直接相关。

一个是三公，一个是直管官员，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难看出武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分歧之大。

这一次，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汉匈和平又维持了一年。

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马邑，叫作聂壹的富豪求见大行令王恢。他认为，匈奴刚刚和亲，对汉朝警惕性降低，此时恰是攻击匈奴的最佳时机。

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把聂壹的意见上呈汉武帝，于是宫廷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武帝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他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3]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进行。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汉书》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

根据聂壹的计谋，他本人偷偷逃到匈奴军臣单于处，获得信任后，向单于建议：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

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把他放回马邑。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军了。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

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史记》记载是二十多万

[4]），并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他被任命为护军将军）统领。

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一旦单于到来，就由王恢、李息、李广等人击其辎重，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

如果军事行动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所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

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

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打算，而是以劫掠为主。在进军的路上，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匈奴已经开始了劫掠。他们发现，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但是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单于临时下令占领这个烽燧。此时，有一个武州的小官恰好在这个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大呼上当，引军撤退。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连忙追了上来，但由于距离遥远，没有追上，只得撤离。

唯一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匈奴辎重。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却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经回撤，要和辎重部队会合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于是率军撤退了。

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汉武帝大怒，要惩罚当初坚决主战的王恢。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辎重部队的，然而他却选择了退军。在军法上，擅自撤退是斩首之罪。

王恢则辩解说，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他的撤退保全了汉军的三万人马。不过，暗地里他却贿赂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蚡，

希望田蚡为他说句好话。田蚡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就找太后去说情：反对匈奴最坚决的人是王恢，杀了他就等于是替匈奴出了气。

但武帝不为所动，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可能。出于面子考虑，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也比什么都没捞到要好得多。

整个事件以王恢自杀而告终。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战役过程平淡无奇，而且由于错失时机，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杀伤，那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

原因在于：此次战役标志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此后，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不指望和平，双方之间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恶战，[5]就算想停都停不下来了。

这些恶战对于汉匈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匈奴人口少，战争消耗大，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到了东汉中期终于瓦解；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帝国带来的影响，则是帝国财政的崩溃。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不得不放弃了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另辟财源。于是，一整套国家垄断、国家干预经济的制度被建立起来，这套财政制度延续了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一场小小的战役改变了汉匈关系，进而改变了帝国的财政结构，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至今，我们仍然在接受那次战役结果的影响。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

在汉初，中国经济恰好处于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自由经济时代。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6]认为，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税收要尽量规则简单、平等，不要过量。相应地，财政支出也要尽量最小化，只承担必要的安全保障，如军队、警察的开支，承担一部分实在没有私人愿意做的公共事

业，比如修建道路和水坝。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让社会去掌控经济运营。在这种体系里，不需要所谓国有企业，也用不着政府去指导经济。

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状况，即便是现代西方社会，也没有完全实践这些原则，政府逐渐变得臃肿，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也越来越大。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最接近亚当·斯密的理想，就是汉代初期。这个时期甚至有一套接近亚当·斯密理论的指导思想，叫“黄老之术”，据称发端于黄帝和老子。所谓“黄老之术”，就是要求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套用现在的话，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现在，人们常质疑亚当·斯密理论的效果，但西汉初年实行“黄老之术”恰好提供了良好的证明：在这之前，整个中国经过了战国末年的大规模兼并战争、秦代的集权统治、秦末的群雄混战，一直处于纷纭扰攘之中，民生凋敝，金融混乱。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立竿见影，很快地，国库充盈，民间富裕[7]。

除了民间经济的发展，汉初统治者还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官僚制度。这套制度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以及供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

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也就是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统）这三公，加上九个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并不多。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的官僚人数少，制度简单，政府没有整体干预经济的想法。据司马迁估计，养活中央官吏，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8]

即便按照一百万石计算，汉代一亩收一石的平均生产率[9]，约需要一百万亩土地；而汉代的耕地面积是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顷[10]，一百

万亩只相当于全国总耕地的八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只用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如果折算成钱币，当时一石粮食的正常价格是三十钱，则一百万石粮食大约为三千万钱。

由于养官所需很少，汉文帝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年免除农业税。[11]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当年的富裕的深情描述，成为人们描述汉代经济时必须引用的材料：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然而，在这幅和平安宁的图画下，却隐藏着中央帝国财政方面的一个巨大死穴：税收弹性不足。

对于帝国而言，每年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是固定的。农民的税率是固定的，人口和土地数量的变化也不大，因而可以估算出每年的总税额。而这些财政收入大都有了固定的用途，如养官、建筑宫殿、兴修水利、维持治安，等等。

尽管社会经济繁荣，可一旦出现了持续的异常情况，需要动用预算外的大额开支，就会立即出现财政紧张的情况，而财政的紧张最终会通过政权的力量破坏繁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盛世都无法持续的原因之一。

战争就属于最典型的异常情况。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与前几位皇帝保持朴素生活、竭力避免战争不同，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汉武帝爱好奢华和大场面，时时刻刻都试图表现出汉家的威仪。他喜欢美酒妇人、建设宫殿，利用儒家推崇的天子礼仪四处铺张。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他抛弃了前几位皇帝谨慎的态度，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

感。

在大行令王恢发动针对匈奴的马邑之战前，皇帝在其他方向已经采取了军事行动。例如，在严助和朱买臣对南越和闽越发动战争期间，政府征召了许多东瓯（今浙江温州）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这一带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南、贵州开辟道路，使得巴蜀的老百姓疲惫不堪；彭吾出兵朝鲜，让现在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群臣发现汉武帝喜欢战争，纷纷投其所好，鼓励他放弃前任的安抚政策，在帝国的各方边境都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行为。所以，马邑之战并非偶然发生，而是汉武帝个人喜好造成的自然结果。

只是，之前的战争都还没有进入不可逆转的状态，如果及时收手，还能够维持大致的和平。而自马邑一战起，匈奴和汉朝廷互相猜忌，双方的对抗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最初，匈奴在战争中占了上风。公元前129年，马邑之战五年后的秋天，汉武帝曾派遣四位将军攻打匈奴。但战争的结果却与武帝的初衷大相径庭：四位将军中，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被匈奴击败，损失了七千人马；李广被击败后，本人也被匈奴俘虏，他在押解的路上瞅准机会，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只有卫青小有收获，斩首七百人。

第二年，匈奴杀了汉朝的辽西太守，俘虏两千人，又在渔阳围困了韩安国，汉军损失千人。匈奴离开后在雁门又杀掠了千余人。[12]

双方的交战持续了十年，随后，汉代迎来了一个名将迭出的时期，最著名的是两位年轻的外戚，武帝卫夫人的娘家人——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人的成就在整个中国战争史中都极为突出。

然而，就在汉军屡屡获胜时，真正的问题却来了。如果换个角度，从财政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战争有巨大的破坏性，所谓“名将之福，财政之灾”。[13]

公元前124年，车骑将军卫青率领骑将军公孙贺，游击将军苏建和轻车将军、强弩将军李沮，兵分四路进攻匈奴右贤王，出塞六七百里，

斩获一万五千人。

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领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后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敌一万九千人。

这两次战役是卫青扬名立万的标志性事件，军事学家则称之为远程奔袭的楷模，是中外战役史上的名局，为汉政府出了一口积压了几十年的恶气。

但如果从财政的角度看，就会发现，当年御史大夫韩安国所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即便是打了大胜仗，也是得不偿失。

在这两场战役中，汉军共损失兵马十余万；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了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汉代一斤黄金折合一万钱，[14]二十余万斤黄金就是二十余亿钱。之前供养中央官吏每年只需要三千万钱，而一次战争的赏赐就是中央官吏年俸禄的几十倍，可见消耗之大。

但这还不是全部。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再加上正常的战争物资和粮食的消耗，汉代财政吃不消了。

为了应付这巨大的开支，主管财政的大司农拿出了库里所有的积蓄。当年文景时期积累的丰厚家底已经耗空了，可还是不够支付战争费用。

最后，武帝只好下诏卖爵，因为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买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头税，还可以当吏，甚至当官。

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连续两次进攻匈奴，令匈奴的浑邪王投降了汉朝。从军事角度讲，这又是传奇的一年，霍去病的征战可谓出生入死，一万兵马最后只剩下三千。他转战河西走廊五国，歼敌九千，缴获匈奴的祭天金人。不久，霍去病再一次孤军深入，杀敌三万。匈奴的浑邪王归顺了汉朝，这是一次分裂匈奴的巨大胜利。

关于此时期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司马迁只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数字：这一年汉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15]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的总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16]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战争费用大增、政府疲于应付之时，汉武帝的其他政策又导致了额外的花销：为了运送粮食和战略物资，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运输系统，政府于是兴修水利，开凿运河。开河的效果并不明显，却徒然耗费了巨款。

作为战略物资的马匹一直是汉政府的心病。在古代，一个国家的马匹数量在十万到几十万之间，一场战役的马匹消耗就接近这个数字。为了弥补马匹的消耗，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养马。他将数十万中原百姓迁往关西，但这些百姓一时间还不能养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给予补贴。

就在大司农还在战战兢兢地考虑如何应对如此之多的财政问题时，汉王朝在漠北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联军直捣漠北，完成了对匈奴的重大一击。霍去病更是深入位于今蒙古国境内的匈奴腹地，在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封礼。两位将军斩杀的匈奴合计达八九万人。

在这一大捷背后，财政却是另一幅景象：此役战死的马匹达十多万，不管采取什么政策鼓励养马，无论花多少钱，政府财政都禁不起战争的消耗了。而为了奖赏出生入死的战士，皇帝的赏赐高达黄金五十万斤（折合五十亿钱），超过了政府一年的常规财政收入。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皇帝又如何满足将士们对于金钱的渴望呢？

从冷冰冰的数字和空荡荡的国库可以看出，巨大的帝国一旦统一，就要承担高昂的统一成本，几次边境战争就足以拖垮汉代曾经健康的财政。

那么，汉武帝又将如何应对？

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

当战争这枚多米诺骨牌倒下时，汉武帝就已经失去了退路。为了应付巨额的开支，汉武帝启动了他的特别筹款之法。

对于依靠农业税和人口税的大一统王朝而言，这两项的常规税收是有限的。在汉初，帝国主要依靠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两种税收。土地税的税率是三十分之一，[17]土地的规模是固定的，所以土地税的总额也可以计算出来。人头税（成年人称为算赋，一年一百二十钱，未成年人称为口赋，一年二十钱[18]）针对人口征收，也可以相应计算。两项收入相加，折算成钱，一年大约在四十亿钱[19]。

一旦战争出现，土地和人口的数量不能迅速增加，税率也不能大幅度提高，而人力被从农业抽调进入军队，生产力还会受到影响。综合起来，税收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

武帝之前的汉代政府是一个消极型政府，除了收税和最基本的养官、司法、行政和一定的公共工程之外，不负责与具体经济有关的职责。政府由于过于简洁，在税收上更显无力。所以，一旦政府开支膨胀，常规渠道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资金的需要。

在汉匈关系还没有完全恶化时，汉武帝就已经考虑过征收商业税来满足战争需求。[20]但由于商业税的征收需要建立一套严密的财政班子，在这套班子没建立起来之前，征收商业税并不容易，而当前税收的额度也满足不了政府的战争需求。

汉武帝也尝试过出卖爵位甚至官位，但汉代卖爵的鼻祖并不是武帝。文帝时期的汉代虽然与匈奴维持着和平，但在与匈奴接壤的边界上却建立了防御阵地。为了保住阵地，需要向边关输送粮食，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沿用了秦代制定的爵位制度：如果有人向边关输送六百石粮食（合六户人家一年的产量），就给以上造的爵位；如果送四千石，就拜爵五大夫；送一万二千石，爵位为大庶长。

不过，汉初的功爵位与当官并不是一回事。爵位制度来自于秦国的商鞅变法。为了鼓励百姓征战，秦国法令规定，对享有战功的人封爵，相当于荣誉称号，一共设有二十个等级。在汉初，拥有高等爵位的人具有免赋免役的特权，不需要再出人头税和服役了，但是仍然需要缴纳土

地税。

景帝时期，上郡以西遭遇灾荒时，也曾有短暂的卖爵令，罪行较轻的犯人还可以交粮食抵罪。

武帝时，为了大规模卖爵，政府模仿秦代的爵级制度，另起炉灶，共设十一级武功爵，每一级武功爵的售价是十七万钱。公元前123年的一次战役之后，政府的一次卖爵收入就高达三十余万斤黄金。

武功爵除了可以免赋免役之外，还可以免罪。轻罪可以减免，重罪可以减轻惩罚。另外，武功爵的拥有者还可以担任吏。在古代，官和吏是分开的，吏的地位比官低，不让武功爵当官而只让当吏，也算是对官僚体系的一种保护。但是，到了最需要钱的时候，皇帝将这个隔离层也去掉了，许多人先购买爵位，之后进入仕途，大的封侯，小的当郎官。

武功爵出台后，西汉政府虽然暂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从长期来看，是丧失了帝国的常规税收。而当吏的人太杂，又导致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到最后，随着这些人进入官场，帝国的官僚系统也败坏了。这是杀鸡取卵的办法。

当卖爵还是不能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时，汉武帝将目光瞄准了另一端：货币。

在武帝之前，汉代的货币主要是文帝时期推出的四铢钱，钱币六枚重一两，它的面值和所含铜的价值相近。汉政府甚至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要铸币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格，都可以进入市场流通。

汉武帝采纳了酷吏张汤的意见，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皮币和白金。这两种货币的面值与真实价值严重不符，皇帝借助它们从民间抽取了大量的“铸币税”。

所谓皮币，基本材料就是一块白鹿皮，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可以充当四十万钱，也就是四十斤黄金。

由于兑换率不合理，近乎明目张胆的抢劫，市场拒绝接纳皮币。要推行皮币，必须依靠政权的强制性力量。依照汉代的礼仪，诸侯朝觐、

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汉武帝就看上了这块市场，他规定诸侯在贡献玉璧的场合，都必须用皮币作垫子，衬在玉璧下面。一个玉璧有时只值几千钱，而它的垫子却要四十万钱，等于让诸侯花大价钱购买一块不值钱的皮子。

如果说皮币是为了搜刮诸侯的钱，那么白金则是为了直接从民间搜钱。所谓白金是银锡合金。汉代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币，银并不属于法定货币。皇帝决定把它利用起来。

汉武帝制作的白金货币有三种：一种重八两，圆形，上面有龙形图案，叫作白选，一枚价值三千钱；另一种小一些，方形，上面有马的图案，价值五百钱；第三种更小，椭圆形，龟形图案，价值三百钱。

由于民间本来不使用银和锡做货币，加上白金的价格被严重高估，官方估值已接近金的三分之二，[21]出现了巨大的暴利空间。

民间社会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这类货币，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铸假币，希望以此牟利。短短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偷铸钱币、使用假币的行列。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监管市场，官僚阶层也因此变得更加庞大。这件事导致日后政府深度介入金融业，将整个金融业收归国有。另一方面，政府的法律机器也开动了。按照法律规定，那些偷铸货币的人会被判处死刑。但由于这个行业可以牟取暴利，在严刑重法之下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当所有的人都参与犯罪，法律就好像是概率决定的射击游戏，谁被打中了谁就自认倒霉，没有被打中的继续犯罪。但是，没有被打中的总是大多数。

对于白金持有异议的官员也遭到了排挤甚至杀害。历史上有名的“腹诽之罪”就出现在这个时候。

这位倒霉的官员是掌管财政的大司农，名叫颜异。汉武帝听从张汤的意见创造皮币时，派人征求颜异的看法，主管财政的颜异表示不赞同，说道：“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几千钱，而现在规定玉璧必须垫上皮币，这个皮币的价值却值四十万钱，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武帝听了不高兴。张汤乘机找人告发颜异，说他有意见不好好提，心怀不满，肚子里瞎嘀咕，犯了腹诽之罪，应当将其处死。

颜异之死向百官指明了方向，他们再也不敢表示哪怕一点点的不赞成。武帝开始变本加厉地用张汤的标准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

在官员的推波助澜下，武帝的政策已经被执行到荒谬的程度。在高峰时期，西汉每一百个人中，就有五个人因偷铸货币而犯死罪。[22]在这些犯罪的人中，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偷铸犯被抓，剩下的继续逍遥法外。

五年后，汉武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不能靠灭绝人民来推行政策。他推行挽救措施，签署赦免令，赦免了几十万偷铸犯的死刑。由于政府保证犯人自首就可以获得赦免，因此，又有一百多万人自首，而没有自首的人至少还有一半。

到最后，白金币终于支撑不下去，被废止了。

这次货币改革不仅没有满足皇帝的胃口，反而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如果要解决财政危机，必须从其他方面想主意。

到这时，国家垄断制度已经呼之欲出。汉武帝最终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获得无限制的收入，就必须把政府变成一家庞大的企业，这家企业唯一的任务就是为政府创造利润，政府想要多少，就供应多少。这就是官营垄断之源。这个办法也终于影响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国的经济和财政的走势。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

在叙述汉代的政府垄断如何建立起来之前，需要先谈一谈汉代政府的“理财专家”。

在任何一个朝代，只要政府出现了财政困难，就会出现一大堆吹鼓手，帮助政府鼓吹增加财政收入的好处；而财政收入的增加，意味着社会承担更重的负担，反过来又会造成经济的衰败。

除了这些吹鼓手之外，还会出现许多所谓的理财专家，帮助政府设计规则，来征收更多的税，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得财政收入。这些理财专家往往受到整个社会的顶礼膜拜，认为他们是最贤明的大臣，有着点石成金的妙手。

汉代的几个理财专家也受到大部分人的推崇，甚至到现在，人们还把这些人当作能臣的样板；而另一些人则意识到，这些理财专家所做的实际上是从民间抽血来供给政府，他们敛走的每一笔钱，最终都会通过另一种方式转嫁到人民的头上，形成更高的税收，并最终让人民无法承受。于是人们又给这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聚敛之臣”。

虽然中国的政治传统一直排斥商人，但汉代的几个聚敛之臣都是大商人出身。

汉武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挤压商人阶层，令民间的商业受损。也正是在这时，几位在商业中发过大财的商人摸准了风向，弃商从政，适时地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利用他们熟练的商业技巧，帮助皇帝敛财。

在任何一个政治侵蚀民间经济的时代，总会有一批原本成长于民间的商人把准了脉，跳出来要求被政府收编，希望用财产换取政府的保护，并在保护伞下谋取更大的发展。

汉代著名的几个聚敛之臣是：主管制盐的大农丞东郭咸阳、主管冶铁的大农丞孔仅，以及掌管帝国财政的侍中桑弘羊（商人子弟出身）。[23]其中，桑弘羊主持政策的时间最长，知名度也远高于前两位，被认为是古今第一能臣。

这些能臣又做了些什么来帮助皇帝获得军费呢？

他们和现代非洲的军事独裁者们所做的一样：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垄断自然资源，进而垄断最能影响国计民生的工业部门来获得收入。

在汉代，人们把自然资源的营利统称为山海收入。

在封建制时代的周代，天下所有的土地都被看成是天子的。但到了

战国时期，封建制和井田制逐渐解体，所有开垦的土地渐渐归私人所有。除了耕地之外，国土资源中还包括山泽和海岸等非农地资源。在周代，非农地资源也曾经是天子的财产。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农地归了个人，可是山海资源理论上的所有权[24]仍然在统治者手中。

但实际上，山海资源也已经被私人利用了。为了矿石、木材、野兽、鱼类和海盐等资源，人们纷纷到山中、海边去谋生。统治者默许了人民去开发自然资源，但也在山海地带设立了关卡，让私人按照比例缴纳税收，这笔税被称为山泽税。

汉代的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两部分。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掌握，主要收入来源是全国的土地税，用于国家治理方面的花费，如军费、官员俸禄等。而皇室财政主要由少府掌握，主要来源就是山泽税，用于皇家的生活开支。由于山海在理论上是皇家的，所以山泽税收入归皇室所有。[25]

通过税收制度的安排，山海资源事实上已经归私人使用，而皇室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这就出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局面。但是，这种趋势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逆转，山海资源并没有完成私有化的最后阶段，反而又被国有化了。

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消耗太大，皇帝首先作出了牺牲，主动将山泽税中的盐铁税收从少府划归给大司农管理，也就是皇帝把体已钱拿出来补贴国家财政。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政府财政进一步枯竭，皇帝发现还需要对盐铁制度作一系列的“改革”。

由于盐铁是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工业部门（支柱产业），民间参与盐铁业的人，有的已经成了巨富。司马迁曾经给大商人立传，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至少一半的大商人都是盐铁业出身。

当国家财政接近崩溃的边缘，民间却还有巨富存在时，这些巨富自然成为国家的目标。汉武帝先是提高商业税，希望富人们出钱帮助政府渡过难关。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商业税已经无法满足皇帝的胃口。要实现财富从私人向政府的转移，必须有一个全盘性的安排。

这时，东郭咸阳和孔仅扮演了财政专家的角色。他们都是盐铁商人出身，成了官吏后，更加知道商业的法门在哪里，如何替皇帝赚快钱。经过研究，他们提议将盐铁工业，也就是汉代最先进的两个工业部门，立即全部收归国有，不准私人经营。

为了这次国有化，他们铺垫了一系列的理论。他们并不承认这么做是为皇帝打仗筹集资金，而是以民生的名义来进行改革。他们认为，盐铁工业在以前是私营的，许多大商人因此而暴富，这些富人有了钱，也就更有能力奴役普通民众了。为了公平起见，必须将盐铁收归国有，再由政府来保护普通人民的利益。

理论工作完成后，这项政策立即付诸实施。后世之所以关注这项改革，除了盐铁收归国有这个事实之外，更是因为汉武帝为此建立了一整套国有机构，而这套机构是日后历朝历代的重要蓝本。

在这几位聚敛之臣的帮助下，政府首先制定了严厉的手段，惩罚私自铸铁采盐者。[26]之后，招募工人，由政府供应采盐采铁的工具，组织他们工作，再把采出的盐和铁矿石专卖给政府。在产盐铁的地方，政府垄断，低价采购，再运到外地高价售出——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的利润。

为了防止盐铁工人偷出盐铁，私自贩卖，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并在各地设置了管理盐铁的官吏。在产地，这些官吏负责收购；在其他地方，官吏则负责销售盐铁产品。

汉代的盐铁官吏遍布全国，据《汉书·地理志》统计，全国至少有四十四个地方设置了铁官，至少有三十二个地方设置了盐官。这些设置盐铁官的地方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产盐产铁的地区。这些官吏的设置，让原本功能简单的政府机构复杂化了。原来政府只管收税和花钱，在经济方面，只扮演仲裁的角色；而自此以后，政府成为市场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拥有压倒性权力的参与者。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民间经济的繁荣。

关于盐铁工业官营化的弊端，可以从一些史料里获得证实，其中之一是汉代桓宽的《盐铁论》。这部书提到，由于铁器只能由公家铸造，

老百姓如果要用铁，必须向专营的经销商购买，经销商从政府控制的制造企业批发。但制造企业并不关心民间的需求，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指令，生产的铁器往往是劣质的，也不会根据市场作出调整。结果，老百姓要么买不到合用的工具，要么只能买到劣质的工具，而且价格还很贵。

盐业垄断的弊端，在西汉没有具体的数字可供参考，但我们可以从后世的效仿中找到一些痕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唐代。[27]由于唐代前期没有实行食盐专卖，到了后期才建立了专卖制度，所以，比较两个时期的盐价，就可以知道政府从中获利多少。

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到肃宗至德年间（公元742年至756年），由于没有实行食盐专卖，所以每斗盐只值十钱。到了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实行盐业专卖，每斗盐立刻涨到一百一十钱，上涨了十一倍。到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98年），淮南盐已经涨到三百一十钱，后来又涨到三百七十钱。而江淮那些经过政府认证的大盐商为了追求利润，还要再将盐价提高一倍出售。由于盐价高昂，许多百姓甚至不吃盐了。

从十钱涨到三百七十钱，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实行官营之后，从民间抽取的垄断税。正因为这样，许多朝代的盐税曾经占政府总收入的一半。[28]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

当盐铁官营制度建立之后，汉代财政制度为之一变，从以土地税为主，变成了土地税、盐铁收入并重，政府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的体系已经建立，但这还不能完全满足汉武帝对于财政的需求。

于是，他将目光再次投向了商业税重组的问题。

在马邑之战后不久（约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已经引入了商业税。这种税的征收方式是：由于商人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使用载货车辆，政府就设立关卡对车辆征税，叫作算轺车。

此前，税收大部分都是依照土地和户籍而征收的，土地和户籍都是固定的，容易征收，而商人和货物却是流动的。所以，虽然规定了商业税，但征收难度很大。直到皇帝更加缺钱的时候，才想起要采取更为严厉的征收办法。

首先，政府逐渐细化有关商业税的规定。政府规定，商人每拥有价值两千钱的资产，就要缴税一算（一百二十钱），税率是百分之六。手工业税率为百分之三。对于不好计价的货物就按车算，平民有一辆轺车要缴纳一算的税，有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缴纳一算的税。商人的税收还要加倍。

虽然税制很详细，但由于规定过于苛刻，没有人主动缴纳。因而，皇帝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雇佣大批的帮手——酷吏去征税。武帝时期成为西汉王朝酷吏最多的时代。[29]

即便在武帝时代，大部分有尊严的士大夫对于政府的横征暴敛也是有看法的。皇帝要征税，只能依靠那些“大无畏”的酷吏。一时间著名的“刀斧手”云集：御史大夫张汤，御史中丞减宣、杜周，以及推崇严刑峻法官至九卿的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相继而出。

其次，为了配合商业税的强制征收，汉武帝颁布了《告缗令》，这是一项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的法令。民间社会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许多人热衷于打探邻居的财产，告发他们，获得分成。在这股吃大户的风气下，全国中等资产以上的家庭大部分都被告发过[30]。

《告缗令》由一个叫杨可的人推行，而主持审判工作的则是著名的酷吏杜周。

在《汉书》中，班固为杜周刻画了一个入木三分的形象。杜周当廷尉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逮捕的郡守及九卿以上的官吏俸禄二千石以上，和现在做个对比，可以理解为省部级以上不下百余人，每年由地方上交审讯的案件不下千份。一个大案所牵连的人动辄数百人，而小案牵连的也有几十人。为了查证案件，办案人员来来回回折腾数百里甚至千里。遇有不服审判者，狱吏则采取严刑逼供的办法来定案。到最后，人们一听说惹上官司了，就立即逃亡，免得落在杜周的手里。有

的案件拖延十几年还未结案，监狱里关押着十余万人。[31]

就是这个杜周，当官前只有一匹马的财产，当官后成为巨富，并安然善终。

在杜周的主持下，没收的民间财物以亿计算，奴婢以千、万计算，没收的田地大县有几百顷，小县也有上百顷，中等商人大都破产，政府收入大大增加。

告缗钱上缴后，大都交到了上林苑，于是武帝专门派遣一个新增加的官职——水衡都尉来管理上林事务。由于钱多了，上林苑需要扩建，武帝就在这里大修亭台楼阁，还以征讨南越为名修建巨大的战船。这些钱如果留在民间，本可以作为发展经济之用；而收归政府后，却成为战争和高档馆所的浪费之源。

汉武帝最后两项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叫作均输、平准。这两项政策所引起的争论也是最大的。特别是平准政策，从初衷来看，人们认为它是一项好政策；但从执行来看，不仅没有预想的好处，反而带来无数的恶果。后世的书生往往根据初衷来相信平准的好处，而不去检查一下实际的执行效果。

这两项法令由著名的敛财能手桑弘羊提出，其目的仍然是增强政府的财力和对经济的控制力。

所谓均输，是一种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做法。汉代的土地税主要以粮食的形式上缴，但把粮食从地方运到京城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均输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这些粮食，在当地卖掉，换成钱，或者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把土特产品运输到外地高价出售。粮食价格低又笨重，换成土特产品价高量轻，而且土特产品往往在产地很便宜，在外地很贵。这样，政府就可以在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吃买卖的差价。

从理论上看，均输是一种市场调节机制，如果实行得当，各地的产品分配会更加均衡。但执行的实际效果是：政府参与市场之后，不仅没有平抑物价，反而会利用权力压低采购价，抬高出售价，形成剪刀差，

赚取额外的利润。因为政府拥有着权力资源，能够通过公权力形成垄断，将其他玩家踢出去；而它奇高无比的管理成本又会抬高商品的价格。

所谓平准，是指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接济社会。但接济不是免费的，而是采取一个低于市价、高于收购价的中间价，这个价格既可以保证政府盈利，又保证民间获得较为平价的粮食。这就像水库对水位的调节一样，丰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

由于历代政府都强调民以食为天，平准的原理吸引了大部分的执政者，他们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设立平准仓来平抑粮价，有的时期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历朝历代的实际运作中，平准仓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

首先，政府一旦缺少了收入，就会打平准仓里粮食的主意，盘算着怎么卖掉，把钱拿去充当养官成本。灾难真的来了，人们往往发现平准仓空空如也，不知道粮食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

其次，仓库里的粮食也有保质期的问题。政府的仓库往往管理不善，许多粮食发霉、变质，被平白浪费掉了。

再次，政府一旦逐利，会变得比私人更加凶狠。敛财的官员们很快学会如何坐庄哄抬价格，不仅起不到平抑的作用，反而成了粮食市场上最大的玩家，把其他的商人都挤兑出局。加上还有一些关系户和官员相勾结，依靠政府资源大发横财，平准仓成了少数人的工具。

在历史上，人们往往根据理论和教条得出某些结论，却没有实在地去考察，致使某些政策看上去很美好，可一旦实施，必然变味。至于统治者推出上述政策的实际目的，也往往不是所谓的民生，而是看上了它们盈利的能力。

消失的小政府

比较武帝统治前后，就会发现汉代的宫廷已经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气象。

在武帝统治初期，汉代几乎是小政府的典范：土地实行私有制，人们只需缴纳很轻的土地税。政府开支不大，人头税时常减免。其他自然资源也由私人开采，皇室抽取一定的税。整个官僚阶层规模不大，养官成本很低。同时，官员的职责主要在于收税和维持地方治安，不参与具体的经济运行。

到了武帝统治末期，中央政府机构已经变得臃肿不堪了：首先，政府的官员构成发生了变化，掌权的人里塞进了大量“有商业头脑”的“能臣”，这些能臣将中央政府变成了一家混业经营的庞大公司，这家公司既负责生产盐铁等当时最急需和最先进的工业产品，还控制了很大一块的流通行业，特别是长途运输业。同时，这家公司还介入了最有利可图的粮食和土特产买卖。

对于这些能臣的所作所为，其他大臣们也怨声载道。比如，太子太傅卜式就抱怨说：“当官的职责本来是收税，可桑弘羊却下令叫官员们坐在街上的店里做买卖赚钱，太不像话了。”

从官职来看，最初负责财政的是大农，当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后来汉武帝将盐铁和货币管理权也交给了大农。大农管理不过来这么多事情，又设置了水衡都尉负责管理盐铁事务。《告缗令》颁布之后，从民间来的罚款源源不断地输送进了上林苑，于是武帝就叫水衡都尉管理上林事务。汉武帝大修亭台楼阁，钱都出自上林苑，水衡都尉的权力愈加扩张，但还是管不过来了。

汉武帝只好把权力分散到水衡都尉、少府、大农、太仆等各个官员手中，又让他们安排了一系列的官员，负责管理没收来的土地。至于没收来的奴婢，也由政府出钱养着，让他们照看宫殿、马匹、飞禽走兽。

到后来，各种官吏、奴婢的数量大增，都要靠政府供养。在武帝统治初期，每年只需要几十万石粮食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经过无休止的改革后，政府每年通过黄河运入的四百万石粮食仍然不够官僚系统的挥霍。单单养官一项的财政负担已经翻了好几倍。这些钱都转化为民

间的经济负担。政府控制全国经济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各种官吏霸占市场，成为经济的大玩家。

武帝时期的财政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之前是以农业等常规税收为主，之后则越来越依靠官营垄断产生的利润；同时，政府垄断了铸币权，抽取了铸币税；另外，政府还利用流通领域的买卖差价获得了大量的收入。

到了汉元帝年间，民间的经济负担虽比武帝时期轻了很多，然而，正规税收之外的项目仍然占总财政的一半以上。[32]

对于农民来说，农业税和人头税虽然没有明显增加，但他们所受到的盘剥却十分严重。首先，他们购买的工业产品价格更高，用以支付政府的垄断税。其次，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后，商人成为一个特权阶层，这个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社会的贫富差距大幅度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阶层到农村收购了大量的土地，成为大地主。西汉的豪强大族、东汉的世家大族，以至魏晋的士族问题就是在这时候萌发的。

由于汉武帝时期充斥着各种各样享有特权的阶层，这些阶层不缴纳农业税，又拥有着庞大的土地资源。所以，农业税被不平等地强加在弱势的农民头上，他们拥有更少的土地，却承担更高的税负。到这时，中国历代社会中的弊病都一一显现。

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东汉和唐前期的政府没有采取国家垄断的做法，其余历代统治者大都没有摆脱汉武帝的统治模式。国家垄断成为中央帝国的财政秘诀，逐渐成为唐以后各个王朝的标配。

汉武帝对于财政收入的渴求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在制度上，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为了拥有足够的权力去改革，武帝破坏了汉初形成的官僚体制的平衡，建立了一套围绕皇帝的内廷系统，从此以后，制度失衡问题一直困扰着汉代的统治者们。

在西汉初年建立的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中，三公之首（也是百官之首）是丞相。皇帝负责定调子和把握方向，丞相则负责整个国家的吏治和日常行政工作。[33]

然而，在武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复杂改革之后，由于政府承担了太多的职责，从开办国有企业到征收商业税，再加上官吏队伍变得庞大、难以管理，皇帝感觉丞相已经无法领会他的意图，做这么多的事情了。因此，皇帝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这个委员会依托于少府下面的一个小机构：尚书台。

所谓少府，本来是服侍皇帝起居的。丞相的衙门对外治理国家事务，而少府则属于伺候皇帝的内廷机构。少府下属的尚书台在秦代就已经存在。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应付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一个随时都能领会皇帝意图的部门，所以皇帝削弱了丞相的权力，加强了尚书台，形成了一个围绕皇帝的决策机构。这个设在宫内的小机构（内廷）让皇帝可以不用公开办公，在私人场合找几个人一商量，就把政策定下了。

不过，虽然尚书台的地位得以提高，但尚书台的官员，比如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的级别都很低。所以，这些官员一旦离开了尚书台，权力立刻丧失殆尽。为了保住权势，他们势必将自己的命运与皇帝绑在一起。

另外，武帝喜欢征战，对于武将也更加倚重，分封了许多将军，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将军卫青。卫青之后，大将军成为一种封号，武帝死后，接受托孤重任的霍光（霍去病的异母兄弟）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进行统治。大司马是三公之一的太尉的改称，也就是掌管武装部队的最高官员。通过制度变更，丞相的权力就转移到了掌管尚书台的大司马大将军手中。

到了东汉时期，尚书台成为最核心的权力机构。

在日后的历史中，我们还会看到无数次权力的内廷化。当皇帝觉得现有的机构不能领会他的意图，对他形成羁绊时，就会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机构来掌管权力。这种对原来官僚架构的破坏，令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也造成了大量的冗余官员。政权的不稳定，以及官僚机构的烦冗，甚至成为整个王朝的绝症。

统一的代价？

关于汉武帝的改革，人们的争论仍在继续。

本书只利用现代财政工具，分析并描述了汉武帝建立新财政体系的经过，并将国家垄断型财政体系对民间经济的破坏摆在了读者面前。

然而，许多人却把焦点放在另一个问题上：国家垄断和政府干预到底是可以避免的恶，还是必要的恶？

许多人认为：政府垄断确实拖累了民间经济，但这是中国建立大一统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根本没有办法避免。

当汉高祖在如此庞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时，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为了维持它的统一，帝国必须拿出相当一部分资源来发展军备，防范外部的敌人，又要加强政府官僚体系的控制力，来镇压内部的反抗；而军备资源和养官成本最终肯定会超出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逼迫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去敛财。汉武帝采取的办法，是统治者能够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宣称要放权于民，一方面却舍不得放弃垄断的“蛋糕”的原因。

在大一统帝国下，人民享有无数的好处：迁徙的便利，市场的庞大，和平带来的飞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切，我们必须承担一部分集权之恶，养活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为了养活这个体系，又必须忍受政府垄断资源的存在。

这就是“必要的恶”理论。

但是，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巨大的困惑：即便保留政府垄断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保留所有的“必要的恶”，可一个王朝仍然没有办法永驻。

虽然每个王朝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它们都被财政制度本身拖垮。或者说，最终不管如何努力，不断扩张的政府财政还是要拖垮经济，将整个社会变得脆弱不堪，这时候，一个小错就会导致全盘的解体。这就好像癌症一样，到后期，当肌体被癌细胞侵蚀，任何的小毛病都将导致健康的崩溃。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否定或者肯定这种“必要的恶”，只是想将它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线条中剥离出来，展现给读者，请读者自己分析、判断。

于是，我们必须回到统一的源头，去看一看这个制度如何建立，又如何在千年轨道中一次次挣扎和重归往复……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33年—公元前87年。

[2]马邑之战的详细情况主要记载于《史记·韩长孺列传》《史记·匈奴列传》《汉书·韩安国传》《汉书·匈奴传》。

[3]《汉书·韩安国传》：“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4]见《史记·韩长孺列传》。

[5]《史记·匈奴列传》：“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6]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著有《国富论》等。

[7]《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朝刚建立时，由于社会物资匮乏，甚至连皇帝都找不到几匹纯色的马来拉车，而将相只能乘坐牛车。七十年后，社会物资已经极大繁荣，人们聚会时如果骑母马，都会受到嘲笑。

[8]见《史记·平准书》。

[9]关于汉代生产率和物价的讨论，参看本书第二章及注释。

[10]《汉书·地理志》：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

[11]从公元前166年起的十三年间，汉文帝持续免除全国的农业

税。具体情况参看本书第一章。

[12]见《史记·匈奴列传》。

[13]马邑之战后，由战争引起的财政变化，主要记载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

[14]《史记·平准书》［集解］瓒曰："秦以一溢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又［索隐］大颜云："一金，万钱也"。

[15]《史记·平准书》："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同篇的上文，有"京师之钱累巨万"。集解引"韦昭曰：巨万，今万万"。

[16]《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武帝之前，少府收入还没有增加，中央财政依靠百姓赋敛，按四十亿记，大约是上百亿的几分之一。"

[17]土地税税率出自《汉书》，详见本书第一章。

[18]与土地税有明确记载不同，汉代的人口税记载相对零散。《汉书·惠帝记》注引《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可参考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上册）。

[19]税收总额的讨论，见本页注释a。

[20]《汉书·武帝纪》："（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

[21]一斤黄金价值万钱，而一斤（十六两）白选的价格也已经是六千钱。

[22]《汉书·地理志》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总人口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达到鼎盛。在武帝时期人数应当低于此数。根据《汉书·食货志》，"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偷铸犯中赦免、自首、法外的三项几据相加，已为二百几十万人。故偷铸犯已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23]《史记》《汉书》均未给这几位聚敛之臣单独列传，他们的事迹主要见于《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盐铁论》。

[24]山泽资源的归属问题，可参考钱穆《汉代经济制度》一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25]《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

[26]《史记·平准书》："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没入其器物。"

[27]见《新唐书·食货志四》。

[28]西汉、唐中晚期、宋、明、清前期，盐税都曾经占总税收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29]《汉书·酷吏传》记载了十三个酷吏，其中武帝时代的酷吏有八人；而最为酷烈的杜周、张汤、江充等人都分别立传，没有记入《酷吏传》。

[30]《汉书·食货志》："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

[31]见《汉书·杜周传》。

[32]《汉书·王嘉传》："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33]制度问题的材料来自《汉书·百官公卿表》。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秦到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

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1]

秦代灭亡的原因跟“仁义”毫无关系，而是亡于战争财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秦为了统一六国，围绕着战争建设了一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但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崩塌。

秦代灭亡后，社会的普遍思潮是：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集权帝国注定会失败，谁也无法以合理的财政成本来维持帝国的统一。在这种思潮下，人们更倾向于回到战国时代，建立众多的国家，来分散统一帝国的风险。

刘邦没有顺从这种思潮，而是逆势而动，重建统一的集权帝国。然而他死时，这个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财政上离心力过大，不可持续。

文景时期，是集权帝国的二次构建时期，不仅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还要通过财政制度的建设，来压制地方的离心力。文帝采取了拖延战略，先发展经济，至于地方诸侯问题，则留给了未来。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给中央政府留了机会，完成了官僚和财政的集权，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到这时，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趋于稳定。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被丞相赵高推上了王位。此刻，他祖父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已经存在了十五年[2]。

子婴登基时，并没有像他之前两任君主那样称“皇帝”，而是改用“秦王”的称号。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接手时疆域已经大大缩水，当不起“皇帝”的称号了。

秦始皇时期，秦的疆域从西方的临洮、羌中直到东方的大海，从北方的长城直达越南北部的象郡。但是子婴继位时，原来的六国都已经叛乱，名义上属于子婴的，其实只有关中一带属于原来秦国的部分。可是这一部分也濒临失控，起义军已经来到家门口，只等着入关了。

继位四十六天后，刘邦兵临城下，子婴出城投降。秦代灭亡。随后，起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在项羽的率领下也到来了。

项羽杀掉了子婴。起义军将领在项羽的主持下瓜分天下，各自称王。秦代统一的疆土被分裂成十九个诸侯国。其中，先入关的刘邦被封为汉王，接收了巴蜀和汉中之地，定都南郑；而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占据了梁、楚地的九个郡，定都彭城。

这就是楚汉相争的起点。四年后，汉王刘邦灭西楚霸王，建立了汉帝国。

人们常常把楚汉相争当作一场普通的争霸战。在汉代以后的争霸战中，争战双方怀着同样的目的，都想获得整个帝国，称帝登基。因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项羽获胜，也会像刘邦一样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西楚帝国”。

但这只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大一统的观念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形成的。[3]在秦代灭亡之后，项羽以及大部分的军事将领并没有想要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楚汉相争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想的争锋。在刘邦要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同时，大部分人的理想却是：废除皇帝，回到诸侯时代，由各个诸侯管理自己的国家。对于他们而言，项羽本人则是一个齐桓公式的霸主，不是皇帝，对于各个诸侯国只有有限的监督权。

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帝国。

但这两种选择的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是不均衡的。秦末民变一爆发，诸侯力量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人们纷纷杀死秦始皇派去的守丞，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参与到复国运动中去。[4]

虽然首义的陈胜自称陈王，建号“张楚”，希望将反秦的力量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诸侯力量很快就占了上风。民变不久，六国纷纷称王复国[5]。其中，齐、楚、魏、韩四王都是原来四国的王室后裔，而首先占据赵国土地称王的是陈胜的大将武臣，武臣死后，赵国贵族后裔赵歇也恢复了对赵国的控制。唯一由外人占据王位的是燕国，但燕王韩广、臧荼相继称王后，也都不让外人插手，以维持燕国的独立地位。

在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之外，还有另一股势力也不容小觑，他们是掌握了军权的各将领，包括项羽、刘邦、张耳、陈余、彭越、英布等人，这些人不属于六国宗室后裔，实力却比复国的六国还要强大。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没有统一的理念，他们受到六国的影响，也憧憬着割据一片土地，独立称王。

在这种局面下，作为反秦势力中实力最强的项羽，顺应了流行的想法，在灭亡秦朝之后，将原来的七国土地分割成了十九块，建立了十九个诸侯国。其基本做法是把七国每一国的土地分成若干块，除了保留一块给六国的后裔之外，其余的分封给各个功臣。只有秦国是个例外，由于暴秦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不可能让秦王的后裔保留统治权，就由投降了项羽的三个秦朝将领瓜分了原来秦国的国土。

另外，项羽、刘邦原都是楚王的将领，楚王曾说过，谁先攻克关中（函谷关和武关以西，即统一之前秦国的土地），就让他当关中的王。为了兑现这个许诺，项羽还把秦国的汉中和四川（关中地的一部分）两地分出来，交给了刘邦；[6]而项羽本人的封地则分割自楚国。

分封后，各王并没有隶属关系，各自统治自己的诸侯国，从内部征税，组织军队，维持内部秩序。

在项羽的政治蓝图中，他所建立的新秩序是另一个诸侯时代，而大部分获得分封的诸侯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个蓝图中存在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当年战国时期，主要国家只有七个，还相互攻伐，战争不断。如今有十九个国家，又如何保证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就算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争斗，国家内部的争斗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外部的裁判员，到底谁能做裁判？

项羽认为这个裁判就是他本人。

与其他的王不同，项羽号称“霸王”。现在人们一提起霸王，首先想到的是蛮横、不讲理的人，然而在古代，“霸王”一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称号。项羽怀念的是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以最早称霸的齐桓公为例，齐国强大以后，齐桓公在中原负有更高的责任，他要调停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防止他们逾矩，主持正义，扮演着类似当今世界“国际警察”的角色。当一个国家的国君承担起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角色时，人们尊他为“霸”。项羽自称霸王，就是希望与其他王区别开来，表明他担负着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责任。

当然，这个霸王与皇帝是完全不同的。霸王在平常不干预各国内政，只是在特殊时期维持一下秩序，大部分时间里只满足于统治自己的国家；而皇帝却要做所有领土的主人，让所有的人都听命于己。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不想建立统一的帝国，反而纷纷盼着回到从前的诸侯国模式呢？

答案可能出乎现代人的意料：在当时的人看来，组织一个疆域广阔的超级帝国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现在的世界作比方，人们已经习惯了世界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各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如果有人宣称要在地球上建立统一的帝国，大部分人都会嗤之以鼻。原因很简单：这种国家以前没有出现过，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这么大的国家，其复杂度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组织能力。

在秦代以前，整个华夏地区就是一个小型的地球，人们早已习惯了各国的存在。对于他们而言，这种分立的状态只不过被秦始皇中断了十五年而已，而这十五年又是不成功的。因为即便是秦始皇，也无法长期维持它的稳定，还让人们的生活越过越糟糕，大家都在盼着它分崩离析。

与后世认定秦代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起点不同，秦亡的几年内，人们反思的却是秦的建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狂妄尝试，它的失败是

注定的。

不仅在中国要注定失败，哪怕放眼全世界，秦代以前都很难找到一个如此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人们往往被古代埃及辉煌灿烂的文明所迷惑，以为那是一个古代的大帝国。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古埃及法老的统治只局限在尼罗河两侧几千米到十几千米宽的河岸上。以现代埃及为例，埃及的总国土面积达一百零一万平方千米，可居住面积却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三多[7]，不足四万平方千米，不到中国陕西省（二十万五千八百平方千米）的五分之一，远小于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古国也只局限在两河流域的狭小平原里，在沙漠和沼泽之间，面积只有一万五千平方千米，小于古埃及。

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是古埃及的新王朝和赫梯人（Hitties，位于今土耳其）争霸的时代。在此期间，埃及领土大大扩张，终于超出了狭小的尼罗河河谷。但不管是埃及还是赫梯，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集权帝国。埃及在尼罗河河谷之外、位于中东地区的领地大都是靠间接统治来维持的，这些地区有自己的国王，只是名义上服从于埃及。这与真正的中央集权制——由皇帝派遣官员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秦代之前的西方世界，只有两次建立庞大帝国的尝试。第一次是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30年），也称波斯第一帝国。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尝试建立横跨亚非欧三洲的统一政权。第二次尝试则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建立的帝国。

波斯帝国是最接近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遗憾的是，虽然波斯本部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当波斯王的征服带来更多的土地时，他们仍然很难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同样的集权官僚制度，只能因地制宜，派遣总督，或者听任当地统治者继续管理。[8]

这仍然是一种集权制和封建制的混合制度，一个强大的核心带着众

多松散的外围区域。政权的兴衰取决于本部的国王的能力，甚至取决于一场战争的胜负，当本部军队被消灭，外围区域立刻脱离核心。

当亚历山大大帝的步兵方阵横扫波斯时，帝国无力抵抗，走向灭亡。但取代波斯的亚历山大帝国表现得更加不稳定。它是一种军事征服的产物，甚至在还没有建立固定的制度时，就垮台消失了。

从西方的例子也可以看出，秦代之前，整个世界范围内没有人能够建立稳定的、制度统一的集权官僚制国家，几次尝试要么很快失败，要么仍然是松散的拼图模式。

那么，为什么几大帝国在创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时失败了呢？

答案是：要建立统一的国家，需要经历两个步骤。第一步，用军队进行武力征服；第二步，用文官进行政治征服，建立统一的制度。不管是波斯帝国还是亚历山大帝国，都完成了军事征服，却无法完成政治征服。

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获胜者往往是那些能够调动一切财政资源为战争服务的一方；而在政治征服时，却又要调动主要资源服务于政治和民生，建立制度，发展经济，使人们在新的框架下安居乐业，不再想着回到过去的制度。

但是，如何将军事征服转向政治征服，人们很难把握。当军事征服刚结束，由于惯性，大量的军队仍然存在于四方，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如果迅速把财政权从他们手中移开，会造成军队的不稳定；如果继续让军队掌握过多的资源，又无法建立起后续的政治结构，最终会产生资源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于是，依靠军事打下来的帝国，又在军人的纷争或者财政危机中分崩离析。

在秦代，这个问题同样是它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从春秋进入战国，大量的诸侯国消失，只剩下几个强大的国家。战

争也早已从纯粹的武力炫耀变成了财政的比拼。

哪个国家能够建立起更高效的财政系统用于战争，它就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于是，各国进入了一个竞相变法的时期。所谓变法，本质是改变经济资源的配置，提高国家财政效率的做法。

早期的变法起自鲁国的初税亩。所谓初税亩，就是丈量土地，摸清楚全国土地数量，再根据土地面积征税。

在实行初税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封君所有制，或者说土地封建制。

名义上，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周王的权力却极其有限。当他把鲁国的土地分封给鲁国的国君时，就不再掌握鲁国的土地收益了。每年鲁国国君只需向周王象征性地进贡，就获得了鲁国的统治权和财政权。

但是，鲁国的国君也无法完全控制他的土地。当他把某一个邑分封给某个贵族（比如孟伯，即孟孙氏的伯爵）时，那么这个邑的农民就向孟伯缴纳粮食，而不再向鲁国国君缴纳。每个国家内部的下级封君（贵族）对国君承担的义务是：当国君需要打仗时，贵族有义务按照封地的大小，赞助一定的军士和装备，而供养这些军士和装备的钱由贵族承担。

所以，每一个国家的军队，其实是许多下级封君共同拼凑的，战斗力并不强。而国君由于不控制贵族土地上的税收，也没有足够的财政规模来组织更加庞大的军队。

到了春秋后期，随着几个大国的崛起，国君感到这种杂凑的军队已经不能满足军事需要了。他开始组织属于自己的军队，这时，财政问题就更加突出。

与此同时，在每个国家的贵族斗争中，也出现了分化，大量的低级小封君消失了。每个国家内部要么国君变得强大，将下级封君都压制住

了；要么国君衰落，而次一级的几个大封君掌握政治优势。比如，在晋国，国君逐渐被边缘化，四个次一级的封君却崛起了，分别是韩、赵、魏三个子爵，以及智氏一个伯爵。韩、赵、魏灭了智伯，并取代了晋国的国君，在原来晋国的土地上成立了三个独立的国家。在齐国，一个田氏的子爵最终取代了姜氏，当上了齐国的国君。[9]

新君取代旧君之后，就派出只向国君负责的“令”和“守”去管理这些直属于国君的土地，农民缴纳的粮食直接归国君所有。这就是直属于中央的县的雏形。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土地仍然属于没有完全消失的各级封君。

另外，随着战国时期人口增多，许多新增人口分不到成熟的土地，但还有大量的荒地没有利用，新增人口都跑去开荒。这些开荒的土地由于没有登记，没有具体的归属，所以不需要向任何封君缴纳粮食。时间长了，各级封君发现无主的土地已经吸引了太多的人，而封君们自己的土地产出却越来越少，影响了税收，而税收的减少又影响了他们的军事实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势必实行一次土地改革，对土地进行重新统计，重新分派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为了让耕种者配合土地改革，封君们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原来土地在名义上都是属于各级封君的，耕种者只有使用权，而改革要实现土地私有化，承认耕种者就是土地的主人。耕种者为了获得土地，付出的代价就是按亩缴税，土地越多，缴税越多。

通过利益交换，封君和耕种者实现双赢。耕种者获得了土地，而封君增加了税收。

土地改革最早从鲁国开始。主持改革的是鲁国的次级封君季文子。在鲁国，国君权力并不强，几个次级封君垄断了政权，分别是孟孙氏（伯爵）、叔孙氏（子爵）、季孙氏（子爵），以及东门氏。在改革前，东门氏实力最强而且把持了朝政。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在东门氏的公孙归父掌权时，来自季孙氏的季文子为了对付公孙归父，建议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清丈

全国的土地，进行土地确权，并按照统一的税率收税。[10]这种做法使得鲁国的税收大为好转，并且由于承认了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季文子在政治上赢得了民心，击败了东门氏。与此同时，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却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壮大。

季文子的改革引起了列国普遍的关注。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发现，鲁国的改革可以让财政收入骤然增加，使政府有能力组织更强大的军队。于是，这项改革迅速被各国效仿，向整个华夏铺开。

特别是那些已经解决了下级封君干政问题的国家，一旦进行初税亩改革，国君手中的财政力量会大大增强，有可能组织更强大的军队，形成更大规模的政权，土地改革使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速兼并的时代。

在这项改革中，地处西北的秦国却属于落后的一方。直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才“为田开阡陌”；两年后，才“初为赋”，开始征税。这时距离鲁国最早的初税亩（公元前594年）已经过去了近二百五十年。[11]

秦国土地改革之所以这么晚，源于秦国落后的制度。它在诸侯国中资历浅薄，又地处六国的西部，孤零零地在关中平原，与中原地区隔绝，与北方和西方的蛮族接壤。

然而，在所有不利因素之外，秦国的隔绝和落后却又变成了它最大的优势：由于六国发展过早，国家内部已经有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即便经过了艰难的兼并和整合，国君仍然无法将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统一战争中。秦国由于发展较晚，国内的利益关系简单，更容易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将每一份资源都用到战争上。

在财政问题上，齐国和秦国是可以进行对比的两个案例。

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和齐湣王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他们分别加了尊号，称为“西帝”和“东帝”。[12]在古代的礼仪中，“帝”是一个比“王”更高的称号，自五帝以后，就没有人再使用了。秦王和齐王的举动，是想告诉世人，他们已经强大到超乎其他诸侯王之上，不满足于只称王了。

虽然两国君主很快就去掉了帝号，但这也反映出当时齐国是足以与秦国抗衡的大国。另外，齐国的商业远比秦国发达得多。自齐国的开国国君姜太公起，齐国就确立了以手工业和商业立国的方针，长期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13]齐国和秦国的争霸，也大有商业文明对垒农业文明的势头。那么，为什么齐国最终却在与秦国的竞争中失败了？

主要原因就在于齐国国内复杂的利益团体阻碍了齐王掌控更多的资源。其实，齐国发展商业也带着很大的无奈，因为国内耕地面积本来就狭小，而土地贵族又过于发达，国君很难通过土地获得足够的税收，只能通过发展商业来获得财政收入。

相比而言，秦国建立时，它的国土面积并不大，却很单纯。后来秦国的历代国君向西逐渐扩大土地，建立起庞大的国家。这些新征服的土地上还没有形成利益集团，也没有分封，都归国君直接管辖。

秦国国君最初就派遣直属官员来统治这些土地，制定统一的政策。秦国的结构一开始就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其优势远大于其他国家。它的郡县制也比其他国家更发达。而集权制度的发展，也让秦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强的扩张冲动，因为新得来的土地大都归国君所有，只有小部分作为赏赐分封给功臣，和其余六国比起来，小规模的土地赏赐无法改变秦王的优势地位。

通过两场内容迥异的改革（变法）也可以看出秦与六国的区别。

在战国初期，魏国的魏文侯曾经任用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李悝去世的那年（公元前396年），另一个变法家恰好诞生，他就是商鞅。

这两个人都是法家和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分别主导了魏国和秦国的变法。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不同，两人变法的内容和效果有着巨大的差距。

李悝所在的魏国利益关系复杂，他无法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只能采取温和的方法进行变革。进行调查之后，他提出了几个观察结果：

第一，方圆百里的土地大约有九百万亩，不能耕种的土地加上人们的宅基地共占了三分之一，剩下六百万亩土地就是可以耕种的。如果调

动农民的积极性，每亩能增加三斗粮食；如果农民没有积极性，就要减产三斗。一进一出，方圆百里就有一百八十万石粮食的差异。他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挤出这一百八十万石粮食。

第二，粮食太贵，人们就会吃不起；粮食太贱，就要伤害农民的积极性。唯有价格适中才是最好的。而经过李悝一系列复杂的计算，按照现有的价格体系，魏国一户农民生产一年的粮食，还不够这户农民一年的开销。这说明，提高农民积极性，稳定价格是最要紧的。于是李悝就为改革找到了突破点：稳定价格，提高农民积极性。[14]

他采取的措施是“尽地力”和“善平籴”，前者是鼓励农民在土地上增产，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后者是利用类似平准的制度平衡粮食的价格。政府在丰年时多收购一些粮食储备起来，让丰年的粮食不要太便宜，以免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到了荒年，就减免一部分税收，并低价把粮食卖给农民，用这种办法平抑价格。

可以看出，李悝是在尽量不破坏原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改革刺激农民的积极性，获得一定的增产。可以说，他的变法是温和的，适应魏国复杂的政治体系，但不具有革命性。魏文侯可以通过李悝的改革使魏国成为强国，却不足以用来进行统一战争。到最后，由于改革成果无法持续，魏国也随之衰落。

商鞅变法则采取了最为激进的做法。由于秦国的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配力更强，集权程度更高，商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最根本的变革，将秦国打造成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为战争出力。

商鞅的变法措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5]

第一，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各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官员由中央统一指派。并在民间建立什保制度，五户为一保，互相监督，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郡县制度彻底破坏了商周以来的封建制度，在地方一级上完成了集权化。秦国所建立的这套制度也成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蓝本，虽然地方管理的层级越变越多，但管理的思路再也没有变化过。

第二，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虽然土地属于农民，但农民不得擅自离开土地。这样，每一个农民就都被“标准化”了，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生产粮食。政府通过控制流通渠道将农民生产的粮食输送到秦国的战争机器中。

第三，实行军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同军事挂钩。一个人只有在军事上有所贡献，才能得到爵位。爵级共二十个级别，一个人先受封低级爵位，下一次再立功受封，依次累积，直到最高级。就像现代的公务员用一辈子从科员熬到正部级一样，秦国人也用漫长的一生去盼望着军爵，从低级走向高级，爵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高。整个社会组织高度军事化，是秦国战争机器如此完美的原因之一。

汉代的董仲舒曾经评价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情况，认为变法前后，百姓的徭役负担比之前增加了三十倍，而官府的赋税收入增加了二十倍。[16]虽然这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从侧面显示出秦国财政机器在压榨民间资本上做得多么完美。

第四，秦国由于发展晚，因而土地充足；而山东六国人口众多，土地不够。于是，商鞅就鼓励六国向秦国移民。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就分给他们土地，并免除三代人的兵役，让他们专心种田。这些人就转化成了秦国的生产机器，而打仗参军则由原来的秦人承担。新秦人获得了安全，老秦人通过打仗立功获得了爵位，各得其所。

如果说，在古希腊有斯巴达式的军国主义城邦，那么与之相应的则是东方的秦国。斯巴达只是一个城邦的军国主义，而秦国却是一个国家的军国主义。这个国家采用中央集权制，政令直达每一个人，这样的战争机器产生出了强大的力量，将各国一一摧毁。

在与六国的战争中，地处偏远的秦国可以组织起六十万人的大军，并调动足够的资源供养他们，把军队送到数千里之外去打仗，可见当年商鞅建立的制度是多么高效。

然而，当战争结束后，这套高效的制度却只维持了十五年，就彻底瓦解了。

强大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应付六国的正规军，却无法抗衡起义者的杂牌军呢？

问题仍然出在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同样的困局上：为武力征服而建立的财政制度无法及时地转换成政治征服的工具。表面上看，秦代在全国建立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但郡县官员没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获得足够的资源来安抚地方人民，建立起让人民内心认同的统治基础。

当秦征服六国之后，秦始皇曾经考虑过以何种模式进行统治的问题，放在他面前的选项有两个：第一，学习周代，分封一批王室子弟做诸侯，来取代那些老诸侯；第二，彻底建立中央集权的模式，将秦国的模式向六国推行。[17]

许多人赞成第一种模式，因为这是大家已经熟悉的套路，好处是各个诸侯都会立即担负起统治责任，全国可以迅速平静下去；而坏处则是几代人之后，各诸侯国再次厮杀，将周代的形势重演一遍。丞相李斯则坚持第二种，将郡县制推向全国，整个庞大的帝国都由皇帝本人来控制。

丞相的坚持让始皇帝下定决心推行中央集权制，彻底消除六国内部残留的分封制痕迹，将郡县制度扩展到了整个中国。

为了推行中央集权制，秦始皇需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向六国故地派遣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担任郡县长官。由于秦国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才储备，不合格的官吏必定会在各地造成混乱；即便是合格的官吏，也会受到各地的抵制。

为了强行将制度推行下去，秦始皇保持了高压态势：他没收了天下的兵器，防止各地反抗，强迫六国的贵族迁往关内。

秦始皇很注意用迁移民众的做法来打破原来的社会结构。秦军征服过后，许多地方的精英分子都被带走安置到其他地方，而这些人离开时留下了大量的土地，秦始皇再靠赦免的罪犯，或者调其他地方的人来填充，重建社会结构。

在《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中，许多富豪的家族都被迫迁到了外地，重新起家，继续获得财富。比如，蜀地的卓氏（司马相如妻子卓文君的家族）就是从赵国迁来的，南阳的孔氏是从魏国迁来的。

对于那些不听话、不懂规矩的人，秦始皇用严刑酷法对待他们。

在后来的民变中，许多人都是被秦法逼成了叛乱者。比如最先起事的陈胜、吴广，还有后来的刘邦，都是在押解犯人或者服役者的过程中，因为出现了人员逃亡或者误期的情况，按照秦法要严格处理，所以才不得不造反的。[18]

但是，就算秦始皇采取了这么多办法推行中央集权制度，习惯了诸侯制的人们仍然不甘心被置于集权社会中一个零件的位置，对于中央政府派去的官员也是阳奉阴违。许多人还在幻想着六国势力重新崛起。如果秦代能够维持更长久的和平，也许等这些六国余孽都老死了，人们能够适应新的模式，就真的完成了政治征服。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社会的记忆仍然深刻时，秦代就维持不下去了。

统一后，巨大的战争财政消耗还在继续，集权制官僚们还在按照战时的模式从民间榨取利润，民间无法重建社会经济。更严酷的高压态势也迫使皇帝从民间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来保持统治阶层的忠心。

更重要的是，本来六国的民间经济要更加自由一些，秦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六国，给六国的经济也戴上了紧箍，加入到战时经济之中。

而秦国庞大的人员组织能力也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将军们失去了对手，只好将武力强加给异族，并修筑长城，建造阿房宫。整个帝国在战时经济中消耗巨大，却没有人能够将这架战争机器停下。

最后，这架机器终于失控。庞大的帝国死于自己的制度。中国人第一次尝到了中央帝国带来的巨大的统一成本。

贾谊曾经感慨秦因“仁义不施”而亡国，[19]我们不能只看到所谓“仁义与否”，而应该从背后的制度去寻找原因。

表1 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变法[20]

年代	国别	领导人	内容		
			经济	政治	军事
公元前685年	齐	管仲，齐桓公	1.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采取差别征税制。 2.实行重商主义，大力发展商业和金融业。 3.实行经济国家主义，强调对山海资源的控制。	1.带有很浓的集权倾向，整饬田制，减少封建分权特征，建立围绕国君的官僚体系。 2.对士农工商进行分别管理。全国分为六个工商之乡和十五个士乡。	在士乡建立基层组织，打实兵源基础。
公元前594年	鲁	季文子，鲁宣公	实行“初税亩”。进行土地确权并按照土地征税，打破封建制度对土地的束缚。		
公元前544年	郑	子产，郑简公	整顿田制，划定疆界，设立基层社会组织，便于实行按亩课税。	1.铸刑书，使法律制度化。 2.恩威并重，儒法结合。	
公元前403年后	魏	李悝，魏文侯	尽地力，善平籴。在不触动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调动农民积极性。	1.加强法制，削弱贵族特权。 2.重用非贵族子弟，使得一批名臣（李悝、吴起、乐羊、子夏、田子方、端木干）崛起。	1.加强对战略要地的占领，如秦国的河西地。 2.发掘和重用有才能的将领。
公元前386年至前381年	楚	吴起，楚悼王		1.明法审令。 2.淘汰冗官。 3.减少特权贵族阶层。 4.杜绝人情说辞。	节约财富，富国强兵。
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	秦	商鞅，秦孝公	1.废除中间阶层对土地的控制，由国家直接掌控农民的命运。 2.尽一切手段调动人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 3.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将农民变成军事机器的直接供养人。 4.利用秦国多余的土地，鼓励他国人民向秦国移民。	1.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各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官员由中央统一指派，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2.在民间建立什保制度，五户为一保，互相监督，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	1.实行军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和军事挂钩。只有有战功的人，才能在社会、经济上享有较高的地位。 2.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
公元前302年	赵	赵武灵王[2]	未做国内经济改革。希望以扩张代替改革。当中原没有土地可以扩张时，向北发展，扩充经济资源。		1.推行“胡服骑射”政策，采用胡人先进的作战方法。 2.采取奇谋，希望采取从北方大迂回的策略，击溃最大的对手秦国。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

秦代轰然倒塌后，它的失败让当时的人们认为庞大的中国无法承载统一之重，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这个“怪兽”还没有到出笼之时。

在这种流行的思潮下，群雄起兵的目的不是重新恢复六国，就是寻求割据一方。至于重新统一，谁都不想也不敢去尝试。项羽顺应了这种思潮，按照战国时代的模式重建了众多的诸侯国。最具野心的刘邦虽然也被封王，但被放置在了西南方的死角里，远离中原地区。

在秦代，刘邦的蜀地和汉中是距离中原最遥远的地方。一个人如果要从中原去四川，必须首先走函谷关，到达秦所在关中地区，再从关中地区走一条架着栈道的山间小路（褒斜道）到达汉中，最后从汉中走另一条小道（金牛道）去往四川盆地。[21]

项羽又把秦地（今陕西境内）分封给了三位投降的秦国将领，由这三位将领守住关中平原，这就彻底断绝了刘邦和中原的联系。

由于绝大多数受封的诸侯没有兼并天下的野心，所以，这个分散的新体系似乎会长久地维持下去。

然而，有一个人想尝试与“项羽秩序”完全不同的模式，试图继承秦代的正朔，这个人就是刘邦。

秦末的起义者中，包括两类最主要的参与者：六国的贵族和各种对强秦不满的亡命之徒。项羽属于楚国的贵族后代，而刘邦则是一个典型的亡命者。

在起义没有爆发时，刘邦曾经担任过沛县的亭长，在一次为县里押送犯人去骊山时，由于逃跑的人太多，他思量免不了被追究责任，也逃亡了。如果不是秦末起义的到来，刘邦就要做一辈子的亡命者。

当别的诸侯都因为获得了封地而感到满足时，只有刘邦心中充斥着不满。由于没有历史和身份的包袱，他眼中看到更多的是秦帝国的威仪，他不想作为一个诸侯统治汉中这个小地方，而是想作为皇帝君临整个秦帝国的疆域。

于是，所谓楚汉相争，就意味着到底是项羽的“诸侯加霸王”模式，

还是刘邦梦想中的“中央帝国”模式能够胜出的斗争了。

对刘邦有利的是，项羽所建立的新诸侯制度并不稳定。十九个诸侯中，大部分人虽然并不想兼并天下，却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野心。他们总想将领地扩张一点，从邻国手中抢几座城市。还有的诸侯国国内迅速发生了争位。这些问题每一个都看似不大，但如果纠纷同时在四处爆发，新诸侯制度就会迅速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

作为制度的建立者和一国霸主，项羽有责任保证制度的平静，秩序一旦出现混乱，项羽就必须出马来恢复平静。于是，不需要刘邦反对项羽，其他的诸侯国就已经让这位西楚霸王疲于奔命了。

首先让项羽感到愤怒的是齐国的形势。齐国原本被项羽分成了三国，封给了原来齐国王室的后裔，这却引起了另一位叫作田荣的将领的不满，他起兵杀掉了三国的国君，合并了三齐。赵、代等国也随即出现了国君更替的情况。

汉王刘邦在这时兼并了关中的三个秦降将获封的诸侯国，将原本属于秦国的领土合并起来，并向关外扩张。

项羽突然发现他从反秦的革命者变成了旧秩序的维持者，从革命党变成了保守党。为了维护他设计的秩序，必须出兵征战。但每一次诸侯的叛乱，都是一次对新秩序的嘲讽。

刘邦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采取了兼并、联合、替换的方法，逐渐将诸侯国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曾经的西楚霸王。

在战争中，刘邦的将领韩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位能够忍辱负重的将军在北伐中灭掉了魏、代、赵、齐诸国，并降服了燕国，这些曾经最强大的诸侯国要么灭亡，要么结为同盟。

韩信对刘邦的态度也决定了汉王能否掌控全局，如果韩信在灭了旧诸侯之后，立即取而代之，不听从号令，那么他只不过是在旧秩序的牌局里洗了一下牌而已。韩信虽然争取到了齐王的位置，却仍然对刘邦保持了忠心，如此一来，汉王才有了建立新秩序的可能性。

战争结束时，项羽建立的体系随着他的死亡而崩溃。但是，当初为了对付项羽，刘邦不得不分封了许多新的诸侯。这些诸侯并没有意识到未来的秩序会有什么变化。他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思维来考虑问题，以为刘邦战败了项羽，只不过意味着刘邦代替项羽担任“霸王”的角色，而每一个诸侯还都拥有着独立的封地，行使独立的权力。如果刘邦想要废除诸侯，他们会用全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项羽倒台之后的政治秩序仍然接近于诸侯国模式，刘邦充其量只是另一个霸主，而非一个皇帝。

诸侯没有想到的是，刘邦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他知道，哪怕有诸侯国存在，他仍必须首先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在谋臣的帮助下，刘邦在关外就迫不及待地导演了皇帝登基的大戏。在这出戏中，最想当皇帝的是刘邦本人，但他却装作不情愿，由谋臣们劝说诸侯劝进三次，他才同意加皇帝尊号。

在汉王加皇帝号时，诸侯们仍然没有意识到秩序的改变。他们还以为回到了周代的秩序，所谓皇帝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哪怕是皇帝，也无法干预每一个诸侯国内部的事务。

但他们不知道，刘邦之所以封他们为诸侯，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一下子掌控全国而已。

如果在剿灭项羽后立即废除诸侯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制，那么新建立的汉帝国立即会和秦帝国一样，遭到激烈的反抗而崩塌。刘邦不愿冒这个风险，他更擅长于慢慢地剥夺诸侯的权力，让项羽建立的新诸侯体制在温水中煮死。

刘邦加皇帝号之后，他的手下包含了三种人：

第一种是仍然醉心于旧秩序的旧诸侯，这些人希望尽快回到诸侯国内，享受统治者的乐趣，并不尊重所谓皇帝的权威；

第二种是已经理解了新秩序的中央官员，以丞相萧何、陈平等为代表；

第三种则是刘氏的宗室子弟。

刘邦的任务是消灭第一种人，将诸侯的领地一部分交给宗室子弟，一部分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交给第二种人。

而此刻汉帝国最大的功臣韩信，由于被封为楚王，已经被汉高祖当作了第一种人——旧秩序的代表。

在后人的眼中，韩信是一个矛盾的角色。战争中，他手握重兵却对刘邦忠心耿耿。项羽曾经劝说他反叛汉王，许诺天下三分，但韩信拒绝了项羽的美意。然而在攻克齐国之后，韩信却向汉王申请做代理齐王，这令刘邦感到不满。后世接受了大一统思维熏陶的人们因此认为，他申请代理齐王的举动就是对刘邦不忠。

但实际上，韩信与项羽一样，是一个旧秩序的信奉者。他认为战争结束之后，世界仍然会恢复到诸侯制的旧轨道上，刘邦代替了项羽成为霸主，负责维持诸侯国的秩序，但是并不剥夺其他诸侯的生存权。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拥护霸主的诸侯角色，帮助霸主维持国际秩序。“当上齐王”与“对汉王忠心耿耿”，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韩信没有想到的是，刘邦要颠覆整个诸侯制度，建立一套新的集权制度来代替它。韩信也没有看到，刘邦对他的防范有多深。

《史记》中的一件小事反映了刘邦对韩信的戒心：在消灭了项羽之后，刘邦在称皇帝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亲自前往齐王韩信的军中，夺走了他的军权。只有这样，汉王才敢于称皇帝。

汉王称帝后，作为皇帝制度的绊脚石，韩信先被从齐王贬为楚王，又被剥夺了王的封号，贬为淮阴侯。最后，刘邦仍然不放心，借助妻子吕后之手杀掉了韩信。

除了韩信之外，异姓诸侯中的彭越、黥布、臧荼、卢绾等人也一一被剥夺封号或者被杀。

但是，在剥夺异姓诸侯的同时，刘邦却无法完全废除掉诸侯制。他意识到，他还不具备一下子建成全国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制的能力。

和秦始皇一样，刘邦没有足够多的能理解皇帝真实意图的帮手，也不可能一下子任命如此之多的中央集权官吏。更何况，能够维持帝国稳定的财政制度更是一片空白，如果强行往下推行，必定遭到抵制和失败。

在异姓诸侯曾经统治过的地方，他必须再树立一个诸侯来代替原来的角色。作为妥协，他将刘姓宗室子弟扶上了诸侯的位置，并立下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规矩，希望通过家族的力量来补充集权制的不足。

登基八年后，还没有完全剪除诸侯势力的刘邦去世。他留下了一个逐渐恢复稳定、带着新秩序雏形的大帝国。但这个帝国的统治模式是否已经成功，仍然没有人说得清楚。

在人们看来，这个帝国太脆弱了。

汉高祖本人的死就源于与淮南王黥布的交战，他在战斗中被流矢所伤，身体再也没有康复。他死时，燕王卢绾正准备逃往匈奴所在地。异姓王中，长沙王吴臣尚在。

甚至皇帝的军队也对帝国构成了威胁。高祖死去时，陈平、灌婴在荥阳统帅着十万人马，樊哙、周勃在燕、代等地有二十万大军。高祖一死，他的皇后（后来的吕太后）甚至担心这些将领造反，密谋将他们都杀掉。审食其劝说太后，若诛杀将领，必天下大乱。[22]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汉帝国仍然风声鹤唳，就连吕太后也处于失败的恐惧之中。

更重要的是，帝国虽然完成了武力征服，具有了表面的形式，但在更深层次上，却没有完成政治征服，尚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

第一，在经历了如此众多的动荡之后，如何保证社会的经济发展，让人们对帝国产生信心，不再想回到过去。

第二，如何建立一套符合帝国需要的财政制度，使这套制度能够控制同姓诸侯王的野心，又能满足帝国稳定的需要，同时不干扰民间的繁荣。

汉高祖死去时，帝国连统一的财政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各诸侯除了对诸侯国国内的土地征税之外，还对诸侯国国内的自然资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几乎丧失了诸侯国中的所有税收，只能在直属领地征税。诸侯王可以有独立的军队，设置几乎和中央政府一样的官僚系统和财政系统。他们统治着真正的国中之国，只是依靠亲属关系维持着与中央政府的合作。

在这样的架构下，中央只不过是比诸侯国面积更大一些的诸侯国罢了，仍然是一个“霸主”，不是帝国。必须把诸侯国的财政权拿回来，在诸侯国国内为中央征税，才能解决最终的控制权问题。

高祖本人对经济并不精通。他仇视商人和商业，采取了许多抑制商业的措施。[23]如果继续采取抑商的做法，民间就感受不到统一带来的好处而离心离德，中央政府也获得不了足够的财政收入，到了诸侯势力觉醒时，就是汉帝国分崩离析的时刻。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由汉高祖的狂妄无知所建立起来的巨大怪胎，到底会走向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它会像强秦一样，由于政府抑制了民间发展而崩塌，还是像周代一样，由于诸侯国的强大而逐渐解体？这个问题必须留给刘邦的后代去解决。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在任何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初期，当王朝创建者擦干了剑上的血迹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先发展经济还是先强调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

秦始皇更看重后者。他首先利用政府控制力解决财政问题，没有考虑民间经济的持续发展，导致了经济的羸弱、人民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

而汉高祖的性格多疑、自大，控制欲强，这一点与秦始皇并无二致。如果他再多做一些年的皇帝，那么汉代的经济也许会进一步恶化。他适时的死，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变革的空间。

汉高祖死后，人们对于汉帝国能否解决民生问题持有深深的疑虑。

按照古人的观念，如果没有战争和灾荒的侵扰，连年丰收，人们劳作三年，就能够积攒下一年的余粮。当丰收了九个年头，积攒下三年余粮，就称为“登”，意味着五谷丰登；如果好年景维持了十八个年头，有了六年的余粮，就称为“平”，意味着和平稳定；如果积攒了九年的余粮，就称为“泰平”。所以天下太平需要二十七年的和平时光才能获得。[24]

可是，汉高祖建立的帝国过于庞大，总是东边不乱西边乱，诸侯的反叛、外敌的入侵、底层的叛乱、对皇帝错误政策的反抗连绵不断……一旦战争来临，为了供养军队，搜刮式的财政政策就成了政府的优先考虑，民间很难获得足够的时间去休养。所以，人们总是担心大一统帝国带给他们的只有贫穷、束缚和失控。

从另一个角度看，汉帝国的疆域最远到达了今天越南的中北部（如汉代在越南的北部、中部地区设置了交阯郡、九真郡、日南郡），从长安到越南北部的直线距离也有三千里，中间更是山阻水隔，路线难测。帝国派遣一个官吏去统治越北，上任都要走几个月，更何况还要考虑当地人能不能听他的话、愿不愿意缴税等棘手的问题。

即便在汉代统治的高峰时期，除了中原、山东、关中、川蜀之外的其他辖区，比如西北、东南，包括越北，由于人口稀少，经济成本高昂，最多只能自给自足，无法向中央缴纳财税。

更重要的是，如果越南北部发生了叛乱，就要从别的地方调兵去镇压，可是从传递消息到调兵，几个月都过去了。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去征服一个连征税都困难的地方，是否有必要？

当时人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诸侯国时期。由于每个诸侯国的面积都有限，一个地方发生了叛乱，国君调集军队去镇压，来回加打仗，往往十天半月就够了。那时的军人每年接受征调的时间不用超过一个月，养兵成本很小。如今的军队调动却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调兵的距离长达几千里，其复杂程度已经超乎当时人们的想象。

在这么复杂的条件下，帝国的统一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另外，汉帝国内部还保留着大量的同姓诸侯，这让问题更加复杂。这些诸侯在封地内征税，设置官员进行治理，又有自己的军队。如果诸侯势力太大，中央政府的征税权就会变小，最终无法同众多的诸侯相抗衡。当中央政府无法约束诸侯时，帝国就会最终走向解体。

吕太后执政时期（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0年），汉帝国出现了第一次危机。吕太后出于强烈的不安全感，违背了汉高祖“非刘氏不王”的规矩，立了几个娘家吕氏的诸侯王来巩固她的权力。吕氏诸侯王们虽然在太后活着时能够保卫太后的帝国，但他们只忠心于太后本人。一旦太后死去，吕氏诸王缺少了核心人物，就会生出反叛之心。

吕太后死后，刘邦的老臣们除掉了吕氏家族。但这一次的吕氏危机，却给汉帝国的统治阶层敲响了警钟：目前的财政制度是一种无法维持的制度。只要诸侯国享有国内的财政全权，可以有自己的官僚系统和军队，未来必然还会出现无数次的反叛。如果要建立长久的帝国，就必须剥夺诸侯国的财政权，让他们无法养兵。

公元前180年，在高祖老臣的拥戴下，高祖的儿子刘恒登基为帝，是为文帝。

文帝继位前是代国的诸侯王。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吕氏诸侯王的叛乱刚刚被平定，文帝也没有急于去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和民生。

汉文帝时期，是先发展经济，普遍实现人民富裕，还是先建立可靠的中央财政制度，约束诸侯财政，保证帝国不会解体——这两个问题都已经非常迫切。吕后时期虽然推崇黄老之术，让民间经济自由恢复，但是宫廷内斗不断，诸侯王摇摆不定，民间依旧处于扰动之中。人们仍然在观望，看这个庞大的帝国走向何方。

只有更加稳定的社会和更快的经济发展，才能让人们认同汉帝国的存在，并自觉地将自己当作帝国的子民。但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有矛盾的：要稳定，就必须强调控制；要控制，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拖累经济的发展。

汉文帝决定，首先解决民生问题，把稳定问题先放下。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政府从国民经济领域完全撤出，让人们自由发展工商业和农业。

汉高祖时代，土地税是十五分之一。之后，由于战争的需要，高祖提高了土地税，但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税率，大约不会超过十分之一。吕后执政时期，土地税再次调整回十五分之一。[25]

除了土地税之外，汉代的人还必须缴纳人头税（算赋），一个人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年必须缴纳算赋一百二十钱。

文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对于上述税率进行了调整。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将土地税暂时减半，从十五分之一变成了三十分之一。[26]之后，人头税也做了调整，减为三分之一，每年只用缴纳四十钱，丁男每三年出一次役。[27]

税率降低之后，政府的财政问题更加突出。汉代的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两项是养官和养兵。在文帝时代，由于北方蛮族的存在，加之诸侯势力仍然强大，皇帝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来做防范。

但是，汉文帝仍然决定大力压缩财政开支，将政府精简到极致。他首先从个人做起，节衣缩食，不修宫室，压缩皇室开支；其次，他压缩军队和官员的开销，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避免不必要的财政开支。[28]

文帝统治后期，财政问题更加突出。

由于压缩财政开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虽然社会正在慢慢变得富有，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但政府无法依靠财政收入供养边关的守军。

虽然皇帝极力避免战争，但边关不可能没有守军，而这些守军的粮食要由政府供应。可是政府正处于最无力的时候，财政不到位，运输能力低下，粮食和军饷无法按时运到。

这时，大臣晁错替皇帝想了一个办法。他看到，通过休养生息，民

间已经涌现出一批富人。于是，他建议文帝采取买卖爵位的办法，允许富人通过捐献，获得一定的爵位，或免除罪过。只要富人想办法把粮食运到边关，交给守军，就可以从皇帝这里获得爵位。[29]

在汉代，买卖爵位仍然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合理的现象。这个时期距离实行封建制的周代并不远。在封建制时代，封君可以将爵位、土地随意地赐予任何人，没有人有资格质问封君，责怪他随意支配公共资源。到了汉初，虽然已经渐渐地形成了公共资源（属于社会的资源）和皇家资源（属于皇帝私人的资源）的概念，但二者区分得不够清晰。另外，治理人民的官员已经逐渐被当作公共资源，不能随便买卖官爵了。但是，更具象征意义的爵位更接近于皇家资源，相当于带有一定特权的荣誉称号。因此，皇帝买卖皇家资源，仍然被认为是合理的。只不过，这种荣誉称号带有免人头税、免役、减罪免罪的特权（但不减免土地税，只减免与人身有直接关系的税收），有侵占公共资源的嫌疑，这让卖爵又带有灰色地带的性质。

晁错的做法收到了惊人的效果。很快，在富人的帮助下，边关军队的粮食有了保证，不仅不再匮乏，反而变得充足。晁错又建议文帝让富人把粮食上缴到中央政府在各地的仓库。这样，富人的捐献就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汉初，由于和平时期养官成本很小，文帝很快发现，富人的捐助，再加上一定的山海税收，已经足够维持中央政府运转了，根本不再需要征收农业税。

公元前167年，文帝宣布全国税收减免一半。到了第二年，他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干脆宣布不再收农业税。[30]

在以后的十三年间，西汉政府一直没有征收农业税。直到景帝登基后的第二年，才恢复了税收。不过，景帝把土地税仍然定成三十分之一，并一直维持这个低税率直到西汉末年。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也宣布废除农业税。不过，这次废除农业税与汉文帝时期的废除不可同日而语。文帝时期，农业占国民产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放弃农业税，就等于放弃了最大的一笔收入；而在现代社

会，农业的地位已经降低，工业和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所以，现在放弃农业税要容易得多。

虽然，文帝的免税政策值得欢呼，但是，也应该看到，文帝的政策是一种妥协式的权宜之计。正规税收收不上来，就干脆放弃建设税收制度，通过卖爵获得收入。由于当时恰好处于财政紧缩时期与和平时期，政府不需要太多的花费，所以这种做法是可以的。可是，一旦国家出现了动荡，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征税工具，势必会遭受剧烈的打击。

文帝不建设正规的财政体系，还能够保证政府的稳定，靠的不仅是他的执政能力，还有机遇。

他的做法带着很大的赌博成分。他在位时，北方的匈奴和内部的诸侯王都处于蓄势的时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两个地雷只要有一个提前爆炸，就可能摧毁文帝脆弱的财政系统，使中央政府重回混乱。特别是诸侯王问题。[31]文帝时期，也是诸侯王大发展的时代。此时的诸侯王和高祖、吕后时期相比更加富足。文帝时期，每个诸侯国内的矿产资源都交给诸侯王自行处理，中央政府并不插手，这导致那些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的诸侯王成了巨富。

中央政府在长安，这里人口密集，土地肥沃，但矿产资源并不丰富；而齐、楚、吴等地丰富的资源却都控制在诸侯的手中。例如，高祖的哥哥的儿子刘濞被封为吴王，其辖境内产铜，依靠挖铜铸币，吴国富比中央。

不过，幸运的是，文帝执政时期，正是社会的恢复期，人们不想打仗；而汉高祖的子孙们由于对高祖的记忆还没有模糊，尚且没有叛乱的决心。文帝仁慈地对待每一个诸侯，使得他们也没有叛乱的必要。至于匈奴一方，文帝的和亲政策和贸易政策也足够明智，没有像武帝那样主动挑衅。文帝谦恭仁慈的性格和与世无争的心态，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文帝时期，政府的财政支出达到最小。

文帝的统治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一个神话。[32]对于汉代的大臣们而言，在文帝之前，帝国一直没有过真正的安定，甚至人们不知道这个帝国是否已经真的建立起来，还是又如同秦帝国那样，最终会变成镜花

水月，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崩离析。文帝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帝国模式的成功了。虽然最为关键的财政地雷还没有拆除，但帝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而且逐渐繁荣起来，大部分人从中都享受到了真真正正的实惠。人们已经学会了站在帝国的本位上来考虑解决办法，而不是试图再次推倒重建。

对于现代人而言，文帝的统治简直是一个小政府的范本。亚当·斯密曾经提出，政府只需要保证最基本的财政支出，如国防和必需的公共工程，其余一切都应该交由社会去做。

文帝时期，由于维持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国防开支很少，养官成本很低，故而剩下的钱都可以留在民间，促进经济发展。

历史上，中央帝国最大的财政失控总是出现在军事上，一旦控制住了军事支出，的确可以做到“小政府”。所以，历史上采用黄老之术的时期，往往是不需要太多军事行动的时期。由于和平，方才富足；而富足伴随着和平，于是成就了汉初的盛世。

但在这盛世之下，始终有一颗定时炸弹：财政失衡。到了文帝的儿子汉景帝时期，这颗炸弹终于爆炸了。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1991年4月23日，在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苏联与九个加盟共和国达成协议，同意成立一个叫作“主权国家联盟”（Union of Sovereign States）的新联盟，来取代原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33]

《新联盟条约》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拥有相当大的主权，联盟政府只保留三方面的权力：统一的总统、统一的外交政策和统一的军队。

戈尔巴乔夫认为，只要军队和外交政策是统一的，就可以保证联盟有一定的凝聚力，不会走向解体。

为了让加盟共和国同意签字，他在一点上做出了妥协：独立的财

政。也就是说，联盟必须经过加盟共和国的同意才能行使征税权。

当戈尔巴乔夫做出这个妥协后，他本人并没有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是，就连西方国家都意识到了这个条约的危险性，忍不住提醒他：丧失了独立的财政权，就意味着联盟的解体。因为不管是外交还是军队，如果没有财政收入作为后盾，都将化为泡影。

这个条约带来的争论导致了保守派的八月政变，彻底葬送了苏联。人们如今回忆起苏联往事，无不将这个条约作为一个重要节点来讨论。

与苏联受困于财政一样，文帝死时的西汉帝国在财政上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文帝治理带来的长期和平让大部分人享受到了好处，故而，人们对西汉政权的态度由以前的漠不关心，变成了此刻的不希望它崩溃。人们担心它会被巨大的离心力所分裂。人们害怕在未来还会有无数的问题等待着这个年轻的庞大怪物。

文帝死后，他的休养生息政策仍在继续实行。这时，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是他的皇后，即后来的窦太后。[34]这位已经失明的老太后把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六年。窦太后去世后，武帝才转变政策，彻底抛弃了黄老之术。

窦太后不像当年的吕太后那样强势，她对于政策的影响力是依靠教育获得的：她要求宗室子弟和太子都必须学习与黄老之术相关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治国。景帝虽然面临着众多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他主动去作调整，但他并不反对继续施行黄老之术。

可另一方面，在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依靠文帝威望和仁慈来维持的帝国体系已经出现了危机。

由于景帝已经是高祖的孙子辈，与同姓王侯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诸侯们不像尊敬文帝那样尊敬他。景帝的性格也并不招人喜欢，他心胸狭小、优柔寡断，又缺乏担当。

诸侯们已经在文帝时期积累下了巨大的财富。在皇帝放弃经营正规的财政系统时，诸侯们却牢牢控制着封地。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地方逐渐占据了优势。与此同时，与匈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虽然汉帝国

仍然保持着克制的态度，但越来越多的人在经济富裕后，已经抑制不住大国梦，有些跃跃欲试了。

如何抑制诸侯的发展？如何对付匈奴？如何建立健康的财政体系？这些问题依靠黄老之术是回答不了的。

皇帝发现，在黄老之徒以外，另一拨人正在摩拳擦掌——儒家。

与黄老之徒着重于解决经济问题不同，儒家对经济和财政都不感兴趣，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思路：利用对皇权有利的政治思想，加强对社会的软性控制。可以说，他们只对政治和社会控制术感兴趣。

在儒家看来，如果中央帝国的权力失控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帝国势必在未来出现新的危局。如果要避免危机，必须在政治上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使得中央政府掌握更大的权威，削弱地方上的诸侯势力。

赞同黄老之术的人更注重经济发展，而赞同儒家的人则偏爱政治稳定，两者看问题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汉代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贾谊和晁错，然而两个人的观点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贾谊希望通过严格的等级规则来限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中央权威；晁错则除了儒家外，还采用了一套法家的方法，不考虑手段的正当性，只考虑手段是否管用，直接对诸侯采取行动。

汉文帝继位不久，太中大夫贾谊就根据五行学说提出了一套礼仪制度，希望皇帝能定制度、兴礼乐。[35]在中国古代，礼乐和制度是相伴相生的，每个阶层都拥有各自的礼仪，使用不同的音乐，甚至连穿着和配饰都有所不同。贾谊希望通过兴礼乐的做法，使整个政治制度更加固化，并突出皇帝的地位，让人们形成皇帝威严不可侵犯的思维定式，再辅之以烦琐的规章制度，把诸侯和其他权势阶层都限制住。

贾谊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之后，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取的同样是这个办法：通过强调人在宇宙中的秩序和等级，将每个人都固定在他的位置上。

贾谊在经济上则采取了完全不同于黄老的做法，提倡政府干预，重

视发展农业，贬低其他行业。这样的做法对于经济是有破坏作用的，很可能会使中国在未来两千年内都围着农业打转。但在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诸侯势力借助工商业坐大，带有很强的针对性。

由于文帝时期强调放松对民间的控制和发展经济，因此，贾谊的学说无法得到皇帝的赏识。他最后郁郁而终。

到了景帝时期，晁错作为儒家和法家的代表，则抢得了先机。

晁错希望直接削藩，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主张像汉高祖一样，不惜利用阴谋密计，抓住一切机会，剪灭诸侯王。[36]

景帝一着手削藩，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就准备造反。在中央必须考虑经济的全盘政策时，每一个诸侯王却像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他们有土地收入、山海收入，又有效忠于己的高管团队[37]。每一个诸侯国的官员设置几乎和中央一样：诸侯王也有丞相、九卿，也有太傅辅佐；对应于皇帝掌管财政的大司农（最早叫治粟内史），诸侯王有内史；掌管军队的叫中尉，对应于皇帝的太尉。在这些官员中，只有丞相一职是由皇帝指定的，其余的职务都由诸侯王自己决定。

诸侯借口帮助景帝清理身边的恶人晁错，发动了七国之乱。景帝在面对诸侯王的叛乱时，显出了投机本色。他首先杀掉晁错，希望诸侯止兵。当看到诸侯无意退兵时，才坚决迎战。

诸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叛乱却成为皇帝解决最终问题的契机。景帝在镇压叛乱的同时，完成了惊人的一跃，粉碎了诸侯国对帝国财政的阻碍，实现了财政集权。

在叛乱之前，皇帝始终无法插手诸侯国的财政。最明显的问题来自于山海收入，由于诸侯国内部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皇帝无法对这部分矿产资源征税，因而，皇室丧失了大笔的收入，而诸侯利用经营矿产积累的巨额财富来对抗中央。

七国战败后，皇帝乘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削弱了诸侯国的财政基础。

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七国之乱九年之后，汉景帝推出了改革措施，剥夺了诸侯治理国家的权力，而诸侯国的官员也都由皇帝任命。[38]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是剥夺诸侯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将诸侯国内少府、御史大夫、廷尉等重要官职直接裁撤。

少府是掌管王室收入，特别是矿产税收的官员。少府被裁撤，意味着皇帝已经将诸侯国的矿产资源收归中央。从此以后，诸侯国除了从规定的封地收取粮食之外，没有了其他的收入，也就很难造反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增加了矿产收入，中央财政状况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御史大夫、廷尉等监察、司法官员的裁撤，意味着诸侯王再也没有能力控制国内的官员了。皇帝将中央政府的监察权的触角伸进了诸侯国内。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在这项法令之前，诸侯王死去后，他的继承人将继承完整的诸侯国，而其他子孙一无所有。但《推恩令》允许诸侯将封地分封给不同的子孙。大的诸侯国慢慢地分隔成小国，无力与中央抗衡。

随着中央政府权威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也趋近完善。皇帝的官员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建立起更加正规的财政制度。

与文帝时期的放任政策不同，景帝做了许多完善财政系统的工作。与他的几位前辈高祖、吕后和文帝，以及后来的武帝相比，景帝名声最不响亮，形象也最模糊，然而他对于政治、财政的理解，却可能是几位统治者中最透彻的。

他并没有像文帝那样彻底减免人民的土地税，而是将土地税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三十分之一，这个税率成为两汉的标准税率，除了偶尔的中断之外，直到东汉末年仍然在坚持实行。

如果说，文帝时期经济发展的硕果还只集中于民间，而政府一直受困于财政问题的话，到了景帝时期，民间越来越富裕，通过税收，政府已经将仓库全部填满。皇室财政收入也由于收回了诸侯国国内的自然资

源税，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经过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的努力，人们终于确信新的帝国模式是成立的。在如此庞大的疆域内，的确可以建立统一的帝国。即便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次重大的创新：数百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人们和平、富裕、安宁地生活在一个皇权之下，即便出现了天灾，也只是短时间的困难；一旦风调雨顺，生活立即回到正轨。

汉代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在于汉高祖和他的子孙们把秦始皇用一代的时间想解决的问题用了数代、几十年来慢慢地解决。他们一点一点地将中央集权的观念灌输给世人，等那些不接受新形势的老人死去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将这个中央帝国视作理所当然。当年的战国和分封都已经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人希望回到从前。

在景帝时期，帝国的财政和经济也达到了高峰，在吕太后、文帝、窦太后、景帝等人的主持下，一直施行的黄老之术让民间尝到了甜头。

但谁也没有意识到，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旦建立，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它的最终走向，而集权制本身的死穴也在慢慢地膨胀，并最终侵蚀着帝国的肌体。

在文景时期，这个死穴还显得如此之小，没有人能够觉察。但随着文帝和景帝的逝世，皇帝和官僚集团就悄然开始膨胀。为了养活他们的家族，以及满足他们的野心，民间经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财政问题最终有可能会把整个社会拖垮。

汉武帝六年，最后一位支持黄老之术的人——窦太后驾崩，中央帝国骤然转向。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221年—公元前141年。

[2]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汉武帝在经济上进行集权的同时，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并采纳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的主张，梳理了以《春秋公羊

传》为核心的儒家理论，着力推崇“大一统”“通三统”等理论体系。董仲舒又借此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夹杂了阴阳家的儒家学说，将儒术从学派变成了宗教。此外，汉武帝将儒教与官僚体制相结合，使得大一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理论之一。由于这些内容超出了本书论述的范围，仅简单以注释作为说明。可参考《史记》《汉书》中相应人物的传记，以及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

[4]《史记·秦始皇本纪》：“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

[5]六国复国，参考《史记》“本纪”第六至八，“表”四、五，“世家”第十八，“列传”第二十九至三十四。

[6]虽然后来刘邦一直指责项羽违背了当初“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许诺，只把关中的一部分（汉中和四川）交给了他，而不是把原属于秦国所有的土地都给他，但这种指责是空洞的。实际上，项羽为了把天下划分成十九块，对原本六国的领地也都进行了进一步的分割，不仅仅是针对原秦国的土地。

[7]由于埃及境内绝大部分均为酷热少雨的沙漠，只有宽约十六千米的绿洲带。现代百分之九十八的埃及人生活在百分之三的土地上。

[8]如波斯的小居鲁士就做过位于现代土耳其的小亚细亚的总督，但小居鲁士并不听命于他的哥哥波斯王，反而利用希腊人武装入侵波斯本土，抢占王位。见色诺芬的《长征记》。

[9]参见《左传》和《史记》“世家”。

[10]初税亩在古代常常受到批评，特别是对古代政策推崇备至的复古主义者。他们认为，古代存在一种理想的公有制叫井田制，在如同“井”字形的九块土地上，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分给八户人家作为私田。私田产出归个人，而公田由八户人家共种，产出归封君。初税亩的出现打碎了复古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模式。现在，人们虽然不再认为古代存在过于理想化的井田制，但都承认，初税亩出现前，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君所有制，耕种者没有所有权。正是初税亩给了劳动者土

地所有权。关于对初税亩的批评，典型的如《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初始者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

[11]见《史记·秦本纪》。

[12]《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

[13]《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14]见《汉书·食货志》。

[15]见《史记·商君列传》，部分思想参考《商君书》。

[16]《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言秦之弊：“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17]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

[18]见《史记·陈涉世家》《史记·高祖本纪》。

[19]贾谊《过秦论》：“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20]本表总结自《史记》《左传》《战国策》《管子》《孟子》等。

[21]中国道路系统的开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四川为例，从陕西通往四川盆地的道路在战国时已经开通，秦国从这条路征服四川。但从四川沿长江进入湖北的道路，却并没有开通，只有少数的军事冒险做过尝试（秦袭楚郢都之战，见《史记》）。直到东汉、三国时期，随着水运的发展，从长江入四川的通道才有了重要意义，打破了必须从陕西入

蜀的局面。

[22]见《史记·高祖本纪》。

[23]高祖当政后，推出了一系列对商人不利的政策，试图通过限制商人的做法来发展经济。参见《史记·平准书》。

[24]《汉书·食货志》："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至德流洽，礼乐成焉。"

[25]《汉书·食货志》记载高祖："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而《汉书·惠帝纪》提到，他登基那一年"减田租，复什五税一"。说明在高祖时期，有增加田租的举动。

[26]《汉书·文帝纪》："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27]《汉书·贾捐之传》："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28]见《汉书·文帝纪》。

[29]晁错《论贵粟疏》："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见《汉书·食货志》。

[30]《汉书·食货志》："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31]文帝时期，贾谊对于诸侯王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在《陈政事疏》中，他认为，诸侯王问题在未来会成为西汉政府的大危机。“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32]《史记·孝文本纪》：“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

[33]Conor，O’Clery，Moscow，December 25，1991：The Last Day of the Soviet Union，2011.

[34]《汉书·外戚传》：“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35]《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

[36]《汉书·爰盎晁错传》：“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

[37]《汉书·百官公卿表》：“（诸侯王）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

[38]《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1]

在一个集权社会中，财政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朝代初期能够做到小财政和小政府，但随着官僚数量的膨胀、政府职能的扩张，对于财政收入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最终压垮民间经济。

汉武帝除了建立国有企业，还建立了中央垄断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发行也为皇帝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垄断金融成了历代政府聚敛钱财的重要手段。

汉武帝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体系后，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诟病，一场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不可避免。

在汉昭帝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讨论，讨论的双方是皇帝的“聚敛之臣”和民间的“贤良”“文学”，这场争论的主题延续了两千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争论中，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表面上获胜，但实际上，争论过后，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不仅没有废除，还不时得到加强。

事实证明，一旦国有垄断体系建立，政府对于这种体系的财政依赖度已经太强，要想废除这个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彻即位。

新帝即位时，汉室江山已经存在了六十余年，随着天下太平和经济的发展，秦时的战乱已经成为过去。在汉代，由于文字并不普及，人们的寿命也比现代人的更为短暂，当时的社会比现代的社会更容易遗忘历史，六十多年前的事情已经过于遥远，活着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在大一统时代的生活。他们悠然自得，工作、缴税、享受，并认为自己处于最好的时代。

然而，事情在向着对民间经济不利的方向发展。

随着人们对于贫穷状态的遗忘和对汉家威仪的推崇，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不需要谨小慎微的节俭，而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豪迈。这也是财政扩张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皇帝不懂得没钱时的艰辛，只体会到了花钱的爽快。

这也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在“二十四史”中，绝大部分朝代的历史都是由后朝人撰写，作者们不会因为写出了前朝统治者的恶而受到迫害。只有《史记》是个例外，司马迁将历史一直写到了他生活的年代，并且秉笔直书，丝毫不顾及皇帝的情面和本人的安危。

然而，人们无法通过《史记》的《孝武本纪》来了解汉武帝其人其事，只能通过其他章节间接地了解。如果翻开《孝武本纪》，会发现这一卷只是拼凑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原始文本已经遗失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文本，是由一位叫作褚少孙的人补写的，大段大段地抄袭了《史记》的《封禅书》。[2]

司马迁的文本之所以遗失，其原因不言自明：这位态度严谨的史学家流露出对汉武帝政策的批评，尤其在直接描写汉武帝的本纪中，其立场和态度绝对无法见容于武帝和后世的皇帝。如果要让《史记》流传，则必定不能保留这一卷。

但我们可以猜测，司马迁会在这一卷里写些什么内容[3]：在武帝一代，扩建的宫室、复杂的礼仪已经逐渐成为常态，董仲舒们开始神化皇帝，用现代人看起来是胡言乱语的神学语言将儒家变成了儒教，而战争更是使帝国的财政问题显露无遗。

在思想带有自由色彩的司马迁看来，汉帝国已经过于庞大了，从民间收了过多的税，花了太多的钱，却没有带来好的结果。

当武帝政策带来的破坏性显露无遗时，人们感叹武帝与前几位皇帝差别竟如此之大。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武帝，而是换成另一个皇帝，或许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继续文景时期的政策，让汉初的盛世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永久。

但如果仔细研究，其实武帝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现代的人们已经逐渐明白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死穴，就在于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在帝国建立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个死穴逐渐地暴露出来：无论皇帝如何小心翼翼，帝国的财政扩张最终都会摧毁健康的民间经济。不管帝国的前期经济表现如何好，它的制度却总是在慢慢地变坏，直到崩溃。无论何人想把时间停下，维持在帝国前期，都是办不到的。

之所以这样，还是集权制度本身的问题。

汉高祖开创的帝国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好处，将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政权下，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经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在人们享受这些优点时，却没有看到官僚集团在悄然膨胀，[4]如同癌症一样在扩大，直到经济吃不消，养不起官僚集团。

从文帝始，皇帝由于缺乏收入，开始买卖爵位。景帝削藩后，更是将中央直属官僚系统铺向深层。当全国性的官僚网络建立起来之后，由于整个官僚系统受到的监督是很有限的，这个阶层就变得越来越臃肿。

虽然皇帝在官僚层面设立了严格的监察制度，[5]防止官员滥权，但是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却没有外部力量能够监督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任何监督的能力，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就造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手段去制衡政府。

每一级官僚所耗费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以位于官僚集团最顶层的皇室为例。汉初，皇室消耗占比很小：高祖、文帝、景帝时期，宫女人数极少，后宫也极为简单，除了皇后之外，只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少数等级。然而，到了武帝时期，又增加了婕妤、娥、傛华、充依等级别。元帝时，又增加了昭仪等级别，形成了十四等的后宫制度。[6]

后宫的俸禄等级已经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官僚集团。昭仪的俸禄与丞相、诸侯王相同，婕妤的与上卿、列侯相同，娥与中二千石、关内侯

相同。级别一直排下去，直到最末一级也都有百石的俸禄。

当后宫的人数达到数千人时，养活这个后宫就要耗费大量的物资。而除了皇帝之外，各地的诸侯王、官员都要维持愈加庞大的排场，俸禄消耗呈几何级数增长。

王朝初期，经济处于快速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这时，民间的收入就会增加，人们的日子更好过。但是，到了盛世末年，经济增长速度慢慢减缓时，官僚的膨胀速度却正处于高峰时期，悄然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却无法降下来，甚至反而会加速膨胀。因为经济不好，民间的日子不好过，吃空饷的人更不想离开官僚集团的庇护，更多的人想挤到庞大的官僚队伍里来。

这时的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们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想着如何讨好上级和皇帝。皇帝有什么喜好，官僚们都会争相满足。皇帝喜欢打仗，大家立即发动战争；皇帝喜欢声色犬马，下面就会送上不计其数的女人。这些铺张浪费进一步掏空了帝国的财政，并嫁祸于民间，导致民间经济更快地陷入枯竭状态。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财政猛然扩张、经济猛然失速的情况，社会问题频频发生。王朝迅速由盛转衰。

所以，官僚集团引起的财政扩张，对于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到最后，这个问题会越积越大，埋下灭亡的种子。王朝前期表现得再美好，到了后期还是要面对民生凋敝的无奈结局。

具体到汉武帝，则是官僚集团引发的战争问题导致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逼迫皇帝开办国有企业、垄断资源。而政府具体参与经济之后，又需要大量管理经济的官员，官僚系统一下子膨胀了数倍，成为凌驾于民间经济之上的巨大负担。

在大一统国家，无论是汉，还是后来的唐、宋和明、清，战争成本都是历代集权政府承受不起的重担。战争时期，政府的花费数倍、数十倍于和平时期，政府的财政骤然恶化。

在本书的“引子”里，已经谈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直接成本。但除了直接花费（养兵、抚恤金、养战俘、收买敌人）之外，更加难以估算的是间接的战争成本，比如战争时期的物资转运和战备消耗。

西汉时期的产粮区主要集中于华北、川蜀，以及长江—淮河地带。在非战争时期，地方政府收了税，把税粮从地方运往首都长安，供皇帝和中央政府使用。由于古代缺乏道路系统和交通工具，运输税粮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算是富裕的中央帝国也感到很吃力。

战争期间，皇帝除了调兵之外，还需要把军粮再运往战争地带；而战争地带往往处于无法自给自足的边境地区。王朝再强大，也无法单独依靠政府的力量做到。

除了物资转运之外，战备消耗是另一个死穴。这里仅举汉匈开战后，汉政府修筑朔方城的例子，来说明战备消耗有多大。[7]

朔方城位于河套地区，在西安的正北方，与匈奴直接对峙。汉武帝时期，由苏武的父亲苏建率领十万人建造。[8]在前机械化时代，修筑城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在人口不足的地方修城更为麻烦。为了修筑朔方这样一座边防城市，汉政府需要从内地调动十万人到塞外边关去劳动，为了供应这十万人的口粮，又需要极强的物资运载能力。整体耗费高达数十亿至上百亿钱，相当于汉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更是远远超过了整个中央政府官员一年的俸禄。

朔方城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除了朔方之外，在东南、西南、朝鲜等地都有大规模的战备调动，同样消耗着大量的财政收入。

最终，战争会把健康的财政彻底拖垮，帝国不得不依靠临时性的举措过日子。

但是，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旦集权国家经济恢复，就会有人鼓吹战争，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人们只把这种鼓吹当作是疯子的言论，但是第十次、第一百次的时候，这种言论就能够打动执政者，又通过政权的力量传播开来，整个社会变得狼性十足，从而开始了疯狂的冒险。冒险过后能够及时收手还好，如果过了能够回头的临界点，就必然

采取财政上的一系列集权措施，最终导致财政的崩塌。

经过了一辈子的战争，武帝在晚年有了另一次反思。[9]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人又提议武帝继续花钱，以轮台为中心建立军事基地。然而这一次，武帝经过深思熟虑后拒绝了。他发了一道长长的诏书，详细讨论了之前发兵的得与失，得出结论：在轮台兴军务是一项划不来的举动。他终于认识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10]。

在忏悔两年之后，武帝去世。在他在位期间，帝国财政得以无限制地扩张，武帝也终于将中央帝国建设成为两千年的样板。

这个样板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帝国农业税的税率不高。汉代采取三十税一的税额，而其他朝代税额最轻时是十税一或者十五税一。对农业采取低税率，除了所谓的重农情结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的粮食产量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如果税收过高，农民就无法留够活命的粮食。除非是在战争的特殊时期，王朝为了稳定的需要，一般不会对农业加税，甚至不时有减税的措施出台。

其次，农业税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农民税收负担低。在降低农业税的同时，政府却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从其他方面获得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包括：垄断工业的国有企业收入、关市收入、垄断流通领域的收入、垄断铸币产生的铸币税、财产收入，等等。这些收入最终都会转嫁到农民头上。

这些税虽然沉重，却是隐性的。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农民不需要直接缴税，但是政府通过较高的工业品价格，或者利用铸币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农民手中把财富抽走。这种做法隐蔽、高效、来钱快。这也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11]的秘密所在。

在西汉时期，百姓缴纳的正规税赋最高时达到四十亿钱，而皇室的财政收入却达八十三亿钱。[12]也就是说，在整个财政盘子（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财政）里，皇帝通过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等方式获得了占总

财政三分之二的收入。汉帝国时期，农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工商业占比不到百分之十，却承担了总财政的三分之二的负担。可见，皇帝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压榨到了何种程度。

这种压榨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工商业在重负下始终无法得到完全的发展。不仅是汉代，在任何朝代都存在同样的税负问题。这或许是中国无法摆脱农业社会的原因所在。

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武帝时期，还为未来千年的中国经济和财政制度树立了另一个样板——货币制度。

武帝之前的汉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处于罕见的自由竞争状态，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民间和诸侯国也都可以发行货币。而武帝则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形成了我们熟悉的国营垄断发行制度。

欧洲和美国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垄断，而中国的货币垄断却已经维持了两千年。

汉武帝的制度使得宋代之前的中国一直处于金融抑制状态。直到北宋时期纸币出现，才唱响了对这种金融制度的反叛。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一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它为了方便贸易而诞生，却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在纸币发行之前，人类使用金属铸币的时期，最古怪的问题是货币面值和实际价值不一致。

在货币还没有出现，人们利用金、银、铜做交换的时代，人们会按照金属的实际价值来估值。比如，一斤麦子价值一两铜，一两银子价值一匹马。

由于称重很不方便，人们又发明了另一种做法，把一两铜做成特殊的形状，并在上面标明重量（面值），标准化的货币从此诞生了。由于

省去了称重和切割金属的麻烦，货币很快就成为贸易中最主要的中介物。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虽然货币上标明了重量，但有的人会把货币做得比标明的重量更轻，却按照标明的重量去使用，赚取差价。也就是说，面值上标明是一两，但实际重量只有八钱，面值和实际价值出现了分离。

就算一开始货币都是足值铸造的，但随着货币使用一段时间后，足值的货币也磨损成不足值的了。

为了对付减重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对货币进行称重，按照实际重量估值。但这样做除了不方便之外，还需要防止另一种造假手段，即往铜钱里掺锡、铅等不值钱的金属，人为地给货币增重。

这种称重的做法只是在民间采用，而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另一种办法。

二是政府规定，不管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市场只能按照面值来接受它。当加入了官方强制力后，货币也就从“自然货币”变成了“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必须依靠政府立法强制流通，已经偏离了货币的实际价值，而后来出现的纸币也是一种典型的法定货币。

可是，一旦官方授予不足值货币和足值货币同样的流通权，就会有人在铸造货币时故意缺斤少两。而人们持有货币时，也会先把货币的边缘剪下来，再把剪边货币当作足值货币使用，剪下来的边就可以用来铸造新的货币。[13]时间长了，足值的货币反而不见了，只剩下不足值的劣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劣币问题在所有使用铸币的人类文明中都会出现，只要由官方强行规定法定货币的流通权，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那么，如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呢？

出乎意料的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与此同时，放开民间的选择权。官方不去规定哪些货币能用，哪些不能用，由民间根据各家货币的口碑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模式：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通过市场选择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现象：良币驱逐劣币。

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区别在于，政府是否强制规定某一种货币为法定货币，而禁止其他货币的流通。如此一来，就一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如果政府规定所有货币都可以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良币最终会驱逐劣币。

放开货币铸造权和使用权，这种方法虽然是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方法，却受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抵制。政府之所以不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效率，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彻底失去了对于货币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

掌管货币话语权，会给政府带来无数隐藏的利益。政府缺钱时，只要统一往货币里掺点儿假，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收走了大量的财富。对于历代政府，货币掺假始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手段。结果，每个朝代的货币都会出现缓慢的贬值，朝代初年的货币个头儿最大、材料最好；随后，货币越来越小，材料越来越差；最后出现所谓的大额货币，原本一个铜钱一文，后来出现“当十”“当五十”的大钱，一个大钱的材料价值只是小钱的两三倍，面值却是小钱的数十倍。

如果说在铸币时期，中央帝国有货币密码的话，垄断铸币权就是最大的密码。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有一段罕见的时期，由于形势所迫，政府采取货币自由竞争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这段时期就是汉初。

战国时期，每一个国家发行各自的货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的货币统一起来，规定只有秦代的“半两钱”可以流通。[14]

但是，秦代的钱币并非统一铸造，而是在规定了钱币的重量和规格后，由各个地方分别铸造，铸造的钱币只要符合规格，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15]

当汉高祖得到天下时，人们仍然在继续使用秦代的半两钱。只是这时的钱币制度已经显现出了许多弊端。[16]

第一，由于战乱的影响，货币的数量严重不足。汉政府尚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铸造，来满足民间对于钱币的需求。

第二，秦代的半两钱太重了，不便于使用。

在古代的重量单位中，二十四铢为一两，半两等于十二铢，接近后来汉代五铢钱的两倍半。按照这个重量，一串（一千枚）钱就有三十多斤重，携带很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半两钱的价值太大，不利于小额交易。

在汉武帝之前的数百年间，中国农民的收入是很固定的，按照一家五口一百亩地计算，每亩地一年可以产一石到一石半粮食，[17]除去五口人的口粮和缴税，大约可以节余四十五石粮食，一石粮食的价格是三十钱。也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的货币收入只有一千三百五十文钱，[18]平均每个人每天的货币收入不足一文钱。

由于货币最小的单位是一文，如果购买一文以下的商品，就不好付账，这就像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一元两元的硬币，却处处是百元大钞一样。那么小额交易就只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了。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汉代前几任皇帝都被迫采取了放任民间铸币的方法，由官方规定货币的重量，由民间来完成铸币。流通在市面上的钱币更是五花八门，政府铸钱、诸侯铸钱、私人铸钱并行于世。

这也是一个验证货币竞争理论的恰当时机。最初，混乱产生了。民间铸币的质量良莠不齐，绝大部分都是不足值的。实际上，汉代官方已经将货币贬值，官方规定在钱币上标明半两钱，而重量却降到了八铢、六铢，甚至四铢。民间在铸钱时再次减重，加上做工粗糙，各种各样的小钱、劣钱并出，最小的钱只有一铢左右，相当于秦代货币重量的十二

分之一。[19]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自由市场的混乱消失了，更加优良的货币脱颖而出。这些货币的重量不如秦钱，但是方便小额交易。同时，这些钱也不能随便作假，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落败。

在这些货币竞争的胜利者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叫作刘濞的诸侯王。他的封地吴国恰好是个产铜大国，刘濞借助铜山发展铸币业，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另一位是汉朝廷的大夫邓通。这两家的铸币由于质量好、有信用，通行天下。[20]一种民间经济的新秩序建立了起来。汉初的恢复，与金融业和工业的发达有很重要的关系。

但是，有关货币问题的争论却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停止。皇帝们允许自由铸造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中央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掌控全局，不得不放手让民间去干。

汉文帝时期，货币问题已经成为群臣争论的焦点之一。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皇帝曾因为秦钱太大，更改了一次货币标准，规定民间铸钱不再按照半两的重量来铸造（其实当时已经没有人铸这么重的钱了，皇帝的诏书只是追加了它的合法性），而是按照四铢的重量来铸造。所有民间铸造的符合四铢标准的钱，都可以自由流通。[21]

这时，贾谊乘机进谏，提出要废止民间铸造钱币的行为，改由官方铸造。他认为，民间私自铸造钱币，是一切劣币的根源。贾谊甚至详细讨论了如何才能断绝民间铸币。他认为仅仅下令禁止民间铸钱，是没有效果的，不管法令如何严苛，民间还是会偷偷铸钱。如果想要彻底断了民间铸钱的路子，必须从源头禁止，也就是禁止开采铜矿。[22]

这是汉代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矿业国有化的理论。幸运的是，汉文帝听不进去贾谊的国有化理论，汉代的金融自由又保持了数十年，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然而，贾谊代表的儒家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经济的发达使汉初一直没有解决的另一个问题突显出来——如何抑制失控的诸侯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稳定？

吴王刘濞有了钱，中央政府对他心怀猜忌，害怕他会反叛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猜忌又终于逼迫刘濞反叛。七国之乱的爆发，令这个中国少有的金融黄金时代进入了尾声。随着叛乱被镇压，皇帝也在考虑如何利用金融政策来抑制诸侯势力，对民间铸币的政策开始收紧。

这种逐渐收紧的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终于达到了顶峰。由于战争消耗和财政浪费，武帝需要更多的钱来填补财政缺额。于是，他看上了货币发行这块肥肉，以发展民生为借口整治货币。

武帝对币制的收拢措施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出于敛财目的，发明了皮币和白金，并发行了一种三铢钱。三铢钱重三铢，钱上的文字也写着“三铢”，这是汉代第一种标明重量的钱币。之前，虽然有过八铢钱、四铢钱，但这只是钱的重量，而钱上的文字仍然和秦代一样写着“半两”。

汉武帝的白金、皮币大大地扰乱了市场，原本已经稳定的币值重新变得紊乱不堪。货币市场出现了紊乱，武帝不仅没有反思政策问题，反而以此为借口，加紧干预货币发行。

二是在皮币、白金、三铢钱名声不佳之后，武帝规定了一种新的钱币——五铢钱。这种钱币重五铢，面值上写的也是“五铢”。武帝同时规定：不许私人铸币，只准官方发行。

但这时的铸币权仍然不是由中央政府垄断的。由于中央政府还没有铸造这么多货币的能力，于是，皇帝允许各个郡国（诸侯和地方政府）按照中央颁布的标准来铸造。郡国铸造的钱币称为“郡国五铢”。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各个郡国铸造的五铢钱立即出现了劣币的特征。王侯、郡守获得权力后，并不遵循金融规则。他们发现在币材中大量掺假可以制造更多的钱币，造假比遵守规则更赚钱。这引起了另一波的金融混乱。

如果郡国劣币只在民间流通，皇帝不会感到很难堪。但是，当郡国劣币通过税收渠道回流到中央政府时，汉武帝就感觉吃了亏。这就像现在地方政府滥发地方债，最后却让中央政府兜底是一个道理。

为了对付这些劣币，汉武帝又发行了一种钱，这就是赤侧五铢。所谓“赤侧”，就是钱币有一个红铜镶边。这些钱币的发行权已经不再授予郡国，而是收归中央政府，在京城铸造。赤侧五铢的质量是有保证的，但是，汉武帝规定，每一个赤侧五铢要顶五个郡国五铢来使用。同时，上缴中央的税收必须使用赤侧五铢，不得用其他钱币缴纳。

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实质是使其他的钱币都贬值了五倍。于是人们纷纷伪造赤侧五铢，钱币市场更加混乱。

到了这时，货币市场已经混乱到了极致。皮币、白金仍然在使用，郡国五铢在地方上流通，而真假赤侧五铢更是让人民吃不消。大量的投机分子在山上开炉铸币，监狱里关满了假币犯。

当一切已经乱套，汉武帝能够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政府。不仅不准民间铸造五铢钱，也不准各个郡国铸造，只准在上林苑铸造，铸出的钱称为“上林三官五铢”。

从此，中国的钱币从自由竞争阶段彻底过渡到了国有垄断阶段，并成为未来的样本。短暂的自由铸币时期过去了。

汉武帝的改革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通行八百年的货币——五铢钱。五铢钱规定了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路线，即国家垄断金融，打击私人金融。这种做法造成了中央帝国的金融稳定，却又让每一个朝代都带上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并为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留下了后门。

对于汉武帝的货币政策，历史的评价却出人意料。

汉代时，许多人的评价是负面的，他们看到政府垄断铸币之后的金融抑制，以及武帝当初制造的金融混乱。即便官方垄断铸币，到了西汉后期，也仍然有官吏偷工减料、掺假的情况，而且是借国家名义合法化的掺假。

可是汉代之后，人们却又颂扬他的功劳，并世世代代以他为榜样来发行货币。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间，一共铸造钱币二百八十多万亿。这个庞大的数字令人眩晕，于是后人原谅了国有化带来的一切问题。[23]

当然，后世的皇帝们也充分地意识到，汉武帝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多大的便利。当政府垄断了铸币权之后，皇帝就掌握了另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手段，而且是最简洁、最直接的手段。他只需在铸币中掺一半的假，就可以铸造出多一倍的货币，用这些货币可以换来多一倍的物资。等市场发现了皇帝的诡计时，一切都晚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一半，相当于政府收取了百分之五十的通胀税。但由于皇帝利用了时间差，没有人能够防范这种铸币税。

在历史上，货币的减重总是悄然地逐渐发生。一个月、两个月还显现不出来，但如果在更长时间段内，就会发现总是“劣币驱逐良币”，钱币的铜含量越减越少，被其他杂质所代替。

于是，到了每个朝代末期，法定货币已经掺了太多的假，到了再掺假就铸不出钱来的地步时，政府就干脆不再铸钱。而每个朝代的末期，经济本来就脆弱，不铸钱的做法让民间经济缺乏了润滑剂，更趋于混乱，从而加速了王权的崩溃。

宋代以后，随着纸币的发明，政府更是找到了一本万利的方法，通过印钞票来掠夺民间的资本，而纸币的老祖宗还师法了当年武帝的皮币。不管是法国约翰·劳[24]的密西西比骗局，还是魏玛共和国[25]、南京国民政府、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一丝影子。

表2 汉代发行的铸币[26]

发行时间	名称	重量	币面文字	是否垄断发行
自秦延续	秦半两	半两	半两	否
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	八铢钱	八铢	半两	否
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	五分钱	五分	半两	否
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	四铢钱	四铢	半两	否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	三铢钱	三铢	三铢	不准私铸
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	三分钱	三分	半两	不知
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郡国五铢	五铢	五铢	由郡国垄断
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	赤侧五铢	五铢	五铢（带红色镶边）	由中央垄断
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	上林三官五铢	五铢	五铢	由中央垄断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

公元2012年，中国社会再次迎来一个期盼改革的高峰时期。

这次呼唤改革的运动与领导人的换届同时发生。人们对新一任领导人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期待他们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

在人们期待的改革清单中，国企改革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人们希望国企退出所有垄断性行业，将资源留给民营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换届的完成，领导人不负众望。他们首先大力惩治腐败，逼迫地方官吏束手服从。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

然而在所有的改革中，国企改革迈的步子却是最小的。许多主张市场完全自由化的人认为，应该取消国企垄断，让政府从具体的经济运营中彻底收手。但从现已启动的国企改革来看，虽然政府提出了股权多元化的主张，但是一条底线却横亘在人们的眼前，那就是：政府不会失去对国企的控制权，也不会完全放弃资源垄断。不仅没有放弃，甚至出现了许多加强垄断的迹象，在通信、铁路等行业，都出现了政府加强干预、重新合并企业以获得垄断地位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政府的国企改革总达不到人们的期望？这项改革的底线何在？一场发生在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或许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

当汉武帝的丰功伟绩成为历史之后，在昭帝刘弗陵和宣帝刘询时代，汉帝国进入了另一个稳定阶段。历史上把这个时期与“文景之治”并称，史称“昭宣之治”。

汉帝国在武帝之后没有步入财政旋涡，而是获得了第二次新生，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武帝晚年已经放弃了耗资巨大的战争游戏，财政的额外支出

得到了控制。战争和养官是政府最大的两项财政支出，当战争停止后，政府的花费已经得到了控制。

第二，昭帝和宣帝时期，特别是出身贫苦的宣帝，重新提倡节俭，舍弃了奢华的宫室和大规模的礼仪活动，节省了皇室支出。[27]

第三，对于民间经济来说，幸运的是一次农业革命正在进行。武帝末年，一位叫赵过的人担任搜粟都尉，大力推广代田法。在此之前，由于土地的肥力不足，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休耕的措施，典型的休耕有三块土地，每年耕种其中的一块，让另外两块抛荒积攒地力，三年轮一遍。而赵过则提出在一亩地里挖三条垄沟，每年在其中一条里种粮食，另两条留着积攒地力。如果土地肥沃，还可以每年种两条留一条。用这种方法种地，每一亩比起以前可以多收一石粮食。[28]

另外，这一时期也是耕牛逐渐普及的时期，许多地方用牛力来代替人力，获得了更高的收成。赵过本人通过改进犁的构造，一头牛可以拉三个犁头，大幅度提高了耕种的效率。

赵过的农业革命进展很慢，最初只局限于关中地区，之后慢慢向外扩散，到东汉时，农业革命仍然在继续。精耕细作提高了产量和效率，从而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

不过，由于汉帝国的官僚体系已经膨胀了好几倍，对于盐铁工业的垄断也一直持续下来，经济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文景时期的繁荣。

在集权帝国内部，有两条规律在交错中起作用：

第一条规律是，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削减财政开支，社会经济会立即出现反弹。

第二条规律是效益递减规律。在制度建立初期，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往往能得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是在朝代中后期，使用同样的政策，效果却要打一个折扣。

在朝代中后期，复杂的利益集团已经成型，特别是官僚人数的膨胀，即便中央选择让利，但这一部分利益不见得能够进入老百姓口袋

里，而是被中间的利益集团截留了。

昭、宣两位皇帝的改革必须在武帝已经设好的框架下进行。这时，政府的养官成本大大增加，由官员带出的利益群体则呈几何级数上涨。

在汉初，官员不插手经济运营。后来，官员以私人身份涉足商业。而自武帝卖官之后，官员和商人就彻底合流了。如果这时候再让官员从商业中退出来，不仅不可能实现，还会引起激烈的反抗。

汉昭帝时期，由于主政的大臣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而霍光又是汉武帝指定的托孤大臣，所以政策还不能与武帝时期背道而驰，只能打着武帝的旗号来换上一些不同的内容。

正是在汉昭帝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争论。

随着经济的好转和农业的进步，昭宣时期逐渐出现新气象。崇尚自由经济的人们在昭宣新气象的鼓舞下，也指望更大的改变，期待皇帝能够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彻底回归文景时期，将武帝建立的国有经济体系废除掉。

在人们的心中，仍然认为政府不应该参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应该恢复到小政府的状态中去。

这场国家和民间的大争论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辩论记录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幸运地流传到了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它来了解争论的许多细节。这本叫作《盐铁论》的书让现代人也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而现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两千年前有了折射。

当年，汉昭帝为了了解民间疾苦，让各个郡国推荐了数十位贤良、文学，也就是民间的社会贤达，到朝廷来反映民间问题。这些人果然不负众望，一到京城，就将民间的问题和盘托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罢黜盐铁专卖、还利于民的建议。

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功劳最大的大臣桑弘羊仍然在朝，当贤良、

文学们控诉他亲手制定的政策时，桑弘羊自然坚决不同意，跳出来辩白。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辩论场如同战场，讲究刀刀致命。[29]

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就会破产。[30]而与他辩论的文学、贤良们都来自民间，对于政府财政问题不甚了了，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却更为了解。他们最能感受到武帝政策给民间带来的困扰。但这些人在理论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说不过别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31]，或者“政府要回归儒家传统，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强调要重本抑末，以为问题出在工商业上面，[32]没有看到工商业并没有罪过，而是政府控制了工商业，才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后世的新派人物大都嘲笑这些贤良、文学的迂腐。

包括明代最具反叛精神的李贽，在普遍“灭人欲”的背景下，他大胆地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将焦点从空洞的说教转回了民生。但由于他反对儒教过了头，看到贤良、文学要回归儒家传统就来气，故而他也认为桑弘羊的做法更加正确。[33]而到了近代，相信“人定胜天”的历史学家更是把贤良、文学们贬得一文不值，而把桑弘羊捧到了天上。

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虽然贤良、文学们迂腐，看不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比如，桑弘羊谈到，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国有，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

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制铁业国有化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34]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

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国有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但从基层的经验来看又是另一回事儿：铸币权国有化之后，政府的钱币也在慢慢减重，偷工减料。[35]另外，皇帝也将什么白鹿皮、白金当作货币，让市场更加混乱。

所以，抛开道德上的说教，贤良、文学认为，政府的做法，一是抽取民间财富，二是扰乱市场，三是官商勾结，这三点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按照桓宽的说法，贤良、文学在辩论中占了上风。[36]但这个说法未必正确。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次的讨论本应该成为事情的转折点，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昭帝只是象征性地废除了酒类专营，其余国有企业没有被废除，官方垄断也没有解除。

盼望改革的人们都忽视了一点：一旦国有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国有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了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西汉后期的皇帝也尝试过一次废除盐铁专卖。

公元前48年，汉元帝继位，当年全国出现了大水灾。第二年，在曾经富裕的齐地出现了大饥荒。这时，中央政府终于下决心不再与民争利，削减一系列的政府开支，同时取消盐铁官营，准许地方撤销常平仓。这次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三年后，皇帝又悄然恢复了盐铁官营。[37]

这是西汉皇帝最后一次试图恢复到以前的黄金时期，但随后他知道

一切已经不可能了。官僚集团只会膨胀，不会收缩，他们已经绑架了政府财政，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又必须建立国有垄断体系来绑架民间经济。

国有企业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国有企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国有企业来渡过难关。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现在的改革，就会发现，它是一种理顺式的改革。由于社会经济运行了这么多年，产生了许多问题，所以，就由领导者出面，将这些问题都理顺。由于金融过于抑制，就做一些调整把民间资本引进来；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太庞大，就出台一些透明化的举措，防止泡沫的堆积；由于司法透明度差，民怨太大，就改革司法系统，让司法与地方政府离得远一点。

一切都是在理顺关系，但在结构上，不会有太大的调整。这和当年“昭宣之治”的思路是一样的。汉昭帝时期采取了很多补救式的措施，包括尽量避免新的战争，不主动找麻烦，重新强调休养生息政策。

宣帝时期继承了这些基本政策。宣帝还特别注意吏治问题，采取严厉的手段整顿吏治。虽然两位皇帝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最终，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都被下层的官僚捞去了，虽然也有惠及民间，但由于官僚阶层的阻碍，效果要小得多。自武帝以来，随着朝廷介入经济的程度加深，出现了不少官商勾结现象。如果要向民间放权，必须击破这些中间层的力量。

宣帝经过分析，认为是吏治出了问题，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民间经济，必须整顿官场。宣帝的吏治整顿也并非汉代所独有，一般到了朝代中期之后都会出现一个设法使吏治清明的皇帝，试图将皇朝重新拉回正常的轨道。

但所有试图这么做的措施都只能暂时奏效。一旦放松了警惕，情况就会立即恶化。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2012年开始的反腐运动仍然在轰轰烈烈地继续。执政者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反腐，是因为这是推进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步骤。

从汉代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除了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之外，还有许多条条块块的诸侯。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卿，都是一个拥有独断权力的诸侯，他们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比如，上一届中央政府调控了十年房价，却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并不想调控房价。因为一调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出现大幅度下滑，而地方官员也没有办法从中渔利了。所以，每一个地方官员一边跟着中央唱高调，一边在私下里挖墙脚搞自己的一套。而中央政府知道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却很难抓住具体的把柄，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从名义上讲，中央领导地方，并负责地方官员的任命。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只要能把中央政府糊弄过去，不影响仕途，私下里干事的空间大得超乎想象。

除了地方政府，各个中央部委也从中谋取私利，使得中央政府的政令很少越出红墙之外。

由于双重争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但改革条文到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

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会一无所获，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把损失转嫁给民间。

新的执政者上台时，这种现象已经到了临界点；再加上许多地方官员认为新执政者上台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这是大肆扩张的好机会。

但这一次，他们遭到了当头一棒。

执政者在推行改革之前，必须让各级官僚俯首听命，而反腐就是最好的办法。每个官员都突然意识到：哪怕他再强势，也只不过是趴在岌岌可危的高杆上，随时会被捅下来。他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只有这时，中央政府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推进。

汉宣帝也曾经做出过类似的努力，但宣帝死后，汉代却并没有走出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困局，甚至出现了新的失衡。而社会上，贫富分化问题也愈加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当秦代结束了战国的局面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塑期。汉代建立时，已经没有了传统的富翁和贵族，而是进入了普遍的贫穷。加上秦汉王朝都特别注意防止旧势力再起，将以前的豪门贵族都迁到首都去定居，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富裕阶层的力量。

但随着帝国的复兴、财富的积聚，大的富豪很快又出现了。[38]

比如，四川地区依靠冶铁发财的就有卓氏和郑氏。汉武帝的理财能手之一孔仅出自南阳孔氏，而南阳孔氏直到三国两晋时期仍然发达。鲁地曹县的邴氏（冶铁），齐地的刀氏（煮盐和贸易），周地的师氏（贸易），宣曲的任氏（粮食贸易），边塞的桥氏（马匹贸易），关中的无盐氏（金融）、田氏、栗氏、杜氏，等等，财势都闻名于世。

这些商人有一个共同点：最初大都是依靠机遇和头脑起家，当大家都处于同一起点时，他们更善于发现新的工业和贸易机会，并坚决地投身其中，成为社会的佼佼者。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大都是最先进的工业部门，依靠资源的稀缺性和工业化规模优势脱颖而出。

然而不幸的是，西汉的大商人也和后世的商人一样，在他们富裕之后，立即和权力粘在了一起。他们从事的工商业成为皇帝觊觎的对象，汉武帝出于扩大财政收入的目的，将资源收归国有。这些人要么被皇权所淘汰，要么投靠皇权，个人的选择余地并不大。

而出于工业管理的需要，汉武帝也必须依靠一批有经验的大商人帮助他建立国有企业体系。于是这些商人立即变成政府的座上宾客。当汉

武帝把地方官的财政贡献当作指标来考核时，这些人在地方官眼里也变得不可或缺。[39]

在西汉政府建立时的限权设计中，只考虑了对军队、官员的限制，防止他们对皇权产生冲击。但皇帝很少过问官员和商人的勾结，只要皇权是稳定的，这些勾结行为就是可以谅解的。[40]

如果政府的定位只是仲裁者，不是市场参与者的话，那么也许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可一旦政府成为参与者，缺乏限制的权力立即会借机大捞一票，这就是官商勾结得以产生的契机。

如果说西汉前期的富翁大都还靠市场起家，那么随着后来官商渠道的打通，贫富分化的问题愈加严重。在任何有权力垄断迹象的地方，就会产生不正常的巨富，而权力垄断最集中之处，就是土地。如武帝时期的丞相田蚡，他的住处比别人的都豪华，又占据着最好的土地；在集市上买的东西都堆在道路上，院子里极尽奢华，后房里塞着上百的女人。至于其他稀奇古怪、声色犬马的东西更是不计其数。[41]

元帝、成帝时期的丞相张禹是另一个例子。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将儒术当成治国术之后，西汉的儒者大多以通一两本书著称。张禹学过《易》和《论语》，官至丞相。但这位儒者却对地产抱有很大兴趣，积攒了四百顷最上等的土地。[42]

到了哀帝时期，大司马师丹更是提到，现在富人官吏的财产已经达到数亿钱，而穷人却更加贫困。

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师丹和王莽在哀帝刚即位时推行了限田令，诸侯王、列侯不得去封地之外占有土地，其余人的土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可以有二百人，列侯、公主的奴婢限于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的奴隶限于三十人。诏令给人们留了三年时间进行整改，三年后调查，如果有超过规定的，就要惩罚。

一时间鸡飞狗跳，土地、人口的价格大跌。然而随后，哀帝宠幸他的娘家人，赐给董贤二千顷土地，早已超过了限田令的额度。由于皇帝首先破坏了规矩，这次限田令不了了之。[43]

人们突然发现，中央的命令并不需要全部执行，只需要敷衍一下，等它慢慢被遗忘就行了。

汉代的巨富还和另一社会状况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更加危险的后果。

汉代的人才流通机制非常孱弱，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容易形成社会的结块现象。这个结块现象在三国两晋时期达到高潮，而当时的所谓“世家大族”，大都在西汉时期就开始形成了。

皇帝为了加强人才的流通，避免阶层的固化，采用察举制来发现民间的人才。但是，一旦权力和利益结合之后，察举制就逐渐失效了。负责察举的官员选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或者关系户。随着人才上升的通道被官僚阶层和富裕阶层（这两者往往是合一的）所垄断，社会结块、贫富分化就更加严重了。

贫富分化还造成了一系列的争论：为了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应该管制经济，还是放松经济？

这在《盐铁论》中也有着明显的反映：争论的双方都看到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层严重的现象，也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采取的方式却是截然相反的。[44]

支持政府控制经济的桑弘羊认为，既然现在有着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政府更应该毫不犹豫地介入，花大力气整治这种现象。整治的措施包括：禁止富户擅自从事工商业，把工商业交给政府垄断经营，同时加强流通领域的许可证制。这样，政府控制了经济和财政收入，就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来调节民间的财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来赈济灾民。

而桑弘羊的反对者认为，如果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应该让政府退出工商业，让民间自由地进入这个行业，达到平均地利的效果。管制带来的不是民生，而是更严重的不平等。

桑弘羊的“社会主义”观点看上去非常具有说服力，也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在实践层面上，人类对于这个理想已经试验了几千年，每一次试

验都会发现：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越凋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

这些经验是通过实践总结的，很难从形而上的辩论中获得。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千年前和现在争论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几乎没有区别。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照贤良、文学的观点，政府减少管制，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

答案出乎意料：同样也解决不了。原因仍然在于集权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权。当官僚集团复杂化之后，中央政府即便想放权，也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甚至中央政府正准备放权时，地方政府立即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

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而中央政府试图放权的努力也总是败于官僚阶层的抵抗。这种问题在集权体制的历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踪迹。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41年—公元前33年。

[2]《史记·孝武本纪》：“［集解］张晏曰：‘武纪，褚先生补作也。褚先生名少孙，汉博士也。’”［索隐］按：褚先生补史记，合集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

[3]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政策批评，最集中反映在《平准书》《封禅书》等篇目中，虽然他编写的汉武帝本纪已经不存在，他的态度却仍然可见。

[4]《汉书·贡禹传》对比今昔，特别指出了官僚的奢侈无度：“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

厩马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

[5]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即为监察官，负责监察百官。另外，武帝时期又设置刺史去监察地方官员。同时，武帝使用酷吏来纠察官员的罪行，审理了大量的官员腐败案件，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吏治。参见《汉书》。

[6]见《汉书·外戚传》。

[7]见《史记·平准书》。

[8]《汉书·苏建传》：“苏建，杜陵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封平陵侯。以将军筑朔方。”

[9]《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10]见《汉书·西域传》。

[11]这是司马迁评价桑弘羊的话，见《史记·平准书》。

[12]《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13]中国的金属货币虽然以铜为主，但工艺上却是领先的。西方早期的金属货币不像中国那样是铸造的，而是在金银饼上敲入徽章和印记。这样的货币形状不够规则，更容易出现减值。同中国拿剪下来的边铸造新的货币的做法类似，常用的做法是把一批货币放入布袋，使劲摇晃，依靠金属的碰撞和摩擦使货币磨损，再收集磨损下来的金属屑。

[14]《汉书·食货志》：“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15]同一时期的文献并未提到秦朝钱币的铸造问题，但由于秦朝流传下来的钱币千差万别，统一铸造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差别，故得出此结论。彭信威认为，秦始皇的统一币制，只是货币种类和货币单位的统一，而不是货币铸造发行权的统一。半两钱并不由国有统一铸造，甚至政府是否铸造钱币，也无从知道。遗留下来的半两钱，如同牡丹叶一样，枚枚不同，可见是各地自由铸造的。因此我们也不能根据秦半两的重量来求得秦的衡法。秦半两中，最轻的只有六厘米许，而最重的有到二十厘米以上的。（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16]《汉书·食货志》：“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

[17]《汉书·食货志》引李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同书引晁错：“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18]见《汉书·食货志》。李悝计算，百亩可以收一百五十石粮食，什一税扣除十五石，剩下一百三十五石。口粮每人每月一点五石，五人一年需要消耗九十石，剩下的四十五石进入商品市场。按照每石三十钱计算，可得一千三百五十文钱。汉初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率的进步有限，而粮食价格也相对稳定，可以用来做横向比较。

[19]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20]《汉书·食货志》：“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21]《汉书·食货志》：“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22]见《汉书·食货志》。贾谊谏曰：“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23]《汉书·食货志》："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24]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著名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被誉为"金融和纸币之父"。

[25]魏玛共和国，指1918年至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国宪政政体的德国。

[26]本表依据《史记》《汉书》相关材料制成。

[27]宣帝原名刘病已，汉武帝原太子刘据的孙子。由于刘据受"巫蛊之祸"牵连而死，不到一岁的刘病已就被收押在监。他的成长经历使得他更加了解民情，故其政策较为清明，财政开支较为节俭。

[28]崔寔《政论》："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为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汉书·食货志》："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

[29]《汉书·食货志》："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盐铁论·本议第一》："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30]《盐铁论·本议第一》："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31]《盐铁论·本议第一》："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

[32]《盐铁论·本议第一》："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

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

[33]见《藏书·富国名臣总论》。

[34]《汉书·食货志》：“……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

[35]《盐铁论·错币第四》：“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

[36]《盐铁论·大论第五十九》：“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当此之时，顺风承意之士如编，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暗然而怀重负而见责。”

[37]《汉书·食货志》：“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38]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有一卷《货殖列传》，讲到了当时的一批巨富。

[39]西汉时期，除了以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为代表的中央聚敛之臣外，由于地方也遍布着盐铁官，故而可以推测聚敛之臣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或者可以称为“浊水集团”，与另一个儒者官员集团（清议集团）形成对峙。

[40]西汉以官致富的人多如牛毛，除了下文所举例子，较为著名的还有杜周的杜氏、霍光的霍氏，以及王莽所在的王氏等。

[41]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42]见《汉书·张禹传》。

[43]见《汉书·哀帝纪》。

[44]见《盐铁论》相关章节。

第三章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1]

王莽取代汉王朝并没有受到多少抵制，群臣和民间不仅不反对他当皇帝，甚至不断地恭维和簇拥他完成改朝换代。但随后王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却导致了政权的垮台，而改革的核心则是金融和财政。

王莽的改革带有很强的幻想色彩，试图通过遵循儒家经典来完成新的制度设计，从而达到大同理想。可以说，王莽的改革是一次儒家原教旨的乌托邦实验。

王莽改革的核心包括三个方面：土地所有制改革、货币制度改革，以及加强政府垄断。这些改革对民间经济的破坏作用，彻底粉碎了政权基础，引起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的发生，又让王莽陷入了财政旋涡，最终倒台。

王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货币制度，这个制度把金、银、铜、龟、贝都纳入到货币体系之中，创造了二十八种货币，并强行规定了二十八种货币的兑换比率。但政府权威最终敌不过市场，市场拒绝接受这么多货币，使得王莽的币制改革归于失败。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

公元前71年，就在汉昭帝去世、汉宣帝继位三年后，一位叫作王政君的女孩出生了。[2]

她活了八十四岁，有八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她一直活到了西汉皇权的结束，这个朝代后期的大事件也多和这个女人的家族有关。

公元前33年，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去世，成帝即位。元帝的皇后王政君成为帝国命运的主宰者。她先后任命四个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根去职后，她又在王家的孙辈里找到了王莽来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一职。

成帝死后无子，侄子汉哀帝即位，哀帝不喜欢王氏一家，将王莽贬斥。但哀帝只在位七年就死了，他死后，王太后继续掌权，于是王莽又被召回，辅佐了两代婴幼儿皇帝：汉平帝和孺子婴。[3]

在王太后的时代，汉帝国在经济上的稳定一直持续到王莽代汉。

然而，这个时代已经无法达到文景时期的高度，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大。在丰收的年份，人们的生活与文景时期毫无二致；可一旦出现灾荒，由于政府平时从民间抽走的利润太多，民间的积累已经不足，就会有人陷入赤贫。

不过，一俟灾荒年过去，经过一两个丰收年，人们的日子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这一段时期的史书里充斥着对灾荒的记载，但也承认人民整体生活是小康水平。

班固在《汉书》中这样评价哀平时期：

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4]

西汉皇权的坠落并非因为经济和财政上的吃紧，而是出现了另一种失衡：王太后的娘家人带来的权力失衡。

在“家天下”的时代，外戚和宦官的专权一直是无解的难题。当皇帝过于孱弱，其权力就会被这两种势力的其中一个控制。汉元帝死后，控制政权的是外戚势力。这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宫廷事变，那些有雄心壮志的新皇帝总是莫名其妙地暴病死去，继任者大都是性格懦弱的人，甚至是未成年的孩子。在经过几代暴死、懦弱或者未成年的统治者之后，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西汉王朝的外戚专权问题又因汉武帝时期对官制的破坏而进一步加深。武帝为了统治的便利，将丞相等外朝官员的权力分走，给了围绕着他的小圈子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被冠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号，在内廷做决策，反而使三公九卿的正规官员们被隔离在真正的权力之外。

在这种模式下，外戚只要控制了内廷集团，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政

府。王莽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改朝换代。这种改朝换代大都是以禅让的形式来完成的。政权更替如果得当，对于民间经济、财政结构的影响并不大。除了皇帝换了人，其他的生活照旧。

王莽的新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禅让大戏”。在这出大戏里，我们已经可以总结出以后每一出禅让戏的基本模式。

人们本以为官僚系统会对汉皇室表现出极大的忠诚，抵制王莽。但绝大部分官员尊重的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他们并不排斥王莽的篡权，反而在整个过程中屡屡充当先锋，帮助王莽完成他的使命。而王莽在早期也特别注意将自己的命运与官员绑在一起，扶持派系。

在“出道”伊始，他就表现得如同谦谦君子，生活节俭，提倡孝道，谦恭下士，在整个王氏家族中享有盛誉。[5]在汉哀帝执政的那几年，由于哀帝也要扶持娘家人，王莽暂时失去了权势。但正是因为他有好名声并得到了官僚集团的拥护，王莽在哀帝死后很快重新执政，并废除了哀帝的外戚集团。

官员的行为艺术在公元元年王莽封安汉公的事件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一年，塞外进献了一种被认为是祥瑞的白雉（野鸡），群臣上奏，以王莽治理国家带来了祥瑞为借口，请求册封王莽，把他提高到与萧何、霍光这两位汉代名臣并列的地位上。

所谓“祥瑞”，也是汉武帝留下的遗产。为了神化皇帝，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帮助下制定了天人合一理论，[6]将皇帝比作天，同时大力推行祥瑞和谶纬，对于自然事件进行政治化的解读，令汉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迷信的朝代。王莽不仅借助了董仲舒的理论，还大力推广为其所用，利用祥瑞来为上台做铺垫。而白雉正是传统的祥瑞之一。[7]

王太后收到了请求，为了撇清关系，连忙请群臣澄清：他们要求任命王莽，是出自真心，还是因为王莽是太后的亲戚？群臣听了王太后的话，诚惶诚恐，为了更表忠心，立刻再次加码，将王莽比作和周公齐名的人，并乘机要求给王莽加封号“安汉公”。[8]

这一次，王太后终于同意了。

然而这时轮到王莽出来表演，他立刻拒绝给自己加封，同时要求给他的几个党羽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等人加封，认为他们才够资格。甄邯听说王莽推荐自己，立刻跳出来推举王莽。

王莽再次推辞。太后前后三次试图召见王莽，给他加封，都被他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前往宫廷。三召三辞，甚至五召五辞，也成了此后的标准程序，在历次权臣主持的禅让活动中屡屡上演。

最后，群臣没有办法了，只好请求太后先给王莽推荐的其他人加封，再加封王莽为安汉公。其他四人都得到加封之后，王莽却继续推辞。此时，群臣再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又提出请求，请太后考虑百官和庶民的普遍愿望，不要让他们失望。这时，太后勉为其难地发出了诏书，加封王莽为安汉公。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王莽仍然诚惶诚恐，虽然接受了诏书和封号，却推辞了封地和世袭权，表示待百姓都富足之后再接受。

双方的推辞又持续了一轮，直到太后又答应给汉代的诸侯功臣的子孙都加赏，王莽的演出才告一段落。

在这整个仪式中，太后、王莽、群臣的配合严丝合缝，虽然大家都知道最后的结果，却必须演好各自的角色。可以看出，群臣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排斥王莽，甚至与王莽勾结在一起。

当然这只是王莽代汉的起点。在成为安汉公之后，王莽的地位越来越高，又当上皇帝的岳父，加九锡（接受象征官员最高荣誉的九种皇帝赏赐。王莽之后，加九锡也成了历次禅让的标准程序），直到成为代理皇帝，但承诺等孺子婴长大之后还政于他。最后，王莽变成了真皇帝，取代了刘氏政权。

这一出出大戏充斥着繁文缛节，如果要将它一一展开，能够写满数十页。人们为了完成这个仪式，制定了五花八门的礼仪，虽然大家都知道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并非整个官僚系统都乐于看到王莽得势。

在王莽篡权的整个过程中，他两次斗败了新外戚势力的夺权。公元6年，当他成为假皇帝之后，安众侯刘崇也起兵反叛过。而对王莽打击最深的是公元7年的翟义起兵。[9]翟义是汉丞相翟方进最小的儿子。不管是外戚还是属于刘氏家族的刘崇，他们的反抗都是天经地义的，因为王莽要篡夺的就是这些人的权力。王莽在和这些人的斗争中，早有心理准备。

而翟义代表的是官僚阶层的反叛，这却是王莽最为担心的。即便这次起兵很快被镇压了下去，王莽在以后也经常会提到翟义这个人，将他看成是乱臣贼子的典型。这也表现出翟义起兵在王莽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但王莽多虑了。其实大部分官员是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场斗争，仿佛与己无关，他们只会选择和胜利者在一起，连反抗的意思都没有。

正是大部分官员的冷漠让王莽代汉的大戏显得波澜不惊。汉代的老百姓表现得更加冷漠，人们似乎已经明白，皇帝换了人之后，生活的一切都会照旧。官僚继续存在，税赋照样缴纳，耕田、买卖、生活，这些主旋律都不会变化。发生在遥远都城的事情，本不应该对遥远乡村的人们有影响。

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既然官员不反对，社会也不反抗，那么王莽取得皇位之后，应该大大地松一口气，享受当皇帝的乐趣。至于政治，西汉留下的家底还过得去，本不应该做太多的变动，免得动出问题来。

但奇怪的是，王莽渡过了最危险的政权交接期之后，却突然启动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财政、金融改革。而这些经济改革不仅没有取得效果，反而使整个社会疲惫不堪，走向解体。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局面被他亲手葬送，到最后他也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那么，他为什么非要进行这些激进的改革呢？他到底是一个野心家，还是一个疯子，抑或是一个幻想家？

答案也许是：都不是。

在大多数官员以冷静和功利的眼光看待王莽代汉的同时，这位新皇帝却有着一批狂热的粉丝。这些粉丝的数量有限，却掌握着一大半的舆论和话语权。正是他们将王莽捧上了天，也正是他们的狂热诱导着王莽进行改革。

这些狂热分子就是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王莽之前，汉元帝为太子时，曾经怪父亲汉宣帝不重视儒家学说。太子说，汉代的许多弊端都是因为制度不好而造成的，作为皇帝，应当采纳儒家推崇的周代理想，来构建一套新的制度，取代现有的规则。

太子的天真想法随即遭到了汉宣帝的驳斥，他批评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10]

汉宣帝与人们熟悉的清代雍正皇帝有几分类似：大力整顿吏治，又有务实的性格，知道每一代必须以已有的制度为基础进行演化。当汉高祖建立皇朝之后，制度一旦确定，就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变革。武帝扰乱了汉家制度，但后世的皇帝即便不喜欢他的政策，也必须首先接受这个事实，在这个现实基础上再做调整。想全盘推翻，回到理想中的模型是办不到的。

虽然太子的提议没有成为现实，但太子和皇帝的对话却将西汉后期的一个基本问题呈现了出来。这个基本问题不仅影响了元帝一代，还在其他皇帝统治时屡屡出现，成为大臣们争论的焦点。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现实不满，希望重新设计一套制度来取代已经千疮百孔的旧制度。

西汉帝国后期，人们之所以对现实不满，并非是因为吃不上饭，而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的不认同。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随着盐铁等最具前景的工业的国有化，人们除

了种地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生存手段。虽然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但因为缺乏发展前景，人们心中的不满反而增加了。

中央官僚的选任范围更加窄小，挑选范围集中于官二代、官三代，加上外戚势力把持朝政，普通人的仕途变得更加狭窄。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控制经济的程度加深，与商人的勾结越来越严重，社会结块现象明显，大家族出现了，普通人致富的渠道变得更加稀少。

这个结块的社会还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地方权力失控。地方上的大家族垄断了地方官吏的职位，中央和地方出现了脱节。中央的控制力下降了。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对于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始终是中央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在两者的对抗中，中央不断派出巡视组去审查地方官。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第一次派出六个人作为中央巡视组（刺史）前往地方巡查。到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就设置了十三部刺史，将巡视制度固定了下来。[11]

监察制度可以一时抑制地方的离心倾向，但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地方势力失控的长期趋势。

在对社会不满的人眼中，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不公正，干活的人忍受着贫穷，不干活的人却享受着奢侈。特别是在一些家族势力的带动下，人们竞相穿戴绫罗绸缎、金银珠玉，竞相购买家奴，建设高级住宅。富裕的人家更是控制了地方官僚的选举，饱学的儒生没有办法进入仕途。[12]

对现实不满的带头人大都是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大声呼喊着改变。“Change”，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运用得滚瓜烂熟的词汇，在中国历史上也屡屡发生着作用，让人们显得无所适从。

实际上，随着汉武帝将儒术定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大学机构（太学）的确输送了一批儒家学者进入官僚系统。

汉代后期的丞相如萧望之、翟方进等人，往往都是当世闻名的大儒。另外，皇帝设立的五经博士也已经成为官方圈养的学术机构的代

表，依靠出卖学问享受着皇家待遇。他们通过编撰课本和垄断教育行业，将儒家理论灌输给整个社会。

但是，与更多人想当官比起来，这个渠道仍然太窄，大部分人根本无法通过儒术进入政权。更令皇帝想不到的是，他们尊崇儒学是为了给政权带来稳定，而儒学的发展却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负面作用。

首先，儒生掌握了强大的宣传能力。作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儒学仿佛同时控制了现在的中宣部和教育部，拥有无限的开火权。

但儒家学者们并不总是按照皇帝的意图编造理论，他们还时不时让皇帝难堪。

西汉时期，是儒家经典纷纷定型的时期。流传下来的残缺的五经文字，都经过了汉代人的篡改、伪造和阐释，这使得许多汉代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加进书中，谎称是古代就有的思想。[13]这就像清代康有为谎称孔子是改革的典范来推动变法一样，借古讽今，却也让民心更加偏激和失控。

在汉武帝时期，儒者们还能根据皇帝的意图来解释经文，强调现代是从古代演进的结果，是一种必然趋势，带着社会进化论的色彩。[14]但武帝之后，由于人们对社会和政治失望，另一种复古主义的风潮逐渐占据了上风。他们将周代描述成一个更加富裕、平等和充满礼教的社会。在那个时代，人们全都知书达理、安守本分。

周代的井田制之所以被私人土地所有制取代，是因为这种制度效率低下，但学者却把周代的土地所有制描写成一种理想的制度，在那儿，人人有饭吃，无人不饱暖。不仅人人饱暖，而且人人反对奢侈。每一个人都有着相应的社会等级，每一个社会等级都有着符合该等级的着装和消费标准，只要安守于标准之内，就不会奢侈。

在那里，没有超级的富人，也没有穷人。他们的位置是根据需要来分配的，贤人成为贵族和官员，而贵族一定是贤人。至于为什么贵族一定是贤人，却没有人愿意追究其原因。

这是古代社会的“共产主义”，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但在汉代后

期，却成为许多人探讨政策、制定法规的模板。

汉代的社会思潮又由于今古文经的争执变得更加复杂。[15]在汉代圈养的知识分子中，有的人一旦当上了五经博士，立刻变成了学阀。他们拉帮结伙，只准徒弟背诵自己的理论，不准有任何偏差，更加优秀的人无法脱颖而出。

但是，这些人使用的教科书却是有问题的。由于秦代焚书坑儒，大部分的儒家典籍都已经残缺不全，依靠一些老人的记忆而得以流传下来。当他们幸存到汉代后，凭借记忆或者私藏的书简，将儒经进行了恢复。但这样的经文充满了讹误。后来，随着一些在秦之前书写的文本的发掘，人们发现市面上流传的所谓经典有许多错误，也残缺不全。这些后来发掘的经文被称为古文经，而在太学里流传的是今文经。

许多对当时学术现状感到不满的学者都聚集在了古文经学的旗下，开始了反叛。他们更加推崇古代，也更加批判现实。周代的乌托邦在他们的描绘下熠熠生辉，吸引着人们前去投奔。

王莽时期古文经学的大家是刘歆。刘歆是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刘向也是西汉著名的编撰家，《战国策》《说苑》《新序》等典籍都经由刘向编著，而刘歆则和父亲共同编校了《山海经》。

刘歆被认为是王莽的国师。除了刘歆之外，还包括孙阳、张邯、鲁匡等人，无一不是当时饱学的大儒。

当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在批判现实的旗帜下聚集时，还需要一个旗手带领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司马大将军王莽恰好出现在这个时候。

王莽本人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也认同儒家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不惮用权力去实现理想。为了对抗崇尚奢侈的社会风气，王莽曾经希望带头提倡简朴。作为皇家的最高官员，他带头“恶衣恶食，陋车驽马”[16]，一听说各地有灾荒，就连肉都不吃。他希望通过皇家的提倡来改变风气。

王莽这样做有他的理由，他需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只有有了威信，

才能掌握足够的权柄，取代汉家王朝。

这些儒者本身并不在乎谁来当皇帝，他们只在乎谁能帮助他们实现理想社会。于是，在西汉末年，王莽和儒生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联合体。儒生利用他们庞大的宣传能力帮助王莽上台，而王莽则推行儒生期望的政策来改变社会。

关于西汉末年这一复古思潮，有许多例子可以印证。

元帝时期，一个叫作贡禹的官员很得皇帝喜爱。他品格高尚，生活简朴。他依照古代社会的标准，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比如，他认为武帝之后的宫廷中声色犬马、美人充斥，花费难以估算。而他理想中的古代社会是：皇帝的宫女不过九人，马匹不过八匹，一切都是极节俭的。贡禹从这个角度出发，请元帝大幅度削减宫室开支。此举收到了好的效果。

然而，当一切都以古代为标准时，贡禹也会得到一些荒谬的结论。比如，在对待货币的问题上，贡禹看到了政府垄断货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他提出的建议却是：废除货币，回到以物易物的时期；或者用米和布来作为交易媒介，取代黄金、铜币的作用。[17]

贡禹对于金融的质疑只是当时的一个代表，许多人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希望改革货币制度，而这种思想传到了王莽时期，就成为他改革的主线之一。

另一个例子则来自于以研究《诗经》而闻名的师丹。在古代，曾经使用龟壳和贝壳来当作货币，许多人希望把这些东西重新搬出来，师丹本人也赞同这种做法。这就距离王莽的货币改革更近了一步。

而师丹更重要的思想则反映在哀帝刚刚即位时他提出的观点中。他认为，西汉后期日渐明显的社会结块现象，来自于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富人？因为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天子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或者限制土地占有量，不准自由买卖。[18]

师丹的提法后来成为王莽改革的另一条主线。

在贡禹和师丹等人的影响下，王莽上台后，希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希望借助舆论的东风，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当王莽改革失败后，大儒们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绝口不提这段书生乱政的历史，继续充当后世执政者的犬马。人们将社会的乱套都归罪于王莽，反而忘记了当初社会舆论的推动作用。于是，王莽就作为著名的乱臣贼子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王莽：改革派的复古式集权

公元前6年，汉哀帝登基。

由于哀帝继位时已经成年，时任大将军的王莽经过短暂留任后下野，将权力交还给新皇帝。

不过，他下野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和继任者师丹共同策划了一次土地改革。在哀帝继位两个月后，发布了限田限奴令，规定诸王、列侯不得在他们的封国之外购买田地，而关内侯和其余人民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不得超过三十人，但是六十岁以上、十岁以下的不算在奴婢数量中；商人不能占田，不能做官吏。[19]

但这次改革并不符合新皇帝的胃口。刚刚登基的哀帝有着太多的附庸等待册封，他母亲的家族也不富裕，需要皇帝赐予大块的土地。皇帝将这项法令解读为故意制造麻烦，一旦坐稳了位置，就将师丹罢免。第一次改革不了了之。

这次改革却给知识分子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意识到，朝廷已经有人看重自己设计的理想制度了。从此以后，知识界更是把王莽、师丹这些最高层的官员树立成改革的先锋。

公元前1年，仅当了六年皇帝的汉哀帝去世。他去世前，在知识阶层的呼吁下，王莽已经被哀帝召回。皇帝死后，王莽更是重新执掌了军政大权。

这时的王莽由于拥有改革派的名声，加上被贬黜的经历，已经成为一个魅力型领袖。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王莽建立了新王朝，以万象更新的姿态，将他的改革理想继续进行下去。另外，随着他对刘崇、翟义等人的镇压，以及对匈奴不明智的挑衅，[20]在军事和军备上的开支也让皇帝有必要对财政做一系列的整理，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于是，公元9年，王莽称帝的第二年，他终于推出了混合着理想和现实动机的改革法案。他宣称，为了打破土地的分配不均和世家的蓄奴制度，让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决定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和奴婢问题。

改革的措施从名义上结束了土地私人占有制度，从此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而奴婢也不能再私自买卖。

例如，政策规定，每户人家，如果男丁不超过八人，而占有的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话，就必须把自家的土地赠送给亲戚、邻里。

鉴于哀帝时期的改革无疾而终，王莽加强了对于违反规定者的惩罚力度，违反者甚至可以判死刑。他希望通过严厉的措施来彰显王权，达到集中权力的目的。[21]

王莽的土地改革表面上尊重儒家先贤，按照儒家推崇的井田制来设计改革，但同时又有着强烈的个人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实行井田制的时期。周代实行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君所有制，也就是封君控制土地，再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收取一定的贡赋，或者让农民给封君多种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即公田，其产出完全归封君所有。

而到了孟子所处的时代，孟子根据周代的土地情况，在纸面上设计了一种他认为最理想的土地制度。他首先将土地分成一块块九百亩大小的正方形区块，再在每个区块中横画两道，竖画两道，如同一个“井”字，将土地分成大小相等的九块。周边的八块分给八户人家，而中间的一块是公田，由这八户人家共同耕种，公田的收成则归属封君。孟子设计的制度只是出于理想，技术上却不可能实现。比如，土地不见得都能分成九百亩的正方形区块，当农民生老病死后，如何重新分配土

地更是问题。

到了汉代，这个只存在于孟子头脑中的制度在一代代儒生的努力下，却被渲染成周代实际实施的制度了。在《谷梁传》《韩诗外传》，以及《周礼》《汉书》等古代典籍中，都信誓旦旦地说周代实行过井田制。[22]这些人在阐述井田制的同时，另一个潜在的观点是：必须把土地从私人手中收归国有，由天子统一进行分配。

王莽抓住的也恰好是这一点，希望通过重新丈量，将所有的土地都置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而对土地的重新掌握，能够从财政上解决地方失控的局面。他的改革是要彻底改变土地所有制，并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权。

王莽的改革推出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在皇帝权威能够触及的地方，特别是关中平原一代，许多人被投入了监狱。

但是，王莽没有想到一点：不管是谁，在什么时代，在执行全局性的改革过程中，仅仅依靠下达法令是不行的。在如此广大的疆土内，如果缺乏有条不紊的规划，以及巨大的执行力，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王莽的改革虽然能够得到儒家狂热分子的追捧，却让更多的普通人感到厌倦。

对于地方势力来讲，他们当初默许王莽上台，就是以为与王莽做了一个交换，用他们的支持换取王莽对他们权力的默认。王莽的激进改革显然打破了这种默契，地方势力放弃了幻想，不再配合中央政府。

在匆匆推出改革的三年后，王莽意识到这一做法的莽撞：这是一项没有配套措施，没有实力保障的改革。这时，由于处理匈奴问题不当，汉帝国与匈奴的纠纷越来越大，政府正需要地方的帮助来渡过难关。作为妥协，他取消了这些激进但对于财政并没有产生实质性作用的改革措施。[23]

公元17年，当边地的骚乱已经影响到中央财政时，愈加缺钱的王莽下令征收奴婢税，规定每养一个奴婢，征收三千六百钱。但与其将这项

政策看作是改革的后续，不如视为敛财的手段。

在土地和人口改革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财政改革也推出了，这就是五均、赊贷和六筦之法。

所谓五均，是政府对物价进行控制，对行业进行垄断和专卖的做法。

公元10年，王莽下令在全国大城市的集市上设立五均官。这些官员负责监督民间市场，要求他们按照统一的价格来销售谷、布、帛、丝、绵这五样民生物品。这就像现在的限价令一样，当政府的财政金融扩张造成了通货膨胀时，政府则要求民间限价，来掩盖通胀的事实。

赊贷是指当民间经营者缺乏资本时，政府还可以以放贷的形式借给经营者一笔钱，按照月息三分收取利息，介入民间金融市场。

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还是出自儒家理想，即民生需要的东西必须由政府指定价格，不能由奸商来操控，从而把市场力量弱化。

另外，所谓六筦，则是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的税收，加上五均、赊贷的总称。

根据儒家理论，人民应该去种田谋生，其余的行业都是末业，不鼓励人民去从事。但是既然人民还是需要一些末业的产品，就由政府勉为其难地代替人民从事这些罪恶的行业。

六筦之中，有许多项其实已经由汉武帝实施了，但是王莽将其系统化和理论化，并置于统一的框架之中。而背后的目的却与汉武帝一样：财政动机。

当五均六筦政策把社会上最重要的商品都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中时，我们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

然而，王莽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汉武帝时期一样：为了实行这些法律，需要大量的商业人才来为政府服务。王莽本来的意图是抑制商人，疏远商业人才，但他很快就发现，如果离开了这些商业人才，就无法将

政策推行下去。

公元17年，当政府更加缺钱时，王莽放弃了原则，任命商人担任五均六筦之官，加强对民间违禁者的打击。[24]

但到这时，此起彼伏的叛乱者已经使王莽无法把他的命令推行下去了。就在同一年，受水灾的影响，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饥荒。在和平时期，饥荒并不足以击溃社会，但是，由于王莽改革造成社会免疫力下降，人们在饥荒的威胁下揭竿而起。那一年，绿林起义爆发。公元22年，赤眉起义接踵而至。

起义军的出现让中央政府的税基逐渐减小，也越来越没有办法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公元18年，王莽下令清查贪污行为，那些在近年涉及贪污的官员，将被没收五分之四的财产。这些财产用于应付国家的军事开支。为了让这个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政府鼓励相互告发。

走到这一步，王莽的改革已经卷入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旋涡。财政改革导致社会经济紊乱，经济紊乱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减少让政府更加致力于搜刮，到最后政府无力镇压动荡。他的失败已经无法避免。

在短短十几年中，汉代留下的家底已经消失殆尽，社会开始分崩离析。王莽想利用复古式改革加强权力，却由于改革措施不当，造就了一个短命的王朝。[25]

梦想家的币制幻想曲

在王莽的改制中，有一项改革对后世的人们充满了吸引力：币制改革。

这项改革深刻地体现了“复古式改革”的魅力。利用古人创造的理想图景，来设计一个全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失败得如此彻底，却又设计得如此精美，令人们既神往，又感到困惑。

即便到了现在，收藏者们仍然把王莽时期的钱币当作是中国钱币艺

术的高峰。从工艺上讲，王莽时期的每一枚货币都是最精美的创造。比如，在钱币工艺中排第一的金错刀（一种错金的刀币），从材料到工艺无不是精心设计的。

由于幅员辽阔，中国历代的钱币首先需要的是快速生产。即便粗糙，但只要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铸造，满足全国的需要，就是好货币。只有在生产效率提高之后，才会去考虑工艺的改进和美化。

而王莽的货币似乎首先考虑的是工艺和其象征意义，有不计成本的嫌疑。货币在王莽的哲学体系中不仅仅是简单的流通工具，它还是通往古代理想财政模型的途径。

在这个模型中，货币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还代表着礼仪。货币的价值是由天子规定的，不是由它的实际价值决定的。当然，天子的规定总是对自己有利，当他铸造高面值的货币时，其实就是一种使货币贬值的行为。

王莽在他最顶峰的改革中把背后的经济利益掩藏得那么深，以至于人们根本感觉不到。在他之后，有多少人利用粗制滥造的小钱糊弄民间，行偷盗之实。但人们却总是相信王莽是在实现他的理想，只是不小心偷走了民间财富。

但是，不管他小心还是不小心，民间经济立即做出了回应，与他的其他一系列的改革一起，击溃了本来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走向了崩溃。

虽然隐藏得很深，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人们仍然能够找到王莽货币改革的利益动机。

王莽的币制改革分为四次，而第一次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公元7年，在他还是代理皇帝时，推出了一个货币政策上的“小手术”，来解决一个看似不那么要命的小问题。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达到目的，却引起了蝴蝶效应，逼迫着王莽做第二次改革、第三次改革……直到他的货币改革牵扯面越来越大，并最终走向失控。

而他第一次改革要解决的小问题是：货币贬值问题。

到王莽时期，汉武帝推出的五铢钱已经流通了一百多年，世人基本上已经适应了单一货币。但令政府感到烦恼的是，经过一百年的不断贬值，铸造五铢钱的成本已经显得太高。特别是五铢钱对重量是有要求的，政府即便可以偷偷减重，但不能做得太过分。

王莽希望通过一次改革来使货币贬值，但又不影响社会的稳定。他的办法是发行大面额的钱币，这是中国统一之后政府第一次系统地发行大面额货币的尝试。[26]

这一年，王莽发行了三种新的货币，和五铢钱并行使用。

第一种是大钱（大泉五十）。重十二铢，相当于两枚半的五铢钱，但它的面值却是五十个五铢钱。

第二种是契刀。这是一种综合型货币，它有个类似于钱币的圆环，但圆环又挂了一把类似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刀币的把儿。面值五百。

第三种是错刀，也就是俗称的金错刀。这种钱与契刀类似，但用错金工艺组成了“一刀直五千”的文字。面值五千。

由于后两种货币的面值太高，如果民间盗铸会有很高的利益，故而，王莽在铸造这两种钱币时采用了很多先进的防伪工艺，造得精美无比。这些钱币成了后世的艺术精品。

如果这项改革成功的话，政府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比如，大钱只用两个半五铢钱的材料，却当五十个五铢钱来用。而发行契刀和金错刀更是一本万利。

但是，在政府看到利润空间的同时，民间也同样看到了。一枚大钱就意味着二十倍的通货膨胀，也意味着偷铸一枚大钱获得二十倍的利润。这是一项少有的暴利投机。

于是，民间立即熔化原来的五铢钱，再盗铸成这些贬值的钱币。民间造假蜂起，人们如同当今炒股票一样疯狂地拥进了这个行业。

另一方面，在交易市场上，由于钱币贬值得太厉害，人们纷纷转用黄金交易，不敢再接受这些货币。为了对付这个问题，王莽禁止了黄金的流通，强迫人们使用这套新的钱币系统。结果造成了全国性的市场混乱。

王莽以为他的改革可以解决财政问题，却没想到，这次铸币改革等于踹开了地狱之门，再也收不住了。

两年后的公元9年，王莽已经登基称帝。他开始着手修正第一次货币改革造成的问题。

由于两种刀币面值太大，民间反弹太厉害，遂将其废除。他寻找的借口是，汉皇室的“劉”字就是由“卯金刀”三个字组成的，既然刘氏已经不再担任皇帝，那么刀币也应该停止使用了。

而第一次货币改革之所以出问题，在于面值五十的大钱与五铢钱之间的比值悬殊。王莽认为铸造五铢钱太不划算，政府应当直接废除五铢钱。

于是在第二次改革中，他发行了一种重量只有一铢的小钱作为基本货币，将五铢钱停用。实质是把最常用的货币也贬值了五倍。

通过第二次改革，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只剩下两种，分别是重十二铢价值五十文的大钱，和重一铢价值一文的小钱。这时，人们熔化掉十二文（也是十二枚）小钱，就可以铸造一枚大钱，来当五十文花，盗铸仍然有四倍的利润。

随着人们纷纷把小钱熔化掉，市面上将只剩下五十文的大钱。由于民间缺乏零钱，许多小额交易无法进行。第二次改革仍然以扰民为结局。

到了第二年，王莽意识到他的两次改革并没有解决货币问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麻烦，决定来一次一劳永逸的改革，按照古代的理想来重新设计货币。这就有了他的第三次改革，而这次改革被视为货币改革的巅峰。

在古代，有许多种物品曾经充当过货币的角色。比较典型的是龟甲、贝壳，以及金、银、铜。王莽将上述所有的材料都纳入一个复杂的体系中。

通过这五类材料，他发行了六类货币，分别是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和布货。除了金、银、龟、贝四种货币分别对应四种材料之外，钱货和布货这两种货币都是以铜为材料的。所谓布货，不是现在的布匹，而是一种铲状的铜钱，而钱货（泉货）是指圆形方孔的铜钱。这就是所谓“五物六名”。

这六类货币又分成了二十八品。[27]就像现在的人民币面值分为一百元、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一样，每一类货币都有若干种（品）。所有的货币形成了一个梯度差，从小钱的一钱，到金货的一万钱。

这或许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内部出现的最复杂的货币系统，它代表了一个幻想家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也表明了儒家按照礼制设计的金融体系能够达到的荒诞水平。

王莽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把如此众多的钱币投向市场，人们也很难记得住它们的换算关系，更难验证货币的真伪。人们苦于货币的混乱，社会经济已经接近停滞。在私下里，人们拒绝其他货币，仍然使用当初的五铢钱。王莽为了强制推行他发行的货币，下诏凡是敢于携带五铢钱的人，都要发配边关当戍卒。在此之后，五铢钱的确慢慢地消失了，但是整个商业系统已经彻底崩溃。不仅是普通百姓，就连那些公卿大夫因为被强迫使用高面值的货币，也出现了破产的情况。到最后，王莽不得不再次妥协，只使用大钱和小钱两种货币，将龟、贝、布币暂时停止使用。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金融始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当汉武帝将货币发行权彻底收归国有之后，就彻底将政权的命运和金融绑定在一起。因此，任何时候，金融的混乱都会让人想起政府的失职。

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最后一次货币改革。此时性价比最高的五铢钱已经绝迹，市面上只流通大小钱。王莽此次的改革废除了大小钱，发行了货布和货泉两种货币，其中货泉重五铢，值一文。一个货布又等于

二十五个货泉。

这次改革是王莽承认失败之后的回归。通过变相的方式，重新回归了五铢钱的重量，也画上了币制改革的句号。

币制改革极大地扰乱了社会和市场。直到宋代交子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疯狂的币制试验。这次改革足以和法国约翰·劳的货币试验媲美。它演示了一个政权可以利用币制带来多大的灾难，也显示了当货币的面值严重脱离了其价值时，即便依靠一个庞大政权，也仍然无法战胜市场的力量。如果不遵循这个规律，那么历史将把该政权扔出舞台。[28]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被杀。与王莽撇清关系的儒生则继续在复古的招牌下，兜售儒术于帝王将相之间，直至近代。

表3 王莽第三次货币改革的五物六名二十八品[29]

物	名	品	规　格	面值（钱）
金	金货（共一品）	金货	斤	10000
银	银货（共二品）	朱提银	流，一流为八两	1580
		银	流，一流为八两	1000
龟	龟货（共四品）	元龟	长一尺二寸	2160
		公龟	九寸	500
		侯龟	七寸以上	300
		子龟	五寸以上	100
贝	贝货（共五品）	大贝	四寸八分以上，两枚为一朋	216
		壮贝	三寸六分以上，两枚为一朋	50
		幺贝	二寸四分以上，两枚为一朋	30
		小贝	一寸二分以上，两枚为一朋	10
		贝	一寸以下，两枚为一朋	3
铜	布货（共十品）	大布	长二寸四分，重一两（二十四铢）	1000
		次布	长二寸三分，重二十三铢	900
		弟布	长二寸二分，重二十二铢	800
		壮布	长二寸一分，重二十一铢	700
		中布	长二寸，重二十铢	600
		差布	长一寸九分，重十九铢	500

续表

物	名	品	规格	面值（钱）
铜		厚布	长一寸八分，重十八铢	400
		幼布	长一寸七分，重十七铢	300
		幺布	长一寸六分，重十六铢	200
		小布	长一寸五分，重十五铢	100
	钱货（共六品）	大钱	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	50
		壮钱	直径一寸，重九铢	40
		中钱	直径九分，重七铢	30
		幼钱	直径八分，重五铢	20
		幺钱	直径七分，重三铢	10
		小钱	直径六分，重一铢	1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33年—公元25年。

[2]见《汉书·元后传》。

[3]见《汉书·王莽传》。

[4]见《汉书·食货志》。

[5]《汉书·王莽传》：“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6]汉代儒教的兴起，是影响统治的另一大原因，参考董仲舒《春秋繁露》。

[7]班固《白虎通德论·封禅》列举了一系列的动物祥瑞：“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

[8]《汉书·王莽传》：“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9]见《汉书·翟义传》。

[10]见《汉书·元帝纪》。

[11]《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

[12]在《盐铁论》中，就充斥着这样的指责。

[13]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中，在汉代以《春秋》和《礼》最为重要。其中《春秋》由于经文过于简练，必须依靠解释经文的"传"来了解内容。汉代最重要的传是《春秋公羊传》，这个传虽然传说来自孔子的再传弟子公羊高，但一直以来只有口头流传，直到汉代才付诸文字，其中夹杂了大量汉代的思想。而研究礼的重要著作《礼记》，则是汉代初期的作品，《仪礼》则依靠汉人流传的残卷来学习。其余几家，虽然经文来自先秦，但阐释权也基本上被汉人垄断和曲解，加之残缺不全，更偏离了原意。

[14]这种社会进化论主要通过《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的学说大行于世。

[15]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哲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现代人著作，如吴雁南、李禹阶的《中国经学史》。

[16]见《汉书·王莽传》。

[17]见《汉书·贡禹传》。

[18]见《汉书·师丹传》。

[19]见《汉书·哀帝纪》。

[20]《汉书·食货志》："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

[21]《汉书·食货志》记载了王莽的这道法令："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

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22]关于井田制的记载，见《孟子·滕文公上》《谷梁传》之解释“初税亩”、《韩诗外传》卷四、《周礼·地官·大司徒》《周礼·地官·小司徒》《周礼·地官·遂人》《汉书·食货志》，以及东汉何休的《公羊解诂》。从源头上来说，井田制的构思来自孟子，但书中并没有具体实施的记录。

[23]《汉书·食货志》：“制定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

[24]《汉书·食货志》：“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

[25]王莽经济改革的具体情况，见《汉书·食货志》《汉书·王莽传》。

[26]汉武帝发行的皮币、白金和赤侧五铢带有投机的成分，且为时甚短。王莽则是第一次在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地发行大额货币。他的理论依据是汉人伪造的周代理想制度，认为货币应该“子母相权”，除了小面值之外，还应该有大面值货币。

[27]见下页表3。

[28]《汉书·食货志》：“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29]本表依据《汉书·食货志》而制。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1]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却在经济战场上遭遇了最顽强的抵抗。他试图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却遭遇了普遍的抵制。甚至他统治的核心地区，也有人对抗清查。

民间与中央在财政上的对抗贯穿整个东汉时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由于东汉的制度继承自西汉，社会结构也早已固化，中央政府的统治成本更加高昂，这就决定了东汉是一个行政效率低下的朝代。

任何继承前朝制度的朝代都会有行政效率低下、政府开支大却收不上税的窘境。

东汉的财政能力不足以支撑对外战争，却恰好遭遇了羌乱盛行的年代，皇帝最终只能通过卖官、敲诈等各种手段获得收入。这些非常规手段最终导致了政治败坏，从而又引起了内部的叛乱。

东汉末年，由于财政无法满足维稳的需要，皇帝建立了一个新的官职：州牧。州牧是一个集军政、民政、监察于一体的官职，州牧一诞生，就是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最终会瓦解中央政府的官职。东汉也是从这时，进入了解体的节奏。

当皇权受到抵制

公元40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登基的第十六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他苦恼不已。

王莽的改革导致群雄并起，光武帝刘秀在纷纭扰攘的大潮中成为胜利者。与大多数开国皇帝不同，刘秀生性宽宏，谦恭多士，不仅非常体恤民间，也不喜猜忌帮助他打天下的功臣，这使得功臣群体大都得以善终。如果从两千多年的皇帝中选择几个好皇帝的话，他的排名绝对在前

十位。

刘秀在位时期，也恰好是中国科技大发展的时期，人们对水利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水运便利了经济活动。南阳太守杜诗更是创制了水排，即利用水力鼓风，提高了冶铁炉的温度，中国冶铁业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并由此惠及其他行业。[2]耕地技术也在慢慢普及。

而东汉的人口分布也在逐渐改变。与西汉时期相比，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带的人口开始变得密集，长江流域的开荒工作有所进展。[3]

由于政策宽宏，科技进步，东汉的经济很快得以恢复。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令皇帝感到烦恼呢？

他的烦恼来自户籍和田地的整理工作。

一年前的公元39年，光武帝考虑到经过战争之后，天下的户籍和土地数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许多记录已经被毁，加上战争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土地侵占现象，他下令做一次严格的土地和户籍清理工作。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工作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于那些侵占别人土地，或者隐匿了户籍的人。他们大多是地方上的富人。有许多穷人为了避免纳税，投身于可以免税的富人家中。而富人的免税理由也有千千万万种，致使皇帝的税收都漏走了。更可恶的是，这些人还与官员勾结在一起，负责清丈的官员，故意把好地留给那些有势力的人和关系户，把坏地留给穷人，这一行为在地方上引起了更大的民愤。

起初，光武帝还不知道这件事。一次，光武帝无意中发现陈留的一位办事员书牍上写着：颍川、弘农的情况可以查问，而河南、南阳的不能查问。[4]光武帝很好奇，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办事员没有想到皇帝看见了书牍，惊慌间不敢说实话，只说这份书牍是在街上捡到的。光武帝的儿子、后来的汉明帝见状，在旁边回答：“这是郡里官员给办事员的命令。河南是首都，陛下的近臣都在这儿；南阳是帝乡，都是陛下的近亲。这两个地方的土地肯定问题重重，也肯定不能查问。”

光武帝大怒，连忙派人严查，才发现清丈土地带来了诸多问题。

他开始对那些帮助富人、参与违法的官员进行惩处。这次被抓住的“大老虎”是河南尹张伋，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严打中，张伋和同级别的十余官员都被下狱处死。[5]

光武帝本以为通过整治官吏，就可以让工作顺利进行。然而，就在这时，新的反抗力量出现了，许多郡的大姓人家因为利益受损，决定联合抵制。

他们组织了武装力量，杀害前去调查的官员。等皇帝派遣军队去镇压时，这些人已经把武装力量解散了，根本找不到到底是谁干的。可等皇帝的军队一走，他们又立刻集结起来。皇帝的官员和将领们却因为找不到罪犯、害怕会受到惩罚而战战兢兢。张伋已经是前车之鉴，如果换成别的皇帝，在大怒之下一定会把不称职的人都杀掉。

这件事情如同燎原之火，在全国四散开来，而最严重的是位于太行山以东的几个州：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光武帝突然发现，他可以用武力征服天下，但反抗者在用实际行动嘲笑他的武力。这些事情还不是发生在偏远的山区，而是发生在帝国的腹心地带。[6]

光武帝是个聪明人，震怒之余，他并不想过分使用武力，也不想过多惩罚他的官员。他想了一个办法：利用犯罪分子相互间的矛盾来击破。皇帝下令赦免五分之四的作乱分子，只惩罚剩下的五分之一。

但是怎么决定谁属于那五分之一呢？由作乱分子自己决定。光武帝命令：如果有五个人参加了作乱，只要其中四个人合伙杀掉第五个，这四个人就都既往不咎；否则，对五个人都严惩不贷。而那些原本在征讨罪犯时有疏忽，或者出工不出力的官员也不用害怕，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都既往不咎，光武帝只看以后他们查出了多少案子，逮捕了多少罪犯。

光武帝的办法收到了武力都达不到的效果。作乱分子毕竟都心怀惴惴，既然有机会获得既往不咎，就赶快利用机会。一旦有人开了头，作乱分子内部就开始互相猜忌。

于是，反抗停止了。皇帝也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但是，他却并不感到轻松。这件事恰好反映了东汉时期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行政效率低下。

不管皇帝想做什么事情，都无法顺利推进。在地方，充满了和他对着干的人，这些人表面迎合，暗地里却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想着怎么利用皇帝的政策来发大财。

行政效率的降低将东汉变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央仍然保持着某种权威，但这种权威只是名义上的，而地方上的每一个势力都行使着小小的特权，快活地利用体制来获取利益。这时中央需要做的，只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而地方也给予中央足够的尊重，两不打扰。

一旦中央想做事，就是将矛盾暴露出来的时刻。

继东汉光武帝之后，两位继任的皇帝将东汉社会经济推上了高峰。与西汉的文景之治一样，人们把东汉明帝和章帝统治的时期称为“明章之治”。

但是，即便在明帝和章帝时期，皇帝的权威依旧不够强大，行政效率仍然低下。

汉章帝末年，由于要准备对匈奴的战争，政府财政又开始吃紧。皇帝突然想起了汉武帝曾经推出的盐铁专营制度，决定重新实行，以从盐铁专卖中获得的财政来支持军备。于是，东汉政府设立了一系列的盐铁机构。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可以办成的事情，到了章帝时期却成了悲剧。

汉章帝去世后，汉和帝登基。和帝推出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停止盐铁专卖。实际上，章帝去世前就已经下了遗诏，要废除亲自设计的制度。[7]

盐铁制度虽然有许多弊端，但是东汉的盐铁制度之所以失败，却有它自己的特殊原因：这个政府的行政效率太低下了，已经没有能力协调各方来组织起一套经济制度了。

在东汉时期，推行盐铁官营制度的结果必然是：章帝一说要做盐铁专卖，人们立刻一窝蜂而上，打着盐铁专卖的旗号占领资源，然而这些钱都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了各种关系户的腰包。最终的结果是，民间经济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而中央政府也没有得到一丝的好处。

汉章帝临死前意识到，在他所处的时代，一个皇帝能够做成的事情已经很少了，所谓的皇权，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一种无用的福利。

光武帝和章帝的遭遇说明，即便在东汉最好的时期，它的行政效率也惊人的低下，皇帝哪怕想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也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代价。即便如此，还往往达不到效果。

那么，东汉为什么无法建立起像西汉那样高效的行政体系呢？

这是制度的惯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制度的惯性之重

公元25年，在王莽中断了汉祚十六年之后，光武帝刘秀登基，成为东汉的开创者。

从各个方面看，光武帝都是个务实的人。他知道皇权的价值，一上台就注意重塑被王莽打乱的权力中心。

为了防止各种势力不听话，在他确立全国统治权不久之后，就想方设法加强中央集权。如同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那样，他不会滥杀功臣，但战争一结束，他也采取了和宋太祖一样的做法。一方面，他大宴功臣，给他们分封土地和爵位，让他们成为受人尊敬的地方豪族；另一方面，他剥夺了这些人继续参与政权的机会，只有少数的人继续做官，剩下的都只能成为安乐终生的富家翁。[8]

在遣散功臣的同时，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修正了西汉的官僚体系。汉武帝时期，已经逐渐形成了围绕着皇帝的内廷圈子——尚书台，并逐渐剥夺了外廷官员，也就是三公九卿的权力。光武帝更是将这

种制度加码，彻底形成了尚书台议事的制度，三公的权力更加虚化了。庞大的官僚系统都成为冗余，一个皇帝更加容易控制的小圈子建立了起来。[9]

光武帝集权的另一个做法是，不再区分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西汉时期，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来掌握，而皇室财政由少府掌握。他们各有职责，以避免皇室开支过度侵占公共财政。光武帝为了加强控制，将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合一，不再作区分，统一由司农掌握。[10]

虽然从长期来看这样做会增加财政的不透明度，但是在短期内可以加强皇帝的控制力。然而光武帝费尽心机加强集权，权力却无声地从他的手中溜走了。东汉皇帝始终都无法像西汉皇帝那样，拥有那么大的权力。

王莽的执政已经让人们看到了皇权的虚弱。在西汉时期，历代皇帝经过了多少努力，儒生们经过了多少鼓吹，才创造了“天子”这个神话，使得人们相信皇帝是天命所归。但王莽通过禅让获得了皇帝的名号，却去除了它的神秘性。其后，中央政府的权威更是在一次次失败的政令中逐渐瓦解。

王莽末年的反叛也不仅仅是所谓的“农民起义”，更是充斥着各种势力的角逐。比如，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哥哥刘伯升都是汉代宗室子弟，他们的叛乱得到了南阳大族的支持。更加草根的赤眉军胜利后，各大族势力担心赤眉军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全力支持刘秀称帝，并逐渐夺取了全国政权。

即便是夺取全国的战争，刘秀也并不能随心所欲。统一的过程充满了武力之外的权衡和计谋，他通过说服和收编，并采取一种利益平衡的做法获得了天下。

刘秀的功臣之一、伏波将军马援曾经直言不讳：“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11]这句话将选择皇帝的权力从天上直接降到了人间。皇帝不再是天命所归，而是大臣选择的结果。

由于光武帝称帝本来就是权衡的产物，所以，他必须做出许多让

步，来满足别人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更理解东汉与西汉的关系：东汉继承了西汉时期的官僚架构，但这个架构已经更多地向地方的豪族倾斜了。

从表面上看，东汉和西汉之间，只是隔着被王莽一不小心打断的二十年。假设一个老农恰好在王莽篡位之前睡着了，三十年后在光武帝时期醒过来，他会发现，除了人的生老病死因素之外，皇帝还是那样的皇帝，制度还是类似的制度，甚至连民间的大家族都没有更迭，穷人还是穷人，富人还是富人。

但其实中央政府已经变得更加孱弱，向另一个集团妥协了。

人们习惯上认为，一个朝代的建立，就意味着制度的重建。但实际上，从秦始皇统一到公元1949年，中国只有三次重建制度的机会。[12]每一次重建后的制度，都经过了许多代人的努力才逐渐完善，而它的解体则更加漫长。

第一次的制度建立，由秦代开始尝试，到汉高祖时，已建立了一种较为稳定的结构，汉武帝时期，在财政上解决了它的存续问题。这一次制度循环越过了东汉，从三国时代开始逐渐解体，却又苟延残喘到南朝才终于落幕，绵延超过八百年。东汉恰好位于这个制度循环周期的中间，光武帝再优秀，也没有能力重新建立制度。

光武帝做出的妥协如下。

由于初期财政困难，他精简官吏、合并财政的同时，却过多地精简了财政官员。在汉武帝之后，汉代财政由大司农、少府和水衡都尉三驾马车共同执掌。大司农主管政府财政，包括农业税、盐铁专卖等。少府负责皇室财政，主管山泽陂池的收入，这些收入叫禁钱，供皇室开销。水衡都尉虽然名义上属于少府，但他单独掌管上林苑的楼堂馆所、没收的土地财务以及铸币事务。

到了光武帝时期，将山泽陂池的收入从少府的管辖权中剥离出去，交给了司农。少府成为一个专管皇帝起居、服装和器物的机构，权力大大下降。而三驾马车之一的水衡都尉干脆被彻底裁掉了，权力合并到少

府。由于光武帝时期楼堂馆所的规模比西汉武帝时期少得多，水衡都尉的权力本身已经不大。水衡都尉被撤销后，它下属的二十多个属官也一并被勾销。[13]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原来大司农掌管盐铁专卖事务，由于战争时期，盐铁专卖制度已经崩溃，于是，光武帝将盐铁事务从司农治下剥离出来，下放到了各个地方政府。[14]

当盐铁管理下放到地方政府之后，政府垄断和专卖就逐渐消失了，变成由地方政府征收盐铁税，民间负责经营。只是这时的盐铁工业由于地方官僚的染指，已经变得非常不健康了。

盐铁大都被地方豪族垄断，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东汉的盐铁资源如同现代山西的小煤窑一样，是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它由少数与权力有合谋的人控制，而民间得不到好处。但是政府如果想将权力收归中央，又会受到地方势力的抵抗。汉章帝想重新实行中央政府专卖，但在地方势力的抵制中，大败而归。

在地方治理上，光武帝也显得软弱无力。

他将功臣们都遣送回家，看上去是一种聪明的策略，但代价也非常明显：他必须默许这些功臣在当地成为豪族，逍遥于中央政府的法律之外，同时，又拥有着极大的经济特权。他们向东汉的皇室输送大臣和皇亲，几乎垄断了中央政府的上层结构，让东汉比西汉更接近于分层社会。

在社会的最上端，只是数个大家族而已，他们与皇室一起，控制了两百年的朝政。在这些大家族中，最鼎盛的有两个派别，分别是曾与光武帝一起参加反王莽战争的南阳派，以及军阀出身的西北派，其中西北派的典型代表是马援和窦融，他们是光武帝统一战争中归顺的大将，也是光武帝必须容忍的对象。

汉代有外戚干政的传统，一个女人当了皇后，他的家人必定封爵当官。在西汉时期，还屡屡有平民皇后出现。[15]东汉光武帝之后，皇室默认皇后只能出自几个大家族，这是权力机构圈子化的最明显特征。

光武帝的皇后阴丽华出自南阳派，阴皇后长相秀美，是当年刘秀暗恋的对象，他们俩可以说是东汉皇族中少有的靠感情结合的婚姻。之后的明帝娶了马氏的皇后，章帝娶了窦氏的皇后，这两位皇后都是西北派的。

和帝娶了南阳阴氏和邓氏的皇后。安帝皇后阎氏依附于南阳邓氏，所以成了皇后。顺帝皇后梁氏原本依附于西北窦氏，梁氏一族也曾经作为贵人生过和帝。桓帝有过三个皇后，分别出自梁氏、邓氏和窦氏。只有灵帝皇后何氏的背景差一些，但何氏外戚同样把持了朝政。[16]

由于光武帝对中央权力系统进行了改造，利用尚书台将权力圈子化了，尚书台又控制在几个外戚大族手中，于是，中央政府慢慢地变成了几个大族的战利品。

在最大的豪族控制中央时，地方权力则被地方级别的豪族垄断。东汉的社会阶层板结了。在一个阶层板结的社会中，一个人的一生在他出生时就已经注定，不管他怎么努力都很难获得改变。特别在地方官吏这一个级别上，由于举荐官员的权力被地方豪族把持，加之官商勾结行为的合法化，不管皇帝如何想打破这种制度，都没有办法。

皇帝在和地方势力的斗争中逐渐落于下风。而同时，西汉武帝引起的官僚结构失衡问题经过东汉光武帝的加强，终于引发了巨大的问题，导致统一的帝国逐渐解体。

但东汉解体的过程又很缓慢，社会生活显得过于波澜不惊，下层人民没有改变命运的途径。东汉社会从头至尾弥漫着一种绝望感。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即将上任的钜鹿太守司马直体会到了当官之难。[17]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当官是一件光荣而愉快的事情，意味着光宗耀祖和发财。但在汉灵帝后期却是一个例外。

以司马直为例，当他被皇帝选中、授予太守的职位之后，首先要去京城，到皇帝的西园，找皇帝和太监咨询“助军修宫钱”。皇帝根据他职位的大小，给他规定一个数目，到任后，他的职责就是尽快从任所凑齐皇帝要求的数目，派人押往京城。只有交了钱之后，他的位置才能坐稳。

在司马直时期，一个大郡太守的职位，官方通行的价格是两三千万钱左右。这笔巨款不可能由官员个人出资，只能通过压榨民间来获得。这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分赃机制，中央默认地方官吏从民间取财，同时地方官吏必须让中央分一杯羹，作为默认他们发财的代价。

但是，随着皇帝卖官价码的抬高，即便是要从民间榨取，也意味着官员必须放下心理包袱，把自己定位成全心全意赚钱的商人而不仅仅是父母官。

许多人因为磨不开面子，或者担心无法凑齐这么多钱，请求不去上任。与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人们抢着做官不一样，这时却是皇帝强迫官员去上任。只要任命，就必须去，否则严惩不贷。

司马直接到任命时，皇帝根据他以前的履历，认为他是个有清名的好官，给他打了个折，少交三百万。司马直听说之后，认定即便打了折，数目还是太高了，他叹了口气说：“我本来应该去做父母官，还没有到任，先进行盘剥，又怎么忍心？”

他也请求辞职不去，但皇帝拒绝了。

司马直只得从京城出发前往钜鹿，在到达黄河边的孟津关时，他给皇帝上书，极力申诉当时的弊端，并预言如果继续这么做，必然引起巨大的灾祸。随后，他吞药自杀。司马直成为少有的被逼当官而自杀的人。

司马直至死不理解的是：皇帝为什么变得这么贪婪？对于这个问题，皇帝本人有着说不出的苦衷。

以助军修宫钱为例。这笔费用指的是官员们资助皇帝组织军队、修理宫殿的钱。

在司马直被授官的两年之前，东汉爆发了黄巾贼乱，中央政府应接不暇，花费无数。就在贼乱的第二年，皇帝的南宫恰好又遭遇了大火，为了修理宫殿，皇帝更是需要大量的现金。

但是，帝国的国库里已经空空如也，根本拿不出钱来支付这些费用了。为了节省成本，皇帝不得不强行派差，四处索要，但仍然满足不了需求。至于正规的税收，随着行政效率的退化，已经无法指望了。

皇帝只有在最无助的情况下，才会让他的官员们与政府共同分担苦难。他把官员们调来调去，每调动一次，就可以收一笔“助军修宫钱”。[18]

司马直的自杀如同一道耻辱的疤痕，印证了东汉中央政府的财政窘境。由于财政机器不畅和食税阶层过于庞大，这个政府苦苦挣扎了一百多年，越挣扎越疲惫。至灵帝时期，已经接近瓦解的边缘。

那么，东汉的中央财政又是怎样逐渐瓦解的呢？

在“明章之治”的全盛时期，东汉已经出现了财政阴影。

与表面的繁荣不同，“明章之治”是在皇权与豪族、官僚的不断斗争中伛偻前行的。但两位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又各有不同，魏文帝曹丕曾经评价两人“明帝察察，章帝长者”，认为明帝还有整治吏治的雄心，而章帝对待官僚则更加宽容和放任。[19]

汉明帝有感于权力系统的失控，希望通过努力作为，改变“政令不出庙堂”的局面。他采取的做法是：放开民间经济，薄税赋、减徭役、修水利、安抚平民，但与此同时，对官员进行严厉的惩治，紧缩官僚权力。

据《后汉书·独行列传》记载，明帝时楚王试图谋反，结交了一些天下善士。当事情被发觉后，许多人都遭到了严刑拷打。一次，五百人被押解到京城时，大半被拷打致死，个别人被打到皮开肉绽也不承认有罪。

一个叫陆续的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依然辞色慷慨。但是，到了晚上，一位狱吏给他送了一份食物，他却对着食物哭泣不已。审案者感到

好奇，问他哭泣的原因。陆续回答，因为他母亲来了，母子却无法相见，所以哭泣。

按照规定，狱吏不能给犯人传递消息，审案者以为狱吏违反了规矩，要惩罚狱吏。陆续连忙解释说，这跟狱吏没有关系，他之所以知道母亲来京城了，是因为给他的那份食物是母亲做的。

审案者更好奇了，又问他怎么知道食物是母亲做的。陆续回答，因为母亲习惯把肉切得方方正正，把葱切得整整齐齐，每段一寸长，他拿过吃的一看，里面有葱和肉，都很整齐，就知道母亲来了。

皇帝听说了这件事，也很感动，就放了陆续和他的朋友。

这件事显示了明帝整顿吏治之严酷。然而，皇帝却无法消除整个制度的惰性。

明帝死后，继位的章帝知道明帝时期的严苛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作为长者的他立即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方式，删减酷刑，实行仁政。章帝的宽容使得东汉进入了全盛时期，却埋下了行政效率继续下降的隐患。

明帝后期，北方的匈奴再次崛起，东汉政府不得不与匈奴发生战争。从光武帝时期起，皇帝由于财政吃紧的原因，一直避免发生战争，以免造成新的财政负担。

为了不打仗，东汉政府每年向匈奴的南单于提供一亿零九十万钱币，再向西域提供七千四百八十万钱币。[20]给北方蛮族的钱大约占了财政收入（约七十亿）[21]的百分之二点五。

不过这笔钱的支出仍然是值得的，由于没有战争，政府能够在行政效率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保持土地税率为三十分之一，而且在没有盐铁专营收入（由地方政府代收一定的盐铁税）的情况下，也维持了政府的运转。

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开始，将军窦固开始率领大军在西域开战。此次战役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到章帝晚期，由于受到北匈奴的干扰，皇帝准备再次发兵，东汉政府财政出现了第一次的紧张。为了解决战争经费，章帝试图恢复盐铁专营制度，却以失败告终。

明、章两位皇帝之后，和帝时期，东汉政府与匈奴的决战逐渐升级。当时，章帝窦皇后的哥哥窦宪为了逃避宫廷斗争，申请对北匈奴作战。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深入沙漠三千里，杀敌一万多人，在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返。永元三年（公元91年），大将军窦宪出塞北击匈奴，彻底击溃了北匈奴。

然而，窦宪的战功并不能掩饰东汉政府的失控。作为外戚的窦宪专横跋扈，在章帝时期就强买强卖，甚至连明帝女儿沁水公主的园田都不放过，当窦宪侵占了公主的土地后，公主竟然畏惧得不敢和他计较。[22]

自窦宪之后，外戚的权势在东汉变得强大起来。到了汉顺帝时期，外戚梁冀所占的土地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23]梁冀权力最盛时，四方送给皇帝的贡献，必须先拿到梁冀面前先请他挑选。由于他权力太大，到他家里求官请罪的人络绎不绝。他的下属出去执行任务时也是四处索要女人，横行霸道，侮辱良家，甚至殴打官吏。梁冀的府邸更是极尽奢侈，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屋内装饰着大量的金银珠玉、奇珍异宝。他的园林采土筑山，仿效东西崤山做成十里九池，其间充斥着奇禽驯兽。他的林苑规模和皇帝的规制相同，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到黄河、淇水，林苑里有森林沼泽、丘陵旷野，占地面积几乎达到千里。他的财富比诸侯王的都多得多。

窦宪和梁冀只是两个代表。东汉后期，整个疆界之内已经充斥着这种大大小小的官僚豪强，超乎政府的控制。他们的存在对财政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战争。

此刻，继匈奴之后的另一股蛮族势力——羌——兴起时，东汉在蛮族与豪强的打击下，终于踏上了漫长的解体之路。

从汉光武帝晚期，长安以西（今青海、川西、甘南一带）的羌部落就逐渐崛起，与汉政权有了冲突。

公元107年，汉安帝永初元年。前一年，东汉帝国相继埋葬了两位皇帝（和帝、殇帝）。新皇帝登基改元后，都会有例行的大赦天下，然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羌族叛乱的消息已经传来。

从这时起，东汉和羌族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六十年，直到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破羌将军段颎平定东羌，汉羌战争才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一个甲子的悲剧中，汉军屡次出兵，甚至遭遇了五次全军溃灭。

这场战争又有几次高潮和间歇。安帝永初年间陇右羌乱持续了十二年，中央政府的直接军事花费就达二百四十余亿钱。[24]

也正是在安帝时期，中央财政崩溃的信号终于传来。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在西羌攻破临洮的同时，首都所在的京畿地区出现了大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群臣束手无策。

最后，三公站出来提议，请求准许官吏卖官。只要官吏缴纳一定的钱谷，就可以得到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的职位，而更低级别的人只要出钱也可以获得进入官府当吏，或者到军队担任低级指挥官的机会。

这是东汉政府第一次不能依靠正规的税收来渡过难关。此禁一开，随着财政制度被进一步摧毁，吏治也越来越混乱，对民间的干扰也超过了界限，社会的动荡随之而起。

安帝死后，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羌族的一支名叫“烧当羌”的部落袭击金城（今兰州），引起了另一次的羌族大叛乱。这次的战争绵延十年，主要区域涉及凉州（今武威）、并州（今太原）和关中地区，消耗军费八十余亿。[25]

为了应付军事开支，顺帝在帝国财政最大的一笔开支上做了文章。他降低了公卿大夫的工资，并从王侯手中借走田租。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顺帝下令，由皇帝出面借走王侯一年的国租，用于战争开支。当年，皇帝还在有钱的老百姓中推行“国债”，每户一千钱。汉安二年（公元143年），顺帝再次借走了王侯一年的国

租，同时降低了百官的工资。[26]

当然，由于政府缺乏对于官员的约束和监察，官员们失去的工资和物资必然通过其他方式来补偿，最终社会将承担官员的掠夺成本。

但是，对于一个已经在财政上山穷水尽的政府来说，任何能拿到的资金都是救命稻草。

到了桓帝和灵帝时期，东羌再次叛乱，这次战争又耗资达四十四亿。[27]直到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羌乱才告一段落。从顺帝永和年间到东羌叛乱结束，战争费用高达三百二十亿。[28]

在东汉历史上，人们最不喜欢的是桓帝和灵帝时代（公元147年—公元189年）。由于这一时期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加之中央政府功能的退化和腐败化，人们对之深恶痛绝。皇帝对周围的人更加不信任，只宠幸宦官，而宦官更加腐败的统治进一步削弱了皇帝的权威。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桓灵时期的局面实际在前朝就已经注定了。当正规的财政系统被破坏，政府就已经变得低效、无法运转了，哪怕换成是光武帝、明帝或者章帝，也没有办法挽回局面了。

在糟糕的局面下，桓帝做了不少他必须做的事情，来避免帝国的崩溃。他是位操劳的皇帝，却只能起到延迟帝国崩溃的作用。

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由于羌乱的影响，桓帝继续前朝的政策，降低公卿大夫的工资，并从王侯手中借走一半的田租，再次根据财政支出来售卖官职。第二年，又削减那些没有参战的武将的工资，并削减公卿的衣物供应。[29]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汉桓帝在财政的压力下，尝试另一种做法。他下令全国按照亩数征敛额外的税收，每亩征收十钱。[30]这一次，政府不再区分免税田还是非免税田，不管土地属于普通人还是豪族、官僚，都要缴税。桓帝即位前，耕地大概在七亿亩左右，[31]如果全部征收，可以获得七十亿钱的额外税收。但是，有理由相信，以桓帝时期的行政效率，根本无法做到全面征收。

羌乱不仅摧毁了东汉政府的正规税收，还在周围地区掀起了叛乱的风潮。这段时期，也是南部、西南部蛮族叛乱的高发期，同时也是各地民变的高发期。分析其中的相关性，可以大致了解财政旋涡与社会瓦解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要有一次危机瓦解了帝国的财政，那么政府就必须开辟无数的非正规渠道来敛财，从而造成社会上新的不稳定。当一个国家掉到这个旋涡里时，就会越来越混乱，形成恶性循环。

羌乱告一段落之后，东汉政府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崩溃阶段。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由于缺乏资金，开始了最后的疯狂举动——卖官。从关内侯、虎贲、羽林，价格不等。就连三公九卿也都有价格，三公的价格是一千万，九卿的价格是五百万。[32]

到后来，为了强迫百官交钱，灵帝甚至要求不管是刺史还是太守，在任命或者调动时，都必须向皇帝缴纳“助治宫室钱”，司马直就是在这时以死谏皇帝的。

灵帝卖官的方法灵活多样，甚至还支持信用付款，可以先当官，再付款，不过到时候要付两倍的价格。

当灵帝数着他的收入时，帝国的官僚体系已经彻底被破坏了。以前的皇帝即便有卖官的，但在卖官之外，还必须留有正常晋升的渠道，给有才能的人留下空间。而灵帝的卖官已经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份上，一个人不管才能如何，如果想当官，都必须付款。

司徒崔烈是灵帝时期的名士之一，他当太守和廷尉时一直受人尊敬。[33]后来，他花了五百万从灵帝手中买了个司徒。在庆祝他升迁时，汉灵帝也在场，皇帝不仅不感到羞愧，反而认为卖便宜了，应该卖一千万。而人们知道崔烈买官之后，他的声名也随之受损。但是，再清高的人士在灵帝时代也必须适应自污的规则。

更甚的是，桓帝腾挪的钱财大部分是用于公事，而灵帝的敛财却是为了满足私欲。由于东汉的政府财政和皇室财政是合一的，皇帝敛来的钱财往往被用于公事。灵帝为了防止政府用掉他卖官得来的钱，专门建了一个万金堂，把钱放在万金堂，只准用于他的私事。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然而汉灵帝更关心的却是他的宫殿。第二年，由于宫殿失火，灵帝下令，全国每亩地多收十钱来帮助他重修宫殿。当然，这时在叛乱区是不可能收钱上来了，而在政府控制区收这种苛捐杂税，等于逼迫更多的人走上反抗的道路。

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汉灵帝再卖关内侯，爵位可以传给子孙，价格是五百万。这时，东汉的彻底崩溃已经近在眼前了。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灵帝做了一次大胆的改革。这次改革涉及的对象是地方政府，却最终彻底葬送了东汉皇朝。

由于黄巾起义造成了地方混乱，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做出有效的调整，提高各地资源调拨的效率，才能防止下一次起义的爆发。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个政府不仅无能，而且很庞大。军事官员、财政官员、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层层叠叠，每一个官员都想着如何守住地盘，防止别人侵犯自己的领域。从政府调拨来的经费成了各个官员口中的肥肉，你争我夺，却忘了敌人就在眼前。

比如，后来作为改革样板的四川地区，本来就地处偏远，管理不易，官员的责任重叠尤其严重，对于权力你争我夺，有了财政钱粮，谁也不想放手，所以，问题更加突出。

皇帝和大臣都意识到，如果要节省开支，提高效率，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革。他们认为，应该将所有的财政、军政权力统一授予一个官员，由他来整合调拨。在皇帝过问地方事务时，只需拿这个官员是问，再由他确定其他官员的责任；而投入到该地的财政资源，也由这个官员统一分配。

这个统一负责的官员就是州牧。[34]

州牧并非是一种新型的官职，其雏形叫刺史。汉武帝时期，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监督地方官吏，将天下分为十三部，派遣刺史去刺探

各部的官僚。这时的刺史只是一个监察官员。在西汉时期，刺史还不是常驻官员，必须每年回京师向皇帝汇报。

到了东汉初年，为了加强刺史的监察效果，规定刺史不必每年都回京师，可以派下属回京师汇报。于是，刺史就逐渐演变成了地方的常驻官员。由于他有监察郡县官员的权力，地位反而超乎郡之上，成了郡守的上司。[35]

刺史本来是为了帮助皇帝集权而设的，但碰到掌控力不强的皇帝，刺史反而可以扩张权力，使得地方官制更加复杂，不便管理。不过此时的刺史仍然不管财政，只针对官员进行纠察。

随着东汉社会的逐渐解体，皇帝对于刺史的依赖反而更强。皇帝发现，为了镇压叛乱，就要将资源都集中起来形成合力。而集中资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刺史的权力扩大，不仅让他掌管官政，还要掌管财政和军政，也就是将这个地方所有的资源都交给他去管理。

这个办法是由太常刘焉提出来的，他认为，现有的刺史由于权力不够，而且普遍素质不高，徒增暴乱。所以，应该从有好名声的重臣中选取一些官员，把刺史改为州牧，由这些重臣来担任。

朝廷采纳了刘焉的建议，而刘焉本人也当上了益州州牧。益州州牧在刘焉手中控制了六年，之后传给了他的儿子刘璋。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璋为了对抗曹操，引入刘备作为帮手。三年后，刘备取得了益州的控制权，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蜀汉政权。

与刘焉同时担任州牧的还有太仆黄琬，任豫州州牧；宗正刘虞，任幽州州牧。[36]

灵帝的改革很像后来唐玄宗的改革。灵帝创造了州牧这个军阀集团，玄宗则创造了节度使。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因为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开支分散（或者不足），无法满足军事需要，所以，必须在地方上安排一个掌管一切的官员，统一管理财政，形成合力。

但是，官员虽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却由于缺乏监督，很快就独揽大权。这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了。

在州牧这个职位设立一年后，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大将军何进联合袁绍，欲除去宦官势力，但在争斗中被宦官所杀。何进死前曾经邀请在北方带兵的董卓前来洛阳，帮助他对付宦官势力。何进死后，董卓仍然以这个名义进入洛阳，挟持了年幼的天子，剪除了宦官势力。

之后，董卓另立汉献帝，这就是汉代最后一个皇帝。

当董卓擅权时，汉灵帝创造的州牧显出了巨大的活力：他们掌握着一个地方的全部资源，可以迅速调动资源用于战争。袁绍（冀州）、袁术（扬州）、曹操（兖州、冀州）、刘备（徐州、豫州、益州）、刘表（荆州）等，都从地方起家，他们或者亲自担任，或者派心腹代理，但最终的目的都是控制一个地方的所有资源，以用于战争。东汉政权终于在这巨大的离心力之下走向崩溃。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25年—公元189年。

[2]见《后汉书·杜诗传》。

[3]西汉平帝原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数量达到高峰，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口（《汉书》）。东汉高峰时期的人口数量略少，为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口（杜佑《通典》）。但是，根据两汉书的“地理志”和“郡国志”的记载，东汉人口已经开始向四川、两湖、江苏、两浙一带迁移，而陕西一带由于战争频繁，人口出现了极度的萧条。中国人口已经初步出现了由北向南移趋势。参见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4]见《后汉书·刘隆传》。

[5]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6]《后汉书·光武帝纪》：“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7]《后汉书·和帝纪》：“戊寅，诏曰：‘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

权收盐铁之利，以奉师旅之费。自中兴以来，匈奴未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顺圣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8]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光武帝大封功臣为侯，同时，裁撤军队，收其兵权，利用文官治理天下。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因为通晓文治而被继续重用。《后汉书·光武帝纪》："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后汉书·贾复传》："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

[9]见《后汉书·百官志》。今人著作可参考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10]《后汉书·百官志》："承秦，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属少府。世祖改属司农。"

[11]见《后汉书·马援传》。

[12]本书的分部就以此三次重建为界。

[13]《后汉书·百官志》："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别主上林苑有离宫燕休之处，世祖省之，并其职于少府。……又省水衡属官令、长、丞、尉二十余人。"

[14]《后汉书·百官志》："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

[15]如孝宣许皇后和孝成赵皇后等。见《汉书·外戚传》。

[16]见《后汉书·皇后纪》。

[17]见《后汉书·宦者列传》。

[18]见《后汉书·孝灵帝纪》。

[19]见《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

[20]《后汉书·袁安传》："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21]东汉具体的财政收入未见于史册，但可以进行大致的推算。首先，由于西汉、东汉的人口和土地开垦情况类似，税率也一致，西汉的财政收入数据应适用于东汉。《汉书·王嘉传》记载，"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三者相加共计八十三亿，东汉财政收入应该与此相当。其次，《后汉书·梁冀传》记载，（皇帝）"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由此推断天下租税约为六十亿以上。综上，东汉财政收入大约为六十亿到八十亿，取七十亿为宜。

[22]见《后汉书·窦宪传》。

[23]见《后汉书·梁冀传》。

[24]《后汉书·西羌传》："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

[25]《后汉书·西羌传》："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

[26]见《后汉书·孝顺帝纪》。

[27]《后汉书·段颎传》："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

[28]《晋书·食货志》："迨建宁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余年兵连师老，军旅之费三百二十余亿，府帑空虚，延及内郡。"

[29]见《后汉书·孝桓帝纪》。

[30]见《后汉书·孝桓帝纪》。

[31]见附录表2。

[32]见《后汉书·孝灵帝纪》。

[33]见《后汉书·崔骃传》。

[34]《后汉书·孝灵帝纪》：“是岁（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

[35]《后汉书·百官志》：“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诸州，无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

[36]见《后汉书·刘焉传》。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1]

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组织最出色的一方。这个现代军事的基本原理在三国时期就有着很好的反映。

东汉末年，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董卓囤积了大量钱币，却无法买到粮食，袁绍、袁术等人由于不重视后勤，军士们甚至不得不吃野枣和贝壳，只有曹操组织了大规模的屯田，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

在三国的竞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而蜀汉则在连年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一直处于后勤劣势之中。这种战略性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结局。

在灭亡蜀汉和东吴时，司马氏的谋臣们首先考虑的是屯田积累粮食，其次才是打仗。魏晋在统一过程中，屯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西晋建立后，曾经试图进行平均化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晋代继承了从汉到魏的庞大遗产，社会结构已经固化，改革很快就夭折了。

南朝时期，政府的头等大事是清查税源。由于大批的人都依附于豪族，变成了非纳税户，而大量的土地都成了豪族的免税田，南朝各代皇帝不断清查户籍和土地，却从来没有查清过，税收也不断萎缩。因此，南朝被行政效率更高的北朝所超过、灭亡。

三国：财政为王

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

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逃离了郭汜、李傕等西北将领的围追堵截，

从长安出发，一路辗转，来到了洛阳。到达洛阳时，首都的宫殿已经全部毁于战乱，跟随皇帝的百官行走在荆棘之间，靠在残垣和断壁上休息。中原的军阀们早就忽略了皇帝的存在，他们手握强兵，却没有人前来看望皇帝。群臣饿坏了，只能挖野菜吃，有的甚至饿死在东都的废墟之中，有的被乱兵所杀。[2]

在这时，曹操前来收留了皇帝，把疲敝交加的皇帝带到了许都。

这一年，整个中原都处于混乱之中：袁术、袁绍、吕布、公孙瓒等各霸一方，征战不止。这也是东汉末年最残酷的时期，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图谋吞并别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就在这种局面下，曹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他却强调农事。这一年，羽林监枣祗给曹操出了一个主意：赶快进行屯田。[3]

曹操听从了这项建议，以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自此，屯田成为惯例。

曹操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正是靠着屯田，他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他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属于典型的战乱期，而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屯田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历史。可以说，三国的竞争，首先是财政的竞争，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董卓之乱后，整个东汉帝国的财政体系彻底崩塌。各地的州牧和将军们为了供养部队，首先实行的是掠夺式财政政策。

一切都是暂时的，以一次性搜刮为目的。他们谁都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在必须拼命度过今天的时候，明天显得过于遥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董卓本人。作为灭亡东汉的第一推手，董卓也是推行掠夺式财政政策的典型代表。攻克了城池之后，他的军队都会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

空。

与曹操看重粮草不同，董卓根据以往的经验，更看重货币。[4]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后，就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

由于极端缺乏货币，董卓还将传了数百年的秦始皇金人熔化掉了。秦始皇收缴了天下的兵器后，将它们铸成了十二铜人（也称十二金人），董卓将其中的十座毁掉，铸成了钱币。

在和平时期，这种做法可以直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但在战争时期，由于民间已经抛弃了货币，董卓的做法最终失败。

不管是劫掠钱财，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军粮。有了军粮，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战斗力。但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时，不管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

董卓被吕布刺死后，部将郭汜、李傕继续作乱。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一石豆麦二十万，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白骨成堆，腐烂的人肉和残缺的尸体处处可见。[5]

当时还在长安的汉献帝叫人把皇室储存的米、豆拿出来给饥民煮粥，但是粮食被官员们直接盗走，饥民们每天大批地死去。皇帝只好亲自去给饥民施粥。

献帝东逃后，郭汜、李傕在后面追杀。皇帝、皇后也缺食少衣，皇后的几匹细绢被人抢夺，连她身边人的性命都赔了进去。到了后来，皇帝也只能用野草、青菜充饥。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更是一无所有，连人都看不到，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

董卓、郭汜、李傕等人大肆掠夺西部，却没有想到，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由于他们的大肆掠夺，农民无法种粮，随着粮食的枯竭，军队也成了受害者，战斗力下降，最终西北军阀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绍和袁术，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也以掠夺为主。甚至，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在东汉，中原一带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有丰富的水产，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这些水产却无法成为辎重。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

在中国历史上，屯田制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制度。

这种制度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以现代人在新疆地区的屯田制为例，这种带着国有企业成分的屯田制度由于无法激励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产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

但是在战争时期，由于普通农户无法得到安全的保障，只有军队能够出面维持治安，屯田反而成为唯一能够有效组织生产的方法。

在西汉时，由于西北战争的需要，皇帝曾经试验过屯田制。汉武帝设立了张掖、酒泉等郡，又在北方的上郡、朔方、西河等地设置了屯田官员，发动了六十万士兵实行军屯。在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为了应付西北的军事需要，又实行了短暂的屯田。[6]

东汉的明帝、和帝和顺帝时期，也都在西北实行过屯田。

这些屯田大都附属于北方的军事行动，由于政府无法远距离运送大批的粮草，只能利用士兵在当地生产。但由于生产效率低下，一旦军事目的达到，屯田要么改为私田，要么逐渐被废弃。

历史上真正大规模的、长期的屯田，发生在三国时代。

曹操在许昌屯田成功后，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

到了几千万石。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

依靠严格的财政纪律，曹操统一了北方。在战争中，曹操也特别重视粮草、辎重问题。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两次出击袁绍的后勤部队，这是击垮袁绍的关键。[7]

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这个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比如，董卓之乱后，关中地带几无人烟。关中地带在历史上一直是京畿要地，这里农业繁荣、物产富庶。战乱时，关中一带的老百姓四处流亡，有十多万户流落到荆州，脱离了曹魏的国土。

曹魏统一后，侍中卫觊想恢复关中的经济，决定将这些逃亡户招纳回来。他发现，老百姓很想返回家园过正常的生活，但他们身无分文，就算回到家乡，也根本没有办法组织生产。如果要让他们回家，政府必须提供生活补贴，帮助他们渡过最初的难关。但是政府手中也没有钱去帮助百姓。又该怎么办呢？

卫觊想出了办法，上奏提出，西汉时，政府曾经利用盐铁专卖获得财政收入，虽然东汉时期由于行政效率过低，无法恢复，但现在随着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加强，可以恢复一部分盐业控制权来帮助老百姓回归。这相当于国家从盐业中提取一笔特别税，这笔税款专项用于购买农具和牲畜，补贴返乡的关中老百姓。

卫觊的提议已经有了现代财政中定向征税的色彩。政府采取了他的提议，许多老百姓因此得以返乡种田。关中经济步入了恢复的轨道。

战后，人们生产工具不足，京兆太守颜斐就鼓励人们学习木工，多养猪，之后再卖掉猪去买牛。很快，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有了牛和车，耕种效率大幅度提高。

由于耕田需要水利灌溉，曹魏时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兴水利

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水利的钟爱，从东汉起步，到曹魏时代达到一个小高峰，之后延续到晋、南朝，到隋炀帝时代达到另一个高峰。

曹魏的扬州刺史刘馥兴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水利工程，用以灌溉稻田。豫州刺史贾逵在汝水建造水坝、开挖运河。沛郡太守郑浑兴修水利工程郑陂，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倍增。

在西北方，凉州刺史徐邈兴修盐池、广开水田，敦煌太守皇甫隆推广耧犁、灌溉田地。上述地区都实现了粮食的增产。慢慢地，魏国境内各地都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中央调配物资。这一点使得魏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与曹魏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相比，三国中另外两个国家在屯田上花的力气却要小得多。

由于曹魏所在的中原是汉末战争的主要战场，原来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战争破坏了大部分。中央政府在重建制度时，乘机将权力收紧，曹魏也是以武力打天下，弹压了许多地方豪族。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曹魏的行政效率比东吴和蜀汉的都要高很多。

在东吴，孙坚父子并非本地人，根基不深，而江东受战争的破坏最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东汉时期的豪族门阀结构。所以，孙吴政权更多地是利用门阀势力来统治整个国家。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门阀势力更强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更低下。

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东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孙权亲自劳动，鼓励农耕，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国中，蜀汉的地盘最小。史书记载，三国时期，魏国在籍人口大约是四百四十万，吴国不到二百四十万，蜀国不足一百万。[8]这个数字虽然有争议，但整体上可以反映蜀国的疲弱。

蜀汉时期，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丞相诸葛亮平南蛮，开拓了云南市

场；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诸葛亮的计划由姜维实现，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

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这一次次的浪费让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为了准备这次北伐，诸葛亮开辟了从四川前往陕西的水路，并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力图不再受制于粮食的短缺。但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的去世和随后而来的撤军，大量的粮草资源都落入了对手司马懿的手中。第二年，魏国的中原地区发生大灾，司马懿从陕西调五百万石粮食救济洛阳，[9]其中的粮食，就可能包括当年诸葛亮辛辛苦苦从四川运去的粮食。

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

魏齐王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司马氏逐渐掌握了曹魏的实权。司马懿开始着手筹划统一三国的大计。这时距离蜀汉灭亡还有整整二十年，距离东吴灭亡还有三十七年。

司马懿的谋臣中，有一位将军叫作邓艾，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将之一。二十年后，正是他率兵入蜀，灭亡了蜀汉政权。邓艾除了敢冒险、能打仗之外，还是位有名的财政专家。

在司马懿筹划统一时，邓艾写了一篇《济河论》，向宣帝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战争到最后，一定是财政的比拼，谁能够在财政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曹魏之所以能够占领半壁江山，就是因为实行屯田，积累了足够的粮食。[10]

现在，如果要将南方半壁收入囊中，必须首先考虑继续发展农业、储存粮食。根据邓艾的计算，如果要征服南方，必须做好长期打仗的准备，十万大军，五年时间，或许是最低的估计。而要供应十万大军五年

的粮食，意味着必须有三千万石的粮食储备。[11]

但问题是：怎么才能储存三千万石粮食呢？

邓艾看上了许都以东寿春地区的土地。在魏国与蜀、吴对峙的过程中，共有三个地方起着战略枢纽的作用，分别是：魏和蜀对峙的汉中地区，在陕西和四川交界处，这里也是诸葛亮北伐的基地；位于今湖北的襄阳、荆州地区，魏占领了襄阳，而荆州先是被蜀占领，之后被吴占领，与魏形成对峙；第三个地点就是寿春，即现在安徽的寿县。

在三国时代，魏国要进攻吴国，有两条路几乎必选其一：一条经襄阳，一条经寿春。当寿春被魏国占领时，这里还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土地，位于与吴国对峙的正前线。但是，这里的土地非常肥沃，当北方的土地都已经被开发得差不多了的时候，邓艾发现，寿春正是一个天赐的粮食生产基地。

邓艾认为，由于缺乏水利设施，这里的土地虽然肥沃却产量不高，如果合理地开凿运河进行灌溉，土地产量可以提升三倍。只要五万士兵参与耕田，加上充足的水源，就可以每年上缴五百万石的稻谷作为军粮。六七年后，就可以凑够三千万石的粮食，为战争做好准备。

邓艾的提议受到了司马懿的大力称赞，并立即实行。大修水利，兴兵屯田，曹魏南方的气象也为之一变，官田和民田交错其间，一片繁忙景象。

邓艾的计策为司马氏的统一奠定了物资基础。财政成为西晋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12]

邓艾的方法之所以能够被司马懿接纳，是因为司马懿本人也是一位有名的财政专家。[13]

起初，作为曹操的手下，司马懿也是早期提醒曹操要注意屯田的大臣之一。根据他的计算，当时有二十多万人因为战乱而脱离了农业生产。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闲置劳力的存在，曹操才对屯田有了足够的信心。

洛阳以南的中部地带，也就是荆州以北，靠近吴、蜀的前线。当蜀将关羽入侵了这片地区之后，许多老百姓逃走了。曹操决定收拢这些逃走的百姓，把他们迁往北方进行安置。司马懿阻止了曹操的做法，他认为关羽的侵袭不会持久，日后，这些人还会返回家乡进行耕种，如果把他们迁往别的地方，反而伤害了老百姓的积极性，还让前线变得更加空虚。

曹操再次采纳了司马懿的意见。这片肥沃的土地仍然保持着繁荣，为日后进军江南做好了铺垫。

司马懿对财政和经济的深刻理解，更体现为他能够严格把握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界限。他认为，虽然要重视财政，但是一定要避免扰民过甚。随着魏国的扩张，一些新的边境地区加入了魏国。这些地区的人民大都没有户籍，政府想通过核查来落实户籍制度，便于未来征税。

司马懿不赞同这么早清查户籍。他说，吴国和蜀国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14]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也没有用。这件事表明他的看法比起一般人都高明得多。

在与诸葛亮的对抗中，诸葛亮屡屡被粮草困扰，而司马懿却在陕西一带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鼓励人民种田，使曾经荒芜的陕西再次成为粮仓。当中原地区发生灾荒时，司马懿竟然可以从陕西调粮食来支援中原。

司马懿一生在征战的同时，走到哪儿都会发展经济，保证政府可以获得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正是他高瞻远瞩的气魄，才使他能够采纳邓艾的提议。对于他来说，一场战役的胜负，远没有完善的财政系统重要。

当邓艾灭亡了蜀汉，司马氏的晋国取代了魏国之后，晋武帝司马炎为了统一全国，继续了祖辈的政策。他亲自参加耕种，并多次下诏鼓励农业，奖励那些善于发展农业的地方官员，并积极兴修水利。

更难得的是，晋灭吴的两大功臣羊祜和杜预除了在军事上出类拔萃之外，在财政上同样颇有建树。[15]他们和灭蜀的邓艾一样，精于财政竞争。

武帝时，作为尚书左仆射的羊祜被派到襄阳掌管军事。羊祜到达襄阳后，发现那儿连百日的余粮都没有，他立刻发动士兵开垦土地，很快就积攒了十年的余粮。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发动针对东吴的统一战争时，羊祜已经死去，但正是依靠他留下的丰富遗产和战略，晋朝才成功地统一了天下。羊祜也成为伐吴的第一功臣。

晋武帝时期，出现了另一个状况。由于前期人们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过于单一，出现了副作用。

之前，人们总是强调建坝拦水，开荒种地，而种的地以水田为主。可是，由于人们四处建坝，许多地方出现了水灾，大水长期不退，造成了灾难。

当时的河南尹杜预认为，这时不应该再建这么多水坝和水田，而是应该挖开一些水坝，将水放走，发展一些旱田。另外，为了应付战争，政府曾经留了很多种牛，现在应该把这些牛大批配发给老百姓，让他们发展农业。

在平吴战争中，杜预是晋军的指挥官之一。除了死去的羊祜之外，杜预是最主要的功勋人物。

长期以来，我们只把羊祜、杜预和邓艾这三位平定了吴蜀之地的人看作是军事家，但是，他们首先都是深刻理解财政问题的经济专家，只有在军备上做到了极致，才有可能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财政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在平定吴蜀之后，仍然保持着政权的稳定性，而不是随着开支的扩大，增加新的不稳定。所以，晋武帝年间，西晋之所以能够统一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军事范畴，成为一个事关全局的财政问题。

西晋：道不尽的禅让制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亡了东吴，统一了中国。

当中国经过近一百年的时光重新走向统一时，雄心勃勃的皇帝随即展开了宏大的财政改革，要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提供牢固的基础。

财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摸清帝国的人口数量，并把耕地平均分配给广大的人口，让他们安居乐业的同时，为政府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

经过清查，晋朝的人口为一千六百余万人。[16]根据三国时期的统计，蜀国不到一百万人，吴国二百四十万人，三国加起来也只有不到七百七十万人。统一后，晋朝人口数量已经比三国的总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之所以会出现增加，除了太平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之外，还由于流民重新回归家乡，被纳入到户籍之中。

查明户籍之后，晋武帝实施了更具革命性的土地改革。这份土改纲要规定：每一个男丁可以占田七十亩，女丁可以占田三十亩，一个家庭（一夫一妻）正常的土地是一百亩。[17]

从晋武帝的分地意图来看，是要实现“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社会。在收税上，政府也考虑得非常周到。为了照顾老人和小孩，规定男女十六岁到六十岁是正丁，需要课税；而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免税的。剩下的人（十三岁到十五岁，六十一岁到六十五岁）属于次丁，在税收中享受优惠条件。

至于土地税，也并非耕种的所有土地都缴税。一个正丁男子最多按照五十亩土地缴税，而次丁男子则按二十五亩土地缴税。正丁女子只缴二十亩的税，次丁女子免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户调税，规定正丁男子每年上缴绢三匹，绵三斤，次丁男子和正丁女子减半。

上述税收都是针对汉人的，远方的夷狄也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收。

晋武帝改革计划之完善，令人敬畏。如果这个办法顺利推行下去，

那么，晋朝将成为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强大王朝，不用等到唐代的出现，中国就将进入另一个太平盛世。

但事实却是：晋的安定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随后就进入了著名的“八王之乱”时期。“八王之乱”造成的社会解体给各地的少数民族以机会，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中国进入了“五胡乱华”的时代。而晋武帝设想的财政改革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随后的两百多年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财政混乱时期。

那么，为什么司马炎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会流于失败？为什么西晋王朝如此短命？也许，从司马氏通过禅让得到天下的那一刻，一切都已经注定。

在中国历史上，禅让是一件让人既爱又恨的选择。

人们之所以喜欢禅让制，是因为这意味着在朝代更迭时没有发生新旧皇族之间的战争，政权是和平交接的，整个社会所受到的破坏不像武力夺权那么大。

但人们之所以担心禅让制，是因为禅让之后的朝廷往往都比较羸弱，毛病不断，这些疾病伴随政权的终身。而那些从彻底的乱局中以武力脱颖而出的王朝却可能拥有更长的寿命。

禅让得来的政权之所以短命，原因在于新政权虽然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皇帝束手无策。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哪怕如司马炎这样有心改革的人，最终也会发现一切只是徒劳而已。

禅让的弊病在晋代显得更加突出。

当权力传到晋皇室时，已经经过了两代禅让，曹魏禅让自东汉皇室，司马氏在禅让时又几乎将曹魏时期的问题都接收了下来。而在东汉建立时，由于光武帝无力解决西汉时期留下的社会问题，已经先天性地带上了西汉的一系列问题。这就注定西晋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政权，非常

容易发生新的失衡。

司马炎推行土地改革立即遇到了新的问题。

他的改革试图覆盖全国，但有可能推行的只局限在北方曹魏控制的区域。这个区域由于经历的战乱最多，大量的人口变成了流民，许多耕地变成了荒地，土地多次易主，已经不可能恢复汉代的土地权属关系了。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统一规划，进行分配。

而蜀汉和东吴，由于继承了东汉时期的土地权属关系，每一片土地都是有主的。晋代虽然征服了这些土地，却没有能力改变土地权属关系，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所以，晋武帝的土地改革在江东和四川等地都无法进行推广。就算在北方，土地改革进行得也不顺利。

曹魏时代，为了快速生产粮食，实行了大面积的屯田制度。屯田时，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18]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19]

到了后来，皇帝把政府控制的屯田大批赏赐给了官僚和世族，土地上的屯户也随着土地一并转移给了他们，这些屯户就被称为佃客。这时，佃客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这些佃客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世族缴纳粮食。当佃客越来越多时，政府的税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响。

晋武帝司马炎的土地改革，本来就是针对这些佃客的，希望通过清理户籍，让他们重新向政府缴税并服兵役。可是那些世族并不想放弃特权，而佃客也并不想隶属于国家（那意味着服兵役，甚至多缴税）。

晋武帝司马炎的政权是禅让得来的，所以，他不得不对官僚世族做出妥协，在他看似完美的改革纲领里开了不少后门。于是，除了规定普通人按照男子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分配土地外，王公大臣的土地并不需要遵守这个数字。对于官僚，晋武帝有另一套规定：晋朝的官员按照职

位和考核分为九品，第一品官员可以占田五十顷，也就是五千亩。以后每品官员递减五顷，第九品可以占田十顷，也就是一千亩。

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官员的亲属的土地也都是免税的，最多可以包括九族，最少也有三代。除了亲属之外，官员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农业）和衣食客（佣人）。比如第一品官员可以拥有五十户佃客、三户衣食客。

在法律上，晋朝就把人分成了至少三个阶层：一是不需要纳税的官僚世族阶层；二是不需要纳税的“客户”阶层，也就是佃客和衣食客等；三是纳税的普通人。

官僚世族阶层的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却可以拥有众多的“客户”阶层。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

晋武帝虽然向官僚世族做了让步，让他们可以拥有土地和“客户”，但只要数量不超过限制，政府还是拥有足够数量的纳税人的。

但是，由于晋朝政府权威不足，不能将法律贯彻实施，限田数量变成了虚设，国家的纳税人口就越来越少了。

由于禅让得来的权威不足，晋武帝还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大肆分封司马氏的诸侯王。希望通过家族势力来镇服各地的世族，维持晋祚。

然而却事与愿违，这些诸侯王不仅没有帮助皇帝维持帝国的秩序，反而利用中央政府的疲弱，卷入了明争暗斗。

西晋皇室的财政问题本来就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后的“八王之乱”更是直接击垮了财政，中央政府不可能再组织起任何统一的军事行动。“八王之乱”时，晋惠帝逃出京城，在路上只剩下两块布和三千文钱，想吃一只鸡都不可能。

当北方和西方的胡人入侵时，各地诸侯只能自发组织抵抗行动，并自行解决财政问题。匈奴人刘曜围困晋怀帝时，官员都挨饿，甚至有了人吃人的现象。

在一片混乱中，这个始终没有实现好财政统一的王朝轰然瓦解。晋武帝推行的貌似完美的土地改革法案也随即被放弃，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美丽的幻象。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尽的户籍

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初十（公元322年1月3日），晋元帝司马睿死在了宫中。[20]他死前已经心灰意冷。他建立了东晋，却作为失败者死去。

在他死的这一年，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无比混乱的地步。在半年多以前，他的大将王敦刚发动了一次针对皇帝的战争，皇帝的军队完败，奋威将军侯礼战死，尚书令刁协在逃跑途中被贼军杀害，镇北将军刘隗干脆投奔了北方的胡人石勒。

王敦占领了首都后，晋元帝只好写信给他："如果你心里还有晋，就息兵让天下安定一会儿吧。如果你心里已经没有了，我就回我的琅琊（晋元帝当皇帝前，是琅琊王），退位让贤。"

王敦选择了暂时息兵。他当上了丞相，掌管了晋的军政大权，加封武昌郡公，封邑达到一万户。不过，不要以为他满足了——从这时起，王敦大肆杀戮对晋室忠诚的将领，在晋元帝的眼皮底下为禅让做准备。东晋的领土内，纷争叛乱不断。

在东晋外围，蜀地的贼寇张龙入侵了巴东，北方的胡人石勒更是侵袭不断，这一年他骚扰河南，攻陷太山、襄城，就连晋元帝的老根据地琅琊都叛逃归了石勒。这一年，东晋还发生了大瘟疫，疫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三十。

就在这一片凄凉中，晋元帝离世，将不确定的未来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幸运的是，王敦的篡位没有成功，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又存在了近百年。然而，东晋的现实却已经在开创者的软弱中定了型。

之后，这个不幸的朝代又经历了苏峻和祖约的叛乱、桓温的擅权、前秦的淝水之战、孙恩的叛乱，以及桓玄的短暂称帝。东晋政权如同一叶扁舟在风浪中颠簸，最终被刘裕的宋所取代。

在东晋这个孱弱的朝廷中，皇帝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之所以存在，只不过是因为世家大族们商量不出一个公认的领袖来取代他，不如让司马氏继续干着。至于皇帝的权威，则早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然而东晋又是一个名士层出不穷的时代，这些名士语不惊人死不休，放浪形骸却又满腹经纶。这还是一个奢侈之风横行的时代，各大族倚仗着巨额财富，挥霍、宴乐充满了史书，使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战乱和悲剧的时代。

但战乱就在身边，不断失败的北伐，权臣当道，北方和西部的胡人侵扰，内部的纷争充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绝对感觉不到幸福。

可以说，这是一个少数人的天堂时代，也是多数人的炼狱时代。一个有利于豪族，却对皇权和普通人不利的时代。

皇权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东晋本身就是一个客居的政权。它是在原本东吴的地盘上建立起来的，甚至连东吴的社会结构都没有理清。北方陷入了战乱，晋元帝仓皇南逃，东晋只不过是他建立的流亡政权。

南渡后，元帝检视国库，发现整个国库只有四千多匹布。到后赵皇帝石勒向南进攻时，晋元帝悬赏石勒的人头，价格是一千匹布。[21]

在这个政权中，一切都是临时措施，晋武帝制定的土地改革计划早已经被放弃，因为东吴本来就缺乏土地，根本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分配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

在东晋时期，财政上有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土地和人。

所谓土地，指的是政府需要知道详细的土地数据，来作为课税的依据。东晋建国时，由于原本南方的贵族占据了太多免税的土地，政府能够课税的资源本来就少。司马氏南逃后，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

方来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所以，政府的第一要务是查清能够课税的土地有多少。

所谓人，又牵扯到东晋时期一个特有的问题：侨民。由于蛮族占领了北方，许多北方的汉人都逃到了南方，司、冀、青、并、雍、凉、兖、豫、幽、平这些州已经全部沦陷，徐州丧失了一半。这些州的人口大量南逃，挤在了扬、荆、江、梁、益、交、广几个原本就不发达的州。[22]

最初，这些南逃的人都盼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北方，认为只是暂时居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户籍，后来，政府为了便于管理，给他们发了临时身份证。那些原住民的永久身份证用黄色木片登记，所以称为“黄籍”，临时身份证则用白色的纸登记，称为“白籍”。[23]

在白籍聚集的地方，按照他们在北方的居住地，设立了许多侨郡和侨县。这些侨郡侨县和北方的郡县同名，但地处南方，只管人，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少量土地。侨郡侨县只有其名，没有其实。

白籍的人除了世家和官员，大部分在南方都没有土地，他们依靠打工为生，寄身于有土地的豪族门下，成为佃客。困扰着中央政府财政的豪族占地、佃客失控现象都愈加严重。

不过，白籍比起黄籍来，并非完全处于劣势：由于他们没有土地，不用向政府缴纳土地税；而政府为了优待这些从北方逃难的人们，也免除了他们的劳役。于是这些人就彻底脱离了体制，与中央政府脱钩了。

东晋政府还曾经希望能够收复中原，让白籍人士回到北方，但当收复无望时，就必须考虑让他们变成原住民，加入黄籍，为政府贡献税收和劳役。

除了白籍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户籍都没有的人，被称为浮浪人。[24]这些人口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户籍，更难管理。

清查土地和人口，就成为东晋政府必须去做的事务。

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这两项工作都铺展开来。在丈量

土地方面，政府取得了重要进展，虽然有许多免税的土地，但政府仍然在大部分土地上推广了土地税。

东晋的土地税税率为十分之一，摊入土地中，每亩地纳税三升米。[25]

对户籍的整理称为“土断”，这时，政府连白籍都还没有建立，首要目标是登记有多少逃难者。但是，随土地丈量一起进行的土断却并不彻底。由于东晋立国不久，许多人口还在迁移之中，所以，无法将他们纳入到固定的户籍体系中。

到了咸康七年（公元341年），东晋政府再次进行土断，这次的目的仍然是清查人口。也是在这时，政府发明了白籍，将侨居的人口注册进去，而将原住民注册为黄籍。[26]

白籍出现后，引起了南方原住民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人口不仅抢占他们的生存空间，还享有免役的特权。黄白籍制度成了东晋户籍争论的焦点内容。为了对付白籍人口不纳税的问题，东晋政府让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了许多收税方法，对工商业、土特产都进行征税，避免由户籍和土地问题造成税收流失，也为了安抚拥有土地的黄籍人士。

晋哀帝继位后，隆和元年（公元362年），为了减轻土地税问题带来的不公，皇帝将土地税从每亩三升减为每亩二升。[27]

两年后的兴宁二年（公元364年），在权臣大司马桓温的主持下，政府对于户籍的整理工作正式启动。[28]这次户籍整理被称为“庚戌土断”，其核心是通过减少白籍人口，来扩大国家的税基，并解决劳役、兵役人口不足的问题。同时，将世家大族庇荫的佃客阶层都释放出来，编入国家户籍。

此时恰逢桓温准备第三次北伐，土断被认为是解决人口和财政问题的双重武器，所以此次土断的力度非常大，对于敢隐匿户籍者，严惩不贷。晋宗室彭城王曾经因为隐匿了五户，就被治罪。经过土断，政府暂时获得了户籍和赋税。然而，由桓温强行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却在他死后因行政效率的降低而变得松弛。

更麻烦的是，随着行政效率的降低、士族的壮大，东晋的税收问题再次体现了出来。由于豪族占田太多，剩下的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整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

与此同时，在东晋的北方，一个强大的蛮族政权正在兴起。

桓温北伐时，在长安城外的灞上曾经遇到过一位奇客，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边抓虱子边和这位权臣说话。这位奇客就是王猛。[29]后来，王猛辅佐前秦王苻坚，把前秦从蛮族政权变成了一个半汉化、制度化的文明政权。中国北方经过了长期的混乱之后，终于进入了制度重建的轨道。

前秦的出现，给东晋施加了巨大压力，皇帝和群臣必须更加注重财政和军事，避免在与前秦的对抗中处于下风。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政府宣布不再按照土地收税，改为按照人头收税，王公以下每人每年三石粮食，只有服役的人可以免税。[30]

这项改革的实质是：由于政府永远查不清土地，干脆不查了，改换成更为简洁的以人口征税的方式，便于管理。在后来的唐代、明代，皇帝由于查不清人口的多少，只能把所有的税收都摊入土地之中，而在晋代正好相反，人口可以查清，土地却更加困难。

改革的六年后，淝水之战爆发。在这次战役中，东晋以少胜多，粉碎了前秦的进攻。这次战役也使得中国北方再次陷入了一片混乱，东晋得到了暂时的喘息。

不过，淝水之战也给东晋带来了新的财政问题。为了对抗前秦，谢玄成立了以北方流人为主的北府军，随着军事化的加强，中央财政再次吃紧。淝水之战两年后，东晋政府开始加税，每人每年的税负变成五石粮食。

随着税收依据从土地改为数人头，户籍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了出来。此刻，当政府税收不足时，清查土地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把多余的人口找出来，才能增加税收。

于是，到了东晋最后一个权臣时，土断再次变得重要起来。

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太尉刘裕实行了东晋历史上最严格的一次土断。[31]

在这之前，东晋遭遇了桓玄的叛乱和短暂称帝。刘裕击败桓玄后，掌握了军政大权，并率军南征北战。土断发生前，他已经向北灭亡了慕容氏的南燕政权，并平定了南方的卢循兵变，正准备给西方的西蜀谯纵以最后一击。随着疆域和财政开支的扩大，土断启动。

义熙土断撤销了大部分侨郡侨县，将白籍的人口大量地并入黄籍。对于敢反抗的人，刘裕不惜以死刑相威胁。这次土断之前，会稽的士族虞亮就曾经因为藏匿了千余逃亡户，被刘裕处以死刑。

然而，东晋时期的政策特点是，不管多严格的政策，都会留有一定的后门。刘裕在制定政策时，也留下了后门：由于刘裕背后的武装是北府兵，而北府兵的来源大都是徐州、兖州、青州的流亡人士，所以，义熙土断将三州人聚集的晋陵（今常州）一带排除在外了。

只是，这时距离东晋的灭亡已经很近。刘裕的改革与其说是帮助东晋，不如说是为篡位打下一个好的社会基础。

土断七年后，宋武帝刘裕废除了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己当上了皇帝。由此开场的禅让大戏在南朝越来越狭小的区域内一次次上演。

南朝：漫长的终曲

公元485年，南齐武帝永明三年。由于南齐前后两代君主提倡节约，与北方的北魏休战维持和平，武帝期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繁荣时期。

然而就在这一年，在浙江西北部的桐庐，一个叫唐宇之的人却正准备造反。[32]唐宇之的造反理由在现代人看来有些奇怪。在那几年，齐武帝正在严格调查人民的户籍问题。自东晋末年以来，历经南朝宋，中国的户籍再次出现了大混乱。东晋时期，只有显贵的大家族（士族）才

能拥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而士族的身份都是世袭的。可是，到了南朝宋以后，许多原本没有地位的人也依靠做官、经商发了大财，他们甚至比士族更富有，却没有身份。这些人趁着政治混乱的时机，买通地方官员，或者买通士族由他们认亲，将身份从普通人（庶族）改为士族。这种做法叫作“冒籍”。

当这些庶族成为士族，获得了免税、免役特权之后，更多的穷人投靠了他们，在他们的庇荫下，也取得了免税、免役权。

随着作弊的人日渐增多，政府的税收变得更加困难。从南齐的开国皇帝高帝起，对于户籍的混乱就非常关注。齐高帝在休养生息的同时，决心下大力气整顿户籍。公元480年，他下诏征求整理户籍的意见。

一位叫作虞玩之的官员上书提出了看法。他建议皇帝设立专门的户口检查官员（校籍官），由官员通过检视黄籍，抓出那些弄虚作假的分子。为了防止校籍官的懈怠，皇帝必须给他们制定数量指标，要求他们每天都必须查出数起弄虚作假的案子。

虞玩之是一位正直、负责的大臣。他个人生活简朴，一双鞋竟然可以穿二十年。在政治上也常常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人。他提出的建议在当时来说是最有效的。

皇帝采纳了虞玩之建议，设立了校籍官。虽然校籍官也存在着收受贿赂的行为，可是由于有指标考核，还是有大量的虚假户籍被抓了出来。这些被抓出来的人被称为“却籍户”。

另一个叫吕文度的官员乘机又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为了给人们以警示，皇帝应该将那些却籍户充军，送到边防去接受再教育。

这项古代的“上山下乡”提议迫使大量的却籍户纷纷逃亡。而唐宇之所在的浙江一带也有大量的却籍户，他们面临着被抓走充军的风险。唐宇之决定利用这些人发动叛乱。

公元485年，叛乱爆发。叛乱者最初只有四百多人，但当他打出来抵抗户籍审查的旗号之后，各地的却籍户纷纷赶来投靠，竟达到了三万多人。

唐宇之率领部队进攻桐庐、钱唐等地，第二年，在钱唐建立了吴国，自称吴王。

在南齐皇帝和他的官员看来，唐宇之的行为是荒诞的。那些弄虚作假的却籍户本来就是一群违法分子，而皇帝对于户籍的整理更是无可厚非。然而，为什么这些违法分子还会理直气壮地进行反抗？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响应？

原因在于，却籍户认为自己不是犯罪，而是在打碎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所谓“士族”和“庶族”的区分，就是一种落后和野蛮的制度。士族依靠出身就可以不缴税、享有特权，而普通人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进入那个特权圈子。那些冒籍的人虽然目的是为了获得特权，却也明显带着对这种制度的怨恨。

而皇帝虽然通过检籍找出了弄虚作假的人，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却也间接地维护了早就不合时宜的士族制度。

所以，唐宇之的叛乱，反叛的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他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这次叛乱也让齐武帝意识到，政府的行动不能太冒进。上书建议的虞玩之辞职了，而齐武帝也不得不做出既往不咎的决定，在南朝宋的昇明（公元477年—公元479年）之前已经冒籍的，不再追究，而发配边关的人也都遣返了回来。

一场整理户籍的改革不得不草草收场。

唐宇之的叛乱也显示出南朝制度的复杂性。与东晋相比，南朝的所有皇帝都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大都成长于寒门，从武职晋升到高位，并通过禅让获得了政权。

从出身来看，他们并不喜欢士族豪门，这些豪门把持着社会资源，却不给政府纳税，处处以特权为荣。但是，他们又不可能完全离开士族，因为那是文化和教养的象征。

于是，南朝就在“改朝换代——皇帝革新——经济发展——皇帝变得奢靡——经济衰退——改朝换代”这个圈子里一次次地循环。

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被认为是一代明主，他打击地方豪族势力，试图使皇朝的财政正规化，从寒门中选拔官员，整理全国户籍，这一切使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上升期，也使得刘宋的皇帝都可以在较为宽裕的财政状况下执政。

刘裕死后，王朝的财政在文帝刘义隆时期还能支撑起王朝大规模的北伐活动，这是在整个东晋南朝期间少有的新气象。

但文帝的北伐由于连年征战不断，到了下一位皇帝孝武帝时期又缺钱了，于是又有了新一轮的整顿吏治和整理财政。不过，这时刘宋的皇帝已经迅速堕落了，他们变得荒淫无度，贪图享受，刘宋一朝迅速进入了衰退期。

南齐高帝萧道成篡权建立南齐王朝之后，首先做的又是整理财政。他的财政措施从节约开始，提倡将宫廷里的金银铜玉全部都取消，换成铁器，希望用这种方法来节省开支。之后，又大规模整理户籍。他的措施被儿子武帝所继承，形成了另一个繁荣期。

前两任皇帝的节俭带来的繁荣，到了南齐的后几位皇帝那儿，又成为他们享乐的基础，很快，皇帝的挥霍让刚刚丰盈的国库再次扁了下去。

梁武帝萧衍篡位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厉行节约。但梁武帝的厉行节约又经常让位于他对佛教的宠爱，由于在佛教上花了太多的钱，梁朝的财政一直不健康。加上梁武帝任人不当，发生了影响巨大的“侯景之乱”。这次叛乱也标志着南朝的好时光过去了。

南梁后期，南朝丢掉了四川和江陵一带最富庶的地区，实力大打折扣。

到了陈霸先建立陈朝之后，南朝在实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北朝，缩小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它的士族始终活得那么优雅，但它的财政和政治制度已经过于僵化，无法与北朝对抗了。

从秦到南朝，帝国的财政系统一直保持着延续性。秦代和汉代初期是试验期，几位皇帝在试着建立一种新式的庞大帝国。在以前，人们甚

至不敢想象能在这么大的疆域内维持统一和繁荣。但经过几代人的尝试，到汉景帝时期，帝国不仅存在，而且繁荣。

然而武帝却发现了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巨大缺陷：当产生战争等大的开支项目时，帝国的财政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开销。他试图引入一套国有垄断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奏效了，却给帝国带来了更致命的新问题。由于垄断体系的约束，社会永远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官僚体系在参与了经济的具体运行后，社会经济变得庞杂和混乱。当权力与经济勾结时，社会的结块和硬化再次损害了帝国的财政。

王莽试图解决社会的结块问题，他想利用皇家权力，强行击碎社会结块，却只击碎了他自己的皇位和脑袋。

东汉一代，皇帝都只能承认现实，采取修修补补的做法。然而由于社会的板结，东汉一直无法有效组织财政，经过官僚的侵蚀和外族入侵引起的财政超支，政权最终分崩离析。

三国时期，各个地方政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财政，试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作为胜利者，晋武帝却发现，他仍然敌不过惯性这个隐形的杀手，他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蓝图，却永远没有结果。

在更加板结的社会中，东晋和南朝继续腾挪着最后的资源，他们在财政的紧箍咒下挣扎着，每一次都指望着放松一点。到最后，八百年的试验终于结束。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方的虚弱。对于北方来说，这是一个蛮荒的时代，从游牧蛮族的部落制起，他们一点一点地学习和改造，在前秦时期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汉化，在北魏时期，巩固了汉化的成果，到了北周时期，才建立了更加成熟的制度，并传给了隋唐。

这是一个从怀胎到分娩的过程，时间持续了两百多年，漫长得令人绝望，但是，由于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社会结块，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最终，北方的飓风

席卷了南方，将自秦汉以来积累了八百年的垃圾全都扫入了风中卷走，中国大地步入了第二次社会重建。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189年—公元589年。

[2]见《后汉书·孝献帝纪》。

[3]《晋书·食货志》：“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议。”

[4]《晋书·食货志》：“及董卓寻戈，火焚宫室，乃劫鸾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收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

[5]见《晋书·食货志》。本节未作标注者，均出自《晋书·食货志》。

[6]见《汉书·赵充国传》。

[7]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8]见《通典·食货七》。

[9]见《晋书·宣帝纪》。

[10]《晋书·食货志》：“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

[11]《晋书·食货志》：“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余斛于淮土，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

[12]《晋书·食货志》：“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13]见《晋书·高祖宣帝纪》。

[14]在战争中，非但不苛求民众，反而以宽待人，这种品格尤其难得。司马懿的原话是："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晋书·高祖宣帝纪》）

[15]见《晋书·羊祜传》《晋书·杜预传》《晋书·食货志》。

[16]《晋书·地理志》："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

[17]见《晋书·食货志》。

[18]《晋书·傅玄传》："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

[19]见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三册）。

[20]见《晋书·中宗元帝纪》。

[21]见《晋书·食货志》。

[22]见《晋书·地理志》。

[23]关于黄白籍问题，《晋书》《宋书》《南齐书》等都有提及，但均不系统。系统的总结，可参考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24]《隋书·食货志》："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

[25]见《晋书·食货志》。

[26]《晋书·显宗成帝纪》："（咸康七年）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

[27]《晋书·哀帝纪》："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减田税，亩收二升。"

[28]《晋书·哀帝纪》："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

[29]见《晋书·苻坚载记》。

[30]见《晋书·食货志》。

[31]《宋书·武帝纪》："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32]见《南史·虞玩之传》。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

（北朝到南宋，公元386年—公元1279年）

第六章　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1]

当中央王朝从和平走向战乱时，首先乱套的是财政系统。一旦财政系统乱套，即便是皇帝也会变成可怜虫。

安史之乱发生后，由于战乱的原因，中央财政收入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能否收到足够的税收，以及能否把各地的税收送到皇帝的军队手中，成为中央政府能否存亡的关键。

唐肃宗起用财经大臣第五琦，打通运输道路，建立国有企业，进行货币贬值，从而筹集到了与安禄山、史思明作战的经费。

唐代宗继续重用第五琦与刘晏，加强专卖制度，加强对土地税开发。到了唐德宗时期，进行了税制改革，从复杂的租庸调制改为简单的两税法，使得唐代的中央收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借助财政的恢复，唐德宗决定镇压藩镇势力，恢复大唐盛世。但叛乱引起的财政崩溃再次袭来，唐德宗不仅无法恢复盛世，反而被赶出了首都。他最终意识到，当失去了财政的支持，一个皇帝会变得多么窘迫，他已经不可能恢复当年的盛世，只能接受藩镇割据的事实。

唐德宗的后半生迫于财政压力，变成了守财奴，但他积累的财富却足够唐宪宗完成一次中兴。

当皇帝出逃时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扰乱了首都长安。[2]

德宗执政时，已经是“安史之乱”的藩镇割据时期，中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藩镇（节度使），他们手握兵权，争夺地盘，中央政府处于半失

控状态。

一年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唐德宗任命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畿汝州节度使，率军前往镇压。但哥舒曜在败仗之后，退守襄城，遭到了李希烈的围攻。

唐德宗连忙召集新的人马去救助哥舒曜。公元783年冬天，位于长安西面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接受皇帝命令，率领泾原的军队向东前进，援救哥舒曜。第二天，泾原军离开京城，到了距离长安东面不远的浐水，一场兵变在此爆发。

泾原军之所以兵变，与德宗时期的军费制度有关。在藩镇割据时期，由于皇帝手中的兵马不足，要借助藩镇的军队来打仗，每次调动藩镇的军队，皇帝都必须给予丰厚的补偿。

在皇帝与藩镇间，军费的分配如下：如果藩镇只是在自己的统治区里调动军队，那么军费由藩镇负担；如果藩镇的军队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离开其统治区，那么从离开的那一天起，皇帝必须支付给藩镇一笔丰厚的军事补贴，叫“出界粮”，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3]许多藩镇为了拿补贴，故意派出军队，不打仗，专门拿津贴。中央政府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花费高昂，却效果有限。

这一次，皇帝动用泾原军，本应该按照规矩，给军队以高额的补贴。当士兵们经过首都长安时，心里也充满了对美妙赏赐的憧憬。然而，令这些饥肠辘辘的士兵感到不满的是，中央政府派来犒劳的官员京兆尹王翃只提供粗茶淡饭，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

士兵们离开长安时，大失所望，感到被皇帝欺骗了。军队中传播着谣言，说长安城里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皇帝一个人享受着荣华，却置士兵的死亡于不顾。上战场的士兵越想越冤，决定停下不走了。[4]

士兵的“罢工”让唐德宗大惊失色。此时的长安城已经没有军队守卫，在山东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有四大藩镇正在拥兵对抗中央，而在淮西则是李希烈作乱，为了应付他们，几乎所有的军队都被派了出去。

德宗赶快下令安抚泾原军，派人前去犒军。这次的赏赐是每人两匹帛，当赏赐下发时，士兵们更加愤怒了：皇帝如此吝啬，不仅不值得替他卖命，还应该把他推翻，换一个大方的。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只能任由士兵怀着对财宝和劫掠的渴望，冲向了帝国的首都。

泾原兵变爆发。乱兵攻入了长安，在皇宫外扎营，形势已经非常危险，唐德宗匆忙调动他的禁卫军神策营进行抵抗，可令他感到泄气的是，禁卫军竟然没有抵抗——他们也不愿为皇帝卖命。

唐德宗只好带着太子、诸王、妃子、公主一百多人，加上几个愿意跟随他的宦官，从皇宫的花园北门出逃。这时他遇到了四百多弓箭手，由右龙武军使令狐建率领，这些弓箭手成了皇帝仅剩的护卫，与他一同逃难。

当天晚上，皇帝一行逃难到了咸阳，匆匆吃了几口饭，继续起程。第二天，皇帝到达了奉天（今陕西乾县）。皇帝本来还嫌奉天太小，希望继续西逃，到凤翔避难，谁知凤翔随即发生了叛乱，唐德宗被叛军团团围住，困守在奉天小城。

这是公元8世纪下半叶唐朝皇帝第三次逃出长安。第一次是唐玄宗避“安史之乱”，第二次是唐代宗避吐蕃之兵，第三次则是唐德宗避泾原之祸。

唐德宗在奉天孤苦无助，长安的叛军却迅速控制了局势。

攻克长安后，不知谁想到的主意，叛军走在街上喊着：“都别怕，不用担心，我们免除你们货柜税、间架税！”[5]他们的喊话立即受到了长安市民的欢迎，这些市民没有表现出任何对于大唐政权的忠诚，毫不犹豫就投入了叛军的怀抱。

货柜税和间架税是唐德宗发明的新税种。所谓货柜税，就是向长安的钱庄借钱，向粮商借粮。钱庄里的钱都是储户的，但皇帝决定让钱庄拿出四分之一来救济，粮商也面临着同样的政策。命令下达后，整个长安的市场一片哗然，商人们纷纷罢市抗议。而间架税则是向所有的房产

收钱，每间房最高要缴纳二千文钱。

皇帝的税法彻底激怒了百姓，他们宁肯支持叛乱的士兵，只求废除这些苛捐杂税。但是，市民和士兵不知道的是，皇帝这么做也纯属无奈。此刻帝国的财政已经是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即便搜刮聚敛，仍然满足不了战争开支。皇帝之所以没有赏赐士兵，也是因为国库已经空了。

叛乱的士兵最后找到了一位叫朱泚的人来做皇帝。朱泚担任过卢龙节度使、太尉，由于弟弟朱滔参加了北方四镇的叛乱，他在长安附近被免职赋闲。朱泚自称大秦皇帝，亲率大军进攻奉天。而在奉天的唐德宗部队在围困中缺衣少食。士兵们向皇帝请求发一些御寒的衣服，德宗拿不出来，只能把亲王腰带上的金饰拿下来卖掉，再给士兵补贴。

在困境中，唐德宗发出了著名的罪己诏，不惜痛斥自己长在深宫，“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将整个国家带往了灾难之中。“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6]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最深刻的自责。大多数时候，皇帝总是将错误推给别人，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临死还认为是别人辜负了他。唐德宗的诏书却不惜把皇帝的威严全部打掉，只怪自己。

他甚至赦免了大部分发动叛乱的人。不管是北方四镇还是淮西李希烈，一概既往不咎。只有称帝的朱泚不在赦免之列。不过，朱泚的弟弟朱滔是北方四镇的叛乱者之一，皇帝怕他担心受到朱泚的连坐，宣布朱滔也会得到赦免。皇帝还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发誓要做一个好皇帝。

在奉天被困数月后，唐德宗才有机会逃往汉中地区。在汉中几个月后，朱泚叛乱被平息，他得以回到物是人非的长安。

既然德宗在诏书中如此痛斥自我，那么回到长安后，人们是否看到了一个痛改前非的皇帝呢？答案是：唐德宗的确变了，他的变化却令人心碎。

在这几次叛乱之前的德宗皇帝是一个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试图恢复大唐昔日荣耀的君主，他罢黜了专权的宦官，提倡节俭，摒弃不正规

的税收，试图为中央政府建立起健康的财政，并以此为突破口，将藩镇的权力收回，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

可是叛乱过后，皇帝却向着另一个极端靠拢。他不再信任任何大臣，重新依赖宦官掌权。[7]他逃离长安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的大臣，所有的百姓都是不可靠的，会为了一丁点儿利益抛弃整个皇朝。他也不再指望正规的税收，变得贪婪无比，四处找钱，如果想打动皇帝，只有一个办法：向他进贡比别人更多的钱财。

唐德宗在叛乱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即便是皇帝，有着无数的美好计划，如果你没有钱，还是什么都做不成。他所谓痛改前非，就是变成守财奴。

这个老守财奴的雄心都已经被钱给消磨掉了，他终生为财政问题焦头烂额，攫取着任何可以捞到的收入。他的形象显得如此卑微，以后历代的皇帝都把他当作笑柄，提醒后代不要变成受困于财政的守财奴。

德宗皇帝去世时，唐代的财政制度已经千疮百孔，谁都无法纠正了。但他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使得宪宗能够利用这些钱重新实现中央集权。也许，宪宗烧钱打仗时，有一个老守财奴的灵魂正在天上欣慰地望着世间的风云，欣慰感慨一辈子的忍辱负重是值得的。

“安史之乱”后，皇帝为财政付出的努力，如同一部血泪史，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中央帝国财政崩溃的心酸……

战争时期的加税经济学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盛唐时期正式结束。

在叛乱爆发之前，唐代的财政失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只是掩盖在表面的繁荣之下。而叛乱爆发之后，政府的财政问题迅速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暴露出来。

在叛乱前的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代中央政府统计的总人

口一共有八百九十万户，近五千三百万人。[8]但是叛乱之后，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人口数量迅速下滑，几年后的上元元年（760年），只剩下一百九十三万户、一千三百万人。户数不到几年前的四分之一，人口不到三分之一。[9]

更麻烦的是，在这一百九十三万户、一千七百万人中，有一百一十七万户、一千四百六十二万人（老弱病残和特权阶层）是不需要缴纳租庸调税的，只有七十六万户、二百三十七万人来承担整个唐帝国庞大的租庸调税。

由于每个人承担的税率不可能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锐减为玄宗时代的三分之一左右。之所以叛乱前后人口差别那么大，并不是战乱中死了这么多人，而是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许多人游离于政府的户籍统计之外了。

“安史之乱”对唐帝国的打击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大的打击在于切断了唐帝国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

唐朝一代，行政中心仍然是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今陕西地区），而经济中心则变成了东南方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扬州是唐代运河的南方起点，南方的粮食都汇集到这里，再通过运河转运到汴州（今开封），从汴州沿黄河、渭河到达长安，或者走黄河、洛河到达洛阳。

安禄山从范阳（今北京附近）起兵南下，占据了中原地区，逐渐切断了首都长安（行政中心）与东南地区（经济中心）的联系，东南的粮食无法到达长安了。所以，战争爆发后，首先破坏的是中央政府的财政动员能力，让它无法利用帝国的物资来供养军队，对抗叛军。

在安禄山的逼迫下，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他的皇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称帝，决心平叛，是为唐肃宗。

在肃宗的领导下，唐帝国进行了一场财政上的生死时速。随着中央财政收入减少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而军费开支却比之前还要庞大，唐肃宗必须抛开所有的顾虑，想尽一切办法从能够控制的区域内搜刮财政。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公元756年肃宗即位后，首先想到的是从商业上寻找补贴。在此之前，唐代的税收主要针对农业，叫租庸调制，也就是对土地收取一定的租税，再对农户收取“调”（农产品税，以麻布和丝绸为主），并征发每年二十天的“庸”（劳役）。[10]

对商业，唐政府一直采取开放的态度，商业税的税率很低，且不是主要税种。正因为此，唐代的商业一直比较发达。

为了支付军费，肃宗派遣御使郑叔清前往还效忠于中央政府的江淮、四川地区，一次性向富商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资产税，即率贷。除了这两个地区，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其他区域也在集市和关卡向商人征收贸易税，凡是一千钱以上的货物都必须缴纳。[11]

对商人征收重税，是唐代税制变化的初步尝试。

但对商人的临时性征税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事开支，皇帝必须另想办法。这时，一位叫作第五琦的官员出现了，他建议设立一个新的职务：租庸使。[12]租庸使坐镇经济上最富庶的江淮地区，责任就是寻找一切税源，比如吴地的盐、蜀地的麻和铜。租庸使征收完毕，并不直接将盐、麻和铜运送到朝廷，而是就地卖掉，换成土特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卖高价。

由于史思明已经占领了运河枢纽，中央政府的物资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运河和黄河运来了。于是，中央政府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从长江走汉水到襄阳，再从襄阳继续走水路到汉中，从汉中走陕西的凤翔。[13]这条水路难度大，运力小，所以换成土特产可以降低重量，既减少了运输成本，又多卖了钱。

租庸使的出现又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原本唐代的正式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各位官员各司其职，但皇帝由于临时性的需要，利用租庸使绕过了正式官员直接办事，就破坏了政治制度。从这以后，各种各样的“使”职大批出现，这都是皇帝为了避开三省六部而设立的事务性官员。到最后，政府的权力反而转移到了这些人手中，将正式官员晾在了一边，造成了庞大的冗员和办公效率的低下，从而加剧了财政的困难。

唐肃宗之后，唐代掌管经济的使职官员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旧唐书》列出的有：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等等。每一个使职都拥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由皇帝直接授权，超乎正规的官僚体系之上。[14]

但仅仅依靠商业税仍然无法满足政府的需求。第二年，在郑叔清和宰相裴冕的提议下，唐肃宗开始卖爵。人们只要向政府交钱，就可以得到皇帝颁发的证书，被授予一定的官勋称号。除了卖爵之外，朝廷还贩卖一切有变现价值的证书。比如，唐代已经实行了科举制度，考生考取后就有了相应的出身，在未来可以做官或者获得社会地位，在唐肃宗时代，人们只要交钱就可以获得明经科出身。

唐代对和尚、尼姑和道士的数量都有严格的限制，因为他们都是免税的，每个僧人都要持有经过中央政府认可的度牒。唐肃宗出卖度牒，凭空增加了许多僧道。对于商人阶层，肃宗则向他们贩卖免役权，免除他们的徭役。[15]

这些做法无不是短期行为，会导致长期的问题。不仅会让许多不合格的人挤入官僚队伍，同时，免税、免役权还会让政府丧失更加长远的财政收入。

唐肃宗借助回纥人收复了两京。然而，皇帝发现财政支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他不仅要养活唐代的军队，还要补贴回纥人。

此刻，全国各地的人都跑到朝廷来要钱。唐肃宗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从小养在十王宅中，每天都为躲过宫廷的各种阴谋诡计而战战兢兢，没有机会接触政治的实务层面。战争时期的混乱已经令他精疲力竭，他发现卖僧牒的收入刚刚入库，各种将领纷纭而至，一下子把钱抢得一干二净，不管如何拼命地寻找财源，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唐朝廷的财政储备一般是放在一个叫左藏库的仓库里，财政支出和监督有着严格的规定。平常由太府掌管，由尚书的比部审核。皇帝只是过一段时间接到一次汇报，却无法控制具体的每一笔开支。第五琦看出了皇帝的恐慌，建议将帝国的财政库藏从左藏库移走，送进皇家的大盈

库。

大盈库一般是作为皇室生活开支的，皇帝更加容易控制。皇帝将国库“私有化”，这进一步破坏了唐代的财政系统。[16]

与政府财政私有化同时进行的，还有第五琦推出的两项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实行货币贬值和建立国有企业。这两项措施终于破坏了唐代初期宽松的经济氛围，回归到汉武帝时期的传统。然而，这两项改革又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当唐代政府损失了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之后，不能仅靠卖爵、搜刮等短期手段来解决长期的财政问题，必须系统地寻找到大规模的财源，来对冲土地和户籍税的下降。

在唐肃宗之前，除了高宗时期短暂打过货币的念头，大部分的唐代帝王都尽量保证官铸货币的足值，维持价格体系的稳定。肃宗之前，社会上唯一流通的官方货币叫“开元通宝”，每一千枚重六斤四两。

为了获得额外的财政收入，肃宗新发行了一种货币，名称是“乾元重宝”，这种钱的重量是千枚十斤，面值却是开元通宝的十倍。也就是说，通过发行新币，将货币贬值了六点二五倍。

第二年，肃宗再次出手，发行了千枚重二十斤的“重轮乾元钱”。这种钱有两道边，每枚价值开元通宝五十枚，在乾元重宝的基础上，再次将货币贬值了二点五倍。

货币的贬值造成了物价飞涨，开元通宝钱也在市面上迅速消失，一部分被藏在家里舍不得用，另一部分被人拿去熔化掉，再偷铸成重轮钱和乾元钱。

社会价格体系的混乱，迫使肃宗不得不屡次调整货币的币值。

由于开元通宝的价值被低估，他第一次调整了币值，规定一枚开元通宝价值十文，而一枚乾元重宝价值三十文，一枚重轮钱价值五十文。

这时候，“文”这个货币单位第一次被虚化了。以前，每一枚货币就是一文，可现在流通的三种钱，最小的开元通宝也价值十文，却没有代表一文的货币。人们第一次有了文是货币单位，不是货币本身的概念。

这次币值调整引起了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各地的铜器都被人们拿去偷偷铸钱了。京城更是达到了人人偷铸的程度。为了防止私铸，官府四处抓人。郑叔清当京兆尹时，曾经一个月内杀了八百人，都无法止住这股风潮。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肃宗皇帝再次做出稳定币值的努力，将三种钱的币值分别改为十文、十文、三十文，但混乱依旧。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肃宗死去，他的儿子代宗继位。代宗继位后，首先将改革的矛头对准了父亲定下的货币体系。他下令将开元钱和乾元钱等值流通，并废除了重轮钱。

代宗的改革得到了民间的配合，很快，乾元钱和重轮钱都退出了流通领域，只剩下开元通宝继续流通。民间经济暂时从金融混乱中走了出来。

初唐和盛唐时期是少有的商业开明时期，中央政府不设立国有企业，不参与盐铁的经营，只收取一定的税额。

到了肃宗时期，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将财政增收的目标定在了盐业上。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新盐法推出，政府下令垄断产区，招收游民开采盐业。开采的盐由政府统一收购，不准私卖。后来，随着“安史之乱”的平定，第五琦担任了各州的榷盐铁使，在全国范围内（中央政府还能够管辖到的区域内）实行盐的专卖。

盐铁专卖是肃宗财政聚敛中最成功的改革。在专卖之前，每斗盐只值十文钱，专卖之后涨到一百一十文，整整上涨了十一倍，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

更为夸张的是，随着对私盐打击的加强和各种官僚机构的不断庞杂，盐的价格还将进一步上升。到了代宗时期刘晏掌管盐铁事务时，盐的批发价最高已经达到三百七十文，而零售价格还要高一倍。

当然，随着盐业专卖、缉私等制度的常态化，盐业收入中很大一部分都消耗在了制度上，并没有作为中央财政收入用到实处。否则，盐业在国家财政中的占比还会更夸张。

与汉代相比，唐代的冶铁业过于发达。从技术上，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再垄断经营，基于这个原因，这个行业没有出现垄断。

唐肃宗死后，“安史之乱”已经进入尾声。唐代宗继位后，开始考虑帝国财政的正规化问题。

代宗所面临的局面仍然复杂，由于在镇压“安史之乱”中大量使用回纥兵，政府必须对回纥人进行安抚，每年送马十万匹、锦帛百万匹。在他的任上，吐蕃人也乘机从西藏进入了青海、新疆、甘肃一带，甚至在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占领长安长达十五日。[17]加上皇帝无法掌控领土内所有的土地资源，政府的开支仍然紧张。

但与他的父亲不同，代宗更注重财政的可持续性，除了吐蕃入侵京城的短暂时期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实行劫掠式的财政措施。

他放弃父亲所有失败的改革措施的同时，把当年成功的改革措施保留了下来，甚至推行到了极致。肃宗发现的两位理财天才——第五琦和刘晏，也是代宗理财的左膀右臂。

代宗的改革重点落在两个方面：加强专卖制度，加强对土地税的开发。

代宗任用了刘晏来管理盐业垄断。[18]刘晏借助民间资本，建立了一条官僚资本的产业链，由政府垄断源头，再由官商资本贩运到全国各地，政府则为这些大资本提供免税待遇。两者的勾结使得政府把对盐业的控制权延伸到了全国各个角落。

在刘晏任上，政府的盐利从一年四十万缗涨到了六百余万缗，增长了十五倍，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从宫廷开支到军饷、百官俸禄，都要依靠刘晏的盐业。[19]

除了盐之外，代宗还逐渐建立了酒业专卖，唐代的专卖制度进一步复杂化。

在建立专卖制度的同时，唐代宗在土地税上的开发上也没少动脑筋。[20]

在“安史之乱”前，唐代的税制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著名的租庸调制，另一部分人们了解很少，叫地税和户税。

租庸调制是依据人民的户口来征税的制度。唐代有着严格的户籍系统，一个人一生要享受一次政府分配土地的待遇，而他的户口就落在分配土地的地方。原则上来说，一个人不能离开户籍所在地，每年都要在这里纳税。

但随着战争爆发，许多人都流亡到了其他地方，而一个人就算到其他地方住下，由于户籍还在原地，也不需要缴纳租庸调税。

由于户籍混乱，唐代宗更看重以居住地和土地来纳税，加强了地税和户税系统的管理。

在唐代宗时期，地税的税率比“安史之乱”前增加了五倍。在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期，地税的税率是每亩二升，但是到了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政府试图在关中推行每亩收成十分之一的新税率，四年后，又确定为好地每亩一斗（十升），坏地每亩六升。过了一年，每亩又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一升。

除了地税，户税系统也增加了至少一倍。

除地税和户税之外，还有许多苛捐杂税，最典型的是青苗税。每年庄稼还只是青苗时，政府最初每亩收十文，到后来变成每亩收十五文、三十文。

通过对土地和户口加税，以及政府垄断经营，代宗逐渐恢复了脆弱的财政平衡。然而，这种平衡是如此脆弱，禁不起折腾，而它面对的，却是强大的藩镇势力和复杂的国内环境。

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继位。

此时的大唐帝国已经变成了一具陌生的躯体。这个躯体曾经属于一

个中央皇朝，而现在则四分五裂，缺乏统一的指挥。

“安史之乱”前，（藩镇）节度使只存在于边境地区，是为防范外族入侵而设的。但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皇帝为了防止叛军占领更多的地盘，在内地也建立藩镇，授予节度使军政全权。

内地的节度使最多时接近五十个，每个节度使都是一个不受节制的土皇帝。

“安史之乱”前，唐代的地方行政结构是这样的：地方分成州、县两个级别，州有刺史，县有县令，他们是负责地方行政工作的主要官员。而州县的下属官员主要由中央政府任命（在汉代是由郡县长官任命下属官吏，这是唐代和汉代的区别，也向进一步集权迈出了一步），以防止州县长官拥有过大的权力。

后来，政府又设立了十到十五个道，[21]每个道设置一个观察使，但这个观察使并非行政官员，也不负责地方行政工作，而是监视州县官员有没有违法乱纪。

政府在各地还有一定的驻军，归都督府管辖（相当于现在的军区），都督府可以协调周围的州县资源，但不得干涉地方事务。

而藩镇节度使就相当于兼有观察使的监察职能、都督府的军事职能，同时还有管辖几个州的行政权。有的节度使还拥有任命下属州县官吏的权力。当军事、行政和监察权都集中于一人，这个人还拥有任命官吏的权力时，他就等同于一个小规模的皇帝了。[22]

这些藩镇节度使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各有不同。东北地区（今河北、北京一带）的几个藩镇的节度使都曾经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将领，唐军将领仆固怀恩在扑灭史思明叛乱的过程中，允许他们投降朝廷。[23]但事后，给他们保留了节度使的职务。

这几个节度使由此获得了东北地区的军事行政大权，几乎完全独立于朝廷，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而江南地区的藩镇节度使则更加拥护中央，但前提是：中央必须默许他们有很大的财政自由度，可以截留大笔税收。

另外，各个藩镇招募了大量的军队，军费开支成为藩镇和中央政府财政的重头戏。

唐代中央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区域是：从西北的甘肃，到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再到河南南部，结束于江南、岭南一带，呈一个长条形。而河北、山东、北京的大片地区，以及淮西地区则游离于中央之外，甚至形成了节度使的世袭制。

这种结构对中央政府最大的打击在于财政方面。虽然皇帝规定了更加高昂的税额，但这些税大都到不了中央政府的手中。当时的税收一部分需要留在州政府，也就是州刺史收税后，提留下来用于本州的行政花费；一部分则交给节度使，供他养兵之用；最后一部分才上缴中央。经过层层盘剥之后，中央政府所能利用的资金就很有限了。

除了经费不足之外，中央政府手中的军队也不足，除了有一支比较精良的神策军之外，其余的部队几乎都不能打仗。如果有征伐，必须依靠其他藩镇贡献军队。如果中央政府征调了藩镇的军队，还必须提供军事补贴（出界粮），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代价高昂。

为了节省财政，皇帝甚至连好衣服都舍不得穿，一件衣服要洗染好几次。即便如此，皇帝的财政收入仍然无法满足一次大规模的军事需要。

总结起来，唐代宗留给儿子的财政遗产是：

第一，管理财政的官僚系统出现了更迭。[24]以前的财政机构主要归属于户部，而现在户部已经靠边站了，整个中央财政控制在两个名称古怪的使职手中。东都洛阳以及整个帝国的东南部地区归转运使管辖，而西京长安以及整个帝国的西部地区由度支使掌管。担任这两个使职的就是刘晏和第五琦。两个人通过发现任何赚钱的机会，帮助中央政府创造收入。

而财政系统中，唐初的租庸调税已经萎缩，战争中形成的盐业、酒业专卖正在扩大，加上唐代宗逐渐摸索的地税和户税，构成了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

第二，中央政府虽然收不到钱，但人民缴的税并不低。由于藩镇割据，加上地方的州县吏治恶化，这些机构截留了太多的税收，民间被压榨得很厉害，但中央政府并不了解民间经济的苦楚。

第三，藩镇虽然不愿将正规的税收交给中央，却又乐意为中央政府提供额外的“上贡”。这就像老板不愿意给职工涨薪水，却喜欢时不时发奖金一样。各种名目的月供、年供源源不断地送往长安。“上贡”对于藩镇是有好处的，因为每上一笔贡，藩镇都会以此为借口向民间进行一次额外的摊派，多一个名目收钱，最终民间要承受几倍的代价。

虽然皇帝知道财政走到这一步，既无法维持，也代价庞大，却又因为离不了地方的贡品，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

通过这种弊病丛生的税收系统，在代宗离世时，中央政府达到了暂时的税收平衡。但是，每个人都清楚，这种状况不会维持长久，势必改变，不是向好，就是向坏。

公元780年，新皇帝登基时，大家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他的祖父肃宗保住了唐王朝的国祚，而父亲代宗则完成了平叛，并初步恢复了稳定，到了德宗，会将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贯彻中央集权，达到永久的平衡，恢复大唐的稳定和繁荣。

但是，德宗皇帝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呢？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

唐德宗上台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

德宗首先废除了皇室一系列的奢侈消费。代宗虽然生性节俭，但因为相信佛教，在宗教支出上从来不知节省，他又喜欢人们上供，许多人借着上供的名义来讨好他。

德宗在太极殿继位后的一个月内，下了至少七道圣旨，禁止了一系列的进贡。这些贡品五花八门，包括东北（新罗、渤海）的鹰鹞、山南的琵琶、江南的柑橘、剑南的春酒，以及各地的奴婢、其他的珍禽异

兽，等等。他还撤销了皇宫里管理戏子的机构，戏子被解散，一百多名宫女被送回家，就连皇宫里的三十二只大象也送归了山林。[25]

在他父亲任上，宦官已经逐渐居于重要地位。德宗对待宦官也毫不手软。他继位不久，宦官邵光超借着去淮西出差的机会，收了淮西节度使留后（即代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七百匹绸缎。德宗发现后，打了邵光超六十杖，并发配充军。从此以后，宦官再也不敢胡作非为。[26]

之后，德宗皇帝撤销了不必要的朝廷食客机构，削减宫廷开支，严令中央官僚不准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废除酒类专卖。

此时，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形象已经浮现，如果这种势头继续下去，那么，人们可以期待又一次的中兴。毕竟，德宗时代距离玄宗盛世不过只有三四十年而已，人们太渴望社会的复兴了。

德宗皇帝并没有让人们失望，接下来的改革更加关键，也更加显示出皇帝的雄心。

在唐德宗上台的第二年，他采纳了宰相杨炎的提议，推出了影响深刻的两税法，对唐初的租庸调制进行了彻底改革。两税法，是指每年的税分夏天和秋天两次缴纳。[27]

后世往往夸大了两税法的意义，认为这是政府税收从“对人收税”转变到“对土地收税”，也就是按人头收税变成按照土地额来收税。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两税法仍然要同时统计人口和土地。

两税法的实施，主要是因为先前的租庸调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实施，已经积累了太多的问题，无法清理了。

租庸调制包括三部分：地租（租）、劳役（庸）和家庭手工业品（调）。在缴纳时，是根据家庭来缴纳的。

每年，地方政府都会组织调查，给新生人口分一块土地，把已亡故之人的土地收回，统计一个家庭有多少亩需要纳税的土地，有几个可以服劳役的年轻人，要缴纳多少布或者帛。这些统计数据就成了纳税的依据。

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政府已经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分配，而那些该缴回土地的家庭也不愿意上缴土地，土地数据失真。由于人们不愿服役，人口数据也出现了混乱。[28]

唐代的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就是百姓分配土地的地方，如果此人移居别地，需要登记为客户。按照规定，主户需缴纳租庸调税，而客户不需要缴纳。于是，许多人把手里的土地卖掉，搬到了其他地区，就不需要再缴税，而购买土地的人也将土地隐藏起来，没有登记。这就造成了税收的大量流失。

在杨炎的两税法中，不再区分主户和客户，也不再区分土地的性质。政府只确定人们现在的居住地和拥有的土地数量，以此作为纳税的依据。当然，政府以后也不再承担分配土地的责任。

税种则分为户税和地税。所谓地税，就是按照每户拥有的土地数量缴税。所谓户税，是一种财产税，统计每户的财产多少，按照一定比例纳税。

在制定财政计划时，政府是以公元779年（也就是两税法前一年）的税收额度为参考基准的。中央政府根据这个额度制定财政计划，分摊给各个地方。

这就类似于包税制：地方负责征税交给中央。中央要求的额度是一定的，地方政府可以多征，把剩下的留给自己，只要中央额度得到了满足，皇帝就不管地方的行为。这种做法保障了中央政府每年的岁入。

按照分配，中央政府每年可以得到钱九百五十万缗、米一千六百万斛，地方政府可以得到钱二千零五十万缗、米四百万斛。[29]

两税法的实施并没有让民间经济有根本性的好转。由于一系列折算的问题，加上地方层面的征税失控，农民的税收可能已经达到了初唐的十几倍。[30]但两税法的意义在于，中央政府由此得到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中央政府的话语权大大加强。

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那么唐德宗距离恢复中央政府控制力的梦想，又更近一步了。

但就在这时，情况出现了逆转。过于心急的唐德宗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削藩。

唐德宗本应该等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加巩固时，再着手对付地方的藩镇势力。

要削藩，必须做好武力准备。而政府要发动战争，必须给人民留下足够的休养生息时间，也必须等大家都适应了新的税收体制，让粮食和金钱塞满仓库。在曹魏和西晋决定南征时，首先考虑的都是粮食储备问题。但在唐德宗时代，事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皇帝的控制。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两税法实施的第二年，成德（位于今河北和山东境内）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在河北一带，一共有四大节度使拥兵自重，都是“安史之乱”时期投降中央的叛乱将领，也是中央政府的大患，他们掌管的藩镇是成德、魏博、淄青和卢龙[31]。德宗如果要削藩，首先就要对这四家下手。

按照代宗时期留下的惯例，对于这些地位显赫的节度使必须给予安抚，默认他们的世袭权力，当老节度使死去后，朝廷就任命他指定的接班人（一般是儿子）来担任新节度使。

但这一次，德宗决定采取强硬的态度，拒绝任命。

德宗的拒绝迫使成德与附近的魏博、淄青联合起来，向朝廷宣战，参加叛乱的还有远处的山南东道，一共四镇。

为了对付四镇叛乱，唐德宗动用的武力除了朝廷控制的神策军，还包括周边数个藩镇的军队。神策军需要军费，而藩镇武装等着补贴，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得花钱，这就变成了一场财政的消耗战。

然而，掌管财政支出的度支杜佑却给出了悲观的估计，认为当时朝廷的财政储备只够几个月的军费。[32]

如果德宗能够等几年，等朝廷的府库更加充足，也许削藩的过程将更加顺利。可现在，一旦缺乏军费，皇帝必须重开敛财的门路。

杜佑认为，为了再多支撑半年，必须向长安的商人借五百万缗钱。于是朝廷命令户部侍郎赵赞筹措借钱，虽然约定战后归还借款，可是没有人相信。在朝廷官吏的巨大压力下，有的人受不了压榨而自杀。但就算这样，整个长安也只凑了八十万缗，距离目标数额还差很多。

为了继续搜刮，唐德宗开征货柜税以及粮食贸易税，最高税率达到四分之一，整个长安抗税罢市。市民们出动守住路口，拦住宰相哭诉。可政府仍然征收了二百万缗。

当首都宣布征税时，地方也行动了。最先加税的是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加税的幅度是百分之二十，德宗下诏全国推广。

除了直接从市场上抢钱之外，德宗又打起了常平仓的主意。常平仓就是官府调节粮价的仓库，丰年时低价收购粮食，歉年时加一点价平仓卖出，相当于赈济百姓。但这类的平准制度看上去很美好，实行起来却总是出现大量的粮耗子把常平仓偷盗一空，而最大的粮耗子不是别人，正是皇帝和政府。

在德宗之前，全国的常平仓已经被政府偷空过几次，到了德宗时要征收一些特别税来重建常平仓。现在由于打仗缺钱，正好把里面的粮食拿走吃掉。[33]

再后来，赵赞又想出了新办法：除陌钱和间架税。除陌钱的税率，以前是每发生一千钱的交易额，就缴二十钱的税，而现在增加到了五十钱。所谓间架税，就是房屋税，官员挨家挨户去数房间，每个房间都要交税，上等间两千钱，中等间一千钱，下等间五百钱，隐匿一间打六十杖。[34]

唐代的城市里有许多破落户，祖上发达时购买过许多房子，家境衰落后，所有的动产和现金已经没有了，但房子还在。政府征收间架税时，这些破落户首当其冲，成了受害者，他们其实已经很穷，但因为房屋众多，成了缴税大户。许多人为了完税被逼得自杀。[35]

在社会被财税压垮的同时，皇帝的削藩过程却一波三折，越拖越长。

最初，皇帝的部队占了先机，几乎降服了叛乱的藩镇。然而皇帝错估了形势，没有及时收手。他没有意识到财政的脆弱，一旦和平无法维持，不仅社会受不了，中央也无处再征收更多的钱了。

皇帝的强硬让本来与中央政府联合的幽州节度使朱滔也担心了，他害怕皇帝胜利后会对付自己。于是幽州反转矛头，加入了叛乱的一方。幽州是东北方最强大的藩镇，它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实力对比，还让唐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

更使形势雪上加霜的是淮西藩镇。淮西地处运河要道，是中央政府获得南方粮食的枢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曾经帮助中央政府打败了反叛的襄阳，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这时终于也参加了叛乱。淮西的叛变让中央政府的江南粮食供应彻底中断。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围攻襄阳，唐德宗的兵马还在北方，只好命令泾原节度使率兵前去救援。由于中央政府已经没有钱进行补贴，泾原士兵发生了叛乱，攻克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

直到公元786年，整个叛乱才归于平静。

在战争中，除了皇帝感到精疲力竭之外，各个藩镇也已经力不从心了。

当叛乱的藩镇离开了自己的地盘时，突然也发现财政问题难以解决。在自己的地盘上，筹措粮食都是现成的，可一旦进军长安，就等于是实行远距离打击，后勤工作必须跟上，否则就会进入衰退期，直至被消灭。

中央政府无法消灭藩镇，而藩镇也无法消灭中央政府。两者是一种共存关系，剩下的只是如何认清形势，寻找一个平衡点。

当唐德宗认清形势，递出了赦免的橄榄枝时，藩镇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也发现要么接受这个台阶，要么慢慢地消耗直至灭亡。两相妥协，局势再次恢复了平静。只是，这次战争的代价实在太大。叛乱后中原遍地士兵，养兵费用失控，大量的人口逃籍，户口减少了三分之二

[36]，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随着户口的减少，两税法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这个税法的成立，需要足够数量的人数来支撑。由于帝国征收的总税额是不变的，如果一个人逃走了，那么他的税额要由其他人平均承担。全国户口少掉三分之二，意味着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税负要增加三倍。

税负的加重让更多的人逃亡，而逃亡的人越多，剩下的人税负就更加沉重。这个恶性循环抑制着经济的发展。

关于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一清二楚。这些事也曾作为议题被多次讨论，但都因为财政的原因被束之高阁。

政府讲道理时只在它缺乏税收时，而讲道理的唯一方式就是加税。

沦为守财奴

当战争结束时，唐德宗一生的悲剧已经注定。

他曾经想重振帝国，重新建立可靠的财政制度，成为中兴的明君。但刚刚开了个好头，就被现实击得惨败。

叛乱之后，他回到长安，感慨着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他曾经试图信任大臣，却发现他们在关键时刻都离他而去。他曾经试图清除宦官，却发现落难时只有窦文场、霍仙鸣等几个宦官紧紧相随。[37]他曾经试图让皇室府库充盈，可在逃难时却连给士兵买衣服的钱都没有。

他意识到，真正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做好财政准备就贸然发动了攻势。于是，他用整个后半生去弥补这个错误。他不再管什么正规财政手段还是非正规财政手段，只要能给他带来金钱的都是好的。

他曾经拒绝各地藩镇的贡献，因为他知道，藩镇每贡献一分，就会从民间压榨三倍到五倍的财富。但现在，他对任何贡献都敞开大门。各个地方给皇帝的贡品络绎不绝，节度使们有的日进，有的月进，还有的故意把正税算作给皇帝的私人进贡。皇帝都当作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

人们给他带来了多少钱。[38]

有的人假托皇帝密令增加课税，或者克扣官饷，加收关税、丧葬税、蔬果税。但只要能够分得一杯羹，德宗都欣然接受。[39]

为了增加收入，德宗还派宦官作为宫使（皇帝的使者），以几乎白拿的价格来买东西，还要向人们索取各种好处。只要这些宦官出动，就会吓得街上的商户纷纷逃走、关门。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卖炭翁》所写的就是德宗时代的宫使，在诗中，皇帝的宦官以“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价格，拿走了卖炭翁的千余斤炭。

德宗曾经取消过酒类的专卖，可是到了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他却下令对茶叶征税，只是因为每年茶税能够给政府带来四十万贯的收入。他后面的皇帝则借鉴他的方法，干脆对茶叶实行了专卖。[40]

也正是在德宗时期，宦官进一步得势。皇帝不信任外朝的大臣，不敢把手里唯一的军队（神策军）交给大臣，只能重用宦官，让他们指挥军队。[41]同时，德宗还派出宦官当监军使，去监督地方的军事力量。即便是各个藩镇，也要给这些宦官面子，任由他们大发横财。

唐代后期，宦官问题愈加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无法驾驭整个官僚体系，只能倚重身边人进行统治。德宗对于官僚体系和财政体系的放纵留下了无数的隐患，但即便换一个人也很难做得比他更好。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贪财吝啬的皇帝竟然积攒下了庞大的家底，唐代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当这个家底传到他的孙子唐宪宗时，宪宗竟然能利用它完成一次中兴，将主要的藩镇势力一一降服。

历史将掌声送给了宪宗，却没有人意识到他将德宗留下的家底再次耗空，造成了唐王朝的最终衰落。历史将嘲讽留给了德宗，却没有意识到有了德宗的吝啬和抠门，才有了宪宗的武功。只有想到了这一层，我们才会对这个古怪的老皇帝多一分同情，理解他的无奈和苦心。

有人认为，唐德宗之所以这么窝囊，并不怪他本人，而应该怪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正是玄宗皇帝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导致了“安史之乱”。战乱之后，无论谁都无法控制局势了。

在唐玄宗时期，帝国的财政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玄宗不止一次受困于财政的不足，想出了种种方法去化解。而藩镇制度就是他想到的方法之一，只是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灾难。

但人们在责怪玄宗时，也应该看到，玄宗时期财政问题的根源在于更早时种下的祸根，甚至唐代一诞生，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结局。

唐初，统治者继承了北魏、隋代的传统，设立了土地公有制，建立了一套过于复杂的财政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制度变得千疮百孔，让每一个皇帝都头疼不已。

北魏最早建立的土地公有制传统，跨越了朝代的界限，造就了唐代这个财政失控的中央帝国。一次“公有制”实验，将它的影响传到了数百年之后……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779年—公元805年。

[2]见《旧唐书·德宗纪》。关于唐代的正史一共两本，其中《新唐书》以思想和结构见长，《旧唐书》纪事虽然拖沓啰唆，却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材料。本书在引用传记时多参考《旧唐书》，但引用各志，则优先考虑《新唐书》。

[3]《新唐书·食货志二》：“是时，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亿。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旧唐书·德宗纪》：“凡诸道之军出境，仰给于度支，谓之食出界粮，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

[4]《旧唐书·姚令言传》：“泾师离镇，多携子弟而来，望至京师以获厚赏，及师上路，一无所赐。时诏京兆尹王翃犒军士，唯粝食菜啖而已，军士覆而不顾，皆愤怒，扬言曰：‘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

[5]《新唐书·食货志二》：“赵赞复请税间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为间，上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匿一间，杖六十，告者赏

钱五万。除陌法：公私贸易，千钱旧算二十，加为五十；物两相易者，约直为率。而民益愁怨。”

[6]见《旧唐书·德宗纪》。

[7]德宗前期想除掉宦官揽权的弊端，但在统治后期，由于不再信任大臣，却唯宦官是听，造成了整个中晚唐宦官专权的局面。

[8]从附录表2，见《通典·食货七》，但需指明，各典籍记载数目略有差异。根据《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三载，户部见管州县户口：“管郡总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四不课，五百三十万一千四十四课；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不课，七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课。”

[9]见《通典·食货七》。

[10]《新唐书·食货志一》：“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

[11]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12]见《旧唐书·第五琦传》。

[13]《新唐书·食货志三》：“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于是阻绝，租庸盐铁泝汉江而上。”

[14]《旧唐书·食货志》：“开元已前，事归尚书省，开元已后，权移他官，由是有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随事立名，沿革不一。”

[15]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16]《新唐书·食货志一》：“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17]见《旧唐书·吐蕃传》。

[18]见《旧唐书·刘晏传》。

[19]《新唐书·食货志四》：“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20]以下讨论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21]《新唐书·地理志》：“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开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采访使，检察如汉刺史之职。”

[22]见《新唐书·兵志》。

[23]见《旧唐书·仆固怀恩传》。

[24]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25]见《旧唐书·德宗纪》。

[26]见《旧唐书·德宗纪》。

[27]《新唐书·食货志二》：“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田税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

[28]《新唐书·食货志一》：“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

[29]见《新唐书·食货志二》。

[30]在公元779年定基准时，政府采用的是以金钱折算的方式。人们缴纳的是实物（米和粟），可在统计时，按照市价折算成钱币，以钱币的数字作为未来税收的基准。而在未来的年份缴税时，又要将钱币按照当年的市价折算成米和粟，农民们真正缴纳的，还是以实物为主。不幸的是，公元779年恰好是粮价昂贵的一年，所以算出来的以钱币计价的税额很高。这一年过后，粮价一路下跌，加上政府故意压低价格，农民们缴纳的实物实际上已经是当年的好几倍。两税法实施时，其税率就已经是唐初的数倍，中唐时期的税率之重，可能已经是初唐的十几倍了。

[31]成德节度使治理恒州（今河北正定）、冀州（今河北冀州）、赵州（今河北赵州）、深州（今河北深州），魏博节度使治理魏州（今河北大名）、博州（今山东聊城）、相州（今河南安阳）、贝州（今河北清河）、卫州（今河南辉县）、澶州（今河南濮阳）。淄青节度使治理山东中部和东部半岛地带。卢龙节度使治理今北京、天津及周边的河北地带，直到辽宁辽阳。四藩镇的事迹见《新唐书·藩镇魏博传》《新唐书·藩镇镇冀传》《新唐书·藩镇卢龙传》《新唐书·藩镇淄青横海传》。

[32]《新唐书·食货志二》：“德宗以问度支杜佑，以为军费才支数月。”

[33]《新唐书·食货志二》：“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玄宗即位，复置之。其后第五琦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畜本钱。……属军用迫蹙，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

[34]《旧唐书·德宗纪》：“至是又税屋，所由吏秉笔持算，入人庐舍而抄计，峻法绳之，愁叹之声，遍于天下。”

[35]《旧唐书·食货志》：“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其苦。”

[36]《新唐书·食货志二》：“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

[37]《旧唐书·宦官传》：“窦文场、霍仙鸣者，始在东宫事德宗。初鱼朝恩诛后，内官不复典兵，德宗以亲军委白志贞。志贞多纳豪民赂，补为军士，取其佣直，身无在军者，但以名籍请给而已。泾师之乱，帝召禁军御贼，志贞召集无素，是时并无至者，唯文场、仙鸣率诸宦者及亲王左右从行。志贞贬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场主之。”

[38]《文献通考·国用考》给出了德宗皇帝后期执政最好的图景：“初，德宗居奉天，储蓄空窘，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朱泚既平，乃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他如杜亚、刘赞、王纬、李锜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馀，至代易又有进奉。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二三，无敢问者。刺史及幕僚至以进奉得迁官。继而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生民重困，又为宫市。”

[39]《新唐书·食货志二》：“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

[40]《新唐书·食货志四》：“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兴利者益进。贞元八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

[41]见《旧唐书·宦官传》。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1]

中国历史上影响唐宋的一次著名改革，发生在北魏时代。北魏在冯太后与孝文帝的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建立起土地公有制。这种制度通过北魏传承给了西魏、北周，之后被隋继承，并最终成了唐代的制度样板。

北魏土地革命的核心是分地。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由政府分配一块土地，到他死后，由政府回收土地。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有制，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继承权。

土地公有制是一种极易退化的制度，因为农民们并不乐于在死后将土地还给政府，他们的子女往往对父母的死亡隐瞒不报，私藏了土地。北魏的直接继承者北齐就由于无法查清土地数量，出现了财政不足，而北魏的旁支继承者北周由于建立制度较晚，土地清查更彻底，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一点决定了双方的成败。

隋代速亡之谜实际上是一场“大跃进”运动。隋文帝取代北周后，建立了一套严苛的土地和户籍制度，要求对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查清楚。隋文帝的喜好导致了官员们虚报土地数目，虚报数字最高时比实际数字高出了十倍以上。

由于征税机器太高效，加上官员的浮夸风，隋炀帝时，利用强大的征税能力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工程和战争，最终拖垮了民间经济。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是著名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丰收的一年。她不仅找到了推行改革的方法，还找到了一个美妙的情人。

太皇太后姓冯，出生于汉人家庭。中国古代对后妃的要求是贞淑沉

静，这和冯太后完全不沾边。太后情欲旺盛，权力欲极强。

她的丈夫文成帝拓跋濬在世时，夫妻恩爱，伉俪和谐。文成帝死时，皇后差一点自杀殉葬，幸亏人们将她救了下来。

但她不甘心做一个传统的寡妇，在辅佐养子献文帝拓跋弘的同时，在政治上，她干净利落地除去了权臣乙浑，临朝听政；而在感情上，她更是频频招纳情人入宫私会，丝毫不顾忌人们的闲言碎语。

献文帝实在看不下去了，借故诛杀了太后的情人李弈。冯太后大怒，逼迫十八岁的小皇帝让位给他虚岁五岁的皇太子拓跋宏，是为孝文帝。于是冯太后变成了太皇太后，献文帝变成了太上皇。

五年后，冯太后干脆杀死了献文帝，取得了对帝国的完全控制权。[2]孝文帝时期，冯太后的风流韵事仍然层出不穷，皇帝对此不仅不反对，还与太后的情人们和平相处，即便太后死后，也仍然善待他们。[3]

孝文帝时期，冯太后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4]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北魏实行了整顿吏治的班禄制改革。在这之前，北魏的中央官员都没有俸禄，官僚阶层依靠许多不正规的手段，如战争劫掠和霸占土地获得收入。随着战争的远去，官僚阶层没有了战利品，更多地依靠骚扰民间来获得收入。太后决定给官员发薪水，而发薪水的钱则来自民间征收的一笔特别税。

为了从民间征税，太后在第二年启动了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百姓去耕种，才能获得足够的税收。可是，分地进行得并不顺利。要给百姓分田地，必须掌握户籍资料。可是北魏的统治者还不知道怎么去统计和管理户籍，土地改革也就无法顺利推进，税收不能如期收缴，官员的俸禄无法落实。如果继续依靠劫掠式财政，那么北魏就称不上是一个文明的王朝，只是游牧部落的变种而已。

一位名为李冲的官员时任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上表提出了建议：如果要顺利推进一系列的改革，那么首先要建立起社会基层组织，在县以下设立三级村民机构，由这些机构负责基层的户籍和税收管理。

李冲容貌俊美，又满腹文采，让冯太后眼前一亮，她明白自己不仅

多了个好帮手，还有了个好情人。此后，李冲在太后的宠爱之下迅速上升为政治明星，他的建议也成了太和改制的有力收笔。这次改制代表着北方文明的重建，也是北方压倒南方的起始。

公元4世纪初，当南方的东晋和南朝政权苦苦挣扎于旧秩序之中时，北方的中原、关中、河北地区却处于五胡乱华之后的混乱时期。

胡人们只熟悉草原的规则，建立的国家与其说是政权，不如说是部落，原来社会中成熟的结构一一被打破、消灭，而新的结构只能从无到有地逐渐建立。

如同欧洲从中世纪逐渐向文艺复兴过渡一样，重建需要漫长的时间，但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北方摆脱了汉代之后长达八百年的制度累赘，可以不背历史包袱地重新设计一套新制度，轻装上阵。

北方的重建在前秦的苻坚时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苻坚任命了汉人王猛，引入了汉人的朝廷模式。然而王猛死后，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失败，前秦分崩离析，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巩固制度化的成果。[5]

北方的第二次重建属于孝文帝所在的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淝水之战三年后，鲜卑人重新建立代国。在此之前，这群鲜卑人曾经被前秦吞并，借着前秦崩塌的机会，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再次崛起。[6]

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制度是一种混合着游牧色彩和农耕文化的特殊模式。很多时候，统治者们仍然对牛马、乳制品有着特殊的偏爱，他们的官僚阶层与其说是官员，不如说是部落首领。

但是，随着与汉人接触日久，北魏的统治者们已经意识到，作为马背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放弃草原思维，学会新的农业精神。与北方的其他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不同，早期北魏的统治者虽然也以血统为傲，但他们很早就学习汉族人的经济发展方式，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试图建立稳定的户籍制度和耕作制度。

魏太祖在建国之初就在北方采取了屯田措施，生产粮食，保证军队的后勤供给。[7]为了鼓励农耕，他一方面做表率亲自耕田，另一方面将

战乱中空置的农田重新分配，并设立行政区划，尽快地发展农业。

太祖之后的历代皇帝也特别重视农业和户籍。世祖太武帝时期开始整理户籍，高宗时期有了中央官员巡查地方的制度，显祖时期则废除了除农业税之外的杂税，减轻了民间的负担。这一步步的措施反映出北魏统治下的北方社会从战时状态恢复到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孝文帝即位时，他的父亲献文帝已经是位虔诚的佛教徒，而云冈石窟也已经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开凿了十一个年头。北魏的官僚系统进一步成熟。这时，作为汉人代表的冯太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成了巩固制度建设成果的关键因素。

孝文帝活到了公元499年，他统治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改革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公元490年之前，冯太后在世时主持的，以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为主；另一阶段是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独自主持的，以汉化为主要特征的改革。

历史上对孝文帝的评价不一，因为这两阶段的改革是有分裂的。

虽然冯太后本人是汉人，她的措施却并不激进，都是切合实际、以解决问题为主的。

当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亲自主持的改革大都带有很浓的意识形态特征，比如改汉姓、穿汉服、禁胡语等。这些改革（除了迁都）虽然看上去很激进，却没有太大的必要性，还很容易造成北魏皇室的分裂。果然，在孝文帝之后，北魏的保守和改革两派分歧更加明显，最终造成了不可弥合的分裂局面。[8]

由此，北魏无力统一整个中国，将机会留给了继承者隋唐。而隋唐最核心的经济制度，在北魏一代就由冯太后设计好了。

延兴五年（公元475年），在太上皇献文帝还没有驾崩时，冯太后先导性的改革拉开了帷幕。由于北魏的地方官僚制度不够完善，各级政府都以搜刮的方式向民间摊派税收。县一级的政府负责收税，但是州和郡的政府也不时跳出来直接向人民征税。政出多头，意味着中央政府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财税体系。

冯太后下令，未来的税收只能由县政府征收，由其他级的政府监督调运中央，再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拨财政，供给各级政府使用。[9]

这次改革使得皇帝逐渐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财政规则。然而它引起的新问题是，当各级政府没有权力擅自征税，财政由中央统一调拨时，中央就必须把各级政府的办公经费、官员薪水都承担起来。

到这时为止，北魏的官员仍然没有固定的薪水。与后来的元代一样，朝廷的官员依靠战争和劫掠获得第一桶金，占领大量的土地，再把土地租出去获利，或者放贷实现财产增值。

冯太后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做法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官员们每天都在操心自己的财富，就无心为国家付出全力。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她推行了官员俸禄的改革。这次改革首先叫停官商勾结现象，“罢诸商人，以简民事”。让官员从掠夺和资产经营中退出来，由政府提供俸禄，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惩处那些劫掠、贪污的官员。[10]

不过，俸禄改革又引出了新的问题：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才有钱去发薪水。为此又要实行税收改革，政府向每户多增收三匹帛、二斛九斗粟的税，充作官俸。

北魏原来每户的税收为：帛二匹，绵二斤，丝一斤，粟二十斛，外加帛一匹二丈存在州郡库内，作为政府的户调外收入。政府收官俸税之后，调外费也加到了两匹。[11]

冯太后的做法，相当于要民间付出一定的代价，来换取官员不再随便掠夺经济，从而稳定社会环境。按照现代的说法，政府正式从“流寇”转化为“坐寇”。

由于俸禄改革牵扯到增税问题，如何扩大税基就成了太后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北魏时期，由于北方经济刚刚从战乱中恢复，许多土地都没有人耕种，而许多流亡的人们却没有土地可以耕种。

王莽、司马氏都曾经盼望着进行一次彻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私有

制废除，改为公有制和均田制。但可惜的是，在他们的年代，由于土地关系错综复杂，改革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而北魏的统治者最初并没有想到要进行改革，只是，北方特殊的状况，反而给了他们进行彻底改革的舞台。

北魏时期，由于游牧民族刚刚在中原定居不久，对于汉文化充满了憧憬和敬畏，而汉代所整理的儒家典籍更是被他们奉为圭臬。所以，汉儒们理想中的土地公有制和均田制歪打正着地在游牧民族手中复活了。

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大臣李安世建议，由政府主导土地改革，将天下的土地分配给人民。[12]为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政府规定：男子年满十五岁，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四十亩的露田，女子减半，另外，每户凡拥有一头耕牛可以得到三十亩土地，但每户的上限是四头耕牛，超过此数，再多的牛也不增加授田了。另外，考虑到土地轮作制，可以多授一倍的田用于土地轮休。受田人去世后，政府将露田收回，授予其他人。而耕牛如果死去，政府也会相应把因牛而分的土地收回。

除了露田之外，还有桑田。当时，家家户户都需要养蚕，桑树成了一种重要的资源。但是，桑树是一种长效的经济作物，桑田不适宜流转，所以桑田的受田人死后，政府并不收回，而是传给受田人的子孙。最初时，桑田授予每人二十亩，要求种桑树五十棵、枣树五棵、榆树三棵。不适合种桑的地区，每人只授田一亩来种枣树和榆树。

另外，生产麻布的地区还有麻田十亩，女子减半。除了这些田，还有每三口一亩的宅基地，三口人六百平方米的住宅，比现代人都宽松得多。

另外，地方官员也有公田，刺史授予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都是八顷，县令、郡丞六顷。官员离任时，必须将全部公田交付给他的继任者。[13]

这些规定总的来说像一个计划经济的大盘子，类似于1978年之后的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可以想见，在配田之初，人们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大涨，因而产量大大提高。

不过，随着全国开始推行配田，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发现自己根本摸不清楚经济的底。孝文帝初期刚刚取消了州、郡、县胡乱征税的局面，规定由县统一征税。但是县这个行政单位仍然太大了，政府很难对每家每户进行细致的管理。而统计田地和人口、分配田地、征缴税收都需要巨大的人力才能做到准确无误。

可以说，均田制如果要实行得好，政府必须有一个实时更新的数据库，其中有人口、户籍和土地的详细数据。北魏粗糙的政府机构无力建设这个数据库。

到了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后来成为太后情人的李冲提出了最后一项改革：三长制改革。[14]

所谓三长制，就是在县以下设立半自治机构，来负责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时也可以实现民间经济的自我管理。在任何一个稳定的时代，虽然皇权不下县，但是，县以下都存在类似的半自治机构。

北魏的三长制是：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三长要求挑选当地有威望的人担任，并享有一定的免徭役优惠。三长负责厘清土地和人口状况，征收土地税和户调。所谓户调，就是除了粮食产出之外，以户为单位来征收的农产品，主要是布匹。[15]

李冲的提议得到了太后的肯定，却遭到了其他官员的激烈反对。中书令郑羲说："你可以不听我的，去尝试你那一套，但是失败之后一定会明白我说的才是对的。"[16]

官员们之所以反对，在于官员其实是霸占土地、隐匿户籍的大头，如果政府通过立三长来统计数据，那么受到损失最大的是官僚阶层。在官员的带动鼓噪下，整个社会也充满了不安。其实，任何变革的时刻，人们都更倾向于保守的选择。

冯太后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坚决把改革推行了下去。

结果证明，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改革前，由于是按户纳税的，许多人为了逃避税收，一个家庭往往聚集了几十口人。由于户数太少，平均下来，每户达到二十多斛。没有那么多人口的贫困小家庭根本缴不上税。改革后，大家庭拆成了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每一对夫妇纳税帛一匹、粟二石，绵、丝等杂物也一并取消。这样的改革对于穷人非常有利。

三长制的执行让政府的土地改革顺利推行了下去，获得了土地的人民瞬间享受到了好处，对于政策也不再质疑。[17]

随着三长制的确立，北魏得以查清了统治范围内的人口和土地资源，政府有了广阔的税基。

查明税基是一个政权走向正规的标志，但同时，查明税基在集权时代又是一把双刃剑，政府收税过于容易，就容易收过头。比如隋代将人口数字落实得清清楚楚，收税很容易，结果隋炀帝就花费无度。唐太宗和隋炀帝一样东征高丽，对民间经济破坏很大，但由于唐代查不清人口，征税难度大，反而对民间形成了一定的保护。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对冯太后十分依赖，他屡次下诏悼念这位把他亲手带大的老太后，并守孝三年表达哀思。

然而在政策上，对太后的依恋却让孝文帝显得更加偏激。取汉名、迁都、穿汉服、禁胡语等一系列政策直接导致了北魏朝廷内部的对立。孝文帝死后，北魏又坚持了二十五年，就卷入了六镇叛乱的大旋涡。依靠镇压六镇叛乱而崛起的尔朱荣控制了政权，其后，高欢擅权，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又分别被北周和北齐所取代。

北魏虽然亡国，冯太后的改革却跨越了朝代的界限，被北齐和北周继承。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北齐和北周大致采取了北魏的做法，只是偶尔做一些小小的修改。而隋代又继承自北周，接纳了北周的财政制度，再将整个制度传给了唐代。北魏冯太后的改革通过一系列的传承，影响

了中国最伟大的皇朝。

从制度意义上看，冯太后的功劳远远超过唐太宗，是从北朝到南宋这一千年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人。

表4：北朝至隋唐的土地分配[18]

朝代	男		女	一夫一妻共分得土地亩数	宅基地	附注
	露田（口分田），人死后回收的土地	桑田（永业田），人死后不回收的土地	露田（口分田）			
北魏	四十亩，由于土地轮作，加倍授田为八十亩	二十亩	二十亩，轮作加倍授田为四十亩。寡妇授田不课税	一百四十亩	三口给一亩宅基地，奴婢五口给一亩	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老弱残废减半
北齐	八十亩	二十亩	四十亩	一百四十亩		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
北周	男丁一百亩，有家室的一百四十亩			一百四十亩	十口以上给五亩，五口以下给三亩（其余四亩）②	
隋	八十亩	二十亩	四十亩	一百四十亩	三口给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	
唐	八十亩	二十亩	寡妻妾各给三十亩	一百亩	三口以下给一亩，每增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以下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	老弱残废四十亩。商业者口分和永业都减半，土地紧张的狭乡不授予

②《隋书·食货志》："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下，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

六世纪的“大跃进”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在汉文帝之后，历史再次迎来了普天下的免税。根据《隋书》记载，这一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除去所有的花费之外，京城的府库还放满了钱币，多余的储藏甚至堆积到了走廊上。由于没有地方容纳新的赋税，隋文帝下令停止征收这一年的正赋。

历史上将这次事件当成是隋代鼎盛的标志之一。

许多人将功劳推给了隋文帝。这位皇帝厉行节俭，不仅本人省吃俭用，对待大臣也非常抠门。宫廷里一切花费能省则省，因而积攒了大量

的财物。在登基三年后，隋文帝罢黜了酒坊和盐井税，将帝国的财政重心放在了农业上。隋代的农业税也比北周时期降低了很多。[19]

从北魏到隋代，以北周的农业税为最重，为每户五石，到了隋代降为每户三石，唐代则降为每户二石。

这一切措施令民间的日子更加好过，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成就了一番盛世。

然而，隋文帝的盛世又引人生疑。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经验，一个乱世中诞生的王朝，从开创到真正的盛世往往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汉代由于一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复最快的，从汉高祖建国（公元前202年）到汉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经过了四十年的时间；[20]唐代建国（公元618年）之后，虽然很快进入了所谓的“贞观之治”，但“贞观之治”更多是政治上的调整，经济仍然萧条，直到高宗时期，社会才显出了富裕的势头，而进入盛世则是在建国百年之后了；宋代从建国（公元960年）到仁宗（公元1022年登基）时期的太平盛世用了六十多年；明代从建国（公元1368年）到“仁宣之治”（始于公元1425年）也用了五十多年；清代从统治中原（公元1644年）到康熙后期社会繁荣时期，也用了五六十年，到乾隆时期则用了百年以上。

只有隋代是个例外。以隋文帝免税的公元597年为例，这时距离北周灭北齐只有二十一年，距离隋代替北周只有十七年，距离隋灭西梁（南朝梁的残余，北周的附属国）只有十一年，距离隋灭南朝陈，统一全国只有九年。在这些年里，整个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加之北方突厥人不断侵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休养生息。战争结束的九年之后，隋代就到达了繁荣的高峰，令人感到意外。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隋文帝时期刚达到盛世，经过他的儿子隋炀帝的统治，隋代竟然在各地的反抗中分崩离析。如何将隋文帝的盛世与隋炀帝的衰亡联系起来？这让上千年来的历史学家挠头不已。

然而，如果从帝国的财政角度去抽丝剥茧，就会发现，隋代的“鼎盛”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泡沫。所谓“繁荣”，不是民间经济的繁荣，而是帝国财政收入的繁荣。

隋文帝建立了一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在民间还没有真正恢复时，就将资源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抽取到政府手中，塞满了政府的仓库。所以，本节开头所描述的繁荣是虚假的，只是政府财政的丰裕，却并不意味着民间的富足。

由于这个抽税系统过于强大，到了他的儿子隋炀帝时期，终于抑制不住花钱的冲动，以为府库充足，于是四下征战。但他的活动将民间彻底抽干，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人们都已经吃不上饭了，各地纷纷叛乱，但当叛乱的首领们打开政府仓库时，还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粮食……

在三国的魏文帝时期，有不少郡县新归附了魏国，这些郡县老百姓的户籍残缺不全，逃户现象严重，皇帝希望对他们的户籍进行一次严格整理。

这时，司马懿上奏说，不能这么干。正是由于敌国采取了严密的控制网络，郡县的老百姓离心离德，归附了魏国。魏国不仅不应该严查户籍，反而应该宽容，允许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区域。[21]

司马懿作为当时最聪明的政治家，看到了集权时代的一个本质：为了财政，政府必须建立户籍制度让老百姓纳税。可是，为了不过度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又必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样，老百姓能够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

历代帝王也都面临着这个难题：既不能让户籍和土地统计过于混乱，以致于无法征税，导致政府的失败；又不能让统计过于明白，否则征税必然过度，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

隋代之前，在北齐和北周的争斗中，北齐属于统计过于混乱的一类，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于直接继承自北魏政权，北齐的行政效率比北周更加低下，土地、户籍问题上弄虚作假的成分太大，导致税收出现了困难。按照户口缴纳的租调最多时竟然少了百分之六七十。而由于政府规定光棍之家只需要按照普通人家的半数来纳税，于是，许多人为了逃避税收，结了婚却不登记。在阳翟这一郡，竟然大部分人都登记的是

光棍。[22]北齐的皇帝也知道问题严重，但由于控制力弱，想不出办法，在财政困难时，甚至不得不削减百官俸禄，裁减人员编制。

北周则将土地和户籍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并实行了战斗力更强的府兵制。北周最终吞并了北齐，再次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

北周的政权传到隋文帝时，这位节俭的皇帝建立了比北周更严格的制度，民间经济活动完全暴露在政府的目光之下，无所遁形，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隋文帝对于财政的用心，在他没有当皇帝之前就已经显现。他担任相国时，北周的大臣尉迥、王谦、司马消难预感到他要篡权，一一起兵发难。在镇压他们的过程中，仅赏赐士兵的钱就上亿，隋文帝感觉到了财政的重要性。[23]

得天下之后，由于兴修新的首都大兴城，从山东地区（崤山以东的河南、山西等地）征调了大量民工。这个地区原属于北齐，户籍制度本来就不够清晰，许多人逃避了政府的征调，于是，文帝心中有了清理户籍的念头。

正好在这时，北方的突厥人与隋朝的战争也逐渐升级。突厥人在一位著名的首领沙钵略号召下，团结成了一个整体，拥有四十万大军。由于隋文帝对突厥人很傲慢，而沙钵略的妻子千金公主又出自北周的皇室，于是，沙钵略频繁入侵隋代境内。[24]

为了对付突厥人，隋文帝征调了大量的士兵、粮草和运输人员，中国的社会经济尚未恢复，同时政府的财政也开始吃紧。

基于以上原因，隋文帝决心改善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而要改善财政，首先就是整理全国的户籍和土地。

原来的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统一之前属于北齐。由于北齐的政治结构直接继承自北魏，留下了太多的弊端，税收更加不合理，这里的人们为了逃避税役，常常投机倒把，更改年龄，以求获得政府的免税权。

隋文帝决定以这个地区为突破口，命令地方官员进行一次运动式的大检查，把人们全都叫到官府，逐个当面核实年龄，发现有作假的，不仅本人受惩罚，就连所在地的里正和党长（相当于街道办事处主任，或者村委书记）都要发配边关。[25]

由于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齐和北周）是按户纳税的，在北齐地区内，许多大家庭都有几十甚至上百口人，这些人共同算是一户，只纳一份税。隋文帝乘机将大家庭打散，规定叔伯兄弟必须分家，避免逃户现象。经过这次大检查，政府从民间获得了四十四万三千户新劳力，人口也增加了一百六十四万。

对于山东地区的成功，隋文帝感到非常满意。群臣立即摸准了皇帝的心思，渤海郡公高颎乘机上本，要求把整理户籍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同时，要把运动的成果变成制度固定下来。

在高颎的建议下，一套更加严苛的户籍制度建立了起来。政府统一制定税收户籍册发给各个州县，而各州县的户籍是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初五，各地都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工作。

经过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户籍制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政府几乎掌控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没有人能够逃避政府的税收和劳役。

可惜的是，皇帝的重视必然会引起官员的迎合与浮夸风，在隋文帝的号召下，户籍和土地数据都被夸大了，而且夸大得很严重。

最能反映浮夸情况的，是隋代的土地数据。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根据政府的统计，隋代的土地达到了十九亿四千万亩。[26]这个数字放在隋代，可能人们不会觉得异常，但如果放在现代，这就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为什么震惊？

隋代的一亩是二百四十平方步，每步六尺，每尺大约三十厘米，换算下来，当时的一亩略高于现代的一亩一。[27]十九亿四千万亩也可以换算成现代的二十一亿三千万亩土地。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中国

的耕地数量不到二十亿三千万亩。[28]也就是说，隋代的耕地面积竟然比现在的都大！

隋代的统治疆域比现在小得多，而官方的耕地数量已经超过了现代，这怎么可能？

答案只能是：因为官员的浮夸。

事实上，在汉唐时期，中国耕地数量大约在五亿亩（现代亩）左右徘徊，明代之后才大幅度攀升。[29]隋文帝的土地普查数据已经偏离了实际数据四倍。当皇帝重视农业，希望农业取得大发展时，地方政府必然投其所好，夸大统计数据，而夸大之后的数据必然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民间的负担猛然加重。

隋文帝建立的严格制度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政收入。隋代初期，各地的灾荒频发。关中地区人口众多，土地不够，还经常遭遇旱灾，而在中原地区则经常有水涝灾害。比如，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中地区的大旱就导致农民颗粒无收，政府只能从山东地区运米来救济，就连皇帝也跑到洛阳避灾。[30]之后更是连年灾害：关中大旱，山东大水。

隋文帝虽然生活节俭，却常常大兴土木。他当皇帝之后，修建了新的都城大兴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了仁寿宫，开挖了一条从大兴城到潼关的广通河。这三大工程都耗费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隋炀帝之所以也热衷于建设更加宏伟的工程，灵感就来自于他父亲的三大工程。

在建设仁寿宫时，开山填谷，工期紧迫，大批劳工死去，被扔到坑里，盖上土石了事。宫殿建成后，文帝来视察新建的宫殿时，路的两旁就堆满了死尸，由于临时无法处理，监工的大臣杨素只能命人将尸体烧掉。[31]

但即使全国有这么多的灾难，在征税机构的高效运作下，隋文帝的仓库仍然是满满当当，从来没有空虚过。

皇帝仿佛有发不完的钱，给百官的俸禄和功臣的赏赐优厚，对出征陈朝的将士的赏赐从京城的朱雀门开始，一直排到了京城的南郊。一次

性发放的布帛达到三百多万段。就算这样，政府的钱仍然花不完。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财政官员报告各个府库都已经装满了，再收税就没有地方可以放了。连隋文帝都感到惊讶，问他的官员："我已经发了这么多赏赐，为什么仓库还是满满的？"[32]

真实的回答是：由于制度过于高效，皇帝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从民间抽取了过高的税收。但是没有人这么回答，大家只是敷衍了事。

隋文帝没有办法，只好开辟左藏院，建立新库房来继续堆积物资。

在全国各地，隋文帝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大型仓库，用于税收的转运或者储存，如卫州的黎阳仓、洛阳的河阳仓、陕州的常平仓、华州的广通仓，等等。这些大型仓库无不被填满，即便在各地灾难频发的时期也都没有空虚过。

隋文帝虽然也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书来降低民间的税赋，包括公元597年免除天下正税，但隋代民穷官富的现象一直没有解决，一边是时常发生的灾害，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另一边则是堆积如山的政府财政收入。

然而，由于财政的错误信号，隋代的统治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民间的困境，只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考虑问题，从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隋文帝最后一项导致灾难的政策是"义仓"。所谓义仓，是指人民将丰收年的粮食储存下来，到了灾难年用于救灾的仓库。

开皇五年（公元585年），由于各地灾难频发，政府为了增强抗灾能力，鼓励民间开展自救，在丰年建立义仓，这种组织称为"当社"。当人民向当社缴纳粮食后，由专门委任的社司来检查出入数字。由于隋代初年的运动风潮，各地很快都设立了当社，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

然而，这期间建立的机构往往是低效和浪费的。经过十年的运转，当社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弊病，各地当社的粮食都出现了被盗用、浪费的情况。到了出现灾荒，需要用到粮食时，虽然仓库的账簿显示粮食充裕，但打开仓门一看，并没有多少库存。

当看到这样的景象时，隋文帝不仅不反思政策，反而得出结论：义仓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老百姓缺乏长远考虑，随意损耗粮食。义仓虽然是皇帝推行的，却由民间社会负责运营，皇帝对民间社会不放心，决定将义仓“公有化”。

他下令，所有民间义仓的粮食都上缴到各个州政府统一设置的社仓来保管。同时，缴纳义仓粮也变成了一种强制的税收，百姓被分成了上、中、下三个等级，上户每年缴纳一石粮食，中户七斗，下户四斗。

义仓制度从一种自愿的社保变成了强制的税收，而使用义仓的权力则收归政府。不管各地出现什么样的灾荒，只要政府不想发放粮食，那么为救灾设计的义仓就无权发放。

到了隋代后期，常常出现政府的官员在大灾时不敢打开义仓放粮的局面。义仓彻底变成了百姓的负担，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领军队从大兴（今西安）出发，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远征。[33]这可能是中国统一的中央王朝皇帝唯一一次亲自出征进入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

隋炀帝为了征伐吐谷浑，率军从首都向西出发，进入甘南，再向西北进入如今的青海西宁一带，从西宁北上经过大斗拔谷（今青海甘肃间的扁都口）。大斗拔谷位于青藏高原北沿的祁连山脉之中，是古代一条连接西宁与河西走廊的险峻小路。这里风雪弥漫，天昏地暗，炀帝与他的随从失去联系，士兵也冻死了一大半。

翻越祁连山到达张掖后，隋炀帝接受了高昌王麴伯雅的朝见，高昌王向隋炀帝献出了位于新疆的大片土地，皇帝在那儿设置了四个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这是隋代疆土的鼎盛时期。

这一年，也是中国人口达到高峰的一年。当年统计的人口数据是：户数八百九十万户，人口四千六百零二万人。[34]

日后，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但是，如果从官方统计看，唐太宗贞观年间，人口不过三百万户而已，[35]相当于炀帝时期的三分之一。只有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期，人口和户籍才重新接近炀帝时期的数据。

隋炀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当皇子时，就曾经担任过灭陈战争的行军元帅。他的军队纪律严明，灭陈之后，陈朝府库一概封存，本人不取一分。他当皇帝之后，对人民也非常体谅，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曾经下令免天下租税。[36]

在他执政的前五年里，两条大运河已经开工。隋代的三大运河工程中，一条广通河连接首都大兴与黄河，由隋文帝开凿。剩下两大运河都由炀帝开凿，分别是：连接黄河、淮河与长江的通济渠，这条运河是隋唐时期的主干道；从黄河北达涿郡（今北京附近）的永济渠。这两条大运河，特别是通济渠，成为帝国的生命线，将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到了唐代，通济渠更是成为中央政府财政的命脉。

公元609年，隋代的一切看上去还是那么金光闪闪，雄才大略的皇帝、繁盛的人口、繁华的两京，无不诉说着这个新型帝国的繁华。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帝国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被压碎。

执政前五年，炀帝之所以能够取得众多成就，在于他的父亲隋文帝留下了一个高效的财政系统。他需要多少税收，就可以获得多少。即便他曾经推出了减税措施，这个系统仍然一丝不苟地从民间压榨出一点一滴的物资，送进官方的各个仓库。

特别是，炀帝为了兴建东都，又在东都附近修建了大量仓库，为了装满仓库，官员们已经将民间挤压殆尽了。只是这个高速的征税机器根本停不下来，就算在垮掉的那一刻，也不会发出警报声。

同样是公元609年，一个统计数据令人心惊：天下的田地达到了五十五亿八千五百万亩。[37]在文帝时期，十九亿四千万亩的数据已经夸大了至少四倍，而炀帝时期的数据距离实际情况已经有了十倍的差距。统计数据上的失误必然加大人民的税负，在短期内却给皇帝带来了丰厚

的财政收入。

第二年，隋炀帝决定亲征高丽。由于此前一年，大部分军马都在西征中损耗殆尽，炀帝下令向天下富人征集兵马，抵充赋税。庞大的军队集合后，向高丽进发。在军队的背后，帝国腹心地区的河南一带正经历着严重的水灾。这时，帝国财政崩溃的声音终于传了出来。

随着隋炀帝远征的失败，灾难造成的减产、军事行动造成的加税都凑在了一起，文帝高效的征税系统在民变面前显得不堪一击。隋帝国进入了混乱时期。

只是人们都还不明白，帝国如何从几年前的歌舞升平迅速进入了混乱和萧条。一切数据都显得那么完美，所有画面都透露着繁荣……

唐太宗曾经对黄门侍郎王珪评价隋代的制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38]唐太宗算是看到了些许的本质。

直到隋代灭亡，帝国的仓库里仍然堆满了帛匹和粮食。与府库堆积对应的是遍地饿殍。叛乱者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开仓放粮，粮库里都满满当当的。在堆积帛匹的仓库里，人们甚至把帛当柴烧。

随着隋代的统一，社会的生产效率的确在迅速提高，只是，社会上的物资都被一台高效的征税机器送到了政府手中，又被束之高阁，或者浪费掉了。无论人们生产多少东西，都无法满足政府的浪费行为。

资源的错配使得一方雄心勃勃，而另一方却饿着肚子。这提醒人们，在集权帝国时代，高效的征税机构貌似实现了公平，但很可能意味着普遍的贫穷，因为当税都被政府拿走之后，留给老百姓的，只剩下劳苦和饥饿。

因此，隋代的"大跃进"，并没有引起后世的任何警惕。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386年—公元618年。

[2]《魏书·皇后传》："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3]太后死后，作为太后的情人，李冲在孝文帝手下仍然一直得宠。《魏书·李冲传》："文明太后崩后，高祖居丧，引见待接有加。……高祖亦深相杖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4]改革内容三方面：班禄制、土地改革、三长制。均见《魏书·高祖孝文帝纪》。

[5]见《晋书·苻坚载记》。

[6]见《魏书·太祖道武帝纪》。

[7]《魏书·食货志》："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

[8]北魏末年，导致王朝衰落的六镇叛乱，其原因就在于对孝文帝迁都和汉化政策的反抗。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9]《魏书·高祖孝文帝纪》："癸未，诏天下赋调，县专督集，牧守对检送京师，违者免所居官。"

[10]《魏书·高祖孝文帝纪》："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11]见《魏书·食货志》。

[12]见《魏书·李孝伯传》。

[13]见《魏书·食货志》。

[14]《魏书·李冲传》："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

[15]见《魏书·食货志》。

[16]《魏书·李冲传》：“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

[17]《魏书·食货志》：“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

[18]本表根据《魏书》《隋书》《新唐书》制成，并参考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19]《隋书·食货志》：“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

[20]汉文帝上台时，汉代刚刚经过了吕后死时的混乱，经济还很薄弱，直到他统治后期才进入繁荣。

[21]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22]《隋书·食货志》：“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

[23]《隋书·食货志》：“是时尉迥、王谦、司马消难，相次叛逆，兴师诛讨，赏费巨万。”本节未注释者，均引自《隋书·食货志》。

[24]见《隋书·突厥传》。

[25]《隋书·食货》：“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

[26]见《通典·食货二》。

[27]见附录表1。

[28]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

[29]见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

[30]《隋书·高祖纪》：“甲戌，驾幸洛阳，关内饥也。”

[31]《隋书·食货志》：“十三年，帝命杨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寿宫。……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

[32]《隋书·食货志》：“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

[33]见《隋书·炀帝纪》。

[34]见《隋书·地理志》。

[35]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36]《隋书·炀帝纪》：“辛亥，上御端门，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税。”

[37]见《隋书·地理志》。

[38]见《贞观政要·辨兴亡第三十四》。

第八章　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1]

唐代同样采取了土地公有制，并受公有制效率低下的困扰，一直税收不足。唐代虽然拥有繁荣的民间经济，却一直得不到充足的财政收入。

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唐代采取一种奇特的养官制度：自我经营模式。皇帝拨给各个政府机关一定的土地和货币，要求各个政府将土地出租，将货币放贷，把收上来的地租和贷款利息作为办公经费使用。这些土地和货币分别叫作公廨田和公廨钱。

由于政府机关不懂经济，公廨钱贷出去却往往收不回来，唐太宗只好设立一个叫捉钱令史的新职位，这些人专门负责替政府放贷。捉钱令史出现后，引起了大臣们的集体反对，令唐太宗陷入了朝令夕改的困境。

武则天时期，由于政府无法把足够的税粮送到长安，又由于陕西的关中平原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长安人口，皇帝只好不定期迁往洛阳居住，以减轻长安的缺粮压力。

唐玄宗时期，皇帝的财政更加紧张，围绕着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两个集团：贤相集团和聚敛集团。贤相集团强调减少政府开支、不增加农民税负；而聚敛集团则迎合皇帝的财政需要，想方设法增加收入。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加，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集团。

随着北方的边事紧张，唐玄宗的财政已经养不起足够多的士兵，玄宗只好设立节度使的职位，将行政、司法、财税、军事权合一，授予节度使。这种做法导致节度使权力过大，并引起了安史之乱。

中唐以后，帝国的财政事实上已经从财政集权制变成了财政联邦制，唐代中央政府的税收孱弱不堪，无力镇压藩镇。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唐武宗发起了灭佛运动，没收寺院财产，强迫僧人还俗，增加财政收入和纳税人口。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终于步隋炀帝的后尘，决定对高丽开战。[2]

唐太宗一生戎马倥偬，作为秦国公和秦王时，就参加了隋末叛乱之后的统一战争。他亲自率军平定陇西的薛仁杲，击败并州、汾州的宋金刚、刘武周，歼灭河南王世充、河北窦建德，战功赫赫，威名远播。成为皇帝之后，唐太宗派兵灭东突厥、击吐谷浑、并高昌，继续了扩张势头。但整体而言，太宗有意限制了战争的规模，避免军事开支的失控，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

可是到了统治的后期，雄心勃勃的唐太宗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冲动，准备完成隋炀帝未竟的事业，征服高丽。

唐军的三次出征与隋炀帝的结局也类似，劳民伤财，却突破不大。[3]

公元645年的第一次出征，十万大军在太宗的率领下向东北进军。唐军奋勇向前，取得了局部的胜利，然而，对方采取了紧缩防守的策略，依靠冬天的天气击退了唐太宗。这一次战役，唐军的人员损失不大，但军马损失了百分之八十，在冬天的大雪和泥泞中狼狈撤回。

两年后，唐军再次水陆并进，攻击高丽，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两征高丽都无功而返，唐太宗却更加执迷。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他决定再派三十万大军前往征讨。为了做准备，他在黄河上的陕州和山东半岛一带大量储存军粮，又在南方聚集了庞大的舰队。

一部分征高丽的舰船要在四川境内制造，再顺长江驶入东海，前往高丽；另一部分则先从四川境内采集木料，顺江而下，运到浙江一带制

造，造船的钱由四川出，每艘船的成本大约为一千二百匹缣。

对于四川的加税终于引起了当地的骚动，邛州、眉州、雅州的原住民开始造反。为了镇压这次造反，唐太宗又从现在的甘肃、陕西、重庆、湖北一带调兵。于是，东征高丽已经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调兵，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帝国的全面危机。

然而，唐太宗这时却去世了，他的征服计划也随之搁浅。继承皇位的唐高宗性格软弱，不想打仗。将近二十年后，高丽内部衰落，才在总章三年（公元668年）被唐朝征服。

在征高丽的过程中，一个真实的李世民显现了出来。抛开被神化的纳谏因素，晚年的太宗已经变得奢侈傲慢，军事行动也愈加失控，本质上与隋炀帝并没有太大区别。

历史上对他英名的推崇其实表现了百姓对圣君的渴望。特别是到了中晚唐之后，由于人们对现实政治不满，就夸大了初唐时期的政治清明。当吴兢的《贞观政要》问世后，更是没有人怀疑太宗的治国能力了。

但实际上，使唐太宗免于落入隋炀帝结局的，不是他故作姿态的纳谏，而是比隋代低得多的行政效率。这一点，从唐代的人口统计数据上就可以看出来。

隋炀帝时期，人口数据最高接近九百万户，人口则达到了四千六百万。[4]由于隋文帝严格的制度，政府的人口统计准确，没有人游离于户籍之外。

隋炀帝统计人口十年后，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年—公元625年），人口统计数据下降到只有二百万户。[5]也就是说，十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多。

这个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其原因在于唐代的统计粗疏，许多人成了逃籍户，不出现在政府的花名册上。到了唐太宗的鼎盛时期，全国的统计数据也只有三百万户，[6]距离隋代的高峰仍然相差甚远。

到了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由于前一年的户籍增加了十五万户，高宗志得意满，觉得很了不起，随口问他的户部尚书高履行：“隋代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

高履行回答：“隋朝大业年间，户口有八百七十万，今年我们有三百八十万。”[7]唐高宗惊讶于高履行的回答时，他也许不知道，幸亏自己的皇朝查不清户籍，否则，高效的征税机器必然对民间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

唐代每户征税二石，而隋代每户三石[8]，也就是说，唐代的税率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二，加之统计人口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唐代社会的整体税负只有隋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量的财富留在民间，才能促成所谓的贞观之治。

即便唐太宗在晚年也有了大把花钱的习惯，但是，由于户籍管理不完善，政府即便想多征税也找不到人头，这种模糊性间接保护了百姓。

那么，为什么唐代的户口总是查不清楚？为什么唐太宗无法建立一套高效的财政体系？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和唐代继承了隋代的土地制度有关系。

唐高祖称帝前只是隋代太原一代的地方官僚，[9]夺取天下后，政府机构、财政制度、土地制度，都没有创新，而是直接继承自隋代。

在讨论土地制度前，不妨先看一看唐代的行政、军事制度，以及制度如何在财政的影响下，出现进一步的流变。

汉代的官制以三公九卿制为主，之后，三公的权力逐渐被从内廷分化出来的尚书台所取代。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权力外化，皇帝认为尚书台不好管理后，又倚重中书省。到中书省过于庞大时，皇帝又扶持门下省。[10]

隋代时，隋文帝整改了整个官僚系统，彻底抛弃了三公九卿制，将尚书、内史（中书）和门下三省并置。唐代继承了这个制度，改为尚书、中书、门下，这三省构成中央官制的核心。[11]其中，中书（内史）是帮助皇帝起草诏令的机构，诏令起草好由皇帝签字之后，还要送

到门下去讨论，如果门下省认为诏令有问题，可以将诏令封还，即门下有封驳之权。诏令传达下去之后，尚书省负责执行。

在一个决策过程中，如果中书先起草，门下又封驳，如是折腾上几个回合，就要耽误不少时间。所以，皇帝在起草诏令之前，在政事堂举行中书和门下的联席会议。皇帝的政策可以在联席会议上先进行讨论，然后再进入起草阶段。参加联席会议的包括三省的长官，三省各有正副长官一名，一共六名。隋代时，这六人均为宰相。也就是说，隋唐实行的是委员会制，由一个小小的常委集团共同承担宰相的职责。

到了唐代，由于尚书省只是执行机关，地位下降，尚书省的长官逐渐退出了联席会议。当皇帝想让尚书省的长官参加会议时，会授予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类的加衔，获得加衔才有资格参加联席会议。

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又设四个司，共二十四个司。六部相当于现在的各个部委，而下辖的司则类似于现代部委下属的司。另外，还有处理专门事务的九寺五监，它们分别隶属于六部，却又独立运作，地位很像现在的一些负责专门事务的局级机构。在三省六部之外，设立御史台，它是最高的监察机构，负责监察百官，并向皇帝进谏。

隋唐时期地方官僚体制与汉代不同。后者采取以郡县为主的二级体制，而前者是以州县为主的二级体度。

汉代的郡县下属官吏，可以由郡县长官来任命。隋唐时期不仅州县长官是中央吏部任命的，下属的官吏任命权也收归吏部，地方政治更加依赖于中央。

唐代更是设置了两倍于隋代的州，每个州刺史的权力都更小。除了州县之外，唐太宗将全国分为十个道，并派出观察使进行不定期的巡查。

唐王朝还实行了府兵制，全国各地设有总管府（都督府），这些府本来只管军事，不负责民事，地位却在州之上。有的都督府驻扎在一个州内，同时节制周边的数个州，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结构。

这种结构在初唐时对于民事几乎没有影响，但其实带着某种藩镇制的苗头。中唐之所以采用藩镇制，除了安史之乱的因素之外，另一个因素就是唐代的州面积太小，数量太多，不便于中央政府直管。

对唐代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土地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这些制度继承自隋代，却贯穿唐代始终，造成了诸多问题。

唐代实行的是授田制，这是一种土地公有制。所谓授田制，是指一个人出生之后从政府处获得份地，毕生从事农耕，并上缴税收，人死后，份地由政府收回再分配。[12]

税收制度则取租庸调制。根据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时期制定的法令，租庸调制的规定如下：

1.租：成年的男丁可以从政府处得到一百亩土地，伤残人士得田四十亩，寡妻寡妾得田三十亩。如果是一家之主，还可以另外得到二十亩土地。在这些田里，十分之二是世业田，其余十分之八是口分田。当受田人死后，他的世业田由户主继承，而口分田则要交还官府，重新分配给别人。受田人按照每一丁男每年纳粟二石的标准，向政府缴税。

2.调：即家庭手工业税。各地根据产出的不同，向政府缴纳不同的手工业产品。养蚕的地方每年每户上缴绫绢二丈，加上二两纯丝；不养蚕的地方缴纳布匹代替丝绢，但是要加五分之一，同时再缴麻三斤。

3.庸：即力役税。所有丁男每年为政府服力役（不是兵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役，则可以缴纳代役钱，每天丝绢三尺。如果多服役十五天就可以免除户调负担，多服役三十天则租和调都可免除。每年服役不得超过五十天。

4.杂项规定：岭南各州不缴粟而缴米，上等户每年一石二斗，次等户八斗，下等户六斗。少数民族减半缴纳。北方少数民族则缴纳钱和羊。遭遇天灾的地方，如果损失达到四成就免除租税，损失六成则免除租和调，损失七成则租庸调全免。

按照唐代的规定，土地每年都要进行重新分配，[13]而每户的财产也需要三年厘定一次。[14]

从理论上讲，由于政府把土地和户籍挂钩，税负由分得土地的人承担。然而，在现实中，理想的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分配制度却立刻出现了扭曲。

早在隋文帝时期，土地数据就出现了巨大的浮夸，[15]这种浮夸必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一旦政治松弛，立即出现了严重的逃户事件。[16]

唐代建国时的混战恰好是人民占有土地、逃避户籍的高峰期。由于高祖采取了宽简政策，政府没有再恢复隋代高效的行政机器。[17]隋代分配土地时，许多流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即便受田人去世，其家人也不愿意向政府交还土地。而到了唐代初年，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分配制度就慢慢执行不下去了。越来越多的人脱离户籍，越来越多的土地不是被政府回收，而是被私人偷偷在市场上买卖，形成了一个地下市场。

人们寻找一切可能的免税免役机会，逃避户籍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托关系拿到僧道的度牒，有的人占用军籍，或者依靠豪族，充当色役。[18]

许多有权势的家族开始囤积土地，远超规定的额度。[19]到了唐高宗时期，皇帝决定向土地地下市场开刀，下令禁止买卖口分田，回到由政府回收土地重新分配的轨道上。但皇帝的命令比不上利益的诱惑，人们照样买卖不误。[20]

唐代玄宗之前的皇帝们都为土地问题头疼不已，屡屡下禁令不准买卖，试图回收土地，但总是没有效果。玄宗则干脆默认了既成事实，彻底放松了对户籍和土地的管理。[21]

到这时，唐代的土地国有制度和分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由于政府无法获得准确的土地和户籍数据，税收出现了混乱，造成了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由于无法从正规渠道收到足够的税款，皇帝只好另辟蹊径。正是从唐玄宗开始，各种临时性的财务官员层出不穷，肃宗、代宗时期开始重新建立国有企业。为了节省开支，玄宗皇帝推出的节度使改革葬送了盛唐。

总结起来，从北魏到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和分配制度之所以失败，源于它本身固有的巨大缺陷。在任何朝代，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公有制，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农民将土地占为己有，或者土地进入地下市场，流入权贵的手中，政府无法收回土地。

政府虽然在某些时间可以强迫人们退回土地，但随着官僚惰性的滋长，以及人情世故的变化，退地会越来越少，到最后，政府不得不认可土地的私有化进程。而唐初，就是这一进程的起点。

中国从1978年改革以来，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农村最初实行类似于唐代的土地回收和流转制度，每当本村有孩子出生（有的地方要求是男孩），村里就给孩子分配土地。但实行不久之后，这个制度就已经名存实亡，无地可分，回收制度成为画饼，实际实行的是变相的继承制。

元代的马端临感慨地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的盛世，可是根据统计数据，天宝十四年的人口不过八百九十一万户，与隋代相当，而其中不需要缴纳税收的就有三百五十六万户，占了总户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根据唐代规定，不需要缴税的只有鳏寡、残废、疾病、奴婢、带有余荫权的品官后代，这些人竟然能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只能说明作假的人太多了。[22]

更滑稽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人口逃散得只剩下天宝年间的三分之一，而免税户已经达到了总户数的三分之二，[23]纳税户俨然成了少数派，到这时，土地公有制和分配制度就连表面上的形式都维持不下去了。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的一场争论，让后人得以看到唐代财政的一次特殊危机。

这场危机的主角是一批特殊的公务员，这些公务员遍布于京城七十多个衙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与其他的官员需要科举取仕不同，这些人只有一个考核指标：放高利贷。[24]

这些公务员的出现，令那些科举出身的大臣感到恐慌，其中谏议大夫褚遂良就直言不讳地说：“从太学和各州送来的人才都要淘汰一半，还有不少不合格的，可是这群家伙一年却有六百多个等着授官，朝廷又怎么能接收得下来？更何况他们都是些粗俗的商人，会坏了官场的风气！”

而唐太宗本人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他翻来覆去改变主意。制度调整之频繁，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无奈。这时候，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而是一个六神无主的可怜虫。

什么危机能将唐太宗折磨得那么可怜呢？这要从隋唐时期的一个财政政策说起。

在北魏孝文帝之前，朝廷的官员没有俸禄，只能依靠劫掠财物、土地，再将财物放贷、土地出租来赚钱。北魏孝文帝实行俸禄制改革之后，官员们有了固定收入。但是，放贷钱财和出租土地的现象并没有完全终止。

当隋替代了北周之后，官家的放贷和出租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公廨田和公廨钱。

所谓“公廨田”和“公廨钱”，是指中央政府给每一个衙门都配备一些土地和货币，由官员去经营，赚的钱充作办公经费。后来，隋代由于财政充足，废除了公廨钱制度，官员不再搞经营。

到了唐代，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不健康，无法清查土地和户籍，皇帝对于正规的财政一直不信任。唐高祖从建国伊始，就决心建立一套更加独立于税收的自我经营式财政体系。

所谓“自我经营式财政”，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模式：各个部门不需要政府每年拨给的办公经费，只需要在最初得到一笔财产，再利用这笔财产去盈利，获得的利润就足以维持部门的运转了。

唐高祖理想中的政府部门就是一个个的企业，每个企业用经营获利来维持行政运转，这很类似于现代中国采取的政企合一模式，政府就是企业，每一级政府都负有赚钱的使命。

在唐代，政府负责的经营项目是土地和货币。中央政府给每一个部门配发一定的土地和一定的铜钱，安排专门的人手去放贷和收租。[25]

除了政府的公廨钱和公廨田之外，就连给官员发放俸禄也带有自我经营的色彩：政府会根据官员地位的高低授予他们一部分永业田，再根据职位授予他们一部分职分田。官员调任时，需要把职分田交回去，到下一个岗位再重新分配，永业田则可以一直保留并传给子孙。官员的职分田和永业田数量都远远超过普通百姓的分田，如此一来，官员的收入就有了保障，不再需要朝廷发给俸禄。

中央政府最大的开支除了养官，就是养兵。在养兵上，唐高祖沿袭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种亦兵亦农的制度。[26]由中央政府给每一支军队授予一定的土地，士兵们战时为兵，平常务农。生产的粮食充当军费，只有战争时期，士兵的生产跟不上军费所需，才会使用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来填补。

当唐高祖设立了“公廨田（钱）＋职田＋府兵制”的制度模式后，他认为政府所有大的开支都已经实现了“自我经营”，不再需要中央政府投入，政府也就不需要完善财政职能了。人民是否愿意登记户籍，政府能否把税足额收上来，都已经不重要了。

高祖当皇帝没几年，全国还没有完全平定，就被儿子赶下了台。唐太宗继承基业后，却发现父亲设计的这套“自我经营”模式并不好用。

最早爆发的问题出在官员的俸禄上。还在唐高祖时期，官员就发现，职分田和永业田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开支。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消费太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营土地并不简单，从出租到收租，再到粮食的运输、储藏和加工，其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官员的收入就要大打折扣。最后，皇帝除了分给官员土地之外，还是要发一部分俸禄。

接着出现问题的是官员的职分田。随着官员的职分田增多，侵占百姓土地的现象屡屡发生。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下令不再按照规定给官员分配足额的职分田，如果官员少分了田，政府就从公廨钱的放贷收入里拨出一部分，按照每亩地两升粟的价格给予补贴，算作他们的职分田地租。

可这时，公廨钱的问题又冒了出来。

在唐代初年，金融业并不发达，大部分人务农，借钱的只是少数的商人。由于市场小，借钱成本也很高。在唐初，借款年利率在百分之百左右。由于利率太高，人们借钱大都是短期使用。[27]

唐代中央政府设立的公廨钱分散在每一个部门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个部门除了有一定的官员编制之外，还有若干办事员，称为“令史”，相当于现在的科员。比如，门下和中书省各有带令史头衔的办事员八十多人，而尚书省中，仅户部一部就有令史一百七十余人。[28]

这些令史大都负责打杂和文书工作，唐高祖让这些人掌管公廨钱，负责放贷和收取利息。放贷本是一个专业工作，由非专业人士掌管时，不仅赚不到利息，连本金都赔了。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放贷，市面上没有这么多需要贷款的人，掌管放贷的人不称职，也无法控制贷款的风险。如果仅仅依靠公廨钱来筹措办公经费和补贴官员，各个衙门会慢慢倒闭，官员都吃不上饭了。

到了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时，皇帝决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他首先想到的办法是撤销公廨钱。但撤销公廨钱之后，政府部门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职分田补贴谁来出？

唐太宗想了另一个办法：从全国找了七千户最有钱的上等户，逼这些富户每年交钱供养官府和官员，“定向资助”政府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职分田补贴。[29]

这种新的定向资助办法实行了三年，由于扰民过度，受到了太多的批评。唐太宗只得再次下令废弃这个做法，回到老路上去。中央政府再次给各个部门发公廨钱，让他们去经营。

这次，为了解决管理人员不专业的问题，唐太宗直接设置了一个新的岗位，叫作“捉钱令史”，即专门管理公廨钱的办事员。每个单位设置九人，每人掌管五万钱（五十贯），通过向市场放贷来获得利息。

为了防止资金再次流失，唐太宗下令捉钱令史必须实现盈利。他参

考了市场利率，认为每年获得百分之百的回报是可能的，因此规定每个令史每个月必须提供四千钱的利息（一年四万八千钱，折合年利率百分之九十六）。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到惩罚，完成任务的给予奖赏。如果捉钱令史连续十二个月都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升官。

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出现了开头争论的一幕。褚遂良更是扬言这会让整个官场都庸俗化，导致政治的败坏。

在唐太宗一朝，整个三省六部的官员定额只有七百三十员，[30]虽然太宗时期已经出现了许多编外官，但是捉钱令史的编制还是太庞大了，中央政府一共七十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九个捉钱令史。如果每年有六百多人需要升官，官僚系统又怎能受得了？

在群臣的抗议下，唐太宗再次废除了公廨钱，由政府财政接管办公经费，并逐步恢复发给官员职分田的做法，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

但是，问题并没有消失。财政不平衡仍然折磨着这一代明君。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在经历了两次失败后，还是毅然决定再设置公廨本钱。这一次设置的原因，还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支无法平衡。唐高祖已经设立了自我经营式财政制度，要想摆脱对公廨钱的依赖，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重新设计制度。唐太宗在财政上的智慧并不出众，只能一次次地尝试老方法，试图通过改进来获得成功。

但是，这个制度设计的缺陷实在太明显。社会本不需要这么多的贷款，而且总有一时间贷不出去的情况。如果贷不出去，捉钱令史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是拿本金充作利息，期待下一次提高贷款利息补回本金；另一种则是强迫商人们贷款，并强迫他们付出利息。不管哪一种方法，到最后都是不可持续的。

唐太宗死后，他的儿子唐高宗随即废除了公廨钱。这已经是唐代第三次废除公廨钱。

令人惊讶的是，唐高宗随后第四次重建了公廨钱制度。不过这一次有了一些区别。高宗通过多收一定的特别税来获得本金。政府把这笔本金直接交给外面的高等户（富裕人家）。至于高等户怎么使用这些钱

——是去放贷，还是扔在柜子里，皇帝不管，但是高等户每个月必须按时把利息交给皇帝。

这就将政府的经营变成了明目张胆的讹诈。高等户只能自认倒霉，把它当作每年必须缴纳的特别税处理。

公廨钱制度在政府屡次的兴废中经历了唐代的始终。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公廨钱的利率也逐渐降低，从唐太宗时期的百分之百，降到了开元初的百分之七十、开元末的百分之五十，到了晚唐时期，只有百分之四十。

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唐代的财政制度始终问题重重，效率低下，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日益庞大的官僚系统。

虽然中央政府的财政不健康，但是，由于政府对民间缺乏控制力，民间经济出现了极大的繁荣。只是，不健康的财政最终迫使政府用各种歪门邪道来获得收入。在唐代初年，问题看上去还不大，越往后推，财政紊乱引起的问题就越明显。随着官僚系统的膨胀和军事开支的增加，政府的财用出现不足。税收制度不能满足所需，政府就更有动力去绕开正规的税收制度，采取其他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到了玄宗朝的早期，皇帝和大臣们已经想方设法开拓其他的方便渠道来筹措资金。而这些做法又进一步造成了制度性的失衡。

比如，当政府需要更多士兵时，不是通盘考虑财政状况，而是出于惯性直接设立了若干节度使，让他们自己筹措军队，并自己解决粮草的问题。节度使包揽军政大权，造成了制度失衡，从而开启了安史之乱的闸门。

到了后期，各种各样方便之门大开，唐代的财政官僚制度也进入了崩坏阶段。户部逐渐被边缘化，新设的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等，取代了户部的职能，在正规财政机构之外敛财。

正规财政是政府的一道紧箍咒，因为从民间要钱总是困难的。政府采取正规财政之外的其他做法都是为了方便，带着偷偷摸摸的成分。有

的政府给货币减重造成通货膨胀，有的政府搞经营垄断资源，等等。唐代的财政制度既促进了初期的经济发展，又造成了最后的失衡。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公元701年冬天，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武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京师长安。为了纪念，她将年号改成“长安”。她这次在长安待了两年，就回到了神都洛阳。[31]此时，已经到了她政治生涯的晚期。回洛阳两年后，她就被迫退位，离开了政治舞台。公元701年回到长安，对于年老的女皇帝，更像是一场一生的回忆，让她找回记忆中的那个旧舞台。

女皇一生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的双城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武昭仪在京师长安被唐高宗立为皇后。

唐代的京师[32]东西长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南北十四条街，东西十一条街，这些街道纵横，将城区分成了一百零八坊。城市共有两个大市场。皇城在城市的西北角，称为西内。皇城的东北方向则是著名的大明宫，称为东内，高宗在位时已经把大明宫当作了主要的居住场所。后来，玄宗在位时又在大明宫的南面设立兴庆宫，称为南内。京师城外的北面是禁苑。苑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东至灞水，西连汉代的长安城，南靠京师，北枕渭水。

武昭仪册立为皇后两年后，她陪伴皇帝第一次前往东都洛阳。唐高宗在有生之年里，七次从京师到东都居住，每一次都由皇后陪伴。到了后来，由于身体不佳，皇后开始帮他处理政事，上朝时坐在帘子后面听政，与皇帝并称“二圣”。

高宗时期洛阳的地位已经与长安不相上下，它北据邙山，南对伊阙，洛水穿城而过。整个城市规模比长安稍小，南北长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长十五里七十步。城中各纵横十条大街，将城市分成一百零三坊，也有两个大市场。

与长安一样，洛阳的宫城也在城市的西北角。宫城的西南有上阳宫，上阳宫西面又有西上阳宫。禁苑在都城的西面，呈不规则形状，东

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

从长安到洛阳的大道先是沿着渭水一路前行，当渭水并入黄河之后，又沿着黄河伸展，最后一段则翻山进入了洛水谷地。路程在十天到十六天之间，但是，由于大道上布满了皇帝的行宫，皇室走这条路时游山玩水，最短也需要二十天，有时甚至长达一个多月。

高宗皇帝第七次离开长安后，再也没有活着见到京师。他的遗体装在棺材里运往长安，葬在了乾陵。

在他的灵柩被送往墓地时，武皇后却没有陪伴在左右。皇太后决定留在东都洛阳执政，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也厌恶频繁地在两京之间来回迁徙，想找一个不需要折腾的地方。于是，新改名为神都的洛阳取代了京师长安，在这位太后兼女皇执政期间，成为唐代的政治中心。

唐高宗与则天皇后执政时，他们的迁徙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很多时候都是被迫的：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已经无法养活整个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了。

在西汉，由于官制相对简单，养官成本小，政府在关中地区仍然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源。但到了唐代，事情发生了变化。

唐太宗时期，内外官员的定额是七百三十人，唐太宗曾经说：我按照这些名额来招纳天下的贤才已经足够了。但随后，由于公事大量增多，太宗不得不增加了许多编外的官员，称为“员外”“特置”，以及许多加上“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的官员，之后又有各种使职，官制更加混乱，官僚人数已经远超了七百三十人。[33]

在太宗一代，养官成本仍然可以控制。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中央政府官员俸禄是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缗钱。[34]即便加上办公费用，也不会过于庞大。由于关中地区自产粮食，每年只需要从中原地区调运二十万石粮食，就足以供应整个京师的消耗。[35]

然而从高宗和武后，直到玄宗皇帝上台之前的时期，是唐代官僚系统膨胀最厉害的时期。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代的官僚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数百人扩张到了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比起太宗初年已经增

加了二十倍，而且每年新增一千四百人进入官僚队伍。[36]

这还不算夸张，唐代初年的宦官人数并不庞大，[37]到了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年—公元707年），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千人。到玄宗时期，仅宫女就达到了四万人，带品的宦官已达三千人，更高级别穿紫衣的也有一千人。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员数量达到了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公务员（吏）更是多达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人，还有许多有了官员资格，但还没有授官的人。[38]这些人加上皇族、官员子弟，以及各式各样的仆人、供养人，等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且需要供养的集团。

随着官僚人数以及都市规模的膨胀，长安的粮食日渐供应不上了。

唐代之前，隋炀帝已经发现了中国经济的变化趋势，长安和关中平原这个西汉时期最富裕的地区已经变得贫穷，曾经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江南地区已经汇聚了大量的财富。炀帝建立运河系统的初衷，就是要将江南富庶地区与首都连接起来。一旦首都资源紧张，可以便利地从江南调运物资。

然而，在唐代初期，人们发现炀帝当初的设计有一个瓶颈：南方的粮食经过运河北上到达黄河后，经黄河运输到长安却困难重重。[39]

当时的运输路线是这样的：每年二月份开船从扬州出发，四月之后才能通过淮河进入汴河（属于大运河河道），由于这时候运河水浅，通行不便，要到六七月份才能到达运河与黄河交接的河口。可这时恰逢黄河的丰水期，无法通航，只能等到八九月份黄河水落下去之后，再航行进入洛河（洛水）。把粮食从扬州运往洛阳，需要耗费多半年的时间。从运河转黄河时，江南的水手由于不熟悉黄河水性，必须雇佣当地人，这也加大了运输成本。

把粮食运到洛阳，整个运输工程只完成了一半。从洛阳转运到长安还有更大的麻烦。首先，要从洛阳用车辆或者牲口把粮食驮运到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通过陆路绕过三门峡，再重新入黄河，入渭河，

将粮食运往长安。

为什么粮食从运河进入黄河之后，不直接沿着黄河一直西进直达渭河和长安，而非要经过如此麻烦的陆路转运呢？因为黄河有天堑——三门峡。[40]

在古代，位于河南、陕西交界的三门峡是造成黄河运输困难的最主要原因。这个峡口位于崤山的怀抱之中，河中立有砥柱，水流湍急。当时坐船过三门峡，十艘有七八艘会出事故。走水路必须做好折损百分之八十资产的准备。而走陆路的成本又很贵，从洛阳到陕州的三百里，每运送两石粮食就要花费一千钱，运输成本远超粮食的价值。

由于运输成本太高，唐代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大规模运输漕粮到长安。皇帝只能采取另一个做法：不定期地将政府从长安迁移到洛阳。政府迁移到洛阳时，所有相关人员也都跟过去，长安的粮食需求迅猛下跌。

隋文帝也采取过类似的方法，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中地区大旱，隋文帝就只好跑到洛阳。

唐高宗和武后也屡屡采用这个策略。咸亨元年[41]（公元670年），四十多个州出现灾情，其中关中最严重，第二年正月受灾最重之时，新的收成没有下来，老的收成已经吃完。皇帝立即决定打包走人，迁徙到东都，避免与民争粮。皇后跟着高宗皇帝七次迁徙，高宗一死，她立即决定永久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洛阳建立神都，不再回长安了。

武后的选择也显示了长安的窘迫地位：从西周时期，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就是最繁华的所在，但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长安已经变成了西北一隅，在经济上丧失了重要性。但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仍然是首都，政府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大量向长安输血，这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武后时代，也是唐代财政问题逐渐积累的时代。她依靠迁都避免了漕运问题，但其他财政问题都在恶化。

在官僚系统上，唐高祖制定的一系列可笑的自我经营式财政政策已

经失效了，而官僚的膨胀速度超过了预期，政府需要更多的财政经费来维持运转。

土地国有制和分配制度也执行不下去了。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能回收的土地有限，土地兼并问题表现得愈加明显。

而令唐代政府更加头疼的是逃税户问题，一旦税收加重，超过了人民承受的极限点，人民立即逃走不再缴纳税收，而他们的土地也被更强势的人兼并。

高宗时期的名将刘仁轨曾经在白江击败日本和百济的联军，他在上奏时却说，自从开战以来，政府大肆征兵，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靠贿赂逃避兵役，没钱的人，哪怕是老弱之人也被充军。[42]

武后时期的陈子昂更是屡次谈到民间的困苦，如四川的官吏横征暴敛，导致大量人口抛弃土地，逃入山林。[43]狄仁杰谈到，由于军事征召，河北地区出现大量人口逃离的现象。“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44]

武后时期也是府兵制逐渐衰落的时期。这种农战结合的兵役模式在建立之初极有效果，但是，随着机构的老化，军士的惰性增加，府兵制必然如同国有企业一样低效，整个系统变得臃肿，士兵既不能耕地，也不会打仗，军事体系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武后看到了问题所在。她一上台，就准备整理财政。她试图查清税基，避免偷税漏税。

普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后将帝位传给儿子唐中宗的那一年，唐代的户籍已经达到了六百一十万户以上，比唐高宗初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万户。[45]

人口的增加使得政府税收也相应增长，但仍然比不上官僚队伍膨胀的速度。

为了防止忠于唐皇室的官员起兵反对她，也为了整治贪污成风的现象，武后进行了又一轮的集权。她撇开了正规的官僚体系，借助亲手提

拔的酷吏，加大监察力度，并采用举报加酷刑的方式，来让官员俯首帖耳，减少贪污，从而解决更加恶化的财政状况。

但这些酷吏一旦掌了权，就和武则天想惩治的官员一样，变得不受约束、为所欲为，武则天只能扶持新一批酷吏来对付前面的一批，这样的循环直至她下台才结束。她死去时，唐代原本的官僚系统正在解体，宰相权力削弱，围绕着皇帝形成了新的小圈子。

宫廷挥霍成风、养官成本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官员行为缺乏约束，这是高宗和武后时代遗留的问题。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天宝初年（公元742年），水陆转运使韦坚导演了一出“百船来朝”的精彩好戏，让长安人大开眼界。[46]

在长安城外浐水旁的长乐坡，修有皇帝的宫苑望春楼，这里突然开挖了一个水潭直通浐水，过了些时候，从渭水开来三百艘船，停在了水潭外，长长地排开，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船上的人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衣袖宽大，与长安一带的着装绝不相同，反而像是从南方来的。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互相猜测时，皇帝已经到达了望春楼，与他同行的还有许多文武大臣。

皇帝到达后，突然一声令下，歌声四起，三百艘小船如同活了一般，排着队挨个儿从水潭经过。每一艘小船上都写着州郡的名称，仿佛它们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来的。

在船上，还摆放着各地的土特产品：广陵的锦、铜器、官端绫绣，会稽的罗吴绫、绛纱，南海的玳瑁、象牙、珠串、沉香，豫章的瓷器、茶具和锅，宣城的空青颜料、孔雀石绿，始安的蕉葛布、蟒蛇胆、翠鸟羽毛，吴郡的方文绫，等等，应有尽有。

就在人们被船上丰富的贡品吸引时，突然有人发现这支船队的领头人有些怪异。这个人站在第一艘船的船头，穿着短袖的衣衫，红抹额，

欢快地领着大家唱歌。两侧则是从京城招呼来的一百多个妇女，她们妆饰鲜艳，鸣鼓吹笛。

有人发现领头人是陕县县尉崔成甫，而他所唱的歌叫《得宝歌》，歌词也是为了这次表演创作的，分成十段，风格喜庆。

当船队来到望春楼下时，水陆转运使韦坚走过来，将船上代表的贡品拿过来，献给楼上的皇帝用来分赐众人，又送上了百余种食品。船队边奏乐边表演，俨然一副军民同乐的联欢场面。

联欢结束后，皇帝大肆赏赐，将新开凿的水潭命名为广运潭。

这是唐玄宗时期典型的热闹场景之一，表现出了盛唐时期的奢侈与繁华。

然而，这个场景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对于玄宗皇帝而言，广运潭和之前一系列的水陆工程，表明首都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通过几位大臣共同的努力，黄河天险成通途，增强了帝国的运输能力，关中地区不再缺粮。困扰了高宗和武后几十年的问题在他的手上得以解决，而他也不用再定期到东都洛阳了。

任何看到这一幕繁华景象的人都没有想到，这已经是盛世王朝的晚期，再过十几年，唐帝国就会在“安史之乱”的灾难中步入残年。即便是后世的人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开元年间尚是盛世，天宝年间就一派萧条了。

在传统的历史书中，开元和天宝之间如同有一个鸿沟，开元时期的玄宗英明神武，到了天宝时期却昏庸不堪，引起了千古巨变。

但事实上，唐玄宗的统治是一贯的，他与前代帝王的统治也是连续的，帝国的隐患在唐代的前半期逐渐积累、失衡，终于在玄宗末年爆发了。

天宝变局为什么会发生？答案仍然是：财政。

公元713年，唐玄宗粉碎了武后之女太平公主的政治集团，巩固了

帝位，改元开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盛世。[47]

然而，新皇帝执政伊始就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在他之前，韦后和太平公主相继擅权，这两个女人治理经验不如武后，将之前遗留的问题扩大化了：她们提拔了大批不称职的亲信，进一步破坏了官僚体制，并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府兵制的进一步衰落已经威胁到了边疆的安全，特别是在吐蕃崛起之后，军队能否禁得起战争的考验已经成疑。土地制度的破坏，令户籍管理也逐渐混乱，影响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另外，困扰帝国的漕运问题仍然存在，关中的粮食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帝国，但从中原运输，又受到自然条件的阻碍。

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唐帝国随时有可能面临一场危机。

唐玄宗登基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斥退冗官，减少皇室开支。在找到有效的军事改革办法之前，宰相姚崇制定了保守的军事原则：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进行战争。为了解决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皇帝学习武后的做法，不定期地迁往东都洛阳。在天宝之前，唐玄宗在洛阳居住的时间合计不下十年。

从开元初年始，玄宗任命了一系列的贤相治理国家，姚崇、宋璟、苏颋、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人先后拜相，他们或者为官清廉，或者政宽刑息，或者满腹文采，形成了少有的政治新气象。

然而，这些宰相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他们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却不会帮助皇帝增加财政收入。

所谓节省开支，指的是精减官僚机构，减少军事行动。政府可以少花钱，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大，政府能节省的开支也有一定限度。政府除了节流之外，还有着强烈的开源的要求。

玄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百八十余万屯，布一千零三十五余万端。[48]

同时，玄宗时期的花费却非常惊人。以他建立的收容皇族的十王宅

和百孙院为例，十王宅每院配置四百宫人，百孙院每院也有几十人，这个庞大的群体都必须由政府来养活。官员和吏有七万多人，宫人四万多人，军费也在连年上涨。

但是，所有的宰相都不会帮助皇帝去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心里还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意味着盘剥民间。

皇帝需要另外一类人来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也就是聚敛之臣。他们更懂得商业，更知道如何来帮助皇帝赚钱。

于是，在正规的官僚系统之外，皇帝设置了一系列的使职，来帮助他获得更多的收入。在开元贤相们各领风骚的同时，唐玄宗的周围也形成了一个不下于汉武帝时期的聚敛团队，主要人物包括：宰相裴耀卿、监察御史宇文融、太府卿杨崇礼，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户口色役使王、水陆转运使韦坚，还有后来著名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除了裴耀卿之外，其余每一位都是野心家的典范。

这样，唐玄宗的身边就围绕着两个集团：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皇帝需要前者帮助他治理国家、抚慰人民，又需要后一种人帮助他寻找财源。这两个集团从皇帝上台之始就并存着。

最初，唐玄宗还能在贤相群体与聚敛之臣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但随着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聚敛之臣才能够给皇帝带来更多利益时，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之臣。

正是靠着聚敛之臣这个群体，唐玄宗解决了从东方支援京师长安的重大工程。这项工程始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由当时的京兆尹裴耀卿主持。当年由于出现了灾情，玄宗从京师前往东都，而裴耀卿适时地提出了解决运粮问题的方法。[49]

他认为，之前运粮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江南来的船在路上要等待很久，由于运河水浅，从淮河经过运河到达黄河口要等两三个月时间才能通过，而从黄河口进入黄河，又要等两个月才能过去。他希望在每一个等待的地方设立粮仓，船直接把粮食卸在仓库里就调头，分级转运，效率会更高。

另外，由于黄河三门峡一段很险，难以通船，裴耀卿在三门峡口的两侧都设了仓库，运粮时先走水运到东库，从东库走陆运，经由十八里山路到西库，再走水运从西库到京师长安。整个行程只有十八里路是陆运，其余都走水运，降低了运输的成本。

裴耀卿还开辟了一条北路，将粮食先运送到太原，再走水路进入黄河和渭河，这条北路也保证了河东地区的粮食得以汇聚京师。

通过裴耀卿的努力，玄宗时期的税粮运输能力从每年几十万石增加到二百三十万石，足以供应关东地区。唐玄宗在后期，已经没有必要不定期迁往东都了。天宝年间，玄宗回到了京师长安与杨贵妃缠绵，东都洛阳恢复了陪都的地位。

裴耀卿功成身退，却没有想到他带来的示范作用给一批钻营之人指明了道路。

在裴耀卿榜样的作用下，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决定开凿三门峡，将峡谷河道中间的砥柱山凿开一条船道，再在两边开凿栈道用来拉船。他的目的是粮食运输不用再转陆路，全部走水运。

但不幸的是，由于开凿过程中大量的石头崩塌进入河道，反而使河道更加险峻，只能等涨水时再拉船通过。这个方法劳民伤财，并不实用，但是李齐物仍然上报表功。唐玄宗有些怀疑，派宦官下去调查，李齐物通过贿赂封住了宦官的口。

而开头提到的韦坚，在取代李齐物任转运使之后，更是把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变成了仅供皇帝观赏的游戏，整个漕运系统不停地运转，每年的运量已经达到了四百万石，远远超出了实际的需要。[50]

除了税粮运输系统之外，皇帝最头疼的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混乱。避税逃户的人太多，如何把这些人找到，逼迫他们缴税，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

这个工作交给了监察御史宇文融。[51]

宇文融请求清查全国的户口和土地，统一纳入征税范围，来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皇帝允许后，宇文融立刻任命了二十九个劝农官到各地去巡查。由于他的性格严苛，各地的官员出于畏惧，不惜报假数字来讨好他，结果又造成了新的逃亡户。

不过，报给皇帝的数字却非常漂亮：当年就增加了八十万户人，以及同比例的无主土地。新增人口达到了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政府随即按照数字派税，当年税收增加了几百万贯。

宇文融的巨大成功让他升了官，但也遭到了大量的质疑。有人认为，他的做法过于侵扰百姓，会让百姓变得更加贫困，让更多的人逃亡。但皇帝认为宇文融能带来新的财源，不容许质疑，并将皇甫憬、杨玚等反对人士都加以贬斥。

宇文融的升官终于引发了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的正面冲突，宰相张说看不起宇文融，不断地压制他，宇文融则大肆诋毁张说。在这场两个集团的斗争中，玄宗皇帝最终选择了宇文融。贤相集团主导的政治历程已经接近了尾声。

宇文融对于政治气氛的破坏极其严重，除了以聚敛之臣的身份官拜宰相之外，他还设立了一大批临时官员（使职），穿梭于全国，满足皇帝对于财政收入的需要。

后来，皇帝在其他官员的坚持下，贬斥了宇文融，但随即就问宰相裴光庭："在你们的要求下，我已经把宇文融治罪了，但是，他一走，国家财政就不够用，你们谁能帮我呢？"

宰相默然。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如此尖锐。宇文融下台后，由于他对于正规财政系统和民间经济的破坏，财政收入势必下降得更快，但是皇帝不认为问题是宇文融造成的，反而认为正是缺了他，才有了问题。宇文融死后，皇帝还在怀念着他的好处。

但皇帝不用等太久，太府卿杨崇礼接替了宇文融，开始从地方压榨财税。[52]杨崇礼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但正因为他清廉，反而给地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伤害。除了杨崇礼，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也都

是著名的理财官员。

聚敛更甚的是一个叫作王鉷的人，他善于搜刮财产，每年献给皇帝的钱就达上百亿，上贡的其他财宝也差不多值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王鉷宣称这些钱都不是正式的税收，不用存入国库，而是存入唐玄宗的私库——百宝大盈库，供唐玄宗私人支配。这就彻底破坏了唐代的财政基础。

当这些聚敛之臣得势，控制了唐玄宗的宫廷之后，他们之间的内斗也越来越激烈。韦坚、杨氏兄弟、王鉷互相倾轧、互相告状，而皇帝利用完他们之后，一一将其诛杀。最终的胜利者，属于玄宗时期最著名的奸相李林甫。

到此刻，政府已经陷入财政饥渴症不能自拔。贤相集团退位后，聚敛集团带领着唐玄宗，为了财政目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一项政策直接导致了天宝变乱，将盛世王朝彻底葬送。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如果你问当时天下最繁忙的人是谁，会有人告诉你，是宰相杨国忠。[53]

杨国忠的繁忙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余个使职，还担任着帝国的右相，兼任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他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大权，并负责官吏的考核与任命，同时，还监管着四川地区的军政、民政各方面事务。

杨国忠的办事效率奇高无比，在他以前，吏部对官员的选拔有复杂的程序，经过三道唱选，评比从春天持续到夏季，才能将官员选出。但是杨国忠却做得轻轻松松，他在私宅里进行选拔，再召集官员在尚书省的办公室里唱一次票，一天之内就选定完毕。

对于帝国的国库，他也维护得井井有条，不让国库出现哪怕一时的

短缺。直到安禄山兵起，各地的物资仍然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京师长安，将府库填满。有一次，唐玄宗去左藏库视察，看到仓库堆得满满的，对杨国忠推崇有加。

除了吏治和财政之外，杨国忠对于军事也“有所涉猎”。在他的组织下，唐政府对西南方的小国南诏连续发动了两次大的战役，都是全军覆没。不仅如此，战争过后，原本臣属于唐朝的南诏国全面倒向当时最大的威胁——吐蕃。

但是，在杨国忠的汇报中，这两次战役都是唐朝大捷。为了扭转人们私下里对他的非议，他决定在军事上再立功勋，将安禄山拿下。

人们很难想象，唐玄宗晚期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人怎么能够获得如此之大的权力。

除了唐玄宗沉浸在温柔乡这个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人能够满足帝国的财政需求。这时，中央政府已经离不开这些敛财能手的帮助了，否则帝国的财政就要亏空。

如果一切以财政为目标来考核政绩，政治权力就会被这些财政专家所把持。

更致命的是，同样是基于财政的原因，唐玄宗做出的一项军事改革，让中央政府彻底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再也无法回转。

在唐玄宗时期的国际关系中，突厥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不再构成威胁；回纥人还在遥远的北方，没有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然而此时，在西方崛起的吐蕃却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54]

统治中心位于今西藏的吐蕃人几乎与唐朝同时崛起，又同时崩溃。唐玄宗时期，吐蕃恰好也处于鼎盛时期，不仅占领了今天的西藏，还向西进入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地地带；在东面进入了四川西部，青海、甘肃一带；在北面，则进攻了新疆的部分地区。

吐蕃人全面扩张，与唐朝在从巴基斯坦经过新疆延伸到四川、云南的巨大弧形区域都存在着军事对抗。

在与吐蕃对抗时，唐玄宗发现，帝国建立的府兵制已经腐朽得不能打仗了。府兵制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但由于招不够兵，许多人都已经白发苍苍了，还在驻守边防。唐代实行边防轮换制度，内地的府兵过一段时间就轮换到边防去，但随着制度惰性的增大，轮换也成了虚设。[55]

玄宗登基后，进行了军事制度的改革。

在宰相张说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了一批府兵，招募了一批新兵，建立了十二万人的彍骑卫队来守备京师。募兵制建立后，府兵制更成为累赘。

到了天宝年间，就连当初精锐的彍骑卫队也退化了。以守卫京城的部队为例，他们本来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这支号称侍卫皇帝的侍官队伍，却早已经变成了京城的耻辱，人们骂人时就骂对方是侍官。队伍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富裕的变成了商人，忙着做买卖，身强体壮的就靠玩杂耍、拔河来糊口，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军事训练，到“安史之乱”爆发时，这些人甚至不知道怎么穿军装，更别提打仗了。[56]

面对边境蛮族的挑衅，唐玄宗不得不开始另外组织部队。他倚重于一项源自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

唐高宗时期，由于在军事行动中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高宗给一些军事官员（都督）授予了节度使的称号。他们由中央派出，带着皇帝的令符，负责节制当地的军事。但当时的节度使并不是一个正式官职，只是临时性的称号。

到了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皇帝授予凉州（今武威）都督贺拔延嗣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节度使成了正式官职。

所谓节度使，不同于之前的都督，因为都督只负责军事，不参与民事；也不同于地方的州刺史，因为刺史不管军事，只负责民事；他还不同于观察使，因为观察使只有监察权，没有军事权和民事权。节度使将

所有这些权力都合而为一了，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任命权和监察权。[57]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和直接长官结成非常强烈的忠诚关系，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

到了玄宗时代，府兵制已经无法应付西方和北方的军事需要。于是，唐玄宗在边境采取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发给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们种地。

但是，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钱能养活这些士兵。根据统计，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随着边境战事的扩大，以及募兵制成本的增加，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58]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钱只包括士兵的口粮、衣服以及零花钱，如果将运输成本考虑在内，再将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计入，那么，军事开支要比统计数字高得多。

随着军事开支出现了几倍，甚至十倍的增长，中央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应付庞大的花费。唐玄宗决定进一步削减内地的府兵，由此，边境的士兵占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玄宗又设立了几个节度使，授予他们行政权，让他们在统治区域内自行搜刮。

这些节度使是：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前两个节度使位于今新疆）、河西节度使（位于今甘肃）、朔方节度使（位于今黄河北部大拐弯内外）、河东节度使（位于今山西北部）、范阳节度使（位于今北京、河北一带）、平卢节度使（位于今北京以东的东北地区）、陇右节度使（位于今陕西甘南、青海一带）、剑南节度使（位于今四川西部和云南）。[59]

这些节度使并不能帮助皇帝减少财政开支，却可以把财政“隐形化”。他们的许多开支自行筹措，不再受皇帝的管制，也不需要皇帝操心。

为了保证节度使的忠诚，皇帝特别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员，比如请一

些在职或退职的宰相担任或兼任节度使，因为这些宰相对皇帝忠心不二，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执行使命。

但是，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帝国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把持。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交给那些失败者。

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落入了蛮族之手。

就能力而言，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完成皇帝的一切要求，特别是财政需求。另外，他还亲自主持汇编了一系列的法律典籍，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宰相期间完成的。但玄宗时期的宰相已经不同于太宗时期。太宗时期的宰相有四个，是集团领导制，而玄宗时期是以一个人为主。能干的李林甫享有过多的权力，承担过多的事务，能制约他的力量也越来越小。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并精心建立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他一旦离任，这种平衡立即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在他的新方法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外族名将掌管起了庞大的唐朝军队。

在李林甫的机制中，外族的将军虽然掌握大权，但对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着尊敬。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

杨国忠试图从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下手，整治藩镇。安禄山也意识到，在杨国忠的逼迫下，自己不得不反。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

在天宝变乱发生后，杨国忠依然保持着高效的财政工作。当各地的勤王士兵们纷纷赶到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为军队花掉太多的钱感到惋惜。他决定尽量不动国库，而是另外找钱来帮助皇帝打仗。

他派侍御史崔众到太原出卖僧尼道士的度牒，用这种方式筹钱上百

万缗。[60]但此刻的搜刮已经无助于维持唐帝国的稳定，唐玄宗也把他的理财官与宠妃一起，抛弃在了马嵬坡……

盛世王朝的终结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61]

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作赵归真的道士，向他学习法术。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

在道士们的影响下，武宗一直打压佛教，但在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偶发性的，直到这一年，武宗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灭佛运动。

这年四月，武宗请管理僧道的祠部先进行了一次调查，查出全国已经有寺庙四千六百座，僧舍（兰若）四万处，和尚、尼姑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全国人口占比约百分之零点五以上。[62]

到了七月，皇帝正式下达了灭佛的法令。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在每一个大州留一座寺庙，有的寺庙里有先皇、先贤的塑像，可以移入到这座保留的寺庙内。至于小州，则不需保留佛寺。东西两都各保留十座寺庙，每座寺庙十个和尚。

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精美的寺庙，可以考虑保留一座，如果没有也不用保留。两都可以考虑各保留四所，每所三十名僧人。其中上都长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除了皇帝允许保留的几十所寺庙之外，其余的寺庙都予以毁弃，僧尼全部还俗。

在唐代一直繁荣的佛教突然间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除了佛教之外，全国当时还有从中亚传来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

的袄教。这两个教派约有三千名僧人。武宗决定连这两个教派也不保留，三千僧人一起转业。

然而，三个月后，新的麻烦又来了。佛教除了是一种信仰，还是一套慈善机构。在唐代，佛寺负责赡养老弱病残人士，佛寺关了门之后，这些人没有着落，大部分贫病交加，濒临死亡。灭佛成了人们批评皇帝的把柄。

唐武宗只得命令京城和各州的政府拨出一定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地租来赡养这些人，将原本由佛寺主持的慈善机构变成公办。当然，这个机构效率不会高，却可以堵住批评者的嘴巴。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唐武宗加入了一个短名单，历史给这个短名单起了个名字："三武一宗"。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灭佛的皇帝一共四个，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

唐武宗第二年就遭到了"报应"：他崇信的道士们让他不停地吃丹药，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最终中毒而死。

新登基的唐宣宗随即废除了武宗的灭佛措施。那时，由于老皇帝死去，许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寺庙之中。宣宗下令，僧人回流，政府不得干涉。

佛教徒只是从教义和因果报应的角度去看问题，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们惹祸的其实不是信仰，而是财富。

"三武一宗"灭佛的理由只有一个：财政。[63]他们在意的不是佛经对错，而是三样东西：

一是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都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和尚，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

二是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时，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三是佛寺的铜像。在唐代后期，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币，既缺乏铜也缺乏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经考虑过采取限制寺庙的做法。比如，和尚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纳税，而寺院必须用土、石、木头来做塑像，只准在纽扣、饰物上用一点铜来装饰。但这些方法受到了太多的抵制，无法推行。

唐武宗的灭佛彻底解决了问题，可谓硕果累累。根据他的总结报告，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不菲：二十六万僧尼还俗，变成了两税户；同时，佛寺雇佣的十五万奴婢也变成了两税户；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数千万顷，都是最优质的土地。

至于佛像，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估计。但是，当皇帝下令把佛像铸成铜币，政府的铸币机关竟然没有办法把这么多铜像熔化。当大量的铜币涌入市场之后，全国的物价立即出现混乱。到了宣宗时期，政府把一部分钱币重新铸成铜像，减少货币投放量。[64]

宣宗恢复佛教后，并没有将相关的土地资源重新划给佛寺，他享用了武宗灭佛带来的好处，却避免了灭佛的恶名，可谓一举两得。

武宗的灭佛也可以被看作是国家逐渐瓦解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安史之乱”后，唐代虽然已经孱弱，却仍挣扎着，一时间恢复，一时间衰落，直到一百多年后才最终解体。

唐德宗用一生聚敛财富。虽然制度性的败坏已经深入骨髓，但从表面上看，德宗积累的财富又足以让他的孙子宪宗进行再一次集权的努力。宪宗也因此被称为“中兴皇帝”。

唐宪宗对唐代藩镇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并在其统治的十五年间，让大部分藩镇重新听命于中央。[65]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宪宗针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在改革之前，地方向中央上缴财税，州政府征税后，留一部分给自己，剩下的交给节度使，节度使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才会上缴（或者进贡）给中央。

唐宪宗试图限制藩镇的征税权。由于每一个藩镇都下辖几个州，而节度使选择其中的一个州作为驻扎地（直辖州）。皇帝规定，直辖州的征税权完全交给节度使，但是对于其他的非直辖州，其财政收入则完全上缴中央，不再经过节度使。[66]

中央政府这种自断一臂，保全身体的做法，其实减少了节度使的权限。之前的节度使可以全面插手下辖的几个州的财政，现在只能管辖一个州，相当于将节度使的财政权降到了和州同样的级别，这自然引起了节度使的不满。

但由于宪宗时期的财政状况比德宗时期有所好转，他坚持不懈，依靠着灵活的合纵连横的策略，加上武力胁迫，将这项政策逐渐贯彻下去，让大部分藩镇遵从了这个新的规则。

十年后，到了唐宪宗执政的末期，当财政重整规则见效、藩镇的财政权受到遏制后，皇帝再次推出了另一项改革：针对藩镇的军事制度，采用与财政制度类似的规则。节度使直辖州的军事完全归节度使统辖，而非直辖州的军事权则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辖军队也不再听从节度使的调遣。[67]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将军事权交给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强了地方分权，但由于削弱了节度使的军事权力，藩镇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大幅削弱。

在这两次改革中间，唐宪宗也逐渐利用军事行动，将当年侮辱他祖父的东北诸侯一一纳入控制之中。

而对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除了东北诸藩镇，还有淮西。这个藩镇地处运河要道，威胁着唐朝中央政府的漕运安全。在唐宪宗的支持下，名将李愬率领中央军，雪夜奔袭，拿下淮西藩镇的中心蔡州，拔掉了这枚钉子。[68]

根据统计，宪宗初期，每年都上缴赋税的有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个道，一共有一百四十四万户，只有天宝年间的四分之一。而政府财政需要养活的士兵却达八十三万，比天宝

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平均每两户就要养一个士兵。京西北和河北地区由于军队太多，将赋税全部减免。而到宪宗统治结束时，全国户数已经达到三百三十五万，士兵人数九十九万，大约三户养一兵，比起当年已经有了好转。[69]

唐宪宗的削藩和集权措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人们将他视为中唐以后最强大的君主。但人们忽视了其中一点，任何一次削藩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宪宗时期的财政虽然经过重整，但远称不上健康。而当宪宗诉诸武力时，那条左右了德宗的财政规律再次起作用了。

在下一任皇帝统治时期，东北藩镇又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了，而帝国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允许再采取一次宪宗时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了。

经过几代懦弱的皇帝和宦官专权之后，皇位传到了唐武宗，财政收入再次出现困难。武宗必须依靠武力来平定泽潞节度使的反叛，这次平叛虽然成功，却留下了巨大的财政窟窿，皇帝必须依靠灭佛来筹钱。

税务整顿促成了唐代最后一个安定时期。武宗与宣宗时代，唐代户口恢复到了四百九十五万户。

只是，这时的所谓“安定”，与财政匮乏始终是相伴而行的。唐宣宗时期，全国两税、盐酒茶的专卖收入每年有九百二十二万缗，但每年的开支却要多出三百多万缗，[70]而其中的财政缺口只能靠寅吃卯粮、提前收税来解决。末世的气象初现，民间的反抗已经不可避免。

宣宗还在世时，浙东的裘甫叛乱已经爆发。政府为了镇压反抗，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军费。而更多的税收意味着对民间更大的压迫，这又会带来更大的反抗。所以，一旦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很容易就会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再也挣脱不出来。

各地反抗频发时，唐宪宗改革的另一个弊端也显现了出来。唐宪宗为了削藩，不惜降低整个政府的行政效率。比如，在藩镇统兵时期，藩镇为了自身的生存，会加强士兵的训练。但唐宪宗削弱了藩镇的力量，将兵权分散在各个州刺史的手中，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州刺史没有动力维持军队的训练，当财政不足时，首先考虑的是克扣军饷，减少军事开

支。

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越南北部出现叛乱时，中央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可军事开支的缩减再次造成了庞勋兵变，政府进一步失控。随着藩镇制度的衰落，唐代统治者已经没有力量来防范全国性的反抗了。

最后的一击来自于唐代的重臣高骈。[71]黄巢叛乱时，身处江淮最富裕地带的高骈按兵不动，放走了黄巢。中央政府失去了江淮这块最富庶的土地，也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此时距离唐朝的灭亡仅仅是一步之遥。当官制无法保证统一，财政也无法养活这个庞大的官僚结构时，帝国分崩离析。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2]见《旧唐书·太宗纪》。

[3]见《新唐书·高丽传》。

[4]见《隋书·地理志》。

[5]见《通典·食货七》。

[6]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7]见《旧唐书·高宗纪》。

[8]唐代数字见下文，隋代数字见《隋书·食货志》。

[9]《旧唐书·高祖传》：“十三年，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

[10]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度流变，可参考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11]唐代官制，见《新唐书·百官志》。

[12]见《新唐书·食货志一》。唐代土地分配制度可参考表4。

[13]《新唐书·食货志一》："凡收授皆以岁十月。"

[14]《旧唐书·食货志》："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

[15]见第七章第二节。这里可以对数据失真的原因作进一步猜测：土地浮夸可能来自于皇帝对土地分配的强调，由于地方政府拿不出土地来分给农民，只能在账面上作假应付皇帝，而浮夸的土地数据又刺激了税收的增长，使得民间受到压迫。

[16]万国鼎《中国田制史》第三章二十九节："均田制度均授民以田，而逃户之多，乃以实行均田制度之北朝隋唐为最。"

[17]《旧唐书·食货志》："高祖发迹太原，因晋阳宫留守库物，以供军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

[18]《通典·食货七》："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

[19]《新唐书·循吏传》："永徽中，迁洛州。洛多豪右，占田类逾制。敦颐举没者三千余顷，以赋贫民。"永徽是唐高宗的年号，只有六年，紧跟在太宗贞观之后。但从行文上得知，土地问题在太宗时期就已经恶化了。

[20]《新唐书·食货志一》："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

[21]《新唐书·食货志二》："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

[22]见《文献通考》卷三。

[23]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24]见《新唐书·食货志五》。本节未做说明者，均出自本志。

[25]《新唐书·食货志五》："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其后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赐而已。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

[26]见《新唐书·兵志》。

[27]根据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整理。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的放贷年利率为百分之百，到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降到百分之四十。见本书第二十八章。

[28]根据《新唐书·百官志》统计得出。

[29]《新唐书·食货志五》："十二年，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

[30]《新唐书·百官志一》："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

[31]见《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32]见《旧唐书·地理志》。下文对洛阳的描述亦出于此。

[33]见《新唐书·百官志一》。

[34]见《新唐书·食货志五》。

[35]《新唐书·食货志三》："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

[36]《旧唐书·刘祥道传》："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

[37]根据《旧唐书·宦官传》，唐制有内侍省，官员六十名。另外设

有五个局，各有宦官人数不详。

[38]见《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一年相关记载。

[39]见《新唐书·食货志三》裴耀卿的奏章。

[40]关于三门峡和漕运对唐代长安城的影响，可参考赵冈的著作《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三章。根据其测算，唐玄宗时期解决了漕运问题之后，每年最高运量可养活五十一万人，而唐代长安城人口达到了六十万。

[41]见《旧唐书·高宗纪》。

[42]见刘仁轨《陈破百济军事表》，《全唐文》卷一百九十六。

[43]见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全唐文》卷二百十一。

[44]见狄仁杰《请曲赦河北诸州疏》，《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九。

[45]见《资治通鉴》卷二○八。

[46]本故事见《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韦坚传》。

[47]见《旧唐书·玄宗纪》。

[48]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49]见《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裴耀卿传》。

[50]见《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韦坚传》。

[51]见《新唐书·食货志一》《旧唐书·宇文融传》。

[52]杨崇礼、王、韦坚的事迹，见《旧唐书》各自的本传。

[53]见《旧唐书·杨国忠传》。

[54]见《旧唐书·吐蕃传》。

[55]《新唐书·兵志》："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

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

[56]《新唐书·兵志》：“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觗、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57]《新唐书·兵志》：“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58]《通典》：“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疋段，给衣则五百二十万，别支则二百一十万，馈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后经费日广，以至于此）。”

[59]见《旧唐书·地理志》。

[60]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61]见《旧唐书·武宗纪》。

[62]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户数为四百九十五万户，缺乏口数，但以唐代人口整体趋势判断，应在五千万左右。

[63]我们可以把唐武宗的诏令当作自白书来看。在诏令中，他详细谈到了自己对佛教危害的认识：“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见《旧唐书·武宗纪》。

[64]《新唐书·食货志四》：“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

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

[65]见《旧唐书·宪宗纪》。

[66]《新唐书·食货志二》：“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

[67]《旧唐书·宪宗纪》：“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此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其有边于溪洞连接蕃蛮之处，特建城镇，不关州郡者，不在此限。”

[68]见《新唐书·李翘传》。

[69]见《新唐书·食货志二》。

[70]以上数据均见《新唐书·食货志二》。

[71]见《旧唐书·高骈传》。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1]

宋代最著名的改革是王安石变法，但最令人惋惜的改革却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一样，目的都是解决政府财政不足的问题，说具体一点，就是“三冗问题”：冗员、冗兵、冗费。范仲淹的出发点是：既然财政收入无法增加，就减少财政开支。通过整顿官僚制度，减少官员和士兵数量，提升士兵战斗力，从而达到节省财政的目的。

范仲淹的改革遭到了整个官僚阶层的抵制，他们不愿意自己成为裁减三冗的牺牲品。改革最终不了了之。当人们意识到，削减开支的改革不能成功时，就有另一帮人开始呼吁进行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王安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宋代三冗问题的出现，源于宋代是一个继承性的朝代，继承了从唐代到五代形成的庞大官僚阶层和士兵队伍，加上皇帝为了赎买权力，允许官员们享受过量的福利，使得宋代的开支一直非常庞大。

宋代也是官买官卖制度发展最完善的朝代，盐、茶、酒、香、矾，加上其他奢侈品，都被纳入了官营体系，收取高昂的税收，甚至将这些物资信用化成票据流通，成了中国金融最复杂的朝代。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以此为出发点设计政策。他试图使皇帝相信，改革既可以让民间富足，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改革的结果却扰乱了民间经济，遭到了几乎整个社会的抵制。

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不得不排挤大部分台上官员，扶持自己的势力，导致宋代的朝堂斗争失控，许多小人升官。派系斗争成了北宋晚期的主旋律之一。

岳阳楼上叹革新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接待了一位重要的朝臣。这位大臣刚从边境的战场回来，在谏官欧阳修的推荐下担任了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职务。皇帝之所以要见他，是向他请教富国强兵之道。这位大臣就是范仲淹。[2]

范仲淹被后世推举为宋代官吏的楷模，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地位还在苏轼、欧阳修之上。他的《岳阳楼记》传诵千年，脍炙人口，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及他的《灵乌赋》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名句，足以反映出中国文人的气节。而在曾经因为不肯随波逐流，秉笔直言，得罪了皇帝和权贵而遭到数次贬官，又凭着政绩数次崛起。

在皇帝接见范仲淹之前，宋代恰好刚经历过一次危机。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西夏人的领袖李元昊称帝。由于宋代皇帝不承认李元昊的帝位，双方立刻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3]

在冲突中，李元昊几乎一年一次大捷，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共灭宋军几万人。宋军表现得极端无能，连吃败仗。最后，在前线担任守备的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人建立起了一道较为牢固的防线，控制住了西夏人的扩张。而李元昊由于消耗太大，也决定与宋和谈。这次和谈断断续续，到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才达成协议：宋每年输送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

就在宋代与西夏发生战争的同时，原本与宋代维持和平的辽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四十年前，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宋每年向辽纳贡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这时，辽威胁宋仁宗在战争、割地和增贡之间做出选择。

虽然知道这是辽国的无理要求，但宋仁宗还是屈服了，他派富弼与辽国签订了新的合约：给辽国的岁贡增加十万两，绢增加十万匹。[4]

与西夏和辽的扩张相比，更让人头疼的是北宋政府自己的问题。政府内部已经是冗官充斥，军队规模庞大但是战力疲弱。财政吃紧，战争的爆发使朝廷不得不大幅度提高税收，民间经济也受到了影响。

根据掌管财政的三司使统计，战争爆发之前的公元1038年，陕西、河北、河东三路的财政收入分别为一千九百七十八万、二千零一十四万和一千零三十八万，而财政支出分别为二千一百五十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三万和八百五十九万，整体上还略有结余。

宋代财政收入的计算单位很特别。在收税时，主要收的是金、银、钱、帛、粟等，金银以两为单位，钱以贯（一千钱）为单位，帛以匹为单位，粟以石为单位。在统计时，政府不是把所有贡品折算成货币，而只是将各种物品的数量简单相加，算出一个总数。各省的财政数字中包含了所有的税收，但人们无法折算，只能进行大体的比较。

到了战争开始后的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三路的财政立刻出现了大幅度变动。其中陕西路由于是宋夏战争的主战场，花费更大，税负极其沉重，政府收入猛涨到三千三百九十万，而支出也达到了三千三百六十三万。京师汴州（开封）的财政收入从公元1038年的一千九百五十万涨到了公元1042年的二千九百二十九万，支出从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涨到了二千六百一十七万。[5]

面对西夏和辽的逼迫、内部的重重问题，皇帝痛改前非，发愤图强。而在这时，从前线回来的范仲淹成为皇帝信任的对象。他询问这位立了战功的大臣，如何才能解决财政问题，加强军事战备，防止下一次危机。

范仲淹面圣时回答，退下后，对人说：“陛下的确想用我了。但是，朝廷已经积弊太深，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皇帝随即再次向范仲淹请教富国强兵的良策。这次，范仲淹做了书面答复，这就是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提出了十项改革建议，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十项改革主要针对当时的四种现象：冗兵、冗官、冗费、行政效率低下。

关于冗兵，新政针对性地提出恢复府兵制。宋代实行募兵制，兵员

数额庞大，达一百多万人，成为财政的巨大负担。[6]但由于战争频仍，淘汰冗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范仲淹更强调从机制上寻找解决方法，减少养兵的花费，而府兵制寓兵于农，士兵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可以减少军费开支。

在“修武备”一项中，他认为，由于当前京畿卫士抽调边关，首都兵力空虚，可以考虑先在京畿地区实行府兵制，再推广到其他地方。皇帝应该招募五万京畿卫士，这些兵三时务农，一时训练，既可以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又可以保持强盛的战斗力。

关于府兵制的提议，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实行府兵制的时期，也有实行募兵制的时期。实行府兵制时期，人们就想改革成募兵制；而实行募兵制时期，又想改革成府兵制。比如，隋唐时期人们看到先前的募兵制花费太高，所以用府兵制解决花费问题[7]，这和范仲淹的初衷是一样的。但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府兵制虽然节约军费，但士兵的战斗力不强，为了打仗，还是得用募兵制。募兵制持续到宋代，由于花费控制不住，范仲淹又提出要改为府兵制。

这种循环说明，军队的战斗力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无解的难题，要么战斗力低，要么军费高，即便暂时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也无法长期保持。范仲淹想从募兵制往府兵制调整，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寻找再平衡的尝试，在北宋军费太高的情况下，找到一个降低花费的方法。

针对冗官问题，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其核心是减少不合格官员的数量，削减因为家庭背景而当官的人数，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和考核体系，选拔出合格的官员。

所谓“明黜陟”，指的是改革官员的选拔机制。由于官僚制度的惯性，宋仁宗时代形成了官员定期“磨勘”的制度：官员按照资历，文官三年升迁一次，武官五年升迁一次。范仲淹认为，这个制度使官员们根本没有动力去追求政绩，只需熬资历即可。必须改革磨勘法，根据官员实际的能力和成绩来提拔，将那些熬资历的不称职者淘汰掉，形成良性的竞争局面。

所谓"抑侥幸"，指向的是官员的恩荫制度。宋真宗以来，皇帝要向大臣显示恩惠，便大量地分封官员子弟当官，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冗官体系。范仲淹算了一笔账：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在朝任职二十年以上，竟然能帮助兄弟、子弟二十人在京做官。如果不做出改变，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会迅速吃空政府财政。

所谓"精贡举"，是改革贡举制度。由于朝廷的考试注重诗词歌赋，所以招来的人才大多以辞章文采见长，而缺乏真正的治理能力。范仲淹试图改革贡举制度，并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实务训练。

"择官长""均公田"两项，则是希望谨慎地选择合格的地方官，避免不合格官员为祸民间。发给官员职分田，让他们无后顾之忧，不偏不倚地工作，避免贪赃枉法。

总之，范仲淹希望利用制度将老化的官僚体系重新润滑，精简官员数目，提高官僚素质，将有限的财政用到这些合格的官员身上。

针对行政效率低下，事情拖而不决，范仲淹提出了"推恩信""重命令"两项措施，要求朝廷不要总是变动命令，一旦发布了命令，就要执行到底。

针对冗费，范仲淹提出"厚农桑""减徭役"。政府通过兴修水利、政策鼓励、减少税收的措施来鼓励农民，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同时，又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征召，合并政府机构，节省用人，减轻百姓负担，让他们安心从事生产劳动。

范仲淹提出改革纲领之后，宋仁宗经过考虑，除了府兵制不予恢复之外，其余的都下诏办理。[8]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北宋政府终于走上了变革之路，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是一个务实的人，他不提过于宏大的目标，不像后来的王安石那样，想一次性地变革朝廷的体系。他只想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下，将原来制度中已经乱套的地方重新调整好。可以说，这是一次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改革。

范仲淹的改革暗含着这几条原则：

第一，政府虽然要收税，但不是越多越好，财政应该量入为出，而不是量出为入。政府的职责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加强税收。

第二，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利，而应该只依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

第三，政府的主要问题不是财政收入不足，而是规模快速膨胀，政府的规模降下来，花费自然减少。

总之，改革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自身，要从自己身上割肉，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在中国的历史上，绝大部分改革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有少数改革是为了缩小政府规模而推行的，庆历新政属于后者。如果它成功了，那么北宋可能会统治得更长久；而如果它失败了，人们将会从另外的角度考虑问题：既然无法限制政府的规模，那么就只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到了这时，就该聚敛之臣上台了。

庆历新政的命运到底如何呢？

宋仁宗的诏书下达后，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对于范仲淹的才华，人人佩服不已。此前，宰相吕夷简在任时，压迫、驱逐了一批良臣。范仲淹受重用后，富弼、韩琦等较为正直的官员随即被启用，与范仲淹共同筹划改革方案。这时，人们对他们的政策报以极大的期待。

然而，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重要的是有人依据政策去执行。这时，事情却乱了套。

为了将那些不合格的人裁撤，将那些依靠恩荫制度上台的人弄走，必须实行严格的考绩制度，但范仲淹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推行政策，下层机构也不愿意配合。人们议论纷纷，认为改革涉及的面太广，内容太多，于是不再看好范仲淹的改革。[9]

范仲淹做了一次努力，他上书皇帝，提出政出多门，每个衙门自己

不做事，还不让别人做事，要想推进改革，必须把更多权力集中在宰相手中。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监管兵事和财政，而将其他的权力交给中书和枢密院这两府，与辅政大臣共同推进改革。

范仲淹的建议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在经过讨论之后，群臣建议皇帝否决范仲淹的提议，只授予他刑法的司法权。

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既然他有了刑法的司法权，就决定借此继续推进改革。他派出了按察使出巡各地，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揭露出来，他的改革终于激起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

官僚阶层发现，如果改革成功，首先是他们的权力被限制。改革恩荫制度之后，官员的后代当官没有那么容易了，赚钱的机会也少了，而磨勘制度变得严密之后，当官混日子也不方便了。

当整个官僚阶层开始反抗时，范仲淹知道，改革已经进行不下去了。他了解仁宗皇帝的弱点：性格仁慈，能受委屈，却对付不了会哭闹的官员。随着与西夏维持和平的希望增大，财政改革的需求也不那么急迫了，一切都在向着旧轨道滑去。

庆历新政实行了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已经无力将改革再推行下去了。恰好这时，边境传来警报，范仲淹和改革派大臣、枢密副使富弼一同申请戍边。皇帝也已经厌烦了改革，任命范仲淹担任河东、陕西宣抚使，赐予他黄金百两，将他打发走了。到了边关之后，范仲淹将这百两黄金分给了将士。

对于改革的失败，范仲淹是什么心情，历史没有过多记载，他的名作《岳阳楼记》中，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名句或许恰好反映了他的内心。这时的他已经将成败看淡了，只求问心无愧。

北宋的第一次也是最靠谱的一次改革失败了，让人扼腕不已。如果这次改革成功，也许就不会有王安石那次伤筋动骨的改革了。

庆历新政也留下了一定的成果：皇帝偶尔想起来范仲淹的建议，就会清理一批冗官。但不久后，总会有新一批冗官，帝国财政仍旧在恶

化。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也是一个财政混乱的时代。宋朝拥有最复杂的官僚体系、最庞大且无用的军队、最全面的专卖制度、最先进也是最无赖的金融工具。

宋朝的命运在它建立之初就已经注定。人们虽然反抗过，改革过，但最终都无法对抗庞大的财政惯性，政府在不断找钱中消耗着力量，最终瓦解。而北方虎视眈眈的敌人利用这个机会，吞并了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王朝。

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一支后周的军队从京师汴州北上抗击北汉契丹联军。一天晚上，他们驻扎在京师北面、黄河北岸上的陈桥驿，一场阴谋即将在这里展开。[10]

当晚，阴谋的主角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赵匡胤先喝酒将自己灌醉，回到帐中呼呼大睡。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则在外策划军队造反。到了五更时分，有组织的军人们在一种狂热情绪的支配下来到陈桥驿的驿门，鼓噪着要求赵匡胤当皇帝，他们随后向赵匡胤的寝帐进发。赵光义和赵普乘机走进赵匡胤的寝帐，将醉眼蒙眬的赵匡胤叫醒。

等赵匡胤从屋里出来，有人立即给他套上一件黄袍，众人山呼万岁，簇拥着他向京师的方向前进。

到了京师，士兵们把宰相范质带到赵匡胤的面前，范质一看大事不好，只得承认了既成事实。赵匡胤控制了京师，逼迫未成年的后周恭帝将皇位禅让给自己。另一位后周权臣韩通听说此事，立即往家跑，他跑到家还没有来得及关门，赵匡胤的手下王彦生就进屋杀了他的全家。

赵匡胤登基后，后周太尉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相继叛乱。他们被镇压之后，赵匡胤显得忧心忡忡。

从中晚唐至五代十国的一两百年的时间里，由于中央政府缺乏控制力，各地的节度使成为地方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军队，从地方收税来养兵，还有自己的官僚系统，已经完全独立于中央。

赵匡胤虽然得到了天下，但是，如果这样的结构不改变，下一次改朝换代很快又会发生。如何坐稳江山，成了他必须解决的问题。

更棘手的是，他并没有机会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他通过和平禅让获得权力，必须安抚那些推举他上台，或者默认他当皇帝的人。禅让的王朝总是带着前朝的所有问题，要想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稳固的架构更是难上加难。

帮助赵匡胤黄袍加身的赵普心领神会。他向赵匡胤提出了计策，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在政治上，削夺其权；在军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钱谷。

虽然继承了唐、五代时期的基本政治架构，但是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上，另外加上了许多的监管措施，来防止官员擅权。在唐代，宰相的权力很大，但在宋代，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还设置了副宰相（参知政事），兵权分出去，归枢密院，财权也分出去，设置了三司使，号称计相。

在地方官制上，财权、军权、行政权力也各自分离，官员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牵制。[11]除了设州县之外，宋代在州之上还有一个叫作路的机构。路不算是一级政府，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但又承担了政府的许多职能。

就这样，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最复杂的朝代，各级政府机构盘根错节，任何人即便想要反叛，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

军事上，为了对抗节度使的权力，五代时期已经形成了枢密院领兵制度。枢密使这个发端于唐代宦官、从五代时期起由非宦官担任的职务，到了宋代已经成了类似当今的总参谋部部长，掌管军事大权。

为了限权，除了枢密使之外，宋代还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组成的三衙。这三衙统领全国的禁军和厢军，负责军事训

练。三衙负责练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而打仗时还要另设将帅领兵。路、州、县各个地方政府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职务，负责当地驻军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工作。

宋代与唐初军事体制最大的不同，是初唐采取府兵制，而宋代采用募兵制。募兵制与府兵制的区别，在于兵都是招募而来的职业兵，只负责打仗，不负责生产和屯田，他们是由中央政府发工资的。募兵制相对于府兵制的优点是兵士的军事素质更高，而缺点则是养兵必须全靠政府拨款，费用高昂。

要想达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集权，就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该如何控制百姓，让他们乐意帮助政府建立集权制度呢？

赵普的提议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制其钱谷”，从财政上剥夺其独立能力，使其不得不依靠中央政府，这样才能解决财政问题。“剥夺其权”和“收其精兵”都是外在的动作，就像绑住一个人的手脚一样，虽然能够制服他，却也剥夺了他为皇帝效力的能力。只有“制其钱谷”，才能在不损害一个人的战斗力的前提下，又让他服服帖帖。

宋太祖为了剥夺各个地方的独立财权，派遣了大量的使职官僚下去。他规定，地方财政事务都由中央政府设立的转运使掌控，而地方长官（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留后、刺史等）均不管理财政事宜。

回想一下唐代后期，一份税收要分成留州、送（节度）史、上贡（朝廷）三部分，而上贡的比例有时甚至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的财政都被地方克扣了。甚至有的藩镇干脆不向中央缴税，只是不定时地送一些贡品。

唐德宗当年的窘况仿佛是长鸣的警钟，随时提醒着宋代帝王。宋太宗赵光义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整顿财政就要以唐为鉴。

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财赋，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韩滉专制镇海，积聚财货，德宗遣其子皋往求，得百万斛，以救艰危，即时朝廷时势可见矣。朕今收拾天下遗利，以赡军国，以济穷困；若豪户猾民，望毫发之惠，不可得也。[12]

财政官员直属于中央，地方官就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来插手帝国的财政了。

1992年，中国政府启动新一轮分税制改革。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在财政分配上偏向中央，地方需要花费，就由中央进行转移支付。

而一千年前的宋代，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规定税收必须都解京，即使由于交通不便无法送到，也必须在当地封存，不允许地方官员动用。

中央财政比例的加大形成了干强枝弱的局面，这是整个宋代财政状况的一条主线。

在中央，皇帝设立了三司使，专管财务。财政官员的地位提升，并独立于原有的行政系统之外，皇帝对于财政的控制权更加强了。[13]

宋太祖设立的制度如此成功，直到宋代末年，地方官僚都无法与中央政府对抗。

但是，由于宋代在前代官制的基础上设置了太多的权宜性的职位，官僚队伍膨胀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朝代。由于军权分得过散，没有人为军队的实力负责，人们从军只为养家糊口，战斗力糟糕得一塌糊涂。

冗官和冗兵，是宋代财政最大的两个包袱，怎么甩都甩不掉。

在宋真宗时期，宋代的士兵大约为九十一万二千人，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大约为九千七百八十五人。到了宋仁宗宝元时期（公元1038年—公元1040年），士兵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而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为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人。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由于天下太平，士兵人数终于降至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接受俸禄的人却立刻扩充了十分之三。[14]

宋仁宗时期的名臣蔡襄曾经统计过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的税赋收入和军事开支。税赋分为钱、绢帛、粮、草四项，其中军事开支分别占了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一百零二、百分之七

十六和百分之八十四。[15]

由于养兵养官的包袱，宋代不得不大大增加财政收入。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农业税和劳役都更加沉重。

农业税仍然以两税为主，但对两税再次做出了简化：夏税纳钱，秋税缴米。除了两税之外，又有无数的苛捐杂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义仓税、进际税、蚕盐税、曲引钱、纳醋息钱、头子钱，等等，名目繁多。[16]缴税又有不同的方式，一会儿缴钱，一会儿又折算成米，算来算去，政府就吃足了其中的差价。

由于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垦田数量超过了前代，然而，与垦田数量大增并行的，是逃亡户的增加。在群臣的讨论中，逃亡户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由于不缴税的“形势户”太多，大量的税收负担都压在普通户的头上，人们突然发现，依靠农业致富已经成了一种空想。[17]

如果一户人家想多种几棵树，他会发现树还没有长大，地方政府已经调高了他的户等和税赋，算算账，还不如把树砍掉划算。任何财产的变动都可能成为政府加税的理由，最终，人们发现当一个游民反而最省心。许多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也间接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

除了田税之外，劳役问题也十分严重。在宋代，最令人头疼的劳役是替官府出差的衙前，以及治理民间的里正。特别是衙前，本来是一个替官府出差的职位，按照现代人的理解，替官府做事是可以赚钱的。但在宋代，由于这种差没有俸禄，还要受官僚的欺负，充当差役是要倒贴钱的，成了典型的苦差。为了找人充差，政府只能强迫富裕的人家出人，但就算是富裕人家，出衙前差也可以让人倾家荡产。[18]

即便这样搜刮，随着官僚队伍和军事开支的继续膨胀，仅仅依靠农业税，仍然无法满足需要。北宋时期的农业财政收入大约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19]它的财政总收入则在一万二千万到一万五千万之间，[20]其中的差额，则要靠组织最严密的国营垄断事业来填补。

宋代发展出了最复杂的官买官卖制度。

官买官卖遍天下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一位叫作范祥的太常博士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建议，试图解决困扰中央政府的军事财政问题。[21]

由于与西夏战争造成的财政紧张，加上范仲淹改革失败，中央政府已经没有力量支援陕西边境的财政。

此刻，各地的税收已经加无可加，而各种专卖制度已经很严密，政府建立了盐、茶、香药、奢侈品等专卖机构。这些特殊的国有企业控制着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将利润压榨出来供给中央政府养官和打仗。

但政府仍然入不敷出，宋仁宗的满朝名臣都束手无策。这时，枢密副使韩琦向皇帝推荐了名不见经传的范祥，他又能想出什么办法？

范祥的办法是：用盐来养兵。

在范祥之前，宋代的食盐专卖制度是这样安排的：全国划分成若干区域，每个区域内有一个食盐产区，而这个产区的盐只能在本区域销售，否则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比如，四川地区的井盐只能在四川和三峡地区销售；浙江沿海的盐只能供应两浙地区；福建长清场的盐主要供应福建；而解州（位于今山西运城）的解盐，供应了北方的广大地区。

在每一个产地，或由政府组织生产，或者由盐农生产，但盐农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政府，不得销售给他人。政府再组织运输，将盐运往各地进行销售。不过，在销售店铺方面，规则却有一定的松动。比如解盐，在首都等核心地区都是政府直接建立零售机构，别人不得经营。但是，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政府的机构覆盖不到，就准许商人从政府批量购入再自行销售。但是，批发商人也只能在指定地区销售，如果越界，就要受到严惩。

宋代的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现在，即便盐税在现在的政府收入中已

经占比很小。直到2014年，政府才取消了盐业专卖。

虽然宋代政府已经通过食盐专卖获得了大量的收益，但是到了宋仁宗初期，食盐专卖的收益却因为另一项临时措施的出现而打了折扣，这项临时措施和政府的运输能力不足有关。

当时，在与西夏接壤的西北地区，需要外部运进大量的物资和粮食，可是运输是要花钱的，而政府没有那么多钱，无法把粮食运送到边疆地区。

为了应付运输问题，政府想出了一个主意：鼓励商人往边疆运输粮食。[22]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由于边关粮草吃紧，宋太宗请求大商人帮助政府把粮食运送到边防，当边关守将接收了商人运来的粮草之后，就开一张证明，载明捐赠物资价值多少钱，由商人将这张证明带回京师，政府把钱款划拨给商人。

商人之所以愿意接受政府的条件，是因为边关守将会把粮食的价格尽量高估，留给商人一定的利润空间。另外，政府为了激发商人的积极性，还规定商人结款时可以不要现钱，而要一些政府垄断的商品，最初主要是茶叶。垄断商品的价值更高，也更受欢迎。

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三司使王嗣宗进一步细化了规则：政府付款给商人的是百分之四十的香药、百分之三十的犀牛角和象牙，以及百分之三十的茶叶券，商人可以用茶叶券去换茶。后来改为百分之六十的犀牛角和象牙，以及百分之四十的茶叶券。

到了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宋仁宗规定商人可以向政府要现钱，也可以要求政府支付茶叶、香药、象牙或者盐、白矾等紧俏物资。[23]从此，盐进入了商人们的换购清单，政府不得不允许商人参与盐业的垄断经营。

然而，这种办法却让商人钻了空子。由于粮食的价格被高估，商人可以用较少的粮食换得较多的专卖品，更有甚时，商人往边关运送一束草，就可以获得十二斤十一两的高质量颗盐。并且，商人运输的货物质

量并没有保证，常常是劣质的。更严重的是，随着商人手中的专卖品越来越多，政府无法任意抬高专卖品的价格了。随着专卖品价格的降低，中央财政收入减少了。官员们纷纷检讨，认为这个临时性的做法对政府财政的影响弊大于利。[24]

结果，宋代的军费还没有解决，财政收入又出现了问题，可谓顾此失彼。恰好在这时，范祥推出了他的盐票改革。

范祥认为，目前的食盐专卖体系和边关运输方式都太低效了，如果将食盐票券化，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向边关运输的问题。

范祥发行了一种叫作盐钞的证券，同时不再让商人向边关运输粮食物资，而是让商人直接向边关运输现钱，按照当地市价购买物资。这样一来，成本竟然比让商人们运输物资要便宜得多。简单地说，以前边关粮草是政府安排统购统销，价格高昂，质量低劣，后来改为公开招标，价格反而便宜下来了。

商人向边关输送钱币，又能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

守将收到钱款后，会将相应数量的盐钞交给商人。商人持盐钞直接到盐产地（盐池）去提盐，再到指定地区卖盐。政府不再负责盐的运输，而交由商人自己负责。

商人不需要再跑到京师，而是直接去盐产地，也不能再要求犀牛角、象牙等东西，只能换盐，政府的负担减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人亏本，盐在宋代是抢手货，商人都乐于收购。范祥想通过改革造成双赢的局面。

到后来，商人们甚至可以把盐钞当作货币使用。在宋代北方的大宗贸易中，盐钞就是一种通用的交换媒介，商品可以以盐钞计价，用盐钞可以直接购买粮食、茶叶等物品。

当盐钞成为商品交换中介之后，政府就可以加量发行，获得更大的利益，将盐钞逐渐货币化。最后，盐钞的数量超过人们对食盐的实际需求，只有到这一步，政府才算利用盐业将利润最大化。

范祥的设计虽然很好，却并没有马上得到皇帝的认可。又拖了四年，皇帝才终于下决心实行。

一开始，盐钞制度就遭到了抵制。抵制范祥的大都是大商人。在此之前，他们把粮食运到边关，可以高估粮食价格，投机倒把，以次充好。但现在，价格已经被锁死了，他们虽然还能赚钱，但暴利已经不存在了。许多官员对范祥也不满意，因为在以前的制度下，他们能够和商人勾结，吃回扣，钻空子，现在这样的机会少了。

在商人和官员的联合抵制下，皇帝让时任三司户部副使的包拯前往调查。铁面无私的包青天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商人和官员反对，是因为他们钻空子的机会少了，但是实行盐钞制度，政府的财政浪费会大大减少，而利润相应增加，这项政策对政府是有利的。

包拯的报告让盐钞得以继续。[25]

事实证明，盐钞的实行的确给政府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到了皇祐初年（公元1049年），盐钞收入已经达到了二百二十一万，四年后稳定在二百一十五万，这四年的总收入比之前六年的总收入还多六十八万。

更重要的是，以前政府还要支出一部分钱给商人，感谢他们把物资送到了边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这笔支出就达到了六百四十七万，庆历六年也有四百八十万，由于商人不需要再到首都来领钱，这些钱都省下了。[26]

根据记载，仅仅盐法一项，就已经满足了政府百分之八十的边疆军事开支。

范祥的改革让皇帝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官卖制度可以带来很大的收益。宋代对盐业源头的垄断，就好像现代对于土地的垄断一样，会产生令人瞠目结舌的收益。现代的地方政府仅仅依靠卖地就能获得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如果把土地抵押带来的金融效益计算在内，有的地方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而宋代将盐业票券化之后，也有着类似的效果。

但这种效果却是有代价的，因为盐钞的整个流程都只建立在百姓对

盐的需求上，而这个需求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超额发行盐钞，就会形成巨大的泡沫，直到坍塌。

在实行盐钞制度之前，宋代政府甚至依靠强行摊派，规定每个人必须每年买多少盐。后来，政府不再强迫人民买盐了，但是又发行了太多的盐钞。只要商人给边关送去粮食和钱，政府就发盐钞，根本不在意是否超额。

到了宋神宗熙宁六年，民间实际的用盐量只有四十二万八千六百零一席盐（每席为一百一十六点五斤），而陕西边关发出的盐钞达九十万二千七百一十六席，已经超过实际用量的一倍。盐钞越来越不值钱。[27]

除了范祥改革之外，宋代的盐业还经过了多次改革，但整体的指导思想从来没有变化：帮助政府从民间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宋代的专卖制度大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政府垄断经营和专卖的高峰就出现在宋代，到了最后，政府已经将所有适合垄断经营的项目都收了过来。

这些专卖大都继承自五代时期，那时各个小朝廷为了应付军费开支，不断地寻找新的财源，开辟了各种专卖制度。到了宋代，这些专卖制度大都没有废除，甚至更加发达了。

宋太宗时期，实行盐、酒等专卖。侍御史田锡就对财政，特别是专卖制度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筦榷货货，网利太密，躬亲机务，纶肯稍频。臣所谓网利太密者，酒曲之利但要增盈，商税之利但求出剩。或偶有出剩，不询出剩之由，或偶有亏欠，必责亏欠之过。递年比扑，只管增加，递月较量，不管欠折。然国家军兵数广，支用处多，课利不得不如此征收，筦榷不得不如此比较，穷尽取财之路，莫甚于兹，疏通殖货之源，未闻适变。[28]

太宗去世时，王禹偁等人再次直言：

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

泽之利，与民共之。自汉以来，取为国用，不可弃也，然亦不可尽也。方今可谓尽矣。[29]

人们以为太宗已经穷尽了专卖的能事，但这只是个开端。到了宋真宗时期，由于财政窟窿太大，盐酒的专卖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朝廷瞄准了茶、矾、香等一切可能产生垄断收益的商品，而专卖产生的利润也更加丰厚。

高峰时期，宋代的正规税收只能提供百分之三十几的财政收入，而更多收入则来自于这些官僚经营机构。

由于许多垄断的物资出自海外，比如犀牛角、象牙、珍珠、玳瑁、乳香，等等，皇帝甚至将专卖制度延伸到了海外，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海关制度。[30]

根据规定，一艘海外的帆船来到中国的港口，首先必须进行登记，缴纳十分之一的物资作为税收。纳税完毕之后，官员们再拿出两个名单：第一个名单上写着只准政府采购的商品，如果船上有这些物资，必须全部卖给政府；第二个名单上是政府优先采购的商品，先保证政府的所需，剩余的才能卖给民间。

政府采购的物品统一进入官方的专卖系统，并以垄断价格进行销售。

但皇帝没有想到的是，为了维持这种专卖制度，必须雇佣大量的人来运作，而这些人都需要财政养活。为了经营，官僚集团也变得更加庞大，这些官员在帮助政府盈利的同时，也在谋取私利。随着宋代专卖制度的盛行，民间的负担也更加沉重。

到最后，政府其实做了一笔亏本买卖，除了效率低下，还产生巨大的冗员，财政问题更加突出了。

宋仁宗死后，他的养子宋英宗有心改革却英年早逝，继而上台的宋神宗终于下决心面对财政危机，进行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改革。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一场本该发生在现代议会上的激烈辩论出现在了神宗的朝堂上。辩论的双方是两个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31]

这一年，京师汴州接连发生地震，冀州一带出现了黄河决口，而河朔也发生了巨大的旱灾。为了救灾，政府花了不少钱，官员请求神宗在例行的南郊典礼中不要再颁发赏赐。按照规矩，典礼中皇帝应该给他的功臣们赏赐金帛财物。

宋神宗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请三位学士王珪、王安石和司马光前来商量。

三人中，学士承旨王珪资格最老，性格温和，人们讥笑他平生只会做三件事："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是"三旨相公"。[32]面对皇帝时，王珪果然适时地保持了沉默。

而翰林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则赞同提议，认为为了救灾，需要节省其他开支。

这时，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却把话题引向另一个方向，于是这次讨论变成了财政思想的大辩论。

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不是财政紧缩的理由，政府的正常开支不应该缩减。钱不够用，政府就应该积极理财，增加财政收入。

司马光则嘲笑对手：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政府从民间搜刮的理由而已。

王安石不同意，认为善于理财并不是要从民间搜刮。其实，聪明的官员不需要增加民间税率，也可以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做到国用充足。

司马光继续反驳：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就产出了这么多的财物，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间。所谓不剥夺民间财物，依靠理财生钱，只不过

是汉代桑弘羊使用过的花招罢了。

双方你来我往，争议不已。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还原争论的现场，而从《宋史》保留下的材料看，司马光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但事实上，王安石的观点更能打动人。皇帝最后打了圆场，宣布作为个人，他赞成司马光的提法；但是作为皇帝，姑且按照王安石的意见去做。皇帝的态度已经预示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命运。

在这件事之前和之后，王安石与皇帝都有过密切的交流，他系统地向皇帝讲述了变法思想。争论过后的第二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启动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熙宁变法。

自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后，人们就对于下一次改革如何进行议论纷纷。

范仲淹改革的突破口是整顿官僚队伍。通过整顿官僚和军队，减少财政开支，这种方法是保守的。自从他失败之后，人们意识到裁减官僚已经不现实了。

宋神宗继位后，将理财放在了最为优先的位置上。最初，他仍然采取传统思路，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制定政策，以庆历二年（也就是庆历新政的前一年）为标准来压缩朝廷开支。但司马光研究了几天，承认这个工作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他对皇帝说："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33]

当司马光等坚守传统的官员承认无法骤然完成使命时，恰好有另一个人跳出来，宣布他有妙法能够让帝国财政起死回生，也就难怪宋神宗偏向于此人了。当王安石掌权时，宋代的改革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从节省财政开支，变为增加财政收入。

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理财专家，而是一个怀有梦想，又缺乏实务经验的人。他自始至终相信，在帮助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可以发展民间经济。

王安石曾经向宋仁宗递交过万言书，详述了他的改革思想，然而宋仁宗并没有重视他的提议。[34]到了神宗时期，年轻的皇帝急于扭转财政的颓势，王安石无所畏惧的性格恰好与皇帝的期望不谋而合。

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变法条文。主线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利用政府的力量来指导和参与经济运营，搞活经济，从而获得更大的财政收入。

这个主线的唯一问题是：只要政府参与了具体的经济运营，整个市场的效率必然降低，从而造成经济的衰退。至于政府的财政增收，这的确可以做到，但这是以民间的损失为代价的。在王安石看来，这是一个把饼做大的变革，但实际上却是一场分饼大战，政府分得多了，民间必然分得少。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熙宁变法的失败。

这场变法之所以对未来影响深远，还在于王安石在集权过程中对于官制的破坏。

在熙宁变法之前，朝廷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比如欧阳修、韩琦、富弼、司马光、“三苏”等人，但这些人大都不认同王安石的变法。

司马光是典型的保守派，反对新法最甚。虽然他提不出立即见效的方法，但他极力反对新法，认为精减政府机构、减税才是王道。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争斗中都表现得很极端，为了让对方下台，不惜把反对者彻底打趴下。宋朝的官斗愈演愈烈，已经不再以是非为标准，变成了纯粹的拉帮结派。

而苏轼等人的想法更为现实。苏轼一方面看到了王安石的大部分主张不可行，另一方面看到了有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是不错的，同时，他不赞成激烈的官斗。在所有宋朝官僚中，苏轼的见解和姿态一直高人一筹。但王安石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这一派的人士也一并打倒了。

在打倒了这两派之后，王安石必须另外选择一批官员来执行他的改革，但是，随着正直大臣的纷纷离职，他能选择的只有一批“无所谓东西”的钻营之徒。这些人虽缺乏成熟的政治主张，却不缺乏自我意识，很

快就学会利用新法为自己牟利，这就更加败坏了新法，加速了变法的失败。

另外，王安石的集权主张让这些人更加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使得权力缺乏制约。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北宋终了。

从具体的条文上来讲，变法的大部分内容都在以前的历史中出现过，并非他的原创。

王安石制定的均输法，是为了节省政府的运输能力，允许主管官员（发运使）更灵活地处置税收，比如将大米卖掉换成土特产，土特产的重量更轻，也就节省了运输能力。

这个做法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著名的理财大臣桑弘羊提出。[35]在汉代，这一做法就已经出现了问题：由于发运使权力太大，搅乱了市场，因此产生了囤积居奇、强买强卖等各种不法行为。

青苗法也是一项前人的制度，不过王安石将它的规模扩大了。所谓青苗法，是政府给农民发放青苗贷款的法律。[36]当地里还是青苗时，可能是农民最缺钱的时刻，因为这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把去年的存粮都吃完了，可是今年的粮食还没有下来，青苗还没有熟。有的农民甚至把留种子的那点粮食都吃掉了，连地都种不下去。这时官府如果出面，拿出钱来将钱贷给农民，等粮食熟了再让农民还回来，这样，官府可以获得一部分利息，而农民也不至于饿死。这个想法看上去是很不错的。

可是，很不错的想法在执行的时候却必然失败。为什么？因为官僚效率的低下和粗暴。

从理论上分析，这个做法的确可行，但实行起来，如果中央政府不强行推动，各地政府就懒得理睬，不了了之。中央政府要想推动，就必须下达指标强行推进，如果官员完不成指标，就要受到惩罚。可是，一旦下达了额度指标，每年必须贷出去多少，收入利息多少，这个额度就必然被滥用。本来可能一百户农民只有五户需要贷款，但官僚系统的低效率却无法找到真正需要的这五户，反而抓到了另外的人，强行把钱贷给不需要的人，好赶快完成指标。到最后，地方政府执行青苗法就变成

了强制贷款、强行收租，把额度指标完成了事。

这就像现在的GDP攀比，或者财政攀比一样，最终的成本都转嫁到了民间，而借贷的效率反而愈加低下。这也可以看出，变法的本质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增加财政收入。

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市易法上。[37]政府想建立一个叫作市易务的机构，利用这个官方的交易平台来平抑物价，这样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完善的。只有到了现代，人们进行过社会主义实践，才意识到其中的漏洞：官方主导的流通市场必定是一个“剪刀差”横生、低买高抛的好地方，最终会成为官僚企业和关系户大赚其钱的地方，不仅不会降低市场的波动性，反而会增加不确定性。

为了降低军事开支，王安石还订立了保甲、保马和将兵之法。这些法律要求裁撤不合格的军队，同时在民间建立保甲组织，相当于是民兵资源，定期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民兵是不花政府钱的，可以降低财政压力。另外，军马以前是官方养殖，也要把军马放到农户家里去养，减少官方成本。但是，北宋时期由于职业分工的发展，农民搞军事训练不仅不会有效果，反而耽误了种田，可谓劳民伤财。

开封府有人为了逃避保甲，不惜断指自残。知府韩维上奏谈到这事，王安石却认为，这是士大夫针对他的阴谋，就算有这种事情，也说明有愚民被士大夫们挑动了，政府不应该因为有一两件这种事就放弃变法。[38]

王安石的观点跨越了千年，被现代官员们继续采用。当现代的官员面对民众对抗拆迁时，也认为这是少数人不懂得发展的道理而做出的愚蠢举动。

王安石制定的政策，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若干法律如果慢慢地实行，而不是一下子打包推出，是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的。

比如农田水利法，政府的确应该承担一定的公共工程，解决灌溉等农业发展的基本需要。中国历史上，治水的名臣辈出，经验丰富，但是这项法律必须在地方层面上落实，各个地方有水利需求，才会有效果。

如果以运动的方式来做的话，必然会因征调了太多的劳力，而对民间形成干扰。

另一个可能有好处的法律叫方田均税法。如果执行得当，对于政府和民间也都有好处。由于宋代的土地占有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加之许多本该纳税的人逃避了纳税义务，让税收负担向着穷人集中。通过重新丈量和登记土地，可以让税收更加平均。

但是，除非像北魏那样存在大片荒地进行重新规划，如果像宋代这样，所有的土地都已经被人占了，那么不管怎么调查，总会有遗漏的土地。所以，执政者一定要清楚，完全调查清楚是不可能的，必须考虑调查成本和民间承受程度，适可而止。

而王安石希望进行一次全面的丈量，还设计了一个新的单位叫作方（一百万平方步），将土地重新划为五等，重新厘定税收，有着明显的加税意图。

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执行时，民间的敌意终于越来越深，人们担心清查过土地之后，税收会加重。随着各地的抵制和恶评，这项法律最终被搁置。经过清查的土地已经达到了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九顷，约占当时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39]

在王安石的改革中，最令人感到可惜的法律是免役法。在所有的法律中，免役法是最可能成功的一项。由于宋代有着繁重的劳役，已经给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衙前和里正这两个差事，可以使人倾家荡产。

王安石制定这项法律，是想让人们缴纳一定的钱，获得免役，再用免役钱去雇佣劳役。这符合当时的需求，进行职业的分工和细化。从执行的情况来看，由于把户籍分成了五等，按照财富输钱，也将主要的出钱方锁定在了富人身上。最穷的人不需要纳税，而中间户也获得了足够的利益。

根据杭州知府苏轼的观察，杭州的三等户人家一般八年一个轮回，出差役两年，再休息六年。如果按照免役法的规定出钱免役，那么每年

需要出三四千，八年合计约三万钱左右。如果不免役，必须服役的话，那么两年的服役费用约为七万多。即便不算时间成本，仅仅从金钱上衡量，免役法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40]

但随着两派争斗的升级，不管是王安石的改革派，还是司马光的保守派，都已经不单单站在政策本身的角度看问题。变法之争演变成了党争。

王安石下台后，新上台的司马光不顾大量的反对声，将免役法废除。变法留下的仅有的正面成果也消失了。

王安石拜相之后，宋仁宗时期积累下来的一群名臣被一一拿下。吕公著、韩维、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司马光、范镇，都被不遗余力地排挤，御史刘述、刘琦、钱、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和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等也都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离任。

而王安石的党人却只有吕惠卿、蔡确、章惇等少数人，这些人都经过了党争的训练。宋代的朝廷规矩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在朝堂上斗个你死我活，抛弃了一切原则。

熙宁七年，在两位太后的要挟下，宋神宗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但熙宁九年，又重新启任他担任宰相，直到一年后，再次罢免。

即便王安石离开朝堂，他的政策也没有被废除，此时朝廷已经没有人能够主持拨乱反正，也没有人能够将他的新法坚持到底。更重要的是，他的新法虽然给民间带来了混乱，却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财政收入。

根据记载，熙宁六年，官方通过青苗法一项的收入大约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利息。[41]免役钱也是一个能够带来实实在在收入的项目，熙宁九年的数据显示，该年免役收入为一千零四十一万贯，买役支出仅为六百四十九万贯，两者的差额就是政府的收入，约为三百九十三万贯。[42]市易法的收入每年不到百万贯[43]。

除了这三项法令之外，其余的政策对财政的贡献微不足道。但这些钱大体上可以缓解一部分的财政压力。

王安石下台之后，宋神宗的改革却并没有停止。王安石主持的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理财改革，但神宗却探索了另一条路：节省资金、提高行政效率的官僚改革。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在王安石党徒蔡确的帮助下，推出了著名的“元丰改制”，对于冗官问题做出调整。[44]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吏治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中央的法令在地方执行时总是失效或者变味；而官僚机构的重叠、牵制增多，皇帝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

元丰改制的目的就是裁撤冗余机构，合并事权，提高效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皇帝整理了唐代的行政文件《唐六典》，对官制重新进行顶层设计，试图重建三省六部制的结构，将多余的官僚机构去掉，将政府管辖的事务重新装入六部的框架里。中央的权力又回归到宰相的手里。

而对财政机关而言，最主要的改革就是宋初形成的三司使权力下降，财政权力重新回归户部，由户部统一领导。

许多省、台、寺、监的临时性官员要么被裁撤，要么归并到正规的系统之中。为了避免官员任用过滥，中央还将官员纳入到一个二十五等的官阶，便于升迁和发放俸禄。

这次改革是朝代中期的皇帝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官僚干扰的一次尝试。但从实行初期，就带了极大的混乱。时间一长，各种冗官重新出现，依附在改革后的官场上。到了宋徽宗时代，已经看不到改革带来的任何效果了。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960年—公元1100年。

[2]见《宋史·范仲淹传》。

[3]见《宋史·夏国传》。

[4]见《宋史·仁宗纪》《宋史·富弼传》《宋史·食货志下一（会

计）》。

[5]见《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6]冗兵问题详见下一节。

[7]见《新唐书·兵志》。

[8]《宋史·范仲淹传》：“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9]《宋史·范仲淹传》：“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10]见《宋史·太祖纪》《宋史·赵普传》。

[11]见《宋史·职官志》。

[12]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七。

[13]《宋史·职官志二》：“三司之职，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之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其恩数廪禄，与参、枢同。”

[14]见《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15]见《蔡忠惠公文集》卷十八。四项收入的具体数据为：钱三千六百八十二万二千五百四十一贯，绢帛八百七十四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匹，粮二千六百九十四万三千五百七十五石，草二千九百三十九万六千一百一十三束。四项军事开支的具体数据为：钱九百九十四万零一百四十七贯，绢帛七百四十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匹，粮二千三百一十七万零二百二十三石，草二千四百九十八万零四百六十四束。

[16]见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十九章。

[17]关于人民被逼逃亡的最好描述，由宋太宗的一位官员给出。

《宋史·食货志上一（农田）》：“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赋额岁减，国用不充。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宽以岁时。然乡县扰之，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捐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逋，则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

[18]《宋史·食货志上五（役法上）》：“初，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

[19]《宋史·食货志上二》：“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则视当时所须焉。”

[20]《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天禧末，……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皇祐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

[21]见《宋史·食货志下三》。

[22]见《梦溪笔谈·官政二》。

[23]见《宋会要辑稿·食货》。

[24]《宋史·李仕衡传》：“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边，率高其直，而售以解盐。商利益博，国用日耗。请调丁夫转粟，而辇盐诸州，官自鬻之，岁可得缗钱三十万。’”

[25]包拯对范祥的评价一直很高，在范祥死后也为他的子孙争取优遇。《宋史·范祥传》：“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陕西盐法，行之十年，岁减榷货务使缗钱数百万，其劳可录。’官其子孙景郊社斋郎。”

[26]见《宋史·食货志下三》。

[27]《宋史·食货志下三》：“明年，权陕西转运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钞之贵贱，视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后，钞有定数，起熙宁十年冬，尽元丰三年，通印给一百七十七万余席，而盐池所出才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余席，余钞五十九万有余，流布官私，其势不得不贱。’”

[28]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29]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二。

[30]对宋代海外贸易的精彩叙述见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十七章。

[31]见《宋史·司马光传》。

[32]见《宋史·王珪传》。

[33]见《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34]《宋史·王安石传》：“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35]见《汉书·食货志》。

[36]《宋史·王安石传》：“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37]《宋史·王安石传》：“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

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

[38]《宋史·王安石传》：“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

[39]见《宋史·食货志上二》。

[40]见《宋史·食货志上六》。

[41]《宋史·食货志上四》：“六年，户部言：‘准诏诸路常平可酌三年敛散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银谷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

[42]《宋史·食货志上五（役法上）》：“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

[43]市易法带来的利润，可参考今人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

[44]见《宋史·职官志》《宋史·神宗纪》。

第十章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1]

宋代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但宋代也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另一大奇观：恶性通货膨胀。纸币造成的恶性通胀，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宋代，一直到现代仍然是各国政府敛财的主要手段之一。

纸币之所以发展，是民间抵御政府不当政策的结果。

当时的四川，是宋朝政府规定的铁钱区，在这个区域内没有铜钱流通，只有笨重廉价的铁钱。除了四川之外，陕西则属于铜钱和铁钱混合使用区域，而剩余的地方才是铜钱使用区域。

在四川，由于铁钱的价值太低，有商号发明了不记名的交子。人们可以把铁钱拿来存在商号，由商号开给交子作为存款证明。人们可以用交子做交易，不管谁持交子到商号，都可以按照票额领取铁钱。

交子最初的发行是在民间，随后由于有的发行交子的商号出现了倒闭的情况，引起了信用纠纷，政府开始限制民间发行，并最终改为政府发行。

官方交子发行之初，实行了准备金制度。但随后，政府开始加大印钞量，准备金制度被破坏。这时候的交子已经成为不可兑换的纸币。

一旦政府掌握了利用印钞来筹款的秘密，纸钞就成了最隐秘的敛财术，让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将财富吸走。

纸币猛于虎

1948年8月19日，国共内战已经进行到了后半场。为了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国民政府发行了一种新型的货币——金圆券，来取代已经贬值的法币。

按照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总额为二十亿元，并且有黄金储备作为后盾，每一两黄金兑换二百元金圆券，每一两白银兑换三元，银币一枚兑换二元，美金一元兑换四元。由于法币已经严重贬值，政府要求民间用三百万元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

然而，政府受迫于严重的财政缺口，三个月后就取消了发行限额，印钞机“嗡嗡”开动，一刻不停。到了1949年1月，发行超过了二百亿元，三月份达到二千亿元，到了5月，竟然发行了六十八万亿，超过了限额的三点四万倍。钞票发行过量引起的巨大恐慌又让纸币加速贬值，一石大米的价格涨到了价值数亿元钞票。[2]

这次超级通胀是国民政府垮台的重要因素。然而，这却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大通胀，从古至今，中国最不缺乏的就是纸币泡沫。

从近处讲，1949年之后，中国也曾发生过大通胀。从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国一共出现了四次通货膨胀，粮食、金银、面纱、工业原材料等价格轮番上涨，其原因就是财政收支的不平衡。

据统计，1949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粮食三百零三亿斤，而财政支出却达五百六十七亿斤，赤字达到二百六十四亿斤。

为了平衡收支，政府将大批的纸币抛向市场。自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到1949年年底，一年内通货增加了一百六十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二百七十倍。结果物价横飞，人们纷纷囤积粮食，爆炒金银。中央政府决定打击投机倒把，禁止私藏银圆。

到了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取代第一套人民币，规定第二套的一元兑换第一套的一万元。这次通胀虽然没有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的通胀猛烈，但在几年内贬值一万倍，也可以称之为一次巨型通胀。

而在中国台湾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局必须发行另一种货币“新台币”来取代“台币”，一元新台币换四万台币。

当我们以为纸币的通胀只是现代人的产物时，历史却告诉我们，从宋代纸币诞生之初，纸币就承担着帮助政府制造通胀、从中渔利的重任。大大小小的通货膨胀也是花样百出，一次比一次热闹。

由于北宋使用了交子、盐钞、盐引等多种信用工具，物价横飞。从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到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物价涨了五倍，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涨了十二倍。物价之后进入了崩溃的节奏，纸币贬值率达到了几十倍，最后政府不得不将部分批次的纸币直接作废，使得持有这些纸币的人们倾家荡产。[3]

南宋由于更加依赖纸币，并且通过偷偷加印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结果纸币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贬值，原本一贯的纸币只值铜钱五六十文，贬值了大约二十倍。

而更为严重的贬值出现在金代。这个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在使用纸币这一点上也不甘落后。于是金代的纸币展现了“连续迭代”的能力，一种纸币失败了，立即用另一种纸币顶上；新纸币不行了，再换一种更新的纸币。[4]而整体的通货膨胀率，即便按照保守的估计，也达到了数千万倍，比国民政府时期的金圆券有过之而无不及。

金代的纸币最初叫交钞，出现于海陵王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到了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时，每贯纸币只值一文铜钱，贬值了一千倍。于是，政府决定禁止钱币流通，全部用钞，市场出现了巨大的紊乱。

第二年，金代决定为交钞改个名字，叫“贞祐宝券”，但仅仅改名字，并无法提振人们的信心。

两年后（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随着贞祐宝券成为垃圾票券，政府决定发行一种“贞祐通宝”来替代“贞祐宝券”，两者的兑换比是一比一千，将钞票贬值了一千倍。

为了保证“贞祐通宝”的价格，政府规定，四贯“贞祐通宝”与一两银子是等值的。但很快，由于政府纸币发行量太大，“贞祐通宝”也出现了大幅度贬值，一两银子可以兑换八百贯纸币了。

四年后（兴定五年，公元1221年），政府再次发行新纸币，称为“兴定宝泉”，与“贞祐通宝”的兑换率是一比四百，规定每一两银子值两贯“兴定宝泉”。

随后，“兴定宝泉”又出现了大贬值，政府只好在两年后（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再次发行了“元光重宝”和“元光珍货”。到了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又发行了“天兴宝会”，此时距离金代灭亡已经咫尺之遥了。

到了朝代末期，由于财政的失控，政府控制的纸币贬值速度也呈现加速状态，经济出现巨大的通胀，更无力抵抗社会和军事危机。

元代、明代也都有过恶性的通货膨胀，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纸币仍然是政府最隐蔽的财政工具。纵观中国纸币发展史，可谓是“纸币猛于虎”也。

只要存在纸币的垄断发行，政府利用纸币补贴财政就是一种天然的行为，不管人们如何防范都没有办法制止。当财政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诱惑谁也无法抵挡。

随着20世纪世界各国都进入了纸币时代，原本属于中国专利的超级通胀也奔向了全球。这时回到源头去看一看，了解纸币的缘由和发展，更有助于了解未来世界的走向。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大约是在宋仁宗天圣元年之前，益州知府寇瑊接到了数起金融诈骗报案。[5]这些金融诈骗的手段非同寻常，在此之前还没有出现过。诈骗是通过一种存款凭证完成的。

当时，益州（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钱庄联合发行了一种存款凭证，每当有人将钱币存入他们的店铺时，就发给储户一张纸作为存款凭证，这张纸叫交子。交子是统一印制的，上面印着风景人物，以及各个店铺特殊的印记、押字，避免伪造。当人们拿钱过来，店铺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数额，交给储户。储户随时可以用交子来提取现款，只需付少量的手续费。

叙述到这里，交子貌似和现代普通的存款凭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

这种纸却有着另一番魔力。由于市场已经认可了交子，人们可以把它当钱花，拿着交子就可以去市场买东西。卖家收了交子之后，可以去钱庄取现钱。甚至卖家也不愿意去取钱，他们觉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现钱更方便，金属钱币太沉，一张纸却既不占地方，也没有重量。

但是，当市场认可了交子之后，问题却来了。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几家由于经营不善，把存款人的钱花掉了，他们发行的交子已经无法完全兑现。

当人们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拿着交子上门要求兑钱，这几家富商开始四处躲避，人们找不到他们。即便抓到了，最多也只能兑换百分之七八十，不给全额了。

寇瑊到任后，接到了数次报案，决定清理交子乱象。他发现，这十六家富商来历不小，持有政府颁发的特许经营权，也就是说，政府特许经营他们发行交子，给了他们诈骗的机会。

寇瑊劝说这些富商收手，不准他们再发行新的交子，把印刷的母版也给毁掉了。而旧的交子也在逐渐清盘，退出市场。

寇瑊认为他的做法杜绝了类似的金融诈骗，作为政绩，将此事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上呈皇帝。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寇瑊的做法，甚至指责他干扰了市场。

恰好这时，薛田取代了寇瑊担任益州知府。薛田和转运使张若谷两个人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交子不能作废，因为一旦作废了交子，将在整个四川地区引起巨大的混乱。[6]

为什么交子对四川如此重要？

如果看得长远一点，就会发现它是一千多年以来民间最大的金融创新，代表着民间社会对中央集权式的金融体系的反叛，也解决了从汉代以来一直困扰着民间的问题——钱荒。

自从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国有之后，政府的低效就一直让民间缺钱。在中国古代，把这种现象叫作“钱荒”。

所谓钱荒，是指与经济规模相比，铸币的数量总是不足，而铸币的质量也总是持续低劣。每个朝代之初，货币质量是最高的，但由于政府的造币能力不足，铸造的钱币数量有限，人们无法找到足够的货币进行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谓的铜钱大部分都已经不是铜了，而是铜、锡、铁和各种合金的杂合体，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

政府通过铸币从民间抽取了过多的资源，却总是生产不出足够的货币数量。

以唐代为例，唐代已经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但是唐代的货币数量却一直不足，政府没有能力铸这么多钱，却又禁止民间铸造。[7]

于是，民间只能偷偷地铸钱用来交易。唐代的钱币是唐高祖发行的开元通宝钱，每一千枚钱币重六斤四两。民间铸币质量要差得多，他们只能偷偷地跑到山里，用小炉子熔化铜块，钱模的质量也比不过官钱。但由于缺钱，民间社会就连这样的钱币也一样接受。

唐高宗时期，民间的私铸行为已经非常严重，他下令不准恶钱流通，但屡禁不止，只能听之任之。

唐玄宗时代，宰相张九龄曾经提议放开民间铸币权，政府只关心钱币的质量，只要质量合格，不管谁铸的都可以流通。如果他的办法得到采纳，那么民间铸币的质量会提高，钱荒也会缓解。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8]

随着唐代商业的发展，即便把民间铸的不合格钱币都算上，仍然满足不了金融需求。民间社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使用帛来进行交易。

在唐代，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蚕和织帛。帛是一种最常见却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政府接受的一种纳税工具。久而久之，帛也成了一种民间接受的货币，在没有铜钱的地方，人们就用帛来代替铜钱。

只是，帛并不是一种良性的货币，它的保质期是有限的，时间太长就会变脆和损坏。它也不具有无限可分性，分割过小就失去了使用价值。

“安史之乱”后，到了唐宪宗时期，现金更加缺乏，人们手头有了铜钱也舍不得用掉。政府要求人们不得私自将铜钱贮藏起来，除了留够手头花的钱，其余的钱都要上缴，用这种办法逼迫人们将铜钱留在流通领域，而不是藏在家里的地板下。

民间为了对付铜钱短缺，发明了将一吊钱扣除八十文的做法。如果在交易中付现款，一吊钱只用付九百二十枚，打九二折。

由于铜钱过于难得，唐代后期的各个地方政府还都采取了限制货币流通的方法，规定商人不得携带钱币离开辖区。商人的天性就是使财富流动，当他们无法把钱在全国进行转移时，商业就受到了抑制。这时，民间就发明了一种规避的方法：飞钱。

所谓飞钱，是一种汇兑方式。[9]人们在成都把钱交给当地的汇兑商，由汇兑商颁发一张凭证，拿着这张凭证，就可以到长安的汇兑所取钱。人们不用再带现金离开，避免了路上关卡的阻拦。

飞钱的出现，是民间利用技术手段突破行政管制的一次尝试。飞钱最需要的技术是雕版印刷术。唐代后期，正是印刷技术取得突破的时候，商人们恰好利用了这一点。

宋代的交子，就是借鉴了飞钱的技术，来解决宋代特有的金融管制问题。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如果宋仁宗早期的一位商人要在全国做生意，会由于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面临许多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新鲜事。

比如，如果一个住在成都的盐商想去陕西卖盐，再把收入带到京师汴州去购买房产。那么他应该怎么做？按照现代人想法，他可以直接从成都批发盐，送到陕西卖掉，再把钱带到京城。但是在宋代，他却要经历无数的折腾。

为了做这个貌似简单的生意，他必须耐心地完成如下几步：

第一，宋代政府规定，食盐不得跨界销售，虽然四川也产盐，但是四川的盐严禁进入陕西地区。这位商人只能带上钱，到陕西所在的盐区去批发盐。

第二，宋代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钱币。四川是铁钱使用区，只准使用铁钱。铁钱相对于铜钱要沉重得多，四川铁钱在其他地方也不被接受。他不能直接带上钱出发，而是必须持巨量的铁钱到成都的钱商铺子，换取钱商的汇款凭证。再拿着凭证前往长安，从当地钱商手中拿到陕西的钱。

第三，即便拿到了陕西的钱，他还是无法直接去批发盐，因为盐是由官方垄断销售的。由于宋仁宗早期还没有推行范祥的盐业改革，[10]所以，这个商人必须拿着钱先去购买粮食等军需物资，再把粮食送到边关，让边关守将给他开一张凭证，证明他对帝国国防的贡献。

北宋政府之所以要这么折腾盐商，是因为政府运力不足，希望商人都有爱国精神，帮助政府把粮草送到边关。所幸北宋的疆域是有限的，边关地区距离长安也不远，只需走几百里。

第四，离开边关后，商人得到了这张凭证，但这只是生意的开始，他还得越过陕西，前往伟大的帝国首都（京师汴州），把凭证兑换成盐票，这些盐票相当于计划经济的配额指标，注明他能够购买多少盐。

第五，商人带着盐票，去往盐产地提盐。北方的盐产地主要在山西解州，这里生产的盐叫解盐。于是商人离开首都后，又马不停蹄赶往山西去领盐。

第六，当商人从解州领了盐之后，还只能在指定地区销售。陕西属于指定地区之一，他带着盐从山西再回到陕西。

第七，假设他这次足够幸运，顺利地卖掉了手中的盐。当他卖掉了盐，拿到了陕西的货币之后，会发现钱币里既有铜钱，也有铁钱。陕西是铁钱和铜钱混用的地区，但是，京师汴州却只使用铜钱。如果他把陕西的铁钱带到了汴州，不仅毫无用处，还可能违法。他只好再找一次汇钱商，把手里的铜钱和铁钱都交给汇钱商，领取凭证，到汴州取钱。

第八，当商人带着汇兑凭证，从陕西再次到达首都，他的旅行才告一段落。整个过程是三过长安（陕西），两到京师汴州，一进山西，一到边关，才完成了这貌似简单的生意。当他取了钱，买了房子，躺在首都舒服的宅子里时，回想起一路的艰辛，其中的感慨或许能让他“词兴大发”，填几首词出来。

上面的例子足以描绘出北宋围绕着金融、国防、盐业等垄断行业所产生的复杂的贸易体系。北宋是中国金融体系最复杂的朝代之一。

在北宋之前，一个统一的帝国只有一种金融制度，但是北宋的金融制度却是七巧板式的，每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特点。[11]

如果不去追究更多的细节，北宋可以划分成三大区域，在四川地区是铁钱使用区，而陕西等地是混合使用区，剩下的地区是铜钱使用区。[12]

为什么要划成三块，而不使用统一的金融制度呢？这要从历史和政治继承性说起。

唐朝灭亡之后，国家散裂成为五代十国的各个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由于战争不断，它们大都财政窘迫，铜钱不足，为了应付局面，有的地区发行了铁钱。

中国发行铁钱的历史也很悠久。东汉开国时，四川地区曾经被一个叫作公孙述的军阀占领，他发行了大量的铁钱来解决金融问题。[13]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再次大规模发行铁钱，货币堆积如山，物价腾贵，人们拉着整车的钱去买东西，有时候甚至连具体的数目都不算，只看有多少串。[14]

由于铁不是稀缺金属，与铜的比值相差很大，所以在同样购买力的情况下，铁币的重量要大得多。对于任何一个发行铁钱的统治者，这都只是穷于应付，不得不采取的办法罢了。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位于四川的后蜀由于货币不足，也发行了铁钱。[15]

后蜀的孟氏在四川发行铁钱后，规定民间须将铁钱和铜钱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使用，也就是一吊钱中必须有铜币若干，铁币若干，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补充铜币的不足。

当北宋并吞后蜀之后，中央政府乘机对四川地区进行了金融劫掠。地方官为了上贡，将大部分的铜钱都运出了四川，四川这个原本的铜铁币混合使用区只剩下了铁币。[16]

由于北宋初年，全国还没有统一，而铜矿大多位于境外的其他国家，铜币铸造量不足。北宋政府干脆决定，乘势将四川变成一个铁币使用区域，只在这里发行铁币，不准铜币流入，也不准四川铁币流出。这项特殊的政策制造了全世界罕见的铁币区。

陕西的情况又与四川不同。在北宋初年，陕西和北宋其他部分领土一样，都使用铜币。但随着西夏崛起，宋夏间的战争连绵不绝，而陕西则是战争的主要后方。到了宋仁宗时期，为了应付经费的不足，朝廷考虑采用四川的方法，铸造一批铁钱投向市场，将陕西从铜钱区变成铜铁钱混合使用区域。

除了铁钱的问题之外，陕西还有大小钱问题。在铸币过程中，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仅铸造和铜币一比一兑换的铁币，还铸造了所谓的大钱。大钱也分铜和铁两种，每一枚大钱可以兑换十枚正常的钱币（称为小钱）。这时，陕西就有铜钱大钱、铜钱小钱、铁钱大钱和铁钱小钱，一共四种货币。[17]后来，河东路（山西中南部和陕西部分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通行铜铁大小钱。

陕西（和河东）地区变成了铜铁钱混合区之后，立即引起了民间金融秩序的混乱。在这四种钱币中，最不值钱的是当是大铁钱，所以民间竞相私铸这种铁钱。后来，官府意识到比值是不合理的，改为一枚大钱当三枚小钱，后来改为当两枚小钱，民间才慢慢把大钱接受下来。

可民间虽然接受了大钱，对于铁钱还是很排斥。逐渐地，两枚铁钱只能当作一枚铜钱用，甚至三枚铁钱换一枚铜钱。

币制也是朝廷大臣们交锋的主要论题之一。著名大臣欧阳修曾经去

河东路考察过当地的币制，回来写了封札子（《乞罢铁钱札子》）向朝廷汇报。他的结论如下：

1.河东有两个铸造铁钱的钱监，分别位于晋州和泽州。两监共铸了大铁钱四万四千八百余贯（折合小铁钱四十四万八千余贯），小铁钱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

2.晋州铸造大铁钱的利润（用铜钱购买铁，再铸造成铁钱，铁钱的面值与成本之比）有十五倍之余，铸造小铁钱的利润只有一倍有余。泽州铸造大钱利润二十三倍有余，小钱利润两倍。

3.铸造小铁钱并不划算，虽然看上去有一两倍的利润，但扣除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加上铸造的数量有限，实际盈利的总额是很少的，所以不值得铸造小铁钱。

4.铸造大铁钱的利润很高，但由于利润过高，人们铤而走险偷偷私铸，官府也屡禁不止，最终反而扰乱了市场。

基于上面的理由，欧阳修请求废除河东地区的铁钱。

欧阳修的结论是经过细致考察后得出的。但这个结论可以引起人们的称赞，却不会引来皇帝的实际行动。当财政吃紧时，政府几乎不可能放弃任何一笔收入。

除了这两个特殊区域之外，其余地方主要使用铜币。北宋的铜币发行量巨大，好年份可以达到汉唐的几倍至十倍。宋神宗元丰三年，曾经最高达到五百零六万贯，也就是五十亿枚钱币，表明北宋经济的发达。[18]

但即便是这么大的发行量，政府都没有试图去减少铁钱，回归铜钱。发行量再大，政府都感到不够用。花费巨大的战争、贪食的冗官，让北宋的财政左支右绌，无力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到这时，四川的民间力量开始苏醒，创造性地发明了纸币，来解决铁钱难题。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

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四川发生了王小波、李顺之乱。

叛乱中，位于四川的各个铸造铁钱的钱监都不得不停了工。在这之前，四川每年都铸造数十万贯的铁钱；当钱监停工后，民间立即出现了钱荒。

在叛乱之前，四川人就一直苦于铁钱的不方便，探索着更加便捷的支付方法。

在宋代，四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规模仅次于江南。可是，四川铸造的铁钱大钱每贯重达十二斤，小钱每贯也重达六点五斤。[19]而铁币的购买力却小得可怜，一匹绢的价格大约是二十贯铁币，[20]也就是一百三十斤重。一个女人如果出门买一匹绢，需要额外带一个壮汉当背夫，这人不是为了拿货，而是为了拿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庄发行了一种特殊的存款凭证。由于铁钱太重，人们直接拿这种凭据参与日常交易，把它变成了事实上的纸币。

这种存款凭证与唐代的飞钱类似，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飞钱只是一种汇款工具，需要汇款人本人到异地领取。而这种新的凭据却是在本地使用，并且具有匿名的特性，已经接近于现代钞票了。

到了叛乱发生之后，由于钱荒的发生，这种存款凭证突然间变得更加流行，参与其中的钱庄数量也大大增加。

在发行凭证时，私人钱庄突然发现可以偷偷地多发行几张，供自己使用，这多发的凭证并没有人存钱，是虚发行的，没有准备金。只要人们不同时都来兑换，就不会有露馅的风险。

但是，当所有的钱庄都偷偷增加发行量，风险就产生了：总会有不谨慎的钱庄发行过度，到最后无法兑现。只要有一张票据没有兑现，其他持有票据的人听说了，就会赶快前来兑钱，这时就会发生挤兑行为，让市场出现混乱。

到了宋真宗时期，一位叫作张咏的官员担任了益州知府，钱庄多发凭证引起市场不稳定的现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之下，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改革，将发行凭证的钱庄限定在最有财力的十六家，并形成一定的联保机制，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21]

在这时，这种纸质的凭证已经有了名字：交子。不过由于是私人发行的，后来人们称之为“私交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子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再也不想回到如同扛蒜辫一样携带铁钱的时代。但是，十六家发行商由于财力的不同，也出现了分化。钱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放贷，当人们把钱存进了钱庄，钱庄就会把这部分钱贷出去收利息，人们存入的钱并不随时都放在钱庄里。

可是，有的钱庄管理得好，能够随时满足人们的提现要求，有的钱庄管理不善，就发生了现金流断裂。加上发行交子带来的更加复杂的管理问题，十六家发行商中有的渐渐落伍，有的成为优胜者。

落伍者由于无法拿出足够的现金，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来付现，一个人带一贯的交子来，钱庄只能付给七百到八百现款。甚至，有的钱庄在提款人到来时，干脆闭门不出，让他们无法得到现款。

当官司越来越多时，政府开始第二次审视起交子这一问题。

此时已经是宋仁宗初年，担任益州知府的就是寇瑊。

寇瑊决定废除交子。他劝说钱商王昌懿等人关闭了交子铺，并逐渐把钱退给了存款人。然而，当他将这个问题上报给皇帝时，朝内却引起了一场关于交子存废的大讨论。

寇瑊代表的是废除交子的一派，但在他上呈报告之后，就离开了益州，被调往别处，接替他的是一位叫作薛田的官员，与薛田搭档的是转运使张若谷。[22]

两人调查后，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薛田认为，由于交子便于使用，要想废除交子已经不现实了。如果政府明文废除，只会将交子逼入地

下，更难管理。

与两人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后来的交子务负责人孙甫。他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23]

可是，薛田和张若谷虽然不赞成废除交子，但也并不赞成让私人发行交子。两人提出，与其让私人赚钱，不如将交子收归官营，由政府来赚取利润，补贴财政的同时，又让民间也享受交子的便利。

于是，在民间发明了交子之后，官方跳出来赤膊上阵，将交子业务国有化了。

同一年，薛田主持成立了益州交子务，负责发行纸币。此时的纸币与民间自行办理时又有了变化。民办时期，每张纸的金额是不同的，需要现填；而官办时期，交子更加标准化了，政府事先印好一贯到十贯的数字，这就和现代的纸币完全一样了。

另外，关于交子还有几个特点：

首先，交子并非凭空发行的。每发行一贯的交子，必须有一定的准备金。最初时，一界交子印行的数量是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而官方为此准备了三十六万贯的准备金。[24]虽然保证金不是足额的，但考虑到人们不会同时提现，三十六万贯已经足够安全，保证了金融稳定。

其次，交子有界的限制。每界三年，到第四年头则发行新一界的交子，同时将旧交子换回并销毁，保证市面上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五万贯的流通量，避免产生通货膨胀。

再次，交子只在四川使用，不得出四川界，在四川作为钞票，但在其他地方只是废纸。

最后，交子实行铁币本位的，它标明的面值都用铁币来衡量。

宋代是金融创新的朝代，除了交子之外，在北方，特别是陕西使用

的盐钞也是一种信用票据，即用盐来计算财富。可以说，盐钞就是一种用盐作为准备金的货币。

薛田和张若谷将交子发行权收归政府，结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时代。

在十六家“私交子”时代，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是，随着市场的优胜劣汰，不合格的参与者逐渐被淘汰，那些优胜者将有非常高的信誉和足够强的实力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市场竞争虽然残酷，却又高效无比，能够产生最优质的产品。

更多信奉政府的人总是认为只有国营才能保证质量，但是，官方垄断了发行之后，交子是否更可靠了呢？它是否能够避免贬值问题？

有时，政府的确想保证质量，但大部分时候，政府不仅做不到，还在偷偷地利用纸币敛财……

最隐蔽的敛财术

纸币为什么会贬值？

如果暂时把中国放一边，来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会发现纸币的发行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与某种硬通货挂钩。在20世纪之前，世界上所有使用纸币的国家，都会将纸币和金、银或者铜钱挂钩。一元钞票相当于多少硬通货都有定数，人们随时可以拿纸币去兑换。

只有在少数战争时期，政府管制金银，才临时性地限制纸币兑换，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恢复与金银的兑换比率，实行自由兑换。在这个时期，纸币由于与硬通货的挂钩，是不会贬值的。

只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发明了一种不与硬通货挂钩的纸币系统。到了现在，各国发行的纸币都已经浮动，不再与任何硬通货挂钩。但这样的体系只不过实行了几十年，却已经造成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即便是被人们奉为楷模的美国，其平均通胀率也是使用纸币之前的数十倍。而不管是魏玛德国、国民政府、俄罗斯，还是津

巴布韦，都出现过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通胀。

从世界的经验看，只要纸币不与硬通货挂钩，就必然产生通货膨胀。许多政府就依靠印钞票制造通胀，从社会的手中夺取财富。

这个规律在世界上算是新经验，而在中国，却已经是老智慧。交子出现之后，宋代政府就已经有了利用纸币来筹钱的实验。这个实验在北宋时期还是小心翼翼的，到了南宋则加速并失控。而与南宋一河之隔的金国，则由于效仿时用力过猛，脱缰野马般直接进入了超级通胀状态。

最初，四川官方的确想把交子作为一个有信誉的金融工具。在很长时间里，官方都遵守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的限额，没有加印或偷印钞票，交子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了。由于铁钱过于笨重，许多人甚至宁肯多出点溢价，也要持有交子，放弃铁钱。

宋真宗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虽然每年向辽贡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但由于和平的实现，经济的发展，政府没有破坏金融稳定的动机。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事情出现了变化。由于宋仁宗不承认西夏人当皇帝，双方进入了战争状态。这次战争使得宋代政府立刻入不敷出。在四处搜刮民财的同时，一切审慎的金融政策就靠边站了。

宋仁宗庆历年间，边关吃紧，朝廷让商人把物资送往前线，却拿不出现钱来支付商人的服务。中央政府让四川多发行了六十余万贯的交子去支援陕西，这是交子第一次走出四川，在陕西试行。多印的交子没有准备金作为支持，有一定的破坏性。

庆历年间也是铁钱在陕西逐渐流行的年份。铁钱的发行让陕西也陷入了与四川一样的困境。由于铁钱的购买力太低，过于笨重，运输成了大问题。

到了宋神宗时代，由于西夏战争的消耗，财政更加困难，中央政府决定直接在陕西实行纸币。这次不是用四川交子援助陕西，而是陕西设立独立的交子办公室（交子务）发行纸币。但这次发行和四川不同，四

川有较为充分的准备金做后盾，而陕西却没有，所以发行并不成功。陕西此时已经有了另一种纸质凭证：盐钞。交子的发行，还影响了人们对盐钞的使用，可谓得不偿失。政府停止了在陕西印刷交子的工作。[25]

四川的交子发行规则是发新收旧，每隔三年发行一次新纸币，规定人民必须拿旧纸币按照原价兑换成新纸币，但是需要缴纳三十文的工本费。这种做法保证了市面上流通的交子数量始终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了应对财政危机，中央政府再次打起了交子的主意，命令四川多发行一界交子，却并不按惯例把老一界的交子回收。[26]

于是，市面上两界交子并行，纸币量一下子扩大了一倍，但准备金却并没有增加。转眼之间，政府就将相当于十二亿枚钱币的财富从民间转移到了自己手中。

与政府发行量的扩大相应的是，市面上纸币贬值，交子出现了折价。一贯的交子已经换不来一千枚钱币，只能按照大约九五折的价格进行兑换。

与此同时，随着纸币数量的增多，四川的交子逐渐向北方扩散，开始在陕西流通，更进一步影响了盐钞的生意。政府下令，在陕西禁止使用四川交子，将通货膨胀的压力留在了四川境内。

此时，政府对于纸币的性能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皇帝意识到，虽然没有准备金，但即便政府偷偷地超量投放了纸币，人们一开始既不会发现，也没有力量阻止，就像在酒里兑水一样，只要不过度掺水，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是没有人会在意的。

这对于政府不啻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只要动一动印钞机，多印一点钞票，就立马可以缓解财政危机。既然印钞票这个动作这么简单，又何必兴师动众去加强什么正规税收呢？

执政者并没有意识到，用纸币敛财的确是短期通往天堂的道路，但长期这么做，经济就会失控。

于是，中国纸币发行失控的时期终于到来了。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政府又多发了十五万贯交子。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又多发了四十八万贯。这些纸币主要用来应付陕西边境的开支，禁止陕西使用交子的法律也已经松动，不再有效。[27]

从这时起，政府印刷的纸币已经不再受数量的约束，在四川和陕西，交子越来越泛滥。到了宋徽宗时期，在蔡京的主持下，纸币和盐钞等宋代的新发明，展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引起了世界上第一场新技术条件下的金融大泡沫。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993年—公元1100年。

[2]见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四册第三编第十四章。

[3]关于宋代物价的讨论，见漆侠《宋代经济史》。

[4]金代货币的记载取自《金史·食货志》。

[5]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

[6]见《宋史·薛田传》《宋史·食货志下三》。

[7]见《新唐书·食货志四》。

[8]《新唐书·食货志四》："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为钱以通贸易。官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宜纵民铸。'"

[9]《新唐书·食货志四》："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10]见第九章第三节。

[11]北宋钱币体系参考《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

[12]《文献通考·钱币考》："铜钱一十三路行使：开封府界，京东

路，京西路，河北路，淮南路，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铜铁钱两路行使：陕府西路，河东路。铁钱四路行使：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13]《后汉书·公孙述传》：“是时，述废铜钱，置铁官钱，百姓货币不行。”

[14]《隋书·食货志》：“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

[15]《文献通考·钱币考》：“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

[16]《宋史·食货志下二》：“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

[17]《宋史·食货志下二》：“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

[18]《文献通考·钱币考》：“（元丰三年）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每年铸铜、铁钱五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

[19]《宋史·食货志下二》：“大钱贯十二斤十两，以准铜钱。嘉、邛二州所铸钱，贯二十五斤八两，铜钱一当小铁钱十兼用。”

[20]《宋史·食货志下二》：“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

[21]见《宋史·食货志下三》。

[22]《宋史·食货志下三》：“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23]见《宋史·孙甫传》。

[24]《文献通考·钱币考》：“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

[25]见《宋史·食货志下三》。

[26]《文献通考·钱币考》：“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

[27]《文献通考·钱币考》：“绍圣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乏用，请更印制。诏一界率增造十五万缗。’”《蜀中广记·方物·钱》引费著《钱币谱》：“绍圣元年增一十五万道，元符元年增四十八万道，祖额每界以一百八十八万六千三百四十为额，以交子入陕西转用故也。”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溃[1]

北宋末年，中央政府的财政几乎年年赤字，甚至财政收入只够满足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三。当群臣束手无策时，只有一位大臣可以解救皇帝于水火，这个大救星就是蔡京。

蔡京的敛财手段包括：第一，将纸币从四川引向全国，发明一种叫作钱引的货币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第二，加大食盐的票据化，把盐票当作第二货币使用。

通过这些做法，蔡京实现了中国政府第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大量的纸片从政府飞到民间，将民间的真金白银和粮食掠走。

蔡京的做法造成了民间金融系统的崩溃，当金兵入侵时，政府再也筹集不上新的财富来抵御外辱，北宋灭亡。

南宋末年，当政府不得不靠印钞票度日时，再次出现了恶性通胀，南宋纸币会子出现八十几年后，印刷数量已经扩张了六十多倍，到了崩溃时期，更加疯狂的印钞行为让纸币彻底失去了信誉。

为了挽救纸币信誉，并为政府筹措财政，贾似道在南宋末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政府从富户手中购买多余的土地，把土地作为公田。之后，再把公田出租，获得租金收入，这些租金就可以养活军队和用于战争。

但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购买土地，只好印制钞票。而政府也经营不好公田，反而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这一次回买公田以及之后引起的巨大混乱，剥夺了南宋最后的生存机会，它再也无力抵御北方的入侵。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皇帝下令召集了几个工匠进入宫城。在宫城的南门内，是一组叫作大庆殿的宫殿群，这里是皇帝平日上朝、大宴群臣的所在。这组宫殿群的正衙殿叫文德殿，文德殿的南门叫端礼门。[2]

几个石匠带着一块刻好的碑，立在了端礼门外。由于这里是朝臣们上朝必经之地，显得非常醒目，官员们每天从此路过，都可以看到上面的碑文。

碑文是皇帝亲笔书写的，上面有一百二十个人名，分为几大类：一类是宰相，以文彦博为首；一类是官小一些的侍从，以苏轼为首；一类是更小的余官，以秦观为首；一类是内臣，以张士良为首；一类是武臣，以王献可为首。

这些人是皇帝认定的“元祐奸人党”的成员，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决心：凡是活着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夺封号，殃及子孙。

皇帝之所以动这么大肝火，是由于王安石变法之后派系斗争带来的恶果。

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死后，九岁的宋哲宗当上了皇帝，此时由宣仁太后（英宗的皇后）执政，司马光、范纯仁等反对变法的旧党重新上台，废除了新法。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宣仁太后死去，哲宗亲政后，召回了新党的章惇等人，恢复了新政，打击旧党。

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此时掌握政局的是向太后（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再次召回了一批被章惇等新党徒贬斥的旧党成员。

但向太后只执政几个月就死去了，宋徽宗得到了亲政的机会。他立即着手制定政策，大肆打击旧党。就连新党的章惇、曾布也因为曾经反对宋徽宗继位而受到了打压。

执政第二年，宋徽宗已经羽翼丰满，随即推出了党籍碑，禁止元祐

党人以及其后代在京城任职，彻底与旧党决裂。

但这次的打击只是开头，宋徽宗对于旧党的打击一直持续不断。立碑两个月之后，他禁止了元祐党人的学术著作。

次年（公元1103年）四月，徽宗将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人在宫廷里的画像全部毁掉，同时下令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到了九月份，皇帝仍然感到不过瘾，命令全国各地都要刻《元祐奸党碑》，并时时刻刻注意不要让他们的学说得以传播，否则严惩不贷。

到了第三年（公元1104年）六月，皇帝的措施再次升级，他把元祐奸党的花名册重新进行了整理，从一百二十人调整到了三百零九人，新党的章惇等人也列入了名单。这次的碑文由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书写，发往全国进行摹刻，以儆效尤。这也预示着，未来二十年的北宋政权将进入蔡京时代。

宋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有两位，分别是北宋的蔡京和南宋的秦桧。但与秦桧不同的是，蔡京从本质上是一个偏重于财政的“能臣”。他在任上进行了复杂的财政改革，目的只有一个：帮助皇帝获得收入。在当时，由于其余大臣对于帝国的财政已经无能为力，所以，皇帝才不得不倚重蔡京，将脏活、累活一并丢给了他，让他主宰政坛二十年。与其说蔡京是奸臣误国，不如说是宋徽宗的财政挥霍让蔡京不得不进行改革，而财政改革的失败最终葬送了北宋王朝。

宋徽宗上台时，由于前代的积弊，冗官、冗费问题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虽然宋神宗试图对官制进行改革（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限制官员人数，落实事权。但在宋神宗死后的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到公元1094年），人们就又开始抱怨官员人数太多，不仅比改制后几年有所增加，比改制前也增加了。[3]而到了徽宗时期，官员更是多如牛毛，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比起元祐时期，用当时官员自己的话说，又增加了数倍。[4]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政府官员人数已经达到了四万六千多人，[5]比宋仁宗时期扩大了三倍。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户部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支出，几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现，甚至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四分之三。[6]

但就在户部仰仗皇帝解决问题的时候，皇帝花钱的能力却更加强大。宋徽宗本人的花钱能力也位居宋代皇帝之首。他爱好广泛，品味高雅，建了不少亭台楼阁，又因为喜欢艺术，让各地进献花石纲。贤臣们都已经被贬斥，没有人告诉皇帝，他的爱好已经对国家财政构成了巨大的负担。

在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享乐圈子，他们以搜刮民间，满足皇帝为首要目的，却从来没有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7]而替政府筹措资金的责任，就压在了宰相蔡京的头上。

蔡京上台时，帝国的一切形势都对他有利，除了官场内斗造成的青黄不接外，就连宋神宗时期的官制改革（元丰改制）也对他有利。神宗之前，由于官职过于分散，政出多门，没有人能够做事。官制改革虽然成果有限，却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了皇帝和宰相手中，更便于蔡京弄权。

另外，交子、盐钞等金融工具的发展，也让蔡京有了更多的政策工具。王安石时期的变法仍然是一次传统的改革，以整理农业税、发展传统产业为主。而随着金融工具的进一步丰富，蔡京利用金融措施更加便捷地操纵社会经济，获得财政收入，手段更加多样化了。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组织的全国性财政改革拉开了帷幕。

这一年，北宋中央政府决定利用纸币来筹资，扩大交子的使用范围，将原本不使用纸币的区域纳入纸币区。最先被纳入纸币区的是位于京城西边的京西北路（今安徽北部、河南大部）。中央政府仿效在四川的做法，在京西北路设立印钞机构，发行交子。此时发行交子不是为了方便贸易，而是为了财政需要，印刷的纸币也没有准备金在背后支撑。

到了第二年，蔡京决定把纸币经验继续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下令发行一种叫作钱引的纸币。老交子仍然在四川地区使用，而钱引则在除了闽、浙、湖、广之外的其他地区通行。其中福建（闽）由于是蔡京的故里，才免于遭殃。[8]

由于钱引是一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故而在各地受到了抵制，加之这些地区正在推行另一种纸质凭证——盐引，政府最后不得不暂停了纸币的发放，任其自生自灭。

而对民间影响最大的通胀掠夺，仍然发生在四川地区。四川地区纸币发行得最成熟，人们早已经习惯了使用纸币。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在四川开始了滥发的序曲。他要求在四川地区增加交子的发行数量，造三百万贯交子，允许陕西使用四川交子。这次的发行有准备金，政府计划拨付一百万贯钱币作为准备金（是否落实不知道）。[9]

然而，随着陕西用兵的增加，到了第二年，政府随即下令再印一千一百四十三万贯交子，第四年又印了五百七十万贯，到了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又增印了五百五十四万贯。[10]这几次增发都没有准备金，出现了通货膨胀。

在政府发行交子之初，总发行量也只有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仅仅这几年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原发行量的二十倍，而且大部分都没有硬通货做后盾。在市面上，交子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一贯只值十几文钱，出现了金融崩溃的局面。

蔡京一看形势出现了失控，连忙规定新发行的交子与旧交子不再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兑换，而是四贯旧交子只能兑换一贯新交子。由于交子三年一界，每隔三年，人们必须把手中的旧交子换成新的。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交子一下贬值了四倍，持有交子的人一下子损失了百分之七十五的财产。

这种做法让人们对交子本身产生了怀疑。由于“交子”这个名称已经失去了信用，蔡京决定将其改一个名字，在四川发行钱引。钱引与交子

的不同，只是名字的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蔡京以为这样就能骗过市场，重新开始。

但随后，市场做出了反应：钱引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贬值。另外，全国其他地区的交子和钱引都已经不能兑换，只有四川可以兑换，于是，全国的纸币都越界进入了四川地区，更增加了贬值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后下令，以前发行的纸币（对应于四十一界到四十三界），不管是钱引还是交子，政府都不再兑换，让它们自生自灭。政府重新发行一界新的钱引，按照旧的额度发行。[11]

通过一次明目张胆的违约行为，所有持旧交子的人都被政府洗劫一空。他们因为纸币方便才使用它，将所有的财富都换成纸，到最后，政府开一下印钞机，就将所有的财富裹挟而去，留下懵懂的人们在思考着到底哪里没有算清楚，才导致了倾家荡产。政府获得巨利的同时，失去了民间的信任，将民间经济的活力彻底掏空。

除了瞄准纸币之外，蔡京对于以食盐为本位的盐钞也没有放过。

蔡京执政时期，中央政府的盐业收入（也是财政收入最重要的一部分）恰好经历了一次危机：中国最重要的产盐区——山西的解池，由于水涝问题产盐量下降。[12]由于盐钞要求商人们都到解州的盐池去兑换盐，这件事就不仅影响了政府的盐业专卖收入，还让那些持有解盐盐钞的商人们也无处换盐，形成了一次小危机。

蔡京及时地寻到东北和东南地区出产的末盐（解盐为颗盐，即颗粒状的盐，而其他地区大都为粉末状的末盐）来代替解盐，帮助政府获得了收入。同时，他规定商人持有的解盐盐钞可以拿到东南兑换末盐。

另外，盐钞还可以兑换乳香、茶叶、度牒等物品，扩大了使用范围。经过这些措施，盐钞反而更加流行，蔡京漂亮地处理了这次危机。

然而，处理危机时，蔡京看到了盐钞的潜力。在改革的当年，商人们向中央政府缴纳了一百六十四万贯，而中央政府产盐的成本却只有十四万贯，净赚了一百五十万贯。[13]

蔡京意识到，只要把盐钞杠杆化，就可以从民间汲取大量的财富。在以前，只有北方解州盐使用区才实行盐钞制度，这种制度是由政府垄断食盐生产，大商人从政府批发食盐后，卖给民间。而在南方则实行完全的政府专卖，从食盐的生产到运输到零售，都由政府掌握。蔡京废除了东南末盐的专卖衙门，在全国都实行盐钞制度。原本只在北方实行的食盐票据化运动，就遍及了全国。

在宋代，只要政府把持了盐业供给，盐商就会帮助政府把盐价炒高。而盐价的高昂更激发了盐商的热情，政府也可以发行更多的盐钞。

当然，人们对食盐的需求是有限的，当盐钞发多了，人们迟早会发现，储存的盐已经吃不完，那就是泡沫破裂的时刻。

但蔡京想方设法地避免泡沫破裂，他的办法是：让盐钞不断地贬值，增加盐商用盐钞换盐的难度。比如，本来盐商把钱交给政府，就可以获得盐钞去换盐。但有些早年的盐钞没有使用，就又已经发了新盐钞。对于旧盐钞，政府规定必须折价，去买盐时，最多只能使用百分之三十的旧钞，其余都必须是新钞，或者还要搭配一部分现钱。

政府利用不断对旧钞折价的方法，就控制了盐钞的数量。

为了增加收益，蔡京还设置各种各样的出货障碍和苛捐杂税，将利润做大。到了高峰时期，每年收入达到了两千万贯以上。[14]而在政府收入之外，则是食盐质量的大幅度下降。由于食盐价格高昂，许多山区能够吃得起盐的人家十户不过三户。盐商的手中则积攒了大量的盐钞，却因政府设置的各种规矩和障碍兑换不了。就算是与政府共舞的大玩家，也有一朝踩不准就倾家荡产的，朝为富翁，夕挂黄粱。[15]

除了盐业之外，蔡京在茶叶等方面的改革也同样出于聚敛的考虑，发行了一种纸质凭证——茶引（又分为长引和短引），利用金融杠杆，将大量的财富收于政府手中。

蔡京的做法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的尝试。交子、钱引、盐钞、茶引，层出不穷的纸片将社会财富从民间送到了政府手中。这些纸片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人们都反应不过

来，没有能力做任何的反抗，最终被政府剥夺干净。

不仅仅是宋代，在任何时候，只要政府手中掌握着印这些纸片的工具，就必然会制造通货膨胀和财富再分配，在攫取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诱人的官商泡沫。

从王安石开始的政府理财实验，到蔡京时期终于达到了高峰，只是，整个社会的金融系统已经在实验中分崩离析。当北方的战事兴起时，政府已经无力再为战争筹集经费了。

北宋虽然亡于金人之手，但真正令它衰弱到无法抵抗的地步的原因，不在于外界，而在于内部的资源已经被剥夺到了极致，不管面临多大的外部刺激，都已经无力作出响应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徽宗让位于儿子钦宗，蔡京也同时被贬离京，途中饿死于湖南长沙。[16]就在第二年，金人攻破了北宋首都，俘获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了。

南宋的金融崩溃

宋宁宗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十一月，南宋权臣韩侂胄正准备上殿奏事。这是他内外交困的一年。[17]

一年前，作为宰相的他发动了针对金国的北伐（史称“开禧北伐”），想收复失地、恢复疆土。这是南宋建立八十年来，多少臣子盼望已久的时刻。他的支持者中不乏赫赫有名之人，如著名的词人陆游、辛弃疾，以及大思想家叶适等人。

可是，北伐开始后出现的情况却出乎宰相的意料。宋军准备不足，金军早有绸缪，宋军吃了几场败仗之后，内部的主和派开始大肆行动，攻击宰相轻举妄动，在朝堂上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韩侂胄决定反击。他与右丞相陈自强策划，让林行可担任谏议大夫，对他的政敌礼部侍郎史弥远、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等人进行弹劾。这天，他边思考着问题，边向上朝的大殿走去。

南宋人把陪都杭州称为“行在所”，为了表示简朴和非正式，皇帝的宫殿也比北宋的京师汴州简单很多。这里也仿照汴州起了很多殿名，比如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等，但是，这六个名字其实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大殿，只是根据不同的事情换一下名称而已。

在韩侂胄到达之前，他的党羽陈自强和林行可已经在殿外等候了，而他的政敌钱象祖也出现在了门口。

就在韩侂胄接近大殿时，突然从旁边出来一个人把他拉住，这人是负责宫城保卫的官员，名叫夏震。韩侂胄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周围又冒出来三百名士兵，这些士兵在夏震的率领下，将韩侂胄拥入了宫殿旁的玉津园。夏震拿出圣旨宣读了韩侂胄的罪状，随后命令士兵将他斩杀于皇帝的花园之中。

宋代是古代少有的对官员宽容的朝代。韩侂胄之死，和当年岳飞之死一样，属于宽容政策的例外，也表明了当时形势之复杂。斩杀韩侂胄由他的政敌史弥远一手策划。事前，史弥远已经在杨皇后的支持下，得到了皇帝罢免韩侂胄的诏书，借着这个诏书将韩侂胄杀死。

第二年，在宋金议和之际，皇帝将韩侂胄的棺木撬开，将他的人头送给金国，完成了合议。南宋同意每年上贡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两给金国，同时支付战争赔款三百万贯。

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开禧北伐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失败，它更对南宋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持久性影响。

北伐前，南宋借着隆兴和议（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签订）已经获得了四十年的和平时光。北伐始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但到了当年十月，宋军就兵败如山倒。十二月，四川地区又发生了叛乱，平叛期间，四川地区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此之前，四川地区是宋廷的主要财源之一；而之后，四川进入了动荡时期，不仅无法向中央输出财政，反而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兵力维持秩序。这一系列的事件让宋廷彻底跌入了财政崩溃的旋涡，无法挣扎出来。

由于财政收入的巨大漏洞无法弥补，于是，政府加大了印钞力度，

南宋好不容易维持住的金融系统再次陷入了紊乱。

与北宋相比，南宋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更大，这是因为纸币的使用范围在南宋社会更加广泛。北宋时期，虽然四川地区发行纸币，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金属货币区。而到了南宋，借着北宋末年蔡京的改革，政府开始在全国发行纸币，并大幅度减少了铜币的铸造量，纸币成了南宋货币最主要的形式。

导致铜币铸造量减少的因素很多：一是铜开采能力的衰弱；二是政府混乱，无法组织起更大规模的铸币机构，由于生产量的缩小和效率的低下，甚至政府发行铜币本身就是一种亏本行为；[18]三是政府过于依赖纸币，故意减少了发行量。北宋铜币最多时一年发行五百万贯，但南宋的铜币发行量长期在每年十五万贯左右徘徊。[19]

由于缺乏铜币，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来满足民间的贸易需要。宋代政府喜欢在区域之间设立各种贸易障碍，南宋纸币的发行也变得支离破碎，在全国出现了几种不能互相流通的纸币。

政府在东南地区发行了一种叫会子的纸币。会子的发行也是一波三折。最初，政府试图按照四川的方式在江浙一带发行交子，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政府突然发现，民间已经在自发使用一种叫作会子的东西，[20]于是，政府禁止民间发行会子，改由官府经营。

会子与四川交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会子是一种以铜币为储备的纸币（交子是以铁币为储备），理论上讲，会子与东南地区盛行的铜币有着一对一的兑换关系。会子的发行也仅限于东南地区，也就是南宋最主要的经济区。由于区域的限制，就算有人把东南地区的会子带到四川去，也没有办法使用，更没有办法兑换当地的铁钱。

而在四川地区，南宋一共使用了三种纸币，其中一种是北宋末年取代交子的钱引，这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除了钱引之外，还有一种叫作铁钱会子的纸币，但流行的地区很小，影响也不大。另外，四川还有一种以银为储备的银会子，理论上用这种纸币可以与银兑换。

南宋时期，还有两个特殊的区域，分别是两淮地区和湖北一带。这

两个地区原来也是使用铜钱，但由于靠近这两个区域的金国同样需要货币润滑经济，并且从这些边境地区大量地走私铜钱到北方，所以，为了防止金国把铜都运走，南宋政府规定这两个地区不再使用铜钱，而改为使用铁钱。

两淮和湖北使用铁钱之后，也对应着发行了两种纸币，分别是淮交和湖会。这两种货币都以铁钱为储备。但是，淮交和湖会都不能越界发行。虽然都是铁钱储备的纸币，但淮交不能拿到四川使用，四川的钱引也无法拿到两淮使用。

通过这种方法，南宋就将全国划分成了四个金融区，分别是最大的东南区、次大的四川区域，以及两个较小的两淮和湖北区域。这些地方各自使用不同的铁钱和铜钱，并发行各自的纸币。其中东南会子和四川钱引的影响力最大，而尤以东南会子为最。

东南会子最早发行于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21]这一年，皇帝命令户部侍郎钱端礼根据以前的纸币流通经验，设计了会子。第二年设立了会子办公室（会子务）。第三年通过了《伪造会子法》，对于伪造行为严厉镇压，处以死刑。

由于发行纸币的经验不足，在发行之初没有控制额度，于是，会子出现了第一次贬值。到了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皇帝开始用现钱回购一部分超发的会子。两年后，会子正式采用了和当年交子类似的方法，分界发行。从这时起，会子正式成为南宋的主币。

按照规定，会子每一界的发行量为一千万贯，以三年为一界，到期后以旧换新，保持市面上流通的会子始终是一千万贯。

但南宋的货币发行制度始终不如北宋的四川地区，常常朝令夕改，一切以财政状况为依据。

最初时，朝廷规定一界的发行量为一千万贯。但是这个额度很快就控制不住了。

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政府规定每界会子的展期为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使用六年，市面上同时运行两界会子。钞票

的发行量扩大了一倍。

到了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再次规定会子回收展期为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使用九年，市面上三界会子同时运行。钞票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最初的三倍。

但这一切仍然是可控的，失控马上就要到来了。

公元1206年韩侂胄的开禧北伐惨淡收场，而北伐也对南宋的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由于财政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无法弥补，所以，政府陡然加大了印钞力度。

会子最初发行时只有一千万贯，开禧北伐时期，会子的发行总量已经达到了一亿四千万贯，[22]比当初扩大了十四倍。加上在四川发行的八千万贯的钱引，[23]两者加起来达到了二亿二千万贯。

随着发行量大增的是剧烈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意识到了通胀的危险性，于是考虑减少纸币的流通量。这就牵扯到了另一个秘密：政府发行纸币非常容易，但回收纸币却困难重重。

如果要回收钞票，当时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政府拿出库存的硬通货，将纸币买回来销毁掉。所谓硬通货，主要是金银。但是，政府在发行钞票的过程中，的确换回了不少物资，可这些物资随即被花光了，在空空如也的国库内，并没有多少硬通货储备。

政府检视家底之后，发现国库里还剩下一点金银。另外，政府还可以卖一部分僧侣的度牒。中国古代的僧侣一直享有免税权，度牒持有人不管是不是和尚，都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按照每两黄金兑换六十贯纸币，每两银子兑换六点二贯，每道度牒价值一千二百贯计算，政府手中的资产一共可以兑换回一千三百万贯纸币，约占全国流通量的百分之五强。如果把这些金银和度牒集中投放在四川，则可以收回半界的四川钱引（四川有三界钱引并行，一共八千万贯）。[24]

但这次回收工作却引起了民间的恐慌，人们听说政府要回收纸币，立刻想到以后纸币都不流通了，结果纸币的价格从每贯价值四百个铁钱一下子跌到了价值一百个铁钱，这引起了极大的混乱。[25]

但不管怎样，回收纸币这件事说明宋代政府还是一个想负责任的政府，并非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只是无法对如此庞大的帝国进行有效的管理。

在更恶劣的情况下，政府会选择更为极端的做法，比如发行新会子取代旧会子。在发行新会子时，规定两贯旧会子才能兑换一贯新会子。当所有旧会子都按照这个比例兑换新会子时，市面上的钞票数量就减少了一半，从账面上做到了减少流通量。

虽然政府暂时回收了一部分会子，但由于财政系统已经遭到破坏，于是，政府很快又不得不靠印钞来解决财政问题。印钞速度再次失控，到了宋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前后，仅仅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三亿二千九百万贯，这还不算四川钱引。[26]

到了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六点五亿贯。[27]

政府就在“财政困难——疯狂印钞——恶性通胀——朝廷感到害怕——想办法回收纸币——发行新纸币，强行以折价收兑旧纸币”的套路中不断循环。到了用第十八界新会子取代第十六界旧会子时（这时是两界会子并行），政府规定十六界会子不再使用，而十八界会子一贯相当于十七界会子五贯，直接将货币贬值了五倍。[28]

到了公元1247年，政府又决定要跳出这个循环，规定当时在市面上流行的两界会子（第十七界和十八界）不再回收，永远使用。[29]这等于宣布政府无力维持会子的回收工作，只顾继续印钞票，任其贬值了。

到了南宋末年，政府的和籴政策（也就是拿纸币从民间强买强卖粮食）又把更多的纸币注入民间经济中，结果人人谈纸币色变，这种具有魔力的纸已经丧失了信誉。

贾似道当权后，为了挽救南宋政府的财政和金融状况，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除了回买公田之外，还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关子”，取代了已经丧失名义的会子。

在用旧会子兑换新关子时，规定第十七界会子直接废弃，第十八界

会子三贯兑换一贯关子。[30]

贾似道本来是为了重新树立政府权威，但强制作废、强制兑换的措施直接让政府彻底丧失了民意，人们再也不会相信任何纸币的魔术了。

南宋的金融体系彻底崩溃。

南宋的金融崩溃发生在蒙古人叩关之时，当政府最需要财政收入来组织军队打仗时，却由于金融的崩溃，没有钱养兵。并且金融破产影响到了每家每户，使得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也不愿为它卖命。从这个角度说，南宋的灭亡，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财政上的崩溃让这个中央王朝已经无力维持了。

表5 南宋会子发行及货币指数[31]

年　代	纸币数量（贯）	指　数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至宋孝宗乾道四年（1131–1168）	10,000,000（自 3,000,000 起，增加了 7,000,000）	100
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	20,000,000	200
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	24,000,000	240
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	140,000,000	1400
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	230,000,000	2300
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	229,000,000	2290
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	320,000,000	3200
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	500,000,000	5000
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	650,000,000	6500
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	日增印 150,000	

表6 南宋纸币贬值情况[32]

年　代	纸币币值变化（一贯纸币兑换的铜钱数量）	指　数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	1 贯 =770 文	100
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	1 贯 =750 文	97.4
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	1 贯 =500 文	65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	1 贯 =620 文	80
宋宁宗嘉泰初年（1201）	1 贯 =600~750 文	78~97
宋宁宗嘉定初年（1208）	1 贯 =385 文（贬损其半）	50
	1 贯 =600~700 文	78~91
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	利用 2 旧纸币对 1 新纸币折半	50
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	1 贯 =620 文	80

续表

年代	纸币币值变化（一贯纸币兑换的铜钱数量）	指数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	1 贯 =429 文	56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	1 贯 =240 文	31
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	按照 5 旧纸币对 1 新纸币兑换	20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	川引 1 贯 =150 文	19.5
	广西 1 贯 =200~210 文	26
	比绍定二年贬值四倍	13.4
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	1 贯 =250 文	35
宋度宗咸淳二至四年（1266–1267）	75 文旧纸币 =4 文钱	5.32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

大约是在宋理宗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由宰相贾似道组织的南宋最后一次大型改革正在悄然展开。

几年前，南宋与北方蒙古族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在元宪宗大汗蒙哥的进攻下，南宋节节败退，欲和不能。公元1259年，蒙哥死去，蒙古陷入了大汗之位的内争之中，南宋获得了最后一次喘息的机会，紧锣密鼓地做着战备。

宰相贾似道查看政府剩余资源时，发现南宋的国库已经空了。在任何一个即将崩溃的朝代，如果揭开它的财政膏药，就会发现下面已经溃烂成蛆。

此时，南宋的金融体制已经形同虚设，政府发行了太多的纸币，无力控制物价。税收也同样空虚，大量的农民破产，政府收入锐减。更糟糕的是，随着蒙古威胁的增大，政府却需要更多的粮食为打仗做准备。既没有钱，又想多收购粮食，南宋政府不得不依靠古代版的“收购公粮”政策，即“和籴”。

所谓和籴，是指政府强行向民间摊派购买粮食。本来购买粮食是需要花钱的，但是，由于是政权行为，政府以极低的价格，强迫农民大量出售。最初购买时还是用钱币，后来则改成纸币，再后来纸币都给不全，常常亏钱。于是和籴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

以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为例，这一年和籴粮食达到了五百六十万石，全部用纸币购买，甚至超过了全国正规的粮食税收。[33]

南宋时期，人们对于和籴的批评不绝于耳，纷纷谴责这个可以让人倾家荡产的政策。同样是在宋理宗时期，大臣刘克庄也曾抱怨说，以前全国一年和籴只有一百五十万石，现在，仅仅吴门一个郡就被迫交出一百万石，全国更是不知已经增加了几倍。浙江中部本来属于富裕的地区，可是现在就连巨富，十家也有九家变成了穷光蛋。[34]

大臣吴潜则说起了两淮地区的情况。在两淮，一家人有二百四十亩土地，已经算是富裕人家，但是政府除了收税之外，给这家人编排的和籴额度竟然达到了一百四十四石，这还不算，在征收时还要把两石算成一石，数额上立刻又翻倍。除了数额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名目，呈样、罚筹、堆尖、脚剩，每一种名目又敛去若干，到最后竟然要上缴三四百石，家里的人几乎颗粒无剩。[35]

在政府大量使用纸币与民间交易，粮食紧缺的同时，钞票却充塞市场，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贾似道看到，在官家逼迫之下，随着农民的破产，政府的财源将会很快枯竭，到时元兵袭来，军队由于缺乏供给，根本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

如果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做一次全面改革。南宋最后一次拯救财政的努力——回买公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所谓回买公田，指的是政府从富户手中购买多余的土地，把土地作为公田。之后，再把公田出租，获得租金收入，这些租金就可以养活军队，支持战争。当政府有了公田之后，只需要经营好公田，就不用再把过重的税收与和籴负担强加给民间了。

吊诡的是，南宋政府刚建立的时候，手中是有大量的皇庄和公田的，但是，随着政府不断缺钱，慢慢把这些公田都卖给了私人，卖地的收入补贴了财政。到贾似道时期，早就没有公田可卖了。贾似道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把公田再买回来，所以叫回买公田。

为什么要回买公田？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对政府和民间都有好处，吃亏的只有特权阶层。在改革之前，特权阶层把持了大量的土地，却由于种种勾结行为，很少纳税。贾似道试图利用回买公田政策，逼迫这些特权阶层放弃一部分土地，交给政府。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一个人最多只能种完一百亩土地，再多就超过了限制。但宋代整体的政策是不抑兼并，加上制度松弛，使得土地向官僚手中集中。

以前政府采取强行摊牌购买粮食的做法，倒霉的是老百姓，并且由于穷人最没有权力，于是，最终由穷人承担了大部分的损失。如果能够从富豪和官僚手中购买公田，保证财政收入，就可以少干扰贫困的下层人民，也不用再搞粮食摊派强购。

而由于和籴购买粮食都用纸币，只要不再搞粮食强行采购，政府也就不用发行这么多的纸币，这对于控制通货膨胀也是有好处的。

既能筹措军粮，又能避免通胀，这就是贾似道一举两得的憧憬。[36]他的良方很快获得了皇帝的认可，并在宰相的主持下，迅速实行。

最初只是在广西一带小规模推行，尝试屯田，以获得财政收入。由于皇帝重视，广西的屯田进行得很成功，于是，贾似道开始在全国推行。

首先取得突破的是浙西路，这里是贾似道的根据地，最容易控制。他带头捐献出一部分土地。第二年，根据政府的统计，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已经购买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皇帝大喜过望。回买公田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37]

然而，如果从民间的角度观察，则是另一番景象。

按照规定，在自愿的原则下，回买公田政策只购买大土地主多余的土地，不涉及中小土地主，尽量减少对民间的强迫。但由于政府从财政角度考虑问题，势必有指标的要求。官员们为了完成指标，只能向民间摊派，结果到最后，变成每家每户除了二百亩豁免之外，其余的土地都要卖三分之一给政府，其做法和摊派购买粮食时是一样的。

后来，当指标催得紧时，干脆连百亩之家都被逼卖地了。政府原本想通过富户筹款，却变成了一次不幸的全民运动，整个社会根基受到了动摇。[38]

更严重的是，政府并没有足够的钱款来购买土地。所出价格都是压低了再压低，上好的土地被以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价格被强行买走。[39]

在贾似道的逼迫下，各地的官员纷纷“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想尽一切办法从民间搜刮土地，有的甚至用肉刑对付那些胆敢抵抗的人们。

即便这样，政府还是没有钱支付所有的公田。一开始是想以铜钱来支付，但由于铜钱紧缺，干脆改成了纸币支付。如果卖的田多，那么政府还给百分之五的银子，剩下的用纸币、度牒等东西凑数；如果卖的田少，那么就全都给纸片了。这种做法让少地的穷人更加无助。

除了纸币之外，政府的支付方式还五花八门，比如和尚的度牒也被拿来当钞票发给田主，再加上一些虚官和各种各样的头衔，等等，所有稍微有一点价值的东西都被拿了出来。这些东西还不准转卖，有时就等于废纸一张。

纸币和各种奇怪的纸片源源不断地流入民间，原本为了整治滥发纸币，最终却注入了更多的纸币。

在民间大乱套和巨大的抱怨声中，官员们纷纷上书，谴责贾似道的做法。贾似道一看大事不好，连忙请求辞官。

然而，令人们感到错愕的是，宋理宗不仅不反对贾似道的做法，还立刻安慰起他的宰相来。他说：“从你当初提建议开始，就有人说不能这么做，我那时候就已经阻止他们的抱怨了。现在，实行了公田之后，不管是公家还是私家都富足了，我们这一年的军饷全靠你的办法才有了着落。如果因为别人的抱怨就放弃，虽然满足了他们的一时之快，可是谁来帮我筹措国家财政？”[40]

皇帝贬斥了那些批评贾似道政策的人。事后，人们常常以“皇帝没罪，奸臣误国”的观念来责骂贾似道误国，却不知道这个国家已经掉进了财政陷阱而无力自拔，只求下一刻平安，管不了更多了。皇帝对于这样

的局面知道得一清二楚，也对于造成的恶果心知肚明，只是他已经考虑不了这么长远，只能全力支持宰相敛财。至于民不聊生，已经不会再引起他任何的同情。

但是，就算贾似道再努力，仍然无法彻底改变宋代的财政状况。接下来的问题出现在了公田上。

当政府购买了公田之后，就要组织人员进行屯田生产，来获得粮食。最初政府设立了一些屯田机构进行管理，但由于官僚的惰性，根本没办法有效组织，浪费严重，最后只好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随着对佃户压榨的加深，许多人根本不租政府的土地，原本的良田现在抛了荒，社会的总财富减少，从而影响到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当皇帝发现无法解决财政问题时，又有人商议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耕种，于是群臣在蒙古兵叩关时，纷纷在讨论怎样把土地还给私人。但蒙古人已经不再给皇帝留下继续折腾的时间了，他们“帮助”宋代政府彻底结束了窘迫的财政难题。

在蒙古人的铁蹄下，赵宋三百年来的财政腾挪和如此复杂的财政制度，都迅速化为云烟，但它们的敛财经验，特别是金融方面的新经验，却成为宝贵的财富，流传给了后世的皇朝。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1100年—公元1279年。

[2]见《宋史·徽宗纪》。

[3]苏辙《元祐会计录·收支叙》对皇祐和元祐年间（两者之间相差三十几年）的官员情况作了对比：“臣请历举其数：宗室之众，皇祐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矣；两使留后一人，今为八人矣；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矣；防御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为诸曹郎中），今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为员外郎），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为博士），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为三丞），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诸司使二十七人，今为二百六十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为一

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余可以类推，臣不敢以遍举也。”

[4]《宋史·食货志下一》：“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5]洪迈《容斋随笔·宣和冗官》：“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官制》则记载，政和二年官吏共四万三千余人。

[6]《宋史·食货志下一》：“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余仰朝廷应付。’”

[7]《文献通考·国用考》：“靖康元年，言者论天下财用，岁入有常，须会其数，宜量入为出。比年以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

[8]《宋史·食货志下三》：“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

[9]《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蔡京上奏：茶马司将川交子通入陕西，民已取信。今欲造三百万贯，令陕西与见钱、盐钞兼行，仍拨成都常平司钱一百万贯充本。”

[1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四川钱引》：“崇观间，陕西用兵，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万缗（崇宁元年增二百万，二年又增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四年又增五百七十万，大观元年又增五百五十四万），由是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面易其一。”

[11]《宋史·食货志下三》：“三年，诏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毋收易，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

[12]见《宋史·食货志下三》。

[1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二：“自去年九月十七日推行新法东北盐，十月九日客人入纳算清，至今年九月三日终，收趁到钱一百六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六贯三百六十八文，本钱一十四万七千七十三贯，息钱一百五十万一千五百五十三贯三百六十八文。”

[14]《宋史·食货志下四》：“新法于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实未足为今日道也。”

[15]《宋史·食货志下四》：“崇宁间，蔡京始变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间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才通，辄复变易，名对带法。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循环者，已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钱，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资更钞，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16]见《宋史·蔡京传》。

[17]见《宋史·韩侂胄传》。

[1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铸钱诸监》：“赣饶两监新额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所得不偿所费，遂罢铸钱。”

[19]《宋史·孝宗纪》：“丁酉（淳熙三年十一月），定铸钱司岁铸额为十五万缗。”

[2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

[21]《宋史·食货志下三》：“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

[22]见王迈《臞轩集》。

[2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先

是，四川钱引以二年为界，每界书放之数止于一百二十五万……至嘉泰末，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所书放视天圣祖额至六十四倍。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已下。”据此计算，一百二十五万的六十四倍为八千万。

[24]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

[25]《宋史·食货志下三》：“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期以岁终不用。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者千数百里，期限已逼，受给之际，吏复为奸。于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制司乃谕人除易一千三百万引，三界依旧通行，又檄总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民心稍定。”

[26]《宋史·食货志下三》：“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已及三亿二千九百余万。”

[27]《雪窗先生文集·丙午轮对第二札子》：“楮之为数，近如版曹所奏，旧者已及四十二千万，新者已及二十三千万，方来者、伪造者，盖又不知其几。”

[28]《宋史全文》卷三三：“令措置十八界会子，收换十六届，将十七界以五准十八界一券行用。”

[29]《宋史·食货志下三》：“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

[30]《宋史·贾似道传》：“复以楮贱作银关，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自制其印文如‘贾’字状行之，十七界废不用。银关行，物价益踊，楮益贱。”

[31]本表引自漆侠《宋代经济史》。原表分为四列，今舍去“材料来源”一列。

[32]本表引自漆侠《宋代经济史》。原表分为四列，今舍去“材料来源”一列。

[33]《宋史·食货志上三》：“开庆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籴米五十万石，湖南安抚司籴米五十万石，两浙转运司五十万石，淮、浙发运司二百万石，江东提举司三十万石，江西转运司五十万石，湖南转运司二十万石，太平州一十万石，淮安州三十万石，高邮军五十万石，涟水军一十万石，庐州一十万石，并视时以一色会子发下收籴，以供军饷。”

[34]见《后村先生大全集·进故事》。

[35]见《许国公奏议·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36]《宋史·食货志上一》中记载，贾似道认为回买公田是一举五得的好事。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

[37]见《宋史·理宗纪》。

[38]《齐东野语·景定行公田》：“先是，议者以官品逾限田外回买立说，此犹有抑强嫉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已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及其后也，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焉。”

[39]《宋史·食货志上一》：“六郡回买公田，亩起租满石者偿二百贯，九斗者偿一百八十贯，八斗者偿一百六十贯，七斗者偿一百四十贯，六斗者偿一百二十贯。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是岁，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

[40]《宋史·贾似道传》：“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岁军饷，皆仰于此。使因人言而罢之，虽足以快一时之议，如国计何！’”

第三部　最完美的集权机器

（辽金到清，公元907年—公元1911年）

第十二章　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1]

这是一个元代版“四万亿”[2]的故事。

蒙古人早期的财政以掠夺和放贷为主，蒙古将领们靠打仗掠夺了财富，再交给中亚的色目人帮助打理，利用放贷获得收入。

为了将战时的掠夺财政变成和平时期的正规税收，耶律楚材帮助蒙古人建立了土地税制度。但这种制度常常遭到破坏，与耶律楚材针锋相对，色目人介绍了包税制给蒙古人，即将一个地方的税收包给一个负责人，收取一个定额，由负责人想尽一切办法敲诈该地，除了将定额交给蒙古人外，多出来的部分则归包税人自己。

令马可·波罗惊叹的纸币也成了蒙古人掠夺的工具，元代的纸币一直持续不断地处于贬值当中，并不断发行新币来取代旧币，将旧币贬值。在掠夺财政、包税制、纸币敛财的共同作用下，元代成为最孱弱的朝代之一，一直缺乏真正的经济恢复和盛世时期。

元代末年，雄心勃勃的丞相脱脱为了振兴大元王朝，开始了规模巨大的改革。他的改革核心是：利用政府的权威，通过政府花钱的方式，来带动经济发展。这是元代版本的“四万亿”。

然而，政府主导花钱必须有钱可花，当政府手中没钱时，就只好偷偷开动印钞机，依靠印制钞票来筹措财政。

脱脱的做法导致了民间经济的紊乱和金融上的大崩溃，随着各地反元起义的兴起，脱脱的改革没有拯救元朝，反而葬送了元朝。

宰相脱脱：蒙古人的凯恩斯[3]

元顺帝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一场针对权臣伯颜的阴谋正在展

开。[4]

在元代后期，曾经出现了几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这些参与争夺的人都有一个源头，他们都属于太子真金（元世祖忽必烈的儿子）三个儿子的后代。

在最后一次争夺中，伯颜帮助元武宗（真金次子的长子）的儿子元文宗图帖睦尔登上了皇位。从此，元代的皇位留在了元武宗的后代手中，直到元代灭亡。

到了武宗孙子元顺帝统治时，伯颜更是通过杀害其他大臣独揽大权，天下人只知有伯颜，不知有皇帝。他推行非汉化政策，重用蒙古人和色目人，甚至提出要将汉族的大姓灭绝，防止他们的反抗。

为了巩固地位，伯颜提拔侄子脱脱担任御史大夫一职。他没想到，就是侄子脱脱将他赶下了台。

与伯颜的擅权相反，脱脱从一开始就预感到权臣的下场，故意与伯父保持距离。脱脱在得到皇帝的信任后，设计将权臣贬斥。

公元1340年，趁伯颜出猎的机会，脱脱与皇帝合谋，在控制了京城的卫戍部队和城防系统之后，颁发诏书，贬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一次宫廷政变在脱脱的圆满策划下，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

这次政变显示出脱脱为人的干练与坚决。在经过了元代混乱的宫廷和政治斗争之后，人们对于和平发展充满了渴望。第二年年初，脱脱成为帝国的中书右丞相。这个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一举一动，都寄托着时人的期待。

在重重的期待中，脱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要选择一位最能代表元代气象的人物，这个人也许既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耶律楚材、关汉卿和赵孟頫，也不是那些蒙古帝王，而是脱脱。[5]

在历史上，成吉思汗的武功不容置疑，赵孟頫的文采也值得推崇，

但能兼备所有能力的全能选手，则非脱脱莫属。

在担任丞相期间，他彻底扭转前任伯颜的蒙古化政策。伯颜希望元朝回归蒙古传统，重新回到蛮荒性格，但脱脱知道，要统治这么大的帝国，非得有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不可，像伯颜那样为了回归野性，对正规官僚制度进行破坏的政策是没有出路的。他尊重汉人的权利，恢复了科举考试，为伯颜迫害的宗室亲王和大臣平反，采用儒术治国。一时间元代的政坛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同时，他兴修过水利，制定过农业发展计划，这些显示出他对于经济发展拥有纯熟的理解力。

更难得的是，脱脱并不仅仅是一个官僚型的人物，还是一个颇有文学造诣的大家。中国的二十五史中有三部是在元代编撰的，分别是《辽史》《金史》和《宋史》，之前只有唐、宋两代大规模的史书编修可以与元代相比，而主持这三部史书编撰的，正是脱脱。

不管是制定政策，还是编修史书，都只展现了脱脱作为文官的素质。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很有能耐的将军。元代末年，各地叛乱，脱脱组织军队围攻张士诚，并协调天下的兵马，颇有章法，屡屡得胜。

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人们还是认为，如果不是恰好于此时被罢相，他是有机会将各地的骚乱镇压下去，延长元朝的寿祚，让朱元璋暂时靠边站的。

相比于其他的竞争者，脱脱才是最能代表元代才气的人物，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全能型选手。

可是，令人惊讶的是：恰好是在他的任上，全国上下的小骚乱变成了大暴动。

在他之前，元代虽然进入了不稳定时期，却还没有出现失控，而他担任丞相之后，各地的红巾军、强人纷纷揭竿，元政府进入疲于奔命的镇压时期。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这个人呢？一方面他能力超强，但另一方面，又是他的政策导致了元朝的倾颓。我们如何将这两方面协调起来？

这就不得不说说他的经济刺激计划。简单地说，脱脱信奉由政府主导经济，是一个几百年前的凯恩斯主义者。他认为，利用政府主导项目、大力花钱的方法能够将帝国疲弱的经济刺激起来，走向繁荣的轨道。

为了刺激经济，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但元政府手中没有钱，脱脱就只好依靠印刷纸币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结果，一不小心发过了量，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社会经济失控，各地骚乱随之扩大了。

这个元代凯恩斯主义的故事，显示出集权式政府的困境：为了筹措建设资金，仅仅依靠普通的税收不能满足需要，还要依靠金融手段。但最终毁掉社会经济的，往往是政府过于野心勃勃的金融扩张。这个元代发生的“四万亿”故事从元初就已经铺垫了结局……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

公元1260年，忽必烈称帝。这一年也是蒙古帝国消失的一年。[6]

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宣布继承蒙哥汗，成为大蒙古国的新一任大汗。他的僭位立刻在蒙古人的世界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蒙古帝国一共拥有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这四大汗国，都由成吉思汗的子孙统治。

在忽必烈之前，四大汗国与各个亲王家族共同选举大汗。大汗这个职位，拥有整个蒙古帝国的最高权威。随着忽必烈上台，除了他控制的窝阔台汗国之外，其他三大汗国均不承认他的权威，蒙古帝国分裂成了四个地区性的国家——元朝就是其中之一。

元代虽然是类似于中国各个朝代的集权式帝国，却由于曾经是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记。

首先，元代与中国的其他朝代不同，政府的选官范围是世界性的。在成吉思汗和察合台汗时代，蒙古人最信任的理财专家大都有景教、伊

斯兰教的背景，他们组成了一个色目人集团，为蒙古人管理着庞大的财产。

蒙古的王公在当时没有固定的薪俸，他们依靠打仗从各处劫掠了不少财产，这些财产大都是黄金和白银，王公们让色目人为他们打理财产，使其增值。

此前，历代货币以铜币为主，而在西方则以银为主。蒙古人在这点上继承了西方的理念，为中国境内白银的普及做了铺垫。

蒙古帝国分裂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元代。虽然元代统治的疆域已经局限于现在的中国、朝鲜和蒙古国，但忽必烈等人任命的官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东亚、中欧。由于蒙古人有理财和文字（蒙古人继承了中亚字母来书写蒙古语）的需求，所以，中亚的回民们一直处于上等阶层的地位。

对中亚人的宠信甚至影响了蒙古人在中原建立更加稳固的财政基础。最初，蒙古的财政是掠夺式的，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抢来的东西就是帝国的财政基础。到了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代，契丹人耶律楚材任中书令，为蒙古人制定财政计划和政治结构。[7]耶律楚材建立了一套类似于中原的财政体系，依靠向农民征税来获得收入，当时的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和财产税。这件事情让蒙古人喜出望外，他们意识到除了掠夺之外，还可以从占领地获得更加持久的税收。

但是，随着蒙古军事行动的扩大，大汗需要更多的钱，各个王公们更是需要立刻拿到现钱。这时，中亚的理财专家们再次登场，把耶律楚材给边缘化了。他们向大汗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选项：蒙古人不需要操心所谓的税制结构，只需要将征税权包给他们即可。

所谓包税制，就是帝国将税权包给某些人（包税商），包税商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从地方上榨取税收，然后每年向帝国贡献固定的数额，剩下的收入都归包税商。包税制带给了帝国便利，大汗和皇帝们不用费心就有了固定的财政收入，却让包税商们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地方上榨取财富。这种方法将短期效益最大化，却破坏了帝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征税能力。

大蒙古帝国时期的财政就在正规税制和包税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之间摇摆着。可见，一个游牧民族要建立完整的社会架构、维持长期的统治有多艰难。

但不管多艰难，到了大汗蒙哥时代，蒙古帝国的税收结构已经逐渐建立起来。当时的税收项目包括人头税、农业税、商业税，附加一定的徭役。在中原，征税以农业税为主，农业税的征收类似于宋金时期的两税法，一年收两次，这说明蒙古人学习的能力并不弱。

大汗窝阔台时期，也是蒙古的官僚制度逐渐成形的时期。蒙古人的人口非常稀少，却控制了如此广阔的疆土。被当地人稀释后，蒙古人在所有被征服地区（除了蒙古本部之外）都是少数民族。

在最初征服时，蒙古人对每一个地方只派出很少的代表，行使宗主权，这个代表叫作达鲁花赤。公元1231年，大汗终于在中原地区借鉴辽国和金国的经验，建立了一种类似于汉人政权的政治结构。

在辽代，皇帝创立了一种叫作两面官的制度。[8]

所谓两面官制，指的是皇帝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在游牧区实行游牧民族的法制，而在农耕区，则采用宋代的农耕社会制度；其官僚系统也分成了主管游牧民族的北面官和主管农耕社会的南面官；而在军事上则以北面官为主，南面官主要负责民政。

辽代的两面官制被金代继承。但金代在继承的同时，又加强了汉化制度的正规性，仿照唐代设立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

不过，由于三省制结构过于复杂，金代统治者掌握不好，所以，三省制结构就逐渐被一省制取代了。金代海陵王时期，将中书、门下两省废除，只保留尚书省。金代的做法影响了后续的元、明、清三个朝代。[9]

另外，为了便于地方治理，金代还建立了行台尚书省，即行省。所谓行省，指的是按照中央政府（尚书省）的模式，在各地建立克隆机构，完成对地方的统治。行省的官员设置与中央类似，构成单独一级政府。通过行省的设立，这些由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就能够更牢固地控制

汉人，施行异族统治。

蒙古征服金国之后，继承了金国已经探索出来的方法，只是将尚书省改为中书省，在名称上做了改变，但实质并没有变。

行台中书省则与蒙古人的达鲁花赤制度天然契合。蒙古新征服一个地方，会选择暂时保留这个地方的行政结构，同时派出几个代表在当地组建一个新的机关，代表中央的中书省来指导当地部门的工作，这个机关就叫行中书省。

在忽必烈上台之前，蒙古人已经通过摸索，在中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治结构：中央为中书省和下辖的六部，地方为行台中书省。后来，除了中书省之外，又设立了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这一省一院一台构成了蒙古时期的权力制衡结构。[10]

但不幸的是，虽然政治制度逐渐成形，但元代脆弱的财政却贯穿始终，皇帝始终无法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持他的战争和浪费。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

与其他朝代不同，蒙古人的元代始终缺乏一个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仁宗盛治”类似的盛世时期，除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政治架构过于简单、财政结构过于粗暴之外，还和元代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有直接关系。

任何一个朝代想要发展出盛世，都要有一个较长的休养生息时期，但元代是个例外。建国者忽必烈从上台起就一直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破坏了元代经济的可持续性。[11]

这些破坏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战争。忽必烈上台之后，就和他的兄弟阿里不哥打了一场内战，为的是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对阿里不哥所在的蒙古本部进行经济封锁，让他无法与外界交换物资，最终孤立并打败了他。但这次战争却使得统一的蒙古解体了，从此忽必烈虽然获得了虚的称号，却再也不

可能从其他汗国获得必要的支援。

之后，忽必烈征服了朝鲜和中国南部，加上之前的吐蕃等部和大理，基本上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但这些战争，特别是和南宋的战争旷日持久，元代的财政一直处于危机状态，根本没有时间整理财政和发展经济。

除了这些以胜利告终的战争之外，忽必烈时期还打了许多徒劳无功的败仗，蒙古人的进攻势头在各个方向被遏制。

在日本，蒙古人的战船被台风袭击，致使两次远征都惨淡收场，造就了日本不可入侵的神话，也让本来就不宽裕的财政彻底失控。

在越南，蒙古人试图征服越南南部的占婆，最初是想从海上进攻，但占婆人退入山里和蒙古人打游击。后来为了运送更多的兵力和后勤物资，要从越南北部的安南国借道，被拒绝后与安南进行了三次战争。蒙古人三次被击败，损兵折将，越南的民族主义获得了重大进展。

在缅甸，蒙古人占领了蒲甘王朝的首都，大肆劫掠，但是他们没有实力进行长期占领，只能撤退将机会留给掸人。这次表面上的军事胜利无法掩饰事实上的亏损。

在爪哇，远征军也遭到了惨败。

总之，在忽必烈时代，蒙古人的扩张已经到了极限，四处失败增加了它的财政负担。由于无法建立起稳定的财政结构，崩溃很可能是早晚的事。

其次，政治结构不完整，导致很难从中国南部征收税款。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蒙古征服南宋。但征服了南宋之后，蒙古人却一直没有控制好这个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按照常理，蒙古人征服之后应该努力建立一套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行政架构，并利用这个架构获取常规的税收，并保证民间经济的繁荣。但忽必烈长于军事，对于经济和政治并不看重，也无暇关注如何建立这

种结构。

终元一朝，政府始终没有掌握好南方的经济，正规税收不足，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临时措施获得收入。但政策的随意性又破坏了民间正常的经济活动，导致人民的反抗。

到了元代后期，南方的零星反抗不断地冒出来，而政府很难找到有效的镇压手段。军事征服又加重了财政负担，掉入了财政和社会崩溃的旋涡。

再次，纸币的发行缺乏必要的准备金制度。

元代之所以不愿意致力于建设长久有效的税收结构，还在于元政府找到了从民间抽税更加便捷的方式——印钞票。

元代和宋代一样，有着发达的纸币系统。纸币曾经让马可·波罗惊叹不已，把这一切都写进书里。但这种方式却带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政府缺钱时总是控制不住印钞票的冲动，造成普遍的通货膨胀，相当于征收了额外的通胀税。

忽必烈时期，元代发行了两种钞票。

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政府发行了叫作中统钞的纸币。[12]中统钞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中统元宝钞，这种钞票以银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纸币兑换银；另一类是中统交钞，以纱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纸币兑换纱。

宋代的纸钞是以铁币和铜币为储备，而元代以银和纱为储备，表现了元代银的地位上升和铜的地位下降。另外，宋代的钞票往往带有地点限制，比如北宋的交子只在四川使用，南宋会子只在江南使用，而元代的钞票不再有地点限制，是全国通用的。元代的钞票也不像宋代那样有界的划分，而是发行完就不再回收，并且没有规定发行量。

两类货币发行后，以银为储备的中统元宝钞成为主角，并在全国通行。但很快，元政府由于财政的紧张，就开始滥发中统钞，所谓的储备也成了空谈。1260年，中统钞共发行了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公元

1265年，发行量为十一万六千二百零八锭。公元1276年，由于和南宋、日本交战的需要，财政出现了亏空，发行纸钞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锭。这时，通货膨胀就已经有了苗头。[13]

公元1287年，忽必烈利用色目人桑哥（著名的吐蕃僧人萨迦八思巴的弟子）启动了新的敛财之旅。[14]这一年发行了所谓的至元宝钞，这种宝钞和中统钞的兑换比例是一比五，五锭中统钞只能兑换一锭至元钞。这一下子就将旧钞贬值了五倍，不仅引起了币制的混乱，还让纸钞逐渐失去了信誉。

另外，政府为了刮钱不得不求助于专卖和其他敛财制度。

桑哥以敛财著称。他提高专卖价格和商税，直接打劫了元代的民间贸易系统。桑哥手下的吐蕃僧侣杨链真伽为了寻找财富，甚至刨掉了南宋皇帝的陵墓，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恨。

除了桑哥，还有回族人阿合马、中书右丞卢世荣等，也是有名的理财专家，以加税、专卖和敛财著称。[15]

在元代，甚至连竹子都实行专卖，借口是防止敌方得到竹子制造弓箭。

最后，除了这些方式之外，元代的运河系统和邮递系统也耗费了大量的物资。

由于首都北京地处一个不能自给自足的区域，皇帝和宫廷的消耗不得不从南方运输过来。元代最初是利用海运将南方的粮食运送到北方，后来在公元1289年开通了运河，改走内河运输。但是，运河的维护成本非常高昂，维持首都的正常消耗需要竭尽元王朝的全力。

令马可·波罗感到吃惊的驿站系统也要靠当地人提供马匹，而元代的王公贵族总是在滥用这些邮递系统。驿道上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和政府无关的私人业务，这些业务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转嫁到了维护驿站的当地人头上。

当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整个元王朝已经千疮百孔，财政更

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因为开国的皇帝继承了蒙古人开疆拓土、好大喜功的传统，他们在获得了整个帝国之后，没有恢复经济和整理财政，于是帝国进入了中年阶段。

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

元代的另一个问题是：除了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皇帝之外，其余的皇帝统治时间都不长，他们如同匆匆过客，虽然制定着不同的计划，但这些计划又在死后被推翻，由新人重新制定新的计划，这些政策根本没有时间得以落实。

另外，忽必烈是典型的汉化派，但在他死后，子孙们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到底是保留蒙古传统，还是拥抱先进文化？到底是保留蒙古人的部落制，还是实行汉人的官僚制？

在这个问题上，蒙古人总是朝三暮四，基本上这个皇帝愿意采纳中原统治方式，下一个皇帝立即决定恢复蒙古文化。后期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这一点决定了政策具有摇摆性。

在摇摆当中，帝国的财政问题被搁置了。元政府不仅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还随时出台各种临时性的措施来破坏财政。

忽必烈死后，成宗铁穆耳统治了十四个年头，算是中期统治最长的皇帝。他在位时期，元代经济有所恢复，但随后就进入了彻底的失控期。

即便是铁穆耳时代，也只是把问题掩盖了下来而已。官僚数量膨胀、赏赐无度成为这个时代的通病。在忽必烈死去那年，铁穆耳就开始了他的赏赐之旅。根据有据可查的数据，为了稳固人心，他一年内共送出了金四千两、银十六万七千九百两、钞票二十三万三千一百锭。[16]

一边是大幅赏赐，一边是亏空的国库[17]。为了要钱，皇帝将目光转向了钞本银。

所谓钞本银，就是准备金。政府如果发行纸钞，就必须有真金白银

做后盾，当人民手中拿着纸钞，必须有一定的银子做保证。

元代初期，钞本银虽然不足，但毕竟政府还设立了一定的储备。而忽必烈时期为了战争曾挪用过准备金。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是财政困难的时期。成宗下令，将存放在全国各地的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准备金只留下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剩下的全部运往首都供他使用。[18]之后准备金有所恢复，到了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成宗下令再借二十万锭。[19]到了大德三年（1299年），元政府已经有一半的财政是出自钞本。[20]

另外，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元朝发兵攻打位于泰国的八百媳妇国，又造成了失控的军事负担。第二年，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至元钞发行量达到了创纪录的二百万锭[21]。

这种挥霍无度的使用方法立即造成了通货膨胀，但成宗皇帝并没有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到了武宗海山统治时期，他不仅想恢复蒙古人的荣耀，还要养活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而四处花钱的做法令财政危机更加明显。海山开始进行所谓的改革，目的是通过裁减官僚数目来节省开支，并加强政府的理财能力。但实际上，不仅没有把机构减下去，皇帝一不小心又增加了新的机构。

由于中书省机构僵化，办事效率变得更加低下，武宗希望恢复尚书省，由尚书省专门负责理财，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22]在保留了中书省的同时，又平白多出来一个尚书省，反而让官僚阶层越来越庞大。

另外，他模仿元世祖忽必烈，再次想到了发行新钞票的办法。武宗发行的钞票叫作至大银钞，同样按照忽必烈的老规矩又将旧钞票贬值了五倍，规定至大钞和至元钞的比值也是一比五，和中统钞的比值是一比二十五。虽然叫银钞，准备金其实已经不足，于是，武宗干脆下令，以后不准纸币兑换金银，民间也彻底禁用金银。[23]

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至大钞的发行总量达到了一百四十五万锭，折合中统钞三千六百三十万锭，印钞量比前三年翻了七倍。[24]再

加上一定的增税措施，从这时起，元代就已经出现了末期的症候。武宗死后，仁宗虽然废除了他的所有改革措施，但武宗改革的影响已经深入社会的骨髓，即便废除也于事无补了。

到了文宗时期，由于皇位争夺战，元代的政治结构更加脆弱，接近于解体，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也失去了。

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上台时，元代经济已经近于失控，人们都意识到再不改革就要完蛋。

伯颜作为右丞相时，采取了降低盐税和普通税的方法，让民间经济少受骚扰，减缓民间的反抗。[25]但由于他在民族政策上是个守旧派，他赞成加强民族区隔，取消科考，避免蒙古人的进一步汉化。这使得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经济措施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这时，随着元顺帝地位的巩固和脱脱的执政，他们开始对帝国财政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丞相脱脱更希望通过雄心勃勃的改造，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将帝国带出政治和财政危机。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

脱脱为相时，面临的是一个急需恢复、经不起折腾，却又四处都是叛乱小火苗的帝国。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都会顾此失彼，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但脱脱有着巨大的信心来改变孱弱的局面，他试图通过加强政府权力来实现一次中兴。

他担任过两次右丞相。第一次在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到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在此期间，他的主要工作是扭转伯颜前期的政策，重开科举考试，重新向汉人开放官制。同时为了表明元代的正统和持续性，他主持编修了辽、金、宋三代的史书。

在他第一次任期中，他还试图解决南方的粮食运往首都的问题。由于元代重新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在投入运营后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淤塞问题，不得不重新使用海上航线。在鼎盛时期，元代南粮北运的规模在每

年三百万石以上。但在脱脱执政时，已经下滑到二百六十万石到二百八十万石之间。[26]脱脱为了保证大都的粮食供应，避免帝国的基础失衡，试图开凿一条从大海到北京的水运系统，让海上粮食能够不间断地直达北京。但这次开凿以失败告终。[27]

虽然失败，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眼光独到。如果不解决粮食问题，元大都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后来在黄河泛滥和武装割据的时期，元的漕运和海运都中断了，大都的经济也就死了。

这次失败的开凿仍然反映出脱脱的经济发展思路：利用一定的大工程来解决帝国的根本问题，扭转经济颓势。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脱脱下台，继任的宰相们在几年内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恶化了。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黄河又发生了决口，[28]运河系统更加不堪一击，北方的粮食短缺加剧。同时，各地的反抗力量也愈演愈烈。所有这一切，促使皇帝再次想起了帝国最有才华的大臣脱脱，于是，在至正九年（1349年）第二次任命脱脱担任宰相。

面对比第一任时更糟糕的情况，脱脱又如何应对？

脱脱仍然满怀信心，试图用更大规模的政府行动来实现中兴。这次他的政治思想更加成熟，手段也已经纯熟，他的措施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整顿吏治减轻人民的负担，发展经济。这是历代政府的常规动作。特别是到了帝国后期，吏治已经比较混乱，这是任何一个强势的宰相都会动用的手段。

第二，大规模地兴建水利工程。由于黄河的泛滥，如果要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和运输问题，必须首先治理黄河。脱脱高效地组织了数十万劳工治理黄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由于北方的粮食问题很严重，脱脱提出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在北方种植产量更高的稻米。他采用了政府指导的方式，专门从南方请来了熟练的稻农，由政府出资来教北方的农民如何种植稻米。在

整个国家都处于非常状态时，脱脱仍然投入大力去做这些基础性、长效性的措施，说明他认为帝国是可以治理好的。[29]

第四，为了维稳，他还建立了庞大的军事系统。由于黄河泛滥、灾荒加重，帝国的财政已经处于非常状态，各地官吏争相采取非常规方法获得收入，反抗也层出不穷，并且规模在不断增大。为了对付这些反抗，脱脱尽可能建立起一整套高效的制度，来保证调兵的需要。

总之，脱脱的思路很明确，利用政府的一切资源，一方面加强维稳力度，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力量，让社会暂时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加快改革进度，加强基础建设和经济指导。这两方面都需要政府庞大的财政投入。

当时政府是否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即通过政府花钱的方式，来带动经济发展，我们还不敢确定，但他们肯定是相信一旦政府出手进行刺激、控制和指导，就可以让问题马上好转。

然而，好想法没有带来好结果。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原因在于这个理论虽然严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钱从哪儿来？

飞转的印钞机和社会崩溃

脱脱的所有措施都有一个核心问题：需要花钱。对于元代入不敷出的国库来说，又如何承担得起这些工程？

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汉代或者唐代，那是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在汉唐时期，由于货币是金属的，具有稀缺性，即便是皇帝，如果国库没有钱，也无法增加开支，更无法实行野心勃勃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在脱脱以前的各个王朝缺乏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原因：政府不是不想，是没有能力。

但到了元代，现代社会的金融秘诀——纸钞——已经出现。从宋代到金代，甚至元代前期，纸钞都展现了巨大的魔力，可以从无中创造出

有。当然也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某一天政府醒来，会发现发行的纸钞已经没有人接受了，这就会造成整体性的崩溃。

南宋末年，朝廷在讨论金代崩溃的原因时，认为除了军事上不敌蒙古人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导致社会在蒙古人打来之前已经崩塌了。但即便南宋政府能够看到金代的致命短板，到最后还是重蹈覆辙。[30]

那么，脱脱又能否利用好手中的工具，发挥它的长处，同时避免它的害处呢？

脱脱筹钱有两个途径：

第一，传统途径：加强国有企业，也就是盐、茶的专卖，以及增加农业税和商业税。但这些项目大部分已经被前面的政府榨干了，所以没什么特别之处。

第二，当传统途径提供不了这么多发展资金时，脱脱打开印钞机，加印钞票。

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为了筹措资金，脱脱以货币改革的名义启动了印钞之旅。他设计了一个整体性的改革方案，在这之前，元代几乎没有铜币，只使用纸钞。脱脱认为正常情况应该是钱币和纸钞同时流通，大额的用纸币，小额的用铜钱，为此，他发行了一种叫作至正通宝的钱币，进入流通市场。[31]

乍一看，这种金融思想带有明显的进步性，有纸币，有硬币，已经很类似于现代的货币制度了。但是，再一看，就会发现他的真实目的。发行钱币只是一个幌子，而真正的目的是印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这才是货币改革的本质。

除了钱币之外，脱脱还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叫作至正交钞。脱脱规定，至正交钞和至元宝钞的兑换比是一比二，将原来的纸币贬值了一倍。相对来说，脱脱没有像前人那么心急，将货币贬值那么多。

货币改革后，第一次就印了二百万锭[32]，用纸钞支付工人、士兵

的工资，以及用纸币进行采购。同时，这些纸钞都是没有准备金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把钞票都拿去兑换金属货币，会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多金属货币可以兑换。

但很快，钞票的发行就出现了失控，一旦开动了印钞机，就会形成惯性依赖，停不下来。2008年，美联储决定大幅度救助金融系统，敞开印钞票时，人们担心的同样是只要开动了就收不住。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依赖性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更何况生活在七百年前的人呢？当脱脱在北方发展农业时，政府再次需要钞票，于是，立马又加印了五百万锭[33]。这一下，不仅没有帮助经济，反而产生了更加重大的问题。

脱脱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不管他最初如何小心，恶性通胀还是如期而至。物价上涨超过十倍，在价格失控的情况下，政府为了解决采购和发薪问题，只好加班加点地加印钞票。最后钞票要用车船装运，运往四方。由于购买力太小，纸币散落得到处都是，也没有人去捡，如同废纸一般。[34]

金融秩序乱套，是导致人们对政权丧失信心的最关键因素。

第二，大量的政府工程占用了太多的劳动力。去修黄河、运河的人很多，而参加维稳的人也脱离了劳动，不再创造产品，于是种地的人少了，粮食减产，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同时由于天灾，村庄的人手不足，抵御能力也下降了。

宣判脱脱依靠政府发钞，花钱刺激经济的措施走到尽头的，是无情的军事动乱。由于经济秩序紊乱带来的民不聊生，山东、浙江、江苏、湖北等地先后叛乱。脱脱组织人马进行征讨。

元政府最后自掘坟墓的举措是：在脱脱征讨南方的叛军张士诚即将取得突破时，突然将他罢免了。这次罢相反而让人们忘记了脱脱此前的作为，纷纷同情起他来，认为如果不罢免他，也许元朝能够拖延得更久一些。

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却很难掩饰他之前的作为对元朝社会造成的伤害，更无法推脱他的责任。

脱脱被罢免后，元朝就已经瓦解了。这个社会不是被敌人征服的，而是从内部自动瓦解的。中央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全部疆域，南方各个小政权纷纷独立，不再听话。帝国皇帝的政令无法到达长江以南，在北方，也仅仅被限制在京郊地区。在这样的状况下，迟早会有人起来取代这个瘫痪的政府。当朱元璋成了群雄争霸的胜利者时，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接手了全国。

当然，不能完全责怪脱脱导致了元朝的灭亡。不管对谁来说，元晚期已经注定是个悲剧，灭亡不可避免，但脱脱的经济刺激计划却起到了加速灭亡的作用。

脱脱的例子提供的教训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政府往往会大手大脚花钱，大手大脚花钱导致它必须尽可能地捞钱，捞钱最简单的方法是加税和印发纸钞，这些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朝代中期，导致的是经济抑制和社会衰落，而如果发生在朝代末期，就是直接的崩溃。这与个人的人格和人品无关。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1206年—公元1368年。

[2]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中国经济受到冲击。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10年底投资四万亿。

[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ho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著有《就业、信息和货币理论》，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4]见《元史·伯颜传》。

[5]见《元史·脱脱传》。

[6]见《元史·世祖本纪》。

[7]见《元史·耶律楚材传》。

[8]见《辽史·百官志》。

[9]见《金史·百官志》。

[10]见《元史·百官志》。

[11]见《元史·世祖本纪》。

[12]《元史·食货志》："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

[13]《元史·食货志》均给出了详细发行数据。

[14]见《元史·桑哥传》。

[15]见《元史·阿合马传》《元史·卢世荣传》。

[16]根据《元史·成宗本纪》记载相加，有许多赏赐未写数字，故本数字是保守的估计。

[17]这一年，中书省一共发出了两次警告，请皇帝少赏赐点钱。第一次警告"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第二次警告时，表示"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上都、隆兴、西京、应昌、甘肃等处籴粮钞计用二十余万锭，诸王五户丝造作颜料钞计用十余万锭"。扣除后剩下七十六万余锭。

[18]《元史·成宗本纪》："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

[19]《元史·成宗本纪》和《元史·食货志》均有记载。"帝谕中书省臣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右丞相完泽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

[20]《元史·成宗本纪》："中书省臣言：'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支。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

[21]《元史·食货志》：“五年，至元钞五十万锭。六年，至元钞二百万锭。七年，至元钞一百五十万锭。”

[22]《元史·武宗本纪》：“甲申，诏立尚书省，分理财用。命塔剌海、塔思不花仍领中书。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任尚书省，仍俾其自举官属，命铸尚书省印。”

[23]《元史·武宗本纪》：“金银私相买卖及海舶兴贩金、银、铜钱、绵丝、布帛下海者，并禁之。”

[24]见《元史·食货志》。

[25]《元史·伯颜传》：“至元元年，伯颜赞帝率遵旧章，奏寝妨农之务，停海内土木营造四年，息彰德、莱芜冶铁一年，蠲京圻漕户杂徭，减河间、两淮、福建盐额岁十八万五千有奇，赈沙漠贫户及南北饥民至千万计，帝允而行之。”

[26]《元史·食货志》：“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计江南三省所运，止得二百八十万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寺观之粮，尽数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而已。”

[27]《元史·河渠志》：“至正二年正月，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继而御史纠劾建言者，孛罗帖木儿、傅佐俱伏诛。”

[28]《元史·河渠志》：“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

[29]《元史·脱脱传》：“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农卿，而脱脱领大司农事。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

[30]见本书第二部最后两章。

[31]《元史·食货志》："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

[32]《元史·顺帝纪》："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十万锭。"

[33]《元史·顺帝纪》："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召募农夫诸费，给钞五百万锭，以供其用。"

[34]《元史·食货志》："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第十三章　明代：最严密的集权皇朝[1]

明代拥有着最严密的集权手段，也拥有着最笨拙的财政工具。前代的许多财政经验，到了明代却都成了累赘。

明代皇帝由于对金融无知，发行的纸币没有准备金的概念，成了空头纸币，在明代初期就已经崩溃，变得一文不值。民间为了避免通胀，不接受政府发行的纸币，而是自觉采用白银作为货币。白银的采用是民间自发抵制政府掠夺的行为，纸币被抛弃后，由于政府缺乏制造通胀的能力，明代反而成了金融秩序最稳定的朝代之一。

宋元时期发达的对外贸易，到了明代也被做成了亏本买卖。明太祖注重农业，敌视贸易，禁止中外普通贸易，只准外人以进贡的名义前来，而又给予进贡人士过高的奖励，导致各国纷纷朝贡。当政府无力支付赏赐时，又开始禁止朝贡，导致日本人只好铤而走险，开展私下贸易，被称为倭寇。明英宗被俘虏的土木堡之变，也是由于贸易问题引发。

明代财政严重依赖于土地，使得政府收入不具有扩张性。

明代规定了严格的户籍与土地清查制度，却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变成了形式主义，到了明中期之后，户籍与土地已经无法查清。

明后期，大学士张居正为了整顿财政，试图改革税法，增加财政收入。他的整顿将加税的工具赋予了政府。万历后期，随着战争的开启，这些工具逐渐被滥用，使得明末在一片加税声中灭亡。

玩不转钞票的皇帝

在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兰，有一处人造奇观。[2]

当人们到达索马里兰后，首先会被满街堆放的钞票吸引住。在街道旁，几乎每一个做生意的小贩除了摆出货物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铁皮手推车柜，车柜外面是一层铁丝网，透过铁丝网可以看到柜里一摞摞的钞票。

这些钞票的面值分为五百、一千和五千先令三种（2014年状况），其中五千先令的钞票还很少，流通市场上以一千的为主，五百次之。每一千先令价值不到人民币一元，一沓（一百张）钞票比不上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

人们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往往需要带上厚厚的几大摞钞票，哪怕只是吃顿饭，也要吐口唾沫数上好多张。坐一趟车到其他城市，就要掏半沓钞票付账。

在市场里还有许多换钱商，他们把钞票摆在地上，形成了巨大的钞票堆，最大的长宽高各有一米左右，重量超过一吨。在市场里，换钱商们都聚在一起，他们的面前全都是庞大的钞票堆，谁的财富多，望一望谁的堆更大，就一目了然。但如果把一吨重的钞票换成美元，放在手掌心里就可以拿走。

来到索马里兰的人们看到当地巨大的钞票堆，都会带上疑问：为什么政府不多印刷一些大面值的钞票来方便人们携带？比如，从比值上来说，越南的越盾比索马里兰先令更不值钱，三越盾才能兑换一索马里兰先令，但由于越南政府发行了许多大额钞票，民间并不会出现钞票太重不好拿的问题。那么，索马里兰为什么不能借鉴越南经验呢？

原因在于：索马里兰缺乏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对通货膨胀做出反应。当一种新钞票第一次发行时，政府一下子印刷了太多的钞票存放起来，准备未来分批投入市场。

在新钞票大量投入时，也触发了市场上新一波贬值，结果，新印刷的钞票还没有投放完，就已经贬值成了毛票。政府必须硬着头皮将已经印刷出来的毛票继续投入市场，消化完毕后，才有可能印刷更大面值的钞票。钞票贬值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政府做出反应的速度。

在索马里兰，市面上许多一千先令钞票都是全新的，一沓一百张的钞票全是连号，人们使用时也是按沓算，不用拆开。如果按照正常的磨损速度，在十年内，这批钞票仍然不需要退出流通。

了解原因后，许多人都会哑然失笑，仿佛在看西洋景。

但不幸的是，这曾经是中国特有的“东洋景”。当其他国家还没有听说过纸币，宋、金、元时期就已经发生过巨大的钞票贬值。不过，到钞票如废纸时，这三个朝代都已经进入了皇朝的灭亡期。而在明代则更进了一步：在朝代中前期，钞票就成了巨大的废纸堆，出现了与索马里兰类似的景观。甚至比索马里兰还不如，钞票堆积在市场，人们连看都不看。[3]

宋元时期，人们对于纸钞的原理有着清晰的认识，政府发行纸钞，都知道纸钞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背后有准备金，纸钞可以随时兑换钱币或者银子，人们不是看重这张纸，而是看重它对应的实际财富。

不管宋代还是元代都有着较为严密的准备金制度，只是到了后来，由于财政的压力，才偷偷地将准备金挪用了。但由于政府操作还有一定的规则可言，故而能够保证纸钞在崩溃前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正常流通。

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对经济最无知的环境中，对权力斗争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金融、财政、贸易却一窍不通。加上他强调后代必须完全遵从他设计的制度，明代的财政制度从他建立时起，就是最保守、最落后的。

由于对纸钞的原理一无所知，明代的准备金制度也是最差的，这导致明代建立不久之后，纸币制度就已经崩塌。民间由于不信任政府，所以退回到了硬通货之中，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不再理睬政府的纸币了。

在开国之后，统一全国之前，明太祖就开始着手建立新的金融体系。最初，他效仿唐宋，铸造了一批铜钱进行流通。[4]但由于战乱，铜矿开采陷入停滞，政府只能强迫民间把铜器销毁，上缴用来铸币。这种做法引起了民间的不满。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太祖想起了元代纸钞的便捷，便效仿元代发行纸币。明代发行的纸币叫“大明宝钞”，币值分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等。明代的纸币经过了精心设计，在币面上，除了书写“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书省（后来改为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等文字之外，还考虑到有许多人不识字，用图画的形式表明面值，在钞票上画上钱串的图样，每画一串，代表一百文。在一贯的钞票上画十串，五百文画五串。

根据皇帝的设计，一百文以上的交易使用纸币，一百文以下的使用铜钱。他规定了几种中介物的比值，每一贯钞票，对应于一千文钱、银一两；每四贯钞票对应于黄金一两。不仅将纸币与铜钱挂钩，还将黄金、白银、铜钱的比值也都挂钩，强行锁死了几种物品之间的汇率。

明太祖认为，只要利用皇帝的权威规定了纸币的价值，并用严刑酷法来强迫民间接受，就可以保证它的流通。但他对货币流通背后的机制一窍不通，他不知道，人们之所以接受纸币，是因为纸币背后准备金的支撑。

与宋元时期的纸钞比起来，大明宝钞的缺陷非常明显。

第一，宝钞完全没有准备金制度，所有的纸币都是不可兑换的。虽然朝廷公布了纸币与黄金、白银、铜钱的兑换比率，但是，这个比率只在民间拿真金白银换纸币时有效。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持有一两黄金，到政府就可以按照官方比率换回四贯的纸币。但是，他如果不想要纸币了，想拿回黄金，政府却将兑换的窗口关上，不予理睬。仅仅这一点，纸币就成了政府从民间榨取真金白银的工具。

但是，如果民间决定保留黄金白银，不兑换成纸币呢？皇帝也在考虑这个难题。最终明太祖想出了办法：发布禁令，民间不得以金银进行交易，也不准以物易物，必须使用纸币和铜钱，违反的就是犯罪。

禁止了金银交易，而铜钱的数量又很稀少，民间只有使用纸币这一

个选择了。[5]

第二，宝钞的发行不限量，政府想印多少印多少，一旦财政匮乏，立刻打开印钞机。宝钞也不再分界。最初，宝钞也没有以新换旧一说，人们把钞票用旧用烂了就失效了。后来才规定可以以旧换新。

第三，纸币之所以通行，最重要的保证是政府允许民间用纸币纳税。然而明太祖却在财政上做手脚，政府花钱时尽量多使用纸币，而政府收钱却少收纸币。

而在收税时，政府却要求人民不能都使用纸币。比如民间缴纳商税时，只能百分之七十用钞票，剩下百分之三十用铜钱或者金银。[6]民间为了凑齐缴税用的硬通货，必须花高价去购买，结果纸币立刻出现了大贬值。

随着钞票的持续贬值，皇帝在税收中也更加偏好硬通货，有记载说，即便到了一贯纸币只值一文钱的时候，皇帝还强迫民间按照一贯纸币兑换银子二分五厘的标准（这个标准高估了纸币一千倍），上缴银子作为税款。[7]

皇帝向市场投入了过多的纸币，明代的钞票成了典型的击鼓传花游戏，政府源源不断地把流动性放出来。只用了二十年时间，明代宝钞制度就崩溃了。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每贯宝钞只能兑换一百六十枚铜币，贬值已经超过六倍。[8]又过了五十年，宝钞已经成了废品，堆在街上都没有人要了。

当纸币制度已经彻底崩溃后，民间不再顾及皇帝的禁令，转而使用白银作为交易媒介。明代的金融制度陷入了混乱。在宣宗时期（公元1426年—公元1435年），皇帝仍然坚持祖宗的法度，认为用银买卖是一种犯罪行为，下令禁止民间用银。交易用银一钱，罚钞千贯，官吏贪赃一两银子，要追缴纸币一万贯，之外还要缴纳免罪钞。

但宣宗时期的用银禁令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尾声，到了明英宗正统时期（公元1436年—公元1449年），皇帝终于放松了用银的禁令。朝野

都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银子。此后虽有反复，但实际已进入银本位时期。

奇怪的是，明代宝钞制度虽然很快崩溃，可是宝钞却如同细小的尾巴一样一直存在。由于明代是个对祖宗之制无限尊崇的朝代，一旦朱元璋建立了制度，没有人敢于废除。

到了后来，宝钞就成了一种礼仪性的东西。逢年过节，皇帝就会装模作样地向大臣发放宝钞作为赏赐。大臣明明知道宝钞已经形同废纸，没有了市场，也要感激涕零地接受下来。由于这种礼仪作用，大明宝钞一直保留着。

对于明代人来说，皇帝发行纸币唯一的公平之处是：它不仅仅坑老百姓，对官员也毫不手软。实际上，官员是明代纸币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明太祖出身贫寒，明代对官员也一直实行低俸政策。明代初年，一品官月俸大约只有一百石粮食。但明初的官员在俸禄上还算幸运。随后，明太祖决定把一部分俸禄折算成钞票，官员的收入就走向了漫漫的缩水旅程。

钞票发行后五年（洪武十三年），皇帝规定一品官的俸禄为每年一千石，同时给钞票三百贯。刚发行钞票时，一贯钞票合米一石[9]，相当于年俸为一千三百石粮食。

十二年后（洪武二十五年），一品官改为月俸，每月八十七石粮食。由于钞票的贬值，此时的俸禄只发粮食，但数量已经有所缩水。

到了明成祖时期，官员俸禄开始大面积搭钞，高官给四分米六分钞票，小官给六分米四分钞票。随着钞票贬值的加剧，官员俸禄大打折扣，到了宣宗时期，一品官的月俸只有四十六石米，随后的英宗时期只有不到三十五石，宪宗时期只有二十石米，不如一个唐代的七品官[10]。

由于官员俸禄太少，他们只能想其他的办法来补贴家用，这是造成明代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后期，官员也忍受不了钞票的盘

剥，呼吁皇帝加速银本位的普及。

银本位的确立，是民间自发对抗中央政府错误金融政策的结果。由于政府无法保证纸币的信誉，民间只好寻找最方便的中介物来代替纸币，完成交易活动。

中国的银本位还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欧洲和中东都再次进入了铸币时期，而在历史上铸币发展最完善的中国却正好相反，民间用银并非是以钱币的形式使用，而是夹成碎块称重使用。虽然银为交易中介，却缺乏统一的形制，货币形式变得更加落后。

不过，虽然有着种种不方便，当全国普遍采用银本位之后，民间经济却因此受到了保护。汉代政府学会用铸币造假的方法从民间抽取铸币税，而宋代以后的政府屡次使用纸币来筹集财政资金，不管是铸币还是纸币，都会沦为政府的财政工具，破坏民间经济的繁荣。明代政府把纸币玩崩溃之后，不得不把货币职能交给了天然的贵金属银，银子的供应量只和储量、开掘能力有关，政府不能控制。

结果，明代政府虽然失去了一张财政王牌，却出乎意料地有了新的收获：由于民间金融系统脱离了政府摆布，变得更加健壮，反而使明代经济更加经得起政府的折腾。不管是外敌的入侵，还是内政的败坏，二者对于民间经济的破坏力都大大下降。银本位制保护了民间的繁荣，无意之间，让这个原始、僵化的帝国存活了近三百年时光。这或许是朱元璋当初也没有想到的。

表7 明代官员俸禄受纸币的影响[11]

官级	洪武十三年	洪武二十年	宣德八年	正统九年	成化七年
一品	116.32	93.41	45.94	34.80	21.02
二品	98.42	65.50	32.21	24.40	14.73
三品	80.53	37.58	21.76	14.00	8.35
四品	62.63	25.77	14.86	9.60	5.80
五品	33.10	17.18	12.70	6.40	3.86
六品	18.79	10.74	8.01	4.75	3.46
七品	14.32	8.05	6.69	3.56	2.59
八品	10.74	6.98	5.79	3.08	2.23
九品	8.50	5.91	5.90	2.61	1.90
从九品	8.05	5.37	5.37	2.54	1.73

亏本的对外贸易

明代是一个笨拙的朝代，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和尚，对于经济、金融、商业均一窍不通。他建立的制度渗透在整个王朝的血液之中，形成了许多啼笑皆非的现象。

除了在金融上的无知之外，对外贸易这个让之前所有朝代受益匪浅的领域，到了明代皇帝手中却如同噩梦，令人无所适从。

从唐代以来，对外贸易就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到了宋代，政府更是学会了利用对外贸易来发财，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外关税制度和专卖制度，将政府的收入最大化。

然而，明代虽然试图继承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却由于无知，政府不仅无法通过贸易赚钱，还做一单赔一单，对外贸易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最后只能选择闭关锁国了事。

在宋代，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员，都对海外船只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在沿海各省，一旦发现有外国船只到来，地方官员立刻蠢蠢欲动，他们向上级申请开支，再派人到船上邀请船长、船员参加政府组织的聚餐，对其表示欢迎。地方官员与海外商人也称兄道弟，俨然一派祥和的景象。

为了欢迎海外商人，政府甚至出台了法规，保护那些出事的船只。当有船遭遇飓风漂到了海滩，如果船主不在时，地方政府负责保护船只的财货。[12]甚至船主死了，他的亲人来认领，政府也要帮助他们完成交接。

在中央政府层面上，皇帝甚至亲自下空白诏书，让他的使者们带着诏书到南海诸国，根据情况填写，招揽生意到中国来。[13]

当然，在一片重商的氛围下，政府有着不小的财政收入。

在宋代，海外关税的税率是十分之一，一艘船停靠海岸，经过官府

登记后，将十分之一的货物缴纳给政府，剩下的再展开贸易。

除了正常的税收之外，宋代还实行官卖制度，许多海外商品不允许民间买卖，只能由政府收购，比如玳瑁、象牙、犀角、乳香等物品，都是专卖品。即便必须专卖，但由于价格较为合理，形成了政府与外商双赢的局面。在专卖之外的其余物品，如果政府不打算收购，则由外商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这种贸易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却由于受到各级官员的鼓励，运转良好。

但是到了宋代后期，随着政府敛财倾向的加强，另一种趋势已经显露。这种趋势是，为了便于管理，将外贸向广州、泉州等几个重要港口集中，并禁止其他地区接待外国商船。为了避免本国商人的走私行为，限制本国船只前往海外。

这种倾向的出现，为中国海外贸易投下了一丝阴影。

但在宋元时期，皇帝仍然能够从贸易中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虽然在制度上加以限制，但实际上却仍然是鼓励贸易的。官员们深刻地领会了中央的精神，因此，上述限制并没有对贸易造成太大的损害。

到了明代，事情却发生了逆转。这个笨拙的朝代继承了宋元时期的制度基础，却没有继承宋元时期的贸易精神。

由于明太祖强调农业，轻视商业，因此，明代各个边境的官吏不仅不鼓励贸易，反而限制贸易。他们认为，海外诸国与中国的贸易不是互利行为，而是皇帝的一种恩赐。

在这种思想之下，他们并未发展出一套海外贸易规则，也没有想过从海外获利。在宋代，每艘船只的到来都意味着一笔丰富的财政收入，但明代不对海外船只征税，也不准海外船只自由贸易。

他们认为，外国人到中国来，唯一的原因就是仰慕中国的文化，所以才前来朝贡的。他们把所有海外的商团都当作外交使团而不是贸易商人。[14]

即便一个人是来做生意的，也必须伪装成外交使者，才能获准将货

物输入中国。输入中国后，还不能自由买卖，只能统一交给政府，当作贡品押往北京。[15]而皇帝则赏赐给这些使者大量的钱财，这些钱财不仅足以偿还货物的价值，还比通过自由市场买卖赚得更多。

在皇帝看来，外商到来只是进贡，并领取赏赐；但在外商看来，这是中国特有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虽然古怪，却可以获利更丰厚。至于私下的海外贸易，则是完全禁止的。这就使得官方垄断了海外贸易，成为现代贸易垄断的一个先例。[16]

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在面向中亚内陆的西北地区，一套类似的规则也建立了起来。从西域来的商人带着货物到达边境后，必须在嘉峪关外等待。当一位外国政府的使节经过时，商人们会要求加入使节的队伍，冒充使节的随从，然后才能入关。

由于有名额限制，跟随使节的商人又分成两个层次：那些最大的商人被允许和使节一起到北京，将货物献给皇帝，皇帝会回礼给他数倍的赏赐；而小一些的商人则被允许在边贸市场或更靠内地一点的城市里把商品卖掉，他们赚得少一些，但也满足。

外贸对于明政府来说，不仅不再赚钱，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由于赏赐价值总是超过货物本身，买卖做得越多，中央政府反而赔钱越多。此外，当商人跟随使节进入内地后，一路上的吃住行和安全都由各地的官府负责，照顾这些使节（商人）团也需要耗费大量的地方经费。

在这种制度下，不管是海外的国王还是商人都很喜欢到中国来朝贡，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明朝政府有多么尊重，只是因为买卖很划算。

许多国家甚至利用制度的漏洞来牟利。最会利用朝贡漏洞的是日本人。[17]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型国家，能够拿得出来的商品只有工艺品、木材、刀具等少量物品。而明代最欢迎的却是东南亚的奢侈品，对于日本的商品本来就不感兴趣。

同时，日本还是一个擅长贸易的国家，明代限制港口数量和贸易次数，根本满足不了日本商人的需要。在贸易的刺激下，日本商人冒充的

朝贡团络绎不绝，并且大量夹带走私物品，一份贡品之外，会有十倍的走私品藏在船中。而贡品的价格也被虚报，他们希望获得高额的赏赐。

当明代政府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之后，便开始想办法弥补。一方面对日本的贡品大幅度压价，甚至只给到日本人希望价格的六分之一；同时规定日本人不得频繁地进贡，每十年进贡一次，每次只允许两艘船、两百人。对于其他的国家，明政府往往规定两到三年一贡，对日本人的单独规定显然是一种严厉的惩罚。

由于正常的贸易被中央政府的粗暴规定打断，日本人随即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展开了贸易和海盗攻势，中国进入了倭寇频发的时期。[18]

倭寇的发生进一步刺激了政府，皇帝下达禁海令，禁止人民下海贸易，并正式断绝除进贡之外的其他贸易形式。

在西北方向，明代的这套进贡把戏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发生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就与贸易有关。[19]

这一年，皇帝在大太监王振的怂恿之下，御驾亲征，与属于蒙古人远支的瓦剌人（现在叫作卫拉特人）作战。二十万明军在太原附近与瓦剌人接触后，向北京撤退。

在北京的西方和北方，自古以来有两条主要道路：一条经过紫荆关到达河北易县，另一条经过居庸关到达北京昌平。这两条路属于古代有名的“太行八陉”的最后两条。

在选择从哪条路撤回北京时，王振犹豫不决，丧失了最后逃跑的机会。皇帝的大军撤退到土木堡时，被瓦剌人团团围住。此时，明军距离居庸关还有百里之遥。

土木堡处于高地之上，水资源缺乏，皇帝的大军饥渴难忍，掘地两丈都找不到水。瓦剌人的首领也先佯装撤退，皇帝立刻中计。在明军准备向南撤退时，瓦剌人先杀了个回马枪，将二十万明军彻底击溃，大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等大臣都战死了。

皇帝在太监喜宁的陪同下，向瓦剌首领也先投降。

人们感慨土木堡之变让汉人政权蒙尘，却想不到这场冲突也是由明代奇葩的外贸政策引起的。

在东南方，日本人钻朝贡漏洞的做法让明政府感到头疼。而在西北方，则是瓦剌人。由于瓦剌人喜欢中原地区的奢侈品，对于绫罗绸缎、茶叶等物品的需求都非常大，而他们能提供给中原的只不过是些皮毛制品和牲口。如果双方有正常的自由贸易，那么瓦剌人的需求一定无法满足。但他们善于利用明代的朝贡空子。如同一阵风一样，瓦剌的王公贵族们争先恐后地向明朝纳贡，用不值钱的东西换取皇帝的赏赐，并逐渐发展成一种类似于勒索的形式。

瓦剌人的朝贡队伍也越来越庞大，最初一次的朝贡团只有几十人，后来则达到几百人，最后，则有数千人之多。以前一年一次，后来则一年两次。每次来人，一路上各个地方衙门就要出人出力，提供马匹车辆、楼堂馆所，地方政府也叫苦不迭。[20]

朝廷在赏赐上的花费越来越高。皇帝受不了了，就变相地允许瓦剌人在边境处做一部分贸易，不用把所有的贡品都带往北京。即便这样，还是有大量的瓦剌人拥入。

在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瓦剌人的首领也先又派了一个号称三千人的大型朝贡团前来，明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严格核对人数，发现贡团的规模只有宣称的五分之一，于是叫人按照实际情况付账。[21]

明英宗的做法激怒了也先，第二年，他派出了庞大的骑兵。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这才有了土木堡之变。

纵观明代的外贸史，是一场加强控制却越来越扭曲的贸易史。最初政府想控制贸易，又想安抚外国人，将宋元时期的制度弄成一种古怪的朝贡制度，这种制度再次畸形化，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不仅无助于政府财政，反而成了财政的漏洞，变得越来越滑稽。

由于财政失控，明朝政府对于商业和贸易的态度愈加敌视，并最终把中国送入了闭关锁国的轨道。当锁国政策固化到人的脑子里时，整个社会对海外世界都充满了偏见和敌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

公元1367年（元朝灭亡的前一年），割据吴越一带的吴王张士诚在平江（苏州）被朱元璋打败。在被押解前往应天府（南京）时，他选择上吊自杀，不辱于对手。[22]

张士诚死后，朱元璋统一了江淮，为北伐元朝打下了基础。然而，对于长江下游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地区的百姓来说，苦日子却到来了。

当元代末年全国各地频发叛乱时，张士诚维持了苏松嘉湖地区的和平安定，轻徭役、薄赋敛，很受人民的爱戴。在他死后，朱元璋对待这个地区却是另一种做法。他怨恨这里的百姓爱戴张士诚，不及早归顺他，下令对这个地区施加重税。

在明代，官田的税率平均为一亩缴粮五点三五升，民田的是三点三五升，重租田的是八点五五升，而罚没充公的土地（没官田）的租税最重，是十二升。但即便是最重的没官田，也和苏松嘉湖地区的税率无法比。

在这个地区，明代政府将富人豪族的土地尽数罚没，算作官方土地（官田），并按照田租的方式来收税。在中国古代，租和税是两个概念，税是由国家来收的，一般占产量的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之间。而租则是没有土地的人向有土地的人租地缴纳的租金，一般租金是产出的一半左右。没收土地，将原本向国家缴纳的税改成租国家的土地缴纳的租金，是将缴纳数额上涨了至少五倍。

随后，司农卿杨宪仍然认为，考虑到浙西土地的肥沃程度，钱还是收少了，再次奏请皇帝将租税加倍。三番五次加税之后，苏松地区的租税额最严重的甚至达到了一亩缴纳二百到三百升（二三石）的地步，是普通农田税率的四十到六十倍。[23]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在全国进行减税，苏松嘉湖地区也受益。按照新的规定，原来税率在每亩四十四升到七十五升的减税

五分之一，每亩三十六升到四十四升的，一概减到三十五升。

但即便按照这个税率，当地百姓仍然无法承受。根据统计，苏州一府的秋粮产出在二百七十四万六千石左右，来自民田的粮食只有十五万石，其余的都成了官田。而苏州一府缴纳的税收，有时甚至比一个省的税收都高。[24]

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他以为把土地都收归官田、抬高农业税是对苏松嘉湖地区的惩罚，却于无意中造成了另一种现象：当人们在土地上被盘剥过度之后，许多人干脆放弃了土地，去经商，成了城里人。这些人有充足的商业头脑，又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结果，江浙一带不仅变得更加富裕，也成了皇朝文化的主宰。在明清两代，江浙一共出了二百零二名状元，仅仅苏州一府就独占三十五名，仿佛嘲笑着明太祖的诅咒。

朱元璋即便在天有灵，也一定不会明白，为什么当初的惩罚反而成了苏州人的机会。他的脑子里只有农业，并把主要的税收建筑在农业之上。

明代是一个农民意识最强的朝代，朱元璋试图建立最严密的户籍和土地制度，用这种方式来约束整个社会。但不幸的是，这套制度过于严密，除了朱元璋，没有人能够玩转。等他死后，这套烦琐的制度反而成为继承人的枷锁，令他们疲于奔命却徒劳无功。

明代的财政制度主要依靠两种资料来收税：针对户籍的黄册和针对土地的鱼鳞册。前者相当于现在的户口簿，后者相当于土地簿。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太祖下令，天下的府县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的结果要编订成黄册，作为征派赋役的标准。[25]

他把农村分成许多叫作“里”的单位，每一里有在一百一十户人家，其中十户税额最高的担任里长，剩下的一百户，每十户为一甲。城市中的里又称“坊”，在城边则称“厢”。

根据规定，每一里编一本黄册，黄册里不仅登记人口信息，还登记每一户的财产和土地信息，作为征派赋役的依据。

然而，仅仅有黄册还是不够的，因为黄册上虽然记载了每户有多少土地，但是许多人在登记时不会说实话，隐瞒了大量的土地。为了清查全国的土地状况，政府必须派官员到每一块土地去，丈量土地的大小，并落实土地归谁所有，再把这些信息统计起来，计算出每家每户有多少土地。

在编订黄册六年后，明太祖下令，丈量全国土地，编订鱼鳞册。鱼鳞册指的是一种带有图示的土地登记册，画出了土地的形状、分隔和归属。这种图示看上去如同鱼鳞，所以叫鱼鳞册。

建立黄册和鱼鳞册是两项雄心勃勃的工程。在当时，要依靠人力去一一统计全国的土地和户籍，需要耗费皇朝几年的时光。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由于明初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明太祖顺利地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全国户籍共计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土地面积则达到了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这次清查的成就是巨大的，特别是土地，通过清查，全国在册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一倍，皇帝的税收大大增加。

明太祖更是规定，黄册和鱼鳞册每隔十年就要彻底清查一次，以便政府掌握真实的数据。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一次的普查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施。以第一次清查为例，从洪武十四年开始搞人口普查，到洪武二十六年人口土地数据统计完毕，期间花了十二年的时光。明初，由于太祖的苛刻和严谨，官员们战战兢兢、尽职尽责，还用了十二年时间才完成统计。随着行政效率的降低，后来的皇帝又怎么可能完成十年一次的浩大工程呢？

明宣帝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在太祖人口普查三十年后，明政府再次普查人口和土地数据。这次得出的数据却让人大吃一惊。

人口在经过了明成祖时期的高峰之后，已经回落到了只有九百九十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九户，五千一百九十六万一百一十九人。[26]如果说人口下降的幅度却还不大的话，那么土地数据就出现了剧烈的下滑。此时，明政府普查的土地只剩下了四百一十二万四千六百二十六顷[27]，

不足明太祖时期普查的一半。从这时到一百多年后的万历年间，土地数据一直在四百多万顷左右，直到张居正清查土地，状况才有所改观。

土地数据下滑严重，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也出现了困难。

那么为什么人口会出现下降，而土地数据更是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滑呢？

明代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多次。比如，关于人口问题，成祖和宣宗时期的大臣周忱就认为，户口的下降是由于人们或者投靠豪门，成为佃户；或者冒充匠户，去两京谋生；或者四处做生意；或者四处流浪，甚至居住在船上，没有固定的住所，无法调查。[28]

关于土地数据下滑，嘉靖八年时的大臣霍韬认为，从洪武元年到弘治十八年大约是一百四十年，大部分都是太平时代，按说土地数量应当增加，可是天下的土地反而减少了一多半，其中湖广、河南、广东减少得最多。这些失去的土地不是拨给了王府贵族，就是被刁蛮的猾民偷偷隐藏了。广东这个地方没有诸侯王府，那么不是刻意隐瞒，就是被贼寇占据了。[29]

简单地说，由于土地直接和税收相关，比起隐藏户籍来，人们更加有动力将土地隐藏。另外，随着一部分人的流动，土地也进入了市场，但在市场上交易的土地往往会做手脚，使其避免进入黄册。而记录土地状况的鱼鳞册则更加混乱，由于鱼鳞册绘制麻烦，技术含量更高，政府官员们更有理由搁置这项工作，导致鱼鳞册的统计数据严重失真。

如果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明代的数据退化更是必然的，因为任何的全国性系统都需要执行层面严格的配合和复杂的计算，在一个依靠人力和畜力来维持经济运营的时代，其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官僚们能力所及。

与汉唐时期不同，明代是一个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人口的流动程度超过了汉唐，政府也不限制土地兼并，数据统计的复杂度比起前朝更是高出了很多倍。而明太祖为了巩固政权，避免子孙后代乱改法令，又制定了中国历代最僵化的行政体制。

当明太祖还活着时，这套行政体制因为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因此，在他的摆布下，显得得心应手。但等他死后，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驾驭这套制度。行政退化从明太祖死后就已经非常严重，谁也无法再维持系统的高效运转了。

到了后来，户籍和土地普查已经进入了蒙人阶段，有的人死去几十年，名字照样出现在黄册里，至于鱼鳞册则更是乱七八糟。

由于明太祖规定，十年必须查一次户籍和土地，后来的皇帝和官僚必须遵守老祖宗的规矩，但是又实在犯懒，所以就把上次的数据抄一遍。在明代的土地调查数据中，出现了几次令人瞠目结舌的雷同。比如，明武宗时期一共进行了两次普查，一次发生在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第二次发生在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这两次全国的土地数据都是四亿六千九百七十二万三千三百亩[30]，一分不差。这样的雷同说明，皇帝根本就没有去统计。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世宗嘉靖皇帝的前两次调查中，以及明代末年天启和崇祯年间的两次调查中。[31]

由于数据的不准确，官员们征派赋役已经不可能再按照黄册进行。有的人就另造一本户籍，叫作白册，白册上登记的数据要比黄册上的更加准确。

黄册是拿给上级看的，上面登记的户籍和土地数量都较小，计算出来的总税额也较轻，而白册是用于实际征派赋役的，户籍和土地都更准确。通过这种方式，上级给地方官员的压力没有那么大，而地方官员仍然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信息。

土地信息的失灵还产生了“大小亩”的说法。所谓大小亩，是指黄册登记的亩数和实际土地的亩数有差别。一块地可能有十亩，但是在黄册上只登记五亩。在黄册上登记的数字叫大亩，是用来向上级报税的，而实际上的数字叫小亩，是用来征税的。朝廷只知道大亩的数据，却摸不清小亩的数据。

在民间、官吏的共同努力下，明代的财政如同一团乱麻，隐藏在迷雾之中。

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

明代是一个无法变化的朝代，从开国者朱元璋死后，这个朝代就已经僵化到容纳不了一次改革的程度。即便再锐意改革的皇帝，也会发现祖宗的制度已经限制了变革的可能性，只能顺着惯性随波逐流，等待最后的清盘。

即使是人们常常谈到的张居正，也没有能力进行一次完整的改革，他只是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做了一次小小的挣扎，将社会从失控中向回拽了一小把，却又引起了另外的失控。

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制度天才，他设计的制度成熟耐久，让所有人都感觉动弹不得，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他的税收结构虽然很原始，却又由于太原始，为工商业的发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间。这是一个无法进化的政权，与进步和创新无缘，却又由于稳定而长期存在。

整个官僚架构保证了行政工作的刚性。这是一架自动运行的机器，虽然随着年久失修，越来越耗油，越来越吃力，但如果一个人指望这台机器会很快坏掉，那就大错特错了。

没有人喜欢这个制度，但每个人又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无奈地巴望着它倒掉。可是制度冷冷一笑，稍微伸个懒腰，就把人给熬死了。

朱元璋设计的制度之所以稳定，得自于他吸取了元代的经验和教训，保留了那些利于稳定的因素。

明制对于元代最大的继承是它的行省制度。[32]中国古代实行地方两级政府制，到了宋代逐渐过渡到两级半，元明时期正式变成了三级政府。

三级政府比两级政府更有利于集权。在两级政府时代，仅次于中央级的州（郡）的数目越来越多，发展到后来有数百个，这么多的机构需要中央直接管理，根本管不过来。而三级制则在州（府）之上设立了省一级的机构，由于省的数目只有十几个，中央政府的政策传达更有效率，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管理结构，对地方的掌控力更强。

明代的三级政府还包含一系列更加锐利的武器。虽然人们将明代的次一级政府叫作行省，但这只是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它由好几个衙门组成：主管行政的衙门叫作承宣布政使司，主管军政的叫都指挥使司，主管监察和刑罚的叫提刑按察使司。承宣布政使、都指挥使、提刑按察使三个官员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他们都是由中央直接调遣，以避免三人互相勾结，在地方坐大，于集权不利。

与三级政府结构对应的还有三级考试制度。[33]一个读书人如果想中进士，他必须过好几关，只有通关了才能获得最高学衔。

首先，他要在县里参加县试，通过后再去府里参加府试，这两次考试都通过了，他就被人称为童生。

拥有童生资格的人才可以参加由各省学道组织的院试，院试合格的人被称为秀才。只有中了秀才的人，才被国家正式认可为读书人，享受一定的税收和礼仪优待。中国的读书人中，许多人终生通不过秀才这一关，白发苍苍仍然是个老童生。

有了秀才资格后，他可以去省里参加乡试，乡试通过之后称为举人。

有了举人的资格，才能去京城参加会试。会试通过，还要再参加殿试，分三甲放榜，有了进士的身份，而进士第一名叫作状元。

这一套考试制度玩下来，甚至比现在小学、中学、大学还要复杂，考生折腾于县、府、省会和首都之间，交通成本也非常可观。

人们常对科举产生巨大的偏见，认为考试制度是一种“毁人不倦”的制度。但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科举，而在于集权社会里没有第二条可以光宗耀祖的途径。所有的人都扎进了这座独木桥，才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单一化。

明代科举制的完善，也彻底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汉代至魏晋，往往会产生许多传承数百年的大家族，而官员名额大部分被这些家族垄断。在唐宋时期，虽然科举制已经在起作用，但社会上有经济优势的大家族还是长期存在，当官靠家族和祖辈的这一官场习俗也没有完全

扭转。只有到了明清时代，由于科举制已经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地方的人才输送到中央，只有科举一条路可以当官致富，所以使得地方上的大家族萎缩了，反而形成了另一个传统：富不过三代。

通过科举，明代彻底打碎了社会结构的结块现象，民间分散成了一个个原子，互不隶属，中央的权威不会受到任何挑战，形成了彻彻底底的集权模式。

在继承元代制度的基础上，明太祖又吸取了若干教训，将元代的开放型社会变成了保守和封闭的社会。

为了避免元代后期的官僚失控现象，继续加强皇帝的权威，明太祖将百官的权力尽可能回收，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必须由皇帝来定夺。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口中书省丞相胡惟庸造反，大肆迫害开国功臣，并乘机取消了中书省这一机构。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六部长官都要向他直接报告，所有事务都由他亲自定夺。这就产生了一个超强的集权体制[34]。

这样的做法如果放到现在，相当于取消了英国首相，让英国女王直接领导各个部的大臣。

与中书省一起废除的还有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它们是军事和监察的首脑机构。皇帝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不再信任任何人。加上明初大肆屠戮功臣，明代初年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息。君权独断，铸就了整个明代的政治氛围。

但是，当明太祖废除了大都督府、中书省和御史台后，他一个人又如何能够制定这么多的国家管理政策呢？集权国家的管理事务多如牛毛，这些机构本来都是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专业机构，而今只剩下皇帝一个人，就算一天到晚一刻不停，也无法将所有的事情做完。于是，明太祖引入了一系列地位更加低贱、更容易控制的机构和人，来替他做事情。

在民政方面，明太祖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设立了若干大学

士，由这些大学士帮助皇帝起草诏书，商谈国事。

军事方面，大都督府废除后，由中、左、右、前、后等五军都督府主管统兵，统辖全国各地的军事卫所，五军都督再向皇帝负责。而如果需要调兵，五军都督也没有权限，调兵权是归属兵部的，以防军事部门与皇帝抗衡。

监察方面，同样在这一年，明太祖建立了都察院，负责监察工作，以取代被废黜的御史台；并建立锦衣卫，负责监察官员，形成了特殊的特务统治模式。锦衣卫与东厂构成了明代最臭名昭著的厂卫组织，这些组织也成为后来特务组织的榜样。

当明太祖把精力投入到加强皇权上面时，对于财政和经济方面考虑得却过于简单。他曾经想学习元代的纸钞制度，却由于不懂得背后的基本原理，让纸钞很快贬值。由于对外贸的无知，他也无法建立一套有效的外贸体系。他理想中的制度就是一个人人务农、人人缴纳农业税的社会。

在这个框架下，农业人口主要承担的税收包括田赋和丁赋两种。其中田赋实行两税法，分夏税和秋税两次缴纳，而丁赋则是农村人口的劳役税。[35]

明代的农业税简化到极致，在张居正之前，政府甚至连运粮都不负责，粮食由从民间选择的粮长运到朝廷的仓库。

当田赋和丁赋不足以满足财政收入时，政府利用食盐专卖获得了另一部分的收入。除了盐，茶叶也实行专卖。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茶叶贸易可以换取一定的马匹资源。剩下还有一小部分依靠传统的商税来作为补充，这部分包括在全国设立关卡收税，以及市场上需要缴纳的买卖税、营业税等。

整体上看，明代的财政制度已经退回到了中央集权帝国最原始的模式，能够征收的都是最简单易行的税项。而从唐代以来发展的革新，却都被一一摒弃。

在这个原始的财政体系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几乎是固定的。由于土

地数量、人口数量、人们对盐的消费量变化都不大，所以，在两百多年里，税收也不可能出现大的变化。

在明代，真正体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随着贸易的活跃，江南的许多地方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特别是在苏州等农业重税区，人们已经放弃了对土地的依赖，转身变成了城市人口，依靠服务业、加工业生存。

工商业虽然也被列入了政府税收范围，但政府对于商税的征收并不成功。由于商人做买卖每年盈亏不一，缴税差别很大，政府很难正确估算出每年的商业税额。这是一个动态的税，对于中央王朝来说已经过于复杂了。

在逐渐动态化的社会里，这架笨重的行政机器却在用最静态的方法来管理财政，这就是明代财政收入的死结所在。

在财政收入被固化的同时，明代的财政开支却日益变得庞大。

明太祖开国之时，官员的数量并不多，政府不大，皇帝本人也是节俭的人，很会抠着钱过日子。他认为，只要政府保持这个规模，现在的税额已经绰绰有余。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政府规模立即膨胀。他的孙子建文帝希望削藩，延续了控制政府规模的思路。可是，建文帝随即被叔叔燕王朱棣打败，朱棣（明成祖）立即迁都北京，同时在南京也留下了一套领导班子，一下子将中央官僚的数量扩大了一倍。

明成祖还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北征蒙古、南攻安南（今越南），还派出了大型的船队到印度洋耀武扬威，花费巨大。财政状况也开始吃紧。明成祖之后，明朝不再对外扩张，但这时官僚系统却更加膨胀起来。洪武时期，全国的官员加起来只有两万四千人，到了一百年后的明宪宗时期（公元1465年—公元1487年），武职已经超过了八万人，文武官员总计有十多万人。[36]除了官员之外，朱姓的各种宗王也占据了大量的资源，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宗王的禄米达八百五十三万石，超过了全国供应北京粮食（四百万石）一倍。[37]

朱元璋按照小农思想建立的财政制度彻底玩不转了，朝廷的财政状

况变得紧紧巴巴。皇帝不断地挣扎着，又受制于祖宗制度，无法进行变革，只能将就着。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嘉靖年间起，倭寇和北方的蒙古、女真等势力又开始活跃，明朝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对付他们，军费开支陡增，已经被官僚系统耗空了国库的明朝政府就更应付不过来了。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

公元1572年，万历皇帝登基，也造就了一个属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时代。明代进入了人们认为的“改革”时期。[38]

不过，在了解张居正的“改革”之前，不妨放眼全球，去看一下世界都发生了什么。

在万历帝登基前后，西方世界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在欧洲，1570年，俄国沙皇伊凡雷帝摧毁了诺夫哥罗德（Novgorod）。这座城市在中世纪一直是北欧的中心，随着它被摧毁，莫斯科的崛起已经成为必然。1571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联合意大利各国的舰队，在希腊勒班陀（Lepanto）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海军。勒班陀战役是一个转折点，意味着穆斯林失去了地中海的控制权，基督徒成为海洋霸主，也是世界霸主。

同样是1571年，伦敦的皇家交易所也正式开张。交易所的成立，意味着世界正在从农业立国转向商业扩张，复杂的金融工具和商业理论正在取代所谓的道德和礼仪，成为决定政权命运的主要因素。

在欧洲之外，更深刻的变化也在发生。

在亚洲地区，西班牙人于1571年攻克了马尼拉，新的殖民帝国逐渐成形。菲律宾是一个位于中国不远处的堡垒，但中国人却对此无动于衷。

1572年，在美洲地区，南美印加帝国最后的君主图帕克·阿玛鲁（Tupac Amaru）被西班牙人捕获杀害，遗存的美洲帝国彻底消失。与

此同时，西班牙人在美洲的银矿开采正呈现加速状态。

1573年，西班牙船队从美洲地区运送白银，经过菲律宾马尼拉，第一次前往中国，换取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未来，波托西（Potosi）的白银将更大批量地从新世界运往旧世界和中国，刺激中国民间金融业的发展。

1569年，葡萄牙多明我会的修士加斯帕·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以他的见闻为基础出版了《中国志》，叙述中国的官僚系统、社会生活，为欧洲人提供了关于明代的新消息，但是此时，中国人对于欧洲仍然近乎无知。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世界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去观察张居正的努力，就会发现，他的做法根本称不上一次改革，他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些许的更动，帮助这个衰老的王朝更方便地收税罢了。

但是，谁也不能低估在这个最严密的世界里做事的难度。任何人，不管他有多大的雄心，在一个盘根错节、处处受限制的社会里，能够做的都太有限了，而张居正已经做到了极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性格上来看，张居正并不是享有清誉的变革者，而是随大流的现实派。在担任首辅前，他和权臣的关系都很不错，谁也不得罪。担任重臣后，他也并不掩饰以权谋私的行为，他的儿子在科举中分别中了状元、榜眼，引起了普遍的质疑，而他却毫不在意。

明朝的官吏还有一种制度性的腐败行为。明太祖时期提倡廉政，给官员们定的俸禄都很低。这些俸禄还总是被朝廷盘剥，一会儿用纸币，一会儿折算成银两。官员们的钱一直不够花，必须开辟新的财源，于是出现了各种官场陋规。张居正对于这些陋规也同样不予拒绝，习以为常，他没有治理这些根本问题的雄心壮志。[39]明朝是一个太监治国的朝代，在对待太监统治上，张居正也丝毫不考虑其危害，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作为大学士首辅，他和太监们打成一片，保证太监们支持他的政策，不设绊子。至于制度本身，与他无关。

所以，张居正首先是一个在现实中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人。他只

是瞅准了机会，做了一些理顺式的变革。所谓“理顺式”，指的是由于皇朝已经运行了两百年，许多问题已经缠成了一团乱麻，张居正并不是要将这一团乱麻彻底烧掉，而是在保留这些线团的基础上，解开一部分疙瘩，让制度运行得流畅一些。这是一种姑息疗法，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他的改革思路也和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类似，不是为了重建一套新的制度，而是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对于期盼深层制度改革的人，这样做的确令人失望，但理顺式的改革又的确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使皇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在张居正的时代，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财政的收支。在财政开支方面，冗官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行政效率也越来越低。而在财政收入方面，明太祖制定的户籍和土地规则都已经乱了套，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被隐藏了起来，并未记录在册。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御史黎贯曾经向皇帝谈道：明朝初年的两税收入就能达到麦四百七十多万石，米二千四百七十多万石；而一百多年后，税收反而减少，麦少了九万石，米则少了二百五十多万石。在两税收入减少的同时，“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40]

由于老是查不清户籍和土地，老的税收规矩已经过于复杂，不利于征收，必须想出新的办法。张居正的变革也从裁汰冗员和清查人口、土地这两方面入手。

他试图利用官员的考核淘汰一批冗官，采取了一种叫作考成法[41]的措施，就是给每一个官吏事先做一份账簿，上面列出要处理的事情，并上缴一份到上级部门备案，当官吏们按照账簿把事情处理完，再到上级部门把账簿核销。如果一个官吏本来需要处理的事情没有完成，就无法到上级部门核销，那么上级部门到时候拿出单子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不称职的官员。通过这种办法，加上一定的淘汰机制，张居正一方面裁减了冗员，另一方面又强迫官员更卖力地干活。

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任何提振官员士气的做法只能在短期内有

效，但至少在一段时期，改革能够保证官员们多花些精力在政事上。

当官员们的行政效率被张居正逼迫着提高时，张居正开始了另一步基础性的工作：除了节省开支之外，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替政府增加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就要整理税基，清查人口和土地。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明代的户数达到了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户，共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42]，这两个数字接近明太祖时期的水平，也和前几年的调查没有太大区别。这里的口数只是纳税人口的数量，不是实际的人口数。根据后人的估算，明代的人口应该突破了一亿人。

虽然人口与清查前区别不大，但是对于土地的调查数据却出现了大幅增加。张居正下令，全国分三年丈量土地。此前，人们想尽办法隐藏土地面积，比如，针对面积不规则的土地，通过计算方法的化简，就可以缩小实际面积。张居正下令引入最科学的方法，“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务必得到真实的数据。

这次测量得到的土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明孝宗时期的测量数据多了三百万顷。测量让政府有了税法改革的坚实依据，却由于地方官僚涸泽而渔的作风，让民间失去了抵御政府加税的能力，埋下了隐患。[43]

在真实数据（甚至夸大的数据）的基础上，明代最重要的税法变化——一条鞭法——得到了贯彻。

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的首创。在他之前，明代官员已经想过许多办法来解决征税问题，比较著名的有“鼠尾册法”“一串铃法”“十段锦法”等[44]，其目的都是为了找到有纳税能力的人，让他们纳税。

一条鞭法也曾出现在嘉靖年间。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御史傅汉臣就提到了这种方法，之后浙江巡抚庞尚鹏也上奏请求实行。[45]

万历九年，张居正已经查清了土地，在全国铺开了一条鞭法，成为全国的定法。所谓“一条鞭”，应该写为“一条编”，即在编目册上，每一家的税应该交多少，只写一条。[46]

明前期的税赋虽然简陋，但是明太祖制定的统计方法却十分麻烦。为了确定一家的税率，必须首先清查他的土地做鱼鳞册，又要清查他的户籍做黄册，而缴税也要分别计算，土地税、人头税、食盐摊派，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一条一条繁复难行。而纳税物品也是多种多样，有的缴粮食，有的缴纸币，有的缴铜钱，有的缴银子，还有其他物品，七折算八克扣，令民间痛苦不已。税赋缴纳上去，政府还要民间自己负责运输，这又是一层麻烦。

一条鞭法则把一个地方的所有这些税额都加起来，把所有劳役也都折算成银两并入税赋，再根据每家土地的大小摊派下去。对于老百姓来说，政府只骚扰一次，告诉他们一个总数，按照银子缴纳，就不再有其他的麻烦。政府需要劳役就花钱去雇佣。这种纳税方法减少了扰民，也简化了手续，更加便于征收税赋。

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地位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它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历代的财政问题都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麻烦。每个朝代的初期都会制定复杂而严密的税收法则，但是没过多久，随着行政效率的退化，就无法完全贯彻执行，税收也大受影响。一条鞭法把复杂的设计形式都抛弃掉，直接简化成政府的财政渴求，只要能征税，形式能简化就简化。

第二，为了简化形式，它牢牢地把握住一个根本：土地。只要土地在，就有税收，把所有的其他税种都折算入土地。中国历史上的人头税距离退出舞台不远了。

如果完全执行一条鞭法，就没有所谓的人头税了，只是各地在执行时不能完全贯彻执行，因而还保留了一定的劳役税。到了清代“摊丁入亩”时，人头税彻底废除。

第三，从征收实物变成了征收银两，确定了以货币为税的原则。从汉代以征收实物为主，到明清逐渐过渡到以货币为主，表明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政府减少征收实物，是因为利用货币已经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实物了；而政府征银也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张居正的财政措施让政府收入大幅度增加。他死时，北京的粮仓装满了够吃九年的粮食，府库里也堆满了银子。

但这是明朝政府最后一次过好日子了。如果究其根本，他的税制整理是通过将明代社会的税基完全榨干，来获得一时的财政收入。他没有做过任何发展经济的尝试，也没有为民间经济松绑的意图。他只是一个理财专家，对于此外的领域则无能为力。

长长的万历朝将张居正积累的这些财富花光之后，迎接明朝的就只剩下衰落了。

加税直到灭亡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叛乱。为了对付叛乱，皇帝除了使用北方辽东、山西等地的军队，还从浙江、苗地调集军队进行镇压。这次军事行动共花费了一百八十万两白银。就在宁夏之役爆发的同一年，日本人丰臣秀吉率军进入朝鲜。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明政府发兵相助，展开了两次战役。出兵朝鲜的花费大约在七百八十万两。朝鲜战争刚刚平息，万历二十八年，苗疆土司杨应龙叛乱，政府再次出兵镇压。此次花费白银二百万两。[47]

这三次战争统称为“万历三大征”。除此之外，皇室的花费也接近于这个数字。这几项巨大的花费让政府财政再次紧张。据户部右侍郎褚铁计算，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一百万两，而且年年赤字。[48]长此以往，政府的正常运转将无法维持。

但是，毕竟有张居正留下的底子，皇帝和政府仍然可以渡过难关。

就在皇帝感到庆幸时，一件最终决定明朝命运的事情正在发生：在辽东地区，满洲的崛起给中原皇朝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满洲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称汗。两年后，努尔哈赤在盛京誓师南征，宣称与明朝有“七大恨”。[49]

满洲的崛起让东北的局势瞬间恶化，在加派军队的同时，仅仅辽东边境的军饷就增加了三百万两。此时，帝国的国库已经没有这么多积蓄了。

户部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利用张居正的税务系统进行加税。在此之前，由于查不清税基，皇帝要加派税赋非常麻烦。经过张居正整理之后，土地信息已经清晰，皇帝只需要规定每亩土地增加多少税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任务派下去。依靠着税制简化之后的高效执行，政府发现征税原来也不是难事。

户部尚书李汝华根据“三大征”时期的经验，请求除了贵州和北京周边的八个府之外，对其他地区的土地每亩增加三厘五毫银子，可以获得二百多万的收入。

第二年，户部再次加税，每亩增加三厘五毫。

第三年，兵部以招兵买马的名义，工部以制造军械的名义，联合请求加税，每亩增加二厘。

三年之中三次增税，每亩增加税额九厘，每年增加税收五百二十万两，成为定额。[50]万历年间的户部每年进账大约在四百五十万两，三次增税相当于增加了一倍的收入。[51]

历次的加税终于打破了民间经济的临界点。每一次出现饥荒，人们都认为是天灾的结果。但天灾年年有，只要民间经济完好无损，人们就可以通过存粮或者市场行为来对冲灾荒的风险。只有政府从民间吸取了过多的资源，导致民间修复能力下降之后，才会出现真正的大饥荒。

最终影响明朝兴亡的不是后金王朝的连绵进攻，也不是萨尔浒战役的惨败，而是军事行动带来的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导致民间经济崩溃，终于带来了造反潮。

公元1627年，崇祯皇帝继位。这位有理想的皇帝上台后，迅速铲除了阉党魏忠贤，令人耳目一新。但就在他上台的第二年，随着又一次旱灾的来临，陕西人民终于无法渡过危机，起而造反。

这时明政府已经处于造反者和满洲人两方的压迫之下。为了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反叛，政府必须动用更多的军队，而动用军队需要更多的财政。随着造反者对地方经济的破坏，中央政府的税基也逐渐收窄，形成了恶性循环。

就在两方军队肆虐时，兵部尚书梁廷栋仍然在请求加税，再次给每亩增加了三厘的额外税收。五年后，总督卢象升又请求向官宦人家征收十分之一的田赋，普通民众的粮食产量如果在十两银子以上，也一并征收。最后确定，所有收入都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号称助饷。[52]

之后，随着军事的失利，加税的声音更加频繁，明政府在越来越小的区域内腾挪着，直到灭亡。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2]此处叙述为本书作者于2014年8月游历索马里兰时见到的情景。

[3]《明宪宗实录》卷二七记载：“（成化二年）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是积之市肆，过者不顾。”此时，距离朱元璋开国仅仅过了一百年，明王朝的寿命才走完了三分之一。

[4]《明史·食货志》：“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

[5]《明史·食货志》：“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

[6]《明史·食货志》：“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

[7]据《明史·食货志》，英宗天顺时期，“是时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

[8]《明实录》卷二三四：“诏禁用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

[9]《明史·食货志》：“洪武时，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

[10]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七章第二节。

[11]本表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原题“明代官吏月俸表”，单位为公石米。其中一明石约折合一点七三七公石。

[12]《宋史·食货志下八》：“七年，令舶船遇风至诸州界，亟报所隶，送近地舶司榷赋分买。”

[13]《宋史·食货志下八》：“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淳熙二年，诏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

[14]《明史·食货志》：“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

[15]《明史·食货志》：“初，入贡海舟至，有司封识，俟奏报，然后起运。宣宗命至即驰奏，不待报随送至京。”

[16]《续文献通考》卷二六：“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

[17]《明史·食货志》：“琉球、占城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

[18]《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

[19]见《明史·英宗纪》。

[20]《明史·瓦剌传》：“每入贡，主臣并使，朝廷亦两敕答之；赐

赉甚厚，并及其妻子、部长。故事，瓦使不过五十人。利朝廷爵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屡敕，不奉约。”

[21]《明史·瓦剌传》：“时朝使至瓦剌，也先等有所请乞，无不许。瓦剌使来，更增至三千人，复虚其数以冒廪饩。礼部按实予之，所请又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

[22]见《明史·张士诚传》。

[23]《明史·食货志》：“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24]《明史·食货志》：“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

[25]《明史·食货志》：“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

[26]《明史·食货志》：“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

[27]见《明宣宗实录》卷二三。

[28]《明史·食货志》：“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

[29]《明史·食货志》：“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广东无藩府，非欺隐即委弃于寇贼矣。司国计者，可不究心？”

[30]见《明武宗实录》卷七十和卷一百一十八。

[31]参看附录表2。

[32]见《明史·职官志》。

[33]见《明史·选举志》。

[34]《明史·职官志》：“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35]见《明史·食货志》。

[36]《明史·刘体乾传》：“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今边功升授、勋贵传请、曹局添设、大臣恩荫，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之属，岁增月益，不可悉举。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

[37]《明史·食货志》：“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

[38]见《明史·张居正传》。

[39]《明史·张居正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

[40]见《明史·食货志》。

[41]《明史·张居正传》：“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居正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42]见《续文献通考》“户口二”“田赋二”。

[43]《明史·食货志》：“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44]“鼠尾册法”见《明书》《续文献通考》，“一串铃法”见《明史·食货志》，“十段锦法”见《续文献通考》。

[45]见《续文献通考》。

[46]《明史·食货志》：“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47]《明史·王德完传》：“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冗费如此，国何以支！”

[48]《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二：“臣见一年所入止四百五十一万二千有奇，所出至五百四十六万五千有奇，是所出反多所入九十五万三千有奇，而钱不与焉。……我国家财赋岁有常供，迩来岁费日甚。去岁宁夏之平、朝鲜之援，输饷四出，动逾百万，有识之士，大为寒心。”

[49]见《清史稿·太祖本纪》。

[50]见《明史·食货志》。

[51]《明史·食货志》：“至神宗万历六年，太仓岁入凡四百五十余万两。”

[52]《明史·食货志》：“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于九厘外亩复征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余六府亩征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

有奇。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加官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征每两一钱，名曰助饷。越二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越二年，杨嗣昌督师，亩加练饷银一分。兵部郎张若麒请收兵残遗产为官庄，分上、中、下，亩纳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

第十四章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1]

如果仅仅在所有集权社会中作比较，清代已经达到了中央集权模式的最高峰，它兼具了稳定和繁荣两个特点，在康乾盛世的百年之后，经过了多次战争的消耗，仍然能够保持财政盈余。只可惜，此时的西方已经发展出代议制宪政模式，将这个稳定的集权帝国抛在了身后。

清前期继承了明代的“一条鞭法”，做到了税制简单，征收方便，加上清代进行的三大改革：新增人口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使得政府的财政长期保持盈余，民间经济保持了百年的稳定繁荣。

1840年，国外势力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重要变量。但中英战争对于政府财政的影响并不大，赔偿的金额也并未超出政府的承受极限。甚至由于海外技术和商品的使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对财政更为有利。

太平天国之后，清代财政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从农业为主向工商业税收转型，并利用信用工具来筹措临时性开支，这种做法同样增强了政府的财政灵活性，并加大了税基。

直到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后，清代的财政状况才出现了持续的恶化，收入不能满足支出的需要，进入了帝国的尾声。清朝的灭亡，也让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并为下一个千年循环打开了通道。

探花不值一文钱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翰林院编修叶方霭尝到了人生的大起大落。[2]两年前，叶方霭在科举中刚刚高中探花，处于人生的高峰期。那时他才年过三十，已经凭借文章和才气名满天下，在中科举之前，皇帝就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然而，叶方霭随后却经历了啼笑皆非的一幕。中探花两年后，叶方霭的伯乐顺治帝死去，年幼的康熙皇帝在索尼、鳌拜等四大臣的辅弼下登基。

在顺治帝驾崩之前，江宁巡抚朱国治上了一本。他的奏章附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上面列着他的辖区内（苏松常镇四府）所有积欠政府税款的乡绅士人的名字，共一万多人。叶方霭虽然已经中探花离开了家乡，但名单上却显示之前他曾经欠下了价值一厘银子的税粮。所谓一厘，就是一两银子的千分之一，按照一两银子一贯钱（一千文）的比例，一厘银子价值一个铜板。

顺治帝死后，辅政四大臣处理各地官员的上报，看到了奏章，他们下令江宁巡抚朱国治按照规矩办事，积欠税款的革除功名，甚至还要有更严厉的惩罚。

朝廷的旨意也吓了朱国治一大跳。他的本意是表现自己的尽职尽责，却没有想到朝廷竟然要求他对所有的人治罪。他建议，所有补上税粮缴了罚款的人就下不为例，不再追究，但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于是，这次事件变成一场运动，一万多人受到牵连，获得功名的被剥夺，已经当官的降级任用，参与的衙役追究刑责。[3]

叶方霭已经在京城当官，却突然收到了降职命令。他大呼意外，连忙上奏申辩。如果欠税很多，那么说明欠税人是故意对抗朝廷，但如果只欠一文钱，当事人又没有做行为艺术的必要，必定是疏忽或者误会。

但朝廷的意见很坚决，叶方霭被贬官，留下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千古奇景。

叶方霭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碰上了政府的严打；而政府之所以严打，与开国初期的财政状况有关。

属于游牧文明的满洲人进入中原后，要想控制如此广大的疆域，必须建立一套持久性的制度。

顺治帝经历了入关、平定中原等一系列的战争，需要迅速地建立起可靠的财政系统。他任用汉官，继承明代的体系，并鼓励人民开荒种粮，减免开荒土地的税赋。民间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但是，在江淮等富庶地区，士绅阶层还并不情愿接受这个外来的政

权。江淮地区的富人本来就有避税的传统，通过与衙门勾结，减轻赋税额度。这时，他们还是用老一套的办法对付新政权，甚至把这看成是一种汉人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决定树立榜样，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叶方霭和苏、松、常、镇地方的士绅，就不幸成了榜样。

叶方霭的经历只反映了清代重建财政的一个小侧面。但人们不得不承认，清代的财政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财政体系里做得最平衡、最简洁，也是最高效的。它抛弃了一切华而不实的形式，只认准了土地，建立最方便的制度对土地征税，其余的税种都是辅助性的。

它也遵循适度原则，辅助性的税种（包括工商业税）由于没有得到重视，收得很轻。作为主要税的农业税，税率也不高，民间的负担并不重，农业得到了保护。加上美洲新作物的引种、传播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带来的粮食增产，中国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人口就已经达到五千万人，而明代最高可能已经超过一亿人，有的人认为甚至达到一亿五千万人。清代的人口最高峰却达到四亿以上。[4]这个成就连皇帝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产生了恐慌。

由于乾隆时期的人口比康熙时期增长了十倍，因此，乾隆皇帝曾经忧郁地对他的内阁大臣说，天下太平时间太久，人口繁衍太多，而田地无法增加，会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5]他的口吻带上了很重的马尔萨斯[6]味道。幸亏当时没有有效的人口控制技术，否则皇帝一定会加以利用。如果走上了那一条轨道，中国的人口资源不用等到现代摧残就会大打折扣，进入衰落期。

为了应付人口的激增，皇帝只能从其他方面入手，鼓励各地开荒。清代对于垦荒的重视超过了历代。特别在清前期，官方记载里到处都是鼓励垦荒和屯田的命令。在明代，广西、贵州、湖南等地的山林地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那儿丛林密布，人迹罕至，虽然名义上已经归属于中央政府，但社会经济结构却还保留着蛮荒化外的特征。到了清代，这些地方纷纷被开垦出来，人口也逐渐稠密了起来。

甚至在遥远的蒙古国，清兵驻扎的科布多地区（属于高纬度寒冷地区）也有着屯田的记载，至今仍然能够在当年的军队驻扎地遗址看到屯田的痕迹。[7]

除了屯田之外，皇帝鼓励各地官员，劝谕百姓务必节俭，珍惜物产，试图通过节约的方式来维持人口的生存。

清朝政府始终没有意识到，当人口过剩时，就是发展工商业的最佳时机，人口过剩虽然会产生粮食不足的隐患，却又是巨大的财富。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工商业可以提供比农业更丰厚的财政收入。它依然把财政建立在农业之上。

清前期的土地税之所以比明代更健康，一方面是因为继承了明代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得益于皇帝进行的三大改革。

明代的一条鞭法将针对农民的大部分税赋（只有一部分人头税还没有来得及并入）都摊入了田地，一家人有多少土地，就可以计算出要缴多少银子。在明代以前，税赋要分成好几个部分，以家庭为单位收一部分，再根据土地占有情况收一部分，还要针对个人收一部分，除了收钱，还要收粮食，更要收丝收棉收各种产品。现在基本上只针对土地收银子，比起以前已经简单很多，政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怎样设计更加公平有效的税率上，不用在其他事情上分心。

清代完全继承了这一套制度。有一个例外是在运河区仍然征收漕粮，大约四百万石，以保障京师的粮食供应。[8]除了漕粮之外，其余大都已经逐渐货币化了。

与明代相比，清代在财政上还做了几项重大的改变，使税收更加合理。

第一项改变是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皇帝对剩余的人头税进行了改革，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9]这里的“赋”不是指土地税，而是指丁银（人头税）。一条鞭法的实施已经弱化了人头税，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把丁银摊入了土地。但是，从理论上讲，丁银还是要根据人口的多少来计算的，一个家庭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丁银。皇帝为了知道有多

少人，必须不断地进行统计，这也造成了许多人逃避户籍制度。

康熙帝根据前一年的人口数（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口），宣布以后不管人口怎么增加，政府只征收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份丁银，未来多生的人口不再缴纳丁银。如果老的丁银户死了，他的税额传递给他的儿子，或者在他的亲戚里平摊，但最终的额度始终保持只有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份。

到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发现也没有必要讲究什么丁税的继承，丁税还可以继续简化。当丁银的数量已经固定之后，可以方便地摊入全国的土地之中，与地税合并起来征收。

于是就有了第二项重大改变：摊丁入亩。

雍正初年前后，皇帝根据各地的先期实验，宣布全国将丁赋摊入田亩之中进行征收。[10]

这项改革是在康熙末年由广东和四川等省份摸索出来的，到了雍正时期在全国推广。由于每个省的丁银人口不同，土地也不相同，每个省摊丁入亩之后，增加的税额也是不同的。比如，直隶省在每亩土地原来税额的基础上，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山东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五，其余各省也都有摊派。

从此以后，除了边境地区之外，全国的土地税都只有一种，征收起来大大简化。更重要的是，摊丁入亩之后，户籍对于政府财政已经不再重要。政府只要摸清了土地就可以征税，而对人口的限制大大放松，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大的繁荣。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皇帝趁热打铁，推出了清代财政上第三个重大改变：火耗归公[11]。

火耗归公与另一个问题——官僚薪资——捆绑在了一起。明代以来，养官问题就一直让皇帝头疼。由于官僚系统庞大，中央政府发的工资往往不够官员体面地生活，官员只能通过各种方式从民间寻求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皇帝虽然有心整顿吏治，却又明白官员们的确收入太低，

必须保留一定的灰色地带。

而火耗就是灰色地带之一。所谓火耗，是由于政府征税主要用银，而人民缴上来的大都是碎银子，征收后要统一铸成五十两的银块，再上缴中央。在铸银时会发生一定的损耗。地方官员在征税时，会要求人们多缴一点来填补损耗，称为火耗。

由于官员俸禄不足，火耗问题就更加严重，各地纷纷以征收火耗的名义敛财，供养官员的日常消费。

雍正帝认为这个灰色地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不如将它公开化，由政府统一征收火耗银，再统一以养廉银的形式发给官员，同时禁止他们的灰色收入。

由火耗银充养廉银，也带上了财政专款专用的色彩，是财政制度方面的一大进步。此后，官员的养廉银超过了俸禄，成为百官的主要收入之一。

以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为例，这一年征收的耗羡有三百多万两，而文职养廉银有三百四十七余万两，武职养廉银八十余万两。虽然火耗无法完全覆盖养廉银，却占了养廉银的大部分。

这一年，王公百官的俸禄只有九十多万两，加上十二万的外藩王公俸，也只有一百零二万两，与四百二十七万两的养廉银相比，已经只有四分之一了。

这次改革之所以成功，还在于清代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明代初期采用纸币作为货币，官员发薪也部分使用纸币，随着纸币的贬值，官僚的俸禄也出现了大幅度的缩水。清代的银本位却非常稳定，不会出现过大的通胀，官员的俸禄一旦确定，在一两百年之内，都不用做大的变动，这种金融稳定性也让财政制度变得更加可靠。

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

清初财政的三大改革让清代的财政制度保持了一贯的高效和节制，

并保证了政府的财政充裕。

清前期，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每年在四千万两白银上下。以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为例，这一年的财政收入为四千八百五十四余万两白银，财政支出为三千四百五十一余万两白银。[12]由于乾隆时期的统计制度还不完善，这次统计也并不完全，各有一些项目没有统计，但整体上的大数都应该包括在内了。

在财政收入方面，最主要的项目是地丁银，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占了总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为给官员发养廉银而收的耗羡也达三百万两有奇。清廷按照规矩，每年会向社会的富裕人家出卖一定的功名，获得三百余万两。

盐曾经是许多王朝的收入大项，清代仍然实行一定的专卖。但是，和汉、唐、宋的盐税占了总财政的一半相比，清代的盐税收入是适度的，只有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占了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不到。

除了盐之外，另一个收入是关税。这里的关税不是对外的，而是在国内的各个关卡收税，相当于一种商业税，这种税有五百四十余万两。关税所代表的商税在总财政中占比只有百分之十一，也可以看出清前期的财政重心仍然放在了农业上。[13]

在财政支出上，满汉军队的军饷占去了财政开支的一半，达一千七百余万两。王公百官俸九十余万两，外藩王公俸十二万两有奇，文职养廉三百四十七万两有奇，武职养廉八十万两有奇，合计约达五百二十九万两。

另外，朝廷的办公经费中，各省留支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也是一个大项，达六百余万两。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祭祀、宾客备用银达五十六万两。水利费用、运河运输费用也不低，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余万两，更定漕船一百二十万两。[14]

由于每年的费用都比较固定，而每年的收入都高于开支，到最后，政府的府库里就会堆积越来越多的财富。

清代前期的府库盈余已经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常态。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国库存银五千万两[15]，大约相当于当时两年的财政支出。雍正即位之初，随着摊丁入亩改革的进行，国库再次丰盈，存银六千万两[16]。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国库存银更是达到七千八百万两[17]。

由于财政丰盈，政府还推行了几次全国性的免税措施。康熙五十年，由于国库丰盈，皇帝宣布免天下钱粮，在未来的三年里，分地区轮替着将农业税完全免除。第二年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也是一种减税措施。[18]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以及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五次采取康熙五十年的政策，免天下钱粮。[19]

除了西汉文帝时代，能够多次减免天下钱粮的只有清代做到了。而其余大大小小的免税措施，更是不胜枚举，反映了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农民的优待。

更难得的是，清代前期需要面对的战事并不算少，大量的军费用于战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大量的财政盈余。

清代前期的战争，有经费可查的是乾隆时期。乾隆十二年的第一次金川战争耗费了二千多万两白银；乾隆二十年开始的针对准噶尔人的一系列战争，花费了三千三百多万两；乾隆三十一年，清廷曾经因为边界纠纷，与缅甸开战，耗费了九百多万两；乾隆二十五年开始的第二次金川之役，更是耗费了七千多万两；乾隆五十六年，为了保卫西藏，与尼泊尔廓尔喀人进行了一场战争，花费一千零五十二万两；乾隆五十二年，台湾发生变乱，政府投入了八百多万两用于镇压。[20]

乾隆时期的战争花费，总计达到了一亿五千零五十二万两以上，大约相当于不到五年的日常财政开支，再加上五年的天下钱粮普免，耗去了政府一共十年的财政开支。即便这样，仍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即便到了乾隆帝死时，财政仍然足够强壮。与财政相伴的是人口的大量繁衍

和经济的活跃。如果没有1840年的西人叩关的话，这个皇朝仍然可以维持较长的时间。

从纵向看，清代已经是集权制的高峰，经济的繁荣程度已经超过汉唐，社会也拥有着更加良好的稳定性。

但历史仿佛和中国人开了个玩笑。就在伟大的康乾盛世时期，另一项更伟大的运动正在欧洲发生，将康乾盛世从人们顶礼膜拜的纪念碑变成了笑柄。

在清兵入关、正式建立全国性政权的那一年（公元1644年），如果放眼欧洲，会发现整个欧洲处于一片乌烟瘴气之中。英国人正在打内战，此刻距离国王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还有五年。欧洲大陆也还处于三十年战争的凋敝之中，这场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战争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就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样破坏力巨大，令人震惊。

西班牙人只能在美洲逞威风，欧洲人在亚洲虽然已经占据了不少岛屿，但仍然不够强大。哪怕他们在东南亚，也是以小偷小摸的低姿态出现，为了商业利益，不惜低三下四地祈求于南亚、东南亚的君主们。

清军占领了中原之后，继续向西部扩张，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圈，将东南亚、朝鲜、中亚的一些国家都纳入到朝贡体系，又在西藏、新疆和蒙古国建立起更加严密的控制。

这时候，中国的实力仍然较强。

随后，中国进入康乾盛世，经济步入了快车道，一百多年结束后，是否能将欧洲人甩得更远呢？

恰恰相反，当皇帝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之后，回头却发现，当年惨不忍睹的西欧国家已经弯道超车，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在这一百多年里，世界的政治风头已经彻底转变，流行了两千年、占据压倒优势的集权帝国体系被另一种新兴的制度超越了。这种制度在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更能够促进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当然，如果深入研究，会发现实力变化并非如此突兀。公元17世纪前期，欧洲虽然进入了乱世，但制度、商业因素已经具备，而清朝却仍然沿着老路前进。

清朝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欧洲人面前也不值一提。清政府的财政仍然围绕着农业来安排，但欧洲的工业、金融、商业带来的综合实力，却已经逐渐过渡到了强调资本、强调工业的轨道中，工业比重加大，全球性的开发也让欧洲人摆脱了粮食短缺的威胁。政府依靠工业、金融杠杆获得更多的税收。

清政府的第一次财政危机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出现的。

乾隆死后，嘉庆帝继任伊始，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白莲教。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四川、湖北、陕西一带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白莲教叛乱。[21]

在中国历史上，会道门往往是一个不能仅仅用经济学来解释的现象。东汉的黄巾军、元代的红巾军时期，恰好处于政府财政崩溃、大肆搜刮的时刻，但清代的两次叛乱——白莲教和太平天国——却并非因为经济原因，它们更多是一种地下社会的抱团行为。

在中国，所有的会道门和地下社会都有着一个清晰的“天子梦”，当信徒大增时，他们首先会组织起类似于集权政府的政治组织和法律系统，并以组织和法律的名义实施内部统治，内部统治最终又会通过家庭、亲戚关系扩散到外部，引起政府的注意。

而在中央集权模式下，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权力核心，当会道门试图建立另一套权力机构时，政府必然会对这种争权行为进行打击。双方的摩擦如果激化，就会造成一次会道门式的叛乱。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之乱如同是太平天国的先声，拖了九年，政府耗费了两亿两白银对其进行镇压。[22]在乾隆末年，国库还有存银七千多万两，这次战争将国库耗空，政府不得不征收特别税，通过捐纳制度等获得了三千万两的收入。[23]

由于政府财政出现危机，乾隆时期积累的问题也一一出现。虽然清

代的赋税制度相对简单，但经过多年的运行，也会出现拖欠赋税的情况。而此刻，政府已经没有魄力像当年办理奏销案一样，下令将所有人革籍降职了。

乾隆时期，这样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多。由于政府不缺钱，清廷虽然不断地讨论欠税问题，却没有办法整治。

到了嘉庆时期，随着财政日益紧张，欠税问题被更加频繁地讨论。嘉庆十七年，仅安徽、山东两省，就各自欠税四百余万。江宁、江苏的欠款也达到了二百余万。[24]为了清理税收，皇帝威胁将欠粮太多的地区的地方官员直接斩首，但依然无效。

不过，清代的财政随后又得以恢复。随着和平的到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维持在四千万两左右，财政收入仍然大于财政开支，回到了稳定的轨道上。一次战争可以给政府造成暂时的困难，却无法永久地使其失衡。

赔款与借债

公元1840年，中央帝国终于迎来了与西方的首次冲突。这次冲突以割地赔款为结局，也结束了中国社会与世界之间的隔绝与孤立状态。

与流行看法不同的是，中英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和财政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甚至还是有利的。

中英战争的直接花费是一千多万两白银，赔款二千一百万两，此外广东省还请求核销了三百万两经费，总数约在四千万两白银，[25]约合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在中英战争之前，清廷两次出兵镇压新疆大小和卓的叛乱。两次费用合计一千八百三十万两，也接近中英战争的一半。乾隆时期征服大小金川花费的一亿两，咸丰时期镇压白莲教的二亿两，都远多于中英战争的费用。

由于嘉庆、道光时期事情不断，虽然大部分时期有财政盈余，但国

库存银也不算丰厚，要凑够四千万两白银有困难，但并非是大麻烦。

战争给清政府带来赔款压力的同时，却又带来了巨大的机会。随着海关的打开，中国和外国的贸易额呈直线上升，中国由闭关锁国走向了开放。

贸易额的增长带来了两个好处，对于政府财政最直接的好处是关税的大幅度增长。在通商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对外的海关（洋关），而在财政收入上也没有洋税这一项，即便是广州的那一点关税收入，也是与内地的关卡收入合并在一起的。

洋关的设置是在中英战争之后，随着洋关的出现，海关关税（洋税）稳步增长，并成为财政收入的大宗，到了清末甚至超过了土地税的收入。咸丰末年，海关关税还只有四百九十余万；到了同治末年，就已经增至一千一百四十余万；光绪十三年，增长为两千零五十余万；光绪三十四年为三千二百九十余万；宣统末年已经达到了三千六百一十七万。[26]

海关收入的增长一项就足以弥补战争赔款的四千万两白银。

而更大的好处还不仅仅是海关关税。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也破茧而出，中国的社会转型由此展开。工商业的活跃也让政府征收商业税成为可能，使政府能够获得更大的收入。

真正让清政府受到重创的是公元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席卷了中国最富庶地区的运动将清政府的粮仓击碎，并迫使清政府四处调兵遣将，花了十四年时间才将其镇压。

与太平天国相呼应的则是北方的捻军。这场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运动的破坏力虽然不如太平天国，却将混乱的局面扩展到了更广阔的范围。

除了捻军之外，陕西、甘肃、宁夏的回民也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爆发起义。这场起义一直持续到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

这三场内乱的起因并非经济层面上的，而是会道门、宗教和民族偏

见的混合物，加上外来思想和商业发展带来的冲击，共同造成了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

三场内乱对于清政府财政破坏之剧烈，已经超过了原始农业型财政能够承受的极限。[27]在金田起义之后，为了绞杀起义，清政府投入了二千七百万两银子，结局却是让天国军队北上占领了南京。

在围攻南京期间，江南大营每月需要五十万两，徽宁防营每月需三十万两，合计每年需要一千万两费用。从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到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共十二个年头，在此期间两营总费用约为一点二亿两白银。

除了两营的费用之外，湖北每年出四百多万筹军，湖南的数量也类似。北路和西南的军费还没有计算在内。若按十二年计算，又是一亿。

到了同治中期，曾国藩根据湘军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时的花费，请求核销三千多万两。李鸿章请求核销一千七百多万两。左宗棠西征，请求核销四千八百二十多万两。

此外，福建援助浙江，加上省内和台湾地区，也超过了六百万两。四川、湖南援助贵州军需每年四百万两，五年合计二千万两。云南核销军需一千四百六十多万两。甘肃官绅商民集资捐赠也达到了五千多万两。

这些在册的数据相加，已经达到了四亿三千二百八十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这样的规模放在以前的历代王朝，必定会引起全面崩溃，对于清政府而言，也绝对是伤筋动骨。

但是，清政府再一次经受住了动荡的考验。

不仅经受住了考验，在危机中，中央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财政能力比人们预料中的要强大。一系列与西方接轨的财政制度正在摸索中被采纳，危机反而成了中国财政近代化的起点。

在古代，战争进行之时，也是政府花费最大的时候。中央政府想方设法逼迫每家每户缴粮缴款，往往造成人们家破人亡。

古代政府与现代政府的区别在于，现代政府可以利用信用筹集资金，当战争进行时，通过发行国债，或者对外寻求借款，可以筹措相当的资金，待战争结束后慢慢摊还。这种方式可以避免政府在某一个时段负担过大，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崩溃。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终于迈出了借债这一步，使得其财政能力比前朝大有提高。

最早的借款发生在上海。由清政府的苏（州）、松（江）、太（仓）道地方政府向洋商借款十二万七千七百两（含本息），用于镇压本地的小刀会。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黄宗汉在与英法联军作战时缺乏经费，于是向外寻求贷款，最后美国的旗昌洋行向广东政府提供了三十二万两白银，月息六厘。

从公元1853年到公元1865年，广东，福建，江苏，上海的苏、松、太道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多次向外国寻求贷款，总额达三百万两。

由于清政府不熟悉规则，以及一部分中间人的欺诈，有一部分借贷产生了纠纷，但大部分都起到了缓解财政、加强实力的作用，令清政府能够将叛乱镇压，重新获得稳定的时机。

公元19世纪，外债在全球都有着双面的效果。许多落后的国家刚刚走向开放，由于统治者缺钱，都会向外借款。如果运用得当，外债能够起到润滑经济、缓解资金紧缺的作用。但是，许多统治者由于缺乏金融经验，国内的财政又混乱不堪，外债越欠越多，到最后无法偿还，因而出现违约。

与现代的国际规则不同，在19世纪，如果弱国出现了债务违约，债权人所在的国家往往会采取军事行动逼迫弱国签署还款协议，并以一定的关税或者国内税收作抵押，甚至干预债务国的国内事务。

比如，19世纪的埃及本来是一个独立于西方的国家，但它的统治者伊斯梅尔帕夏（Ismā‘il　Pasha）却挥霍无度，借了大量的外债。他借债

时，所有的海外银行为了赚钱都趋之若鹜，没有控制风险。当他宣布无法偿还时，债权国立刻乘机接管了埃及的财政，逼迫他逐渐摊还，并把埃及慢慢地变成了保护国。

有的人会用阴谋论的眼光看待这个事件，但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统治者借债必须学会控制外债规模，避免失控。

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在外债上保持了足够的谨慎，外债成了财政的一种有效工具。

比如，从公元1867年到公元1881年，左宗棠为了对付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以及此后的新疆阿古柏的叛乱，曾经尝试大规模举债。他一共向上海的洋商——怡和、东方、汇丰等机构借债六次，金额总计达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白银。六次借款，有的是为了筹集军费，有的是为了将原来的借款延期，运用金融手段来满足军事财政已经相当熟练。可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在现代金融的支持下做到的。

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花费军费三千万两，由于出现支付困难，政府从公元1883年到公元1885年，先后向英国的银行借债七笔，总数达一千二百六十万两，利用英国的资金来与法国作战。

这些借款都是应急性的，借债总金额控制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并没有造成系统性风险，反而增加了军事和财政的灵活性。

除了外债的使用之外，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向着近代化转变。由于战争的破坏作用，农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农业税不仅无法维持原来的规模，有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缩水。在极端的年份，农业税甚至消失了。比如，光绪继位之初，户部上了一个条陈，指出以前每年的地税收入为三千四百余万两，但当年实际收上来的钱却只有一百四十五万两，相差了二十多倍。[28]

即便正常的年份，农业税的税额也不及当年。与此同时，政府的开支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增加，仅军费支出一项就达到了四千万两之数。

为了应付财政开支，清政府的财政税收开始与西方同步，向工商业

倾斜。

除了关税之外，清政府开征一种叫作厘金的商业税。所谓厘金，指的是按照商人的财产收取百分之一（即一厘）的税。这是近代中国探索新型商业税的起点。[29]

清政府的财政转向也有许多不好的方面。比如加重盐税，重新发行缺乏保证金的纸币，发行大面额的钱币。但事实证明，这些在中国历代已经被无数次使用的方法带来的混乱远大于收获，到最后，真正能够帮助清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还是关税和商业税这些更加现代化的税种。

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上半期，中国恢复了稳定，重新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在海外冲击带来的商业繁荣之下，财政状况得到了连续的改善。

公元1891年，中央政府的财政转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这一年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八千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两，财政开支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实现了财政平衡。传统的土地收入不再一支独大，已经降到了二千三百六十六万六千九百一十一两，而洋关税收入则达到了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七百七十七两。国内的商业税厘金也有一千六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一两，这两驾马车的崛起，让清代的财政已经带上了现代的影子。[30]

在财政开支中，军费开支为三千八百六十二万四千四百七十二两（饷乾二千零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两，勇饷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八千三百一十三两），为所有开支中最大的一项。这表明了清政府发展现代军事的决心。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财政收入中并没有将洋务运动建立的一系列军事工厂的收入计算在内，如果将这一部分计入，军费开支的比例将进一步增加。在开支中，与洋人债务和赔偿相关的洋款只有三百八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一两，占比不到百分之五，表明虽然经过了几次战争，但战争的伤疤已经逐渐愈合，没有带来致命的影响。[31]

如果清政府能够得到更长时间的恢复，建立一套良好的财政体系和经济体系，并增强军事实力，是有希望完成近代化转型，并维持局势稳定的。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切。

表8 左宗棠西征所借洋债[32]

借款年份	贷款人	借款额折合万库平两	中国政府实付利息	经手人所报利率	洋商贷出利率	银行在市场发行利率	期限
1867	上海洋商	120	月息 1.5%	月息 1.3%	月息 0.8%		半年
1868	上海洋商	100	月息 1.5%	月息 1.3%	月息 0.8%		10 月
1875	怡和洋行、东方银行	300	年息 10.5%	年息 10.5%	年息 10%		3 年
1877	汇丰银行	500	年息 15%	年息 12%	年息 10%	年息 8%	7 年
1878	汇丰银行	175	年息 15%	年息 15%	年息 10%	年息 8%	6 年
1881	汇丰银行	400	年息 9.75%	年息 9.75%	年息 8%		6 年
合计		1595					

表9 中法战争中所借款额

借款年份	借款名称	贷款人	借款金额	借款额折合万库平两	利率	期限
1883	广东海防借款 1	汇丰银行	100 万库平两	100	年息 9%	3 年
1884	广东海防借款 2	汇丰银行	1000000 库平两	100	年息 9%	3 年
1884	广东海防借款 3	汇丰银行	100 万库平两	100	年息 9%	3 年
1884	滇桂借款	宝源洋行	1394700 港币	100	年息 8.5%	3 年
1885	福建海防借款	汇丰银行	100 万英镑	358.98	年息 9%	10 年
1885	广东海防借款 4	汇丰银行	505000 库平两	201.25	年息 9%	10 年
1885	援台规越借款	汇丰银行	750000 英镑	298.89	年息 8.5%	9 年
合计				1259.12		

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

公元1910年，度支部按照改革之后的规矩，制定第二年的财政预算。

四年前，清廷实行新政，将原来的户部取消，改为度支部，并根据与世界接轨的精神，建立了一套新的预算法则。

在新法则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包含了经常项、临时项和附列三部分。在过去的会计制度下，许多隐形的收入或者办公经费都没有列出，而在新财政制度下都载明在册。比如，旧制度只载明关税的数额，这个数额是扣除了海关（以及内部关卡）办公经费之后的数据，由于海关的经费混入了收入之中，变得很不透明，官员也容易做手脚，中饱私囊。在新法则下，海关的收入和开支是分开的，都要分别登记。

为了确保数字的准确性，中央政府还派出了财政监理去往各省调查数字的准确性，形成了财务监察制度。

由于细化措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两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三千零十六两，财政支出也有两亿九千八百二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两。[33]

这份财政预算比人们预料的要健康得多，带有多样化的特征。税收的最大项仍然是田赋，但是田赋只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六点二（常规为四千六百一十六万四千七百零九两，临时为一百九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两），盐茶课税（常规为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仍然是大项，与田赋收入相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这两项是与农业相关的旧税种，所占比例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而且还把不算农业收入的盐业也列入其中了。

其余大项为：洋关税（常规为三千五百一十三万九千九百一十七两）、正杂各税（常规为二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釐捐（常规为四千三百一十八万七千九百零七两）。

除了这些比例，还有一项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企业相关的收入——官业收入（常规为四千六百六十万八百九十九两），占了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比例已经接近农业税。[34]

有的人认为，这样的财政报表带着很强的搜刮性质，但从另一方面讲，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正在脱离原始的农业模式，向着工商业模式过渡。农业虽然仍很重要，却已不是唯一，支撑了历代王朝的盐业专卖的重要程度也在下降。

在财政支出中，最大的支出是军政（常规为八千三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一十一两，临时一千四百万五百四十六两）和交通（常规为四千七百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一两，临时为七百八十万四千九百零八两）。

令人扼腕的是，另一项重要的支出显得格外扎眼：对外赔偿款。清政府的对外赔偿款分为三部分，分别由各省、洋海关、内地关卡按年摊还，这三部分开支相加，达到了五千一百六十四万九百五十九两。也就

是说，如果按照康熙、乾隆时期的财政状况，政府全年的收入已经不够偿还赔款之用。

即便到了公元1910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三亿，但是，大部分的项目都在经济体内运转，甚至不见现金，只有资源流动。而赔款的五千万两则是现金流和净流出，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可想而知。[35]

即便压力巨大，晚清的政府仍然试图维持着脆弱的财政平衡。但是第二年辛亥革命随即爆发，在袁世凯的压力下，皇帝退位，中国由此进入了共和时代。

这份财政报表也成了集权时代遗留的纪念品，让人们看到了从汉到清这两千多年来财政高峰时期最后的幻影。

其实，清代社会学习西方的速度并不慢。从1840年起，在西方的冲击下，除了战乱时期之外，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飞速发展中。

虽然大量外国货的涌入带来了贸易的不平衡，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但随后海外投资的大量增加，填补了巨大的贸易赤字。

与中国北方的小农经济相比，中国南方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社会，也乐于接受新的商业规则，民间社会的自发转向就是中国商业的收获期。它们必须在全球化的野蛮背景下打拼出一条路。

与民间社会的自发成长相比，另一场运动（洋务运动）却有着更大的争议。人们常常认为洋务运动是一场官商运动，直接压倒了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让中国在进入近代化时无法发展出更健康的经济。

但是，任何一个后进国家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化时，都不能避免官商经济的发展。

当国门打开后，有两种人总是比其他人更先看到自己的不足：直接与海外接触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以及一部分上层官员。这两种人分别代表了民间和政府开始效仿海外模式发展经济。

代表政府的开明官员眼界最宽，且拥有充足的资金，他们导演了第

一波近代化浪潮。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积累了更丰富的资本和知识之后，才能引领第二波，取得发展并逐渐超过官员主导企业。在日本、土耳其等转型国家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局面，最初是政府主导，随后民间完成接棒，进入更加自由的经济时代。

中国社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洋务企业，而在于第二波的民间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完成接棒，而它们跟不上的原因也不是由于洋务运动，而是大部分集权制官僚仍然无法按照新商业模式转换头脑，因而抑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这也是问题之一。如果整个转型能够持续百年以上，等大部分思想守旧的老人死去，新上台的年轻人主导了政治进程，随后的转型会更加顺利。

如果要持续更久，就必须保证政治上的稳定性。同治时期，中国财政的稳定已经有助于王朝的持续，然而，新到来的中日甲午战争打碎了可持续的稳定。

甲午战争巨额的赔款，以及高昂的军费，终于让中国财政彻底失控。甲午战争之后的群情激奋，也已经让政府无法安抚民间。戊戌变法失败后，西化派与保守派都向更极端的方向演化，保守派默许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再次重创了财政平衡，清政府再也无法从巨大的失衡中脱身。

清朝的灭亡让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随后的三十多年里，人们再也没有获得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

[2]据清史专家孟森考证，民间流传“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当事人为叶方霭，见其所撰《奏销案》一文。

[3]《清史稿·朱国治传》：“又以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二百四十人，请敕部察议。部议现任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赃治罪有差。以是颇有刻核名。”

[4]《清史稿·食货志》："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口。六十年，二千九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又滋生丁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口。雍正十二年，二千六百四十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二口，又滋生丁九十三万七千五百三十口。乾隆二十九年，二万五百五十九万一千一十七口。六十年，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五百四十五口。嘉庆二十四年，三万一百二十六万五百四十五口。道光二十九年，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口。"

[5]《清史稿·食货志》："高宗谕内阁曰：'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

[6]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以其人口理论闻名于世。

[7]2013年，本书作者对蒙古国科布多地区进行过考察，清代屯田的痕迹至今可寻。

[8]《清史稿·食货志》："顺治二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

[9]《清史稿·食货志》："五十一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五岁一编审。'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之丁补之。'"

[10]《清史稿·食货志》："雍正初，令各省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输纳征解，统谓之'地丁'。"

[11]《清史稿·食货志》："二年，以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请提解火耗归公，分给官吏养廉及其他公用。火耗者，加于钱粮正额之外。盖因本色折银，镕销不无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费，州县征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数钱，轻者钱余。行之既久，州

县重敛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繁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

[12]见《清史稿·食货志》。

[13]其他财政收入都是小宗，包括：芦课、鱼课，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十六万两有奇；矿课，八万两有奇。

[14]其余财政支出为：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十四万两有奇，采办颜料、木、铜、布银十二万两有奇，织造银十四万两有奇，宝泉、宝源局工料银十万两有奇，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银八万两有奇，京师官牧马牛羊象刍秣银八万两有奇。

[15]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

[16]阿桂《论增兵筹饷书》，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

[17]见《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十。

[18]《清史稿·圣祖纪》：“戊午，诏前旨普免天下钱粮，五十一年轮及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六省，地丁钱粮及逋欠俱行蠲免。”

[19]见《清史稿·高宗纪》。

[20]见《清史稿·食货志》。

[21]见《清史稿·仁宗纪》。

[22]《清史稿·食货志》：“嘉庆川、湖、陕教匪之役，二万万两。”

[23]见《圣武记·武事余记·兵制兵饷》。

[24]《清史稿·食货志》：“十七年，户部综计各省积欠钱粮及耗羡杂税之数，安徽、山东各四百余万，江宁、江苏各二百余万，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积欠百余万、数十万、数万不等。”

[25]见《清史稿·食货志》。

[26]《清史稿·食货志》："咸丰末年，只四百九十余万。同治末年，增至千一百四十余万。光绪十三年，兼征洋药釐金，增为二千五十余万。三十四年，增至三千二百九十余万。宣统末年，都三千六百十七万有奇，为岁入大宗云。"所谓洋药，主要是鸦片，晚清政府将鸦片纳入课税范围，成为财税重要的组成部分。光绪年间已经在考虑逐渐减少鸦片进口，并完成在财政上的替代工作。

[27]见《清史稿·食货志》。

[28]《清史稿·食货志》："户部条陈整顿钱粮之策，略云：'溯自发逆之平，垂二十年，正杂钱粮，期可渐复原额。乃考核正杂赋税额征总数，岁计三千四百余万两，实征仅百四十五万两，赋税亏额如此。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率为贪官墨吏所侵蚀。'"

[29]《清史稿·食货志》："釐金抽捐，创始扬州一隅，后遂推行全国。咸丰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釐捐。"

[30]其余财政收入为：租息十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二两，粮折四百二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八两，耗羡三百万四千八百八十七两，盐课七百四十二万七千六百零五两，常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两，节扣二百九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四两，续完七百一十二万八千七百四十四两，捐缴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六两，杂赋二百八十一万一百四十四两。

[31]其余财政支出为：陵寝供应等款十三万五百五十九两，交进十八万两，祭祀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三两，仪宪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两，俸食三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四两，科场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驿站一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零九两，廪膳十一万二千零二十九两，赏恤五十二万五千二百一十六两，修缮二百二十万九千七百四十八两，采办四百零三万三千九百零三两，织造一百零三万四千九百一十五两，公廉四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两，杂支三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八两，关局经费三百一十四万四千六百一十六两，补支一千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两，豫支一百七十四万二千零七十三两，解京各衙门饭食经费各

项支款，三百四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

[32]本表与下表均引自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四册第一编第四章第二节。

[33]见《清史稿·食货志》。

[34]其余财政收入为：常关税（常规为六百九十九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临时为八千五百二十四两）、杂收入（常规为一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一百零一两，临时为一千六百零五万六百四十八两）、捐输（附列五百六十五万二千三百三十三两，附列也是临时收入）、公债（附列三百五十六万两）。

[35]其余开支为：行政（常规为二千六百零六万九千六百六十六两，临时为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四两）、交涉（常规为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一百三十两，临时为六十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民政（常规为四百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两，临时为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一两）、财政（常规为一千七百九十万三千五百四十五两，临时为二百八十七万七千九百零四两）、洋关经费（常规为五百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七两，临时为九千一百六十三两）、常关经费（常规为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二两）、典礼（常规为七十四万五千七百五十九两，临时为五万四千零三十七两）、教育（常规为二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六两，临时为一百零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两）、司法（常规为六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九两，临时为二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两）、实业（常规为一百六十万三千八百三十五两）、工程（常规为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二百四十两，临时为二百零二万二千零六十四两）、官业支出（常规为五百六十万四百三十五两）、边防经费（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零八两）、归还公债（附列四百七十七万二千六百一十三两）。

后记

掐指一算，离开北京开始游学生涯已经七年，本书的筹备也已经有七年了。

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我还是一名经济类报纸的记者，对环境做出判断：第一，未来在国内，是一个新闻报道空间逐渐被压缩的时代，如果继续做下去，可能只会消耗个人生命；第二，未来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热心于工作本身的人逐渐被善于变现的人所取代，而如果只关注于变现，又会分散精力无法潜心做研究。

正是有感于这两点判断，我辞去在报社的工作，决心过一种游学式的生活，不依赖于任何单位和组织，行走在路上，用自己的眼睛去客观地观察，系统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七年后，通过这种游学的方式，我已经出版了七部作品，加上这部《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还有几部创作完成，但未能出版的作品。但不管是哪一部，读者都不会看到任何陈词滥调，全都是我用眼睛去做客观的观察，试图向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图景。

总结起来，我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维度。所谓一个中心，就是我的最终目标是研究中国现代问题，我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但是，要研究中国现代问题，必须有一个宽广的视角，必须了解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以及现代中国在历史上的定位。所谓两个维度，就是一个横向的世界维度和一个纵向的历史维度。当对两个维度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会回过头来，集中研究最艰难的领域：现代中国问题。

针对这两个维度，我的非虚构作品分成了两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是文化游记。我带着问题和好奇心前往世界的每一个地区，了解它们的历史、经济、文化、社会，并关注它们和中国的联系。

目前这个系列已经出版了印度、东南亚、蒙古和中东这几个地区，我的目标是，不泛泛而谈，而是希望读者读完一部书，就对一个地区有较为透彻的了解。对于中国人而言，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不了解世界，不了解历史，只能根据宣传的木偶化的影像去对世界做不靠谱的猜测。市面上也缺乏既好看又客观、及时，有深度的、合格的书籍，这就是我试图去做的事情。

第二个系列是历史研究。如果要了解现代，必须了解历史。但自古及今，中国历史已经被污染太久，淹没在层层迷雾之中，而市场上流行的说书人式的历史书中，又只会写王侯将相钩心斗角，却对于背后推动历史的真实力量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恰好给我留下了足够的研究空间。

根据规划，历史系列会包括三本书，分别从财政、军事和统治哲学三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关于中国历史上最深层的脉动，我也认为可以分成这三个方面，即和平时期看财政，战乱时期看军事，维稳必须靠思想控制。

在和平时代，对历史演化影响最大的是财政和经济。一个朝代建立后，最深层的需求是建立官僚体系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建立财政体系来维持官僚制度，而金融垄断、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必然是政权所有者首先想到的几大手段。只有了解政权所有者的财政冲动，才能真正了解历史的走向。财政就是本书所选择的主题。

到了战乱时期，对于历史演化影响最大的是军事，而对排兵布阵影响最大的是地理因素，所以，本系列第二本书《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会对军事地理进行全面考察。为此我已经数次跑遍了全国所有的军事战略要地，去了解它们为什么重要。在考察这些地方时，我曾经亲眼见到了秦赵长平之战、宋夏好水川之战、东西魏玉壁大战的将士枯骨，借此寻找当年战斗的蛛丝马迹。当然，最终，我是想看看中华文明如何在一次次暴力战争中渡尽劫波、浴血重生，每一次战争劫难的逻辑何在，胜利者胜在何种战略，失败者败在何种战略。

不管是和平还是战乱，树立一种稳定的统治哲学是制度维稳的必要条件。而“维稳”这个词，是中国两千多年集权社会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要想做好维稳，不能仅仅靠安检和武装，而必须把人从思想上进行格式

化。所以，我的第三本书《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会对这个主题做出解读，让人们看到一个统治哲学如何建立，又如何通过政权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之中，让每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政权的附庸，建立起稳固统治。同时，这个哲学又如何变质、退化，并被取代的全过程。

由于这个系列牵扯到大量的史料，我在写作时也是慎之又慎。关于《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书，已经拖了七年。每次回到北京见到我的好友洪波和张蕊，他们都会问：你关于中国古代财政经济的书什么时候能出来？我只能支吾着回答“还需要时间”。

2013年底，我认为自己的积累已经够了，开始撰写本书的第一稿。但完成后随即意识到还不成熟，将稿件彻底废掉。

2014年下半年，我从中东和非洲回来后，好友文学锋让我到广州常住一段时间，生活较为稳定。利用这个空当，除了撰写中东报告之外，我开始写作本书的二稿。

2015年，二稿成型后，在好友秦旭东、黄一琨等人的帮助下，交给了相关人员审阅，他们又提出了很专业的修改意见，于是我进行第三稿的修订，最后形成了本稿。

在这本书上花的力气，达到以前诸本书的两三倍。但写完后回顾一下，却发现所花的时间是值得的，因为这本书记录了非常长的时段（两千年），试图利用现代财经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经济，找到驱动中国集权社会政策变化的真实原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有意把书稿截至清代。即便是清代，也比写唐宋时期更简化。主要原因是：现代人研究清代问题的书籍已经很多，而由于这个时代资料很多，哪怕稍微展开一点，都足以写一本书，为此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清代之前的中国历史，将清代、民国和现代中国问题留待以后进行系统研究。另外，由于尺度问题，我不想把民国和现代放在书中。但相信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自然会对后续时代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

本书的第一稿完成于大理游心楼，二稿完成于广州锋子居。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经在微信公号“剑客会”，以及王小明教授的公号“江湖烟雨夜读书”上连载，因此我要感谢公号的所有者和运营人张赋宇、王小明、王力、姚文辉。

除了上面提到的人之外，我还要感谢屈波、贝为任、董曦阳，在你们的帮助下，本书的出版才成为可能。感谢周杭君、文学锋、谷重庆，我的整个写作生涯都离不开你们的鼓励和帮助。

最后，感谢梦舞君，这本书在你的鼓励和陪伴下完成。

附录

表1 各朝田亩丈量尺度[1]

朝 代	时 间	每尺厘米数	每步尺数	每步厘米数	每亩平方步数	每亩平方米数	每亩折合市亩数
周	前 1120- 前 220 年	22.50	6	135.00	100	182.25	0.273
秦	前 221- 前 205 年	23.10	6	138.60	240	461.04	0.691
西汉	前 206- 公元 8 年	23.10	6	138.60	240	461.04	0.691
东汉	9-220 年	23.75	6	142.50	240	487.34	0.731
魏	221-265 年	24.12	6	144.72	240	502.65	0.754
西晋	266-316 年	24.12	6	144.72	240	502.65	0.754
东晋	317-420 年	24.45	6	146.70	240	516.50	0.774
南北朝	421-580 年	29.51	6	177.06	240	752.40	1.135
隋	581-618 年	29.60	6	177.06	240	757.00	1.135
唐	619-906 年	30.00	5	150.00	240	540.00	0.810
五代	907-960 年	31.00	5	155.00	240	576.60	0.865
宋	961-1279 年	31.00	5	155.00	240	576.60	0.865
元	1280-1368 年	34.00	5	170.00	240	693.60	1.040
明	1369-1644 年	34.00	5	170.00	240	693.60	1.040
清	1645-1911 年	34.00	5	170.00	240	693.60	1.040
民国	1912-1949 年	33.33	5	166.65	240	666.53	1.00

表2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统计数据[2]

朝　代	年　度	公元（年）	户数（户）	口数（口）	田地（亩）	每户平均口数	每户平均亩数	每口平均亩数
前汉	平帝元始二年	2	12,233,062	59,594,978	827,053,600	4.87	67.61	13.88
后汉	光武帝中元二年	57	4,279,634	21,007,820	—	4.91	—	—
	明帝永平十八年	75	5,860,573	34,125,021	—	5.82	—	—
	章帝章和二年	88	7,456,784	43,356,367	—	5.81	—	—
	和帝元兴元年	105	9,237,112	53,256,229	732,017,080	5.76	79.25	13.74
	安帝延光四年	125	9,647,838	48,690,789	694,289,213	5.05	71.96	14.26
	顺帝永和五年	140	9,698,630	49,150,220	—	5.07	—	—
	建康元年	144	9,946,919	49,730,550	689,627,156	4.99	69.33	13.87
	冲帝永嘉元年	145	9,937,680	49,524,183	695,767,620	4.98	70.01	14.05
	质帝本初元年	146	9,348,227	47,566,772	693,012,338	5.09	74.13	14.57
	桓帝永寿三年	157	10,677,960	56,486,856	—	5.29	—	—
三国蜀	刘禅炎兴元年	263	280,000	940,000	—	3.36	—	—
魏	曹奂景元四年	263	663,423	4,432,881	—	6.68	—	—
吴	孙皓天纪四年	280	530,000	2,300,000	—	4.34	—	—
西晋	武帝太康元年	280	2,459,840	16,163,863	—	6.57	—	—
十六国	前燕	370	2,458,969	9,987,935	—	4.06	—	—
南北朝宋	武帝大明八年	464	906,870	4,685,501	—	5.17	—	—
北魏	明帝熙平年间	516–520	5,000,000+	—	—	—	—	—
	庄帝永安年间	528–530	3,375,368	—	—	—	—	—
北齐	幼主承光元年	577	3,032,528	20,006,880	—	6.60	—	—
北周	静帝大象中	579–580	3,590,000	9,009,604	—	2.51	—	—
	大定元年	581	3,599,604	—	—	—	—	—

续表

朝代	年度	公元（年）	户数（户）	口数（口）	田地（亩）	每户平均口数	每户平均亩数	每口平均亩数
陈	宣帝时	569–582	600,000	—	—	—	—	—
	后主祯明三年	589	500,000	2,000,000	—	4.00	—	—
隋	文帝开皇九年	589	—	—	1,940,426,700	—	—	—
	炀帝大业五年	609	8,907,000	46,019,956	5,585,404,000	5.17	627.04	121.37
唐	高祖武德年间	618–626	2,000,000+	—	—	—	—	—
	太宗贞观年间	627–649	3,000,000–	—	—	—	—	—
	高宗永徽元年	650	3,800,000	—	—	—	—	—
	中宗神龙元年	705	6,156,141	37,140,000+	—	6.03	—	—
	玄宗开元十四年	726	7,069,565	41,419,712	1,440,386,213	5.86	—	34.78
	开元二十二年	734	8,018,710	46,285,161	—	5.77	—	—
	天宝元年	742	8,525,763	48,909,800	—	5.74	—	—
	天宝十四年	755	8,914,709	52,919,309	1,430,386,213	5.94	160.45	27.03
	肃宗乾元三年	760	1,933,174	16,990,386	—	8.79	—	—
	代宗广德二年	764	2,933,125	16,930,386	—	5.77	—	—
	德宗建中元年	780	3,805,076	—	—	—	—	—
	宪宗元和十五年	820	2,375,400	15,760,000	—	6.63	—	—
	文宗开成四年	839	4,996,752	—	—	—	—	—
	武宗会昌五年	845	4,955,151	—	—	—	—	—
	宣宗大中中	847–859	—	—	1,168,835,400	—	—	—
五代后周	世宗显德六年	959	2,309,812	—	108,583,400	—	47.01	—
宋	太祖开宝九年	976	3,090,504	—	295,332,060	—	95.56	—
	太宗至道二年	996	4,574,257	—	312,525,125	—	68.32	—
	真宗景德三年	1006	7,417,570	16,280,254	186,000,000+	2.19	25.08	11.42
	天禧五年	1021	8,677,677	19,930,320	524,758,432	2.30	60.47	26.33
	仁宗皇祐五年	1053	10,792,705	22,992,861	228,000,000+	2.06	21.13	10.23
	英宗治平三年	1066	12,917,221	29,092,185	440,000,000+	2.25	34.02	15.12
	神宗元丰六年	1083	17,211,713	24,969,300	461,655,600	1.45	26.82	18.69

续表

朝代	年度	公元（年）	户数（户）	口数（口）	田地（亩）	每户平均口数	每户平均亩数	每口平均亩数
	神宗元丰八年	1085	—	—	248,434,900	—	—	—
	哲宗元符三年	1100	19,960,812	44,914,991	—	2.25	—	—
	徽宗大观四年	1110	20,882,258	46,734,784	—	2.24	—	—
	高宗绍兴二十九年	1159	11,091,885	16,842,401	—	1.52	—	—
	孝宗乾道六年	1170	11,847,385	25,971,870	—	2.19	—	—
	淳熙七年	1180	12,130,901	27,020,689	—	2.23	—	—
	光宗绍熙四年	1193	12,302,873	27,845,085	—	2.26	—	—
	宁宗嘉定十六年	1223	12,670,801	28,320,085	—	2.24	—	—
	理宗景定五年	1264	5,696,989	13,026,532	—	2.29	—	—
宋金合计	孝宗淳熙十四年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	1187	19,166,001	69,016,875	—	—	—	—
	光宗绍熙元年 章宗明昌元年	1190	19,294,800	73,948,158	—	—	—	—
	光宗绍熙四年 章宗明昌六年	1193 1195	19,526,273	76,335,485	—	—	—	—
元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1291	13,430,322	59,848,964	—	4.46	—	—
	文宗至顺元年	1330	13,400,699	—	—	—	—	—
明	太祖洪武十四年	1381	10,654,362	59,873,305	366,771,549	5.62	34.42	6.13
	洪武二十四年	1391	10,684,435	56,774,561	387,474,673	5.31	36.27	6.82
	洪武二十六年	1393	10,652,870	60,545,812	850,769,368	5.68	79.86	14.05
	成祖永乐元年	1403	11,415,829	66,598,337	—	5.83	—	—
	永乐十一年	1413	9,684,916	50,950,244	—	5.26	—	—
	永乐二十一年	1423	9,972,125	52,763,178	—	5.29	—	—
	宣宗宣德元年	1426	9,918,649	51,960,119	412,460,600	5.24	41.58	7.94
	宣德十年	1435	9,702,495	50,697,569	427,017,200	5.22	44.01	8.43
	英宗正统十年	1445	9,537,454	53,772,934	424,723,900	5.64	44.53	7.90
	代宗景泰六年	1455	9,405,390	53,807,470	426,733,900	5.72	45.37	7.93
	英宗天顺八年	1464	9,107,205	60,499,330	472,430,200	6.64	51.87	7.81

续表

朝 代	年 度	公元(年)	户数(户)	口数(口)	田地(亩)	每户平均口数	每户平均亩数	每口平均亩数
	宪宗成化十年	1474	9,120,195	61,852,810	477,899,000	6.78	52.40	7.73
	成化二十年	1484	9,205,711	62,885,829	486,149,800	6.83	52.81	7.73
	孝宗弘治三年	1490	9,503,890	50,307,843	423,805,800	5.29	44.59	8.42
	弘治十五年	1502	10,409,788	50,908,672	622,805,881	4.89	59.83	12.23
	武宗正德五年	1510	9,144,095	59,499,759	469,723,300	6.51	51.37	7.85
	正德十四年	1519	9,399,979	60,606,220	469,723,300	6.45	49.97	7.75
	世宗嘉靖十一年	1532	9,443,229	61,712,993	428,828,400	6.54	45.41	6.95
	嘉靖二十一年	1542	9,599,258	63,401,252	428,928,400	6.60	44.68	6.77
	嘉靖三十一年	1552	9,609,305	63,344,107	428,035,800	6.59	44.54	6.75
	嘉靖四十一年	1562	9,638,396	63,654,248	431,169,400	6.60	44.74	6.77
	穆宗隆庆五年	1571	10,008,805	62,537,419	467,775,000	6.25	46.74	7.48
	神宗万历六年	1578	10,621,436	60,692,856	701,397,628	5.71	66.04	11.56
	万历三十年	1602	10,030,241	56,305,050	1,161,894,800	5.61	115.3	20.64
	光宗泰昌元年	1620	9,835,426	51,655,459	743,931,900	5.25	75.64	14.40
	熹宗天启六年	1626	9,835,426	51,655,459	743,931,900	5.25	75.64	14.40
	思宗崇祯年间	1628–1644	—	—	783,752,400	—	—	—
清	世祖顺治十二年	1655	—	14,033,900	387,771,991	—	—	27.63
	顺治十八年	1661	—	19,137,652	526,502,829	—	—	27.51
	圣祖康熙十二年	1673	—	19,393,587	541,562,783	—	—	27.92
	康熙十九年	1680	—	17,094,637	522,766,687	—	—	30.58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	20,341,738	589,162,300	—	—	28.96
	康熙四十年	1701	—	20,411,163	598,698,565	—	—	29.33
	康熙五十年	1711	—	24,621,324	693,034,434	—	—	28.15
	康熙六十年	1721	—	25,616,209	735,645,059	—	—	28.72
	世宗雍正二年	1724	—	26,111,953	890,647,524	—	—	34.11
	雍正十二年	1734	—	27,355,462	890,138,724	—	—	32.54

续表

朝 代	年 度	公元(年)	户数(户)	口数(口)	田地(亩)	每户平均口数	每户平均亩数	每口平均亩数
	高宗乾隆十八年	1753		102,750,000	708,114,288			6.89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	208,095,796	741,449,550	—	—	3.56
	仁宗嘉庆十七年	1812	—	361,693,379	791,525,196	—	—	2.19
	宣宗道光十三年	1833	—	398,942,036	—	—	—	—
	德宗光绪十三年	1887	—	377,636,000	911,976,606	—	—	2.41
	宣统三年	1911	92,699,185	341,423,867	—	5.45	—	—

[1]本表引自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第二章。

[2]本表引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表原为十列，引用时省略“资料来源”一列，以及“与上次相距年数”一列，并将

第一列拆分成“朝代”和“年份”两列。本表数据，特别是田亩数，均是古籍记载的原始数据，受统计条件、比率尺度的影响甚巨，不可直接用以做精确的纵向比较。

参考史料及著作

本书史料以正史记载的经济资料为主，并辅以历代研究食货内容的文献。由于是史料，故近现代以前著作只列编著者和书名。近些年来，由于国内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走向了一条意识形态化的道路，在解读文献、剥离真相方面存在着一些偏差，所以对于现代人研究中国古代财政问题的资料，必须做出极其小心的甄别。本书除了必不可少的现代经典著作之外，尽量回归到古代文献之中，即便必须引用现代著作，亦做出谨慎的考察，力图将意识形态的内容摒弃于文字之外。

《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

《孟子》

《管子》

《商君书》

《韩非子》

《周礼》

《仪礼》

《礼记》

（汉）刘向汇编，《战国策》

（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

（汉）司马迁著，《史记》

（汉）桓宽著，《盐铁论》

（汉）班固撰，《白虎通德论》

（汉）班固撰，《汉书》

（汉）崔寔著，《四民月令》残卷

（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

（晋）陈焘著，《三国志》

（梁）沈约撰，《宋书》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

（北齐）魏收撰，《魏书》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

（唐）房玄龄等主编，《晋书》

（唐）魏征主编，《隋书》

（唐）李延寿《南史》

（唐）李大师，李延寿撰，《北史》

（唐）杜佑撰，《通典》

（唐）吴兢著，《贞观政要》

（宋）宋祁等撰，《新唐书》

（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主编，《旧五代史》

（宋）李昉等主编，《太平御览》

（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欧阳修撰，《欧阳文忠公文集》

（宋）蔡襄撰，《蔡忠惠公文集》

（宋）苏辙撰，《栾城集》

（宋）沈括撰，《梦溪笔谈》

（宋）李攸撰，《宋朝事实》

（宋）陈均撰，《九朝编年纲目备要》

（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宋）王迈撰，《臞轩集》

（宋）孙梦观撰，《雪窗先生文集》

（宋）刘克庄撰，《后村先生大全集》

（宋）吴潜撰，《许国公奏议》

（宋）周密撰，《齐东野语》

（元）脱脱等撰，《宋史》

（元）脱脱等撰，《辽史》

（元）脱脱等撰，《金史》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

（明）宋濂等主编，《元史》

《明实录》

《明宪宗实录》

《明宣宗实录》

《明武宗实录》

《明神宗实录》

（明）李贽撰，《藏书》

（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

（清）董诰等主编，《全唐文》

（清）张廷玉等修纂，《明史》

（清）傅维鳞撰，《明书》

《清圣祖实录》

《清高宗实录》

（清）徐松撰，《宋会要辑稿》

（清）魏源撰，《圣武记》

（清）赵尔巽主编，《清史稿》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

汪圣铎著，《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7月。

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0月。

孟森著，《心史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4月。

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

赵冈、陈钟毅著，《中国土地制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7月。

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2月。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

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1月。

漆侠著，《宋代经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9月。

吴雁南、李禹阶著，《中国经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万国鼎著，《中国田制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李剑农著，《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6月。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梳理中央帝国两千余年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郭建龙 著

中央帝国的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

读懂了中央帝国的政治哲学，就把握了中央帝国统治的思想根基

"帝国密码三部曲"之二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作者郭建龙重磅新作

葛剑雄／林达／张鸣／马勇／张广天／周濂／骆玉明／郑培凯
刘苏里／余世存／俞敏洪／李鸿谷／陈志武／李淼　盛赞推荐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郭建龙　著

鹭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 郭建龙著．—厦门：鹭江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459-1517-4

I．①中…　II．①郭…　III．①哲学史 - 中国　IV．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2369号

ZHONGYANG DIGUO DE ZHEXUE MIMA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郭建龙　著

出版发行：鹭江出版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政编码：361004

印　　刷：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大窝头村西　邮政编码：065200

开　　本：710mm×1000mm　1/16

插　　页：4

印　　张：28.5

字　　数：447千字

版　　次：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9-1517-4

目录

前言 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
大一统哲学问题的产生
庸俗化、反叛和回归
第一部 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公元前202—公元200年，西汉到东汉）
第一章 汉高祖的皇帝危机（公元前202—公元前141年）
一场荒唐的演出
失控的帝国
集权帝国的根本哲学问题
初步神化方案
第二章 皇帝神化运动（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
熬过秦火的儒家
从孔丘变公羊
儒教的诞生
文化集权的第一次高峰
第三章 汉代圈养的知识圈（公元前87—公元23年）
博士、太学和门阀
政治化的儒教
谶纬的世界
第四章 谁是真经？（公元前53—公元36年）
论道石渠阁
发现古文经
打不破的围城
复古，复古
伪造大比拼
第五章 文人打架与皇帝和泥（公元36—公元200年）
光武帝时期大辩论
白虎观大和泥
一个哲学异类的生存方式
反对谶纬的机械论者
合并时，已临近死亡

第二部 哲学嬉皮士：以自然的名义反叛教权（公元166—公元316年，三国到西晋）
第六章 乱世文人抱脚难（公元166—公元220年）
夹缝中的文人结派
儒教理想的终结
经学葬处，玄学萌发
第七章 一切都是“无”（公元220—公元260年）
何谓玄学？
阴阳、五行与才性
嬉皮士的贵无论
第八章 放诞俗世做酒仙（公元249—公元316年）
非汤武而薄周孔
越名教而任自然
分道扬镳的贤人们
玄学思辨的精华
第九章 被收编的嬉皮士（公元266—公元316年）
回归正统，死于正统
独化：最后的调和派
倒向享乐主义
第三部 当皇权遭到拒绝：三教的竞争与妥协（公元316—公元960年，东晋到五代）
第十章 长不大的道教，思辨的佛教（公元前2—公元316年）
作为宗教的“道”
儒道从来是合流
浮屠真义
普度众生的大篷车
西域舶来，落户中原
第十一章 南朝：政治资源争夺战（公元317—公元589年）
不拜皇帝的和尚
华夷之辨与中国特殊论
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梁武帝：垮于佛教
第十二章 北朝：入笼之鸟（公元317—公元589年）

灭佛与兴佛
老子佛陀的迷雾
佛道大斗嘴
不屈的和尚
第十三章 隋唐：从现代边缘坠落（公元581—公元960年）
作为空壳的儒教
本土化佛教的兴盛
向老子认亲的王朝
唐朝思想的现代萌芽
回归孔夫子
皇帝缺钱找佛祖
第四部 叛逆的害人者：重建神权政治（公元960—公元1506年，宋到明）
第十四章 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公元960—公元1127年）
温和的改革，未了的结局
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
受排挤的苏轼
实用主义的终结和余韵
从出版业看政府控制
第十五章 存天理，灭人欲（公元960—公元1200年）
卫道士的到来
北宋的道学谱系
互相吹捧的“道统兄弟”
最后的先知
第十六章 从斯多葛到大一统（公元1200—公元1506年）
辽金：野蛮人学舌
元代画瓢
明代考试体系如何固化道学？
第十七章 蒙古大汗的宫廷圈奴（公元1206—公元1368年）
法国人记录的大辩论
第一次佛道大辩论
被剃头的道士
第五部 世俗哲学兴起：洗脑术的没落（公元1368—公元1911年，明到

清）
第十八章 用“心”反叛束缚（公元1368—公元1529年）
鹅湖寺风波
陈白沙：变奏之始
王阳明：无奈的思想反叛
第十九章 从心学到犬儒（公元1529—公元1644年）
赤手搏龙蛇
游侠之死
以死卫童心
朋党重现
庸俗化的心学
第二十章 神学散去，实学到来（公元1644—公元1911年）
王夫之：从务虚到务实
黄宗羲：政治学曙光
顾炎武：提倡实学精神
阎若璩：伪经的发现
戴震：大一统理论消亡
附录 中央帝国时期中国哲学简单年谱
参考史料及著作
后记
返回总目录

前言
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

在两千多年前，大一统模式刚刚出现，一个小流氓在风云际会中突然成了皇帝。在他之前的统治者都是贵族出身，当他上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相信他当上皇帝不仅不来自欺骗，反而是天生注定的？

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大一统时期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当西方世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中国人却始终在政治与人的框架中反复震荡，至今没有跳出窠臼。

在两千多年前，为了研究答案，西汉王朝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才终于创造了“天选”的思想，将皇帝与天等同起来，利用教育的垄断性，将这一套无法验证的信仰灌输给整个社会。

本书研究的，就是这场运动如何发生，又如何将中国哲学固定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轨道上，以及人们如何挣扎，又如何回归到惯性之中的。

大一统哲学问题的产生

建立汉朝的汉高祖刘邦在上台前是个带有流氓色彩的普通人，依靠暴力和运气当上了皇帝。即便他已经当了皇帝，许多熟人对他早年的底细却知道得一清二楚，还有许多六国的臣民，他们仍然忠于六国的贵族血统，对于平民出身的刘邦嗤之以鼻。到底怎样才能让曾经是普通人的刘邦被接受为皇帝呢？又怎样才能让人们对于刘邦的后代产生忠贞并长期服从于这个新兴的政权呢？

刘邦需要的是一个永久性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是天生的皇帝，不容推翻，也不容反抗。哪怕所有的人民都反对它，它仍然是合法

的。

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哲学基础。为了寻找这个哲学基础，汉代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开国功臣的陆续死亡，一个没有任何战功的懵懂少年依靠血统当上了皇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但不要着急，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了他们的使命，创造性地完成了哲学基础的构造。

这个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不是从逻辑上，而是从信仰上，将皇帝和宇宙真理联系在一起。汉代统治者发现，要想让人们服从，必须树立一个所谓的宇宙真理。在真理之下，人已经不是人，只是宇宙真理的一个零件而已。人活着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要为了宇宙真理而奋斗，自觉服从于真理，任何想要对真理倒行逆施的人都不值得同情，必须予以打击甚至消灭。

但在什么是宇宙真理的问题上，不同政权却有着不同的表述。在汉代，所谓的宇宙真理，就是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这套理论认为，在宇宙之中只有唯一的真理，这个真理不仅对自然界是成立的，对人类世界也是最高理论。真理的源头，来自一个叫作“天”的实体，是天的意志创造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服从于天的意志。

天的意志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帝。皇帝是天选的，决定刘氏当皇帝的不是人间的选择，而是天的决定。这样，小流氓就不再是小流氓，而是宇宙真理的一部分，人们不服从于这个政权，就视同自绝于宇宙。

第二，来自天的宇宙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为了构造内容，就不得不用到新兴的儒教。我们说儒教而不说儒家，是因为汉代建立的儒教已经脱离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是汉代学者的新创造。

汉代儒教借用了先秦儒家的礼法，采用了儒家的经典，却又将阴阳家的宇宙观和法家的权术结合进来，形成了一套包容天地万物的理论。宇宙之所以产生，来自阴阳和五行的互动，人类社会的存在，也要服从

于阴阳五行，由此产生了汉代的谶纬、祥瑞、灾异等观念。

这套无法验证的学说经过了政权的推广，直到现在，仍然成为许多人思维的基础，在社会中吸引着大量的拥趸。

第三，理论构造完毕，必须让所有的人相信它。汉代建立了完整的官方教育体系，并辅以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体制，要求只有学习这套儒教理论的人才能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儒教理论还进入了司法体系，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最根本性的影响。

通过灌输的方式，人们从生下来就浸润在宇宙真理之中，只要经过两三代人，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被格式化了。不管是赞成王朝还是反对皇帝的人，都只会用这套宇宙真理的语言去说话，这才是真理深入人类社会最深的印记。

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不仅彻底解决了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还由于它是信仰而非思辨，对社会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束缚，让中国人在两千余年的时间内，丧失了利用逻辑去验证事实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确是太成功了。

庸俗化、反叛和回归

西汉之后的中国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分为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西汉开始，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代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每一个周期中，又都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分别是：建立期、庸俗期、反抗期和变异期。

在第一周期中，西汉前期是儒教哲学的建立期，经过初期的探索，汉武帝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并通过教育系统和选举系统将这套哲学强行灌输给整个社会，到了昭、宣时代，西汉的社会已经儒教化，人们不再会用其他的方式思考社会。

汉宣帝之后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属于儒教哲学的庸俗期，这个阶

段，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能力，依靠灌输的几个观念来将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现象强行塞入儒教框架之中。这个阶段还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充斥着大量的学阀和门派偏见，人们不再以学问论短长，而是以关系和地位决胜负。把持高位，产生足够的徒子徒孙，成了每一个学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所谓学问，只是一块遮羞布。第二是对于谶纬、比附的滥用，当闪电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接下来要打雷，而是有人做错了事惹恼了老天爷。发现一只白色的野鸡首先想到的是祥瑞。人们辩论时，总是想从伪造的古书中发现预言的蛛丝马迹，好来比附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汉代哲学是最缺乏思辨的哲学，也主要是由于人们更习惯于使用比附而不是逻辑引起的。

第二个阶段末期，这样的哲学不仅无法指导人们的生活，还成了整个社会的累赘。于是，一群人开始挣扎着脱离儒教的控制，运用另一种工具——逻辑和思辨，来重新构造世界观。第一周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反抗期。

反抗期从魏晋时期开始，持续到南朝。这个时期发展出一种叫作玄学的哲学体系。所谓玄学，并没有构造出统一的世界观，而是提倡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工具是怀疑和逻辑。

由于汉儒缺乏逻辑，只是通过洗脑的方式让人们去相信一些无法证实的“宇宙真理”，玄学就首先从怀疑这些真理入手，强调首先要将所有的成见清除出人们的思想，再利用逻辑的力量重新构建可以相信的东西。

玄学的外在表现是对于道家“无”“自然”等观念的推崇，反对执迷于功名利禄，斩断对于官场的留恋。玄学的怀疑精神发展到极致，却导致人们可以推翻一种世界观，无法建立另一种世界观。

随着政治对哲学的干预，玄学也开始庸俗化，有的人学着用逻辑的方式为政权服务，另一些人则倒向了享乐主义。

但幸运的是，玄学之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逐渐接管了思辨一脉，这种更加强调逻辑和辩论的学问使得中国哲学继续远离腐臭的汉儒，于是中国哲学第一周期进入了最后阶段：变异期。

在变异期内，中国实现了三教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儒教虽然仍然居于政治的正统地位，但在社会思潮上，却是佛教占据优势。另外，唐代兴起的另一种思潮——实务精神，让只注重灌输的儒教显得无法适应政权的需要。唐代的高官除了文采之外，往往都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他们注重具体的政策治理，对于经济的关注也让他们无法在儒教经典中寻找到现成答案。这个变异期，成了中国哲学最活跃，却最不受研究者重视的时期。研究哲学的人都提倡一个统一的架构或者世界观，但这个时期却并不需要统一的架构，让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中国哲学的第二个周期从宋代开始。由于唐代缺乏统一的思想，也造成了另一个弊端：中央帝国显得过于松散。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以韩愈为首的文人将社会的散架归结为思想的不统一。到了宋代，文人们再次追求起统一的哲学体系。

北宋前期仍然继承了唐代的实务精神，但随着王安石将实务精神引向了计划经济，保守主义逐渐获得了政治的同情，并在南宋成为主流。

中国哲学第二周期的建立期持续到南宋，建立了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体系。道学与汉代儒教的区别在于，汉儒认为所谓的宇宙真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而宋代道学则将这个宇宙真理替换成了对“天道”的崇拜，这里的天道已经不是汉代那样的一个拥有意志的天，而是没有意志的客观真理。

虽然显得更加“客观”，但在道学家眼中，人同样不是人，只是必须强行绑定在天道之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第二周期的庸俗期从元代持续到明代前期，随着科举考试将朱熹理论树为正统，道学开始影响人们的方方面面，社会再次失去了思考能力。

到了明代，随着心学的诞生，中国哲学再次进入了反叛期。人们通过提倡对内心的遵从，来反对那无所不在的天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真理，人只需服从内心，这个观点成了反抗的依据。但将客观的天道替换

为主观的内心，同样产生了庸俗化的问题，人们以顺应内心为借口坠入了享乐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窠臼。

到了清代，中国哲学再次进入了变异期。这次变异期的特征，仍然是逻辑的力量。清代实学的兴起，让人们不再对那些大道理感兴趣，而是只研究可以证伪、可以逻辑推理的事物。一时间考据学派兴起，人们开始对所有可以观察的东西，不管是一件文物还是一段历史，都放入逻辑的放大镜下一一考察，将那些无法证明的东西排除出去。

清代的变异期又可以视为是对中国哲学体系的彻底反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经与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极其类似。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到了清代，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工具，并在逐渐改写着中国的历史与学术。

本书叙述了两大周期之中政府的格式化、民间的抵抗，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本书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有两大区别：

第一，传统哲学史大都以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主要叙述点，而本书则从秦汉统一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找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由于都处于大一统时代，秦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更加显而易见。

第二，传统哲学史以罗列每一家的具体观点为主。由于哲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是类似的，虽然书大都很厚，但大量的篇幅浪费在相同观点的罗列上，读者也无法从中找到思想演化的轨迹。这样的书大都只能当资料查阅，无法让读者获得足够的有效知识。本书则更加注重讲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为什么这么演化，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与本系列的第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样，本书虽然是寻找古代哲学的发展线索，却同样是一本对现代社会充满启发的书籍。当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在思

考问题时，会打开更加广阔的视角。

第一部
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公元前202—公元200年，西汉到东汉）

第一章
汉高祖的皇帝危机（公元前202—公元前141年）

集权帝国哲学的首要问题是皇帝的合法性。由于依附于政治，中国哲学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给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

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帝国的束缚，最初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产生了诸多的流派。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一个前朝的混混打扮成众望所归的皇帝？如何从人心所向的诸侯体制转变成人们普遍认为失败的中央集权制？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叔孙通强调用礼仪来固化统治者的地位，通过对礼仪的刻意强调，去降低、侮辱每一个臣民的人格，来彰显皇帝的权威。他的尝试虽然短期有效，但长期却失败了。

法家和道家认为，皇帝的合法性建立在人们的适应之上，只要经过几十年，人们适应了新的社会秩序，就会接受刘氏做皇帝。但在如何维持政体上，法家采取了加强权力的做法，而道家采取了放松控制的做

法。

法家和道家在汉初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却无法解答“为什么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别人不能当皇帝”这个问题。于是，儒教登场的时机到了。

儒教早期的代表人物是陆贾和贾谊，陆贾初步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儒教理论，却由于强调无为，仍然归于道家；贾谊综合了陆贾的“仁义”与叔孙通的“礼法”，希望积极干预社会，却由于汉文帝采纳了无为而治，怀才不遇，英年早逝。

任何一条狗都有属于它的那一天。

这句话在一个叫作叔孙通的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叔孙通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山东省滕州市。在秦汉时期，虽然春秋战国的各路诸侯已经被统一，可是人们仍然习惯于把这些诸侯国当作各自的籍贯，而各个地方也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特色。比如，叔孙通出生在当年鲁国的薛县，鲁国是孔子的家乡、儒学的发源地，这里的人一直保留着礼仪之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哪怕面临战争的窘境，人们也习惯于磨磨蹭蹭奏着乐、讲着礼，从容地迎接战争的到来。[1]

叔孙通在鲁地接受教育后，终于获得了人生第一次机会。此时，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需要各地的人才帮助他治理国家，叔孙通受到了征召，前往秦朝都城咸阳担任待诏博士，相当于皇帝的候补智囊。

数年后，秦始皇死了，他的儿子秦二世无力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秦朝进入了崩溃的节奏。当陈胜从楚地的大泽乡打出反秦的大旗后，秦二世慌了，连忙召集几十人，开了一次智囊团扩大会议，叔孙通也有幸列席。

智囊们议论纷纷，出谋划策。但吊诡的是，他们并不着急告诉皇帝如何镇压反叛，而是为了两个词语吵起了架：陈胜反秦到底是一次谋反大乱（反），还是普通的盗贼小乱（盗）？

现代人看来，当陈胜起事后，朝廷不首先发兵，而是争执这是一

次“反”还是一次“盗”，如此唯名论显得很荒谬。但在秦朝，这样的区分和法律有关，根据规定：如果是谋反，那么秦朝必须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如果只是盗贼，那么中央就不用调兵，而是由秦朝的地方政府（郡县）组织“地方警察”一捕了事。区分“反”还是“盗”，关系到中央和地方职权划分问题。

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次谋反，需要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只有叔孙通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只是一群盗贼，地方政府对付他们绰绰有余，不需要动用中央军。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现在的理解，需不需要动用中央军要根据陈胜军队的规模而定，如果预感到地方政府对付不了陈胜，就要赶快动用中央军。

但当时的儒生们不管持有哪个观点，都没有去考察“陈胜军队的规模”这个事实，而是从教条上寻找支持。比如，认为这是一次谋反的人是这么论证的：凡是人臣，就不应该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只要有此种行为，就是谋反。而陈胜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应该被认定为谋反，杀掉。既然是谋反，就要动用中央军。[2]

叔孙通的论证则是：秦朝统一后已经天下一家，连全国的兵器都已经没收了，中央政府也早已宣布天下不再用得着兵器，已没有战争。既然没有战争，皇帝又如此英明，法令又这么明晰，官员这么称职，怎么可能会有谋反？既然不是谋反，就只能是盗贼而已。既然是盗贼，那么就交给地方政府处理，皇帝仍然吃喝玩乐就是了。[3]

秦二世本来就不愿费神处理政务，叔孙通的说法正好符合他的本意，于是皇帝大喜过望。这时摸准了皇帝心思的人纷纷改弦更张，赞同叔孙通的观点。到最后，所有认为是“反”的人都被抓起来坐牢，所有认为是“盗”的人都没事。叔孙通则获得一件衣服和二十匹帛的赏赐，还从候补博士转正了。

叔孙通离开皇宫后，预感到秦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连忙逃走。而听了他计策的秦二世稀里糊涂丢掉了江山。就这样，叔孙通的第一次机会

灰飞烟灭。

离开了长安的叔孙通试图寻找其他的机会，他首先回到了家乡，家乡人民已经投降了起义军。这时首倡起义的陈胜已经死去，起义军最强大的人物变成了项梁（项羽的叔父）。项梁树立了一个傀儡，是楚国王室的后代熊心，尊他为楚怀王。[4]叔孙通决定撞他的大运，跟随了项梁。

但不久，项梁在战争中被秦国将领章邯大败身死，叔孙通只好卷起铺盖投靠了楚怀王。后来，项梁的侄子项羽击溃了秦国，成了西楚霸王。楚怀王这个傀儡用不到了，被贬斥到了现在的湖南郴州，最后被杀死在那儿。叔孙通只好再次寻找下家，投靠了项羽。

但不幸的是，叔孙通投靠项羽不久，项羽的老对手刘邦就趁着项羽进攻北方齐国的空当，率军直捣项羽的老巢，占领了西楚的首都彭城。

叔孙通此时看准时机，认为项羽已成末日残阳，又转身投靠了刘邦。

更不幸的是，这次叔孙通又看错了局势。当项羽听说刘邦偷袭了彭城后，立刻挥兵南下，直指彭城。而刘邦此刻却在彭城整天饮酒作乐，不思进取，结果兵败如山倒。刘邦仓皇逃出彭城，一路上危险重重，刘邦为了要加快逃窜的速度，甚至要将自己的老婆、孩子从车上踹下来。[5]

刚刚投靠刘邦的叔孙通此刻傻了眼，他不可能再投靠项羽一次，这可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跟随刘邦逃走了。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这次他投靠的主子是个来自楚国地域的痞子，尤其见不得读书人，一见穿着儒生袍子的人就厌烦。叔孙通整天长袖阔带，高髻大履，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为了迎合刘邦，他只好换上楚国的短衫，来讨得刘邦的欢心。

此刻，叔孙通已经跌到了人生低点，如同丧家之犬一般不断地更换主子，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块好肉。当年，他出来时耀武扬威地带来了弟子百余人，都希望通过他获得一官半职，但被他打消了念头：如今人

家需要的是打仗的，你们这些文弱书生靠不上边。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本人在刘邦的心目中也人微言轻，只不过混口饭吃而已。

就在这时，这个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五姓家奴（甚至有人说他侍奉过十位主子[6]）却突然转运了，因为战争结束了…

一场荒唐的演出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被边缘化的叔孙通突然求见汉高祖刘邦。此刻西楚霸王项羽已经被彻底击败，自刎于乌江。刘邦在定陶称了皇帝。本来应该是一派祥和景象，总是添乱子的叔孙通又有什么事要求见刘邦呢？

原来，他发现了刘邦体制的一个漏洞。这个漏洞是：没有人知道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汉代最初的体制是继承项羽的分封制。在项羽灭秦后，由于参与对秦战争的将领大都有六国的血统，而人们在对抗秦朝的中央集权帝国时，往往憧憬着回到过去的战国时代，项羽尊重了当时的思潮大肆分封诸侯，不过由于需要照顾的人很多，项羽的分封把原来七国的界限碎片化了，一共建立了大小不等的十九个国家。比如，原来的齐国分为三个国家（济北国、齐国、胶东国），韩、赵、魏、燕四国又各分为两个国家（依次为：河南国、韩国；常山国、代国；殷国、西魏国；燕国、辽东国），秦国和楚国的地方最大，各自分为四个国家（依次为：汉国、雍国、塞国、翟国；西楚国、九江国、临江国、衡山国），其中项羽的西楚就出自楚国。

在项羽的理想中，世界并不需要统一，只需要如同战国时代一样分为许多国家，各自为政，再由一个如同春秋五霸那样的“霸王”进行总的约束。这一点很像现在的国际秩序，世界上有很多互不隶属的国家，但美国试图作为“霸主”维持着世界秩序。

与现在的美国类似，项羽理想中的“霸王”，也不能随便干涉各国的内政，只是负责监管国际的秩序。只有国际之间发生了战争，或者一个

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内战，需要国际调解，西楚霸王才能出兵介入。

项羽的国际秩序存在的最大缺陷是，这个秩序过于碎片化。建立不久，诸侯国之间纷纷开始打仗，国内也出了乱子，把西楚霸王忙得一塌糊涂，也无力维持秩序的稳定性。诸侯王们对这个霸王的积怨越来越深，刘邦立刻钻空子联合不满的诸侯，一同出兵，经过鏖战击败了项羽。

由于刘邦知道项羽式国际秩序的缺陷，在建立自己的秩序时，竭力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他知道，如果自己还是一通分封诸侯，然后退回到关中当另一个霸王，那么迟早会和项羽一样被诸侯们拖累死。

刘邦心目中的秩序是秦朝式的，由一个君主（皇帝）统治中国所有的土地，在皇帝之下都是听从皇帝指挥的中央官吏和地方派出官吏。这些官吏都不是世袭的，必须由皇帝任命。在击败项羽后，刘邦随即称帝，就是为了建立这样的新秩序。

但无奈的是，刘邦在击败项羽的过程中，不得不求助于许多诸侯和将领，为了安抚他们，必须保留若干个诸侯国家当作犒赏。这样，刘邦早期的汉帝国实际上既不是项羽式的，也不是秦朝式的，而变成了周王朝式的。刘邦控制了关中（陕西）地区、四川地区以及一部分函谷关以东地区的领土，这部分土地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但在南方、东方、北方，仍然有一些不归中央政府管辖的诸侯国。

这些新诸侯中，最强大的是刘邦的三大功臣：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这些人成为诸侯之后，并不理解刘邦心目中的秩序，他们大都经历过项羽的分封时代，仍然以为世界秩序会恢复成又一次的诸侯制，只不过霸王的人选换了，从项羽换成了刘邦。

诸侯们认为，虽然自己对刘邦有朝贡的义务，却可以独立统治诸侯国，并享有这些国家的税收权和军事权。

所以，刘邦的皇帝和秦朝的皇帝并不是一回事，秦朝皇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皇帝通过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每一寸国土，而刘邦担任的皇帝却只控制了一部分领土，无缘控制诸侯国。

即便在刘邦的中央政府内部，人们也不知道皇帝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当年的大将本来就是粗人出身，他们以为自己和皇帝分享政权，仍然把他当作带头大哥。在刘邦飨宴群臣时，大臣们喝醉了酒大呼小叫、互相争功，说急了眼就拔出剑来拍打柱子，这些行为让刘邦感到头疼不已。

从骨子里，刘邦羡慕的是秦朝的规矩。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周游列国时期，经过刘邦家乡时，刘邦曾经在路边见过秦始皇的队伍，并发出感慨：大丈夫当如此也！[7]可是现在，刘邦已经当了皇帝，他的队伍却仍然如同老农民，人们对他没有尊重之意，而他的诸侯也不理睬他，独自管理着自己的地盘。到底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秦始皇的尊严，是这个当年的小亭长最关心的问题。

叔孙通正是看到了这一幕，才求见刘邦，为皇帝出谋划策的。

他根据在秦朝任职的经验，认为要解决皇帝地位的问题，必须首先从礼仪做起。要制定一套复杂的礼仪制度，在仪式中突出皇帝的地位，贬低甚至侮辱群臣，让他们逐渐习惯皇帝的威严。叔孙通的看法是：儒家不可以打天下，却可以守天下，既然天下已经太平，那些武将就没有用了，现在正是重视他这种儒家，制定繁文缛节的礼仪的好时机。[8]

汉高祖听了他的建议，并不太感兴趣。他担心礼仪不管用，他的臣下里文盲很多，灌输给他们礼仪，能办到吗？但刘邦又觉得不妨让他去试一下，只是嘱咐他要简化一点，让文盲们能够理解。

叔孙通退下来，到家乡去寻找当年跟随他的儒家弟子们。虽然有人不相信这个善变的人有什么出息，但仍然有三十多人决定碰一碰运气，跟随他来到了首都长安。

在长安，他又寻找了几十个人，凑够了一百多人，开始研发他的“春秋大礼”。在儒家系统中，推崇的是周代的礼仪，而实际实行的则是经过孔子和其弟子改造过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仪。叔孙通并没有见过周代礼仪，对春秋战国也知之不多，但由于他在秦朝宫廷任职，对于秦朝的礼

仪却是清楚的，结果，汉朝的礼仪就带上了严重的秦朝味儿。

为了受到重视，叔孙通全力投入制礼的活动之中。他带着他的一百多人来到野外的空地，扎上草人当作皇帝和大臣，再拉上绳子充当道路，一百多人每天在草人和绳子间折腾着作揖叩拜，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有了模样。汉高祖亲自观察过后，觉得以自己和大臣们的智商可以跟得上，才下令群臣开始跟着排练。

到了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这套由叔孙通制定的大戏终于有了表演时机。这时，恰逢长安的长乐宫建成，大臣们在十月（汉代以十月为一年的开始）纷纷前来宫殿内朝贺，按照原来的传统，朝贺大会必将一片喧哗，如同赶集一般热闹。但这一次，情况却有了变化。

按照叔孙通的设计，从早上开始，群臣们就要到殿门外等候召见，进行一系列的仪式。接着群臣排着队被引入殿门，宫廷中还陈列着车马步卒，张开旗帜，守卫着皇帝，把他与群臣隔开。群臣一路小跑到殿下，分成两列，文臣在东方面朝西，武将在西方面朝东。在群臣就位的过程中，有人专门传口令指挥。到这时，刘邦再坐着敞篷轿子出来，坐在殿上，而百官们纷纷按照规则进行朝贺。

朝贺完毕，还有法酒礼，大臣们在殿上挨个儿给皇帝行礼祝酒，祝酒的次数也有规定。如果谁的动作没有跟上出了差错，立刻会被现场执法的人给请出去以示羞辱。

事实证明，刘邦担心他的文盲下属不能行礼是白担心，实际上，文盲们更容易行礼，他们不会像文人一样问为什么，只懂得照着做。在依样画葫芦的过程中，文盲们突然间领悟了皇帝不是哥们，是主子，不是人，而是神的道理。

在一片森然之中，刘邦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威严。从此以后，他们必须习惯皇帝的高高在上，也必须习惯对着皇帝磕头作揖，并随时战战兢兢。

当韩信等人以赫赫战功而青史留名时，叔孙通就以这次古怪的仪式而登上舞台，并受到了重用，当上了太子太傅。等刘邦死后，作为老臣

的叔孙通更是倚老卖老，他不再是跟随秦始皇、秦二世、项羽的战战兢兢的小人物，而是不断地以礼法的名义干预国政，成了汉代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

然而，叔孙通的仪式真的能给新生的汉政权带来稳定吗？这却未必，它实际上让这个政权离心离德了。

失控的帝国

最先对叔孙通的演出感到心寒的，是那些汉初的异姓诸侯。

在汉代建国时，一共封了七个异姓王。除了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这三位灭楚的功臣大将之外，还有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和韩王信。

这七位诸侯虽然都曾经拥立刘邦当皇帝，但在他们心目中，仍然以为所谓的王，就是如同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一样，对自己的土地享有全权，虽然他们都朝拜周天子，但是周天子也必须尊重诸侯的辖地权利。他们接受的理想政治模式是诸侯式的，与项羽的看法更接近。当年反抗秦国，就是反抗的所谓中央集权制度，而汉高祖却想把这样的集权制度重新建立起来，的确让人心寒。

在现代，人们谈起秦的统一，常常归结为：统一是浩浩荡荡的历史趋势，是人心所向，人们盼望着统一与和平。但这只是一种历史机械论的陈词滥调。在当时的人看来，秦朝的统一并没有带来一种成功的新模式，而是失败了。

秦朝统一后，试图在如此广阔的疆域内建立集权制度，设立郡县制，由中央派遣的官员直接管理。但秦的集权却是过度的，严格限制了民间社会的发展，将过多的资源抽取到了官僚机器中，供皇帝支配。而连绵的巨大工程和战争也让人们看不到和平的希望。结果只过了十五年，这个庞大的怪胎就在社会的反抗中分崩离析。

秦朝崩溃后，人们想到的首先不是建立另一个统一的集权怪胎，而

是回归到旧有的多国模式之中。项羽主导的分封诸侯，就是为了根据中国的山川地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起众多的国家，让诸侯们分别治理。

即便七个异姓王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但他们仍然认为，刘邦可以取代项羽当霸王，却无权干涉列国事务。

甚至就连韩信这样的大将，也认为他辅佐汉高祖，就像当年姜太公辅佐周武王一样，一旦击败了项羽，他就可以像姜太公建立齐国一样，从汉高祖手中获得一块永久性的封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但是，刘邦却逐渐击碎了他们的梦想，刘邦不仅要控制中央直辖领土，还要控制诸侯的领地。

最先看到刘邦真面目的，是燕王臧荼。燕王臧荼属于老一辈的诸侯王，是项羽时代分封的。在后来楚汉相争中，由于刘邦的大将韩信武力击败了赵国，就要兵临燕国了，臧荼才被迫投降了刘邦。当刘邦称帝时，臧荼虽然也不得不拥护，但他随即发现刘邦和项羽不是一回事。项羽尊重诸侯的权利，只要诸侯不侵犯别的国家，在自己封国内进行统治，项羽不会干涉诸侯事务。而刘邦却想逐个消灭诸侯国，改成秦朝模式。

在叔孙通给刘邦设立演出之前，臧荼就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随后被刘邦击败。平定臧荼后，刘邦派遣同乡好友卢绾担任了燕王，便于控制这片北方的偏远土地。[9]

其次被逐的是北方的韩王信，韩王信最初的封地在如今的河南省，汉高祖感觉他太靠近中原，是中央政府的一大威胁，于是将他迁到了山西北部，那儿在茫茫的太行山之中，北面就是匈奴。但刘邦仍然不相信韩王信，后来又以他里通匈奴为借口，将他驱逐了。

在叔孙通导演了礼仪大表演之后，刘邦的野心已经不加掩饰，异姓王与他的冲突也步入了更加剧烈的阶段。到这时，双方的底牌都已经显现，诸侯的底线是：皇帝无权干涉诸侯内部事务，诸侯可以任命自己的官员，独立收税和组织军队。刘邦的底线则是：诸侯要想继续当名义上

的统治者，就必须变作一个普通官员，随时听话并接受皇帝的领导。

随着双方底牌的显现，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刘邦开始抓紧剪灭异姓王的步伐。

在西汉的异姓王中，势头最盛的是楚王韩信。在历史上，楚国在疆域上一直是与秦国相匹敌的大国，人们一直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表面上看，秦始皇灭亡了楚国，但不管是陈胜、吴广，还是项羽、刘邦，都来自楚地，恰好验证这个说法的准确性。西汉建立后，刘邦的根据地是原来秦国的地方，而楚王韩信则占据了楚地。虽然这时的楚地已经四分，实力不如当年，但楚王仍然是刘邦最忌讳的诸侯。

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刘邦以韩信收留项羽大将钟离眛为由，偷偷准备讨伐韩信。韩信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取了钟离眛的人头前往谢罪，却被扣押住，免去了楚王头衔，改封为淮阴侯，剥夺了兵权和治权。五年后，刘邦又利用他的皇后吕后之手，污蔑韩信造反，将韩信夷灭三族。[10]

韩信被废后，刘邦接着瞄准的是他的女婿——赵王张敖。刘邦分封最早的赵王叫张耳，死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张敖。张敖娶了刘邦的独女鲁元公主为妻。作为皇帝的女婿，却由于是诸侯王，也成了被降服的目标。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刘邦路过张敖的领地，故意怠慢和辱骂他。在张敖的侍从中，大都认为张敖是独立于皇帝的，皇帝也无权辱骂一个国王，他们开始策划刺杀汉高祖。但他们的阴谋失败了。两年后，有人告发了他们当年的阴谋，这正好给刘邦提供了借口，刘邦乘机夺取了张敖的领地，贬斥他为侯。赵国也被收回了。[11]

降服张敖之后，最强大的诸侯王还剩下两家：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他们两人在楚汉战争的武将中功劳仅次于韩信，各自统治封地后，也没有做出对不起刘邦的举动。

公元前197年（汉高祖十年），汉高祖派遣使者，以出兵的名义，

请彭越在梁国征兵支援皇帝。这仍然是周代的礼法，按照规矩，天子出兵，诸侯应该再提供一定的军队。彭越正好生病，于是派遣了另一位将领，带着兵马前去支援皇帝，自己没有上阵。这件事惹怒了刘邦。

正好彭越的太仆因为和他有矛盾，逃到刘邦那儿告他谋反，刘邦以此为借口，出其不意将彭越抓住，废为平民，贬斥到四川的最边缘地区。彭越自以为无罪，在贬斥的路上碰到了刘邦的皇后吕后，向她哭诉，没想到这个女人比丈夫更心狠手辣，假装把彭越带回洛阳为他求情，实际劝说刘邦杀了彭越，灭了他的家族。[12]

论战场上的军事能力，这几个人的素质都远高于汉高祖，但在诈术面前，他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干掉了。但是，在对待淮南王英布时，刘邦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彭越死后，他的肉被做成了丸子赐予大臣和诸侯以儆效尤。但这种残酷的举动不仅没有吓住淮南王英布，还引起了西汉帝国建立之后最严重的危机。收到彭越的肉丸后，英布预感到他也成了皇帝觊觎的对象，被迫提前起兵拒汉。

对于这次英布的起兵，刘邦颇为重视，他率兵亲征，两人在阵上遥遥相见。此时，两人的谈话却表明了世界观的不同。

刘邦问英布道：你何苦要造反？

英布讽刺他：老子也想当皇帝！

他的回答换来了刘邦的谩骂。

刘邦认为英布是造反，但英布却认为，他只是自卫而已。在英布看来，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皇帝”这个不明确的概念上。刘邦的“皇帝”是要控制一切，恢复秦朝的集权政治，而英布所代表的诸侯势力，则是要保护自己的领土，保证独立性。

经过了剧烈的战斗，此次战争以皇帝的获胜而告终，英布逃窜后被诛杀。英布的死亡，标志着对集权制度威胁最大的三个诸侯都已经被消灭。[13]

但这样的胜利却有着致命的后果，带来了更大的危机：战斗中刘邦中了一箭，从此身体时好时坏，拖了一年多就死了。

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庞大失控的帝国：由于不满于集权制度带来的束缚，人们离心离德，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他的妻子吕太后更是风声鹤唳，对所有的人都不敢信任。

吕太后甚至恐惧起汉朝自己的中央军队来。在刘邦死前，他派出了大将樊哙、周勃率领二十万大军，对还在位的倒数第二个异姓王——燕王卢绾发起了攻击。卢绾是刘邦的同乡好友，本来应该是帝国的稳定剂，却由于中央政府对他王国的逼迫，而不得不与匈奴人联合对付汉朝。

在樊哙、周勃率领大军进攻卢绾时，为了确保关中地区（陕西）的安全（这里是汉王起家的地方），刘邦还派陈平和灌婴率领十万人把守着关东地区的重镇荥阳。当年荥阳是刘邦与项羽来回争夺的地方，获得这里，就有了进攻洛阳和关中的基地，是全国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

当刘邦死后，吕太后不仅担心无法控制朝政，还担心起樊哙、周勃、陈平、灌婴这些忠心耿耿的将领来。吕太后总是想到，在秦朝时，这些将领和刘邦是平等的编户，现在却要对刘邦的儿子称臣，会不会心有不甘而率三十万大军造反？[14]她不敢宣布皇帝的死讯，秘不发丧，阴谋将在外领兵的将领们都杀掉。

大臣郦商听说后，立刻见到替太后出谋划策的审食其，劝说：如果杀掉这几位将军，三十万汉军不仅不会平息，反而会立刻大乱。[15]在审食其入告后，吕太后这才放弃了杀害这些人的企图。这四位将军都属于刘邦的亲信，吕太后尚且如此不信任，不仅表现了执政者阴暗的心态，也看到了汉朝初期风声鹤唳的局势。

那么，吕太后为什么如此惊恐，连刘邦的亲信都不敢相信呢？

答案仍然是：到这时，人们仍然不理解刘邦要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回答，为什么刘邦成为皇帝，而其他人必须做臣子？在更多人的心中，仍然怀念着列国时期，对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充

满了警惕和敌视。

吕太后担心，刘邦死后，会有下一个造反者推翻汉朝统治，将她和她的子孙做成肉丸子。

只有这时，才能理解人心为什么如此重要。当所有的人都不信任这个制度时，所形成的合力很可能会摧毁它。当一个平民当上皇帝时，所有的人都会问凭什么。只有将皇帝树立成神，当作天赐的，才能避免那些普通人的野心。

叔孙通采取了最简单的做法，试图用一系列复杂的礼仪凸显皇帝的威严，并将人们固定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不让他们反抗。但出身于小混混的刘邦不管经过什么样的包装，人们还是认为他不够神圣，没有起到最终的固定作用，反而让人们更加担心和不信任。叔孙通的努力失败了，但是，怎样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皇帝呢？

集权帝国的根本哲学问题

汉高祖刘邦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基本问题。从秦代开始，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帝国维持了两千年。可在建立之初，人们会问：为什么皇帝就能将整个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据为己有？他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他是皇帝，而不能换成别人？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开国君主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开国君主最初只是生活在前朝的普通人，只是因缘际会得到了天下，对他知根知底的人不在少数。成为皇帝后，要想证明他理应当皇帝，就必须神化他，但那些熟人却不屑于他装神弄鬼，到底该怎么说服大家他就是皇帝的不二人选？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也在这里，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帝国的束缚，最初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并产生了诸多的流派。而中国哲学首先是依附于政治的，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给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只有统治问题得到解答后，才会将哲学延伸到其他领域，产生出新的方向。

在汉初，随着刘邦的逝世以及叔孙通代表的儒家的初次失败，另外两个学派又分别进行了尝试，来解决政权（皇帝）合法性的问题。

在两派出台前，西汉皇族内部的纷争恰好维持住了刘邦政权，没有倒台。这次内部纷争由吕太后引起，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吕太后任命了几位娘家人担任王，包括吕王吕台、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等。

吕太后之所以把她的娘家人封王，也是因为如何分封诸侯王还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规则。虽然刘邦说过“非刘氏不王”，但由于战国时期和汉初的影响，吕后认为将部分国土分封给吕氏是正当的。她本人对于刘邦想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也并没有清晰的概念。

吕太后死后，几位吕姓王短暂拥有过颠覆中央政权的权力。[16]然而，对于跟随刘邦的功臣来说，与其选择吕氏，不如继续拥护刘氏。这种想法导致了重臣陈平、周勃等人合谋消灭吕氏，拥护刘氏。这次谋划也导致了生性宽容的汉文帝上台。[17]

文帝上台后，另外两个学派的观点已经占据了汉朝的主流，并影响了汉朝几十年的社会，它们分别是道家和法家。

与儒家痴迷于利用礼仪将人的行为束缚起来不同，道家和法家都承认刘氏政权并没有必然性，也没有巩固性。人们对于战国时期的记忆过于清晰，不肯轻易接受一个中央集权的庞然大物。

道家和法家相对来说都是务实主义者，他们没有试图从理论上神化皇族，而是寄希望于用现实性来代替编造的理论。他们认为，要想树立刘氏政权的权威，只需要将这个政权维持得足够长久，等那些出生于战国和秦代的老人都死掉时，人们的记忆就会被更迭。如何度过最初的几十年，是一个帝国成败的关键。

如何维持政权的稳定，道家和法家的思路却是截然相反的。道家主张放松社会控制，而法家主张加强社会控制。

法家对集权政权的实践是从秦朝就开始了的。在商鞅、韩非子等人的影响下，秦朝采取了通过严刑峻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做法，试图利

用弹压之术，将人们固定在社会的各个角色之中。当人们适应了新的角色之后，也就承认了新政权的权威。在他们看来，权威来自法律约束。

除了制度之外，法家还主张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剪除诸侯势力，不管是汉高祖和吕后主导的诛杀异姓王，还是汉景帝时期的削藩，都带着鲜明的法家特色。

但是，随着秦朝的灭亡，法家由于过于严苛，已经声名狼藉。而法家主张建立制度，在汉高祖本人看来也并不欣赏。汉高祖本人天马行空，以毁约为常，建立制度除了意味着对民间的限制外，也意味着对皇帝的限制。在汉初，法家虽然屡有应用，却只能处于地下活动，也就是采取法家的政策，却不说自己是法家。

汉初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晁错[18]，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往往在儒术中掺入大量的法家成分，所谓“阳儒阴法”，这种趋势就始于晁错。晁错被人们认为是汉初儒家的代表，他也的确精通儒家经典《尚书》，但同时，他又学习过法家思想，在他提出的政策建议中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思路。

晁错生活在汉文帝、景帝时期，也是中国大一统之后第一次经济盛世时期。为了巩固汉政权，晁错的提议大都是明快直接、不打哑谜的政策。比如，他也和商鞅等法家人物一样，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贬低商业（这和黄老之术代表的道家学说正好相反），为了鼓励人们种粮，也同样是为了解决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向边关地区输送军事后勤的问题，他提出富人可以向边关输送粮食，而朝廷给他们封赏一定的爵位，或者免除一定的刑罚。[19]通过这种方式，中央政府筹集了财政需要，就可以为普通人减税。汉文帝采取他的方法，果然在接下来的十三年中没有收取一点农业税，仍然保持了政府的运转和边关的国防。为了解决边关问题，晁错还鼓励人们向边境移民，寓兵于农，积极防御匈奴的攻击。[20]

而晁错最著名的主张，则是在汉景帝时期的“削藩”。刘邦废除了同姓王之后，由于制度惯性，汉帝国无法一下子在全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没有这么多的官员储备），只好又任命了一批宗室子弟去函谷关以东地区担任诸侯王。这些同姓诸侯王主要分布在如今的山

东、河北、山西、江淮一带，死后可以把国土传给子孙。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们与皇帝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淡漠，他们就成了西汉政权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晁错在削藩问题上反映了典型的法家功利主义观点，他认为，诸侯王已经尾大不掉，不管现在开始削藩，还是不削藩，在未来都会有人起来造反，“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如果现在开始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会逼迫诸侯王立刻造反，但灾难可能更小。如果现在不动手，诸侯王造反可能推后，但到时候，当诸侯王兵强马壮准备完毕，反而更加难以预测结果。“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21]

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立刻引起了七国之乱，即七个诸侯国的叛乱。这七个国家打着“诛晁错”的旗号造反，景帝立刻服软杀掉了晁错。晁错虽然死去，但他的主张却毫无错误，借助这次七国之乱，汉景帝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为汉武帝时期彻底控制诸侯国铺平了道路。

除了法家之外，与法家相对的是另一派，被称为“黄老之术”，也就是西汉初期特殊的道家学派。所谓黄老之术，被认为来自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的思想。

这一派认为，要想巩固政权，必须让人们尝到甜头，认识到现在模式的好处。只有得到了好处，人们才会从心底里接受新模式。

要让人们尝到好处，就必须从经济上考虑问题。在统一的模式下，由于市场的扩大，政府只需要维持住和平，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民间经济就自然会获得发展。当经济发展几十年后，人们都吃上了饱饭好饭，生活上自得其乐，也就已经离不开这个政权了。即便这个政权是依靠欺诈和蛮力建立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因为创造了和平和繁荣而取得合法性。

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是丞相曹参，以及汉文帝和他的皇后窦皇后。幸运的是，吕太后时期虽然政治上斗争不断，但治理国家上却交给了秉持黄老之术的大臣。到了汉文帝时期，更是将黄老之术当成了国策。

借助法家的权术和黄老之术的仁术，汉高祖刘邦死时的皇帝危机暂时被压制住了。随着文景之治带来的盛世局面，人们慢慢地不再怀念战国时期，而是被西汉所创造的巨大的国内市场所迷惑，更加乐于生活在现状之中。

到这时，法家和道家的作用已经达到了最大。然而，人们却发现，皇帝的合法性危机并没有真正解决。法家和道家的做法只是把合法性问题推后了，他们并没有回答“凭什么刘氏才能当皇帝”，只是让大家习惯于刘氏当皇帝的状态，而人们之所以接受刘氏当皇帝，只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生活得不错，没有必要做改变。

可是，万一哪一天，当社会经济出现下滑，人们的生活困难时，“凭什么刘氏才能当皇帝”这个问题又会被提出来，并且成为推翻刘氏政权的借口。按照现代功利主义的观点，人们需要一个皇帝，只是因为暂时想不到更好的政治架构来保证庞大国家的统一和繁荣，至于谁当皇帝，是无所谓的。但这种观点在汉代的皇帝们看来绝对不能接受，他们必须要一种哲学来论证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这样才能保证江山永远在刘氏内部传承。

于是，当道家和法家暂时稳定了社会，让皇帝坐稳了宝座之后，皇帝开始转向了另一派人，请他们彻底解决所谓的合法性问题。

这一派认为，道家使用的是权谋之术，而黄老之术则使人放荡和失控，总的来说，这两派都是针对人们的举止和行动采取方法，而真正高明的手段却是控制人们的思想，通过政府的引导、宣传和洗脑，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爱上皇帝，将皇帝当成比衣食父母都亲的神，把当年的小瘪三当成是天命所归的不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彻底相信，只有刘氏才能做皇帝。

这一派，就是后来的儒家。或许我们更应该称之为儒教。

初步神化方案

在汉代，从黄老之术向儒教转化的两个早期人物是陆贾和贾谊。

陆贾来自楚地，生活的年代与汉高祖重合。在汉高祖统一中国后，陆贾曾经出使南越国，说服南越王赵佗称臣，但令陆贾扬名的却是他写的《新语》。[22]

在秦朝，由于李斯说服秦始皇将除了医药、占卜、种植方面的书籍之外的其他书全部烧毁，对先秦文化形成了致命的打击。[23]到了汉初，各地保留下来的书籍很少，而曾经学习过百家之术的人又分散在乡野，还都没有找到。在这个图书奇缺的年代，一本简单的顺口溜书籍都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力。

汉高祖刘邦本人对文人和书籍并不感兴趣，常常以侮辱文人为乐。由于陆贾动不动就在刘邦的面前说诗书，刘邦当面质疑：老子是马上打天下，读这些诗书有什么用？

陆贾回答：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并举了一系列例子，最后说，如果当年秦朝懂得师法圣人，行仁义，也就轮不到陛下了。

刘邦立刻醒悟，放下架子请陆贾根据历代的得失经验，写出来供他参考。陆贾于是写了十二篇文章，合成一本书称为《新语》。这本书立意浅显，格式粗糙，类似于古代的顺口溜，也反映了秦朝焚书坑儒之后文化的凋敝。但陆贾每每上奏一篇，刘邦都会大声说好，引得其他人都跟着喊万岁，说明他抓住了刘邦的需要，已经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学术水平。

在书中，陆贾以儒家的框架为基础提出了治国之道，认为统治者必须做到“仁义”才能治理好国家，但他又进一步认为，仁义的核心是“无为”。仁义是孟子时期儒学的核心思想，而无为则是道家思想，这样，陆贾的思想实际上是儒家的框架和道家的核心。但他的做法让儒家在汉初的道家氛围内寻找到了一丝根据地。

《新语》翻来覆去说了十二篇[24]，核心观念可以概括为：

第一，从宇宙论入手，叙述了宇宙的发展过程，然后到人类的发展过程，再到历代圣人的功劳。他认为圣人是根据宇宙的规律来治理国家的，所以达到了良好的效果。陆贾的这个体系参考了先秦时期阴阳学家

的成果。

第二，所谓宇宙发展规律，就是“仁义”。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行仁义。陆贾此时的理论体系来自孟子的理论，孟子理论的核心，就是“仁”。

第三，皇帝如何才能做到仁义呢？答案是：所谓仁义，就是要“无为而治”。只要保持内部的和平，民间自己就会发展，皇帝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享受“无为”的成果就可以了。无为的思想来自道家，所以，陆贾最后的结论实际上是道家的，与当时的黄老之术合拍。

陆贾理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宇宙论。这套观念暗含了后来董仲舒创造的“天人合一”理论。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人类社会是另一个小型的宇宙，宇宙的规律也是社会的规律，所以，要治理好人间，就要符合天道。

不过陆贾还没有明确说皇帝就是老天爷派来治理人世的，他只是暗示，皇帝之所以脱颖而出，在于他按照天道来治理人民。

这套天人合一的理论虽然还比较原始，但到了后来，被后人进一步发挥，就把皇帝神化成天子，并把某人当皇帝说成是天道了。这样，皇帝就从小瘪三变成了老天爷派来的，是不可反抗的。一旦皇帝成了天子，人们也就没有资格去质疑他凭什么当皇帝了。

陆贾之后，另一位年轻人继续发展了他的理论。这位年轻人就是汉文帝时期的贾谊。

贾谊是洛阳人，他在当地被称为年少的才子，后来被文帝征召进入宫廷。最初是博士，一年之后就跳到了太中大夫。这两个官职都是皇帝的智囊，博士的待遇是一年六百石粮食，而太中大夫则有一千石的粮食。

贾谊的思想可以看作继承了陆贾的“仁义”思想，加上从叔孙通那儿借来的“礼法”外衣。

叔孙通主张礼仪，强调巨大的仪式感，利用仪式带来的压迫感产生秩序，从而烘托皇帝的威严。他在刘邦时期颇受重用。但是到了汉文帝时期，由于文帝待人宽厚，提倡黄老之术，叔孙通的那一套吃不开了。

但贾谊来到了文帝朝廷之后，没有觉察到这种转变，仍然上书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25]

他的这些提议比叔孙通又进了一步，叔孙通是东施效颦一般模仿秦朝的礼仪规则，而贾谊则是想建立一套属于汉朝自己的礼仪规则，并配合一系列神秘主义的理论。比如，根据先秦时期阴阳学说，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每一个朝代都对应于不同的元素和不同的颜色。

另外，在秦汉时期，“正月”并非就是“一月”的专有名词，而是每个朝代有自己的“正月”。比如根据《史记》记载，夏朝的正月是一月，商朝的正月是十二月，周朝的正月是十一月。[26]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秦朝是“水”德，颜色是黑色，而秦朝的正月是十月。贾谊继承了这样的神秘主义，急于把它并入到礼仪规则之中，把皇朝循环与阴阳五行、宇宙论扯上关系，把汉朝塑造成天命所归。

贾谊对陆贾的理论也有了新的改造。陆贾认为皇帝一定要行仁义，贾谊也认为一定要行仁义。他还专门写了《过秦论》，经过了无限的铺排之后，认为秦朝灭亡就是因为“仁义不施”。

但贾谊的仁义与陆贾的仁义却是天壤之别。陆贾认为仁义就是“无为”，对应于现代术语就是宽容，这是典型的道家思想。而贾谊认为的仁义却是“礼法”。由于礼法是孔子时期儒学的核心观念，贾谊就把陆贾的理论又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儒家思想。除了礼仪上尊崇皇帝之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须突出皇家的威仪，将整个社会置于等级规则之下。一旦所有的等级制度就位，皇帝就成了高高在上的神。

但贾谊不走运的是，汉文帝是一位黄老之术的信奉者，对于一切折腾都敬而远之，将事情能简化就简化。贾谊的思想并没有被采纳，他本

人也被从中央支走，远走长沙。由于英年早逝，他没能熬过汉初的黄老时期。

贾谊死后二十八年，一位十六岁的小皇帝登上了王位，儒教终于等到了机会，摩拳擦掌准备占据中国两千年哲学舞台的中心位置了。

第二章
皇帝神化运动（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

从汉武帝开始，政府注意提拔身份卑微的书呆子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最典型的是犯过罪、牧过猪，年近七十才入仕的公孙弘。这类人缺乏实务经验，却善于把持权力，以皇帝的需要来解释司法，成了神话皇帝的主力军。

窦太后死后，作为汉初指导思想的黄老之术迅速让位于儒家，儒教时代到来了。

西汉的儒教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最初的儒教建立在一本对《春秋》有歪曲的解释性书籍之上，这本书叫《春秋公羊传》。

由于提倡“微言大义”、“大一统”、政治进化论（早期儒家总是向往古代政治的清明，《春秋公羊传》却推崇现世，不注重古代），这一切都符合西汉王朝的需要，《春秋公羊传》成了西汉的《圣经》，孔丘已经变成了公羊。

董仲舒对儒教的改造，是将阴阳学说杂入了儒家学说，提倡“天人合一”，试图利用儒教解释从宇宙天地，到人体发肤，再到社会政治的一切学问。他试图寻找终极真理，再用这个真理束缚住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幸福地生活在真理之中。

按照“天人合一”理论，人类社会的规律与老天爷的运行规律是合一的，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遵从于老天爷的意志。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天选定的，是不容置疑的，必须无条件服从。既然老天爷选择了刘氏作为天子，那么所有对皇帝的反抗就是非法的。通过这种方式，董仲舒就解决了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的问题。

儒教诞生的同时，作为道家集大成者的淮南王刘安却在儒教的打压

之下死亡，他主持编撰的《淮南子》虽然代表了道家思想的最高成就，却没有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力。道家从此退出了政治。

一个叫作公孙弘的小人物可能永远想不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飞黄腾达。

公孙弘生于公元前200年前后，出生时汉高祖刘邦还在位。他曾经担任过小吏，但由于犯罪被免职，迫于生活压力只能到海边去牧猪。[27]他与著名的大才子贾谊同岁，但贾谊三十三岁去世时已名满天下，而此刻，公孙弘还只在猪窝里挣扎。

到了四十多岁，这位一事无成的小人物眼看就要卑微地度过一生，他却决定开始另一段冒险：去读书。

当时已经是汉文帝执政晚期，各地的儒家学说有所抬头。西汉时期人们对书籍的占有与现代不同，现在，我们随时可以接触到琳琅满目、品种齐全的图书。但在汉代，由于书籍都是手工抄在竹简上的，书就意味着财富，许多穷人可能终生都见不到一本书。

在这种情况下读什么书也充满了偶然，一个学习《道德经》的人可能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老子，而是他只见过这一本书，没有机会接触到别的。当他把这一本书背得滚瓜烂熟，就成了一个拥有学问的人，可以到官府混饭吃了。

由于竹简运输不便，许多人传授学问也是靠背诵完成的，当他口对口帮助学生把全书都背下来，解释一遍，就算完成了传授。

公孙弘住在齐地，在战国时期，齐国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以研究变了味的儒家学说而出名，号称“稷下学派”。

孔子出生于鲁国，因此，在鲁地保存了较完整的孔子学说，那么为什么齐国也成了研究儒家的学术中心呢？这是因为齐国比鲁国更强大，它的国君更倾心于称霸，想以齐国为中心重建国际秩序。在齐王的周围聚集了大量的学者，希望为齐王量身打造一套称霸世界的理论体系。这些学者中最主要是儒家，但也有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学派。根据《汉书》的记载，儒家学者荀子、道家学者田况、阴阳家邹衍，都曾经在稷

下做研究。[28]这些不同学派的人在一起联合改造了原始的儒家，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也把这一派儒家称为“齐学”，而更加继承了孔子理论的鲁地儒家称为“鲁学”。

在齐地，公孙弘有机会接触到了一本叫作《春秋》的书。这本书由孔子整理，并经过齐地文人的解释，在私下传授。

在这些文人中，有一位最著名的叫作胡毋生，此人曾经在汉景帝的手下当过博士，老来回到齐地传授学问。[29]胡毋生的学问是从一位叫作公羊寿的人那儿口对口学来的，而公羊寿的学问得自于家传，他的祖先公羊高是子夏的弟子，而子夏又是孔子的嫡传弟子之一。

在胡毋生之前，公羊家族传诵的《春秋》是靠口口相传来延续的，胡毋生第一次把它变成了文字，记在了竹简上。记载的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孔子整理的《春秋》被称为“经”，由于经文写得过于简略，不解释就不容易懂，人们如果直接读春秋经，就像现代人读古文一样云里雾里，所以，公羊家族的人会对经文进行一定的解释，这些解释被称为“传”。由于胡毋生的“传”是公羊家族流传下来的，所以他写出的解释就被称为《春秋公羊传》。

公孙弘师从胡毋生之后，将《春秋公羊传》背得滚瓜烂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文人。

到了他六十岁，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当年，年幼的汉武帝新上台不久，执政的窦太后决定从地方上征召一批有学问的人。当地官员把老头子公孙弘也举荐了上去，白发苍苍的他第一次踏出故乡，去了京城。

执政的窦太后没有嫌他老，授予他博士的头衔。他的第一项差事就是出使匈奴，然而，事实证明，这个放猪的老头子虽然背了一本书，却缺乏处理实务的能力，他搞砸了使命，被太后免了职，打道回府——他向着一事无成地死去又迈进了一步。

六年后，窦太后已经死去，汉武帝开始了亲政。他再次下诏征集儒家人才，地方官员再次将公孙弘上报。公孙弘已经心灰意懒，不想再去碰运气，但还是被劝说着上路。到了首都，负责选拔的太常也看不起

他，在策问时给他评了个下等。随后，这样的成绩送给汉武帝过目，谁知汉武帝却出乎大臣们的意料，立刻被这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子迷住了，不仅大大赞赏一番，还将他留下伺候自己。

此后，公孙弘的提升进入了快车道，从金马门待诏，到左内史，直至御史大夫、丞相，以八十岁的高龄死在了丞相任上。

由于吃过一次亏，公孙弘对于自己的学问知根知底，他变得谦恭多礼，做事首先把私人态度藏起来。当皇帝询问时，哪怕有不同意见，最终也总是无条件支持皇帝。大臣们对他的首鼠两端感到不满，他就用谦恭的态度笼络住下级，再偷偷地排挤那些比他学问大、能力强的人。

在所有学习《春秋公羊传》的人中，他的师弟董仲舒的成就远胜于他，于是他就把董仲舒送到胶西国去当国相，原因是胶西国的国君刘端以残暴出名，当他的手下很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挂掉了。

以编撰《淮南子》出名的淮南王刘安喜欢道术，杂以百家，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而公孙弘只会背诵一本《春秋公羊传》，对于意思还老是吃不透。但他感觉到皇帝担心这位堂叔的权威，开始着手调查淮南王谋反的迹象，为事后汉武帝查办淮南王拉开了序幕。

在公孙弘办理的荒唐事中，最荒谬的要算两个案子：其一，当时的名臣主父偃曾经担任齐厉王的国相，由于齐厉王与姐姐通奸，主父偃对他晓之以理，齐王却担忧主父偃是汉武帝派来查办他的，自杀了。[30]

这件事本来与主父偃无关，但公孙弘却认为，根据《春秋公羊传》的精神，有一条原则叫作“诛首恶”，一件事情哪怕不是他干的，但是因他而起，他就是首恶。如果主父偃不劝说齐王，齐王就不会自杀，所以主父偃就是首恶。公孙弘以这样的借口杀掉了主父偃，并灭掉了他的家族。这件事也开启了滥杀的先河，汉代的法律由此可以不根据人的行为来断案，而是根据事情的后果，甚至可以牵连到无辜的人。

另一件事与一位叫作郭解的游侠有关。游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他们游历在各个国家，不依附于任何政权，不属于任何已有的社会等级，独立于现有的体制。随着汉代大一统的到来，产生游侠的土壤中

断了，他们成了集权政府的敌人，被消灭的对象。

读惯了现代武侠小说的人都会对侠客赞不绝口。郭解就是实际存在过的侠客，他年轻时曾经杀人作恶，遇到大赦，之后痛改前非。他在乡里甘居贫困，却又仗义执言，聚集了大批仰慕他高义的人前来。他虽然只是布衣，在家乡却比官员都有威望，调解人们的矛盾，维持社会正义，不作恶，不杀生。[31]

但郭解这样的人却是集权政府最怕的，担心他成为政权的竞争者。汉武帝在建立他的陵墓茂陵时，从郭解的家乡迁移了一批富户到茂陵居住，郭解由于家贫，并不在被移民之列，但有人故意将他列入了名单。随后，一批官员纷纷请愿说他不应该被迁移。事情传到了汉武帝耳中，武帝大怒，坚持把他迁移了。因为这件事情，有人替郭解打抱不平，查出将郭解列入名单的是本地人杨季主当官的儿子，于是将其儿子和杨季主先后杀死。另外，在一次打抱不平的事件中，另一个郭解的支持者把骂郭解的一个人杀掉了。

但这两件事郭解并不知情，也绝不赞成人们互相残杀。

当官府将郭解抓住后，经过调查，仍然没有办法判他的刑，因为他不知情。

眼看郭解就要再次被释放，这时公孙弘充分了解皇帝对于游侠的恐惧，他出面的时候到了。公孙弘拿出《春秋公羊传》一查，表示：根据“诛首恶”原则，郭解作为平民百姓却总想做官府的事情，导致人们因为他而杀人。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比知情更加可恶。

郭解最终死于公孙弘刀下。

这两个案子典型地反映了汉代所谓的《春秋》决狱，即根据《春秋》的精神来断案。在公孙弘时代，由于人们只通过《公羊传》了解《春秋》，所谓利用《春秋》精神，就是利用《公羊传》被歪曲的解释来断案。

在《春秋》决狱中，汉代经常使用的原则除了“诛首恶”之外，还有“责知诛率”[32]“原心定罪”[33]等。人们只要知情不报，就与犯罪者同

罪，由于怕人们结社，领头的人必定诛杀。而在断案时也不看结果，而是根据人们的意图定罪，只要意图是恶的，哪怕没有引起后果，也要重判。

公孙弘时代，正是《春秋》决狱兴起的时期，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制造了出来。而他本人的飞黄腾达，也反映了汉代儒教兴起时期的混乱现实。一个毫无实际经验的人凭借一本书当上了丞相，并轻率地行使着权力。

但是，人们心头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答：为什么汉武帝会这么喜欢他，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这就要提到汉武帝时期儒教的兴起，以及公孙弘学习的那本《春秋公羊传》如何成了汉代的“客观真理”。

熬过秦火的儒家

公孙弘当政时期，恰好西汉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原始积累”，已经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西汉前期，以黄老之术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社会的主流思潮，但随着经济发展和老一辈的死去，黄老之术却遭遇了危机。

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支持黄老之术的人死光了。最后一个黄老的支持者是汉文帝的皇后、在汉景帝时期和汉武帝初期主政的窦太后。窦太后经过汉初的混乱，知道社会最需要的是稳定和发展，以及政府放手让民间处理自己的问题。

窦太后死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她死后，武帝开始亲政。汉武帝出生于文景时期的太平盛世，对于汉初的动荡没有任何感受，反而生长在深宫大院之中，对曾祖父刘邦充满了崇敬，并将他神化。在他心目中已经把刘氏当皇帝当作了理所应当。

但是，不管是法家还是黄老之术，都不能在理论上提供刘氏必当皇帝的依据。黄老之术只是告诉他：做到无为就对人民有利，对人民有利

就是好皇帝，好皇帝就不会被赶下台。在它们暗含的条件中，刘氏的皇帝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并且有可能在未来不称职时就被免掉了。

年轻的汉武帝没有曾祖父的军功，也没有祖父的宽容，年纪小小的他当上皇帝更缺乏合法性基础，他需要人们给他编造一套新的理论，将皇帝神化，来证明这个皇帝是注定的，这个要求已经越来越迫切。

当黄老之术无法满足这个要求时，一个在野的流派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在野派别在汉武帝之前已经吸引了无数的公子哥儿注意，他们出身于官宦家庭，沉浸在飞车走马之中，希望能够永远占有众多的社会资源。这些公子哥儿以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为代表[34]，他们分别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和汉景帝皇后王氏的娘家人，只是由于窦太后的压制，暂时无法将黄老之术取而代之。

这个在野的派别，就是儒家。

在叙述儒家在汉朝得势之前，不妨先看看儒家是如何熬过了秦朝的毁灭性打击，在汉初流传下来的。

在非洲，许多部族的历史是靠口口相传而得来的，从部落中选择聪明的小男孩，让他从小开始背诵部族史，到他年纪大了，再把历史传颂给下一代男孩。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历史的数百年记忆。非洲方式在中国早期学术史的传承中也可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战国时期的许多亚流派也是依靠口口相传的。例如，孔子的著作（以及他参与整理的典籍）都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对孔子著作的再解读，也就是他的弟子、再传弟子的著作，则可能只是通过口头流传。前面提到的《春秋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著作，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口授给了弟子公羊高，公羊高则把这个解释当作宝贝背了下来，再在家族内部流传，传了五代，给了公羊寿。公羊寿又把它口头传给了弟子胡毋生，胡毋生这才将《春秋公羊传》变成了文字，脱离了口口相传时代，记在了竹简上。到这时，已经是汉朝了。不过，口口相传

往往会带来不准确的问题，随着每个人的传颂，文本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貌。

除了口口相传的传统之外，对于先秦文化影响最大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在李斯的意见下，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将几乎所有的学术书籍都烧毁了，只留下了几种技术性书籍（医学、占卜、农业），在他看来，研究社会学是没有必要的。[35]

经过焚书之后，儒家的典籍已经彻底零散了。

孔子之前的周代已经有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主要的教学内容包括“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36]，这些技能是一个士大夫日常生活中必须掌握的，如何行礼和奏乐，如何射箭和驾车，以及书法和算数。

表1　孔子之前的周代教育体系——六艺

科　目	内　容
五礼	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
六乐	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五射	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
五御	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六书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九数	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

孔子对于六艺也非常精通，他的弟子们也接受了完整的六艺教育。但到了晚年，孔子根据周代的文字，将经典进行了整理，又形成了另一个体系——“六经”。

从本质上说，“六经”只是“六艺”的一个子集，六艺的内容涵盖了现代教育中德智体三个方面，其中礼、乐对应着德，书、数对应着智，

射、御对应着体。而六经则更加局限在德这一个方面，只专注于将这一方面更加深化。

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中的礼、乐被保留了下来，但内容却加深了，前者只要求掌握一定的生活礼乐规则，而后者要对社会中的礼仪和乐理进行完整的学习与研究。除了礼乐之外，《诗经》和《尚书》都是记载人们言行的书籍，《诗经》记载各地的诗歌，而《尚书》则是古代重要政治文献的结集。《易经》研究世界运行规律，而《春秋》则通过历史来探讨人类社会的规则。

在六经当中，又有难易程度的差别，其中《春秋》是最简单入门的，也是学习最广泛、影响最大的，之后按照乐、礼、诗、书，由易到难，而《易经》则被认为是最难学的。

从六艺变成六经，可以看作儒家形成的标志。六艺是周代留下的教育体系，也是前儒家时期的教育体系。孔子采取了新的课本，加强了理论学习，强化了“礼”的地位，也弱化了读书人的动手能力，将“儒”和武士、匠人区分开来，专门以思想维稳为目的来培养人才。

秦朝是以法家为基础构建的统治体系，对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不感兴趣，将儒家的书籍也和其他家一起烧掉了。由于古人的教材是竹简，昂贵且册数有限，秦始皇又可以下令地方官员，到各地的读书人家去搜缴，经过焚书之后，许多书籍只有少量的残卷躲过了焚书。

到了西汉时期，儒家的六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失。[37]其中关于乐的典籍已经彻底亡佚，不可恢复了，从此以后，六经就变成了人们熟知的五经。

《诗经》由于它的传唱特性，保存得较为完整。在西汉时期，有四个人通过记忆将诗经保存了下来，分别传授和解读。这四人分别是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和赵人毛公，他们分别培养弟子，形成了派系，后人将他们传承的诗经和解释分别称为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诗》四家，他们依据的经文都是孔子的《诗经》，虽然由于流传的关系，在文字上也有些微的区别，但真正不同的

只是他们对经文的翻译和解读。就像现代人分别翻译《诗经》，出了数个版本一样。这些版本有的注重直译，有的注重含义，有的还存在大量的误读，有的更可能只是借《诗经》的题，随意发挥。在汉代，每一个版本都有人追随，并将各自的不同放大开来，形成了门派之争。

《易经》由于用于占卜，秦朝时并没有被焚毁，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易经》也有不少传承人，最著名的是齐地的田氏。

《尚书》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秦火之后，人们以为《尚书》彻底失传了。但后来发现有一个叫作伏胜的鲁国人保存了半部《尚书》。当初秦国官员来搜剿书籍时，伏胜在匆忙之间将一部《尚书》藏在了墙壁内。经过了楚汉战争的混乱，伏胜回到位于济南的家乡，发现房屋已坏，他连忙查看藏书的墙壁，从中清理出二十九篇残卷。后世所使用的就是这部残缺的《尚书》。

至于《礼经》，也损毁得非常严重。西汉时期，一位叫作高堂伯的鲁人传下了一部《士礼》，这可能只是孔子所用教材中最不起眼的部分。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士礼》只是一部流程指南。如果一个厨师要写一份菜谱，他会对每一道菜注明材料的分量、调料以及用火，先放什么，再放什么。《士礼》则记载了各种士人在各种礼仪场合应该做什么，流程应该如何进行。它不做解释，只写流程，现代术语称之为脚本。

但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著作来替代，这部脚本就被人们奉为经典，改名为《仪礼》，也称《礼经》。

在孔子的教学体系中，《春秋》虽然是最简单的，却是学习最广泛的学问之一。但《春秋》所流传的情况也出现了混乱。按照班固的记载，传习《春秋》的一共五家，但只有三家（《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流传了下来。

三家中，以《春秋左氏传》写得最好。剩下的两传如同现代的教书先生，逐字逐句地向读者解释难点、段落大意，或者背后隐藏的义理，

枯燥无趣，只有左氏传像写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由于《春秋》经文写得过于晦涩，在汉代已经需要人讲解才能看懂。《左氏传》采取的讲解方式是：既然经文太简略，讲解时就将经文丰富起来，讲成情文并茂的小故事，读者自然就理解了经文的意思。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却总是相信《春秋》除了是历史之外，实际上隐含了各种各样的人间至理、微言大义，他们不断地琢磨着词句，寻找语言背后的意思，就如同看人先看屁股，结果发挥来发挥去，反而失去了对“真”的把握。

在汉武帝时期，《左氏传》由于流传不广，人们知之甚少，而《谷梁传》也缺乏有力官员的支持，无人问津，只有《春秋公羊传》突然间暴得大名，成为西汉王朝前期最著名的书籍。再加上五经之中，以《春秋》最为基础，最后《公羊传》就代表了人们普遍认知的儒家学问。

那么，为什么《公羊传》如此受重视呢？

从孔丘变公羊

现代人谈到汉初的哲学思想时，常常会举例当时编撰的《礼记》《淮南子》等书，以及贾谊、董仲舒等人，很少会想到《春秋公羊传》，但实际上，《公羊传》才是汉初影响最大的哲学书籍。

说它是哲学书籍，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它只是《春秋》的注释。比如，《春秋》经文记载于鲁隐公元年，第一句就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就会逐字逐句不厌其烦地作解释：“元年”是哪一年？是鲁隐公即位的那一年。“春”是什么？是一年的开始…[38]

但这样一部注释书为什么成了汉代哲学的基础呢？原因在于，这本书的作者相信，孔子编撰的《春秋》中每一个字都隐藏着人世间的道理，所谓“微言大义”。

仍然以开篇第一句话为例，其中有三个字“王正月”，什么是王正月？其实就是正月，也就是鲁隐公元年的十一月（周朝以十一月为正

月）。但是为什么要在正月前面加一个“王”字呢？《公羊传》考证说，这里的“王”指的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文王，“王正月”表示这个正月的规定是周文王当年制定的，之所以要在书的开头提一下周王，是表示虽然《春秋》是以鲁国的视角来记录历史的，但天下只有一个王就是周王，要尊重周朝的“大一统”。[39]

大一统的提出，表现了《公羊传》对集权政治的迷恋，到底这个观念是最初子夏讲给公羊氏的，还是到了汉代由人根据皇帝的喜好攒入的，则无法考证了。

在《公羊传》的最后，也能看出作者的意图。在《春秋》经文已经结束后，《公羊传》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它先总结为什么这部书始于鲁隐公，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认为始于鲁隐公，是因为鲁隐公时期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再往前就不可靠了；结束于鲁哀公，是因为到这时，已经把所有的大道理和规律都说到了，再往下记载只是规律的重复而已。接着总结孔子为什么写这本书，是因为孔子要通过书籍来“拨乱反正”，给后世提供样本。而他写《春秋》，就是为了给后世的皇帝们提供治理样本，学习治国之道。[40]

通过这样的解释，《春秋》就已经不再是一本历史书，而变成了一本包罗了所有政治智慧的政治百科全书。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借历史阐述天下公理的一本圣书，具有如同《圣经》和《古兰经》的地位。

用现在的眼光看，公羊学者们之所以把这本书捧这么高，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别的书，一辈子只能玩味这一本书，自然越玩味越觉得它高明，到最后就将它神化了。

但是，公羊学者的神化不仅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嘲笑，反而有了更多的信徒，就连汉朝的皇帝也需要它。皇帝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所提出的“政治智慧”几乎全部是皇帝最需要的。汉代皇帝最焦急的莫过于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公羊传》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中似乎提供了一条路径，来表明“尊王”的必要性。

在《公羊传》中几个比较著名的观点是：

第一，孔子写《春秋》是为了拥护天子，贯穿了大一统思想，也是在为战国之后的统一做准备。西汉的集权帝国不再被认为是刘邦偶然聚合起来的产物，反而被认为是圣人有计划促进的产物。

第二，《春秋公羊传》提到了历史“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不同的划分。所谓所见，指的是作者亲自经历的时代；所闻，指的是更早的一个时代，作者能够从亲历者口中直接获得材料；所传闻又比所闻更早，是指亲历者又传了几代，最终才汇集到作者手中的材料。

到了董仲舒手中，将“所见”“所闻”“所传闻”分成了具体的几个时代。《春秋》一共记载了十二位国君，其中前五个国君是“所传闻世”，中间四个国君是“所闻世”，后三个国君是“所见世”。[41]到了东汉的何休时期，又把这三世杂以阴阳五行轮回之说，当成是“乱世—升平—太平”三世，对应于所传闻、所闻、所见。[42]

这样，从《公羊传》的含混说法，就变成了有名的三世说，而且越到近来越是太平，这种进化论的思想与大部分人对古代的崇敬不同，实际上是为了给皇帝贴金，却让皇帝更加喜欢《公羊传》。

三世说到东汉才正式形成，但在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口中，已经明显暗示了这样的进化。

第三，由于公羊学者相信书里隐藏着大量的“微言大义”，结果汉代人就把这些微言大义引入了法律系统，成为断案的一部分。比如，在本章开头公孙弘就善于利用《春秋》来断案，但公孙弘所使用的所谓《春秋》，实际上就是《春秋公羊传》。当《公羊传》被引入实用领域之后，它的地位就越发不可动摇了。

就这样，公羊学者们就把《春秋》这样一本历史书，利用阐释的力量，变成了一本无所不包的“圣书”。至于怎么阐释，由于《春秋》过于晦涩，而《公羊传》也不算清晰，留下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不过这个裁量权不属于普通人，只属于皇帝和他的亲信大臣。

实际上，《公羊传》由于经过多年的口头流传，早已经不能代表真正的《春秋》，而是充满了讹误和模糊，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东西：非

孔、非古、非史、非现代。

《公羊传》流行的时间大约在汉景帝时期，景帝时期是一个多种思想交锋的时期。这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仍是窦太后坚持的黄老之术，但大臣中间已经很多人开始成了《公羊传》门人。

汉景帝时期，皇帝就提拔了倾向于儒家的卫绾担任了丞相。到了武帝初期，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更是引入了大批的儒党占据了高位，甚至有人提出让年老的窦太后退居后宫，不再参与政事，引得窦太后大怒，做了最后一次反击，贬斥了他们。

但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随后以《公羊传》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说，借着孔子的外壳，开始为皇帝服务了。

儒教的诞生

《公羊传》之所以成为官方学问，除了它本身理论上赞成大一统，又持政治进化论观点，同时很容易被皇帝扩展用来为自己服务之外，更重要的是几位学习公羊学的大臣极力推广。

当《公羊传》由胡毋生传给公孙弘之时，在赵地，另一位学者董仲舒也不知从什么途径接触到了《公羊传》[43]。公孙弘和董仲舒就成了将《公羊传》引入朝廷的最得力之人。

不过，与公孙弘不同，董仲舒更加重视理论化工作。他敏锐地感觉到，《公羊传》虽然很适合给皇帝寻找合法性，但是《公羊传》的文字里并没有直接说汉代皇帝就是合法的，只是人们根据它的意思引申而来的。要想让汉代皇帝彻底合法化，必须去写一本当代的新书，专门为皇帝服务。而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

简单地说，公孙弘等人借助《公羊传》找到了一条将皇帝合法化的路径，而董仲舒则把这条路走了下去，走到了终点。他要从理论上将皇帝神化，将皇帝与天等同。从此以后，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天。这就是“天人合一”理论。

董仲舒的观点大都记载在他的几篇奏章和一本著作之中，最重要的是那本著作《春秋繁露》。所谓繁露，指的是皇帝冠冕上的珠串，《春秋繁露》，实际上就是“春秋杂谈”的更文艺的说法。

现代人翻看这本书，第一感觉是，这是一本读后感，是董仲舒读完《春秋公羊传》之后的感想和总结。作者一开始是想紧贴着《春秋》去写，像《公羊传》一样注释一遍《春秋》，但写着写着，就慢慢地变成了随意漫谈，东一扫帚西一耙子，零零散散围绕着他自己的“大同社会”谈开，既包括读后感，也有各种礼仪的操作性规定，如同一本杂集，由于缺乏统一主题，只好起个名字叫作《春秋繁露（杂谈）》。

董仲舒的文笔也缺乏同时代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的文采，显得晦涩和干干巴巴的，如果不是它的影响力，这只是一部三流书籍。汉朝之后，这本书的影响力也并不大，甚至在选择经典时，人们也往往不会想到它。但就是这本书，却是汉代人认为的最经典著作，远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上，它代表了儒教的诞生。

所谓儒教，指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招牌建立的宗教式体系。这个体系已经不再如同孔子一样，只对人类社会感兴趣，而是试图解释从宇宙天地，到人体发肤，再到社会政治的一切学问，并试图寻找终极真理，再用这个真理约束住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幸福地生活在真理之中。

在一个宗教体系中，一是要寻找真理，二是要用真理来强迫人们幸福地生活，这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可以把儒教和孔子时期的儒家做一个对比。现代人喜欢把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说成哲学流派，但实际上他们研究的方向各不相同，隶属于不同的学科。

在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中划分了许多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文学、语言、政治、历史等。在中国古代也有许多学科，但是，古人划分学科的方法是和现代不同的。

西汉时期的大学问家刘向[44]将当时比较大的学问分成了十家，分别是儒、墨、道、法、名、农、杂、阴阳、纵横、小说，这就是“诸子十

家”。这所谓十家，其实是十个学科，每一个研究的侧重点都不相同。比如，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研究的是伦理学和历史学，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属于现代的文科范畴，当弟子询问的问题超出了这个范畴，他就不做解答了。最典型的是“未知生，焉知死”[45]“子不语怪力乱神”[46]，对于人死这种接近于自然的现象不去考虑，只是考虑人们活着时候的伦理问题。

老子所代表的道家鼓吹的是哲学，却对具体的社会、自然一概不感兴趣，也不做研究。

墨子代表的墨家研究的是工程技术，同时发展了一定的数学、逻辑学和物理学，他虽然也对社会学感兴趣，但世界观带着浓重的工程师味道，显得有些幼稚，带着社会主义色彩。

管子、韩非子等人更关注的是政治学和法学，对于伦理学、科学一概不感兴趣。

苏秦、张仪代表的纵横家，则是纯粹的外交学。

至于邹衍等阴阳家，则试图构建一套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文学，进而演化成为自然科学。五行家对自然的解释由于基于阴阳五行，现在看来有些荒谬，但在当时却被当作最先进的科学看待。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汉代以前，阴阳和五行并不是一回事，阴阳推崇的是一个二元制的世界，以阴和阳两种元素的相互转化来看待世界，而五行则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相生相克来构造世界。阴阳观念出现得更早，并被吸纳进许多其他流派之中，比如道家、儒家都带有阴阳色彩。但是五行观念的出现却较晚，接受的人也较少。相信阴阳的人不见得就相信五行，直到汉代儒教建立后，才把阴阳、五行杂糅到一个系统之中了。

这些形形色色的学科综合起来，就是战国时期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就像现代人必须通过所有学科，才能全面了解世界一样。

孔子的学问以伦理和历史为主，强调“礼”，他为了说明为什么人类社会需要礼，又引入了另两个概念——“义”和“仁”，认为之所以人类需要严格的礼仪制度，是因为这符合“义”，要想达到“义”，就必须遵守这些礼仪制度，而遵守礼仪的行为就是“仁”。

到了孟子时期，将孔子的儒家做了发展，他更强调“仁”，将仁慈作为社会构建的基础，但他的“仁”已经和孔子的“仁”不一样了。孟子的“仁”可以认为是“善良”，君王只有仁慈，才能成为圣君；人民只有仁慈，才能达到世界和谐。孟子对于“礼”已经不大关注，只强调“仁”，导致他的儒家已经有了道家的味道。

孟子和孔子一样，也不曾过多关注社会之外的事务，自然科学、天文地理、苍天鬼神之类，都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既不评价，也尽量不参与讨论。

到了董仲舒创立儒教时期，他已经不满足于儒家只研究社会伦理这个狭窄的领域了，而是要突破出去，研究从天文、自然，到伦理、社会的一切问题。他的目标是写一本汉代的百科全书，或者说，将诸子十家的学问都包含在一本书里，形成一本系统的汉代科学著作，同时也是社会著作，从这本书既可以理解社会发展的秘密，也可以理解科学发展的情况。

写这样的书，虽然最后还叫“儒”，但其实已经是杂家了。董仲舒除了学习《公羊传》之外，还学习了阴阳学、算术学、道家学说等诸多研究成果，将其杂凑起来，形成了这套解释世界的万能理论。

这套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天人合一”“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7]简单说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和社会规律、人体规律都是统一的，只要研究透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对比着理解社会规律了。

那么，董仲舒眼中的自然规律是什么样的呢？如同犹太人一样，他构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这个大神叫作“天”，它就是自然规律的化身，主宰着天上的世界，也主宰着人间。而相对于天，地上也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就是天子、皇帝，只是地上的皇帝必须听命于天。

地上该由谁当皇帝，不是由人说了算的，而是由天说了算。表面上看，刘邦是一个流氓，依靠武力夺取了天下，但实际上，刘邦是天所选择的，是客观规律选择的。不仅刘邦的汉朝是天的选择，就连以前的诸位天子和朝代也是天的选择。当一个朝代的天子变得不称职时，天就会另选其他人来代替他，完成改朝换代。

通过这样的天人理论，董仲舒就把汉代的皇帝神化了，从此以后，谁反对皇帝，谁就是逆天而行。

在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之后，接下来，必须讨论天的规律问题。既然天上和人间的规律是一样的，那么要想吃透人体和社会的规律，就必须首先研究天的规律。

董仲舒所谓天的规律，主要是从道家、阴阳家手中借来的，主要内容包括了“阴阳”和“五行”，正是他将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了。

所谓阴阳，老子认为阴阳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两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可董仲舒却机械地认为阴阳就是善恶，所有阳的就是善的、有德的、好的、促进生长的，阴的则相反，他的阴阳与波斯拜火教的善恶区分很相像。而天之所以变化，就是阴阳之间斗争的结果。[48]

至于五行，则类似于希腊哲学将世间元素分成“水火土气”四种，而中国将其分成“金木水火土”五种，认为所有的物质都可以最终归结为这五类之一。五行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同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49]

通过阴阳变化和五行相生相克，就生成了全世界的一切。在人类无法利用现代仪器更进一步了解世界之前，这种简单的理论的确可以满足一部分人对了解自然的渴望。

接下来，董仲舒更进一步，认为人和社会的规律也要遵循天的规律，并利用简单的算数，将人和社会与自然进行了一定的比附。

比如，人的形体是与天的数字有关的，天有十二个月，但是，一般的植物生产繁荣枯萎都在从春天到秋天的十个月内完成，所以，人也有十月怀胎。[50]人有四肢，每肢三节，对应于四季和十二个月。[51]人的

全身大小关节一共有360个，对应于一年的天数。人身体内有五脏，对应于五行。人的形体骨肉，代表了大地的厚度；人的耳朵和眼睛，象征了日月；人体内部的空壳和经脉，象征着山川谷地。人的德行，对应于天理；人的好恶，对应于天的阴晴；人的喜怒，对应于天的寒暑；人的生命，对应于天的四季。

在这一系列的比附下，就引出了古代医学理论，即利用经脉、五行和阴阳调和，来治疗病人。人只要与天合拍，就可以保持健康。

除了人体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也可以通过研究天的规律来设计。在社会规律中，也有许多利用算术进行的比附。比如，帝王的官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共一百二十人。这是按照三的幂数，一共重复四次而止，三和四，分别代表了一个季度的月数和一年中的四季。[52]

除了天、人、社会是类似的之外，三者也是相通的，也就是所谓的天人互动。通过观察天，就可以得知一个人的情况，也可以得知天对政权是否满意。当地上的君主表现得让天感到不满时，天就会降出灾祸让人明白他的不满，当天子让天感到满意时，天又会降出祥瑞给人间。[53]

所谓皇帝，就是老天爷选来统治民间的，反抗皇帝就是反抗老天爷。但是，老天爷又通过一系列的凶兆向皇帝暗示：如果你做得不好，我就把你换掉。而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暴政，导致了老天爷派遣刘邦下来改朝换代。现在的皇帝虽然是天选的，但也必须注意不要让老天爷不满意。

如何让天感到满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董仲舒终于回到了儒家的范畴之内，认为天最满意的状态，就是按照儒家规矩行事。而什么是儒家规矩？那自然就是他所熟悉的《春秋公羊传》。他认为，《公羊传》就提供了一系列的暗示，表明了什么样的政治是理想政治。[54]

首先，他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从儒家的礼仪，皇帝有皇帝的仪轨，大臣有大臣的待遇，而普通民众也要老老实实听话。如果都各居其位、各司其职，老老实实做事情，整个世界就会和谐统一。

其次，为了表明对老天爷的尊重，每一次按照天意改朝换代之后，都必须进行一系列仪式化的动作，也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表明自己的正统和按照规律行事。[55]

所谓“改正朔”，是与另一个理论“通三统”相对应的。按照当时的理论，夏、商、周三代，每一代选择了不同的月份作为正月，夏朝以一月为正月，商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秦朝改为十月为正月。刘邦继承了秦朝的做法，但汉武帝将正朔又改回了夏朝的一月，完成了一次循环。只是后来各个朝廷并没有继续修改月份，汉朝就成了最后一次修改。

另一个措施是“易服色”，这项措施对应于五行理论，金木水火土（也称为五德）各有自己的色彩，每一个王朝对应于一个“德”，也就是五行之中的一个，在朝服上，必须使用与这一德对应的色彩。黄帝是土德，以黄色为贵。夏代是木德，色尚青；商代是金德，色尚白；周代是火德，色尚赤；秦代是水德，色尚黑。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刘邦建立的汉朝应该又回到土德，但刘邦以继承秦朝为荣，认为自己是水德，色尚黑。到了武帝时期，在儒教的努力下，终于按照相克的说法，把汉朝改为了土德（土克水），色尚黄。

这里顺便把以后的易服色情况做个总的梳理：到了王莽时期，由于王莽是禅让得来天下，没有使用暴力，所以当时的大才子刘歆认为，只有暴力的改朝换代，才使用“五行相克”的理论来决定下一代到底是哪一德，而禅让是非暴力的，应该使用“五行相生”的理论。王莽认为自己是舜的后代，属于土德，根据五行相生，火生土，所以王莽把汉朝的土德又剥夺了，重新封它为火德，色尚赤。

东汉时期，刘秀承认了汉是火德，色尚赤。到了曹魏，由于又是和平禅让，所以曹魏又成了土德，色尚黄。而刘备认为自己是汉家正统，选择了火德和红色。孙权认为要想克曹魏的土德，必须选择木德（木克土）和青色。

晋朝是金德和白色。南朝宋是水德和黑色，南朝齐和梁是木德和青色，南朝陈是火德和红色。北周是木德和青色，隋朝是火德和红色。唐

朝是土德和黄色。

五代梁是金德和白色，五代唐是土德和黄色，五代晋是金德和白色，五代汉是水德和黑色，五代周是木德和青色。

宋朝是火德和红色。辽代是水德和黑色。金代是土德和黄色。明朝是火德和红色。

可见，易服色理论直到明代还有市场。

除了改正朔，易服色，另一个措施是“制礼乐”。这项措施与儒家的礼乐制度更息息相关，意味着通过礼乐对各个阶层都进行标准化。这也包括了设立国家祭祀的场所明堂和太庙，以及一系列类似于宗教的典礼，如封禅泰山等。

董仲舒通过构建这一套无所不包的理论，完全满足了皇帝的统治需要。我们可以把他当作中国古代的康德，利用当时的认知水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地人生观，用以束缚住人们的认知。

但是，要推广这一套理论，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做到。理论构建完毕，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依靠政权的力量强行推行这套理论，禁止了其他的学说。[56]

我们可以把秦皇和汉武做一个比较，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是愚民，让他们接触不到学问，而汉武帝在焚书的基础之上，更加了一层用统一的理论来洗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政权为后盾的洗脑运动。

董仲舒的提议果然是有效果的，虽然我们总是说人类的好奇心会冲破一切羁绊，但历史却告诉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没有那么大，一代人的洗脑过后，可以维持两千年。

汉武帝之后，所有的人都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叫作天，也相信皇帝就是天子。人们变得更加迷信，看见电闪雷鸣首先想到的不是自

然现象，而是老天爷发怒了，出现了灾荒也认为是老天爷的作为。当这一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的时候，汉代的洗脑达到了目标。

到了汉代后期，洗脑已经过于成功了，以至于一旦发生了天灾，皇帝就要开始寻找替罪羊，否则就无法向国人交代。

公元前7年（绥和二年），前几年出现了一系列的灾荒，到了这年，又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被认为不吉利。观星的官员乘机上奏要想破解上天的谴责，必须牺牲一位大臣来承担上天的谴责。汉成帝立即命令丞相翟方进自杀谢罪。[57]

翟方进是当时的名儒，与天灾毫无关系，但人们根据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却认为必须由他来承担罪过，才能缓解老天爷的愤怒。他自杀后，汉成帝一副无辜的样子，亲自吊唁，以高规格将其埋葬，当时的人们没有认为皇帝的做法有何不妥。

到这时，所谓的“儒”早已经脱离了孔子时期的本意。孔子的儒是一种哲学流派，这个学派强调“礼”，但也强调“仁”，他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包容一切的宇宙理论，只是试图解决人世间社会里遇到的问题。

但到了董仲舒时期，由于其理论无所不包的特征，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控制，加上一系列的仪式和组织，就已经宗教化了。宗教和哲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宗教带有很强的强迫性和洗脑特征，并可以用来对人的生活进行强制性规范，哲学却做不到。

当董仲舒写出《春秋繁露》，并鼓动汉武帝罢黜百家时，这一刻，就是儒教诞生的时刻。

文化集权的第一次高峰

在董仲舒编撰他的《春秋繁露》时，在距离长安遥远的淮南地区（首都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还有另一个人在组织编纂当时的学术结集。[58]这就是淮南王刘安编纂的《淮南子》。

西汉最初的淮南王是汉初三将之一的英布，英布被诛杀后，由刘氏

宗亲接替了淮南王位，之后传给了后代刘安。

刘安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对于道家学说有着深深的尊崇，却又不满足于只掌握道家的学问。他广招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以将当时学问一网打尽的姿态，写出了一部中国历史上

《淮南子》的思想以道家为主，涵盖了儒、法、墨、阴阳、纵横，呈现了西汉时期最佳的综合性著作。

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样，这本书也是从茫茫宇宙到人世间，试图对全世界的学问进行总结，体现了当时人的野心。但是，书中却并没有构造一个必须遵守的宗教体系，而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自然性，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主动，而是采纳消极被动的姿态，就可以发展的。[59]比如，在人民面前，皇帝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时候无为反而比有为更加能够促进社会的自然发展，甚至认为，皇帝的扰民行为，是社会动乱的原因。

从文字的优美和简练上，以及它的文学价值，董仲舒的书连与《淮南子》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南子》是汉代道家思想以及学术综合的代表性著作。西汉哲学经过了汉初数十年的沉淀，最终汇集成了这本书。

但遗憾的是，《淮南子》出现时，汉代的学术自由已经接近尾声，由于道家无法解决皇帝的身份危机，反而继续制造危机，质疑皇帝的权威，导致这本汉代哲学的高峰著作必然遭受夭折的命运。

刘安本人由于汉武帝的削藩策略，为了自保，参与了谋反，最终事败身死。他的死亡也表明汉代最后一批通才退出了历史。与刘安一样不受待见的还有《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的思想以道家为主，主张无为，重视经济和商业，成了当时的异数。[60]他的思想可以留在伟大的《史记》当中，却无法影响皇帝的政策和当时的哲学氛围。

汉武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集权的第一次高峰。在他之前，汉代的历任皇帝都小心翼翼，避免对社会造成新矛盾而导致帝制的垮台。到了汉武帝时期，帝制已经稳固，不会在短期内被推翻，同时，武帝从小

被灌输观念他是真命天子。

在武帝雄心勃勃的行动中，他不仅树立更加强调皇帝作用、更加有为的儒教作为指导思想，还在军事上展开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严助和朱买臣对南越和闽粤的战争，这次战争招收了许多东瓯地方（浙江）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这一带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南贵州开辟道路，让巴蜀的老百姓疲惫。彭吾出兵朝鲜，让现在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随后，武帝发起了和匈奴的一系列战争，这次战争终于让西汉前期积累的巨大财政盈余耗空了。

为了筹集财政收入，武帝又加强了经济控制，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盐业和冶铁业，武帝垄断了这些部门，宣布只能国营，使得西汉经济的高峰也结束了。另外，武帝加强了金融控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民间金融成为过去。[61]

为了完成这些社会控制措施，武帝不得不借助大量的酷吏帮他干活，从此破坏了汉代的官僚规则。[62]

最终的结果，道家提倡的小政府思想到武帝时期，就在中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儒教提倡的有为政府、大政府，认定民间无法自由发展，只有在皇帝的管理下，才能获得发展。儒教的大政府思想控制了中国两千年，人们普遍认为人是需要管理的，而管理权属于官家。中国人在做事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政府担任救助者的角色，但实际上，它所担任的角色有时会变成掠夺者。这一点，可以视为董仲舒宗教化最成功的所在。

第三章
汉代圈养的知识圈（公元前87—公元23年）

儒教对中国政治的改造主要在于教育：一方面，皇帝设立了五经博士，将其他学派排斥在外；另一方面，设立了只传授儒教知识的官方教育机构。垄断教育的结果是，人们从此只能接触到儒教学说，其他政治哲学衰亡。

汉武帝树立儒教为正统思想，是为了利用它来维持统治。但武帝之后，作为最高官员的丞相职位被儒教知识分子垄断，就已经不是皇帝控制儒教，而是儒教裹挟皇帝了。

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学会了用儒经（特别是《春秋公羊传》）来指导法律进行审判，对法律的侵蚀，让儒教更成了社会的基础。

随着儒教对教育系统的控制，学术门阀出现了。大量的儒生只会背诵老师的只言片语，不同学派之间为了争夺对政权的控制，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汉代政治进入了一个书呆子横行的时期。

儒教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还反映在对谶纬、灾异、祥瑞的态度上。汉代的人们相信天人合一，认为老天爷会通过一定的灾异或者祥瑞来彰显自己的意志，或者通过书籍上一些模棱两可的文字来预示未来，汉代成了荒诞不经预言的大本营。

翻看历史时，汉昭帝和宣帝时期的几个书呆子让人哑然失笑。这些书呆子身居高位，却缺乏实务经验，满脑子经书和圣人，闹出了不少笑话。

第一位书呆子是汉昭帝时期的学者眭弘[63]，这人年轻时是个浪荡子弟，斗鸡走马，后来学了一点《春秋公羊传》，因为通晓一经，当上了议郎，后来调升符节令。

眭弘的一生不足道也，他之所以被历史记住，只是因为那一件让他丢了性命的事情。眭弘生活于汉昭帝时期，此时人们已经普遍相信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以及《公羊传》里的“微言大义”。从此之后，老天爷对人类突然间开始关心起来，各地都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灾异。在泰山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灾异现象。

时值公元前78年（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在泰山和莱芜山南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声响，如同数千人在吵嚷，当地人看到有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高一丈五尺，有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底部有三块石头为足。石头立起后，有数千只白乌鸦围绕在石头旁。在昌邑还有一段枯社木复活了。在长安的上林苑中，也有一棵大柳树出现了异常，本来这棵柳树已经断掉卧倒在地上枯萎了，这一天突然间自己立了起来，复活了。柳树上还有虫子吃树叶，形成了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这些复杂的灾异现象已经很难考证。所谓大石头自立，可能是陨石，也可能是地震导致的山上落石；至于树木死而复生，可能是所谓的树木“假死”现象。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当时人们相信灾异说，将一般现象夸大了，以讹传讹造成的。

当这些事件传到眭弘耳中，由于他学过最先进的学问，立刻意识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他根据“春秋精神”分析道：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类，是下民的象征（根据董仲舒的理论，阴阳之中，阴代表了恶、坏、下等）；泰山是岱宗中最高的山，每次改朝换代，皇帝都要到这里来祭祀（同样出自董仲舒的祭祀理论）；大石头自立，死了的柳树复活，这不是人力所为，而是改朝换代的迹象，表明有个下等人要做天子了。

眭弘立刻找当内官的朋友把意见上报皇帝，他的意见是：先师董仲舒认为，如果圣人要降生，现在的皇帝就必须让位。皇帝应当寻找到这个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来顺应天命。

由于当时汉昭帝还小，这封信送到了当时掌权的大将军霍光手中，霍光一听，竟然有人正经八百要终结汉家天下，大怒之下，将上书的眭弘和他的朋友全部问斩。

掉书袋的眭弘丢掉了性命，却因为这件事被记入了史册，可谓啼笑

皆非。

眭弘并不是孤例。武帝之后的西汉，是中国书呆子最多最猖獗的时期，他们手里拿一本《春秋公羊传》，再配备一两本谶纬书籍，就可以四处寻找灾异和祥瑞了，不管出了什么事，都会先在书里查找一番，看有没有现成的解释，如果没有现成的，就透过字面寻找蛛丝马迹，自信地做出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

他们一辈子的运道就来自书中那些晦涩的语言，吃饭穿衣、娶妻生子都靠它，并对书本深信不疑，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比眭弘稍后的是大臣盖宽饶。[64]在宣帝时期，由于儒术过盛，人人高谈阔论却没有人做实务，宣帝试图加入一定的法家色彩来治理国家。由于外朝的人们都抠书本看“天人合一”去了，没有人干活儿，宣帝只好选择宦官来负责事务。

宣帝的做法受到了盖宽饶的阻挠，他明着批宣帝重用宦官，暗里怨恨宣帝采取法治而不是儒治。他说：当今圣道已经被废弛，儒术不行，竟然以宦官这样的刑余之人当周公和召公使用，以法律来代替《诗》《书》治理国家，这怎么能行！他引用儒教经典《韩氏易传》说：五帝时候是官天下，三王（夏商周）时代才变成了家天下。家天下是传给子孙的，官天下是传给贤人的。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迭，功成之后就退居幕后，没有那把刷子，就不要身居高位，陛下你应该学习五帝，赶快寻找贤人让位给他。

一听说盖宽饶让自己退位让贤，宣帝立刻大怒，盖宽饶不得不自杀，才了结了这场争论。

汉武帝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当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给政权提供合法性，但独尊儒术之后培养出来的大量书呆子却成了精，他们对于实际的政治运作一无所知，以公孙弘为榜样一门心思往上爬。爬到高位后，他们的无知和迂腐却腐蚀起政权基础来了。

西汉中后期，也是官方大批圈养知识分子的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以五经为武装，“天人合一”“天降灾异”是他们的主要依据，一个个以为窥

得了天机，占据了西汉后期的政治舞台。他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

由于不准研究儒教之外的其他学问，善于斗争的他们在儒教内部分立了许多派别，构成了多家学术门阀。门阀的弟子们互相诋毁，又各自吹捧，还共同防止自己的官方资源被局外人所抢夺。西汉中后期，不管是经济，还是学术、科学，都无法再取得进步，就和这些学术门阀控制了官员的晋升渠道有关。

今天的某些学术机构中门阀并立，不做真实研究，却发明各种理论。他们没有想到，在西汉时代，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并导致了一代帝国的死气沉沉，走入歧途。

博士、太学和门阀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刚刚担任丞相的公孙弘上奏一本，要求建立官方的教学机构——太学[65]。

公孙弘认为，为了提高人们的教化，惩善扬恶，必须将读书与人们的官运结合起来，有意识去培养民间聪明的孩子读书，等他们学成之后，再提拔到官僚岗位之中，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的提议开创了中国中央集权帝国的教育先河，也将儒教成功地灌输进社会的骨髓之中。在汉初，官员大都是跟随皇帝打天下的人，以及功臣的后代，还有一部分来自皇帝和诸侯们的宠臣。这时，政府与民间缺乏必要的孔道，无法让民间的优秀分子进入政府。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政府的圈子化和固化，与民间分离，引起巨大的民怨。公孙弘提议开办官方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解决阶层固化的好办法。但是，他的方法同时也是控制社会思维的好方法，只要控制了学者们的教学内容，就可以控制读书人的思想。当读书人当官之后，会将他所学的东西再灌输给全社会。而年轻人知道学什么才能当官后，对其他的内容也不再感兴趣了，整个社会也就进入了思想格式化的状态。

在公孙弘之前，汉武帝初期，就已经有人不断地提醒汉武帝，只有

把儒教人才和政权打通，才能完成用儒教武装所有人的头脑。

汉武帝刚当上皇帝那一年，偏向儒家的丞相卫绾就向皇帝介绍了大批的儒家知识分子。当时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还没有死，找个错把卫绾杀掉了。[66]

但儒教势力正在逐渐掌控局势。窦太后死前一年的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儒家的支持者就已经在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

博士并非汉朝才有，秦朝就曾经设立了数十个博士。所谓博士，就是掌通古今，为皇帝提出参考意见的人才，相当于现代的智囊。他们职位不高，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这个职位是专门为读书人而设的。汉初则把这个职位保留了下来。在秦朝和汉初，博士对一切哲学学派开放，并没有门户之见。

汉文帝和景帝时期，《书经》《春秋》和《诗经》已经有了博士点。不过，当时人们看重的并不是这些书籍是儒家经典，而是把它们当作历史和文学作品。《书经》和《春秋》中保留了不少历史资料，在缺乏书籍的汉初，皇帝自然要对它们表现出尊重，而《诗经》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历史资料，其中的每一首诗歌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古人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到了汉武帝时期，《仪礼》和《易经》也设立了博士点，到此刻，儒家的五经都已经有了博士点。董仲舒创立儒教时期，劝说汉武帝将其他学派的博士点废除，就形成了五经博士统揽天下的局面。

所谓五经博士，并不是一个人要通晓五本经典，而是每个人只要能背诵一本就足够了。即便能够通晓五经，也不会受到欢迎，这等于抢了别家博士的饭碗，让人难堪。这一点很像现代大学里科目的设置，数学教授精通数学，哪怕他同时还精通物理学，却会受到物理学界的排斥，认为他是多管闲事。五经博士每一家都认为自己的学问是独一无二的，别家不可比拟，不愿意让别人来掺和。

汉武帝时期，一共开了七个博士点，《春秋》《易经》《礼经》《尚书》都有一个博士点，而《诗经》有三个博士点。《诗经》之所以

有三个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汉初，有四个人躲过了秦朝的迫害，他们精通《诗经》，分别是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和赵人毛公，他们各自对《诗经》的解释有所不同，又固执己见。他们各自将学问传给了弟子，弟子再传弟子，就有了所谓的门派之争，形成了四个门派：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

汉代设立《诗经》博士时，《诗经》的几个门派互相争吵，选不出统一的掌门人，最后就立了三家，分别是鲁诗、齐诗和韩诗。每一家的博士只在门派内部流传，外人不得置喙，而在学习时，学生只能死记硬背老师的知识，不得质疑，不得发挥，以免学生受到其他门派观点的影响而被策反。

这就是汉代儒学门派之争的起点，各个门派互不相让，互相攻击，并将这种传统一直保留到了现代。

门派之争的加剧，在公孙弘提议建立太学之时变得激化了。公孙弘建立太学的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儒教知识分子，并将儒教变成社会思维的根基。

他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每年各个地方官都要去自己的辖区查找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看有没有适合读书的，一旦发现了，就上报给郡守，再由郡守上报给中央负责礼仪的官员太常，太常则负责考察首都附近的青年，与地方上的汇集在一起，从中选择五十人送入太学。这五十人将分配给五经博士做弟子。在做五经弟子期间，这些青年都是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一年后经过考核，合格的人就可以授予中央低级小官，并逐渐递升，不合格的人就淘汰回家。另外，官员的递升也要考查文化水平，有文化的人才能高升。

通过这种方式，经过几十年后，那些非儒家老官僚死光了，汉朝廷就会被儒教子弟们占据，他们担负着保卫汉皇帝的重任。

不出公孙弘所料，他的提议迅速起到了效果。他的成功反映在汉代太学的扩张上。汉武帝之后，太学里的学生名额大大增加，昭帝时增加到百人，宣帝末期又增加到两百人。汉元帝因为喜好儒教，对于地方上能够通晓一本经书的，都不用服劳役，一时间，人人都争着读书。几年

后，由于减免成本太大，只好下令停止这个政策。但是，将太学的规模扩大到千人。在各个郡国也设置了五经卒史，俸禄是一百石，负责传播儒教知识。汉成帝末年，太学规模扩大到了三千人。但这个规模只维持了一年多，就因为养不起，缩回到了一千人。即便按照一千人计算，比起汉武帝时代太学也已经膨胀了二十倍。[67]

这些太学学生有很大一部分都会成为官员，所以，汉朝的朝廷里就充斥着能够背诵儒家著作的人才，整个社会被儒教化了。

几十年后，随便拉出一个汉朝人询问宇宙的真理是什么，他都会给你讲述“宇宙的真理是天人合一，皇帝是老天爷的儿子，宇宙是阴阳五行的变化”，这一切就和现代人谈论牛顿、爱因斯坦一样自然。

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牛顿、爱因斯坦之所以是真理的代表，不是他们思考和理解的结果，而是被灌输的结果。汉代人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灌输，当思维已经天人合一化的时候，就再也逃不出这个框架了。《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已经成了西汉的《原理》和《相对论》。

随着太学机构的扩大以及中央官僚儒教化，五经博士们的门派之争也日益激烈化。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背后都对应着巨大的利益。一旦一个门派的掌门人成了五经博士，就由政府来帮助他招学生、养学生，并让他的学生当官，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学术门阀。

现在，某些高校的教师不是把自己当教书匠，而是认为自己是官员。他们的弟子早已经成了高官，而自己也是政府的顾问，手中的资源随时可以变现，那所谓的学术早已经不再有实际意义，只是一种工具。当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想到了当年的西汉。

在《汉书》中，列举了五经博士内部各个门阀的变迁情况。[68]

首先是《易经》中，一个博士点变成了三个博士点。

汉代的《易经》最早出自鲁国的商瞿（字子木），他直接受教于孔

子，接下来的传承人是鲁国的桥庇（字子庸）、江东（吴地）的馯臂（字子弓）、燕国的周丑（字子家）、东武的孙虞（字子乘）、齐国的田何（字子装）。

田何时期，就到了秦朝焚书坑儒之时。但《易经》是筮卜之书，没有被禁。汉代时，田何从齐国迁徙到了关中地区的杜陵，他的学问继续传授，徒子徒孙有东武的王同（字子中），雒阳的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加上淄川的杨何（字叔元）、广川的孟但、鲁地的周霸、莒地的衡胡、临淄的主父偃。

其中杨何、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都担任过高官。于是，田何的徒子徒孙们遍布了汉代朝廷。

丁宽的学孙中又有三个人，叫梁丘贺、施雠、孟喜，这三个人又各立门派，将《易经》分裂成三派。到了宣帝时期，这三派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宣帝只好将三派分开，各立了一个博士点，于是，如同《诗经》立了三个博士点一样，《易经》也获得了三个点。

另外，《易经》三个点内部也是门派林立，从施《易》中又分裂出了张（禹）《易》和彭（宣）《易》，从孟《易》中又分裂出了翟（牧）《易》、白（光）《易》和京（房）《易》，从梁丘《易》中又分裂出了士孙（张）《易》、邓（彭祖）《易》、衡（咸）《易》。由于皇帝没有再新设易经学博士点，这些小的门派只好共用博士点。

《易》博士一分为三，《书》博士也分裂了。

汉代的《尚书》出自于伏胜，伏胜曾经是秦朝博士，后来在焚书时偷藏了一卷《尚书》，等发掘出来后只剩下残卷。伏胜有两个著名弟子：济南的张生和欧阳生。

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欧阳生成了《尚书》博士。

《尚书》学派的分裂，源自张生的徒子徒孙，张生有个弟子叫夏侯都尉，夏侯都尉选择了家族的侄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给了夏侯胜，夏侯胜又传给了哥哥的儿子夏侯建。其中夏侯胜和夏侯建各自写了《尚书》的专著，形成了两派，被称为大小夏侯，和欧阳生的一派，形成了

《尚书》的三派。[69]到最后，汉宣帝再次当起了和泥的角色，为《尚书》设立了三个博士点，分别由欧阳、大小夏侯三派的传承人担任博士。

除了《诗》《易》《书》各有三个博士点之外，《春秋》也又立了一个新的博士点，原本只有《公羊传》一家，现在加了一家《谷梁传》，这个博士点在后面介绍。

没有增加博士点的，只有《礼经》。这样，到汉宣帝时期，五经博士已经有十二个博士点，而学生人数增加到了二百人，一套以儒教为中心的教学和传承体系建立了起来。

任何一个博士点的增加，都意味着残酷的斗争，但在表面上，所有的人又必须维持着儒教要求的君子风度。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始，到太学体系的完成，汉代思想就迅速被以《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为代表的集权理论所禁锢，又由十二家学阀形成了组织上的垄断。到这时，西汉的政治神学就接近完成了。

政治化的儒教

汉武帝时期，一位叫作张汤的酷吏突然宣布要用儒家经典来进行审判。[70]

由于皇帝加强了集权，文景时期的宽松政治突然间收紧，大臣和人民都不适应皇帝的扩权，武帝只好招纳了大批的酷吏来为自己所用，绕过了正规的官僚系统，建立了围绕皇帝的委员会，依靠酷吏的严苛将法律推行下去。

张汤小时候，因为老鼠偷了家里的肉，就用烟熏土掘，将老鼠抓住，然后写了控诉老鼠的法律文书，再把老鼠四肢绑住进行审判，最后将老鼠活剥。他的父亲当时官至长安丞，看到儿子的天赋，立刻决定要他学习法律，从此张汤步步高升，终于成了皇帝的得力干将。

张汤最有名的决狱之一，是所谓的“腹诽之罪”[71]，这件事发生在汉

武帝的货币改革时期。由于皇帝打仗把钱花过了，财政上缺钱，张汤乘机劝说汉武帝杀几头白鹿，把白鹿皮割成块当作货币使用，号称“皮币”。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可以充当四十万钱，也就是四十斤黄金。使用皮币的主要是大臣和诸侯，因为他们有钱，汉武帝就强制性要求他们在贡献祭祀用的玉璧时，必须用皮币垫着。另外，还有银锡合金做成块，号称“白选”，每一个白选最大的面额是三千钱，这一种主要供民间使用。

这两种货币由于价值很低，面值却很高，等于是抢劫。不管是诸侯大臣，还是民间，都拒绝使用，还造了很多假货。于是张汤乘机推行严刑酷法，因为货币问题被杀的就是几十万人。

张汤的货币改革引起了群臣的不满，其中就有掌管帝国财政的大司农颜异。颜异向皇帝表示：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几千钱，而现在规定玉璧必须垫上皮币，这个皮币的价值却值四十万钱，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武帝听了不高兴，但这个事情属于朝议，不好定罪。他就派张汤寻找颜异其他的毛病。这时，有人和颜异在私下里相处时，说皇帝政策的坏话，颜异没有表态，只是翻了翻嘴唇。这件事被张汤知道了，立刻上奏，说颜异对政策不满，却不公开告诉皇帝，反而在私下里表达不满。颜异并没有说话，怎么算表达不满呢？张汤认为，颜异虽然没有说话，但心里实际上是赞同朋友的，肚子里瞎嘀咕，是“腹诽之罪”。颜异最终被杀。

以腹诽就可以定罪的张汤本来是“无所谓东西”，只看皇帝意图的酷吏，却突然之间转向要用儒家经典做审判，不得不让人大跌眼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公孙弘的飞黄腾达让张汤看到了皇帝对儒家的推崇，他也想沾一下光。他召集了一批学习《尚书》和《春秋公羊传》的学者，把他们编入到司法系统，使之成为司法的生力军。

这些学者对于法律本来一窍不通，只懂得两本经书。在审判时，不是依据法律，而是首先求助于《春秋》，从中寻找微言大义来进行判

决。

汉朝的法律原本沿袭自秦朝，属于商鞅制定的世俗法。秦朝法律虽然苛刻，却是以法典和判例的形式来决定人们是否有罪的。汉高祖灭秦入关后，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法条，专门制定了约法三章来规范社会秩序，三章非常简洁，只要求“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随着汉朝的建立，社会需要更复杂的法律来规范，汉朝皇帝们再次引入了秦法，但减轻了秦法的严苛程度，保留了世俗化和法典化的倾向。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世俗法终于遭到了破坏。首先产生破坏的是吏治的败坏和审判的随心所欲。其次，则是公孙弘和张汤等人引入的宗法制度。

与死板的世俗法司法条文比起来，《春秋》充满了模糊性，这就给了皇帝巨大的便利。张汤在决狱时，常常会请示皇帝的意思，根据皇帝的喜好再查找经书，制定新的判例。这就使得《春秋》变成了与《圣经》一样的东西，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了。

当经书作为法律使用时，一个宗教正式形成，并深深地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春秋》被引入作为审判的依据后，接下来被引入的是其他经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礼记》。在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制度，国家是以宗族的方式来构建，而人们的关系也是靠宗族来调节，秦朝为了废除周代的宗法制度，专门引入了世俗法典，将中国社会拉出了宗教化氛围。到了武帝之后，随着儒教的回归和五经的法律化，秦朝创造的成果被毁于一旦，中国也重新回到了两千年的宗法统治之中。

除了酷吏用儒教对法律进行改造，将客观的司法条款变成主观的春秋决狱之外，汉代的官僚体系也在逐渐地儒教化。武帝在中央开办了太学，而各地也纷纷开办地方教育系统。中央级官员大都由太学系统输入，而地方的吏员则由地方教育系统提供。

到了昭帝和宣帝时期，儒教的知识分子终于控制了中央政府，完成了儒教的政教合一体系。

以丞相这个群体为例，西汉丞相从萧何到平晏，一共四十五人[72]，前期的丞相大都出自汉初的功臣群体。除了黄老时期的之外，从汉武帝任命卫绾开始，一共还有三十三人担任丞相。这三十三人鲜明地分为两类，汉武帝统治时期到汉昭帝初期，从卫绾到杨敞的十五位丞相中，在汉武帝早期有几位儒家人士，比如卫绾、窦婴、田蚡，以及对开展集权教育最得力的公孙弘之外，其余的丞相都不是根据他的学问而升到丞相之位的，史书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学派倾向。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本人对于儒教却是一种利用关系，并没有崇敬之心，所以在选择官员时，最主要的条件是听话，而不是学问。在这时，太学系统提供的官员大都还处于低级，没有晋升到高级官僚体系。至于卫绾，他更多的是倾向于儒家，却并不见得有太高的修养。窦婴和田蚡都是因为外戚而升职的，与是不是儒家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公孙弘是一个例外，而他本人却心术颇多，在皇帝面前不说二话，但偷偷地为儒教找补贴。

公孙弘之后的丞相们都很听话，也没有什么政绩，权力从丞相向皇帝以及皇帝的亲信大司马集中。

然而，汉武帝的儒家教育系统在他死后却硕果累累，到了汉宣帝时期，儒教学问几乎已经成了升官的必要条件。汉武帝之前，官员们选择面较窄，大都是功臣、外戚和官二代，但武帝之后，官员们依靠教育体系得以升职，这说明汉代的太学体系是管用的。但同时也说明，儒教终于垄断了汉代人们的头脑，中国不可能跳出儒教圈了。

杨敞的下一任是蔡义，他是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汉代儒教教育培养的丞相。从此以后的十八个丞相中，王商是通过外戚系统而升职，薛宣和朱博是在法律系统内升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要么是儒教教育体系的产物，要么因为法律系统而升职，但最后还得重新学习儒教理论，镀镀金好获得更高的职位。在这些丞相中，有的还是当时举世闻名的大儒，比如韦贤、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等人。

丞相职位被儒教把持，意味着汉代彻底转变成为一个儒教国家。

表2　汉丞相统计[73]

姓　　名	担任丞相的时间	是否儒学
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刘舍	前206—前143年	不是
卫绾	前143—前140年	倾向
窦婴	前140—前139年	是
许昌	前139—前135年	不明
田蚡	前135—前130年	是
薛泽	前130—前124年	不明
公孙弘	前124—前121年	是
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田千秋、王䜣、杨敞	前121—前74年	不明
蔡义	前74—前71年	是
韦贤	前71—前69年	大儒
魏相、丙吉、黄霸、于定国、韦玄成	前69—前36年	是
匡衡	前36—前29年	大儒

姓　　名	担任丞相的时间	是否儒学
王商	前29—前25年	不明
张禹	前25—前20年	大儒
薛宣	前20—前15年	不明
翟方进	前15—前7年	大儒
孔光	前7—前5年， 前2—前1年	大儒
朱博	前5—前5年	不明
平当、王嘉	前5—前2年	是
马宫、平晏	前1—8年	是

谶纬的世界

人们很难理解，踢开终结西汉政权第一步的，竟然是一只白野鸡（白雉）。

公元元年（元始元年），突然从四川的蛮夷处送来了一只白野鸡，这只野鸡先送到了益州的地方官手上，再由益州的地方官千里迢迢送到长安，当野鸡送到王莽手中，他立刻将野鸡呈给了太后，要求太后将白野鸡送到太庙中祭祀。[74]

白野鸡的出现让大臣们也兴奋不已，他们上奏请求册封王莽，把他提高到萧何和霍光这两位汉代最突出的名臣的地位上。太后王政君（也是王莽的姑妈）收到了请求，为了撇清关系，连忙请群臣澄清：你们要求任命王莽，是出自真心，还是因为王莽是太后的亲戚？

群臣听了王太后的话，诚惶诚恐，为了更加表示忠心，立刻再次加码，将王莽比作和周公齐名的人，并乘机要求给王莽加封号安汉公。[75]

这一次，王太后终于同意了。

然而王莽拒绝给自己加封，他表示功劳是大家的，不是自己的，要求给他的几个党羽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等人加封，认为他们才够资格。

甄邯听说王莽推荐自己，立刻跳出来推举王莽。

王莽再次推辞。太后前后三次试图召见王莽，给他加封，都被他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前往宫廷。最后，群臣没有办法了，只好请求太后先给王莽推荐的其他人加封，再授予王莽安汉公。

其他四人都得到加封之后，王莽却继续推辞。此时，群臣再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又提出请求，请太后考虑百官和庶民的普遍愿望，不要让他们失望。这时，太后勉为其难地发出了诏书，加封王莽为安汉公。

但即便这样，事情还没有结束。王莽仍然诚惶诚恐，虽然接受了诏书和封号，却推辞了封地和世袭权，表示等百姓都富足了再接受。

双方的推辞又持续了一轮，直到太后又答应给汉代的诸侯功臣的子孙都加赏，王莽才接受了安汉公的职位。安汉公就是王莽替代汉朝的第一步。

王莽的推辞当然只是一种表演而已。但现代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只白色的野鸡能够产生如此大的效果，让汉代的群臣跟着疯狂表演呢？

这要从汉代的符命说起。汉代是中国历代集权王朝中最相信鬼神和天命的朝代。由于董仲舒相信天人合一，并把它作为儒教的核心观点，对于老天爷的信仰就成了汉代人民共同的心声。

汉代的老天爷不仅指定了谁做皇帝，还不时地降出祥瑞来告诉人民，他喜欢现在的政策，或者降出灾异，表明他憎恶现在的社会。汉代

人看见闪电，除了按照正常的反应，认识到要下雨之外，还会想到：一、皇帝也许做错了什么事，二、地方官或许做错了什么事，三、自己也许做错了什么事。至于选择哪一样，就要根据个人的心理了。

什么是祥瑞？在汉代也是有规定的。东汉时期大学问家班固就列举了一系列的动物祥瑞[76]：当皇帝（大臣，或者社会）的品德影响了鸟兽界时，就会出现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祥瑞，或者看到九尾狐，也可能会看到白野鸡、白鹿和其他白鸟。

正因为祥瑞在汉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王莽才会偷偷地让人们进献白野鸡。而群臣也心领神会，他们请求册封王莽，就是因为：在周成王时期，也有白野鸡出现，那时候的白野鸡是因为周公，从这进行推断，王莽是和周公一样伟大的人物，也必将能够稳定汉朝的江山。[77]

在儒教的神化体系中，老天爷与人世沟通的方式主要有表示好意的“祥瑞”，表示惩罚的“灾异”，表示命运的“符命”，表示预言的“谶纬”。

王莽除了利用祥瑞之外，还善于利用符命，比如，公元5年（元始五年），有人在挖井的时候得到一块白石头，上圆下方，上面写着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就是典型的符命。这次事件导致了王莽代汉的第二步：他当上了“摄皇帝”，也就是帮助年幼的孺子婴行使皇帝的职责。

到了公元8年，老天爷再次降下了一大堆的祥瑞和符命。齐郡有人梦见老天爷的使者告诉他：摄皇帝就要成真皇帝了，不信，等你醒了，会发现亭子里多了一口新井。当他醒了，果然看见了一口深达百尺的新井（估计是出现了地表塌陷）。而在巴郡和扶风，则分别出现了石牛和带字的石头，送到长安，王莽去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铜符和帛画的图，上面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

一个叫哀章的人则发现了一个铜匮，里面装了两本书，一本是“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本是“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里面说王莽应该当皇帝。根据董仲舒创造的五行相替理论，汉代被认为是火德，所以

称为“赤帝”，而和平取代火德是土德，所以是“黄帝”。

在如此大规模的符命轰炸下，王莽终于没有经受住考验，不得不当上了皇帝，改朝换代建立了短命的新朝。

其实，现代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谓的符命和谶纬都是伪造的，所谓灾异和祥瑞，都只不过是人们不了解自然现象，将这些现象神学化了而已。但是在汉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真地对待这些东西，并正经八百地把它们当作正规的学问来接受，甚至继续发明一些类似的理论，将之变得更加复杂。

而这些现象本身，都是董仲舒将阴阳术加入儒家学问产生的必然结果。汉代公认的大儒们，如董仲舒、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谷永等人，几乎都深深地相信天人感应，总结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说法加入儒教之中。

另外，从汉武帝开始，人们也突然发现，当官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即便位高权重，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比如在汉代后期的丞相中，有许多人就是被皇帝胁迫着自杀而死。至于其他小官，更是难保自己的命运。

到最后，为了避免自己倒霉，大臣们也纷纷制造谶纬来规劝皇帝。如果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暴政，必然会被皇帝杀死，但如果借助天灾，向皇帝暗示，由于人间政治出了问题，引起了老天爷的愤怒，就有可能让皇帝在不迁怒于大臣的情况下收敛一点。

汉武帝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编造儒教神话逼迫其他人相信，但到了他的子孙，就已经掉入儒教神话中无法自拔了。董仲舒的理论框架碰到了汉代的现实政治，共同创造了汉代越来越变味的学术氛围。

在这种变味的学术之下，许多书籍被伪造了出来，每本书都说是周公、孔子写的，但内容却荒诞不经，充满了预言、暗示和神化，这些书籍被称为谶纬书籍。

人们伪造这些书，是因为流传下来的儒家典籍实在太少，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必须伪造一些书来为自己的理论服务。

这些书中有的把孔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帝王，认为孔子是黑帝精裔，他的出现就是为了给几百年的汉朝制定规矩的。[78]还有的把刘邦神化成脚踏星空、神游万仞的仙人。[79]再借助孔子、刘邦等人，写自己的理论。而所谓理论，大都是附会之言，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通过自然现象推演人间。

这一类的书很像现代的野史八卦，还充满了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但在汉代却被认为是正经八百的著作，甚至用来指导政治。

谶纬的出现，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在战国时期，由于政治并没有给学术研究设定范围，人们思维大开发，结果产生了百花齐放的诸子百家。可是，一旦政府给学术规定了范围，告诉人们只能在某一个领域内思考，不得越界，那么，必然产生学术的退化。当人们不能思考更广泛的问题时，就会利用他的思维，在有限的范围内胡编乱造，汉代的谶纬就是这样胡编乱造的结果。

在思想束缚下和谶纬横行之下，汉武帝之后的汉代学术一直停滞不前，除了语言铺张却言之无物的汉赋之外，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汉代圈养的知识圈虽然在皇帝的饲养下活得很潇洒，却并非没有“对手”。实际上，在汉儒们围绕着原地画圈时，少数人已经发现了超越的途径，从而威胁到了这些既得利益者的饭碗。

这次超越，源于新发现的一批经文，这些经文的发现似乎证明，汉初以来人们一直沿用，并且深信不疑的五经里，竟然有着许多错误。这个发现迟早会将汉代的学术体系炸飞，将人们从盲从之中解救出来…

第四章
谁是真经？（公元前53—公元36年）

随着儒教快乐地享受着政权的乐趣，儒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也大打出手。皇帝只能在各门派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希望寻找到一种统一的中和的哲学。

在最受皇帝重视的《春秋》学问上，除了《公羊传》这一种学说，另一派学者发现了另一种学说，称为《谷梁传》。为了调和两种学说的矛盾，汉宣帝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试图将两种学说统一起来。

汉宣帝调和儒教纷争的另一个做法是，增加博士点的数量，让大家利益均沾，五经博士点的数量也从七个增加到了十二个。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被称为今文经集团）冲击最大的是古文经集团。由于秦朝焚书坑儒，许多儒家著作都已经不完整，或者有了错别字，统治哲学就建立在这些带错的经文之上。随着一批战国时期写成的文献（它们的错误更少，被称为古文经）被从民间发掘出来，一批研究古文经的学者向既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却被学术门阀排斥在统治之外。

西汉末期，古文经学者为了分享政权，投靠王莽，并帮助王莽设计了复古改革，却由于王莽的倒台，成了新皇帝打压的对象。

在古文经与今文经、汉光武帝与篡位者的大战中，各方都纷纷祭起谶纬的大旗，利用各种伪造的经文来宣誓自己的正统地位，汉代哲学继续向着迷信的腐臭深渊滑去。

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汉宣帝在石渠阁主持了一次哲学大辩论[80]。辩论并不是在两方之间举行，而是以混战的形式出现。参与辩论的都是朝廷的王公大臣或者饱学之士，而辩论的问题在现代人看

来却显得微不足道。不过，这些细碎的问题在当时却是事关王朝命运的大事。

比如，当时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兄弟数人中，哥哥没有儿子，而其余兄弟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是否应该过继给哥哥？[81]

参与这项辩论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礼记》博士戴圣，他认为，按照《礼记》的大义，只要兄弟几人中有一个儿子，作为长子的大宗就不能绝嗣，所以，生了儿子的那个弟弟应该把儿子过继给哥哥，自己忍受没有儿子的悲伤。

另一个叫作通汉的官员则认为，首先不能让亲生父亲没有后代，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儿子，就要留给自己，不能过继给哥哥。

汉宣帝最终采纳了戴圣的提议，决定宁肯让小宗悲伤，不能让大宗绝嗣。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石渠阁会议上讨论的问题还包括：

上朝的服装是什么颜色？

祭祀祖先的时候，要使用一个活人做“靶子”（当时称为尸），让祖先的灵魂依附到这个活人上，这个“靶子”是可以用外姓人，还是必须使用自己的族人？

父亲死了，在服丧期内，母亲突然改嫁，做儿子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喜服还是丧服？

如果一个人死了，长时间没有下葬，那些替他服丧的人到底要多久才能把丧服脱掉？

汉宣帝耐心地听着大臣们激烈的辩论，最后都一一定了调子，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在基督教和佛教历史上，都有过一些激烈的教义辩论。比如，佛教在佛祖释迦牟尼死后，进行过几次大的结集。所谓结集，就是各个弟子进行辩论，争论哪些话是佛祖说过的，哪些教义是佛祖定下的，哪些是

弟子们伪造的，哪些经文是伪经。经过争论之后，将佛祖的言行结成集子，作为最早的佛经。

在基督教历史上，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也有许多次由罗马皇帝主持的会议。这些会议之所以要举行，是因为人们对基督教的教义和经文有了不同的解释，在皇帝的主持下，要确定哪些教义是信经，哪些是伪经。被定为伪经的教派就成了邪教，从此只能远离中心舞台，到世界的边角地区皇权管不到的地方去传播。

而在中国，也有几次类似的论战活动，其中最早的一次，就是汉宣帝在公元前53年和前51年主持的石渠阁系列会议。这系列会议使得中国特有的儒教与基督教、佛教一样，也出现了教义上的大纷争，各方为了垄断政权的教育资源大打出手。

然而，与西方和印度的宗教纷争不同，儒教内部的宗教纷争虽然也造成了暂时的分裂，却并没有像东正教、天主教、阿里乌斯、聂斯托利等教派一样，直到现在仍然处于分裂当中，甚至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反而在东汉时期重归一统，你好我好大家好，共同瓜分政权利益。

那么，中国的宗教纷争是如何产生，又如何解决的呢？

论道石渠阁

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儒教学者们逐渐垄断了皇家的上层政权，他们愉快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乐趣。然而，这种乐趣在武帝死后就逐渐被一种焦虑所代替。

这种焦虑来自博士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随着越来越多的弟子对经书逐字地揣摩，他们对于经书精神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当经文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时，不同的解读可能会造成不同的裁决。

仍然以前面提到的“独子是否要过继给哥哥”这个例子来看，礼学博士们以《礼记》为基础可以得出需要过继的结论，而公羊博士们以《春秋》为基础，则认为不需要过继。到底是遵循《礼记》，还是遵循《春

秋》的教导？两派打起了嘴皮官司，只能靠皇帝强行作规定。

双方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下，并非因为具体的问题有多重要，而是想争夺对于法律的阐释权，都想当法学权威。而真正的世俗法精神却早已被抛弃了。

五经博士对于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就连每一经的学科内部也争执不断，每一句经文的解读都可能不同。特别是以“微言大义”著称的《春秋公羊传》，由于《春秋》是最重要的“法律指导书”，而《公羊传》又总是相信《春秋》里的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无数的哑谜，需要人不停地揣摩。每一个公羊学家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了微言大义的精髓，而其余的人都只不过是皮毛。

当被圈养的学者们为了争夺每一块肉而吵得一塌糊涂时，到底应该怎样才能确立唯一的权威？这个问题让帝国的学术圈陷入了分裂。

除了内部之外，还有来自博士点外部的焦虑。所谓外部，不是指墨家、道家、法家，而是儒教内部其他没有被列入博士点的分支带来的压力。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经的另一个传——《谷梁传》。

《谷梁传》与《公羊传》一样，属于《春秋》三传之一，在最初时也是口头流传。人们传说它的源头也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这一点与《公羊传》一样。很可能《公羊传》和《谷梁传》最初是《春秋》的同一种解释，但是，子夏将他的解释传给不同的弟子时，就产生了不同方向的扭曲。

子夏的弟子公羊高和他的家族位居齐地，这个家族喜欢强调“微言大义”，抠着每一个字看它背后的意义，流传到汉初，从口头落实到竹简，就形成了《公羊传》。

与此同时，子夏的另一个弟子谷梁赤并不在意每一个字背后的意义，只是想弄懂《春秋》都说了什么事儿，他的方向形成了另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流传到汉初，就形成了《谷梁传》。

现代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写过一本书《阐释与过度阐释》，其中提到，人们对于任何一本书首先想弄懂它的意思，这

个“弄懂书的本意”的过程就是“阐释”。可是，有的人却另辟蹊径，总是想解读原书没有的意思，甚至以这本书为幌子来发展自己的观点，这就成了“过度阐释”。但在现实中，往往这种过度阐释受到人们追捧，被认为是有学问的表现，而实事求是的阐释反而被看不起。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是阐释的最好例子，作者左丘明以丰富的史实让春秋从一本看不懂的书变成了能看懂的书。而《谷梁传》位于中间，谷梁赤的学术功底比左丘明差了很多，他的书也含含混混。《公羊传》则是过度阐释的最佳范例，作者学术功底同样不高，却随意地将《春秋》解读为自己的人生观。

但在西汉，三传受到的待遇也恰好符合了艾柯的说法，过度阐释的《公羊传》是最受追捧的，而实事求是的《左传》则除了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再重视。

且不说《左传》的情况，我们先把《公羊传》和《谷梁传》比较一番。《公羊传》大都在齐地流传，而《谷梁传》则主要在鲁地流传。齐地的学问喜欢搞危言耸听，而鲁地的学问则比较迂腐平实。这种区别在两个传中也有所体会，从表面上看，公羊、谷梁对于经文解释中，大部分都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对照。但是，与《公羊传》动不动就自我发挥不同，《谷梁传》讲究贴着地皮，以经文的本义解释经文。《谷梁传》也很重视对于大义的弘扬，不过《公羊传》弘扬的大义总是与“大一统”“通三统”等宏大主题相关，而《谷梁传》所说的大义则更具现在“仁义”“礼仪”等的传统儒家修养上。

汉武帝时期需要人们接受汉家正统的观念，对于所谓的仁义却并不看重。加上《谷梁传》当时的传人瑕丘江公是个不会说话的人，与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相比显得笨拙无比，被汉武帝抛弃，公羊学从此成为显学。《春秋》的博士点也授予了公羊传人，公羊学的达官贵人层出不穷。而《谷梁传》却备受冷落，无人理睬[82]。

但是，瑕丘江公虽然因为木讷被冷落，他却成功地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那就是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刘据最初学习《公羊传》，但随后转向了《谷梁传》，认为谷梁的平实与朴素更优。[83]但随后，太子刘据因为“巫蛊之祸”受到了奸臣江充的陷害，被迫起兵身死，瑕丘江公就更

受冷落了。

在公羊学者们欢呼垄断了《春秋》的阐释权时，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太子刘据虽然身死，却留下了一个孙子在民间。到了汉武帝死后，立小儿子刘弗陵为汉昭帝，昭帝死后无子，权臣霍光几经周折，最终确立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后改名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84]

汉宣帝继位后，听说祖父刘据喜欢《谷梁传》，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谷梁传》的传人，谷梁的春天到来了。[85]

汉宣帝之所以扶持《谷梁传》，还有另外的原因。当他继位时，汉代的江山已经彻底稳固了，随着儒教控制了帝国的思想，已经没有人再质疑汉代的正统性，当年的小流氓刘邦早已经成了人们思想中理所当然的天子，他的子孙们也成了上天的选择。

到这时，《公羊传》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公羊传》虽然强调大一统，却又加入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强调灾异、谶纬，甚至可以被人们用来反对朝廷。比如，后来的王莽就利用了《公羊传》和董仲舒思想中强调王朝更迭、天命转移的思想，完成了改朝换代。

反而是笨拙的《谷梁传》由于不随意发挥，只强调仁义、忠诚、礼仪，更有利于皇帝对社会的控制。汉宣帝已经不再需要《公羊传》所代表的齐学的诡异，而更需要《谷梁传》所代表的鲁学的平实。

正是在《谷梁传》的冲击下，以及内部观点越来越分裂，以五经博士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充满了焦虑。如何摆平不同意见，将他们同化掉？如果无法同化的话，又该如何让新势力分一杯羹，同时又将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汉宣帝时代学术界的新课题就成了事关重大的利益分配问题。汉代的学者们从来不考虑学术成就，而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幸运的是，汉宣帝时期，西汉政权还有足够的活力进行调整，容纳一部分新的势力，而石渠阁会议，就是这样的尝试。

这里也可以看出东西方的不同。西方基督教的历次会议都是以分裂和打击为目标的，皇帝组织会议，就是为了树立一个统一的思想，而把

另外的都打成异端，从思想甚至肉体上进行消灭。

而中国的会议并不是为了消灭一种思想，皇帝知道，《公羊传》已经成了一种理论基础，无法完全废除，他追求的是在《公羊传》中加入《谷梁传》的成分，进行调和后，让两者都成为政权的基础。至于《谷梁传》和《公羊传》中不一样的地方，则由皇帝进行裁决，两家都服从皇帝的意见，形成另一次理论统一。

而两派的学者群也没有誓死捍卫理论的决心，他们把自己当成是皇帝的臣民，随时做好服从皇帝裁决的准备。

公元前53年（甘露元年），汉宣帝召集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调和公羊学说和谷梁学说之间的区别，参加者一共有公羊学者五人、谷梁学者五人，还有以太子太傅萧望之为代表的五经名儒十一人。形式是公羊学者和谷梁学者对他们有分歧的三十余处理论进行辩论，而萧望之等人则评判双方的对错。

由于《公羊传》学派一直在朝，学者们更乐于瓜分利益，而对经义研究不够，反而是谷梁学者们忍辱负重、厚积薄发，这次辩论下来，裁判们大都认为《谷梁传》学派的意见比《公羊传》学派更靠谱，从而使得《谷梁传》学派获得了极大的名声。[86]

但汉宣帝的意图并非是扶持谷梁学说的同时打倒公羊学说，而是在保留公羊学说的同时，让谷梁学说也获得一定的地位。两年后，汉宣帝决定设立《谷梁传》博士点。之前，《春秋》博士只设立公羊学一个博士点，此后，双方各自设立博士，开展学术竞争，并瓜分政权利益。

谷梁学说加入到官方学术之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由于双方的理论有差异，而同时五经之间的观点也有差异，皇帝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差异问题，于是汉宣帝时期成了学术会议最频繁的时期。

汉宣帝本人是一个严肃、兢兢业业的君主，一生考虑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怎么维持汉朝的统治。在他的任上，任何能够保持汉江山的理论都是要吸取的。皇帝并不喜欢公羊学，因为里面充满了大话和套话，但他仍然利用公羊学理论，不断地强调在他任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祥

瑞，从天降甘露，到出现凤凰、黄龙，[87]他的年号也改来改去，元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充满了祥瑞色彩。

在不舍弃老理论的同时，如何与新理论调和？两年后，皇帝召集大臣和学者再次在石渠阁开会，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调和五经当中的分歧。

这次会议形成了一系列的文件，这些文件分别对五经进行了解读和规定，统一了各家的分歧，形成了由皇家主持的正统的哲学体系。

除了统一教义之外，汉宣帝还在组织上尽量向各个派别的文人开放。在汉武帝时期，五经博士一共只有七个博士点，其中《诗经》有三个，其余各只有一个。汉宣帝将《易经》《尚书》都一分为三，各立了三个博士点，《春秋》除了原来的公羊学一家外，又立了谷梁学一家，只有《礼记》还是只有一个博士点。这样，汉宣帝时期的五经博士就有了十二家。

通过扩充五经博士数目，宣帝造就了一个皆大欢喜的格局。由于宣帝时期的经济形势不错，官僚阶层一直处于扩张之中，学术扩军产生了双赢格局，每一家都感到满意。这时的西汉学术机构就如同现在的某些高校，学府并不以学术研究而骄傲，反而以出了多少官僚，获得了多少资源而著称，所有的老师几乎同时都是占有政府资源的商人，成了巨富。

然而，这已经是西汉时期的最后一次皆大欢喜。由于学术与官僚挂上了钩，当民间经济开始收缩，养不起这么多官的时候，学阀内部的争斗就会立刻显现。

与汉宣帝想的一劳永逸解决宗教纷争不同，石渠阁会议还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小的宗教统一大会。根据《汉书》记载，会议后形成了一系列的文件，来用作思想格式化的教材，这些文件包括：《尚书议奏》四十二篇、《礼经议奏》三十八篇、《春秋议奏》三十九篇、《论语议奏》十八篇、《五经杂议》十八篇[88]。但可惜的是，这些书只是在汉代有人看，汉代之后就迅速失传了，只有《礼经议奏》中几个条款保留了下来，成为人们理解皇帝宗教统一大会的蓝本。

它们之所以失传，是因为从学术上来看，这些书籍都毫无价值。西汉时期的博士们由于过于听话，几乎没有任何学术造诣，他们自以为曾经叱咤风云，但汉代还没有结束，就已经被新的学者们抛弃了。皇帝的话在他死前显得无比重要，但放在历史之中，汉宣帝本人也只是茫茫时间之轴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黑点而已，谁还在乎他当年调停学术的努力？

西汉时期的皇家博士和学术之所以迅速过时，还在于又从外部传来了惊人的消息。他们的学术要遭受一次考古学的巨大冲击：根据西汉时期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市面上流传的六经课本都是假的，而孔子时期教学用的真课本正在被"考古学家"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他们把新发现的经文称为"古文经"，而将学阀们用的"假课本"叫作"今文经"。

汉代进入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纷争时期。

发现古文经

秦朝的焚书坑儒几乎彻底毁灭了诸子文化，到了汉代进入和平之后，虽然找到了五经的一部分版本，却早已经不完整了，并且由于传播的关系，充满了错误。当汉武帝把五经列入了学官，这些错误也一并被接受了下来。

汉代官方所用的版本中，《易经》《诗经》争议较小、本子较全，而其余的都只是残卷。由于当时找不到更好的版本，这些带着错误与偏见的本子就逐渐被树立成了万世不易的标准著作。

放在现在，一本书经过流传出现讹误是正常现象，但在汉代，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学者们对五经的文本进行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深信每一个字都包含了宇宙的绝对真理。欧洲原教旨主义者对《圣经》虔诚无比，认为《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流传下来的，不可更动，汉代的学者们对于五经的态度，就和这些欧洲人是一样的。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使用的版本有错误，会被他们当作无稽之谈予以指责。

如果没有人知道这些错误，那么也无所谓。历史如同在和他们开玩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又找到了一批残存的更早的五经版本。这些版本是战国时期的原文，字都是几百年前写下的，当人们把这些本子与流传的本子做个比较，就发现了流传版本中的错误。

这些逐渐被发掘出来的经典是用秦朝之前的古文字写成的。在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除了地域不统一之外，就连文字也是不同的。大致说来，秦国和楚国有各自的文字系统，而山东五国的文字更加接近于另一个系统。直到秦始皇时期，才统一了文字。

汉朝采取了秦朝统一之后的隶书，官方承认的经典都是隶书写成，被称为今文经；而新发掘的战国文献由山东五国的古籀文写成，被称为古文经。

最早的古文经是《左传》。到了汉宣帝时期，《春秋》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两部注释都列入学官，成了官僚们进阶的工具，这两部注释被称为今文经。而当时的人们对《左传》这本书却几乎不提。实际上，在《公羊传》和《谷梁传》流传时期，《左传》已经出现了。

最早发现《左传》的是汉初的北平侯张苍，张苍曾经担任过秦朝的柱下御史，是一个史官[89]，也正因为这样，他可能在秦朝的秘府中见过《左传》。他将书献给了皇帝，但没有引起重视，被藏于秘府之中，只有少数人阅读过这本书[90]。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在写《史记》时需要博览群书，就曾经参考过这本书。在著名的人物中，贾谊、张敞、张禹、萧望之、翟方进等人也学习过《左传》，但是，与《公羊传》和《谷梁传》比起来，《左传》的影响小得多。直到汉末，刘歆才从萧望之等人处再次发掘出《左传》，并在秘府里捧起这部沾满了尘土的著作。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左传》要比《公羊传》和《谷梁传》有价值得多。《公羊传》对《春秋》进行不准确的讲解和发挥，《谷梁传》更注重对字词和句子意思进行注释，而《左传》却是对《春秋》中记载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和叙述。《春秋》写得极为简略难懂，而《左传》却文情并茂，将历史说得栩栩如生。甚至有人认为，从文采和丰富性上来讲，孔子和左丘明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除了《左传》之外，还有大量的古文经书从孔子的宅邸被找到。汉武帝末年，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为了给自己修宫殿，要拆除孔子宅邸的部分房子。在打碎一堵墙时，突然从墙壁里出现了许多书简，通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发现这是一批用古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91]经过释读，整理出《古文尚书经》《礼古经》《春秋古经》《论语》《孝经》等著作。[92]

另一批书由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集，包括了《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著作。[93]

如此众多的古文书籍被发现后，人们有了对照和比较的机会。通过比较发现，已经被官方神化的文字实际上遗失严重，还有不少讹误。

以《尚书》为例，行世的今文尚书是通过伏胜流传下来的，包括二十九篇文字，但从孔府发现的文字却有四十六篇。

如果仅仅是缺少篇数，还可以认为是流传过程中的损耗，而更麻烦的是，今文《尚书》中的文字与古文《尚书》已经有了不同。按照刘向的统计，今文《尚书》中有脱简的情况，竹简少一根，就掉二十几个字。至于抄写和背诵过程中的错误则更多，文字差异一共有七百多字。[94]

如果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也无所谓，只要承认了就可。但许多博士已经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错误的文字之上，做了过多的阐释，不好改变了。

今古文经差别更大的是《礼》。高堂生传下来的《士礼》（即《仪礼》，当时又称为《礼经》）残缺严重，只剩下十七篇。从孔子宅中所得的《礼古经》却有五十六篇，包括了今文经的十七篇在内。[95]而这十七篇的文字差异也很大。

古文经和今文经之所以有这些差异，是因为今文经是流传的，特别是早期依靠背诵和记忆，更容易出错。当古文经面世时，如果今文经博士们承认这些差异，迅速改正，那么不失为一种最明智的做法。

但现实却是：由于处于庙堂之高，博士们已经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当这些古文经被发掘出来时，他们根本没有理睬，继续按照原来的版本开课授业。汉代对于文字的神化，也让他们无法承认经文有错误。

在圈养的博士们不肯承认错误时，一批来自政权边缘的学者却注意到了古文经，开始学习古文经。

结果，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研究者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官方的博士们都靠今文经继续找饭吃，而草莽的学者们在学习古文经的同时，又带着偏激的情绪讽刺那些官方博士不学无术，拿错误的东西欺骗皇帝。

这种态度的不同又造成了学术风格的不同。官方学者研究学问是为了给统治者寻找合法的理由，他们把经文根据皇帝的需要进行肆意解释。而草莽学者由于看不起他们，提出了另外的观点。

古文经的学者认为[96]：所谓五经，并没有充满微言大义，所谓大一统、天人合一都是穿凿附会上去的。孔子编纂的五经，只不过是留下了一份来自古代的文献集，便于人们了解古代、研究古代。这就将五经的地位从与天相连的神秘天书，变成了普通的文献资料。

双方对于孔子的态度也有着巨大的差异。由于董仲舒在今文经中加入了较多的神学内容，学者们普遍把孔子神化了，认为他是不在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的“素王”，是个大圣人。六经的所有文本也都是由孔子完成的，他的作品寄托了他的所有思想。古文经学却认为孔子是个人，是个学者，是个文化传承者。所谓六经，也并不是孔子的作品，而是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由孔子用作了教材而已。

今文经学由于受《春秋公羊传》影响最大，认为六经中最大的学问是《春秋》，其次是《易》《乐》《礼》《书》《诗》。而古文经学则不这么认为，他们对最古老的作品最为尊重，在六经中，最古老的作品是伏羲画八卦的《周易》。其次是《尚书》，《尚书》中的许多篇章都是夏商周时期流传的文献，《尚书·尧典》一章就被认为是三代之前的，是尧舜禅让的证据。然后是《诗经》，《诗经》中最早的《商颂》被认为出自商代。《礼》《乐》被认为是周公所制，也就是西周早期的。至于《春秋》，则是以鲁国视角写的东周时期的历史，被认为是最靠后，

也最不重要的作品。

到底是今文经学的《诗》《书》《礼》《易》《乐》《春秋》（按照重要程度升序排列），还是古文经学的《易》《书》《诗》《礼》《乐》《春秋》（按照重要程度降序排列），两家也都争论不已。

在许多具体的研究上，双方也持不同的态度，比如，双方都把周代的封建制度和官制当作理想范本，但是，对古代封建制度的内容却看法不一。

今文经学认为，古代封地分为五服，每一服五百里。[97]分封的爵位分成三等，第一等是公爵和侯爵，封地方圆一百里；第二等是伯爵，封地方圆七十里；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封地方圆五十里。王直接统治的地方（王畿）也可以分封给他国。作为天子要巡行天下，五年一次。作为天子的官员，有三公（司徒、司马、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共一百二十人。这些官员是选举产生的，不是世袭的。

古文经学则认为，周代封地分为九服，每一服五百里，再加上王畿的一千里，一共一万里。[98]分封的爵位分成五等，第一等是公爵，封地方圆五百里；第二等是侯爵，封地方圆四百里；第三等是伯爵，封地方圆三百里；第四等是子爵，封地方圆二百里；第五等是男爵，封地方圆一百里。王畿不能分封给他国。天子巡行十二年一次。作为天子的官员，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再加上从属于六卿的大夫、士、庶人，一共一万二千人。这些官员是世袭的，不是选举产生的。

在经济政策[99]上，双方的看法也不一致，今文经学比较认同土地私有化原则，虽然也认同周代的井田制，但基本上把它看成是税收模式，也就是天子从农户手中取十分之一的税收，只不过有的地方以种公田的形式代替，有的地方收实物。另外，除了耕地之外，还有许多山地和池塘等，今文经学也认为应该归属私人，而天子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物产作为税收。

古文经学则更加“公有制”，强调井田制的实质是公田，由天子根据

距离首都的远近，征收不同的税收，同时，山地和池塘都是公有的，不允许私人开采利用。

由于古文经学在考古方面做的工作更足，研究也更贴近客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古文经。古文经学的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开始不满足于汉代的学术现状。在现有的框架下，不管古文经如何正确，朝廷的选官体系却由太学和博士们把持，而所有的博士点都是今文经学的重镇。妒忌、嘲弄、不甘心，立刻在古文经学中扩散开来。今文经学出于防御的目的，为了保卫既得利益，也表现出了敌意，双方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

更致命的是，汉宣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皇帝权威的加强，皇帝仍然可以通过开会的形式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让新兴的学派加入到利益集团之中，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到了宣帝之后，随着汉代政治的板结以及社会经济的僵化，皇帝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分饼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叫刘歆的人开始尝试着请皇帝主持公道，允许古文经学参与政治。但是，他能成功吗？

打不破的围城

汉哀帝时期，奉车光禄大夫刘歆做了一次努力，想调和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矛盾，解决西汉政府的统治哲学问题。

在西汉后期，如果说还有真正的学者的话，那么非刘向、刘歆父子莫属。他们的祖先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弟楚元王刘交。与刘邦的不学无术相比，刘交却是个诗书胚子，汉代最早的一批儒学图书就是由他发掘的，他任命了几位《诗经》学者当他的智囊，在汉初混乱的年代起到了保卫读书种子的作用。[100]

刘向生活在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这时的西汉帝国已经在走下坡路，政治逐渐僵化，权臣控制朝政，整个社会政治中充斥着一种无力感。他饱读诗书，是一个五经全才，同时又涉猎诸子，可谓当时最博学之人。中国第一份藏书文献《汉书·艺文志》，就是以刘向、刘歆父子整

理的藏书目录为底本。除了整理图书之外，他还做了许多编纂工作，比如现在流传的《战国策》，以及《说苑》《新序》《列女传》等，也都是他编撰的。

刘向虽然涉猎诸子，却是个典型的今文经学家，他相信所谓的天地灾变，曾经写出了《洪范五行传论》[101]，用灾异的眼光来解读政治，总结了历代书籍上记载的自然灾难，与政治作比较，利用数学和逻辑学，进行归纳，企图得到社会政治与自然天象的互动关系。

刘向时代也是权臣当道的时代，当时，外戚的许氏和史氏在位弄权，而朝内又有太监弘恭、石显把持。刘向数次警告汉元帝：最近灾难频发，就是权臣当道的明证。然而，这样的说法并没有给刘向带来好运，反而三番五次带去灾祸[102]。

作为刘向的儿子，刘歆悲观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前代人传下来的今文经学已经无力解释现实状况，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都无法说明现实为什么这么无奈。而那些在台上的大儒除了个人利益以外，已经不在乎所谓的政治和学术。刘歆对于今文经学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痴迷，反而由于父亲的藏书，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古文经学。

刘歆最感兴趣的是《左传》，他最初在汉代的秘藏中找到了《左传》，大受影响，正好当朝宰相翟方进对《左传》颇有研究，刘歆拜在他的门下，学通了这本书，并把它发扬光大。[103]汉朝的人只在乎《春秋》中所传的大义，并不《春秋》当作一本历史书，也不把《左传》当作《春秋》的解读。刘歆却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只不过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们的著作，而《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却是孔子同时代人，相对而言，更了解《春秋》，比《公羊传》和《谷梁传》这种二手资料更加可靠。

除了《左传》之外，他还推崇古文经中的《诗经毛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认为这些著作更接近于原貌，比起今文经更加可靠。

他从这些书籍中总结出了一套更加复古的政治理念，认为汉代从官制到政策都已经偏离了古代的方向[104]，而如果想恢复盛世，必须走复

古的道路。而要走复古的道路，必须首先修改教科书，采用更加可靠的古文经典来代替今文经典，让人们了解正确的价值观。

汉哀帝时，刘歆终于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上书皇帝，要求根据汉宣帝时期的传统，新设立几个博士点，包括《左传》《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由于今文经集团的根深蒂固，刘歆并没有要求废除今文经，而是希望今文经和古文经并置，都作为教科书。他相信依靠竞争和学生自己评价，更加稳重的古文经最终会击败华而不实、只知享乐的今文经。

与刘歆一样，汉哀帝也对当时的社会忧心忡忡，希望做出改变。他试图促成一次新的辩论，让刘歆与今文经的五经博士进行对质，来比较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分歧。

但这次，皇帝的权威不奏效了。今文经博士们纷纷避战，根本不给刘歆同台竞争的机会。刘歆失望之余，写了一封信质问当时掌管文化的太常博士。[105]这封著名的信就成了汉代哲学论战的最高成果之一。在信中，刘歆回顾了古文经与今文经的来源，提出今文经经过这么多年的以讹传讹，实际上全都是汉代的三脚猫理论，古文经才是真正的研究周代制度的著作。他斥责了各个今文经学者抱守残缺，为了利益和门派不肯弘扬大道，让汉代的哲学走入了死胡同，也失去了政治和社会连接的能力，到最后损害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而是整个皇朝。

这封著名的书信不仅没有给刘歆带来辩论的机会，反而让整个的今文经学界（也就是大部分的官僚集团）对他都充满了愤恨。著名的学者、光禄大夫龚胜立刻做出反应，以自责为名宣布辞职，要挟皇帝，同时大司空师丹更是大怒，上奏皇帝要治刘歆的罪。

刘歆为了避祸，不得不离开了中央，到地方任职。

这次刘歆以他的官运和身家性命为赌注，希望打破整个知识阶层对于现实的无知和对于利益的贪婪，最终却失败了。他仿佛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城堡，这个城堡由于盘根错节着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已经不容许新的思想进入了。

他不知道的是，一旦一个系统把一种思想树立成指导思想，由于路径依赖，就只能在这个思想的前提下腾挪，不可能再推倒重来。也许系统内的每一个人都不再相信这些理论，但是，又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去击碎理论本身，因为那会毁掉整个系统。于是，人们只能装模作样继续做着无用的研究。在汉代，人们只能顺着天人合一、谶纬、灾异的老路继续走下去，等待着这个系统的崩溃。

心灰意懒的刘歆对西汉政权绝望了，虽然他是刘氏宗亲，但他对刘氏的汉朝已经不再留恋，并不介意用一个全新的系统来代替汉朝建筑在儒教今文经体系上的政权。

恰好这时，他的朋友王莽成了大司马，于是刘歆迅速地将希望寄托在王莽的身上。

复古，复古

公元8年（新莽始建国元年），王莽称帝建立新朝。

王莽曾经与刘歆共事，对刘歆的才华了解得一清二楚，在他还没有当皇帝时，就开始重用刘歆。公元4年（西汉元始四年），王莽命令刘歆建造一个叫作明堂的建筑。

所谓明堂，指的是天子祭祀天地鬼神、举行大典的地方。这是古文经学中的一个概念，在今文经学中，人们更愿意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太庙。所谓太庙，就是天子祭祀父辈祖先的地方，而古文经学更加推崇周代的制度，认为周天子不仅祭祀父母，还祭祀天地阴阳，这个祭祀的场所是明堂。[106]

现在的北京还存在一个巨大的明堂，就在北京城南的天坛，同时，明清时期也保留了太庙，位于天安门之后。这实际上综合了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家的学说，兼而有之。

王莽建立明堂的举动被视为古文经学崛起的标志。实际上，所谓明堂属于三雍建筑群中的一个。按照古文经学的意见，皇家宗教性建筑分

成三部分，分别是明堂、辟雍[107]、灵台[108]。如果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做一个对比，明堂是举行大典、祭祀的场所，类似于基督教堂或者清真寺。而辟雍则是周代所设的大学，也就是皇家教育机构，相当于基督教的大学，或者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学校。灵台则是皇帝观天象、预测国家命运的场所，可以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天文台相比。

明堂、辟雍、灵台，就构成了王莽时期的国家宗教建筑群。国家宗教的古文化，意味着皇帝对古文经的认可。

但是，王莽为什么要认可古文经呢？

原因在于，他要为自己的篡位做理论储备。在古文经中，有一本书叫《周官》，是刘歆发现的一本记载周代礼仪制度的书籍，这本书后来改名叫《周礼》，成了儒家经典“三礼”的一部。

《周礼》曾经被认为是周公所做的礼仪制度，王莽在篡位之初，希望把自己打扮成周公的角色。周朝灭亡商朝后，周武王很快就死了。由于继位的周成王年幼，周武王的弟弟周公负责摄政。王莽标榜自己是汉代的周公，为年幼的汉天子摄政，所以被封为安汉公。作为周公的继承人，王莽希望把制度都周公化，所以，《周官》这本书就成了他的理论基础之一。

刘歆之所以帮助王莽，则是为了推广自己的理论，促使王莽在政治上使用古文经。此刻他已经对汉代社会的革新能力不再抱希望，因此投靠了王莽这个更加锐意改革的人。

刘歆的理论包括：在哲学上，推行周代的教育系统，也就是把古文经当作教材使用；在政治上，重新实行周代的官制，把汉代的创造去掉，完全恢复周代的官名；在经济上，由于周代是井田制，皇帝应该重新实行土地公有制，并实行一套与周代理想合拍的货币制度。

刘歆并不热衷于帮助王莽登基。但他与同党甄丰、王舜等人为了改革汉代制度，希望授予王莽足够的权力，帮助王莽当上了安汉公，后来又帮助他获得了宰衡的称号，这个称号也是被周朝的周公、商朝的伊尹使用过的。

王莽为了报答三人，将他们升职。当其他人看到他们高升后，纷纷效仿讨王莽欢心，呼吁王莽当所谓的“摄皇帝”。摄皇帝就是代理皇帝，安汉公虽然权力大，但还不是皇帝，但代理皇帝就是皇帝了。帮助王莽当上摄皇帝的，是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等人。[109]这些人的操守已经不如刘歆和甄丰。到这时，刘歆就已经是被局势推着走了，他只是想借助王莽推行改革，却被潮流裹挟着成了汉朝的叛臣。

但这还不是结束，当刘庆、谢嚣、田终术等人得手后，又有一些更不靠谱的人想求官，不断地制造祥瑞和符谶，也就是各种预言说王莽是奉天命当皇帝的。王莽就是在这一波波的浪潮下当上了真皇帝。

到最后，刘歆已经感觉到事情失控，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指望王莽在当上皇帝之后，继续用自己的理论来治理国家。

王莽当皇帝后并没有忘记刘歆，任命他为国师，皇帝的头号智囊。新莽一代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改革最频繁的朝代。但是，王莽又并没有全部采纳刘歆的观点，而是既使用了今文经学的主张，又使用了古文经学的主张。

比如，在官制改革方面，他把汉代的官名全部改掉了，但基本上还是使用了今文经学的主张，按照今文经学对周代的理解改名。比如，设立了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三个官，把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来又更名为纳言，把大理更名为作士，太常更名为秩宗，大鸿胪更名为典乐，少府更名为共工，水衡都尉更名为予虞，与三公司卿一共九卿，分别隶属于三公。每一卿又设置了大夫三人，一个大夫设立元士三人，一共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央官职。另外，把光禄勋改名为司中，太仆改为太御，卫尉改为太卫，执金吾改为奋武，中尉改为军正，又设立了大赘官，掌管皇帝的车马物件，以后还负责练兵，这些人都是上卿，称号为六监。把郡太守改名为大尹，都尉改名为太尉，县令长改名为宰，御史改名为执法。

更重要的则是官名改变背后的意义。周代的官制是不分国家官员和皇家官员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员，其实都是周王的私臣。而汉代在官制上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把内臣和外臣区分开来，外臣就是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员，而内臣则是负责皇帝起居和家事的私臣。王莽的改

变，把内臣和外臣又混为一谈，实际上是把权力更加集中在皇帝手中了。

他这样做有野心的一面，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与任何改革一样，王莽也面临着改革悖论：要想改革，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才能推动，所以要先集权，再改革。可是集权之后，又容易扼杀民间活力，导致没有人再相信所谓的改革。

官制上基本是今文经学的思路，但在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经济类改革上，王莽则采用了古文经学的观点。他把土地都收归国有，并订立了一套复杂的货币系统，使用了金、银、铜、龟、贝五种材质，设计了二十八种货币。结果民间由于土地关系紊乱，金融秩序崩溃，最终导致了新朝的灭亡。

王莽的试验也表明，不管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它们作为一种哲学观念、一种学术思想是可以的，可一旦将它们现实化为政治政策，就会立刻引起巨大的社会失调。

不过，古文经学在王莽时期的确获得了与今文经学平起平坐的地位，《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礼》都列入了学官，设置了新的博士点，试图保持所有文化都繁荣昌盛的景象。

随着王莽改革造成的混乱，刘歆开始心灰意冷。他心目中想的是一种纯粹的改革，得到的却是一堆糅合与妥协的杂货。随着改革的失败，新王朝也摇摇欲坠。他孜孜以求将古文经学列入学官，这个目标表面上是达到了，但一旦进入了官僚系统，古文经学家并没有表现得比今文经学家更好，而是迅速同流合污，变成了食利阶层。实际上，任何的学术，如果沾上了官僚的气味，就会变成同样的货色。

当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时，刘歆参与刺杀王莽的行动，希望投靠东方崛起的刘秀，继续他的学术冒险。但这一次，政变失败了，他被迫自杀。他的死亡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命运。经学家们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却无法改变哪怕一个小小王朝的命运。到了东汉，一切还都得顺着汉武帝创造的惯性继续走下去……

伪造大比拼

与刘歆同样悲剧的还有新朝唯一的皇帝——王莽。

王莽作为改革家，曾经试图统一今文经和古文经，利用宇宙真理制造一次巨大的繁荣。但现实却又逼迫他最终投靠了所谓的谶纬，依靠着各种方士和阴谋家制造的虚假预言来维持统治。这导致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迷信朝代的最迷信时期。

在王莽登基之前，他就造了一系列的祥瑞、符命和谶纬来给自己的篡位制造依据。公元元年（平帝元始元年）四川地区蛮夷献上了白野鸡，让他当上了安汉公。公元4年（元始四年），王莽开始为古文经正名，同时获得正名的还有谶纬，他命令征集精通《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史篇》的人，以及钟律、月令、兵法等专门人才，而天文（观天象解读命运）、图谶等也被列为专门人才受到重用。[110]

当谶纬受到重用之后，各种类型的超自然现象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公元5年（元始五年），有人挖井时得到了一块白石头，上面写着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结果王莽当上了代理皇帝。随后，有人梦到了天公的使者，请王莽当真皇帝。而哀章则伪造了铜匮劝进，这些人共同努力把王莽打造成了真皇帝。王莽当皇帝后，也投桃报李，封官加爵，同时颁布了一本叫作《符命》的书，一共四十二篇，都是说王莽应该当皇帝的。

除了皇家颁布的《符命》之外，各种各样的谶纬、符命书籍更是层出不穷。如同现在街边摆满的算命书一样，当时最热门的图书品种也是算命书。这些书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与五经等“经书”相对，被称为“纬书”。

表3　纬书举例[111]

七纬	篇目	题解
易纬六种	稽览图	把易经与历法结合起来，用六十四卦配合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讲卦气，占验灾异吉凶，说明天人感应，以备帝王稽览，书中有图，故曰稽览图。
	乾凿度	乾为天，度者路也。说明圣人凿开通向天庭的道路，勾通人神。
	坤灵图	坤为地，指地之灵妙，有图配合，故曰坤灵图。
	通卦验	通过卦气来占验吉凶灾异，故曰通卦验。
	是类谋	一作筮类谋，卜筮其可行之类，预为筹谋，故曰筮类谋。
	辨终备	占验灾祥，通过天人感应之理，辨其吉凶，而做充分的准备，故曰辨终备。纬中说：小辨终备无遗。言无遗患之意。
诗纬三种	推度灾	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据天的行度，以推天意，占验灾异，故曰推度灾。

七纬	篇目	题解
	氾历枢	氾历枢云：大明亡亥，水始也。诗纬以三百篇配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午亥之际为革命，配大明，即武王伐纣革命之诗。历数的运行，贵在掌握关键时刻，即革命的时机。赵在翰说：泛历五际，其枢在水。亥为水始，即革命之际，乃历数运行的关键时刻，故曰氾历枢。
	含神雾	谶纬是神学，认为天命人事，统于神灵。神灵下降，其气象是雾气茫茫的，故名含神雾。
礼纬三种	含文嘉	礼是区别文质、象征文明的，乃是嘉美的集中表现，故名含文嘉。
	稽命征	考察天命，只有神圣才能征应，受命为王，故名稽命征。
	斗威仪	北斗在天中象征威仪，礼主容仪，取法北斗，故名斗威仪。
	璇玑钤	古代帝王司历明时，璇玑玉衡是古代观测天文的重要仪器，最为关键，故名璇玑钤。
	考灵曜	考察日月星辰的运行，测其光景，故名考灵曜。
书纬五种	刑德放	帝王政教，以德为本，刑以辅之。阳生阴杀，效法天行，故名刑德放。
	帝命验	帝王历运，决于天命，朝代兴亡，随五行更替，各有征验，故名帝命验。
	运受期	帝王兴起，受命于天，随五行之运，各有运期，故名运受期。
	动声仪	歌咏舞蹈，雍容雅态，故名动声仪。
乐纬三种	稽耀嘉	顺乎天行，功成事举，光耀永嘉，故名稽耀嘉。
	叶图征	制作灵图，以为征验，故名叶图征。
春秋纬十四种	演孔图	孔丘为汉受命，天降血书，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名曰演孔图。

七纬	篇目	题解
	元命包	圣人制命，统于一元，无所不包，故名元命包。
	文耀钩	孔子修《春秋》九月成书，凡万八千字，文成光耀四布，钩治阴阳，故名文耀钩。
	运斗枢	北斗七星的运动变化为记时之枢纽，故名运斗枢。
	合诚图	天人感应，以诚想通，有图相配，故名合诚图。
	感精符	天降精气，圣人以生，天人相感，如合符契，故名感精符。
	考异邮	天垂象，见吉凶。考其祯祥灾异，天人通邮，符应不爽，故名考异邮。
	保乾图	承天之命，应运受图，于此保之，故名保乾图。
	汉含孳	孔子以西狩获麟而作《春秋》，为汉制法，麟为汉受命之瑞。故作《春秋》孕育着汉的孳生，因名汉含孳。
	佐助期	圣王兴起，必有神灵辅佐帮助，应期而至，故名佐助期。
	握诚图	诚为天道，王者所握，有图相配，故名握诚图。
	潜潭巴	阴阳灾异，其理玄妙，深潜难知，精微难言，其出如巴，故名潜潭巴。
	命历序	帝王年世，受命自天，五运相承，历载有序，故名命历序。
	说题辞	这等于春秋纬的序言，解说经旨，阐明纬理，宣扬圣意，以为题辞，故名说题辞。

七纬	篇目	题　解
孝经纬二种	援神契	援引众义，阐发微旨，孝通神明，天人合契，故名援神契。
	钩命决	孝通神明，以立情性，钩稽天命，以崇人伦，故名钩命决。

王莽没有想到的是，他可以借助伪造的符命、谶纬当上皇帝，别人也可以伪造来反对他。结果，在他执政时期，灾异也层出不穷。公元15年（天凤二年），有人宣称有一条黄龙在黄山宫摔死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王莽听了担心影响政权，连忙派人去查看这件事是怎么发源的，最终无法找到谣言的出处。[112]公元21年（地皇二年），又有人预言王莽将被汉家取代。

这类谣言越传越广，当初怎么推王莽上台，又在后来怎么让他下台。

然而，王莽带起来的风潮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由于社会思潮已经被他和前人带入了迷信的轨道，谶纬已经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到了刘秀起兵建立东汉时，也不得不继续利用谶纬来做文章，为自己寻找合法性。

在刘秀和四川军阀公孙述的战争中，双方都大打迷信牌，争相宣告正统地位。公孙述认为，孔子写《春秋》一共十二代，而西汉也已经传了十二代，到了历数终结的时候了。至于谁将继承汉朝，他四处翻书，在一本叫作《援神契》（见本节表格）的纬书中寻找到了依据，这本书中有一句是：西太守，乙卯金。他把这句解释为，西方的太守（公孙述本人）应该终结刘氏的天下。另外，根据当时流行的五行理论，西方属金，颜色崇尚白色，而五德轮替中，王莽崇尚的黄色继承了红色，又会被白色所替代，公孙述认为自己西方所代表的白色应该替代王莽的黄色。

但刘秀却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所谓的乙卯金不是说终结刘氏，而是说在乙未那一年重新授权给刘氏。

公孙述还曾经引用另一处文字，在一本叫作《录运法》的书中找到

一句“废昌帝，立公孙”，以及在一本叫作《括地象》的书中找到一句“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表明应该由公孙氏继承帝位。但刘秀则反驳说，其实这两处文字早已经在西汉就应验了。这两句话预言的是当年霍光废黜汉废帝刘贺，重新立汉宣帝的故事。当年汉昭帝死后，权臣霍光首先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可是刘贺当皇帝二十七天后，霍光不满意他，又把他废掉，立了另一个人为帝，这个人叫刘病已，是武帝废太子刘据的孙子，所以被称为公孙病已。[113]

刘秀还发明了一套赤赴符，赤裸裸地宣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114]所谓四七之际，就是说汉高祖创立汉朝到刘秀称帝，时间为二百二十八年，而刘秀自称火德，认为继承了汉帝国的正统。

虽然最终的胜负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但光武帝对于谶纬的信奉，使得东汉继续顶着最迷信朝代的称号。

于是，从董仲舒发端的天人合一理论，虽然成功地抵御了古文经学的攻击，却最终变成了符谶的大杂烩，东汉的学者中充斥着各类迷信色彩，人人口言灾异，四处比附，至于真正的学问，却并不在他们的脑子里。从汉武帝开始的哲学系统已经成了严重拖累中国学术发展的紧箍咒。

第五章
文人打架与皇帝和泥（公元36—公元200年）

东汉末年，当今文经学者、古文经学者斗得不亦乐乎时，他们却突然间双双变成了历史的注脚，被边缘化了。

今文经学之所以衰微，原因在于它已经不是学问，而是关系与帮派的综合体。失去了研究能力，最终必然失去它把持的权力本身。

古文经学衰微，来自于它过分地想取代今文经学占据政治的中央，吸纳了太多的糟粕，从而失去了原本的锐度。

东汉时期的白虎通会议又做了一次综合今古文经学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东汉末年，综合今古文经学的大儒终于出现，重新统一了经学。但在经学统一之时，人们却悲哀地发现，不管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其实都已经死亡。

在东汉，已经产生了一批试图跳出今古文经学斗争思维研究问题的学者。其中扬雄试图效仿儒教体系，创造一个类似于当时流行哲学，却又有别于流行哲学的体系，但由于他的体系模仿性较强，也缺乏追随者，成了稍显滑稽的异类。

东汉也出现了一批反对谶纬的学者，最典型的代表是机械论者王充。但王充在质疑谶纬、破坏原有哲学体系的同时，却无法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真正将汉代哲学清扫干净的，是后来的玄学和舶来的佛教。

光武帝刘秀在获得天下不久，就受到了一位郎中的嘲弄，这次嘲弄是东汉时期学术争论的缩影。

公元26年（建武二年），光武帝刘秀任命了一位儒生为郎中，这位儒生叫尹敏。这次任命反映了光武帝的政治抱负。他深知马上打天下、书本治天下的道理，在开国后，迅速向儒术治国转变。他首先从西汉王

朝在长安的秘府中寻找到了大量的图书，装载起来竟然有两千多辆马车，由于他把首都设在了洛阳，这些图书都被装上车从长安送到洛阳，成了皇家馆藏。

在东汉历代皇帝的经营下，皇家馆藏又扩大了三倍。但是，光武帝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图书最终的命运。到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时，由于士兵们不知道图书的价值，将竹简木简劈了当柴烧，布帛的图册则被用来制作帘子和伞盖，几乎所有的图书都失散了。当董卓舍弃洛阳，迁往长安时，司徒王允搜集了一下图书，只找到了原藏书的百分之一，装了七十多车，在路上又损失了一半。王允和吕布联合杀死董卓后，董卓的部将郭汜和李傕进攻长安，将关中地区变成了荒地，最后的图书也在此次事件中失散。东汉末年的图书之灾并不亚于秦朝的焚书坑儒。[115]汉代之后，历史不断地重复这一幕，大量的古代典籍被藏于秘府，无法被民间利用，却被付之一炬。

光武帝除了搜集图书外，更想像当年汉武帝一样，将帝国的整个学术界掌握在手中。随着王莽的灭亡，大量的读书人都逃进了山中，光武帝将他们延揽到首都洛阳，授予一定的职位。一位叫尹敏的儒生也是这个时候投靠了光武帝。

尹敏最初学习的是今文经中的《欧阳尚书》，后来又学习了几部古文经，包括《毛诗》《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是一位兼修今古文经学的大家。他来投靠光武帝，是希望发挥自己的特长，谁知，光武帝授予他职位后，却派给他一个荒诞的工作：整理谶纬书籍。

在当时，不管是王莽还是光武帝都深信所谓的谶纬、祥瑞和灾异。王莽将原来的谶纬图书攒入了许多有利于自己的内容，于是，对纬书的考据学正式成了一门学问。光武帝希望将王莽添加的内容去掉，恢复谶纬书籍的本来面貌。尹敏的工作就是校订这些书籍，去掉王莽的痕迹。

尹敏对于谶纬书籍毫不在意，他上奏说：谶纬书籍本来就不是圣人的作品，而是后人杜撰的，就算恢复了王莽之前的模样，它照样是伪书，整理这样的书籍会误人子弟的。

光武帝并不这么看，他相信谶纬书籍与经书一样，同样是圣人留下

的教导。尹敏闷闷不乐地开始了他的工作。

有一天，光武帝找来一本尹敏校订过的纬书翻阅，突然发现其中有一句：君无口，为汉辅。

所谓君无口，恰好是一个“尹”字，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就意味着应该请尹敏入阁辅政。光武帝连忙将尹敏叫来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尹敏不慌不忙回答：我见前人伪造图书，也不自量力，伪造一把，万一成了呢？[116]

光武帝知道尹敏这是在讽刺自己过于相信谶纬，不再重用他，但也没有惩罚他。

尹敏的命大在于他碰到了性格宽厚的光武帝，如果碰到汉武帝，他肯定会因为欺君之罪而掉脑袋。不过，光武帝之所以宽厚，也反映了另一个现实：东汉时期的学术界已经不再像西汉时那样铁板一块。西汉时，皇帝的权力更加集中，学者的官运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没有人敢于反抗，也没有人敢在皇帝面前卖弄学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深深地根植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而各个博士点的家法传承又养成了不容怀疑的精神。西汉的学者大都只从师傅手中接受知识，不准许灵活变通，也不准许融入其他家的说法。

但到了东汉，随着中央集权程度的减弱以及学问的庸俗化，学者为了获得真知灼见，势必要打破家法的束缚，抛弃掉那些成见，开始自我探索。另外，在东汉时期，古文、今文、谶纬之间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即便皇帝也很难摆平各派的偏见。

以光武帝时期为例，由于王莽大量使用古文经人才，光武帝召回的学者中既有古文经人才，也有今文经人才。光武帝最初的意图是调和今古文经学之争，但由于今文经学者的态度更加强硬，偏见更深，在他们的逼迫下，光武帝不得不取消了古文经学官，只保留了今文经学官，又开始了另一个今文经为主的时期。由于古文经受到排斥，在民间反而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学术群体，结果，皇帝已经不能独占知识的阐释权了。

除了今古文经学之外，谶纬也始终如影随形，成了皇家信仰的一部

分。谶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就在皇帝的面前斗来斗去，让皇帝无所适从。

东汉皇帝的式微导致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失控的时期。学者们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皇帝试图在其中寻找平衡，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但最终，学者的争斗还是超出了政权的容忍程度，发展出了影响政局的大变动。

光武帝时期大辩论

公元28年（光武帝建武四年），尚书令韩歆的一份奏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掀起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最激烈的争斗。[117]

这场争斗可以追溯到两年前光武帝对儒家学者的大征召。这场征召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尹敏之外，还有几个大学问家，他们是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人。在这七位中，有三位是今文经学家，另外四位是古文经学家。[118]

在光武帝的政治图谱中，最初，他希望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谶纬。西汉时期设立了五经博士点的都是今文经学家，将古文经学家排除在外。光武帝想对这种局面做出平衡，在征召了诸位大家之后，接下来，就是重新设立五经博士的问题。

这时，尚书令韩歆领会了皇帝的意图，乘机上奏，请求皇帝设立五经博士的同时，注意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平衡，为属于古文经学的《费氏易》和《左氏春秋》设立博士点。

在东汉初期，今文经学继续分裂，较为主流的已经有了十四个分支，分别是：《易》四家，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家，欧阳、大小夏侯；《诗》三家，齐、鲁、韩；《礼》二家，大小戴；《春秋》二家，严、颜。

在十四家今文经学之外，再设立《费氏易》和《左氏春秋》两家古文经学，既符合皇帝的和平意图，也是在政治上做出一定的平衡，避免

今文经学一家坐大，也防止古文经学由于没有正规途径进入官场而变得极端。

韩歆的提议让光武帝大喜，但为了向臣下表明他的慎重态度，他下诏请群臣到云台议事，讨论一下可行性。在很多事情上，所谓讨论只不过是橡皮图章，但光武帝没有想到，由于设立新博士点动到了某些人的奶酪，这次议事变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争吵。而争吵的主角们，就是当初他请过来的诸位大学问家。

由于王莽时期刘歆强行推广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家们结下了梁子，今文经学家们拿出了视死如归的气魄，坚决抵制古文经学。

首先跳出来的是范升。范升是光武帝所立的《易经》博士，学的是《梁丘易》。除了《梁丘易》之外，他还看过《论语》和《孝经》，同时还看过道家著作《老子》。作为今文经学博士的他听说皇帝要立古文经学博士，立刻表示反对，他把主要的火力集中在了《左传》上，主要观点是：《左传》不是孔子著作，而是左丘明写的，不是圣人言；《左传》也没有合格的继承人来做研究；先帝们没有设立这个博士点，现在也没有理由设立。

范升的说法引来了大量的辩驳，韩歆和太中大夫许淑对他进行了诘难。在朝堂上没有吵出结果，范升退下来后愤愤不平，抓起笔来又给皇帝写了信。在信中，他着重强调了三条理由：第一，经学的各个分支太多，《易经》传承中，除了费氏之外，还有高氏，《春秋》传承中，除了《左传》之外，还有驺氏、夹氏，如果将《费氏易》和《左传》立了博士点，那么其他家都会争先恐后前来争取博士点；第二，《左传》和《费氏易》传承关系不明，内容和其他家大都不一致，有违圣人之理；第三，由于刚刚建国，当务之急是打基本功，找到讲《诗》《书》的人，而不是扩大基础，去寻找偏僻的《左传》《费氏易》传人。

范升还列了《左传》中十四处他认为有违圣人的错误，由于司马迁喜欢引用《左传》，范升连带着把司马迁也批驳了一通，又列了《史记》里三十一处错误。[119]

范升的奏章上去后，惹怒了另一位当时的大家陈元。陈元也是光武

帝当初征召的文人之一，主修《左传》。他上奏皇帝，批驳范升。他对范升提出的《左传》和《史记》共四十五处错误进行了一一反驳，说明范升只是小题大做，故意挑刺。随后，又继续说，即便先帝没有立，但后来的皇帝是可以立的，比如当初的《谷梁传》也没有立博士点，到了宣帝时期才设立。皇帝应该根据政治需要来设立学官，网罗人才。[120]

范升和陈元又你来我往，进行了十数回合的交战，最终，由于光武帝本人对《左传》有好感，决定仍然设立《左传》博士点。

但随后又发生了问题：在《左传》博士点的四个候选人中，参与辩论的陈元排名第一。为了避嫌，光武帝只好选择了第二位的司隶从事李封来担任《左传》博士。

但即便如此，今文经学的众多官员仍然感到《左传》博士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继续喧哗，试图影响皇帝。

到最后，光武帝不胜其烦，只好趁李封去世的机会，不再补充新的人选，从而废除了《左传》博士点。

这次争执以今文经学的胜利而告终，光武帝最终设立了十四个博士点，全部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经过了王莽时期的曙光之后，再次被打入了地下状态。

然而，今文经学家弹冠相庆时，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胜利显得如此短暂。因为从光武帝到后来的皇帝，都已经是在古文经学的熏陶下长大，他们即便无法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却总是在试图将之正常化。

到了汉章帝时期，古文经学的第二次机会到来了。

白虎观大和泥

光武帝去世后，经过明帝较为严厉的统治，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三派的矛盾被搁置了起来。然而，性格宽厚的章帝继位后，皇帝再次想撮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分歧，形成经学上的统一。

章帝本人爱好古文经学，特别是《左传》和《古文尚书》。在当时，研究这两门学问的大家是贾逵。贾逵的父亲直接师从于刘歆，他本人除了熟悉各种古文经学经典之外，对于今文经学经典也有涉猎，可谓最懂两种经典差异的人。

章帝一继位，就把贾逵召进了北宫白虎观和南宫云台。与光武帝不同，章帝明白如果只是泛泛地说要采纳《左传》，必然引起巨大的反弹。他必须找到《左传》优秀的地方，才能说服群臣它值得设立博士点。章帝命令贾逵总结《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的区别，特别是《左传》比其他两传更优秀的地方。

贾逵得到命令后，从《左传》中选取了三十七个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强调君臣正义、父子纲纪的。由于东汉最缺乏君臣之间的互相尊重，《左传》显然可以帮助皇帝说话。而与《左传》相比，《公羊传》在这些地方则主要强调权变，对皇权有害，这是皇帝所不需要的。

除了这些区别之外，贾逵认为，《左传》与《公羊传》其余部分大都相同，相同的比例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即便有不同，区别也不大，对整体无害。

另外，贾逵还指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意见：东汉的皇帝自认为是火德，色尚赤，是尧的后代，可是，如果采用今文经学中五经的记载，都记载黄帝之后是颛顼，按照五行迭代，传到尧时，不可能是火德。只有《左传》记载黄帝之后是少昊，图谶中将少昊称作帝宣，从这个世系来算，汉才是火德。

章帝拿到了贾逵的奏章，感到很满意。既然《左传》关系到汉朝的命运，那么应该不会有反对意见了。他赏赐了贾逵，并命令贾逵从《公羊传》的学徒中选取二十位优秀学生教授《左传》。[121]

到这时，皇帝还只是命令教授《左传》，没有将它列为博士点。但即便是这样，今文经学家们仍然强烈反对，这次跳出来的带头人是公羊学专家李育。贾逵从《左传》中找了三十七处来证明《左传》比《公羊传》好，李育就找了四十一处证明《左传》比《公羊传》差。[122]

双方仍然大打嘴仗。到最后，兰台校书郎杨终上奏，干脆开个会讨论一下[123]，章帝无奈，只好下令在北宫白虎观召开一次经学会议。这次会议可以视为一次学者们的“华山论剑”，参加的主体，是各大学派的掌门人和官员。这是继汉宣帝时期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后，第二次由皇帝主持的大会。[124]

与基督教召开的公会议相同，这次会议的目的还是辩论谁是真经。不过，由于皇帝持调解态度，会议不会证明谁是伪经，而是如何将各家学派综合起来，形成一套对汉朝皇帝最有利的学说。

会议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汉儒不善于学习，只善于诠释，结果，五经文本原来极为简单，在他们的注释下却变得冗长乏味，有时候经文不过只有区区数万字，而注释却有上百万字，还不准学生随意发挥，学生学习时背得头大。如何化简注释（也就是所谓的章句），成了人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二，各家学派本来都是为皇权服务的，但随着学问传来传去，就产生了许多不利于皇权的因素，各派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也越来越多。如何把各派的经义重新统一起来，产生一个最有利于皇权的正解？

从这个意义上，白虎观会议又是一场和稀泥的会议，就是要大家放弃分歧，重建共识，服务朝廷。

与石渠阁会议相比，白虎观会议之所以幸运，在于会议的文集历经沧桑之后竟然保存了下来。在会议过后，皇帝叫人将会议要点记录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这个记录人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他的记载成了一本叫作《白虎通义》（或《白虎通德论》）的书。通过这本书，我们就了解了汉代的“客观真理”。

与现代包揽一切的各种“客观真理”相同，《白虎通义》上讨论天，下讨论地，中间讨论人，将围绕着政权和社会产生的所有问题都考虑在内，将科学、宗教、哲学都包括其中。

全书分成四十三个专题[125]，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科学和自然的认识。书中讨论了天地、日月、四时都是什么，为什么形成。

什么是天？汉代君臣认为，天就是居于高处统领天下的有意志的实体，代表着不变，而地则是万物的始祖，代表着变化。

在宇宙形成学上，如同现在的大爆炸理论一样，汉代也有一套生成论。最早的世界叫“太初”，就好像我们常常谈论的“奇点”，“太初”是没有形体概念的。“太初”又变成“太始”，随后形成了形体，称为“太素”。“太素”虽然有形体，但仍然是混沌一片，看不见、听不见的。之后世界开始分离，精气上升、浊气下降，精气形成日月星辰，而其余的形成五行。五行中生出万物和“情性”，“情性”中又生出“汁中”，“汁中”生出“神明”，“神明”生出“道德”，“道德”又生出“文章”。这样，自然的天地就和人世的道德文章联系在了一起。天地之间的运转（天向左旋转，地向右旋转）则和人世间的君臣、自然界中的阴阳一样，是一组对应的概念。[126]

第二，对于人类社会的讨论。书中讨论了人类社会运行的各种事务，如商业、农业、法律、婚嫁、丧事等，这些都是从天地运行中延伸出来的。

第三，从对于人类社会的讨论又上升到了对于政治的讨论，这就有一套符合君臣礼仪的规则出现。君臣之礼又对应于天地之礼，上升为一种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就将人类社会固定住了。当一个人生下来是什么位置，他就必须遵从于这个位置来度过他的一生，因为这是符合天道的。

在这些礼仪中，“三纲六纪”是主要的道德标准。所谓“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妇；所谓“六纪”，就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127]其中“三纲”效法天地人，也就是君臣关系根据天来设计，父子关系根据地来设计，夫妇关系根据人来设计，而“六纪”则主要根据“六合”，也就是上下东西南北六个方向来设计的。

“三纲六纪”将中国人装入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盒子，从天地到六合都被牢牢控制。一个人生下来就已经不是为自己生活，而是为了皇帝、

父亲、配偶以及各种亲戚而活着，他必须努力劳动来维持这些关系，所谓发明和创造力，都是不需要的。

即便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提所谓的汉代的哲学，但是，“三纲六纪”仍然是每个人生活中抛之不去的阴影。君臣父子不再提，却变成了所谓家国情怀继续存在，而夫妇和六纪则变身为各种各样的人情，不断地占用着每一个人的时间。这些事情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放弃自己的创造力和理想，生活在俗事之中无法摆脱。

从传承上来看，《白虎通德论》是一个综合的产物，这一点上，汉章帝和稀泥的目的达到了，它以今文经学的观点和内容为主，同时吸收了古文经学中的《毛诗》、《周官》（后来的《周礼》）、《逸礼》的部分文字。另外，还引用了大量的谶纬学著作。

今人在研究哲学时，已经很少提到这本《白虎通德论》，原因在于它很少是原创的，只是各派观点的一个大杂烩，选取了对皇帝最为有利的一方面。但是，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东汉时期最流行的统治哲学，是东汉社会组织的基础性文献。它是东汉时期的语录，是打开一代王朝思想的钥匙。只有理解了这本书，才真正理解了东汉社会的精神面貌。

白虎观会议之后，古文经学在统治圈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承认。但是，如果皇帝想要为古文经学专门设立博士点，仍然困难重重。到最后，皇帝只好做出了妥协，他没有增加古文经学博士点，却以诏书的形式命令各地的高才生必须学习古文经。[128]

表面上看，今文经学最在乎的官场之路仍然被今文经学博士们把持，但是博士点的学生们被要求必须在学习今文经的同时，学习一些古文经文献，这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混合的第一步。

从此以后，今文经学学者们也慢慢地研习古文经，熟悉了古文经的经文。章帝通过努力，终于将两派捏合在了一起，两者开始了从斗争走向融合的道路。

一个哲学异类的生存方式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复的斗争，其原因在于，他们争夺的是皇家资源。读书人追求的不是学问，而是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或者在各自的地方上当官称雄。他们内部虽然斗争，但随着古文经学的地位上升，又共同反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防止他们抢了饭碗。

随着古文经列入官修课程，汉代的官方教育体系也更加成型。除了中央的太学之外，地方上也有各级地方官设立的教育机构。学生们必须首先到州县的教育机构就学，然后才有可能被发现并送往更高的教育机构。

还有很多人连官方教育机构都进不去，他们就被排斥在了升官道路之外。这些人的学问自成一家，不受经学门派的束缚，甚至想自创门派。

然而，这些人由于水平有限，又学不会各类学术术语，他们的研究能力和创造力到底有多强，是值得怀疑的。这些人的榜样是一个叫扬雄的人。[129]

扬雄是四川人，生活在王莽时代。对于读书人来说，王莽时代是一个好时代，只要肯出卖自己的立场，奉承几句皇帝，不管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可以升官发财。扬雄所学的学问大都是自学，没有师承，他也不屑于去学习五经的词句，只是了解大意就足够了。这样的人本来是跳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传统之外的，也只有在王莽时期，才有可能受到不拘一格的任用。

但扬雄忍住了奉承君主的诱惑，一辈子虽然做过小官，但整体上不得志。他也淡泊名利，对于钱财不在意，而是专注于文字创作。这样的人成为后世的楷模，的确不算过分。

但是，扬雄既然处于朝廷之外，又没有受到正规经学的腐蚀，是否就可能创造出独立的门派呢？答案却是悲观的。

实际上，由于受到当时流行观念的影响，扬雄的著述并没有摆脱五

经的束缚，反而由于强烈的模仿而显得怪异了。

在扬雄看来，汉代的儒生是没有创造力的，只是不断地背诵课文，再生搬硬套运用到生活和执政当中，他希望自己摆脱出来，创造出真正的作品和独创的哲学思想。他的作品不是以对某一本书做注释为满足，而是想写出与《论语》《易经》《离骚》等作品同等地位的杰作。这种理想已经超出了汉儒敢于设想的极限。

但是，扬雄想写出伟大作品的雄心壮志，却是靠模仿来实现的。比如，他认为《论语》是一个伟大的作品，他要写一本超越性的著作，于是，模仿《论语》的格式写出了《法言》一书。但他不明白，当你模仿别人的格式去写作时，就决定了你只是在别人的框架内打转，不可能超越了。

除了《法言》模仿《论语》之外，他还模仿《易经》写了一本叫《太玄》的著作。

《易经》以八卦为基础，采取了二进制的方法，产生了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占卜。《太玄》则模仿性地创造了一个三进制的世界，它的基础符号不是阴和阳，而是“一、二、三”，分别用一长横、两短横和三短横来表示。它的复杂度也是按照三的级数来演化，分成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然后再以这些数字为基础进行一定的比附，与天地人相配合，形成了一套新的宇宙论。

与《易经》的宇宙论一样，《太玄》的宇宙论也是扬雄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最初的出发点只是一个头脑游戏，即利用三的级数创造一个图形，再对图形进行一定的解释。至于这些解释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则是作者无法考虑的。

扬雄认为他的体系足以比肩《易经》，但可惜的是，汉代的人们偶尔会赞叹他设计的图形如何精妙[130]，但很少有人真的把他当回事儿。

除了《太玄》和《法言》，扬雄还模仿过别的作品。屈原的《离骚》在当时算是最流行的文学，扬雄又想着去超越，于是模仿《离骚》

写了一篇《反离骚》，后来还不过瘾，写了一篇《广骚》，又写了一篇《畔牢愁》。[131]

他以为自己写得很好，是反抗当时流行思想的代表，却不知道正是这些模仿，证明了他仍然没有摆脱汉代的流行哲学，只会用与流行哲学类似的语言来说话。这就像当下出现的许多文人一样，一方面批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小时候教育的关系，只会用马克思的语言说话。

扬雄的遭遇说明，在汉代随着政府将哲学垄断，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都不由自主地受到影响，无力摆脱从而进行独立的研究。即便到后来，汉代的经学已经变质，甚至腐烂了，人们也无力拯救。直到社会崩溃后，读书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进阶的可能，才痛定思痛，产生了一批背离经学的思想者，这就到了魏晋时期。

扬雄当年的大部头到了现代，也几乎被遗忘。但他的另一个成就却越来越多被人提及，那就是对谶纬观念的反叛。

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令学术界最乌烟瘴气的还不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斗争，而是对谶纬的滥用。谶纬作为一种皇帝提倡的思想，已经变得无可救药，学者们开始了自发的抵抗。

扬雄不算反对天人合一的代表人物，他有时强调人力决定，有时候又透露出人力无法干预天命的思想。[132]但在对待谶纬的态度上，却有着强烈的反对色彩，认为如《黄帝终始》这样的书不仅不是圣人言，反而是伪造的。[133]对邹衍这样受到经学家们崇拜的阴阳家，也认为不可信。[134]

东汉初年，扬雄对于谶纬的态度被继承了下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谶纬。其中比较著名的，除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尹敏之外，还有桓谭、郑兴等人。

在光武帝时期，由于皇帝喜欢图谶，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言必谶纬，一时间整个朝堂之上弥漫着各种各样的预言和灾祥，桓谭[135]和郑兴[136]却当着皇帝的面宣称自己不相信。桓谭更是屡次上言，表示谶纬误

国，都没有效果。

从扬雄到桓谭、郑兴等人，对于谶纬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东汉的皇帝们却由于政治的需要，继续推崇谶纬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这时，就到了王充出世的时候了。

反对谶纬的机械论者

光武帝建国后不久，在东南方的会稽郡出生了一位童子，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反对谶纬的主将。

王充出生于贫困人家，年幼失去了父亲。后来他来到京师进入太学机构，师从于当时的大儒班彪，也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的父亲。王充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虽然是太学出身，但脾气倔强，与其他的钻营之徒不合拍，最后退而写书。王充最著名的著作是《论衡》，流传到了今天。

由于深受唯物主义影响，当今的学者对王充总是持拔高态度，认为他是东汉时期唯物主义的旗手，与唯心主义做斗争。但实际上，王充也许并不符合当下给他贴的那么多标签。

首先，我们总是把人类哲学史当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做斗争的历史，但这是错误的。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只是人类思想中一个很小的分支，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大都相信神灵、灵魂，即便到了现在，相信神、上帝的人也不在少数。

人类历史上哲学的对立，在不同时候也有不同的主题，有时候表现为唯实论和唯名论的争论，有时候表现为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而在中国的汉代，在哲学上则主要是汉儒所代表的宇宙论（强调人依附于天，建立一个试图解释一切的理论体系）与战国哲学强调的心性论（试图弄明白人如何认识世界，但不主张建立包容一切的理论体系）之间的争执，在组织上主要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论之间的合纵连横。所谓唯物主义，其实并不在人们争论的焦点之内。

其次，王充是否是唯物主义者，也是有问题的，他并不完全否认天和命。如果找一个更合理的标签，我们可以将他称作机械的经验论者。

所谓机械的经验论，是从他的主要观点来看的。他的主要观点是：我只相信我看到的东西，其余的一切都是虚妄的。[137]他的出发点是从经验中寻找真相，而绝不是有一个自动站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由于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他对当时的一切流行看法都看不惯，所以针对流行的观点都一一进行批判，写了一本愤世嫉俗的书。由于汉代时谶纬流行，谶纬也就成了王充批判的对象。而现代唯物主义者以破除迷信自居，自然也就把王充划归了同类。

在哲学上，王充的价值并不大，原因也在于他擅长批判，却极少构建。哲学上最伟大的人物往往是创造型的，他们构建了一套自洽的理论（如柏拉图、笛卡尔、牛顿），或者研究出一种方法（如亚里士多德、培根）。

王充的批判也大都是从机械经验出发，如果放在现在，他会否定万有引力和电磁波的存在，原因是“我看不到”。

但在质疑王充唯物主义标签时，不能否定，王充的质疑很多是有道理的。总结起来，他对当时的几个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

第一，对汉代的灾异观进行了批判。汉代儒生认为，天人之间是有感应的，所以，人世出了问题，老天爷就会降出灾异来惩罚人类。王充并没有完全否认人类的命运，而是认为老天爷太大了，不可能对人类的事情随时做干预。[138]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所谓的天降灾异都是假的。他对于天的认识，反而更接近道家的天，认为天道自然。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受汉儒的局限，他对天的认识又停留在董仲舒的意志天上，认为天是一种拥有意志的实体存在。

除了天之外，他也相信命，认为人的命运是绝对的，人的生死、福祸、贵贱，无不是命造成的。

更有甚者，他在否定灾异的同时，为了迎合皇帝，又在某些篇中赞

扬所谓的瑞符。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表明他并没有一个体系，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第二，对于鬼神观念的批判。汉代流行厚葬，认为人死后会去往另外的世界，而王充不仅对这种传统不满，同时还否定鬼的存在。[139]那么，人死后去了哪儿？王充认为，人是阴阳二气交汇的结果，阴气形成人的形体，阳气形成人的精神。而阴阳二气则弥散在空中，是没有感觉、没有意识的。直到阳气的精神附着在阴气形成的实体上，才有了感觉和意识。当人死后，阴阳二气分离，阳气又回到了空中，感觉和意识也随之消灭。[140]

需要说明的是，王充对于阴阳二气的看法同样来自汉儒体系。以阳为天，阴为地，所以阳气代表了天，是人死后精神去往的地方，阴气代表了地，是人死后身体腐朽之地。

第三，针对汉代神化孔子，将儒家五经奉为神圣的做法，王充也感到不满。他写了《问孔》《刺孟》等篇，认为圣贤也会犯错，不需要将他们无限制拔高。所谓的五经，在王充看来也不是不能更改的圣经，因为在汉儒传播的过程中，不知道错过多少了。[141]这个看法又和当年刘歆的看法类似。

第四，除了上述三点之外，王充还花了大量的篇幅对当时的种种迷信做法进行了驳斥，如神仙方术、占卜忌讳等。

整体而言，王充的书代表了汉代学者对于汉代思潮中不良观念的较高水平批评，也表明在他的时代，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阶层，开始反思当时的各种谶纬观念。并不是王充一个人粉碎了谶纬，而是这个时代已经感觉到了谶纬的荒谬性，这才会出现王充。

到这时，董仲舒所建立的天人合一体系也进入了垮台的节奏。一方面，它已经成了整个社会观念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人们开始不相信它。这就像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共产主义已经成了整个社会构建的基础，但已经没有人相信它，只是缺乏另一种理论来取代它而已。更麻烦的是，虽然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但由于受教育的关系，所有的人思维方式还是固定不变的，哪怕就是反对，也只会用固定

不变的语言去反对，这样的苏联政权不可能不出现问题。

果然，随着东汉的崩塌，魏晋知识分子抛弃掉汉儒的天人合一之后，建立了另一套玄学体系，希望尽早地摆脱汉代的影响。

但在汉代哲学崩塌之前，由汉章帝开始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合并，也即将完成。

合并时，已临近死亡

汉章帝要求儒家知识分子也学习古文经学，但没有单独设立古文经学博士点，这导致东汉时期哲学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特征：今文经学由于把持着通往官场的渠道，输送了大量的官员，但古文经学虽然在野，却逐渐成了哲学的主角。到了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再也出不来大学问家，而古文经学却人才辈出，他们大都不是当权派，却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宗师。

这样的格局看上去相安无事，但随着今文经学丧失了研究能力，合并的机会终于来临。

东汉由于皇权较弱，是一个对知识分子较为优厚的时代。明帝时期，皇帝要亲自到辟雍去尊养三老五更，以示对学问的尊重，并亲自参加讲课，听众如云，《后汉书》中用“亿万”来形容当时的听课人数。对于功臣子孙、大姓都要设立单独的校舍，甚至匈奴都派子孙来学习。[142]

学校的规模到了顺帝和质帝时期达到顶峰，皇帝修建了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的大校舍，人数则达到了三万余人，略少于东汉总人口的百分之一。[143]青年人已经形成了游学的风气，以上学为借口到京城游荡，建立关系网。[144]

但东汉又是一个分层的社会，读书人虽然多，进阶的机会却大都被世家大族把持，许多读书的青年并没有明确的出路，皇帝也没有这么多官位留给他们。结果是，一方面读书人数众多，但另一方面，真正乐于去读书的却是少数，特别是在官方举办的学校之中，混日子的人很多。

安帝时期，由于皇帝突然间松懈下来，结果，博士们占据了职位却不讲课，学生们也懒散惯了，学校荒芜成了菜园。[145]顺帝虽然增加了人数，却无法让他们更加重视学业，反而成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今文经学走到这一步，与它成为当官的工具有着必然的联系，看上去这可以鼓励人们学习经学，但实际上，随着求学目的的庸俗化，反而产生了大量的学阀，他们的教科书充满了错误，又不允许学生自由发挥，形成了学术僵化。与人们的理解相反，任何与官运挂钩的学术机构到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从汉代的太学，到明清的科举莫不如此。即便到了社会多元化的现代，最热门的考试也不是为了学术，而是最没有学术价值的公务员考试。在大学中，由于行政化的束缚，真正追求学问、产生出有价值研究成果的也是极少数。

今文经学走向僵化的同时，古文经学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却没有参与官位的分配，反而产生了一大批立志于学问的大家。东汉时期，古文经学人才辈出，杜林、郑兴、卫宏、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郑玄等人相继主导了经学的发展。

最初，这些大家还以与今文经学辩论为己任，到后来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争吵，而是遍读书籍，开创自己的体系去了。

今文经学由于壁垒森严，一个学者往往只学一本书或者几本书，而古文经学家到了后期几乎要把所有的经典都读一遍，再统统进行注释。

以古文经学大儒马融为例[146]，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活到八十八岁），仅仅他注释过的书籍就有《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他曾经还想注《左传》，但看到贾逵和郑众的注释后，最终放弃了，只写了一部《三传异同说》。

由于他的学问扎实，受到世间称赞，他的学生常常有数千人，其影响力已经远超过了那些官方的博士。

对于整个经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叫郑玄的经学家。在流传中，

由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对于经典的解读并不相同，甚至意思上都会出现巨大的差别，大部分古文经学家在注疏时，会严格地按照古文学派内部流传的解释来注释。但郑玄是一个例外，他不仅精通古文经学，还对今文经学有着透彻的学习，这使得他成了统一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不二人选。

郑玄年轻时曾经进入太学，学习了《京氏易传》《春秋公羊传》等今文经学著作，以及《三统历》《九章算术》的历数方法。后来，又师从东郡的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春秋左氏传》《韩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著作。

他把在洛阳所能学到的学问都掌握后，感慨整个中原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又过函谷关前往陕西地区，投在马融门下学习。学成后继续游学，共花了十几年时间在游学上。这与太学生们只守在京师等待升官发财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由于郑玄的学问好，他的弟子有了数千人之多，北海相孔融由于尊敬他，专门在高密县（今高密市）设立了一个乡，叫“郑公乡”。郑玄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反叛者的耳中，黄巾贼乱时，郑玄从徐州去往高密，路上遇到了数万人的黄巾军，这些叛乱者不仅不敢动他，还见了他都下拜，纷纷避开他所在的高密县，不打扰他。

郑玄曾与今文经学唯一还拿得出手的学者何休展开了论战。其原因是何休写了三本反对古文经学的书，分别是《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利用何休的章句进行回击，破掉了何休的说法。何休感慨地说：这是在进我的房间，拿我的矛来打我。[147]

这也是最后一次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之后，经学将进入另一个时期。

虽然与今文经学论战，但郑玄并没有马融等人的门派之见，他的目标是超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为现存的所有的经典都寻找一个权威的解读。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中，对于同一本书的解读大部分是相同的，不同的部分中，有的今文经学说得对，有的古文经学说得对。但在双方长期的争吵中，由于门派之见，即便知道对方说对了，也不能采纳，只能全盘性地接受某一方的理论。

郑玄正是将所有各家的观点拿在一起进行比较之后，择善而从形成一个新的版本。[148]汉代的大儒并不以著述出名，而是以注释经文为傲，郑玄用一生的工夫将儒家经典的大部分都重新进行了注释，包括《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除了这些注释之外，还写了《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书，加起来一共百余万言。另外，他的学生根据他解读五经时的问答，又依照《论语》的格式整理了八篇《郑志》。

在对于经典的注释中，郑玄大部分选用古文经学版本为底本，又加入了大量今文经学的研究成果，甚至有的进行对校，或者将两方的说法并行排列。比如，对《诗》的评注，采用了古文版的《毛诗》为底本，但也用了今文经学的齐、鲁、韩三家来进行校正。注《仪礼》则并存今古文经学，按照今文说法记录的，就在注里写出古文经学，按照古文经学的说法，则在注里标出今文经学。注释《论语》，则以鲁论为底本，用齐论和古文经学进行考证。

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整本流传到今天的一共四部，分别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注释，以及《毛诗》的注释。后人总结的儒家经典“十三经”[149]中，有四部用的就是郑玄的注本。

郑玄的著作一出，不管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都被边缘化了。在他之前，每一个博士都有自己的课本。郑玄之后，博士们的书没人看了，不管谁家的弟子只要拥有一套“郑玄全集”，就可以了解整个儒教系统了。可以说，郑玄的课本成了孔子之后又一次统一的教科书。

随着东汉末年和曹魏初年，郑玄的弟子们在政权中逐渐升任高官，“郑学”也成了一门显学，正式取代了两汉的今文经学。当年横行一时的各大学派逐渐衰亡，被人遗忘，最终失传了。[150]

郑玄统一经学本来应该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但实际上，他的统一又是微不足道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斗争，为的是进入朝廷，掌握政权，影响社会。在东汉的整个繁荣期内，文人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不

仅没有成为政权的好帮手，还不停地制造麻烦。由于政权机器运行不畅，皇帝不能靠文人治理，逐渐倒向了宦官和外戚，引起了东汉政治的腐败和崩塌。

直到东汉已经不行了，汉代的经学才归于统一。时局的动荡已经把对社会的控制权从文人转到了武夫手中，依靠学问控制社会的时代结束了。

所谓儒家弟子们不仅没有为经学统一而欣慰，反而体会到了社会的幻灭。于是，他们不仅把今文经学抛弃了，甚至连儒家的理想都抛弃了。董仲舒创建的今文经学和谶纬两大系统，躲过了文人们的攻击，最终在武夫们的冲击下崩溃了。

两汉经学刚刚统一，就被抛弃，埋入了坟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叛逆和玩世不恭的哲学嬉皮士时代。

注解：

[1] 《史记·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2]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

[3]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4] 见《史记·项羽本纪》。

[5] 见《史记·高祖本纪》。

[6]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7] 见《史记·高祖本纪》。

[8]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9] 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10] 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11] 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12] 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13] 见《史记·黥布列传》。

[14] 《史记·高祖本纪》：“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

[15] 《汉书·高帝纪》：“郦商见审食其曰：‘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畔，诸将外反，亡可跷足待也。’”《史记》也有同样记载，但将郦商记为郦将军。

[16] 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17] 见《史记·孝文本纪》。

[18] 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19] 见晁错《论贵粟疏》。

[20] 见晁错《论守边疏》。

[21] 见晁错《削藩策》。

[22] 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3]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24] 见陆贾《新语》。

[25] 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26] 《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27] 见《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28] 见《汉书·艺文志》。

[29] 见《汉书·儒林传》。

[30] 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1] 见《史记·游侠列传》。

[32] 《潜夫论·断讼》：“春秋之义，责知诛率。”

[33] 《汉书·薛宣传》：“春秋之义，原心定罪。”

[34] 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35]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6] 《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37] 见《汉书·艺文志》。

[38]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39]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40]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41] 《春秋繁露·楚庄王》：“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42]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所见者，谓昭、定、哀，已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

[43] 见《汉书·董仲舒传》。

[44] 《汉书·艺文志》即反映了刘向的划分。

[45] 见《论语·先进》。

[46] 见《论语·述而》。

[47] 见《春秋繁露·阴阳义》。

[48] 《春秋繁露·阴阳义》：“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迹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而任，成天之功，犹谓之空，空者之实也，故清溧之于岁也，若酸咸之于味也，仅有而已矣，圣人之治，亦从而然；天之少阴用于功，太阴用于空，人之少阴用于严，而太阴用于丧，丧亦空，空亦丧也。”

[49]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50]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是故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长养于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积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于天数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

成，合于天道也。”

[51]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

[52]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王所取，仪金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数以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无失矣，备天数以参事，治谨于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与直道而行也。是故天子自参以三公，三公自参以九卿，九卿自参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参以三士，三人为选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时以终始岁也，一阳而三春，非自三之时与！而天四重之，其数同矣。”

[53] 《春秋繁露·王道》：“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

[54] 《春秋繁露·正贯》：“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旨之谓也。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幽隐不相逾，而近之则密矣，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

[55]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56] 《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少有的兼容并蓄的作品《淮南子》。

[57] 见《汉书·翟方进传》。

[58] 见《汉书·淮南王传》。

[59] 《淮南子·主术训》：“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60]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史记·平准书》中，这一篇章超越了时代，即便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看，仍然不落伍，甚至超乎许多当代经济学家之上。

[61] 关于汉武帝财政改革的情况，可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62] 参考《史记·酷吏列传》，汉代酷吏一半以上产生于汉武帝时期。

[63] 见《汉书·眭弘传》。

[64] 见《汉书·盖宽饶传》。

[65] 《汉书·儒林传》记载的奏章全文如下：“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

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

[66]　见《史记·儒林列传》。

[67]　《汉书·儒林传》：“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68]　见《汉书·儒林传》。

[69]　小夏侯又分成了五派，分别是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李（寻）。

[70]　见《汉书·张汤传》。

[71]　见《史记·平准书》。

[72]　公元前1年，丞相职位改称大司马，本统计也将大司马计算在内。

[73]　资料采自《汉书·百官公卿表》。

[74]　见《汉书·王莽传》。

[75]　《汉书·王莽传》：“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76]　《白虎通德论·封禅》：“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荚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德至草木朱草生，木连理；德至鸟兽则凤皇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德至山陵则景云出，芝实茂，陵出异丹，阜出莲莆，山出器车，泽出神鼎；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醴泉通，河出龙图，洛出龟书，

江出大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则祥风至，佳气时喜，钟律调，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贡。”

[77] 《汉书·王莽传》：“汉危无嗣，而公定之；四辅之职，三公之任，而公干之；群僚众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庙以安，盖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赐嘉号曰安汉公，辅翼于帝，期于致平，毋违朕意。”

[78] 《春秋纬·演孔图》：“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己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

[79] 《河图稽命征》：“帝刘季，日角载北斗，胸龟背龙，身长七尺八寸，名圣而宽仁，好任主。”

[80] 《汉书·宣帝纪》：“（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

[81] 出自《石渠礼论》，原书已佚，辑本来自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82] 《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

[83] 《汉书·儒林传》：“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

[84] 见《汉书·昭帝纪》《汉书·宣帝纪》《汉书·戾太子传》。

[85] 《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

[86] 《汉书·儒林传》：“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

[87] 《汉书·宣帝纪》：“（甘露二年春正月）诏曰：‘乃者凤皇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其赦天下。减民算三十。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金钱各有差。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88] 见《汉书·艺文志》。

[89] 见《汉书·张苍传》。

[90] 《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

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91] 《汉书·景十三王传》：“共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92] 另一处记载来自《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

[93]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94] 《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95] 《汉书·艺文志》：“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96] 本节描述参考了吴雁南等人著作《中国经学史》第二章第一节。

[97] 这种说法以《尚书·禹贡》为代表：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98] 这种说法以《周礼·夏官》为代表：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99]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00] 《汉书·楚元王传》：“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101] 《洪范五行传论》在《汉书·五行志》中得以大量保留。

[102] 见《汉书·刘向传》。

[103]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

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104]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105] 《移书让太常博士》全文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106] 《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明堂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107] 《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108] 张衡《东京赋》：“左制辟雍，又立灵台。”

[109] 见《汉书·王莽传》。

[110] 《汉书·王莽传》：“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一异说云。”

[111] 本表引自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的纬书综述一章。

[112] 《汉书·王莽传》：“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以万数。莽恶之，捕系问语所从起，不能得。”

[113] 《后汉书·公孙述列传》：“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

[114] 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115] 《后汉书·儒林列传》：“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116] 见《后汉书·尹敏列传》。

[117] 见《后汉书·儒林列传》。

[118] 陈元、郑兴治《左传》，杜林治《古文尚书》，卫宏治《毛诗》。

[119] 见《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120] 见《后汉书·陈元列传》。

[121]　见《后汉书·贾逵列传》。

[122]　见《后汉书·李育列传》。

[123]　《后汉书·杨终列传》：“终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124]　《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125]　分别是：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仕、辟雍、灾变、耕桑、封禅、巡狩、考黜、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瑞贽、三正、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刑、五经、嫁娶、绋冕、丧服、崩薨。

[126]　《白虎通德论·天地》：“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地者，易也。言养万物怀任，交易变化也。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为天地动而不别，行而不离。所以左旋、右周者，犹君臣、阴阳相对之义。”

[127]　《白虎通德论·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纲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诗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化端也。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纪助也。”

[128]　《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建初八年冬十二月）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

[129]　见《汉书·扬雄传》。

[130]　比如《后汉书·张衡列传》：“常耽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

[131]　《汉书·扬雄传》：“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

放依而驰骋云。”

[132] 《法言·问明》：“或问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为也。人为不为命。请问人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

[133] 《法言·重黎》：“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仇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

[134] 《法言·五百》：“邹衍迂而不信。”

[135]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136] 《后汉书·郑兴列传》：“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137] 《论衡·佚文》：“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138] 《论衡·变动》：“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何则？人物系于天，天为人物主也。”“故人生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人能，不达物器之理也。”

[139] 《论衡·论死》：“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140] 《论衡·论死》：“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元气荒忽，人气在其中。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论衡·订鬼》：“人之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

[141] 《论衡·正说》：“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142] 《后汉书·儒林列传》：“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143] 《后汉书·儒林列传》：“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东汉总人口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144] 《后汉书·儒林列传》：“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

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145]　《后汉书·儒林列传》：“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

[146]　见《后汉书·马融列传》。

[147]　《后汉书·郑玄列传》：“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148]　《后汉书·郑玄列传》：“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149]　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150]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

第二部
哲学嬉皮士：以自然的名义反叛教权
（公元166—公元316年，三国到西晋）

第六章
乱世文人抱脚难（公元166—公元220年）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彻底扒下了文人的尊严。宦官集团的胜利将文人分享权力之路堵死，也预示着汉代的权力哲学迎来了大变局。

东汉也是文人最喜欢拉帮结派的时代，由于私学发达，大的学者可以有上万的徒子徒孙，对权力形成了绑架。文人集团虽然有正义的一面，但党锢之祸也是权力本身对于文人绑架政权的不满与反抗。

皇帝禁止文人集团参与政治之后，为了解决官僚不足的情况，试图绕过原有的学术架构，另立学校，培养人才供应朝廷。但由于学术能力不足，无法填补官僚真空。

文人集团脱离政治后，也导致了一批“闲云野鹤”的出现，他们开始思考汉代哲学的问题，从而启动了对于玄学的探索。

公元168年（东汉建宁元年），汉灵帝刚刚继位不久，东汉大将军窦武就卷入了一场与宦官的生死争斗。[1]

窦武的女儿是桓帝的皇后，桓帝死后无子，窦武和窦太后商议立十

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为皇帝，是为灵帝。既然窦武是皇太后的父亲，又兼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本来应该是东汉最具实力的实权派。更何况与他一同在尚书台的太傅陈蕃是他的同党，他的儿子渭阳侯窦机担任侍中，侄子雩侯窦绍担任步兵校尉，掌管北营五军中的一军，窦绍之弟西乡侯窦靖也是侍中，监管羽林左骑。

窦氏一门都在权力中枢，又有谁能和他挑战呢？

答案是：宦官。当时的宦官是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与东汉历代宦官相比，曹节、王甫在窦武之前并没有显示出大恶的迹象，实际上，东汉宦官虽然权柄较大，但更多原因是皇帝和行政工作的需要。由于政治结构不合理，皇帝的许多打手工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能让宦官去做，时间长了，他们自然有了一定的权力。

灵帝初期，由于窦武等人的节制，宦官权力并没有大到不可收拾。曹节之所以有权，只不过是他奉命迎接灵帝入宫继位。而王甫也是个知是非的人，曾经在审判名士范滂时，被范滂的凛然所感动，主动帮他解开枷锁。[2]可见，作为政权机器零件的宦官，也并非十恶不赦，只是皇帝的工具而已。

但窦武在陈蕃的鼓动下，决定彻底铲除当权的宦官集团，并换上自己的、听话的新人。

然而，窦武的性格中有一个要命的因素：犹豫不决。这个因素又遇到了另一个障碍——窦武的女儿窦太后。窦太后认为，宦官集团是朝廷的一部分，代表着一定的行政功能，不可能全部不要；即便要诛杀某个具体的人，也需要合法的借口。窦武只好从长计议，从针对整个宦官阶层改为针对某些具体的个人。他首先请求太后诛杀了中常侍苏康和管霸，当桓帝去世时，窦太后曾想把桓帝的诸位妃子都杀掉，是这两个人苦苦劝谏，阻止了窦太后[3]，因此，对于杀这两个人窦太后是没有意见的。接着窦武又找借口要求诛杀曹节，这次太后认为理由不够，没有同意。但窦武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曹节做掉。

到了这年八月，由于天象不好，窦武决定提前动手。他首先把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都换成心腹，然后又奏免了黄门令魏彪，换上了

听话的另一个宦官山冰。接着，他逮捕了长乐尚书郑飒，关进了北寺狱进行审问，利用他来牵连曹节、王甫等宦官。

准备工作完成后，窦武决定，不仅对曹节、王甫动手，还要将前朝的宦官群体一网打尽，重新换人。但在这时，消息泄露了。

消息之所以泄露，是因为窦武在诛杀宦官时不得不利用宦官。当窦武离开官府回家后，执掌文书的小宦官立刻报告了长乐五官史（也是宦官）朱瑀。朱瑀看到窦武的奏章后，大骂窦武不近人情，认为他可以诛杀那些放纵的宦官，怎么可以把所有的宦官都族灭掉！朱瑀立刻行动起来，一面大声宣扬窦武谋逆想废皇帝，一面找了十七个人，他们共同起誓要杀掉窦武。

消息传到了曹节耳中，他迅速将皇帝、太后软禁起来，逼迫太后下诏书到北寺狱把窦武的同党尹勋、山冰杀掉。同时下令在南宫设防，关闭禁门，进行殊死抵抗。最后，又派人去抓捕窦武。到这时，窦武诛杀宦官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当宦官去抓捕他时，窦武逃到了兵营，召集他能控制的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扎在都亭，号令军士杀掉黄门宦官。与此同时，宦官也借助皇帝的诏书，命令少府周靖率领人马进攻窦武，双方进入了战争状态。由于宦官不得人心，窦武与宦官即便发生战斗，也并不落下风。

但这时，另一个人决定了双方的实力对比。东汉著名将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恰好从边疆归来，身在洛阳。张奂一生为人正直，不肯侍奉权贵，对宦官也没有好感，常常被宦官告黑状剥夺赏赐。但因为他刚回来，并不知道首都发生了什么事，曹节等人决定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张奂前往攻打窦武。

不明就里的张奂接到诏书后，立刻领兵前往都亭。身经百战的他显示出了巨大的号召力。窦武的士兵越走越少，散光了，他被迫自杀身亡，他的宗亲、姻属、宾客都被诛杀，就连窦太后也被软禁。[4]

窦武铲除宦官集团的图谋以他的死亡而告终，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也愈演愈烈。在窦武死前，曹节、王甫等人还有所忌惮不敢为所欲为，

窦武死后，缺乏制衡的他们变得专断跋扈，东汉的政治就彻底倒向了宦官集团。

窦武之死不仅仅是东汉政权崩溃的前兆，还是东汉文人的超级劫难。窦武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外戚，他还被当时的读书人尊奉为文人之首。与窦武合谋的太傅陈蕃则是另一位文坛领袖。当窦武死时，陈蕃已经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他一听说事情完了，立刻率领他的下属和学生八十多人，拔刀闯入皇宫的承明门，大呼：大将军是忠义为国，是黄门在造反，怎么反说窦氏大逆不道！

王甫出来与陈蕃争论一番，最后下令逮捕陈蕃。七十多岁的老人拔剑厮杀，抓他的人围了数十重，才把他送往北寺狱，当天就把他杀掉了。[5]

窦武、陈蕃死后，宦官们开始制造"党锢"，将他们的同党一网打尽，杀害的杀害，剩下的禁止为官。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这使得几乎整个知识圈都被禁绝。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给文人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除了被禁止当官之外，也发现了所谓的文人是多么脆弱，他们所相信的原则在暴力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在反思声中，东汉的哲学体系走向了崩溃。

但是，党锢之祸的发生又是一种必然，即便没有这次灾难，东汉已经失控的文人圈也必然导致另一次祸患，从这个角度说，东汉的哲学体系之所以崩溃，又可以理解为是它内部的原因。

夹缝中的文人结派

与西汉的酷烈相比，在历史上不声不响的东汉却是文人的白银时代。皇帝对文人更宽容，也较少对他们进行直接的迫害。

但文人生活悠闲的同时，权力却比西汉时期下降了。西汉大儒可以升任宰相，东汉的权力更多地被分给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由一些大家族把持，文人虽然受到了皇帝的优待，但权力却是减少的。

结果，东汉的读书人形成了不同于西汉的习惯：他们生活悠闲，喜欢拉帮结派，评论政事，却缺乏实际的政务经验。

在集结小团伙上，东汉人的群聚性可以让后世各朝代都甘拜下风。除了皇帝制造了三万人的太学供读书人交游之外，各地的地方学校以及私学都极其发达，私下里开门授徒的学者不下万人，而每个人的学生也都很多。

《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了一帮儒者的事迹，这些文人大都有大量的徒子徒孙，最多的几个每人有弟子上万人，少则数千人。这些徒子徒孙不仅是学知识，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搭把手。

当老师死亡时，是检验徒子徒孙规模的最佳时机。各地的弟子都要赶赴老师的葬礼，在葬礼上不仅仅是哀悼，还是炫耀的好时机。公元187年（中平四年），著名学者陈寔死亡，除了大将军何进派人吊唁之外，各地的徒子徒孙们倾巢出动，一共三万多人参加葬礼，披麻戴孝的都有数百人。[6]

这个巨大的读书人群体有着知识的自负以及怀才不遇的感慨，他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东汉的政局，并不时地拉帮结派对皇帝的政策品头论足，构成了巨大的清议压力。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务经验，却是政治提案的制造者。

到了灵帝时期，随着帝国政治的恶化，文人的拉帮结派运动也达到了高峰期，这时，全国性的文人网络已经形成，在这个网络顶部的，是被人们奉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三十五个人。这些人中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只是普通的学者，身居高位的需要普通学者们拥戴，普通人则需要高官的撑腰。在文人官员的领导下，读书人突然有了参政议政的归属感，并死心塌地地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表4　东汉灵帝时期的名士[7]

名称	意义	人名
三君	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窦武、刘淑、陈蕃
八俊	俊者，人之英也	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
八顾	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
八及	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	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
八厨	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

对读书人参政形成阻碍的，在东汉后期主要有两个集团。

首先出场的是外戚集团。比起西汉来，东汉的皇帝更加依靠内部人统治，最大的内部人就是妻子的娘家人。西汉时期还屡屡有平民皇后出现[8]，东汉光武帝之后，皇后默认只能出自几个大家族。

由于光武帝对中央权力系统进行了改造，边缘化了丞相所代表的外官体系，把原本属于外官的权力交给了宫内的尚书台，尚书台又控制在几个外戚大族手中，中央政府慢慢地变成了几个大族的战利品。

到了东汉中期，皇帝与外戚的冲突已经愈演愈烈，于是又引进了另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在正规的儒家经典上是没有地位的，没有圣人教导要怎么处理他们，但是皇帝却十分需要他们。这就是宦官集团。

公元92年（永元四年），宦官郑众帮助皇帝干掉了外戚窦宪。这是宦官势力得势的开始。

皇帝之所以不得不利用宦官，是因为宦官是最无法培养自己嫡系的势力的。与外戚时常利用读书人不同，宦官大都缺乏儒家训练，对于儒家提出的各种仁义道德也不在意，他们唯皇帝马首是瞻，且没有后代，不会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

之后，宦官与外戚发生了数次冲突，比如，安帝死后，宦官孙程诛杀外戚阎显，拥立顺帝；桓帝时期，宦官单超诛杀外戚梁冀。

到了桓帝末年和灵帝初期，桓帝的岳父、外戚窦武决定铲除宦官集团。出于需要，他开始与文人集团联合，并得到了文人集团的认可。在文人集团的推动下，窦武成为“三君”之首、文坛领袖。

除了窦武之外，对于铲除宦官呼声最强的是太尉陈蕃，两人联合后，窦武又借助皇帝把志同道合的尹勋封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还有曾经被废黜的名士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等，都被窦武找来列于朝廷，前越巂太守荀翌成了从事中郎，颍川陈寔作为下属[9]。

外戚与文人的联合，是文人集团试图更深入参与政治的表现。由于文人本身没有统治能力，必须依附于外戚或者宦官之一。与宦官相比，外戚还是较为名正言顺的集团。毕竟在白虎观所代表的哲学体系中，能够找到外戚的位置，却没有给宦官留下合法的空间。

窦武联合文人集团，准备对宦官集团动手时，文人集团内部的拉帮结派现象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所谓的结党时期。

儒教理想的终结

文人们在桓帝和灵帝时期第一次有记载的结派运动，可以追溯到桓帝刚上台之时。桓帝未当皇帝之前是蠡吾侯，当时曾经给一个叫周福的人当学生。周福是甘陵[10]人，与当时的河南尹房植是同乡。

桓帝当上皇帝后，为了报答恩师，将周福提拔为尚书。汉代人有利用歌谣嘲讽政治的习惯，这时，甘陵本地人就造出了一首民谣，叫“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大意是在肯定房植的同时，嘲讽周福依靠皇帝的裙带关系升官。这两家宾客互相嘲讽，各自树立朋党，在甘陵号称南北部。这就是桓帝时期党人的开始。[11]

另一个朋党事件出现在汝南和南阳，都是首都洛阳附近的重镇。这两个地方的太守都委任了一个特别能干的功曹，汝南太守宗资任命的是“八顾”之一的范滂，而南阳太守成瑨委任的是“八及”之一的岑晊。这两个人刚正不阿，用人严厉，得罪了不少人，他们提拔了一批官员来推

行自己的政策。那些嫉恨他们的人乘机说这是结党营私。[12]民间又出现了歌谣，嘲笑两个太守不管事，权力被两个功曹把持了。[13]

范滂、岑晊的名声传到了首都的太学之中，成了太学生们的榜样。当时的太学生领袖是郭泰和贾伟节，这些人又和官员李膺、陈蕃、王畅互相往来，共同抬高身价，再结交范滂、岑晊等，形成了更大的朋党群。这个朋党群遍及整个学术圈，学者们大都属于清议一派，他们对于时政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褒贬，构成巨大的压力集团。朝廷的达官贵人、宦官外戚，莫不对这个巨大的清议集团侧目，害怕被他们议论。

在清议集团中，又以已经获得了官职的陈蕃、李膺和王畅三人更加活跃。其中李膺由于担任河南尹（大首都行政圈的最高官员）而备受推崇，他执法时刚正不阿，甚至过于严厉。

在他当河南尹时，有一个叫羊元群的人离开北海郡的职位，带着大量的赃物离开，李膺控告他的罪状，却被羊元群行贿宦官，先告了状，李膺被反坐了。好在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李膺没有被判罪，反而当上了司隶校尉。吃过宦官亏的李膺对于宦官群体更是深恶痛绝。

当时一个有名的宦官叫张让，他的弟弟张朔是野王县令，张朔为人残暴无道，甚至有过杀孕妇的罪恶。当张朔听说李膺要惩罚他时，连忙逃回首都，藏在了哥哥张让的房子里。房子里的柱子是可以打开的，张朔就藏在柱中。李膺打听到了这个消息，率领士兵进入张让的宅子，把柱子打碎，把张朔揪出来带走。到了洛阳的监狱，先记录了他的供词，随后将他处死。大为震惊的张让连忙向皇帝告发李膺，李膺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最后，皇帝只好对张让说：那是你弟弟的错，怪司隶什么事？自此以后，宦官们不敢出宫门，害怕碰到李膺。

但李膺的清流精神总有遇到麻烦的时候。公元166年（延熹九年），有一个叫张成的术士与宦官集团交往甚密，有一次，他通过占卜得知（更可能是通过内部消息得到）皇帝即将大赦，就乘这个空闲教唆自己的儿子报私仇杀了人。杀人之后，果然大赦，也就是说杀人者被赦免了。这件事却让李膺感到愤怒，他不允许自己的辖区内出现这种事，于是不理睬所谓的大赦，照样杀掉了张成的儿子。

由这件事作为导火索，张成借助宦官的力量游说皇帝，一是告李膺不理睬皇帝的诏令私自杀人，二是趁机告李膺等人拉帮结伙、树立朋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皇帝大怒，下令各地逮捕所谓的党人，首先把李膺捉拿归案，之后抓了二百多人，还有很多人逃走后被悬赏，暂时没有抓到。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当文人集团受到第一次打击时，把集团从混乱中救出来的，就是外戚窦武。窦武此时还没有当上大将军，但作为外戚，又是文人，为了拉拢清议集团，他上书请求赦免这些党人。窦武和其他人的求情起了作用，皇帝下令将他们释放出来，但不再让他们当官。

这一次党锢之祸持续时间不长，但文人出狱后，由于失去了上升空间，更加拉帮结派，议论朝政。外戚窦武也就成了这帮人的首领，并且被奉为“三君”之首，俨然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

但是，当文人集团与外戚绑在一辆战车上时，也就成了最危险的时刻。

公元168年，窦武在与宦官的斗争中失败被杀，东汉读书人最后的转折点到了。窦武和陈蕃死后不久，对党人的大锤再一次落下。

这一次，出头的是张俭的一位同乡。张俭位列“八及”之首，这位同乡在宦官侯览的授意下，上书状告张俭和其他二十三位同乡拉帮结党，其中张俭是首领。这人又造了一个新的“八俊”“八顾”“八及”的名单，把这些同乡都编排进去，这和老的名单是完全不同的。灵帝下令抓捕张俭，命令下到大长秋曹节手中，曹节趁机下令逮捕老的“八俊”“八顾”“八及”，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最后死于狱中。剩下没有被捕的人中，要么逃走，要么被禁止当官。

李膺被捕前，他的乡人都劝他逃走，他说：出了事不要躲避，有了罪不要逃刑，我已经六十岁了，死生有命，逃又能逃到哪里？

他自投罗网，最后被拷打致死。[14]

范滂待在乡下的家里，逮捕他的督邮吴导来到县上，抱着诏书，闭上驿馆的门，伏在床上大哭，范滂一听就知道是冲着自己来的。他自投县上的牢狱，县令郭揖大惊，把印绶一解，要跟着他逃走。范滂拒绝了，他死时只有三十三岁。[15]

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十六年，后来才因为黄巾贼乱，朝廷急需人才而解禁。东汉文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务经验，动不动就回到儒家经典中去吵架。党锢之祸爆发前，由于朝廷花钱养着他们，同时又有一定的上升通道，即便无法上升，也因为是文人受到尊敬，他们可以四处游荡、悠然自得。但党锢之祸断绝了他们的上升通道，朝廷甚至抓捕、驱赶他们。流离失所之后，有人开始痛定思痛，不再寄希望于朝堂之上了。

在文人们对于治国平天下失去了兴趣之后，皇帝也陷入了没有文人拥戴的困局。皇帝在治理国家上，已经离不开宦官的帮助，但如果只有宦官，整个政权腐败的速度就会加剧，必须有文人在旁边监督，减少腐败。当文人集团离开后，皇帝只好想方设法重新塑造一个文人集团。

如果放在汉武帝时期，由于皇帝有足够的权威，这种塑造也可能有效，甚至创造出另一个体系来维持。但在东汉时期，皇帝已经没有权威了，他们的做法就成了笑柄。

皇帝想塑造的新的文人集团分成两个团体，一个叫鸿都门学，一个叫宣陵孝子。所谓鸿都门学，是灵帝试图取代太学机构设立的一个学校，地址在洛阳的鸿都门下，所以称为鸿都门学。所谓宣陵孝子，则是自愿为桓帝陵墓（宣陵）守陵的一帮人，由于东汉强调孝道，灵帝就把他们提出来做榜样，封了小官。[16]

且不论更加低级的宣陵孝子，仅看鸿都门学。与教授儒家经典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主要是教授辞赋、书画以及一些当官用到的实用性技巧，毕业后直接派去当官。[17]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废弃虚学，提倡实学，倒也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方法，但问题在于，当最优秀的文人群体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时，鸿都门学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抵制，只有那些投机分子和品行不端的人才会进入鸿都门学学习，这导致了质量的低下，无法填补党锢带来的真空。

失去了文人支持的皇帝与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文人双双成了东汉末年的输家，即便是曾经翻云覆雨的宦官们也没有笑到最后，当帝国已经没有了凝聚力，更加粗暴的武人上台，埋葬了延续数百年的儒教学术。

经学葬处，玄学萌发

党锢之祸将许多优秀的人才排除在政权之外，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感到难过。即便在党锢之祸之前，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政治感到失望，他们或者如同郑玄那样著书立说，或者开始了另一种更加悠闲的生活。

汉代哲学强调的是与政权的捆绑，但到了东汉后期，人们开始远离政权，过一种悠然甚至放浪的生活。当一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如此众多的文人死节时，另外的人却发现了一条通往鸟语花香的道路。

在党人中位于“八顾”之首的郭林宗，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被称为玄学的早期代表。郭林宗，名泰，字林宗，山西介休人。他年轻时就显现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质。由于他家贫，父亲又死得早，母亲让他到县衙打工，他拒绝了，认为“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他学习了三年就通了典籍，然后开始了全国性的游学。

在当时，河南尹李膺是人人都希望结交却结交不上的名士，当时同样很有名气的荀爽求见时，帮李膺赶了一通车，立刻高兴地四处炫耀：今天我给李君赶车了！

但郭林宗去见李膺时，李膺立刻引为知己。李膺的器重也让郭林宗名震京师，他离开时，送他的人乘坐着上千辆车，到了黄河，李膺和郭林宗一同乘船离开，其余的人只有看着的份，以为他们是神仙。史书上说他“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

郭林宗气质独特，一直拒绝为官。他四处游荡，又具有很强的正义感。他在母亲去世时极尽孝道，在陈蕃身死后痛哭流涕，不久就死去了。虽然他有正义感，但由于他从不危言耸听，即便那些制造党锢之祸的宦官也奈何不得他。

郭林宗最擅长的是品评人物。所谓品评，不仅仅是评头论足，而是如同伯乐一般将异人从凡人中寻找出来，鼓励他帮助他成才。在郭林宗的传记中，列出他发掘的人才带姓名的就有二十几个，另外还有没有姓名的六十个[18]。

在后来的魏晋玄学中，一个分支就是评价人物的才性。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班固的《汉书》，班固在书中专门列了一个表，叫《古今人物表》，将从上古到汉代的名人分成九等，列在表中。由于缺乏标准，这个表也是《汉书》争议最大的篇章之一。但班固的精神到了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却成了一种风尚，人们习惯于对人物进行评级，甚至曹魏建立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也带着这样的痕迹，要求把人才分成九等，便于任用。而郭林宗对于人物的品评显然起到了推进作用。

郭林宗所表现的出世感已经有了很强的魏晋之风，可是，他本人虽然脱离了政治，但关注点仍然在政治之中，所以在陈蕃死后，他伤心而死。

在东汉时期已经有了更加远离政治的人士。这个人叫徐稺，字孺子。他完全断绝了一切与政治的联系，过着隐士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彻底放弃了汉儒所推崇的礼仪观念，而是采取了与道家类似的人生态度。

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太尉黄琼死后，徐孺子背着粮食徒步到江夏，买了只鸡，摆上薄酒，哭了几声就离开了，连姓名都没有通报。这时郭林宗也在当地，听说后立刻知道就是徐孺子，连忙派人去追，追上之后，徐孺子与来人吃了一顿饭，临走托他带话给郭林宗：大树快倒了，一条绳子根本拉不住，不如找个安宁的地方待着。[19]

即便他的好友郭林宗母亲去世，他也是带一束草放在屋前就离开了。

由于儒教讲究“礼”，所以汉代人讲究厚葬。到了徐孺子这里，已经彻底摆脱了儒教思想对人的束缚。

《后汉书》还记载了许多人的事迹。周勰从小喜欢玄虚，学习老子

的清净，但该玩的时候又能游晏自如，随心所欲。戴良在母亲去世时照样喝酒吃肉，只是在悲哀到极致时才偶尔哭泣，这和礼法要求的必须一直哭泣，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但戴良却毫不在意流俗。向栩也深受老子影响，不修边幅，喜欢长啸，如同学道，又如同癫狂。袁闳在党锢之祸时披散头发，想与世隔绝投入森林，却由于老母在不能远行，就在家旁盖了间土房，每天隔墙拜母亲，但又不和母亲见面[20]。这些人或疯或癫或狂，共同构成了东汉末年知识分子挣扎的形象。

但是，此时的知识分子又和魏晋玄学有距离。玄学除了行为学之外，还有着背后的理论基础，这就要从汉代的儒教哲学中打破出去，建立新的理论基础和世界观。而东汉末年的人虽然已经开始亲近老子，从道家寻找精神寄托，却没有独创的思想来支撑他们这么做。他们之所以这样，只不过是因为政权不接纳他们，或者他们不信任政权。这是经学哲学瓦解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玄学哲学建立的时刻。要想建立玄学，必须等到人绝望够了的时候，才会想到重新建立另一套。

这就像现代一样，世间人们开始四处寻找新的信仰，有的人回到儒家，有的人找到民族主义，有的人回到宗教，而宗教又有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但仅仅在现成的理论中寻找答案，最终是无法满足人们需要的。于是，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就是创新。

玄学诞生的时候到了。

第七章
一切都是“无”（公元220—公元260年）

汉代哲学讲究的是灌输和盲从，不要求学者们去追问为什么，只是将“天人合一”的理论灌输给他们，要求他们必须相信。魏晋哲学的本质却是思辨，要求人们从“什么都不相信”出发，用自己的理性和逻辑，去寻求应该相信什么。

所谓玄学，是一种质疑精神，一种方法论，对五花八门的现象提出质疑、辩论，恢复人的思考能力，这种态度就是玄学。

玄学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看上去各不相干，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思辨的逻辑去分析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这个特点让玄学成了打破旧有观念的最好武器。

玄学的萌芽期，来自学者们对政权的不满。他们认为政权和皇帝是无知的，分不清人才的好坏，开始探讨建立一套更加科学的人才鉴别标准。品评人物，就成了玄学的第一个主题。通过品评人物，发展到对人的“才华”和“天性”关系的讨论，试图用逻辑来论证才性问题，这就进入了思辨的节奏。

玄学的成熟期，是两个嬉皮士利用思辨的力量来解决宇宙的本源问题，并提出了不同于“天人合一”的另一套理论：整个宇宙不是诞生于天人合一，而是从“无”这个抽象概念诞生的。

汉代哲学认为功名利禄也是天道的一部分，而玄学的“贵无论”则认为，人们生活的目的是回归自然。

公元256年（甘露元年）魏国皇帝曹髦与群臣的几次辩论，让我们在形式上看到了玄学的影子，但内容又带着浓重的经学特征。他处的时代，恰好是经学向玄学转变的初期。

曹髦当皇帝时已经进入了魏国末期，三十多年前，魏王曹操[21]的儿子曹丕在父亲去世后，终于抑制不住篡权的冲动，取代了汉朝。群臣的劝进，曹氏的扭捏推辞，汉献帝的配合，如同王莽取代西汉一样重复了一遍。此时，汉代经学的作用已经只剩下一个：给统治者找借口进行统治。

然而，经历了文帝曹丕和明帝曹叡之后，曹魏的政权被司马氏掌控，到最后，司马师废除了皇帝曹芳，将帝位授予了年轻的高贵乡公曹髦。

曹髦得到帝位后，却深知这个皇帝是司马氏的玩物，他不甘心当傀儡，开始了反抗。在京城之外，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也先后发动了针对司马氏的起兵，却不幸失败了。

与在外将领的武力反抗不同，在首都的皇帝曹髦根本调不动军队，只能做橱窗里的小丑摆个姿态，于是，和身边文臣的辩论就成了皇帝表达不满的舞台。

第一次辩论发生在公元256年二月，当时皇帝在太极东堂大宴群臣，随后，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人讲述礼典。曹髦之前的皇帝曹芳年号叫正始，一般认为，魏晋玄风就是从正始年间正式开始的，而玄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品评人物。曹髦与群臣谈着谈着，自然也进入了品评人物的节奏，这次他们评论的人物是夏朝的君主少康以及汉朝皇帝刘邦。

少康是夏朝著名的君主，他之前的君主叫太康，太康时期夏朝出现了衰落，结果被东夷（位于现在山东境内）灭国了。少康则聚集了夏朝的残众，击败了东夷，完成了复国，这就是“少康中兴”。汉朝皇帝刘邦则属于开国皇帝。这次争论的题目，翻译成现代人能理解的词句，就是：开国之君和中兴之主，谁更伟大？

群臣大都支持刘邦，认为开国之君要比中兴之主更伟大。而曹髦则认为开国往往是乘着前朝的衰弱顺势而为，而中兴是将已经衰落的势头逆转过来，难度上要大得多，所以，少康优于汉高祖。群臣为了照顾皇帝的面子，最终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观点。[22]

这场辩论已经流露出了曹髦的志向，他认为自己当皇帝后，曹魏的政权实际上已经被司马氏篡夺了，而他要做一个中兴之君，将国运逆转。

第二次辩论发生在同一年的四月份，皇帝到太学和众儒家辩论。这次的辩论形式上是玄学式的，但主题却是经学的。

在曹髦时期，从经学中突然出现了一位叫作王肃的人，将东汉末年本来已经被郑玄统一的经学又强行分裂了。

实际上，从曹魏开始，经学已经衰微到了寒碜的地步。魏文帝曹丕虽然恢复了太学，又恢复了部分考试制度，但这时的太学已经和东汉鼎盛时期有了天壤之别。表面上看，太学生人数从最初的数百人恢复到了最高千把人，但这些人大都是因为天下战乱跑到太学里来避难的，至于学习则谈不上。到了皇帝曹芳时期，朝堂上的公卿百官有四百多人，能够操笔写作的不到十人，大部分人都只是为了吃饱饭。至于郎官和司徒领吏更是达到了两万多人，能够用文章来回答皇帝问题的也没有多少。[23]

经学已经微不足道时，王肃却是个例外。魏晋时期王肃的解经曾经暂时性压倒了郑玄，人们称他的学问是“王学”。他曾经做过《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的注，并把他父亲写的《易传》做了整理和刊行。这些书都成了魏国后期的教材。

王学与郑学的区别是：郑玄综合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谁说得对，就选择谁的经义；而王肃精通的是古文经学家贾逵和马融的理论，他主要从这两家来寻找理论上的弹药库，一旦这两家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他就伪造一部分书籍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魏晋历史上有不少伪托古人做的伪书，其中儒家伪书多和王肃有关。[24]

在魏晋时期，王肃对于经义的注解超过了郑玄，成为逐渐缩小的儒教群体的精神支撑。魏国大臣中仍然有儒教修养的人大都跟从了王肃，但是曹髦却是王学和郑学兼修，并且更加偏向于郑学。

那么，王肃为什么能够垄断曹魏时期的经学解释呢？这和他的身份有关。他的第一个身份是重臣王朗的儿子。在《三国演义》中，司徒王

朗是被诸葛亮骂死的，但在真实的历史中，王朗却是位兼有品德和文采的重臣，并且获得了善终。[25]仅仅这个身份还无法说明王学为什么如此受人推崇，王肃的另一个身份是司马昭的岳父[26]，群臣们不给王肃面子，也必须给权臣面子。

当司马氏掌权后，王肃的学问开始横扫整个魏国政坛。但是到了高贵乡公曹髦上台后，皇帝反司马氏的情绪就给群臣带来了新的困扰：到底是支持王学还是郑学，成了群臣们站队的选项。

这天，曹髦视察太学时，首先和学者们讨论了一通《易经》的问题，从三代以上的圣人，到孔子和郑玄，皇帝都提出了疑问，表现了他的质疑精神。

讨论完《易经》之后，开始讲《尚书》时，才真正展现了皇帝的思想。皇帝抓住了《尚书·尧典》中的一句话，其中郑玄和王肃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尧典》是尧舜禅让的故事，由于司马氏掌权，曹氏衰弱，所以尧舜禅让的故事被授予了格外的意义。曹髦自然站在了尧的立场上，而许多人为了讨好司马氏，恭维司马氏是舜，要通过禅让获得尧的王位。

皇帝和学者的冲突发生在“若稽古帝尧”这一句，对于“稽古”这两个字，王肃和郑玄有着不同的解释。郑玄认为：“稽古”就是“同天”的意思，是说尧和天一样伟大。王肃认为：“稽古”就是“顺考古道而行之”的意思，是说尧考察了古代的做法，决定跟着做。这就给后来的禅让做了铺垫。

皇帝赞同前一种说法，是为了给自己的地位做辩护；学者们支持后一种，则是给司马氏做铺垫。皇帝和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博士庾峻你来我往辩论了起来，直到庾峻承认自己的“愚见”不能答复，才告一段落。[27]

曹髦虽然依靠权威压住了群臣的辩论，但手无军队的他却无法在事实上战胜司马氏，后来在一次冲动中送掉了性命。

我们之所以对曹髦与群臣的辩论这么感兴趣，是因为这场辩论恰好

反映了经学向玄学的过渡：两汉经学到了曹魏时期，已经失去了活力，除了给政治斗争的人群找个借口之外，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功用。

即便是用到经学的地方，但在辩论上却已经玄学化了。曹髦和群臣品评少康和刘邦，就是典型的早期玄学做法。这一派叫“才性派”，以品评人物为乐，不仅品评当代人物，还在古人之间、古人与当代人之间比来比去。流传下来的最著名的品评人物的书籍《人物志》甚至专门讨论如何划分人物的才性，好对人物分门别类，俨然认为这是一门管理科学。[28]

而在辩论《尧典》时，所用到的辩术也是玄学的。特别是皇帝曹髦，由于他的地位与司马氏冲突，更加借重于玄学的辩论技术与学者争论。

在唐代之后，人们把学问总结为“传道授业解惑”，通俗一点，就是老师给学生填鸭式教学，而在魏晋，学生们却更看重技巧。玄学最重要的技巧是辩论，双方寻找一个题目，并施展各自的手段进行辩论，其中的逻辑力量并不亚于现代。

魏晋玄学在现代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代表着人们的自由精神被压抑了数百年后，又获得了一次释放的时机。于是，它脱离了当初的政治含义，成了一种彰显人类自由的运动。我们要追寻的，除了什么是玄学之外，还有：它是如何在政治中产生？又如何跳到了政治之外，成了一种象征？

何谓玄学？

所谓玄，最早出现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的“玄”，与“道”同义，就是天地之间总的规律。最著名的玄学家之一王弼在《老子指略》中将玄解释为深远。[29]所谓玄学，就是深远、深邃的学问。

这样说还是太深奥了，用现代语言总结来说，所谓玄学，不是一个像汉代儒教一样体系化的东西，而是故意将原来的体系否定掉。玄学其

实是一种质疑精神，一种方法论，对五花八门的现象提出质疑、辩论，恢复人的思考能力，这种态度就是玄学。它其实更多的是教会人如何思辨地看待世界。

当你看到有的人品格很高，但才能很低，有的人满肚子坏水却很有能力，突然想到，这和圣人教导的“人的天赋与道德是统一的”不是矛盾了吗？于是经过思考，提出了人的“才干”和“品德”是分离的。这个理论虽然小，但你思考的过程其实就是玄学。

当你思考万物的背后有什么，是不是老天爷，最后得出结论，不是老天爷，而是“无”或者“空”，有点儿类似于大爆炸理论的奇点，这样的思考也属于玄学。

当你读到孔子不喜欢郑国和卫国的音乐，说它们是“淫声”，你提出质疑：声音还有什么好坏！然后论证这个质疑，得出结论：声音没有悲哀和欢乐。这个论证过程就是玄学。

当你思考“语言到底能不能把客观世界全都表达出来”，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论证，这就是玄学。

玄学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看上去各不相干，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思辨的逻辑去分析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这个特点让玄学成了打破旧有观念的最好武器。

玄学为了发展思辨性，也有着一定的理论储备作为弹药库。这个弹药库包括三本书：《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书称为“三玄”。其中《周易》是儒家经典，《老子》《庄子》是道家经典。玄学更偏向于道，之所以对《周易》重视，在于这本书与其他的儒教经典有所不同。

其他的儒教经典强调的是一个“礼”字，周代是一个最尊重礼的朝代。但在“礼”之外，周代也从夏商两代继承了另一个特征：占卜文化。《周易》就是一本关于占卜的书，与其他书强调“礼”不同，《周易》强调的是“变”，与其说是周代文化，不如说是更早文化的残留。

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期，将其他的儒家经典都烧了，却保留了《周

易》，因为他根本不觉得这本书是儒家的，只认为它就是一本占卜书。

《周易》的变还不是特殊的变，而是千变万化。由于占卜是一种高度不确定的行为，对《周易》的解读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这种自由度让《周易》成了历代术士的宝库，可以对它进行随心所欲的解读，即便现在，算命先生们也总宣称是利用《周易》来算卦的。

道家、玄学、阴阳学都看上了《周易》的千变万化，当需要找古书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时，总是将这本最含糊的书揪出来。

虽然三本经典有了，玄学的出现，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仍然回到东汉末年，随着党锢之祸以及东汉社会的崩塌，大量的学者离开了圈养的知识圈，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了社会的残酷并不符合所谓的天道规律。

董仲舒说，天人是合一的，天的运行反映了人间的状况，而人也影响着天的征兆。只要人们遵从皇帝的领导，皇帝又遵从天道，那么世界就会和谐、和平、和睦，不会有天灾人祸，也不会有朝代更迭。

但到了汉末，董仲舒的假设却严重背离了人们的感受。人们突然发现，即便他再守规矩，仍然免不了成为鱼肉，皇帝甚至连性命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又怎么去“替天行道”？到底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那所谓的“天人合一”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跑到哪里去了？

学者们发生了两个方向的转向。

第一，他们的学问从儒家的五经转向了三玄。在他们看来，汉代经学利用五经做的那些牵强的比附已经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了。反而是三玄所代表的精神，更与现实合拍。三玄中，首先是《周易》，世界之所以如此乱套，是因为它太复杂了，其中的变化需要《周易》这样的复杂系统。其余四经讲的是一个确定的世界，信服度不够。对典籍研究的变化，决定了学者的思维已经逐渐跳出了汉代的天人合一和谶纬。

第二，学者们由于无法被政权吸收，游荡于江湖时，仍然不免讽刺一下朝廷和皇帝的无知。于是，与皇帝选人标准不同的另一套标准建立了起来。既然皇帝无法识别人才，那么江湖自有标准，在文人的世界里，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的品格优秀，谁的学问更好，都自有公断。

这种与皇帝不同的品评人物的做法，就成了玄学萌芽期。

最初品评人物，还只是笼统地评价，但后来人们开始制定标准。比如，两个人比较时，人们可能说，甲的天赋高，但乙的造诣大。这其中“天赋”和“造诣”就是不同的标准。品评人物集大成者刘劭在他的《人物志》中，就把人才分成了十二种。[30]品评诗歌的著作《诗品》则把诗人们进行分门别类，试图寻找出优劣排序。[31]

如果说，对人物的品评还是文人对社会的一种反应和行为的话，为品评人物设立标准，就已经表明文人开始寻找理论了。

在寻找理论的过程中，人们发明了一种划分方法，即“才”和“性”的二元划分。所谓才，就是一个人能力的外在表现，所谓性，就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这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现象”（对应于才）和“本质”（对应于性），就有点儿接近了。

当人们开始对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时，就已经上升为哲学问题了。这也可以看出魏晋玄学和汉代经学的区别。两汉时期的哲学匠人很像现代的小学老师，他们只告诉你，官方规定的静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不准怀疑，只准全盘接受。一个人没有怀疑的权利，只能按照传授的规矩生活。

可以说，汉代经学首先创造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再用它来解释一切，是由“大”（宇宙）到“小”（社会、家庭、个人）的思路。而玄学最初研究的就是“小”的，研究人的问题，然后从“小”，再研究到“更小”（微观），也就是人的才和性的问题，两者的研究对象是迥然不同的。

才性问题的研究以魏国的正始年间为盛。正始是魏国皇帝曹芳的年

号，对应时间是公元240年到248年。这段时间恰好是司马氏篡权的时期，上一个皇帝曹叡死后，权力掌握在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手中。在接下来的斗争中，司马懿用计策铲除了曹爽的势力，基本上控制了曹魏的政权。[32]这一段时期是政治上变动最为剧烈的时候，也是许多人政治幻灭的时候。政治上的幻灭催生了哲学上的发展。所以，这一段时间也被称为玄学哲学化形成的时间。玄学的出现，也被称为正始玄风。

关于才性问题，正始时期的人看法各个不同，但基本上有四类：一、才和性这两种东西，其实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外在表现出的才能，和他的内在品质是一样的，看不出什么区别，这叫“才性同”。二、“才性异”，外在才能和内在品质并不相同。一个人的品质可能很好，但外在之才也许并不佳，另一个人看上去很有才，但实际上资质并不行。三、“才性合”。才性虽然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整体趋势是一致的。四、“才性离”。才性之间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关于“才”和“性”的这四种观点，总称为“四本”。[33]才性问题本来是非政治性的，但在魏国，因为不同的人持不同的观点，而不同的人又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结果才性问题就和政治派别结合了起来。

在汉代，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来，但是统治者暗含地认为“才”和“性”是一回事，有品格有道德的人才会有才华。可是，到了魏王曹操时期，由于天下的读书人已经不多，曹操也更重视实务经验，所以，主张把一个人的才和性分开，即便这个人道德上有缺陷，但如果他有才华，能够胜任官府中的具体事务，那么就应该受到重用。

曹操之后的魏国皇帝大都继承了这个思路，认为“才”和“性”不是一回事。不过他们内部也有分歧，有的认为“才”是第一位的，有的认为“性”是第一位的。

司马氏崛起后，他们对才性问题采取了更为保守的看法，为了打击忠于曹魏的人，往往借助人品问题做文章，就开始强调“才”和“性”是合的。还有一部分人处于中间骑墙的位置，谁也不想得罪，就主张才性是离的，没有什么必然联系。[34]

才性问题是玄学作为理论哲学寻找到的第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名理问题。

“才”和“性”基本上是针对人来说的，才性如果扩大到整个世界，就是所谓的“名”和“理”的问题。所谓名，指的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以及事物具体的个体属性。所谓理，指的是事物的实质属性，或者事物的总体属性。

从才性到名理，又是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也就是把研究对象从人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汉代经学是从自然到社会，而玄学则是首先考虑人，再到人的品质，最后扩大到自然，其中的人文关怀也就在这里。

在研究名理问题时，玄学的哲学性发展到了最高峰。这时候，玄学与汉代经学中的另一大区别显现了。汉代经学是比附式的，也就是首先创造一个理论，再根据这个理论构造一个固定的世界，把一切现象都比附进去。一旦打雷，不是去考虑雷是什么，而是立刻想到雷是老天爷在警告人类做错了事情，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是一种生搬硬套。玄学却是思辨式的，它强调一个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要禁得起推敲，禁得起质疑，禁得起来回的辩论。如果说，汉代经学和西方的宗教很相似，只允许相信，不允许质疑，那么魏晋的玄学就和西方真正意义的哲学很类似了。

在思考名理问题的时候，产生了几个流派，第一个就是正始时期何晏和王弼的贵无派。所谓贵无派，是研究名理问题时，认为万物的实质，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无”字。这个“无”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更像佛教的概念“空”。

以后，魏晋的玄学就围绕“无”这个概念做文章，并从各个角度来辩论，希望揭示名理之间的关系，或者找到万物的“名”和“理”。

魏晋玄学除了理论上之外，还有两个很强烈的特点。一个是在形式上强调辩论。人们不分师承、不分背景和身份，在辩论时都是平等的。

一场辩论有一个题目，再由双方各自摆出自己的观点，然后互相寻找对方的矛盾所在。而其余的人都是听众，并且用公论的形式来评定优劣。公论很像现在的投票制度，谁的支持者多，谁就胜利了。有时候双方并没有辩出胜负，听众们却大呼过瘾，因为他们听到了最好的辩论技巧，以及最出乎意料的论点和论据。

第二个特点是，由于玄学题目脱离了政治题目，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表现在生活上，就是放诞不羁，惊世骇俗，脱离了儒家社会的教导。不管是嵇康临刑前的从容不迫，还是阮籍、刘伶的嗜酒如命，或是郭象、葛洪的神仙气质，都让人赞叹不已。

正因为这两个理论之外的特点，玄学吸引现代人，不是因为它研究的题目（才性、名理），反而是那些人物的作风、个性和生活方式，至于他们对于政治的蔑视，更让人神往了。

阴阳、五行与才性

品评人物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叫刘劭，他写的一本《人物志》流传到了今天，成为我们研究魏晋早期玄学的经典文献。

刘劭出生于汉灵帝年间，受到过正统的经学教育，他死时，已经是魏国正始年间。他曾经担任过许多和文化有关的工作，比如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之后又负责首都官员的考察和评价，为此他写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当作典章制度。所以，刘劭对于评价和分类学颇有研究。[35]

而他所写的《人物志》最能代表他在品评分类上的功力，分析它的内容，也有助于理解魏晋时期是怎么品评人物的。

由于受过经学教育，刘劭的思想还有汉代的特点，一定要从大到小叙述。所谓从大到小，就是说出发点一定要回到宇宙论上去。他认为，人作为带血气的物种，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质”，也就是人类最根本的属性，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第二个方面叫“性”，也就是人的性格，每个人是不同的。第三个方面叫“形”，也就是人的形体，是

人的外在表现。

从宇宙学上来讲，人的这三个属性是从不同的源头得来的，人的“质”是来自于“元一”，也就是天地间最基本的气或者元素，是万物的根本。“元一”作为根本的气分化后，轻气上升形成了“阳”，浊气下降形成了“阴”，于是就生出阴阳，而阴阳则是生成人的“性”的源头。从阴阳继续变化，生出五行，而五行就是构成人的“形”的源头。

刘劭通过区分质、性和形，就与元一、阴阳和五行联系了起来。

阴阳对人的困扰是它决定了人的品性，比如，阳气重的人好动，明白通达，但是不善于深思熟虑；而阴气重的人正好相反，动作慢，但是善于思考。不过，与董仲舒认为“阴是坏，阳是好”不同，刘劭的阴阳并不区分好坏，只是不同特点罢了。到底是动作快好，还是善于思考好，答案或许是，都好，但又都有缺陷。决定人的好坏的，在于五行。

金木水火土五行，对人的影响是在身体上的，木对应着人的骨头，金对应于人的筋，火对应于人的气息，土对应着肌肉，水对应着血。除了生理上，五行同样影响着人的性格，木对应着人的“仁”，火对应着人的“礼”，土对应于“信”，金对应于“义”，水对应于“智”。所以，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因为五行而生的。再进一步分析性格，人的“仁”外在表现叫弘毅；“礼”的外在表现叫文理，所谓文理，就是气质清朗；“信”的外在表现叫贞固，所谓贞固，就是体质端庄诚实；“义”的外在表现叫勇敢；“智”的外在表现叫通微，也就是通达精微。

这样，通过阴阳、五行，就把人的优劣决定了。而通过分析人的相貌、姿态、性格，就可以得到这个人由阴阳、五行决定的品质。这就是当时品评人物背后的理论基础。

那么，如何通过观察人物来知道他们的品格呢？刘劭给出了九种特征，这就是所谓“九征”，也就是观察人的九种指标、九种征候。这九种征候是：“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势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36]

通过这九种征候，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优劣了。一一对应九个指标，如果人能做到平澹、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就是最高境界，是纯粹的德行。如果无法全部达标，只有一部分合格，就是所谓偏杂型人才。

根据一个人能达到多少指标，又可以把人分成五类。

第一类是所有标准都达到的，这样的人有个名字，叫作中庸，也叫作圣人。

第二类是这些标准都几乎达到了，但又差这么一点儿，这种人叫作德行，或者大雅。

第三类是至少有一类标准达到了，其他的没达到，但也没有违反，这种人叫作偏才，也叫小雅。

第四类是都没有达到，但有一征似乎还算可以，这种人叫依似，也叫乱德。

第五类是有的达到了，但有的又彻底违反了，这种人叫无恒，也叫间杂。

但作者对于偏才也并没有歧视，他总结了十二种偏才，分别是：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辨、雄杰。这些偏才虽然不能成为圣人，但都有作为人臣的潜质，所以，要有圣人来学会利用他们。

通过这种框架，刘劭就完成了自己的伯乐术。之后的人们虽然在理论上大同小异，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相信人才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魏晋时期也就成了一个品评人物的高峰时期。

所谓高峰，是指从政府到私人都以发现人才、品评人才为乐趣。政府制定了如同相马一样的人才选拔术，叫“九品中正法”。[37]

所谓九品中正法，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汉代时依靠察举选择人才，各郡的太守每年要负责向中央举报人才，由中央检查合格后，予以

任用。但后来，察举失实了，官员们举报的人才都是自己亲朋好友的儿子，甚至酒囊饭袋也送上来不少。到了魏国，推出九品中正制，制定了一些选拔人才的标准，防止官员们随便乱报。

这个标准把人分成了九个等级，最高等级的是圣人，由于人们认为世上很少有圣人，所以这个等级等于是空缺的，而次高等级的人才就已经是最了不起的。至于如何评价人的等级，很可能采取的是与刘劭《人物志》类似的方法。

但是，九品中正制实行了没多久就失败了，原因在于，人才实在太难量化了，也许这个人在甲看来是上中等，也就是第二等，而在另一个人看来，只不过是下中等，倒数第二等，所以最终选拔的人才仍然都是亲朋好友的后代。

虽然朝廷选拔人才失败了，但在私人和民间，品评人物的做法仍然非常普遍，他们不需要进行量化，只是给一个评价就足够了。

在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中，有许多篇幅都和品评人物有关。比如，《世说新语》中有专门的两卷，叫作《赏誉》和《品藻》，通篇都是对从东汉末到南朝的人物的评价，前者偏重于评价个人，后者偏重于对比。如它谈到，在汉末名士中有两个人叫陈蕃（党锢“三君”的最后一位）和李膺（党锢“八俊”的第一位），当时人们认为他们水平相当，无法定夺孰优孰劣，这时一个叫蔡伯喈的人评价说：陈蕃强在他敢于犯上，而李膺强在他严于对下，比起对下来，犯上还是更难一点。就因为他的一句话，陈蕃就排在了李膺之前[38]。

再如，人们对诸葛瑾、诸葛亮兄弟和他们的从弟诸葛诞的评价，这三个人分别在吴、蜀、魏三国担任大臣，认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世说新语》的其他篇章，也都是对于人物的品评。比如，竹林七贤之中，山涛评价嵇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39]，将嵇康身材修长伟岸，风度翩翩又桀骜不驯的神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王戎则评价山涛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40]，正好点出了竹林七贤的特色，他们有着深厚的才华，

却又不事雕琢，傲物独立。

魏晋时期对人评价的名句妙语辈出，其背后的评价逻辑，正是玄学的一大特色。

另外，对人物的品评还有一个好处，虽然官方的人才选拔评价极其失败，但是私人的评价却总是能够闪光。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一场聚会、一次活动中脱颖而出获得赞誉，他就有了走向仕途的资本，被名士引荐，甚至成为名士的女婿。正是通过这样的非正式评价体系，魏晋维持统治阶层稳定性的同时，又可以吸纳一定的新鲜血液，保证人才不会匮乏。

嬉皮士的贵无论

品评人物只能算玄学的一个偏门的小分支。人们也许不会料到，魏晋玄学的正门，却是由两个嬉皮士踹开的。

这两个嬉皮士是中国式纨绔子弟的典型，他们生活腐化、沉湎情色、吸毒，与正人君子的形象毫不沾边。

与古代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拥有大麻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代表性植物毒品。但中国古人却发明了一种矿物性的替代品——五石散。五石散是用矿物（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配制的一种药剂，据说可以长生不老，但实际上吃了却浑身燥热，出大汗，长期服用可能要人命。魏晋时期人们寿命短，除了战乱之外，富人文士们的早夭可能与这种药有关。

服用五石散的风气，就是由一位叫何晏的人倡导的，他就是本节的主角之一。在魏晋时期可能是服用五石散致死的名单中，我们可以找到本节的另一位主角：王弼。王弼二十四岁就死了，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死于药物中毒。在这短短的二十四年间，他创立了玄学的第一个代表性理论：贵无论。

魏晋时期的人们不热衷于背诵经文，而是更看重思辨和灵性，汉代

的儒生的形象是白发鸡皮的老头子，因为他们要先花大半辈子背书，才能出人头地，但魏晋时期许多年轻人却凭着论辩的智慧，在十几岁、二十岁就已经成了名士。

王弼[41]，字辅嗣，出生于曹魏建国之后的公元226年，死于公元249年。他出生于世家，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是他的继祖父（本来是族中祖父辈）。

三国时期，各个地方的学术界是不同的，玄学主要在魏国发生，在吴国和蜀国两个国家内部，也没有遵从汉代经学的教导，同样发生了偏离。

在东吴，由于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东吴的君主更加倚重于江东的世家大族，虽然表面上没有提，君主实际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回归了黄老之术的传统。

而在蜀汉，诸葛亮代表的官僚集团采取法家的思想进行统治，同样抛弃了儒术。

曹魏的统治者虽然仍尊崇儒教的地位，但由于曹氏并非出自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而是出自较小的庶族家庭，他们也更多地借鉴了刑名和法家传统，将碎片化的社会强行捏合在一起。但随着社会的玄化，不管是刑名还是法家都无法抵抗玄学的力量。

除了笼统地说几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之外，有一个地区却值得专门提出，那就是荆州。荆州位于现在的湖北省西部，从地理位置上说是中国的中心部位，东汉末年属于军阀刘表，随后被魏蜀吴三国瓜分，魏国占去了北部，蜀国、吴国瓜分南部，后来，吴国赶走了蜀国，杀掉了蜀国守将关羽，获得了整个荆州南部。可以说，荆州是一片四分五裂的土地。

但在刘表统治时期，由于其余地方都处于战乱之中，荆州反而成了一片安静之地，聚集了一批著名的文人。刘表本人就曾经跟一位叫王畅的人学习过，而王畅就是著名的“八俊”之一。王畅有两个孙子，分别是王粲和王凯，其中王粲就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42]刘表以貌取人，

嫌王粲太丑了，把女儿嫁给了他的兄弟王凯，生下了王业。王粲曾经获得了大文学家蔡邕送给的上万卷图书，这些书最后都给了王业，王业的儿子就是王弼。所以，王弼从小就受到荆州学派的耳濡目染，又有一定的读书量作积淀，有助于他在小小的年纪就创立了自己的学说。

贵无嬉皮士的另一位代表何晏则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也是曹操的养子。[43]曹操接纳了他的母亲。他后来又当了曹操的女婿。到了司马氏掌权时期，何晏由于参与政治，和曹爽一起反对司马懿，被司马氏杀死了。

这样一位官宦子弟，加上一位毛头小子，他们到底发明了什么理论呢？

在金庸的小说中，面对一个围棋的残局，所有的高手都束手无策，但一位不通围棋的人却可以无意中找到解法。这是因为当局面过于复杂的时候，也许最简单的人能够找到出路，而考虑过多，只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

汉代的经学就是一片关系错综复杂的沼泽地，谁陷入其中，就再也无力挣扎出来。如果要开创新的哲学，就不能陷入这片沼泽，而是必须从另外的地方找一条干路通过。

何晏和王弼没有太多的经学包袱，他们抛弃了儒家的大部分经典著作，只选择了三本小书：道家的《老子》和儒家的《易经》《论语》。他们认为，除了《易经》之外的其他五经都只是对社会的烦琐描绘，距离根本性的问题相差很远。而真正能够描绘根本问题的，是《老子》和《易经》。

至于《论语》，在汉代《论语》并不受重视。《论语》要一直到宋代确立“四书”时，才被提高到了经典的地位。在汉代，它只是被认为是一本谶纬书，里面都是孔子的预言，在未来会一一应验。

到了何晏手中，才将其当作一本哲理语录，恢复了它的真实身份。

首先创造“贵无论”的是何晏。何晏在读书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按照《老子》和《易经》的说法，万事万物的缘起都是“道”，也就是说，“道”是万物之母。万物都是有形的，每一个物体的形状都是不同的，作为万物共同母亲的“道”又该是什么形状的呢？

这个问题很有现代哲学的气味，比如，鸡和鸭都是鸟类，所以“鸟”这个概念应该既包括了鸡，也包括了鸭，我们可以总结为“鸟是带翅膀的活物”。而鸟和兽都是动物，动物这个概念应该既包括鸡、鸭，也包括其他兽类，我们就不能说动物有翅膀，只能把动物定义成“活物”了。概念越往高级走，就越泛化。按照何晏的想法，所有的动物、植物、石头、水等，都属于一个最高的概念，就是“道”。“道”也必须是最泛化的一个概念，它具有的性质是最普遍的。

可是，什么是最普遍的呢？所有可以说出来的性质都不是最普遍的，都必然能举出反例来。比如，如果我们说“道”是有体积的，那“道”就不包括思想这种东西，就称不上是最高概念。如果我们说“道”是没有体积的，那么就无法包括“实物”这种概念。不管怎么说，总会遗漏掉一些东西。

何晏得出结论：“道”要想包括万物，就必须抽象成“无”。万物有形，他们是“有”，“道”必然是无形的，只有“无”才能无所不包。而“有”是从“无”中“生”出来的。

何晏的作品流传下来一本《论语集解》，此外还有他的三段话，这三段话表明了他关于“无”的理论。

第一段是他《道论》里的话，大意是：有之为有，要靠无才诞生，而事物也是靠无而成就。事物的本源是说不出来，无法命名，看不见形状，听不见声音的，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道。[44]

后两段是他《无名论》里的话，大意是讲“无”和“有”的辩证关系：“道”是无所有的，无名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众有之有，众名之名。而真正的圣人，是那些不在乎自己名声（无名）的人，但只有这样，反而能够得到人们的交口赞誉，成就有名。[45]

《论语集解》中也已经带有“贵无”的思想，但没有明确提出。让何晏获得声誉的，主要就是这三段话。

虽然何晏先提出了“贵无”的观点，但是，不管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人们往往把王弼的才华和作用放在何晏之上。那么，王弼又做了哪些突破呢？

王弼与何晏的不同在于：何晏是从一个问题出发，创造了一个概念。而王弼是从一个系统出发，创造了整个体系，使得玄学成了如同佛学那样自洽的理论，人们可以不离开这个体系，就创造出千变万化来。

王弼的体系基础是：将纷纭复杂的世界回归原点。

由于汉代经学体系过于复杂，过于坠入具体现象之中，妄图对每一个现象给出解释。比如，发现了白野鸡，意味着什么；出现了流星，意味着什么。这个世界上有数不完的变化，不可能每一个变化都给一个说法。

如果把如此众多的问题回归原点，王弼给的答案是：从多回到一，从一回到无。也就是寻找事物的本源。

再比如，汉代的经学家为皇帝寻找合法性依据，说皇帝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代表，老天爷掌管了人世的运转，每一个人以及整个社会都要符合老天爷的意志。但战乱之后，老天爷没有干预人间的屠戮，结果这个世界观崩溃了。王弼又是怎么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呢？

王弼认为，皇帝和政府的合法性不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而是他们能否治理好国家。而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崇本”，也就是抓住问题的根本。什么是世界上最根本的呢？王弼认为，就是“无”，以及从“无”发出的各种变化规律。对于政权来说，主要就是要“无为而治”。

为什么“无”是根本？因为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从根本而变化来的。万物可以归结为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而金木水火土也是从根本变化来的。可是，金木水火土是完全没有共同特征的五种物质，要有一种根本性的概念能够生出这五种截然不同的物质，同时包容五种物质，只

有“无”是符合条件的。无生有，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而之所以要从《老子》和《易经》两本书出发寻找根本，也是有它的逻辑性的。首先，《老子》是描写“无”的书，告诉人们什么是世界的根本问题，只有把握了“无”，才掌握了“道”，有了“道”，才能统治好国家。国家统一后，最重要的政策是无为，不要破坏自发秩序的稳定。

但是，《老子》只是阐述了基本问题，却没有提供方法。方法问题就由《易经》来提供。《易经》在玄学中的作用，是告诉人们，当“无”生出万物之后，万物是怎么变化的。当无变成有，进而变成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和社会时，其中的变化规律就由《易经》来概括。

比如，当国家统一时，要使用无为，但在国家没统一之前的混乱时期，就需要使用《易经》的理论，强调军事上的有为。一旦完成了统一，又要根据《易经》的变化，适时地转移到无为的轨道上。

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无为是与自然合一，因为自然就是从“无”变化出来的。这导致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的喜爱，不管是真隐士假隐士，都以自然田园为憧憬。

王弼认为，在玄学的体系中，《老子》是一本归纳性的著作，把万事万物归纳成一个“无”的概念，而《易经》则是一本演绎性的著作，告诉人们，从“无”怎么生出万事万物。

所以，总结而言，王弼的思想是：

第一，万事万物可以由众归结为寡，由动归结为静，最后归结为道。这是研究事物的根本，抓到这个根本，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变化。[46]

第二，道这个根本，继续追究，又可以追究为“无”。万物的开端是没有名字没有形状的，并且无所不在，一旦得了形状和名字，就已经无法做到无所不在，也就不是根本了。[47]

第三，天地自然，都是无的创造，所以，我们的生活最终必须与自然合一。与自然合一的做法，就是对社会和人有利的。[48]

就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轻浮子，发现了通往新哲学圣殿的道路。与汉代经学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玄学是多么的思辨。经学创造了一个体系，却不允许人们怀疑，到了玄学时，人们却突然发现，经学体系中原来有这么多漏洞，每一个概念如果细细追究，都经不起推敲。玄学就是要对这些概念进行一一考究，重新确定根本性的问题，重新解释世界。

在这一番重构中，汉代的“天人合一”就变成了玄学的“一切都是无”。

但不幸的是，由于开创玄学的人太年轻太轻浮，当他们找到了道路之后，却无法将思辨精神贯彻到底。玄学比起汉儒来是进步多了，但是与佛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比起来，它又过于浅薄了。它过于倚重于“无”这个概念，却缺乏更深厚的内涵，而很快地转向玄谈和辩论这个方向上。

玄学本应该沿着事物的“名”与“理”、本质与现象更深入挖掘下去，如果这样的话，将成为一门更加深入的哲学。但是当发掘到了“无”这个概念后，就没有人继续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了。以后有的人赞成“无”，有的人反对“无”，说世界不是“无”而是“有”，还有的人说既不是“无”也不是“有”，而是“独化”等，这些名词又由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已经无力去探究事物的本质问题了。

在文学里，最简单的作品是玄幻作品，作者不用对社会现实有任何的了解，在脑子里转一转，就可以天马行空地做任何想象。玄学的发展如同是玄幻作品，人们不再需要钻研学问，只需要坐在椅子上喝着茶，就可以云里雾里地构造什么是无，无如何生有了。

它的简单性让它很快风行天下，但它缺乏深度，又让它在一阵风掠过之后，形不成更实用的成果。

但毕竟，它将“名教（功名利禄）”与“自然（终极规律）”统一起来。魏晋时期的人们已经隐隐约约认识到，除了汉儒们说的那种和人世间存在感应的“天”之外，更存在一个独立于人间的“自然”。“自然”与汉代“天”的区别在于，自然是独立运行的。

当然，由于人们认识不彻底，魏晋时期的人们也有多种看法，王弼和何晏等人认为“自然”虽然独立运行，但人世仍然可以寻找到它的规律，并与之契合，只是人世不能再影响“自然”，不存在所谓的感应一说了。而他们之后的嵇康等人更加彻底，认为自然就是和人世彻底脱离的，人们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

另外，何晏和王弼的哲学还是享乐主义，甚至带着点乐观主义的。他们相信规律的可行性，也相信可以既有功名利禄，也有自然享受。这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分不开。

但是，公元249年（正始十年），作为曹家女婿的何晏因为参与曹爽与司马懿的对抗活动，被司马懿杀死。王弼也在这一年得病死去（可能与服用五石散有关）。两位代表人物的死去，加之改朝换代带来的政治环境恶化，也让魏晋的玄学之风骤然转向，变成了放诞俗世的幽愤主义和悲观主义。

第八章
放诞俗世做酒仙（公元249—公元316年）

玄学发展到嵇康与阮籍时期，已经成了人们反抗政治的武器。而政治对于玄学的镇压，让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即使选择了放诞于世俗之外，也仍然无法逃脱政治的迫害。

嵇康和阮籍将思辨的力量指向了政治本身，将政治的荒谬之处通过逻辑的力量予以展示，提出了将名教排除在自然之外，彻底否定了政治对于哲学的干预。

在嵇康时代，对于人的“才华”和“本性”的讨论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持不同立场的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别，让即便想远离官场的人，也不免卷入其中。

阮、嵇之后的哲学家已经开始分道扬镳，但即便最贴近政权的人，亦不免在政治中颠沛流离。

玄学的思辨力量，在论证三个主题——“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时，发展到了高峰。

在三国时期，如果选择最虚伪的人，那么魏国的钟会至少可以进入候选名单。

钟会是曹魏太傅钟繇的幼子，钟繇则是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深受后来“书圣”王羲之的推崇。钟会也和他的父亲一样，以书法闻名当世，而且从他小时候，在魏国君臣之间就传颂着他如何聪明。

比如，他和哥哥钟毓跟随父亲第一次去见魏文帝曹丕时，哥哥吓得大汗淋漓，而弟弟却无事一般从容不迫，魏文帝问哥哥：你脸上怎么这么多汗？哥哥钟毓回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魏文帝又问弟弟钟会：你怎么不出汗？钟会回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两兄弟又喜欢趁父亲睡觉时偷药酒喝。一次父亲装睡，看两人的反应。哥哥钟毓偷了酒之后，喝之前要先学着大人行礼的样子拜一拜，然后再喝，而弟弟钟会则拿起来就喝。父亲问钟毓为什么要拜，钟毓回答：根据礼法，喝酒是一种礼仪，所以喝之前不敢不拜。父亲又问钟会为什么不拜，钟会回答：偷本来就不符合礼仪，所以不用拜了。[49]

这两件事反映了钟会的聪明才智，又带着很强的功利心态。

到了钟会的青年时期，学问更是与发明了“贵无论”的王弼齐名。钟会曾经学习过道家言说，并把刑名家的思想融合进道家。

当时，魏国文人讨论最多的是“才性”问题，即一个人的才华和他的本性之间的关系。由此演生出了四种说法，分别是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

曹操之后的曹魏君主们大都认为“才”“性”是不同的，一个人有才，但不一定品格高尚，而君主重用某人，只要看到他的优点就可以忽略缺点。而司马氏崛起后，为了镇压忠于曹魏的大臣，强调品格和才华是关联的，把不忠于司马氏的人都划归到品格不好的行列中予以贬斥。

钟会本人是一个品格和才华分家的最好例子，他的品格低下，却有很高的才华。为了投奔司马氏，他提出的观点却是“才性合”，也就是才和性是同步的。为此，他写了一本专门的著作，叫《四本论》，将四种观点都进行了论述，并着重谈了自己认为的“才性合”。

写好这本书后，他决定将这本书送给当时最著名的学问家嵇康，请他来评判一番，于是带着这本书去找嵇康。从年龄上说，嵇康只比钟会大一岁，却早已是文坛领袖，又性格桀骜不群，喜欢辩论，绝不谬赞。钟会心怀忐忑地揣着书来到嵇康门外，却不敢进去，只好把书往屋里一扔，吓得扭头就走。[50]

他之所以这么怕嵇康，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心虚，为了迎合司马氏，违心地提出“才性合”，嵇康如果看出来他的投机，一定会嘲笑他；另一方面，是嵇康的观点更接近于“才性离”，如果两人辩论一番，也不是对手。[51]

不过，虽然钟会在嵇康面前显得渺小，在司马氏眼中却是很好的帮手。司马氏掌权后（篡位之前），曹魏旧臣有许多心怀不满的，其中位于淮南地区的毋丘俭开始反抗。大将军司马师决定率军亲征，他的弟弟卫将军司马昭则紧跟在后，钟会就在司马师军中。这次反抗虽然镇压了下去，但司马师也得病死去了。这时，洛阳朝廷里出现了一股反对司马氏的阴谋，皇帝派遣尚书傅嘏前往司马昭军中，以淮南刚刚平定为借口，请求司马昭留在许昌稳定局势，而把大军交给傅嘏带回洛阳。这样做，实际上是要剥夺司马昭的兵权。

钟会立刻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他和傅嘏谈话把傅嘏争取了过来，请求傅嘏上书皇帝，要求和司马昭一起回洛阳。司马昭率领大军回到洛阳，由于他的兵权胁迫，皇帝只好任命他继任大将军，继续把持朝政。

随后，淮南再次发生了诸葛诞的反抗，又是钟会的计策让司马昭击破了吴国前来帮助诸葛诞的将领，从而赢得了战争。

钟会在得宠后，成了司马氏集团不可缺少的人物，不时地参与政策制定和人事任免，拥有着打击政敌的权力。

而真正让他扬名天下的，是魏国的灭蜀战争。在战争发生前，大部分朝臣是不主张灭蜀的，认为风险太大，只有钟会是极少数主战派之一。司马昭最终支持了钟会，给了他十几万大军，让他作为主将大举伐蜀。

然而，事情却向着对钟会不利的方向演进。他虽然借着蜀国防守汉中（秦岭以南的小盆地，四川和陕西的交通要道）的薄弱攻克了汉中，但在继续向四川推进时，却屡屡不利。从汉中进入四川的关键通道是金牛道，而金牛道上最重要的关口是剑阁，在这里，蜀国大将姜维千里跃进，堵塞了钟会的进路。钟会的背后还有蜀军的据点，魏军很有可能会被包夹。

在作战中，钟会的虚伪狡诈也暴露无遗，给军队造成了困扰。除了钟会之外，还有一支军队由诸葛绪率领，从甘肃赶过来。钟会为了获得指挥全权，秘奏诸葛绪畏懦不进，抓起来用囚车送回了国，接管了对方的军队。

内斗加上姜维的阻挡，这次远征看来要以失败告终。

但就在这时，著名的将领邓艾却打开了一条传颂千年的道路，捷足先登了。当两国大军僵持在剑阁时，邓艾率领三万人马开山辟路，从甘肃的阴平起，在大山里硬是开出一条路，进入了四川盆地，并逼迫蜀国皇帝刘禅投降。[52]

蜀国投降后，邓艾采取仁政争取人心，同时等候魏国大部队到来。而阻挡钟会的蜀军将领姜维听说成都失陷，选择了投降钟会。钟会兵不血刃地率领大军进入成都。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成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针对伐蜀的最大功臣邓艾。他利用司马昭害怕将领擅权的心理，密奏邓艾谋反，获得司马昭命令后，将邓艾抓起来关进了囚车。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其实真正谋反的却是钟会本人。除掉邓艾后，钟会不满足于当臣属，决定以恢复曹氏权力为幌子，向司马氏开战。

可惜这一次，钟会碰到了更大的对手。司马昭在向钟会发布命令，逮捕邓艾的同时，就亲率大军向长安移动了，一旦司马昭占领了长安，不让钟会出川，钟会的计谋就告失败了。最终，钟会只好仓促起兵，但士兵不听号令，起事将钟会杀死。[53]

在伐蜀途中的两次密奏，加上最后的谋反，将一位伪君子的形象展示于人。作为伐蜀最大功臣的战略家邓艾却含冤致死，直到历史进入了西晋时代，邓艾才得以昭雪。

然而，邓艾并非是钟会谋反的唯一受害者。在钟会伐蜀之前，还害死了他认为的另一个仇人，原因同样是妒忌。如果说，在武功上，邓艾超乎钟会之上，那么在哲学和文学上，钟会与嵇康的差距更是云泥，钟会又怎能忍受？

除了钟会第一次向嵇康献书之外，历史还记载了两人的另一次相会。[54]嵇康由于家境贫穷，常常和朋友向秀打铁糊口。一次，年少得志的钟会终于鼓起勇气，穿着时尚的衣服，赶着肥马拉的车，带着如云

的宾客，一起去拜望嵇康。

当他们来到嵇康的住处，却发现嵇康坐在地上打铁。钟会恭恭敬敬地等着嵇康，嵇康既不说话，也不抬头，继续干他的铁匠活。钟会在众多的随从面前等待良久，大丢面子。离开时，嵇康终于开了口，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怀好意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如果说第一次拜访是因为钟会的胆怯，那么第二次拜访，则是嵇康对他直接的侮辱。嵇康一向对自己看得起的人热情似火，即便千里迢迢也说去就去[55]，但对于他看不起的人，连一个字也懒得说。

这次拜访给钟会的心灵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他记住了嵇康这位不给权贵面子的狂人。当司马昭逐渐掌握权力，排斥忠于曹魏的人时，钟会不失时机地说：嵇康是一条卧龙，你驾驭不了他，但他言论放荡，诋毁圣贤，又有大批的追随者，是个心腹大患。

司马昭听信了钟会的话，开始制造冤狱，杀掉了嵇康。

司马昭找的理由是一个花边新闻。嵇康有个好友叫吕安，吕安的哥哥吕巽奸淫了吕安的妻子徐氏，为了防止吕安的打击报复，吕巽先发制人污蔑吕安不孝。在司马氏统治下，提倡儒教精神，不孝是大罪。吕安为了脱罪，引嵇康作证，嵇康作为朋友义不负心，将吕巽如何奸淫弟媳和污蔑的事情都说了出来。但既然司马昭决定除掉嵇康，就不会听他的证词，吕安不承想自己没有脱罪，反而将嵇康也牵连在内。[56]两人双双被判死刑。

在临刑前，嵇康望着地上的日影，要过了一把琴，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并叹息这个曲子从此绝迹了。三千名太学生请求当嵇康的学生，希望保下他的性命，但铁了心的司马昭还是除掉了这位才华绝世的高士，只是在事后，才假惺惺表达了后悔。[57]

也许钟会没有想过，他害死的是魏晋时期最具反抗精神的哲学家，也代表着魏晋玄学最自由最独立的精神。在这个时期，哲学家和文人们大都带着反叛的影子，反抗汉代以来形成的名教对人的压迫。但是，几

乎所有的人在反抗的同时，都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既享受名教带来的荣华富贵，又对名教采取嘲弄的态度。还有的人则寄希望于将名教和自然打通，享受政权好处的同时，也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这就像现代某些寄生在体制之中的学者一样，一方面想追求学问，另一方面又很在乎自己的工资和职称，不时地申请个谄媚的课题。

只有嵇康以一种决裂的态度来看待名教问题，告诉人们守着这玩意儿毫无用处，只会妨碍你对自由的追求。

但是，嵇康的死让人明白，集权的笼子里不会有自由的鸟儿，只要你在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就不会找到真正的自由，哪怕你想回归山林，不问政事，但只要你有足够的才华，这个政权就会自动把你当作敌人。

嵇康死后，哲学虽还保留着反叛之名，却再无反叛之实。文人们那种故作超然的姿态，实际上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表演，既要彰显独立性，又总是在谄媚着权力者。

那么，嵇康的哲学包含了哪些内容？他给魏晋这个动荡却反叛的时代做出了哪些贡献，才让现代人把他当作魏晋玄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予以纪念呢？

非汤武而薄周孔

大约在公元260年（曹魏景元元年），一次当官的机会突然出现在了嵇康的面前。这次机会是由他的朋友山涛举荐的。这一年，山涛从尚书吏部郎迁任大将军从事中郎，留下来的职位需要填补，他立刻想到了好朋友嵇康。

嵇康，字叔夜，在他年幼时就失去了父亲，跟着哥哥嵇喜长大。他身长七尺八寸，换算成现在的尺度，身高超过一点八米[58]。他言谈举止优雅风仪，却又土木形骸，不加修饰，人们称之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他性格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在学问上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却不讲究师门，博览群书，而尤其喜好《老》《庄》。[59]对

嵇康，当时人形容他的风姿是“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山涛之所以想到嵇康，除了他的才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嵇康娶了魏国曹氏的宗室女子，是曹魏的女婿。他还因此官拜中散大夫，只是随着对政治的失望，才远离了政坛，放弃了职务。

但是，随着司马氏掌握了曹魏大权，司马氏取代曹氏已成定局，作为曹氏姻亲的嵇康就成了司马氏忌惮的人物，甚至有生命危险。如果这时候能够出山担任司马氏提供的一个官职，就相当于投靠了司马氏，也就获得了安全。山涛举荐嵇康，是想保护这位最好的朋友。

嵇康的哥哥嵇喜就很懂得这样的道理。他也是当时的名士，论做官，比嵇康更胜一筹，担任过扬州刺史、太仆、宗正等职位，自然也获得了安全。[60]

但令山涛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片好心被嵇康直接拒绝了。不仅拒绝，嵇康还专门写了一封信与他绝交。这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成了魏晋时期少有的好作品，也是解读魏晋风流人物的一个窗口。

在信中，嵇康首先表示他和山涛不再相知，之后，转入对历史人物的总结，评论了十一个历史人物，认为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格，各安本命。而他本人则仰慕那些不为官的人士，这样的志气不可夺。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懒散、孤傲、不喜约束的人，懒到常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不洗头不洗脸，更不通人情礼仪。[61]

随后，他转入了最著名的段落，提出了自己不适合当官的九个理由，这九个理由又分为“七不堪”和“二甚不可”。所谓“七不堪”还简单，指的是生活上的七种习惯与做官格格不入，比如起得晚、不喜人跟随、爱动且不喜欢向上级行礼、不喜欢写字、不喜欢应酬、不喜俗人、不耐烦俗世。而“二甚不可”则显得离经叛道了。所谓“二甚不可”，是指他喜欢“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及说话直言不讳，绝不替人掩饰。[62]而“非汤武而薄周孔”一项，更是对自汉代形成的儒教文化的彻底否定。

从孔子开始，整个儒家的哲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周代礼法体系之上

的，特别是周公这个人，更被认为是周代礼法体系的鼻祖。这就好像基督徒突然有一天对耶稣开炮，或者佛教徒否定释迦牟尼一样，一旦批判，整个体系就会轰然倒塌。

“非汤武而薄周孔”表明的是嵇康的生活态度，但在时人看来，却是他的政治宣言。因为如果周公失去了合法性，在当时受打击最大的就是司马氏。因为司马氏在篡权之前，总是以周公自居，这就像当年王莽以周公自居，到最后却篡夺了汉朝是一样的。如果周公没有了合法性，那么司马氏搞摄政就成了乱臣贼子，而不是功臣了。

“非汤武而薄周孔”还不是嵇康态度的终点，他除了否定这些人之外，还要替被周公镇压的人翻案。在周公时代，他有两个同胞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这两个人在儒教写成的历史上一直是反派角色。西周灭商后，他们最早被周武王派到了崤山以东原来商朝的土地上帮助周朝维持秩序，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即位，武王的弟弟周公成了摄政，这时管、蔡两人发动了叛乱反对周公。他们的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他们也被打成了将近三千年的恶人，是冒犯中央帝国的罪犯。

但嵇康认为，管、蔡两人不是罪犯。首先，他们是周武王任命的，帮助维持了中原地区的秩序，如果不是他们，地处陕西的周朝是无法控制广大中原地区的。其次，按照儒教的看法，圣人不犯错，而周武王就是个圣人，如果管、蔡是坏人，就证明周武王的任命是错误的，这和周武王是圣人相矛盾。再次，从情理上讲，一个小孩子当了王，而另一个成年人虎视眈眈地摄政，自然会让人疑心这个成年人要篡位。所以管、蔡的叛乱不是叛乱，而是在勤王。[63]

最后这条理由更是直刺司马氏。魏明帝曹叡死后，大将军曹爽和太傅司马懿摄政，随后司马懿发动政变，处死了曹爽，开始了摄政生涯。在司马氏摄政之后，发生了著名的淮南三叛：淮南地区的三位将军（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将军毋丘俭、征东将军诸葛诞）先后叛乱。他们之所以起兵，是不满司马氏的摄政，试图恢复曹魏的政权，赶走司马氏。嵇康对管、蔡的辩护，就仿佛是在歌颂三位将领的反叛。[64]

嵇康这样的观点绝不会被司马氏所容忍，却让他成了文坛领袖。实际上，司马氏篡夺皇位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

一，大量的人敢怒不敢言，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被迫投降，而嵇康的态度则成了当时不屈服的标志。

在司马氏辅政的那段时期，文坛最著名、最具特色的是一个叫作“竹林七贤”的松散群体。这个群体中最年长、最具组织才能的是山涛，而最核心的人物有两位，除了嵇康之外，还有一位叫作阮籍的人。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这七人常在竹林中游晏，号称竹林七贤。除了七贤之外，还有一个他们的朋友圈，而在朋友圈中最显著的就是嵇康的朋友吕安，也就是导致他死亡的那位挚友。

竹林七贤代表了一种倾向，当文人们对政治不满时，就会寄情于山水之间，流连于诗酒之中。虽然后来七人的结局不同，但在某个时间，他们都对政治有着强烈的不满。而在七人中，又以阮籍和嵇康最为纯粹，两人兴趣相似，互相钦慕，成为双璧。嵇康更善于论理，而阮籍长于写诗。有后人品诗将阮籍列在了上品，而将嵇康列在了中品，大概因为嵇康不注重文采，写诗时，只是用极其冷峻的笔调记录自己的感想而已。

两人的作品中，都流露着对于现实的巨大不满。

比如，阮籍最著名的非诗体作品叫《大人先生传》，就是对现实的批评。阮籍和嵇康都认为，古代的制度是一种无为而治的制度，所以人们相安无事，和平幸福。但是到了当世，由于皇帝推崇名教治国，强调人的德行和君王的有为，大量的赏赐和严苛的刑法不仅无力治理国家，反而让社会乱了套。而所谓的名教，实际上是“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65]。

阮籍对于那些儒家君子最精辟的嘲讽，就是把他们比作一群裤裆里的虱子，追求功名利禄自以为安全，就像虱子在裤裆里，躲在棉絮里以为是大宅子，行动在布缝里以为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动不动就吸人血，以为找到了享用不尽的美味佳肴。但是，一把火袭来，这些虱子就被烧死在裤裆里了。[66]

嵇康对现实鞭笞最深的文字则来自《太师箴》，认为以前治国是为了天下，今天则是为了一个人而已。结果导致臣下仇恨皇帝，皇帝猜忌

臣下，四处丧乱，国家倾亡。[67]

正因为司马氏统治的残忍，嵇康和阮籍对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才发生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大转折：彻底放弃人们热衷的名教，彻底地拥抱自然。

越名教而任自然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永远是政治压过科学，入世压过出世，名教压过自然。所谓名教，一般指功名利禄和儒家礼法，而自然则指政治之外的江湖之远。走得最远的人，也只能说要兼顾“名教”和“自然”，不敢将自己彻底置于传统的敌对面。

发明了“贵无论”的王弼本人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他认为“名教”和“自然”是调和的，不管是“名教”还是“自然”，它们的最终特征都是“无”，把握了“无”，既可以理解“名教”，也可以理解“自然”。而理解了“无”之后，可以把自然界的“无”“无为”等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之中，实现“名教”和“自然”的统一。

和王弼相比，嵇康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于他出生于公元223年（黄初四年），比王弼还要大三岁。在王弼与何晏的思想占据主流时，嵇康也秉持与他们同样的观点，认为通过掌握自然的规律，就可以过一种将名教调和于自然的生活。

他甚至认为，中国的三皇五帝时代，是因为有人根据自然规律，制定了正确的生活准则，才让当时的人们幸福地活着。

这个时期是曹魏统治时期，曹氏并不是东汉的大家族，它的统治虽然强调法家和刑名思想，但主要是为了将社会捏合在一起。而在实际的统治中，却对士大夫阶层相对宽松。加上曹氏统治者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文人，创造了一个文人的黄金时代。

最能反映嵇康此阶段思想的作品是《太师箴》，嵇康甚至为此叙述

了他的宇宙观[68]，认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物质是太素，从太素生阴阳，随后生出天地万物和人伦社会。人伦社会刚刚形成时，没有善恶羞耻，也不担心未来、不经营财产，处于自然状态，而这个时期反而是最“仁”的时期。之后，随着人们的物欲打开，忧患意识形成，才有了人世间的各种祸患。所以，圣人不是要打开人们的欲望，或者限制人们的生活，而是要让他们回归自然。所谓“君道自然，必托贤明”。

从“君道自然”可以看出，嵇康当时仍然相信可以把“名教”和“自然”结合起来，也就是皇帝采取“自然无为”的方式进行统治，就可以做到人事与自然和睦。

然而，嵇康的想法却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公元239年（景初三年），魏明帝曹叡去世，将太子曹芳托给了司马懿、曹爽等重臣辅佐。十年后，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死了曹爽。从司马氏掌权到篡位的十几年中，司马氏祖孙三代四人镇压、淘汰不服从的人，曹魏时期文人的黄金时代成为过去。嵇康的思想也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嵇康不参与、不认同司马氏党同伐异的做法，开始对政治失望，他不再相信所谓人既可以享受功名利禄，又可以遵循自然的说法，而是把自然和名教对立了起来。

他开始仇视名教，认为人之所以受到束缚，是因为脱离了自然，而坠入了名教织成的网中无法自拔。如果想恢复自由，必须挣破这个名教之网，到自然中去寻找真正的自由。如何挣破名教之网？他认为所谓挣破，不是说人要到山上隐居，再也不见人，而是要做到对名教无视。哪怕你身处于闹市之中，甚至朝堂之上，只要做到无视眼前的人，将功名利禄之徒视为粪土，不追求、不参与、不恭维，就已经挣破了这个名教之网。

这个时期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另一篇文章《释私论》中。

他在《释私论》中提到[69]，所谓君子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心里根本不在意人世间所谓的礼法、是非等观念；第二个标准是：

减少自己的欲望，不放纵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当做到第一点的时候，就能够“越名教而任自然”，做到第二点，就可以“审贵贱而通物情”。

后人常说“大隐隐于市”，与嵇康的观念就有相似之处，一个真正的君子既要在思想上超脱于俗世之外，但又甘心在行为上做一个普通人，对自己的境遇毫不在意、毫不强求。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出，是秦代之后中国文人第一次要摆脱集权帝国的束缚，寻找真正的自由。嵇康将自然看成是通往大道的途径，而把俗世的名教看成是通往大道的障碍。

与此同时，阮籍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阮籍的观点反映在他的作品《大人先生传》里，他塑造了一个叫作“大人先生”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原型可能是嵇康和阮籍都认识的好友孙登，也是一位隐士。

在文章开头，“大人先生”和一位名教中人辩论，这个名教中人认为，所谓君子，应当注重礼仪，忠于朝廷，束身修行，钻营官职。而“大人先生”乘机反驳，将名教所说的君子礼法说成是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而真正的君子要超乎于天地之外。[70]

这一段的辩论基本上继承了嵇康所说的第一个标准，心里根本不在意人世间所谓的礼法是非。

“大人先生”的话自然引来了叫好声，这次叫好的是一位隐士。这位隐士立刻把“大人先生”当作同类，骂了一通社会之后，邀请他一同去隐居。

而“大人先生”随即又把隐士教训了一通，他认为，隐士所骂，只不过是出于激愤，别人说是他就一定要说非。而真正的君子，是超脱于世事之外，不会为了这些事激愤，也不会专门去隐居。他可以处于任何地方而又对一切身外之物视而不见。

“大人先生”和隐士的辩论，恰好与嵇康所说的第二个标准暗合。

嵇康和阮籍的思想也由此达到了中国文人的反叛极致。在之前和之后，中国也有数次对政治不满的思想反抗运动，但除了嵇、阮之外，文人们虽然对政治不满，却并不否认有一种理想的名教系统，只是现在的统治者做得不够好而已。只有嵇、阮认定，名教本身就是与大道相矛盾的，如果要追求大道，就必须放弃名教本身，去追求心灵和思想的彻底解放。其他人也有游山玩水不问政治的，但他们大都采取犬儒主义态度，比如陶渊明。但嵇康却是以完全敌视的态度来对待政治，采取了极端的否定态度。

嵇康、阮籍等人抛弃名教逃到自然之后，又能做些什么？他们两人的境遇又有所不同。

嵇康注重的是“养生”，所谓养生，除了为长命百岁，也是为了与自然合一。嵇康由此成了养生学的专家。只是司马氏对他的迫害，打断了他的养生之路。

与嵇康相比，阮籍的心没有那么沉，他更多的是靠喝酒发泄苦闷，却仍然无法避开世事的纷扰。史书中记载了许多阮氏喝酒的故事，比如阮氏家族喝酒用大缸喝，有时猪过来喝水，也走到大缸前喝一通，人们也毫不在意[71]。

但不管怎样，到最后，这群放纵诗酒的人仍然无法躲过名教的迫害。司马氏在夺取曹魏政权的过程，不允许有不站队的人。特别是嵇康、阮籍这样的文坛领袖，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太多的人，当他们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时，就是对帝国最大的威胁。

最终，不肯合作的嵇康被杀。嵇康就刑后，阮籍又多活了一年，他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直到死去。

司马氏为了拉拢阮籍，想和他结亲，为了避免和司马氏成亲家，阮籍大醉六十天，让提媒的人没有机会说话，才躲了过去[72]。

害死嵇康的钟会也曾经想对阮籍下手，他数次向阮籍请教问题，试图找到他的把柄，也被阮籍喝醉躲避了过去。

但即便这样，当司马炎篡位时，要完成一系列的仪式，魏国皇帝要

先给司马炎加九锡，而司马炎要推辞，这时再由群臣写劝进表，请司马炎接受。写劝进表的任务就被推给了阮籍。阮籍还是以喝醉推脱，但这次他没有这么幸运，司马炎派人去取时，发现他趴在案上醉了，却什么都没有写，于是临时把他摇醒，让他在醉中强行写一篇。

阮籍只好抓起笔完成了任务。在如此高压的政治下，他也很快去世了，到底是因为酒，还是因为政治？也许只有死亡能让他们摆脱名教的迫害。

嵇康的《琴赋》[73]中暗藏了一首歌，这首歌仿佛是他提前为自己的结局所写的，这首歌的歌词是："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

一句"委性命兮任去留"道出了他对生命的旷达态度，他相信，所谓生和死，只不过是两种自然的形式。在他死后，人们也乐于相信，他不是死去，而是进入了"齐万物兮超自得"的另一种境界，继续以他高冷的姿态嘲笑着世人的蝇营狗苟。

分道扬镳的贤人们

嵇康和阮籍的先后死亡，让司马氏恢复了对魏国朝政的控制权，从而为取代魏国做好了准备。此时，在战场上的反抗早已经消失，首都文化圈的领袖人物已经除去，没有人再敢发出对司马氏统治不利的声音。

曾经的竹林七贤是最活跃思想的发源地，七贤中又以阮籍和嵇康的成就最大，失去了他们之后，这个松散的群体中剩下的人又将如何？

事实证明，他们本来只是有着一定共同兴趣的人，聚合在一起，当政治压力逐渐加大时，这个群体就分崩离析了。

在七贤中，山涛的年龄是最大的，他比阮籍大了五岁，比嵇康更是大了将近二十岁。他的社会交游更广，可以视为这个群体的组织人。他虽然也读《老》《庄》，但对所谓的名教并没有如此排斥。他当初之所

以弃官，更多是出于自保，避开司马氏与曹爽的争斗。也是在弃官期间，他和嵇康、阮籍等人来往过密。

后来，一旦司马氏确定胜利，山涛意识到必须投靠司马氏，就再次进入了官场。他的一个姑祖是司马懿的岳母，凭着这层关系，他很容易就融入司马氏集团。在司马昭率军西进，防止在四川的钟会作乱时，山涛被留在了后方监视曹魏的宗室。司马炎被立为太子的过程中，也有山涛的功劳。

由于山涛有过竹林七贤的经历，具有一双辨识人才的眼睛，他向西晋帝国进荐了大量的人才，人们甚至将他推荐的人才列成花名册，称为“山公启事”。到最后，山涛官封司徒，达到了极致，并安然善终。[74]

不用怀疑，如果嵇康和阮籍更加灵活，都会被山涛一一发掘出来，成为达官贵人，甚至位居“山公启事”的榜首。

虽然由于山涛推荐嵇康，导致嵇康与他决裂，但嵇康死后，山涛义无反顾承担了抚养嵇康未成年儿子（嵇绍）的责任，并且把他培养成了与父亲完全不同的人。嵇绍后来在晋朝为官，也是山涛鼓励的。

山涛死时家无余财，只有十间旧屋而已。这个人是大部分中国士大夫的榜样，一个合格的大臣、好官员。竹林的经历只是他一次短暂的休息而已。

除了嵇康、阮籍、山涛这三大主将之外，竹林七贤中还有四个名气稍微小一点的人，分别是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

这四人中，刘伶的才华并不算突出，却是竹林七贤之中的死硬派。他有过几次短暂的入朝和参军经历，但在军队仍然维持着自己邋遢的作风，后来晋武帝司马炎把他召去策问，他仍然坚持宣扬无为而治，与皇帝对着干，结果被赶走了。[75]

后来他放荡到光着身子喝酒，当别人指责他时，他就说：天地是我的房子，屋子是我的裤子，你跑到我裤子里干吗？[76]刘伶就这样在酒坛子里度过了一生，算是保留了在竹林时期的气节。但是刘伶的创造力不足，除了留下“酒仙”的名声之外，在思想上无法与阮籍和嵇康比肩。

比刘伶灵活一点的是向秀。在竹林七贤中，嵇康对阮籍非常尊重，但最亲近的是向秀。嵇康喜欢打铁，在住处支起了铁匠炉子，而为他拉风箱的大都是向秀。在学问上，嵇康与向秀的交流也最多，特别是在养生的问题上，两人还有过交锋，但这只是学术上的探讨。

嵇康死后，作为嵇康密友的向秀也成了目标，为了避开司马氏的迫害，他不得已应诏担任了一些闲职。但他选择了做官不做事，以消极抵抗的方式度过了危机，保留了自己的气节。[77]

最能体现向秀心情的是他写的《思旧赋》。[78]中国历史上有几首著名的纪念亡人的诗歌，其中纪念死去妻子最悲切的是苏轼的《江城子》，而纪念朋友最深切的则是向秀的《思旧赋》，其中几乎每一句都能榨出人的眼泪来。

四人中最得阮籍真传的，是他的侄子阮咸。阮咸生性放达，无拘无束。虽然也和阮籍一样挂着散官官职，实际上却远离官场，过着自己的日子。他爱好音乐，认真钻研，真正做到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完全不去考虑官场的钩心斗角，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79]

竹林七贤中最小的是王戎，他比嵇康整整小了十岁。在竹林七贤中官瘾最大的也莫过于王戎。他参加与嵇、阮的宴游时仍然是年轻人，随着司马氏的得势，他很快就放弃了自然，回归了名教。

山涛虽然为官，但是私心不大。而王戎与山涛不同，有着很强的私心，是个财迷鬼，购置了大量的田产和水碓。在当时，水碓作为捣米的设备，是一种重要的工业资源，购买水碓，就像拥有磨坊一样。

但王戎本身的能力又很出众，除了做京官之外，还做过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豫州刺史，担任过建威将军，参加过灭吴战争，后来还封了侯（安丰县侯）。

王戎和山涛一样，也做到了司徒，晋身于西晋的最高官员行列。

但是，在西晋的政治制度下，虽然做官可以风光无限，却总不能避免政治斗争和战乱。王戎曾经因为八王之乱，为了避祸而游山玩水，不问政事，也因为派系之争而失去官位。最后，又由于战乱而颠沛流离。

公元305年（西晋永兴二年），王戎去世。在他去世之前，西晋帝国已经被八王之乱折腾得元气大伤，王戎本人也逃出京城，在跟随皇帝逃亡的途中去世。

王戎死前一年，嵇康的儿子嵇绍在保护晋惠帝时，中箭身亡。竹林贤士的下一代，也进入了凋零之年。

王戎可以说是竹林七贤中的异类，他只是暂时与嵇、阮等人接触，很快禁不住诱惑，选择了离开自然，返回名教。有一次，已经当上尚书令的王戎乘车经过一家酒馆，这是当年他和嵇康、阮籍痛饮的所在地，只是这时候，他却发现，酒馆就近在眼前，却仿佛隔着无数的山河。当年的竹林精神已经变成了一场梦境[80]。

玄学思辨的精华

历史倏忽间已到公元317年（东晋建武元年）。这一年，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登基，在北方，蛮族人刘曜正横扫着这片文明的土地。

在辅佐晋元帝开国的元勋中，有一对兄弟的功劳最大，他们是王戎的族人王导和王敦兄弟。兄弟两人一个管文，一个管武，帮助司马睿稳固了东南江山，并建立起了领导班子。可以说，如果没有王氏的努力，就没有东晋的江山，所以当时才会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王导作为当时文人的代表，也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当他到了江左之后，文人贤士更是云集在他的四周。但人们发现，在谈玄论道时，王导总是由三个主题出发，再由这三个主题发散出去，变得无所不入，无所不能谈。

这三个主题是“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81]在王导看来，这三论代表了当时哲学的最高成就，他把它们称为“三理”。

在三理中，《声无哀乐》和《养生》都是嵇康的理论文章，而《言尽意论》则是西晋时期哲学家欧阳建的文章。从王导的推崇也可以看出嵇康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那么，这三论都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如此

受推崇？

如果用现代的观点进行评价，《声无哀乐》和《言尽意论》代表了魏晋时期思辨玄学的最高成就，特别是《言尽意》，已经接近了西方哲学的热门题目之一：概念与事物的对应关系，这是唯名论与唯理论的争执焦点。

而《养生》则是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然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从古至今追求长生的自然延续。由于《养生》研究的题目过于具体，这里只对更具思辨性的《声无哀乐》和《言尽意》进行讨论。

首先看《声无哀乐》。在两汉时期的儒教哲学体系中，音乐是一个重要的道具，当时的人认为，音乐是一种等级礼仪的表现，也有着好坏之分，比如，孔子对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就有过严厉的批评，认为那是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庄重的音乐则适合在国君的朝廷中演奏。到了汉代，音乐更是成了宇宙体系的一部分，比如司马迁就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82]将音乐和礼等同起来，又和天地关联在一起。

汉代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时候，要找童男童女七十人唱着歌完成祭祀。

而叔孙通替汉高祖制定庙乐规矩更是繁复，当皇帝的神官迎接神灵时，必须在庙门口演奏专门请神的音乐，叫《嘉至》。等皇帝进了庙门，要演奏《永至》，这首歌就如同现在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上的进行曲一样，是有行步节奏的。等上了祭祀品，要奏《登歌》，这是一首人声歌曲，不能用乐器伴奏。《登歌》完了，要演奏《休成》，请神明享用美食。然后皇帝在东厢房摆酒坐定，演奏《永安》，表示礼仪已经完成。另外，汉高祖的唐山夫人还写了一首《房中祠乐》，简称《房中乐》，也被用来演奏。

汉高祖死后，祭祀他的高庙里要演奏《武德》《文始》《五行》这三种舞乐，因为这三种乐代表了汉高祖的盖世功绩。文帝死后，文庙里演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武帝死后，武庙里演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83]

这一切都是说，音乐是一种与天地合拍的礼仪，同时，音乐也分好坏，有神圣的，也有淫邪的。

但这种说法到了嵇康时期，却受到了怀疑。嵇康试图用客观的考察来戳破神话。由于嵇康将“自然”和“名教”彻底割裂开，认为自然是人类追求的极致，而名教只是障碍，这种二分法让他认为，所有自然之物，和人类之物是没有必然关联的。他试图把这种二分法贯彻到一切领域。最典型的思想体现在他的两篇文章中，一是《明胆论》，二是《声无哀乐》。《明胆论》讨论的是人的才性问题，而《声无哀乐》讨论的是音乐和人的感情之间的关系。

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之声，和人类没有必然的关系，自然声音的发出不是为了取悦人类，也不是为了惩罚人类，所以，音乐本身是没有喜怒哀乐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听了声音之后会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呢？这是因为，人本身就已经有了情绪，只是当听到音乐后，借助音乐而激发了出来。由于每个人心情的不同，听见同样的音乐，有的人会高兴，有的人会悲伤，这就是明证。

嵇康的《声无哀乐》实际上打破了汉代的宗教教条，将音乐重新放回了欣赏的角度，不再带有任何的功利色彩。他本人也因为对乐理的理解，成了当时最著名的音乐家。

《言尽意论》则是针对魏晋时期人们经常讨论的另一个话题，牵扯到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即便现代人也会有这样的体会：相对于自己丰富的感情而言，语言总是不够用的。不管是男孩子想赞美女孩子，还是作家想描绘一个丰富的场景，都会感到语言的贫乏，突然间不知道该写什么、说什么。

那么，语言是否能够把自然、社会或者感情百分之百描绘出来呢？有的人认为做不到，这就是“言不尽意”；另一些人认为做得到，这就是“言尽意”。到底哪一种更正确？

如果再升华一点，语言问题其实是人类认知过程中最重大的问题之

一，人类如何从客观世界获得认知？又如何把这些认知组织成语言？再通过文字记录语言，将认知变成知识传授给没有这类认知的其他人？这些都是西方哲学所研究的重大主题，在魏晋时期，这些主题已经进入了中国的玄学之中。

对这个问题最好的思辨性探讨，来自西晋时期的欧阳建。

欧阳建是西晋大富豪石崇的外甥，担任过冯翊太守、顿丘太守，在八王之乱时和赵王司马伦有矛盾。司马伦的亲信孙秀图谋石崇的宠姬绿珠，向石崇讨要，石崇没有送给他。当司马伦篡位后，孙秀借机杀掉了石崇和欧阳建的全家。[84]在死前，欧阳建写了一首《临终诗》，表达了对游于世外的向往，以及对自己身陷名教的无奈。[85]

在《言尽意论》中，欧阳建首先虚拟了两个人物——雷同君子和违众先生，前者持“言不尽意”的观点，并说世间大部分人都认为“言不尽意”，为什么你偏偏认为“言能尽意”呢？

违众先生先是总结了一下那些认为“言不尽意”的人的观点。那些人之所以认为言不尽意，是通过比附的方法来论证的。比如，老天爷不说话，但是一年四季照样运行；圣人不说话，但是心中对人和事物的评价都已经有了；形状不用说出来，而方圆已经现成摆着呢；颜色不用称呼，黑白早已分明。这样看来，不用说话，事物的性质已经确定了。[86]

那么，违众先生怎么来反驳这些人的看法呢？他认为，“不说”和“不能说”不是一回事。比如，圣人不说话，但是心中已经清楚善恶对错。可实际上，圣人只是不说，并不代表他说不出，他想说的时候自然可以说出来。“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但实际上，方圆是有名字的，不管你名还是不名。

违众先生认为，名称相对于物体，语言相对于事理，就如同回声相对于声音，影子相对于物体一样，是现成的、不可分离的。

对于人来说，要想辨识物体，就必须给它们不同的名字；要阐述你的意思，就必须给它们不同的表达。物体和意思有多少，名称和语言就有多少，这样，最终必然能做到言尽其意。[87]

欧阳建以他高度的思辨性，获得了人们的赞赏。正是这种思辨的方法让王导可以举一反三，用这几个有限的命题来解释一切。

魏晋时期所开辟的思辨哲学，也终结了两汉时期的机械宇宙论，让人们开始关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不是死记硬背什么灾异对应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当思辨的大门打开后，从印度而来的佛学才容易“占领”这个东方的中央帝国，继续注入更加思辨性的哲学体系。

第九章
被收编的嬉皮士（公元266—公元316年）

嵇康死后，玄学的思辨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由于无法再像汉代一样靠灌输让人相信，有人试图从逻辑上做文章，证明政治的必然性。

裴提出的“崇有论”表面上是驳斥“贵无论”，实际上却是想唤起人们对于政治的热情，重新回归到功名利禄的轨道上，但裴本人却死于政治。

向秀和郭象提出的“独化论”，想将功名和自然重新统一起来，是一种和稀泥的理论。但西晋和平时代的过去，让统一成为不可能。

乱世时期，嬉皮士们最终没有找到名教，却倒向了享乐主义的怀抱。玄学退化成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理论依据，进入了尾声阶段。它的逻辑主义倾向，也被更加思辨的佛教所取代。

公元266年（西晋泰始元年），刚刚篡夺了曹魏政权的晋武帝司马炎决定算一卦，看他新建立的政权能够传多少代。他屏气凝神，抽出了一卦，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的是个“一”字。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就是晋帝国只有一位皇帝就到了尽头。

在旁边观看的群臣突然间都傻了眼，一言不发，不知道该如何收场。皇帝心中的震惊无以言表。

这时，突然从群臣中走出一个人，朗声说道：恭喜陛下！

众人一看，这人是侍中裴楷。大家正纳闷为什么他敢如此大胆恭喜皇帝，就听见他继续说下去：臣听说“一”是万物之本，天得到了“一”就变得清明，而地得到了“一”就变得安宁，王侯得到了“一”就可以让天下忠贞不贰。

当裴楷说完后，皇帝哈哈大笑，群臣也松了一口气，赞叹他的灵活机智。[88]裴楷实际上利用了《老子》中“一”的概念，置换了数字“一”的概念，将晋武帝从尴尬中解救了出来。

西晋王朝作为中国中古时期少有的统一时代，开始了它雄心勃勃但是颠沛流离的命运。晋武帝不知道，虽然西晋的帝位名义上传了不只一代，但除了他之外也只有三代，其中后两代怀帝和愍帝时期，天下已经大乱，所谓皇帝，只不过是流窜的囚犯而已。这样算来，除了司马炎本人而外，西晋的帝位事实上只传了他的傻儿子晋惠帝司马衷一代。

晋武帝称帝之后有过一段雄心勃勃的时期，他希望将晋朝打造成如同两汉一样的统一帝国，并长期维持下去，于是在军事、经济、文化上，都做了许多改革措施。

在军事上，由于疆土刚刚统一，各地（特别是原本东吴和蜀汉的土地上）对晋朝没有形成向心力，司马炎派出了许多司马氏的子孙分布到全国，担任诸侯王，希望依靠亲情的力量来维持统一。同时，他解散了全国郡县的地方军，却授予了诸侯国兵权，最大规模的诸侯王可以组织五千人的部队。[89]

在经济上，晋武帝试图推行一套全新的财政制度，其主要目标是：摸清帝国的人口数量，并把耕地平均分配给广大的人口，让他们安居乐业的同时，为政府也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90]

经过清查，晋朝的人口为一千六百余万人[91]，比三国时期总人口增加了一倍。除了太平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之外，也由于战争中流民重新回归家乡，被纳入户籍之中。

查明户籍之后，晋武帝规划了更加革命性的土地改革。每一个男丁可以占田七十亩，女丁可以占田三十亩，一个家庭（一夫一妻）正常的土地是一百亩。再根据土地的数量、人口、户籍的多寡，进行收税，一方面做到人人有田种，另一方面做到税收充足。

为了考虑周到，晋武帝还规定了许多税收减免措施，从方案的详细来看，皇帝的改革充满了诚意，想全心全意打造一个新的盛世帝国。

而在文化上，晋武帝也继承了两汉的正统，重新捡起了儒教，试图利用儒教标准统一人们的思想，取代那些张牙舞爪的玄学思想，完成一次礼法的复兴。

在晋武帝的张罗下，针对嵇阮、何王等人的批判也逐渐展开，而最要紧的工作，是制定一套新的理论体系，针对何、王的“贵无论”和嵇、阮的“自然论”进行大批判，从理论上论证他们是错误的。于是文人们纷纷寻找理论，进行大批判。

在所有的批判者中，做得最成功、理论上最成熟的，就是裴楷的同族人裴。他提出的“崇有论”将玄学题目的争论引向了又一次高峰。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即便批评“贵无论”的人，也必须利用玄学的工具进行论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晋武帝试图恢复儒教的努力有多么苍白。

回归正统，死于正统

裴出自著名的河东（现山西境内）裴氏家族，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裴秀，中国已知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就出自裴秀之手。前文所说的裴楷则是裴的堂叔。

在西晋时期，随着政权再次儒教化，司马氏政权希望将更多的读书人吸纳到政治之中，而不是让他们游山玩水。嵇康、阮籍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司马氏的第一大敌。当文人对政治不再抱希望，彻底脱离政治怀抱时，反而是统治者最恐惧的。中央帝国的权威需要所有的人都围着它转，不管爱它还是恨它。

第二个敌人则是何、王等人的“贵无论”。作为大有为的皇帝，“无为”“静”这些观念都意味着主动放弃权力，这是皇帝不愿见到的。

司马炎认为，当前社会是一个大一统的盛世，是一个需要人们行动起来，变得有为的时代，人人都应该参加建设强大祖国的大业，只有将前两者的幽灵祛除掉，才能让更多的人加入歌唱祖国的合唱团。

裴作为西晋的高官，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与政府的步调一致，

他认为最大的敌人是嵇康对名教的敌视，引起了整个文化圈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的高官们“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92]，其次是王弼的“贵无论”。

为了对抗两大学说，他必须从理论上进行回击，于是提出了“崇有论”。这个理论表面上是直接反驳王弼，但深层次暗含的却是针对嵇康。

裴的崇有论包含如下几层意思：

第一，贬斥《老子》和道教，将儒教恢复到正统地位。他认为《老子》里的确有对的地方，比如强调“一”这个概念。但这些对的地方其实是和儒教经典《易经》暗合的，《易经》也强调“一”和阴阳。同时，裴认为《老子》里错误的地方更多，比如对“无”的强调，这些虚无性的东西不应该当作真理，只应该当作一家之言。[93]

第二，从理论上，他提出事物的本源并不是“无”。王弼认为，事物总要有个本源，比如，世界上有无数张实际存在的桌子，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叫作“桌子”的抽象概念，而“桌子”又可以归结到更大的概念之中，比如“物体”，每一次归纳，都让概念变得更加笼统，更加大而化之，到最后，如果把普天下的事物都归结成一个概念的话，这个概念就应该是最笼统、最大、包容性最强的。它不能带一点具体的特性，因为只要带具体的特性，就会把不符合这个特性的一些概念排除出去，它也就不是那个终极概念了。所以，这个终极概念只能是“无”，因为“无”不具有任何特殊性，可以包容一切。

但裴却认为，“无”并不是最终的本源，因为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存在的，而“无”是不存在，所以“无”不能生“有”，而“有”只能是“有”生出来的。这就像人不能凭空生出来，必须有父母，才能有子女一样。

那么，“有”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有”是被其他的“有”创造出来的。比如，器物是匠人创造出来的，器物是“有”，如果没有“匠人”，就无法创造这个“有”，而“匠人”就是另外的“有”。所以，各种“有”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联系，每一种“有”都可能参与创造了其他的“有”，这就有了“群有”的概念。

通过对“有”和“群有”概念的塑造，裴就提出了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比如，如果去打猎，依靠“无为”等待是打不到猎物的，必须积极行动起来，选择“有”而不是“无”，选择“动”而不是“静”，才能打到猎物。

到这里，裴的“有”主要是针对王弼的“无”。接下来，裴就把对“有”的概念应用到了政治之中，批判嵇康等人的出世哲学。认为这些人忘记了礼法，从而扰乱了政治。[94]

由于有形的东西容易考察，无形的“无”却摸不着看不见，不容易检验，结果反而能够糊弄更多的人。这些人聚集起来一唱一和，形成了风气，结果造成了礼法废弛，人们不喜欢功名，反而去追求虚无之理。到最后，聪明的人都满口玄理，笨蛋们只知道交口称赞。说一句俏皮话就当成玄妙，当官的不务正业叫作雅远，修身不注意操守，反而称为旷达。[95]

通过批判虚无，裴树立了另一种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并不是新的，而是旧有的，或者说，按照司马氏政权的期望，回归到汉儒传统中去寻找解药，回归到功名利禄的轨道上去。

但是，裴也许永远不会明白，当思辨的魔盒打开之后，人们已经无法回归汉儒了。汉儒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盲目相信上的，要求人们放弃思考，只是死记硬背一些条条框框，再加上一些比附，以及伪造的谶纬，当人们已经学会思考更抽象的问题时，只能继续向下发展。

实际上，裴批评贵无论，建立崇有论，使用的也是思辨哲学和逻辑学，这些学问都是依靠玄学发展起来的，而他的文章如果拿给汉儒看，对方根本就无法看懂。

除了在理论上反驳嵇、阮、何、王等人之外，裴还是个朝政上的行动派[96]。晋惠帝司马衷时期，晋国的朝政最初由贾后贾南风把持，朝野混乱，作为尚书的裴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商议将贾后废掉，另立更加贤惠的谢淑妃为皇后，后来事情不了了之。

贾后继续执政，与赵王司马伦勾结。但赵王是个有野心的人，掌握朝政后，就逼迫晋惠帝把皇位让给了自己。作为显臣的裴成了赵王篡位

的障碍，被赵王杀死了。

裴在写《崇有论》时，可能永远想不到，他所推崇的“有”和“名教”是如此险恶，就算像他这样信心满满的人都无法控制。他所推崇的“动”把他打造成了行动派，却始终没有别人行动迅速。

裴死后，崇有派继续存在，但西晋的政局却让那些试图恢复名教的人心寒，最后不了了之。两晋南朝的士大夫们仍然回到了王弼、嵇康所指引的旧轨道上，并且变得越来越颓废，陷入了享乐主义的泥沼。

独化：最后的调和派

当裴无法找到一条现实的出路时，还有两个人提出了另外一套理论，试图将名教和自然结合起来，同时把“有”和“无”的问题也结合起来。之所以说是两个人，是因为这牵扯到一通文人公案。

在历史上，中国文人向来不重视版权问题，在西晋时期有一部流行的书籍，到底谁是作者，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这部书就是《庄子注》。在三玄中，《老子》和《易经》早就有了较好的注本，但是《庄子》却一直没有好的注本。阮籍写过《达庄论》，嵇康也一直推崇《庄子》，但真正对之做出全面注解的却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

然而，向秀在死前并没有注完，死后他的稿本零散，被另一个人郭象拿到后接着完成，就形成了今天最流行的《庄子注》。后世一千多年来，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向秀和郭象到底谁的贡献大。

根据《晋书》记载，《庄子》三十三篇中，向秀没有完成的只有《秋水》和《至乐》两篇。郭象为人轻薄，窃取了向秀的文字，自己只做了这两篇的文字，又把《马蹄》一篇的注释替换掉，剩下的都几乎原封不动照搬了向秀的注解。[97]

但这种指控是否属实，现在仍然有争议。向秀死于晋武帝篡位后、西晋灭亡吴国之前，恰逢西晋政治上的上升期，但在注释中却深深地带着社会崩溃之后的沧桑感，比如，书中谈到，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必然

要以一个人为主，这个人就是皇帝。没有皇帝，或者有多个皇帝，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混乱。[98]

这种说法显然是针对西晋的八王之乱，八个诸侯王争相控制朝政，造成了西晋政治的彻底失衡。向秀本人没有经历八王之乱，他对于“君”也没有这么深的感情，反而是轻薄的郭象会说出这样的话。

在无法分清两者贡献的情况下，只能将《庄子注》看作两人共同的作品。

《庄子注》虽然名为注释《庄子》一书，但实际上却是以《庄子》借题发挥，阐述新的思想。《庄子》的特点本是狂放恣肆、天马行空，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好工具，注释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它解读为“名教”与“自然”结合的书，充满了调和精神。

在《庄子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独化”。要谈“独化论”，首先必须谈作者引入的“天然”这个概念，要谈“天然”，又要从作者同时否定王弼的“无”和裴的“有”谈起。

作者首先认为，世界的本源绝对不是“无”，因为“无”生不出“有”来。那么，“有”又是什么生出来的呢？他也不认为像裴所说的，是由其他的“有”创造出来的（就像鞋匠这个“有”，把鞋这个“有”创造出来），而是认为，每一个具体的“有”，都是自己生出来的，是“自生”的，不是“他生”的。这种“自生”，就是自然，自己而然，也叫“天然”。[99]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庄子注》和裴都否定了“无”，但是裴所说的“有”是动的，是他生的，是被别的“有”创造的；而《庄子注》却认为不是他生的，而是静的，天然就有的。

所谓静的，天然就有的，就叫作“无待”，也就是不依赖于别的东西而天然存在。能够保持无待，保持天然存在的，就是“独化”。[100]

“独化”这个概念很像现代物理学中的概念，一个物体如果不受外力，就会保持静止或者匀速运动，无始无终。而独化也是，一个物体如果不被其他物体干扰，就会一直保持下去，无始无终，这就是独化。

从独化又可以引出另一个概念：逍遥。所谓“逍遥”，就是“无待”，就是“独化”。比如，鲲鹏展翅九万里，看上去很逍遥，但是，它要依赖于风才能飞翔，这就不是“无待”，也就算不上“逍遥”。

可是怎样才能“无待”（不依赖于外力）呢？不依赖于外力的物体所处的状态，就叫“玄冥之境”，也就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政治上，也应该以“玄冥之境”作为标准，所谓“神器入于玄冥之境”。神器一般指的就是政治。要想达到玄冥，就不要随便施加外力，不要干扰人民的自我运动，让他们自己决定生活方式，这又回到了“无为”的概念上。

《庄子注》一书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回到了道家的无为概念。但它本身又是有为的，希望参与政治运行。这样，一方面否定了贵无派的“无”，调和了名教和自然的关系，让人们最后还是回到名教中来，参与政治建设。但另一方面，政治建设的手段就是无为而治。这就又做到了不要出世，又做到了无为而治。

魏晋玄学从“无”开始反对汉儒的“天人合一”，后来人为了反对“无”，提出了“有”，最后又有人同时反对“无”和“有”，提出了“独化”，再次回归到对政治的参与感。这些理论都有社会背景，也都有一定的道理。到现在，人们已经不会单独相信某一个理论，玄学真正流传下来的，反而是那些思辨性的论证过程，以及人们对于独立思考的坚持。从玄学之后，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已经土崩瓦解。即便到了隋唐时期，人们已经跳出了玄学主题，但思辨精神却保留了下来，直到元明时期，中国的学术才再次被威权主义所笼罩。

《庄子注》作为一部调和的作品，已经是玄学最后的高峰，当它出现时，天下已经大乱。西晋短暂的和平时代结束，进入了烽火连天的战争状态。这个时候，无论怎么提倡无为而治，都毫无用处了。

倒向享乐主义

西晋王朝的崩溃，意味着玄学理论的创造活力最终消失了。人们疲

于奔命时，不再考虑思辨性的玄学问题，而和平恢复之后，佛教已经逐渐取代了玄学，继续思辨性的游戏。

事实证明，晋武帝的改革完全以失败而告终。不管是军事上，还是经济、文化上，改革措施要么不到位，要么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不仅没有加强皇帝统治，反而摧毁了帝国。

对帝国影响最大的是军事改革。晋武帝设立了许多司马氏的诸侯王，又授予他们兵权，本来是想让他们帮助控制全国的，但司马氏的诸侯们热衷于争权夺利，在晋武帝死后不久，就发动了八王之乱。八个诸侯王互相仇杀、控制朝政，让中央政府彻底瘫痪，也给了北方蛮族的刘渊、石勒以机会。他们起兵叛乱，推翻了西晋。郡县裁兵的措施又让西晋缺少足够的兵源对付蛮族的反抗。[101]

经济改革也在士族的阳奉阴违中失效，没有土地的人照样没有土地，大土地主照样拥有着大量的土地。

文化改革同样没有效果，裴等人试图建立另一套理论来取代王弼、嵇康等人建立的脱离世俗、尊崇自然的风气，把人们引回到名教中来。但是，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却告诉人们，在名教中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不管是做官还是富贵，到最后都不能保证善终。石崇是巨富之人，可一旦得罪了权贵，立刻遭到杀身之祸。即便贵为皇帝，在贪婪的诸侯和可怕的蛮族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在八王之乱中，晋惠帝逃出京城，在路上只剩下两块布和三千文钱，想吃一只鸡都不可能。晋怀帝被匈奴人刘曜围困，文武百官都饿着肚子，城里一点炊烟都见不到，人们饿得只好吃人。愍帝被刘曜困在西部，一斗米被炒到两斤黄金的价格，死者大半，君臣除了哭之外做不了什么。[102]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哲学思想不仅没有像皇帝期望的那样回归儒教，反而变得更加放荡难测。如果说，嵇康、阮籍、刘伶等人虽然放浪形骸，可心中仍然有他的“道”，那么，西晋时期产生的另一种思潮，就是纯粹为了放浪而放浪，为了享乐而享乐了。

我们可以和希腊哲学做一个对比。希腊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学派叫

伊壁鸠鲁学派，这个学派最初的出发点是物质论（按照现在人的说法，有点接近唯物主义），也就是否定人类的灵魂，认为人死魂灭。既然人死之后没有灵魂，那么人们所能追究的就只剩下此生的欢乐。所以，这个学派很容易引出一种“得欢乐处且欢乐”的主张，变成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

这里有一个现代人不愿承认的事实：物质论往往是和“暴政”“享乐主义”伴生的。因为物质论认为人没有来生，没有灵魂，所以人们此生做的事情（不管是享乐还是作恶）都不会受到惩罚，也没有什么因果报应。当执政者意识到这一点，就会产生暴政；当普通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及时享乐。

魏晋后期也产生了一种类似于伊壁鸠鲁派的看法。当人们发现所谓的“因果报应”“天人感应”都是虚假的，老天爷没有随时盯着人间时，当人们看到作恶的人不受惩罚，而善良的人反而在乱世中丧命时，及时享乐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出现了。

代表这一思潮的作品是《列子》。在秦朝以前，确实有个列子写过一本书，但这本书到魏晋时期已经失传了，晋人假托列子的名义（或者借鉴了原来的某些材料）写了一本新的《列子》流传到了今天，成了我们了解魏晋享乐主义思潮的最佳资料。

这本书一共八篇，其中最让人无法接受却又说出了事实的，是《杨朱》和《力命》两篇。其中《杨朱》的主要论点是：人应该及时享乐，不要管死后会怎么样。没有天人合一，各种教条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听话，从而丧失掉享乐的本能。如果你听从这些教条，那么你就进入了罗网；如果你挣脱了这些教条，他们拿你也毫无办法。这就彻底打碎了儒教礼法约束人的种种理论。

《力命》则成了一种对“好有好报”的反思，认为命运是绝对的，不是每个善良的人都有好报，也不是每个恶人都受惩罚。所以，弱者总以为那些欺负自己的人在未来会受报应，这种想法只是鸵鸟政策而已。对于命运的绝对化，又让人们转而追求享乐主义，放弃那些渺茫的希望。

魏晋时期的人比战国时期更善于讲故事和论理，所以《列子》的阅

读快感比起诸子来要高得多，也更容易鼓动人们的情绪，接受它的观点。

比如，在《杨朱》篇中，作者借助齐国的管仲和晏婴（两个人并非同一时代的）来讨论养生态度的问题，从而引出了享乐主义的主张。

晏婴首先问管仲养生之道，历史上的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喜欢富贵享乐的人，他回答：养生之道就是随心所欲，不要试图压抑。

他接着提出了如何随心所欲：放任耳朵听想听的，放任眼睛看想看的，放任鼻子闻想闻的，放任嘴巴说想说的，放任身体去想去的，放任意愿干想干的[103]。这六条已经达到了人类享乐的极致。只要能做到这些，就可以乐呵呵地等死了，即便能这样活上十年、一年、一月、一天，都挺满足的。如果做不到这些，而是陷入礼法之中无法自拔，那么悲戚戚毫无乐趣地活上百年、千年、万年，也没有什么意思。

谈完养生之后，管仲反问晏婴如何看待死的问题。晏婴本人生性淡泊，不惧死亡，倒是谈死的正确人选。他说：死有什么可谈的，我又控制不了死亡。死后人的身体放火烧了也可以，沉到水里也可以，用土埋了也可以，扔到野外也可以，拿草遮住丢到沟里也可以，穿着好衣服装进石头棺椁也可以。碰到什么算什么。[104]

管仲最终总结说：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就把生死之道都看透了！

在同篇的另一处，作者借杨朱的口把儒教最崇拜的舜、禹、周公、孔子四个人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亡国之君夏桀、商纣做了对比。儒教的传统推崇尧、舜、禹的禅让，又把周公当成是周代礼仪等级制度的起点，至于孔子，则是儒教的教主。但在《列子》的作者看来，他们的做法却并不值得效法。反而是桀、纣的做法更有价值。为什么？

舜的一生“四体不得暂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行年三十，不告而娶。乃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儿子）商钧不才，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所以，舜是一个苦难深重的人。

而禹的父亲因为治水无功被杀，他本人为了治水，家里生孩子连名

字都来不及起，“过门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虽然舜禅位给了他，但是他自己住得很差，却要给鬼神准备美丽的祭祀服装，最后戚戚然以至于死，可以说禹是个忧苦的人。

至于周公和孔子，一个过得担惊受怕，一个活得凄惨窘迫，都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这四个人虽然死后获得了万世之名，可这些名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他们死了，变成了草木土块，什么都不知道了。

反而是桀、纣，高居帝位，受人尊敬，为所欲为，放情纵欲，快快乐乐地过了一辈子，即便死亡也是须臾之间的事情，相比于一生的快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至于死后的名声，他们反正不知道了。

这种绝对化的享乐主义让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了物质论的魅力，也成了现在一些无所畏惧的人的先驱。

在《力命》篇中，还给出了享乐主义的理论基础：人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采取苦修的态度，或者行善积德，也并不能真的积来德。比如，有的人省吃俭用一辈子，好不容易积累了一点家业，一旦革命到来，反而成了掉脑袋的事情。

作者虚构了两个角色，分别是“力”和“命”，代表着人力和命运，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对话，争论谁的功劳大。

人力认为：寿与夭、穷与达、贵与贱、贫与富，都是我人力可以决定的。

但命运并不同意，他举了许多好人没好报，坏人得长寿富贵的例子[105]，最后总结说，如果你人力可以决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圣人穷、坏人达、贤人贱、愚人贵、善人贫、恶人富的例子呢？

人力只好认输说：这么看来，我是决定不了，可是你命运为什么做这么多乖张的事情，让好人没好报呢？

命运说：这你就不懂了，既然叫作命，就是说没人能决定。我最多

也就是对顺利的事情稍微推动一下，对于曲折的事情听之任之。至于每个人的命，都是早就定了的，我也认识不了啊！

这种看似诙谐的小故事，透露的却是魏晋时期深深的无奈。一方面，人们对于政权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政权做事如同掷骰子，胡乱地决定每个人的命运，已经不具有确定性。另一方面，政权在失去了控制力之后，虽然有心恢复统一的哲学，却已经无能为力了。结果，魏晋哲学从最初的思辨、积极，到最后消极、丧失了活力。

到这时，另一股更加活跃、更加思辨的哲学力量逐渐占据了主流，将玄学这种想对简单的哲学形式排斥到历史的角落之中。

佛教来了。

注解：

[1] 本段史实见《后汉书·窦武列传》。

[2] 《后汉书·范滂列传》：“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滂等皆三木囊头，暴于阶下，余人在前，或对或否，滂、忠于后越次而进。王甫诘曰：‘君为人臣，不惟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滂对曰：‘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甫曰：‘卿更相拔举，迭为唇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

[3] 《后汉书·桓思窦皇后纪》：“太后素忌忍，积怒田圣等，桓帝梓宫尚在前殿，遂杀田圣。又欲尽诛诸贵人，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乃止。”

[4] 张奂知道真相后后悔不已，虽然宦官因为感激升了他的官，但他总想找机会为窦武申冤。最后，不堪忍受迫害的他回乡闭门不出，著书立言去了。见《后汉书·张奂列传》。

[5] 见《后汉书·陈蕃列传》。

[6] 《后汉书·陈寔列传》：“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

[7] 资料来自《后汉书·党锢列传》。

[8] 如汉宣帝皇后许皇后，以及汉成帝皇后赵皇后等。见《汉书·外戚传》。

[9] 见《后汉书·窦武列传》。

[10] 甘陵现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在东汉时期地属清河王国。汉安帝刘祜

在当皇帝前，是清河王刘庆的儿子，为帝后，为刘庆在清河造陵墓称为甘陵。

[11] 见《后汉书·党锢列传》。

[12] 《后汉书·范滂列传》：“太守宗资先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

[13] 《后汉书·党锢列传》：“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14] 见《后汉书·李膺列传》。

[15] 见《后汉书·范滂列传》。

[16] 《后汉书·蔡邕列传》：“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

[17] 《后汉书·蔡邕列传》：“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18] 《后汉书·郭太列传》记载的人物有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贾淑、史叔宾、黄允、谢甄、王柔、王泽、张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许伟康、司马子威、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周康子、王季然、丘季智、郝礼真等。

[19] 《后汉书·徐穉列传》：“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20] 这四人的发掘来自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事迹分别见《后汉书》各自本传。

[21] 曹操有能力篡权，却把机会留给了儿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22]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23]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

[24]　如《孔子家语》和伪《古文尚书》，有人认为多和王肃或其弟子有关。

[25]　见《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26]　《晋书·皇后传》："文明王皇后，讳元姬，东海郯人也。父肃，魏中领军、兰陵侯。"

[27]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讲易毕，复命讲尚书。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具体辩论的内容参见原书。

[28]　见刘劭《人物志》。

[29]　《老子指略》："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玄，谓之深者也。'"

[30]　《人物志·流业第三》："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辨，有雄杰。"

[31]　钟嵘《诗品》将五言诗的源流分成国风、小雅、楚辞三派，并对一百多位诗人进行分级，分成了上中下三品。比较典型的名人中，王粲、曹植、阮籍、陆机、潘岳、左思、谢灵运等入上品，曹丕、嵇康、何晏、石崇、郭璞、顾恺之、陶渊明、江淹、沈约等入中品，班固、曹操、曹叡、嵇绍、傅玄、杜预、范缜等入下品。

[32]　见《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晋书·宣帝纪》。

[33]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魏志》："（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

[34]　见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册第二章。

[35]　见《三国志·魏书·刘劭传》。

[36]　见《人物志·九征》。

[37]　《三国志·魏书·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38]　见《世说新语·品藻》。

[39]　见《世说新语·容止》。

[40]　见《世说新语·赏誉》。

[41]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对王弼有简单介绍。

[42]　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43]　见《三国志·魏书·曹爽传》附《何晏传》。

[44]　《列子·天瑞》注引《道论》："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矣。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圆。圆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45] 《列子·仲尼》注引《无名论》：“凡所以至于此者何哉？夫道者，惟无所有也。自天地已来，皆有所有矣。然犹谓之道者，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故虽处有名之域，而没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阳之远体，而忘其自有阴之远类。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则强为之名，取世所知而称耳，岂有名而更当云无能名焉者邪？夫惟无名，故可德遍以天下之名而名之，然岂其名也哉？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则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誉者，可以言有誉矣。然与夫可誉可名者，岂同用哉？此比于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于有所有之中，当于无所有相从，而与夫有所有者不同。同类无远而相应，异类无近而不相违。譬如阴中之阳，阳中之阴，各以物类自相求从，夏日为阳，而夕夜远与冬日共为阴；冬日为阴，而朝昼远与夏日同为阳；皆异于近而同于远也。详此异同，而后无名论可知矣。”

[46] 王弼《周易略例·明彖》：“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

[47] 《老子注》二十五章：“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名有形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论语释疑》（引自邢昺《论语正义》）：“道者，无之称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老子注》三十四章：“道泛滥无所不适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则无所不至也。”

[48] 《老子注》：“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四十二章）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二十五章）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五章）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穷。（五章）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二十九章）”

[49] 两故事均见《世说新语·言语》。

[50] 见《世说新语·文学》。

[51] 嵇康对于才性问题的观点，可以从他的《明胆论》中看出来。在文章中，嵇康对“明”和“胆”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所谓“明”，指的是人的智慧和品行；所谓“胆”，指的是人的才华和胆量。嵇康认为，“明”和“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该强行将之联系。

[52] 见《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53]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记载，钟会的谋反尽在司马昭掌握之中。司马昭认为，蜀国刚刚平定，处于丧胆状态，而魏国的军队又纷纷思归，这种状态下，即便有人谋反，也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他率军前往长安时，认定不管钟会是否谋反，大军到达长安之时，蜀地已经尘埃落定。果然，当他到达长安时，钟会已经死亡。

[54] 《晋书·嵇康传》：“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

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另见《世说新语·简傲》。

[55] 《晋书·嵇康传》："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

[56]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引《嵇康传》："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

[57] 见《世说新语·雅量》。

[58] 一魏尺大约二十四厘米。

[59] 见《晋书·嵇康传》。

[60] 魏晋时期的人们都喜欢评头论足，关于兄弟两人的优劣，也不能避免。一次，嵇康的朋友吕安去拜访他，却只见到哥哥嵇喜在家。嵇喜热烈欢迎吕安，但吕安不进门，只是在门上写了个"鳳"字，就离开了。嵇喜大喜过望，以为吕安在夸奖自己。到嵇康回来后，笑着告诉哥哥，所谓"鳳"，拆开就是"凡鸟"两个字。见《世说新语》。

[61] 《与山巨源绝交书》："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62] 《与山巨源绝交书》："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63] 见《嵇中散集·管蔡论》。

[64] 见《三国志》各自本传。

[65] 《阮步兵集·大人先生传》："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趋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

[66] 《阮步兵集·大人先生传》："且汝独不见乎虱之处乎裈中，逃乎深缝，匿夫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67] 《嵇中散集·太师箴》："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沈。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

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

[68] 《嵇中散集·太师箴》：“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厥初冥昧，不虑不营。欲以物开，患以事成。犯机触害，智不救生。宗长归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托贤明。”

[69] 《嵇中散集·释私论》：“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70] 《阮步兵集·大人先生传》：“是以至人不处而居，不修而治，日月为正，阴阳为期。岂情于世，系累于一时。乘东云，驾西风，与阴守雌，据阳为雄，志得欲从，物莫之穷，又何不能自达而畏夫世笑哉？”

[71] 《世说新语·任诞》：“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闲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72] 本则和以下数则皆取自《晋书·阮籍传》。

[73] 见《嵇中散集·琴赋》。

[74] 见《晋书·山涛传》。

[75] 见《晋书·刘伶传》。

[76] 见《世说新语·任诞》。

[77] 见《晋书·向秀传》。

[78] 《思旧赋并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79] 见《晋书·阮咸传》。

[80] 《晋书·王戎传》：“尝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

[81] 《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82] 见《史记·乐书》。

[83] 见《汉书·礼乐志》。

[84] 见《晋书·欧阳建传》。

[85]　欧阳建《临终诗》："伯阳适西戎，孔子欲居蛮。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况乃遭屯蹇，颠沛遇灾患。古人达机兆，策马游近关。咨余冲且暗，抱责守微官。潜图密已构，成此祸福端。恢恢六合间，四海一何宽。天网布纮纲，投足不获安。松柏隆冬悴，然后知岁寒。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上负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顾所怜女，恻恻心中酸。二子弃若遗，念皆遘凶残。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环。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汍澜。"

[86]　《言尽意论》："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

[87]　《言尽意论》："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不二，则无不尽，吾故以为尽矣。"

[88]　《世说新语·言语》："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89]　《晋书·职官志》："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制度。"

[90]　经济政策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91]　《晋书·地理志》："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根据《通典·食货七》，三国时期人口数，魏国（公元263年）大约是4432881人，蜀国（公元263年）大约是1082000人，吴国（公元280年）大约是2567000人。

[92]　《晋书·裴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

[93]　《崇有论》："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沈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

[94]　《崇有论》："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

[95]　《崇有论》："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96]　见《晋书·裴传》。

[97]　《晋书·郭象传》："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

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98] 《庄子注·人间世》：“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99] 《庄子注·知北游》：“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之，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庄子注·齐物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已而然，谓之天然。”

[100] 《庄子注·齐物论》：“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而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

[101] 西晋裁撤士兵，遭到过大臣的反对。《晋书·山涛传》记载：“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

[102] 《晋书·食货志》：“惠后北征，荡阴反驾，寒桃在御，只鸡以给，其布衾两幅，囊钱三千，以为车驾之资焉。怀帝为刘曜所围，王师累败，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馁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太半。刘曜陈兵，内外断绝，十饼之曲，屑而供帝，君臣相顾，莫不挥涕。”

[103] 《列子·杨朱》：“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104] 《列子·杨朱》：“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105] 《列子·力命》：“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

第三部
当皇权遭到拒绝：三教的竞争与妥协
（公元316—公元960年，东晋到五代）

第十章
长不大的道教，思辨的佛教（公元前2—公元316年）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教一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作为哲学的道家是一个出世、崇尚自然和简朴的学派，但作为宗教的道教却是一个极其世俗化，与政权关系密切的宗教。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就由道教提供，是位于陕西汉中地区的五斗米道。著名的天师道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

在对世俗政权的崇拜和利用上，道教和儒教是等同的。它不仅不反对人间统治，还总是试图加入它。道教与儒教的不同，更多表现在对于丹药和修炼的痴迷，符咒、仙药、修炼、阴阳、五行成了道教的特征，持续到现在仍然是这一套。

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是一个比玄学更加思辨的体系，在玄学衰落之后，继承了中国哲学中的逻辑力量。

印度早期的上座部佛教，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四谛”，即“集、苦、灭、道”四种真理。人类在轮回中承受着一切苦难，如“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这些苦难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贪、嗔、痴三毒，也就是集谛。如果要消灭痛苦，就必须消灭贪、嗔、痴三毒，跳出轮回，即灭谛。道谛，就是跳出轮回的方法和修行。

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将上座部求解脱、跳出轮回的目的称作“解脱道”，也就是只注重自己脱离苦海。大乘佛教同时提出“菩提道”，即帮助众人共同脱离苦海。所谓菩提道，就是成为佛陀那样的“佛”，是更高级的解脱。

大乘佛教根据修行理论的不同，又分为“中观”“唯识”和“真常”三支。前两支流行于印度，并传入中国。后一支发源于印度，在印度却并不流行，反而在中国找到了最佳土壤，发展出了不少中国本土原创的分支。

在三国正在形成之际，人们很少注意到，在如今的陕西汉中地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这个教不是佛教，也不是儒教，而是道教。

汉中的地理位置在秦岭之南的汉江上游，翻过秦岭，就是陕西著名的关中平原和长安。从汉江向东而下，就到达了湖北的襄阳盆地，这里已经接近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从汉中向南，则是著名的蜀道入口，千百年来，这里是从内地进入四川的首选道路。

汉中本身就是一个小盆地，拥有着丰富的资源，汉高祖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时，最初的都城就设在这里。到了汉末，一个奇怪的宗教群落却在这里发展起来。

最初在这里发展宗教的，是一位叫作张脩的人[1]。当全国各地都尊孔子时，张脩却反其道而行，独尊老子。他虽然尊崇老子，但最具有号召力的把戏却是治病。如果谁生病了，他就叫这个人进入一间安静的房间清修，再派人为他祈祷。祈祷的方式是制作三份咒符，写上生病人的名字，一份放到山上，另一份埋到地下，最后一份则沉到水里。为病人祈祷的人有一个名字，叫“鬼吏”。另外，还有一种人叫作“奸令”，所

谓“奸令”，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必须是能够背诵《老子》的文化人。他们要帮助病人学会背诵《老子》。这些文化人平常被授予“祭酒”的职位，也就相当于组织里的官僚阶层，在帮助病人学习时就被称为“奸令”。

当然，治病是要收费的，每一个病人要出五斗米，所以，又称为“五斗米教”。张脩时期，这个组织还比较粗糙，不能算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权。

在东汉末年、三国之前的乱世时期，各路诸侯都忙着收编各地的豪强，张脩也被位于四川的益州牧刘焉收编了，赐予别部司马的官职。但是他并没有官运，随后被另一个觊觎汉中的人张鲁所杀。

张鲁也是刘焉封的官，官职是督义司马。刘焉死后，张鲁和刘焉的儿子刘璋闹崩了。刘璋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家室，导致张鲁割据了汉中，成了一方军阀。

正是张鲁借助张脩打下的基础，在汉中开始了第一个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试验。要建立政权，第一要务，就是建立组织。张鲁自称是“师君”，也就是宗教导师和政治君主的合体。刚刚加入组织的人被称为“鬼卒”，经过训练后，已经皈依了教门的，就称为“祭酒”，祭酒们可以建立支部，如果他的支部规模很大，权力也就很大，这样的人被称为“治头大祭酒”。

至于张脩的传统节目治病，也被放在了宗教的审视之下。如果人病了，必然是他不诚实，或者做了坏事，这时就需要在祭酒的指引下进行忏悔，只要忏悔得当，病自然就好了。如果病没有好，证明这人不可救药。

组织化之后，张鲁率领着他的人马做了不少好事。比如，各位祭酒有责任设立一些义舍，相当于慈善性质的机构，有的设在驿站，有的设在县里，人们路过时饿了，就可以进去免费吃喝一顿。但如果一个人贪得无厌吃得太多，张鲁就会命令小鬼让他生病。

根据教主的教导，人们还应该诚信，不欺诈，检验的标准也是看他

是否生病。另外，如果犯了法，也要原谅三次，第四次才惩罚。

由于有了“祭酒”这个集团，张鲁也就不再设立正规的行政官员，利用祭酒来管理这片地方。这样，祭酒们就成了这个政教合一体制的核心部件，他们负责控制人们的思想，也负责规范人们的行为。[2]

张鲁的政权让我们第一次认识了政教合一在中国的魅力。虽然汉帝国也可以说是政教合一的，但毕竟它还有正规的官僚系统，官僚们虽然利用儒教治国，但由于国家很大，很难纳入一个严密的政教体系中。而在汉中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是绝对化的，与西方的政教合一机构已经很类似了。

张鲁为了宣扬自己的正统性，宣布他的爷爷叫张陵，父亲叫张衡。他还宣称五斗米教是他爷爷在四川旅游时创建，并在汉中实施的。这也许并不是真的，只是为了消灭张脩的痕迹而已。但是，民间却相信他造的神化，张陵也被民间授予了另一个名字——张道陵，他被封为道教的祖师，又称为张天师。

人们在谈论道家时，往往会认为所谓道家，就是主张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从而以为道教也必然符合这个主张。但实际上，道教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世俗性的、功利性的组织，以控制人为目的，而不是实现最大化的自由。

张鲁后来被曹操收编，得以善终。汉中地区也恢复了世俗生活，但是，张鲁所创造的五斗米教却以“天师道”的形式存在下来，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道教的形态。

作为宗教的“道”

什么是“道家”？什么又是“道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谓道家，是指一个学术流派，这个流派以《老子》、《庄子》（以及后来的《列子》）为经典进行学术探讨。但是，他们的学术并不与政治和社会直接挂钩，最多只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而所谓道教，则依托于一个社会化的组织，设计了一套“万有理论”。这个组织是带有强迫性的，对人身设定了一系列的准则，要求信徒们必须执行。同时，这套“万有理论”也是无所不包的，希望能够指导人们从生下来到死亡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不管是生病，还是养生，或是参与社会活动，都在它的指导范围之内。

这也是一个宗教与普通思潮的区别，一个思潮只是探讨，不具有强迫性，一旦一个思想与政权相结合，要求人们必须以某种思想为指导来生活，那它就变成了一种宗教。

人们普遍认为，道教的产生是对儒教的一种反抗，但实际上，道教是依托于儒教才产生的。

在汉代随着儒教深入到人们思想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新教派也必然是儒教的变种，这时出现的道教也不例外。

汉代道教和儒教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用老子取代了孔子，用《老子》取代了《春秋公羊传》。至于组织化的一切都是类似的。又由于组织化的类似性，老子取代孔子也是不彻底的。

关于道教的诞生，和一本叫作《太平经》的书有关。

大约在汉顺帝时期，市面上出现了一本伪托仙人所作的神书[3]，这本书中谈了许多虚无缥缈的事情，并承诺按照这本书的指引，不仅可以治理国家，还可以修身养性、成仙得道。这本书号称《太平清领书》，共一百七十卷，后人将之称为《太平经》，传世的有五十七卷。

《太平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简单地说，它是一本融合了儒教谶纬、政治观、养生、神仙、符水等内容的大杂烩，并点缀了一点道家的宇宙观，杂凑而成的书。这种书之所以出现，是深受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影响，又想做出点特色，所以取道家的理论糅合进去。

这本书和儒教观点相合的地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天地阴阳生成说。关于天地万物的化生关系，书中大部分观点都和儒教相通，只是在数字的解读上稍有区别。儒教认为太一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一、二、四、八”的数列，而《太平经》根据道家传统，从《老子》里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强调“一、二、三”的数列，除了“一”代表“太一”之外，“二”则代表天地、阴阳、雌雄等，而且进一步把“一”当作阳数，而“二”当作阴数，从而推断出一系列的结论。为什么一个皇帝要有很多大臣？因为君是阳，而阳是“一”，臣是阴，而阴是“二”（表示“多”）。另外，书中还由此主张两女共侍一男，因为男是阳，女是阴，等等。[4]

《太平经》对于“三”这个数字也很重视，认为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第二，关于阴阳灾异的学说，继承了儒教的天人合一理论，并将它变得更加复杂化，从而设计一套“人法天地”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与儒教制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道教和道家的区别，道家是反制度的，对一切人为制度充满了警惕，而道教并不反制度，反而劝说人们遵从政治，这一点和儒教的目的是相同的。

除了与儒教的相同点，《太平经》中也有一些儒教理论较少涉及的领域。这些领域并不来自老子，也不来自孔子，而是来自中国神话学的另一个传统：萨满传统。

所谓萨满教，指的是相信万物皆神的一种原始宗教。它一般出现在人类早期，或者发展较慢的游牧、山林部落之中。到后来演化成一种多神教体系，与更加思辨的一神教相对立。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样，一直有万物皆灵的传统，并持续到了现在。

《太平经》中由此设计了一套多神教的体系，也就是神仙体系，并由此演化出一套修仙成道的理论。要修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符水，靠画符来获得功力；另一种是炼丹，吃丹药成仙。

关于《太平经》和儒教的不同，可以列为如下几点：

第一，它设计了一个六等的神仙体系，这个体系中包括了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其中道人以下就回到了人间，前三种则升到了天上。所以，儒教所推崇的圣贤（如周公、孔子），在道教看来，只不过是最后两等而已。至于普罗大众，则不在这个体系之内。

第二，一个普通人如何才能进入这个体系呢？这就要修行。修行的方法主要包括：一、要遵守社会规则，做一个良民，比如，忠君、孝敬等都被说成是一种功德；二、要从理论上参悟，主要是要学会静，要学会守一等；三、要服药，或者使用符水。

当然，道教的符水也不是它的特色，这是从儒教的谶纬变化而来的，而且更加具有功利性。

《太平经》成书后，最初由于内容芜杂难信，并没有受到重视，但到了东汉末年，突然间引爆了一个大事件，这就是黄巾军叛乱。

黄巾军的领导人张角曾经得到过这本书，被它的理论所吸引，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开始了对东汉政权的反叛。张角的组织号称“太平道”就来自于此书，而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号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就来自《太平经》对数字“三”的解读[5]。

张角最初的特色是以符水咒来治病，相当于对人实施信心疗法。即便现在，国内还存在着许多巫医，有的巫医门口车水马龙，大到富商大贾，小到平民百姓都去治病，可见两千多年并没有太大长进。与张鲁的五斗米道一样，张角的符水也并不包好，而是教病人叩头思过，如果病人好了，就说他信道了；如果没有好，就说他不信道活该[6]。

随着人们传得神乎其神，他开始建立组织，并招兵买马，对抗朝廷。他的组织更多是军事化的，缺乏更紧密的宗教性联系。被镇压之后，太平道也随之进入低潮。

汉中的五斗米道则和太平道不同，通过把人变得社会化和组织化，建立了一套政教合一的体制，成为道教的开端。

被曹操收编后，五斗米道虽然不再是政教合一，但作为一种宗教却被保存了下来。

由于道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功利化的，总是希望与政权相结合，导致道教一直长不大。和佛教相比，佛教是思辨性的，可以独立于政治。但道教出生于汉代，汉代的哲学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逻辑能力的，导致道教不喜欢思考问题，只习惯于用一系列的比附和符咒，动不动就跳神，失去了进化的能力。

即便到了现在，道教所谈论的东西其实和汉代没有太多区别，仍然是符咒、仙药、修炼、阴阳、五行等东西，很少有理论上的创新，这也导致道教一直不如其他两种教派昌盛。

儒道从来是合流

道教的定型还和另一个人有关：两晋时期的道士葛洪。他给道教提供了两方面的营养：第一，外儒术，内神仙，一个人外在表现要采用儒教的仁义道德标准，而内在要修长生不死的神仙学。第二，炼丹，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长生不老丹药运动，就从这里发端。前者决定了道教实际上是和儒教合流的，而后者决定了道教未来只在长生不老的丹药里打转。

葛洪[7]的祖父是东吴的高官，父亲则在西晋灭吴后，入晋做官。葛洪父亲早逝，他经历过贫穷，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博览群书。他读书的起点，是从儒教的经典著作开始[8]，之后进入杂家，这也决定了葛洪的思想并未脱离儒家的窠臼。

葛洪年轻时，恰逢西晋的石冰作乱，他参与过镇压。之后由于天下大乱，南行到广州，投靠了广州刺史嵇含（嵇含的爷爷叫嵇喜，嵇喜是嵇康的哥哥）。

但他去了不久，嵇含就遇害了。葛洪在广州逗留许久，开始系统地钻研他的神仙理论。东晋建立后，葛洪回到了江南在元帝朝廷混官，但并不得意，最后又返回广州，著述文章，死在了那里。

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葛洪并不是一个静心的人，对于功名的追求，表明他离不开儒教的立场。他对于“道”的理解也是功利化的，就是

为了长生不老。

正因为这样，他对于之前的“道”都持批评态度。比如，东汉末年的早期道教，葛洪就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奸邪逆乱之徒。[9]

而在他生活的时代，五斗米道信仰仍然在民间保留着，不管是反叛者还是顺从朝廷的人，都有五斗米的从众。比如，东晋王朝的反叛者孙恩家族就信奉五斗米道。[10]王羲之所在的琅琊王氏，也有许多五斗米道的信徒，他的儿子王凝之在孙恩打过来时，不仅不做军事准备，还去祈祷请鬼兵，结果他的五斗米道不如孙恩的五斗米道，王凝之也被杀。[11]

葛洪认为，这些以前的道教分支都不够听话，他要进行改造，让它们更听话，不要反抗。

甚至对于道家的老子、庄子，他也缺乏尊重。对于老子，他的评价是：老子的五千言只是泛泛之谈，过于简略，让人无法找到当神仙的步骤；对于庄子，他也认为庄子只是说到大概，距离真理还远得很。[12]

那么，葛洪认为的真理又包括什么呢？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他继承了道家的一些词汇，提出世界的本源是“元（也就是玄）”“道”“一”，在他看来，这几个词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世界的本源。

第二，人类的目的就是要“守一”成仙。只有成仙才能长生不死。为此，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憧憬成仙之后的各种妙处。当然成仙也是很难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仙。“成仙很好，成仙很难”，此类同义反复的话说了很多遍。

第三，不仅成仙很难，而且成仙也有等级。有的人有仙骨，有的人没仙骨。而且成仙也不一样，有的人整个身体升入太虚，叫作天仙；有的人在名山大川中游荡不死，叫作地仙；有的人要先死掉，然后得以解脱，叫作尸解。[13]有人认为，葛洪本人也只混了个尸解仙。[14]

第四，绕来绕去，终于到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才能成仙？步骤是什么？葛洪还真的列出了不少成仙的法子，具体到让人流泪。最大的

法子就是服用仙丹。

如何炼制仙丹？他给出了不少药方。比如，黄帝当年成仙时服用的九鼎神丹，一共有九种丹，分别叫作丹华、神丹（也叫神符）、神丹（原书如此，与第二丹同名）、还丹、饵丹、炼丹、柔丹、伏丹、寒丹。

这些丹如何做？他有的没有具体说，有的给了方子。比如，九鼎神丹中第一丹的药方如下[15]：第一丹名曰丹华。当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礜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七之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须臾成黄金。又以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亦成黄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更封药而火之，日数如前，无不成也。

当然，没有人能根据这个药方炼出丹来，因为这个方子并没有写重量、配比，而且耗时动不动就是几十天，来来回回折腾到死，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配比。所以，即便给了方子，所谓炼丹，也不过是人们在漫长的一生中等死时玩的游戏而已。[16]

除了九鼎神丹，慷慨的葛洪在书里还给出了许多其他的方子。不仅仅是药方，还有其他修身养性的大法，同样可以达到长生不死。除了成仙，还有炼金银的方子，这就又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但整体而言，葛洪之前，特别是东汉时期，信奉道教的人们使用的大都是符水，也就是画个符弄个咒，给人治病；葛洪之后，画符诅咒已经成了小打小闹，只保留在底层的民间信仰之中，而高级道士们纷纷开始开炉炼丹了。到了唐代，人们嫌炼丹更麻烦，于是兴起了炼内丹，也就是不再炼实体的丹药，而是通过养性修身，让丹药自动在体内形成，就达到长生不老了。

除了修仙之外，葛洪还定义了道教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儒道双修”，或者“内神仙，外儒术”。

在他的心目中，儒和道都是“大道”的一个方面，只是道是“本”，而儒是“末”。[17]虽然有所差别，认为神仙之术更加高贵，但葛洪主张的人

生哲学是：在人世里规规矩矩遵守礼法，暗地里炼丹成仙，不和社会对抗，也不违逆世俗的社会规则。

在他的观念里面，天道、君道、臣道、人道，都是等同的。比如，人们认为伊尹和霍光是贤臣，因为他们废掉了昏君，又认为商汤和周武王是圣王，因为他们讨伐无道昏君，建立了新的王朝。但在葛洪看来，这都是错误的，因为这鼓励了大家叛逆。他认为，君就是天，是父，如果君主都可以废弃，就好像天也可以改，父亲也可以拿掉一样。[18]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时代，道教做的是群众运动，这是皇帝最害怕的。葛洪把道教关于群众运动的内容去掉了，变成了只和上层打交道，出入于王庭的宗教，这实际上有利于道士们提高地位，又扫除了皇帝的戒心。

在这样的理论下，道教走的是一条妥协的路，服从中央帝国权威的管理，不做任何让政权不高兴的事情。到了后世，这已经成了一种交易，即政权默许甚至支持道教的存在，而道教一方面炼自己的仙丹，另一方面则帮助政权稳定局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经过了改造的道教几乎从来不闹事，反而是闷声大发财，甚至和佛教争宠，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权资源，其原因就在于葛洪对道教的改造。

在葛洪的影响下，东晋南北朝的道教终于脱离了民间，形成了一个上层集团和文人参与的宗教，他们越来越不重视民间的信仰者。这时的道教分成了如下几个支派：

在北朝，是道士寇谦之建立的天师道。在南朝，则分成了两支，分别是道士陆修静代表的灵宝派（也叫南天师道）和道士陶弘景所代表的上清派（也叫茅山派）。

所谓北朝天师道[19]，是寇谦之在五斗米道基础上建立的教派，这个教派抽去了五斗米道的群众基础，却建立了复杂的上层架构。寇谦之创造了一个新神“太上老君”，又创造了一个职位“天师”。他宣称最早的天师是五斗米道的名义创始人张道陵（张陵），而现在则是他寇谦之。

除了这个职位之外，他设立了道坛，又模仿政治制度创立了道教的各种仪规。更重要的是，天师道是直接和皇帝打交道的，热衷于当皇帝的谋臣，并希望能成为国教。

所谓灵宝派，是奉《灵宝经》（相传为葛洪所作）为圣经的一派，也和五斗米道有瓜葛。陆修静也热衷于建立组织，讲究排场规矩，重视符箓，这些都和天师道类似，所以被称为南天师道。

而上清派则尊奉《上清经》，这是一本伪托真人所作的经书，这一派相对出世，注重个人的修道，继承了葛洪神仙修行的一脉思想。

但总体而言，这三派要么热衷于成为国师，要么热衷于成仙得道，都以皇帝的好帮手自居。

在道教被改造成顺从的宗教，希望能够获得政权支持时，另一支外来的宗教却以更快的速度席卷了全国，成了皇帝的座上宾，它就是佛教。

浮屠真义

公元前6世纪的一天[20]，一位印度的王子（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净饭王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Gotama　Siddhattha）离开了王宫，去寻找心中的“道”。在他的前半生，他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王子生活，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但在二十九岁那年，一次出行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路上看到了人的死亡、病困和衰老，开始意识到皇宫内的一切虽然值得留恋，却显得那么虚幻，掩盖了真相。他开始考虑人之为人的意义，既然人们都要死，为什么还要活过来？妻子、孩子、王国都是如影旋灭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

最终他选择了离开皇宫，去寻找答案。这次寻找，带来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那么，佛教都说了些什么？在佛教之前，印度其实已经有了婆罗门教，而佛教的许多理论就脱胎于其中。可是，现有佛教理论中，哪些是

它从印度的婆罗门教继承的？哪些是它新创的？

如今人们一谈到佛教，就要谈到轮回观念，但这并不是佛教的发明。印度的原始人口是达罗毗荼人，后来来自亚欧大草原的雅利安人入侵了印度，成了统治阶层。为了便于统治底层的达罗毗荼人口，雅利安人制造了种姓制度，将人口分成了四种姓，分别是：婆罗门（教士阶层）、刹帝利（国王和武士阶层）、吠舍（商人阶层）、首陀罗（底层人口），另外还有不入等级的贱民阶层。

为了保持血液的纯净，这些阶层之间没有血缘流通渠道，不能通婚，一个贱民也永远没有机会上升到高等级。

如果社会如此板结，那么必然引起下等人的反抗。为了避免这种反抗，婆罗门教制造了轮回观念。人死后灵魂会再次托生，开始另一个循环。如果一个人在此生表现良好，安守种姓的本分，不违规，不逾矩，那么，到了下一次轮回的时候，将升入高的种姓。如果他表现不好，到了下一次轮回，就会降入低种姓，甚至不再是人，变为畜生。

轮回观念通过给人虚无缥缈的“下辈子”希望，避免了下等人在“这辈子”进行反抗。

但是，这种信仰到了悉达多时代，受到了冲击。他处于印度的十六国时代，也就是战争最频繁的阶段，世界过于惨烈，使得人们感觉来生也没有了希望。

悉达多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轮回的基础上再创立一种学说，给人以新的希望。当然，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来生，因为来生的社会同样混乱，打打杀杀，来了也是受苦。所以，他设想了另一种可能性：跳出轮回。通过修行，人们可以跳出轮回，就不用再回到这个混乱的世界。在新的理论下，跳出轮回是比下一辈子晋升高种姓更令人羡慕的事情。这样，佛教就给了下等人和上等人平等的地位，因为不管是谁，只要生活在轮回之中，就是受苦，而且谁都能通过修行跳出去。

悉达多（我们应该称他佛陀了）的理论可以用“四谛”来概括，所谓四谛，就是“集、苦、灭、道”四种真理。

苦谛，指的是轮回之中的一切苦难，如“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都是人生必须经受的苦难。

这些苦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贪、嗔、痴三毒，也就是集谛。所谓集，就是人类的欲望的集合体。

如果要消灭痛苦，就必须消灭贪、嗔、痴三毒，消灭了三毒，也就跳出了轮回。这就是灭谛。

而道谛，也就是跳出轮回的方法和修行。佛教弟子修行的行为规范，一般来说是指八正道，“正见解、正思想、正语言、正行为、正职业、正精进、正意念、正禅定”。这些正道帮助人们消灭三毒，跳出轮回之苦，从而达到其活着的意义和死后的永恒。

后世的佛教基本上都承认这个“四谛”，特别是在“集、苦、灭”三谛上，大乘、小乘、金刚乘都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对于“道”谛，后世的发挥却层出不穷，因为“道”是跳出轮回的方法，每一个派别提供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而看待世界的理论也各个不同，所以，各个派别的争执，主要都是争谁的“道”才是正道。

在争执中，主要又分成了几个派别，分别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

佛陀死后，他的言论和戒律被弟子们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就是《巴利三藏经》。小乘佛教的经典是用巴利文（这是一种类似于梵文的语言，与更加正式的梵文比起来，巴利文是更加通俗的民间用语）记录的，所谓三藏包括了律藏（佛教戒律和规范）、经藏（记载佛陀言行）、论藏（后来弟子的解释性教义）。

与《巴利三藏经》对应的，是最早形成的佛教派别上座部，也称小乘佛教，由于现在的上座部主要通过斯里兰卡传入东南亚，也称为南传佛教。

在中国早期，也曾经选择性地翻译了一部分上座部经典（主要从经藏部分翻译），这些经文统称为《阿含经》，而《阿含经》又包括了《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几部分。

上座部基本上继承了佛陀的理论，认为人的修行，就是为了跳出轮回，得到解脱。它又做了一些细化工作，增加了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业”。所谓业，是一个数学概念。上座部讲修行是持续许多个轮回的，由于修行很难，一个人一生可能只修行了50%，还达不到脱离轮回的标准，那么他下一辈子再修行20%，第三辈子又修行了30%，加起来达到了100%，就可以脱离轮回了。“业”就是衡量一个人修行成果的计量指标，我们可以将它看作这个百分数。有了业的概念，一个人就不用急着在这辈子解脱了，他只要坚持不断修行，总有一辈子能够达到目标。

第二个概念是“十二因缘”，也就是把“四谛”里面的“集谛”继续细化，总结了人类的十二种活动，由低到高排列，分别是“无明（最初的浑浑噩噩的状态）”、“行（从最初状态开始有了行动）”、“识（行动之后有了辨识能力）”、“明色（有了辨识能力之后，对事物开始分门别类）”、“六入（通过各种感官获得认知材料）”、“触（接触外界事物）”、“受（感受外界事物）”、“爱（感受之后，对外界事物做出评价）”、“取（有了评价之后，主动获取喜欢的事物）”、“有（占有主动获取的事物）”、“生”、“老死”。

第三个概念是修行的细化，即修行要从“戒（遵守戒律）、定（禅定）、慧（对教义的领悟）”三方面入手。关于遵守戒律，并没有太多值得探讨的，而修行功夫主要在于禅定和领悟。

比如，本书作者曾经参与过南传佛教的禅修，所谓禅定，并非仅仅打坐，而是要求在打坐的同时，好好体会呼吸的每一个步骤，观察气流在身体中的运行，并从中体会到人体与宇宙的合一。另外，一个修行者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走路上，走路时必须将每一步都进行无限分解，体会到每一个动作、每一块肌肉的运动，并与天地融合，体会到无穷智慧。

南传佛教的信徒们就这样花一辈子去体会人体与宇宙的合一，然后又一辈子，再一辈子…不断地积累着“业”。

第四个概念是对四谛的总结，提炼出三句话，号称三法印：“诸行无

常，诸行皆苦，诸法无我”。即人生没有常态，人生都是受苦，以及“我”并不是独立的实体，只是因缘之中的一个被动的受体而已。

通过这些概念，小乘佛教就建立了一套修行体系，信徒们用毕生的工夫进行修行，希望积累他的“业”，等业积累够了得到解脱。而修行的内容主要是禅定、戒律，加上一定的教义探讨。与后来出现的大乘佛教相比，它更加原始，更少理论化的，更强调行动，缺乏思辨性。

除了小乘佛教，佛教第二个分支是密宗，也叫金刚乘，由于主要流传于西藏，也称藏传佛教。

在修行方法上，密宗和小乘佛教是两个极端。小乘佛教讲究“业”，一个人要通过许多轮回的积累，最终才能脱离轮回。而密宗则忍受不了这么长时间的禅定修行，而是讲究高效。它提出，除了这样年复一年、生复一生的修炼方式（这种方式也叫渐悟）之外，还有一种更加迅速的方式，叫作“顿悟”。

所谓顿悟，就是在一瞬间，人的“业”从零突然增加到百分之百，立刻脱离轮回成佛了。而且“业”还可以传授，通过一个人瞬间传给另一个，让他也从零增加到百分之百。

密宗之所以出现，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人类的心急，等不了太久的修炼；另一种是受更加原始的宗教，比如萨满教、苯教的影响，相信自然界的超能力，并且超能力可以传授。

我们经常会看到密宗的信奉者们四处游荡，要么给别人传授某种法门，要么接受别人的法门，寄希望于顿悟，这一辈子赶快得道。即便不能立刻得道，也多增加点特异功能，让人刮目相看。

相对于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来说，密宗是一个不入流的分支，只是在最近全民信佛的功利背景下，才又将它炒作了起来。现代人绝对等不起慢慢的修行，只想赶快就见成效，好拿着那点成效四处招摇撞骗冒充活佛。当然最终的目的是经济上的，得来了活佛名号，就可以开个公司授课或者卖产品。

在中国历史上，密宗对于哲学的影响也并不大。

对于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是大乘佛教。那么，什么是大乘佛教？它又说了些什么？

普度众生的大篷车

如果把佛教的各个教派和其他两大宗教做个对比，小乘佛教相当于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或者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之后出现的大乘佛教则类似于基督教中的新教，或者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信仰基础是相同的，都信奉佛陀提出的四谛。但在这基础之上，两派又有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又经过组织化之后，变得不可调和，成了根本性的分裂。

大乘佛教又分成了许多分支，如空宗（中观）、有宗（唯识）等，相当于新教分裂出的许多小派别，如英国国教、加尔文派，或者美国的一些小教派，而在什叶派中也分成了伊斯玛仪派、十二伊玛目派、宰德派等。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血腥冲突不同，大乘佛教内部的分野没有那么武力敌对，却仍然由于组织化的加强，形成了一个个的分裂竞争的僧团。

在大乘佛教诞生之前，小乘佛教主张通过自我修行来脱离轮回，目的相对简单，修行也以个人经验为主。这种修行方法更接近于佛陀的本意，却由于过于朴素，缺乏号召力。

于是，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思路：所谓修行，不是仅仅修自己的行，而是要帮助天下人都获得道。

为了区分自己修道和为天下修道，他们提出了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导致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根本性分歧：“解脱道”和“菩提道”。

所谓解脱道，就是小乘佛教的修行方式，追求的是个人解脱。而所谓菩提道，指的是更宏伟的目标：不仅要个人解脱，还要像佛陀一样帮助他人解脱。他们把只修解脱道当作小家子气，所以叫“小乘”，而把修菩提道当作康庄大道，称为“大乘”。

但是，什么是菩提道呢？

菩提道要求人们像佛陀一样帮助他人，修菩提道的人最终目标不是解脱轮回，而是成为佛陀（立地成佛）。到这时，人们会发现，对于“佛”的概念，大小乘佛教也有了区别。小乘佛教认为佛陀只是一个导师，来指引人们脱离轮回之苦，这一点更像早期的耶稣的形象。而大乘佛教则把佛陀神化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这就类似于上帝了。神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许多佛，释迦佛只是其中之一，大乘佛教给这些佛一一起了名字和定了意义，这花了不少功夫。

从定义可以看出，小乘佛教基本上还是按照佛陀去世前的教导来修行，没有脱离这个框架。而大乘佛教已经超越了佛陀生前的教导，变得天马行空，甚至又创造了无数的佛陀。

自然修行方法上也不能满足于小乘佛教的方法，所以，除了“戒定慧”和“八正道”之外，又增加了许多修菩萨道的方法，比如六度和四摄。所谓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个要素；而四摄，是指日常生活中要布施、爱语、利行、同事。

只有六度、四摄还不行，大乘佛教又设立了52个等级，按照这些等级次第修行，才能达到菩提道。[21]这52个等级就是硬生生造出的52个意义难懂的名词，为了解释它们，就要消耗许多佛经的篇幅。

而从这众多的概念、名词和意义中，自然会产生出无数的变化，让每个人究其一生，都不可能走出来。所以，大乘佛教的理论是无穷无尽的，在人们学会修行方法之前，就在这种概念组成的迷宫中消耗了一生。

也正由于概念众多，大乘佛教又分成了无数的支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凑在一起吵来吵去，辩论充满了思辨性，使得佛教骤然间复杂化，成了世界上最难懂的宗教。当大乘佛教进入中国后，立刻让玄学的思辨成了小儿科，相形见绌，被淘汰了。从此以后，思辨哲学的代表被佛教取得。

任何宗教总是一方面是戒律，另一方面是理论化的教义。我们可以

把佛教的教义理解为对世界的解读。世界到底是怎么构成的？只有理解了世界的构成，才能找到通往菩提的道路。

大乘佛教的教义主要发展出三个分支，分别是“中观”“唯识”和“真常”。

“中观”一支最早出现，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最流行的一支[22]，又叫般若宗、空宗或三论宗。这一支最核心的观点是一个“空”字：只要理解了“空”，就是理解了世界，也就找到了通往菩提的道。

所谓“空”，是指万事万物都不是实在的，而是“空”的。我们看到的事物只是一种幻象，只是一个名字，没有实物，这个名字叫“假名”。既然是幻象，我们又怎么能够触摸到一个桌子，亲吻到爱人的嘴巴呢？因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因缘）也不是实在的，是另一种幻象，我们认为触摸到了，亲吻到了，只是被欺骗的幻觉，如果不破掉这种幻觉，就无法达到菩提道。

不仅仅世间的实物是幻觉，就连修行的佛教理论也不是实在的，是幻觉、假名。所以，任何认为找到了修行大道的人，实际上都是掉入了幻觉之中，只有跳出修行的执念，才能理解“空”的含义，无意之间理解了修行之道。

当然，这里的“空”不是一无所有，既然有幻象，就不等于完全不存在。所谓“空”，是说事物不是实在的，只是一种虚托的关系，是没有主体性的。所有的世界和所有的道都处于“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的状态。

我们可以把中观派的“空”和魏晋玄学里的“无”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无”的观念和“空”有很大相似之处，都强调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可以有千变万化，但它又不和任何实体相联系。

正因为“空”和“无”的相似性，当中观派进入中国的时候，当年信奉玄学的人毫无障碍地转到了“空”的概念上。

但中观派“空”的概念却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被大乘佛教的另一个分支唯识派[23]发现了。于是，我们就转入了对唯识派的讨论。

唯识派认为，中观派说所有的佛法也都是“空”，可是它自己却定义了一个法，叫“所有的佛法都是空”，至少这句话应该是实在的吧？如果这句话都不实在了，那么中观派就陷入了悖论之中。

在古希腊有一个说谎者悖论，哲学家艾皮米尼得斯（Epimenides）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撒谎精。艾皮米尼得斯本人就是克里特人，如果人们认为他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艾皮米尼得斯本人也是撒谎精，他说的这句话就肯定是假的。如果人们认为这句话是假的，那么克里特人就说真话，作为克里特人的他说的这句话就是真的。

中观派“佛法是空”的结论也掉入了说谎者悖论之中。为了解开这个悖论，唯识派设立了三种例外，认为有三种道理不是“空”的，而是“有”的，只是这种“有”和普通的“有”不一样，叫“妙有”。所谓妙有，就是它是“有”，但又不同于普通的“有”，人们知道它是“有”，但又不会执着地把它变成一种执念。

三种“妙有”情况称为“三自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

遍计所执性，是指人们浸泡在经验的世界里，会把本来为空的事物当成是实有的。

依他起性，指的是事物本来是空的，这在佛教用语里叫没有“自性”，但是事物可以有“他性”，也就是说可以进入到人们的经验之中，但保持为空。

圆成实性，指的是当所有的妄念被破解掉之后，真实的佛法却可以保留下来。有了这个“圆成实性”，就解决了中观派的说谎者悖论，因为破妄之后的佛法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妙有”。

这三自性针对的，都是人类的意识活动，讨论的是人类经验世界的“妙有”。一切佛法都只存在于人类的意识之中（一切法唯识），这就是“唯识”这一派名字的来历。

唯识派在提出了“一切法唯识”之后，就开始对“识”进行划分。它把“识”当作人类的感觉、思维和下意识，提出人类一共有八种“识”，即“眼”“耳”“鼻”“识”“身”“意”“末那”“阿赖耶”。

这些“识”其实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意识。现代人认为，除了普通的五种感官（五感）之外，还有第六感存在，叫“直觉”。有的人足够大胆，还提出第七感。在唯识派中，早已超越了现代理论，提出了有八种识。

在八识中，前六识与现代的六感对应，而最重要的却是第七识和第八识。

第七识叫“末那识”，指的是“我执”，也就是产生自我意识的那种感觉。第八识叫“阿赖耶识”，则被定义为“藏识”，也就是隐藏在人们心中、通向菩提道的那种智慧。这一识虽然早已在人们心中，但绝大部分人说不清道不明甚至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一旦你的第八识被激发出来，你就成佛了。

所以，唯识派绕到最后，实际上就变成了“认识你心中的第八识”的问题。只要开发出了第八识，你就是佛，觉察不到你就是凡人。

围绕着“第八识”的性质，唯识派又分成了三派，分别是“摄论宗”“地论宗”“唯识宗”。

摄论宗认为，阿赖耶识还不是尽头，它也不是完全纯粹的，人类心中还有一个第九识“阿摩罗识”，这一识才是最纯粹的智慧，要想成佛，必须利用第八识唤醒第九识，才达到了证果。

地论宗认为，阿赖耶识就已经是最纯粹的智慧，只要打开它、激发它，就可以证果。

唯识宗则认为，阿赖耶识既不是纯粹，也不是不纯粹。它本身是普通的，但在阿赖耶识之中蕴含着通往佛法的种子，人们不仅要打开阿赖耶识，还要让阿赖耶识里的真理种子（学名叫无漏种子）生根发芽，才能证果。

虽然唯识派的理论已经发展到如此繁复的高度，但历史发展到现在

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找到了阿赖耶识，更别提什么第九识和无漏种子了。

除了中观派和唯识派之外，佛教的“真常”一支出现得更晚[24]，也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真常”和“中观”“唯识”两支的区别在于，“中观”认为一切皆空，即便佛法也是空的，而“唯识”认为，一切皆空，只有蕴含着佛法的“识”是有（实体性）的，他们把这种有称为“妙有”。而“真常”则认为，一切皆空，只有佛和佛性是有（实体性）的，他们把佛性称为“真常”。

最初，小乘佛教认为人类修行是为了脱离轮回（解脱道），而大乘佛教认为人要修菩提道，但并没有否定解脱道。到了“真常”一支，则认为没有所谓解脱道，世界上只有一种道，就是修成佛性。所谓众生皆能成佛，没有其他的道。这样，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就彻底决裂了。

另外，不管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不具备佛性的人，称之为“一阐提（Icchantika）”，这种人不论怎样修行，都无法修成正果。但是“真常”一支却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佛性，即便是“一阐提”也可以修佛法。

由于人人具有佛性，那么，人类的目的就是发掘出自己的佛性，找到真我，而这个真我就不能是“空”的，必须是“有”，这就是“真常”。

人人有佛性的说法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虽然最初中国人大都采用中观论，但到了唐代，最著名的几家都是从真常论出发，来发展自己的哲学的。至于唯识论，由于它理论过于复杂，不符合中国人的胃口，虽然经过玄奘的大力弘扬，却仍然免不了落寞的命运。

西域舶来，落户中原

在耶稣出生前两年（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西汉的哀帝派遣一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前往大月氏使者的住处。景卢怀着一个特殊

的使命：向使者学习一种中国没有见过的经文——浮屠经。所谓浮屠经就是佛经。而景卢也成了首位接触佛经的中国人。[25]

在这之前，印度的佛经已经传到了西域的大月氏之中，又经过西域来到了汉地的家门口。不过，汉人由于不了解佛经，认为佛经和《老子》大概是差不多的理论，甚至传说这是老子出函谷关之后去往西方，教给蛮人的。

到了东汉时期，佛教正式登场。最早的信奉者包括了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英。[26]不过，楚王英时期，仍然仅仅把佛教当作方士的一种，关注的是它的形式，而不是教义。

公元67年（明帝永平十年），明帝派出使者迎来了第一批僧人到洛阳，为他们建立了著名的白马寺。[27]佛教开始在中国缓慢传播，到了东汉末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这时，上到皇帝下到百姓仍然只把佛教当成一种法术的教门而已。

东汉时期，传播佛教的大都是西域人士，他们本来属于月氏人、安息人、康居人等，所以，来到中国后以“支”“安”“康”为姓。至于印度（天竺）来客，则以“竺”为姓。比如，东汉最著名的小乘佛教僧人安世高、大乘经的首译者支娄迦谶，以及安玄、竺朔佛等人。

东汉末年恰好是印度大乘佛教出现时期，中国正好赶上了头班车，较早接受了大乘佛教，受小乘佛教的影响比其他地方小。

到了三国时期，僧人继续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由于旅行线路的问题，佛教主要在曹魏和东吴传播。到曹魏传播的大都走陆路的西域进来，而到东吴传播的则走海路，比如曹魏的昙摩迦罗、昙无谛，东吴的支谦、康僧会等人。

公元260年（曹魏甘露五年），一位中国僧人终于踏出了国门，前往西域取经，他的名字叫朱士行。[28]朱士行为了取得大乘真经，从洛阳出发，到达陕西、甘肃，再西渡流沙，走丝绸之路南线到达于阗，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在那儿得到了经书。朱士行之后，宗教旅游就成了一种热门，培养出了法显、玄奘等忠实的追随者。

朱士行的出现，也说明中国人已经不满足于只知道佛教的凤毛麟角，而是想从义理上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此时，中国的玄学正盛，佛教仍然依附于玄学，借助玄学的概念来传播佛教精神。

西晋时期最重要的僧人是竺法护，他翻译出了大批的大乘佛经，为“空”的概念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东晋，中国开始分裂，北方陷入了一片混乱，但是南方却保持了文化的稳定。曹魏和西晋时期，佛教在北方更胜，而到了东晋，则开始南移，南方取代混乱的北方成了学术中心。此时玄学已经接近尾声，人们需要更新的理论作为谈资，前面的译经和传经活动终于开花结果，佛教大肆传播的同时，人们对于义理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样化。

首先进入中国的是大乘空宗，也就是中观派。大乘空宗的传播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中国佛教也进入了般若学的时期。所谓般若学，是围绕着《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教理，讨论“空”的学问。而此时中国人仍然离不开玄学的“无”，所以大都将“空”理解成“无”，由此形成了六家，而其中第一家又分成了两宗，构成了六家七宗。

这六家七宗分别是：本无宗、本无异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这里不对这些宗进行详细解释，仅仅说，它们都是围绕着“无（空）”这个概念进行发挥，所以都属于般若学的变种。

在般若学的热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释道安。[29]释道安处于西晋末期，他的主要活动地仍然在北方，但是他的影响力却遍布南北。他本人持本无宗的观点，这是比较正统的一派，认为一切法都是空的，由于时人分不清“空”和“无”，所以叫本无宗。

释道安真正的贡献不仅仅是发明了一家之言，他的功劳在于推动了大乘佛教的传播。他一方面推动佛教理论的传播，尽最大可能地区分佛教和玄学，另一方面，又在制定佛教仪规，在佛教组织正规化上做了很多工作。他的弟子遍天下，不仅北方有，南方也有，更是加速了佛教的扩张。佛教已经穿越了政治的边界，成了沟通南北的纽带。

释道安死后，他的弟子慧远[30]在南方成了一代宗师，慧远虽为大

乘般若学，却鼓励一切形式和内容的佛教发展。在他的努力下，佛教不仅成了普遍信仰，更是征服了东晋皇族，成了贵人和富人的座上宾。

慧远在南方开疆辟土时，北方的龟兹人鸠摩罗什[31]也寻找到了机会。北方经过西晋末年以后的大混战，在前秦王苻坚的手中再次统一，但随后，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击溃，北方第二次陷入混乱。在陕西地区，取代苻坚的是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帝国。后秦时期的陕西、甘肃一带暂时保持了稳定，鸠摩罗什最初被从西域抓到了甘肃凉州（武威），后来又到长安译经。鸠摩罗什翻译了大量的经文，并带来了佛教最正宗的义理，使得西北再次成了佛教中心。在未来，虽然北魏取代了其他政权，统一了北中国，但北魏采纳了佛教后，更是让北方再次成为佛教的领地。

鸠摩罗什有一个弟子叫竺道生[32]，他从北方来到了南方，脱离了一般的般若学，建立了另一个学派：涅槃宗。他所持的观点与般若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般若学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法，比如被称为“一阐提”的人就没有佛性，而竺道生却认为任何人都有佛性。第二，把“佛”这个概念抽象出来，认为“佛”是一种最高的道，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第三，认为人们可以顿悟得道，也就是某人某天突然间就成佛了，不一定需要持续的修行。

竺道生的观点很符合中国人的胃口，实际上，后来的禅宗就基本上继承了他的观点。

涅槃宗的建立，让东晋南朝的般若学进入了尾声。而另一个从东南亚来的僧人真谛则带来了摄论宗。不管是涅槃还是摄论，都是“真常”一支的学问。

之前的各大门派虽然热闹，但理论上大都是舶来品，由印度人发明理论，再由中国人接受、探讨。而“真常”一支却是另一种情形，这一支在印度并不发达，反而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发展出许多新的理论，这些理论不属于印度，只属于中国。真常论逐渐占据主流，就意味着中国佛教慢慢度过了学习和模仿的阶段，开始要发展出真正的汉地佛教了。

第十一章
南朝：政治资源争夺战（公元317—公元589年）

佛教进入中国后，为了争夺政治资源，与儒教和道教展开了大量的论战。在南朝，佛教逐渐取得了政治优势，成了统治者最宠爱的思想体系。

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面对的是作为人间权威的皇帝。在和尚需不需要跪拜皇帝的问题上，僧人与皇帝的大臣们展开了论战，并最终获得了不拜皇帝的特权。

佛教与儒教的论战还包括了“华夷之辨”“中国特殊论”，以及著名的“神灭神不灭”，最终依靠皇帝的权威压制住了质疑的声音。

最宠幸佛教的中国皇帝是南朝梁的梁武帝，皇帝数次将自己舍身入寺院，为佛教换取了大量的特权和财富。佛教特权引起的政府财政失控和政治失调，最终摧毁了南朝的繁华，让中国再次统一在北朝手中。

公元504年（梁武帝天监三年）[33]，梁武帝萧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下了一道诏书，将佛教定为唯一的“正道”，而将老子代表的道教，周公、孔子代表的儒教都斥为“邪道”。他宣称，人间的“道”有九十六种之多，但是，只有佛教才是对的，而道教和儒教都属于其他九十五种歪门邪道。皇帝敦促王公百官们从邪道返回正道。[34]这封诏书的出现，确定了南朝佛教的国教化地位。

梁武帝为人雄才大略又文采非凡，是整个南朝难得的君主。[35]在他的治下，中国南方不仅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完全盖过了北国，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艺术的高峰时期。

梁武帝最初是南朝齐的将领，因为武功得到提拔。他曾经击退过北魏孝文帝的进攻，当其他将领出现了战略失误，在战场上失利时，是他

率军稳住了阵脚，巩固了国防。他为了铲除昏庸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发动内战占领了建康（南京），最终夺得了帝位。

在文化上，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36]选编了著名的文学作品集《文选》，而萧衍本人在学问上也造诣颇丰。最初，他曾经编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儒学书籍，又主持编撰过一个巨大的史书工程：六百卷的《通史》，同时他在佛学上也造诣深厚，写过《涅萃》《大品》《净明》《三慧》等佛学著作。他还是当时著名的诗人、音乐家和书法家，在未当皇帝之前，就以文学和武功同时受人称赞。

萧衍的统治从公元502年持续到公元549年，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他的疆土如同一片歌舞升平之地，不仅让南朝的人们保持了优越感，也让北朝的人们羡慕不已。就连东魏的掌权人高欢也曾经说：江东有一个老头儿萧衍，专事衣冠礼乐，北方中原的士大夫认为那儿才是正统[37]。

就在这样的歌舞升平之中，萧衍却突然间转向，抛弃了中国的儒教传统，采纳了佛教。他对于佛教的宠信是如此彻底，甚至荒废了政治。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封诏书之外，他还曾经数次将自己“卖到”了寺庙里。这里所谓“卖”，就是“舍身”。佛教词汇中，舍身指的是舍去肉体，根据佛教经文记载，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前身之中，有一身叫萨陲王子，王子曾经为了养活遇到的几只老虎，将自己的身体贡献出去给老虎吃了。之后，佛教徒们将舍身用在了更广泛的意义上，比如，将自己送入寺院为奴也称为舍身。梁武帝就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舍身的方法。[38]

公元527年（大通元年），梁武帝在皇宫旁边建设了一座皇家寺庙——同泰寺，又在同泰寺方向的宫墙上开了一个门叫大通门，便于皇帝进出。这个寺庙就是他舍身的主要场所。同年，梁武帝进入寺庙舍身。他剃掉了头发，穿上了僧袍，像和尚一样吃斋念佛。这次舍身持续了三天，随后他返回皇宫，改元大通，并大赦天下。

两年后的九月份，梁武帝在同泰寺举行了一次“四部无遮大会”。所谓四部，指的是僧、尼、善男、信女；而无遮大会是佛教专用名词，指

的是没有阻隔，没有门槛，谁都可以参加，只要是教义都可以探讨。在这次无遮大会上，梁武帝再次舍身，他穿上僧袍，住在了僧舍里，素床瓦器，乘坐小车，取消了宫廷卫士。他亲自向四部大众讲解《涅槃经》。由于皇帝老是不回宫里，群臣着急了，只好与和尚们协商，由群臣凑了一亿钱为皇帝赎身。和尚们默许之后，群臣来到了同泰寺东门上表，请皇帝回宫，皇帝又推辞了三次，他声称自己不是皇帝，而是佛徒，在回答群臣的书信中也谦卑地写“顿首”（这是人们给皇帝上书才用的词），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39]

这件事一直拖到了十月份，为了庆祝皇帝还宫，又举行了一次无遮大会，邀请了五万僧人和俗人参加。大会结束后，皇帝脱掉了僧袍，登上了御车回宫。梁武帝回宫后，又是一次改元，改为中大通，并大赦天下。

公元546年（中大同元年）三月，梁武帝再次来到同泰寺。他先是讲解了《金字三慧经》，随后又开始舍身。一个月后，皇太子出钱将他赎了出来，出来之前又是法会，出来后大赦天下，改元。

但梁武帝出来的当晚，同泰寺就发生了火灾。为了冲掉不吉利，第二年，梁武帝再次进入修缮好的同泰寺，同样是无遮大会。梁武帝住在五明殿，穿着僧衣，睡素木床，葛帐，土瓦器，私人执役。随后，皇帝在光严殿讲授《金字三慧经》。讲授完毕，皇帝正式舍身入寺。

一个月后，群臣再次出钱一亿将皇帝赎了出来，又是三请三辞的旧规矩。回到皇宫后，皇帝如同新即位一样举行了典礼，并宣布改元太清，大赦天下。

这四次舍身到寺庙，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不说，整个帝国的官僚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不仅仅是失去了皇帝，群臣还要跟着皇帝转，凑钱的凑钱，请神的请神，搅得人鸡犬不宁，却毫无办法。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会如此虔诚地笃信佛教，不惜花费钱财和消耗帝国的气运呢？

实际上，佛教成为中国的正统宗教并非是从萧衍开始的，当历史从

西晋进入东晋之后，佛教的地位就处于逐渐上升之中，并最终占据了主流。

西晋皇帝们最初的选择是重归儒教，但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高风险，人们逐渐走向了一条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道路，他们诗酒流连，专注于谈玄说理，对于政治和儒教理念并不感兴趣。

魏晋时期的玄学过于专注在几个简单的概念，缺乏扩充性，当人们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时，就发现佛教是玄学的一种替代品，并且更加思辨和博大，这就是佛教扩张的前奏。此时的佛教也有意向玄学靠拢，利用玄学的概念来推广自己，并把佛教与儒教、道教等同起来，认为是同源的，或者殊途同归的。

自东晋开始，从皇帝到王公，都逐渐变成了佛教的信徒。比如，东晋的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恭帝，[40]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佛教信徒。特别到了后期，随着权力逐渐被权臣剥夺，皇帝们纷纷堕入了信仰之中，试图从这里寻找解脱。比如晋恭帝就曾经为了铸造巨大的金佛像，投入了巨资，并亲自到寺庙去迎接。[41]

皇帝的投入最初是一种无奈和解脱，但他们带起来的风气又影响了社会，反过来推动人们更加相信佛教。这时，即便掌握局势的权臣们也发现佛教是个好东西，当人们专注于谈论佛理时，也就忽视了现实政治的不公平。当人们相信那虚无缥缈的来生和涅槃时，就不再在意此生的痛苦。

随着南朝宋取代了东晋，皇帝们也从信仰变成了利用佛教，宋武帝和宋文帝、齐高帝等君主都有着雄才大略，虽然没有完全倒向佛教，仍然利用儒教的理念作为政权基础，但对于佛教的崇信已经越来越加深。

梁武帝取代南齐之后，最初也在儒教上下功夫，他本人就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但梁武帝同时发现，即便宣扬儒教，也不可能像汉儒那样只要求比附和死记硬背，必须在谈理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仅仅靠权威是没有用的。而最能谈理的宗教就是佛教。

所以，梁武帝实际上致力于寻找一条改造的道路，一方面，儒教礼

仪仍然是皇帝必须使用的规矩，但必须加入佛教的因素，让人们从理论上认可；另一方面，又要把佛教政治化，佛教本身是出世的，但大乘佛教中带有入世的借口，让统治者以普度众生的名义进行统治。

在皇帝宠信佛教的同时，却意味着另外一拨人的失宠，他们是儒教和道教的人士。这两个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本来处于剧烈的斗争之中，儒教处于在朝的地位，道教是在野的，最初希望通过民间组织化来对抗中央帝国，随后又采取了与政权妥协、补充儒教的方式来蚕食儒教的正统地位。

佛教的兴起却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这个外来的宗教由于受到人们普遍的尊崇，大有取代内生宗教的趋势。于是，儒、道暂时放弃了争执，开始研究佛教的问题，寻找击破它的可能性。

在南北朝，佛、道和佛、儒的斗争，是当时学术界的主旋律。后来人们总结当时的斗争，将对佛教的质疑集中在六个方面，分别是：第一，经说迂诞，大而无征；第二，人死神灭，无有三世；第三，莫见真佛，无益国治；第四，古无法教，近出汉世；第五，教在戎方，化非华俗；第六，汉魏法微，晋代始盛。[42]

这些质疑贯穿着南北朝的始终，成了宗派斗争的焦点所在。

不拜皇帝的和尚

最初对佛教的攻击来自儒教。

儒教对佛教的攻击，更是两种政教理念的碰撞。儒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系统，佛教从印度传入后，却更接近政教分离的理念。

如果在古代中国，说一句“我不爱皇帝，不爱皇帝建立的政权，不爱这个政权统治的国家”，就是一种叛国大罪。

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有人说这样的话，并不会被当作出格。比如，公元1245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时期，皇帝由于和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的冲突，被革除

了教籍。教皇宣称，任何人都不要服从已经成了异教徒的皇帝，甚至任何人都应该帮助教皇反对皇帝。这时，即便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人民，如果他深信天主教，也会出于信仰认为反对皇帝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个皇帝不配当皇帝。

当政教分离后，皇帝就无法对人民行使全权，甚至人民可以宣称不爱俗世的“君主”“国家”这些概念。

在印度，政教分离虽然没有欧洲那么强烈，但是印度教的婆罗门（教士阶层）和刹帝利（国王和武士阶层）这两个种姓也是分离的。而佛教更是强调出世，与政权离得很远。在这样的环境中，佛教的僧人与世俗的国王形成了区隔，僧人不需要对国王行礼，而国王即便供养了僧人，也管不了僧人的具体事务。如果国王想插手，必定引起巨大的反抗。

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皇帝就是教主，拥有着宗教阐释权，他之所以接受人们崇拜，除了是权力的象征，更是老天爷的象征。

当佛教传入后，僧人们把不服从世俗政权的传统带了进来，就形成了第一次冲突。冲突的排头兵，则是充当思想卫道士的儒教。

双方集中的焦点放在了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动作上：以前任何人见了皇帝都要下跪行礼，而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人却拒绝这么做。

僧人们拒绝拜皇帝，在最初得到了容忍，因为他们大都是外国人，不懂礼法，而皇帝对他们也充满了好奇心，当作宠物养，赦免了他们的轻慢。可当佛教中国化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地僧人出现了，他们按照以前的传统，对皇帝也不行跪拜，这时，儒教徒们就找到了第一个攻击佛教的口实。

东晋成帝时期，刚刚经历了苏峻、祖约之乱的东晋在南方站稳了脚跟，就开始整顿政教问题。当时辅政的车骑将军庾冰是一个正直的儒教信徒，他一眼就看到了政教不统一的危害，提出“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

乱”，认为僧人不敬拜皇帝，就破坏了礼治的统一，损害了皇帝的权威。所以，必须让僧人和佛教进入中国政教合一的体系之中，如果佛教要存在，必须将皇帝当成宗教体系的中心，而皇帝成为中心的第一步，就从僧人对皇帝行敬拜之礼开始。[43]

庾冰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和他一同辅政的大臣何充却持有另外的观点。何充是一个佛教的爱好者，在佛教上投入了无数的金钱，却对亲友吝啬得一毛不拔[44]。由于他对佛理更加了解，他提出了反驳，认为佛教是一种淡泊的宗教，有着种种的清规戒律，这些戒律实际上是有利于控制民间反抗的。皇帝与其改变它，不如把它养起来，允许它有一定的小脾气。所以，既然不拜皇帝已经成了佛教的传统，就不要因为这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引起一个阶层的普遍反抗。[45]最终在何充的反对下，庾冰的提议没有成为现实。

但这个争论到底是庾冰对，还是何充对呢？答案也许是，都有道理，但都没有看清全盘。

何充想利用佛教控制人们思想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但他没有看到，政教合一的体系必须是放弃一切独立思考的体系，一旦有了裂缝，就不可能保持完整。佛教就是这样的裂缝，一旦允许僧人不拜皇帝，就会引起社会对于皇帝权威的淡化，并最终开始质疑，到这时，这个思想的火花迟早会带来政教合一的解体。

但是庾冰试图压迫僧人跪拜皇帝，从而消灭他们的独立性，也同样是做不到的。因为这种压迫只能激发出僧人们更多的反抗，他们会从理论上继续质疑对皇帝的崇拜。

一句话，不管同意和不同意，只要佛教出现过，只要政教分离的体系有了萌芽，就必然会继续发展，不管皇帝怎么做，都是没有用的。

第一次“拜不拜皇帝”的争论之后，又过了几十年，到了东晋晚期的晋安帝时期，权臣桓玄掌握了政局，并试图取代东晋自己称帝。在他主政下，僧人是否应该跪拜皇帝的问题第二次被提了出来。

桓玄与那些佛教的支持者开始了另一场辩论。桓玄的理由除了和庾

冰类似外，还基于当时的一些新情况，由于佛教此时和政权的关系已经很密切，许多佛教徒都接受了皇帝和高官的供养，已经失去了出世的精神。桓玄认为，僧人们已经享受了皇帝的恩宠，就应该敬拜皇帝。另外，他还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夷夏论的前奏，也就是从外国传来的佛教不如本国的儒教；二是根据儒教传统，皇帝比老师更重要，佛教尊重老师，就更应该尊敬皇帝。

反驳者的意见与何充类似，仍然强调佛教的理论是尊重皇帝的，是皇帝的好帮手，不要因为细枝末节得罪了佛教徒。

桓玄最后将这些往来的书信交给了佛教界的权威——僧人慧远，请他作答。慧远立刻意识到敬拜皇帝的危险性，于是说出了僧人不拜皇帝的新理由，他把佛教徒分成了两类：一种是在家的居士（在俗的教徒），另一种是出家的僧人。他认为，在家的居士都应该遵守世俗的法则，而出家人则必须用另一套标准来看待，因为他们出家后，已经禁欲剃发穿僧袍，不再理俗事，而是以修行大道为己任。一旦大道修成，则可以泽流天下，这是至德至孝的事情，不应该用俗世的礼节来要求僧人。[46]

桓玄最终经过掂量，认为如果强迫僧人敬拜，代价太大，不利于他在政治上的作为，最终维持了原状。

慧远除了对桓玄的答复之外，还写了一组系统的文章叫《沙门不敬王者论》。[47]在这组文章中，他把自己的理论进行了系统化，也成了后世僧人和皇帝关系的基准。在文章中，他在宗教和政治之间做了一定的妥协，也就是宗教不对抗政治，但政治也容忍宗教。这种妥协的结果是中国再也出不来西欧式的政教分离，即便最具独立性的佛教，也以不给政府找麻烦作为理念，当然前提是政府也别管佛教的事情。

慧远规定，佛教的新信徒应该首先尊奉亲情、礼敬皇帝，这是信仰的起点。如果一个人要出家，也必须首先征得君亲的同意，如果他们有疑问，就不能出家，只能退而追求在家修行。只有在出家之后，才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不需要拜父母，也不需要拜皇帝。

慧远的这种妥协到了唐代被利用了起来，形成了一套度牒制度，皇

帝同意人们当和尚，但是有名额的，而这个名额是可以买卖的，有数量限制。皇帝就通过控制度牒，限制了佛教的发展。

除了需不需要跪拜皇帝之外，儒教和佛教的冲突还发生在许多方面，比如服饰问题、孝敬父母的问题以及报应问题。特别是孝敬问题，更是争论的另一大焦点。

由于僧人不奉养父母、不结婚生子，这违背了儒教关于孝道的理论，也是人们对佛教诟病最深的所在。佛教则认为，修“道”是更大的“孝”，比起奉养父母和传宗接代都重要得多。

佛家信奉报应，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朝，人们很少看到报应，反而看到好人没有好报，在这个问题上，慧远也加入了争论，提出了所谓的三报论，将报应分成了现报、生报、后报，即立刻有报应、此生有报应、来生以及无穷后世才有报应[48]。这样把报应拉长到虚无缥缈的无限未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华夷之辨与中国特殊论

公元420年（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东晋权臣刘裕取代了司马氏，建立了新的刘宋政权。宋武帝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在称帝之前，他先后击败了权臣桓玄的篡位，灭亡了与东晋敌对的南燕、西蜀和后秦，讨平了卢循的内部叛乱，又镇压了与之争权的刘毅和司马休之。在政治上，他有意提拔有才能的寒门子弟，抑制大土地主，实行户籍改革，整顿税赋制度。在他的努力下，南方政权再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从刘宋开始，也是佛教迅速发展的时期。刘裕出身于行伍，文化水平不高，这个问题还没有显现。到了他的儿子宋文帝时，佛教已经被皇帝认可了。皇帝把佛教提到可以取代儒教的地位上，儒教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可以帮助皇帝禁锢人们的思想不要反抗，宋文帝认为，只要人们都相信了佛教，同样不会反抗政权，所以它具有替代功能。

皇帝对于佛教的认可激起了另一批人的巨大担忧。于是，从刘宋时

期开始，佛教与儒教的争吵也上了一个台阶，从“拜不拜皇帝”的“简单礼仪时期”，进入了理论争锋的“复杂明理时期”。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三次争论，分别是“白黑论”“达性论”和“夷夏论”。

所谓“白黑论”是由一位和尚主动提出的。这位和尚叫慧琳[49]，他虽然出家为僧，实际上却是个外佛内儒、儒道释兼修的人，他除了著有《白黑论》，还注释过《庄子》和《孝经》。“白黑论”虚构了一位白学先生代表儒教，一位黑学道士代表佛教，两人之间发生了辩论。

辩论双方的题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佛教所说的“空”，第二个是佛教的“无欲”。白学先生批驳佛教的“空”是无意义的，黑学道士讲了一通“空”的真义，比如，所谓空，指的是事物的本性是空的，虽然它可以有“事用”，但是“性理”却是空的。而白学先生讽刺说：不管你说一棵树有多“空”，也无法伤害它茂盛的树荫；不管你说一个房子有多“虚”，也损害不了它美轮美奂的外表。

对于佛教的放弃欲望，白学先生也找到了其理论的漏洞：不管佛教怎么声称要无欲，但是所有的佛教徒却有着一个最大的欲望：修炼成佛。所以，佛教徒不仅有欲望，而且胃口很大，又怎么能说是无欲呢？

慧琳的《白黑论》提出的问题，成了当时人们辩论的焦点，吸引了大批的人参与。[50]辩论越扯越远，已经不再限于“空”和“无欲”这两个主题，而是延伸到了因果报应、形神、华戎等无数领域。

在因果报应领域内，出现了何承天的《达性论》。[51]在这篇文章中，何承天试图利用儒教的“三才论”对抗佛教的“三报论”。

所谓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才[52]，也是《易经》中提到的。其背后的意义，则是和佛教的众生观相对。佛教认为，众生都是有灵的，都是大的轮回体系之中的一部分，所以众生也是平等的。而儒教却认为，人和天地是联系的，而其余的动物并不能和人并列，是低于人的生物体。

从佛教众生理论出发，就可以得到因果报应的三报论。三报论由东晋的慧远和尚提出，认为报应分成三种，分别是现报、生报和后报。运

用到众生之中，则是每一种生物都有着报应轮回，很可能眼前的一只鸡，就是前世的某位熟人。所以，人不能随便杀生，而杀生就意味着新的报应要在你的身上显现。

针对杀生问题，何承天[53]举了两种鸟类作例子，一种是鹅，一种是燕子。鹅以春草为生，是植食动物，又性格呆头呆脑，与人为善，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鹅都是死于人类的屠刀。而燕子以飞虫为食，是肉食动物，但人们都很喜欢燕子，还让它们在屋里筑巢。这两种鸟类的不同待遇就说明了不杀生不见得有好报，而杀生也不见得有恶报。

对于何承天的反驳其实也容易，何承天仍然把报应放在了当世，认为鹅不杀生，此生就应该受到好报。但实际上，三报论却可以把报应放到遥远的来生，甚至数次的来生。所以，这样的吵架必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评价到底谁在理，要看评价人持有什么立场。由于现代中国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就认为何承天的在理，但在佛教徒看来，何承天的批评则是虚妄的。

在刘宋时期影响最大的争论，是一位道士顾欢所写的《夷夏论》。[54]顾欢是一名隐逸的道士，却参与了佛教与儒教的辩论，这已经带上了后期宗教辩论的色彩：在后期，儒教已经退居次席，而佛教和道教的辩论成了主流。

顾欢的《夷夏论》也主要针对佛教和道教的比较。在他看来，佛教和道教都是好的，只是，每一个宗教都是地域性的，既然佛教产生在外国，就只能适用于外国，它并非不好，却在本地不适用。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却是最适合国人的。由于选择佛教还是道教带有了很强的政治意味，当时的夷夏论就好像现在的中国特殊论一样吸引人，到了现在，人们仍在争论所谓“普世价值是否适合于中国”这种论题。支持“普世价值”的人在刘宋时期也会支持佛教，而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往往会支持道教。

当然，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使得争论变成了一种信仰之争，而无关乎对错了。

顾欢理论的批评者大都采用所谓“普世价值”的观点，比如，谢镇之

认为，人类的本性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相同的，只是在服饰、丧葬、音乐等细枝末节的世俗礼节上有所不同。与佛教教义的博大精深相比，道教的教义显得过于粗糙、简陋，而且大都是借鉴，甚至借鉴了许多佛教的内容。既然是借鉴，自然是承认了佛教的教义也适用于道教中国。[55]

还有的人认为，佛道本来就是一家，[56]采取了调和的态度。在佛教早期为了便于传播，曾经借用了许多道家和玄学的词汇。但此刻的佛教已经羽翼丰满，不仅不再和道家搅成一团，还反对别人将两教联系起来，所以这种调和态度并不能吸引真正的佛教徒。

夷夏论并没有很深的哲学道理，但是自古及今，从来不缺乏信奉者，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无数的人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希望发现中国特殊的能力，与世界上其他地区隔绝开。

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历史又前进到了南朝的齐梁时期，佛教与儒教、道教的争论逐渐白热化。此时，佛教对于社会的控制力更加增强，大部分的王公贵族都成了佛教的信奉者，不相信佛教的人已经形只影单。在这样的背景下，却诞生了现代人最为推崇的“神灭神不灭”的争论。

在古代人看来，特别是佛教看来，范缜的“神灭论”只是佛教辩论的主题之一，并非最高主题，他和前面提到的“夷夏论”“拜不拜皇帝”“白黑论”“佛道是否同门”“报应论”等是并列的，并不值得专门提出来。而到了现代，由于采用了无神论哲学体系，突然发现范缜的“神灭论”与无神论差不多，才将他的地位更加突出。

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相信“有灵魂”还是“没灵魂”都只是一种信仰，而不是实证科学。科学研究的范围是人们可以观察的世界，可以用测量和观察来进行证实或者证伪的世界。但是，灵魂迄今为止是无法测量和观察的，所以，它并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只是一种信仰。一个人说世间没有灵魂，但另一个人可以反驳说：不对，世间有灵魂，只是我们看不到灵魂，也测量不到，因为它是无重量、无形体、感知不到

的。当把灵魂定义为无法用现有仪器测量的东西，它就变成无法证伪的信仰了。

人们研究其他科学问题时，不管是相信有灵魂，还是相信没灵魂，都不妨碍他在科学上的研究成果。范缜坚持没有灵魂，也不是所谓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只是信仰上的辩论而已，没有所谓的对错。另外，范缜所采取的辩论方式大都是求助于直接感受，这种方式在辩论“神不灭”问题上是有用的，但在研究另一些问题上却可能成为阻碍，比如，如果放到了十九世纪，他可能并不相信电磁波，也不会相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在获得证实之前，在构造时要求很高的思辨性。

范缜出生于宋文帝后期，一生经过了宋齐梁三代，而他活跃的时期，恰好是佛教从繁荣变成国教的初期。范缜出身贫寒，朴质直爽，看不惯士族出身的权威阶层，这造成了他喜好辩论的性格，却又让他的辩论带有很强的局限性，缺乏思辨能力。他从小学习的是儒教经典，从而有了反佛的思想，也有着维持儒教社会的保守性，所以，他不是革命的，而是守旧的。

虽然齐梁时期，佛教已经成为主流，但社会并没有对其他宗教群体封闭，而是具有很大的宽容性，这使得范缜一方面持有反佛立场，但另一方面还能受到统治者的善待，一直位居朝堂之上。他在南朝宋时期并不得意，到了南齐时期，投靠了竟陵王萧子良。萧子良是一位佛教信徒，又礼贤纳士，吸引了各方的人才[57]，后来的南朝梁武帝萧衍、写《宋书》的沈约，都出自他的门下。

在竟陵王门下，范缜展开了他喜爱辩论、反佛的性格，与竟陵王和其他宾客吵翻了天，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升官，他担任过领军长史和宜都太守。一面争吵，一面升官，也说明范缜和竟陵王之间的争吵最多算是学术探讨，不影响感情，更与所谓的战斗性和反抗性无关。

到了萧衍篡夺南齐政权的时期，由于范缜和萧衍曾经都是萧子良门下，范缜在母丧的情况下，穿着丧服出迎萧衍，结果获得了晋安太守的任命，随后又担任了尚书左丞。在这时，范缜和信佛的梁武帝萧衍再次对上，开始了大辩论，皇帝亲自做书反驳，但他仍然没有屈服。这次辩

论似乎也并没有伤害到他的仕途。

到了晚年伤害仕途的反而是另一件和佛教无关的事，他受到尚书令王亮的牵连而被贬往广州。[58]即便到了广州，也被追封为中书郎、国子博士，说明皇帝对于他学问的认可。可以说，范缜的一生不仅不说明他战斗的性格不容于当世，反而说明了当时的学术宽容精神，一个有性格的人即便持有与官方不同的观点，仍然可以受到善待。

关于《神灭论》本身，需要追溯到范缜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手下时的一件小事。当时的范缜已经宣扬不信佛和因果，萧子良乘机问道：你不信因果，可是怎么解释贫富贵贱？范缜说：人生下来，就像是一棵树上的花。虽然同根生，可是随风落下之后，有的落到了锦席上，有的落到了茅坑里，殿下就落在了锦席上，而我则落在了茅坑里。[59]

萧子良竟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也就认了。随后，有许多同门的人开始和范缜辩论，最后，萧子良又找了一些僧人来辩论，仍然谁也不服谁。而这些辩论的成果，就成了范缜的《神灭论》一文。

《神灭论》最主要的论点是什么？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形灭神灭”，即人的身体死了，精神（灵魂）也就没有了。范缜在谈论这个论点时，形成了许多名句，比如，“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即神形相即，不能分离）；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本质），神者形之用（效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他举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来论证为什么形体是精神的本质，而精神是形体的效用：这就像“刀子”和“锋利”这两个概念一样，形体就是“刀子”，而精神就和“锋利”一样，只是一种效用，离开了刀子，就谈不上所谓的锋利，离开了形体，也谈不上精神。[60]

范缜的神灭论遭到了有神论者无数的批判，而其中又以范缜的内兄萧琛的文章最为深入，萧琛对范缜进行了逐条批驳。[61]从辩论的角度上来看，两者不相高下。用现代人的语言来总结萧琛的反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你说神形相即，不能分离。可是，就像我没有证据说神形可以分离一样，你也没有证据说神形不可以分离。毕竟灵魂是不可见的。所以，“神形不可分离”只是一种无法验证的假说，你相信它，只是因为你相信它，却没有证据。

第二，你说人的形体和精神，就像刀子和锋利。可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仍然是未知的。我同样可以举出来一些比喻，来证明形体和精神是可以分离的。比如，人的形体就像干柴，精神就像烈火，干柴可以烧完，但烈火却可以从这根干柴传到下一根干柴。到底你的比喻有道理，还是我的比喻有道理，仍然是见仁见智。

有了这两点之后，就有了萧琛和范缜的本质区别，范缜是把人的身体当成是精神的“体”，也就是“精神”只是“形体”的一个属性；而萧琛则是把人的身体当作是精神的容器，也就是“精神”居住在“形体”这个容器之中，可以从这个容器转移到下一个容器。至于谁的说法更正确，仍然只关信仰，不关科学。

这样的辩论也反映了中国逻辑学的不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以三段论为基础，设大前提和小前提，最后必然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比如，人是要死的（大前提），亚里士多德是人（小前提），必然得出结论：亚里士多德是要死的。

但中国的逻辑学缺乏这种确定性的范式，结果辩论起来只好使用比附的方法，人的“形”和“神”，就像“刀子”和“锋利”，或者就像“干柴”和“烈火”。但是到底谁的比附更恰当，却成了扯皮的事情。所以，中国式的辩论不会产生对错观念，只会产生信仰的碰撞，你信什么，吵到最后还是你信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服范缜，也没有人会被范缜说服。

不屈服的范缜继续坚持自己的理念，到了南朝梁时期，他的好辩性格已经影响到了皇帝。这个皇帝曾经是范缜的朋友，现在不得不出面平定这个争论。

皇帝相信佛教，于是亲自作答，写了一篇《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灭论》。这篇文章很简短，实际上是以皇帝的名义阻止继续再闹下去，算是为神灭论之争画上了句号。

皇帝认为，三教中都有许多经典是说人是有灵魂的。范缜对于佛教的敌视，最初是从捍卫儒教的立场来的，他本人精通“三礼”，为了捍卫礼法，才与佛教争论。既然如此，皇帝就从《礼记》中寻找了两个例子，证明《礼记》也是说有灵魂的。[62]范缜既然信任《礼记》，就听《礼记》一句劝，接受“人是有灵魂的”这个观点吧。

皇帝写了答复后，又把自己的答复发给了臣下。为了向皇帝表示忠心，一共六十多个臣下纷纷上表，表示赞同皇帝的意思。

臣下的回答有两层含义：第一，大部分人都是相信灵魂的；第二，这些人赞同皇帝，只是礼节性的，并不意味着对范缜的迫害。

最终，神灭论作为一种理论被记录了下来，范缜也因为这篇文章而名传于世。但是，佛教仍然在南朝大行其道。

梁武帝：垮于佛教

不管范禛的神灭论说了什么，但至少有一点，他抓住了当时的社会本质，那就是：佛教已经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显得太庞大了。

现代人在讨论西藏的人口结构时，往往被它过于庞大的僧侣团所震惊，在高峰时期，僧侣竟然占西藏劳力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就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劳力被抽走，无缘生产性活动。然而，西藏由于地势特殊，依靠天险足以保证土地安全，这样的代价似乎还可以承受。但对于南朝社会来说，他们的边界并非封闭的，北方的强敌虎视眈眈，如果僧侣团过于庞大，必然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备战。

佛教对社会资源并非没有节约作用，比如，由于汉代的儒教传统，人们喜欢厚葬。公元2016年挖掘的海昏侯墓中黄金灿烂，铜钱以吨计量，表明王侯之死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但是，到了魏晋之后人们却开始了薄葬的风气。这其中原因之一是汉末大部分皇帝墓葬都被盗掘了，人们认识到越厚葬越是给自己找麻烦，为了获得死后的安宁，宁肯少点陪葬品。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佛教的传播，佛教不重视人的皮囊而重视人的精神，所以对于死后的身体也不关心，甚至想烧掉。

但是，佛教又的确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范缜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从儒教的角度批评了佛教。他说：佛教伤害政治，蛀空了风俗，我之所以反佛，是为它的弊端感到哀伤，想着把社会从对佛教的溺爱中拯救出来。

他批评那些宠信佛教的人，把财产全送给了僧人，直到自己破产为止，却从来不去体恤他的亲戚，更别提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穷苦人。

当然，他这样的批评，和中国的体制有关。

在如今的东南亚，佛教本身就是一种慈善机制。由有钱人施舍到寺院，再由寺院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寺院起到了财富转移的作用，类似于西方的慈善机构。但中国的佛教走的却是上层路线，寺院本该有这样的慈善功能，却很少发挥作用，反而是僧人的铺张浪费、四处坑蒙拐骗更加显著。即便到了现在，也很少有人去钻研真正的佛理。所以，范缜的批评是有道理的。[63]

不过，范缜的批评倒和梁武帝本人无关。《南史》记载的梁武帝几乎是一个帝王的最高标准，说到他的孝道，六岁母亲去世时，他哭得比成人都惨痛，滴水不进达三日之久。父亲去世时更是一哭就吐血，前后加起来达到数升。

说到学问，即便他日理万机，仍然卷不措手，每天就着烛光读书。他写的书除了《通史》六百卷之外，还有《金海》三十卷。儒教方面，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孝经讲疏》，加起来一共二百余卷。在他统治的时期也没有忽略儒教，重新设立了五经博士。在礼仪方面，他主持编纂《吉凶宾军嘉五礼》一千余卷。登基后，作为皇帝写的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笺、奏诸文有一百二十卷。此外，他会的技艺有：围棋、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等等。佛经方面，他写有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一共数百卷，还不断地去同泰寺讲学，每次都有数万听众。[64]

梁武帝本人还非常节俭，身穿布衣，不着绫罗绸缎，一个帽子戴三

年，一床被子用两年。晚年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吃素。五十岁之后就不再亲近女人，不喝酒，除了大宴群臣或者做法事时之外不听音乐。

在处理政务上也极其严格，冬天四更就起来，借着烛光看奏章，持笔写字，甚至手都冻裂了。

在他几乎严格的苦行僧方式下，南朝恰好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在这个时期，社会经济保持了和平而迅速恢复，人们的文化和修养都处于南朝的黄金时代。在刘宋时期，皇帝的修养仍然单薄，萧齐时期过于短暂，而且被一些稀奇古怪的皇帝拖了后腿。只有萧梁时期，皇帝的品位和社会的繁荣都达到了高峰。梁武帝认为，之所以社会如此精彩，是和他尊奉佛教有关。

但是，他忽略一点，梁朝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内部的稳定与外部的和平。而外部之所以和平，是因为北方的魏国处于一次衰落期。在刘宋和萧齐时期，北方的北魏正好强大，而梁朝时，北魏经过了六镇之乱，朝政随后又被尔朱荣把持，最后高欢、宇文泰的崛起使得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65]当两个魏国征战不止时，没有人腾得出手来入侵南方，南方才保持了长期的和平。

而梁武帝过分注重发展内部文化，却忽略了对边境的防守。于是，一旦两魏喘过气来对付南方，就是灾难的开始。

就在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入寺的时候，危机已经到来。他还在寺庙时，突然有消息传来，东魏一位叫侯景的将领要投降梁朝。[66]梁武帝听后大喜，派遣司州刺史羊鸦仁率土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人接应侯景。下令完毕，他继续在寺庙里开他的大会。

梁武帝没有想到，这件看起来不经意的事情，却决定了梁朝和他本人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侯景将会以少有的乱臣形象被记入历史。他是少数民族羯族人，曾经在北魏权臣尔朱荣手下效命，当高欢征讨尔朱氏时，他又该换了门庭，效命于高欢。到高欢的儿子高澄即位后，他又叛变率军向南方投诚。

侯景投降南方后，由于不得志，再次叛乱。这次他没有逃走，而是

突然间向梁朝的首都建康进攻。进攻出其不意，梁朝的军队在几十年的安乐中早已丧失作战能力，根本无力抵抗侯景的部队。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两年后，他被围困在建康，建康城投降了侯景。八十六岁的梁武帝被饿死在宫中。

梁武帝去世后，侯景之乱虽然被镇压，但梁朝的盛世再也没有回来。梁武帝当年建立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年的繁华顶峰。

第十二章
北朝：入笼之鸟（公元317—公元589年）

与南朝的佛教失控相比，北朝对于佛教虽然也极为推崇，却从来没有放弃控制。一旦佛教规模失控，皇帝就发动灭佛运动，将佛教资源重新收入政府手中。

在北朝，佛教和道教在理论上发生了多次论战。双方论战的焦点始终是：佛教是不是产生于道教？佛陀是不是老子的化身或者学生？

老子化佛是由道教编造的故事。但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由于人们不了解佛教，僧人们默许了这个故事的存在。一旦佛教羽翼丰满，佛教开始与道教拉开距离，双方的辩论随即展开。

与佛教的思辨相比，道教是一个信口开河、缺乏逻辑能力的宗教，在辩论中屡战屡败。

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行动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对皇帝的最大胆攻击，僧人慧远直斥皇帝要下地狱，成为佛教不屈从权威的最典型事例，也是绝响。

在南朝的佛教享受着皇帝的恩宠和无限荣华时，在遥远的北方，佛教却正经历一场劫难。

这场劫难来得非常突然。在几年前，北魏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对和尚们还恩宠有加，毕恭毕敬，但几年后的公元444年（太平真君五年），政治风向标却突然转向，佛教瞬间成了皇帝进攻的目标。

这一年春天正月，皇帝突然下了一封诏书，这封诏书如同古代的“清理思想垃圾”运动，主要针对的目标，几乎包括了一切官方不喜欢的思潮，这其中既有巫术、谶记、阴阳、图纬、方伎这些中国传统的灰色地带，也包括了佛教这样的宗教团体。皇帝几乎没有把它们进行区分，就

一网打尽了。

为了铲除这些“思想垃圾”，皇帝规定：不管是老百姓还是王公贵族，一概不准私自奉养和尚、巫师以及金银匠人，凡是已经有的，必须送到官府，不能私藏。皇帝给了一个月的期限，如果过期不报的，巫师和和尚身死，主人也要灭门。[67]

过后，皇帝又下了第二道谕旨，宣布人们不能私立学校，必须到政府举办的学校上学，而那些技工、武卒，则只能继承父辈的职业。[68]

这两个法令几乎断绝了人们从事自由职业、进行自由学习的空间，而僧人作为首当其冲的对象，受到了严厉的对待。

但这次的敕令似乎只是在北魏的都城平城（现山西大同）和东部地区实行。两年后，位于陕西的卢水胡人盖吴造反，太武帝率军进入陕西镇压了造反者。进入长安后，皇帝的马匹放在了一个寺庙中，因为寺里的僧人种了一些麦子，可以供马食用。太武帝进去看马时，他的随从官员在寺庙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些兵器，出来后告诉了皇帝。皇帝大怒，认为这不是和尚们用的东西，而是和造反的人同谋的证据。于是他下命令诛杀了整个寺庙的和尚。

杀完和尚之后，开始检点寺庙的物品，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器具。另外，在躲避战乱时，许多有钱人不能把东西都带走，就把一些贵重东西寄存在寺庙，也被发现了。最后，还在寺庙内发现了一些密室，被认为是和尚和贵族妇女淫乱的证据。

这时，皇帝的亲信大臣崔浩正巧在旁边，趁机煽风点火，撺掇皇帝下令将长安的僧人全部杀死，将佛像毁坏，又命令全国依照长安的规矩办理。[69]

到这时，一次全国性的灭佛运动形成了。

太武帝在长安时，他的太子拓跋晃（恭宗）留在平城。恭宗对佛、道都有好感，听说父亲大开杀戒，连忙上表请求不要这么做，认为杀戮和尚、摧毁佛像都是罪过，而更重要的是，许多艺术珍品都在灭佛中毁于一旦。通信来回三次后，太武帝仍然不解气，他发了一通诏书，描写

自己对佛教的认识。[70]诏书的原稿可能是崔浩写的，显得文采飞扬。由于当时普遍认为是东汉的明帝做梦梦见金人在宫殿里飞行，才派人前往西域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僧人，诏书里直接把明帝称为“后汉荒君”，认为他本人信惑邪伪，胡乱崇敬妖孽。并强调，所谓佛，是中国自古没有的东西，只会造成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黑白颠倒。皇帝重申：从今以后，敢有崇拜外来大神或者制造神的形象的，都是灭门之罪。而各地方官员则应该把所有的佛像佛经都毁掉，把所有的和尚都活埋。

在诏令之下，大批的和尚被赶走，大量的土木宫塔都毁于一旦。然而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即便他发布了如此严厉的命令，可是仍然有人敢于冒险。就连他的太子也并不听他的话。于是，皇帝命令下达的同时，各地官员已经开始暗中行动，提醒和尚尽早逃走，或者把金银宝像和佛经都藏起来。

大量的僧人从北朝逃到了南朝，促进了南朝的发展。还有的人躲起来，等待着将来政策的转向。

北魏太武帝灭佛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难。此后，这样的行动还有三次，历史上将这四次法难称为“三武一宗”[71]灭佛，这“三武一宗”也就是迫害佛教的四个皇帝。然而，每一次法难之后，都会进入下一个迅速恢复期。

而所谓灭佛，实际上也只是政治和经济的一部分。皇帝之所以要灭佛，是因为佛教不听话，而通过灭佛让和尚们听话之后，一旦皇帝控制了政权，就立刻又发了通行证。到最后，佛教、道教、儒教都在政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形成了一派和谐。

如果说佛教在魏晋是一种思想上的开放势力，到了南朝，则已经和政权相连接，变成了皇帝的玩物，只是，在南朝时期，皇帝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佛教、道教和儒教之间的关系，无法让它们统一生活在政权之下。而在北朝，诸位皇帝虽然经过了数次暴力事件，最终却驯服了佛教，皇帝成了三教的首领，带领它们共同享受中央集权带来的权力和荣华。

下面，就是北朝皇权和佛教在摩擦中最终得到和谐的过程。

灭佛与兴佛

北魏是鲜卑族政权，建国的过程是从军事部落制向行政官僚制转化。要想完成转化，最适宜的方法是采纳中国的中央集权和政教合一模式，强调君臣父子各安其位。由于定位清晰，北魏从一开始就把汉朝的儒教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终其一朝，将北方的文化进行重建，学习中原的正统模式。

北魏遵循的是汉朝传统，使得它的文化成了一个集道统、谶纬、方术于一体的大杂烩。有人认为，北魏的正史《魏书》是二十四史中最迷信的一本，其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统治者的神化，以及无数的谶纬故事。在《魏书》中，那些北魏的名臣变得既像道学家，又像占卜的巫师，他们总是朝皇帝做着各种预言，要求皇帝根据这些预言治国。

北魏王朝的实际开创者是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他学习汉文化定国号为魏，又迁都平城，建立宫殿，建设了宗庙社稷等宗教建筑，又设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官品、爵位、律令、历法等，表明自己继承了汉代的正统。之后，他又设立了五经博士，并录取了三千太学生。为了彰显儒教，还命令这些博士和学生从儒教经典中总结大义，写了四万多字的《众文经》，进行文化推广。[72]

道武帝的儿子明元帝继续了父亲的爱好，他本人对于历史更感兴趣，甚至模仿刘向的书籍，写了一本三十篇的《新集》。[73]

明元帝的儿子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继续了前两代的政策，建立新的太学机构的同时，还供奉了孔子，以孔子的弟子颜渊配祀，形成了国家宗教模式。[74]

北魏的皇帝们在学习汉文化的儒教时，最初并没有忽略掉另外两种宗教，特别是佛教。实际上，自从西晋末年北方乱套之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对佛教有认同感。由于西域是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这些少数民族又多少和西域有点关系，他们认为佛教是自己的宗教。比如石勒、石虎的后赵政权就曾经在河北地区崇佛，受到汉族大臣的质疑，认为应该用儒来取代佛，而石虎却认为：佛是外面来的神，而我就是从边

外来的，所以崇佛本来就是我的风俗。[75]

前秦苻坚对于僧人道安的尊敬，后秦对于龟兹名僧鸠摩罗什的资助，都是北方对于佛教的贡献。

北魏发端于中国的北方，与西域隔绝，所以最初对于佛教并不了解。但是道武帝仍然很尊重佛教，他平中山，经略燕赵，经过佛寺时都致敬，并禁止军旅侵犯佛寺。之后道武帝下令建立佛塔、禅堂，北魏开始了佛教的发展。另外，除了尊崇儒教、尊敬佛教之外，道武帝对于黄老之术也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可谓三教同尊。

明元帝时期，继续尊道崇佛。在这个时期，中国一个特殊的机构建立了起来，这就是“道人统”，所谓道人统，就是管理得道之人机构。这个机构的出现，表明这个新兴国家想把僧人和道士纳入行政管理的尝试。[76]道人统也成了如今国家宗教局的前身。

太武帝即位后，本来也采取了和前两代一样的宗教政策，但他本人戎马倥偬，征服了北中国大量的土地，最后统一了北方。胡夏（陕西）、北凉（甘肃）都是佛教发达的国家，在灭亡这两个国家的过程中，大量的僧人终于出现在了统一后的北魏帝国之中。僧人的急剧扩张，难以管理，使得太武帝的态度逐渐转变，而这时，两个人的出现彻底转变了太武帝对佛教的好感。他们是信奉儒教的崔浩和道士寇谦之。

在北魏统一的过程中，作为汉人的崔浩是第一大功臣，他帮助太武帝建立了一套类似于汉人的官僚制度，而他本人则是汉儒的信奉者。[77]在明元帝时期，崔浩就为皇帝解说《易》和《洪范五行》，大多利用天人感应来解说政治。崔浩发现，在北魏建立官僚体系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佛教，因为佛教已经是一种组织化的宗教，而且不属于官僚系统内的组织。它有着大量的信徒，占据了不少社会资源。只有打掉佛教，才有利于北魏官僚系统更加正规化。

为了与佛教对抗，崔浩引入了道士寇谦之，将他介绍给了太武帝。于是，太武帝从早年的信佛突然转向了道教，并把国号改为太平真君。寇谦之也利用北魏政权的力量建立了天师道，试图将道教国教化，变成北魏帝权的支柱。

在寇谦之的影响下，以及崔浩的直接策划下，太武帝有了灭佛行动。与灭佛同时进行的，是北魏儒教教育体系的构建，建立了太学，禁止了私学，官方也就垄断了人才的思想。

不过，寇谦之与崔浩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赞同用武力对待佛教，曾经苦苦劝说太武帝，并与崔浩发生了争执。没有效果，寇谦之只好对崔浩说：你很快就要得到报应，灭门不远了！[78]

四年后，崔浩果然遭受了灭门之刑。不仅清河崔氏被灭，就连崔浩姻亲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被灭族。

崔浩被杀，表面上源于他主持编纂的《国书》这本书。这是一本写作北魏历史的著作，对于北魏皇族的历史，他写得非常详细，却没有想到要为皇帝避讳，不仅写了好事，也写了丑事。写完后，崔浩命人将《国书》刻在石头上供人阅读。他这样做是对于书的质量有信心，但在反对他的人看来，却是故意暴露北魏皇室的丑，他给了政治对手把柄，让他们借助《国书》事件将其害死。

崔浩死后，儒教势力暂时遭到了挫折，佛教势力再次抬头。以他的死亡为界，佛教徒遭受迫害的时光过去了。虽然太武帝又过了几年才死去，但佛教遭受的迫害已经大大减轻，人们可以偷偷奉事了。除了京都之外，其余的地方恢复得更快。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下诏恢复佛教的地位。[79]虽然名曰恢复，但实际上的政府控制却是加强了，比如，文成帝的诏书中虽然说人们可以自由信奉佛教、自由出家，但又在人数上进行了限制，规定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更远的地方十人。

一个州只有几十位僧人，这样的数目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社会僧人的数量早已突破了限制。但这些数字却说明了政府的管理思路，就是控制佛教规模，不让它成长为政府的威胁，也限制它获取的社会资源数量。

文成帝恢复佛教的同时，还重建了“国家宗教局”机关，名字从道人统改成了沙门统。孝文帝时期，又禁止和尚在民间浮游，而规定和尚必须领取官方发给的证明，这就是官方度牒的前身。[80]

当然，政府控制佛教，也要同时给予僧人们足够的好处，以利益换取服从。而最重要的，则是在经济上做出妥协。文成帝时期，沙门统的负责人、和尚昙曜认准了皇帝的底线，奏请皇帝批准，如果有人能每年交给僧曹六十斛谷子，就可以算为“僧祇户”，而输送的谷子就是“僧祇粟”，僧祇户获得好处是不再属于国家的税收系统，不再承担国家的税赋。由于北魏的税收并不轻，成为僧祇户最初是一种减轻负担的做法。

昙曜还请政府赐予寺院一些人手，这些人或者是国家重罪的囚徒，或者是官奴，让他们充当“佛图户”，也就是帮助寺院打扫卫生或者种地的人。

皇帝没有想到，这一批准，就创造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寺院经济。僧祇户、佛图户一开始人数还不多，后来人数飙升，成了政府财政之外的人。

当然这对社会来说不是坏事，当皇帝的税收过度时，会有许多人来给寺院当僧祇户，或者把地卖给寺院，再来帮寺院种地，寺院收取的租金更低，也就避免了政府的残害。当政府政策好的时候，人们又会从寺院反流到社会之中。

到这时，政府和佛教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有时候斗争激化，但有时候又相互利用。到了北魏后期，佛教已经迅速膨胀，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寺庙数最高时达到了天下三万，而僧人更是达到了二百万，这还不包括那些围绕着僧人服务的群体。

与此同时，官方的语言体系仍然是儒教的，官僚系统的晋升也主要是从儒生中选取。儒教和佛教达成了一种默契，一方占据了政治主导权，另一方则获得了经济资源。

唯一没有从这种默契中获得太多好处的是道教，于是，道教开始反击了。

表5　北魏寺庙僧尼统计[81]

年代	寺庙数	僧尼数	备注
公元477年（孝文帝	平城京内约百所	京内2000余人	太和十年遣1327名僧

太和元年）	四方6478所	四方77258人	尼还俗
公元512—515年（宣武帝延昌中）	天下13727所 洛阳城内500所	僧侣益重	此时已迁都洛阳
公元518年（孝明帝神龟元年）			
公元534年（魏末）	洛阳1367所（《洛阳伽蓝记》） 天下3万有余	天下200万	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415部，合1919卷

老子佛陀的迷雾

公元520年（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在皇帝面前，佛教和道教的代表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交锋。交锋的内容是：佛陀和老子的关系。[82]

这一年，孝明帝更改了国号，举行了大赦，召集了佛道的代表来到殿前。道教的代表是清通观道士姜斌，佛教的代表是融觉寺僧人昙谟最。

双方到齐后，皇帝开始提问：老子和佛陀是不是同时的人？

道士回答：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向西而去，化为胡人。而僧人们所说的佛陀，在当时是老子的侍者，所以，他们是同时的人。

道士的回答实际上来自一桩公案。在当时市面上流传着一本叫作《老子开天经》的书。这本书的记载显得很奇特。根据正史记载，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西去，在关口碰到了守关的关令尹喜。尹喜请老子留下点文字，于是老子挥笔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然后离开。[83]

《老子开天经》却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发挥，在书中，尹喜并没有离开老子，而是跟着他一起去了西方。当他们到达一个叫作印度的地方，老子让尹喜摇身一变，变成了佛陀，留在印度普度众生。

现代人很容易就能看出这本书是后人编纂的，但在南北朝时期的道士们看来，这本书说的却全是史实。他们用这本书来证明：一、道教比佛教更早；二、道教比佛教更高明。

听了道士的话，和尚立刻反驳说：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道士回答：有一本书叫《老子开天经》，我是根据这本书知道的。

和尚追问：那么，老子又是周代哪个王的哪一年生的？哪个王的哪一年西去的？

道士回答：老子生于周定王三年（公元前604年）乙卯年，出生地是楚国陈郡苦县厉乡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时生人。到了周简王四年（公元前582年）丁丑年，成了周朝的守藏吏。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年）迁为太史。到了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庚辰年，那年老子八十五岁，见到周德已衰，决定和散关令尹喜[84]一同向西，化为胡人。这已经足够详细了。

和尚接着反驳说：佛陀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涅槃。在佛陀涅槃后，经过三百四十五年，才到定王三年，也就是老子的生年。老子活到八十五岁，到了敬王元年，才和尹喜西行。这时已经距离佛陀涅槃四百二十五年了。[85]老子比佛陀晚生这么多年，怎么还能当上佛陀的师父？

道士反问说：如果佛陀真的生在周昭王时期，又有什么文献做依据呢？

和尚说：《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这两本书里都有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本书也是后人伪造的，就如同道士们把《老子开天经》当成史实一样，和尚们把这两本书也当成史实使用。

在辩论中和尚的气势压住了道士。于是道士试图把话题引向孔子和佛陀的比较，试图拉拢儒教阵营一同反驳佛教，但被及时制止了。皇帝的大臣宣布，道士姜斌观点散漫，没有宗旨，辩论失利。

辩论末了，皇帝又追问了道士一句：你说的那本《老子开天经》从哪里得来的？是谁说的？

道士只好和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莹等人，一同去取经书。经书

取来后，皇帝分发给一百七十多个大臣，一同阅读。读完后，众人认定，老子只写过五千字的《老子》（《道德经》），没有听说过这本书，认定是伪造的。

皇帝生气地要把道士判处死刑，被其他的和尚劝说着没有杀，而是流放到了偏远的马邑（现山西省朔州）才作罢。

这次争论以佛教的胜出而告终。现代人感兴趣的不是辩论题目本身，而是辩论的过程。这次辩论代表着当时考据学的较高水平，却又有无数的缺陷。双方旁征博引，详细计算，值得肯定。但他们引用的经文却都是伪造的，不仅《老子开天经》不是老子所作，就连和尚引的《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也不知是何许人写的伪书。佛教之所以胜出，只是因为此时的皇帝更喜欢佛教一些，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次争论也将数百年佛、道大辩论的主题说得明明白白。在未来几百年里，中国还会发生多次大规模论战，而每一次的主题都围绕着老子的身份展开。道教认为，佛教是老子西行之后创立的，把佛教当作道教的一个支派，而佛教则坚决否认这一点。

遥想佛教刚进入中国时，为了人们便于理解，不断地往道家的概念上靠，现在羽翼丰满后则极力否认与道教的联系，只能感慨世事变幻。

关于老子化胡的起源，最早出现在《后汉书》，汉桓帝时期的大臣襄楷的奏章当中，提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86]这个时候出此传言，可能由于人们对佛教的不理解，也可能是佛教故意附会让人容易理解。西晋时期，国子监祭酒王浮和僧人辩论时，写下了一部《老子化胡经》。[87]此时佛教徒已经明确不同意老子化胡的说法，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

除了这部《老子化胡经》之外，流传到现在的材料，还有前面辩论中提到的《老子开天经》。另外，北周时期的前司隶、母极县开国伯甄鸾也曾经写过一部《笑道论》[88]，专门嘲笑道教理论，其中引用了许多道教的书籍片段，比如《太上道君造立天地》等。

在甘肃省平凉崆峒山的老君楼，至今保存着一组著名的壁画，称为《老子八十一化图》，也是描写老子的诸般变化。

不过，流传到现在的《老子开天经》可能不是当年佛道大辩论时用到的版本，其中并没有关于老子化胡的记载。这本书写的是道教综合了所有神话之后，设计的一个宇宙生成过程，既带着一点玄学色彩，又有佛教特点。

根据书中记载，最初天地之间是一片浩荡，没有形状，没有天地阴阳日月东西，只有一片无以名状的广阔。而此刻的老子是没有形状没有言语的，很难说他是人。这和西方哲学中后来的上帝形象很相似，哲学家们慢慢地抛弃了上帝是人形的看法，把他当作一种无处不在的意志。而这里的老子也是类似的。

在这片浩荡之中，产生了所谓的“洪元”，又经过了一万个“劫数”（这是个佛教用语），才产生了“混元”，又经过了万劫百成（百成是八十一万年），到了“太初”。

“太初”时，老子也成形了，从虚空中降落下来，带来了一部《开天经》，经文四十八万卷，每卷四十八万字，每个字方圆一百里。“太初”在经文的作用下，分开了天地，产生了日月、人类。之后到了“太始”。不再具体叙述要经过多少年，从“太始”开始，又经历了“太素”“混沌”“九宫”“元皇”“天皇”“地皇”“人皇”，之后开始了各位圣人的统治，而老子都在其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老子开天经》写到夏商周就结束了，没有继续写老子如何去西方变佛。而接下来的任务，交给了《老子化胡经》。

王浮的《老子化胡经》虚构了老子出函谷关之后的行程：第一，他到了于阗国（现新疆和田）的毗摩城，在这里招来了一堆仙人，又度化了八十多个国家的国王，教导他们杀生太多，要修道赎罪。由于胡人不洗澡，身体腥臊，于是又命令他们剃头。[89]第二，他到了摩揭陀，立浮屠教，然后回中原，去扶桑（日本）。第三，派遣尹喜托生于印度，成为佛陀。

而在甘肃崆峒山发现的《老子八十一化图》虽然出自明代，但也详细叙述了老子的化胡经历。在他的八十一次变化中，从第二十七个变化开始，老子就进入了西方世界。第二十七化是进入罽宾，也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大乘佛教发源地），度化了那儿的国王和王子，并说了《莲华经》《光明经》《涅槃经》《四十二章经》等。第三十四化则明确提出，老子让尹喜当佛，去度化克什米尔人。之后，老子开始降服九十六种邪道，并在各个西域国家游荡显神。第四十一化到了天竺，也就是印度，给各个国王传授佛教戒律。第四十五化则说老子又托生于天竺的迦毗罗卫国摩耶夫人腹内，成了净梵王子，继续度化众生。从第四十七化开始，又回到了中原来点化孔子。由于八十一化图是明代画的，后面的诸般变化，一直说到了宋代，才告结束。但从前面这些变化，可以明确地看到道教是如何穿凿附会，把佛教说成道教的分支。

佛道大斗嘴

自从有了《老子化胡经》之后，佛道之间的辩论就再也没有断过。上节提到的北魏孝明帝时期的辩论可以看作第一次。到了继承北魏政权的北齐，出现了第二次。

这一次辩论记在了唐朝和尚道宣所写的《集古今佛道论衡》里。这本书记载了东汉明帝到唐高宗时期的佛道辩论事件，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真实的。

在公元555年（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90]，同样是皇帝召来了佛道的代表进行辩论，道教的代表是著名的道士陆修静，而佛教的代表是上统法师。在书里将这次辩论神化成了法术的大比拼，但实际上，可能仍然是义理的比较，最终佛教胜出，皇帝让道士削发为僧。

而更重要的辩论出现在北周时期，北周武帝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出身胡人，却一心用儒术治国，对佛教充满了警惕心，这也使得佛道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

武帝最初试图利用儒教，并相信汉儒的谶纬，被道士张宾迷惑后，决定亲近道教、远离佛教，甚至穿上了道士的衣服[91]，而另一个人卫

元嵩则怂恿武帝建立一套以皇帝为中心、集成三教的新宗教体系，叫作平延寺。[92]

公元569年（天和四年），北周武帝召集了名僧、儒者、道士以及百官两千多人。这次讨论的目的，是给三个宗教排定座次，他心目中的座次是：第一道教，第二儒教，第三佛教。

他这样排的理由是：根据《老子开天经》等道教经文的叙述，道教是在天地产生之前的混沌状态时就已经有了；而儒教则产生于周代，而且儒教是治国的宗教；至于佛教，根据《老子化胡经》的叙述，则是老子的小跟班尹喜创立的，所以更晚，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是在汉代。

这次开会，讨论到后来，北周武帝再次改变主意，想直接废除佛教，但仍然没有做结论。随后，他命令大臣甄鸾写一篇命题作文，讨论佛道二教的优劣，他没有想到，认真的甄鸾竟然洋洋洒洒写了三卷书呈了上来，这就是有名的《笑道论》。

《笑道论》直接针对皇帝的说法，对道教进行了三十六条批驳。皇帝大惊，他的本意是取消佛教，没想到大臣却和他对着干，于是召集群臣讨论，给甄鸾扣上了“伤蠹道法”的帽子。而这时，另一位僧人道安又上了一本《二教论》[93]，继续批驳道教。武帝最后无奈，只好暂时搁置了这个议题。

《笑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了佛道大辩论的最高水平，作者利用道教文献，再加上逻辑的力量，指出道教文献本身就有着太多的逻辑错误，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可以看成是伪造的。这也看出佛教和道教的区别，道教天马行空，缺乏逻辑性，其文献也显得支离破碎，更多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而佛教内部文献则早已接近于学术论文的水平，虽然逻辑没有发展出三段论这样确定的形式，却已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巅峰。

《笑道论》分成三卷三十六条，批判了道教的三十六个论点。按照作者的说法，是嘲笑道教经典号称三洞[94]，而当时的道教经典号称三十六部。

这三十六条又可以主要概括为五点[95]：第一，道教书籍中记载互相矛盾，比如所谓“造立天地”，道教经典中的记载就是矛盾的，在《太上老君造立天地》中声称老子的身体变成了日月山川[96]，可是其他书（比如《老子开天经》）又说天地是从混沌中诞生的。

第二，书中的记载违背了历史常识，比如“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为周师，无极元年癸丑去周度关”，这样的记载，而年号实际上是汉武帝时期才有的，在周代就编造年号，显然不符合历史。

第三，关于老子化胡的说法混乱不堪，一会儿说老子化成了佛陀，一会儿说老子的跟班尹喜化成了佛陀。甄鸾总结了各类书中共五种说法，每一种都不同：尹喜化佛是一种；老子化佛又有两种，一种是在克什米尔成佛，另一种是说在“维卫”这个地方化佛，也叫释迦；第四种是说老子的老婆号称释迦；最后一种是说老子度化了印度王子悉达多，号称释迦；到底哪个是真的，无从知晓。

第四，道教经典中有许多荒唐污秽的道术，还在房中术上大做文章，这在当时的佛教徒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第五，道教经典原创性不足，偷窃了很多佛经的内容。比如《妙真偈》和《灵宝经》偷窃《法华经》。

这次辩论没有胜负结果，但是从理论上，佛教一直保持着对道教的优势。

除了北周的理论辩论之外，佛道的辩论一直持续到了元代。由于明代是铁板的儒教治国，清代又明确了喇嘛教的地位，汉地的佛道二教处于在野地位，纷纷到民间吸引普罗大众去了，也就没有必要为了争夺高层资源而辩论了。

隋代时，隋文帝也曾经发现了老子化胡的塑像，觉得很奇怪，召集了一次佛道辩论，辩论的题目仍然是老子化胡问题。隋炀帝时期，佛道继续辩论，到了唐代高宗、玄宗、德宗时期，也都有辩论。

可以说，老子化胡问题只是中国文人的戏谑之作，等于吵架不过编一些盘外招，却意外地引领了千年佛道大辩论的主题。历代统治者出于

统治的便利性，利用这个主题挑动双方的争论，再给予它们不同的待遇。在一个吃肉的同时，另一个却总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佛道两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皇帝，围绕着皇帝打转。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北周武帝在挑动了佛道之间的妒忌心，发动了辩论之后，突然决定哪个也不支持，两个一块儿干掉…

不屈的和尚

公元573年（建德二年），北周武帝再次协调三教问题，召集了佛道和官员们探讨三教的排位。此时的武帝已经想明白，统治还是必须用儒教，这次的排位变成了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

佛道两家争吵不已，皇帝也烦了。武帝忍无可忍，终于下令，佛道两家都禁止掉。经书全部烧毁，佛像砸碎，所有的和尚道士一概还俗，编入户籍成为纳税人，而所有的祭祀，只要是儒教经典中没有记载的，一概废除。[97]

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佛，或者称为法难。

北周武帝灭佛与当初的北魏太武帝灭佛不同，太武帝对不听话的僧人进行武力消灭，而北周武帝却没有消灭僧人，只是强迫僧人还俗。北周武帝的措施之所以更缓和，得益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措施。

孝文帝（和他的祖母文成文明太后）改革，我们一般称之为汉化改革，这样的提法偏离了重点。他改革的实质，是建立一套社会控制体系。北魏皇室是从游牧部落发展而来的，而北方中国经过多年的战乱，也早已经社会失序，基层结构都乱了套。所以，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就是要把这个失序的社会重新组织化。他们建立了完整的官员俸禄制度，重新分配了土地，建立了完整的户籍制度和纳税体系。当这些改革完成后，皇帝就已经对社会的人口和资源都有了详细了解。北周就继承了北魏的社会结构。

在北魏太武帝时，皇帝对社会基层控制力弱，即便想让和尚还俗，但是由于对基层不清楚，和尚们阳奉阴违，白天还俗，晚上就逃走了，继续跑到皇帝管不到的地方当和尚。至于全国和尚的户籍，皇帝也查不清楚。所以要灭佛只能采取激进的措施，用武力把反抗者吓服。

而北周武帝时期，皇帝已经有了和尚的户籍信息，哪里有多少和尚一目了然。皇帝把和尚还俗安排到地方后，地方的乡长里长可以把他们看住，还给他们分配土地，这样和尚就跑不掉了。

所以，两次灭佛的不同，反映了皇权对于社会控制力的加强。

武帝灭佛之初，北方还没有统一，西部的陕西地区掌握在北周手中，而东部的中原地区则掌握在北齐手中。几年后的公元577年（建德六年），北周武帝攻入北齐首都邺城，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于是，灭佛的措施也推进到了北齐的疆域之内。

进入邺城后，皇帝召集了北齐的僧人前往邺城，向他们宣布废除佛教。皇帝的诏书包括了几层意思：第一，原本要三教皆废，但考虑到儒教是治国之道，所以保留，其余两教废除。第二，真正的佛是没有形象的，佛像、佛寺和佛塔，费钱无数，却无助于信仰，予以铲除。第三，和尚不尽孝道，国法不容，还俗回家。[98]

皇帝本来以为，他只需把僧人召集起来，做一个宣布，就足够了。却没有想到，他突然间遭遇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胆和尚的攻击。这也成了佛教精神不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所有被召集的和尚中，有一位叫慧远的僧人。当别人都默不作声时，他突然站起来，开始反驳皇帝。针对皇帝诏书里说的“真正的佛是没有形象的，所以要铲除佛像”，慧远认为：真佛虽然没有形象，可是普罗大众要靠佛像来维持对佛的崇敬，毁掉之后，大众会不习惯。

他举了一个非常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如果形象是不需要的，那么帝国为什么还要国家七庙，里面不也塑有三皇五帝，以及皇帝祖先的雕像吗？

皇帝铁了心废除佛像，竟然说：国家七庙是上代所立，也不是我想要立的，我也认为这不好，干脆一块儿废除了。另外，皇帝认为，佛经是外国之法，中国不需要它。

慧远又打了个巧妙的比方：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在的鲁国对于秦国、晋国来说，也是外国，是不是说，孔子的儒家就不应该在秦国和晋国通行呢？至于皇帝要废除七庙，就是不尊重祖先，不尊重祖先就是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导致五经无用，皇帝一会儿要尊崇儒教，一会儿又要废除儒教的根本，这是不是也是矛盾的？如果儒道释三教都不要了，又如何治理国家？

皇帝反驳说：鲁国和秦国、晋国虽然是不同国家，可是都属于华夏（王者一化）之地。

慧远说：鲁国和秦晋都属于华夏之地，那么中国和印度还都在四海之内，轮王一化之地呢！

皇帝无语。

慧远接着批驳皇帝逼迫僧侣还俗，他举儒教提到的“立身行道以显父母”，这也是孝道。意思是说，僧人不见得非要回家伺候父母才叫孝顺，在外行道，为父母挣名，也叫孝顺。

皇帝认为：父母如此恩重，如果抛弃父母，远离父母，就算是孝顺，也不是至孝。

慧远立刻又抓住了皇帝的把柄，反驳说：如果远离父母就不是至孝，那么，陛下的左右大臣们为了给陛下当官，都必须远离父母。为什么陛下不放你的大臣都回家，而是要让他们跟着你服役至少五年见不到父母呢？

皇帝说：我也是轮番派他们回家伺候。

慧远说：佛教也让僧人们在冬夏修道，春秋回家伺候父母。

皇帝又无语了。

慧远接下来的话将成为中国历代皇帝能够听到的最大胆的话。他声称：皇帝依靠武力破除佛教三宝，就是“邪见人”，而邪见人是要下地狱的，在阿鼻地狱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皇帝难道不害怕吗？

慧远的诅咒让皇帝勃然大怒，他直视着慧远，说道：如果百姓幸福，那么我宁肯下地狱。

慧远说：陛下你以邪法引导人，是在种苦业，凡是听从你的人，都会跟着下地狱，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慧远说了这些话，竟然还能平安无事地从宫中出来。皇帝没有对他下手，只是命令众僧先回去，把参加辩论者的姓名留下。不过最后他也没有处理慧远和尚。

皇帝虽然表现出了大度，却并没有停止灭佛。在北齐，佛教原本比北周要兴盛，在北周武帝的努力下，四万座佛寺要么被毁，要么成了王公贵族的府邸。而僧人们还俗的就有三百万之多。至于佛像佛经被毁的，更是不计其数。

可惜的是，这一次灭佛持续的时间也不长，第二年，北周武帝去世了。继任者很快转变了方向，佛教再次兴盛起来，并在隋唐达到了最高峰。

不过，此时的佛教已经与当初的不同了。在最初，佛教是作为一种反叛力量被人们接受的；在南朝，佛教又成了皇帝的座上宾客，享受着极大的特权；而到了北朝，随着“道人统”“沙门统”等政府机构的出现，僧人们已经被纳入了政府的管理之中。他们的数量受政府管控，建设寺庙要批准，经济也仰仗政策上的“僧祇户”，所以越来越低调。就如同当年的道教转变一样，佛教也越来越不问世事，专心禅修去了。所谓的思想自由，就逐渐地被管控了起来，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才偶尔做出反抗。

不屈的和尚慧远的诅咒，虽然是佛教不屈服的象征，却也成了绝响。

第十三章
隋唐：从现代边缘坠落（公元581—公元960年）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的朝代，儒、道、释三个宗教都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在科举考试中，注重文采的进士科地位远在学习儒教经典的明经科之上，表明唐代统治者对于经文并不看重，而是更加注重人的实际素质。

唐朝皇帝由于把自己的李姓追溯到了老子，道教受到了优待，甚至在科举中也有道教科目。道教对于唐代最大的影响在于文学，唐代文人的想象力，大都来自道教的熏陶。

玄奘去印度取经，并试图将理论更加完善的唯识宗发扬光大。但中国人并不喜欢印度哲学过于繁复的思辨，反而是更加本土化的三大宗——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在唐代大行其道。玄奘取经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但他的最终目的却没有达到。

唐代在三教之外，是一个极其重视实际治理能力的朝代。随着王朝制度的复杂化，人们开始将政治当作一种实务学问（科学）予以重视，这种科学精神传给了宋代。

到了晚唐，人们反思三教竞争带来的思想不统一，以韩愈为首的儒家学者重新推动儒教的回归。这场运动在唐代没有带来果实，却在宋代结出了硕果：中国哲学再次回归统一，最活跃的时代过去了。

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一位和尚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这次事件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不朽事件。

但人们很少知道，这位和尚历经千辛万苦取来的经文，对于中国佛教却并没有很大用处。从历史地位上看，大唐玄奘法师的印度之行是一

次重要的文化事件，但是如果从效果上看，这次西游带回来的成果却是一次完败。

《西游记》认为，玄奘西游是为了取得真经，而所谓真经就是大乘佛教的教法。按照书里的说法，唐朝流行的仍然是小乘佛教，观世音让玄奘去取经，就是用大乘佛教来替代小乘佛教。[99]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唐代在玄奘之前，流行的已经是大乘教法。大乘佛教主要包括了般若、唯识、真常三支[100]，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是般若学，其他两支也有所发展。到了唐代，真常一支逐渐成了中国的主流学说。

这三支的区别主要是：

般若主要讲“空”，世界的一切，包括佛法都是空的，只有理解了“空”，才找到了通向菩提的道路。

唯识则认为在世界为“空”的前提下，佛法却不能是“空”。佛法既不是“空”，也不是“不空”，而是一种微妙的真实。为了理解佛法，人们需要有独立的意识，这种意识也是微妙的存在。所谓唯识，就是对这种佛法意识的解读。为此，这一支认为，人类一共有八种意识，分别是“眼”“耳”“鼻”“识”“身”“意”“末那”“阿赖耶”，其中“阿赖耶”识就是和佛法相关的意识。

在印度，主要流行的是般若和唯识两支。而第三支真常虽然也产生于印度，却由于中国人的发挥，主要在东亚流行。所谓真常，就是说佛和佛性是真实的存在，不是“空”，这种真实的存在叫真常。

中国人是一个偷懒的民族，之所以继承真常，是因为这一支对佛教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工作。比如，般若和唯识两支（特别是后者）都认为，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必须分成许多等级，从低到高一层一层慢慢来，最后才是佛性。可是中国的真常系则认为佛性不需要分级，一次性就可以修成佛性，没有中间等级。更加省事的是，修佛也可以是顿悟的，不需要花许多辈子逐渐领悟，只要人的境界到了，可以立刻成佛。

唯识一支还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修成佛，有的人的“阿赖耶识”本身就是邪的，缺乏佛性，怎么修炼都不可能成佛，这些人被称为“一阐提”，而中国的真常系却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佛性。

到了隋唐时期，真常系成了中国的主流，又派生出许多分支，比如，在玄奘之前就开始流行的天台宗就是这样的分支之一。在这些中国式佛学的解读下，许多印度佛经被曲解，而许多印度没有的教义被中国人提了出来。

玄奘秉持的是唯识这一支，更偏重印度原教义，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唯识，由于中国的佛经翻译上问题太多，也掩盖了真实的教义。更何况受到真常系的各种污染，很难找到一种纯净的理论。他决定到印度去寻找原始经文，将这些污染去掉。这里的“真经”，不是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对立，而是在大乘佛教内部，中国式解读和印度原教旨之间的矛盾。

为了寻找印度的原始教义，玄奘西行，经过西域进入中亚，过铁门进入阿富汗，又到达克什米尔，最后进入印度佛教的中心那烂陀寺[101]学习，并在游历了整个印度之后，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原文，一共五百二十六筴、六百五十七部。[102]

回到中国后，玄奘拒绝了唐太宗请他出仕的要求，潜心译经，共翻译佛经七十四部。[103]他翻译的佛经质量上乘，更接近印度的原义。而对于唯识理论，他做了深入的研究，编译成了《成唯识论》。在他的倡导下，唯识宗在唐太宗、高宗年间成了主流。

但是玄奘没有想到的是，他花这么大功夫做的事情，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影响。当他去世后，唯识宗又火了一段时间，就迅速冷却了下去，反而被从中国发端的几个宗派压倒了。这几个宗派从理论上来说和印度原典相差甚远，大都属于一知半解，却主导了中国的佛教界。

他高质量的经文翻译也没有起到作用，由于印度佛教的理论性太强，思辨过于复杂，中国人理解不了，僧人读来读去都放弃了，还是更喜欢在简单的道理上随意发挥。

结果，到了武则天时期，玄奘的一切努力就已经化为了泡影。如今的人们更是不了解他孜孜以求的佛经理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不务正业的旅行家，如果玄奘在天有灵，会更加沮丧。

为什么他的努力换不来成果呢？

实际上，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已经和印度佛教脱钩了。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们还是在学习外来文明，到了唐代，就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经义了。到这时，任何外来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中国式创造，才能被接受，然后转化成为汉式理论，再去影响中华帝国圈的其他文明。玄奘恢复佛教教义纯正的企图根本不可能得逞，也注定了他的悲剧。

他或许不明白，一个宗教，或者一种文化，并没有所谓的纯正一说，当它们飘到哪里，就开始在哪里生根发芽，产生出独特性。而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恰好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最为开放，也最为自信的朝代，它的人民既不受制于充满了天人崇拜的汉代经学，也不同于宋明以后束缚人类思想的理学，而是有充分的空间接受新的事物，发展自己的观点。唐人的天马行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学，也为社会的发展打开了足够的缺口。从魏晋开始，玄学和佛教注入的思辨精神，到了唐代起到了催化作用，变得百花齐放，而统一之后的稳定又为文人们提供了生存的便利，不再担心会战死或者饿死，他们要么做官，要么发展自己的兴趣。同时，北魏时期建立的一系列政教分离的制度，又保证了三教可以相对和平地共处、共同发展。

唐初由于社会没有恢复，百花齐放还不明显，到了盛唐时期，已经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信奉儒教、道教、佛教，也可以将自己融入自然，对于经商感兴趣的人开始发财，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几大发明：印刷、指南针、火药也开始纷纷出现。

从思想开放的角度看，唐代之所以创造出这绚烂的一切，和不强调意识形态有着极大的联系，这个朝代也最像现代社会模式，或者说，站在了现代社会的边缘。到了宋代，整个社会生活仍然带着唐代留下的底

子，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唐代末年出现的意识形态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在宋人的头上，并产生出了下一次神权政治的重建，让唐代的现代萌芽没有成为现实，而是坠落回了旧的轨道之中。

作为空壳的儒教

我们常常感慨现在的学生太累，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需要经过十二年的学习，加上大学四年，就是十六年的时光，然后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官僚系统。那么，在科举制度刚刚实行不久的唐代，一个学生要完成当时的各门学科，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呢？

答案出人意料：二十年半。[104]

唐朝的教材，是唐太宗时期制定的《五经正义》，以及其他的儒教经典。那时最高的学问叫“通五经”，五经皆通，就是最高级的文人。

学生从《孝经》和《论语》学起，每一本书学习一年。这两门课属于学前班教材，学通之后，才能继续学习小学，当时叫作“小经”。

小经的教材包括四部，分别是《尚书》《公羊传》《谷梁传》《易经》。前三本书每一本学习一年半，《易经》则要学习两年，一共是六年半。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学习的课程是“中经”。

中经的教材包括《诗经》《周礼》《仪礼》这三本书。三本书学习的时间是各两年，加起来是六年。六年后，中学毕业，升入大学。大学学习的课程叫“大经”。

大经的教材只有两本书，分别是《礼记》和《左氏传》。这两本书各学习三年，一共六年。

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年半时光。五经通彻后，参加中央政府组织的考试，也就是科考。录取后授予的就是“明经”出身了。这个出身，就是进入官僚系统的通行证，虽然暂时还是待业，但过上一两年，或者几年，皇帝就会授予他职位。

当然，人的天资有别，不见得一定要学通所有的经典。于是，唐朝又设立了层次低一些的考试，可以通两经，也可以通三经，当然前途也比通五经要差。

如果仅仅看到这里，人们会以为，唐朝的科举已经开始束缚人的思想，要求人们花二十年时光背十一本书，当人们把这些书背下来，也就失去了创造力，只适合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当一个老官僚了。一个人很有智慧，却不想背书，难道就被排除在政权之外？

且慢，这些人照样有前途，唐代的科举制度留下了足够的后门，这个后门叫“进士科”。进士科与前面的明经科不同，对儒经的要求放得很低。它只要求参加考试的人写诗、写赋，或者写策文回答实际的政治问题。同时，再从一部大经中选取一些句子，贴上其中的几句，要求考生填空，只要填对了，就过了。

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文采，又对社会实事有独特的见解，只要参加这个考试，就可以被授予“进士”出身，其受到的待遇不仅不低于“明经”出身，反而还要高一些。之所以高一些，是因为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皇帝发现，进士出身的人更加干练，能做事，反而比那些明经出身的学究更有价值。许多人甚至在考了明经科之后，还要再去考进士科，因为进士科更加有利于仕途。

除了明经、进士这两大学位之外，唐朝还有其他的学位，供那些有专长的人考取。比如秀才科、明法科、书学科、算学科，分别为皇帝提供文学、法律、书法和数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后来又设立了史科、开元礼等，提供史学和礼学人才。

到了后期，由于明经、进士考科通过的人太多，人们从录取到授官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吏部又组织了一些二次考核，比如地位崇高的“博学鸿词科”，就专门考人的博学和文采，考试内容是诗、赋、论各一篇。唐顺宗时期有一个短暂的改革集团，其中著名人物包括了刘禹锡和柳宗元，这两人都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通过了进士科考试，后来又分别通过了博学鸿词科考试，进入了仕途。[105]而当时的另一位大家韩愈则没有这么好的命，他考了四次进士才考上，参加博学鸿词科又考了三次，却全部落榜[106]，考试的艰难催生了韩愈对于唐代多元制度的不

满，开始谋求回归儒教，开启了宋儒的先河。

唐代通过这样一种多元化的考试机制，提供了多条路径接近中央政府，避免了人才的单一化。

当科目如此众多时，儒教的地位就下降了。

唐朝之所以仍然把儒教经典当作统治的基础，从很大程度上说是历史原因。唐朝继承了隋朝制度，隋朝继承了北周的制度，而北周继承了北魏的制度，北魏建立制度时，认为佛教和道教都无法取代儒教对于社会的管理功能，虽然在皇帝的信仰上已经多元化了，但在社会组织上，仍然采用了儒教的一套。

当北魏制度传递到隋代后，又加入了科举制，也就是用儒教经典来测试人才的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汉代的翻版，汉代虽然没有明确的科举，但仍然利用儒教经典选拔人才。

到了唐代，皇帝意识到，儒教可以维系政治结构，但仅仅在儒教内部，很难产生足够的治国人才，于是，选拔的标准多样化了。

这时，儒教反而被边缘化了。需要背二十年书的明经科在唐代并不受欢迎，人们越来越发现，通过明经科进入仕途并不受重视，反而是通过进士科进入仕途能当大官，这个闸门一开，儒教经典更少人问津。

唐高宗时期开始，进士科基本上不再读古文的儒经，而是阅读当代人的时论，并比拼诗词歌赋，用这些现代的知识取代了古代的死书。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人们对于现世的关注超过了古代，也造就了唐诗的发达。

中国的诗歌在《诗经》中就有发展，到了屈原时期告一段落。从汉代开始，人们写诗就在古代风格中打转，多少人仿过《离骚》，又有多少人仿过《诗经》，却很少有人敢于用自己的语言来写诗。汉代的汉赋更是空洞无味，充满了各种古典的词语，但大部分内容都是歌功颂德，即便有一点不是歌功颂德的，也隐藏在华丽的辞藻中让人看不出来。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学会说自己的话，但从体例上，当时的诗歌仍然过于简单。只有到了唐代，由于皇帝的科考都重视

现代，不重视古代，鼓励了人们抒发自己的感情，产生了众多朗朗上口的名篇。

但唐朝的皇帝还不以当代文字入考题为满足，他们还要将一些非儒教的学问加入进去。唐高宗、玄宗时期，都曾经把《老子》加入到考试当中，而唐玄宗时期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科目——“道举”科，考试的书目是《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这是道教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享受的最高待遇。比如，唐肃宗、代宗时期的宰相元载就是道举出身的。他擅长道家学问，曾经参加过其他科目的考试但总考不上，这时，恰好唐玄宗设立了道举，他一考就考上了。[107]

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儒教无法做出足够的调整来适应，在唐朝的存续期内，儒教虽然表面上看是统治宗教，实际上却已经被边缘化了。

唐代的儒教就这样处于蛰伏状态，直到中晚唐时期才悄然恢复。而佛教和道教却处于强势地位，共同构成了一幕多元文化的大合唱。

表6　唐代的学校制度[108]

隶属	名称	人数	入学资格
中央学校共六种，隶属于国子监	国子学	300	文武三品以上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
	太学	500	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
	四门学	1300	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之子，共500人
			庶人之俊异者，共800人
	律学	50	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
	书学	30	
	算学	30	
特殊机构学校共两种	弘文馆，隶属于门下省	30	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
	崇文馆，隶属于东宫	20	
地方学校，隶属州县	京都	80	由州县长官决定，长史主持
	大都督、中都督	60	

	府、上州	
	下都督府、中州、京县	50
	下州、上县	40
	中县、中下县	35
	下县	20

表7　唐代学校学习儒教经典的要求[109]

科目	内　　容	学习时间
通二经	大经、小经各一，或者中经二	《孝经》《论语》各学习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学习一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学习两年，《礼记》《左氏传》各三年。共二十年半
通三经	大经、中经、小经各一	
通五经	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	
书法	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	石经三体学习三年，《说文》二年，《字林》一年。共六年
算学	《孙子》《五曹》《九章》《海岛》《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术》《缉古》《记遗》《三等数》	《孙子》《五曹》共一年，《九章》《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记遗》《三等数》兼习。共十四年

表8　唐代科举考试内容[110]

科　　目	内　　容	考取标准
进士	时务策五道，以一部大经为题的帖文若干	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两者都算及第
秀才	方略策五道	根据文理打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这四等为及第
明经	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	根据文理打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这四等为及第
开元礼	大义百条、策三道	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散、试官员参加考试能够及第的，录为正式官员
（春秋）三传	《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传》《谷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	文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及第。及第后，没有出身的视同五经及第，有出身和有资历的官员，视同学究一经
史科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	文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的，没有出身的视同五经、三传，有出身和有资历的官员，视为学究一经；三史皆通，给予奖励
明法	试律七条、令三条	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
书学	先口试通过，再笔试《说文》《字林》二十条	通十八条为及第
算学	录大文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通过第一关。再考《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及第	

科目	内容	考取标准
	考《缀术》《缉古》，录大义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通过第一关。《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及第	
童子	十岁以下，以五经和《孝经》《论语》为题，背诵其中文章十篇	通一经和《孝经》《论语》的，予官；七书皆通，予出身
弘文、崇文馆生	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	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二，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及第。

本土化佛教的兴盛

在玄奘孜孜以求寻找佛经真义时，中国的佛教徒们却已经抛弃了印度过于烦琐的教义，发展出更加简洁的理论，也更便于普通信徒理解。

这套教义的根本点和我们现在的汉地佛教已经很相似：

第一，世间万物都是苦，要想摆脱这种苦难，必须理解世间万物都是“空”的，理解了“空”，就可以悟道成佛。作为对比，印度佛教普遍认同万物皆空，但是到底佛法是不是空的，却有很大争议。汉地佛教根本就没有思辨到要考虑“佛法是不是空”这样的问题，一句“万物皆空”就将一切争论都掩盖了。

第二，人们修行不再是为了修解脱道，世界上只有一种大法，修的是“佛”，即菩提道。所有的人都有佛性，修道就是打开佛性的过程。印度佛教则认为有的人修不成佛，汉地佛教则给了所有人以希望。

第三，打开佛性可以是一种顿悟，只要悟了，就直通佛性。印度佛教是分等级的，需要用很多辈子去逐渐升级，最后达到佛性。

汉地佛教基本上都是在这三点共识之上发挥，这三条共识很符合中

国人的观念。玄奘想恢复印度佛教烦琐复杂的教义，最终却败给了这三点共识。

唐代以来，佛教在三点共识之上又产生了三大宗派，这三大宗派分别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世界的解释不同。现在人们将世界划分成宇宙、星系、太阳、地球、生物圈、人，然后进入人的思想，对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进行剖析。但佛教对世界的解释却是另一种模样，并且每一个宗派都有所区别。

天台宗出现最早，还带着南北朝时期般若学的痕迹。它发源于南朝陈、隋时期的僧人智顗，尊崇的佛经是《大涅槃经》和《法华经》。天台宗对世界的认识隐藏在智顗最流行的理论之中，这个理论叫“一念三千，百界千如”。

要解释这个词，必须从包含一切法的十个“如是”来说，所谓十个如是，指的是人们心中对于世界认识的各个方面。由于佛教不承认客观世界，所以对世界的认识也是从主观出发的：如是性（本性），如是相（表象），如是体（实体），如是力（功能），如是作（活动），如是因（主要条件），如是缘（辅助条件），如是果（直接后果），如是报（间接后果），如是本末究竟等（以上全体过程）。

另外，它将带有自我主体意识的生物分成了十个界，分别是：四圣（佛、菩萨、缘觉、声闻）和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地狱、恶鬼）。

这十个界每一界又有通向其他界的道路，所以十界就成了百界，而每一界都有十如（十如是），这就构成了“百界千如”。百界千如可以理解为整个世界的多层次和多样。

而“一念三千”的“三千”，就是在千如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三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阴世间）构成。一念则是指人的一念之间，即一念之间就可以穿透三千如的厚度，人的一念可以到达任何地方，也可以参透任何机缘。

从这个概念讲，人要理解佛法，是非常迅速，也非常全面的。而天

台宗就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向外扩展，将这种对世界的认识传承下去，形成了庞大的教门，构成了中国本土化的第一个佛教派别。

在武则天之前，天台宗和玄奘建立的法相唯识宗是主流。但在武则天时期，情况出现了变化。天台宗和法相唯识宗的信奉者大都出自士族大家，这些人和李氏一起反对武后，于是，武后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扶持了两个小门派取代了天台宗和法相唯识宗的地位。这两个新的门派是华严宗和禅宗。

华严宗与天台宗一样，也属于“真常”一系，都主张佛性和顿悟。它们的教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来源上却有所不同。天台宗是从般若一支发展而来，加入了真常的教义。而华严宗则是从唯识一系的地论宗发展而来的。

地论宗（属于唯识系）认为，人类要想取得佛性，需要打开第八识阿赖耶识，来找到佛性。而华严宗则把这个观念发展成“法界”的观念，认为佛性就存在于法界，而法界又分成了四个，分别是“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分别对应于现象、规律、现象与规律的关系，现象与现象的作用。从这再发挥开去，继续探讨。

华严宗还把世界上的佛教分成了所谓五教十宗。其中五教，指的是佛教发展的五个阶段，分别是小乘教、大乘始教（主要包括大乘中观和唯识）、大乘终教（主要包括真常，也就是主张一切众生都可成佛的一系）、顿教（主张人们不需要分阶修行，而可以立地成佛的一系）、圆教（专指华严宗，认为它是圆融包容所有内容的一系）。[111]

在汉地佛教三宗之中，历史上最成功的非禅宗莫属。对于印度原始佛教来说，禅宗是最不可理解的一宗。

禅宗和佛教其他支派的关系，就好像是《论语》和五经的关系。最初，儒教是靠五经立论，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来阐明儒教的内容，孔子的最大功劳就是整理了五经，形成了儒家的教

义。而《论语》则只是他的一个语录，在汉代的儒教徒看来，《论语》并不算经典，只是一种日常的小品文而已。但到了宋代，《论语》的地位逐渐超过了五经，人们宁肯看小品文，也不再看五经了。

佛教的经典更是汗牛充栋，人们无论怎么研究也研究不完，可是禅宗竟然把几乎所有的经典都抛弃掉了，把六祖慧能的《坛经》奉为经典。实际上，《坛经》就像《论语》一样，只不过是一本语录摘抄而已，没有统一的观点，只是一种语言的集合体。

至于《坛经》的教义，也是最简单的。它比起其他宗派，更看重“禅定”的作用，也就是打坐进入无我的状态，认为通过禅定，就可以达到佛性。在佛教中，讲究定、慧双修，也就是禅定和经义同时修炼。禅宗却认为，禅定和经义其实是一回事，它们是等同的，通过一种修炼，就可以达到佛性，所谓定慧无二。

到了唐代后期，禅宗发展迅速，之后穿越了历次改朝换代的灾难，一直长盛不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简单性。别的宗需要大量的预备知识才能听懂，可是禅宗的道理一说谁都明白。

由于汉儒制定了一套不需要思维的宗教体系，中国成了一个不擅长逻辑思维的民族，所以，禅宗为了适应这个民族，将思辨的地方尽量去除，将禅宗又退回到如同玄学一样，只依靠少数概念就能运转的体系之中。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的。

向老子认亲的王朝

在对待道教和佛教的关系时，唐代还有一点特殊性。唐代的皇帝一直认为他们是老子的后代，他们在佛道两者之间是有偏向的。在隋代，佛教的地位比道教更高，隋文帝即位不久，就下令人们可以自由出家，并推动佛经的传播，使得民间佛经的数量大幅增加[112]。虽然皇帝并没有冷落道教，但对佛教的关注还是更多一些。

到了唐代，由于和道教有了亲戚关系，皇帝们开始将天平偏向了道教。在唐高祖时期，最先定立的次序竟然是道教最先，其次是儒教，最

后才是佛教[113]。

唐太宗时期，儒教虽然用处不大，不受民间的重视，但仍然是中央帝国的理论基础，排在最优先的位置上。而在道教和佛教的争论上，皇帝仍然偏向了道教，下令在皇家仪式上，男女道士走在僧尼前面，在列名时道士也要在僧人之前[114]。

唐太宗的诏书引起了僧人的大反弹，直到唐太宗以杖责、流放作武器，才击退了僧人的进攻。但整体而言，皇帝虽然崇道，却并没有压制佛教，还鼓励它的发展。玄奘归来后，唐太宗给他建寺翻译佛经，就是很好的证明。

到了唐高宗时期，为了平息僧道矛盾，高宗规定两者不分先后，集会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不偏不倚，算是对太宗政策的纠正。

然而，到了武则天时期，僧道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则天对于唐王室的防范心理，导致她更加偏向于佛教，在她的统治时期，佛教的地位高于道教。

武则天晚年最受困扰的问题是继承人问题，如果让她的儿子继承王位，由于这些儿子姓李，必然改回到李唐王朝世系当中，不再尊奉她的娘家武氏。可如果让她姓武的侄子继承，毕竟又不是亲骨肉。这个矛盾困扰女皇始终，不管哪个宗教都没有提供给她现实的解决方案。最终，政权重新回到了唐王室的手中，道教的地位再次提升。

虽然道教一直受到皇帝的推崇，但是道教在理论上的缺陷，使得它的信奉者永远比不过佛教。

在唐代，道教的神仙体系更加完善，其主神经历了一个从“元始天尊”向“太上老君”转化的过程。

在唐代建国之前，道士们认为世界上的最高主神是元始天尊，所谓元始天尊，指的是世界刚刚从“无”变成“有”的时候就存在的一个神。这个神出现了之后，才有了混沌，从混沌中又产生了阴阳、天地等事物。

[115]太上老君（也就是老子）只不过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之一。

当时道教主要的经文是《三洞经》，这些经文缺乏哲学味儿，却充满了神仙、炼丹等内容。作为道家最基本书籍的《老子》只有五千言，不如《三洞经》的体系庞大，受到重视的程度下降了。

唐代建立后，由于李氏皇帝们认为老子是他们的祖先，情况发生了变化。皇帝们推崇老子和《老子》，道士们要向皇帝靠拢，于是《三洞经》就逐渐被替换成了《老子》，太上老君的地位也超过了元始天尊。

唐玄宗时期，把《老子》列入学官，成了官员们的必读书目。公元743年（天宝二年），还追封老子为皇帝，将道教的地位提升到与儒教相同了。[116]

不过，唐代官方提倡的道教和传统的道教并不完全一致。官方道教强调信仰，不强调仪式，官方规定官员必须读《老子》，却并不要求官员们住道观、开道场，或者吃长生不老药。官员们对于老子的理解，被要求往政治上靠，以求对统治有利，成为统治理论的一部分。

在私下里，道教仍然保持着修炼长生不老的本性，但此时的修炼和魏晋时期的也有了区别。魏晋时期更注重外丹，也就是用金、水银等物质炼出来的仙丹，唐代受佛教的影响，道士们更强调内丹和服气，也就是通过吐纳、调经脉等方法，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的目的。

道教不是一个思维缜密的宗教，道士们喜欢说大话，前言不搭后语，但是道教对于仙山和仙境的想象力却可以促进文学的发展。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就是一位道教信徒，道教对于仙境的描述化成了他诗的一部分，其影响力一直保留到现代。

唐朝思想的现代萌芽

儒教、佛教、道教共同繁荣，是唐代哲学的最大特征。人们常常以为，唐代的哲学不如中国其他时代发达，但实际上，唐代的哲学是活的

和综合性的，也是最开放的。

人们不会被限制在任何一种宗教或者哲学体系之中，而是拥有着选择权，并在不同程度上被三教同时影响。佛教给了唐代思辨的武器，道教给了人们想象力，儒教则保持了一定的社会稳定性。

由于每一种宗教都不是独专的，这保证了社会创造力的丰富。实际上，唐代和宋代是两个最接近现代的朝代，在这两个朝代里，人们过着世俗的生活，受到的束缚最少，也很少谈论那些所谓的天人合一与谶纬，更少受到各种礼法的约束。文化发达，唐诗宋词和散文都达到了高峰。经济也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期，创造力十足。同时，官员们也是现代派的，他们很少谈论礼教，在讨论问题时总是从现实出发，寻找一针见血的解决方法。

宋代之所以现代，主要是唐代风气的余韵，而唐代之所以现代，是因为社会开放造成的多方面发展。

在唐初，由于刚刚经过战乱，人们的文化底蕴不够，还没有显出优势。随后，经济出现了恢复和高速发展，并带动了政治理论和文学的发展。到了盛唐时期，经济已经达到高峰，出现了各种发明，文化则在安史之乱前后，达到了顶峰。虽然安史之乱造成的凋敝使得唐代没有走入现代，但是战乱之后，人们仍然在金融、经济理论领域继续探索。

经过了唐末和五代的变乱之后，宋代继承了唐代的学术繁荣，在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上继续突破，并在科学技术上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除了现代拥有更多的科技产品之外，宋朝人们的生活与现代人几乎没有区别。

唐宋时期的现代性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都是在唐代出现或者进入实用阶段的。除了造纸术发明于东汉之外，火药、印刷（雕版印刷）、指南针都是在唐代进入大规模使用，到了宋代更加完善。特别是雕版印刷，更是由于佛经的需求，成了人们日常所需，而火药则又和道教的炼丹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在政治上，唐宋时期的官僚和现代官僚已经非常接近。我们谈论现代政治时，经常使用的词是“技术官僚”，也就是说，这些官员是政治治理上的技术派，要用理论和模型说话。唐宋时期的官员更接近技术官僚。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汉代、唐宋、明清三个时期的官员向皇帝阐述一个政策，会找什么理由来阐明政策的好处。汉代官员会说：这个政策是符合上天的旨意的，在某一本谶纬书籍当中曾经预言过这样的政策。明清的官员会翻出四书五经，证明这个政策是孔子或者周公推崇的，或者符合儒教经典的。而唐宋时期的官员则会告诉皇帝，这个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养活多少人民，或者带来多少财政收入，他们对于老天爷怎么看，或者孔子怎么说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政策本身。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中国古代社会最现代的，只可惜宋代之后的转向，使得现代性不仅没有保持，反而产生出了另一次保守主义运动，回归了儒教。

第三，唐宋时期已经进化出了较为发达的商业社会，现代的许多商业现象在当时已经出现。最典型的商业现象就是唐代的汇票和宋代的纸币，这些技术最初都产生于民间，而民间之所以产生如此先进的技术，是因为金融需要。海关关税也产生于唐宋时期，对于贸易的重视、对于商人的友善，使得唐宋时期的商业理论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

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唐宋时期政教分离和宗教竞争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够继续下去，那么中国有希望走入现代，而不是回归到千年往复的循环中无法自拔。

回归孔夫子

唐代最大的问题在于财政结构的失败。隋代曾经建立了高效征税机器，但这台机器过于高效，将民间经济迅速抽干，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代建立之后，继承了隋代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但是税收机器却一直无法重建，不管唐太宗想了多少办法，唐朝一直无法征收足够的税收来养

活官僚机构和军队。

到了唐玄宗时期，随着北方战线的开战，由于财政无法养活军队，唐玄宗只好采取了一个极端的做法：设立节度使，将地方的行政权、税权、军事权都交给节度使，让他们自己征税征兵，养活军队。[117]这种做法就把帝国军队变成了节度使的私人军队，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

安史之乱中，唐代的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随后的藩镇割据更是让人扼腕。藩镇们割据一方，不再听从皇帝的号令，也对文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他们为皇帝的软弱无力感到耻辱。许多人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灾难，得出的结论却是：唐代的自由精神破坏了整个帝国的社会结构，使得皇帝丧失了权威。他们认为如果要恢复权威，关键是要恢复儒教的中心地位。到这时，唐朝最自由的阶段过去了，儒教正在悄然重建。

重建儒家精神的代表人物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

韩愈虽然出自官宦之家，但从小是孤儿，家境并不富裕。这种条件之下，他无力接触当时的名人达士，只能闷头读儒家经典。到了长安之后，受当时风气影响，没有参加明经科考试，而是参加进士科考试，结果第四次才中。接下来为了获得官职，又参加吏部组织的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更是三次都不中，也是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才入了围。

这一段经历对韩愈的尊严造成了极大的冒犯，由于进士科和博学鸿词科考的都是诗词歌赋，而不是儒家经典，让他感叹这样的考试毫无用处。他看到了考试的缺点，当时人们写文章时为了表现文采，喜欢使用排比句，堆砌辞藻，韩愈认为这样的文章没有价值。[118]

当然，他的看法是有所夸大的。这就像现代人看待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一样，虽然考试的科目有许多是没有用的，但整体上而言，考试还是能把较为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也要比社会平均水平高一些。考试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却不能保证对每一个人绝对公平。

韩愈跳龙门成功之后，开始谋求改变社会风气。他提出了一种文学上的运动，叫“古文运动”。这个运动在唐代的代表人物是他和柳宗元，一直持续到宋代，代表人物是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这就是唐宋八大家的来历。

所谓古文运动，是希望人们学习夏商周三代和汉代的方法进行写作。这个提倡看起来很荒谬，比如，汉代的汉赋是使用排比句最严重的，辞章华丽却空洞无物，是韩愈讨厌的风气的鼻祖。而韩愈提倡的文字却是简洁有力的，主要是为了表达思想，而不是为了堆砌形容词。这样的提倡实际上和近代的白话文运动如出一辙，自然也不是复古式的。

不过，古文运动又可以和文艺复兴作比较，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在号称复兴古代文化，而其实是创造了一种新型文化。

古文运动本身是一场极具影响力的运动，在唐宋八大家的提倡之下，人们的文章风气大变，变得更加有逻辑性和可读性，也造就了中国文化从韵文时代到散文时代的过渡。

在唐代，仅仅从古文运动的成就来讲，另一位与韩愈同时期的人柳宗元的成就可能更高。韩愈的文章总是试图说理，而说的道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有些迂腐；柳宗元却擅长于写小品文，比如《黔之驴》《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等，简单短小却字字精辟，代表了中国文字的最大魅力。

韩愈提倡古文运动，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意图。他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而是以复古为招牌，希望将佛道等势力排挤出去，重新树立起儒教的权威，建立以儒教为正统的社会。他之所以提倡三代和汉代的文字，就是希望返回到三代和汉代的儒家传统之中。

所以，当人们接受了他的古文运动之后，也就逐渐接受了回归儒教的理念，社会风气也在逐渐从开放变得封闭。

韩愈对于佛道的痛恨反映在他自己的文字之中，他曾经说：释迦牟尼和老子的祸害，比起杨朱和墨子当年要大得多，并自诩虽然不如孟子贤良，却试图以螳臂当车的勇气来阻止佛道对于社会的破坏。[119]

不过，韩愈想恢复的儒家传统并不是汉儒式的。汉儒喜欢谶纬和天人合一，这套理论已经陈旧到不会有人相信了。唐朝人看汉代的谶纬观念，就像我们现在讨论明清时期的封建迷信一样，不可能接受。韩愈必须从儒家经典中选取新的文字，发展出一套新理论，才能完成所谓的回归儒教。这套新理论虽然是反佛道的，却又从佛教道教内部借用了许多东西，只有这样当时的人们才能理解。

他首先提出的是一套“道统”论。由于佛教总是提法统，也就是佛经的流传世系，韩愈为了对抗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按照当时的说法，佛教的佛陀比孔子生活时代更早，为了对抗佛陀，韩愈把儒教的道统追溯到了尧舜时期，认为尧将儒教知识传给了舜，之后的传承世系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而孟子之后，道统中断了。[120]这个说法到了宋儒时期更加发扬光大，人们都乐于在这个谱系上加上对自己有利的人名，来显示自己的学问才是真正的道统。

需要注意的是，从韩愈开始，儒家的道统就把孟子加入进来。孟子在汉代并没有受到儒教学者的重视，他们认为他只是诸子之一。而孟子和孔子的学问也是有区别的，孔子最核心的主张是“礼”，靠礼仪调解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他们固定住。而孟子的核心主张是“仁”，国君只有仁慈地对待百姓，才能获得回报，建立起富强的国家。孔子的“礼”是对所有人的束缚，而孟子的“仁”则更多是对统治者的要求。

孟子地位的提升是逐渐的过程，到唐代早期，官方的儒教课本里还没有孟子的地位，到了韩愈时期，才正式提出要把孟子算作儒教的道统。

除了孟子之外，韩愈对于从《礼记》中提取的两篇文章很有好感，这两篇文章是《大学》和《中庸》。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学》之中提出了一整套的修炼理念。修炼本来是佛教的做法，讲究人们通过修炼，如何接近佛性的过程。而韩愈把它借用过来，认为儒教也是一个逐渐修炼的过程，他正好从《大学》之中发现了这个过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庸》则提出了儒教的最高目标，就是达到不偏不倚的中庸，这一点其实也是和佛教相通的。

针对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则提出了“性三品”的概念，认为人性是有的善，有的恶，有的人可以引导为善，也可以引导为恶，这就把人分成了上中下三品。比如，圣人天生是善的，而大多数人则需要靠教育引导到善的方向上。

这样，汉儒提倡的天人合一和谶纬，就被韩愈替换成了另一套理论，这套理论认为人类的目标不在来生，也不在轮回之外，而是在现世当中，一个人之所以活着，是为了达到中庸的境界，而中庸境界的修炼过程，就是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皇帝缺钱找佛祖

韩愈除了是个理论家之外，也是个实践家。唐宪宗时期，由于皇帝宠信佛教，韩愈大为不满。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唐宪宗派人去凤翔迎佛骨，掀起了又一次崇佛的高峰。道统先生韩愈立刻写了一份《谏迎佛骨表》，极力陈述迎佛骨的荒唐，并提出把佛骨烧掉。[121]这件事惹恼了唐宪宗，皇帝要杀掉他，被人阻止后，把他贬到了潮州。

到这时，佛教的力量仍然足够强大。但事实上，佛教的危机已经不远了。

在韩愈死后二十一年，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终于在全国展开。[122]

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赵归真的道士，向赵归真学习法术。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在道士们的影响下，他对佛教的打压层出不穷。在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偶发性的，直到这一年，武宗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运动。

四月，武宗请管理僧道的祠部先进行了一次调查，查出全国已经有寺庙四千六百座，僧舍（兰若）四万处，和尚尼姑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全国人口占比零点五以上。[123]

到了七月份，皇帝正式下达了灭佛的法令。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在每一个大州留一座寺庙，有的寺庙里有先皇先贤的塑像，都可以移入这座保留的寺庙内。至于小州，则不需保留佛寺。在东西两都，每都保留十座寺庙，每座寺庙十个和尚。

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建造精美的寺庙，可以考虑保留一座，如果没有，也不用保留。两都可以考虑各保留四所，每所三十名僧人。其中上都长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除了皇帝允许保留的几十所寺庙之外，其余的寺庙都予以毁弃，僧尼全部还俗。

除了佛教之外，全国当时还有从中亚传来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的祆教。这两个教派约有三千名僧人。武宗决定连这两个教派也不保留，三千僧人一起转业。

然而，三个月后，新的麻烦又来了。佛教除了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慈善机构。在唐代，佛寺也负责赡养一些老弱病残人士，当佛寺关了门之后，这些人没有着落，大部分贫病交加接近死亡，成了人们批评皇帝的把柄。

唐武宗只得再次下令，命令京城和各州的政府拨出一定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地租来赡养这些人士，将原本属于佛教的慈善变成公办。

唐武宗的灭佛将他列入了“三武一宗”的短名单。但是，与前两个武帝相比，唐武宗的理由却又有不同，与其说他是从政治考虑问题，不如说有更多经济和财政的成分在内。[124]

唐武宗灭佛看中的，不过是三样东西：

一、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里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和尚，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

二、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三、佛寺的铜像。在唐代后期，缺乏铜币一直是经济的巨大困扰。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钱业，垄断的弊端一一出现，既缺乏铜也缺乏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经考虑过对寺庙采取限制的做法，比如，和尚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纳税，而寺院必须用土、石、木头来做塑像，只准在纽扣、饰物上用一点铜来装饰。但这些方法受到了太多的抵制，无法推行。

唐武宗的灭佛彻底解决了问题，可谓硕果累累。根据他的总结报告，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不菲：直接还俗二十六万名僧尼，把他们都变成了两税户，同时，佛寺雇用的十五万名奴婢也被政府抓了出来，变成了两税户。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数千万顷，都是最优质的土地。

至于佛像，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估计，但是，当皇帝下令把佛像铸成铜币，政府的铸币机关竟然发现效率太低，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么多铜像融化。当大量的铜币涌入市场之后，全国的物价立即出现混乱。武宗死后，到了宣宗时期，竟然需要把一部分钱币重新铸成铜像，减少货币投放量。[125]

宣宗恢复佛教后，并没有将相关的土地资源重新划给佛寺，他获得了武宗带来的好处，却避免了灭佛的恶名，可谓一举两得。

只是，这一次灭佛的时间不长，唐武宗第二年就遭到了“报应”：他崇信的道士们请他不停地吃丹药，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皇帝中毒死了。新登基的唐宣宗随即废除了武宗的灭佛措施。那时，由于老皇帝死去，许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寺庙之中，宣宗下令，对于僧人回流的现象，政府不得制止。

即便佛教又有了恢复，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辉煌。曾经红极一时的华严宗衰落了，剩下的只有禅宗熬过了衰落期，到了宋代继续辉煌。

在宋代之前，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柴荣发动了最后一次灭佛行动。公元955年（后周显德二年），周世宗发动了行动，这次灭佛行动毁掉了90%的寺庙，但仍然留下了2694所寺庙、61200名僧人[126]，可见僧

人数目的庞大。

周世宗的灭佛行动并没有表现出残暴，而显得很有秩序，也没有一刀切，每个县都至少可以保留一所寺院。也并非不让人们出家，但是提高了要求，要出家除了得到父母的同意之外，还必须能够背诵足够的经文。

这样要求的目的仍然是经济上的，这时恰好是接近统一、百废待兴之时，国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也需要寺院释放出来的土地。灭佛，是拿到这些资源的最简单办法。

两次灭佛之后，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引领作用彻底终结。虽然佛教仍然是一个社会因素，但是，和尚们已经被政府控制了起来。到了宋代，政府卖和尚的度牒筹钱渡过财政难关已经成了明目张胆的方法。

僧人们也学会了“闷声大发财”，他们变得越来越庸俗，享受着皇帝恩赐的财产，至于思想，早已经不再是重点。

佛道的衰落，导致中国再次回到了儒教主导的轨道上。于是，中央帝国对思想的控制再次成为可能。

注解：

[1]　关于张脩和张鲁的关系，人们有不同的说法。注《三国志》的裴松之认为，张脩和张鲁的父亲张衡应该是一个人。而《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记载：“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而在注中又引《典略》记载：“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后来张鲁杀死张脩，取代了张脩。综合考虑，本书作者认为，张鲁取代张脩更符合逻辑，而张鲁的祖父和父亲是否存在，仍然值得怀疑，很可能是张鲁为了推行五斗米道而伪造的世系。

[2]　张鲁事迹见《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3]　《后汉书·襄楷列传》：“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4]　《太平经》：“天法，阳数一，阴数二。故阳者奇，阴者偶。是故君少而臣多。阳者尊，阴者卑，故二阴当共事一阳，故天数一而地数二也，故当二女共事一男也。”

[5]　《后汉书·皇甫嵩列传》：“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

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万。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6]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引《典略》："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7] 见《晋书·葛洪传》。

[8] 《抱朴子·外篇·自叙》："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

[9] 《抱朴子·内篇·道意》："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惑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

[10] 《晋书·孙恩传》："孙恩字灵修，琅琊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

[11] 《晋书·王羲之传》："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

[12] 《抱朴子·内篇·释滞》："又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13] 见《抱朴子·内篇·论仙》。

[14] 《晋书·葛洪传》："（洪卒）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15] 见《抱朴子·内篇·金丹》。

[16] 到了唐代，又有好事者将九种丹的药方都补全了，写了一本《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各丹的方子繁复到令人哭泣，自然也没有人真的能够炼出来。

[17] 《抱朴子·内篇·明本》："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18] 见《抱朴子·外篇·良规》。

[19] 见《魏书·释老志》。

[20] 本书作者曾遍访印度佛教遗迹，并写出了《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一书，关于佛陀生平、教义的叙述均选自该书。

[21] 这52个等级是：十信（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护法心、戒心、愿心），十行（欢喜行、饶益行、无嗔恨行、无尽行、离痴乱行、善现行、无著行、尊重行、善法行、真实行），十住（初发心住、治地住、修行住、生贵住、具足方便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顶住），十回向

（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不坏回向、等一切佛回向、至一切处回向、无尽功德藏回向、随顺平等善根回向、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如相回向、无缚无著解脱回向、法界无量回向），十地（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等觉，妙觉。

[22] 代表人物为龙树（Nagarjuna）和提婆（Arya Deva），代表著作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中论》和《大智度论》。

[23] 代表人物有弥勒（Maitreya）、无著（Asanga）、世亲（Vasubandhu），代表著作有《解深密经》《入楞伽经》《密严经》《菩萨藏经》《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唯识三十论》等。

[24] 代表著作有《法华经》《华严经》《大般涅槃经》。

[25]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26] 《后汉书·楚王英列传》："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27] 《魏书·释老志》："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28] 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高僧传·义解一·晋洛阳朱士行》。

[29] 见《高僧传·义解二·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

[30] 见《高僧传·义解三·晋庐山释慧远》。

[31] 见《晋书·鸠摩罗什传》。

[32] 见《高僧传·义解四·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

[33] 此日期依据《广弘明集》，此时仍然是梁武帝执政早期。但根据梁武帝崇佛的历史来看，梁武帝最初仍然推崇儒教，在执政中后期开始倒向佛教，所以，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有可能推后二十年到三十年。

[34] 《广弘明集》记载了梁武帝的《舍事李老道法诏》："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

[35] 见《梁书·武帝纪》。

[36] 见《梁书·昭明太子传》。

[37] 《资治通鉴·梁纪十三》："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言于丞相欢，请治之。欢曰：'弼来，我语尔！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

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38] 关于梁武帝舍身的次数，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南史》记载，梁武帝曾经四次舍身，而《梁书》记载的则是三次。本书根据《南史》的记载还原当时的现场。

[39] 见《南史·梁武帝纪》。

[40] 见《晋书》各自本纪。

[41] 《晋书·恭帝纪》：“其后复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

[42] 见《弘明集·后序》。

[43] 《弘明集·卷十二》，共两篇。

[44] 《晋书·何充传》：“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至于贫乏，无所施遗。”

[45] 见《弘明集·卷十二》。

[46] 《弘明集·卷十二》：“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条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异也。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也。”

[47] 见《弘明集·卷五》。

[48] 见《弘明集·卷五》。

[49] 《宋书·夷蛮传》：“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著均善论（《白黑论》）。”

[50] 见《弘明集·卷三》。

[51] 见《弘明集·卷四》。

[52] 《达性论》：“夫两仪既位，帝王参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阴阳分，地以刚柔用，人以仁义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三才同体相须而成者也。”

[53] 《广弘明集·报应问》：“夫鹅之为禽，浮清池咀春草众生蠢动弗之犯也，而庖人执焉鲜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飞虫是甘，而人皆爱之，虽巢幕而不惧。非直鹅燕也，群生万有往往如之，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

[54] 见《南齐书·高逸传》。

[55] 《弘明集·卷六》载有《与顾道士书》和《重与顾道士书》两篇。

[56] 《弘明集·卷七》载有朱广之《谘顾道士夷夏论》。

[57] 见《南齐书·竟陵王传》。

[58] 《南史·范缜传》：“迁尚书左丞，及还，虽亲戚无所遗，唯饷前尚书令王

亮。缜在齐时，与亮同台为郎，旧相友爱。至是亮摈弃在家，缜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权轴，而所怀未满，亦快快，故私相亲结，以矫于时。竟坐亮徙广州。”

[59] 《南史·范缜传》：“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60] 《神灭论》：“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61] 见《弘明集·卷九》。

[62] 《弘明集·卷九》：“《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礼运》云：‘三日斋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见非所见，违经背亲言诚可息。”

[63] 《神灭论》：“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64] 见《南史·梁武帝纪》。

[65] 见《魏书》相关章节。

[66] 见《南史·侯景传》。

[67] 《魏书·世祖纪》：“戊申，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

[68] 《魏书·世祖纪》：“庚戌，诏曰：‘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

[69] 见《魏书·释老志》。

[70] 《魏书·释老志》：“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

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71]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

[72] 见《魏书·太祖纪》。

[73] 《魏书·太宗纪》：“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

[74] 见《魏书·世祖纪》。

[75] 见《广弘明集·卷六》。

[76] 《魏书·释老志》：“初，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

[77] 见《魏书·崔浩传》。

[78] 《魏书·释老志》：“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

[79] 《魏书·释老志》：“高宗践极，下诏曰：‘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

[80] 《魏书·释老志》：“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

[81] 本表摘自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82] 本段争论选自《广弘明集·卷一》。

[83]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

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84] 原文如此。大部分文献记载尹喜是函谷关令。

[85] 原文如此。这里没有纠正原文的计算错误，也无法根据僧人的说法还原佛陀的生卒年月。

[86] 见《后汉书·襄楷列传》。

[87]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祖法师传》：“昔祖平素之日，与（王）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

[88] 见《广弘明集·卷九》。

[89] 《老子化胡经·序说》：“尔时老君告诸国王：汝等心毒，好行杀害，唯食血肉，断众生命。我今为汝说夜叉经，令汝断肉专食麦麨，勿为屠杀，不能断者，以自死肉。胡人佷戾，不识亲疏，唯好贪淫，一无恩义。须发拳鞠，梳洗至难，性既膻腥，体多垢秽，使其修道，烦恼行人。是故普令剔除须发，随汝本俗而衣毡裘。教汝小道，令渐修学，兼持禁戒，稍习慈悲，每月十五日，常须忏悔。”

[90] 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甲》。

[91] 见《广弘明集·卷八》。

[92] 《广弘明集·卷七》：“夫平延寺者。无选道俗罔择亲疏。爱润黎元等无持毁。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勤用蚕以充户课。供政课以报国恩。推令德作三纲。遵耆老为上座。选仁智充执事。求勇略作法师。行十善以伏未宁。示无贪以断偷劫。于是衣寒露养孤生匹鳏夫配寡妇。矜老病免贫穷。赏忠孝之门。代凶逆之党。进清简之士。退谄佞之臣使。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沈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

[93] 《笑道论》和《二教论》全文分别见《广弘明集》卷八和卷九。

[94] 《道门大论》：“三洞者，洞言通也。通玄达妙，其统有三，故云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

[95] 此处总结参考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

[96] 《笑道论》：“老子遂变形。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头为昆山，发为星宿，骨为龙，肉为狩，肠为蛇，腹为海，指为五岳，毛为草木，心为华盖，乃至两肾合为真要父母。”

[97] 见《周书·武帝纪》。

[98] 《广弘明集·卷十》：“朕受天命，宁一区宇。世弘三教，其风逾远，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并废之。然其六经儒教文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且自真佛无像，遥敬表心，佛经广叹，崇建图塔，壮丽修造，致福极多，此实无情，何能恩惠，愚人向信，倾竭珍财，徒为引费，故须除荡。故凡是经像皆毁灭之。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不容，并退还家用崇孝治。朕意如此，诸大德谓理何如？”

[99] 《西游记·第十二回》：“这菩萨近前来，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么？’玄奘闻言，心中大喜，翻身跳下台来，对菩萨起手道：‘老师父，弟子失瞻，多罪。见前的盖众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

教法如何。'菩萨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

[100] 更详细情况见本书第十章。

[101] 那烂陀寺遗址至今犹存，本书作者访问印度时，参观过遗址内的大规模僧舍。每一个建筑内都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周边是一圈如同格子间的僧舍。一千多年前，其中有一间必定属于那位中国来的和尚。

[102] 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

[103] 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

[104] 见《新唐书·选举志》。

[105] 见《旧唐书·刘禹锡传》和《旧唐书·柳宗元传》。

[106] 《韩昌黎集·答崔立之书》："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既已为之，则欲有所成就，书所谓耻过作非者也。因复求举，亦无幸焉，乃复自疑，以为所试与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观之，余亦无甚愧焉。"

[107] 《旧唐书·元载传》："载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家贫，徒步随乡赋，累上不升第。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载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

[108] 材料来自《新唐书·选举志》。

[109] 材料来自《新唐书·选举志》。

[110] 材料来自《新唐书·选举志》。

[111] 十宗指的是：我法俱有宗、法有我无宗、法无去来宗、现通假实宗、俗妄真实宗、诸法但明宗、一切法皆空宗、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绝宗、圆明具德宗。

[112] 《隋书·经籍志》："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113]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天子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114] 《广弘明集·卷二十五》："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官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

[115] 《道教义枢·序》："夫道者，至虚至寂，甚真甚妙，而虚无不通，寂无不应，于是有元始天尊，应气成象，自寂而动，从真起应，出乎混沌之际，窈冥之中，含养元和，化贷阴阳也。……元始天尊生于太无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

其极。天地沦坏，劫数终尽，而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五方净土，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其所度人，皆诸天仙圣，无量上品，有太上老君、天真皇人、五方天地及诸仙官。”

[116] 《旧唐书·玄宗纪》：“（天宝）二年春正月丙辰，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三月壬子，亲祀玄元庙以册尊号。制追尊圣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仍于谯郡本乡置庙。尊咎繇为德明皇帝。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

[117] 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18] 《韩昌黎集·答崔立之书》：“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

[119] 《韩昌黎集·与孟尚书书》：“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某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以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120] 《韩昌黎集·原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121] 《旧唐书·韩愈传》：“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

[122] 见《旧唐书·武宗纪》。

[123] 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户数为四百九十五万户，缺乏口数，但以唐代人口整体趋势判断，应在五千万左右。

[124] 我们可以把唐武宗的诏令当作自白书来看，在诏令中，他详细谈到了对佛教危害的认识：“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见《旧唐书·武宗纪》。

[125] 《新唐书·食货志四》：“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

[126] 《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是岁，诸道供到帐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

第四部
叛逆的害人者：重建神权政治（公元960—公元1506年，宋到明）

第十四章
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公元960—公元1127年）

王安石时代对科举的改造，为明清时代的僵化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唐代的自由式科举被更加严格和充满了限制的课本式科举取代了。

北宋时期，在政治哲学上最大的两派是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者崇尚对社会治理有用的实学，强调经济的作用，却由于过于相信政府的力量，采取了计划经济的方式而宣告失败。复古主义虽然反对实用主义的计划经济，却对经济一窍不通，总是想回归古代的道德统治和礼法制度。

在两派的夹缝里，温和的折中派包括范仲淹、苏轼等人。前者更加温和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后者受到了双方的排挤，无法施展政治抱负。

实用主义终结后，宋代逐渐陷入了道学的陷阱。道学对唐代的反思，也认定唐代的问题在于自由太多了，应该更加控制人们的思想。

宋代也是出版业大发展的时代，皇帝从对出版活动不知所措，到逐渐学会控制，将出版列入了政府的监管之下，为其所用，中国失去了发展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可能性。

公元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决定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进行一次重大改组。

这次改组发生在熙宁变法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两年前，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变法，当年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常平仓，第二年又推出了保甲法。[1]然而，新法的实施却遇到了重大的干扰，当时的大臣们有一多半都在激烈地反对。在王安石党羽和反对派的争论中，双方互相攻击，反对派把支持派贬为“新党”，而支持派则把反对派称为“旧党”。大量的政治资源都浪费在争吵上，让王安石感觉到，除了变法本身，思想的控制才是更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批齐心协力的大臣，改革措施很难推进。而要选拔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才，必须从选拔机制上做文章。

在王安石之前的北宋时期，科举制度是直接继承自唐朝，主要考试科目分为进士科和经学科两类。进士科主要考诗赋，测试人们的语文能力，而经学科则主要考人们对五经的背诵能力。但在王安石看来，随着制度惰性的加强，这两种考试都变了味，无法找到合格的人才。进士科选出来的人只会一些浮艳的词句来获得世俗的欢心，而经学科则只会背诵经文，却并不理解其中的义理。[2]

要想选拔真正的人才，必须做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是政府的科举制度，第二是学校的教育制度。

虽然王安石被称作“新党”党魁，也就是所谓的改革派，但在改革科举制度时，他和清末的康有为采取了同样的路数：回到儒教去找依据，恢复古代的人才选拔标准，也就是儒家标准。

首先是科举制度改革，王安石废除了其他的科目（包括明经），再对进士科进行了改造，废除了对于诗词歌赋的考试，而改为对五经、《论语》、《孟子》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先通五经之中的一部，然后再考《论语》《孟子》，再测试经学的大义十道题，最后写一篇时论和三道时务策，以及五道礼部题目。[3]

这项改革首先在京东（开封以东的河南、江苏、山东、安徽一带）、陕西、河东（黄河以东的山西地区）、河北、京西（开封以西的

河南、湖北地区）五路实施，包括了宋代最核心的领土。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王安石名曰“复古”，却并没有真的返回到汉代的经学传统。汉代经学侧重于背诵经文，对于大意则不大讲究，培养出来的都是书呆子，而王安石想培养的，却是只掌握经义精神，不要求背诵课文的人。这是对汉代经学的颠覆，而不是复古。实际上，宋代已经无法回到汉代精神，所有叫嚷着恢复汉儒的人，都强调不要背诵章句，而是理解儒家的精神。

但是，所谓的儒家精神是什么，每一个党派都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为了垄断对于经义的阐述权，又做出了第二项改革：学校的改革。教书育人是政府交给教师们的光荣职责，绝不允许传授挖政府墙脚的内容。

他一方面大力清除太学里的反对派，把老师都换成自己人；另一方面，则开始编撰新的教材，这些教材的内容可以和改革相配合，起到洗脑的作用。

他选择的三本书是《诗经》《尚书》和《周礼》，对这三本书做了新的注释。其中《周礼》是周代政治制度的汇编，王安石用来比附他的改革措施，而《诗经》和《尚书》也同样被用来为改革造势，强调变法精神。

通过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王安石就控制了人才流动权。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改革措施，后来他虽然下台了，但由官僚系统提升上来的，已经变成了新法的支持者，他们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使得北宋后期的政治被新党所主导。

但这次的改革也带着极大的危险性，先不说它引起了剧烈的党争，从思想改造上，它的影响力早已经穿越了朝代的限制。科举改革凸显了对儒教的推崇，唐代所建立的自由主义选拔方式告一段落，以后的人们再也不可能因为文采而当官，只能依靠研究儒教经典，才能被政权接纳。持有异端思想的人们都被排斥在了官僚系统之外。

更为严重的是，王安石推崇的是不死记硬背，以活学活用为主，但

是他又设定了自己编的基本教科书，从这些教科书中出题，经过一段时间，学生们势必只会这几本教科书的内容了。到了后来，王安石编纂的教科书被废除，反对他、贬低他的人们另外制定了一批教科书使用，这就是朱熹等人推崇和注疏的四书五经。中国历史进入了八股文时期。

明清时期的僵化，实际上是从王安石开始的。王安石为了赢得改革，为新一轮的守旧打下了基础。

在北宋时期，整个社会在两种思潮之间跌宕：实用主义和复古主义。

所谓复古主义，是以欧阳修、司马光、程颐、程颢等人为代表的“道学”。他们既反对激进的社会改革，也反对儒道释合流的自由主义，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古代的大同世界和君臣大义，重新做到政教合一。

所谓实用主义，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而是指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虽然表面上也尊崇复古，但骨子里却是想用更加现代的手段进行改革。比如，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财政式的，经过了严格的计算，以恢复国家财政和军队强盛为直接目的。改革措施中也看不到任何形而上的东西，而是非常有针对性：军队不行，就用保甲法改革加强军队建设；财政不行，就建立一系列的政府插手经济的制度来获得财政收入。

如果和现代社会做一个对比，可以认为：复古主义更接近于法西斯主义，他们试图回到过去的光荣，用古典书籍对人们重新洗脑。而实用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他们摒弃了任何形而上，相信经济救国，而恢复经济的手段，就是政府起到主导作用，引导人们共同致富的同时多交税。

可惜的是，不管是复古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都是集权式的，过于相信政权的力量，也都不惜以斗争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

北宋后期，当改革势在必行时，最先得势的是实用主义。王安石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强力打压复古主义一派。但是，王

安石的社会主义式改革却以失败而告终，留给复古主义足够的把柄。到了南宋时期，复古主义已经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于是社会风气越来越保守，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内敛化。

到了明清，这种保守主义的潮流反映在政治上，则变得越来越僵化，官僚阶层丧失了唐宋时期的活力，成为皇帝的附庸，也导致了中国再也走不出大一统集权模式。

北宋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开放的朝代，既享受了开放的辉煌，又孕育了封闭的种子。

温和的改革，末了的结局

公元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北宋和西夏、辽国的边关有了新警报，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和枢密副使富弼一同申请回到边关去加强军事。[4]皇帝立刻任命范仲淹担任河东、陕西宣抚使，并赐他黄金百两，负责西北边境；富弼担任河北宣抚使，负责北方边境。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两位大臣从中央到地方任职，竟然成了北宋社会思潮的转折点，也是北宋温和改革失败的标志。

在前一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大臣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改革运动，但在一年之后，改革就告失败，两人也离开了中央。这次改革本来是联合改革派（实用主义）与保守派（复古主义）的最后契机，它的失败也标志着两派的分道扬镳，再也不可调和了。

在北宋的大臣中，范仲淹是一个异类。

北宋是一个外患严重的王朝，皇帝对于文臣又采取了极其宽大的政策，不会随便加以迫害，所以，大臣们大都表现出很强的气节。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不屈服于政治压力，愿意为理想献身，这在其他的朝代都很少见。

但是，北宋的文臣又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结党。在处理内政问题时，势必要大臣们提出针对性的方案，由于人们接受教育的不同，方

案自然也不同。

在政治问题上，最大的两派分别是改革派（实用主义）和保守派（保守主义）。这两派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唐代。

改革派来自于唐代的实务派。唐代由于不重视儒教经学，当皇帝遇到了政治上的实际问题，往往不会考虑“以德服人”等陈词滥调，而是采取直接的措施来处理。如何处理军队的给养和训练？如何处理铜钱不足和铜钱造假？如何处理税收的不足？如何赈灾？这些问题都不是儒教经学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较强的行政技术手段来对待。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几乎每一个唐代的大臣都是实务派，也将这种传统传给了宋代的君臣。

而保守派则来自于唐代安史之乱后产生的古文运动。实务派并没有将政权问题解决好，比如，唐玄宗试图解决军队的后勤问题，引入了节度使制度，这是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却并没有把后果完全计算到，反而引起了安史之乱。这时，一群学者在反思问题时，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和社会丢掉了信仰，才引起了巨大的变乱。他们发起的古文运动表面上只是一场文化革命，但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保守运动，希望通过返回汉代和三代的儒教传统，来恢复中国的强盛。这一支的代表人物是韩愈和柳宗元，而到了宋代，则被欧阳修等人继承了下来。

于是，宋代就成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派争议的战场。

在战场上，改革派在实务上取得了优势，而保守派却在文化上取得了优势。宋代最著名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以及描写唐代和五代的《新唐书》《新五代史》[5]，都是在保守主义传统下形成的。改革派擅长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保守派却取得了道义上的优势。

在两派斗争之时，有一个人却超乎于党派之上，他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从小是孤儿，上学的经历特别曲折。他的学识是以儒教传统为底子的，学的是六经，特别是对易学很擅长。这让他成了保守派可以接纳的对象。

范仲淹更让人们佩服的是，他有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进入官场后，

不肯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在面对皇帝时也屡次秉笔直言，得罪了皇帝和权贵而数次被贬官，又数次崛起。

他之所以能数次崛起，和他的能力分不开。从能力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改革派，得到了所有务实派的认同。他曾经在对西夏的战场上立过战功，也曾经在担任地方官时，赈济百姓、兴修水利，都取得过良好的效果，受人爱戴。

范仲淹是一个能够团结两派的人，如果要控制北宋时期的党争，必须有这样一个团结派的人出头，才能形成联合的局面。

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宋朝刚刚经历过西夏危机。从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开始，西夏人的领袖李元昊称帝，与宋朝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6]在冲突中，李元昊几乎一年一次大捷，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共屠戮了几万人。最后，正是在前线担任守备的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人建立起了一条较为牢固的防线，才将西夏人的扩张控制住。直到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两方才达成协议，由宋朝每年送给西夏岁赐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

就在宋朝与西夏发生战争的同时，原本与宋朝维持和平的辽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宋仁宗再次屈服，派富弼与辽国签订了新的合约，将送给辽国的岁贡每年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7]

与西夏和辽的扩张相比，更让人头疼的是北宋政府自己的问题。政府内部已经是冗官充斥，军队规模庞大但是实力羸弱，财政吃紧。战争的爆发更是直接让朝廷不得不大幅度提高税收，影响了民间经济。

西夏和辽的逼迫、内部的重重问题，终于让皇帝要发愤图强进行改革。改革派和保守派也都能接受的范仲淹成了改革的设计师。这次改革，就成了关乎宋朝命运的大事。

范仲淹的改革基本上是务实的。在中国历史上，历次改革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以增加政府财政、提倡政府加强经济管控为目的的改革；而第二类则属于放松政府控制、搞活民间为目的的改革。

第一类改革往往是左派采取的方法，而右派却坚决抵制。第二类改

革往往能得到右派的赞同，但是，实施起来会同时触动两派的利益，所受到的阻力会更大。

范仲淹的改革属于后者，他提出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了十条内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8]

而这十条内容针对的是当时的四种现象：一是养兵贵，二是冗官，三是行政效率低下，四是百姓税重。[9]

改革的整体思路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下，进行一次理顺式的调整，将原来制度中已经乱套的地方重新调整好。这是一次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改革，与后来王安石的激进式改革形成了对比。它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本身的改革，从自我的身上割肉，减少对社会的干预。

如果此次改革成功，就不需要后来的王安石改革，也就不会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裂。而作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范仲淹的改革应该会得到双方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但庆历新政到底命运又如何呢？

在改革之初，人们对于改革的热情是很高的。然而，当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需要的是依据政策去执行，这时，人们就不干了。

由于新政需要淘汰不合格的官员，取消官员子弟的当官权利，严格考绩制度。这件事情一提出来，人们开始纷纷推脱逃避，不支持他了。[10]

范仲淹为了对付这种推脱，决定理顺官僚制度，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监管兵事和财政，而将其他的权力也交给中书和枢密院这两府，与辅政大臣形成权力上的协调，共同推进改革。

这次，由于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皇帝也不敢支持他，只交给了他刑法权。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他派出了按察使四处出巡，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他的改革终于触发了整

个官僚阶层的反抗。庆历新政失败了。

范仲淹是最后一个改革派和保守派都能够接受的人物，当他的改革失败后，就意味着再也没有人能够联合两派来推动一个事情了。任何一个想做事的人，必须要么投靠这一派，要么投靠那一派，否则就会同时受到两派的牵制。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斗争了。

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

在北宋意识形态分裂史上，有两个人物没有被后来的理学家尊崇为道统，但对理学产生的影响却比其他人都大得多。南宋的朱熹等人喜欢给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脸上贴金，可即便没有二程，理学家仍然可能发掘出其他人来填补二程的地位。但是如果没有王安石、司马光的争斗，就不会有理学产生的环境。

王和司马两人的争斗看上去是因为改革问题，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从北宋创建以来，随着文官的地位提高和稳固，文官之中就产生了一种复古主义的传统。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的混乱让北宋初年的文人开始反思：为什么会产生战乱？他们得到结论是：唐代的自由太多了。

所谓自由太多，一是在意识形态上三教并立，人们的思想是分散的，缺乏合力。二是因为臣下对皇帝的不尊重，北宋太宗就曾经嘲笑过唐德宗。唐德宗时期由于藩镇割据，藩镇不听皇帝的话，皇帝也没有能力去教训藩镇，因为他没有钱，甚至只能朝着藩镇求爷爷告奶奶，请他们出钱。[11]

文人们总结这两点经验，认为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又要人们听从皇帝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重归儒教，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居其位，不要乱了纲常规矩。

北宋初年和中叶，人们撰写历史时都特别注意遵循儒教的这套规律，弘扬那些听话的人，批评那些不听话的人。从欧阳修撰写《新唐书》《新五代史》开始，就把这套原则贯彻到了字里行间。司马光撰写

《资治通鉴》时，更是将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在这种精神之中产生了北宋的保守主义。

北宋保守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是有区别的。现代保守主义包罗万象，从政治到经济无所不包，基本上以主张小政府为主，也就是政府少管事情。而北宋保守主义只是提倡人们要遵从于儒教礼法，而在治理上并不推崇小政府。

保守主义最初也只是一个理念，比如，欧阳修本人虽然提倡儒教礼法，但是在谈到具体的政策时却是实用主义者。北宋前期的大臣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对于政治结构、经济、军事都有涉猎，基本上是通才。比如欧阳修是一代文宗，但是他一生中担任的官职却非常丰富，曾经担任过首都最高行政长官知开封府，也担任过掌管军队的枢密副使，还担任过最高行政官员参知政事。史书称他为军政、民政、财政的通才。[12]

保守主义在这时是没有完全和实用主义分离的。即便到了范仲淹改革失败后，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看上去已经无法共存，但在表现上仍然是联合的。

而剥掉了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温情面纱的，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执。

与欧阳修等人不同，司马光基本上是一个清流官员，他编纂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却对于实务性工作并不够了解。他在修史的过程中，对于任何企图改变先人做法的事情都充满了警惕，任何对于儒教礼法的不尊重，都会引起他极大的愤怒。王安石则正好相反，雄心勃勃的他一心做实务性改革，对于意识形态并不在意，他之所以要改革科举制度，掌控意识形态，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推进改革的手段。

两个人一个采取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另一个采取完全保守主义的作风，就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开始了有名的熙宁变法。皇帝想要变法，并非匆忙推出的，他曾经广泛征求了各位大臣的意见，请他们讨论，看谁能够解决当时最大的问题——财政问题。

在大臣们的反馈中，主要的意见分成了两类，各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代表。

司马光虽然认为问题很大，却提不出具体的措施，希望从长计议。[13]王安石则认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搞活民间经济。[14]

如果仅仅从两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来看，显然王安石的态度更值得推崇。司马光的做法，只不过是在等死。既然宋代的财政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就必须尽快进行改革，拖延不是办法。王安石对待改革的态度，和当初的范仲淹也是一致的，范仲淹也认为改革必须尽快进行，才能带来最小的副作用。

如果王安石改革成功，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保守主义的得势，也就不会有社会思潮的剧烈封闭化。

但是，王安石的改革却出现了一个重大缺陷。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他，许多改革者都会有这个缺陷，这就是：他们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试图以大政府来指导社会，结果不仅指导不成，反而引起了更多的问题。

关于变法的内容并非本书的范围。[15]简单说，王安石想建立一套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框架，以政府插手金融、贸易、运输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发展，结果，官员对经济插手之后，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搅乱了社会经济。

他的变法在某些局部上也有好处，比如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可以解决一定的缴税公平问题和经济外部性问题。但作为一个整体，是副作用远大于好处。到了他下台后，新法大部分都被废除了。

不过，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遗产反而不是变法本身，而是变法带来的党争。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改变了人才录取标准，并直接打击那些反对他的人。但新上台的这些人往往都是投机分子，他们之所以支持改革，是因为想上台而已。

改革失败后，司马光等人上台，王安石下台。由于此时已经没有了

容忍的风气，于是又开始了另一轮斗争，改革派下台，保守主义者上台。事实证明，保守主义者并不比改革派好，甚至更糟糕，他们在打击政敌上同样不遗余力，同时还缺乏改变现状的精神。北宋的政治更加混乱，直到另一次反转。

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皇帝再次找到了改革派，把保守主义者打入禁区。双方的斗争最后耗尽了北宋王朝的元气，不仅无力解决经济问题，就在精神上也趋于分裂，无法抵抗更加凶猛的女真人了。

受排挤的苏轼

在实用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另外有一类人，他们不肯依附于其中的任何一派，试图保持独立性和判断力，结果遭到了双方的打击。这一派人的代表叫苏轼。

苏轼的年纪比司马光和王安石小十几岁[16]，却继承了更上一代的范仲淹的传统。他一方面不避讳改革，而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急功近利的聚敛式改革。在改革思路上，他也继承了范仲淹的想法，并不把为政府征税当作第一位，而是主张政府应该节用，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于王安石改革中以敛财为目的的内容，他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改革中有助于理顺经济关系的部分，他又是支持的。

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本来应该是一个人所持的最正确立场，却在当时遭到了两派的反对。人们对于苏轼的文采大都非常赞赏，但他在仕途上却屡遭排挤，在中央闲差和地方小官之间打转。

苏轼在哲学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继承了唐代文人的传统，对儒教并没有特殊的偏好，反而对于佛教和道教充满了向往，希望能够将儒道释综合起来，形成一种宽容的学术氛围。由于力主宽容，他对于道、儒的意见也更加接近于两者的哲学本意。

这一点，从他的学习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他最初学习儒教的经典和史书，对贾谊、陆贽等人非常佩服。到后来读到了《庄子》，感慨地说：我以前心里面有见解，但是说不出来，现在读到这本书，就见到了

我的心里话。[17]

对于道，他并不认同道教所编造的各种神仙体系，而是回归到了道家的原点：无为而治，也就是汉代提倡的黄老之术。

他对于道家的看法，集中反映在碑文《上清储祥宫碑》里。上清宫建于宋太宗时期，在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失火，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开始重建。最初使用的是皇帝拨款，后来太皇太后曹氏认为不应该动用国家的钱，“民不可劳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钱不可发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变卖自己的财产，才建立起来。苏轼对太皇太后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既尊重信仰又不连累社会的好办法，并阐述了对于道教的看法。他认为黄老之术才是道家的本源，而所谓的方士之术只不过是道家的末流而已。他希望皇帝能够接纳汉代文景时期的经验，采取黄老之术，清心省事，薄敛缓欲，重新回到不用兵而天下大治的境界。[18]

对于佛教，他也没有按照印度佛教的本意去理解，而是认为佛教是一种与儒教相通的信仰，只不过儒教管世间，而佛教管出世，至于出世还是入世，两者的法门都是一样的。[19]

在打通了儒道释之后，苏轼对于政治的看法也相当清楚，就是：收缩官僚权力，简化政治流程，交给民间自己处理事务的权利。这种做法不管是王安石的新党，还是司马光的旧党，以及当时已经悄然兴起的道学家们都无法接受，所以，他注定只是个边缘人物。

苏轼的一生，就反映了他的边缘化。最初，他以文采受到了欧阳修等人的赞赏，似乎前途远大。但他还没有熬到当高官的时候，就碰上了王安石改革。

由于反对新法的急功近利倾向，得罪了王安石，他只好出京到地方任职，历任杭州通判、密州（现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在地方任职时，他身体力行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抵消新法带来的危害，仿佛是专门在证明王安石变法的坏处，结果得罪了新党。新党借助他给皇帝上表里面的牢骚话，再加上几首诗，以文字狱给他定罪，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北宋没有杀大臣的传统，但这一次，新党差点

将他置于死地，可见新党对于苏轼的敌视。

到了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告终，上台的是司马光的旧党。最初，司马光以为苏轼是自己人，将他召回中央担任官职。但此时苏轼又主张王安石变法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不应该都废除，应该就事论事，将好的保留。这种意见又给他带来了一大堆敌人。他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为了做事而做事，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用信仰代替了实际的做事，看问题也不是看是否对社会有利，而是看它是否符合信仰。

苏轼最终发现无法和他们共事，只好再次要求外调。这一次，他到杭州担任知州。在杭州，他仿佛是为了专门证明王安石变法还是有好的地方，开始兴修水利（王安石变法有“农田水利法”），疏浚西湖，将西湖的淤泥堆积起来成了苏堤。

之后，他在地方职务上来回漂泊，担任过颍州（现安徽阜阳）、扬州、定州的知州。这时宋哲宗亲政，再次起用新党，苏轼又成了新党的眼中钉，被贬到了惠阳（现广东惠州），之后又被贬到了海南岛。宋徽宗大赦时，苏轼得以北归，却在北归的途中死去。

这个宋代最有文采，也有能力的人几乎在一辈子漂泊中死去。他本人对生活采取了一种豁达的态度，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既不表现出得意，也不表现出失意，只是当作一种生活状态接受下来。虽然他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出最大的成就，但他的遭遇仍然说明了宋代的问题：在一个强调主义的环境中，任何试图撇开主义做实事的人都不会被容忍。苏轼之后，能够生存的，也只有过于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以及不着边际的复古主义者这两种人了。

实用主义的终结和余韵

苏轼的遭遇说明了夹杂在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中间派不可能有出路，北宋晚期的政治只能在这两大派别之间颠簸。

在北宋后期，由于皇帝越来越缺钱，实用主义始终比复古主义领先

一步，也更受宠。但也正因为实用主义更加受宠，随着北宋的灭亡，它也就成了替罪羊，受到了人们的鄙视，无形之间让复古主义者得了利，这也是为什么南宋成了道学先生乐园的原因。

可以说，实用主义的失败促成了复古主义的兴盛，而复古主义的兴盛，又锁死了中国摆脱封闭的最后机会。

在王安石之后，两派的斗争继续。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死后，九岁的宋哲宗当上了皇帝，实际掌权的是宣仁太后（英宗的皇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司马光、范纯仁等反对变法的“旧党”重新上台，废除了新法。

公元1093年（元祐八年），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后，召回了新党的章惇等人，恢复了新政，打击旧党。

七年后，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此时掌握政局的是向太后（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再次召回了一批被章惇等新党徒贬斥的旧党成员。

向太后执政只有几个月就死去了（公元1101年正月，建中靖国元年），宋徽宗得到了亲政的机会。他立即着手制定政策，大肆打击旧党。就连新党的章惇、曾布也因为曾经反对宋徽宗继位而受到了打压。一年后，羽翼丰满的宋徽宗推出了党籍碑，在党籍碑上刻了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宣布对这些人永不任用。两年后又增加到了三百零九人，这些人中除了真的旧党，也包括苏轼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还包括反对皇帝继位的章惇等人。碑文由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书写，发往全国进行摹刻，形成警示作用。

而蔡京，则是实用主义者在北宋的最后代表，就是他彻底毁灭了实用主义者的名声，使得这个派别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们往往把蔡京当作奸臣的代表，但实际上，蔡京是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在他上任后，北宋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政治体系。而且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已经不再是司马光式的复古主义者能够解决的了，必须依靠实务派来找钱。蔡京作为宰相，自然要把执政的重头戏放在这上面，因此也成了背锅的人。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不管是王安石的改革还是蔡京的改革都很现

代。直到20世纪，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架构，才有了充分的信用工具来扩张政府财政。但是在宋代，王、蔡两人的改革已经将这些手段都用出来了。

王安石主要利用政府直接插手经济，而蔡京则主要利用金融工具。他使用的金融工具主要是纸币和盐钞，盐钞实际上相当于一种以盐为抵押品的纸币。这些信用工具出现在宋代，绝对是革命性的。

但是，只有到了现代，人们才会明白，当政府手中掌握了操控经济的手段，它就必然使用这些手段来为自己牟利。在西方，人们在把这些手段交给政府时，也会通过立法制定一系列的限制，防止政府滥用。但在宋代，防止政府滥用的立法不会也不可能出现，所以政府在缺钱时必然将其用过了头。

当蔡京发现盐钞的发行可以为政府筹集款项，或者印钞票可以解决政府财政问题时，必然会发行过量的盐钞和纸币，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扰乱了社会经济。

北宋末年的社会紊乱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北宋无力对抗金兵的入侵，灭亡了。北宋的灭亡给了复古派足够的口实，仿佛这一切都是新党造成的。但即使没有新党，财政不足、官僚系统扩张等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人去解决。新党虽然失败，但他们还是敢于面对问题，去提出解决思路的。更糟糕的旧党却连问题的存在都不承认，或者认为，依靠回归古代的儒教传统，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蔡京已经彻底败坏了实用主义的名声，到了南宋时期，实用主义的一支已经萎缩到了微不足道，让位给了高谈阔论的复古主义者。

但在浙江南部地区的永嘉（属于温州）和永康（属于金华），却产生了实用主义的一个小小分支——事功主义。这个分支的代表人物是陈亮和叶适。

此时的实用主义与北宋的实用主义不同，北宋的实用主义是与内部治理（特别是经济事务）相结合的，不管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蔡京，都是以改革和解决政府治理、财政问题为导向。而到了南宋，实用主义

却是和军事相结合的，所有的实用主义几乎都是主战派，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收复中原，必须做出改变，改善政治治理，加强军事。

陈亮在上奏皇帝的书信中把那些复古主义的道学家骂得一塌糊涂，说他们都是些不知痛痒的人，当皇帝都被抓走两个之后，还在那儿低头拱手谈性命之学。[20]他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声称自己墨翟、杨朱、子贡、子思都采纳，不在乎是儒是墨[21]。

陈亮一生以教学为主，参与政治的机会不多。而叶适则是一个政治的参与者。在南宋韩侂胄北伐中，叶适是个积极的推动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最终北伐失败，韩侂胄被皇帝杀掉，叶适也成为替罪羊下野。[22]

作为实用主义者，叶适认为儒教经典也不必尽信，对于道学提出的道统，他也认为荒谬，而是希望综合一切有用的学问，不要故步自封在小圈子里。

但是，不管是陈亮还是叶适都已经无法撼动南宋道学的地位，虽然中间有曲折，但是道学经过了北宋的奠基，到了南宋时期已经枝繁叶茂，绑架了中国未来数百年的思想潮流。

从出版业看政府控制

北宋时期，还是另一个传统的开始：对出版业的控制。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个近千年前的出版控制如何产生，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公元1055年（宋仁宗至和二年），欧阳修给皇帝写了一封奏章。奏章中谈到了对于出版控制的问题。他说，最近首都开封（汴京）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宋文》。这本书开头第一篇文章是新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写的，名叫《让官表》。因为这篇文章，欧阳修认为这本书应该禁止，他建议政府到印刷厂将书的雕版烧掉，并严格执法。以后，如果再有私自不经政府核准就印书卖书的，都要狠狠地打击，严厉地惩罚，鼓励告发，给予奖励。[23]

欧阳修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居宋六家之首。他本人的大名就得益于宋代的印刷革命，使得文章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富弼的文章会引起他的重视，不惜焚书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谈起。

在欧阳修写这封信的十七年前，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和宋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西夏多次打败宋军，到最后，北宋不得不与西夏议和，支付岁币。同时辽国也要求北宋增加岁币，否则就进行战争。

由于有了纠纷，宋朝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辽国谈判，改定条约。

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出使辽国是非常有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期辽国的胃口有多大，就算能活着回来，也会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落得一身骂名。此时是宰相吕夷简掌权，他与富弼不和，就趁这个机会推荐富弼去送死。

谁知，富弼不仅没有死，反而不辱使命，以较小的代价与辽国签订了和约，每年增加岁贡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富弼回到开封后，皇帝因为他出使的功劳，要给他加官，授予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富弼连忙推辞。后来又要授予他枢密副使，富弼只好上表说：契丹已经结盟，大家就认为没有事了，但未来万一契丹毁约，我就算死了也是罪过。陛下就不要再把这当喜事给我升官了（这是侮辱不是光荣），而是应该卧薪尝胆，把国家搞好。[24]

正因为有这么多耻辱的事情做铺垫，所以，富弼的《让官表》就如宋朝的一道伤疤，提起这篇文字来不得不提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

而恰好，公元1055年，富弼刚被皇帝授予宰相的职位，坊间的人们消息灵通，立即将富弼当作活广告，把他的文章放在了出版物的第一篇。

这时，政府发现原来出版真是件令人烦恼的破事儿。

在宋代之前，统治者对于书籍的苦恼没有这么多。秦始皇嫌书太多，只需一烧了之，就防止了信息的传播。那时人们还使用竹简和手工抄书，成本昂贵，效率低下，所以，书籍的传播功能是非常弱的。

到了唐代，虽然已经有了雕版印刷，但出版物在民间的传播力度仍然不够。由于采用雕版技术，也就是在整块木板上将文字和图画一次性雕刻上去，雕工的成本很高，如果印数不够的话，就无法回本。唐代的印刷局限在文人圈子里，或者佛经等可以大批量销售的领域。

唐代的手工业作坊以官办为主，也限制了经济的繁荣程度。直到唐末，雕版印刷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只是这时皇朝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宋代由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呈现出极度的繁荣，随着造纸、雕版技术更加规模化，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传媒革命开始爆发。

这次革命在政府和私人两个层面上都有体现。

政府利用雕版印刷了大量经学、史籍，形成了官方的话语权。另外，自从有了雕版之后，方便了钞票的产生。宋代的钞票叫作交子，由于交子的印刷量大，要求高，政府采用了铜板雕刻技术，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来生产，避免人们的伪造。

除了政府层面之外，大量的私人书商更成了革命的主角，他们除了仍然印刷唐代的佛经之外，还印刷医书、历书、占卜书等，这些书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受教育层面的扩大，文学书籍也在民间变得有利可图，使得文化的传播呈现爆炸的局面。原来，劳动人民只能靠口口相传来解决文化需求，现在即便普通人也可以拿着书籍来获得知识。比如，主张禁书的欧阳修就受益于这场革命，在他小时候，曾经从别人家的废书筐中找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脑筋随之开窍，继承韩愈的传统发扬古文，终成大家。[25]

在宋代，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许多有名的文化中心。除了首都开封和行在（临时首都）临安（杭州）之外，两浙路、福建路、成都府也都是有名的印刷中心。

在首都，政府的势力太大，所以还以官方出版为中心。而在两浙，私人资本发达，则已经成了私人的天下，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把一部分书放到私人工厂里去出版。

而成都、福建由于地处遥远，更是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里的书籍质量并不高，与宫廷本相比显得有些粗制滥造。但它们价格便宜，很适合民间普及，于是，在民间需求的刺激下，很快遍布全国。

除了普通书之外，私人书籍还善于发现任何的机会，比如，文人科考时做的小抄也是从这时开始发展，这种书必须足够小，字体如同苍蝇腿。但只要有需求，没有人办不到。

在出版革命的刺激之下，人们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然而就在这时，政府的担心却越来越重，即便是欧阳修这样的开明人士，也开始担心书籍的力量了。

政府之所以担心书籍的力量，是因为它能够将足够的知识迅速地进行传播。仍然回到开头的例子，从富弼的出使算起不过只有十三年，他的文章就已经进入了全国性的普及读物。而由文章延伸出的对于国家、社会问题讨论，则恐怕更加广泛。

宋代也是一个人人关心社会问题的朝代，即便普通人都能方便地了解到政治、军事的变化。但普通人的了解让政府很没有面子，特别是随着朝代的加长，政府有越来越多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的时候。

为了保全面子，政府决定禁书。不过，禁书总是需要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国家安全。由于宋代与西夏、辽国开战，防止国家机密泄露就成了最好的借口，皇帝的无能和软弱、官场的内斗和争吵，都被想当然地划进了国家机密。

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最早的禁令还被限制在外国人身上。宋真宗时期，就规定边民不准将除了儒家经文之外的书籍带给外国人。到了宋仁宗时期，更是下令不准将大臣们的文集带到北方，以免泄露了国家秘密。

欧阳修的提议，也是借口国家安全问题，认为如果辽国人看到了这些讨论，会对国家不利。

但这只是一个借口，既然这些事情连国内普通大众都知道，仅仅靠禁书，又如何防得住辽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些文集讨论了太多朝野事务，使得有的人面子没地方搁。

更加神奇的人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公元1089年（元祐四年），翰林学士、权吏部尚书苏辙奉命出使辽国，由于宋代的文化水平比辽国高了很多，苏辙在辽国找到了久违的优越感，辽国负责接待的官员也无不对三苏充满了敬佩。

他刚到燕京，就有人告诉他：你老哥苏轼的《眉山集》已经到货很久了，你啥时也出本书让俺瞅瞅？

到了中京，官员们请他吃饭的时候，又有人和他谈论起他老爹苏洵的文字，对于老人家的经历和观点也很了解。

到了辽国皇帝的帐前，又有人问他：据说你成天吃茯苓，俺也挺喜欢那玩意儿的，啥时给俺开个方子呗？原来苏辙写过《服茯苓赋》，那人显然看过这篇文章，才向他乞求茯苓药方。

苏辙在一片奉承中回国，对这些很是受用。在给宋哲宗的札子里，还不忘将这些事情一一列举，充满了炫耀之情。但是，他突然笔锋一转，提议说：为了国家安全，请陛下禁止我国的书籍流入北国。

如何禁止？苏辙提议，最好的禁止方法，就是对本国的出版物进行审查。民间在出版之前，必须先申报给所属的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设置两个官员负责审查[26]。

审查制的出现，已经使得政府在理论上拥有了封杀书籍的能力。

欧阳修、苏辙等官员本是文化阶层的代表，他们却给皇帝出主意封杀出版物，自以为得计，却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欧阳修、苏辙等人替禁书做了大量的铺垫，给皇帝找了很好的借口，手把手告诉皇帝如何操作。一切掌握熟练之后，皇帝开始抡起了禁书的板斧，砍向——教会他禁书的人。

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皇帝下令，把一些人打入了“元祐奸人党”，共一百二十人（后来增加到三百零九人）。把他们名字公之于众，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决心，凡是活着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夺封号，殃及子孙。[27]欧阳修死得早，碑文上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出馊主意的苏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和哥哥苏轼的名字都不幸被列在了碑文里。

立碑两个月之后，皇帝开始禁止元祐党人的学术著作。第二年又特别下令，一定要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皇帝仍然感到不过瘾，又在当年命令全国各地都要刻《元祐奸党碑》，并时时刻刻注意不要让他们的学说得以传播，否则严惩不贷。

此刻，苏辙还没有死去。大概他提议禁书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却没有想到炮火会砸到自己的脑门上。

从这时开始，禁书也就成了皇帝的武器，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

不过，宋代行政效率不高，相对宽容，还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

到了明清两代，随着集权主义达到鼎盛，终于开始对异端大肆屠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和文字狱。到了这时，中国曾经出现过的那次出版革命彻底告终。

不仅是镇压，明清时代的思想控制术也达到了顶峰。皇帝在禁书的同时，会发现出版业也在跟着自己的旗杆转，由于印刷违禁书籍要掉脑袋，出版商开始主动帮助皇帝过滤他不喜欢的内容。而皇帝喜欢的书则立刻大量印刷，铺天盖地。于是，市场的选择渐渐被统治者的口味取代了。

当皇帝把四书五经和朱熹定成入仕的标准之后，大量的应考书籍、辅导书籍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到了明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成为人类摆脱思想束缚的契机，反而被统治者利用起来，将更多的人纳入受奴役的轨道，进行庞大的集体格式化，制造了大批的书呆子和蠢蛋。

在中国人禁书之时，却没有想到会有人弯道超车。

大约在明朝建立八十年后，西方的出版家古登堡也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发明时间比中国人晚，但起到的作用却大得多。

不出所料，古登堡的发明也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出版革命，人们可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图书，开始了知识传播加速的时代。

与中国相同的是，出版革命在西方的统治者中也带来了恐慌，他们纷纷对市场进行干涉，试图禁止不喜欢的内容。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统治者们却无力扼杀这场革命。

与中国的大一统不同，西方存在着许多个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全局，作家和文人总能找到一个他们管不到的角落来印刷书籍。伏尔泰在法国不受欢迎，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诸国欢迎他。马丁·路德的批评被教皇咒骂，却受到了后来成为新教徒的人的欢迎。当亨利排斥胡格诺教徒，荷兰人大喜过望，虚席以待。

更有趣的是，一本书在一个地方被禁止，往往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销量，出版商们反而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更乐于帮助那些异端思想传播。

随着这些反叛的知识阶层崛起，出版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原则，先是被少数人宣扬，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最后，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这个原则。当人心已经慢慢被转变，普遍接受新的原则时，出版革命被固定了下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更可贵的是，当知识引起的好奇心在人世传播，会激励起人们更大的好奇心，向外探索的冲动就在这种好奇心中萌发。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大航海，都与人们好奇心被激发有着直接关系。

在历史上，中西方差距最大的年代不是汉唐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代，而是宋代。在汉朝时期，西方的古罗马帝国也达全盛。唐朝时期西方虽然已经进入黑暗时代，但唐朝由于土地和户籍问题的拖累，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没有摆脱完全的羁绊。

到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才达到巅峰，而西方仍然在中世纪里苦苦挣扎。

只是，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

第十五章
存天理，灭人欲（公元960—公元1200年）

在东汉灭亡九百年后，中国再次发展出一套系统化的、试图囊括一切的学问。这套学问被称为道学，控制了中国接下来一千年的哲学走向。

道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在于首先树立了一个所谓的“宇宙真理”，并通过政权的力量强迫人们都服从于这个宇宙真理，从而格式化了人们的头脑。

人们为了服从宇宙真理，必须舍弃小我，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更大的真理之中，从而舍弃掉了个性，变成了千篇一律的螺丝钉。不幸的是，这个宇宙真理是禁欲式的，充满了社会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的思想，这些思想决定了螺丝钉们的面貌。

从谱系上，道学从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后来的张载、周敦颐，再到程氏兄弟，最后由南宋的朱熹集大成，完成了体系的构造。

宋代的党争也随着道学的发展而出现，经过了两次党争之后，道学最终成了胜利者，在南宋末年成了社会的统治性思想。

南宋时期，在“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争论中脱颖而出的理学终于逐渐成为主流。

为了理解理学都说了什么，和汉代的经学有什么不同，必须首先与西方哲学做一个类比。

在所有的哲学（宗教）体系中，一般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第二，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第三，人应该做什么才能与整个世界合拍？

两汉经学类似于西方的天主教思想，都是一种宗教信仰。两汉经学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第一，世界是由“天”创造的，而“天”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老天爷会通过灾异、祥瑞、符命、谶纬等方式，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人类，又派出了皇帝作为他在人世的代理，来统治人类，并形成了一整套儒教体系，来约束人类。第三，人应该听从老天爷的指示，学习谶纬、符命等知识，看懂老天爷的命令，再按照命令来做事情。同时，人类必须服从皇帝这个代理人，遵循礼法，达到人类社会与老天爷的同步。

而天主教思想则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第一，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第二，人类也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通过教会来领导人类。第三，人类要服从上帝的意志，也就是服从教会的领导，遵循教会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戒律。

但是，天主教思想到了近代就受到了冲击，人们纷纷表示不再相信它了，从这些怀疑者中产生了许多派别，而最著名的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第一，这个世界绝不是上帝创造的，它是机械式存在的，不需要创造。但是，这个世界有一个“宇宙真理”，这个宇宙真理就代替了上帝的地位，统治着整个宇宙。第二，人类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也受到这个宇宙真理的统治。下面，就到了最关键的部分：这个宇宙真理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这个宇宙真理反映到人类社会，就是由阶级斗争推动的五步进化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人类到最后都会从奴隶进化成共产主义战士，毕竟他不可能违背宇宙真理。第三，既然五步进化论是宇宙真理，那么人类应该怎么做呢？人类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植入这个阶级斗争的宇宙真理之中，放弃掉自我，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以便更快地实现这个宇宙真理。

通过这样的设置，人就不再是人，而是变成实现宇宙真理的一个小小工具了。所谓“存真理，灭人格”。

作为对比，宋代发展出来的理学类似于某种程度上的“马克思主义”，它取代了作为天主教的两汉经学教义，代表着对于宗教的反叛，却把人类交给了宇宙真理。

宋代理学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第一，这个世界是由“天理”这种抽象的宇宙真理所创造的，天理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类社会也是“天理”的创造，所以人类也受天理的约束。第三，人类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放弃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应该首先学习这个天理，其次再遵循这个天理做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的五步进化论是“宇宙真理”，而上面谈理学时，光说理学也承认有一个“天理”，但这个天理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理学内部争论的焦点，不同的人心里的天理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有很多相似性，又是不同的。

理学发展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天理进行认证的过程，从周敦颐到朱熹，他们的天理观逐渐演化，也逐渐条理化，最终形成了一套束缚人思想的理论。

那么，理学到底是好是坏？

简单的答案是：理学既不好也不坏，而对社会真正产生影响的，是那些把理论应用到社会的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没有实现它，就只不过是一种纸面的学说而已，而列宁把它实现了，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组织。

本章就来看一下，理学发展中的一位位道学家，是如何探索这个所谓天理的。

卫道士的到来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是北宋帝国最有希望的年代。在这之前，当宰相的是吕夷简，他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权倾朝野，北宋官场呈现出一片暮气沉沉的景象。

在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到了庆历三年，局势得到了根本

性的逆转，吕夷简下台，执政的是一批有理想的改革派。北宋经过了几十年的统一后，经济大发展造就了学术环境的稳定，这时的朝臣大都满腹经纶又有实务经验，同时又表现得刚正不阿，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

此时执政的是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北宋还有一个庞大的谏官群体，负责监督官员和皇帝的政策，担任谏官的是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人，吕夷简之后，军事枢密使一职最初给了与改革派不属于一系的夏竦，后来在谏官的要求下，又罢去了夏竦，让杜衍当上了枢密使。

这时，所有重要的职务基本上都掌握在了改革派的手中[28]，范仲淹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了庆历改革。

对于改革派来说，此时最忌讳的是，反对派把他们“朋党化”。在他们掌握政局之前，吕夷简之徒打击他们的最有力武器，就是说他们“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如果被扣上了“党”的帽子，任何改革措施都可以被认为是谋私的。在被打压的时候，欧阳修曾经专门写过《朋党论》，辩称君子选择朋友是以“道义相同”为标准，而小人选择朋友是以“利益相同”为标准，皇帝应该区分这之间的不同，不能因为君子们成为朋友就感到紧张。[29]

但即便如此，在改革派当权推进改革之时，他们仍然最避讳的是被当作党徒，而反对派们也是不断地用“党徒”这个名字来影响皇帝的判断，如果反对派们成功，改革就必将失败。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自视为改革派朋友的人却放了一炮，让人大跌眼镜，这人就是石介。

石介，字守道，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年轻时曾经在北宋的南京（当时的应天府，现在的商丘）师从于范仲淹，因此自称是范仲淹的弟子。到了庆历年间，在杜衍的推荐下，他当上了国子监直讲。事实证明，石介是个颇具煽动能力的老师，他在这个职位上，把国子监变成了一个清流横行之地，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他的课，太学的兴盛从他开始。石介也由此结交了欧阳修等人，成了改革派的座上宾。

当夏竦被解职，杜衍成了枢密使之后，石介发现，他的老师范仲淹、推荐人杜衍、朋友欧阳修等人都成了当政者，于是心情大快，认为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皇帝是最好的皇帝，大臣是最好的大臣，一时兴起，写了一首拗口的《庆历圣德诗》。这首诗使用了大量的古词古句，彰显了他的学究精神，而诗的内容则充满了党派精神。其中他赞扬了皇帝的圣明，又赞扬了范仲淹为首的大臣们的改革，同时贬斥了他认为的那些奸臣（比如夏竦）。对当时人物如同数豆子一样点名道姓进行渲染，让人一看，就产生了强烈的朋党印象。

这首诗一传开，就让改革派的大臣们感到不适，如同出了一个猪队友，不仅给自己找麻烦，还给改革带来了新的阻力。

石介的朋友孙复听说了此事，立刻认为，石介的祸端从这首诗开始了。

而最难过的反而是改革派的主将范仲淹，为了改革殚精竭虑的他突然听说了这首诗，感叹说：这个古怪怎么这么能坏事啊！[30]

庆历新政持续了不到一年，就因为重重阻力而告罢，改革派的大臣们也纷纷外调，石介极力反对的夏竦却掌了权。

此时，石介再次“倒打一耙”，帮了夏竦的大忙。他秘密写信给改革派的富弼，自以为是地请富弼“行伊周之事”，也就是按照伊尹和周公的榜样行事（伊尹和周公分别是夏代和周代的名臣，都曾经以摄政的身份辅佐过皇帝）。石介这样提议，是把自己当成改革派的心腹幕僚，但夏竦掌权后，却以此为借口，说石介请富弼“行伊霍之事”。所谓伊霍之事，指的是按照伊尹和霍光的榜样行事（伊尹和汉代的霍光都担任过摄政，并废除过昏庸的皇帝），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石介请富弼另立皇帝。

虽然宋仁宗没有相信这件事，但范仲淹和富弼等人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好，继续待下去有性命之忧，在一片结党的疑虑中，离开了京城，外调了。

他们的外调，彻底结束了改革。[31]

石介作为道学家最早的楷模被记入了历史，他的榜样鼓舞了二程、朱熹等后来的道学家。他和胡瑗、孙复一起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也可以看出，到了庆历时期，道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关于胡瑗、孙复两人的成就不多谈，而分析一下最为强硬的石介，就可以看到未来道学的面目。

石介除了“帮助”改革派之外，在理论上最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反对佛教、道教；第二，建立道统。这两点都是从别人处得来的，谈不上创见，却由于他的倡导和细化，加上煽动式的教学，成了流行思想的一部分。

反对佛教、道教，源自唐朝的韩愈，石介要求禁止寺庙和佛道崇拜，认为它们是丧乱政治的源泉。[32]当废除了佛道之后，再用比佛道更加虔诚的心态去崇拜儒教和孔子，于是就有了道统一说。

“道统”说法同样来自韩愈。韩愈认为，关于“道”的知识谱系，是由尧传给了舜，之后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所以这些人都是理解宇宙真理的先知。孟子之后，道统中断，导致了中国礼法的沦丧和邪门歪道的兴起。

石介将这个道统更加复杂化，如同道教罗列神仙体系一样，把道统中包括了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这些圣人[33]，甚至还包括孟子、扬雄、王通（隋代）、韩愈这些贤人。[34]

这样，反对佛道，并以佛道为榜样建立起儒教自己的崇拜体系，就构成了卫道士形成的两个条件。当这两个条件具备后，道学的组织根基就已经扎下了。

石介之后，北宋的卫道集团发展加速，正式进入了道学时期。

北宋的道学谱系

既然道统的传承已经定下，那么道学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

道学的主要内容是：它和汉儒的理想一样，是宋代的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从对于天地和自然的解释，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

汉儒将这个体系的核心放在了“天人感应”上，而宋儒将这个体系的核心定在了“天理”上。也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在一套由“理”概括的规矩中运行，从天地自然到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守这套规矩。

什么是“理”？最早的“理”就由周敦颐概括。后来的朱熹总结北宋理学时，提到了五位“先知”，认为道统在孟子之后就中断了，但是到了宋代，道统重新恢复，而继承了孟子的道统的第一人，就是周敦颐。

这种道统的叙述让人想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承，在犹太教信仰中有无数的先知，而早期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继承了这个先知“道统”的最后一个先知，但随着基督教的正规化，耶稣被提到了“上帝之子”的地位，也就脱离了普通的先知。

伊斯兰教也继承了这个先知体系，认为亚伯拉罕、大卫、耶稣等都是先知，而穆罕默德则是最后一位先知。到了什叶派，虽然没有了先知的名目，却又发明出一个“伊玛目”，认为伊玛目继承了先知的精神和知识，继续指导人类。

儒教的道统体系也是如此，最初韩愈认为先知从历代早期君王传到孔子，而孔子是一个特殊的先知，有着耶稣的地位。韩愈将道统延续到孟子。而宋代的新宗教则把先知的谱系又续上了，延续到了周敦颐。

周敦颐概括的“理”的内容，在一篇叫作《太极图说》的小短文中，这篇文章只有二百多字，却是宋代人对于自然、社会的最高认识成就。虽然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认识近乎荒谬，但在宋代却是最先进的。[35]

周敦颐认为，世界最高的主宰是“太极”，太极由“无极”而生。太极处于运动之中，就生出了“阳”，运动到达极致，就进入了动的反面，也就是静止，此时又生出了“阴”。当静止到达极致之后，又会进入运动状态，一动一静，互相转化。

阴阳区分，就是“两仪”。而从两仪又生出了水火木金土这“五气”，

五气按照规律运行，就生成了春夏秋冬“四时”。如果把五行合一，就回到了阴阳这两仪，如果把阴阳合一，就回到了太极，而太极就是无极，即无穷状态。

到这时，周敦颐说的是“天理”中的宇宙论，也就是从无极中如何生出阴阳五行和四季。接下来，就是从“天理”中如何生出万物。

万物是从阴阳和五行之中生出的，它们的精华从无极之中凝结，形成了“乾”“坤”，也就是阳道和阴道，乾是男，坤是女，乾气和坤气交感，就生成了万物。万物生成后，就可以依照“乾坤交感”的方法繁衍下去。

在这万物当中，人是最有灵性的，包括了形体和精神两种状态。而五行的互相交感，又导致了人能够区分善恶，从而产生出复杂的人类社会。五行还生出仁义礼智信，而圣人又以“仁义”为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对应于“静”，而静，则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

整体而言，周敦颐的体系，是一个从无极到太极到宇宙，再到万物，最后到人类社会的一个转化、影响的过程。在人类还没有学会科学观察和验证之前，这套假说不比其他理论更正确，也不比其他理论更错误，谈不上唯物或者唯心。

周敦颐的体系已经包罗万象，但在传给朱熹之前，还又得到了另两位“道统”的补充。这两人就是邵雍和张载。在未来，人们谈到道统时，会认为道统从孟子传给了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再传给了二程，最后传给了南宋的朱熹。而朱熹再次被授予了“最后的先知”的地位。

周敦颐的理论代表了道学的正统系，而在理论构建上，邵雍则代表了更加神秘主义的一系。

在古希腊历史上，有一个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派别，对于数字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认为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字来构造。而在中国的阴阳家谱系中也有这样的传统，他们认为万物之间的一切联系都是数字化的。这派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后来被董仲舒吸纳进了天人感应理论之中，又被道教所继承，到了北宋又传给了邵雍。

邵雍的理论试图用数字来解释万物，进行推演，是周敦颐无极—太极—两仪—五行的复杂化。从太极生出两仪，这里的两仪是“动”和“静”，从动和静，又生出了四象（柔、刚、阴、阳），从柔刚阴阳又生出了八卦，即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少阴、少阳、太阴、太阳。

这“一二四八”的数字又对应于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不同事物，比如，四象对应于“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而八卦则对应于“雨风露雷、夜昼、寒暑、走兽飞禽、草木、体形情性、声色味气、口鼻耳目”这八种自然属性[36]。

通过这样的附会，就可以通过八卦进行推演，邵雍认为宇宙真理的极致，就是用这些概念可以推演世间的万事万物，获得完美的知识。

除了邵雍这样对数字痴迷的人之外，张载对于道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对人类社会伦理的系统化。后来的道学家之所以特别推崇他，大多是因为一篇小小的文章。

张载曾经在他书室的东窗上写了一篇小文叫《砭愚》，在西窗上写了一篇《订顽》，后来这两篇改名为《东铭》和《西铭》。而《西铭》一篇由于说明了人类社会的伦理而受到了道学家的推崇，可以和周敦颐的宇宙论互为补充，产生一个既包括宇宙也包括人间的完整理论。

张载认为：乾、天、父是同一个概念，坤、地、母是另一个概念，人类就是天地父母所生，居于中间。天地之中是人类的“体”，而天地之帅是人类的性情。所以，人民是我的同胞，而万物则是我的同伴。

这样，张载就把人间和天地（自然界）打通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一家子。所谓皇帝（大君），就是天地的宗子，而大臣就是宗子的家臣。在这一家子当中，人们应该尊老爱幼，崇圣敬贤，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37]

在周敦颐、张载和邵雍三家之中，朱熹虽然都认为他们进入了道统谱系，但对待他们三人的学问又是有区别的，其中周敦颐被认为是继承了孔孟嫡传的人，而张载则由于生活在陕西地区，与北宋主要学术区域

中原有距离，被朱熹认为与“宇宙真理”较为疏远一些。至于邵雍一系，由于他过于痴迷于术数，又更加疏远一些。

在这三家之外，北宋还有司马光和苏轼两家，司马光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解读现实，而苏轼则试图融合儒道释三家。道学家们和司马光很亲近，因为他们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却对司马光的学问带着轻视，虽然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来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要比他们的道学著作更加著名也更加有价值。而对苏轼，道学家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异类而加以摒弃。

在北宋时期，还有两个道学家最为推崇的人，他们是程颢和程颐兄弟。

互相吹捧的“道统兄弟”

公元1088年（宋哲宗元祐三年），随着王安石新政被废除，司马光等反对新政的人得到了重用。在这一批大臣之中，还有一位道学家混迹其中，他就是程颐。

程颐此时已经年过五十，被授予了崇政殿说书的职位。在此之前，人们屡屡推荐他，却都没有被重用，直到这一次，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并说他爱好古代、安贫守节，是圣世的逸民，等等，最终皇帝终于给了他服务朝廷的机会。

司马光之所以如此推崇他，是因为司马光在被王安石排挤后退居洛阳时，和当地的文人接触甚密。而程颐和他的哥哥程颢当时就在洛阳教书。当司马光执政后，程颢已经去世了，弟弟程颐也就受到了司马光等人的青睐。

程颢死前已经是中原的文人领袖之一，由于他门徒众多，且不少人当官，影响力颇大。但是，在程颢死前，人们虽然认为他影响力很大，却并不把他当作唯一的道学家。在他死后，他的名声反而越来越大，因为有人把他列入了“道统”谱系，号称：周公死后，圣人之道就不再通行，而孟子死后，圣人之道连传人都没有了，人们糊里糊涂过了一千多

年，才突然出了个程圣人，这个程圣人继承了孟子，开创了当代圣世。

这些话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一旦一个人说过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重复，直到最后把它当作了真理。

而第一个说这话的人，就是程颐。[38]结果，程颐不仅把哥哥捧上了天，而他本人也继承了哥哥的道统，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程颐成为大臣后，果然起到了发扬道学的作用。他穿着庄重，带着面瘫的表情，总是不断地施加影响力。一天，皇帝在宫中盥洗，发现有只蚂蚁，怕把蚂蚁弄伤了，故意避开。这件事被程颐知道了，他连忙问皇帝有没有这件事，皇帝回答有，是怕伤了蚂蚁。程颐连忙说：这就对啦，你不伤蚂蚁这件事，就是所谓的“道”，如果把这个“道”推到整个世界，你就是最佳帝王了！

还有一次，皇帝凭栏观望时，随手想折一枝柳枝，程颐却劝阻说：现在是春天，是万物生长和谐共处的时候，你折了这个树枝，就是伤了天地的和气。

程颐的劝谏总是充满了这类“心灵鸡汤”，却对治理国家的实务经验一窍不通，结果受到了某些人的嘲笑。嘲笑最厉害的，就是刚刚被调回京城的翰林学士苏轼。

和程颐的道学相比，苏轼更看重治国的实际能力，对于板着脸说话不感兴趣，程颐的面瘫自然也成了他嘲笑的对象，那些所谓的心灵鸡汤自然也不能幸免。

一天，程颐的推荐人司马光死了，那一天恰好也有一场庆典活动，百官不得不首先参加庆典，然后再相约一起去吊唁司马光。就在大家都准备出发时，突然间程颐板着脸跳了出来，说不能这样做。众人问为什么，程颐找出古书来一板一眼地说：这是孔夫子的规矩，他如果当天哭过（有悲伤的事情），就不再唱歌（参加喜事）了。

听完程颐的话，人们纷纷开始调侃他，有的人说：孔夫子当天哭过就不唱歌，可是我们是先唱歌再去哭，和孔夫子的情况正反过来，怕什么？

最能说的还是苏轼，他说：这种破礼仪一定是当初叔孙通那个死鬼定的！[39]孔子是通人情的，怎么会定这种乱七八糟的规矩！

之后，程颐的党徒开始排挤苏轼，最终却导致了程颐的离职。

苏轼和程颐的争议，可以看成是道学派和实务派之间的争议，苏轼主张世俗化，对于实际问题实际处理，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道德或者理论高度。而程颐则认为，不管什么事情，大到治理国家，小到吃饭拉屎，必须首先高屋建瓴看到事情的实质，再进行选择。但他对于理论高度的把握由于过高，往往忽略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了强调自己理论的重要性，程氏兄弟认为，天下的学者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文士""讲师"和"知道者"。文士，指的是能文的人，也就是精通除了道学之外文化的人，自然与程颐争执的苏轼会被划成这一类，这一类是学者的最低级类。讲师，指的是阅读儒经、进行训诂的人，这一类人已经懂得儒经，却并不了解儒经背后的深意，按照划分，宋代以前的儒家学者，以及宋代不属于二程流派的儒家学者（比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会被划归这一类。最后一类是所谓"懂得道的人"，这一类人自然也就是程氏门徒。

由于有了"道"，程氏门徒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之中，人们首先想的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根据世间的事物，首先寻求它们背后的"道""天理"，在找到天理之前，人们是没有资格谈论政治的。

在程氏的划分中，政治是外，天理是内，求学必须求之于内，而不能求之于外。所以，考察政治得失，在于考察人的道德，人的道德又在于是否符合天理。通过这样的约束，理学就带上了深深的形而上的味道，放弃了对实际世界的了解。

只有知道了这个框架，才明白宋代的理学为什么深深地走入了封闭的圈子，它的门徒忙不迭追究所谓天理，却忽视了人间的实务。

北宋的后期一直处于外部环境的逐渐恶化之中，为了应付这样的恶化，北宋王朝想出了种种办法来增加财政，直到引起了社会崩溃。而另一方面，更多的士大夫却一直处于观望、唱高调和幸灾乐祸之中，他们

由于受到了蔡京等人的排挤，也乐于看着皇帝越来越捉襟见肘地应付着局势，直到垮台。

随着北宋的倒台，以蔡京为代表的实务派变得臭名昭著，二程的门人再次得势，此时他们作为反对和议派出现。宋高宗时期，曾经以赵鼎为相，赵鼎起用了大批的程氏徒子徒孙。[40]赵鼎是南宋贤相中坚决反对和议的人，程氏门徒此时也因为华夏和蛮夷的大义而反对议和。

赵鼎被秦桧排挤后，秦桧将程氏门人打入冷宫，直到孝宗时期才再次起用。不过，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程颐的门徒已经声势浩大，足以左右政治格局。清谈之士口口声声言必伊川，已经成了时尚，这也是理学将统治天下的前兆[41]。

最后的先知

公元1195年（宋宁宗庆元元年），宋代的理学经历了最后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威胁。这一年是宋宁宗上台的第一年，一位叫作韩侂胄的主战派权臣取代主和的赵汝愚，开始了执政。

韩侂胄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大肆排挤大臣，而首当其冲的，竟然是个名叫朱熹的小官。韩侂胄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次排挤，反而成了理学主宰政坛的前奏。

在宋宁宗之前的两位皇帝孝宗和光宗时期，对于理学的排斥时有发生，之所以排斥，主要原因是理学过于迂腐，缺乏对于实际政治的治理能力，而宋代朝廷需要的是有实务经验的技术派官员。

比如，公元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侍御史谢廓然就曾经提议禁止周敦颐和王安石的学说，认为性理学说是浮言游词，饰怪惊愚。[42]

五年后，监察御史陈贾又请皇帝禁止道学，这次禁止主要针对当时道学的领军人物朱熹。朱熹在当浙东提刑时，曾经上书弹劾了台州知州唐仲友，而唐仲友是当朝宰相王淮的同乡和姻亲，王淮于是让吏部尚书郑丙和监察御史陈贾一同上书禁止道学。

虽然这件事带有报私仇的成分，但是陈贾奏章里提到的道学的缺点却是实实在在的。他认为，天下之人所学的圣人的道理都应该是相同的，如果有人总是标新立异说自己的道学不同于别人，时时刻刻总是创造所谓的道统抬高自己，则必定是假借圣人的名号来行伪学之实。[43]

又过了五年，朱熹被招为兵部侍郎，却再次遭到上级兵部侍郎林栗的排斥，林栗认为，朱熹的学问来自张载和程颐，却四处招揽门生，徒有虚名。此次林栗的打击让与朱熹政见相左的叶适也看不下去了，但仍然未能挽救朱熹的仕途。

然而，朱熹的转折点似乎在宋宁宗时期到来。公元1195年，宋宁宗即位后，招揽朱熹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他之所以得官，是因为宋宁宗在当嘉王的时候，就常听他的老师黄裳夸奖朱熹，并用道学的理论武装嘉王。宁宗即位后，朱熹似乎也会跟着飞黄腾达。

但就在这时，朱熹一生中最大的障碍出现了。在担任侍讲时，朱熹劝说宋宁宗要学会尊重大臣，不要独断专行，否则，皇帝看似独断，却可能让一两个大臣窃取了权力，造成所谓的“主威下移”。

朱熹之所以说这些话，都是针对刚刚获得了权力的外戚韩侂胄。韩侂胄听说之后，迅速做出反应，认定朱熹是敌人，开始了排挤道学的运动。

韩侂胄首先请戏子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装作道学模样，等皇帝看到了，又乘机进言朱熹这样的道学毫无用处。果然皇帝听信了韩侂胄的话，将朱熹贬斥了。之后，韩侂胄又让他的党羽刘德秀以考绩为名，将尊崇道学的大臣一一拿下。

第二年，端明殿学士叶翥负责科考事宜，他和刘德秀一起规定，凡是在科考中使用道学理论的，一概不能录取。年底又罢了朱熹的官。

第三年，韩侂胄开始仿效北宋徽宗年间的崇宁党禁，规定了五十九人的名单，对于这些人不得任用。这五十九人中，包括了宰相级别的四人，以赵汝愚为首，待制级别的十三人，以朱熹为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从规模和烈度上来说，庆元党禁的杀伤力远小于当年的崇宁党禁。崇宁党禁是新党与旧党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禁止本人当官，还禁止了子孙后代的仕途，对党人的著作也悉数销毁，党禁一直持续到宋徽宗末年。

而庆元党禁持续时间很短，力度也小，由于韩侂胄只是为了消灭反对派，一旦达到了目的，就随即放松了党禁，更无力禁止道学学问的传播。

事实上，庆元党禁除了党派斗争之外，也有它的合理性一面。道学发展过剩，导致南宋已经出现了空谈道德的倾向，实务派们本身就有一种清理夸夸其谈的要求，只是借助此事一起发泄了出来。

另外，这一次事件本身也是一次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争斗，虽然朱熹持有主战的立场，但是他的朋友赵汝愚等人却是主和派，主战派打击朱熹，实际上是为了打击背后的赵汝愚，消灭主和势力。

但韩侂胄没有想到的是，他实施的党禁不仅没有起到打击道学的目的，反而助长了它的传播。当人们听说党禁之后，立刻想到的是上次党禁（崇宁党禁）中，被禁止的人后来都成了英雄，而禁人者反而成了奸臣，再回过头看待这一次党禁，也同样认定是好人受到了打压。

至于暂时得势的主战派则输得更惨。韩侂胄打击完道学，为了讨好主战派，决定和金人发动战争。但作为投机分子，韩侂胄对于北伐的准备工作做得却一塌糊涂，导致了战场上的惨败。到最后，就连韩侂胄本人，由于金国要他的脑袋，皇帝也不得不含恨下令杀了他满足金人的要求。

于是，在这场危机过后，道学家们却发现，他们已经处在了胜利的边缘，当初被迫害的朱熹，不管他有什么缺点，都已经不存在了，人们记得的只是他是一代宗师，是继承了孔孟和二程道统的大圣人，一个神话被确立了起来。于是，在南宋还没有终了，以朱熹为标志的道学系统已经成了主流。

按照辈分，朱熹是二程的三传弟子，二程最得意的弟子中，有一个

人叫杨时，杨时的弟子中有一人叫罗从彦，罗从彦的弟子有一人叫李侗，朱熹就是李侗的弟子。

朱熹的批评者说，他的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原创性，只是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理论进行了综合，重新包装一遍，再用这些理论对四书五经进行了注释，使得四书五经看上去更适合理学。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事实，但朱熹的功劳在于，他将综合后的理学定型了，传播了，光大了，让理学占领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脑袋。

这里不妨将整个理学体系再叙述一遍。

在宇宙论上，朱熹基本上继承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认为万事万物之中蕴含着一个总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世界的本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把扇子蕴含着扇子的道理，一把椅子包含了椅子的道理，如果再把扇子和椅子这两个道理进行抽象，又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级的道理，把世界上所有的道理一直这样抽象下去，最终会得到一个最高的道理，这就是理学家要找的“天理”。天理反映在人身上，就是所谓的“性”（人性）。

天理的另一个名字叫太极，太极从无极而生，又生出阴阳两仪。从两仪又生出五行。其中太极是所谓的“理”，而两仪是所谓的“气”，五行则是所谓的“质”，我们可以把“理”理解为规律，而“气”可以理解为抽象的物体，而“质”就是实际的物体。

“气”这个概念是朱熹从张载处得来的，是联系天理与实际宇宙的连接点。世界万物都是气运动的结果，天地也在围绕着宇宙中心转动，在转动的过程中，浊气下降成了地，而更加轻盈的气则变成了九重天，这些重天越往上越轻，直到变得没有重量，没有形质。而日月星辰则是气的精华，最纯正的气。

天理之所以和人间连起来，是因为五行和人类社会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对应，而仁义礼智信之中，又以“仁”为首，而《孟子》主要说仁，所以，朱熹将天理与孟子的仁又联系了起来。

另外，之所以天理在人世间各种事物中都有表现，是因为“理一分

殊”，也就是理是一个，表现形式却是多样的。

人类如何学习理，如何识别多样却又统一的理呢？下面就进入到方法论。这个方法叫作“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从二程继承来的理论。所谓格物，指的是对事物进行观察，穷尽它的理；所谓致知，就是获得真理的过程。格物致知则是通过穷极物理达到真理，再用真理来指导行动的过程。

程颐当年教导皇帝时，总是希望皇帝从一个小事出发来发现宇宙真理，再利用宇宙真理来统治国家，就是用的这种理论。

经过格物之后，程颐和朱熹都得到了最后的“知”，这个知（天理）对应于人类就是：三纲五常和儒教传统。人们为了实践这个天理，必须消灭人的气质之性，而发扬天命之性。

在进行格物致知时，朱熹终于有了一个独创性的观念：为什么格物一定能够致知，这是因为，人的心分成了“道心”（也叫天命之性）和“人心”（也叫气质之性）两部分。所谓道心，就是能够觉察到“道”的心，而人心则是做一般性思考的心，也就是普通的心。

他对孟子的人性善理论进行了改造。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而朱熹认为，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其中道心（天命之性）体悟了天理，所以肯定是善的，但是每个人蕴含的道心有多有少，表现不同，这具体的表现就是人心。道心虽然是善，但人心却有可能善也有可能恶。

人类追寻天理的过程，就是要找到所谓的道心、天命之性，而消灭人心、气质之性，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

到最后，对于天理的追求不仅没有带来思想的解放，却带来了人性的束缚，这或许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朱熹对于理学的贡献，除了他将这些理论综合起来，还在于将它们放入了儒教的经典著作之中。北宋时期的诸位道学家在发挥自己学说时，往往天马行空，没有紧扣儒教经典。到了朱熹，才开始逐字逐句将新的理论与儒教经典对照起来。朱熹在他的一生中几乎将儒教经典注了

遍，他对四书的推崇使得它们超越了五经。

在宋代之前，人们提起儒教著作来首先想到的是孔子参与编撰的五经，宋代以后，四书的重要性比五经更高，特别是《大学》之中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以及《中庸》的生活态度，都成了理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十六章
从斯多葛到大一统（公元1200—公元1506年）

宋代的政府控制力不强，如果宋朝不灭亡，那么道学还无法取得控制一切的权威。但宋代灭亡之后，上台的元朝在哲学和文化上是一个极端落后的政权，它对于南宋哲学和科举的画瓢，最终确立了道学在哲学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辽金元时代，科举仍然显得幼稚、时断时续。明代完整的考试体系以及僵化的课本，终于将隋代建立的科举制度，从唐代灵活的运用，变成了明清的八股文。

从受迫害到被尊崇，形势反转得如此之快，不管是道学家们，还是他们的对手，都没有料到。

公元1211年（南宋嘉定四年），道学被禁才十五年之后，人们已经开始热情地呼吁恢复道学的地位，甚至要将它树立成政权的统治思想。

事实上，恢复道学的思潮从韩侂胄活着的时候已经开始，韩侂胄禁止道学几年后，就意识到他树立了太多的敌人，有意识地放松管制。

但道学真正的解放，却源于韩侂胄在四年前的死亡。由于北伐失败，金军要皇帝用韩侂胄的人头换和平，韩侂胄被杀死后，人头送往了北方。之后，南宋以岁币增加50%（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并一次性补助对方三百万贯的代价换取了和平。

韩侂胄死后，皇帝放弃了任何政权优化，南宋进入了一个僵化等死的阶段。皇帝意识到与其听从改革派的进取之心，不如采纳道学家的方法，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政治中引开，去讨论那些天理问题。这种姑息疗法使得道学再次得势。

这一年，著作郎李道传上书请求尊崇道学，他的提议包括：重用道

学人才、提倡道学著作、尊崇死去的道学家（二程、邵雍、张载、朱熹）。但这一次，人们仍然无法从变化中回过味来，没有采纳。[44]

五年后，潼川府路提点刑狱魏了翁再次提议尊崇二程和周敦颐。这一次皇帝开始认真考虑问题，又过了四年，他下令给二程、周敦颐、张载加谥号，算是对道学的一次承认。[45]

宋宁宗由于参与了对道学的禁止，还磨不开面子，全面废除自己之前的政策，对于朱熹仍然不闻不问。等他死后，宋理宗继承了皇位（宋宁宗无子，理宗只是他的养子），这位养子就开始大刀阔斧废除先皇的政策。

公元1228年（宝庆三年），宋理宗追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第二年，又封为徽国公。[46]

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更是道学家们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宋理宗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送入了孔庙，享受从祀的待遇。与此同时，原本从祀的王安石则被请出了孔庙。朱熹的著作《四书集注》也成了政府的必读书，确立了未来在科考中的统治地位。[47]

宋代的文庙制度发展，可以看作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历朝历代在供奉孔子时，除了在大殿里供奉孔子像之外，还一起供奉了孔门弟子和历代先贤，这些人又分成了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配享”，一般只有对儒教贡献最大的一人到数人能享有这样的待遇，这些人的塑像比孔子的塑像要小，位于孔子像的两侧，共同享受香火，这些人是面南背北的。第二个等级叫从祀，其中第二等级的人也有塑像，位于孔子像两侧的东西厢，东面的人面朝西方，西面的人面朝东方。一般享受塑像待遇的，是孔子最著名的弟子以及后来的对儒教贡献很大的学者。第三个等级也叫从祀，却没有塑像，只有画像，他们位于大堂周围的东西走廊内。[48]

宋代最初享受“配享”的只有孟子一人，而“从祀”有塑像的，是孔子最著名的十位弟子，号称“孔门十哲”，其余有画像的还有孔门七十二弟子，以及历代命儒二十一人。孔子的封号是至圣文宣王。

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之时，封孟子为邹国公，颜回为

兖国公，让这两个人享受“配享”的待遇。同时，增加了荀子、扬雄和韩愈三人享受从祀（画像）的待遇。

到了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初年），由于新党在蔡京的聚合下重新执政，新党为了加强凝聚力，开始神化王安石，把王安石说成是当代圣人，结果荆国公王安石也加入了配享的行列，和颜回、孟子一起被塑在了孔子身旁。

到了公元1113年（政和三年），又追封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为临川伯，让他也加入了从祀（画像）的行列。到此时，孔庙之中一共有配享三人、从祀（塑像）十人、从祀（画像）九十七人。

但王安石配享的时间是短暂的，到了宋徽宗下台后的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道学家们开始了反攻，二程的重要弟子、右谏议大夫杨时请求剥夺王安石配享的权力，最后皇帝下诏，把王安石从配享降为从祀。

南宋公元1177年（淳熙四年），王安石儿子王雱的画像被逐出孔庙。

到了宋理宗时期，道学家们终于得势，此时的主战派和改革派已经彻底失去了市场，王安石也就被请出了孔庙。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皇帝借着考察太学的机会，废除了王安石，同时把道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请入了孔庙，列于从祀的地位，这是朱熹第一次进入庙堂。公元1262年（景定三年），从祀的名单中又加入了张栻和吕祖谦。

公元1267年（咸淳三年），封曾参为郕国公，孔伋为沂国公，这两人和孟子、颜回一起享受配享的待遇。到这时，配享一共四人，从祀（塑像）十人，而从祀（画像）一百零四人。由于后世统治者都继承了宋代的理学，配享就再也没有变化，直到今天，孔庙中仍然是这四人配享。到了元代，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为郕国宗圣公，子思（孔伋）为沂国述圣公，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四圣的名称就来自于此。[49]从祀的名单仍然有所变化，皇帝根据兴趣或删或加，但规模也基本上保持了下来。

宋朝的灭亡对道学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如果宋朝仍在，其内部的斗争迟早还会激化，随着道学变得越来越无力改善政治和社会，道学说不定还有被废除的那一天，但宋代灭亡后，统治中国的蒙古人还没有能力辨别道学的优劣，只是一味地接受汉地的传统，这使得道学固化在了制度之中。明代这个保守的朝代为了控制社会，更是继承了元代的制度和统治思路，将道学神化成了统治哲学，并禁锢了中国六百年。

辽金：野蛮人学舌

与人们认为中国是十几个朝代的循环不同，中国从汉代以来的大一统历史实际上分成三个大的周期。[50]第一周期从秦汉延续到南朝，经历了秦、西汉、新莽、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宋齐梁陈等共十三个政权，这个周期中的财政、经济、政治制度都是连续变化的，每一个政权都继承了前代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直到南朝陈，这一套制度体系才跟着政权一同毁灭。

第二周期从北朝的北魏开始，北魏建立制度后，由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继承，并由北周传给了隋唐，经过五代，直到两宋后垮台，一共经历了十四个政权。

第三周期从辽代开始，经过金、元，到明、清，一共经历了五个政权。宋代的道学之所以能够统治第三周期，恰好在于它出现在第二周期的末尾，在第二周期灭亡之前上升为统治哲学。而第三周期由于是野蛮人建立，在学习汉化的过程中，将前一周期中的统治哲学照搬了过来，结果道学固化成了第三周期的思想基础。又由于第三周期各个政权的保守性，道学（理学）越来越僵化，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牢笼。

在第三周期中，最早尝试利用儒教进行统治的是辽代。在唐灭亡之后、北宋建立之前，契丹人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治时期，他的大儿子耶律倍就是一个汉化派，试图依靠儒教来统治契丹人。根据记载，阿保机曾经问部下：作为国君应该敬奉天地诸神，可是神灵宗教众多，我应该首先尊崇哪一个呢？

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学习其他游牧民族的做法，敬奉佛教。但阿保

机否决了，认为佛教不是中国本土宗教。

这时，耶律倍说：中国最大的圣人是孔子，已经供奉了万世，我们既然要占领中国，就应该首先敬奉孔子。[51]

耶律倍虽然最终没有继承皇位，却将儒教引入了契丹人之中，从此，辽国兴建孔子庙，并由太子率领年年祭祀。

辽国由于是初创帝国，许多制度都很原始，比如，辽国也采取了唐代的进士科考法，但由于各种杂项的官员太多，官员中进士比例最高不过百分之三十。[52]

辽代灭亡后，北方进入了金的统治，制度比起辽代已经相对完善，科考法则也模仿了唐代和宋代的做法。不过，金代的科考与唐代更为相近，不仅考儒经，也考文章和词赋，以及其他专科。[53]

金代的考试分为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后来又创造了女直进士，也就是专为女真人开的，还曾经加过制举鸿词科，为那些非常之士开辟门路。所以金代的考试一共是七科。在这七科当中，词赋、经义、策论三科的中选者称为进士。律科、经童两科的中选者称为举人。考试分成四等，分别是乡试、府试、省试、殿试，四次都考取了，就授予官职。

政府开设的学校包括几类，最早开设的是国子监，后来又设太学。地方上则有府学和州学，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学习体系。金代之所以能够如此完善，是因为它在北方继承了北宋的疆域，也继承了北宋的人才。

至于所用课本，由于宋代理学还没有成为气候，大都是沿用了前人的课本。这些课本以五经、史学为主，加上少量的其他典籍（《老子》《荀子》《扬子》）。这里也可以看出金代的另一个倾向：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系统，以拼凑前人的资料为主。到了后期，可能由于组织难度的原因，甚至把经义和策论科目都取消，只用词赋来录取人才。由于词赋是最简单的，这样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放宽了人才录取的标准。

表9　金代课本使用情况[54]

科　目	注　本	注本产生的朝代
《易》	王弼、韩康伯注	曹魏、晋
《书》	孔安国注	汉
《诗》	毛苌注、郑玄笺	汉
《春秋左氏传》	杜预注	晋
《礼记》	孔颖达疏	唐
《周礼》	郑玄注、贾公彦疏	汉、唐
《论语》	何晏集注、邢昺疏	曹魏、宋
《孟子》	赵岐注、孙奭疏	汉、北宋
《孝经》	唐玄宗注	唐
《史记》	裴骃注	南朝
《前汉书》	颜师古注	唐
《后汉书》	李贤注	唐
《三国志》	裴松之注	南朝
《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		
《老子》	唐玄宗注疏	唐
《荀子》	杨倞注	唐
《扬子》	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	隋、唐

金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但皇帝已经非常重视儒教。对于儒教最重视的是熙宗皇帝，公元1140年，金和南宋刚形成了稳定的疆

界不久，就学着宋代的样子，封孔子的后代为衍圣公。[55]第二年（皇统元年），又亲自到孔庙中去祭奠，并以身作则地学习儒家经典和史学著作。[56]

金代这种带有一定灵活性，却又充满了原教旨虔诚的学习方法，成为后世王朝的榜样。金人选择前朝课本苦读，到了元代，就把前朝课本换成了宋儒理学的课本，但是对于课本原教旨般的崇拜却毫无变化。到了明代，这种做法更是变本加厉，就让学习变成了巨大的思想包袱。

元代画瓢

公元1237年（元太宗忽必烈九年），中书令（宰相）耶律楚材开始为蒙古江山制定一项长治久安的规则：科举制度。

耶律楚材曾经是在金国当官的契丹人，当蒙古人不断地对金国的中京（现北京）进行打击时，金宣宗逃难到了南京（汴京，现开封），留下丞相完颜承晖守卫中京，耶律楚材就在中京担任左右司员外郎。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十年），蒙古大军攻克中京，耶律楚材作为俘虏，被成吉思汗选中，开始为蒙古人的大业出谋划策。在此之前，蒙古人喜欢使用心理震撼战术，对于不投降的城市，一旦攻克后就进行屠城，甚至有意识地消灭当地人，将耕地变成草场养马。耶律楚材逐渐地教育蒙古人，耕地比草场更重要，能够提供更多的税收。

到了太宗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的建议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价值。蒙古人之前主要靠掠夺获取财产，再交给回人拿去放贷，产生利息，所以蒙古人对于回人非常倚重。而耶律楚材则通过征收土地税和商业税，获得了大量的收入。[57]这种试验成功后，耶律楚材以征税为借口，开始建立元代的统治机构。公元1231年（太宗三年），蒙古人开始实行行政官僚制度，建立了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并设立了左右丞相。[58]耶律楚材帮助窝阔台编订了汉地的户籍，设立了税收制度，甚至仿照金代推出了纸币。[59]之后，为了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转，他开始设立学校和科举制度，为雏形中的中央政府选定官员。

在此之前，蒙古人选择人才大都是掠夺式的，还有各种江湖人士投靠。蒙古人最重视的，是回人中的商人，他们能够帮助蒙古人理财，获得了极大的信任。耶律楚材试图通过正规化制度，来减少非正规的理财商人的影响力。

公元1237年，在灭亡了金国三年之后，元代的科考制度开场了。

根据耶律楚材的规划，科考分成了三科，分别是策论、经义和词赋。其中策论以考实务为主，而经义以考儒术为主，词赋以考文采为主。考中的人不仅可以免去赋役，还可以担任官员。

从耶律楚材制定的考试规则中可以看出，元朝最初的考试制度是继承自唐宋传统，唐代考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目，兼用诗赋、策论、算术、法条、历史、经学等各种学科，虽然元代取消了法条、算术、历史等考核，但保留了诗赋与经学并行，并兼顾了策论，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考试体系。

第二年在耶律楚材的组织下，考试大获成功，这次考试一共录取了4030人[60]，大都是当时的名士。这次考试也为蒙古人统治初期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保证了政权的平稳。

但可惜的是，这次考试并没有持续下来形成制度，蒙古人最终证明自己是缺乏耐心的。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掠夺财物，靠建立制度收税来慢慢获得财富的吸引力，比不过来快钱的诱惑，当耶律楚材在孜孜不倦地为蒙古人建立制度时，蒙古人自己却开始挖他的墙角。

窝阔台为了要更多的税收，开始把征税权外包出去，由回人给蒙古人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就获得了一年的征税权，至于他们如何横征暴敛，蒙古人就一概不问了。如果有人反抗，则由蒙古人出面镇压。最后，征税权已经拍卖到了二百二十万两，又有更多的财富流入了包税人的腰包。

耶律楚材对于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痛心异常，却毫无办法。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被边缘化郁郁而终。蒙古人由于无法建立良好的统治秩

序，成了短命的王朝。[61]

耶律楚材试行科举制没有成功，元代就在混乱中度过了几十年，直到公元1314年（仁宗皇庆三年），才再次开始了科举尝试。此时的元代已经到了中期，统治混乱，汉化派和骑马派互相争斗，使得政治的进程异常颠簸。

仁宗时期，元朝的政治正好摆到了汉化派一边，经过了几十年的统治，由于秩序的恢复，中原的读书人也恢复了对于治国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程朱理学经过了若干年的沉淀，已经成了当时的显学，这时候恢复科举，就已经无法避开程朱理学的影响。

在金代，所选择的课本大多数都是老课本，来自从汉代到唐代的宽广时域，再加上对于词赋、历史的考核，使得儒教学问对读书人的束缚很小。可是元代时蒙古人能够得到的课本大都已经理学化，这就导致蒙古人的科考必定是理学化的。

这一点也许蒙古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选择了最流行的课本，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另外，让蒙古人兼考词赋、经义、策论、历史等科目是做不到的，由于政治制度过于简单，必须将科考简化再简化，才能保证推行下去，到最后，科考将词赋、历史、算学等全部砍掉，只保留了最容易考核的经义，加上时务策，而经义又采取当时最通行的四书，五经由于过于繁复，也很少使用。这样，历史上最单调的科举考试就出现了。

元代的考试是这样的：每三年考一次，对蒙古人、色目人，分为两场，第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共五条，会背就通过；第二场考一篇时务策一道，要求五百字以上，比现在的高考还简单得多。对汉人和南人，则分为三场：第一场考明经，在四书内出题；第二场考诏诰章表，也就是检查考生的应用文能力；第三场考时务策一道。[62]

课本主要选择四书，而四书又选用朱熹的《四书集注》，其余五经也主要以朱熹的理论为主，这就使得元代的科考好像是专门为朱熹设计的。

宋代的理学革命在宋代没有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当它成为统治哲学时，整个社会都快崩盘了，但宋代理学却在蒙古人手中被无意间发扬光大，这也许对于宋朝皇帝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这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也绝不是福分。

明代考试体系如何固化道学？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教科书的世界。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最重要的版块不是经典书，也不是畅销书，而是各种各样的教科书。

中国历史上教科书的发达，来源于明代的科举制度。

在唐代印刷术刚刚兴起，出版商们印行的大都是宗教、实用性书籍。宋代，由于科举考试范围很广，进士科目考试更偏重于能力和实务，很难通过一两本粗糙的教科书就能准备得当，因此，宋代的出版业以出版文人的文章文集为主。

到了明代，政府出版的考试教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占据了主流市场，四书五经大行于世。而这三套七部（五经分别各一部，四书、性理各为一部）的所谓“大全”，编制得粗制滥造，明代的科考就成了一种批量生产废品的工场，将科举制度演化到了荒谬的地步。

唐宋的科考能够较好地区分出优秀的文人，而元代虽然实行了科考，却将原本内容丰富的考试进行了极度的简化，导致考试的内容过于偏向朱熹的理学，成了文化的禁锢。

明代作为一个汉人的朝代，本来应该打破元代的失误，重新回到唐宋传统，但是，由于开国者的封闭和小农意识，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将元代的错误更加放大了。

明太祖朱元璋从开国之初，就充满了对文人的不信任，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设立特务机构来防范大臣，同时又破坏官制的完整性，取消了宰相。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朱元璋对于任何能够被解读为反

皇权的思想都充满了警惕。这种警惕甚至让他对准了“四书”之一的《孟子》。

在读《孟子》的过程中，明太祖发现，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如果皇帝把臣民当作草芥，那么臣民就把皇帝当作寇仇。[63]这句话惹恼了朱元璋，就算君再胡作非为，臣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他决定将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废除，逐出孔庙，并且下令任何敢为孟子说情的人都以大不敬论处。后来刑部尚书钱唐强谏，朱元璋忍住没有治罪。孟子的配享地位最终也得到了恢复。[64]不过，朱元璋为了对付孟子，出了一本“洁本”的《孟子》，将对皇帝不利的话全部删掉了，明代所学的就是这个阉割版。

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为了统治人才的需要，朱元璋在刘基的帮助下，恢复了科考，但为了让人们只学那些听话的内容，皇帝开始对考试内容做出限制。

首先，他意识到，元朝的考试内容从四书五经里出题，已经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完成了限制思想的工作。而刘基又帮助朱元璋更进了一步，发明了“八股文”，要求考生将文章写成起承转合的固定格式。这样，考生们就只能学习四书五经，写作八股文，也就不用学什么诗词歌赋了。明代的考试制度也和现在很类似，一位现代的考生穿越到明代，一定感到很亲切，考试有专门的考房，考卷是糊名制的。[65]

在朱元璋时期，根据刘基的安排，所用的课本主要是：“四书”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易》采用《程传》和《朱子本义》，《书》采用《蔡沈传》和夏僎的《详解》，《诗》采用《朱子集传》，《春秋》采用《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及《胡安国传》《张洽传》，《礼记》采用《陈浩集说》。这些大都是理学课本。

但就算这样，明朝的皇帝仍然担心人们思想失控，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再编纂一套教科书，“教”会人们怎么安全地思考。这套书由中书庶吉士解缙提出[66]，但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编撰，解缙也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到了明成祖时代，皇帝终于下决心编纂教科书，这就是著名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

七部大全可以说是中国教科书最糟糕的典范，受到了后人激烈的批判。之所以糟糕，是因为一方面它编纂得极为仓促，带着粗制滥造的痕迹；另一方面它抄袭严重。由于元末的战乱和靖难之役，中国的文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创造性的时期，这时如果编纂大部头著作，大都是抄袭前代而来的。

比如《四书大全》，主要是抄袭了元代倪士毅的著作《四书辑释》，稍作修改之后刊行。倪士毅作品本来就错误很多，而经过修改后，错误更多，这本书就成了明代文人学习“四书”的标准著作。考生们可能没有读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反而对于《四书大全》都了如指掌，这样考出来的学生到底有多少真的领悟，的确令人感到担心。

其余的大全，也基本上都有一个到数个蓝本，《周易大全》抄袭自元代文人董楷的《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的《周易会通》、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以及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书传大全》以南宋蔡沈的《书集传》为抄袭对象。《诗经大全》抄袭元代刘瑾的《诗传通释》。《礼记大全》抄袭元代陈澔的《礼记集说》。《春秋大全》采用了元代汪克宽的《春秋纂疏》。

而《性理大全》则主要采纳了一些解说四书五经之外的关于理学的文章，比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邵雍的《皇极经世》等。

这七部大全就构成了明代文人的学术世界，至于七部之外的文章和学问，是读书人不关心，也学不到的，因为其余的学问对于做官毫无用处，考不到，甚至学多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就这样，中国的哲学从宋代的程朱理学，在极端保守的明代科考机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僵化的时期。

第十七章 蒙古大汗的宫廷圈奴（公元1206—公元1368年）

蒙古早期，展现了中国宗教宽容的最后版本。在哈拉和林蒙哥汗的宫廷内，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和谐共存，它们都在争取蒙古人的皈依，但蒙古人却保持了世俗化的特征，将所有宗教都圈养起来，却并不受任何宗教的支配。

在蒙古宫廷，发生了最早的东西方宗教的大辩论，西欧的天主教教士与穆斯林、道教教徒举行了教义辩论，最终却握手言欢。

蒙古人时期最激烈的辩论仍然是佛道大辩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老子化胡说。辩论多以道士的失败而告终。

随着统一蒙古帝国的分裂，不同部分的蒙古人也皈依了不同的宗教，元朝蒙古人变成了藏传佛教徒，而西方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争取蒙古人的目标遭到了挫败。

“蒙哥大汗要受洗皈依基督了！”一位景教修士得意地告诉传教士威廉·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

蒙哥大汗是蒙古人的第四任大汗，位于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之后，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哥哥，在他死后，忽必烈才登上了大汗的位置。

传教士鲁不鲁乞是法国国王圣路易（St.Louis，Louis IX of France）向蒙古人宫廷派来的使节团成员。他从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坐船出发，纵穿黑海，在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之后改走陆路，从俄罗斯大草原越过亚欧边界，进入蒙古人的地界。

他们先见到了一位当地的蒙古人首领，又见到了金帐汗国首领拔都汗（术赤的儿子，术赤是成吉思汗的大儿子）的儿子撒儿塔。撒儿塔把

他们送到了拔都那儿去。拔都再次把他们送往了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位于现在蒙古国境内）大汗蒙哥的营帐。

鲁不鲁乞所记载的蒙古之行[67]，应该成为中世纪纪实文学的经典，这个人的笔触非常冷静，描写细致，甚至带着点现代史学的味道。他不仅记录史实，还记录蒙古的社会、风土、人情、宗教。我们通过它对蒙哥时期蒙古的了解可能比其他任何的来源都多得多。

蒙哥汗坐在一张床上，穿着一件皮衣，皮上有斑点且有光泽，像是海豹的皮。他的鼻子扁平，中等身材，约有四十五岁。一个年轻的妻子坐在他身旁。一个很丑陋的，已长大成人的名叫昔里纳（Cirina）的女儿，同几个小孩一起坐在他们后面的一张床上。

蒙哥汗像是一个遥远的乡下人，可就是这个处于荒山野岭的乡下人，却成了半个世界的主宰。

而令鲁不鲁乞最吃惊的是，他发现蒙古人的周围并不缺乏宗教人士。他本以为蒙古人是落后、孤陋寡闻的野蛮人，却发现在哈拉和林，各个宗教的传教士都在围绕着蒙哥大汗嗡嗡叫。

这里有穆斯林，也有中国的道士，甚至有不少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也分成了好几类，人数最多的是景教徒。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相信耶稣有独立的人性和神性，而正统的基督徒却否认耶稣有独立的人性。景教徒在逃离了迫害之后，在中亚发展成一支独立的派别，又被蒙古人的近亲克烈人、汪古人所尊奉，最终传给了蒙古人。

除了景教徒之外，这里甚至还有原汁原味的基督徒，来自德国、法国，由于各种原因出现在了蒙古的草原之上。当然还有俄罗斯的正教徒，他们来自金帐汗国的领地。

但在蒙古宫廷真正形成气候的，只有景教（也算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三大派别。鲁不鲁乞发现，这三大派别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之中，它们互相配合着共同从蒙古人手中捞取好处，又互相排挤对方，希望多占一些利益。

虽然三大宗教围绕在蒙古人周围，但鲁不鲁乞发现，蒙哥汗真正信

奉的，却仍然是蒙古人的萨满教。以传教为己任的鲁不鲁乞感到有些失望。

但就在这时，一位景教修士却跑过来神秘兮兮地告诉鲁不鲁乞：蒙哥大汗就要信基督了，他第二天就要受洗。

在西方，受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意味着一个人终生皈依基督，而一个大汗（世界上最辽阔疆域的主宰）受洗，意味着整个国家都皈依了基督教。当鲁不鲁乞听说蒙哥大汗受洗时，大吃一惊，他请求第二天与景教修士一起去，作为目击者，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但第二天，修士并没有来叫鲁不鲁乞，反而是蒙哥大汗专门叫人来请他。鲁不鲁乞向大汗的营帐走去时，正好看到那位景教修士和几位教士离开，修士拿着十字架，其余的人拿着香炉和福音书，看来，他们已经给蒙哥施洗完了。

但就在这时，几位伊斯兰教士突然出现在了蒙哥的帐外，他们也是来给大汗施洗的。于是，伊斯兰教士又把景教修士的仪式做了一遍。

当穆斯林离开后，几个和尚突然来到了现场，他们也带着法器前来，进入大帐舞弄了半天才结束。

鲁不鲁乞惊讶地望着这一切，终于弄明白了，基督徒的施洗仪式在蒙古人眼中根本不算什么。蒙哥大汗在所有的节日里都会举行这样的仪式，把大家拉来当点缀，图个吉祥乐呵。在他看来，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都是差不多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为蒙古人祝福，不偏不倚，全部利用。这些人的施洗和萨满教的驱魔仪式一样，都是在祝福他健康长寿，除此之外没别的用处。

当鲁不鲁乞再见到那位景教修士时，修士仍然坚持蒙哥大汗只相信基督教。鲁不鲁乞想拆穿他的谎言，但景教修士坚决不承认。

从法国派来的教士鲁不鲁乞和蒙古人在一起厮混了好几个月，他在这里观察到了世界上少有的奇景，这里是世界各大宗教的会集地，当其他地方的宗教派别在流血厮杀时，这里的宗教却在和平共处。在他的笔下，也详细地记录了一件件有关信仰和哲学的大事。而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发生在蒙古人宫廷中的宗教大辩论。

有趣的是，这些辩论不仅被法国人记录了下来，甚至被中国人也记录了下来，于是，我们现在的人们能够详细地了解蒙古人宫廷之上的辩论是什么样的。这的确是一次次思想的巨大碰撞。

蒙古人的宫廷辩论主要集中在公元1254年（蒙哥四年）到公元1258年（蒙哥八年）之间，发生的原因是，各方面都在争取蒙古人的皈依，希望掌握这个征服者部族的思想，从而控制他们的行动。参加辩论的人包括了道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和佛教徒，记录者主要是佛教徒和基督徒。

这样的辩论，也表明了蒙古人统治这个特殊时期内，虽然他们允许汉族区域使用儒教进行统治，但实际上蒙古人更尊重的，还是儒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元朝这么晚才开始科举制度，因为蒙古人信奉了佛教（喇嘛教），对于儒教本来就是轻视的。

法国人记录的大辩论

公元1254年，首先发生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偶像教的大辩论。这三个教派都在争取蒙古人的皈依。其中偶像教可能包括了道教和佛教，由于鲁不鲁乞将它们看作错误的宗教，不加区分，没有注意到佛教和道教之间也有着根本的冲突。

鲁不鲁乞在哈拉和林时突然得到了消息，说蒙哥大汗要举行一场宗教大辩论，题目是：谁的宗教是正确的？

鲁不鲁乞这样记载蒙哥的话："你们都在这里——基督教徒、萨拉森人（穆斯林）和偶像教徒——你们之中每一个人都宣称，他的教规是最好的，他的文献——他的书籍——是最正确的。"因此大汗希望这些人在一起辩论，每个人都把他的辩词写下来，以便蒙哥能知道谁赢了，谁说的是真理。

作为客人的鲁不鲁乞也获准参加，他和景教徒一起组成了基督教阵

营，面对的对手是穆斯林和偶像教徒。他立刻跃跃欲试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各个击破，他专门制定了辩论技巧，决定先击破偶像教阵营。之所以这么选择，是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也支持只有一个主宰，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和穆斯林取得共识，共同击败宣称有很多神的偶像教徒。一旦击破了偶像教徒，基督徒再和穆斯林决裂，争论有关穆罕默德到底是不是先知的问题。

为了准备更充分，鲁不鲁乞甚至专门扮演起偶像教徒，先和景教徒辩论，寻找偶像教的弱点。同时，他们还规定了出场次序，由鲁不鲁乞首先发动攻击，万一鲁不鲁乞失败，也不至于引起整个阵营的崩溃，而景教徒还可以继续发动进攻。

辩论的日子终于到了，蒙哥汗派出了三名书记做仲裁人，这三人分别属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偶像教，表明仲裁是公平的。

鲁不鲁乞首先出来，望着对面一片偶像教徒，偶像教徒阵营里推出了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试图从“开天辟地”和“灵魂归宿”这两个话题来辩论，可是鲁不鲁乞却认为，应该从“上帝（神）的唯一性”这个话题来谈。最终裁判同意先谈上帝。

到底先谈什么，也反映了不同信仰的关注点不同，偶像教徒往往最重视的是灵魂的转移，甚至专门带了一个据说有三岁，却已经投胎三次的小孩子做表演。鲁不鲁乞却认为，基督徒和偶像教徒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基督徒只相信一个神，偶像教徒却相信很多神。

在辩论上帝问题时，偶像教徒果然又谈到世界上有许多的神，一个最大的，下面有许多次级的，以此类推，除了天上有神之外，地上也有神。

而鲁不鲁乞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神，这个神是全能的、善的。

但最后，却发现仍然是鸡同鸭讲，双方都不能理解对方为什么这么想。他们对神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基督教的神更加思辨，也更加抽象，包含在整个宇宙之中，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可是偶像教神的形象

却是具体的，每一个神都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也有无数的缺点。他们不理解，既然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他又怎么管得了这么大的世界，毕竟，神出现在这里，就不可能同时出现在那里。而对基督徒来说，神却是抽象的，可以同时存在于所有的地方。

由于不能理解对方对神的定义，这次辩论显得驴唇不对马嘴，不会有结果。但鲁不鲁乞却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方，在他看来，自己是胜利了。

偶像教徒们闭嘴退出了，按照策略，基督徒接下来要和穆斯林决裂，争论穆罕默德是不是先知。但就在景教徒气势汹汹想上场时，穆斯林却聪明地推脱了，说他们赞成一神论，基督徒不管说什么，他们都没有意见。

就这样，辩论稀里糊涂结束了。

鲁不鲁乞从欧洲过来，习惯于你死我活的辩论，却不知道这里的宗教人士也和蒙哥大汗一样，学会了和平共处。他们并不想争个你死我活，只愿意一起从蒙古人身上捞取好处，又何必争个你死我活呢？

当然，蒙哥汗虽然尊重各种信仰，心中却有着自己的归属，那就是本民族的宗教：萨满。在一次谈话时，他告诉传教士：蒙古人只相信一个上帝（腾格里）。[68]这表明蒙古人到这时还没有选定任何的外来宗教做皈依。

在送鲁不鲁乞回欧洲时，蒙哥汗写了信给法兰西国王，其中强调了西方必须归顺东方，否则上帝（腾格里）将会派蒙古人去惩罚他们。当然，他已经开始准备所谓的惩罚，一次新的西征——旭烈兀西征，这次西征打掉了穆斯林的哈萨辛派，更直接毁灭了巴格达的哈里发。但最终，旭烈兀创建的波斯汗国信奉了伊斯兰教。鲁不鲁乞经过的金帐汗国也信奉了伊斯兰教。

不过，蒙古本部和中国的元朝却向着另外的方向发展，信奉了喇嘛教。不管是蒙古人的哪一支，都没有信奉基督教。

鲁不鲁乞经历的大辩论，是蒙古历史上对信仰最宽容的时刻。但蒙

古人的宽容到了汉地却逐渐行不通了，汉地的佛教和道教的争斗与邀宠，让他们有些茫然。

第一次佛道大辩论

就在鲁不鲁乞大辩论发生的第二年，蒙哥大汗的宫廷内又发生了第二场辩论。这场辩论的主角已经换成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成吉思汗时期，曾经从内地招过去一个老道士丘处机，成吉思汗向他询问长生不老的方法。丘处机属于道教的一个新的支派——全真教。全真教在金朝时由王喆（王重阳）在陕西创建，后来他到山东招了七个徒弟，其中之一是丘处机。丘处机善写炼丹和延长寿命的顺口溜，让人误以为他会长生不老之术[69]。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传到了成吉思汗耳中，成吉思汗就派人把他找去。

丘处机从山东经过蒙古，一直到了中亚才见到了成吉思汗，在蒙古大汗面前，他只好说实话："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听后，觉得他没用，就把他送回了山东。[70]

这次见蒙古大汗却给全真教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个教派借着"注意力经济"迅速火了起来，成了中原道教的霸主，甚至逐渐开始侵袭佛教的地盘。

在和佛教的斗争中，这个教派拆佛寺、改佛像，将佛教逐渐排挤，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除了武力打击之外，全真教再次祭起了心理战术的大旗，又找到了《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宣称老子创立了佛教，甚至老子（或者他的徒弟尹喜）就是佛陀。

当佛教和道教发生了严重的对立之后，佛教徒想到了当时的中原霸主蒙古人，向蒙古人申冤寻求公道。

与蒙古人联系的僧人是少林寺长老福裕，他托人找到了蒙哥的弟弟阿里不哥，向阿里不哥叙述全真教欺负佛教的情况。阿里不哥汇报给了蒙哥，将全真教掌门人李志常、长老福裕等人带到了首都哈拉和林，在

万安阁举行了一次辩论。参加的人除了佛道两派，还有丞相钵刺海、翻译合剌合孙、学士安藏，以及其他的亲王贵戚。[71]

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处：第一，福裕整理了道教打砸抢占的500余处佛教地点，请求蒙古人做主，要求道教归还；第二，要求证伪《老子化胡经》。

福裕提出，《老子化胡经》说老子生于五运之前，也就是天地之先，可是根据《史记》，老子和孔子都出生在周代衰落之后。甚至他举出了一首唐诗，这首诗也说老子生于战国时期[72]。最后他反问：如果老子是大贤，应该辅佐国君安定百姓，可为什么他放弃中原的混乱不管，反而跑到西方去了呢？

蒙古人最后支持了福裕的提法，要求道教徒归还部分寺院，弥补损失，同时烧毁《老子化胡经》。

这一次辩论是对全真教发展的一次重大打击，掌门人李志常从此信心全无，第二年就去世了。

但佛道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第一次辩论地点在蒙哥汗的宫廷哈拉和林，由于路途遥远，去的人不多，且辩论没有充分展开，影响力有限。而归还寺庙、烧毁经版的做法更是引起了普遍的敌视，最终，蒙古人认定，必须让佛道两派再来一次更加正规的辩论，从理论上解决《老子化胡经》的问题，才能够解开佛道矛盾。

三年后，矛盾激化了，蒙哥大汗要求弟弟忽必烈在后来成为元上都的开平府，再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辩论会。

被剃头的道士

根据记载，双方都派出了精锐部队参与辩论。参与的外国人有：那摩国师、八思巴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大理国僧，这些人都来自蒙古人的疆域，但已经属于汉地之外的区域。汉地僧人则有三百余名参与。

而道士方面则有道士张真人、蛮子（元代的第四等人南人）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道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人。

中立方，作为证人和裁判的也有两百余人，有蒙古人的丞相、达鲁花赤等高官，也有忽必烈的谋臣、汉儒代表姚枢、窦默等。

这一次辩论最大的看点，是佛道双方的一次对赌活动。对赌的起因是这样的。忽必烈问双方，如果输了有什么惩罚？道教一方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不敢明着回答，僧人一方倒是干脆，说按照西方的惯例，输掉的砍头谢罪。忽必烈最后定规矩：不需要砍头，如果佛教输掉，就让僧人蓄发戴帽；如果道士输掉，就剃头当和尚。参加这次对赌的各有十七名代表，这份代表的名单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表10　佛道对赌名单[73]

佛教	道教
燕京：圆福寺长老从超、奉福寺长老德亨、药师院长老从伦、法宝寺长老圆胤、资圣寺统摄至温、大明府长老明津	大都天长观：道录樊志应、道判魏志阳、提点霍志融、讲师周志立、讲师周志全、讲师张志柔、讲师李志和、讲师卫志益、讲师张志真、讲师申志贞、讲师郭择善、待诏马志宁
蓟州：甘泉山长老本琏、上方长老道云	真定府神霄宫：讲师赵志修
滦州：开觉寺长老祥迈	西京开元观：讲师张志明
北京：传教寺讲主了询	平阳路玄都观：讲师李志全
大名府：法华寺讲主庆规、龙门县杭讲主行育	代阳胜宁观：讲师石永玉
大都：延寿寺讲主道寿、仰山寺律主相睿、资福寺讲主善朗	抚州龙兴观：观主于志申
绛州：唯识讲主祖圭、蜀川讲主元一	

辩论开始后，佛教选择进攻，问道：《化胡经》真的是老子说的？

道士回答：是老子说的。

和尚们开始设疑：如果是老子说的，那么和尚剃发受戒的规矩也应该是老子定的，你也应该知道这些步骤，不妨说一说。

道士回答：剃发是你们的屁事，老子不管。

和尚反驳说：受戒这种小事你都不知道，《老子化胡经》明显就是

假的。

接着双方又争论佛是什么。道士回答佛是好人，后来又说佛就是觉悟，觉天觉地觉阴觉阳觉仁觉义觉知觉信，无所不觉，这就是佛的真义。

和尚立刻反驳：你的这种对佛的定义，无非是拿对孔子的定义来套佛，可你们为什么不把孔子当作佛呢？

说到这里，圆福寺长老还和儒士姚枢开起了玩笑，问他道士对佛的定义是不是和儒教差不多，姚枢说是。圆福寺长老说看来道士不光偷佛经，还偷你们儒教，你们要小心看好不要让道士当面偷了。

接下来到了呈现证据的时候，道士们把《老子化胡经》和《史记》一起呈给了忽必烈，作为老子是佛陀的证据。[74]

忽必烈对于《史记》印象深刻，问道士这是什么。道士回答，这是汉地有名的皇帝的书，集成起来作为古今凭证。

这句话惹恼了忽必烈，忽必烈随即问除了汉地之外，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皇帝？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继续问：其他地方皇帝的话是不是也管用？道士只好回答管用。忽必烈反问：为什么其他地方的皇帝都没有记载老子的事情呢？

就在道士们沉默之时，那摩国师忍不住骂了一句：这般驴马之人百事不晓！

那摩国师过后，到了吐蕃人八思巴国师出场，他问：老子留下的根本经叫什么？回答是：《道德经》。

八思巴继续提问：《道德经》上有说化胡的事情吗？

回答是：没有。

那么什么上有说？

回答：汉地的《史记》上有说。

八思巴立即举出“西天的《史记》”，频婆娑罗王的记载，说佛是天上天下、十方世界都没有第二个，又怎么能是老子化的呢？

道士对于频婆娑罗的来头不知道，不能反驳，吃了大亏。最终皇帝发现道士们已经无力辩驳，作为裁判的姚枢也乘机宣布佛教获胜。

从辩论的过程来看，道教的失败是注定的。此时的蒙古人从见识上来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固守中原的道士们。蒙古人去过中亚、俄罗斯和欧洲的边境，在他们的眼里，世界要大得多，中国的汉地只是世界的一角，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接触到的学问也是世界性的，知道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其他伟大的皇帝和国王，也知道中国人的学问是有限的，在工程、数学、财务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并不把中国文化过分看重。

但对于中国的道士来说，汉地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所学到的那些学问，只是古代的经验而已，却并不知道蒙古铁蹄下的世界已经骤然扩大，而蒙古人宫廷之中，也聚集了全世界的学者。当把汉地特别是道教的那点小学问放在世界学者们的聚光镜下时，那点知识就显得可怜而微不足道了。

不管是八思巴还是那摩国师，他们显然了解蒙古人的看法，所以，更容易用世界性的知识来驳斥道士，他们的辩论完全是站在不同层次上的辩论，道士们在防守时，都无法判断对方会从何处攻击。

佛道辩论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上中国学术一直缺乏成熟的辩论技巧，而佛教专门为辩论准备的因明学却异常发达。道士们开个道场，制个符箓是可以的，但如果上升到思辨层次，则变得极其幼稚，没有章法，这样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道教失败后，蒙古人下令：第一，归还道教霸占的佛寺数百所。第二，烧毁以《老子化胡经》为首的道经经版。由于经文的雕刻都是雕版的，一旦雕版被毁，很难重新制作。第三，十七位道士被迫剃度，当了和尚。

为了防止这十七位新和尚重新变成道士，忽必烈下令将他们分别安

插到寺庙之中，并记入佛籍，时时刻刻看守他们防止开溜。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一批僧人。

蒙古人时期的这三次辩论，虽然表面上看只是蒙古人选择信仰时的争执，实际上却给所谓的中国本土思想敲了警钟。

不管是参与争论的道教，还是没有参与争论的儒教，这些中国本土思想大都是以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的，即只允许你相信，不许不信，更不许质疑。它们的存在基础是制定教条让人遵守，而无法通过有效的论证和逻辑进行证明。

到了蒙古人时期，不管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有非本土化的佛教体系，都已经逐渐从信仰时期过渡到了思辨时期，一条理论之所以被相信，是要经过逻辑检验的。这是为什么道教的理论在佛教的攻击下变得体无完肤。

另外，中国思想缺乏抽象的能力，使得它无法跟上世界的脚步，去理解更加思辨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宋儒理学被认为是中国思辨的高峰之一，但理学中的概念如果放在西方经院哲学体系之中，却早已经被讨论了千百遍。

缺乏思辨能力和怀疑精神，只是一味地从思想和行动上对人进行束缚，这种方法使得中国虽然在表面上仍然繁荣，却已经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三教并存的时期，它在政府组织上尽量遵循儒教，那是为了便于管理汉人。但元代的统治者却选择了更加思辨的藏传佛教体系，他们甚至没有选择汉传佛教，实际上，汉传佛教经过唐代的发展已经逐渐放弃了思辨和逻辑，变得和儒教、道教一样更讲究束缚了。

蒙古人之所以这么选择，和他们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有关，在接触这三种宗教之后，很难说中国的思想体系还有多少吸引人之处，蒙古人上层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蒙古人之后，明代作为汉传思想的直接继承人，成了最保守最落后

的思想代表。清代虽然统治者采纳了藏传佛教，但和元代一样，为了便于管理，仍然使用儒教原则来治理社会。明清的选择，也注定了中国思想无法走出束缚的怪圈，进入另一个思辨的体系之中。

中国原创思想的落后性从元代开始已经有所表现，并注定了最终的结局，只是，当时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在意…

注解：

[1] 见《宋史·王安石传》。

[2] 《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取材》："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神宗熙宁四年》："明经及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诸科新人应举，渐令改习进士。仍于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其礼部所增进士奏名，止取五路进士充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诸科向习进士。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

[4] 见《宋史·范仲淹传》《宋史·富弼传》。

[5] 《资治通鉴》由保守派领军人物司马光领衔，《新唐书》由保守派大将欧阳修领衔，《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的私撰史书。

[6] 见《宋史·夏国传》。

[7] 见《宋史·仁宗纪》《宋史·富弼传》《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8] 见《范文正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

[9] 具体内容参见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第九章。

[10] 《宋史·范仲淹传》："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七》："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财赋，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韩滉专制镇海，积聚财货，德宗遣其子皋往求，得百万斛以救艰危，即当时朝廷事势可见矣。朕今收拾天下遗利，以赡军国，以

济穷困，若豪民猾户，望吾毫发之惠不可得也。”

[12] 《宋史·欧阳修传》：“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

[13] 《宋史·食货志下一》：“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

[14] 《宋史·王安石传》：“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15] 具体内容参见本书作者所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6] 司马光是公元1019年生人，王安石是公元1021年生人，苏轼是公元1037年生人。

[17] 见《宋史·苏轼传》。

[18] 《上清储祥宫碑》：“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术公金母之号，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天皇、太一、紫微、北极之祀，下至于丹乐奇技，符箓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则韶濩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札，不能以致刑措。汉兴，盖公治黄老，而曹参师其言，以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以此为政，天下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其后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敛缓狱，不言兵而天下富。”

[19] 《南华长老题名记》：“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20] 《龙川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21] 《龙川集·卷二十·又甲辰答书》：“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

[22] 见《宋史·叶适传》。

[23] 《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八·论雕印文字劄子》：“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版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篇首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

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乃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版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24] 见《宋史·富弼传》。

[25] 见《宋史·欧阳修传》。

[26] 见《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27] 见《宋史·徽宗纪》。

[28] 见《宋史·欧阳修传》。

[29] 《朋党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30] 《宋史纪事本末·庆历党议》：“范仲淹亦谓韩琦曰：为此鬼怪辈坏事也！”

[31] 见《宋史纪事本末·庆历党议》。

[32] 《徂徕集·去二画本纪》：“有老子生焉，然后仁义废而礼乐坏，有佛氏出焉，然后三纲弃而五常乱。呜呼，老与佛，贼圣人之道者也，悖中国之治者也。”

[33] 见《徂徕集·尊韩》。

[34] 见《徂徕集·与士建中秀才书》。

[35] 《太极图说》全文：“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36] 邵雍著作《皇极经世》，所谓皇，指的是“至大”；所谓极，指的是“至中”；所谓经，指的是“至正”；所谓世，指的是“至变”。

[37] 《西铭》全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

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38]　《宋史·程颢传》：“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39]　《宋史纪事本末·洛蜀党议》：“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歌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

[40]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赵元镇用伊川门人》：“赵元镇初相，喜用程伊川门下士，当时轻薄者遂有伊川三魂之目，谓元镇为尊魂；王侍郎居正为强魂，以其多忿也；谓杨龟山为还魂，以其身死而道犹行也。”

[41]　《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诎》：“（宋高宗绍兴六年十二月，左司谏陈）公辅上疏言：今世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之学，相率从之，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者非也。诚恐士习从此大坏，乞禁止之。”

[42]　《宋史·孝宗纪》：“五年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从之。”

[43]　《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诎》：“臣窃谓天下之士所学于圣人之道未尝不同，既同矣，而谓已之学独异于人，是必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邪正之辨，诚与伪而已矣。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已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

[44]　《宋史·李道传传》：“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

[45]　见《宋史·魏了翁传》。

[46] 见《宋史·朱熹传》。

[47] 《宋史·理宗纪》：“（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丙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郿伯，程颢河南伯，程颐伊阳伯。”

[48] 宋代文庙制度参考《宋史·礼志·文宣王庙》。

[49] 见《元史·祭祀五》。

[50] 见本书作者所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书。

[51] 《辽史·义宗倍传》：“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52] 《金史·选举志》：“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

[53] 本书所谈的金国考试制度参见《金史·选举志》。

[54] 本表根据《金史·选举志》制成。

[55] 《金史·熙宗纪》：“（天眷三年）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

[56] 《金史·熙宗纪》：“（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57] 《元史·耶律楚材传》：“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

[58] 《元史·太宗纪》：“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

[59] 《元史·太宗纪》：“八年丙申春正月，诸王各治具来会宴。万安宫落成。诏印造交钞行之。”

[60] 《元史·太宗纪》：“秋八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

[61] 《元史·耶律楚材传》：“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楚材曰：‘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奏罢之。……自庚寅定课税格，至甲午平河南，岁有增羡，至戊戌，课银增至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

合者，谄事镇海，首引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楚材极力辨谏，至声色俱厉，言与涕俱。帝曰：‘尔欲搏斗耶？’又曰：‘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叹息曰：‘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

[62] 见《元史·选举志》仁宗皇庆三年十一月诏。

[63] 《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64] 《明史·钱唐传》：“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65] 见《明史·选举志》。

[66] 《明史·解缙传》：“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67] 鲁不鲁乞的观察参见他的回忆录《鲁不鲁乞东行记》。

[68] 《鲁不鲁乞东行记》：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腾格里），在他保佑下我们生活，在他保佑下我们死亡，对于他我们怀着一颗正直的心。但是，正如上帝赐给手以不同的手指一样，同样地，他也赐给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并不遵守它们。另一方面，他赐给我们占卜者（萨满），我们按照他们告诉我们的行事，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69] 现从《丘处机集》中摘两首：（其一）还丹要妙筑基先，筑得基牢寿命延。延寿须饮延命酒，饮将一得返童颜。（其二）月在当头星在天，阴阳妙处岂言传。人将纸上寻文字，看尽丹经也罔然。

[70] 见《长春真人西游记》。

[71] 以下叙述内容参见《大元至元辩伪录·卷三》。

[72] 唐代胡曾《咏史诗·流沙》：“七雄戈戟乱如麻，四海无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将徐甲去流沙。”

[73] 本表采自《大元至元辩伪录·卷四》。

[74]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内容，被当作了老子西去化胡的证据：“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第五部 世俗哲学兴起：洗脑术的没落（公元1368—公元1911年，明到清）

第十八章 用“心”反叛束缚（公元1368—公元1529年）

随着明代八股文的兴起，做官的学问变成了死学问，从民间再次兴起了一波自由学术的潮流，其中的代表就是心学。

南宋后期虽然树立了道学，但另一股潮流却保留了下来，这就是陆九渊所代表的心学。理学认为真理高高在天外，控制着人类的一切，将人类束缚在天理上；而心学则强调人类应该服从于自己的内心，摆脱心外的束缚。

明代的陈白沙重新提倡心学，成为一代宗师。心学由于提倡自由精神，逐渐成为民间反抗僵化思想控制的武器。

作为明代文人代表的王阳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迫害后，龙场悟道，将心学变成了显学，不管是民间还是官场，都兴起了研究心学的热潮。

明代的学术是分裂的，人们知道科举的知识并非是真学术，在科举之外毫无用处，但他们一方面学习“科举技术”，另一方面却毫不耽误他们标榜自己为心学子弟。

公元1397年（明太祖洪武三十年，丁丑年），在首都应天府（现江苏南京）举行了明朝建立以来第九次国家级考试，各地的举人纷纷赶来，参加丁丑科会试，如果能够考取，就有了贡士的身份和当官的资本。

这一年考试的主考官是德高望重的大学士刘三吾，他已经八十多岁，是个饱学的鸿儒，与汪睿、朱善并称朝廷的三老。他之所以成为考官，除了学问好之外，还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

放榜时，人们突然发现，刘三吾录取的五十二名考生，籍贯全是南方人，而北方人一个都没有。这件事最初只是私下流传，就连考官本人都没有当回事，贡士放榜之后，刘三吾继续组织殿试，殿试过后，这一届的考试本应该成为历史。[1]

但随着北方考生声音的放大，事情终于传到了皇帝的耳中。朱元璋开始下令彻查。刘三吾和他的副官白信蹈认为，之所以全部录取南方考生，是和当时的教育质量有关的，并非是作假。

从唐宋以来，北方战乱频仍，南方获得休养生息的时间较长。元代控制中心也是在北方，至于南方，虽然蒙古人灭掉了南宋，却无力建立有效统治，致使南方遭受的破坏较小。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中国的文化也出现了倒转，南方的文化已经远远超越了北方。丁丑科放榜的全部是南方人，恰好反映了南方和北方的这道学术鸿沟。

但这种看法在朱元璋这儿却通不过，对于皇帝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学术，而是政治。实际上，虽然教学内容的固化，所谓学术早已寿终正寝，但皇帝并不需要真正的学术，他考虑的是如何才能笼络住全国的人心。特别是明朝起于南方，而蒙古人虽然退回了漠北，却随时可以回到中原北部，如果北方的读书人寒了心，必然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

皇帝责成侍读张信等十二人重新阅卷，希望能够给北方读书人找到一个台阶下。没有想到，张信等人汇报时，仍然坚持了刘三吾的判断，认为榜单被南方人包揽是合理的。为了证明合理性，张信还专门把北方考生的考卷拿来呈给皇帝，和南方考生的考卷作对比，彰显其中巨大的差距。

张信、刘三吾的不配合让皇帝大怒。有人立刻读懂了皇帝的心思，检举张信故意拿北方学生中的差卷来充数，以帮助刘三吾洗脱罪名。

这次检举给了皇帝台阶。他下令将主考官刘三吾发配边关，而将他的副官白信蹈和张信一起诛杀。皇帝重新制定考题，再次考试，亲自阅卷，等放榜后，一共取了六十一人，这一次录取的竟然全是北方人。

这件事对于未来的影响有几重：第一，从此以后，科举考试开始在地域上找平衡[2]，到了公元1425年（洪熙元年），正式规定南方省份和北方省份的录取比例为六比四，保证北方文人的数量。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出来个中部省份，规定南方录取五十五名，北方录取三十五名，中部录取十名。[3]之后又有变化，但这样的架构保留了下来。

中国现在的高考分省设分数线录取的规则，就来自明代。不过，明代最初的目的是照顾落后地区，而现在的目的则是照顾中心地区，以北京、上海的考生分数能上清华北大，在其他省份可能只能上个地方师范院校。

第二，没有人相信刘三吾作假，也没有人相信朱元璋真的愤怒了，他只不过是要找几个替罪羊将事情圆转过去。可皇帝寻找替罪羊，却导致了无辜大臣的死亡。这件事集中地反映了明朝统治制度的严酷，也打消了许多读书人，特别是南方读书人的积极性。

南方文人的反思，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在唐代，由于统治者尊重文化，读书人很容易就找到当官的途径，所以唐代的读书人和仕途是不分家的，官员们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也都是著名的文人，诗酒应答，文采飞扬。政府也不限制人们读什么书，一个人不读孔夫子，完全可以凭借佛教、道教甚至诗词歌赋入仕，唐代的官员的最高学问，就是整个社会的最高学问。

宋代虽然同样尊重读书人，但王安石之后，出现了强烈的党争，使得读书人当官的路子不好走了，必须参与党派，才能当官。即便文采如苏轼，由于党派的排挤，大部分时间是被边缘化的。这时的读书人之中出现了一批人不以当官为目的，只为了研究学问。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都带着民间学问的特征。他们广招门徒，一旦门

徒中有人发达了，老师的学问就推广开来。

所以，宋代的学问是半官方半民间的，在民间做学问的目的最终仍然是为了获得官方认可，这就是为什么宋代总是出现党禁的原因。

到了明代，情况又有了变化。明代的读书人依靠官方做学问的空间已经很小，如果依靠官方，只能读劣质的参考书（各种大全），写八股文，这显然满足不了他们的学术需求。更麻烦的是，皇帝一系列的规定将学问打成了权力的附庸，明朝的官员虽然出身于科举，但有真正学问的并不多，大都是皇帝说啥，就帮着皇帝寻找依据，学术的自由和官方的束缚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对立。

到后来，明代的读书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人彻底放弃思考，以科考为目的来学习；另一部分人则放弃了官场，坚持自己的民间学术立场。

坚持民间学术立场、脱离官场的一部分人，又借助着世俗商业的兴起，成了商业阶层的代表。到最后，明代的民间学术反而出现了市井化、实用化的倾向，不管是哲学还是文化都逐渐发达，与官方控制的学术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明代，民间学术的发展使得哲学背离了官方指定的理学道路，沿着一条前人打下的小路，找到了一条反叛之路。他们认为，不管皇帝怎么控制人身自由，只有一个领域是自由的，政府无论如何无法插手，那就是：一个人的内心！

鹅湖寺风波

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一个叫作鹅湖寺（现江西铅山县鹅湖镇）的小地方迎来了它历史上的巅峰时刻。

这一年，朱熹和他的朋友吕祖谦来到了位于当时信州的鹅湖寺，随后，吕祖谦邀请另两位哲学家——陆九龄和陆九渊兄弟——也来到了这里。双方展开了一次关于认识论的大讨论，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重

要的思想碰撞。

双方的焦点在于：一个人到底怎样才能获得“天理”，也就是最高的绝对的知识？

针对人类的学习能力，朱熹提出，人类的学习，就是“格物致知”的过程。格物致知，就是穷尽所有事物之理，推广到知识的极致。按照他的主张，人们首先应该是对具体的事物进行思考，找到具体事物的道理，再进行总结获得更加普遍的高层道理，以此类推，逐渐上升到“天理”，并以此来指导人们的行为。

而陆氏兄弟则认为，按照这种方法，穷尽一生也无法获得“天理”，因为世间事物如此之多，哪有时间每件物都去格一遍？即便格一遍，也很难从每一件具体的事物中提取出什么有用的道理，更无所谓获得“天理”了。

针对认识论，陆氏兄弟则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他们并不反对天理的存在，而是认为，其实天理不需要每件物都去格，所谓天理，就隐藏在每个人的心中，既然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直接去心中寻找就行了。

在他们看来，人从出生开始，心中就已经有了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甚至在孩提时这些知识还更纯粹，长大了反而越来越被污染，忘记了本心。所以，人类不需要读太多儒经，也不需要面对每一根竹子都格一遍，而是定下心来，跟随内心的召唤。

双方吵了数天之后，没有达成统一认识，最后不欢而散。

鹅湖寺之会只是几个文人的冲突，其哲学意义上的丰富程度也比佛教辩论要弱得多，却由于朱熹最后被封神，这一场争论被记入了史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大事件。

鹅湖寺之会，也成就了陆氏兄弟的“心学”，它成了宋代理学的一个异类，直接影响到了明代心学传统。

陆九渊，江西抚州人，出生于当地的大家族，有兄弟六个，其中哥哥陆九韶、陆九龄和他三人的共同研究，形成了一代心学学派。

关于他对心学的理解，传说他从小时候就思考这方面的问题。[4]他在三四岁时，就曾经问过父亲天地到底有多大，父亲笑而不答，引得他废寝忘食地思考。稍大一点，开始读程颐的书，突然意识到，程颐虽然标榜来自孔孟，但他的理论却和孔孟相差极大。这是陆九渊和程朱理学分裂之始。在读古书时，他有一次见“宇宙”两个字，请人解释，说“宇”是空间量度，就是东西南北上下的延伸；而“宙”是时间量度，就是往古来今直到无穷。他突然意识到原来宇宙内的事情就是自己心中的事，而心中的事情就是宇宙的事。

最能表明他想法的，是他的一段话：东海有圣人，他对于“天理”的认知必定藏在心中，而西海、南海、北海的圣人，心中也必定有对“天理”的认知，而这些认知虽然来自于不同人，但既然是同一个“天理”，认知也必然是相同的。所以，东西南北圣人的心其实是相同的。[5]

通过这样的抽象，陆九渊就得到了一个概念——“心”，认为天理存在于人的心中，天理相同，那么人的心也必然是相同的。这个心不同于一颗颗具体的心，而是一个抽象的心，这个抽象的心与“天理”是等同的概念。不过这个抽象的心又蕴含在每一个具体的心之中，再被装进了每个人的胸膛里。所以，每个具体的人要想了解天理，首先要通过自己胸膛中这颗具体的心，达到那颗抽象的心，再达到最终的天理。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陆九渊和朱熹的分歧并不在有没有天理，其实双方都承认天理，但在承认天理之后的方法论上，两者却截然不同。朱熹希望通过观察思考外部事物来获得天理，而陆九渊则认为应该求诸自己的心中。

由于方法论上的不同，他们对于儒教经典的态度就有所不同。比如，如果一个人和朋友吵了架，朱熹的判断方法必然是从经典中寻找解决朋友矛盾的办法，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根据中庸的原则，希望以息事宁人的方式来获得和解。陆九渊则会告诉你，抛弃一切经书典籍，根据你的心自己去判断，因为真理已经在你心里，如果你的心告诉你，这个朋友不值得要，就直接散伙；如果你珍惜这个朋友，自然会想办法留下他。前者求助于外界，后者则求助于本能。

正因为更相信自己的心，陆九渊曾经对劝他写书的人说：写书要么

是六经注我，要么是我注六经，写它干什么。又曾经说过，做学问如果知道了“道”，那么六经只不过都是“我”的注脚而已。[6]

从理论上说，陆九渊并不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家。朱熹为了论证万物如何影响人类社会，首先要从万物上升到天理，再设想一种东西叫作“气”，由理影响气，而气再影响人类的认知，从而达到人的精神，最终影响人类社会。但对陆九渊来说，这一切都是不证自明的，人心里就有天理，还去论证这些干什么。

这种简单性会让哲学家们嗤之以鼻，却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而他本人也把这种简单性运用在了政治上。

他曾经担任荆门军的地方官。宋代在边境地区设立了一种军屯机构，类似于州府，但名字叫“某某军”，荆门军就是荆门地方的军屯。这种军屯除了军队驻扎之外，围绕着军队也会形成庞大的民间社会，需要政府的民政机构治理。

由于地处边境，人等繁杂，这类的民政机构在治理上更加复杂。但陆九渊不看重条条框框，往往能够一眼就找到简化的方法，解决实际的问题。他减轻税负，简化诉讼手续，减轻惩罚力度，一切便宜行事，反而让当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说，陆氏的心学比起繁文缛节的朱氏理学，更利于经济的发展。

但是，南宋晚期的局势却对陆氏心学不利，因为政府的财政崩溃要求加税，社会的不稳定要求加强社会控制，陆氏却是反其道而行，希望减轻控制力度，将判断对错的权力交给每个具体的人，削弱了政府的权威。

到最后，朱熹的理学得以成为政府的标配，心学却在陆九渊之后走入低谷，陷入了被遗忘的境地。

陈白沙：变奏之始

时间进入了明代，另一场心学的复兴运动正在酝酿。

公元1451年（景泰二年），著名的学者吴与弼收了一位落第的乡举为弟子。吴与弼是明代早期学者，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却一辈子立志不当官，以研究学术和开课授徒度过一生。在黄宗羲著名的《明儒学案》中，将吴与弼作为明代第一个学派“崇仁学案”的创始人。[7]

吴与弼本人是一个虔诚的理学信徒，为了学习曾经数年不下楼。在学问上，他的思想接近于正统的朱熹式思想，创造性不大。但在治学上，他强调要心境澄明，去掉刚勇的血气，这其中，似乎蕴含着心学的影子。不过，如果有人告诉吴与弼本人，他偏离了理学的道路，一定会遭到他的驳斥。

可吴与弼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收的弟子陈献章，最终却成了一个叛逆、脱离了程朱理学的窠臼，自成一体，重新发现了心学的人。

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最初以考试为目标，接连考取了秀才和举人，可是在继续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却总是失败，最后前往江西投奔了吴与弼。学习半年后，回到广东专心读书，他专门修筑了一个书阁叫阳春台，在其中日日静坐，苦思数年之后，抛弃了老师的学问，也抛弃了朱熹的理学。

朱熹的理学是一种讲究进取的学问，他要求学者主动去“格物”，以求获得其中的真知。吴与弼虽然强调养心和沉静，但在格物致知上从来没有抛弃朱氏的理论。陈献章却将静发挥到了极致，认为人的修养首先要舍弃繁华，回归简约，静静坐着将心中的杂事都抛弃掉，才能发现世界的真相。他教学生的时候，首先要求学生端正地静坐，让心安静下来，从静中寻找心之所思所想。[8]

他之所以取静，从根本上说，是被朱熹逼的。在他发现静的道理之前，按照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论研究学问，朱熹强调“理一分殊”，也就是说天理只有一个，但在各种事物中的表现不同，为了追求这个天理，必须对于不同表现都一一进行追究，这样追究下来，不是把人搞得更明白，而是让人变得混乱不堪，陷入具体的事物之中。

陈献章发现，要从朱熹理学的一团乱麻中跳出来，必须静下心来坐好，将这一团乱麻全部从心中清理出去。心中放空之后，反而能看到一

片桃源景象。

他最终认定，所谓的理并不在于具体的格物之中，而是就在人的心中。当人心能够静下来统御万物时，就达到了天理。如果人心无法静下来，而是被万物所左右，就变成了万物的奴隶，谈不上所谓的天理了。

这种想法最终又回到了陆九渊。陈献章在陆九渊之后数百年，重新把心学发现了一遍。

发现心学后，陈献章回到了京城，他曾经就读于太学，现在回去探望。他的学问突然间名震京师，甚至有官员立刻辞官不做，拜他为师。回到广州后，人们纷纷探望已经成了名儒的陈献章，白沙学派成为显学。

陈献章之所以显名后世，还得益于他的学生湛若水。湛若水也是广东人，中了举人，在赴京赶考之前认识了陈献章并拜他为师，甚至烧毁了赶考的路条，安心学习。

不过最后湛若水学成之后，还是回到了考场，考取了进士。考取进士的过程也和陈献章有关，当时的考官是学士张元祯和杨廷和，他们看了湛若水的考卷，赞叹说：只有陈白沙的学生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于是把他选做了第二名。[9]

湛若水历任礼部侍郎、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作为高官更有机会宣传老师的学问。他走到哪儿，就把老师的学问带到哪儿，首先建立书院祭奠陈献章。湛若水活到了九十五岁，这使得陈献章的学问遍及天下。

人们在谈论陆王心学时，往往会谈及两人的不同点，比如，陆九渊是从理学到心学的，简单说，首先承认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天理”，只是在如何认识天理这个问题上，才认为心里就含着天理。而王阳明则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天理，将一切都解释成心的活动。

陈献章、湛若水两人的看法和陆九渊更加接近，他们讲的是“随处体认天理”。也就是说，天理是存在的，但是在学习天理的过程中，要做到

心之所至，理之所至。所以，陈白沙虽然背叛了朱熹，但仍然可以看作一次对朱熹的改造，并没有完全背离理学，或者说，只是改造了学习的方法论而已。

而再接下来，明代哲学终于超出了理学的范围，开始了更加开创性的一步。

王阳明：无奈的思想反叛

公元1506年（明武宗正德元年），一位三十四岁的中年人开始了自己的逃亡和流放之路。这时恰值大太监刘瑾擅权，他大肆打击政敌，大部分官员为了怕得罪他，不敢为被打倒的人说一句话，但一位资历很浅的官员却站了出来[10]，他就是王守仁。

王守仁时任兵部主事，是一个勤勉、有抱负的官员，他的父亲王华则是成化十七年的进士第一名，任礼部左侍郎。父子双进士，共同在朝为官，本来是一桩佳话。但在刘瑾迫害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时，心高气傲的王守仁忍不住出来说了几句话，结果得罪了刘瑾。他本人被打了四十杖，公开羞辱一番，最后被发配到贵州的龙场当驿丞，这个职位是不入品的小官，相当于某个偏远县的邮政局局长。他的父亲也受到牵连，改为南京吏部尚书。

但刘瑾根本就不打算让王守仁活着。在去往龙场驿的途中，王守仁遭到了刘瑾一派打手的追杀，只能脱掉衣服伪装成跳水自尽，才躲过了一劫。他逃到了南京的父亲处，父亲开导了他一通，认为驿丞虽然是不入品的小官，但毕竟是皇帝的旨意，应该去上任。

王守仁辞别了父亲，到了龙场驿。在这里，已经到达人生最低谷的他开始总结自己的人生哲学，并成了一代宗师。

明朝到了王守仁时期，仍然是程朱理学统治天下，虽然陈白沙已经开始发展心学，但影响力还无法与理学相比。

王守仁则是从另一个方向上怀疑理学。在年轻时，他曾经是一个理

学的信徒，但与普通的理学学者不同，他却执迷于悟道。比如，普通的人都会说，世界上有一种包罗万物的“天理”，这种天理就隐藏在纷纭复杂的万事万物之中，一个人要想领悟这种天理，就必须首先去“格物”，也就是去领悟万事万物。大部分人学到这一步就算了，至于从万事万物中领略的天理到底是什么滋味，他们就觉得太难了，不去管了。

王守仁却想真的从万事万物中领略天理，所以，他最初对着一根竹子不停地去“格物”，想发掘出竹子里蕴含的天理，可不管怎么对着竹子看，它还是根竹子，很难从这根竹子上领悟到什么大道理。最终，他认定，这种空对着竹子胡思乱想的做法绝对找不到天理，还会把心情搞乱套。所以，朱熹的所谓“格物致知”无助于寻找天理，只不过是告诉人一种等死的方法，一个人可以对着竹子思考一辈子，就到了死的时候了。

王守仁年轻时没有想到如何破掉朱熹的“格物致知”，但到了龙场这个偏僻的地方，却有了更多的世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最终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后来心学信徒最常提起的“龙场悟道”。

王守仁想到的答案是这样的：他认为朱熹解释的“格物致知”是错误的，实际上，“格物致知”有另一种解释方法。朱熹认为，要想获得关于天理的知识，必须首先去对着各种物体苦思冥想，他的方法是从“物体”到“知识”。而王守仁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人类意识和外界事物的交互过程应该是从“知识”到“物体”。

他认为，所谓天理，根本不用去外面寻找，它就藏在人的心里。每个人都有一颗心，但他们生下来，心中就深藏着所有的知识，只是这些知识被隐藏起来，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一旦意识到了这些知识，我们就了解了全世界。[11]

所谓“格物致知”，就是把外界的万物放回到心里，发掘出内心知识的过程。他的方法是从“知识”到“物体”的。首先发掘内心的知识，再用来比照外界的万事万物，或者改造世界。[12]

王守仁之所以如此相信自己的内心，和他的抱负有关。他一方面喜爱军事，另一方面，自从受到迫害挨了四十大板后，开始依赖于内心深处的自我保护意识躲过灾难，这两方面都要依靠高度的内心活动和直

觉。

王守仁在龙场待到了刘瑾倒台，终于被召回内地，在经历了一系列小官之后，他受到了兵部尚书王琼的赏识，担任了右佥都御史，并开始巡抚南方。这个官职在当时是一个棘手的位置。明代时南方的江西、福建山区里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盗贼，这些地方都属于边区，明政府很难管辖，这些盗贼不仅不听从政府的指令，还四处劫掠。地方官员们头疼不已：不理他们，他们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如果镇压，一是花钱太多出不起钱，二是用兵太多权限不够，三是地方偏远跑不过盗贼。

但这个棘手的职位对于王守仁来说却是游刃有余，他对于人心的洞察力是一流的，在龙场和边民打交道的经验也能派上用场。首先，他认定这些群贼一定有内应，由于边区人民之间的婚姻、亲戚纽带，不可能不把官府的行踪透露给盗贼。如果只想到这一步，还不算有洞察力，可王守仁认为，这种纽带是双向的，既可以把官府的消息泄露给盗贼，也可以把盗贼的消息透露给官府。果然，他通过官府的仆役们拿到了盗贼的动静，再出兵剿匪，获得了巨大的效果，荡平了当地的匪患。

除了剿匪之外，另一件好事也突然间降临。当时宗室子弟朱宸濠被封在了南昌，封号为宁王。宁王一直不满武宗的统治，突然间举起了造反的大旗，率军进攻九江、南京，试图占据帝国的南京。

王守仁在剿匪的途中得到了消息，他随机应变，在朝廷命令还没有下达时，就挥兵直捣宁王的根据地南昌，利用虚虚实实的欺骗战术，拖延住宁王，最终先攻破南昌，又北上生擒了宁王。

整个叛乱在三十五天之内就被镇压了下去。而此时，北方的皇帝还在和群臣讨论要御驾亲征呢。[13]

剿匪和平宁王这两件事给王守仁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带来了棘手的麻烦。麻烦在于，他的功劳太大，引起了朝臣的妒忌。特别是宁王事件中，当皇帝刚刚组建团队御驾亲征，突然间传来宁王已经被擒的消息，这是直接让皇帝难堪。而宁王在造反之前，又曾经花大价钱买通了许多高官，这些高官也希望掩饰自己的罪过。

这一切让王守仁突然间成了公敌。如果有一点处理不当，就会给他带来巨大的灾难。

但王守仁在对付皇帝和这些大臣时，展现了他心学的风范。他一方面低调处理自己的功劳，满足皇帝的虚荣心；另一方面避开风口浪尖，只通过偏向自己的太监张永说话。当北方的士兵来到时，已经成为江西巡抚的王守仁嘘寒问暖，收买了士兵的人心。到最后，除了少数他的死对头之外，大部分人都感到满意了。

这件事也反映出明代政治的复杂性，一个人的地位不是靠功劳来决定的，而是他的资历和人脉。否则，即便有功劳，也可能变成祸患。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让王守仁更加相信自己创立的对心的崇拜。[14]他从“格物致知”开始，又提出了所谓“致良知”。所谓良知，指的是人心之中固有的理念，致良知就是寻找内心深处的呼唤，利用这种直觉来做事。

王守仁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致良知”的实践者，他正是因为寻找到了内心的呼唤，才能避开了如此众多的祸患，将这些祸患都变成了有利的机会，躲过了政治的惊涛骇浪。

他的功劳虽然得不到朝廷的承认，却在民间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保证了“致良知”理论的传播。

这种理论不仅仅是对于朱熹的反驳，更是一种明朝人必须学会的处世之道。他们希望像王守仁那样既做成事情，又不被这一团乱麻的政治所伤害。

到了晚年，王阳明更是越来越相信心的作用，认为外在的一切都只是心的一种表现，除了心，没有其他的东西是实在的。[15]

针对心法，他提出了四句口诀：“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6]解释开来就是，人心的本质是没有善恶之分的，而之所以产生出善恶，是由于人们的意（欲望）的作用。而所谓良知，就是人根据自己的内心，区分善恶的过程。当寻找到良知之后，也就达到“知”的境界，再用这个良知去改造世界，

改造世界的过程就叫“格物”，这个过程也是践行善事、去除恶习的过程。

王阳明的无奈在于，他的学说是对正统思想的一次反叛，却又不得不隐藏起来装成温顺。这种伪装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心学的践行，可他的政敌却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危险。如果让他的学说传播，所有的人都不再相信天理，也不相信依靠天理架构的政治体系，而是一味地遵循个人内心的良知，那必然引起人们对于政治体系的怀疑，甚至会质疑皇帝的合法性本身。

实际上，后来的人们思想解放，也果然得益于王阳明把人们的“心”解放出来。

在他刚刚死后，就有人上告他的学问是非法的，是以邪说蛊惑人心。[17]皇帝听后，立刻下诏停止了他的世袭职位，并禁止了他的理论传播。

只是，这时的心学已经传播开来，不是皇帝所能禁止的了。阳明心学的开辟，让明代的哲学进入了双轨制。一方面，政府还在用正统的理学考试选拔人才，但另一方面，民间的心学已经颠覆了理学的统治地位，甚至官员们也变成了双重人格，他们要晋升就必须背诵理学经典，但要修身，则必须皈依心学谱系。

第十九章
从心学到犬儒（公元1529—公元1644年）

明代社会最大的特征是，出现了一个不依赖于官场的市井阶层，他们对当官没有兴趣，也有足够的资本用于生活。心学的发展，导致一个叫作泰州学派的流派成了市井哲学的代言人。

心学对于个人的解放，还导致了一批具有游侠精神的学者出现，何心隐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成了政府的心头大患，受到了镇压。

作为泰州学派的集大成者，李贽以离经叛道的态度，将道学“皇帝的新衣”戳破，他本人也以自杀结束了一生。

随着叛逆者的死去，心学如同当年的玄学一样，逐渐变成了犬儒主义和庸俗主义的大本营，中国哲学第二轮回的叛逆阶段走向了终结。

明朝嘉靖年间，就在王阳明在南方创立心学之时，北京城却突然来了一个怪人。[18]这个怪人穿着没有人见过的大袍子，戴着稀奇古怪的帽子，手里拿着笏板，坐着一种人们没有见过的小车，从中国的南方出发，招摇地一路向北，最终到达北京。

如果有人问他：你这是什么衣服，什么车？他就会回答，这是周代《礼经》中规定的学者的衣服，帽子叫五常冠，衣服要求深衣大带，手里必须拿个笏板。而车叫蒲轮车，是用蒲草包轮制作的，当初孔子就坐着这种车周游天下。

这个怪人到达北京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也冒出不少传说。最著名的是，一个不知名的老翁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条没有头的黄龙边播雨边前行，最后来到了北京的崇文门下，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人。老翁一看天亮，连忙跑到崇文门下，发现有一个怪人穿着怪异，坐

着怪车正好到达。

这个人来到北京城后，照样行事高调，处处宣讲他的学问。当有人问他，他的师承出自何处，他就骄傲地回答：我的老师就是王阳明！

在北京，王阳明的弟子并不算少，由于他平定叛乱，声动朝野，其学问也已经遍及天下，就连北京官场之中也有不少崇拜者。但是，这个穿着奇怪、大言不惭的人却令王阳明的弟子们很尴尬，他不仅不像个儒生，反而像个妄想狂。

但这个妄想狂的确很尊重王阳明，动不动就说我来北京就是为宣讲老师的学问，老师的学问来自天启，是千载绝学，我一定要让天下的人都听到他的学说。[19]

当人们问起他要传播王阳明什么样的学问时，这家伙的回答却让人心惊肉跳，因为他宣扬的并非王阳明的话，而是他自己的话。比如，王阳明虽然强调心学，可是基本上还是在伦理的框架内谈，维护着明王朝统治者的权威，可是这人却说：什么是道？道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东西，道就是老百姓的日用生活。他甚至认为老百姓的日用生活才是根本，而皇帝老子的政权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只有根本稳固了，才有枝节的稳定。这就近似于大逆不道了，怎么会是王阳明的说法呢？

北京王门弟子如同吃了屎，坐立不安。他们之所以感到担心，还有一个原因。明王朝是一个最防备朝臣不听话的朝代，任何人，即便功劳再大，皇帝也总是要防着，而且功劳越大皇帝越担心。王阳明平定叛乱之后，天下人都成了他的粉丝，这时，王阳明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廷极大的猜忌。这个人不断地来北京宣扬皇帝老子不算啥，到底是不是王阳明指使的？如果是他指使的，王阳明的目的何在？是否意味着他想推翻明朝自立？

即便皇帝不相信这些说辞，在北京的朝廷上还有很多王阳明的政敌，他们随时关注着王阳明和弟子们的一举一动，希望找到他们的错处，而这个人简直就是老天爷送来搅局的。

王门弟子们赶快写信到江西，询问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传回来的

信息说这个叫王艮的人果然是王阳明弟子，他以前是个盐场灶丁的子弟，又曾经做过生意，后来摇身一变成了王门弟子。

但他前来北京，并不是王阳明指使的，而是他自己愿意宣扬老师的学问跑过来的。众人听后，既然是同门，只好把他的车藏起来不让他这么招摇，再劝说他赶快离开，不要坏事。但这个人性格倔强，不肯听从。王阳明听说了王艮在北京的事迹，也连忙写信请他回去，他这才快快不乐地离开了北京，去往浙江会稽，寻找他的老师去了。

王艮大闹北京城，就成了明代哲学史上的一桩趣闻，保留在了中国枯燥的历史之中。但是，不要因为王艮的性格就忽略了他的学问。实际上，王艮是王阳明的弟子中影响力最大，也最具独创性的一个。他不仅发挥了老师的心学，还结合佛道，将心学改造成了实用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典范，在明朝这个极端压抑的朝代内部，竟然产生出了现代政治理论的萌芽。[20]

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极端分化的时期，一方面王艮和他的弟子创造了泰州学派这个民本主义的学派；而另一方面，王门弟子们却开始与政权合流，他们大都成为达官贵人，谈论心学的同时，还享受着政权提供的一切优厚待遇，王学也逐渐变成了一种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和自私主义的代名词。最后，东林党人的崛起让明朝后期又成了一个党派斗争的时代。享乐主义、党派斗争，将朱元璋制定的铁板一块的政治秩序腐蚀，降低了行政效率和军事效率，明朝已经无法抵御底层叛乱和外族入侵的双重夹击，最终被取而代之。

赤手搏龙蛇

王艮，号心斋，江苏泰州人。在泰州有一个大的盐场，叫安丰场，他的父亲就是盐场工人出身。

他年轻时因为家境贫寒，曾经辍学，跟随着父亲在盐场工作，后来又曾经跟随父亲到山东经商。不过，虽然没法上学，他却坚持自学，他最常看的三本书是《孝经》《论语》和《大学》，另外也看过一些《礼经》。

由于读书不多，王艮的学问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这几本书的生吞活剥，他非常强调"孝"，就是对《孝经》的一种过度解读，而《礼经》则给他带来了一套长袖阔带、高冠大履的衣服，还在腰上别个笏板。[21]另外，他喜欢用书里的理论和人争论，随口就说，表明他对这几本书背得滚瓜烂熟。

但另一部分学问却和书呆子精神完全对立，那就是，王艮从他的手工业、商业经验中意识到，人类的真理也许并不掌握在统治阶层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每一个具体的人手中。不管他是皇帝还是达官贵人、工人、农民以及无业游民，在学问面前他们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特殊的。这种平民性，让他比其他人更能够接触中国最广大的平民群体，成为他们之中的传道士。

王艮认识王阳明，也很有传奇性。当他在当地小有名气时，他的一位朋友黄文刚听了他的谈论，说：你的道理很像王巡抚谈的。当时王阳明在江西当巡抚，也在传讲心学和"致良知"，在大江南北影响力很大，只不过王艮地处泰州的社会底层，对于王阳明竟然毫无听闻。

王艮第一次听说王阳明后，决定去见一见他。之所以见王阳明，也带着很大的自负色彩，他去看一看王阳明是否和自己一致，如果一致，他就是块试金石，试出了王阳明的水平；如果不一致，那么他就要成为王阳明的老师，向王阳明传授真学问。

到了王阳明府邸，王艮还穿着他的古怪袍子，举着笏板通报，王阳明不知对方来头，出门相迎。进了屋子，王艮毫不客气坐在了上座，两人对谈。谈着谈着，他就移到了侧座上，谈完后，王艮觉得这人学问还可以，虽然不是特别满意，但还是下跪拜了王阳明为师。可是晚上想了半天，第二天又反悔了，跟王阳明说不想拜他为师了。王阳明大度地称赞他这是不轻信。王艮又毫不客气地坐在上座继续谈论，这一次，王艮终于折服，再拜为师。王阳明对人感慨：我率军擒拿朱宸濠，都感觉很平常，但今天反而为这个人动了心。

王艮复杂的拜师过程，说明了他和王阳明的差异，他一方面为王阳明的学问叹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和王阳明是不同的，他的一些想法可能已经超越了老师。王阳明也是同样的感觉，一方面看到了王艮的能

力；但另一方面，又感觉他不会成为一个听话、忠实的弟子，会将老师的学问改得面目全非。

在王艮自作主张去完北京，回到了江西之后，王阳明痛感王艮是个闯祸的能手，接连三天不肯见他。王艮在门口也等了三天。有一次，王阳明出门送人，王艮就在路边跪着，王阳明装作没有看见，转身就回了院子。王艮一直跟着王阳明来到了屋檐下，眼看王阳明又要消失了，他不耐烦地大声喊道：孔仲尼也不会比你更过分！一句话喊醒梦中人，王阳明立刻反身长揖，双方和好。

王阳明死后，王艮获得了自由，回到了泰州以讲学为生。此时，他的学问已经和王阳明差别巨大了。

首先，两者的弟子成分差别巨大，王阳明的弟子大都是达官贵人和读书人，收到王艮这样的异类已经算是特殊情况。而王艮的弟子却是五花八门，从贩夫走卒到市井百姓，无奇不有，当然也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但大都是平民出身。明代是一个民间商业很发达的朝代，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官员大都背四书五经去了，对商业一窍不通，任其自由生长，而政府的纸币信用崩溃，人们被迫改用银两，反而造成了金融层面的稳定。商业发达，商人们需要他们在哲学和文化上的代言人，王艮就正好填补了他们的需求。

其次，他的学问也非常适合这个平民群体。他从来不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者家国天下的大道理，只讲身边的小事，从人本身出发。

比如，以“格物致知”四个字，朱熹认为是“思考每一个具体物体背后的大学问，达到真理的极致”，而王阳明则认为是“把物体映射到心，在良知之中发现物体的道理”。这两种解释都很抽象化，而王艮则对这四个字重新做了解释，认为格物致知无非就是说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的身体是根本，而家国天下是枝节问题，如果个人不正，就没有办法治理好国家，格物致知，就是要修个人的根本，再来安定国家。黄宗羲给王艮的理论起了个名字，叫“淮南格物”，便于和朱熹、阳明的理论作区分[22]。

“格物致知”的改变，以及对于个人身体的重视，让王艮开始大谈“百

姓日用就是道”。这个理论很适合于明代发达的商人阶层，他们很乐于听到这样的说法。

而更多的人喜欢听他说，则是因为他说所有的人都能得道，只要做到了能知能行，就满大街都是圣人。在以前，人们把读书人看作一个特殊的阶层，中了秀才之后，读书人就享受了各种待遇，鼻子翘到了天上。但在王艮看来，只知道死背几本书，就算当了进士也不算是有学问，真正的学问隐藏在生活之中，只要在生活中行得正，坚持修身，谁都是圣人。

这种简易教学法第一次打断了中国读书人对学问的垄断，将学问放到了所有人的手中。泰州学派也由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宗教化的平民学习组织，中国南方的商业社会就从中脱颖而出。

由于泰州学派激进的反叛性格，黄宗羲叹这个学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继承者大都能“以赤手搏龙蛇”，不再是名教所能束缚的了[23]。

游侠之死

公元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大学士张居正主导的经济财政改革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朝廷上下对于改革措施议论纷纷。张居正认定，要想推动改革，就必须打击这些议论的声音，统一舆论，形成合力推进改革。

他以皇帝的名义下达了一份诏书，要求各地方官员毁掉天下的私人书院[24]。这是一次对私人学校的系统打击。

实际上，明政府一直以警惕的目光望着私人书院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组织。由于官方主导的文化体系呈现僵死特征，很多对政府死了心的人宁肯不入政府，愿意去独立研究学问，并广开书院，教授学徒。这些人拥有第一流的智力和学识，被明政府视为心腹大患。

最初，明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些私人讲学机构。到了公元1537年（明世宗嘉靖十六年），当时的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走到哪儿就把书

院开到哪儿，引起了政敌的反弹，他们开始上奏皇帝，要求摧毁各地书院。第二年，命令生效。

但是，这个命令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官员都出自读书阶层，他们对于要求销毁书院的命令大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导致命令没有办法真正执行。

到了明神宗时期，张居正为了改革要求统一舆论，而对他反对最大的，就来自于读书人内部的批评，这些人以书院为基地，品评政治。张居正认为，如果要推行改革，必须首先将反对派打掉。[25]

摧毁书院的命令下达后，各地对于读书人的镇压活动也迅速展开。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最大的目标是一个叫作何心隐的人。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是典型的对政府充满了警惕的读书人。他曾经参加省试，获得了江西省第一名的好成绩，但就在这时，他却突然转向，宣布不再参加考试，而是拜了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为师，开始学习王艮的思想。

与其他人不同，何心隐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实践派。比如，王艮的理论要求先正心立身，然后管理好家族问题，认为人的身体和家族的利益高于政权，只有这些事情都做好了，才能去管国家的事。何心隐立刻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建立了一个家族自治机构，他当族长，将整个家族的红白喜事和矛盾纠纷全部管了起来。

如果仅仅是管理家族，也没有问题，但何心隐的管理组织是对外的，比如，当地方官员为了平衡财政，想在正税之外再多征点杂税，何心隐不仅反对，还写信将当地官员讽刺了一通。很显然，这样的家族组织如果过于强大，地方官员就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官员找借口将他抓了起来，后来被朋友救出。

何心隐的侠义心肠，很像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复活。他后来去了北京，当时恰好是奸臣严嵩当道之时，严嵩将一切反对他的人都镇压下去，在朝堂上一手遮天。唯独何心隐不怕他，甚至想计策要把严嵩搞掉。由于皇帝相信方术，当时皇帝宠幸的术士叫蓝道行，何心隐刻意和

蓝道行结交。一次，蓝道行在给皇帝扶乩占卜时，突然显示，有一个奸臣正在靠近皇帝。皇帝正奇怪为什么会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严嵩突然进来奏事。

这件事实际上是何心隐和蓝道行的策划，目的是诋毁严嵩。从这一天开始，皇帝开始怀疑严嵩的品质，这种怀疑被群臣利用，并最终导致了严嵩的倒台。[26]

严嵩虽倒，但是严嵩的党羽处处都在，何心隐为了避祸，改名换姓（从梁汝元改成了何心隐），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以给别人做幕僚为生，却处处出谋划策，如苏秦、张仪一样纵横天下。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性格，他不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严嵩的党羽都逐渐倒掉了，后来上台执政的是张居正。在张居正手中，何心隐是否会好一些呢？

答案恰恰相反。张居正上台后，在推出对私人书院的禁令之前，就开始用强硬手段对付这些游侠。万历四年，何心隐正在湖北的孝感讲学，张居正听说后，立刻派湖广巡抚陈瑞去抓何心隐。但这次有人告密，何心隐逃脱了。

何心隐认为自己坦坦荡荡，没有罪过，甚至想亲自前往北京申辩。但官僚机构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三年后，就在推出书院禁令的同一年，何心隐终于被抓获，被送到了新任湖广巡抚王之垣处。

被捕之时，何心隐就已经知道，王之垣已经获得了张居正的授意一定要杀掉他。早年他在北京见到还没有当政的张居正时，就预言会死在这个人手中。他说：这个人未来一定会主政，而主政之时，一定会杀掉我。[27]

何心隐之死，反映了民间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民间学术要求的是自由精神和质疑的态度，而官方学术要求的是服从。由于奸臣以官斗为主，对于民间往往无暇顾及，这时的民间学术反而能够获得一定的空间。张居正上台后，作为改革派希望推动社会变革，这时反而会更加感觉到民间学术的不合拍，采取更加强硬的态

度。到这时，民间学术就连一点空间都没有了。

只要存在这样的制度，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倾向于控制民间，剪除反对和质疑的力量，达到铁板一块。不过，铁板一块反过来又会造成政治的脆性，一遇到困难就会崩断，最后造成整个社会的崩塌。这一点是封建社会无法避免的弱点。

张居正死后，他亲手建立的高效镇压体系也逐渐锈化，不仅无力镇压民间学术力量，甚至连政权本身都难保了。

以死卫童心

何心隐死时，同情他的人很多，就在他死亡之地武昌，也有数万人为他喊冤，甚至在朝廷张榜罗列他罪状时，人们也都起哄认为这是陷害。[28]

而在这所有的人中，有一个人却用冷静的笔调分析着何心隐的幸与不幸，他就是李贽。李贽与何心隐同属于泰州学派，却并没有见过何心隐本人。

他总结了何心隐三点令人佩服之处：第一，每个人都在为了生而蝇营狗苟，可是何心隐却看透了生死，认为人终将一死，只不过是被人杀死，还是被鬼杀死的选择。第二，每个人都装作在效法孔子，可是只有何心隐是在真的效法孔子，因为孔子以天下为家，不治家产，不畏惧得罪人。也正因为得罪人，他才会被害死。李贽认为孔子之所以没有被仇人杀死，只不过是幸运，何心隐稍微不幸一点罢了。第三，何心隐效法孔子的道，却并不效法孔子的一言一行，这让那些东施效颦的人愤怒不已，把他当成是歪门邪道。

但李贽感慨地说，当一个人临死时，有数万人为他喊冤，即便是他被最权威的宰相杀死，人们也认为是宰相在迫害他。这样的公道自在人心，又何必在乎死呢？

从他写《何心隐论》之后又过了二十三年，李贽也选择了以死抗

争，也许在为何心隐招魂的那一刻，悲剧的种子已经注入了李贽的心中。

在明代的思想家中，李贽是一位最伟大的践行者。他的思想已经彻底脱离了理学的束缚，不管是程朱的那一套，还是王阳明的那一套，都已经被他超越了，他自称为“狂禅”，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这里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海港城市，如同现在的广州一样，居住着大量的海外商人。他的祖辈曾经是回教徒[29]，而他本人显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于儒学并没有特别的尊敬。

李贽二十六岁中福建乡试的举人，之后没有继续考试。他的青壮年时代一直在南京、北京等地方的各种小官之间徘徊，生活贫困。直到五十一岁时，才被授予偏远的云南姚安太守。在治理地方时，他习惯了清静无为的方式。云南位于边陲，他因地制宜，法令清简，不言而治。除了俸禄之外，分文不取，继续保持着贫寒的本色。

也正在这时，张居正开始对民间读书人进行迫害，两年后，何心隐死去。何心隐之死，让李贽彻底放弃了对官场的渴望，开始了另一段追求心性的生活。

在最后任职时期，他已经躲进了大理洱海边上的鸡足山中，以佛教典籍为乐。由于现代大理成了旅游胜地，人们往往对苍山耳熟能详，但在明清时期的历史上，大理最著名的山是鸡足山，它是当地的佛教圣地，甚至在当地信仰中代表着西天。

离职后，李贽带着家眷开始尝试另一种生活：在完全无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游学生涯。由于没有钱，他只好去湖北黄安（今红安）投靠朋友耿子庸（耿定理），由于养不起妻子女儿，只好让妻子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自己寄居在朋友处。

李贽之所以不愿意回老家，另一个原因是明朝严密的户籍制度，一旦回家，就会被地方登记造册，成为监控人口，而客居在外，则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游离于户籍之外了。

耿定理死后，李贽被迫离开黄安，前往麻城的龙潭湖上，与一群朋

友相互切磋读书。由于头上发痒，他干脆剃光了脑袋，只留下了胡子，如同和尚一般，后人把这个行为当作他与名教的决裂[30]。

在他游学的这段生涯，李贽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成了继何心隐之后的又一个异端。他的思想比何心隐更加锐利，反道学的精神更加彻底。他的书籍一经刊行，立刻风靡天下，害得政府不得不数次祭出禁书的大旗，却屡禁不止，四处传唱，如同是哲学界的柳三变。

他首先继承了王艮的思想，认为人们的生活之中才蕴含着真正的道，“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没有其他更大的道理。由此，他对程朱理学系统进行最无情的抨击。在他的笔下，道学都是高屐大履，长袖阔带，恨不得在帽子上写着“纲常”两个字，在衣服上写上各种人伦警句，说话的时候不离孔仲尼的名言，摆道理的时候随口四书章句。

他最好的小品文是《赞刘谐》，刘谐是他的一位朋友，一次遇到一位道学家，道学家自称是孔子的徒弟，刘谐随口说：你是他徒弟，我还是他的哥哥呢！

道学家勃然大怒，说：老天爷如果不生孔仲尼，万古就如同漫漫长夜！你到底有多大胆敢冒充他的哥哥！

刘谐笑答：万古如长夜？怪不得孔仲尼出生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人们都白天点蜡烛过日子。[31]

通过这种戏谑的方式，李贽就把道学的目光短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他本人认为，大部分学孔教的，不过是如同矮子去看戏，看不到里面在演啥，只能跟着喝彩，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懂得理学说了什么，只不过是瞎起哄而已。他甚至认为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的，后来才开悟，反对这样的人云亦云。[32]

然而，在反对完程朱理学之后，到底什么样的学问是他赞同的呢？这就要从他的“童心说”说起，再延伸到他的学问上。

李贽秉承了王艮的心学主张，进一步认为，人真正困难的是找到自己的“童心”。童心，就是人最初的本心。如果失去了童心，就是失去了

真人，变成了戴着面具的行尸走肉。[33]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失去了童心，就在于读多了四书五经这样的废书。四书五经中不是史官滥用的褒崇之词，就是臣子不负责任的赞美之语，或者出自腐臭弟子有头无尾的记忆，只是些只言片语。这样的话传来传去，早已失去了本来的意味，靠学习这些东西，哪里能找回童心，反而只能学成个蠢蛋。

那么，哪些书里更具有童心呢？李贽认为不是那些古书，而是各个朝代的最优秀作品，比如，唐代的传奇、元代的杂剧、《西厢记》、《水浒传》，这都是天下最好的文章书籍，充满了童心。

从寻找童心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来李贽的现代主义倾向。他反对仿古，认为应该抓住时代的潮流。他推崇现代的实用主义的学问，反对古代僵化主义的内容。

但是，在李贽的思想中又蕴藏着一点极其危险的倾向：由于实用主义的态度，他对经济、财政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对那些从古至今的理财专家都赞赏不已。中国封建社会存在财政饥渴症，多少钱都不够皇帝和政府花，每到朝代中后期，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理财专家，打着政府指导经济的名义，实际上是帮助政府从民间抽取财富。

李贽在经济上也认同这种理念，认为古今的贤臣不是那些满口道德说教的人，而是那些实际做事，帮助政府发展经济和寻找财政的人。他反对道德说教，反对大臣只懂儒术没有实际学问，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作为明代的人，他不可能知道政府插手经济的危害，总体而言，在明代他的思想已经是最领先的，就好像所有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主义者都带着一点社会主义倾向一样不可避免。

在教学上，李贽也超越了他的祖师王艮。王艮认为人人都是圣人，欢迎一切贩夫走卒来参加他的课程。而李贽则把他的学生扩大到女人，强调男女平等授课，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来听。这在明末逐渐保守的环境中，更加显得离经叛道。设想一下，一个光头如同和尚一样的老头儿，在给一群裹脚的妇女授课，叫她们挣脱礼教的束缚，这样的场面不是在民国时期，而是发生在明代。

李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他比何心隐幸运。他教学的时期，已经是张居正死后，张居正的集权主义已经告一段落，明王朝又回到了笨拙、僵化的轨道上，即便李贽如此离经叛道，也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来惩罚他。只要他表面上不直接危及政权，就没有人想找这个麻烦。

李贽最初在南方讲学，后来竟然应前御史马经纶的邀请，跑到了距离北京只有几十里的通州去讲学。

这几十里的距离，就等于是在天子的脚下示威。在这里，他继续讲学著文，对于官僚丝毫不留情面，甚至得罪了当时的当权者大学士沈一贯。[34]这一次，朝廷终于派人来抓他了。

在李贽的传记作家（也是朋友）袁中道的笔下，当抓他的人来到时，李贽恰好卧病在床，他要求取门板把他抬走，自称罪人不宜留。邀请他来的马经纶要跟他一起走，被他谢绝了。马经纶说：如果你是妖孽，我就是藏妖人，死也要死在一起！

第二天提审的大金吾派人将李贽拉上了审讯室，放在地上。问道：你为什么写作邪书？

李贽回答：罪人著书甚多，这些书都在，这些书对于圣教是有益无损的。

大金吾笑他太倔强，又佩服他的为人，最终只把他打回籍贯，没有再深究，进行更多的惩罚。

但就在他等待被遣返的时候，一次请侍者给他剃头时，他却乘机利用剃刀割开了喉管。两天后，他死了。在死前，侍者问他：和尚你疼吗？

他已经不会说话了，只是用指头在侍者的手心里写：不疼。

侍者又问：和尚你为什么要自杀？

他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35]

关于李贽之死，从明朝到现在人们议论纷纷。坦率地说，明末政府

的控制力不强，当时的政府禁书禁言的力度是比较小的，李贽能够写这么多大逆不道的书，而政府屡禁不绝，就得益于当时的行政效率低下。政府虽然对李贽很恼火，也同样没有想到要杀死他，但他为什么自己要选择死？

这个答案或许在他为何心隐申辩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是在用实际行动表明，被人杀死还是被鬼杀死都是无所谓的，但关键是，要在自由中从事学问，追求自己的心，他认为，心比性命更加重要。

李贽在自己的遗言中写道：如果死了，就在城外找一片高地，向南挖个坑，长一丈宽五尺，深六尺就够了。然后，在这坑中间再挖一个二尺五寸深，长六尺半，宽二尺五寸的小坑，用芦席五张铺在下面，把我放在上面。

衣服也不用换新的，就用在身的衣服。埋葬完毕，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上“李卓吾先生之墓”[36]。

马经纶按照他的要求，将他埋葬在通州。这个明代最具独立精神的人没有在中央帝国中找到位置，却依然在另一个世界嘲笑着时代。

朋党重现

李贽死去两年后，公元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在江苏无锡，几位学者重新建立了一个古代书院，开启了明代最后一段哲学变化。

这个书院名叫东林书院，最早建立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是朱熹的师公、二程的弟子杨时讲学的场所。到了明代末年，以顾宪成为首的学者们决定在无锡重新建立它，以弘扬士大夫传统。

东林书院的重建，说明了顾宪成等人与王阳明、王艮、李贽等人的区别，王阳明开创了心学，以心学为契机，王艮、李贽等人发起了反叛思潮，从正统的儒教中叛离出去，形成了一次思想开化运动。

而顾宪成等人却是以程朱为宗，要恢复的是保守精神。他和李贽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我们可以和现代做一个对

比，我们现在又处于一个对现实不满的时期，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思潮，一种是从制度根本上反思问题，并认为现状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应该改变制度本身；而另一种是在制度之上进行反思，认为现状问题是由于人们不遵守制度造成的，应该做的不是改变制度，而是加强制度对人的束缚力，让每个人都遵守制度。如果放到明代，前一种人就进化成了王艮、李贽，而后一种人则进化成了顾宪成。

顾宪成对于明代的官僚腐败、枉法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强化理学传统，强调每个人的道德水平，从而让世界变成一个清官的世界。而要变成清官的世界，就要把贪官打倒，为了打倒，必然要联合其他人一起，于是就有了拉帮结派的理由。东林人士也迅速构成了团伙。

东林书院开张后，吸引了大批名士前来讲学。由于当时的掌权者沈一贯、方从哲等人都善于依附皇亲国戚、拉拢太监，排挤非同党，许多人有气无处发泄，这些人大都被吸引到顾宪成组织的小圈子里。他们议论朝政，痛斥奸党，以清流的态度吸引了世间的普通人。一时间，东林书院都容纳不下这么多的皈依者[37]。这些人被他们的反对派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掌握了道义优势，被他们排斥的官僚们为了自保，朝堂之上又出现了几个地域性的党派，比如浙党、齐党、楚党等。这些党派在捕风捉影之中开始互相攻击，明代末期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党争。

在党争过程中，东林党人表现得轻车熟路，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对手。更重要的是，党争一起，最后争论的往往不是正经事，而是许多琐碎事，或者是皇帝的家事儿，党争的各派（包括东林党）很少显示出正义性，只看见了党派性。

东林党唯一显示出正义性的事件，是参与反对矿税的运动。万历年间，由于皇帝进行了三次征伐，以及宫殿屡次起火，皇帝财政不足，开始在采矿上做文章，派出了太监作为矿监税使，从民间压榨矿税。[38]

当时的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的李三才因为矿税导

致的腐败和民间反抗痛心不已，屡屡上书，顾宪成知道后，主动与李三才联系，将他拉入了东林党。他们之所以反对矿税，是因为矿税对于南部经济影响尤大，如果参与了反对矿税的运动，就掌握了南部的舆论导向，从而成为当时的舆论领袖。

李三才也并不是清廉之士，他掌握了漕运监督权，家境豪富，受人批评，又喜欢拉帮结派，享受着朋党遍天下的便利。[39]

在积累起巨大的人气后，东林党立刻投入剧烈的党争之中。他们首先争的是官员的任免。明朝有种审查官员的制度叫“京察”，最初三年一次，后来十年一次，在东林党时期，则是六年考察一次。官员的任免升降，大都和京察的结果有关。

东林书院成立的第二年，恰好是京察之年，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左侍郎杨时乔。首辅沈一贯为了阻止杨时乔，试图用兵部尚书萧大亨来取代杨时乔，但没有成功。杨时乔主持的京察，几乎完全针对沈一贯的党人，沈一贯也坚决反击，两派陷入僵局，最后两败俱伤，沈一贯于第二年被免，杨时乔也受到了申斥。[40]

从这之后，历次京察都成了党派交锋的主战场，东林党和浙党、齐党、楚党以及其他小党派大打出手，基本上谁主持京察，对立党派就有人要倒台，东林党吃亏的时候也很多。直到万历皇帝死后，到了天启皇帝时期，东林党人才受到重用，但随后又遭到了大太监魏忠贤的迫害。在这一系列的党争中，明朝的政治也走向了分裂。

京察时，大量的官员缺职，更多的人陷入争执而不敢做事，使得明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幅度降低。

除了争京察职位之外，东林党人还用巨大的精力陷入皇帝的家事。在东林书院没有成立之前，顾宪成就坚决地介入皇帝选太子事件。万历皇帝的皇后无子，其他妃子有儿子，皇帝希望选择自己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而顾宪成等大臣们却主张立皇长子。最终皇帝不得不服从了大臣。

然而，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却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事件。公元1615

年（万历四十三年）有人拿着棍子跑进东宫伤人。万历皇帝死后，皇长子刚刚即位一个月，就因为服用了大臣送来的两粒红丸，死了。这些事件都成为党争的焦点。天启皇帝即位后，又围绕着郑贵妃等人的政权斗争，进行了另一轮的争执。

在这些争执中，东林党人表现得乐此不疲。最终迎来了他们最大的敌人——大太监魏忠贤。在双方争权的斗争中，魏忠贤将东林党人一一击倒，并烧毁了东林书院。直到崇祯帝即位，东林党人才再次得势。但这一次，他们仍然没有享受太久的权力。皇帝铲除魏忠贤之后，却发现东林党人并不好用，他们可以党争，却缺乏治国的能力，特别是面对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危机时束手无策，只好再次贬黜他们。当皇帝也没有替代人选时，这就已经到了明朝亡国之时了。

东林党争显示的是中国历史上儒教的最大悲剧，他们试图在道德上净化整个社会，但他们的道德诉求却总是被当作党派诉求，最后变成党争。而道德诉求又无助于现实，无法改变中央帝国在政治治理上遇到的危机，最终，望着摇摇欲坠的大厦，除了感慨道德的沦丧之外，没有任何救助的方法。

庸俗化的心学

东林党人进行激烈党争时，王阳明的继承人们也陷入了危机之中。

这时，距离王学的诞生不过百年，人们却已经发现了王学的巨大漏洞，这个漏洞在明朝同样是无解的。

王阳明认为，所谓的理、天道，都藏在人的心中，要想了解世界，必先反思内心，去寻找所谓的“良知”。但王阳明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人，在他的体系之中，到心里去寻找良知之后，仍然要返回到现实之中，用这种良知来改造社会。所以，“致知”之后的“格物”也是同等重要的，“知”和“行”必须合一。

在他的时代，心学起到把人心解放出来的作用。由于皇权推行的理学让人们过于僵化，没有创造力，没有自我，必须将人从这种僵化中解

放。当王阳明提倡内心时，就是让人回到自我，去体验自我的价值。所谓心和良知，就是让人们不违背自己的心去生活，相信自己的判断，利用直觉去对抗世俗的压力。

但王阳明没有想到，他死后，人们却利用他的理论推导出一系列他并不想要的结论。比如，如果对心过分强调，会让人发现，这种提法实际上和佛教（特别是禅学）有共同之处，人们不需要通过观察世界，只要内省地冥想，就可以发现内心深处的“道”。

人们忘了他的理论还有后半截，体会到道之后还要去改造世界。他们只是不断地缩回到内心之中，对整个世界无视了。当与世界过分脱节，这样的人就没有用了。

明末，东林党人正在和太监血战，皇帝正焦急地处理着财政问题，满洲人在北方已经叩关，信奉了心学的士大夫们却慢悠悠地思考着“心”的问题，对于外界的俗事不闻不问。

更要命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实际上，大部分读书人到了后来，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这个毛病，他们讲心谈性，彻底与政权脱节，也不再关心政治事务。[41]

这些人与其说是儒教徒，不如说是佛教徒。到了清代，人们反思明代灭亡的教训时，许多人开始认定，这些王学末流是造成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不过，即便是这些王学末流也有理由，因为当时的政权已经混乱到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几大派别打成一团，即便有忠贞的人士，也被猜忌的皇帝所摆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血光之灾。他们躲到一边去空谈，与其说是王学的影响，不如说是政治的黑暗使然。

公元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作为明儒最后代表的刘宗周绝食而死，表达自己不做贰臣的理想。他的死亡，也为中国哲学的理学时期画上了句号。

第二十章
神学散去，实学到来（公元1644—公元1911年）

明朝的灭亡、清朝的文字狱以及八股科考对于文化的摧残，让清初的文人终于开始从根子上反思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问题。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大体系，更愿意从小处入手，考证具体的问题。他们的做法与西方的科学方法论有着惊人的吻合，不随意上升到形而上，只研究可以用逻辑和观察验证的领域。

在清初三大家中，王夫之是唯一一个仍然带着体系特征的学者，他试图将理学时代的务虚哲学引向务实，强调客观和物质，避免构造空虚的“宇宙真理”。

黄宗羲则转向了政治学，试图从政治规律的角度来分析明亡的教训，并分析了中国政治中存在的许多痼疾。

顾炎武成了清代实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他最大的贡献在政治地理学，用科学考察的精神，对中国的山川地理、户籍物产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还在音韵、考证、考古、金石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

当实学将逻辑的力量运用到了儒教经典时，摧毁性的力量出现了：阎若璩通过考证，证明现世流传的《古文尚书》是后世伪造的。儒教学者们奉若神明的儒经成了伪书，摧毁了许多人的信仰，也宣示着任何神圣的东西必然需要经过逻辑的考验，否则就是虚假的。

清代实学在社会科学上的成就，已经接近一次文艺复兴。即便没有外国思想的到来，中国两千余年的大一统哲学也可能被内部发展的学术成就所改变。

明代崇祯末年，就在李自成进攻北京和清朝叩关的时候，在皇帝的朝堂上突然贴出来一张纸条。

这张纸条上的内容令人大吃一惊，上面写着：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42]

这张纸颠覆了人们对于明代的刻板认知，将对明代科考制度的愤恨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也宣布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哲学走入了死胡同。

在明代末年，不管是当权派（右派），还是以东林党为代表的道德派（左派），以及以阳明学为代表的自由派，在面临社会时都已经找不到解法。

明代是中央集权的最高峰，在朱元璋的设计下，没有人能够挑战皇帝的权威，也没有人能够停下这个庞大的机器，甚至没有人能对它做出必要的调整。但这台机器又足够稳定地存在了近三百年才崩溃。在这三百年里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重大问题。汉代曾经出现了王莽之乱，唐代有安史之乱，但明代的稳定性远远高于汉唐，即便已经变得虚弱不堪，也很难被纯粹从内部攻破，只是因为清朝的崛起和李自成内乱，内外夹攻才终于倒塌。

但在明代集权的同时，从西方却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能兼顾稳定和发展的制度。在历史上，西方制度一直是落后于东方的，只能在比较小的疆域内建立国家，无法在更大范围内保持稳定。但明代时，西方却进入了超车的轨道上，开始发展出代议制、宪政制，同时对民间的放松也导致了经济、科学的发展。

这里不谈宪政的陈词滥调，只说在科学上，西方发展出了一套认识世界的新方法。之前东西方哲学都有一个烂毛病：不喜欢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而是喜欢制造一些无法观察的概念。不知道人们死后会去往哪里，就发明了一个概念叫作“鬼”，并规定鬼是现世的人观察不到的；不知道世界是怎么运行的，人们懒得去实际观察，玄学家发明了“无”的概念，理学家发明了“天理”的概念，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空想和吵架，却与现实世界无关。

任何现象都可以以增加概念的方法来圆通，却无助于人们了解真实的世界。针对于此，威廉·奥卡姆提出了一条规矩：除非必要，勿增实

体，[43]禁止人们胡乱地制造概念。

接着，培根提出另一条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首先不是制造理论和概念，而是观察世界，当搜集了足够的观察材料之后，再利用归纳法整理材料，总结规律；其次，当总结出规律后，再利用演绎法来验证规律，如果根据规律推导的结果与新的观察相符合，就证明这条规律是可行的，否则，规律就是错误的，要重新回到第一步。

培根提出的这种方法至今仍然是科学的基石，将观察、归纳、演绎、验证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将那些不可观察的概念排除在了科学之外。

而在古代的学术研究中，没有观察、验证这两步，归纳也非常简单，而以想象和演绎为主，至于符不符合事实，没有人在意。这一点中外皆然。

明代虽然产生了泰州学派这样的民间思潮，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受制于中央帝国的束缚，无法进一步解放出来，也找不到更加现代的思想来发展科学技术。事实上，在这个政权内部以及它提倡的哲学内部，已经不可能再找到答案。

明朝灭亡后，一群知识分子开始痛定思痛，开始讨论明朝为什么变得如此僵化和不可救药。他们从哲学体系中寻找答案，认识到从两汉开始的儒教试验已经走到了尽头，将一切可能的扩展都已经做过了。

他们虽然不知道世界即将进入另一个阶段，并由西方思潮引领，却本能地感觉到，哲学和思想不能仅仅为了统治服务，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甚至只为了纯粹的真相。

在他们的引领下，清初成了一个消解中国哲学的时代，他们不是为了建立另一套大而全的哲学体系，而是首先质疑原有的体系，将两汉以来的儒教思想一一证伪，证明它们是错的。在他们证伪这些旧体系时，却建立了一系列的工具学科，比如考据学、政治学、金石学、声律学、考古学、地理学等，这些统称为实学的科目看上去不如哲学那么宏大，却更加有用处，也更加符合现代科学精神，与培根的归纳、验证暗暗相

合。

海通之后，当西方思潮进来时，人们发现，中国文人在学术方法上已经做了一定的储备，让有的人能够迅速接受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完成了转向。

从公元1840年到公元1911年，在短短的七十年里，中国人已经抛弃了两千年的积垢，迅速地拥抱了西方体系，并产生了许多名噪一时的大家。这比起印度、美洲、东南亚的集权国家都要短得多，唯一能够超过中国的只有日本，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人学习的速度并不慢。

从这个角度说，清前期的学术转向更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当明朝灭亡的钟声刚刚敲响，学术界对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清理工作已经展开…

王夫之：从务虚到务实

在所有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反思的声音中，王夫之是最有代表性的。

王夫之是中国大一统哲学的最后代表人物。他生于公元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经历过明末张献忠的叛乱和南明战争。张献忠攻克他的家乡衡州之后，曾经拘禁了他的父亲作为人质，王夫之将自己的身体刺伤，前往替换父亲，贼人见他伤势太重，把他和父亲都放了回来。但这个家庭仍然没有逃过明末灾难，在清军攻克衡州之后，他父亲死难。

清军战胜南明后，王夫之拒绝出仕，也不剃发。吴三桂反清时期，曾经让王夫之署名劝进表，也被他拒绝了。[44]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在做学问之中度过。后人将他和黄宗羲、顾炎武并列，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家。

三大家中，黄宗羲主要兴趣在政治学和历史学，而顾炎武兴趣广泛，但都以研究具体的问题、考据为主，只有王夫之仍然是以哲学为方向。

他的哲学主要是反对宋明理学的。宋明理学过于思辨化，和现实问题脱节严重，王夫之就是要在哲学上将人们的兴趣引向现实问题。

比如，朱熹理学认为世间首先存在天理，由天理来引起气的变化，从而影响人类的认知。但在实际操作中，人们都不断地思考天理是什么，倾向于空想主义。

王夫之为了扭转这种空想的风气，提出了气才是万物的本源，不是理产生了气，而是气中蕴含着理。

他所谓的气，现代人可以理解成物质，他之所以提倡气，就是告诉人们，物质才是世界的本源，而所谓的理，只不过是物质的性质而已，离开了物质，就谈不上理。当一个人要谈理时，必须首先承认物质的存在，承认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存在。当一个老农民种地的时候，不用去谈什么修身养性的大道理，也不用感谢老天爷或者感谢皇帝，他只要认清楚土壤的性质，确定好水源和肥料，找好季节种上种子，再施肥浇水和收获，全部是现实性的问题，和物质本身有关。先伺候好了物质，再去考虑所谓的大道理不迟。

除了理和气的关系，另一对关系则是道和器的关系。[45]所谓道、器，也是指的物体和属性（规律性）的关系。所谓的道，必须是依附于具体物体的道，如果像道学那样把道说成是一个脱离了实体的“天道”，那只是骗人的。脱离了具体的世界，去谈论空泛的天道不仅毫无意义，也没有任何实用性。

如果一个人不重视人类世界，不重视每一个凡夫俗子的具体生活，而去空谈天道，甚至用天道杀人，那么这个人不仅不懂得天道，反而是最违背人性的。

朱熹还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在他看来，天理是好的，而人欲是坏的，是和天理相对立的概念，要天理就不能要人欲，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天理就是为了人欲而存在的，没有人欲，天理何用？

有人欲，人们采用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欲望，才能发现更多的规律性。如果没有了人欲，人们只剩下了打坐冥想，那么许多发明都不会

成为现实。[46]

这样的哲学改造，就把宋明以来的枯坐和否定人世的传统，改造成了肯定人世、积极去发现世界的哲理。清代的实学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哲学指导下开展的。

黄宗羲：政治学曙光

王夫之从哲学上开始扭转宋明以来的问题，而他同时代的黄宗羲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反思，将政治学从哲学的大锅饭中独立出来，成了中国独立学科政治学的鼻祖。

黄宗羲比王夫之大九岁，对于明朝的记忆也更加深刻。他的父亲是东林党人，因为弹劾魏忠贤，下狱而死。当魏忠贤被崇祯帝除去后，黄宗羲上书请求惩罚魏忠贤余孽徐显纯和崔应元，在会审的时候，黄宗羲突然从袖子里拿出一柄锥子，将徐显纯扎得浑身是血，又把崔应元揍了一顿，将他的胡须拔下来祭奠父亲。之后，他找到了直接杀害父亲的狱卒，将他们杀死。另一个余党钦程听说后害怕了，用三千两黄金贿赂黄宗羲，不仅没有得逞，也在提审时挨了黄宗羲的锥子。这段传奇般的剧情成了黄宗羲一生的先兆。[47]

明亡后，清军占领了北方，定都于南京的南明弘光小王朝内斗不止，黄宗羲差点被弘光朝的权臣阮大铖捕杀，后来多亏清军攻陷南京城，黄宗羲才逃脱了牢狱，趁乱逃走。之后，他屡次参加抗清队伍，屡次遭到清朝的通缉，甚至跑到日本，请求日本起兵。

南明抗清失败后，黄宗羲意识到抗清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决定放弃抵抗，以著书讲学为生。

到了康熙时代，皇帝已经不再追究这些抗清人士的罪责，反而要将他们吸纳入新政权，但黄宗羲拒绝了。清初这些游离于政权之外的学者，成了新思想的来源。

与王夫之不同，黄宗羲对于明朝的教训，主要从政治学角度来考

虑。他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主要是因为政治指导思想和政治架构上出了问题，使得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无法在现有的架构下，解决社会危机，最终造成了政治上的失败，又演化成了一系列的军事、经济危机，直到摧毁了政权。

他的主要政治研究，在一本叫作《明夷待访录》的小册子里，这本书，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专门研究政治的小册子的鼻祖。

在西方，英国的霍布斯写过《利维坦》，提出过人类之所以要结成政府，是为了防止互相侵害。他认为在有政府之前，人们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丛林状态，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遭到谁的侵害，因此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人们最后不得不结成政府，制定法律，限制人们互相侵害。如果有人胆敢打破法律，就由国王来惩罚他们。政府和国王给人带来了安全感，却也剥夺了他们一定的自由。

而中国则采取了另外的方法论证皇帝的合法性。汉儒认为“天人合一”，人要服从于天，而皇帝是老天之子，所以人们服从皇帝就像服从老天。而宋儒则认为人们要服从世界规律也就是“天理”，而天理就规定了皇帝的地位，人们为了服从天理，必须服从皇帝。

在历史上，最接近西方思想的是《孟子》的理论，暗含着人与皇帝之间的契约关系，如果皇帝不履行契约，就没有资格当皇帝。但孟子的这种思想一直是处于压抑之中的，并和儒教的其他思想混合在一起，早就被人忽略了。

与现代一样，黄宗羲的政治学可以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两部分进行讨论。

在政治哲学上，黄宗羲构建了一个类似于霍布斯的契约论。他认为，在最初（三代以前），人们各自都是为了私欲而做事，类似于一种丛林状态。后来有人出来克制自己的私欲，为了天下的公利而百倍努力，这些人就成了君主。[48]

所以，君主的产生是为了防止人人各得其私，形成一种公利观念。

但是，到了后来，君主却变了味道。古人的君主是为了天下之利而

进行治理，这时候，天下是主，君主是客。可是到了后来，皇帝开始体会到权力的滋味，认为天下的利润都应该归属于自己，这就是把天下都当作私产了，甚至为了私欲，宁肯把天下的家庭都拆散。皇帝变成了主，天下变成了客。结果，皇帝不仅不再是天下的保护者，而且成了天下的大害。[49]

但是，皇帝以天下为私产，是否能够长期做到呢？答案是：不可能。明太祖可以做到，但是，经过十几代传承之后，早晚会遭到报应。到了崇祯皇帝时期，一个皇帝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子女，崇祯皇帝甚至对公主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啊！

这种说法看起来悲壮，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历代皇帝都把天下当私产，到最后已经积重难返，最终必然被天下所抛弃。

谈完君主之后，第二个问题是大臣。大臣的职责是什么？到底是俯首帖耳，还是舍生取义？

答案是：这两种做法都不是大臣的职责。所谓大臣，只是因为靠君主一人治理天下治理不过来，必须将他的责任分一部分给大臣。所以，大臣和君主是一种共同治理的关系。大臣要负责的对象不是君主，而是天下的百姓。这种思想延伸出去，就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架构：地方政府不是向中央政府负责，而是向当地的人民负责。这实际上是否认了所谓的中央集权模式，对于大一统帝国是一种颠覆性思想。

黄宗羲还直接否定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完全是两码事。父子之所以为父子，是因为儿子的身体是来自父亲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不当大臣，他和君主就形同路人，根本没有任何联系。[50]

谈完君、臣之后，第三个问题要谈的是法律。黄宗羲将法律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三代以前的法律，另一种是后来的法律。他认为最初的法律是用来调整人们之间生活关系的，比如，土地如何分配，婚姻如何调节，都需要一定的法律框架，保证人们的生活便利。但是，后来的法律则不是以调节人们生活为主，而是帮助君主来统治人民，如何从人民那儿压榨出足够的资源来供应皇帝，同时如何抑制人们的不满，让皇帝可

以持续性压榨。[51]

法律到底是为了“治人”，还是为了“服务人”，这是好法律和坏法律的重要区别。而自从秦汉以来，到宋元，法律都是为皇帝服务的，所以已经走上了歧途。

在谈完君、臣、法律之后，黄宗羲进入了政治学的另一个层面——政治实践，开始讨论政治学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设置宰相的问题、学校、取士、建都、地方的方镇、土地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公务员、宦官等。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有自己的分析。

比如，他认为在政治架构上，宰相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明朝之所以灭亡，首先从朱元璋为了集权废除宰相开始[52]。

他所设想的宰相，实际上类似于一种宪政架构下的分权制，皇帝拥有一定的决策权，而宰相则是最高行政首脑，起着制约皇权的作用。这样一种分权制，才能保证人民的权利不完全被家天下的国君所蚕食。

我们可以把黄宗羲的政治学著作和唐代吴兢的政治学著作《贞观政要》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他的书有多进步。《贞观政要》一直是唐代以来历代皇帝的标准政治教材，虽然也提到了君民关系、君臣关系，表示君主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但吴兢的基本架构仍然是“君臣父子”式的，仰仗于国君的道德水平，希望明君的产生。而《明夷待访录》不再幻想君主的仁慈与否，而是寄希望于建立一套新的制度架构，限制君主的权力和私欲，不要让他对社会产生破坏。以制度的优势来达到民间的繁荣，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另外，黄宗羲对于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政治学从哲学中分离了出去。在之前，哲学是包罗万象的，既包括现在的科学（物理、化学、天文、数学），也包括社会学，如同一锅粥搅和在一起。在这种架构下，所有的学问都是信仰式的，不容怀疑，都建立在一套“天人合一”或者“天理”的架构之下。可是黄宗羲却把政治学单独提取了出来，放在放大镜下，对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哪怕他的观点不见得正确，但这种研究态度，让政治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诞生了。

黄宗羲对于政治学进行研究时，另外的人则把更多的学科从哲学的大酱缸中分离了出来，形成专门的学问，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顾炎武：提倡实学精神

在明末学者群中，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是顾炎武。

顾炎武比黄宗羲小三岁，他虽然家境宽裕，但没有像黄宗羲一样名显当时。在年轻的时候，他总是科考失败，最终干脆放弃了科考，开始重视实学。[53]

在明朝没有灭亡时，他就开始搜集各地的历史和地方志，考证其中的农田、水利、矿产、交通记载，这些记载到了后来，成了他两本最有价值的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材料。

明朝灭亡之后，顾炎武也加入了反抗清军的斗争。他撰写了一系列的专门学问论文，最著名的是《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但南明王朝只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小朝廷，又因为清朝的入侵而焦头烂额，这些实学论文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除了这些建议之外，他也投笔从戎，加入了军事斗争，和抗清队伍一起遭遇了多次失败。他的嗣母绝食而死，临死前嘱咐顾炎武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坚持大义。在斗争的过程中，顾炎武屡次到南京的明太祖陵祭拜，表示不忘明朝。

当清军最终获得了胜利之后，顾炎武拒绝了在清朝当官的邀请，浪迹天涯，回归学术，开始了著述时期。不过他本人并没有因为与清朝的不合作态度而受穷，因为他重视实学，很有经济头脑，到了一个地方就购买田产，积累财物，但又自持不乱花钱，喜欢救济别人。整体看来，他的后半生选择四处漂泊，却过得十分惬意。

因为他在明朝没有深入政治，缺乏像黄宗羲那样对于政治深刻的理解，也无法写出类似于《明夷待访录》那样彻底反思的著作，但顾炎武却博学多知，在许多方面都有极大的造诣。加上他在游走过程中，对于

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全部穷原究委，考证得失，试图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使得他成了一个博学家。

他研究最深入（但不是影响力最大）的学科，是政治地理学。在这方面，他写出了两部规模巨大的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本书以地理为经，将中国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资源、山川形势、军事险要全部考察了一遍。这两本书形成了中国意义上的博物学著作。这两本书可以和《徐霞客游记》做对比，同样是游览四方，《徐霞客游记》以记载山川地理为主，而顾炎武的著作却以地理为依托，考究各地社会和自然的方方面面。

不过，就如同现代正经的地理历史著作永远比不上小年轻吃喝玩乐的旅游书一样，顾炎武的书虽然深入得多，知名度却要小得多。

除了政治地理学之外，顾炎武还开创了许多专门的学问。他研究最多的是音韵学，特别是对古代读音的研究，通过对古代书籍的考证，来解读古代读音的问题，成了研究古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另外，在金石、考古上，他也都有创见。

在明末清初的三大家之中，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是黄宗羲，因为他研究政治和经济，特别是现代人总结的“黄宗羲定律”更是让他大出风头。其次是王夫之，因为他研究的是哲学，将人们对于天理的崇拜驱散，改为对人世的研究。顾炎武由于研究具体的学问，反而受到了轻视。但实际上，对于清朝学术影响最大的，反而可能是顾炎武。

清朝学术的主要方向是：放弃宏大叙事，从细微处做起。也就是从方法论上形成突破，而不求建立统一的体系。

这和现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有点相似。宗教的态度是宏大叙事的，从一片叶子可以看到上帝的旨意，如果是汉儒，就可以从中看到老天爷；如果是宋儒，就可以看到天理，再从天理想到应该好好做人，听皇帝的话。但是现代科学却避免讨论如此宏大的主题，而是研究这一片叶子属于什么植物，有什么用途，或者这片叶子出现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样的地理什么样的天气，等等。这种方法看起来没有那么振奋人心，却更加贴近于实际生活。当越来越多的这种细微细节积累起来的时候，科

学就可能获得突破，从这种植物中提取出何种化学成分，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

王夫之是利用宏大叙事来提倡实学精神，但他本人对于实学研究却兴趣不大。而黄宗羲已经开始实学研究，但他的实学主要表现在政治学和学术史，范围仍然有限。只有顾炎武真的对他能接触到的万事万物都有兴趣，并真正沉下心来做具体的研究。

他研究地理学，就把古今地理著作拿来考证，并亲自跑过去查看，再考校着，加入各种与地理有关的人文、自然，形成统一的体系。

他研究经学、金石、音韵，也是要大量阅读书籍，再从细微处考证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答案，从而将这门学科专业化。

他的做法更像是现代科学、社会学中的学者的做法，首先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再沉下心去做研究，找到前沿性的问题，最后寻找自己的答案。

这种方法会将诸多的学科逐渐从大一统的理学中剥离出来，形成专门的学问。在清代，经过人们努力，地理、史料考证、文字考证、音韵、算术、金石这些具体的学问一点点专门化，形成了体系，而这些学科的专门化、研究的专业化，都可以追溯到顾炎武。

在清代形成的一大批考据派中，顾炎武是最早的之一，也是成就最大的之一。后期的考据派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最终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走向了实学之路。

清朝的实学，看上去没有天学、理学那么波澜壮阔，但它蕴含的科学精神，不仅影响到了民国的学术，也是我们现在的榜样。

阎若璩：伪经的发现

清初三大家对宋明理学百般质难，提倡学者们研究实在的学问。但对理学造成致命一击的，却是一个文弱、看上去无害的书生。

与黄宗羲、顾炎武的侠客之风和王夫之的哲理大家相比，阎若璩的学问并不显山露水，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他专门研究一些深奥而没有多少人能懂的学问，看上去像个书呆子。如果非要找出一个相似的人，那么顾炎武的学问和他还有几分相似，他们既研究经学，也研究地理、掌故，更重要的是，两者都是考据大家，对于古书之中的一字一句都揣摩来揣摩去，质疑每一个字的真伪，考查每一个例子的出处。

但这个书呆子有一天却利用考据的功夫挖了理学的墙脚，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挖就让程朱建立的理学大厦轰然倒塌了。

在程朱理学体系中，有一个仿照佛教心法的“十六字心传”，这个心传从《尚书》的一篇文章《大禹谟》中摘取了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熹认为这十六个字包含了儒学的精华，据此把人类的心分成了两个部分——人心和道心，认为人心就是普通的心，而道心就是体会天道的心，这两个心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心。体会天道的过程，就是压抑人心、通达道心的过程。要通达道心，又必须专注和中庸。

包含这个心传的文章《大禹谟》出自《古文尚书》，这篇文章大意是，舜在传位给大禹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交代。人们认为这句心法是尧舜禹相传下来的，代表着圣人的最高智慧。

所谓《古文尚书》，可以追溯到秦朝的焚书坑儒时期。由于秦始皇只保留农业、医学和占卜用书，其余的书都下令毁灭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尚书》也没有逃过劫难。但在毁书时，一位秦朝的博士伏生将一部《尚书》藏到了墙里，没有被发现。到了汉初，拿出来时，发现书已经坏了，本来大约有一百篇，最终只留下来二十九篇。伏生就用这部残缺的《尚书》教授学生。后来这一部分《尚书》就称为《今文尚书》。

到了汉武帝末年，汉朝的鲁恭王为了扩大宫殿，拆除孔子家宅，在墙壁里又找到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是使用先秦时期山东的古文字写的，后来由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得到，这部书除了包含《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之外，还多了十六篇，这就是《古文尚书》。[54]《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区别是：第一，二十九篇中有字词的不一致；第二，多了十六篇。

汉代的学者因为《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争执不下，实际上是为了抢夺政治资源。但没有料到，西晋末年的战火时期，《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原本都已经失传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找到一本《尚书》，这本《尚书》包含了《今文尚书》三十三篇（与原来二十八篇相比，有了拆分）、《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一共五十八篇。再加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序言。根据当时的说法，这就是孔安国当年的本子。

到了唐代，孔颖达根据皇帝的旨意做了统一的教科书《五经正义》，就利用了这个本子。从此以后，今古文合一的《尚书》成了儒教经典的标准配置。

宋代理学家们选择“十六字心法”的那一篇《大禹谟》，属于《尚书》中的古文篇章。从晋代之后，几乎没有人怀疑《尚书》的古文部分和今文部分是不一样的。但是到了宋明时期，偶尔有人提到《古文尚书》里的文字似乎不大像古代的文字。[55]但由于这是官方定的儒教经典，人们不可能相信这本书是后人伪造的，不是圣人的话。

随着考据学的发展，人们的怀疑精神终于被释放了出来。阎若璩二十岁时读《古文尚书》，就觉得这似乎不是真的，之后三十年一直苦苦思索，最终得出了令当时的人们瞠目结舌的结论：这是一本伪造的书，是晋朝时的作品[56]。他列了一百二十八条质疑，来说明这是本伪书。经过争论，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

为了说明阎若璩的考订功夫，我们总结他的论据大致包含了四个方面，一个比一个更加深入[57]。

第一，现传的《古文尚书》的篇数和篇名，与记载的不同。按照汉代的记载，《古文尚书》一共是十六篇，但是现传的《古文尚书》却有二十五篇。原本的《古文尚书》虽然失传，但是篇名保留了下来，在对比篇名时，发现现传的《古文尚书》与原来的篇名并不完全一致。

第二，原来的《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都有一些残篇流传了下来，可以拿来和现传的《古文尚书》作比较。原本古文残篇保存在东汉人郑玄的尚书注里，而原本今文残篇保存在东汉时期刻的石经里，通过

比较，发现现传《古文尚书》中的字句和这两个来源的文字都有很大的出入，说明现传的《古文尚书》既不是古文也不是今文，很可能是后人伪造的。

第三，现传的《古文尚书》中有很多史实和地名有问题。比如，《古文尚书》的《泰誓》中提到族刑[58]，也就是灭族。可是这个刑罚是秦文公时期才出现的，而《泰誓》写的却是周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的事情。再比如，现传《古文尚书》附了一篇《孔安国传》，其中提到金城郡，而金城郡是在汉昭帝时期设立的，可是孔安国死于汉武帝时期。

第四，文体和文法问题。现传的《古文尚书》中的《五子之歌》不像是夏代的文体，而《胤征》中出现的“玉石俱焚”是魏晋时期的词汇。

通过这些点点滴滴小的考证，阎若璩最后得出结论，儒教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至少有一半是魏晋时期的人伪造的。

这个结论一出，理学家们脸上挂不住了。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理学的心法，按照心法所授修身养性，认为这是来自尧舜禹时期的圣人圣言，可以传诸万世。但突然之间却被告知，这个所谓的心法其实是魏晋时期的人伪造的，而魏晋时期又以玄学而臭名昭著，他们不知道骂过多少遍。这就像一个人吃着山珍海味不停地炫耀着，却突然被告知，他吃的其实是用屎调的一样。

但震动过后，有脑子的人却开始学会怀疑精神。他们意识到，自己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并不总是正确的，其中包含了很多错误，也有很多伪造。当生活在封闭之中的人突然被打开了一扇小窗时，更多的人开始凿其他的窗，并造成黑暗的终结。

与阎若璩同时期的胡渭、毛奇龄则对宋明理学的另一个阵地——河图和洛书进行了考证。河图和洛书是两种用数字表示的图形。这两个名称最早出自《易经》[59]，接着就有传说，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中跳出，背负着河图，又有神龟从洛水中爬出，背负着洛书，伏羲根据河图、洛书创造了八卦。

但河图和洛书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后来，五代末年的道士陈

抟为了附会这个传说，画了两个数字图，称作河图和洛书。如果拿出一张纸，在中心画五个点，再在上下左右四个方位上分成内外两层，下内层画一个点，上内层画两个点，左内三个点，右内四个点，下外六个点，上外七个点，左外八个点，右外九个点。画完后，再在中心五个点的上下靠近处各画五个点。这些点加起来一共五十五个，就构成了神秘的河图。

至于洛书，其实就是一个数字游戏，将九个数字放入三乘三的九个格里，使得横排、竖排、斜排的三个数字相加都是十五。如果做出了这道题，恭喜你，你画出了令多少古人痴迷和崇拜的洛书。

到底河图、洛书有多神秘？理学家们告诉你，这两个图关乎宇宙真理，是上古圣人流传下来的。到底怎么关乎宇宙真理，理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最终你也不可能搞明白。

清代学者告诉人们，其实这两个图只不过是一个五代道士的胡说八道，这个道士把宋代的那些大儒都骗了，抑或那些大儒主动要求受骗。

在清代学者的共同冲击下，理学这个不容置疑的怪物，终于变成了可研究的对象。虽然清代的统治者仍然在用理学选取官员，但是，理学已经变成了一张皮，人们之所以学它，只不过当作一种政治课来学习，考试之后就把它抛到脑后去了。

戴震：大一统理论消亡

雍正年间，一位未成年孩子的提问震惊了老师[60]。在授课时，老师讲到了《大学章句》，按照传统，人们认为《大学》是孔子传授给弟子曾子的，由曾子口述给后人，再由他的门人记录成文字。当老师说到这里，孩子突然提问说：你是怎么知道这是孔子的话，又由曾子记住并口述下来的？又是怎么知道是由曾子的得意弟子记下来的？

老师回答说：这是朱熹老爷说的。

孩子问道：朱熹老爷是什么时候的人？

老师回答：宋朝人。

孩子问：那么孔子和曾子又是什么时候的人？

老师答：周朝人。

孩子又问：周朝和宋朝相差多少年？

老师回答：快两千年了。

孩子立刻问道：差了这么多年，朱熹老爷又是怎么知道两千年前的事情呢？

老师无法回答，感叹说，这个小家伙真不是常人啊！

这个孩子就是戴震。他从小就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考据倾向，对每一个字都必须求得含义，对于任何考据性的著作都爱不释手。这种倾向一直保持到他成年、做学问和死去，让他成了清代最有学问的大家。

到了乾隆、嘉庆时期，清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盛世，也是清代学术的高峰期之一。在顾炎武、阎若璩等人的影响下，清代的学问比前代都扎实。这时的学者大都走实学路线，他们对于大道理并不感兴趣，也不再相信什么天道人伦，更不想用主义淹没了事实，只对事实感兴趣。

这也是中国学术最接近西方学术的时期。西方学术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之后，到了文艺复兴开始追求对真实世界的描述，放弃了对于各种主义的兴趣。这种实学精神最初还只是表现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但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变成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并引起了西方科技的大发展。

中国第一次实学精神开始于唐代，最初是在文化上，后来进入了社会学、经济学，并产生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些实用性的发明。但唐代的实学精神到北宋中期就完结了，重新在二程、朱熹等人的带领下回归了神学。

中国第二次实学精神开始于清初，最初也是在文化、社会、经济方

面发展，这一次人们对于客观性强调得更进一步，也更看重逻辑和验证的力量。如果假以时日，也许会和西方一样，从文化转向自然研究，产生一次科技复兴，但我们无从验证这种假设是否成立，因为西方的入侵，将中国强行带入了这一个轨道。中国的科技发展最终是靠外力推动的，没有机会实现自我的缓慢转型。

戴震就是第二次实学精神的最高峰。

戴震的一生在科举上坎坷无比。他二十八岁才是县学生员，三十九岁才中举，之后六次会试都没有考中。但他的学问却早已传到了中央政府的耳中，在皇帝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时，还把他找了去，让他以举人的身份，厕身于大批的进士高才生之中，那时他已经五十一岁了。

为了显得好看一点，他五十三岁又参加了会试，没想到又失败了。皇帝看着实在不像话，特准他和进士们一同参加殿试，给了他一个同进士出身。但他获得出身后两年就去世了。[61]

他的经历正好说明，考试所用的八股文与真学问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幸运的是，戴震并没有像范进那样，为了考试把其他的都耽误了。他本人一直勤于钻研，写成了大量的著作。在他死后十余年，乾隆皇帝偶尔翻起他校的《水经注》，问大臣：戴震还在吗？当听说戴震早已经死去，皇帝唏嘘不已。

按照后人的总结，戴震的学问从对文字的考证开始，到训诂之学，从训诂再进入义理层面的解读。按照这个步骤，他的学问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是“小学”，第二是“测算”，第三是“典章制度”。

所谓小学，指的是声韵、文字方面的考证学问，以及对于语法、语音的总结。[62]

所谓测算，指的是数学、几何、天文、历法等学问。[63]

所谓典章制度，内容更加宽泛，既包括了经学的考证，也包括了对于地理、河渠等的考证。[64]比如，在戴震之前，《水经》一书因为流

传，早就和注文混为一体，戴震将《水经》和注文分开，再详细考证了这本书对应的山川地理。

《周礼·考工记》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工程技术手册，记载了从建筑到兵器、农具、生活用具的制作方法。但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简单，很难通过阅读这七千字的书稿，获得完整的印象。戴震则根据书稿，通过考证，将书中提到的各种制作方法用图的形式表现出来，恢复了中国古代的制作技术。

他还从《永乐大典》中将《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等数学书籍恢复了出来，总结古代数学成就的同时，又采用西方数学来研究勾股弦问题、圆的问题，开拓了中国的数学。同时，他的《策算》专门讲乘除开方，更是超越了中国数学。

这种严格的学术精神，将中国的学术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顾炎武等人的开拓下，到了戴震，中国学术终于走出了大而全、形而上的模式，进入了研究具体问题、实际问题的时期。

人们谈论清代学问时，常常认为清代没有哲学，只有小学（各种专门技艺），比起宋明来要差很远。但实际上，清代学问的演化，恰好是人类哲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在最初，人们将一切关于智慧的学问都称为哲学，此时的哲学是无所不包的，既包括对宇宙、社会的看法，也包括数学、天文、物理这些专门化的学问。人们从信仰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种知识，都受到哲学的统辖。

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加深，许多学科从哲学中分化了出来。比如，在牛顿时期，人们仍然不提“科学”，只是将之称为“自然哲学”，也就是有关自然的哲学，牛顿最著名的著作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之后，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继续细分成了物理、化学等。

在自然科学分离时，关于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学问，如政治学、经济学等也逐渐分离，形成了单独的学问。当这些更加成熟的学问都纷纷独立时，给哲学的领域只剩下了那些无法充分观察，只能凭借信仰维持的部分。“哲学家”这个词曾经是博学的代称，但现在许多所谓的哲学家都只能靠贩卖心灵鸡汤而苟延残喘。

所以，现代哲学比起古代哲学对人类的影响已经在缩小，因为它不再负责解释宇宙的构成，也不再影响人类的经济和生活。哲学的退缩与科学的前进，是现代人的主旋律。

清代哲学恰好符合了这种趋势，文人们已经意识到，构建一个大而全的一统理论不仅无益于治理国家，反而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更何况，在没有研究透自然和社会时，任何声称“宇宙真理”的学问都必然是伪真理。他们选择各种“小学”是有意识的主动选择，不仅仅是无奈和退缩。他们的研究也并非鸡毛蒜皮，而是磨炼思辨工具、发展考据功夫、重新审理古代材料的过程，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典籍都被重新研究，并利用考古学对中国历史进行再审查，将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制度进行重新研读。当把这些材料研究透彻，再从“小学”进化到更大的学问。这条路不仅是西方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也同样适合中国的进化。

公元1840年，当西方的炮舰强迫中国人睁开眼睛时，恰好中国的学术已经站在了现代的门口，于是，东方的头脑与西方的学问碰撞了。

注解：

[1] 《明史·刘三吾传》中没有廷试的情节，但据《明史·选举志》：放榜之后，三月份仍然举行了廷试，可以看出在放榜之初，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后来的轩然大波，而廷试也照常举行。

[2] 《明史·选举志》：“然讫永乐间，未尝分地而取。洪熙元年，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宣德、正统间，分为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

[3] 南北中三部的划分。南部：应天府，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部：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部：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根据《明史·选举志》。

[4] 本段例子均见《宋史·陆九渊传》。

[5] 《宋史·陆九渊传》："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

[6] 陆九渊《语录》："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7] 该学案还有胡居仁、娄谅、谢复、郑伉、胡九韶、魏校、余祐、夏尚朴、潘润等人。见《明儒学案·崇仁学案》。

[8] 《明史·陈献章传》："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9] 《明史·湛若水传》："十八年会试，学士张元祯、杨廷和为考官，抚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置第二。赐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

[10] 见《明史·王守仁传》。

[11]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

[12]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

[13] 见《明史·王守仁传》。

[14] 《答李明德》："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15]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16] 见《天泉问答》。

[17] 见《明史·王守仁传》桂萼对王守仁的弹劾。

[18] 见《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处士王心斋先生艮》和《明史·王艮传》。

[19]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处士王心斋先生艮》："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可使天下有不及闻者乎！"

[20] 《明史·王艮传》："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

[21]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处士王心斋先生艮》："乃按礼经制五常冠、深衣、大带、笏板，服之。曰：'言尧之言，行尧之行，而不服尧之服，可乎？'"

[22]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处士王心斋先生艮》："先生以'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齐治平在于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

身未安，本不立也，知身安者，则必爱身、敬身。爱身、敬身者，必不敢不爱人、不敬人。能爱人、敬人，则人必爱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爱我敬我，则家齐，一国爱我敬我，则国治，天下爱我敬我，则天下平。故人不爱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谓淮南格物也。子刘子曰：'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第少一注脚，格知诚意之为本，而正修治平之为末，则备矣。"

[23]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又云：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

[24]　《明史·神宗纪》："（万历）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

[25]　比如，名儒罗汝芳的讲学机构就让张居正愤怒不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参政罗近溪先生汝芳》："万历五年，（罗汝芳）进表，讲学于广惠寺，朝士多从之者，江陵恶焉。"

[26]　见《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相关记载。

[27]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已同后台入京师，与罗近溪、耿天台游。一日遇江陵于僧舍，江陵时为司业，心隐率尔曰：'公居太学，知太学道乎？'江陵为勿闻也者，目摄之曰：'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江陵去，心隐舍然若丧，曰：'夫夫也，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

[28]　《焚书·卷三·何心隐论》："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

[29]　见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二十四章引《林李宗谱》。

[30]　《珂雪斋集·李温陵传》："公遂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发，独存鬓须。公气既激昂，行复诡异，钦其才，畏其笔，始有以幻语闻当事，当事者逐之。"

[31]　《赞刘谐》："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

[32]　《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

[33]　《焚书·卷三·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

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

[34] 《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二大教主》：“壬寅，曾抵郊外极乐寺，寻通州马诚所经纶侍御留寓于家，忽蜚语传京师云：卓吾著书丑诋四明相公（沈一贯）。四明恨甚，踪迹无所得。礼垣都谏张诚宇明远遂特疏劾之，逮下法司，亦未必欲遽置之死。李愤极自裁，马悔恨亦病卒。”

[35] 见《珂雪斋集·卷八·李温陵传》。

[36] 见《续焚书·卷四·李卓吾先生遗言》。

[37] 《明史·顾宪成传》：“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38] 《万历野获编·卷五·陈增之死》：“矿税流毒，宇内已无尺寸净地，而淮徐之陈增为甚。”

[39] 《明史·李三才传》：“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明史》在评论中，也点出了结党的危害：“朋党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恶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同异之见岐于中，而附者毁者争胜而不已，则党日众，而为祸炽矣。”

[40] 见《明史·杨时乔传》。

[41] 《明史·儒林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42] 此事件记载于多种清初史料，但文字略有不同。本书采纳吕留良《吕晚村先生诗集·伥伥集·卷三·真进士歌》自注的文字。而根据蔡尔康《纪闻类编·卷四》，这张纸张贴在北京大明门上，文字为“奉送大明江山一座”，落款为“八股朋友同具”。

[43] 这个原则称为“奥卡姆剃刀”。

[44] 《清史稿·王夫之传》：“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于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馈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

[45] 《周易外传·系辞上传》：“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圣人知之。圣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妇能之。人或昧于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无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

[46]　《读四书大全说·孟子·梁惠王下》：“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

[47]　黄宗羲生平见《清史稿·黄宗羲传》。

[48]　《明夷待访录·原君》：“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49]　《明夷待访录·原君》：“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50]　《明夷待访录·原臣》：“或曰：臣不与子并称乎？曰：非也。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久之无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后，日远日疏，久之而气不相似矣。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夫然，谓之臣，其名累变。夫父子固不可变者也。”

[51]　《明夷待访录·原法》：“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52]　《明夷待访录·置相》：“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

[53]　顾炎武生平见《清史稿·顾炎武传》。

[54]　见《汉书·儒林传》。

[55]　如朱熹本人也曾有疑心。他在《朱文公文集·卷八二·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提道：“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

[56]　《清史稿·阎若璩传》：“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尚书古文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

[57]　参考《古文尚书疏证》。

[58]　《尚书·泰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

[59]　《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60]　见《戴震集·附录·戴东原先生年谱》。

[61]　见《清史稿·戴震传》，以下三处引文皆出自于此。

[62]　其小学书有六书论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方言疏证十卷。

[63]　其测算书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

[64]　震所著典章制度之书未成。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水经注四十卷，九章补图一卷，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有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附录
中央帝国时期中国哲学简单年谱

神学谶纬期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统一的秦朝进入了崩溃之路。叔孙通劝告秦二世，陈胜等人只是小盗，不需要动用中央军队。

公元前207年：第一个大一统朝代秦灭亡。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确立第二个大一统朝代汉朝。

同年：叔孙通求见汉高祖，为汉高祖制定宫廷礼仪和君臣名分。

同年：陆贾写作《新语》，为大一统王朝寻找理论依据。陆贾的理论在儒道之间，满足了皇帝一时的需要，却无法解决长期的合法性问题。

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叔孙通主持君臣大典，皇帝正式成为凌驾于诸侯王之上的主宰。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身死。在他身后，由于缺乏人们的尊重，帝国几近崩溃。

公元前180年：吕太后去世。吕太后终生没有解决皇帝合法性问题，只能依靠娘家人维持政权稳定性。吕太后死后，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以吕氏诸王被废为结局。

同年：汉文帝继位。文帝利用黄老之术进行统治，发展经济，让人们适应大一统的存在，暂时搁置了皇帝合法性问题。

同年：二十二岁的贾谊成为汉博士。他主张利用儒家学说来制定一

套礼仪制度，从而利用礼议固化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完成皇帝的合法化。但贾谊的提议未被采纳。

公元前176年：贾谊被外放长沙王太傅，七年后郁郁而终。

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爆发，晁错被诛杀。晁错利用法家理论，试图利用法律来固定皇帝权威，并力主削藩，防止诸侯国有颠覆中央的实力。晁错死后，七国之乱被镇压，中央政权更加稳固。

公元前141年：十六岁的汉武帝刘彻登基。

公元前140年：魏其侯窦婴为丞相。窦婴与继任的武安侯田蚡都是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因为得罪了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而被贬。

同年：汉武帝征召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岁的公孙弘第一次被征召，却由于不合用而罢职。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立《易》《礼》博士。此前汉代已经有了《诗》《书》《春秋》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立，是儒学成为正统的标志之一。此前，汉代博士不止限于儒家，但在汉武帝时期，博士才专门针对儒教，形成了知识垄断权。武帝时期，一共有七个博士点，其中《春秋》《易》《礼》《书》各有一个博士点，而《诗经》有三个博士点。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窦太后是汉文帝皇后，是黄老之术的最后代表。她去世后，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被强调政府控制的激进政策所代替。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征召天下儒生策问长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教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同时，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学说将皇帝塑造成上天安排统治人间的，解决了皇帝的合法性问题。从此，人们开始相信，只有刘氏应该当皇帝，因为这是上天的安排。

公元前130年：公孙弘被第二次征召，因为其阴阳儒术混杂的世界观而受到皇帝崇信。

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担任丞相。他只精通一本书《春秋公羊

传》，依靠这本书来治理国家。“公羊传”成了汉代儒教的代名词。他的示范作用让人们对儒教趋之若鹜。

同年：公孙弘要求皇帝建立太学。西汉教育体系正式成型。太学以传授儒教为主，并成为官员晋升的途径，使得西汉后期的政治完全被儒教所控制。

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被告谋反，担心受迫害而被迫自杀。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体系博大，成了最后一部带有黄老精神的著作，却生不逢时，被一系列宣扬儒教的小册子取代。

公元前117年：酷吏张汤以“腹诽之罪”杀大司农颜异。张汤号称“春秋决狱”，将儒教经典引入了司法体系。儒教的司法化，是一个宗教形成的正式标志。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去世。他留下了内容芜杂的《春秋繁露》，成了汉代儒教的经典著作。其中夹杂着大量的谶纬、阴阳、天人感应，使得汉代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迷信的朝代之一。

公元前81年：盐铁大辩论。

公元前78年：著名学者眭弘被杀。当年泰山和莱芜山出现了一系列的灾异，眭弘认为这是改朝换代的信号，要求皇帝让贤。眭弘成了汉代书呆子的典范，也可以看到儒教的灾异学说如何控制了人们的脑子。

公元前74年：汉宣帝继位。汉宣帝时期，五经博士一共有十二个博士点。《诗》《易》《书》各三个博士点，《春秋》两个点，《礼》只有一个点。

公元前53年：汉宣帝主持关于公羊学与谷梁学的第一次辩论。

公元前51年：石渠阁大辩论。汉宣帝试图确立统治哲学的正统教义。谷梁学列为博士点。

公元前7年：丞相翟方进自杀。前几年出现了一系列的灾荒，这年又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被认为不吉利。观星的官员乘机上奏要想破

解上天的谴责，必须牺牲一位大臣来承担上天的谴责。汉成帝命令丞相翟方进自杀谢罪。翟方进的死亡虽然有政争的成分，但也反映了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的荒谬。

公元前6年：刘歆上书要求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学官，设立博士点。今古文之争进入了白热化。西汉时期，先秦之前所写的古文经逐渐被人们发现，形成了古文学派，与经过西汉篡改的今文经学争夺政治资源。刘歆提议将古文经列为学官后，遭到了今文经学博士们的大力抵制，刘歆写了《移书让太常博士》批评今文经学抱残守缺。

公元前2年：汉哀帝派遣博士弟子景卢前往大月氏使者的住处，学习佛经。景卢成了首位接触到佛经的中国人。

公元元年：四川送来一只白野鸡，被当作了祥瑞，群臣请求王莽当上了安汉公。这只白野鸡拉开了王莽代汉的序幕。

公元4年：刘歆受到王莽重用，利用古文经中的记载为王莽建立国家宗教建筑明堂。

同年：王莽开始为古文经正名，同时获得正名的还有谶纬。他命令征集精通《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史篇》的人，以及钟律、月令、兵法等专门人才，而天文（观天象解读命运）、图谶等也被列为专门人才受到重用。

公元5年：借助一块白石头，王莽当上了摄皇帝。

公元8年：又是一堆祥瑞，王莽当上了真皇帝。汉武帝开创的天人感应学说虽然授予了皇帝合法性，却又被人利用来推翻他的王朝。儒教的影响力达到了最大。

同年开始：王莽按照古代记载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如官制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等，这一系列改革最终葬送了新莽王朝。王莽时期，《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礼》都列入了学官，设置了新的博士点。但王莽灭亡后，今文经学再次受到了政治的抛弃。

公元18年：扬雄去世。扬雄模仿《易经》，构建了以“三”为阶的哲学体系，作为汉代哲学的异类而存在。但由于过于玄虚，扬雄对后世的影响力并不大。

公元23年：王莽身死。在他死后的混战中，刘秀、公孙述各派纷纷利用谶纬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依据。最终刘秀在战场上脱颖而出，建立了东汉政权。

公元28年：尚书令韩歆在皇帝的授意下，请求为古文经学的《费氏易》和《左氏春秋》设立博士点。他的提议引起了一场学术战争。最终光武帝只为《左传》设立了新博士点，但《左传》博士只持续了一届即告废除。在东汉初期，今文经学有十四个博士点，分别是《易》四家、《尚书》三家、《诗》三家、《礼》二家、《春秋》二家。古文经学一个博士点都没有。

公元67年：汉明帝派出使者迎来了第一批僧人到洛阳，为他们建立了白马寺。

公元75年：汉章帝继位。章帝本人爱好古文经学，特别是《左传》和《古文尚书》。在他任上，他命令贾逵从《公羊传》的学徒中选取优秀学生二十人教授《左传》。由此引发了多次今古文论战。

公元79年：白虎观会议召开。皇帝试图统一汉代各流派，建议官方指定的信仰，并由此产生了《白虎通德论》这本著作，作为官方信仰的指定读本。

公元97年：王充去世。王充著作《论衡》是汉代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作。

公元125年：汉顺帝登基。汉顺帝在位时，道教的根本经典《太平经》的雏形开始出现。《太平经》大量借鉴儒教的谶纬理论，形成了亦神亦鬼的风格。在漫长的两千年里，这个风格一直保存至今。

公元166年：马融去世。马融是东汉经学家集大成者，不仅精通今文经学，还精通古文经学，以及《老子》《淮南子》等著作，是东汉后期通儒的代表人物。这表明人们已经不满于门户之见，而想统领所有的

世间学问。

同年：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68年：第二次党锢之祸。大批文人丧失了从政通道，导致民间学问更加发达，官方学问日渐衰微。

公元184年：黄巾军叛乱。黄巾军以道教（太平道）为幌子建立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大叛乱。

同年：张脩叛乱。张脩在汉中地区建立了五斗米道，同样是一个以道教为幌子的类政权机构。

公元191年：张鲁杀张脩，改造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政权。

公元200年：郑玄去世。作为东汉最后一位经学大师，郑玄统一了今古文经学。他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文本统一起来，构成了统一经学。只是，在他完成学术统一时，经学已经濒临灭亡，被玄学取代。

玄学自然期

公元215年：张鲁投降曹操，汉中的五斗米道政权倒台。

公元220年：曹魏建立。在人才考察上，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对人分类为九品，根据品级进行任用。由此产生了玄学第一个流派：品评人物。品评人物的代表作品是刘劭的《人物志》。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去世。司马懿成为辅政大臣之一。此时魏国流行的哲学叫“王学”，是由一个叫王肃的人传授的经学。王肃是大臣王朗之子，也是司马昭的岳父，“王学”成了两汉经学残余与玄学对抗的主要力量。

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司马懿干掉了魏国宗室势力，成了魏国的主宰。玄学与经学的对抗白热化。

同年：玄学家何晏被杀，王弼去世。王弼与何晏是玄学的早期代

表，他们提出了“贵无论”，将“无”设为宇宙的本质，并由此拉开了思辨哲学的序幕。

公元256年：魏国皇帝曹髦利用玄学知识与群臣辩论，可以看作中国哲学玄学化的一个标志。

公元260年：中国僧人朱士行前往西域取经。朱士行从洛阳出发，到达陕西、甘肃，再西渡流沙，走丝绸之路南线到达于阗，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在那儿得到了经书。朱士行是中国宗教旅游第一人。

公元263年：玄学家嵇康被司马昭和钟会害死。嵇康一生“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接近苏格拉底精神的人物之一。他的死亡让玄学最具反叛精神的时代成为过去。

同年：玄学家阮籍身死。阮籍借酒躲避政治，却在死前被要求写司马氏篡权的劝进表。

公元264年：钟会在四川叛乱身死。在哲学上钟会写过《四本论》，对人的才性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人的才和性是同步的，以讨好司马氏。魏晋时期，辩论之风盛行，对于任何问题都会有一番辩论。

约公元272年：向秀去世。向秀最著名的作品是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他死时曾经为《庄子》作注，死后，书稿被郭象获得，郭象经过加工，发表了《庄子注》，成了玄学后期的代表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概念叫“独化”“无待”，在试图整合“有”“无”时，也试图将名教和自然统一起来。

公元283年：山涛去世。山涛是阮籍和嵇康的朋友，但在后期却重新进入名教，成了晋代的名臣。

公元300年：裴身死。裴最著名的作品叫《崇有论》，驳斥王弼、嵇康等人抛弃名教的思想，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回到对政治的热情之中。但裴最终却被赵王司马伦杀死，成了名教的陪葬品。

公元305年：竹林七贤中最小的王戎在经历了兵荒马乱之后，死在了逃亡的途中。王戎后期也耐不住对名教的追随，成为一代名臣，见证

了西晋王朝的衰落。

晋代：充满了享乐主义精神的《列子》诞生，将玄学引入了享乐主义之中。

三教开放期

约公元316年：西域僧人竺法护去世。他翻译了大量大乘佛经，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打下了基础。大乘般若学传入中国后，形成了六家七宗，为一时之盛。

公元317年：葛洪写成《抱朴子》内外篇。葛洪以炼丹为目的重新定义了道教。两千年来，道教的道士们矢志不渝地寻找仙丹，但所有的道士都不免一死。葛洪的另一个特点是“儒道双修”，内神仙，外儒术，认为儒道是并行不悖的。这个见解也让道教永远处于二流的地位，无法完成超越，在三教中长期位居末流。

公元339年：东晋辅政的车骑将军庾冰提出僧人应该敬拜皇帝，否则就破坏了礼治的统一，损害了皇帝的权威。另一个辅政大臣何充却反驳，认为佛教是一种淡泊的宗教，有着种种的清规戒律，这些戒律实际上是有利于控制民间反抗的，更加有利于皇帝。皇帝与其改变它，不如把它养起来，允许它有一定的小脾气。这是第一次关于僧人是否要敬拜皇帝的争论，这次争议以何充获胜告终。

公元384年：身在龟兹的鸠摩罗什被吕光抓获。吕光强迫鸠摩罗什破了淫戒，囚禁在凉州十八年。

公元385年：释道安去世。他极大地推动了大乘佛教的传播，尽最大可能区分佛教和玄学，又在制定佛教仪规、将佛教组织正规化上做了很多工作。释道安弟子遍天下，不仅北方有，南方也有，更是加速了佛教的扩张。

约公元396年：北魏道武帝建立沙门统，成为政府管理僧人机构的起始。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迁都平城，开始建立宫殿、宗庙、社稷，进行儒教化。道武帝也尊崇佛教和道教，表现了对于文明的饥渴。

公元401年：后凉灭亡，作为囚徒的鸠摩罗什被带往长安，在醇酒妇人（被迫）的环境中，开始翻译佛经，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译经师。他翻译了大量中观学的佛经，促进了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约公元402年：东晋权臣桓玄再次提出和尚应该敬拜皇帝。僧人慧远则回答了桓玄的责难，他把佛教徒分成了两类：一种是在家的居士，另一种是出家的僧人。他认为，在家的居士都应该遵守世俗的法则，而出家人则以修行大道为己任，不应该用俗世的礼节来要求僧人。桓玄最终妥协。

公元416年：慧远去世。慧远将佛教变成了上流的宗教，征服了东晋皇族，成为贵人和富人的座上宾。

公元433年：南朝宋的僧人慧琳写作《白黑论》，诋毁佛教，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大讨论。

公元434年：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去世。竺道生建立了涅槃宗，开创了顿悟得道的理论，后来被禅宗效仿。

公元440年：北魏太武帝在道士寇谦之的影响下，改元太平真君。寇谦之改良了天师道（脱胎于五斗米道），之后甚至担任了北魏的国师，将道教与政权的结合推向了一次高潮。天师道在他的改造之下，也变成了皇帝顺从的工具，称为北天师道。

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要求毁佛毁寺还俗和尚。两年后，灭佛达到高潮。

公元447年：南朝宋何承天去世。何承天曾写作《达性论》，批评佛教的三报论，提倡儒教的三才论，引起了另一场儒佛大辩论。

公元450年：北魏大臣崔浩被杀。作为儒教徒的崔浩是灭佛的最主要推手。寇谦之曾经警告崔浩会遭报应，果然崔浩因为写作历史著作《国书》，惹怒皇帝被杀。

公元452年：北魏太武帝去世，灭佛终止。

同年：北魏文成帝重设道人统，掌管僧道事务。

公元467年：道士陆修静被南朝宋明帝召往首都。陆修静对天师道进行改造以适应统治需要，称为南天师道。

约公元474年：南朝道士顾欢写作《夷夏论》，认为佛教不适合中国。

公元489年：在南朝齐竟陵王的宴席上，爆发了神灭论大辩论。持神灭观点的是范缜，其余人则持相反观点。范缜为此写作《神灭论》。

公元504年：南朝梁武帝萧衍下诏将佛教定为唯一的“正道”，将老子代表的道教，周公、孔子代表的儒教都斥为“邪道”。

公元507年：南朝梁武帝针对范缜不信神这件事，亲自写了一篇《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灭论》。皇帝认为，三教中都有许多经典是说人有灵魂的。皇帝写了答复后，又把自己的答复发给了臣下，为了向皇帝表示忠心，一共六十多个臣下纷纷上表，表示赞同皇帝的意思。

公元520年：北魏孝明帝组织了一次佛道大辩论，围绕老子是不是佛教鼻祖的问题展开，最终佛教获胜。这是历史上多次佛道起源大辩论的起始。

公元527年：南朝梁武帝建设同泰寺，舍身入寺，三天后返回皇宫，大赦天下。

公元529年：南朝梁武帝在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并再次舍身，由群臣凑了一亿钱为皇帝赎身。

公元534年：北朝佛寺共三万有余，仅洛阳就有1367所。

公元536年：道士陶弘景去世。陶弘景官场不得志，刻意追求炼丹修行，号称上清派。

公元546年：南朝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同泰寺。一个月后皇太子出钱

将他赎了出来。

公元547年：南朝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同泰寺，群臣用一亿钱将其赎出。

公元548年：侯景之乱爆发，梁武帝于次年被困死于首都。南朝的繁华与佛教一起走入了衰微。

公元555年：北齐文宣帝再次举行佛道辩论会，最终佛教胜出，皇帝让道士削发为僧。

公元569年：北周武帝召集名僧、儒者、道士以及百官两千多人，试图给三个宗教排定座次，皇帝心目中的座次是：第一道教，第二儒教，第三佛教。但最终辩论无结果。佛道辩论一直持续下去，在隋文帝、隋炀帝、唐高宗、唐玄宗、德宗时期，也都有辩论。

同年：甄鸾写作《笑道论》，代表佛教对道教驳斥的最高成就。另外僧人道安也写作《二教论》，同样是驳斥道教的经典。

公元573年：北周武帝开始灭佛。这次灭佛不杀人，只要求还俗。最终清退寺院四万座，还俗僧人三百万。

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武帝召集北齐首都邺城僧人开会，宣布将灭佛扩大到北齐境内。僧人慧远在皇帝的朝堂上发出了中国历史上对皇帝的最大诅咒：皇帝依靠武力破除佛教三宝，就是“邪见人”，而邪见人是要下地狱的，在阿鼻地狱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皇帝难道不害怕吗？

公元578年：北周武帝去世，灭佛告一段落。

公元597年：僧人智顗去世。他开创的天台宗成为中国第一个本土化的佛教学派。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根本经典，在唐代初期最为繁盛。

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始科举取士，开创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传统，也把社会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入了中央政府，解决了人才流通的问

题。

公元625年：唐高祖确立三教次序，道教最先，其次是儒教，最后才是佛教。

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开始取经。十六年后，他回到长安，带回经书526册、657部。

公元637年：唐太宗下令在皇家仪式上，男女道士走在僧尼前面，在列名时道士也要在僧人之前。诏书引起了僧人的大反弹，直到唐太宗以杖责、流放作武器，才击退了僧人的进攻。

公元640年：和尚杜顺去世。杜顺被认为是华严宗的创始人。

公元652年：玄奘建立大雁塔，储藏经书和佛像。他一共翻译了1335卷经文。但可惜的是，他所宣扬的“唯识派”并没有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公元690年：武则天登基称帝。武则天上台后，为了巩固政权，贬斥已经成为主流的天台宗和法相唯识宗，开始扶持更加草根的华严宗和禅宗，使得后两者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武后时代，贬抑道教，发展佛教，与唐代的基本政策正好相反。

公元713年：僧人慧能去世。慧能长期在广东韶关南华寺讲经，弘扬禅宗，提倡顿悟。他被人们称为禅宗六祖，也是对禅宗发展贡献最大的人。

公元730年：慧能弟子神会在辩经中取胜，压倒了禅宗北派，成为中国禅宗的正统。

公元743年：唐玄宗追封老子为皇帝，将道教的地位提升到与儒教相同。

公元819年：唐宪宗举办大规模仪式迎接法门寺佛骨，韩愈对这样的劳民伤财痛心不已，写作《谏迎佛骨表》劝谏皇帝，被皇帝贬黜。

同年：柳宗元去世。柳宗元是古文运动代表人物，也是唐代儒学的

代表。

公元824年：韩愈去世。作为唐代儒学的领军人物，韩愈激烈地反对佛教，复兴儒教。他的努力在唐代后期已经看到了成果，到宋代则产生了燎原之势。

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二十六万僧人还俗，十五万奴婢也成了两税户。唐武宗灭佛主要从经济上考虑。他死后，灭佛停止。

公元955年：后周世宗灭佛。他毁掉了90%的寺庙，但仍然留下了2694所寺庙、61200名僧人。

经世实用期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北宋前期科举制度直接继承自唐朝，主要考试科目为进士科和经学科。进士科考诗赋，经学科考人们对五经的背诵能力。

公元1043年：范仲淹改革。一年后改革失败。这次温和改革的失败，表明北宋已经很难找到一条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支持的改革道路了。

公元1045年：石介死亡。石介是宋初道德标兵，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

公元1046年：程颢、程颐兄弟拜周敦颐为师。

公元1053年：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告成，这是北宋保守主义史学革命的早期著作。

公元1055年：欧阳修以国家安全为名，请求皇帝禁止私人随意出版图书，在出版前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证。这是中国官方干预出版传统的早期阶段。

公元1057年：“宋初三先生”之一孙复死亡。

公元1059年：“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死亡。三人的出现，被视为道学家开始出现的标志。

公元1060年：欧阳修主修的《新唐书》告成。这本书充满了保守主义精神，带着儒家正统特色，是北宋保守主义史学革命的成就之一。

公元1069年：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这是一次实用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改革，它的成败，决定着北宋到底是进入更现代的实用主义轨道，还是停留在儒教的保守主义轨道。

公元1071年：王安石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进行重大改组。废除了其他的科目（包括明经），再对进士科进行了改造，废除了对于诗词歌赋的考试，而改为对五经、《论语》、《孟子》的考试。他的改革让科举具有了后期特征，将考试范围从文化变成了儒经。

公元1073年：周敦颐死亡。周敦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小短文《太极图说》，后来成为道学宇宙论的根本。

公元1077年：邵雍死亡。邵雍一生痴迷于用数字创造神秘主义理论，后被道学家吸纳入道学的宇宙论之中。

同年：张载死亡。张载的研究方向主要在人类的认识论，以及人和宇宙的关系。

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新党要将苏轼置于死地。苏轼的遭遇，反映了实用主义者的斗争策略，要将一切反对自己的人都打倒。

公元1084年：司马光主修的《资治通鉴》告成，这是北宋保守主义史学革命的集大成之作。作为保守主义的主将，司马光以儒教君臣思想贯穿始终，形成了超强的话语体系。

公元1085年：宋哲宗继位。保守派重新得势，司马光为相。苏轼被召回中央任职。但由于不容于旧党，苏轼再次请求外调。

同年：道学家程颢死亡。他的兄弟程颐吹捧他是：周公死后，圣人之道就不再通行，而孟子死后，圣人之道连传人都没有了，人们糊里糊

涂过了一千多年，才突然出了个程圣人，这个程圣人继承了孟子，开创了当代圣世。

公元1088年：程颐被授予崇政殿说书的职位，开始产生影响力。

公元1089年：苏辙请求政府干预私人印刷。宋代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印刷业政府控制体系，成为中央帝国控制出版的范本。

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召回了新党的章惇等人，恢复了新政，打击旧党。

公元1100年：宋徽宗继位，掌握政局的向太后再次召回了一批被章惇等新党贬斥的旧党成员。

公元1101年：宋徽宗亲政。他大肆打击旧党，就连新党的章惇、曾布也因为曾经反对宋徽宗继位而受到了打压。

公元1102年：宋徽宗推出党籍碑，在党籍碑上刻了120人的名字，宣布对这些人永不任用。两年后又增加到了309人，这些人中除了真的旧党，也包括苏轼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还包括反对皇帝继位的章惇等人。

同年：蔡京为相。作为实用主义最后的代表，蔡京为皇帝四处找钱，费尽心血，却无助于挽救北宋的命运。

同年：荆国公王安石加入了孔庙配享的行列，和颜回、孟子一起塑在了孔子身旁。

公元1107年：道学家程颐死亡。

公元1113年：追封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为临川伯，加入孔庙从祀（画像）行列。

公元1126年：二程的重要弟子、右谏议大夫杨时请求剥夺王安石配享的权利，最终皇帝把王安石从配享降为从祀。

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北宋最后是实用主义者掌权，他们利用金

融工具将北宋社会带入了崩溃之中。实用主义者已经臭名昭著，使得南宋成了保守主义者的天下。

道学封闭期

公元1140年：金朝封孔子的后代为衍圣公，宣告它继承了华夏的儒教文化。

公元1141年：金朝皇帝亲自到孔庙中祭奠，并以身作则地学习儒家经典和史学著作。辽金两代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了中原的科考制度，尊孔为正统。

公元1175年：朱熹、陆九渊鹅湖寺之会。陆九渊持心学立场，朱熹挺理学。这是中国心学和理学的第一次碰撞。

公元1177年：王安石儿子王雱的画像被逐出孔庙。

公元1178年：侍御史谢廓然提议禁止周敦颐和王安石的学说，认为性理学说是浮言游词，饰怪惊愚。

公元1195年：宋宁宗即位，招揽朱熹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同年：庆元党禁。党禁持续了六年，针对朱熹等道学门徒。这次党禁是道学上升为统治哲学之前的最后一次劫难。

公元1200年：朱熹死亡。

公元1206年：开禧北伐。北伐以失败告终，主持北伐的韩侂胄也被杀身死。韩侂胄是道学的最大敌人，他的死亡解放了道学。从此，再也没有势力能够阻止道学在中国的得势了。

公元1211年：南宋著作郎李道传上书请求尊崇道学，他的提议包括：重用道学人才、提倡道学著作、尊崇死去的道学家（二程、邵雍、张载、朱熹）。但没有被采纳。

公元1215年：蒙古大军攻克中京，俘虏了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开始

为蒙古人服务，建立制度。

公元1216年：南宋潼川府路提点刑狱魏了翁再次提议尊崇二程和周敦颐。

公元1220年：宋宁宗下令给二程、周敦颐、张载加谥号。

公元1228年：宋理宗追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第二年，又封为徽国公。

公元1231年：蒙古开始实行官僚制度，建立中书省，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开始建立户籍、税收制度。

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开始为蒙古主持科举制度。这次科举选取了4030位人才为蒙古人服务。但科考没有继续下去，只进行了一届就中断了。

公元1241年：宋理宗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送入孔庙，享受从祀的待遇。原本从祀的王安石则被请出了孔庙。朱熹的著作《四书集注》也成了政府的必读书，确立了未来在科考中的统治地位。

公元1254年：西方教士鲁不鲁乞到达哈拉和林，见到了蒙古大汗蒙哥。他在这里经历了一次蒙古大汗的“洗礼”，以及一次规模巨大的信仰大辩论。

公元1255年：道士不断侵占佛教资产，蒙古大汗宫廷再次发生了佛道之辩。

公元1258年：佛道再次在蒙古大汗宫廷辩论，争执的焦点仍然是老子化胡说。道士输掉了辩论，被强行剃头送入了佛寺。

公元1267年：南宋封曾参为郕国公，孔伋为沂国公，这两人和孟子、颜回一起享受配享的待遇。到了元代，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为郕国宗圣公，子思（孔伋）为沂国述圣公，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四圣的名称就来自于此。

公元1314年：元朝再次开始恢复科举。由于缺乏行政能力，科考极

为简陋，为了简化，采取了道学家的课本，造成了道学开始蔓延到科举体系之中。又课本单一，导致科举不再成为知识比拼的场所，而变成了死记硬背的投机之地。

公元1370年：朱元璋在刘基的帮助下，恢复了科考。

公元1397年：南北榜事件爆发。许多读书人为此心寒，而不再以功名为目的读书，这反而造成了明代民间学术的繁荣。

公元1415年：明朝政府主持编撰的超级课本《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问世。与其说是道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的封闭，不如说是这几部粗制滥造的教科书以及简陋的考试方法造成了中国哲学进入了思想封闭期。

公元1451年：陈献章拜著名学者吴与弼为师，学习理学。但他最终叛逆，开创了明代心学。

公元1494年：湛若水拜陈献章为师。湛若水后来做了明朝大官，处处宣传陈献章的学问，让陈献章成了明代心学的早期代表。

公元1506年：王守仁因为得罪权贵，被贬往贵州龙场驿。他在这里思考哲学问题，逐渐从理学过渡到心学。

公元1519年：王守仁镇压宁王叛乱，声名鹊起。他的心学也由此大行天下。心学是对理学的反叛，却由于过分强调内心，而忽略了外部世界，到了后期让人走向了犬儒。

实学兴起期

公元1520年：王艮拜师王守仁。他名为阳明弟子，却强调人本，认为老百姓的日用生活才是根本，而皇帝老子的政权只不过是枝节问题，与老师的学问已经迥异。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为商人服务的实用主义学派。

公元1523年：王艮大闹北京城。王艮是王守仁弟子，以宣扬师父学

问为名前往北京，他行事高调，言语狂妄，让王守仁其他弟子战战兢兢。

公元1537年：皇帝下令摧毁各地书院。第二年命令生效，但由于地方和官员的抵制，效果不大。

公元1577年：李贽任职云南姚安知府。他不在意政务，到鸡足山疗养。三年后弃官不做。

公元1579年：大学士张居正再次下令毁掉天下的私人书院。这种做法是为了统一舆论场，便于推进改革，却由此扼杀了民间学术的活力。

同年：哲学家何心隐被张居正及其同党害死。何心隐被认为是中国最后一个游侠。

公元1602年：李贽自杀。以死捍卫童心。

公元1604年：顾宪成重建东林书院。围绕东林书院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流党派，大肆介入明朝后期的政治生活和皇帝废立，成为党争的绝对主角。

公元1625年：明熹宗下诏毁全国书院。

公元1626年：东林书院被毁。许多东林党人被杀害。

公元1629年：崇祯皇帝平反东林党，重修东林书院。但明朝的气运已经在党争中耗尽。

约公元1644年：李自成进攻北京，在皇帝的朝堂上贴了一张纸条：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

公元1645年：作为明儒最后代表的刘宗周绝食而死，表达自己不做贰臣的理想。

公元1662年：黄宗羲写成《明夷待访录》，这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政治学著作。

公元1678年：顾炎武拒绝了清朝让他当官的要求。第二年再次拒

绝，终身不仕。

公元1679年：吴三桂逼王夫之写劝进表。王夫子逃走。王夫之的哲学出自理学，但强调“气”，将人们从空中拉回到对世间和自然的观察。

公元1704年：阎若璩去世。他写的《古文尚书疏证》证伪了《古文尚书》，让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奉若经典的，不仅不是圣人言，还只不过是些伪作。清代的考据学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得中国学术进入了实学时代。

公元1777年：戴震去世。戴震一生六次考进士未中，却代表了清代实学的最高峰。

参考史料及著作

与《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致，本书尽量避免使用现代意识形态化的资料，做到从史料中寻找线索。

中国哲学是一个充满了时代偏见的命题，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统治者都在有意识地将哲学变成一种工具，即便反对者也早已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污染，无法跳出官方设定的思想体系。在研究时，要想跳出这些体系，必须首先将史料中的偏见过滤，才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并找到哲学与政治的互动线索。

《周礼》

《仪礼》

《礼记》

《诗经》

《韩诗外传》

《尚书》

《周易》

《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

《春秋左氏传》

《论语》

《孟子》

《列子》

（汉）司马迁著，《史记》

（汉）班固撰，《汉书》

（汉）陆贾撰，《新语》

（汉）贾谊著，《新书》

（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

（汉）刘安著，《淮南子》

（汉）桓宽著，《盐铁论》

（汉）扬雄著，《法言》

（汉）扬雄撰，《太玄》

（汉）桓谭撰，《新论》：已佚，现传为清代辑本。

（汉）班固撰，《白虎通德论》

（汉）王充撰，《论衡》

（汉）王符撰，《潜夫论》

（汉）何休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三国魏）刘劭著，《人物志》

（三国魏）何晏撰，《论语集解》

（三国魏）王弼撰，《周易略例》

（三国魏）王弼撰，《老子注》

（三国魏）嵇康著，《嵇中散集》

（三国魏）阮籍著，《阮步兵集》

（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

（晋）陈寿著，《三国志》

（晋）郭象注，《庄子注》

（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

（南朝宋）刘义庆等编，《世说新语》

（南朝）姚廉、姚思廉撰，《梁书》

（南朝）钟嵘著，《诗品》

（北朝）魏收著，《魏书》

（梁）沈约撰，《宋书》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

（唐）房玄龄等主编，《晋书》

（唐）李延寿撰，《南史》

（唐）令狐德菜主编，《周书》

（唐）魏征主编，《隋书》

（唐）杜佑撰，《通典》

（唐）关兢著，《贞观政要》

（唐）萧嵩等撰，《大唐开元礼》

（唐）韩愈著，《韩昌黎集》

（唐）柳宗元著，《柳河东集》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

（宋）宋祁等撰，《新唐书》

（宋）薛居正等主编，《旧五代史》

（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宋）郑樵撰，《通志二十略》

（宋）范仲淹著，《范文正奏议》

（宋）周必大等编纂，《欧阳文忠公集》

（宋）石介著，《徂徕集》

（宋）邵雍著，《皇极经世书》

（宋）王安石著，《临川先生文集》

（宋）苏轼著，《苏文忠公全集》

（宋）苏辙著，《栾城集》

（宋）陈亮著，《龙川集》

（宋）朱熹著，《朱文公文集》

（宋）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

（元）脱脱等撰，《宋史》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

（元）脱脱等撰，《辽史》

（元）脱脱等撰，《金史》

（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

（明）宋濂等主编，《元史》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

（明）李贽著，《焚书》

（明）李贽著，《续焚书》

（明）袁中道著，《珂雪斋集》

（清）张廷玉等修纂，《明史》

（清）皮锡瑞著，《经学历史》

（清）马国翰辑，《石渠礼议》

（清）黄奭辑，《春秋纬演孔图》

（清）黄奭辑，《河图稽命征》

（清）黄宗羲著，《明儒学案》

（清）黄宗羲著，《宋元学案》

（清）王梓材、冯云濠编撰，《宋元学案补遗》

（明）王夫之著，《周易外传》

（明）王夫之著，《读四书大全说》

（清）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

（清）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

（清）戴震著，《戴震集》

（清）唐晏著，《两汉三国学案》

（清）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

（清）赵尔巽主编，《清史稿》

《太平经》

《抱朴子》

《上清大洞真经》

《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

《老子化胡经》

《道门大论》

《道教义枢》

《丘处机集》

《出三藏记集》

《高僧传》

《续高僧传》

《宋高僧传》

《大明高僧传》

《弘明集》

《广弘明集》

《集古今佛道论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五灯会元》

《大元至元辩伪录》

《阿含经》

《俱舍论》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中论》

《瑜伽师地论》

《解深密经》

《摄大乘论》

《妙法莲华经》

《华严经》

《楞伽经》

《金刚经》

《六祖坛经》

《成唯识论》

《因明入正理论》

《菩提道次第广论》

《密宗道次第广论》

［法］鲁不鲁乞，《鲁不鲁乞东行记》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

吴雁南等主编，《中国经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

劳思光著，《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2月。

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

后记

我一直相信，一个作者最恰当的做法，是悄然隐于读者的关注之外。既然他的思想已经在作品中表达，那么剩下的躯壳对于外人就已毫无价值，苦乐生死只不过是个人的私事，又何须关注？

但我又总是忍不住将每本书的后记当作自留地，写几句话，既是对前事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规划，更多的则是给自己打气，免于懈怠，或者走上名利的不归路。

我的前半生是在奔波劳累中度过的，曾经错入行伍，又为了生计做过程序员，费尽精力，才终于进入了兴趣所归的文字行业。即便开始作文，也并非正襟危坐于书桌前，日日苦思冥想，挖掘内心的小确幸，或者以说几句俏皮话为荣，而是选择了颠簸于社会之中，做过记者，在旷野中冒过险，或者游走于世界上的战乱之地。

由于放弃了固定的职位和保障，虽然奔波却收入有限，时常引得家人朋友牵挂。我父亲曾经问我：当别人退休后安享宁静的生活时，你却依然为了生计而打拼，一刻不得闲，难道不为自己心疼吗？

我回答：既然找到了终生的兴趣，就要一直做到死。所谓退休生活，只有那些不知道自己兴趣是什么的人才会在乎。我宁愿死前一刻仍然在写作，当我写不动了，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由于没有名气，我的前几本书为了符合出版社的审读，不敢放开写，收入也很少。为了维持生活，甚至必须靠写溜须拍马的商业书来筹钱。

到了最近两本书，我的生活才有了改观。《穿越百年中东》给我带来了不错的声誉，《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则让我不用为最近几年的生活费担忧。于是，另一个麻烦找上门来：如何避免不必要的分心？

有朋友出于好心，推荐我去机构任职，被我回绝了。有朋友希望我在网络上开课，我也拒绝了。还有人希望我参加活动，我也无法答应。

所有的人都是好意，他们认定总有一天我会写不出新的作品，而依靠卖作品获得的收入总有枯竭之时，如果不趁当红之际找到更稳定的收入来源，当我写不动时，就会再次陷入困顿之中。

但我拒绝他们的真实原因也只有一个：我想保留精力，趁创作高峰期还没有过去，尽量多写几部作品。我深深地知道，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保持高效的创作，不管多么想排除杂念，也只是推迟杂念的侵蚀，无法完全避免。如果不趁这之前多努把力，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了。

在本系列的第一部《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后记中，我叙述了最近几年的创作规划，现在正好总结一下规划的完成情况。

按照规划，我的创作分成两条线：第一条线研究现代中国在历史中的定位，包括了三本书，分别是《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和《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第二条线是研究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暂时规划了三本书，分别是《穿越百年中东》《穿越劫后中亚》以及《穿越非洲两百年》。

到今天，“帝国密码三部曲”的稿件都已经完成，其中《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已经出版，本书《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也即将出版。按照计划，《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应该先于《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出版，但由于《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中有不少地图，需要更多的时间讨论以何种形式呈现给读者，所以将《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提前出版。

这三本书从财政、军事和政治哲学三方面重新分析了中国历史，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获得对于中国历史新的印象。

在“穿越系列三部曲”中，《穿越劫后中亚》已经完成了一年半，也即将出版，《穿越非洲两百年》的草稿也已经写完，待《穿越劫后中亚》出版后，再交给出版社处理。中东、中亚和非洲是中国古代对世界认知的最外沿，也是当今世界最混乱、最让人理解不透的地区，希望通

过我的解读，读者能够了解这几片复杂地区的来龙去脉。

既然两个三部曲都已经完成，那么接下来，我关注的领域在哪里呢？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将暂时搁置穿越系列的写作。我已经研究过亚洲（南亚、东南亚、北亚和中亚）、中东和非洲，而观察和写作欧美世界的人已经很多，唯有东欧、苏联地区和拉丁美洲还没有成熟的作品出现，也许以后恢复这个系列时，我会从这些地区入手，继续我的闯荡。

接下来的两年内，我的目标是加深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

关于小说的主题，我已经有了两个，但由于还不够成熟，不便透露。也许，等写下一本书的后记时，我有足够的勇气向读者坦白。

感谢文学锋、张赋宇，你们帮助我获得了写作本书的资料。

感谢周杭君、秦旭东，这本书同样是在你们的鼓舞与帮助下完成的。

感谢林达，虽然从未见面，我一直最看重你的鼓励。

感谢王小明、羽戈、鄢烈山，你们的鼓励同样是我的动力。

本书的部分内容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思想的云”，也感谢“思想的云”主编姚文晖的帮助。

感谢本书的编辑董曦阳、李博，以及团队的其他成员，本系列的作品都是在你们的努力下诞生的。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你们是最富有激情的团队之一。

感谢我的父亲母亲，你们在初稿时就已经阅读了本书，给了我最大的激励。

感谢梦舞君的陪伴，是你支持我坚持写作道路。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写作，这来自我的祖父母郭保成和李玉萍当初对我的引导，他们将“理想”这个词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他们将我抚养大，却在我读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时双双离世。我曾经发誓要用我的书纪念他们，如今，是我还愿的时候了。

本书计划于广州锋子居。本书的初稿完成于云龙梦君庐。本书终稿完成于大理走青春客栈。本书最终订正于大理风吼居。

独家首发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梳理中央帝国两千余年战争演变的内在逻辑

把脉中央帝国统一与衰亡的内在规律

郭建龙 著

以技术化方式，读懂中央帝国两千余年军事战略的演化

随郭建龙分析地理，解读战争，感知历史，体悟兴衰

继《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之后，

郭建龙“帝国密码三部曲”收官之作

葛剑雄/林达/马勇/骆玉明/刘苏里/余世存

俞敏洪/李鸿谷/陈志武/李淼/吴晓波

盛赞推荐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郭建龙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2019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郭建龙著．—厦门：鹭江出版社，2019.9

ISBN 978-7-5459-1612-6

Ⅰ．①中…　Ⅱ．①郭…　Ⅲ．①战争史－中国－古代　Ⅳ．①E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5774号

ZHONGYANG DIGUO DE JUNSHI MIMA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郭建龙　著

出版发行：鹭江出版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政编码：361004

印　　刷：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大窝头村西

邮政编码：065200

开　　本：710mm×1000mm　　1/16

插　　页：4

印　　张：28.5

字　　数：435千字

版　　次：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9-1612-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两千年帝国，两千年战乱
统一战争与衰亡战争
战争的地理逻辑
楔子　蒙古人：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协同作战
最顽强的对手
蒙古人的第二战场
最伟大的行军
功败垂成
地理是战争的基础
第一部　关中时代　（公元前771—公元189年，秦到东汉）
第一章　得关中者得天下（公元前771—公元前221年）
四面皆险的关中平原
秦国：从化外到关中
四川：天下之砝码
武灵王：河套大迂回
统一的代价：长平枯骨与郢都赤地
第二章　西楚霸王：不懂地理之困（公元前209—公元前202年）
秦末起义：制度之失
战略地理：楚汉战争的决定要素
中央帝国在军事上的形成
第三章　汉武帝的塞上曲（公元前133—公元169年）
北方长战线
杀戮换功名
老将之死与新星联欢
战争的财政陷阱
汉匈战争的尾声
第四章　光武帝：中原反击关中（公元8—公元36年）
新莽：改革导致的军事大崩盘
光武帝：寻找战略点
借助三晋，跃进两京

关中时代的落幕
第二部　分裂时代　（公元189—公元589年，三国到南朝）
第五章　《隆中对》：开创分裂时代的大战略（公元189—公元219年）
东汉末年的老军阀与新军阀
张竑与孙策：一代霸主的江东战略
粉面书生的千年之对
赤壁之战：长江防线进入历史
四川不再是附庸
第六章　“隆中对”战略的失败：武侯伐岐山的是是非非（公元220—公元234年）
蜀吴战略冲突与东线崩溃
汉中战争与祁山通道
寻找古街亭
秦岭：无法击破的屏障
“隆中对”战略的最终失败
第七章　西晋：北方反击战（公元234—公元280年）
魏国政治斗争中的伐蜀议题
邓艾：被低估的军事天才
击穿金牛道
进军东吴：最完美的战略进攻
第八章　东晋时期的南北争霸（公元280—公元581年）
想巩固政权，却导致皇族内乱
两赵之役：从山西统一北中国
前秦：从关中到北中国
淝水之战：淮河防线成关键
尴尬的北伐
第九章　南朝：长江混沌战（公元307—公元581年）
荆州与建康的两极争霸
王敦：“皇帝—权臣”模式的开创者
陶侃：力挽狂澜
颠覆东晋的权臣父子
赣江、湘江变奏曲
南方帝国的衰落

侯景之乱与南朝末日
第三部　失衡时代　（公元384—公元907年，隋到唐）
第十章　北朝：从黄河到长江（公元384—公元589年）
定都洛阳的利弊
最后一次东西对峙
统一与失衡
第十一章　唐代建国：关中的最后辉煌（公元589—公元622年）
隋朝崩溃于大跃进
李唐：低调示人的黄雀
清理后院的战争
关中的最后辉煌
第十二章　安史之乱：缺乏制高点的叛乱（公元622—公元763年）
都是藩镇惹的祸
安禄山的智慧与失误
唐军的关门打狗战略
李泌奇谋空叹息
第十三章　藩镇的群狼谋略（公元763—公元820年）
割据，是为了自保
唐德宗：失衡的关中与高昂的军费
泾原兵变：回到原点
中央王朝的回光返照
第十四章　黄巢：最漫长的长征（公元859—公元907年）
前奏：思乡武士叛乱记
王仙芝：失控社会的流窜作战
黄巢：最漫长的流窜
缩短的分裂期
第四部　中原时代　（公元907—公元1279年，五代到宋）
第十五章　后周世宗：新王朝的奠基人（公元907—公元979年）
五代时期的军阀整合
周世宗的命题作文
赵匡胤的军事变革
柴规赵随统一全国
第十六章　十六州忧思（公元936—公元1125年）

东京汴梁的功与过
宋太宗：失败的收复战
买来的百年和平
无险可守的边境线
第十七章　西北争夺战（公元982—公元1085年）
宋夏的四条进攻线
引发改革的惨败
失败的协同战
第十八章　变换的北方防线（公元1115—公元1208年）
是是非非海上盟
靖康之变：物质文明遭遇部落战争
逃往海洋的皇帝
又到尴尬北伐时
第五部　帝国时代　（公元1179—公元1911年，元到清）
第十九章　成吉思汗眼中的世界（公元1179—公元1449年）
从流亡者到蒙古之主
蒙古的帝国时代
西藏、大理与蒙宋战争
蒙古帝国塑造的现代中国
帝国分崩离析时
土木堡：蒙古旁支的逆袭
第二十章　清帝国的新疆域（公元1618—公元1911年）
黄金家族的黄昏
准噶尔：最后的蒙古帝国
西藏并入帝国疆域
南疆的臣服
大小金川：帝国扩张的极限到了
海权时代的来临
附录　全国战略要地简述
参考书籍
后记
返回总目录

前言　两千年帝国，两千年战乱

统一战争与衰亡战争

所有战争都是典型的零和游戏，一方的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所失。由于战争的损耗，即便所得的一方，也要遭受巨大损失。在整体上，战争对整个人类造成的是破坏和伤痛。人类不得不通过战争重新分配利益，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的博弈。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战争有且只有一个好处：将国家统一起来，形成统一的市场。在这里，国家统一只是手段，市场统一才是人类的福祉。

在世界上，中国之所以一直作为大国存在，就在于它的地理天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疆域，在这个疆域内的人们倾向于成为一个整体。在统一的国家中，人力、物资、资金这三种最重要的要素都可以较为自由地流动。在国界之内，人们也不用过多担忧人身和资本的安全。

正是统一市场的出现，使得统一战争一结束，当社会恢复了和平，就会形成一次新的盛世。不管生活在古代盛世还是现代盛世，人们都是幸福的，他们安居乐业，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协作，共同创造了财富的黄金时代。

但是，历史上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统一战争，还有许多战争导致了国家的分裂。根据这两点，我们把战争分成了统一战争和衰亡战争。

也因为这种划分，中国的战争就有了第一个密码：在乱世时期，战争促进了统一，统一又结束了战争；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大国崛起的幻象会让很多和平时期的人再次渴望战争；这种战争就带有巨大的破坏性，即便是打胜了，也会造成社会不可磨灭的伤痕。

这就是为什么在朝代初期，人们总是讴歌那些将国家统一的战争，因为通过战争，他们获得了长久的和平，能够在稳定的大市场中过上好日子。

当日子刚刚开始变好时，人们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害怕和平被新的战争打断，这时对战争的看法就变得负面起来，更倾向于从个人的遭遇角度去解剖战争的残酷。

可社会发展到更富足的程度时，没有经过战乱的民众在民族情绪的刺激下会渴望武力，战争的阴影再次复活，整个社会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很可能要进入衰落期了。

朝代中后期的战争对社会的影响也主要是经济上的。为了战争，政府必然要加税，而加税又必然导致社会的凋敝。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旦经济进入了下行周期，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反而会增加，因为当社会上没有了赚钱的机会，许多人就会考公务员进入官僚队伍，所以，社会下行时，养官成本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种增加最终会拖垮社会经济，到了这一步，就可能进入下一个改朝换代的周期。

如果我们把朝代之初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那么朝代中后期发生的战争则可以称为衰亡战争，它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衰落。

但衰亡战争又是很难避免的。在封建帝国中，必然存在着强大的宣传机器，用于鼓动人们的情绪。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情绪的积累必然失控，到这时，不是皇帝领导社会去打仗，而是社会自发地推动皇帝向战争方向前进。

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对于人类的智慧不抱太高的期望，在未来，战争必定还会出现，也许现在已经在路上。

既然战争无法避免，就进入了本书探讨的最主要问题：那些历次战争的胜利者是怎么胜利的？那些失败者为什么会失败？其中有什么秘密可言？

战争的地理逻辑

与人们强调人心所向不同，乱世时期的战争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反而是地理。

中国人对于战争的认知大都来自那句古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实际上，真正能够进入战略的只有地利。所谓天时，更多是战术层面把握的稍纵即逝的机会，而人和也并非是可以客观衡量的标准。只有地理是长久不变的，如果论山脉，从人类出现后就基本上没有变化；如果说水体，在几十年里也是相对固定的。

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军事战略家，首先是一个精通地理的人。当刘邦进入咸阳时，萧何首先想到的是进入秦宫室将天下图籍搜走，就是为了了解地理关隘的所在，为后来的楚汉战争指明了战略方向。诸葛亮的《隆中对》之所以著名，在于他率先将南方的地理纳入战略考量，制订了从南方如何反制北方，甚至统一北方的战略。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从关中和中原出发，才能获得天下，诸葛亮的策略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却极大地丰富了南方战略，使得他之后的军事家都必须在他的基础上重新制订全国战略。

本书所考察的，就是以地理为基础的军事战略，并试图总结其中规律性的因素。

本系列的前两本《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和《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都能区分出明确的历史大循环，比如秦汉以来的中国财政大周期只有三次，而哲学大周期只有两次。但在军事上，战争的逻辑却并不能区分出如此明确的周期。

实际上，军事规律是随着人们地理视界的打开而变化的。秦汉时期的战略家在统一战争中很少考虑南方，因为当时的地理中心在北方，南方太微不足道了。可是，到了三国时期，南方的长江就成了战略重点之一。在秦汉时期，关中是全国最重要的地理要素，可是唐代之后，关中地区虽然还很重要，却再也不是战略地理中心了。这是因为秦汉时期的

中原和长江都还不够富裕，到了唐代，东部的财富远超西部，对于东部的地理也已经探索完毕。

不同时代的发展，决定了军事战略的演化。

中国的军事战略演化可以分为五个时代，分别是：关中时代、分裂时代（长江时代）、失衡时代（第二次关中时代）、中原时代，以及以蒙古和满洲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帝国时代。

第一个时代关中时代，包括了春秋战国到秦汉的数百年时间。这个时代最典型的地理基础是，当时的中国文明国家大都以关中和中原两个地方为中心，唯一的例外是占据了江淮地带的楚国，以及刚刚进入文明视野的四川。

当历史局限在这个区域之内时，人们会发现关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这主要是由于，除了关中之外的其他地区没有形成可以防御的封闭式结构，比如中原虽然足够富裕，却没有足够的天险抵挡四面的攻击。只有关中是一个四塞之地，在它的四面都环山，且有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四大关口保护着其中的土地，只要把守这些关口，从任何一面进攻关中都是极其困难的。

即便在秦汉时期，仅仅靠关中仍然不足以与全部中原和江淮对抗。关中的优势在于，还有两个富裕的盆地成了它的附属，那就是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一旦关中的政权同时掌握了汉中和四川，就拥有了足以与整个中原对抗的资源，同时由于关中、汉中、四川都地处上游，打击中原更加占有形胜。

秦国正是借着这个战略统一了中国。当秦朝崩溃后，汉高祖又按照几乎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中、汉中和四川反攻中原成功。

但关中模式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随着时间的延续和江淮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关中、汉中和四川三地中的任何单独一个，所拥有的资源都无法与中原抗衡，只有三者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联手才可以对付中原。东汉光武帝就利用这个弱点，乘关中、汉中、四川等地四分五裂时，以中原为基地反击关中得手。这次反击，也预示着

关中优势已经成为过去。

关中时代虽然结束了，但人们探索关中地理战略所留下的经验，还会在以后的战争中屡屡被使用。从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时代的落幕，并不意味着前人探索经验的失效，它只会以更高级的形式出现在新的战略框架之中。

第二个时代分裂时代，是长江成为中国战略主角的时代。关中时代是围绕着黄河制订终极目标的，长江地区由于发展较晚，处于附属性地位。但随着长江地区经济发展，这里逐渐拥有了与北方抗衡的资本。特别是光武帝顺着长江三峡进攻四川，将四川与湖北打通。在这之前，通往四川的主道是从关中出发的蜀道，这使得四川一直是关中的附属地，但自从四川通过长江与湖北直联之后，四川逐渐加入了南方阵营，与关中的关系反而疏远了。

在分裂时代的开篇，是两个划时代的军事战略，分别是东吴张竑提出的江东战略，与蜀汉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两个战略的共同点，是提出长江不再是北方的附属，而是足以与北方对抗的基地。张竑指出了江东地区的重要性，认为首先占领了江东，再顺长江而上，将赣江谷地（江西）、湘江谷地（湖南）收入囊中，最后进攻荆州，甚至四川，这些地区加起来已经足以和中原对抗。诸葛亮则认为，只要占据了荆州和四川，就拥有了两条北上的道路。在中国南北之间沟通的主要通道本来只有三条，占据了两条，就足以借助四川粮仓，向中原发动钳形攻势，甚至统一中国。

张竑和诸葛亮的战略虽然都没有完成统一中国，却是对长江流域最好的战略探索，为日后的中国战争增加了足够的深度。

东晋南北朝更是进一步对长江进行探索，特别是中下游区域，探索出了“建康（南京）—荆州”轴心，这两个超级城市成了南方军事和政治的中心。一个轴心、两个重点区域（南京和荆州）、三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四条江（长江、汉江、湘江、赣江）、五座城市（镇江、马鞍山、九江、岳阳、武汉），构成了南方的军事战略基础。

但在探索结束时，人们发现，南方虽然足以称霸，却很难统一全

国。这和南方较少战略纵深有关。北方由于有太行山和山西高地，构成了足够的纵深，使得南方对北方的攻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然在某一个点被迫停滞。而北方对南方的进攻，却只要攻克了长江就行，再往南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纵深空间和富庶的粮仓，构不成对北方的有效抵抗。

南方的这种缺陷，导致它可以丰富中国的军事战略，却很难颠覆北方的优势。于是，北朝借助地理优势最终统一了南方，结束了分裂时代。

隋唐时期开始的第三个时代（失衡时代），战略重心又回到了北方的关中地区，但这时的关中已不足以支撑整个庞大帝国的战略中心，使得唐代的战略一直处于失衡状态。

由于关中不够富裕，为了保卫和养活关中，唐王朝花费了大量的财富，却仍然无法解决失衡问题。加之无法解决养兵难题，唐朝皇帝发明了节度使这种制度，却将帝国送上了不归路。

但是，安史之乱中，叛军由于战略错误并没有占上风。这时山西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唐朝就是从山西太原起家统一的全国，安史之乱中，又是由于唐军守住了山西，并防住了襄阳、商丘一线，使得安禄山的军队被压缩在华北平原一个倒“L”形的平原区域。这个区域由于缺乏制高点，使得安禄山如同风箱中的老鼠，四处挨打。如果唐王朝完全采取李泌的关门打狗策略（见本书第十二章），安史之乱将更快被平定且后遗症较少。但可惜的是，唐朝没有采取这种策略，虽然平定了叛乱，却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失衡时代，另一个战略浮出水面，成了后世的叛乱者们经常使用且屡屡奏效的战略。这就是黄巢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当一个帝国处于不稳定状态时，起事者最好的方式不是建立基地，而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长征，击打帝国最虚弱的地方，直到引起它的财政和行政崩塌，灭亡帝国。黄巢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能长征的人，给后来的李自成等都提供了范本。

失衡时代表明长安再也无力主导中国的战略发展，于是，中国军事

战略史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中原时代。这个时代以北宋为代表，甚至可以延续到明清时期。

中原时代的关键是在中原地区找到一个足够富裕又拥有战略优势的中心点。不幸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虽然看上了洛阳，却由于过早去世，让开封成了北宋首都。这个失误造成了中国的指挥中心处于无法防守的大平原上，加上北方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得游牧民族可以长驱直下，直捣龙庭。

北宋的策略失误到了明代被弥补，明成祖将首都选在了最具有防守优势的北京。但到了明朝后期，北京的劣势又被放大：由于地理的关系，北京可以防御北方的攻击，却无力抵御来自南方的叛乱。

在中原时代继续的同时，另一个时代也到来了，那就是元朝和清朝所代表的帝国时代。这个时代，中原、长江等汉人居住区已经更加合为一体，皇帝要做的更多的是将边缘地带一一整合进入中央帝国。

如果没有元朝和清朝，中国的国土面积将缩小一半以上。元朝是划定中国新疆界的开始，可以说，元帝国当年征服过的地方，大部分现在都还保留在中国之内，元帝国没有征服的地方就永久性地成了外国。越南和云南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在宋朝时都不属于中国本土，但由于蒙古人征服了大理，使得云南彻底并入了中国版图。而越南由于击败了蒙古人，永久性地成了外国。

清朝虽然是靠击败李自成取代明朝而占据了中原，但它获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是靠和当时另一个霸主准噶尔人竞争而赢得的。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性节点，如果准噶尔人获胜，中国将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但清朝的胜利，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多元化的庞大遗产。

本书叙述了中国历史上军事战略的详细演化过程，探讨每一个时代的军事关键点，寻找那些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秘密。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中央王朝如何成长，直到成为现在中国的模样。

本书与传统的军事史书有两大区别：

第一，本书既不探讨三十六计，也不强调民心可用，而是从技术化的角度出发，聚焦于最不易变的地理因素，旁及其他，来叙述中国两千年的军事战略演化史。这样做，是想让读者在读历史时，不光是看热闹，而是知道每一场战争背后的逻辑所在。只有了解了客观的历史，才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第二，阅读本书，实际上是理解中国地理的一个过程，从关中出发，直到新疆、西藏，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会更加理解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幕悲喜剧，并在谈论中国现状时，也更能理解它的演化和逻辑所在。

楔子　蒙古人：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协同作战

为了进攻南宋首都临安，蒙古人选择现在甘肃境内的达拉沟作为进攻起点，以云南大理为中间点，实现了上万里的大迂回，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最有想象力的进攻之一。

宋元时期，沟通中国南北的主要通道有三条，分别是长安（汉中）四川道、南襄隘道，以及淮河平原交通网。北方进攻南方，通常选择三条道路的一条或者几条。

蒙古人在传统的三条道路上都遭到了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从机动战变成了攻坚战。他们必须重新掌握机动性，才有可能击败南宋。

蒙古人重新获取机动性的方法，是首先进攻云南，再以云南为基地，从南方包抄打击南宋的重庆与湖北地区，形成大迂回。

为了进攻云南，蒙古人在中国西部开辟了几条前无古人的进军通道，完成了这个上万里的大迂回。

获得云南后，蒙古人在数千里的战线上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协同作战，这本来是一次载入历史的大战略，却由于一个人的死亡而功败垂成。

在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中，地理是讨论战争问题的基础。本书的目的，就是抛弃那些主观的成分，讨论中国的地理在历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每次战争的具体逻辑，引导读者了解战争背后的客观事实。

甘肃与四川交界的一个小山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奇袭的起点。

这座山沟叫达拉沟，位于一条叫作白龙江的河流上游地区。如果现

代人想从内地去往这个偏僻的山沟，必须首先从西安出发，跨越巨大的陇山山脉，去往三百五十公里外的甘肃天水，再从天水向南，前往二百三十公里外的陇南市。从天水到陇南同样要翻越好几个山谷，才进入位于迭山山脉以南的一条河谷盆地，陇南市就坐落在这个小盆地上。这里看上去相当偏僻，除了市区之外，四处都是高山大壑，在中国古代，已经属于极端的边疆地区。但是，陇南仍然不是故事的起点。

陇南所在的河谷叫白龙江谷地，是由一条同名的河流冲刷而成的。从陇南开始，白龙江继续向东南方奔流几百公里，汇入著名的嘉陵江。而要想到达本书提到的现场，不是沿河向下，而是向着河流上游方向再西行二百多公里。

一路上，这二百多公里都是沿着白龙江所在的峡谷前行，谷地极端狭窄，即便最宽处也只有几百米。在峡谷的南北两岸，是两列高耸入云的山脉。这两条山脉近在咫尺，却截然不同，南侧是著名的岷山山脉，而北侧的叫迭山山脉。

在河谷靠近迭山山脉的一侧，有一座小城叫作舟曲，这里在公元2010年曾经发生了巨大的泥石流，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在舟曲附近，河谷越发狭窄，由于山脉太高，是滑坡、落石、泥石流的高发地带，行走在峡谷中，仿佛已经离开了文明。

从舟曲继续向前，到达一个叫作迭部的县城。在这里，白龙江已经缩成了一条季节性的小水沟，抬头可以望见岷山山脉巨大的雪峰。已经是河流的极上游，再往西走，地势会突然变平坦，就进入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了。从陇南到迭部虽然只有两百多公里，却路途艰难，即便开车，也往往需要一整天时间。

但迭部县还不是故事的起点，这里距离达拉沟还有数十公里。从迭部县城出发，向东走三十公里，从白龙江的北岸过到南岸，就会看到一条湍急的小河（也是白龙江的主要支流）在岷山山脉上劈开了一个山谷。顺着小河走到山谷的尽头，形成了一片山间小盆地，这个小盆地才是达拉沟的所在。

从西安到达拉沟，即便借助最便捷的交通，也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到

达。

达拉沟如此偏僻，但在七百多年前的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这个谷地里却拥挤着一支远征的大军，在如今荒芜的高寒树下和草甸中，曾经人声鼎沸、马嘶刀鸣。对这支大军来说，达拉沟还不叫现在的名字，而是被称为“忒剌”(1)。

在来到这个偏僻地方之前，远征军已经跋涉了千山万水。主要人马是从现在的蒙古境内赶来，经过内蒙古、陕西北部、宁夏，到达现在的甘肃境内，又从甘肃兰州附近的临洮穿越了迭山山脉，才到达了达拉沟，(2)集结时间就花费了整整一年。

这支大军的统领叫作忽必烈，在当时，他的身份是蒙古大汗蒙哥的弟弟。副统帅则是刚刚从俄罗斯境内回来的大将兀良合台，他也是蒙古人最骁勇善战的勇士速不台的儿子。

那么，蒙古人如此大动干戈，他们攻击的最终目标是哪里呢？答案出乎意料：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个西部的小山沟里，最终的目标竟然是位于中国东部的南宋首都临安（杭州）。

即便到了现在的高铁和柏油路时代，从杭州到达拉沟的距离也在两千两百公里以上，几乎是绕着当时的中华文明转了一整圈。如此遥远的距离，蒙古人在这里集结重兵，到底如何才能打到杭州？为什么要选择这里作为打击杭州的跳板呢？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当时蒙古人已经占领了现在山东、河南、江苏的许多土地，从这些地方出发，距离杭州最近的不过只有三四百公里，也没有太大的高山阻隔，为什么蒙古人不直接从更近的地方发起攻击，反而要找数千里之外、隔着重重高大山脉的西部小山沟作为出发点呢？

解读这次战争的过程，我们能充分领略作为世界战争大师的蒙古人的谋略。

最顽强的对手

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蒙古人与南宋联合将金国灭亡。但也从这时开始，失去了屏障的南宋直接与蒙古人对垒了，双方之间发生了连绵不绝的战争。

最先进攻的是南宋，南宋的目的是收复被金国占据的三大京城："东京"汴梁（现河南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现河南商丘）。这三大京城都在黄河以南，借助收复三京，可以巩固黄河南岸的防御系统，将北方民族赶到黄河以北。至于号称"北京"的大名（现河北大名），由于已经过了黄河，是无法收复的。

但事与愿违的是，南宋收复三京之战不仅以失败告终，还激发了蒙古人的好战性，于是战争就演变到了下一个阶段：蒙古人进攻，南宋防守。

不过战争也并非一面倒，蒙古人在进攻南宋时，发现原来南宋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堪一击。实际上，它可能是蒙古人自从离开蒙古高原后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

在宋蒙对峙时期，双方的分界线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从东面靠海的海州（现江苏连云港）出发，直到西面的岷州（现甘肃天水以南的西和县）。虽然南方与北方有着数千里的分界线，但实际上，由于山脉阻隔，沟通南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北方的军队如果想占领南方，要从这三条通道经过，才能顺利地到达南方的地界。

这三条通道的西道，是从长安（现陕西西安，已经被蒙古人控制）出发，翻越秦岭，到达南宋控制的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走古代的蜀道进入四川，这也是三国时期魏国灭蜀的主线路。如果能够控制四川，再从四川顺长江而下横扫湖北、湖南，甚至直达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西晋灭吴之战的主线路之一。

西道是三条通道中绕得最远的一条，从位于杭州的南宋中央政府视

角来看，这条路过于迂回，且必须通过两个最艰难的关口：从汉中到成都的蜀道，以及连接湖北和四川的长江三峡，蒙古人几乎不可能短期内打通这些关口。

从西道往东，就遇上了巍峨连绵的秦岭山脉。在中国古代，秦岭就是天险，几乎是不可通过的，只有绕过秦岭寻找进攻机会。在秦岭东侧还有一系列的小山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这些山脉从河南西部一直延伸到江苏、安徽、江西，将北方与南方隔开，也不容易通过。

但是，这一连串小山脉之间却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在历史上称为南（阳）襄（阳）隘道，也叫方城隘道。宋蒙对峙时期的中道就位于这条隘道上。

南襄隘道从现在河南的方城县，经过河南的南阳市到达湖北的襄阳市，从襄阳可以继续向南走陆路，到达长江边的荆州，也可以在襄阳顺汉江而下，走水路到达湖北武汉（宋朝时叫鄂州）。

从荆州和武汉，可以过江去往湖南，也可以顺江而下进攻江西和江苏。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道都是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宋蒙对峙时期，蒙古人占领了中道北端的唐州（现河南唐河县及其周边区域）和邓州（现河南邓州市），也就是将南襄隘道的南阳部分占领了，而宋朝则占据了襄阳，双方形成对峙。

从中道再往东，又是连绵的桐柏山和大别山，这些山脉向东南方延伸。在两山的东侧，终于到达了位于现在江苏、安徽的淮河平原地区。淮河就是从桐柏山发端，向东流入大海。

按常理讲，既然到达了平原地区，那么这里的道路系统就应该是四通八达，也是最容易进攻的。但不幸的是，淮河平原却是个例外。这里河湖纵横，充满了沼泽，非常不利于行军。蒙古人擅长骑马，却对河湖地区不够适应，反而不容易发挥机动性。

在淮河平原上，人们经过数千年的交通实践，发现利用这里丰富的

河网系统，也能找到几条比较容易行军的水陆交通。所谓东道，就是在淮河平原上形成的一系列的水道和陆路的综合通道。

最著名的通道是：从北宋曾经的首都开封出发，附近有数条淮河的支流，分别是东面的汴河，中间的涡水，以及西面的颍水，北方的军队可以从这几条水路出发，进入淮河。再从淮河转入陆路，或者仍旧走水路，进入长江。

在长江北岸（以及西岸），又有两个著名的战略要地，分别是扬州（位于现江苏省）与和州（现马鞍山市和县）。在扬州的江对岸，是另一个著名重镇京口（现江苏镇江），当年南宋高宗逃避金军追杀，就是从这里渡江。而在和州的对岸也有一个城市叫当涂（现马鞍山市），这里拥有长江上著名的江岸礁石采石矶，驻兵采石矶附近，就可以封锁长江水道，防止北兵前来。

既然从北方攻打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那么蒙古人在这三条道中选择哪一条为主攻方向呢？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军事行动中，往往会采取以一路主攻，其余方向佯动（牵制敌人兵力）来进攻。

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作为进攻大师的蒙古人很少采取“一路主攻，其余佯动”的做法，而是习惯于数路大军并进。由于他们的机动性太强，在每一个方向都配备实力雄厚的大将，几路大军是竞争关系，他们争先恐后，谁先获得突破谁就是主攻方向。这种做法在北亚、中亚、西亚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敌人根本无法配置兵力在广阔的战线上做出有效抵抗。当某一处被突破后，蒙古人就蜂拥而入，整条战线一溃千里。

在最初的宋蒙战争中，蒙古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三路并进，进攻南宋。但这一次，蒙古人却遭遇了巨大的困境：南宋的疆域太庞大了，地形也过于复杂，超过了蒙古之前并吞的任何国家。要想在如此庞大的战线上进行机动作战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在中亚，两路大军之间往往只隔了两三天的行程，通过快马传递消息，就可以做到各路军之间的协调与协作。但是，中国南北三条道路之间却隔着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行程，三路大军之间很难协调，更

无法取得联系，在进攻中纷纷变成了局部的孤军奋战，从机动战变成了阵地战。

在西道，如果要从西安进攻四川，首先要拿下的是汉中地区。汉中是秦岭以南、巴山以北的一块小盆地，是入蜀道路的中点，当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根据地就在这里。南宋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蒙古人顺利地攻克了汉中，获得了进入四川的跳板。

此后，蒙古人数次进入四川盆地，甚至攻陷了成都，但他们接下来碰到了另一个问题：他们试图从成都平原沿长江三峡进入湖北的宜昌、荆州地区，一旦过了三峡，也就可以乘胜攻克湖南、湖北。但南宋守将孟珙却在三峡部位扎住了口子。蒙古人经过数次尝试，不仅无法突破三峡，甚至连四川都守不住。他们每次攻克城池，劫掠完毕后，都因为后勤以及当地人反抗问题，无法久守，最终还是得撤出四川盆地。

与此同时，南宋蜀地守将余玠也找到了正确抗击蒙古人的做法。四川盆地内部和边缘分布着许多小山，他在各地的山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堡进行死守，将蒙古人擅长的机动战变成了攻坚战。蒙古人在西道的进攻虽然让四川成了废墟，却无法获得更大的进展。

在中道，蒙古人曾短暂地占领了襄阳，但随后，南宋在中道的守将孟珙建立了完善的防护体系，让蒙古人在中道也丧失了机动性，变成了持久战。

而在东道，蒙古人的马队不熟悉水战，骚扰之后，也无法形成稳固的进攻点。

传统的三条线路都无法获得突破，在全世界罕有对手的蒙古人第一次尝到了僵持的滋味。善于快速作战的他们被迫进入了汉人的战争模式，双方围绕着一城一池展开了争夺，将蒙古人耗在了中国广大的土地上。

如果要打破这种僵持，就必须重新机动起来，回归到蒙古人习惯的作战模式中。但是，他们到底如何才能重新机动，打破僵局呢？

这时，蒙古人想到了一位汉人将领曾经提出的极其大胆的主张，正

是他的奇谋让一场千里跃进式的奇袭载入了史册……

蒙古人的第二战场

当我身临其境地站在滔滔金沙江边时，心中想的却是一位叫作郭宝玉的元代将领。

郭宝玉，字玉臣，自称唐代著名将领郭子仪的后代。他曾经在金朝为官，后投降了蒙古。当时，蒙古人还没有灭金，成吉思汗向他询问如何才能夺取中原，郭宝玉提出了大胆的主张：开辟第二战场。

他认为，不管是金国还是宋国，对于中原的山川地理都很熟悉，要想奇袭，非常困难，只要对方不犯错，蒙古人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赢得胜利。

蒙古人最大的优势是机动性，因此，必须开辟新的进攻路线，出其不意，才能更快速地灭亡金国，乃至灭亡南方的大宋。

郭宝玉看上的进攻区域在西南。在宋、金的西南方，是位于现在西藏的吐蕃和位于现在云南的大理。西面是中原的上水方向，一旦蒙古人将吐蕃、大理收入囊中，再顺流直下，夺取中原，会方便得多。[3]

郭宝玉提出建议时，蒙古还没有灭亡金国，因此他主要针对的是金国。当时蒙古人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是金国灭亡之后，蒙古人在对宋作战的三条战线上都碰了钉子，才终于想起了当年郭宝玉的提议。于是，在提出四十多年后，进攻西南的战略终于上了台面，大理进入了蒙古人的视野。

蒙古人决定首先拿下大理，再以此为跳板合围南宋。

但是，云南大理怎么会成为蒙古人攻打南宋的新跳板呢？大理与杭州的距离在两千五百公里以上，甚至比从达拉沟到杭州还要遥远。更何况，在宋代，云南并不属于宋朝版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用玉斧在地图上划界，将云南划在了界外，宣布宋朝不谋求并吞云南。即便蒙古人能够打下云南，又怎么千里跃进去打击南宋呢？

这就要从蒙古的另一个战略与云南的地理位置谈起。

在人类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是最会机动作战的军队。与其他游牧民族不同，为了获得机动性，蒙古人还是最会打迂回战的民族。

所谓迂回，包括战术与战略两个方面。两者的区别是规模的大小。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正面进攻，派遣骑兵绕到敌后夹击，这是战术方面。许多军事家也都擅长战术迂回。但在战略上能够做到迂回的统帅就不多了。战略迂回要求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开辟另一条行军路线，迂回数百数千里，以求达到奇兵的效果。

比如，在攻打金国时，蒙古人为了包抄金国（主要位于现在的河南）后路，就从现在的陕西转战汉中，顺着汉江绕到湖北境内，出现在金国的后方（南方），与北面的军队配合，形成包围圈，最终消灭了金国。这次迂回的直线距离达到了数百里。

在宋蒙战争时代，当从北方进攻南宋的三条路线都演化成了持久战之后，蒙古人想到的也是在南方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与北方形成包夹，快速将宋军击败。

可是，与迂回金国相比，迂回南宋的难度要大得多。迂回金国只不过是数百里，要想迂回南宋，却必须达到数千里才有可能。

南宋的南方疆域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和四川南部。广东的南面是大海，无法进行迂回。但广西的南面却是一个叫作安南的国家，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安南是南宋的属国，实际上却保持着独立性。南宋面向安南的重镇是老苍关（昆仑关附近，现广西南宁附近），如果能够从南路攻破老苍关，就可以继续北上桂林。

在桂林附近有一条古代著名的通道，向南流的漓江和向北流的湘江都发源于此。两条江的源头近在咫尺，秦代开辟了一条人工运河叫灵渠，将两个源头连在了一起，这里就成了古代沟通岭南与中原的首选。人们从湖北进入湖南，沿着湘江向南，到达源头附近，再通过灵渠进入漓江水系，也就进入了两广地区。

蒙古人可以反其道而行，从漓江北上湘江，顺湘江而下，经过潭州（现湖南长沙）直达鄂州（现湖北武汉），在鄂州附近与北路军南北夹攻，将两湖地区（湖南和湖北）收入囊中。一旦获得了两湖地区，南宋也就失去了半壁江山，距离灭亡不远了。

安南比南宋更加弱小，容易攻取，因此，只要蒙古人先拿到了安南，就可以借助安南进攻南宋。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安南距离蒙古人控制区域达数千里之遥，更何况它们中间隔着南宋，蒙古人又从哪条路去攻克安南呢？

除了南宋可以通往安南之外，第二个可以通往安南的地区叫大理国（现云南省境内）。如今的云南省河口县，仍然是中越两国最繁荣的边境城市之一。一条叫作红河的河流经过小城静静流淌，顺着红河而下，就可以到达一片叫作红河三角洲的平原，这里就是安南的中心（现越南首都河内）。

如果蒙古人能够拿下大理国，就可以顺红河而下前往安南。

云南的战略重要性不止于做通往安南的中间站。实际上，大理国除了绕道安南之外，还有着其他数条孔道可以共同压迫汉境。

在宋代，通往云南的道路，在四川境内与现在的成昆铁路基本吻合，从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凉山，再经过攀枝花之后进入云南。但进入云南后，并没有沿现在的铁路向东拐向昆明，由于当时云南的政治中心在大理，道路直接向楚雄方向延伸，经过大姚、姚安，最终到达大理。

也就是说，如果蒙古人可以得到大理，就可以反向走这条路进入四川盆地和成都地区，对四川形成压力。

不过，蒙古人最感兴趣的还不是利用云南压迫成都，而是想突破长江三峡和两湖地区。从云南出发还有另外几条路，除了通向安南和四川成都之外，在云南东部，另一条古代经常使用的道路，是从云南的昆明

和曲靖，经过贵州的六盘水、毕节，到达四川宜宾（南宋时称叙州）和泸州的道路。到泸州后，可以顺长江继续去往重庆府。

在南宋末年，重庆以及北面的合州钓鱼城已经成了余玠防卫体系中最坚固的堡垒，蒙古人从北方进攻合州，一直无法攻克。如果能从云南出发，截断钓鱼城的后方，再南北合击，那么重庆地区就可能落入蒙古人手中。有了重庆，就可以继续顺江而下进攻三峡。

从云南还有两条路也非常重要：一是从云南曲靖，横穿贵州，到达湖南怀化，进入两湖（湖南、湖北）盆地；另一条是从云南直接进入广西，与从安南进入广西的道路相会合，再顺着漓江、湘江进入两湖。这两条路绕过了三峡，直接出现在了两湖盆地中，威胁性更大。

不管是进攻重庆，还是借道广西、贵州进攻两湖，都给了蒙古人最大的选择性，提供了充分的机动性以包抄和夹击。一旦获得了两湖和重庆，蒙古人就可以从东西两面夹击宜昌和长江三峡一带，将荆州、襄阳地区收入囊中。

总结起来，如果蒙古人能够拿下大理，进而拿下云南甚至安南，就可以获得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并至少为蒙古开辟两条新的进攻线路，第一条是经过宜宾、泸州，从重庆南部打击重庆。第二条是经过贵州、安南或者广西，进入湖南，从南方夹击湖南、湖北地区。

由于两条进攻线路都是在南方，将牵制南宋一半的兵力，使得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宋朝军事力量更加分散，也利于蒙古人的快速打击。这样做，比一味地从北方三线进攻层次要丰富得多，也更符合蒙古人的性格。

在蒙古人的战略中，云南已经提上了日程。但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出现了：云南与蒙古人控制的陕西、甘肃之间，仍然隔着一个巨大的四川地区，南宋在四川的守卫力量并不弱。那么他们到底怎样越过四川，去打击云南呢？

这难不倒被称为战争之王的蒙古人。

最伟大的行军

在蒙古人之前，云南曾受过来自汉地的数次入侵。他们大都采取了两条进攻路线。

在战国时期，楚国人庄蹻进入云南，成了一代滇王。之后秦代开发出一条五尺道，从四川的宜宾，经过云南的昭通或者贵州的毕节，再从曲靖进入云南的昆明附近。

秦代和汉初，由于云南的中心在昆明，道路的终点大都在滇池，古滇国的首都也在滇池附近。古滇国的历史直到现代，随着滇王墓葬的发掘，以及当年汉代皇帝赐给滇王金印的出土，才从重重迷雾中重新浮现。

汉武帝时，由于张骞在西域听说有一条从四川经过云南进入印度，再去往中亚的道路（现在被称作丝路南道），汉政府开始加大昆明以西的开发，大理和洱海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时，人们又找到了另一条路（称为新道）：从成都，经过西昌、姚安，直接去往大理的道路。

唐代时，五尺道已经逐渐衰落，新道反而成了最常用道路。

南宋时期，大理已经成了云南地区的中心。不管是走老道，还是新道，如果要去往大理，在进入大理盆地（也叫洱海坝子[4]）之前，都必须首先经过一个小盆地，也就是现在的弥渡坝子。

在弥渡坝子和洱海坝子之间，有一条小山岭叫定西岭。越过定西岭，就可以进入洱海盆地。

古代大理地区的统治者都知道定西岭的重要性，于是在定西岭下建立了一座城池叫作白崖城。所以，要想进入洱海坝子，必须首先翻越定西岭，如果要翻越定西岭，又要先拿下白崖城。白崖城遗址也是近年才通过考古发掘，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就算翻越了定西岭，进了洱海坝子，仍然不见得能够打下大理。

从定西岭方向进入坝子之后，首先到达的是洱海南岸的东侧。在宋代时，洱海南岸还是一片荒地，大理真正繁华的所在位于洱海西岸的平地上。

洱海坝子是一个不平均的盆地，在盆地中间是叫洱海的湖泊。洱海周长一百二十八公里，是一个形似耳朵的湖泊，南北长，东西短，东西两岸间距只有几公里。由于形状的原因，南北两岸地方很狭窄，且充满了沼泽地。在洱海的东面，也没有平坦的土地，而是直接与山地相接。只有在洱海的西侧才有大片的平地，这里才是南诏和大理的故乡。

宋元时期的大理都城位于现在的大理古城，位于洱海西侧平地上。出于战略需要，古城的位置选得特别有利于防守的一方。首先，古城的东面是洱海，西面是巨大的苍山山脉，这两面被山水阻断，无法进攻。只有南北两面有两条通道可以到达大理城。要想进攻大理，必须首先绕到洱海南面或者北面，再利用这两条通道进城。

但大理国在通道的两端各设立了一个关口。在北方的叫作龙首关，也叫上关。在南方的叫龙尾关，也叫下关。

如果从白崖城和定西岭方向进入洱海盆地，那么一般会选择南面的龙尾关。但龙尾关并不好攻打，因为从洱海流出一条河（西洱河），把洱海南岸和西岸隔开了，龙尾关就在西洱河的北侧，要想攻打龙尾关，首先必须渡过西洱河。

西洱河与苍山交界的地方，是巨大的悬崖绝壁。从地形上，龙尾关被夹在了东面的洱海、南面的西洱河，与西面的苍山之间，很难攻克。

唐代天宝年间，大将李宓就是越过定西岭，进入洱海盆地后，在攻打龙尾关时，在西洱河边大败。至今，大理的下关区域还有两座巨大的坟茔，分别称作千人冢和万人冢，就是当年唐朝将士的埋骨之所。天宝战争让人们认识到大理是一个非常难以攻打的地方。

如果蒙古人还是按照唐军的线路来进攻大理，那么必须克服好几个障碍：首先，李宓是走从成都出发的新道进入云南，前往大理的，而成都还掌握在南宋手中；其次，经过白崖城和定西岭时必须与大理军队鏖

战；第三，如何突破大理在洱海苍山之间的防御工事（龙首关或者龙尾关）？

这三个困难中的任一个都可能决定蒙古人的成败。

但如果仅仅从前人的路线去揣测蒙古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蒙古人并没有选择传统的线路，而是走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天路。

公元1253年8月，忽必烈大军来到了如今甘肃南部的临洮。之前，为了准备这次远征，忽必烈调动了一切资源。蒙古人把各个征服的地方分给不同的宗王治理，忽必烈治理的土地在如今的陕西、山西一带。由于山西解州产优质的盐，忽必烈把盐当作报酬付给商人，让他们把粮食输送到嘉陵江上游的军队。为了更充分保证军需，还在陕西凤翔一带屯田积攒粮食。最后，为了筹措经费，他还模仿宋朝和金国发行了纸币。(5)

蒙古人打仗习惯于奇袭，但绝不是偷袭。在临洮，忽必烈派遣了三位使者前往大理劝降。但由于中间路程山重水复，三位使者都没有到达。

大军从临洮出发后，顺着洮水向南，到达了洮州（现在的临潭）。这里的南部有两条平行的大山，分别是迭山和岷山，两山中间部位是那条叫作白龙江的河流，这两山一河阻断了蒙古人的去路。

但在崇山峻岭中，却有一条羊肠小道穿过了两山一河。在迭山的西部，有一条叫作车坝沟的山沟穿过迭山，顺着这条山沟就可以进入白龙江河谷。

过了江，忽必烈的大军在岷山的达拉沟中做了最后一次集结。这条山沟就因为这次集结被记入了史册。

如果顺着这条山沟继续南走，越过岷山山脉，就会到达川北地区一个著名关口黄胜关，过了黄胜关，有一条小路通往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地区。(6)对于现代人来说，松潘地区意味着风景名胜九寨沟，但对古代人，却意味着这是一条通往四川盆地的道路。

这条路大致上与今天人们去往九寨沟和松潘的公路重合。从成都去往九寨沟旅行的人们如果坐汽车前往，会从成都经过都江堰市，再北行经过汶川、茂县、松潘、川主寺，就到了九寨沟的附近。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条河叫作岷江，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建在岷江上。古代从四川通往川北、甘肃的道路就顺着岷江直上。如果蒙古人要想攻打云南，把这条路反过来走，顺着岷江向南，进入四川盆地，应该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道路。

但蒙古人却并不满足于这条路。实际上，就在达拉沟，忽必烈突然决定，将大军分为三路，向着数千里外的云南进发。

三路大军中，只有最不重要的抄合、也只烈率领的东路军选择了岷江道，在达拉沟与其他两路分开后，东路军从达拉沟翻越岷山，经过黄胜关到达川主寺，沿着这条路到达成都的西面，在都江堰附近，擦过成都和四川盆地的西边缘前往雅安，再顺着如今的成昆铁路线方向行走，顺着人们常用的新道到达云南边境，渡过金沙江后，从云南姚安县去往大理。这条路虽然是最普通最好走的路线，但由于许多地段经过了宋朝国境，并不容易通过。蒙古的东路军看上去更像是一支牵制部队，为了吸引南宋军队的火力，而不是主攻方向。

东路军之外，忽必烈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以及大将兀良合台的西路军，才真正展现了蒙古人的想象力。他们选择了两条对于当时人来说不可思议的道路。在当时人看来，岷江以西横亘着无数的高大山脉，这些山终年积雪，处处是悬崖峭壁，充满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蒙古人到底从哪里通过，才能不经过四川盆地，直插云南呢？

在现在的四川省阿坝州西部，以及甘孜州境内，有数条巨大的南北流向的河流，除了已经被开发的岷江之外，在西面还有大渡河（以及上游支流大金川）、雅砻江（及其复杂的支流系统）、金沙江。这几条河流在宋代还属于化外之地，但对于早已居住在那儿的羌族和藏族人，却并不是不可跨越的天险。特别是大渡河与雅砻江通道，只要顺着河两岸的高山一直向南，就可以与金沙江最终汇合，越过金沙江，进入云南。

忽必烈的另两路大军就利用了这两条通道，穿越在崇山峻岭之中，在山高谷深的川西大地上纵横驰骋，超越了当时人们能够想象的极限。

其中兀良合台率领的西路军在翻越岷山后向西疾行，经过晏当（今天的四川壤塘县）直插藏区，利用雅砻江河谷向南到达金沙江。虽然无法完全复原当时的线路，但整个路线极有可能经过如今的阿坝县、壤塘县、炉霍县、新龙县、理塘县，再擦过稻城北部，进入乡城，翻越大雪山进入云南的中甸（如今称为香格里拉）。从中甸南下丽江，到达大理北郊的龙首关。

忽必烈亲自率领的中路军是主力军，则可能选择了大金川—大渡河河谷向南，经过如今的若尔盖县、红原县、马尔康县，沿着大渡河直下金川、丹巴、康定、泸定一带，到达了南面大渡河边的满陀城（又称盘陀寨，在如今的汉源县附近）。从这里渡过大渡河后，沿着安宁河谷的青溪古道一路前行，经过如今的西昌、盐源，进入云南的宁蒗县境内，此时距离丽江和大理都不远了。

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是，在现在云南境内，还有一支保留了走婚传统的族群，叫作摩梭人。这个民族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元史》中称之为“摩娑蛮人”。摩梭人现在主要分布在泸沽湖地区，而在宋元时期分布却更加广泛，他们在金沙江流域也有活动。当蒙古大军经过时，摩梭人没有选择抵抗，而是迅速归顺，成了蒙军的帮手。

蒙古大军利用北方常用的羊皮筏子迅速渡过了金沙江。公元1253年十二月，这两路（中路和西路）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就绕过了南宋控制区域，进入了云南，完成了对大理的进攻集结。

此时的大理已经处于衰落之中。蒙古人到来前，渡过金沙江后，忽必烈按照蒙古传统，不搞偷袭，再次派人要求大理投降，结果使者被杀。忽必烈来到龙首关，大理国王段兴智和权臣高泰祥仓促出战，被击败了，只好退回龙首关和龙尾关之间的大理城，借助地理优势死守。

此刻，蒙古人东路军也赶到了。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可能驻扎在龙首关，而东路军可能从龙尾关前来。就算三路大军集结完毕，忽必烈仍然没有直接攻打大理，继续采取震慑策略，他派人从北面绕到了苍山之后，在如今的大理州漾濞县境内的苍山西坡，有一条小道可以直上苍山顶。在如今苍山玉局峰和龙泉峰之间，还有一个叫作洗马潭的小池塘，据说就是当年忽必烈翻越苍山洗马的所在。

蒙古人把旗帜立在了苍山顶上，可以俯瞰大理全城，这也意味着蒙古人只要冲下苍山，就突破了龙首关和龙尾关防线，直达大理城下了。

眼见大理失去了苍山天险，大理国王段兴智与权臣高泰祥只好选择了逃跑，大理城门顿开，蒙古人完成了对大理的进攻。

接下来的两年，蒙古人在大将兀良合台的指挥下，以大理为基地，向东和向南横扫了整个云南地区，完成了对云南的直接控制。

到了公元1257年，兀良合台进攻安南，于第二年逼迫安南国王向蒙古人请降。安南一直没有像云南这样进入蒙古人的直接管辖，只是属国状态。但蒙古人已经获得了经过安南的权力，也就可以借道安南进攻南宋了。到这时为止，蒙古人第一阶段的战争以全部实现目标而结束。

在获得了云南之后，如何利用云南攻打南宋呢？这就进入了战争的第二部分。

功败垂成

公元1258年，云南、安南平定后，蒙古人获得了西南方的交通要道，元宪宗蒙哥大汗开始了他上任以来对宋朝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

这次行动是中国历史上在最广阔疆域内同时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战场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国，进军路线和战场涉及现在的宁夏、甘肃、陕西、四川、重庆、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云南、广西、贵州等省份。总结起来，可以称为三大战场、五大方向。

所谓三大战场，仍然以南北交界的三条通道而言，也就是西面的四川战场、中间的两湖（湖南、湖北）战场，以及东面的江淮战场。但与之前的攻击不同的是，为了进入这三大战场，除了北方的三大方向之外，又增加了两条从南方进攻的方向，这两条新的方向是由于获得了云南才打通的。

具体来说，针对四川战场，有两个方向。北方，蒙哥大汗亲自率领大军从陕西进入汉中地区，再利用汉中通往四川的道路，从北面进攻四川。

同时，在南方，镇守云南的兀良合台也派出人马，从云南经过泸州直趋重庆，与蒙哥大汗在重庆附近会合，扫平四川。之后，两支大军再一起从长江向湖北地区扫荡。

针对两湖战场，也采取两个方向共同攻击。忽必烈和大将张柔率军从北方进攻鄂州（现在的武昌）。南方，则由兀良合台亲自率领人马，带着云南的部队进入广西，再从广西进入湖南，从南方与忽必烈形成合围。

除了这两大战场之外，淮河战场虽然离杭州最近，却仍然是牵制战场，由大将塔察尔率领，进攻方向在荆山，荆山位于现在安徽蚌埠市的怀远县境内，是淮河与数条支流的交汇处。蒙古人不习水战，所以这条线路更多是牵制性的，让南宋不得不分兵防御。

计划已定，就差执行。接下来蒙古人的进攻，让人们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军事协调能力。在如此大的区域内，一旦制订了军事协同方案，各方立刻开始了分步实施。

在四川战场，南路军迅速打通了云南东北通道，将前来防卫的三万人击溃之后，夺取了两百多艘船顺金沙江而下，直趋重庆与合州。

与此同时，北方大军也迅速行动，经过汉中地区向四川前进。从汉中进入四川一般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是走剑阁的金牛道，这条路主要是前往成都地区；而另一条更少走的被称为米仓道，汉中正南方有一座米仓山，如果翻越了这座山，就进入了四川盆地的东部，古代的人们常常翻越米仓山前往重庆。

蒙哥同时利用这两条道路，与南方军会兵于合州钓鱼城下。只要攻克了这座城，南宋在四川的抵抗就基本瓦解了。

与前几次进攻不同的是，此次蒙古人占领四川不是以扫荡为主，而是要长久占领，并与进攻湖北的军队合力向杭州进军。

蒙古人在四川接近成功时，进攻两湖的部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湖南地区，最重要的据点是潭州城，也就是现在的长沙。兀良合台的云南方面军接到的命令就是从云南跃进到湖南，占领潭州。他招募了上万云南蛮人，加上三千骑兵，从云南进入广西，在现在南宁附近的老苍关击溃了宋军六万人。之后乘胜追击，进入桂林，经过现在的怀化地区进入湖南境，直抵潭州城下。在潭州城，他击溃了南宋二十万守军，围城月余，也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云南方面军的战绩是：大小打了十三次战役，杀敌四十余万，从来没有败北。

从北面进攻鄂州的忽必烈和张柔方面军在渡过淮河后，也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扫平了江淮地区，并顺利渡过了长江，将长江南岸的鄂州（现湖北武昌）重重围困。一旦攻克鄂州和潭州，湖南、湖北的两大据点长沙和武汉就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了。

如果再与重庆的西路军会合，湖北西部的荆州、襄阳地区也就保不住了。一旦湖南、湖北失守，再加上江苏和安徽的长江北岸地区易手，

那么宋朝的江东（江南）部分就很难维持超过一年。

但就在这时，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

公元1259年8月，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蒙哥可能死于疾病，但对于汉人来说，他们更愿意认为他是死于汉军的炮火。

大汗的死亡，让几乎没有弱点的蒙古人突然显现出一个最大的弱点：一旦大汗死去，蒙古各路诸侯将会集到漠北的斡难河边举行新的选举。汗王之间的钩心斗角，让所有的人都必须撤军，赶去争夺权位。

忽必烈是蒙哥之后最有权势的汗王，也最有可能继承大汗之位。他试图继续进攻鄂州，为争夺王位留下点儿可以称道的成果，但随着汗位斗争形势的恶化，他不得不与南宋签订合约，赶快北返争夺汗位去了。

南宋在已经接近崩溃时突然间获得了新生。这次撤兵，让赵氏江山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年时光。

中国历史上最具想象力的一次军事行动竟然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以失败告终，不得不说，这就是战争的魅力之一。

不过，蒙古人远征云南并非毫无成果，我们不去总结蒙古人获得了什么，而是看它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

蒙古人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云南从此彻底并入了中国版图。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在秦汉时代，云南的部分地区曾经属于中央政府，唐代丧失了大理地区，却还保留着一部分疆土。到了宋代，云南大理虽受册封，但相对独立。是蒙古人的征服行动，让云南永久性地与中国合一了。蒙古人没有征服的越南、泰国、缅甸，则再也没有属于过中国的版图。

蒙古人的另一个贡献出现在忽必烈进军的六百八十一年后，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几乎沿着蒙古人进攻的反向，重走了这条道路，他们就是

中国工农红军。在我访问蒙古人遗迹之路上，经常会看到纪念长征的纪念碑。比如，在达拉沟附近，就是举行红军俄界会议的所在。而在丽江蒙古西路军渡江南下处，也是某支红军渡江北上之地。

蒙古人还有一个小贡献，在如今的湖南省桑植县境内，竟然还有一支白族人幸存。云南大理是白族人的故乡，在数千里之外又怎么会有另一支白族人呢？他们的祖先就是跟随兀良合台征战湖南的蛮人士兵。据说，当蒙古人决定撤军时，兀良合台就地解散了云南部队，让他们自行回家。大部分人都归去了，但还有一小部分留在了湖南，在深山里披荆斩棘，开辟了另一片天地。

蒙古人在阿富汗留下了哈扎拉人，在中亚产生了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将吉尔吉斯人从蒙古赶到现在的中亚，他们也在云南留下了蒙古族、回族的后代，而给湖南的礼物，就是那一支白族人。

地理是战争的基础

我们常说，在战争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误，就像蒙古人的奇袭，最终却毁于一个人的意外死亡，这就是人和因素。

但人们对这句话过于迷信，就容易产生反作用，过分地去强调人和，而忽略了战争中更多的客观因素。把战争理解为一种情绪的鼓动，或者精神式传销，只要有了士气，一切都迎刃而解，至于其余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不需要深究。

实际上，战争却是有规律可循的，最基础的要素就是地理。

地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他因素都是变化的，只有地理是相对固定的。天时是不固定的，虽然季节有规律，但天气每天都在变。所谓人和，也充满了偶然性，不容易把握。只有山川是近乎静止的，只要掌握了地理规律，就可以计划一场战争，至于人和、天时，都是在根据地理制订了作战计划之后，才去考虑的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都是很好的地理学家。以蒙古人为例，许多蒙古将领在从蒙古到俄罗斯，再到西亚、高加索、东欧，以及中国、东南亚的巨大范围内调兵遣将，他们的活动空间比徐霞客不知道大多少倍，出行也并不是游山玩水，必须在短时间内摸透已知世界的地理特征，才能准确地设计出大战略。

蒙古人最常用的战术是分兵迂回、出其不意快速打击，至于人们常常谈到的屠城，虽然可以起到心理震慑的作用，却并不是战场上的决定因素。

蒙古人如此，其他历次战争的胜利者也都必须对地理有清晰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自古及今战争的逻辑。

不仅是东方，西方的战略大师们也往往强调地理因素，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制订的施里芬计划虽然在战前就已经被论证

过无数次，看上去已经无秘密可言，但真的打起仗来，德国人还是能在这个战略上进行修改，加入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大战略不变的情况下，在小战略上做调整，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地理就已经决定了。

但人类对于地理的认识是逐渐升级的。比如，中国从古代到现在，华夏民族的征服从三代时期的陕西、河南开始，地图逐渐打开，到了战国，加入了华北、四川、西北，再到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也进入了古人的视野。至于长江成为战争中的一极，已经是三国时期的事了。宋元时期，西南、东北也进入了战争考量，现代的疆域才逐渐形成。

在每一个时代，地理规模的不同，导致地理特征也有区别。而这些地理特征，就决定了战争的走向。

总而言之，地理不见得是决定因素，却是讨论战争逻辑的基础。

本书试图分析的，不是人们早已经翻烂了的《孙子兵法》，而是利用具体的战争，引导人们熟悉中国的战争地理，理解在秦汉时期为什么得关中者得天下，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为什么那么高瞻远瞩，南北朝时期的长江争夺战，安史之乱的睢阳坚守，这些战争之所以如此发生，其背后的逻辑都在于地理所带来的大战略。

于是，我们将视野拉回到中央帝国形成之初，两千多年前的另一场战争，这又是一次不啻蒙古人的大迂回……

(1) 《元史·世祖本纪一》。

(2) 元世祖平云南碑：“秋九月出师，冬十二月济河，明年春历盐、夏，夏四月出萧关、驻六盘，八月绝洮，逾吐蕃，分军为三道，禁杀掠焚庐舍。”

(3) 《元史·郭宝玉传》：“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

(4) 云南习惯于将山间小盆地称为坝子。

(5) 忽必烈南征过程参考《元史·世祖本纪》。

(6)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篇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第一部　关中时代
（公元前771—公元189年，秦到东汉）

第一章　得关中者得天下（公元前771—公元前221年）

秦汉时期，由于中国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函谷关两侧的关中与中原地区，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关中平原成了争夺天下的最佳起点。

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缺乏适合防御的密闭地形，因此屡被关中军队攻克。

关中平原四周都是大山，在大山中有著名的关中四塞，只要控制了四塞，外面的力量就很难进攻关中，这种地貌使得关中具备了“得关中者得天下”的军事地理优势。

春秋与战国时期战争的最大区别，是春秋的战争不以杀人为目的，而战国的战争是以杀光敌方有生力量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击败对方。

用战败者的头颅垒金字塔，是中国古代战争的特征之一，并非蒙古人的发明。这种号称“京观”的人头塔至今仍有遗存。

秦国巩固了关中地区后，并没有首先向东方进攻，而是首先攻占了“天下之砝码”的四川，既获得了物资支持，也获得了上游的优势战略地位，从而为统一中原创造了条件。

赵武灵王除了胡服骑射之外，也是唯一一个发现了对抗秦国可能性的人，他发现了进攻秦国的北路。不幸，他的发现并没有被利用，反而成了秦国统一之后防范游牧民族的工具。

秦国统一六国，分为北线、中线和南线，历代国王在三线中首先挑选最强大的国家作为敌人，而与其他国家暂时结盟，如此循环，将各国逐渐蚕食。

从关中和四川发起的联合进攻，帮助秦击破了楚国的首都郢都，并获得了整个楚国西部。这次战役也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借助

长江发动的战争。

解决了楚国的问题，秦军利用长平之战消灭了赵军的主力，完成了统一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次突破。长平之战只是一次战术上的迂回作战，却由于赵括的轻举妄动而中了并不复杂的圈套。

秦国的统一可以概括为：扎根关中，先取四川，同时拥有关中与四川，占据上游，再从北、中、南三路依次打击中原，这是秦汉时期最大的军事密码。

公元2015年9月底，在甘肃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展览。这场展览的主角是一批从法国返回中国的文物，最著名的是几片巨大的鸟形金箔。

这些文物在两千多年前曾经属于秦国早期的某位国君，在他下葬时，金箔片曾经附着在他的棺椁上埋入地下，直到20世纪90年代被盗墓者挖掘。

文物的出土地点在甘肃省礼县的大堡子山。由于盗墓事件的曝光，人们才逐渐发现这里就是秦国早期的都城所在，在古代被称为犬丘。与后来秦国占据的关中平原不同，大堡子山位于甘肃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在西汉水之畔，西周时代曾经是少数民族西戎的地盘。

关于秦人的来历，有人认为，他们本来就是戎狄之人，所以才占据了犬丘这个地方。另一批人则认为，他们是周初从东方迁徙过来的。不管怎样，在西周末年，秦国仍然是一个不起眼的边缘国家。然而，随后发生的事件改变了秦国的命运。

公元前771年，西方蛮族犬戎联合申侯与缯国攻陷了西周的首都镐京（也叫宗周），杀死了周幽王，占领了位于陕西的关中平原。

关中平原是周的发源地，拥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当这里陷入蛮人的蹂躏时，新立的周平王只能带着他的政府班子向东撤离，过了函谷关，退向了今天河南洛阳一带，历史上称此后的周代为东周。在当时，洛阳一带建有另一个大都市成周（也叫洛邑），平王东迁后，成周成为东周的新首都。

在东迁时，一位叫作秦襄公的秦国国君离开了大堡子山的本土，率军从山上进入了关中平原，护送周平王到洛邑。周平王为了感谢，封他为诸侯，并表示如果秦襄公能够收复关中平原西部，就把这里当作秦襄公的封地。

周平王的分封只是客套话，因为整个关中平原已经从周王室手中丢失，成了戎狄的牧马场。秦国只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又如何能与善于打仗的戎狄相抗衡？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封却为未来留下了巨大的变数。更为要紧的是，当周王室东迁之后，整个关中地区陷入了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必然为另一个势力的崛起铺平道路。

那么，关中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就要从关中的地理位置说起。

四面皆险的关中平原

周文王觊觎商王朝的东方之地时，绝没有意识到造物主在西方已经给了他一份多么大的礼物。这个礼物叫作关中平原，也就是现代以西安为中心的平原地带。

这个平原宽五十公里，长三百多公里，以现代的眼光看并不算大。但在周代，关中之外的中国大部领土都处于蛮荒之中，仅有的文明区域只是现在的河南大部，以及河南与山东、河北、山西交界附近的领土。在这有限的已知世界内，关中平原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必然成为一代王国的开基之地。

在商周时期，以位于河南、陕西交界附近的函谷关、崤山为界，其西为关中，其东为中原地区。在中原，最重要地区大都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内。但并非整个河南省都很重要，现在河南省的粮仓是郑州以东的大平原，但在周代，东部却仍然是水网纵横、沼泽密布、坑坑洼洼的湿地，并不适合人们居住，只有在中部和西部靠近山区的土地上，才适合人们生存。这些土地大都位于现在的洛阳到郑州之间。

另外，还有一些适合耕种的土地分布在河南与山西交界地带的山区，以及与河北、山东交界的山脚平原。

这些土地虽然适合耕种，却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缺乏地理上的安全性。

在周代之前，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商代的首都商城（位于现在安阳的殷墟），这座城市规模巨大，被称为“大邑商”。然而，商城的地理位置却并不优越。它的西面是太行山脉，东面是黄河。在商代，黄河的河道并非今天的河道，而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流去，在天津附近入海。[1]安阳位于黄河与太行山之间，属于这个区域中最安全的位置，如果从东方攻击大邑商，必须渡过滔滔黄河，从西方则需要翻越高耸的太行山脉。然而，大邑商在南方却有一个巨大的弱点：这里有一条天然的通道存在，进攻者只要顺着这条道路过来，就可以轻易到达首都。

这条通道也处于黄河与太行山之间，位于黄河北岸。在山西、陕西和河南交界地带，奔涌的黄河从北方而来，突然拐了个九十度的大弯改向东流。在黄河的北岸是太行、王屋等山脉，但在黄河与这些山脉之间，有一条平坦的过渡地带一直在黄河北岸延伸，只需要越过几个低矮的山丘，就可以经过现在的河南济源、庆阳、焦作等地，畅通无阻到达大邑商。

周武王时代，周朝的军队就是从洛阳北上渡过黄河，在黄河北岸再沿着这条路东进，攻克了大邑商，建立了周王朝。

商朝首都尚且有这么大的弱点，其余地区更是无法安守。

崤山以东的区域没有形成封闭的防御地理，崤山、函谷关以西的关中地区却是天然的防御宝地。它形成了一个盆地地貌，在盆地的正中心，是海拔较低的关中平原，这个平原主要由渭河和泾河两条河谷组成，适合农业生长。盆地四周则是一圈易守难攻的高山，从地理上保护关中平原不受侵略。

在盆地的南方，是一道巨大的山脉——秦岭，诸多的山峰高达三千米以上，将盆地与陕西南部的汉江谷地分开。在盆地的北方，是一系列被总称为北山山系的山脉，与陕北高原隔离。在盆地的西方，宝鸡以西迅速爬升，进入了南北走向的六盘山，广义的六盘山又分成了两组山脉，北方是六盘山，南方是陇山，这两列山脉把盆地与西方的甘肃和宁夏分开。在盆地的东方，黄河以南，顺着秦岭余脉向东形成了几个小的山脉：小秦岭、崤山、外方山、熊耳山、伏牛山，黄河以北则是太行山、中条山，将中原与关中盆地隔开。

在中国古代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要动力的时代，这些山脉构成了巨大障碍，任何人想攻打关中地区，都充满了艰难险阻，无法做到奇袭或者快速奔袭。

如果要攻打关中，在这些群山中只有几条孔道可以通过，这些孔道就成了兵家必争的关塞之地。在盆地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个关塞最著名，构成了著名的“关中四塞”。

在东方，洛阳和西安之间的黄河南岸，是著名的函谷关。黄河南岸有着典型的沟壑丘陵地貌，从远古以来，这里的大地上就充满了巨大的冲沟，高达数百米，任何人想要通过，都必须在这些巨大的冲沟中翻来翻去，把体力消耗殆尽。在这些冲沟中，在现在河南陕县与灵宝之间，有一条规模巨大的冲沟，如果军队顺着这条冲沟行走，可以较为容易进入西面的关中平原，这就成了古代人联通关中与中原的通道。人们走在沟底，望着两侧的山脉，如同走在箱子底部，这就是函谷关名字的由来。

自古以来，函谷关就是从关中到中原的必经之路。从关中盆地沿渭河进入黄河谷地，再顺着函谷关进入三门峡一带，最后离开黄河河岸，向南突破小秦岭和崤山，进入前往洛阳的大道。这条道路经历过无数军队、皇帝、文人墨客的造访，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连接两京（长安和洛阳）的大道。

在南方，庞大的秦岭山脉中，有几条河谷南北向纵切秦岭，成了古人翻越秦岭的孔道。最重要的有五条：

第一，在宝鸡附近有一个关口叫作大散关，从散关向南有一条通道到达汉中地区，这条路就是著名的散关道，也叫故道；

第二，在散关道以东，有两条山谷纵切了秦岭，它们分别是北面的斜谷与南面的褒谷，古人就从北方的斜谷进入，直达秦岭的山脊附近，再顺着褒谷下行，到达汉中地区，这条路也非常著名，被称为褒斜道；

第三，褒斜道以东，又有一对山谷纵切秦岭，连接了关中与汉中，这对谷地叫作傥谷和骆谷，因此道路被称为傥骆道；

第四，继续向东，又有一条叫作子午谷的山谷沟通了关中与汉中（也可以去往现在的安康地区），被称为子午道；

第五，继续向东，来到长安的东南方，有一条山谷，经过蓝田和武关，前往湖北的襄阳地区，这条道被称为武关道。

这五条道路中，前四条都是为了到达汉中，再从汉中进入四川，第一条还可以向西南方向进入甘肃南部。第五条则是例外，它沟通了关中

与湖北，可以不经过中原，直接从湖北北上南阳盆地，再斜插越过秦岭进入关中。

在这五条道路中，商周时期最有战略意义的是第一条和第五条，其余各条由于道路险阻，在当时还不适合大军行动。在西周时代，周王向楚地的征伐大都走第五条武关道，而西部的戎狄则通过第一条散关道骚扰周王。边远的秦人要想进入关中盆地，也必须经过大散关附近的宝鸡进入平原。

大散关与武关，就和函谷关一样，成了关中四塞中的两塞。

在西北方，挡住了盆地外戎狄的则是庞大的六盘山脉，在山脉的深处，却有一条古代的道路贯穿。从宁夏境内贺兰山开始，沿着黄河到达中卫，再从中卫沿着清水河进入一块相对平坦的小平原，这就是如今的固原地区。

从固原继续向南就到达六盘山下，越过几道黄土山梁，可以进入一条泾河的支流，经过平凉与泾河汇合。从固原到平凉之间的六盘山就成了西北最著名的军事要地，这里在历史上被称为三关口，在三关口西侧有一道巨防，称为萧关。

东面的函谷关、东南的武关、西南的大散关和西北的萧关，就成了防护关中平原的四个最重要关塞，被称为关中四塞。

西周王朝之所以立足，就是因为掌握了关中四塞的险要。只要掌握好四塞附近的控制权，外人就很难攻入关中地区。

然而，关中盆地也并非无机可乘。比如，西周的灭亡就在于西北方向的失手。在西周时代，面向西北的萧关外有一片缓冲地带，现代称之为固原平原，如果西周能够同时占领萧关和固原，那么固原就能成为萧关的前哨，避免敌人的袭击。然而西周后期，固原一带变成了少数民族犬戎的势力范围，犬戎经常越过萧关进攻西周腹地，并最终从这里出发，攻陷了西周的京城，灭亡了西周。

秦国：从化外到关中

在如今的河北易县，有一片巨大的废墟记录着两千多年前的战争。

现在易县最著名的地点是清朝皇帝的西陵，以及穿越太行山的关隘紫荆关，熙来攘往的游客大都匆匆而过，前往这两个知名的景点。游客们很少知道，在县城外的南方几里处，就是当年一个巨大的都城所在。

战国时期，这里叫燕下都，如今的遗址内仍然耸立着数座巨大的夯土墩台，它们是当年宫殿的遗迹。根据当地的传说，燕昭王招贤和燕太子丹请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可如今这片遗迹上最大的谜题却是十几座巨大的土丘。当人们无意中打开其中一个时，却发现了中国仅存的京观遗存。

所谓京观，是指战争中，战胜者把战败者的头颅收集起来，集体埋葬形成的土丘。当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横扫中亚，修筑人头金字塔时，实际上他是继承了汉族人的传统。燕下都京观的发现，至少表明中国自从战国时期，就有割去人头聚集成塔的习惯。

公元2015年7月底，我到了燕下都城南五里的解村，看到了那几座土丘。虽然说这种土丘曾经有十四座，但我去的时候，大部分都已消失，有显著地表凸起的只找到了三座。

在其中的一座土丘上，有一个巨大的盗洞，地上散落着大量的头骨碎片，有的相对完整，有的已经在水浸的作用下，变得像一团海绵。在地表最多的是人类的牙齿，这些牙齿都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战士。据估算，每一座土丘下都埋葬着上千个人头，十四座土丘内的人头总数将有数万个。

至今，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战士死于哪场战争。最可能的战争是发生在燕王哙三年（公元前318年）的子之之乱。根据史书记载，[(2)]燕王哙学习尧舜禅让，将燕国的王位让给了国相子之（可能也是燕国宗室），他的太子随即发动叛乱，引起了一场燕国内部的大屠杀。随后，

齐国和中山国乘机侵略了燕国。直到太子平继位成为燕昭王后，这场动摇了燕国根基的内乱加外患才终告结束。

这些人头可能就是在子之之乱中死难的士兵。不过，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到底属于子之的人马，还是太子平的人马，抑或是赶走齐国侵略者时遭斩首的敌方士兵。

在战国时期，类似规模的屠杀不计其数，人头墩在华夏大地上也不止一处。甚至这一处并不算最大的，只是它穿越了历史，保存到现代，让我们体会到当年的血雨腥风。

人头墩的发现也向人们揭露了战国时代的一个战争秘密。在春秋时期，战争不是以杀人为主，它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战争双方并没有想要灭绝对方，而是点到为止，最终是为了签订条约，获得对方几座城池。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战争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并吞手段，最终的目的是消灭对方的国家。在战国时期，人们的国家归属感也非常强烈，一个赵国人哪怕投降了秦国，一旦被释放，他仍然回到家乡变成一个赵国人，下次打仗时，秦军又会在战场上看到同一个赵国人。

秦国唯一能够消灭赵国抵抗力的有效手段，就是将对方的年轻人都杀光。于是，战国时期的战争突然间变得血雨腥风，失去了原本文质彬彬的特征。秦国是最早体会到战争变化的国家，也更加娴熟地完成了对敌国有生力量的屠杀。

但在秦国崛起之初，他们首先要做的还不是与六国厮杀，而是怎样从化外的一个边缘小国变成统一关中的强国。

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后，整个关中盆地成了犬戎的牧马场。几乎所有的周王室诸侯都跟随平王逃往了函谷关以东，只有秦国由于地处偏远，留在了西方。

此刻的秦国也没有占领关中平原，而是在陇山西面、位于甘肃礼县的崇山峻岭中生存。不过，周王室离开后的真空，以及犬戎无力建立政

治结构，给了秦国足够的机会。

秦人占领关中平原的第一步，是从襄公时期开始的。由于西部面临的戎人压力太大，襄公决定将秦人的势力向平原移动。秦襄公十二年（公元766年），他率领人马进攻了盘踞在岐邑的戎人，并死在了战争之中。他的儿子文公随后将都城迁往了陕西眉县附近的汧渭之会，进入了关中平原的西部，控制了如今的宝鸡地区。

文公在汧渭之会一共统治了四十六年，他南征北战，将盘踞在平原中西部的戎人赶走。秦国的胜利让那些留在西部的周朝遗民看到了希望，他们成了秦国的忠诚拥趸。

公元前697年，秦武公继位，这时距离周平王东迁已经七十多年，秦国通过几代国君的努力，终于将蛮人赶出了曾经的西周土地，将整个关中平原据为己有。

然而，直到战国时期，秦国仍然没有办法将关中所有的战略要地掌握在手中。对它的威胁来自东方的魏国和南方的楚国。

在秦国东部，直接接壤的是从晋国分出的魏国和韩国。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晋国下属的三个次级封君取代了原来的晋国君室获得了诸侯的资格，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韩、赵、魏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中，赵国地处东部，不与秦国直接接壤，而韩国和魏国却控制了数个战略要地，对秦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分散的是魏国。魏国的领土包括了黄河以西（河西，现在的陕西北部）、黄河以东（河东，现在山西境内，临近陕西与河南的黄河大拐弯处，以首都安邑为中心）、黄河以北（河内，现在河北境内）、黄河以南（河外，现在河南省，以后来的首都大梁为中心）四大部分，从现在的陕西延安一带一直延续到河南的开封。

在关中地区，除了四塞之外，在关中平原的东北方向还有一个缺

口。这个缺口位于现在的韩城方向，顺着缺口可以从陕西的关中平原越过黄河到达山西的汾河谷地。不过，这个缺口有个天然的屏障：黄河。也就是说，秦国的陕西和魏国的山西之间，只隔着一条黄河，如果秦国想保持疆域的安全，就必须全部占领黄河以西的土地，把黄河作为天险进行防卫。如果东方国家（魏国）跨过了黄河，秦国就会感觉到危险。

魏国的第一个正式国君魏文侯是个雄才大略之人，一方面，他重用李悝、吴起、乐羊、翟璜、西门豹等人，聚集了大批的名将文臣；另一方面，魏文侯一眼看穿了关中平原的战略地位，他避免与其他山东五国争斗，而是将秦国的关中平原作为主攻方向。

在三家分晋之前的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魏国侵入黄河以西，在少梁（现在的陕西韩城）筑城，取得了军事据点。

随后在吴起、李悝的联合攻势下，魏军进攻了位于关中平原的郑地（如今的陕西华县），并占领了秦国洛河（注意：是位于陕西的北洛河，不是位于洛阳的南洛河）与黄河之间的大量据点，推进到了泾河一线。随后，魏国筑了一道长城，加强了对黄河以西地区的控制。此时，魏国的首都就设在黄河东岸的安邑（山西夏县境内），距离中原地区路途遥远，却距离秦境很近，可见魏文侯的军事重心所在。

魏文侯的扩张让秦国的关中地区不再完整，随时受到魏军的威胁。此后几十年，秦国被迫收缩防线，与中原地区断了联系。

但秦国的麻烦并不仅仅在东北（河西地区），还在于函谷关。最初秦国与晋国分别占有了函谷关两侧，三家分晋后，韩国继承了晋国函谷关东侧的土地。随后，魏国攻占少梁，将函谷关西侧的土地也据为己有，这个对秦国价值最大的关塞也不再被秦所控制。

在东南的武关地区，由于楚国的扩张，秦国也无法通过武关威胁楚国。

函谷关和武关的断绝，使得秦国无法染指中原事务，被中原六国长期当作夷狄。为了向东扩张，秦国首先必须打开函谷关、武关通道，并占领魏国的河西之地。

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秦国却激发出了最强的动力。在历代秦王的领导下，秦国一直致力于两方面的变革：第一，从制度上建立一种能够供养庞大军队、激发士兵斗志的财政和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必须比六国的更加持久，也更加能够组织起庞大的军事供给；第二，多杀人，消灭六国的有生力量，让他们因为人员不足，从财政和社会上出现总的崩溃。

致力于战争的财政和社会制度是由商鞅建立的。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连续两次进行变法，将秦国社会打造成了一部专门为战争服务的财政机器。

商鞅变法的内容包括：(3)

第一，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在商鞅之前，华夏各个国家流行的是分封建制，国君并不能直接统治国家的所有土地，他把一部分土地分给了一些下级封君，让他们代自己进行统治，在已经分封出去的土地上，国君并不能直接插手经营，这就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商鞅在全国建立了郡县制，各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官员由中央统一指派，减少了下级封君反抗的可能性。他还在民间建立什保制度，五家为一保，互相监督，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政府的税收也大大增加，可以组织更加庞大的军队。

第二，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虽然土地属于农民，但农民不得擅自离开土地。通过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每一个农民就都被“标准化”了，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生产粮食，并通过政府控制的流通渠道输送到秦国的战争机器之中。

第三，实行军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和军事挂钩。一个人只有在军事上有所贡献，才能得到爵位，爵级共二十个级别，一个人先受封低级爵位，下一次再受封，就可以累积到更高级，依次累积，直到最高级。爵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提升。

第四，秦国由于发展晚，土地充足，而山东六国的土地不够，人口众多，商鞅就鼓励六国向秦国移民。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就分给他们土地，并免除他们三代人的兵役，让他们专心种田。这些人就转化成

了秦国的生产机器，而打仗参军则由原来的老秦人承担。

一个生活在秦国的人，不管他是做什么职业，都被一整套的国家制度纳入了军事体系之中，这个体系能够产生出足够的军人和粮食，完成对外作战。

当秦国的军事体系建立之后，对外扩张成了必然。商鞅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目光卓越的军事家。在他的策划和努力下，秦国扭转了百年的颓势，从魏国、韩国、楚国手中收回了关系命运的几大战略要地，重新巩固了秦的疆域。

在秦孝公继位四年后的公元前358年，秦国出击伐韩，四年后伐魏，拉开了巩固关中的序幕。最能表现商鞅谋略的是夺取魏国河西之地的战争。

战争的序幕是魏国在东方的失误。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魏国在马陵之战惨败于齐国，由于孙膑的计谋，魏国主将庞涓被迫自杀。魏文侯之后，魏国几代国君失去了先辈的睿智，文侯始终知道最大的敌人是秦国，然而随后的武侯、惠王却缺乏目标的单一性，将重心逐渐转移到了中原地区，时常发起韩、赵、魏三国的内斗，又卷入了与齐国的战争，最终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两次被齐国击败。

就在魏国东线失败的同时，西线的秦国乘机发动战争。秦孝公派遣商鞅率军收复河西，魏军派出公子卬迎战。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卬是朋友，他写信给公子卬，回顾以前的交往，希望能够见面缔结盟约，维持和平。公子卬按照春秋时期的君子战争规则欣然前往，但商鞅却毫不留情地采取了战国时期的小人规则，将公子卬扣留，失去了主帅的魏军大败。

这场战争让魏国割让了河西所有的领土。由于失去了河西，距离秦国太近的首都安邑已经不再安全，魏惠王不得不将首都迁到了东部的大梁（现开封），远离了与秦国作战的前线。

魏国的迁都意味着它已经将重心转移到了东部，不再参与西部的纠纷，秦国可以舒服地在黄河以西活动，并逐渐占领了韩国和魏国在函谷

关一带的战略要地。

在南方，秦国也在与楚国交界的武关一带加强了军备，修筑了关塞。武关、函谷关的天险从此掌握在了秦国手中。关中地区巩固了。关中四塞的占领，意味着秦国已经成了独一无二的大国，拥有了其余六国无法比拟的战略地位，下一步，自然就是向东扩张。

然而，秦国稳固了关中之后，并没有再接再厉向中原扩张，而是又走了一步谁也想不到的妙棋——进军四川。

四川：天下之砝码

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在中国西部发生了一起足以影响战国军事格局的事件。

执政的秦惠文王是秦孝公的儿子，他一上台就杀掉了商鞅，对于商鞅的改革措施，却全部继承。惠文王时代，是战国时期变动最大的时代，他执政十四年后，各个国家的国君不满足于称“公”或者“侯”，也就是周王的下属，纷纷也和周王一样改称王。

随着称呼的改变，列国战争频发，苏秦在函谷关以东的六国频繁穿梭，进行合纵，联合六国共同抗击秦国。

就在这一年，秦国周边出现了两起需要用兵的事件：第一起，秦国东面的韩国派兵攻打秦国，秦王想出兵迎击，顺便入侵韩国教训它一下；第二起，秦国南面隔着崇山峻岭，有两个处于文明之外的国度，分别是位于现在重庆地区的巴国，和位于现在成都的蜀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出现了争执，纷纷派遣使者翻山越岭，来秦国求助，秦王看到了这是一个并吞巴蜀的好时机。

然而，秦国的兵力不足以同时双线出兵，到底先干哪一票，群臣们在朝堂上议论纷纷，意见不一致。

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伐韩派的客卿张仪和伐蜀派的大将司马错。两人观点迥异，却各有道理。

张仪的理由非常充足：韩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位于天下的中心，攻取了韩国，就有了号令天下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地位。相对而言，作为化外蛮荒之地的蜀国简直无足轻重。两相对比，伐韩比伐蜀有利得多。

在战国中后期，韩国和（丢失了河西的）魏国是两个有趣的国家，它们的领土面积是七国中最狭小的，也是军事实力最弱的，却处于七国的正中心，是连接各国的战略要地，被称为天下之枢。

在现代地图上，韩国的土地包括河南西部和南部的丘陵山地，加上山西南部一部分山谷地带，以及河南东部平原上的首都新郑。[(4)]而魏国的土地主要在河南东部平原，河北、河南交界地带，以及山西西南部的河谷盆地。[(5)]

这两个国家占据的地方恰好是从秦国的关中平原去往中原地带的主要道路。从秦国往中原去的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走函谷关的大道，这条路在黄河以南，从函谷关出来，所经过的土地大都属于韩、魏，如陕地属于魏国，宜阳和成皋、荥阳属于韩国；另一条道在黄河北岸，也就是黄河与中条山、太行山之间的狭长通道，道路同样被韩、魏阻断，中间的上党属于韩国，两端的蒲坂、皮氏、汲等属于魏国。

除了秦国与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的交通需要经过韩、魏之外，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从燕赵通往楚国，这条路同样要从韩国和魏国经过。正是因为沟通了南北和东西的交通，韩、魏才成了天下的枢纽之地。

张仪的计谋是：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第一次出兵只针对韩国，甚至为了袭击韩国，要主动去联络魏国和楚国，秦国从北方进攻，截断韩国北方的领土上党，魏国从中间袭击韩国黄河两岸的腹地，而楚国则从南部袭击韩国的首都。

击败韩国之后，秦国可以谋取更大的目标：韩国曾经的首都宜阳与周天子所在成周（洛阳）距离很近，秦军利用攻韩的机会，可以顺便出击洛阳，直抵周天子最后的领地，胁迫周天子，取得象征天子权势的宝鼎，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

一旦获得了韩国和周天子的领土，秦国就取得了天下之枢的一半，为接下来进攻其他国家做好了地理上的准备。

张仪认为，与韩国的地理位置相比，蜀地所在的四川只是蛮荒之地，与中原的联系非常松散。如果要从秦国去往四川，必须先穿越秦岭（走子午道）前往汉中，再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金牛道）进入四川盆地。由于地理遥远，取得了四川对秦的意义也不大。

张仪的分析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人们普遍认为，决定天下命运的是中原腹地，秦国既然处于西面，就应该时时刻刻想着去占领函谷关以东的中原领土，逐渐蚕食，最后统一，至于西南、西北，并不是主要的战场。

幸运的是，有一个人反对张仪的提议，他就是秦国的大将司马错。

司马错的观点与张仪相反，他认为暂时放弃韩国，进攻四川才是最明智的做法。这个观点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但司马错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在司马错死后两千两百年，英国的一位战略学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提出了一个概念：间接战略（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6)。所谓间接战略，就是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并不是直接向目标前进，而是适应环境，随时做好改变路线的准备，积攒必要的“势”，当万事俱备的时候，再向最终目标发动总攻。司马错的观点恰好与哈特的战略是一致的。

为什么不直接攻打韩国？司马错认为，秦国的目标虽然是统一天下，但这个目标如果过早地暴露出来，不仅无法实现，反而会让六国变得更加警惕，联合起来对付秦国。

韩国的地理位置重要，是六国皆知的事实，所以，当秦国攻打韩国的关隘、图谋周王时，韩国和周王会立即觉察到秦国的野心，转而向齐国和赵国求救。

同时，虽然秦国想联合楚、魏一同伐韩，但韩和周为了拉拢楚国和魏国，会把周王的宝鼎送到楚国，把韩国的土地割让给魏国，再一同抗击秦军。到最后，秦国的野心暴露无遗，却没有捞到任何好处，战略彻底失败。

秦国之所以达不到目的，终归还是因为它的实力没有强大到可以灭亡六国，缺乏足够的“势”。土地不够多，兵不够强，国家不够富裕，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秦国未来的征战都会遭遇困难。

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司马错给出的答案是：走间接战略——伐蜀。通过征服蜀地来扩充土地，增加财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最后再进军中原，统一全国。

蜀虽然是偏僻的国度，却是蛮人中最强大的一个，又恰逢内乱，攻取了蜀地，就等于秦国在西方的势力获得了最大化。对秦最重要的是：蜀地已经是极其富裕的国家，一旦被秦国攫取，就可以利用蜀地的财富进行备战。

实际上，如果要统一（当时认为的）全世界，一个关中地区仍然不足以积累足够的财富，可是加上一个蜀地，情况就不同了。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把韩、魏当作天下的枢纽，那么蜀地就是天下的砝码。秦国无法凭借关中与整个山东六国抗衡，可是加上蜀地这个砝码带来的资源，胜利的天平就朝秦国倾斜了。

除了资源之外，蜀地的战略地位其实也并不低。在秦国的敌手中最强大的是楚国。楚国地方五千余里，一个国家的地域就与韩、赵、魏、燕四国相当。楚国依靠着巴山秦岭的天险、汉江长江的天堑，足以抵抗秦国的进攻。但楚国也有一个弱点：它位于长江和汉江的下游地区，而上游正是汉中和蜀地。如果秦国控制了这两条江水的上游，就可以顺流而下，利用地理上的天然优势压迫楚国。

所以，要想并吞六国，首先要占领蜀国，在不知不觉间获得资源和地理上的优势，趁别国还没有注意到，已经成了最强大的国家。

司马错的提议，也是第一次将四川的战略地位提了出来。在中国军事历史的关中时代，蜀地一直是胜利天平上决定胜负的那块砝码。如果一个国家只占据了关中地区，那么因为资源不够，很可能无法统一中原，可如果同时占领了四川和关中，就具有了统一的资本。

不仅仅是秦代，在楚汉相争中，四川仍然在背后默默地支撑着刘邦的补给，它虽然不出名，没有直接参与战斗，却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

秦国的幸运在于，司马错的提议已经超出了当时人们的视野范围，

却出人意料地被采纳了。执行战争命令的，就是主张伐韩的张仪。当年十月，秦国大军从子午道越过了秦岭，乘着巴蜀的内乱，将蜀地收入囊中。

由于蜀地在六国的关注之外，当秦国走出这个重要的胜负手时，六国都毫无反应，不知道胜利的天平已经在朝秦国倾斜。

直到秦国利用蜀地的地理优势开始进攻楚国时，人们才意识到，秦国占领蜀地是多么重要的一步。

武灵王：河套大迂回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前后，已经足够强大的秦国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天，一队赵国的使节出现在秦国首都咸阳，并获得了当时秦国国君秦昭王的接见。

昭王看见使臣里有一个人相貌雄伟，举止威严。更不同寻常的是，其他使节在与这人打交道时，都不由自主带着恭敬的痕迹，即便想掩饰，但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接见完毕，使节的队伍离开了首都。秦昭王仍然纳闷，这个人不像是位居人下的臣子。出于好奇，他派人骑马追赶，试图再问个究竟，却发现此人已经骑快马先行离去了。

这是一个俄国彼得大帝式的故事，因为秦昭王见到的这个人就是当时他最大的敌手之一：赵武灵王。

武灵王冒险进入秦国首都，就是来探秦国的虚实，以及地理情报的。就在秦国迂回四川，获得资源和地理上的双重优势时，武灵王也发现了一条大迂回袭击秦国的通道。这条道路对于战国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同样是具有开拓性的。

如今，在内蒙古包头北面的山中，仍然保留有两道古代的长城，它们分别是秦国统一后修建的石长城，以及赵武灵王当年修建的赵长城。

从包头去往固阳的省道211上，从一个叫大庙村的村子分出一条岔路通往石拐区，从大庙开始，有一道低矮的土堤时隐时现，伴随着公路一直向东。这条土堤就是当年的赵长城。

赵长城与后来的长城不同，并没有修建在高高的山脊上，而是修建在两道小山脉中间的谷地里，它只是一道边墙，很少有敌楼，代表了中国早期的长城形态。如果敌人攻打长城，必须首先翻上北面的山脉，然后冲到谷地里，在谷地最深的地方遭遇到这道长城。

由于坍塌和被土埋入地下，赵长城已经成了一道不明显的土堤，但人们依然可以沿着长城走上数公里，不至于迷失。随着现代的开山筑路，有的地段把土挖开，露出了长城的剖面，可以看见雄伟的夯土墙体。在长城边上，偶尔可以看到后来各个朝代屯戍的痕迹。

赵武灵王修建的这道长城，表明赵国的北疆已经延伸到了黄河“几”字形最北端的阴山深处，那儿无法进行耕种，却有着无比重要的军事价值。到了秦国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不满足于赵长城的简陋，派遣大将蒙恬在赵长城北方几十公里的一道山脊上，劈山取石建了另一道石长城。与赵长城建在谷地不同，秦长城已经选择建在山脊上，进攻难度更大了很多，也表明秦朝的疆域比起赵国又向北推进了几十公里。

赵武灵王之所以跑到遥远的北方筑城，正是要从后门进入关中平原，对秦国进行打击。他是战国后期唯一一位制订详细计划打击秦国的君主。当其他国家纷纷迎合秦国时，武灵王却奋发图强，为进军秦国做着准备。

在武灵王时期，秦国的关中四塞已经成型，武备森严，从武关和函谷关入境打击秦军都已经不可能了。当别国束手无策时，武灵王却发现了一条遥远的道路，可以绕过武关和函谷关，进入关中平原。这条路就是：从北方塞外进入河套地区，然后翻越北山山系进攻秦国。

在关中四面的群山中，只有北面的北山山系是低矮且充满了豁口的，武灵王就是想利用地图的宽度绕过太行山，从北面进入河套和陕北高原，再打通北山山系进入关中平原。

到了秦始皇时期，他也意识到从河套到首都咸阳这条道路的重要性，故主持修建了一个伟大的工程：秦直道。秦直道笔直地从咸阳出发，穿越陕北高原，越过黄河，终点就是包头。

如果赵武灵王的战略得以实现，这条路就是赵国打击秦国心脏的出兵之路，但因为秦国的统一，武灵王的发现成了秦国防范北方匈奴人的运兵道。

当赵武灵王认识到可以从北方打击秦国时，赵国的北方还有中山等白狄国家，以及更加北方的胡人（林胡、东胡、娄烦等）。为了增强赵军的战斗力，与胡人周旋，武灵王决定改穿更加方便打仗的胡服，减少笨重的战车使用，利用马匹和弓箭增加机动性。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成了战国后期最著名的一次军事技术改革，并直接影响了未来军事发展的方向。

完成改革后，武灵王花了十年时间灭掉了中山，进入了胡人的区域，将赵国的疆域直接推至黄河河套以北，占领了现在内蒙古境内的云中、九原，作为进攻秦军的后备基地，并越过黄河，到达了陕西北方的米脂、延安一带，初步具备了打击秦国的能力。

也就是在这时，武灵王率队冒险潜入了秦国首都，完成了对秦国的最后观察。

为了做进军秦国的军事准备，他甚至将王位让给了儿子惠文王，自称赵主父，专心准备军事行动。在当时世间没有太上皇的说法，这个词是汉高祖刘邦为他父亲发明的，所谓主父，其实就是太上皇之意。

如果赵武灵王能够活得更久一些，那么他对秦国的进攻将会成为现实。但不幸的是，当他决定让位给儿子时，事实上铸就了自己的毁灭之路。

虽然让位给了惠文王，但他在两个儿子（惠文王与安阳君）之间一直态度不明，致使儿子之间出现了内斗。公元前295年，武灵王突然被惠文王围困，三个月后，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带着无数的征服梦想，被活活饿死在沙丘宫。

武灵王死后，赵国的政治从对外扩张变成了守成，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雄才大略，也没有人有他的眼光，能够看到那条北方遥远地带的道路有多重要。进攻秦国成为泡影。

不过，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却为赵国留下了一支兵强马壮的军队，到了战国后期，赵军的战斗力已经成了秦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也正因为此，赵军成了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军队。

赵武灵王另一个想不到的是，在他饿死八十五年后，沙丘宫迎来了另一个著名的帝王——秦始皇。在巡行全国的途中，到达沙丘宫时，秦始皇患病身死，让沙丘宫成了帝王们最诅咒的地方。

统一的代价：长平枯骨与郢都赤地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高平这座城市，仍然仿佛只为一场战争而存在。

当我还在去往高平的火车上，铁道旁的墙上就出现了长平之战的地图和宣传画。打开任意一张高平地图，就会被许多怪异的地名所吸引：企甲院（弃甲院）、箭头村、围城村、王降村、三军村……这样的地名有几十个。在火车上，老人们已经开始向我推荐：一定要去谷口村和骷髅王庙看一看……

实际上，高平就是一座建在古战场上的城市，在两千多年前，这片战场曾经尸骨遍野，丹河水为之变色。为了说明战争的规模，先举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被歼灭三十三万人，而在两千年前的长平之战中，赵军投降的一共四十余万，被秦将白起悉数坑杀。

在战国时代，一个国家能够组织的兵力最多只有百万之众，在所有国家中，秦国和楚国是最强大的两国，能够达到百万，其余国家的兵力都只有几十万人而已。长平一战，消灭了赵国的大部分军队，使其在秦统一之前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表1　苏秦、张仪时代七国的军事实力[7]

国别	苏秦的说法	张仪的说法
燕	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	
赵	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	
韩	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彊弓劲弩	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

	皆从韩出	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
魏	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
齐	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菑之中七万户……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楚	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	
秦		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

由于地理的关系，韩、赵、魏三国是在抗秦战争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其次是楚国。仅以秦国武安君白起发动的战争来计算，除了长平之战坑杀赵国四十多万人之外，白起还在在伊阙之战中斩首韩魏联军二十四万人；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战役中，斩首（加沉河）魏赵联军十五万人；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斩首韩国

五万人。[8]

另外，在惠文君七年（公元前331年），秦军斩首魏军八万人。惠王（惠文君，称王后改元纪年）七年（公元前318年），斩首韩、魏、赵、燕、齐和匈奴联军八万两千人；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斩首楚军八万人。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攻克宜阳，斩首韩军六万人。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斩杀楚军两万人；十年（公元前297年），再斩杀五万人；三十二年（公元前275年）攻魏斩首四万人；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攻韩斩首四万人。[9]

秦国的统一，实际上是将中原国家的人口资源消耗干净，使得他们无力反抗才获得的。在中国历代战争中，以血腥消耗人口为代价获得胜利的例子并不多，除了秦之外，就只有蒙古人的对外扩张，以及清朝对准噶尔人的镇压。在大部分时候，战争是为了让对方臣服，而不是消灭。

秦的统一之所以如此残暴，和中国第一次进入统一帝国模式有关。在进入帝国模式之前，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地域归属感，哪怕暂时被打败，也牢记自己是楚国人、赵国人，不是秦国人。一旦进入了帝国模式，人们自认为属于一个国家，就会随时做好归顺胜利者的准备，在天下一家的心理作用下，征服者不用做动员，人民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时，杀人就变成了辅助手段，最重要的反而是人心。

我们总是把秦国的统一当作一个事件，实际上，它却是很长时间段内各种事件积累的结果。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并吞六国，其根基是在孝公时期打下，并由历代秦王通过蚕食逐渐积累优势的。

秦孝公之后，继承了孝公扩张思想的是秦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和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

惠文王时期主要的政策制定者是张仪，张仪的主要任务是破坏诸侯的合纵政策。在当时，由于秦国军事优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六国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秦国，一位叫苏秦的纵横家推出了合纵政策，游说六国国君共同抗秦。苏秦死后，张仪的任务就是帮助秦国破掉六国的

合纵，他采取了新的措施：连横。

在张仪时代，韩、魏这两个国家地域狭小、实力有限，而赵国（赵武灵王）、燕国、齐国与秦国没有接壤，赵武灵王虽然试图打通北方通道进攻秦国，却还没有引起秦国的重视。

在惠文王和张仪的眼中，对秦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南方大国楚国。以领土而论，楚国比秦国还要庞大，是齐国领土的二点五倍，几乎与燕、赵、韩、魏四国领土相当。以军事而论，只有秦、楚可以组织起百万军队。双方领土相接，在武关形成对峙，这样的楚国成了秦扩张最大的障碍。张仪十年的工作重心，就在于孤立楚国、削弱楚国，击碎六国的合纵梦想。

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313年），身为合纵国首领的楚怀王在郢都（现湖北荆州偏北）的宫殿中迎接了一位不速之客：秦国的使者张仪。

张仪向楚怀王推销连横之术，认为秦、楚本是友邦，不应兵戎相见。然而真正打动楚怀王的却是张仪许诺，为表诚意，秦国向楚国献出商于地区的六百里土地。商于之地在武关之外、秦岭之南，本来属于楚国，后来被秦国夺得。由于它已经越过了秦岭山脉，深入楚国的腹地，一直让楚国如鲠在喉。这片土地的面积很大，几乎相当于韩国的三分之二。

对于土地的渴望让楚怀王昏了头，他干净利落地与齐国绝交，派人前往咸阳去接受土地。然而，回到咸阳之后的张仪却消失了，三个月内一直称病不出。怀王认为秦国的拖延，是在检验自己的态度是否坚决，于是派人去临淄的宫廷内大骂齐王。齐王大怒，决定与秦联合。

楚怀王的一厢情愿换来的却是耻辱。秦国拒绝承认割地一事。怀王终于明白上了当，决定对秦国采取军事行动，结果，八万楚军被秦国歼灭。楚国没有得到商于之地，反而丢失了军事价值极为重要的汉中地区东部。

汉中地区是沟通关中和四川的交通要地，秦国虽然已经征服了四

川，但如果汉中不稳定，关中和四川的联系就会中断。在此之前，秦国只是占领了汉中地区的西部，这次终于获得了整个汉中。

更让楚怀王感到耻辱的是，欺骗了他的张仪随后再次出现在他的宫廷，这一次，张仪是来要求楚国的黔中郡。

这时，秦国并吞巴蜀的优势就显现了出来。黔中郡位于如今湖南西部的沅陵，是楚国的南方领土，本来与秦国距离最遥远。但秦获得了四川盆地之后，重庆地区已经与黔中郡接壤了；更重要的是，秦国的四川盆地更加富饶，而楚国的黔中郡却是边缘的贫瘠之地，没有办法与四川盆地相抗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仪的威胁就显得更加现实。张仪声称，如果楚国不割地，秦军就要从四川顺水而下，经过长江直捣楚国首都。至于黔中郡，秦军也可以越过武陵山，顺沅江而下，收入囊中。

昏庸的楚怀王在威逼之下决定求和，割让了一部分黔中郡，与秦国缔结和约。黔中郡的割地，让秦军在楚国的南方有了进攻点，形成了夹击之势。楚国更加危险了。

在秦国历史上，对统一贡献最大的是在位五十六年的昭襄王。他在穰侯魏厓和将军白起的帮助下，南征北战，将楚国、魏国、韩国、赵国一一削弱。他的继承人完成统一已经只是临门一脚了。

昭襄王的战略，可以视为中国战略思想的高峰之一。他熟练地挑选对手，每一次都先认准最强的那个对手进行打击，而与其他的弱者相联合。当把强者削弱后，他再从其他对手中选出下一个最强的，如此反复，直到所有的国家都疲弱不堪。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其他的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秦式和平，或者被动迎战。

在昭襄王时代，赵国已经完成了北方攻势，占领了大片胡人的地区，从北方河套地区与秦国接壤，赵国对山西北部的占领也让秦国与赵国在黄河两岸对峙。韩、魏两国作为一个整体虽然已经沉沦，但它们的领土包括了黄河两岸的许多战略要地，也必须一一夺取，以便成为进攻

赵国、齐国、楚国的跳板。南方的楚国虽然被削弱，却仍然是六国之中最强的国家。昭襄王必须从北线（对赵）、中线（对韩、魏）、南线（对楚）这三线中来回移动，决定下一次出击何方。

他首先把目光瞄准了最强大的对手楚国。这时的楚国仍然是楚怀王当政，为了迷惑怀王，秦国先和楚国结盟，让韩、赵、魏等国再次怨恨楚国。随后，秦国寻找借口进攻楚国，由于楚国的朝三暮四，其他国家袖手旁观。当进一步削弱楚国后，秦国再次提出结盟，邀请楚怀王和秦王在双方边境上的武关相会，商讨和平条约。

楚怀王刚到武关，就被劫持到了秦国首都咸阳，客死他乡。

秦国劫持楚王，目的是逼迫他进一步割地。这次秦国想要的是巫郡和整个黔中郡，巫郡位于长江三峡附近，黔中郡位于湖南的沅陵，如果要从秦国控制的四川进入楚国所在的湖北，走长江则必经过巫郡，走沅江则必经过黔中郡，楚国丢失了这两处领土，意味着国家的西大门朝秦国洞开。

令秦王没有想到的是，囚禁中的楚怀王拒绝了秦国的要求。楚国也另立了新君，表明了与秦国对抗的决心。

昭襄王依靠阴谋夺取楚国领土的计划失败了，只能采取武力解决问题。但为了准备对楚战争，秦国不得不暂时把注意力转到中路的韩国和魏国。

如果要继续攻打楚国，必须经过武关进入南阳盆地，再南下楚国的首都郢城（现在的荆州）。但是，秦军一旦到达南阳盆地，就必须考虑侧翼的危险：在南阳盆地的北方，隔着伏牛山就是韩、魏的地界，如果韩、魏从北方袭击秦军，与南方的楚军相配合，必然导致秦军的被动。

为了解决侧翼问题，秦军首先要对韩、魏发动进攻，切断韩国和魏国南下的路径。于是，就有了秦国统一中第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伊阙之战，这也是白起登上战争舞台的一战。

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军对伊洛盆地（洛阳所在盆地）以南的新城发动攻势，试图掌握从洛阳地区前往南阳的通道锁钥。

韩、魏派出大军前往解救。此刻，指挥秦军的就是左更白起。

白起放弃了新城据点，率军抄了韩魏联军的后路，把韩魏联军向南压缩。在伊水谷地的深处，有一处叫作伊阙的山谷，这里两山并立，伊水从中流出，越往上游，峡谷越狭窄，庞大的韩魏联军在谷地中无法施展，被白起尽数歼灭。

伊阙之战，韩魏联军共被斩首二十四万人，成了战国时期长平之战外的第二次大屠杀。这场战争消灭了韩国和魏国的主力部队，[10]使得两国无法组织起对秦国的攻势。秦国乘机继续扩大战果，将魏国的河东之地据为己有。在河南、陕西、山西交界地带即黄河大拐弯处，山西境内有一块三角突出地带，如果秦军从黄河南岸进入中原，这片三角带就是很好的侧翼突袭基地，秦军占领这片三角之后，出入关中已经毫无阻碍，函谷关天险已成坦途。

除此之外，秦军还占领了韩国在山西汾河谷地的领土武遂[11]，为秦军提供了一条沿着汾河谷地进入太原的道路。经过此次战役，秦国已经与赵国领土接壤了。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在解决了侧翼问题之后，秦国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着手解决最大的对手楚国，直接向它的国都进军，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千里跃进。

楚国的首都郢在如今的荆州城东北角、长江岸边。这也是荆州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决定生死的主战场。

从地理上说，楚国选择郢作为首都，有着无比的地利优势。郢所在地是长江流域的江汉平原，在平原的北方是桐柏山，西方是巴山、巫山的天险和长江三峡，南方则是武陵山连绵的山地。东方腹地广阔庞大，提供了无尽的粮食和兵力资源。这样的地理对于楚国是有利的，对进攻方的秦国却充满了艰辛。

由于秦国在楚国的西北，如何越过北方和西方的山地，就成了秦国首要解决的问题。

在传统上，秦国进军路线是走武关，进入南阳盆地，再越过大洪山、荆山垭口到达郢城。但这条路也是楚国最严防死守的道路。

当秦国打通巴蜀之后，另外两种选择出现在了秦国的战略板上。由于巴蜀在战国时期仍然属于化外之地，楚国很难想到秦国会借助巴蜀跃进江汉。

秦国镇守巴蜀的仍然是老将司马错，根据秦王命令，司马错从陕西进入四川，再沿着岷江进入长江，到达重庆，在重庆兵分二路。一路翻越巍峨的武陵山脉，进入湖南的洞庭湖盆地，沿着沅水占领黔中（现沅陵，之前秦国已经割走了一部分）。黔中这个楚怀王到死也不愿放弃的地方终于归秦所有。占领黔中后，秦就抄了楚国南方的后路。

司马错另一路大军沿着长江而下，进入三峡，进攻西陵，对楚国的西面进行包抄。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沿长江攻击。在人类历史早期，山区的主要交通是沿着江河岸边的谷地前行，然而长江却由于峡谷众多，一直是人类通行的障碍，直到三国时期才正式确立了长江的交通地位。秦国利用长江是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探索之一。

在西路和南路进攻的同时，秦国的北路军也从传统线路逼近楚国。秦王命令白起掌管北军，由于楚国必须三路分军把守，应接不暇之际，白起已经乘机攻克了大片领土，将战略要地鄢（现湖北襄阳宜城市境）、邓（河南邓州市）均收入囊中，并与中路军一起攻克西陵。到这时，秦军完成了对楚国都城北、西、南三方面的包抄。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秦军攻陷，秦军不仅大掠都城，还将楚王的陵墓尽数烧毁。

残余的楚国势力将首都迁往陈（河南省淮阳县），随后又前往寿春（安徽寿县），进入了淮河中下游地区，江汉盆地划入秦国版图。

秦国对江汉盆地的占领，将楚国远远地驱逐到了对秦不产生威胁的淮河流域，楚国的战略地位一落千丈，不再对秦构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被除掉了。

并吞了楚国西部之后，秦国最大的敌人瞬间转换成为赵国。在其他国家经受重大损失之时，赵国却仍然保持着兵强马壮。赵武灵王改革的成果仍然持久地影响着这个国家。

赵国的地理战略地位也很强大，它位于韩、魏的北面，如果赵国保持强大，秦军在出击韩、魏时，很可能会遭到赵国在背后的袭击。同时，只要赵国存在，就很难越过赵国去攻打北方的燕国和东方的齐国。

赵国还是一个领土广阔的国家，它包含了北方的草原地带，也有险峻的太行山区，易守难攻，更有太行山东麓的首都邯郸，远离秦的边界，要想进攻，必须进行远程打击，不管是对士兵还是后勤都是巨大的麻烦。

为了对付赵国，秦国必须还从韩、魏入手，层层推进，将韩、魏在黄河两岸的战略要地一一收入囊中，推进到赵国的边界上，再实行打击。

此时，秦国已经得到了韩国的宜阳、南阳，魏国的河内、安城、陶等地。为了更加东进，秦军以新获得的楚地为依托，从南方向魏国的大梁（现河南开封）发起了进攻，并在韩国的华阳大败赵魏联军，斩首十五万人。这是除了长平、伊阙之外，杀敌第三多的战役。这次战役彻底打击了韩国和魏国的军事实力，从此以后，韩国几乎没有能力给秦国造成麻烦，而魏国在秦赵的长平之战前，也没有能力再帮助邻国。

随后，秦国直接对赵国发动攻击，在通往邯郸、位于太行山中的阏与要道被赵奢领军的赵军击败。这证明，秦军过于远离家乡，进攻半径太大，突破并不容易。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机会摆在了秦军的面前。

这个机会来自韩国的上党地区。所谓上党，是现在山西境内以长治为中心的一片山间高地，夹在山西高原的太行山与太岳山之间，它的东侧和南侧是太行山，西北侧是太岳山，自古以来是连接山西与河南的要道，也是晋中山地去往黄河的重要通道，同时还处于从关中通往赵国首

都邯郸的路途中间。如果秦军要进攻赵国首都邯郸，最便捷的途径就是经过上党，再穿过东面的太行山，直达邯郸城下。

战国时期的上党地区分成了两块，以浊漳水为界，北部属于赵国，南部属于韩国。

除了上党地区，韩国的主要领土位于黄河以南的新郑一带。上党与南方国土之间由一条狭窄的中间地带相连接，在这狭窄地带上有三个主要城市——平阳、野王、南阳，都位于黄河以北和太行山以南。如果秦军占领了这三个城市，就切断了韩国南方和北方的联系，可以逼迫韩国让出上党地区。一旦韩国的上党地区被秦国并吞，就可以作为打击赵国的前线基地。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率军攻克韩国南阳，正式将韩国上党与首都隔断，韩国国土被分割成了两部分。

秦军的本意是逼迫韩王割让上党，然而，这个计策却被上党的守将冯亭识破了，为了断绝秦军的念头，他率部投奔了赵国。秦王大怒，派兵进军赵国，双方在上党以南的长平形成了对峙，由此拉开了长平之战的序幕。

在赵国，曾经的抗秦英雄赵奢已经去世，赵军的指挥权归属了老将廉颇。在如今的高平一带，到现在人们还都能指出廉颇修筑石长城的所在。

赵国的长平防线一共三道，廉颇到任时，位于最西面的防线已经失守，最东面的防线则是一条建在山脊上的石长城。为了占据险要，廉颇率领赵军退居石长城，但为了形成纵深，他又在石长城以西，沿着一条叫作丹河的谷地构建了一条新防线，丹河防线位于失守的西防线的东面和石长城的西面，是位于中间的一条防线。如果丹河防线失守，赵军就可以全体撤退到石长城进行防守。

在廉颇的指挥下，虽然赵军的损失不小，却阻止了秦军的推进，如果假以时日，秦军粮草耗尽，就是赵军胜利之时。

但这时，赵王却不满于廉颇的防守策略，派遣赵括替代了廉颇，要

求提前发动进攻。

此时，秦军将领白起假装撤退，引诱赵括率领赵军主力离开了石长城，前往中间的丹河防线，以便继续西进打击秦军。

当赵军主力离开石长城之后，白起却派遣奇兵包抄到丹河防线以东，夺取了石长城。这时，赵军就被秦军包围在西防线和东防线（石长城）之间。所谓丹河防线其实只是沿着丹河的一条谷地，缺乏高度，成了瓮中捉鳖之势。石长城本来是赵军防御秦军用的，现在却被秦军用来截断了赵军的归路。

白起的做法，实际上是战术层面的迂回作战，即正面撤退，侧翼迂回到敌人后方，形成包抄，将敌人围困。如果是有经验的将领指挥赵军，是可以将白起的战术识破的，只要牢牢守住最后一道防线石长城，秦军就无法将赵军围困住。

白起围困了赵军之后，又派另一支奇兵冲击赵军的中部，将赵军斩断，分成两截。

四十多万赵军就此被困在了狭小的丹河谷地中，前后两段都自顾不暇，无法协同突围。四十多天后，粮草匮乏的赵军试图突围，主将赵括身死，四十万赵军被白起活埋。

到秦赵长平之战结束时，秦统一六国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对于六国而言，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丧失殆尽。韩、赵、魏的主力部队已经被消灭。齐国、燕国虽然由于偏安而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却无力与占据了半壁天下的秦军抗衡。楚国的实力大打折扣，只有防守之力，无力组织进攻。

公元前246年，经过了两个短暂的秦王之后，年幼的秦王政继承了王位。在吕不韦、李斯等大臣的辅佐下，秦国开始了最后的统一阶段。

统一中最大的障碍仍然是赵国。长平之战后，赵国又涌现出一位优秀的将军李牧，在武灵王开创的军事传统下，继续与秦军抗争。为了对

付赵国，秦军花了九年时间，才最终攻克了邯郸。

赵国灭亡后，秦国统一的步伐迅速加快。此刻，韩国已不战而降。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灭赵后的大军在王翦的率领下，直接向北进攻燕国，燕国灭亡。两年后，在进攻楚国前，王翦的儿子王贲在伐楚前顺便灭亡了魏国。楚国的抵抗更久一些，经过李信的一次失败远征后，王翦重新披挂上阵，灭亡了楚国。从第一次出兵到最终结束，花了两年半时间。当秦军进攻齐国时，这个曾经的东方大国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就投降了。

从最初的落地关中，到缓慢蚕食山东地区，到获得四川基地，进攻楚国，最后摧枯拉朽般横扫六国，秦国的成功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第一，关中地区的封闭环境，有利于秦国统一关中，又有利于秦国守卫边境，防止六国攻入家园。

第二，同时获得关中和四川后，有足够的后方生产粮食，保证了军事供应。

第三，秦国由于后起，国内的行政较为简单，便于商鞅通过变法将国家打造成一台战争机器，从民间压榨出最大的能量用于战争。

第四，关中、汉中、四川地区的上游位置，便于秦国包抄进攻楚国，击溃这个最大的敌人。

第五，中原地区的碎片化，让秦国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连横，各个击破。

在秦统一的过程中，关中地区的优势地位显现无疑，也为那一个时代提供了胜利的法门，这个法门是：一、同时占领关中和四川，就有了足以对抗中原的资源优势；二、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来说，如果不想被关中打败，就要避免关中和四川掌握在同一个敌人手中。汉高祖刘邦就是采取第一点统一了天下，而汉光武帝刘秀则是利用第二点，挫败了关中的敌人。

在关中时代，秦统一的难度也是最大的，由于处于摸索阶段，许多

战略都是由秦国的尝试而定型。比如，对楚地的打击必须从上游着手，并利用分路包抄，才可能取得成果，这一点被后来的王朝无数次利用。

另外，从四川进攻湖南、长江三峡、赵武灵王的北方通道，都是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当这些战略要地被秦摸索出来，之后历代的将军们都可以循着秦的足迹去排兵布阵。加上人心逐渐适应了一统的局面，统一全国的难度在逐渐降低。这就是为什么秦国要花几百年完成的统一，到了汉高祖时期，只需要五年就可以复制一遍。

(1) 吴忱、何乃华：《2万年来华北平原主要河流的河道变迁》，《华北平原古河道研究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2) 《史记·燕召公世家》。

(3) 参见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2017。

(4) 《汉书·地理志》："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

(5) 《汉书·地理志》："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强、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傿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

(6) （英）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战略论：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7) 根据《史记》《战国策》整理。

(8)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9) 《史记·秦本纪》。

(10) 根据张仪测算，韩、魏两国士兵不过五十万人，见本节中的表。

(11) 韩国有两个武遂，一个在现山西临汾一带，一个在现山西垣曲东南。此处指的是第一个武遂。

第二章　西楚霸王：不懂地理之困（公元前209—公元前202年）

战国与秦时期的三种长城反映了战术的变迁：包头赵长城建立在谷地之中，是长城的早期形态；固原秦长城建立在面向敌军的缓坡上，并有着严格的“两墙夹一壕”形态，便于防守，万一长城失守后，也可以利用车阵从山顶冲下，对敌人进行打击；包头秦统一之后的长城建立在陡峭的山脊上，更加易守难攻，是长城的完成形态。

秦国之所以崩溃，除了政治层面之外，在军事层面上，在于它无法在原有的六国区域内建立稳定的军事结构，又无法将六国的年轻人吸收进入中央军队，从而造成了关东地区的失控。

四十八岁的刘邦在和二十四岁的项羽对比中，展现出了更多的战略性眼光。项羽有年轻人的冲击力，却缺乏足够的阅历去理解军事地理的重要性，他选择了最不具有军事价值的西楚，却把最具军事价值的关中留给了刘邦。

刘邦占据的汉中与四川是最偏僻的，却由于项羽把关中分成了三个国家，被刘邦各个击破，迅速占领了全部关中。于是，刘邦按照秦国的战略，在同时拥有关中和四川的情况下，完成了另一次统一。

项羽的西楚是一片没有险阻的四战之地，经济富裕却没有战略价值。关东地区分散成为十五个国家，也无力对抗强大的关中刘邦，这样的失败是必然的。

韩信的北方战略和侧翼攻击，是楚汉战争中巨大的胜负手，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大迂回。

荥阳的战略地位在汉初达到了顶峰。荥阳以西是山地地貌，以东是平原。只要控制了荥阳，位于西部的中央政府就可以镇压来自东部的对抗。

在如今的宁夏固原一带，保留着一道雄伟的长城。

秦统一六国之前，这里曾经是秦国的边境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关中四塞”中，北方的萧关是通往塞外的门户。萧关在平凉以西的六盘山上，位于一条叫作弹筝峡的峡谷之中。这条峡谷沟通了关中与塞外，从弹筝峡北上，可以到达宁夏固原所在的固原台地，再顺清水河而下，即可到达黄河沿岸，顺着黄河，南可到兰州，北可往银川，如果从陆路向西，就是去往河西走廊之路。

从古至今，从黄河入固原，过萧关进入关中平原，就是北方蛮人进入华夏核心区的一条最主要通道。萧关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必然成为历代定都关中的统治者最关注的要塞之一。

然而，仅仅守卫萧关是不够的。在萧关以北，就是一个小盆地——固原。对于蛮族而言，固原是进攻萧关的前哨，哪怕暂时没有获得萧关，但只要占据了固原，就获得了一个前进基地，也是一个补给基地，从固原长期骚扰萧关，总有一天会将其攻占。

对于关中政权而言，为了保卫萧关，必须占领固原作为缓冲。有了固原才能破坏掉蛮人的进攻企图。

秦国在惠文王之前，占据固原地区的是少数民族义渠，惠文王出兵灭掉了义渠，获得了固原，随后秦国开始在固原以北修建长城，将这里变为国界。

固原的秦长城穿越了历史，直到现在仍然清晰可辨。秦朝统一之后的包头长城建立在陡峭的山脊上，而赵长城则建立在山谷里，固原秦长城与这两者都不相同，选择建立在面向敌军的缓坡上，位于半山腰位置。

长城的这种形态也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军事战术。此刻，诸侯的战阵仍然是以步兵配合车阵为主。将长城修建在缓坡上，有利于修筑更复杂的结构。固原的秦长城是中国早期长城修筑的典范，它有着双重城墙结构，进攻者首先要翻越一道矮墙，到达一条壕沟，越过壕沟，再翻越高耸的内墙，才能占领长城。另外，这段长城有着严密的敌楼结构，每隔百米，就会有一座圆形的敌楼。如今这些敌楼仍清晰可辨，即便都变成了土堆，却体积巨大，与城墙构成了独特的项链结构。

城墙修筑在半山腰，还有利于防守方的二次防御。哪怕进攻方攻入了半山腰的长城，守城者也可以从山顶借助地形优势，从高处冲下，对进攻方造成二次杀伤。

固原秦长城到秦国统一六国就完成了使命。统一之后，国境线推向了北方。黄河以北的巴彦淖尔、包头一带早已被赵国征服，也并入了秦国的版图。秦国在这里修建了第二条长城，包头的石长城就是这段时期的杰作。

为了防止北方蛮族的进攻，秦国的历代国君可谓花尽心思。统一之后，秦始皇仍然在抽调大量的人力修建长城和直道，应对游牧民族的攻击。

他没有想到的是，毁掉了秦朝社稷的力量并不来自外部，而是在内部滋生。秦始皇死去的第二年，公元前209年，在中原地区的内部叛乱就毁掉了这个统一帝国。

秦末起义：制度之失

秦朝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灭亡？最大的原因在于制度。

战国时期的秦国是一架典型的战争机器，每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这架机器添砖加瓦。农夫种地，多余的粮食要供应战备，商人养马卖给部队，人们要想受到社会尊敬，必须取得军功，获得军爵，一切都是以战争为标杆来衡量的。

统一之后，这架战争机器由于惯性却停不下来，对于人民的严苛统治仍在继续，秦朝的庞大机器开始深入六国的土地，对民间经济进行抽血。由于一下子无法找到如此众多的理解秦朝体制的官员，秦的政策不仅没有让人民驯服，反而激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只要有一丁点儿的火星，就可以形成燎原之势。

另一个原因则隐藏在军事之中，秦朝虽然已经统一了全国，但在军事上仍然是关中本位的。它把主要兵力放在了如何保卫关中上，在六国区域内没有建立起强大有效的军事组织。

征服六国后，如何防止六国的民间反抗？秦始皇采取的措施是：收缴天下的兵器，只准秦国的军队持有武器。但政府却没有办法把六国的年轻人吸纳进秦朝的精锐部队之中，秦军的组织仍然以关中兵为主。

六国地区的年轻人无法参军，经济又由于管制下滑，上升通道被堵死，在民间形成了巨大的不满。

为了对付六国民间的不满，最有效的方法本应该是在六国加强驻军，并形成联合指挥。可是，秦始皇在建立民政组织的同时，把中原地区的兵力也分散了，分散在每个郡的官员手中，缺乏统一领导和调度。而秦国的大部队仍然集中在关中地区和北方边境。这种处理方法，使得中原地区一旦有事，各个郡中的少量守军立即土崩瓦解，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领土由于没有政府军，反而成了游击队的天堂，陈胜、项羽、刘邦等人都出自这样的游击队。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政府征发戍卒前往北方的渔阳地区，楚地的九百名戍卒在大泽乡附近因为下雨，无法按时赶到。戍卒的首领之一陈胜于是掀起了造反的大旗。

陈胜的起义让秦朝军事部署上的缺陷被无限放大。军队归各个郡县自行管辖，缺乏统一的指挥，中原地区又没有精锐部队，陈胜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占领了周围的几个县城，并把各县的兵力收归己有。

当他到达陈邑（现河南省淮阳县）的时候，已经聚集了骑兵上千人，士兵总数达到了数万。陈胜随后定都于陈，建立了张楚政权。

如果仅仅是一个陈胜，那还好解决。更令秦二世没有想到的是，陈胜成了各地反抗者的榜样，当他在陈邑建立政权时，各地也纷纷响应。他们都发现，秦朝在中原的军事控制力是如此有限，根本没有办法对付蜂拥而起的反抗集团。

这些反抗集团包括两种：一是和陈胜一样的民间反抗者，借助世间纷乱的机会脱颖而出；二是刚刚灭亡了十几年的六国贵族后代，他们想重新建立贵族政权。

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纷纷仿效六国的模式建立了政权。

除了陈胜建立的张楚之外，陈胜派到北方赵地去的将军武臣，在收复了原来赵国的土地之后，自称赵王。武臣被部将李良杀害后，他的部将张耳、陈余又击败了李良，选了一个赵国宗室的后裔赵歇为赵王。赵国复辟了。

武臣曾经派部将韩广收复燕国地界，韩广随即自称燕王。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六国后裔（或者宗室）血统的王。

齐国的王室后裔田儋起兵恢复了齐国。田儋死后，他的弟弟田荣争当齐王，但齐国人却选择了齐国最后一个国君齐王建的弟弟田假为王。齐国复辟了。

陈胜死后，楚国人项梁选择了楚国楚怀王的孙子，名叫心，立为楚王，也号称楚怀王。与战国时期一样，楚国的势力也是最强大的，刘

邦、项羽都出自楚国名下。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这样实现了。

陈胜部将周市选择了魏国的宗室魏咎，立他为魏王。魏咎死后，他的弟弟魏豹继承了魏王。

韩国人张良请求项梁寻找韩国宗室公子成，立为韩王。

当六国复辟后，整个函谷关以东地区已非秦所有，秦朝的疆域退回到了关中一隅。然而，中原豪杰们普遍没有战争经验，队伍拥有极大的热情，却没有战斗力。当秦二世从关中调来军队时，中原各支武装迅速转为劣势。

首当其冲的是陈胜。陈胜曾经派遣将军周文率军乘着混乱闯过函谷关，进入了关中平原，试图颠覆秦政权，却被秦朝大将章邯领导的临时拼凑的刑徒军队（正规部队大都在边疆筑长城）击败。随后，章邯越过函谷关，进攻陈胜的首都陈邑，再次获胜，陈胜在逃跑途中被叛徒所杀。

陈胜死后，章邯在华北平原的南部，如今的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地带与魏、齐、楚的军队相周旋。在临济一战中，歼灭了魏王咎，平定了魏国，并杀死了前来救援的齐王田儋。在定陶一战中，消灭了项梁为首的楚军主力。然而，楚军主力虽失，但楚怀王心还是退回了彭城，项羽、刘邦等人跟随着他。

章邯没有等到完全剪灭楚国，就掉转矛头，北上攻击赵国。根据秦国统一的经验，每一次出击都应该先找对方最强的部队。项梁死后，反抗力量中最强的已经变成了赵国（赵歇），如果击败了赵国，就可以威胁北方的燕国（韩广）和东方的齐国（田荣、田假），所以章邯的选择并没有错误。

但此时的秦军与统一六国过程中的秦军有一个区别：在统一战争时期，秦国尽量每一次选择一个敌人，将其他的对手通过连横变成朋友，至少胁迫他们不要帮助敌人。但章邯与反抗军对峙的过程中却没有办法结交朋友，随时都必须做好与所有反抗军队同时作战的准备。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楚军已经被削弱，却仍然会北上帮助赵国抵抗秦军。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章邯率军北上，击败赵王歇。赵王歇带着他的部将张耳逃入巨鹿城，并向齐、楚、燕三国求救。三国纷纷出兵援助赵国，却又纷纷作壁上观，不肯与秦军交战。

此时，决定战争的另一个偶然因素出现了：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决定了战局。楚军统帅原本是更加懂得兵法（也更加谨慎）的宋义，宋义做出了更加程式化的选择——拖延，直到秦军疲惫。但项羽却打破了这种默契，杀死了宋义，自任统帅，破釜沉舟，与秦军大战，击败秦军，解了巨鹿之围。

到这时，章邯的秦军已经过了巅峰期，他选择了逃走。如果能够逃跑成功，秦军仍然可能占据关中，与关东地区形成割据。等待关东群雄们内部发生争斗，就是秦军重新采取连横之策，统一中原的时机。

但项羽并没有给章邯留下机会，他率军紧追不舍，在邯郸以南（现河南、河北交界地带）截住了章邯的后路，逼迫二十万秦军投降。

为了防止秦军再次叛乱，项羽在向关中进军途中，在新安（现河南省义马市）坑杀了二十万秦军。曾经庞大的如猛兽一般的秦国主力部队就这样不存在了。这也是战国以来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杀俘事件。项羽之所以杀害俘虏，是因为战国遗风犹在，士兵的地域性忠诚让他们很难被对手所利用，叛乱的可能性很大。汉朝之后，中国进入了统一时代，士兵的地域性减弱，也就不用靠杀俘来防止叛乱了。

从项羽参加的数次战役来看，他不愧为战国的继承人，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在杀俘上也继承了当年的做法。从军事角度上说，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将才。

可是，项羽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却为什么无法凭借这种冲击力继续取胜呢？为什么更加不起眼的刘邦反而能够超越项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战略地理：楚汉战争的决定要素

关于刘邦为什么会崛起，项羽为什么无法统一全国，答案可以有很多。

有一条重要的原因：项羽太年轻了，巨鹿大战时他只有二十四岁，可以打仗，却缺乏战略眼光。那一年刘邦却已经四十八岁，早已懂得战略和谋士的重要性。

在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地利与人和。所谓人和，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士气，而是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最能够激发战斗力的制度。所谓地利，指的是必须了解全国的山川地理，以便选择主攻点和战场。

项羽是一位战术家，在局部战役时可以选择战场，但他不是战略家，并不了解全国山川关隘的优势所在，所以才会在分封诸侯时，将所有战略要点都拱手让给别人，只选择了最不能守的平原之地给自己。要想认清人才、制度和地理的重要性，必须经过足够的历练才行，项羽太年轻了，没有办法积累这些经验。

在项羽依靠年轻人的冲击力发动巨鹿大战时，在远处的刘邦却已经展现出他战略天才的一面。

刘邦对于中国的地理结构要更熟悉，当他从彭城向关中地区进发时，首先选择了通往关中的最主要通道：长安（咸阳）洛阳道（函谷关大道）。为了获得这条通道的控制权，首先要夺取洛阳。为了进攻洛阳，刘邦先占领了嵩山以南的阳城。在阳城与洛阳之间，是一道著名的关隘——轘关，越过关口后，就可以袭击洛阳。

但刘邦的兵力太弱小了，虽然秦朝的主力已经北上，但他仍然无法攻克洛阳。

如果是项羽，可能会选择在洛阳与秦军决一死战，但刘邦却选择了迂回战略。既然洛阳不容易攻打，就绕过去。除了函谷关大道，在洛阳以南的南阳盆地，还有一条越过秦岭，经过武关直插关中的道路，也是

当年楚国与秦国对峙的主要通道。

刘邦从洛阳回到阳城后，折向了西南方，越过了伏牛山脉进入南阳盆地。他的战略其实是钻了一个空子：当章邯带着主力与项羽鏖战时，秦朝关中的兵力已经不足。同时，由于项羽的主力部队随时可能从函谷关进攻关中，秦王必须把函谷关作为第一保护目标，不敢从函谷关调兵去支援武关，使得武关一直处于空虚状态。

刘邦借着这个空当，在武关打败守军，进入了关中平原，又在蓝田附近取得另一次胜利。他的出现引起了关中地区的恐慌。此时秦朝早已出现了严重的内斗，权臣赵高杀死了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他本人又被子婴杀死。没有执政经验的子婴在获悉了蓝田的失败后，放弃抵抗投降了刘邦。

曾经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在刘邦不起眼的起义军面前消失了，此时，起义军主力项羽的部队还没有赶到关中。

当子婴投降后，所有的将士都无比激动地开始了狂欢，纷纷到秦朝的各个府库中瞄准金银珠宝时，只有一个人显得与这样的场景格格不入。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也预示着未来楚汉战争的走向。他就是萧何。

萧何进入秦王的宫殿后，并没有被其中的华丽所吸引，只是默默地将秦丞相府和御史处的法令、文书与天下图籍收藏了起来。

日后，这些图籍成了刘邦的重要资料，天下的关塞、户口、强弱，萧何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战略上进行针对性的军事准备。刘邦对于萧何的倚重，表明了一个拥有足够阅历的人的智慧，而萧何的谋略则是刘邦胜利的保证。

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对各路将领进行论功行赏，共封了十九个国家。

项羽的分封是周代的封建制继续，在他的理想中，世界并不需要统

一，只需要如同战国时代一样分为许多国家各自为政，再由一个如同春秋五霸那样的“霸王”进行总的约束。不过这个霸王只是负责监管国际秩序，并不干预各国的内政。从这方面讲，项羽心目中的霸王很像现在的美国扮演的角色。

十九国也只是七国时代的更加碎片化。在灭秦战争中，由于需要犒赏的人太多，项羽将原七国疆土中每一国，都再次分成大小不等的几部分，比如，齐国分成了三国（济北、齐、胶东），韩、赵、魏、燕各分为二（依次为：河南、韩；常山、代；殷、西魏；燕、辽东），秦国和楚国由于地域广大，各分为四（依次为：汉、雍、塞、翟；西楚、九江、临江、衡山），其中项羽的西楚出自楚国，刘邦的汉只是原秦朝领土中最偏僻的一个。

表2　项羽分封的十九诸侯[(1)]

国　名	诸侯名	原属于	管辖地域	都　城
汉	刘邦	秦	巴蜀、汉中	南郑
雍	章邯	秦	咸阳以西的关中地区	废丘
塞	司马欣	秦	咸阳以东的关中地区，东至黄河	栎阳
翟	董翳	秦	上郡	高奴
西魏	魏豹	魏	河东	平阳
殷王	司马卬	魏	河内	朝歌
河南	申阳	韩	黄河南岸的韩地，现河南西部	洛阳
韩	韩成	韩	剩余韩地，现河南南部	阳翟
代	赵歇	赵	代地	代
常山	张耳	赵	赵地	襄国
九江	英布	楚	九江地	六
衡山	吴芮	楚	现湖南	邾
临江	共敖	楚	南郡，现湖北	江陵
西楚	项羽	楚	楚地九郡	彭城
辽东	韩广	燕	辽东地	无终
燕	臧荼	燕	燕地	蓟
胶东	田市	齐	胶水之东	即墨
齐王	田都	齐	齐地	临淄
济北	田安	齐	济水之北	博阳

但项羽没有预料到，这种更加碎片化的政治局势是不稳定的，必然会出现许多摩擦，很难通过一个“霸王”协调国际秩序。如果西楚想把所有的国际事务管起来，会立刻陷入疲于奔命的状态。在现代社会中，作为“霸王”的美国也同样受困于此，参与国际事务太深，就影响国内的发

展，而不参与国际事务，又受到国际的批评，只能在参与与收缩之间来回摇摆。

在分封结束后，各国的政治形势也果然向着分崩离析滑去，立刻陷入了互相征伐，西楚霸王徒劳地维持着国际秩序，却没有效果。即便没有刘邦的出现，项羽的精力也必然被这种徒劳无功和诸侯的怨恨所削弱。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项羽由于缺乏战略眼光，留给自己的国土实际上是最危险的。西楚名为楚国的西部，却处于当年楚国疆土的东北部，(2)在现在江苏、安徽与河南东部一带。按照经济学来看，这里一马平川，的确是产粮食的好地方，然而从军事角度入手，却发现这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

当年的楚国之所以强大，除了有东部平原之外，还在于它拥有着地理的优势，西部、南部、北部都被高山包围，易守难攻。当秦国攫取了楚国的西部之后，楚国就衰落了。

项羽为了尽量攫取膏腴之地，无意中放弃了西部的山川地带，就失去了雄关险隘，变得易攻难守。这样的地方，必然是所有人觊觎的对象，最容易发生战争的所在。

与项羽相对应的刘邦则把地理上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表面上看，项羽把刘邦分到了最偏僻的地方，在楚汉相争的时代，汉中只是关中的附庸，而四川只是半开化土地。但汉中和巴蜀却几乎是封闭的地域，只需要少量的兵马把守住几条秦岭通道，就可以拒敌于险阻之外，没有后顾之忧。

消除了后顾之忧，就到了扩张的时候。刘邦在分封几个月后，就从汉中出发，利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出其不意，用一个月时间的闪电战，绕道剿灭了关中地区的三个王。分封时，秦朝原本的关中地区分给了三个秦朝的投降将领，项羽这样安排，就是为了让他们抵御刘邦，把刘邦封锁在最偏僻的地方。

战国和秦汉早期，汉中（包括四川）与内地的联系，大都必须经过

关中地区，主要道路就是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平原的山路。项羽认为，当三个秦将占据了关中，刘邦就没有办法进入函谷关以东地带了。

但项羽没有想到，如果刘邦消灭了三个关中王，就统一了关中、汉中和四川，形势就与当年的秦国很相似了。一旦获得了关中四塞，山东（崤山以东，即中原地区）的军队打不过去，关中的军队却可以随时骚扰山东地区。由于四川根据地的存在，刘邦在战争中不会缺乏后勤支持，变得更加强大。

刘邦强大的同时，面对的却是一个比当年六国更弱小的中原。当年山东六国由于领土太分散，形不成合力，被秦国一一歼灭；楚汉时期，山东地区变成了十五个国家，更加碎片化，根本无法协调。

更麻烦的是，年轻的项羽在性格上不仅无法联合山东诸侯，还将他们推向了对立面，变成了刘邦的友军，他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中央帝国在军事上的形成

公元前205年冬，在剿灭了关中地区的三个秦朝降将之后，刘邦趁项羽北上伐齐时，向中原进军。

齐国之乱是项羽分封的后遗症。他把齐国分成三块，分给了跟随他入关的三位齐国王室后裔，然而最初自称齐王的田荣由于没有跟他入关，却被忽视了。田荣不满这样的格局，起兵灭掉三齐，重新统一了齐国，自称齐王。

田荣不仅自己称齐王，还帮助另一位项羽的敌人陈余击败了常山王张耳，把张耳的疆土送给了代王赵歇，让他称赵王，而赵歇则把代国送给了陈余。

与此同时，继承了燕国属地的两个诸侯也乱套了，辽东王韩广被燕王臧荼所杀，燕国重新统一了。

作为新的国际秩序维护者，项羽不可能置身事外，让世界大乱，只好出兵去惩罚首恶，也就是函谷关以东最有实力的诸侯田荣。

与刘邦习惯于将民政和军事委托给得力的帮手不同，项羽在军事上更倾向于亲力亲为。他指挥的战役都有很高的胜率，但如果同时在几个方向都出现了紧急情况，需要分兵时，项羽就陷入了麻烦，无法做到几路同时行动。

与项羽相反，由于善于委任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刘邦却可以做到几路同时行动。

刘邦获得关中地区之后，与项羽的胜负手主要在当年的韩、魏地区。秦国正是因为打通了韩、魏，才能北上攻击赵国，或者南下楚国。项羽的西楚位于东部的大平原，一旦刘邦得到了韩、魏的山地，就让项羽彻底失去了山河险阻。

项羽攻打齐国之前，也对刘邦可能的进攻做了防范，他杀掉了亲刘

的韩王成（韩成虽然是韩王，却一直被项羽扣押没有赴任），改立亲楚的郑昌为韩王。他这么做，是想利用韩国的位置，封锁刘邦的进军通道，好给自己缓冲的时间。

但没有想到，零散的关东诸侯对于强大的关中军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刘邦的连横战略也运用得非常成功。

在获得关中两个月后，刘邦就招降了河南王申阳，又派韩信攻克了不肯降服的韩王郑昌，另立了韩王信，将整个河南西部收入控制之中。这时，函谷关天险就归属了刘邦。

五个月后，刘邦又招降了黄河以北的西魏王魏豹，以及殷王司马卬，获得了黄河以北的战略要地。黄河南北的平复，打通了通往西楚的道路。之后，刘邦又和常山王张耳联络，联合伐楚。

到这时，只用了半年时间，刘邦就已经打通了河南、山西的中部通道，获得了伐楚的路径。

刘邦的伐楚部队一共聚集了五十六万人，可谓规模巨大。他兵分三路，南线出武关，通过南阳；中线出函谷关；北线走黄河以北的河内通道，三路并进直捣项羽的首都彭城。

此刻的项羽仍然在北方与齐国作战，无暇顾及首都。他的将领都无法胜任保卫彭城的重任。刘邦的进攻显得无比顺利，三路大军只遇到了短暂的抵抗，就占领了彭城。

从项羽分封诸王，到刘邦出击关中，只隔了四个月时间；从刘邦出击关中，到攻克项羽的首都，又只用了八个月，可谓闪电战。

但这只是楚汉战争的开始阶段。

听闻首都失陷，在北方前线的项羽急忙回师。攻克了彭城的刘邦却因为大肆庆贺而没有做好准备。项羽战术家的优势瞬间显现，在他的快速打击下，刘邦损失了二十万人马，仓皇逃出了彭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荥阳稳住了阵脚。各路诸侯见项羽得势，纷纷背叛了刘邦，第一次联合伐楚失败了。

彭城一战，将双方的优势都展示得淋漓尽致：项羽是战术天才，刘邦是合纵与驾驭的高手，但在战场上绝不是项羽的对手。到底是战术指挥重要，还是战略重要呢？

事实证明，刘邦即便出逃，他还是占了上风。

刘邦虽然逃离了彭城，却没有失去中部（河南、山西）的所有战略要地。关中、汉中、四川完整地掌握在刘邦手中，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的山区通道也没有丢失。刘邦相对于项羽的战略优势，仍然相当于战国时期的秦始皇前期。

双方的接战线位于荥阳，这是一个在黄河边的小城，距离现在的郑州西面不远。荥阳的北面就是黄河，南面是高耸的嵩山山脉，只有一条狭窄的道路与洛阳连接。在荥阳的周围，还有一组要塞，包括广武、修武、成皋（现在的虎牢关），与荥阳共同组成了链式防御体系。这个链条上的要塞可以互相支援，共同防止东方的军队进入西部。

只要守住荥阳和周边城市，项羽就很难攻打洛阳，更无法通过函谷关进入关中地区。只要项羽无法进入关中，刘邦的后方基地就是安全的，粮草兵马可以源源不断地从西方运往东方前线。而荥阳以东就进入了平原地区，通往徐州（彭城）的道路完全打开，对于项羽的后方基地始终是一个特大的威胁。

刘邦和项羽围绕着荥阳、广武一线展开了拉锯战，虽然荥阳屡有丢失，却最终稳住了阵脚，数次夺回。

此时，也是展现刘邦军事政治谋略的时刻。既然从正面战场上只能稳住阵脚，无法击破项羽的进攻线，就到了开辟第二、第三、第四战场的时候了。

能够影响战争格局的两个人物是彭越和英布。英布是项羽的爪牙，在封王中被封为九江王，国土在西楚的南方。彭越是早期的反秦名将，却在封王中被项羽忽略，活动于山东、江苏、河南一带。

刘邦通过谈判和诱惑，将彭越和英布都拉入了汉集团，从此以后，英布在南方成了抗击楚国的第二战线，而彭越继续从山东骚扰项羽，形

成第三战线。特别是彭越，他的骚扰破坏了项羽的粮食基地，使得在楚汉战争中楚国一直缺乏粮草。

但第一、第二、第三战线仍然不足以击穿项羽的战线，刘邦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砝码：大将韩信。在与项羽在荥阳对峙的同时，韩信开辟的第四战线，打破了双方的实力平衡。

在韩信出兵之前，除了刘邦控制的西部和项羽控制的东南部之外，还有一大片地区，大约占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它们不服从于楚国，但也不服从于汉王。这片土地就是赵国、燕国、齐国所在的中国东北部，占据了现在的山西中北部、河北、山东全境、河南东北部、北京、辽宁等地。如果这些地域能够归属刘邦，就会把项羽压缩成一个东南部的小势力，并开辟从北方压迫项羽的新战线。当初秦国也是在首先灭掉了韩、魏、赵、燕之后，才有了更大的空间去攻击楚国。

韩信的军事行动可以视为一次巨型的迂回与侧翼攻击。公元前205年8月，获得了刘邦的许可，韩信率军来到了黄河西岸的渡口临晋关（现在陕西境内的蒲坂一带）。临晋关是进攻魏国首都安邑的最重要渡口，魏王豹在这里布置了大军，以防汉军的偷袭。此时的魏豹已经再次叛离了汉，要进攻燕、赵，必须首先击败他。

韩信在临晋关大肆准备，布置了许多船只准备渡河。当魏军紧张地等待着汉军渡河时，韩信却派出了一支兵马，从汾河入黄河口不远的夏阳渡河。夏阳在如今的龙门口附近，在临晋关北方。渡河之后的汉军南下抄了魏军后路，大败魏军，并乘胜追击抓住了魏王豹，并吞魏国。

魏国的灭亡，使得刘邦的黄河运输线完全没有了威胁，也为韩信提供了一条进攻赵国的路线。随后，韩信率军从汾河北上进攻太原，一战而胜。从太原走井陉进攻赵国，在这里，他遇到了久经沙场的老将陈余，并留下了千古名局背水阵。

在井陉口的河边，韩信故意让士兵先过河，然后布阵。在《孙子兵法》中有明确记载：不要背水向敌，以免没有退路。[3]然而韩信所需要的就是没有退路。韩信派兵挑战，当陈余进攻时，汉军佯败退到了背水

阵边，将士们由于没有退路，进行了死战。

当然，不能光靠背水阵，韩信的军事手段实际上更多样。当敌人离开了井陉的工事后，韩信派两千骑兵绕路攻入了他们的营垒，拔掉赵旗，插上汉旗。这就对赵军形成了包围态势。赵军击不穿对方的背水阵，也回不去自己的营垒，阵脚大乱，汉军大胜。

这次出击导致赵国的覆灭。随后，韩信依靠威慑招降了燕国，并通过两场战役击溃了齐国和前来救援的二十万楚军，整个北方都成了汉家的天下。

韩信对北方的扫荡，彻底孤立了西楚霸王，从北方而来的骚扰行动也摧毁了项羽的军备。到这时，战争的天平彻底转向了刘邦。

表面上看，在刘邦与项羽的直接对抗中，霸王胜多负少，刘邦屡次狼狈逃窜。然而由于战略的失败，霸王却越来越陷入孤立之中，最终被消耗致死。

公元前202年，筋疲力尽的西楚霸王项羽决定与刘邦言和，双方以鸿沟为界划定疆土，其西归刘邦，其东归项羽。这个看上去是和平协议的方案却反映了双方实力的差距。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公平的交易，鸿沟是一条人工河，在战国时期由魏国开凿，从荥阳引入黄河水，向东经过中牟、开封，南下通过颍河进入淮河，再通过邗沟与长江贯通。这条河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先声，也让魏国成了富庶的贸易中心。

但中国战略分界线也恰好经过鸿沟，在鸿沟以西，进入了山区，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在鸿沟以东进入了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无险可守。

以鸿沟为界，意味着刘邦随时可以跨过鸿沟袭击项羽，而项羽却无法骚扰刘邦的关中根据地。这样的条约反映了刘邦已经占据了完全的优势。失衡的条约必定无法维持长久，西方肯定要把东方并吞。

更令人惊讶的是，订立条约后，项羽立刻率军回到了彭城，对于未来可能的打击未做任何防备。

刘邦的打击来得格外迅速，在张良等人的劝说下，刘邦完全没有履行协议的打算，等项羽一回军，立刻组织大军前去攻击。这次进攻直接击败了项羽，结束了楚汉相争的局面。

由于是西部山区与东部平原的分界点，荥阳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还可以在西汉其他的内战中得到体现。

刘邦为了攻打项羽不得不分封了几个异姓诸侯王，在随后剪除异姓诸侯王的战争中，刘邦始终派大军镇守荥阳，避免对关中造成威胁。

剪除了异姓王，刘邦又把自己的子弟分封下去，封了一批同姓王。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这些同姓王又成了反叛的主要动力。在贾谊、晁错等人的影响下，文帝和景帝都进行了削藩，目的是把大的诸侯王进行拆分、削弱。

文帝时期，将疆域过大的淮南国分成三国（淮南、衡山、庐江），而齐国则被分成六个（齐、菑川、济北、济南、胶东、胶西）。景帝时期致力于削弱诸侯的封地，楚、赵、胶西三国割让了部分封地给中央政府，接下来被削的是吴国。为了保持自己实力，不受中央政府侵食，吴王刘濞被迫起兵反叛中央。

吴王联系了赵国、楚国和齐国拆分的六国，它们都是受中央政府压迫的对象。除了齐王和济北王之外，其余七国都发兵攻汉。

在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荥阳仍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汉将周亚夫死守荥阳一线，不让吴王的军队骚扰豫西和关中，保证了后方的稳定。荥阳又是天下最重要的粮仓所在，守住了这里，就可以依靠粮食的丰足等待叛军粮食的耗尽。

七国之乱中另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是梁国，梁国的国土是继承自原来魏国的领土，都城设在了睢阳（如今的商丘），到后来的唐代，这座

城市因为抵御安史之乱将获得大名，其实在七国之乱中，睢阳已经成为坚固的堡垒。

梁国处于叛乱诸国的腹心地带，在东面、南面、北面均被叛乱国家包围，周亚夫将梁国放给了吴国尽情围困，牵制住吴国不要进攻荥阳。

吴王叛乱之初，也有人提议不应该在意东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应该以最快速度绕过城池，率军直趋荥阳和武关，尽快打开进入关中平原的要道，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如果吴、楚攻打武关和荥阳，赵军从北方沿汾河过黄河威胁关中，齐六国再从东方牵制汉中央的军力，那么七国还有所作为。一旦七国无法占领这些战略要地，被拖在东部平原地区，陷入消耗战，则必败无疑。

果然，七国之乱只持续了十个月就被平定，其中作为主力的吴楚联军只持续了三个月，就在周亚夫的战略下土崩瓦解。

经过了楚汉战争和七国之乱，地方诸侯终于没有能力再抗击中央。当儒教被汉武帝树立成中国两千年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国的分裂趋势终于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时代。

在这个时代，统一已经成了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基础，由于士兵不再有国别属性，在战争中的杀俘也得到了控制。

但后续王朝的战争无不借鉴战国时代的军事经验，两千多年前开辟的战场和战略要地，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秦岭、淮河、太行山、崤山以及“几”字形的黄河，成了争夺全国必须掌握的屏障，函谷关、武关、汉中、河内、上党、四川盆地，是战争中巨大的胜负手，在历次战争中都会涉及，至少是涉及一部分。

但战国和楚汉时代的战争又是有局限的。在这个时代，长江还没有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四川以南、广东、江浙一带虽然已经进入了文明圈，但都还是边缘地带，北方的蛮族还没有成为核心问题，关中盆地以西地区也没有受到重视。

在未来，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大，这些当年的边缘地带都会进入中国的地域战略之中，直到形成现在的版图。

在汉代向外扩张中，首先瞄准的是塞外的广大地区，于是，我们把目光瞄向了遥远的蒙古高原……

(1) 根据《史记·项羽本纪》。

(2) 《史记·货殖列传》：“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如果按照《史记》的划分，西楚包括了一道从西南向东北的带状地带，从湖北、重庆交界，一直到江苏北部。然而，项羽把西楚南部的湖北划给了临江王，而西楚的国境又向东移动，最终反而更接近于楚国的东北部了。

(3) 《孙子兵法·行军》：“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

第三章　汉武帝的塞上曲（公元前133—公元169年）

燕然山铭的发现，确定了汉代军队最北到达的区域已经进入了蒙古境内。但燕然山却还停留在大漠的北沿，没有深入蒙古最富庶的草原和森林地带。

汉匈战争中，由于各自王庭设置地的不同，汉军的打击往往落在西部，而匈奴的打击大部分在东部。

在与异族的战争中，大量的非战斗人员会死于杀戮，这与同种族之战只杀军人形成对比。

汉匈战争中，李广等老将由于只对军队作战，很难获得太大的战果。无所畏惧的新人却可以通过对部族的屠杀，形成大捷，获得丰厚的赏赐。

卫青第一次大捷杀戮五千人，获得了三千八百户的封赏，接近一个人头一户，可谓昂贵的战争。

汉武帝发动的战争对于国家最大的破坏作用，是对财政的破坏，使得汉代失去了健康的财政，不得不建立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国有政策，从而导致了经济的凋敝。

西汉时期的汉匈之间的消耗战，几乎同时拖垮了西汉与匈奴，使得汉朝社会出现了极大的萧条，也造成了匈奴社会的崩溃。双方均得不偿失。

当一个王朝处于稳定和繁荣期时，人们往往被大国崛起的幻想所迷惑，更愿意发动战争。然而，战争的巨大消耗又会反作用于财政，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导致社会的衰落。

在现在的蒙古国境内，仍然有数目众多的古代石堆墓葬。这些墓葬年代久远，但由于地广人稀，至今仍然广泛地分布在蒙古草原的西部，

以及中国的新疆境内。

当我访问蒙古时，曾经在西部的乌瑞格湖（Uureg Lake）畔和科布多河（Khovd River）畔见到了大量的石堆墓葬。回到新疆后，又在清河县的三道海子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游牧石堆墓，这座大墓高达近二十米，直径近百米，如同一座小山的规模。

墓葬是由中间的一个石堆，加上周围的石圈构成。从石堆到石圈之间，还有若干条辐条结构，最多的大概有七条。石堆的大小、辐条的多寡，可能反映了墓主的社会地位。

在墓葬前，有时还会发现树立的鹿石或者草原石人，石人的形象大都带着刀剑，留着胡子，一看就是亚洲人种。

这些墓葬并不来自单一的时代，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草原上的各种民族都有建立石堆墓的习惯。早期墓葬中，甚至有印欧血统的人，而更多的墓主则属于东北亚血统。

许多墓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秦汉时期，他们很有可能就属于当年的匈奴人。

中国人对蒙古的认识是从汉代开始的。秦代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仍然采取闭关的政策，建立了长城，试图将匈奴人隔离在北方。到了汉代，中央政府采取了另一种政策——主动出击。

在出击政策的指导下，人们对于北方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汉代时，两次出击最远的战役，分别是霍去病到达狼居胥山和窦宪到达燕然山的战役。自古及今，人们就在争论这两座山到底在哪里。

最流行的说法是，狼居胥山就是蒙古东部的肯特山（Khentii Mountains），肯特山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面，它不是一条山脉，而是一组山丛，它并不高大，却非常遥远。肯特山现在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蒙古人的图腾成吉思汗就出自这里。而在汉代，中国人可能就曾经出征到达。

燕然山可能是杭爱山（Khangai Mountains），杭爱山位于蒙古的

中部，呈南北走向。在杭爱山以东，就是一个硕大的盆地，盆地之中拥有着蒙古最著名的首都哈拉和林遗址，以及唐代突厥人建立的都城所在。当年匈奴人的都城早就不见了踪迹，但也可能在这附近。

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针对狼居胥山和燕然山的另一种说法是：霍去病和窦宪并没有到达蒙古，这两座山可能都位于内蒙古境内，或许就是阴山和贺兰山。这种说法的依据，是认为汉代还不具有穿越大漠的手段。

在蒙古国和现在的内蒙古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戈壁，被称为大漠。这座戈壁几乎是人类的禁区，只有游牧民族才能根据生物的蛛丝马迹穿行而过，对于汉代军队来说，能否穿过庞大的无人区，的确是存在疑问的。

这个疑问随着现代考古的进行，终于画上了句号。公元2017年，考古学家发现了燕然山在蒙古国境内的最直接证据。当年窦宪到达燕然山后，随行的人中，有《汉书》的作者班固。班固写了一篇铭文《燕然山铭》刻在了燕然山的山体之上。由于考古学家发现了这篇铭文，汉朝人到达过蒙古终于成了定论。

准确地说，燕然山不是杭爱山的主脉，而是在杭爱山脉东南方的一条余脉上，距离主脉有上百公里远。这条余脉位于中戈壁省的西南方，处于戈壁之中，并不高大。

燕然山的确进入了蒙古，却还停留在大漠的北边缘，没有到达蒙古最肥沃的北方草原和森林地带。也正因为这样，汉代对于蒙古高原的回忆充满了沙子和石头。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带着不同种族的偏见与仇恨，以及统治者的贪婪，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作为战争本身，却又是一次发现地理的冒险之旅，让人们可以借助战争的开拓作用，将北方广大的地域收进汉民族的记忆与地理认知之中。

北方长战线

汉与匈奴的战争，可能是中国战争史上最长的战线之一。在鼎盛时期，这条战线的东线在辽西一带，而西线则到达了新疆西部。这条战线如此漫长，是因为南北的两大文明都达到了一次巅峰。北方的游牧民族统一在匈奴之下，而南方的大汉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也处于经济高峰。

在这漫长的边境上，又有若干个战略要地，成了汉政府控制全局的关键。

在这些战略要地中，最突出的是黄河组成的特殊地形。在中国的北部，黄河从甘肃北上，拐了个“几”字形的大弯，经过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诸省份。这个“几”字形大弯容纳了一片东西近四百公里、南北六百多公里的庞大区域。这个区域包含了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在南部仍可农耕，随后是连绵的山脉，最后过渡到荒滩和草原。秦朝在巅峰时期，曾经把整个河套地区纳入了版图。到了汉初，位于陕西榆林和延安以外（以北和以西）的河套地区已不再为汉人所有，成了游牧民族的天堂。

这里也是游牧民族向关中地区发动进攻的大本营。只要占据了河套，眼前就摆着两条路可以直趋关中：一条顺着黄河南下，在如今的宁夏中卫市，顺黄河支流清水河而上，进入固原盆地，再走经过萧关的回中道进入关中；另一条则是从延安翻越北山的道路，秦始皇利用这条路修筑了秦直道，从黄河北岸的包头直达长安。

从河套再往北，就是著名的阴山山脉。秦始皇为了保护直道，在阴山山麓建筑了秦长城。

阴山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在南部有着广大的草场，北方则更加荒凉，并逐渐过渡到戈壁地貌。在如今的中国和蒙古交界，是著名的大戈壁，戈壁北方叫漠北，南方叫漠南。班固的燕然山就在漠北的南沿地带，没有深入蒙古草原。

从河套往西，在黄河西岸，就是著名的贺兰山，这座山现在以岩画和西夏王陵著称，在两千年前曾经是汉匈争夺的重要地区。

贺兰山以西，越过沙漠，就进入了河西走廊的范围。河西走廊是汉代入西域的必经之路，也是匈奴东西交通的要道。

从河套往东，则进入了山西北部的山地，这里分布着一系列的碎山和小平原，在战国时期，这里是代地的一部分，代地（中心在现河北蔚县）曾属于赵国，楚汉相争时期单独成国。继续往东翻越五台山和太行山，就进入了燕、赵的领地。

在这些高山大川之间，汉政府继承和修建了若干个城市，以满足对于北方的防御，最著名的是平城（现山西大同）和马邑（现山西朔州）。

汉高祖时期，韩王信（不是淮阴侯韩信）勾结匈奴造反，汉高祖在平定韩王信之后，顺便想试一试匈奴的战斗力，被匈奴大军团团围困于白登山，差点儿做了俘虏。白登山就在当时的平城、如今的大同。

除了平城和马邑之外，著名的城市还有平城西面的雁门，也就是现在的雁门关所在地附近，雁门西面则有定襄，以及黄河河套东北角上的云中。在黄河河套的西北角内外，则分别有五原和朔方，后者是汉武帝时期新筑的城市。

在平城以东，五台山脚下有代城（现河北蔚县境内），继续往东，在如今的北京附近，有上谷和渔阳。

而在河西走廊地区，当霍去病平定了这个区域后，汉武帝修筑了四座城市，分别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构成了著名的河西四郡。

这些城市之间建立了大量的长城和烽燧，以保证彼此之间的联系。卫青、霍去病等人伐匈奴的出发地，也大都在这些城市。

另外，双方的首都所在也影响了各自的战略。汉代的首都在长安，距离河套地区、固原、天水、河西走廊等地较近。这些地方决定了首都的命运，因此，汉政府的军事出发点首先是进攻这些地方，保证首都的

安全。

而匈奴的王庭却包括了两个部分，在漠北（如今蒙古境内）的王庭，汉军几乎很难到达。在漠南匈奴也设了王庭，位于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距离山西、河北、北京都不算遥远。

除了王庭之外，匈奴单于王庭东面的广大区域，从王庭直到辽宁境内，是左贤王的居所；西面广大区域，从王庭直到新疆，是右贤王的居所。

汉军的打击常常落在右贤王的辖区，所以右贤王的损失总是更加惨重。而匈奴人的打击则更加倾向于放在东面，给汉军的渔阳、代、上谷造成了持续的压力。

杀戮换功名

边境线虽然漫长，但汉匈战争也许规模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当卫青、霍去病杀敌成千上万时，其中可能包含了大量非战的平民。

在中原的战争中，双方士兵在战场上决一胜负，失败者的士兵或者投降，或被斩首，至于妇女儿童以及非参战人员，并不受影响。

即便是最残酷的秦赵战争中，白起坑杀赵国士兵四十多万，但这仅限于士兵，而不包括非战斗人员。汉代之后，杀俘行为也少了下去。

但在汉匈战争中，主要存在两个原因：第一，双方的战争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都不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人；第二，皇帝按照人头进行封赏，所以，不仅保留了残酷的杀人习俗，就连非战斗人员也不幸成了杀戮的对象。

另外，早期的游牧部落也很难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他们逐水草而居，男人骑马放牧，女人照顾家庭。即便男人也只是生活在草地上，并非是纯粹的战士。如果首领召集出征，男人们就骑马上阵，进行掠夺或者格杀，战斗完毕后各自归家，仍然是平民。如果敌人来了，所有的男人也都上马保卫家庭，女人和孩子则躲起来，避免被屠戮。如果男人失败，所有的孩子或者女人要么被掳走，要么被杀死，所有牲口都归属战胜者。如果将妇女和孩子留在原地，孩子长大后势必会复仇。

在匈奴攻打汉代边疆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模式。汉文帝时期，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大批向边关迁徙人民，希望他们在边关生活下来，生产粮食，代替远程的屯戍。[(1)]这个建议把人民推向了与匈奴交界的前线，立刻在两方的人民之间产生了冲突。随着冲突的激化，匈奴开始了战争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将汉人赶离土地，恢复草场。

文帝时期，匈奴的进攻多以掠夺为主，一直持续到武帝初年。以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的情况为例，那一年，匈奴组织两万骑进入辽西地区，进行掠夺，抓走了边民两千多人，又在雁门郡杀掠千余

人。这些死亡和被俘的人中，既有士兵，也有平民。

汉军的出击也采取了类似的模式。以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针对匈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大捷为例。这次大捷针对的是匈奴的两个部落集团。这两个集团生活在原来秦的疆域之内，却在汉的疆域之外，这片地方在现在的宁夏黄河河套以内。两个部落的名字叫作楼烦和白羊。

作为部落的居所，这里必定是牛羊成群，妇女儿童穿梭其间，男人骑马放牧。随后，卫青率军侵入该地，展开屠杀和驱逐。汉军共杀戮了五千余人，剩下的部落民众跟随着首领逃走了，剩下的牛羊有上百万头，都成了汉军的猎获品。

如果只是针对军队的厮杀，匈奴绝无可能将上百万牛羊带在行伍之中，所以，汉军攻击的必然是游牧民族的部落，而不仅仅针对军队。

如果把男女老少都算上，那么卫青这次的胜利就显得苍白，这意味着，斩首的五千人中，也许真正的战士要少得多。因为这次战役，卫青被封为长平侯，赏赐给他的俸禄达到了三千八百户，即他享受每年三千八百户人家打出的粮食。平均每一个人头，价值将近一户，可谓昂贵的战争。

汉武帝后来的历次战争大都采取了类似的模式：派出大军在北方茫茫的草原上进行扫荡，看见有游牧民族的部落，就进行屠杀和抢掠。

之所以卫青、霍去病的出击屡屡有收获，原因就在于他们适应了这种新式的战法。匈奴部落逐水草而居，在广阔的草原上，总能碰到不少牧羊人。

汉代以李广为代表的老将军心中仍然有着正规作战的念头，很少采取针对平民的行动，只和匈奴的军队打仗。只有年轻人在民族偏见的激励下，敢于对一切人动手：当他们遇到了游牧民族的部落，开始对男女老幼和牲畜进行扫荡时，游牧民族的男人们不得不骑马来战，无法逃避追击。按照这种战法，即便不是卫青、霍去病，换成其他人，也可以获得巨大的胜利。

老将之死与新星联欢

汉武帝时期，最早的战争是“马邑之谋”。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汉武帝终于决定不再对匈奴采取绥靖政策，而是通过战争解决匈奴问题。在这之前，汉朝的文帝和景帝更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随着汉朝的国力增强，鹰派已经占据了上风。

马邑之谋又显得非常平淡，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也有说二十多万[(2)]），兵分五路，试图在马邑附近伏击敌人，同时派人诈降，将匈奴十万大军引入马邑伏击圈。但匈奴在进军途中看穿了汉朝的阴谋，主动撤退了。兴师动众却徒劳无功，汉武帝只好将献出计策的大行令王恢杀掉，给自己留个面子。

但马邑的这场军事行动又是非常重要的标志，它破坏了汉匈之间的信任关系，双方从此不再把和平当作选项，战争也连绵不绝。同时，战争还破坏了汉初健康的财政，迫使武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特殊的依靠国有企业和控制金融来筹钱的财政体系，这套体系一直到现在仍然被沿用。[(3)]

马邑之战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出四路大军，分别从上谷、代郡、雁门和云中出发，北上袭击匈奴。其余几路或者吃了败仗，或者徒劳无功，只有一位年轻的将军获得了斩首七百人的小功，这位将军就是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

我们可以对比两位将军的运道。此刻，号称飞将军的李广已经成名了三十多年，令匈奴闻风丧胆。但不幸的是，在这次袭击中，李广却碰上了匈奴的大部队，全军覆没，连他本人都被俘，只是靠侥幸才逃了出来。而这场战役却是卫青成名之始，这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第一次带兵，就获得了小胜。随着汉匈战争的发展，卫青官封大将军，又有三子封侯，父子的封户加起来达到了一万五千七百户，而李广临死时甚至连个五百户的小侯都没有混上。

汉军出击后，匈奴开始反击。他们的反击从王庭和左贤王部出发，向汉帝国的右翼（东方）进攻。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兵分数路，开始骚扰汉疆域东北角的辽西郡，其中一路杀掉了辽西太守，俘虏了两千人，又击败了渔阳的千人，围攻了镇守渔阳的韩安国，差点儿攻克了渔阳城。另一路匈奴军进攻山西北方的雁门郡，杀了千余人。此刻，汉军仍然处于被动防守阶段，派出了将军卫青和李息，分别解救雁门和渔阳。这次卫青又获得了小胜，斩首数千。

让卫青声名鹊起的一战，是对楼烦和白羊部落的讨伐，卫青将两部落从河套赶走，将他们的牛羊全部虏获。这一次可以算作汉军对匈奴的第一场大胜。这次战役也确定了汉军的出战模式：当匈奴以主力攻击东方时，汉军派出主力从西方出发，向匈奴的各个部落人民发动进攻，除了斩杀之外，也以驱逐为目的，将匈奴赶往北方更加蛮荒的土地。

随后两年，匈奴反攻，除了进攻刚刚丢失的河套地区之外，其主要兵力集中于战线的中部，在代郡、雁门、定襄之间，造成了汉边境一定的伤亡。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军进攻。与匈奴喜欢攻打中部和东部不同，汉军的重点仍然放在了右贤王所在的西部。东部虽然也派了兵力，但更多可能属于骚扰或者牵制。这次，已经封为车骑将军的卫青率领三万骑兵，出阴山的高阙塞，进入漠南。此外，卫青还节制其他六位将军一并出击，分别是：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他们从朔方出发；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在东方作为牵制。

在此之前，汉军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北方作战。卫青的冒险换来了回报，当汉军到达匈奴人的放牧地时，匈奴的右贤王根本没有做准备，他的部落民众处于生活状态，更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汉兵开始屠杀时，右贤王仓促之间带着一个爱妾和数百个亲信骑马逃走。其余的男女老幼和牲口悉数被卫青俘获，共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数十万。

此役之后，卫青已经成了汉王朝最著名的军人，得到了大量的封赏，官拜大将军，位于所有的将军之上。官爵背后，是那些被掳的离开了草原的妇孺的眼泪。

削弱了匈奴的右贤王（右翼），第二年，汉军开始将目标转向了匈奴的核心——单于的军队。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领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从定襄出发，向匈奴王庭发动了攻击。这一次，汉军没有像前面几次那样，碰到毫无防备处于生活状态的匈奴人，而是碰上了匈奴单于的大部队。交战后，汉军斩首数千人，撤退回到定襄。

一个月后，卫青不满意于上一仗的结果，再次率军出发。随后遭到了匈奴大部队的围攻，右将军苏建在军队被围歼后只身逃脱，前将军赵信原本是匈奴人，当他的人马损耗殆尽时，率领最后的八百人投降了匈奴，成为此后汉匈战争中匈奴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第二次出击斩首敌人上万，但己方的损失也很大。最终证明，当面对匈奴的精锐部队时，汉军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可言。汉军如果想获胜，必须袭击那些不做防备的匈奴部落。

不过，这次战役最大的收获，是汉武帝又找到了第二员大将——骠骑将军霍去病。这位年轻的将领当时只有十八岁，在战争中已经初露头角，率领八百骑兵斩首敌人两千零二十八人。汉武帝随即提拔了霍去病，使之在随后的战争中成了主角。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由于攻击匈奴中部单于难度太大，汉军又把精力转回到西部的右贤王处。这次的目标是打通西域通道。右贤王所在的区域恰好包括了著名的河西走廊。在汉代，通往西域只有一条路——河西走廊。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曾经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联合大月氏一同抗击匈奴，张骞却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抓获，十年后方才回归。张骞的遭遇证明，为了联合西域对抗匈奴，打通河西走廊、确保联络线的安全是必需的前提条件。

霍去病在春夏之交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第一场在春天，第二场在夏天。

春之战中，霍去病从长安出发，扫荡如今的天水一带，再从陇西（现甘肃省临洮县境内）北上，过焉支山（现甘肃省山丹县东），一路掩杀，斩首八千人，其中包括两个匈奴部落折兰、卢胡的首领，以及活捉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相国等人。第一次战争以擒贼擒王为目的，机动性强，没有时间劫掠民众。然而下一场战争就不同了。

夏天，霍去病再次出击，彻底打通了河西走廊，将走廊地区的匈奴人驱离，斩首三万零二百人，投降二千五百人，擒获了五个部落首领。这次战争还导致了匈奴的分裂，以浑邪王为首的一个上层集团率领十万人投降了汉朝，被安置在河西走廊地区。同时，汉武帝建立了武威郡和酒泉郡，以保护走廊的安全，之后又建立了张掖和敦煌，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

河西走廊的打通，是汉武帝伐匈奴最大的成就。这条通道的畅通，令汉人与西域有了稳定的联系，形成了丝绸之路的第一次繁荣。

获得了河西走廊、击溃了匈奴的右翼之后，汉武帝决定对匈奴发动一次总攻，同时攻击其中央军（单于本部）和左翼（左贤王部）。这次总攻由卫青和霍去病联合指挥，其中卫青率领人马攻击左贤王，霍去病率领精锐部队攻击单于本部。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支大军集结完毕，按照计划，霍去病将率领六将军（加上两支匈奴降将）从定襄出发北上直接攻打单于王庭，而卫青率领六将军从代郡出发，攻击左贤王。然而在出发前由于情报出错，以为单于在左翼，两位将军于是交换了位置，改由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

这次交换，使得卫青率领的非主力部队遇上了单于的主力部队，与单于搏杀多日，深入漠北，最后斩杀上万人，烧掉了匈奴的辎重，却无力消灭匈奴单于。霍去病率领主力部队，斩杀左贤王部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基本上击溃了左贤王的部属。

这次战争，也代表着老将军的谢幕与新将军的巅峰时刻。当霍去病再次受到皇帝的隆重封赏时，李广却在战争中黯然谢幕，这位在北方战

场厮杀了几十年的老将，本是卫青麾下的前将军，却由于率领的部队迷路，没有赶上战争。

卫青责问李广时，李广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他决定不面对皇帝的审判官，引刀自刭。他死时，率领的部卒全部痛哭，百姓中认识不认识他的，老的少的，都跟着流泪。

李广不知道的是，他所参与的其实是汉武帝最后一次大的胜仗。汉代的军事力量已经在汉武帝的挥霍面前耗空了，他已经无力再组织如此巨大的征伐。

战争的财政陷阱

在世界上，规模巨大的战争往往不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而是看谁经得起战争对财政和经济的蚕食。

到最后，必定有一方被消耗战拖垮，或者没有了可以上战场的年轻人，或者出不起战争的费用，引起了社会的总坍塌而告负。

汉匈战争到最后也变成了漫长的消耗战，对战争的双方造成了极大的损失。[4]对匈奴而言，最大的资源是人，当部族被一次次劫掠，年轻人遭到屠杀时，人口稀少的匈奴人已经无法守住如此广阔的地盘，它开始收缩了。单于从漠南退到了漠北，整个民族开始向西方移动，左贤王退出了东部的北京、辽西一带，来到了云中郡北方，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和陕西一带。而右贤王失去了河西走廊，进入了新疆北部。

除了人力之外，匈奴还失去了大量的牛羊和粮食储备，没有了后勤支援，战争就无法进行。

但对于汉帝国而言，这些战争同样是得不偿失的。人不是问题，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人员损失比例都高达百分之三十，但汉帝国仍然可以找到源源不断的士兵去送死。出乎意料的是，汉朝最先被消耗光的资源竟然是马。在卫青、霍去病发动的最后一场攻势中，汉军一共使用马十四万匹，活着回来的不满三万匹。巨大的马匹消耗让武帝凑不够足够的马匹发动下一次战役。

除了马匹之外，汉武帝的国库也变得空空如也。作为汉代最喜欢打仗的皇帝，除了征战匈奴之外，他还发动了针对朝鲜、南越（以广州为中心，涵盖了广东大部，广西、越南的一部分）、西南夷的战争，也消耗了大量的战略资源。

由于前几位皇帝都采取了和平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继位初年，政府的财政状况异常宽裕，仓库内堆满了粮食和钱币，串钱的绳子断了，钱滚得到处都是，无法详细统计。社会上马匹充足，人们羞于骑

母马赴宴。

但这样巨大的财富竟然禁不起几场战争的消耗。

实际上，汉代的财政在卫青元朔六年之战后，就发生了巨大的困难。原本丰盈的国库到这时已经消耗殆尽，大司农拿不出钱来应付皇帝打仗。

这两场战役造成了汉军兵马十余万的损失，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了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约合二十亿钱，仅仅战争的赏赐就达到了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还有正常的战争物资、粮食消耗。

为了应付这巨大的开支，除了拿光积蓄之外，武帝只好下诏卖爵，因为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买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头税，还可以当公务员（吏），甚至当官。这就破坏了汉代官僚系统。

霍去病的两场战争更是消耗巨大，元狩二年之战中，汉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的总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

元狩四年之战中，战死的马匹又高达十多万匹，而为了奖赏出生入死的战士，皇帝拿出的赏赐高达黄金五十万斤（折合五十亿钱），超过了政府一年的正规财政收入。

到这时，汉武帝已经无力再应付下一场战争了，于是汉匈战争如同虎头蛇尾一样，突然间进入了低潮期。但它的后遗症却一直保留下来，汉武帝为了应付财政问题，不得不建立一系列的国有垄断机构，从自然资源、金融等各个方面敲诈民间，来获得收入。这一系列的改革，最终造成了汉代经济鼎盛的结束。

汉匈战争的尾声

整体而言，汉匈战争是一场悲剧。两个正在崛起的民族，随着各自变得更加富裕强大，信心满满，冲突不断，最终变成了规模巨大的连绵战争，两败俱伤。匈奴进入了衰落期，而汉代也过了鼎盛期。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性质的战争。一种是原有世界崩溃之后，为了将中国重新捏合起来而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原有世界崩溃的自然结果。这样的战争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重建，由于前期的崩溃，社会经济已经糟糕到极致，随着统一进程，社会经济逐渐好转，到了统一之后，全国性市场的建立、和平的维持，经济立刻进入全面恢复时期，带来一次盛世。

另一种是不必要的战争，当一个王朝处于稳定和繁荣期时，人们往往被大国崛起的幻象所迷惑，更愿意发动战争。然而，战争的巨大消耗又会反作用于财政，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导致社会的衰落。

武帝后期，经过近十年的休养后，恢复了对匈奴的部分对抗，但再也没有赢得巨大的胜利。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由于匈奴内部的分歧，其左大将军企图与汉朝联合反对年幼的单于，武帝派遣浚稽将军赵破奴率领两万骑兵前往接应，却由于左大将军计谋泄露，汉军被匈奴单于围困全歼。这是汉匈之战中，汉朝的一次大败。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遣三路大军攻打匈奴。在三军之外，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蒙古境内，与匈奴接战，战败投降，其麾下只逃回了四百人。贰师将军（得名于著名的贰师城，也就是现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城）李广利进军天山，大胜而还，却在回师途中遭遇惨败。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七万大军进攻匈奴，战败投降。

经过几次惨败后，汉武帝晚年回顾自己的政策，终于认识到“当今务

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5)。

此后，武帝再也没有主动向匈奴挑起过战争。而真正决定了西汉胜利的，是匈奴的衰落而不是汉军的胜利。

汉宣帝时期，进行过一次失败的远征。又过了十几年，匈奴内部分裂越来越严重，最多时曾经五个单于并立。最后，呼韩邪单于投靠了汉朝，郅支单于逃往了西部，最终被陈汤所杀。西汉与匈奴的战争终告结束。

到了东汉时期，匈奴虽然又有了一定的恢复，但在窦固、窦宪的两次打击下彻底衰落。但匈奴的灭亡并没有给汉朝带来太大的利益，因为灭亡了这支蛮族，还有其他的蛮族填补。东汉时期，甘肃境内的羌乱成了帝国财政的大包袱。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羌族的叛乱开始，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六十年，直到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破羌将军段颎平定东羌，汉羌战争才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一个甲子的悲剧中，汉军屡次出兵，甚至遭遇了五次全军溃灭。

安帝永初年间陇右羌乱持续了十二年，中央政府因为战争，直接军事花费就达二百四十余亿钱。(6)从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烧当羌叛乱到公元169年东羌叛乱结束，战争费用更是高达三百二十亿钱。(7)

这些叛乱造成了东汉政府的财政崩溃，并最终导致了东汉政府的灭亡。由此看来，对于中央政府造成最大困扰的不是匈奴，也不是羌，而是战争本身，只要战争存在，就必然会导致财政的扩张和入不敷出，并影响到社会。

(1) 《汉书·爰盎晁错传》：“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

(2) 如《史记·韩长孺列传》。

(3) 参见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2017。

(4) 本节数据来源分析参见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

2017。

(5) 《汉书·西域传》。

(6) 《后汉书·西羌传》：“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

(7) 《晋书·食货志》：“逮建宁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余年兵连师老，军旅之费三百二十余亿，府帑空虚，延及内郡。”

第四章　光武帝：中原反击关中（公元8—公元36年）

与秦和西汉的统一不同，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统一难度更大，他只带了少量人马，从无险可守的河北地区出发，仅仅三年就攻占了两京，又两年已经称雄了东部，再七年后统一了全国。刘秀的战略为中原地区提供了击败关中地区的可贵蓝本。

在推翻王莽的战争中，南阳地区由于控制了进攻关中的南线和中线入口，成了胜负的关键点，加之四川、甘肃等地的军阀摆脱关中领导，使得关中无法抵抗中原的进攻。

刘秀占据河北后，为了获得战略立足点，必须获得山西的控制权。刘秀的战争展现了山西在北方的战略重要性。

山西是中原的脊梁，在群山之中拥有四处价值巨大的盆地，分别是河内地区、上党高地、汾河谷地和太原盆地。同时拥有山西与河北，进可攻、退可守，就在中原的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

关中分散在数个军阀之手时，洛阳成了对抗关中的基地。洛阳作为小关中，四面皆山，中间的平原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光武帝以此为基地征服了关中地区。

与光武帝相比，曾经占据上风的赤眉军由于缺乏战略，不懂得寻找根据地，在流寇生涯中日渐衰落，最终灭亡。

光武帝从中原出发统一全国，也预示着第一次关中时代的结束。随着中原的发展和长江流域步入文明进程，关中的重要性降低，中原、山西、长江的地位在缓慢抬升。

更始二年（公元24年）春，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在逃亡的路上。他从邯郸逃出，最初的目的地是北上蓟城，再从蓟城去上谷郡。然而在到达蓟城时，他却发现这里已经投降了他的对手刘子舆，只好仓皇南返，寻找机会。

刘子舆本名王郎，是一位算命先生。在西汉末年和王莽新朝，随着各地起义频发，天下大乱，王郎乘机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在河北邯郸起事，获得了当地人的支持。他把更始帝派去平定河北的刘秀当作心腹大患，用十万户的爵位悬赏刘秀的人头。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刘秀南逃的路程显得格外艰辛。他只有少数人马跟随，由于担心被俘，即便到了黑夜也不敢进城，只能在路边野营吃饭。到了饶阳，由于缺乏粮食，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决定铤而走险，到官方的驿站里去要点儿吃的。刘秀带着他的人，宣称是邯郸刘子舆派来的使者，要求驿站提供食物。

在吃饭时，随从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太饿了，纷纷不顾礼节争夺着食物，没有官家的吃相，这引起了驿站官员的怀疑。

驿站官员想验证一下刘秀的真假，于是敲起了鼓，说邯郸有位将军也路过驿站。如果刘秀是假使者，自然怕被邯郸将军识破，必然露出破绽。

果然，刘秀的随从们一听邯郸有将军来了，脸色立刻大变，就连刘秀本人也向车辆跑去。但他随即一想，又回到了座位坐下，假装镇定地对驿站官员说：请邯郸将军过来和我相见。

到刘秀要离开时，驿站官员也没有摸准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使者。官员暗示负责守门的门长不要给刘秀开门，但门长说：现在天下是谁的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得罪人呢？

刘秀这才惊险地逃出了是非之地。

由于天寒地冻，这些人的脸上都生了皴、裂开了口子。但也由于天冷，到达呼沱河后，他们才能不用准备船，直接从冰上走过去。不过由于冰面不够厚，他们损失了好几辆车。

继续向前到达了博城的西面，就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时，遇到了一位穿白衣服的老头儿。老头儿不仅给他们指了路，还对刘秀说：努力呀！信都郡（现河北省冀州市）现在还没有投降刘子舆，奉长安的更始

帝为正统，再有八十里就到信都了。

刘秀大喜过望，带人去了信都。果然，信都太守任光欢迎他的到来，刘秀这才有了第一个落脚点。

就在刘秀疲于奔命的时候，放眼全国，却发现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这时，篡夺了西汉皇位的王莽已经被杀死，杀死王莽的是绿林起义军的一支——新市军，首领刘玄是汉朝的宗室，已经在长安称皇帝，自称更始帝。刘秀就是更始帝派往河北收拾局势的，但他除了少量人马，一无所有。

更始帝之外，全国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十几处，加上一支庞大却混乱的起义军——赤眉军。所有的这些军阀和乌合之众，都比刘秀强大得多。

而刘秀所在的河北平原也并不是什么战略要地，这里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没有任何的险阻可以依靠。这样的地方根本无法成为王朝的根基，反而会成为众多军阀的靶子，随时被战争所蹂躏。在这样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

但出人意料的是，刘秀在落魄逃难短短三年之后，就攻占了长安和洛阳这两京。再过了两年，就将东方的军阀一一剪灭。再七年之后，他又打败了西部军阀，重新统一了汉代疆域，建立了近两百年的东汉政权。

在光武帝之前，中国的统一往往是从关中开始，以占据中原为结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关中地区拥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易于防守，难于进攻。如果再加上汉中盆地和四川作为后勤基地，基本上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可是，刘秀是从关东出发，特别是地形最不利的河北平原，他又是如何从一个丧家之犬变成皇帝？又用什么战略，从最劣势的地位崛起，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呢？

这要先从王莽的崩溃开始讲起……

新莽：改革导致的军事大崩盘

公元8年，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建立新朝时，整个社会并没有看出崩盘的迹象。实际上，除了少数人进行了简单抵抗之外，大部分西汉官僚都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改朝换代。

之所以说兴高采烈，是指官员们到最后都进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争相上书讨好王莽，他们先是要求按照周代周公当摄政王的先例，封王莽为安汉公（摄政王），王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个称号。之后，群臣纷纷要求王莽当摄皇帝，也就是暂代皇帝，比摄政王又高了一级。最后，他们干脆上书请王莽当真皇帝。

群臣争先恐后生怕自己被忽视。在一片欢呼声中，王莽当上了皇帝，建立了短命的新朝。

新朝之所以短命，与人心向背无关，却与王莽的改革相关。在他当皇帝时，整个社会依然较为稳固，但又有许多暗流存在。经过两百年的运行，贫富差距已经很大，社会流动的渠道越来越少，引起了许多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不满。王莽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就和这些人打得火热，上台后，立刻按照他们的理论设想实行了全盘改革。

但可惜的是，这些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儒者往往也是腐儒，他们如同法国大革命中的平等鼓吹者一样，树立了一个高高的标准，却没有提供可行的路径。

如果说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路径，也是不对的。他们的确提出了一条崇高之路，只是这是一条死路——回归古代。

古代是什么样子，他们也并不真的知道，于是在头脑中勾画出一个想象中的模型，这个模型要求皇帝对经济进行全盘控制，由皇帝分派贤人来管理，所谓贤人自然是这些腐儒。

所谓全盘控制，包括：对土地实行公有制，对货币进行全面改革，对政府和官制实行全面改革，等等。

当王莽把这个模型实现的时候，社会却立刻陷入了混乱。由于设想的模型过于宏大，官员们理解不了皇帝想要干什么，而民间更不知道皇帝要把他们带到何处去。

货币改革太复杂，民间分不清几十种货币的兑换率，干脆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官制改革成了半拉子工程，结果连官员的工资都被冻结了。土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也实行不下去，找不到足够的官员去负责执行，民间更缺乏动力。

全盘改革失败后，全国立刻陷入了动荡之中。最先起事的是关中之外的东部地区，由于中央政府设在西部的长安，对东部地区控制弱，这些地方率先起义。

最大的两股人马，是位于现在山东省境内的赤眉军（起事于天凤五年，公元18年），以及位于湖北、河南西部交界地带的绿林军（起事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尤其是后者，由于距离王莽统治的核心区域更近，敲响了灭亡新朝的丧钟。

在湖北省的西北方与河南省的西南方，是著名的南阳盆地和南襄隘道所在地。王莽时期与楚汉相争时一样，从东方的中原地区进入关中平原，主要道路还是三条：中路，从洛阳出发，翻越崤山，走函谷关大道；南路，从南阳出发，走武关；北路，从山西出发，渡过黄河进入关中。

南阳的位置就在第二条入关道路（南路）的起点。另外，人们还可以从南阳北上，经过昆阳（现河南叶县）抵达洛阳，进入第一条道路（中路）的起点。从南阳还可以南下，经过襄阳，到达湖北荆州一带，抵达长江沿岸，成为沟通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一条直达道路。因此，人们常常把“南阳—襄阳—荆州”看作一个整体。

王莽时代，首先出问题的是位于荆州地区的新市（现湖北京山县境内），由于发生了灾荒，新市人王匡、王凤带头起事，他们流亡在绿林山中，号称绿林军。绿林军击退了周围州县的几次镇压后，人数已达五万人。

随后，绿林军遭遇了粮草困难，从山中出来，一支人马在王匡、王凤等人的带领下，号称新市兵，他们进攻随地（现湖北随州），合并了一支号称平林兵的部队。平林兵中有一个汉朝的宗室子弟，叫刘玄，即后来的更始帝。

当新市兵到达南阳舂陵（现湖北枣阳市）时，另两位汉室子弟加入，他们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以及他的哥哥刘。

与普通的起义军（特别是山东地区的赤眉军）不同，新市兵从离开山林开始，就不是一支流民或者底层的军队，而是由地方乡绅阶层、汉宗室子弟参与的，有政治目标的军队。他们很快意识到王莽政权的虚弱，很早就打起了复兴汉室的大旗。

为了复兴汉室，必须有一个路线图。这个路线图是：政治上，拥立一个有皇室血统的人当皇帝；军事上，首先攻克南阳的中心城市宛城，占据了宛城，就可以向西进攻武关，或者向北经过昆阳、洛阳，进攻函谷关。一旦占据了宛城或洛阳，就尽快向关中地区进军，灭亡王莽。

在拥立谁当皇帝的问题上，是刘玄和刘的争夺，最后新市兵大部分人选择了刘玄，号称更始帝，而刘则在随后被刘玄杀害。作为刘的亲弟弟，刘秀没有被害，却受到了刘玄的排挤，成为他日后北走河北的原因之一。

在军事上，新市兵节节胜利，他们顺利占领了宛城，获得了战略据点。在攻打宛城的同时，派出一支人马（包括刘秀）向东方进攻，占领了昆阳、定陵、郾等据点，打通了通往洛阳的道路。他们的胜利也引来了王莽的关注，王莽派出四十二万大军，号称百万，进驻洛阳，要与新市兵决一死战。但出乎意料的是，王莽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在刘秀敢死队的强力冲击下战败，将通往洛阳的道路拱手让出。

宛城之战和昆阳大捷，预示着新市兵已经成了王莽的劲敌。不过由于王莽占据了关中这个四塞之地，只要指挥得当，从中原地区很难攻破武关和函谷关的天险，王莽虽然丢失了东方，仍然可以保有西方。

但王莽没有想到，昆阳大捷引起的震动导致了统治链条的进一步松动，于是，西方也纷纷举起了反旗。这次造反的是位于甘肃的隗嚣，以及位于四川的公孙述。甘肃和四川的丢失，使得王莽政权只占有了长安附近的平原，关中变得不完整了。

在秦汉统一的过程中，四川都是重要的一环，只有同时占据了四川和关中（包括汉中），才有可能利用资源和地理优势获得天下。四川丢失后，王莽不仅无法再统一中国，甚至想保住关中都困难了。

他不仅丢掉了一个巨大的粮食基地，还不得不分兵西面和南面，防守难度大大增加。起关键作用的还有甘肃的隗嚣，在与更始帝取得联系后，双方夹攻王莽，造成了王莽的疲于奔命，并最终灭亡。

王莽为了守卫关中，将兵马集中在南方的武关、北方的洛阳，以及函谷关东南侧的回溪（河南洛宁县东北）。回溪位于东崤山的山坡上，这里是古代关中洛阳大道上的一个防守点，只有过了回溪，才能前往函谷关。王莽对这条大道非常重视，他手下有九位将军，号称九虎，被派到了回溪。

更始帝派出的负责攻打长安的是西屏大将军申屠建和丞相司直李松。申屠建负责攻打武关，从蓝田入长安，而李松则从如今的西峡县北上攻打九虎将守卫的回溪隘。

为了防止九虎将叛逃，王莽在关中扣押了他们的老婆孩子。这么重要的任务，本来应该给予重重的赏赐，但此刻，王莽守财奴的本性却暴露无遗，虽然皇帝的财宝无数，却只给每人赏赐了四千钱。[(1)]结果九虎将无精打采地上了战场。

这样的军队自然不堪一击，李松的北路军顺利攻占了回溪隘，进而攻克了函谷关天险。由于在渭河南岸受到了王莽军的阻拦，李松分出一支军队北上渡过渭河，从北方进攻长安，而大部队仍然从南岸进攻。与此同时，隗嚣的部队也从西方攻打长安。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初，更始帝大军攻克长安，王莽战死。同月，定国上公王匡攻克洛阳。新莽政权落幕。

王莽溃灭，证明关中地区即便再牢固，但是当政权分崩离析时，依然无法抵挡住敌人从四面联合攻击。

但王莽的死亡并非混乱的结束。实际上，更始帝虽然占领了长安和洛阳，但反抗王莽的各地的起义军却并不听从他的号令。人们纷纷嗅到了改朝换代所带来的机会，揭竿而起，互不服从。

事实证明，更始帝可以推翻旧政权，却不会建立新政权，也无力镇压众多的起义军。于是，中国向着又一次大分裂滑去。

在长安的西面和南面，有甘肃的隗嚣、四川的公孙述、汉中的延岑，以及占据了宁夏和甘肃北方一带的卢芳。而在函谷关以东，各地的政权则更加零散。

除了流寇性质的赤眉军之外，在北方有邯郸的王郎（刘子舆）、临淄（现山东淄博）的张步、东海（现山东郯城）的董宪、睢阳（现河南商丘）的刘永、寿春（现安徽寿县）的李宪、江陵（现湖北荆州）的秦丰、夷陵（现湖北宜昌）的田戎。

刘秀被更始帝派遣去平定河北，却被刘子舆追得东躲西藏。而更始帝在长安的政权更是成为各路人马觊觎的对象，其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况下，地位最微小，又处于开阔平原地带，缺乏纵深的刘秀，又怎样才能统一天下呢？

他的冒险从信都开始……

光武帝：寻找战略点

对刘秀来说，对他有利的因素只有一个：全国军阀割据得太散，那些拥有地理优势的人无法完全运用地理优势。比如，更始帝刘玄同时占领了洛阳和关中，关中本是四塞之地，而洛阳同样是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可以称为小关中。更始帝具有绝对的地理优势，本应该借此统一中原。

但是，更始帝所占领的关中与秦始皇、刘邦时期的关中完全不同。秦始皇时期，秦不仅仅占领了关中，还同时拥有着四川的粮仓，这才对中原地区形成了压倒性优势。更始帝虽然拥有了关中，四川却被公孙述割据走了。同时，在关中地区的西面，陇山之西的甘肃地区，还有一个隗嚣。在汉中地区还有个延岑。在宁夏地区，包括了最要紧的固原盆地，还有一个卢芳。这三家对关中的威胁，使得更始帝无法集中兵力对付中原的军阀。

如果更始帝更加机智，应该尽全力消灭隗嚣、公孙述、卢芳、延岑等人，将四川和陕西统一在手中，并消除西方的威胁，利用地理优势牢牢地守住这些根据地，然后出兵中原，对分散在东方的军阀各个击破，那么也许刘秀根本没有机会获得主动。

可是，更始帝却无力控制局势，没有任何战略构想进行统一。当最具优势的一方不采取措施，就给其他人留了机会。

不过这时的刘秀还谈不上考虑全国性战略，他首先要做的，是寻找到战略依托。在河北的平原上，由于无险可守，他随时会被周围的军阀消灭掉。

当信都太守任光决定支持他时，刘秀只是获得了一个小小的立足点，他必须将这个立足点迅速扩张，站稳脚跟。在信都太守任光，以及旁边和戎（现河北巨鹿县）太守邳彤的支持下，刘秀开始进攻和收编周围的小县，并一路向邯郸进军。

虽然华北平原上缺乏有力的险关要地，却有若干个交通枢纽，邯郸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处。邯郸曾经是赵国的首都，其西面就是巍巍的太行山。虽然邯郸无法防止太行山方向的袭击，却可以倚靠太行山，防范东面的攻击。加上这里是连接南北交通的要道，从洛阳到北方的道路在这里经过，要想控制河北，首先就必须控制邯郸。

此刻的邯郸在算命先生王郎（刘子舆）的手中，此人是冒牌的汉朝宗室，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当刘秀打出正统的旗号时，周围的地方守将纷纷响应。特别是北方上谷、渔阳的军队前来支援，加上更始帝从南方派来了援军，使得刘秀实力大增，击溃了刘子舆的部队，获得了邯郸。这是刘秀获得的第一个战略点。

拿下邯郸时，刘秀的名义还是更始帝的大将。更始帝为了防范他，迅速派来了部队，由一位叫谢躬的将领指挥，也驻扎在邯郸附近（分别扎营）监视他。同时，更始帝向河北各地派去了新的官员，加强控制。刘秀接下来要做的是，利用邯郸的优势位置，各个击破，统一河北，摆脱更始帝的监视。

恰好，在邯郸的东方有一支很大的赤眉军，号称铜马军，刘秀借着征讨铜马军的名义，派兵离开邯郸。但他首先没有攻击铜马军，而是迅速北上，乘更始帝派去的官员没有来得及接手时，将这些官员一一擒获，控制了北方的幽州。再合并幽州的兵力南下，在馆陶（现河北馆陶）、蒲阳（现河北大名）一带击败铜马军。

铜马军是一群乌合之众组织的队伍，却有数十万人之多，被击溃后，投降的士兵大大地丰富了刘秀的军队。

铜马军灭亡后，在南方的山阳（现河南省修武县）、射犬（现河南省武陟县境内）一带，还有另一支赤眉军，号称青犊军。山阳、射犬地区位于黄河北岸的平地上，但靠近太行山山脉，又距离洛阳不远，已经接近更始帝的战略中心区域了。

刘秀挥军南下，名为针对青犊军，实际上是要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黄河一线。在他向南移动时，更始帝派去监视他的谢躬也将军队南

移，来到了邯郸南面的邺城（现河南安阳境内）。刘秀一方面联络谢躬，要求双方配合着一同对付赤眉军，取得了谢躬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乘谢躬减轻了防备，利用离间计，收买守邺城的魏郡太守陈康，将谢躬斩杀。

谢躬的死亡，让刘秀彻底脱离了更始帝的控制，开始独立行动。当平定了青犊军之后，整个河北地区就落在了他的手中。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邯郸北方的鄗城（现河北省柏乡县固城店镇）称帝，正式拉开了逐鹿天下的序幕。

然而，此刻的刘秀只是占领一块平坦肥沃的土地，却由于无险可守，随时可能遭受四面的攻击。在各个割据势力中，刘秀后勤资源富足，却缺乏战略资源。一旦其他军阀反应过来，就会展开对这个四战之地的争夺。刘秀必须获得足够的山地，才能借助山河之险守住得来不易的成果。

可是，刘秀的下一个战略点在哪儿呢？

借助三晋，跃进两京

在刘秀收拾河北战局之时，另一支起义军樊崇领导的赤眉军正毫无目的地在中原大地四处乱撞。

更始二年（公元24年），赤眉军在扫荡了东部之后，由于缺乏战略性计划，人心散乱，纷纷想回山东老家。樊崇意识到如果不树立起下一个目标，队伍就散掉了。他决定进攻关中，利用战争提高队伍的凝聚力。赤眉军兵分武关（南路）、函谷关（中路）二路，向关中进攻。

在赤眉军进攻关中时，刘秀也派出了邓禹率领两万军队向关中进军。

樊崇选择了中路和南路，刘秀由于位于河北，选择了北路，也就是从黄河北岸，走安邑的道路。在历史上，这条经过晋南、豫北的道路是一条从秦进入河北地区的便捷通道，与经过函谷关的豫西通道平行。在战国时期，秦国进攻赵国就常走这条路。

选择走安邑，除了距离上的方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获取山西的战略要地。刘秀寻找的最关键的战略点就是山西，由此也引出了山西在北方战略中的地位。

在历史上，山西常常作为中原的脊梁而存在，这里有太行山、王屋山、中条山等一系列山脉，将山西割裂得七零八碎。与东面的河北和南面的河南相比，山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但由于地势高，易守难攻，是控制中原的堡垒。

刘秀如果控制了山西的关隘，就获得了稳固的落脚点。他可以依托山西的高地，加上河北的富庶，进可攻，退可守，敌人就很难消灭他了。

在山西的崇山峻岭中，有几个重要的小平原和台地，成了控制山西的关键所在。

第一个地区是靠近陕西、河南的黄河大拐弯处，由黄河拐弯，包围出一片三角形的地貌，这就是战国魏的古都安邑所在。在历史上，这一片地区被称作河内，也是进攻关中的北路必经之地。

第二个地区是长治所在的上党，这是一片较为平坦的高台地，北控太原，南通黄河，西达安邑，东扼邯郸，这里也是秦、赵当年争夺的重点地区。长平之战也发生在附近。

第三个地区是汾河谷地的临汾一带，这里是从太原顺汾河南下陕西的交通要道。

最后一个地区是太原盆地，太原盆地北可通大同，西可通黄河，东可以通过井陉前往河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十字路口。虽然四通八达，太原本身的地形却有利于防御，更提升了它的军事价值。

在这四个地区中，如果要进攻和控制洛阳、关中，最重要的地区是靠南的安邑和上党。刘秀派邓禹走北路进攻长安，必经过安邑。邓禹率军在安邑击斩更始帝的守将樊参，又击溃了大将王匡，在进攻长安的同时拿下了安邑，为刘秀找到了第一个牢固的战略据点，可谓一举多得。

除了安邑，山西第二个要地是上党。这时的上党由一个叫作鲍永的人占据，鲍永表面上服从更始帝，却并不与刘秀对抗，保持着较为和平的关系。在后来刘秀攻取洛阳的过程中，鲍永始终观望不参与，他的态度给刘秀占领洛阳提供了机会。但为了防止鲍永态度改变，刘秀还是攻陷了从河南通往上党的必经之路天井关，确保了侧翼的安全。

当河北平定，安邑、上党的安全得到了保证之后，刘秀大举进攻洛阳。他一面派大将耿弇出兵洛阳东方，防止东方其他军阀乘乱而入，一面派大司马吴汉直攻洛阳。抵抗了三个月后，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九月，洛阳投降。这里成为光武帝刘秀的首都。

攻克洛阳，是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的关键一步。短短的两年中，他从一个一无所有的逃亡者，到占领了河北平原，再进军山西安邑、上党，获得可攻可守的战略要地，到进攻和占领洛阳，成为东部军阀的佼

佼者。

在中国东部，洛阳之所以成为十三朝古都，在于它在东部无与伦比的战略地位。洛阳盆地的四面皆山，崤山、伏牛山、嵩山环绕着西、南、东三个方向，北面邙山之外就是黄河，伊水、洛水穿盆地而过。在洛阳的周围有八个关口将它与其他地域分开，既可以防守，也是个富裕肥沃之地。同时，黄河和洛水还方便地把洛阳和外界沟通，便于外界的粮食进入。

从战略地位上，东汉时期的洛阳仍然无法与关中相比，因为关中的平原更大，产粮更多，地理要塞也更加险峻。但由于洛阳平原比长安平原小，使用更少的兵力就可以防卫。同时它比关中更靠近富裕的东部，使得洛阳成了乱世时期最佳的战略要地。只要关中、汉中、四川没有统一在一个人手中，洛阳就不用担心关中的压力。

幸运的是，光武帝获得洛阳时，关中地区正乱成一团糨糊。由于更始帝派了大量人马到安邑与邓禹作战，关中兵力空虚，让赤眉军捡了便宜。在刘秀取得洛阳的当月，赤眉军攻陷了长安，另立了一位汉朝宗室刘盆子为皇帝。

赤眉军之后，邓禹的军队也进入了关中地区。他避开了势头正健的赤眉军，选择攻取长安之外的其他领土。他平定了上郡、北地、安定等三个郡。这三个郡位置从陕西北部直到甘肃东部，对赤眉军形成了压迫的态势，导致赤眉军无法稳定社会，开展生产。

当把粮食耗光之后，流寇出身的赤眉军决定甩掉长安这个包袱，离开长安。随后，赤眉军先是向西北进军，在遭受了邓禹、隗嚣的攻击后转而向东，想回到中原，在崤山一带被光武帝刘秀的大将冯异击败，全军覆没。

赤眉军的遭遇凸显了光武帝的战略眼光。赤眉军曾经是全国最大的武装集团，又占领了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长安，却由于缺乏统一全国的战略，走一步看一步，越来越弱小，最终亡于刘秀之手。

赤眉军离开长安后，关中的混乱局势并没有好转。盘踞在汉中地区

的军阀延岑看到了机会，从汉中出发进入关中平原，乘邓禹立足未稳，赶走了邓禹。

但延岑也无法收拾残局，因为赤眉军撤退后，关中各地进入了更加碎片化的时代，十数个小军阀各据一地，互不臣服，整个关中粮食断绝，人民颠沛流离。如果要平定这些小军阀，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勤基地，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将小军阀一一征服。

除了刘秀之外，另一个拥有后勤基地的就是汉中的延岑。但汉中地域还是过于狭小，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供军事需要，所以延岑也无法统一关中。

能够收拾关中混乱局面的只有刘秀。占据了洛阳之后，整个河北、洛阳地区已经成了全国的稳定之源，生产的粮食足以供应军队所需。随着延岑的败落，刘秀再次派遣冯异进军关中。

初次进军两年后，关中和长安落入了光武帝之手。到这时，全国最有价值的战略之地大都掌握在了刘秀手中。

在掌握了中心之后，他开始平定外围地区，以尽早统一整个中国。

关中时代的落幕

在历史上，陕西的宝鸡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它之所以重要，在于这里是两条大道的交汇点，一条是从宝鸡出发向南的陈仓道，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所谓陈仓道，也叫散关道、故道，即经过宝鸡南面的大散关，经过凤县、略阳进入汉中的道路。从汉中走另一条古道金牛道，进入四川盆地，到达成都。

经过宝鸡的另一条道路是通往甘肃天水的陇关古道。宝鸡在关中平原的西沿，天水已经上到了青藏高原的边缘山区，处于文明的边缘。但从天水可以向西进入兰州，再北上河西走廊和新疆，因此这条路是著名丝绸之路的起始部分。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宝鸡和天水都在渭河边，古人又有沿河修路的习惯，但是，从宝鸡到天水的道路不仅没有沿渭河前行，反而从宝鸡向北折到了陇县，再翻越巍峨的陇山，这里有著名的关口大震关和瓦亭关，最后顺山谷绕到天水。那么，古人为什么不直接顺着渭河而上直达天水呢？

古人之所以这么选择，是因为这一段的渭河在巨大的峡谷中穿流，两岸悬崖峭壁，间不容发，只有到了现代，利用机械化开凿隧道才有可能沿河修路。中国古代这条奇怪的绕道翻越陇山的道路，就成了历代征服者的噩梦。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五月，一支八九万人的军队来到了陇坻（现陕西陇县西南），他们属于光武帝刘秀，在著名将军耿弇的率领下，向陇山之上的守军进攻。

守关的部队是天水军阀隗嚣的部队。光武帝已经平息了整个东部的军阀，决定向西部进军了。

但这次，耿弇却大败而回，汉军没有占到便宜。这也证明隗嚣才是光武帝真正的劲敌。

隗嚣又是个奇怪的军阀，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配合，光武帝就很难这么容易地统一天下。当光武帝平息东部时，隗嚣似乎与光武帝达成了默契，不与他为敌，不在西部进攻他的后方，这才让光武帝放手统一了东部。只是在光武帝统一东部之后，隗嚣又不甘于向他称臣，双方才发生了战争。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光武帝统一东部的过程，再回头看他如何对付隗嚣。

四年前，光武帝获得了长安和洛阳之后，开始制订统一全国的战略。

在当时，全国一共还有十一个较大的军阀，其中西部有四个：隗嚣（天水）、公孙述（巴蜀和汉中）、窦融（河西走廊）、卢芳（九原）；东部有七个：刘永（睢阳）、董宪（郯城）、张步（齐地）、李宪（庐江）、秦丰（江陵）、田戎（夷陵），另外还有一个幽州的彭宠，曾经帮助光武帝平定河北，但随后又反叛了光武帝。

面对十一家争雄的局面，光武帝如何选择，才能逐一消灭，最后完成统一呢？如果没有隗嚣等西方军阀的配合，光武帝的难度要大很多。

在西方的四位军阀中，卢芳地处偏远，除了自保，野心不大。窦融曾经属于隗嚣集团，后来则与光武帝相善，到最后投靠了光武帝。只有公孙述和隗嚣两家实力较强，特别是公孙述，占领了四川和汉中，有实力也有野心北进关中平原，一旦他统一了关中、汉中和四川，就有了当年秦朝和刘邦的优势，光武帝就不容易消灭他了。

幸运的是，光武帝能够拉拢天水的隗嚣来对付公孙述。隗嚣的地盘不足以统一全国，却由于地理优势，能够居高临下打击任何觊觎关中的人。公孙述屡次进攻关中，都被隗嚣击退。隗嚣的存在，使得光武帝能够制订先平东部，再平西部的战略。

他的战略可以总结为：当已经拥有了长安和洛阳时，由于关中平原周边地区还处于分裂之中，可以利用西部的矛盾，让他们持续分裂，先腾出手来统一东部的中原地区。当整个东部、洛阳和关中盆地都被控制

后，剩下的西部地区就无力与他抗衡了。

此刻东部也处于分裂之中，每个小军阀都无法单独与光武帝抗衡，他们很快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开始的四年里，光武帝先后平定了秦丰、田戎、刘永、彭宠、董宪、张步、李宪等人，将东部统一。

统一东部后，光武帝将重点放回了长安所在的关中，将公孙述和隗嚣列入了攻击范围。

在这两人中，又以隗嚣对关中威胁最大。天水除了可以居高临下进攻关中平原之外，还是通往四川的制高点。如果不先取得天水，即便想进军四川，也可能被隗嚣从背后袭击。为此，必须首先并吞隗嚣，才能对公孙述采取行动。

但是，光武帝的第一场伐隗嚣之战，就以惨败告终。这也表明，占据了地理优势的隗嚣，在战略上并不处于下风。

随后，双方开始了拉锯战。由于陇山的地理优势，光武帝无法攻入陇山以西。但由于光武帝的总兵力有优势，隗嚣也无法从陇山下来，占领平原的关中地区。

在拉锯战过程中，光武帝顺便消灭了卢芳，并招降了窦融，进一步孤立了隗嚣，却仍然找不到进入陇西的方法。隗嚣为了对付光武帝，也和四川的公孙述和解，向公孙述称臣，双方抱团与光武帝对抗。

相持了两年后，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的大将来歙才找到了一次巨大的机会，攻入了陇上。他的这次攻击，也给从关中地区进攻陇上指明了方向。

事实证明，想从正面的陇坻，直接进攻是不现实的。但陇山除了这条大道之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孔道，只有绕到守军背后，才有可能成功。

来歙率领两千人马，从回中道北上番须（现甘肃省华亭市南），从

番须向西找到了一条人迹罕见的小道，他们伐山开道，从北方绕过了隗嚣军队的防守，又绕回到主道上，直接从侧面攻下了主道上的略阳（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一带），切断了隗嚣的军队。

略阳在陇坻的西面，作为陇山路上的重镇，是连接陇上和陇下的关键地区。从略阳向西可以到达隗嚣的统治中心天水，向东就是陇山前线的各个关口。隗嚣失去了略阳，意味着陇山各个关口与天水之间的联系被斩断了。

两百多年后，略阳已经被人遗忘，但在它的附近，几乎是同一个山谷里，另一个著名的重镇崛起了，它就是诸葛武侯北伐时的重镇街亭。

来歙的奇袭让隗嚣大惊失色，他一方面命令各个关口加强防守，一面亲率大军抢回略阳。来歙拼死守住了略阳城，在隗嚣筋疲力尽的时候，光武帝率领大军，与窦融等人相配合，一同向陇山各个关口进攻。这次进攻终于打穿了隗嚣的防守，击溃了他的军队。隗嚣被迫放弃了天水，退向了天水以南的西城，做困兽犹斗。

这次进攻也成了历代进攻天水的指路明灯，从此以后，人们知道，从陇坻直接翻山进攻天水并不是好的方法，必须从北方或者南方绕上陇山，形成夹击态势，才有可能攻克这座堡垒。

但是光武帝与隗嚣的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隗嚣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时，汉军突然得报，东部的颍川发生了叛乱，为了镇压叛乱，光武帝离开了陇西。他走后，隗嚣又把汉军赶回了关中。这场战争又持续了两年，直到隗嚣死后，汉军才终于攻克了陇山，占据了进攻四川的制高点。

消灭了隗嚣，汉军就只剩下四川没有平定。

在平定四川的过程中，汉军的进军路线也预示着关中时代的结束。

在此之前，要想进军四川，只有从关中越过秦岭进入四川这一条路可以走，也就是从散关道（子午道、褒斜道等）进入汉中地区，再走金牛道（或者米仓道）进入四川盆地。

但到了东汉初年，随着人们对长江地区的开发，从湖北经过长江进入四川的大道已经成为可能。虽然秦国曾从四川顺长江而下进攻湖北，但如果想逆流而上从湖北进入四川，必须等条件更成熟才行。

光武帝派遣了两路大军，分别从秦岭道和长江道进攻四川，而起决定作用的已经是从荆州出发，顺长江而上的部队。这支部队由岑彭和吴汉率领，进攻者进军江州（重庆）后，岑彭兵分两路：一面从嘉陵江、垫江西进，吸引了公孙述的主力军；另一面顺长江而上，从南方沿岷江接近成都。这次奇袭打开了成都的大门。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吴汉率军攻入成都，为期一年的入蜀战争结束。

入蜀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光武帝对中国的再统一。

光武帝的战争，是对从周代形成的战争传统的反叛。从周代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军事上的关中时代，所谓得关中者得天下。周武王伐纣、秦始皇统一、楚汉战争都是首先统一关中，再蚕食中原的最好例证。

关中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这个地区容易形成一家独大的局势。关中统一后，再向外扩张，就可以将四分五裂的中原一一击败。

周武王时期，中国的文明区域还太小，一个关中就足以将中原降服。到了战国和秦代，随着六国对中原地区的深耕，特别是楚国对南方的经营，关中已经从世界的二分之一下降为三分之一，仅凭关中已不足以和中原对抗。但秦国幸运地发现了四川的重要性，处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可以打击楚国的湖北，却很难被楚国反向进攻。在四川粮食的支援下，关中重新获得了战略优势，帮助秦统一了六国。

楚汉战争基本上重复了秦统一的战略思路，由于轻车熟路，战争的进程也加快了。

但又经过了两百年的开发，随着中原地区的进一步富裕，以及长江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关中已经从世界的三分之一掉到了四分之一，即便

加上四川，也最多只能算半壁江山，中国的战略优势已经逐渐地从关中向东转移了。

光武帝正是利用了战略优势的转移，抓住了关中和四川分裂的机会，从河北迅速占领山西的战略要地，再获得洛阳，随后将关中最富裕的平原地区抓在手中，占据了中国最核心的“洛阳—关中”轴心，再利用这里的粮草优势，各个击破，从东到西完成统一。

此时，四川也不再是关中的后花园，从这时开始，直到数百年后完成，长江通道逐渐成为通往四川的主流通道。由于水运的承载能力远大于陆运，蜀道逐渐成了客运通道，而物资交流则转移到了长江之上。失去了四川的关中显得更加寂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中时代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凄然落幕。

历史突然进入了第二个时代：分裂时代，也是长江时代……

(1) 《汉书·王莽传》：“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莽愈爱之，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众重怨，无斗意。”

第二部　分裂时代
（公元189—公元589年，三国到南朝）

第五章 《隆中对》：开创分裂时代的大战略（公元189—公元219年）

三国初期，人们仍然认为决定中国统一的关键在于北方，长江上的四川和江东只是附属性的，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诸葛亮第一个提出，依托于南方，也同样可以完成统一大业。他的《隆中对》之所以具有开创性，在于确定了南方和长江在中国军事战略中的新地位。

东汉末年的军阀分为老军阀和新军阀。老军阀大都是东汉的第一代州牧出身，新军阀则是依靠反对董卓起家。东汉末年到三国的转型，就是新军阀依靠战争取代老军阀的过程，最终只剩下三家新军阀脱颖而出。

决定了曹操在北方胜出的，是战争的后勤。曹操是最重视后勤的军阀，采取了屯田措施。官渡之战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是曹操对袁绍后勤的打击。

在诸葛亮之前，吴国的张竑已经独立提出了从南方进攻北方的战略构想。他建议孙策首先占领江东，再溯江而上占领长江中游的赣江盆地和荆州地区。依靠江东、赣江盆地和两湖盆地，就足以与中原对抗。张竑的提议成就了孙氏数代的霸业。

江东的重心在南京，要想保卫南京，必须保卫两侧的镇江和马鞍山。这里有两条古道通往北方。中国数千年的长江战线莫不与这两条通道有关。

诸葛亮《隆中对》的实质，是利用西南的战略地理反攻中原。这要求刘备必须同时占据四川和荆州，利用四川作为粮仓，再利用汉中与荆州两条通往北方的通道，实施钳形攻势，进攻中原。

荆州作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被诸葛亮发现，这里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在这里会合，因此成了战争的胜负手。

长江成为中国的战略重点后，南方政权要想防卫长江，不能只退缩到长江以南被动防守，必须占据江北的缓冲地带，才有可能守住长江。江北的淮河流域与荆州就作为长江的锁钥而进入了历史。

江东战略和《隆中对》是南方对北方的一次逆袭，表明南方不再是北方的附庸，而是拥有独立地位的地理单元。在这两个战略之下，吴、蜀分别建国，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在南阳郡邓县一个叫作隆中的地方，迎来了一位流浪的军阀，他是去拜访一位隐士。这位军阀就是刘备。

在拜访隐士之前，刘备是典型的丧家之犬，在争夺中原的战争中失败得极其彻底，很难翻身。

要想了解刘备到底有多狼狈，必须从当时的流行思潮谈起。在三国之前的中国历史上，要想建立王朝，必须占据关中和中原地区，中原的夏、商、东汉，关中的周、秦、西汉，都是成功的例子。一旦离开了这些区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小角色，失去了逐鹿的舞台。

刘备在早年，也曾积极地参与对中原地区的争夺。由于实力不足，他四处投靠，却都不得善终。

他最初在东汉朝廷当小官，跟随大将军何进。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何进预谋清除宦官，自己却遭遇杀身之祸，还导致了后来的董卓之乱。

刘备又投靠了盘踞北方的军阀公孙瓒。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公孙瓒被袁绍所败，自杀身亡。

当公孙瓒与袁绍发生连绵不绝的战争时，刘备又瞅准了机会投靠了公孙瓒的拥趸、盘踞青州的军阀田楷。在投靠田楷期间，刘备获得了平生第一次重大机会。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以徐州牧陶谦是杀父仇人为由，[(1)]率军进攻陶谦，攻克十余城，在陶谦的老巢彭城（现江苏省徐州），曹

军烧杀掳掠，杀死了数万人，尸体堵塞了泗水。

就在此刻，刘备跟随着青州刺史田楷出兵援救陶谦，受到了陶谦的优待。他抛弃了田楷，选择陶谦做了新主子。作为回报，陶谦上书皇帝，封刘备为豫州刺史。

第二年，陶谦病死，将徐州让给了刘备，刘备升级成为徐州牧，第一次获得了与曹操、袁绍等顶级军阀并称的资格。后来，曹操为了拉拢刘备，又上表请求封刘备为镇东将军、宜城亭侯。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术进攻刘备，两人相持时，另一个著名的流浪军阀吕布偷袭了刘备，夺取了徐州。刘备再次颠沛流离。流浪中的他人困马乏，下属互相攻击争夺食物。迫不得已，他投靠了敌人吕布。[(2)]

但不久，刘备又和吕布反目，只好夹起包裹投靠了曹操，并借助曹操的力量杀死了吕布。

不过曹刘的蜜月期并不长久，刘备仍然想夺回徐州的控制权，他杀死了曹操的徐州刺史，举起了反旗。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击败了刘备，把他的老婆孩子加上大将关羽全都俘虏。如同丧家之犬的刘备立刻打包投靠了袁绍。

很不幸，就在当年，曹操在官渡决定性地击败了袁绍，在整个中国北方获得了优势。此刻的刘备在中原已经待不下去了，再次夹起尾巴逃跑。这次他逃向了南方，投靠了同为汉室宗亲的荆州牧刘表。刘表亲自到郊外接待这位本家，并划了一座城让他留守。

刘备所守的城叫新野，位于南阳和襄阳之间，地处交通要道。他在这里度过了较为平静的七年时光。

在当时的人看来，靠近长江的荆州已是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区，这里虽然很安逸，却缺乏战略上的重要性，到了这儿，就基本上被排除在了顶级军阀之外了。

在荆州西面的四川盆地，是偏安一隅的益州军阀刘璋；在东面的长

江下游，则是刚刚站稳脚跟的江东军阀孙权。荆州、益州和江东，虽然在战国时期就进入了中国历史，但一直被中原人士当作偏远地区，不具有战略决定性。刘备时代，这种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真正被人们看重的，是强大的中原和关中，它们都被曹操抢到了手。

根据以前的经验，每一次中原和关中的对决，决定了谁能够完成统一。当北方统一之后，进军南方只是顺带性的和象征性的，大军一到，南方也就平定了。这一次，人们也认为，当曹操在北方获得了足够的优势，就会轻而易举南下，荡平这几个小据点，完成又一次统一。

刘备就是在这种悲观的气氛中拜访了在隆中居住的隐士。也只有了解了前面所谈的背景，才知道这位隐士提出了一个多么具有革命性的战略设想。

诸葛亮的《隆中对》将四川和荆州，以及江东提到了与中原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认为即便在这些中华文明的边角地区，也一样可以借助地理优势统一中原。

他如同先知一般觉察到，中国的战争局势早已变化，其轴心已不再是那条短短的“长安—洛阳”轴线，长江的地位可能超过了黄河，成为中国战争下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

分裂时代来临了。

东汉末年的老军阀与新军阀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年189年），东汉灵帝去世，年方十四岁的少帝刘辩继位。不久，影响东汉国运的两大势力就展开了直接的对撞，它们是外戚势力和宦官势力。

在东汉历史上，光武帝削减了百官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却不经意间造就了外戚和宦官的得势。一旦出现小皇帝和弱皇帝，由于百官权力过小，中央行政机关立刻出现半瘫痪状况，而这种权力的真空，就被外戚或者宦官填补。

少帝时期外戚势力的代表是少帝的舅舅大将军何进，为了巩固权势，他与太傅袁隗、中军校尉袁绍等人策划，将大权在握的宦官们消灭。但由于性格优柔寡断，何进被宦官们抢先杀死，随后，何进的下属向宦官进攻，将他们全部屠戮。

这次事件以外戚和宦官的两败俱伤而告终，这原本是对东汉政府有利的事。但何进在死前的一个决策却毁掉了东汉政权：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何进试图招回在外的将领来保卫他，他招揽的将军叫董卓。

董卓时任并州（现山西境内）的州牧，驻军在安邑。得到命令后，董卓立即渡过黄河，率军向京城洛阳进军。何进死后，董卓并没有停下步伐，还是按照原计划进攻洛阳。

董卓进入洛阳后，把持了朝政，废除了少帝，另立灵帝的儿子刘协为帝，这就是汉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

董卓的作为引起了群臣的不满，许多人乘机逃离了京城，大部分逃往了东部和北部，开始招兵买马，以诛董卓为号召拉起了义旗。随后，这些人将军队集中在了洛阳的东面，主要占据了酸枣、封丘、河内、陈留等地，都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

但在具体作战时，这些将领虽然都反对董卓，在出兵时却显得过于谨慎。他们大都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出工不出力。很快，原本信誓

旦旦的讨伐变成了一场滑稽剧，最终群雄各自散去。董卓安然撤离了洛阳，将皇帝劫持到更加安全的关中地区。

就在董卓以为掌控了局势时，内部的冲突却决定了他的命运：司徒王允与董卓的部下吕布合谋杀掉了他。但董卓的几员大将郭汜、李傕、樊稠等人继续将关中搅得鸡犬不宁。

当初征讨董卓的将领，乘着董卓死后的大乱，纷纷割据变成了军阀，他们主宰了中国随后几十年的命运。

东汉末年的军阀又可以分为新军阀和老军阀。所谓老军阀，指的是从汉灵帝时期的一项政策中受益的军阀。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灵帝在他死前一年，设立了一个叫州牧的职位。

所谓州牧，是对光武帝政策的一次反动。光武帝刘秀为了防止地方反抗中央，故意剥夺了地方政府的军权，又削弱了地方行政官员的权力。这种做法在和平时期还看不出有什么危害，可一旦进入战争，立刻显得极其笨重。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政府发现官僚结构完全缺乏效率。军事官员、财政官员、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层层叠叠，每一个官员都想着如何守住地盘，防止别人侵犯自己的领地。从政府调拨来的财政支出成了各个官员的肥肉，你争我夺，却忘了敌人就在眼前，结果自然是屡吃败仗。

针对这样的局面，太常刘焉随即提出，皇帝应该设立一个新的职务，将一个地方的财政、军政权力统一授予同一个人，由他来整合调拨各种资源。在皇帝过问地方事务时，只需拿这个官员是问，再由他确定其他官员的责任。而投入该地的财政和军事资源，也由这个官员统一分配。

刘焉的提议得到了灵帝的赞同，州牧这个职位就这样出现了。

在东汉，州相当于现在的省，即仅次于中央的下一级单位。原本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刺史，刺史最初主管监察，后来也管行政，而州牧就是刺史的加强版，将军事职能赋予刺史，同时给他更多的资源调拨权。

并非每个州都立刻设立州牧，有的州只有刺史，有的州则由州牧管理，全凭当时的情况需要来决定。

一些关键州设立的州牧，就成了东汉末年的第一代军阀。比如，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刘虞，徐州的陶谦，冀州的韩馥，都属于第一代州牧出身的军阀。其中刘焉是州牧政策的提出者，又被封往益州，他的地盘后来被刘备所夺，成了蜀汉的根据地。刘虞的部下公孙瓒也可以算作这一代军阀，他先是取代刘虞占据了幽州，后又被袁绍所灭。

除了这些老军阀之外，另一批新军阀则出自反对董卓的各位将领，他们虽然在反董卓上徒劳无功，却借助由此聚集起来的军队，与老军阀展开了角逐，最终成了佼佼者。

这些新军阀，包括袁绍、袁术、曹操、孙坚、刘备等人。三国形成的过程，就是新军阀如何取代老军阀，再在新军阀中展开混战，最终只剩三家的过程。

除了这两个来源之外，东部的军阀中还有一家不得不提，他是原来董卓的将领吕布，在董卓失败后，参与了东部的角逐，并最终被曹操击败。

表3　东汉末年的主要军阀[3]

姓 名	地 域	兴亡经过
刘焉、刘璋	益州	公元188年被封为益州牧，公元214年，益州被刘备夺取
刘虞	幽州	汉室宗亲。公元188年任幽州牧。颇得人望，群雄曾有意推举刘虞为皇帝。公元193年为公孙瓒所杀，幽州亦被公孙瓒夺取
董卓	司隶	公元189年，受大将军

		何进所招前往洛阳，控制了朝政，造成了天下大乱。公元192年被杀
袁术	荆州南阳、豫州	公元189年占据荆州南阳地区，后前往豫州。公元197年称帝，两年后死亡。豫州被曹操、孙权分割
陶谦	徐州	公元189年封徐州牧。公元194年死后将徐州赠予刘备
公孙度、公孙渊	辽东	公元189年封辽东太守，传四代。孙公孙渊建立燕政权。公元238年，公孙渊被魏国击杀，辽东归魏
韩馥	冀州	公元189年封冀州牧。公元191年将冀州让与袁绍
刘岱	兖州	公元189年封兖州刺史。公元192年为黄巾军所杀，兖州随后被曹操收复
刘表、刘琮	荆州	公元190年封荆州刺史，公元208年，刘琮投降曹操
袁绍	冀州、并州、幽州、青州	公元191年从韩馥手中获得冀州，后进占并州。公元199年击败公孙瓒，获得幽州、青州。公元200年官渡之战，败于曹操。公元202年死亡。冀州、并

		州、幽州、青州归曹操
张鲁	汉中	公元191年夺取汉中。公元215年投降曹操。汉中先归曹操，后被刘备所得
曹操	兖州、徐州、豫州、司隶、冀州、青州、并州、幽州、荆州北部、扬州北部、凉州	公元192年从韩馥手中获得兖州。公元194年被吕布所袭，只剩三城，后克复。公元196年迎汉献帝，控制司隶。公元198年，击斩占据了徐州的吕布，获得徐州。公元199年袁术死，曹操获得豫州。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击败袁绍，随后获得了冀州、青州、并州、幽州。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占据荆州、扬州北部，无法南下。公元211年，击败马超、韩遂，获得凉州。公元215年，击败张鲁取得汉中。公元217年，败给刘备，丢失汉中
韩遂、马腾、马超	凉州	公元192年，原本凉州叛乱头子韩遂被封为镇西将军，马腾被封为征西将军，继续盘踞凉州。公元211年，曹操平定凉州。公元212年马腾被杀，公元215年韩遂被杀。马超成为蜀

		汉大将。凉州归曹操
公孙瓒	幽州、青州	公元193年击败刘虞控制幽州。亲信田楷控制青州。公元199年为袁绍击败自焚。幽州、青州归袁绍
吕布	兖州、徐州	公元194年袭击曹操获得大部分兖州，后被曹操重新夺回。公元195年，击败刘备获得徐州。公元198年，为曹操所败身死。徐州归曹操
刘备	徐州、荆州、益州	公元194年，陶谦将徐州赠予刘备。公元195年，败于吕布，丢失徐州。公元208年，赤壁之战，获得荆州南部。公元214年，击败刘璋获得益州。公元215年，与孙权协议，将荆州南部湘江以东的土地还给孙权。公元219年，击败曹操获得汉中。公元219年，关羽兵败，荆州丢失。公元222年，复仇未成，仅剩益州
孙策、孙权	江东、荆州	公元194年，孙策进军江东。公元200年，击败黄祖，进军赣江流域。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公元215年，从

刘备手中获得湘江东部的荆州地区。公元219年和222年，两败蜀汉，获得整个荆州南部

在这所有的军阀中，经过混战，在东部的北方逐渐强大的是袁绍和曹操两家。袁绍在伐董卓失败后，率军取代了韩馥，进占冀州（主体在现河北省南部），成了冀州牧。在当时，也恰好是幽州的公孙瓒取代原来的州牧刘虞之时，公孙瓒杀掉了德高望重的刘虞，又借助镇压青州黄巾军的机会，占据了青州（主体在现山东省东部），派遣他的大将田楷担任青州刺史，势力跨幽、青两州。

袁绍在占领了冀州之后，又进军群龙无首的并州（主体在现山西省），将中原屋脊的并州收入囊中，派遣外甥高干担任并州刺史。

随即而来的是袁绍与公孙瓒的对决，他们各据两州，缠斗不止。最终，袁绍击败了公孙瓒，成了四州的首领。在全国的十三州中，已经有了将近三分之一。

在袁绍之南，曹操也在快速地扩张。

曹操在讨伐董卓失败后，乘青州黄巾军进攻兖州（现山东、河南、河北、江苏交界地带）的机会，获得了兖州的统治权。在兖州的北方，是袁绍的冀州、并州，公孙瓒的幽州、青州；在东南方，是陶谦的徐州（主体在现山东、江苏交界地带）；南方是袁术占领的豫州（主体在现河南中南部）；西方则是相当于首都直辖区的司隶校尉部（包括洛阳和长安所在的平原，以及两者的连接部，当时由董卓的余党所控制）。

在周边的区域中，徐州由于没有遭到兵乱，最富裕也最有后勤价值。曹操随后对徐州展开了进攻。

曹操没有想到，当他进攻徐州的陶谦时，流浪军阀吕布却从背后袭击了曹操的兖州，只有三座城市（范县、东阿和鄄城）没有投降吕布。而徐州牧陶谦死后，将州牧的职位让给了投靠他的刘备，兖州和徐州的形势为之一变。

曹操随后与吕布展开搏杀，收复兖州的同时，将袁术所据豫州的一部分北方领土也一并占领，而这部分领土中包括了后来魏国的都城许昌。

曹操定都许昌时，关中的董卓旧将郭汜、李傕等人展开了内讧，汉献帝借助内讧的机会逃出了他们的控制，在杨奉、韩暹、董承等人的帮助下，从长安迁往洛阳。到达洛阳后，汉献帝发现曾经的首都变成了一片废墟，百官公卿连饭都吃不上，皇帝都只能吃野菜为生。

在当时，皇帝已经成了烫手山芋，谁得到了他，意味着立刻成为周围军阀的攻击对象。各个军阀都认定汉代天下已经完蛋了，接下来只是谁来取代他，谁也不肯接受这个皇帝。

曹操接受了荀彧的建议，派兵获得了献帝的监护权，并将献帝迁往了他的首都许昌。

此时，曹操的相邻对手有三个：第一，占据了徐州的吕布；第二，一个曾经身为董卓旧部的张绣占据了南阳盆地；第三，以寿春（现安徽寿县）为中心的袁术还控制着豫州的一部分，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流域的扬州（十三州之一）。

曹操对三者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张绣，先是以军事为主，后来则以政治手段收编了张绣。吕布逃出兖州后，从刘备手中抢走了徐州，继续与曹操对抗，是最直接的大敌，被曹操击败、俘获、斩首。剩下的袁术缺乏战略，又生活堕落，在曹操获得汉献帝后，袁术试图自己称帝，最终被曹操击败。

经过对周边地区的吞并，曹操一跃成了与袁绍并肩的军阀，拥有了兖州、徐州，以及豫州的大部、司隶校尉部的一部分。整个中原地区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两个人之手。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以袁绍攻击曹操开端，双方的战争正式拉开帷幕。主战场在黄河与支流济水之间。在中国古代，济水是黄河的一条主要支流，现在却已经不见了踪影。东汉时期，济水上最主

要的渡口叫官渡（现河南省中牟县境内）。

在这场战争中，袁绍是兵力更强的一方，同时拥有着地理的优势，将曹操压缩到济水边上，处于背水的位置。如果按照实力对比，失败的将是曹操。

但决定了战争成败的却是双方对于后勤的态度。

在三国时期，曹操是最注重后勤和粮食的军阀，而袁绍却相反，是最不注重后勤的军阀之一。实际上，三国时期，由于军阀众多，战乱频仍，人们最缺乏的是粮食。

各个军阀都吃过后勤的苦头。董卓为了筹集军费，将秦始皇时期留下的铜人都熔化了铸钱，但最后却发现有钱买不到粮食。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曹操是最先意识到粮草重要性，开始有计划进行屯田收集粮食的。袁绍对于粮食和后勤工作的忽略，让曹操找到了可乘之机。

官渡之战中，最先乏粮的是曹操。但他从战俘口中审出了袁绍运粮车队的行踪，出兵袭击了车队，造成袁绍军队也缺乏粮食。

随后，袁绍的属下许攸投降曹操，将袁绍辎重基地（在乌巢）的位置透露给了曹操。虽然袁绍已经吃了后勤的亏，但没有长记性，仍然没有对乌巢的后勤基地做太多的防范，导致曹操烧毁了袁军辎重。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曹操进攻他的后勤时，袁绍想到的还是进攻，趁曹操没有回来，完成袭击。虽然他派出一支兵马救助辎重，但重头部队却仍然放在了袭击曹营上。不幸的是，一旦曹操击破了袁绍的辎重部队和援军，那些进攻曹营的袁军不仅没有完成任务，反而投降了曹操。

袁绍军破后，曹操又用了七年时间，才最终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和袁熙均被击败，死于辽东。

到这时，曹操已经统一了整个华北地区。关中地区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掌握在几个小军阀韩遂、马超、张鲁手中。按照后汉光武帝的战

略，一旦获得了华北，就应该扫荡东部，将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权收服，在东部安定后，西部军阀将不可撼动曹操的优势。

根据之前的经验，荆州和江东一直是作为中原的附属而存在的，并不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曹操降服这两个地方不应该太困难。

但这一次，南方却第一次成了北方的对手。

张竑与孙策：一代霸主的江东战略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拜访了正在江都（现江苏扬州）家中赋闲的一代名士张竑，向他请教未来的选择。张竑的回答将江东这一片土地从中原的附庸变成了与中原对抗的堡垒。这位年轻人，就是东吴江山的实际开拓者——讨逆将军孙策。

东汉末年群雄起兵对抗董卓时，大部分都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有两人拼尽全力与董卓对战，一个是曹操，另一个是孙坚，也就是孙策的父亲。

孙坚是三国时期最被低估的人之一，曾封破虏将军，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他在袁术麾下担任豫州刺史，率军进攻董卓九死一生，攻克了洛阳。董卓被迫撤出了洛阳，向关中退却。在《三国演义》中，人们津津乐道“关公温酒斩华雄”的故事，但实际上华雄是孙坚在讨伐董卓时斩杀的。

就在孙坚准备向关中进发时，讨董军队内部出现了裂痕，袁绍派军袭击了孙坚所在的豫州，断绝了他的粮道。孙坚仰天长叹，被迫退兵。他的撤退给董卓留下了空当，董卓从容不迫地撤入了关中，再分兵把守险要。勤王军队失败。

在群雄割据的时代，孙坚一直是袁术得力的战将。当北方的曹操和袁绍扩充实力时，南方的袁术（豫州）和刘表（荆州）也打得不亦乐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接受袁术的命令，征讨荆州的刘表，在襄阳一带大战。孙坚被暗箭射杀，功亏一篑，死时只有三十七岁。

孙坚死后，他的军队被袁术收编。长子孙策居住在江都，拜访了生活在这里的张竑，向他请教，张竑推脱再三，最终被他感动，提出了建议：投靠丹杨（现江苏省丹阳市）的舅舅吴景，再以此为基地将江东的土地一一占领，接着顺长江而上，攻占荆州，为父亲报仇。占领荆州之

后，孙策就可以倚靠长江，向北方进攻，匡复汉室。(4)

张竑的话就成了孙策日后进军江东的战略路线图，这也是长江第一次成为影响中国命运的战略天险。张竑提出的构想实际上早于诸葛亮，可以视为《隆中对》的先声。

在秦汉时期，一旦统一战争打到了长江，就进入了尾声阶段。由于长江以南的经济繁荣程度远低于中原，中国人大都将这里视为蛮夷之地，只有在统一了中原之后，再顺便来收拾一下江南。但张竑却意识到，随着东汉经济的发展，江南特别是江东地区已经足够发达，可以支撑得起一个割据政权，甚至可以用来作为反攻中原的基地。张竑作为最早意识到江东价值的人，成就了孙氏数代的霸业。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江西九江开始，长江转而向东北方向流淌，经过安庆、芜湖、马鞍山、南京，到达镇江。这一段长江将土地分成了东南和西北两块，而处于东南的一块也被称为江东。

江东的战略中心，也是最突出部，在南京一带。而为了守卫南京，两个战略要道分别位于东侧的镇江和西南侧的马鞍山。镇江和马鞍山也分别对应着两条江淮之间最重要的古代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从寿春（现安徽寿县），沿着巢湖和淝水形成的水道，直达长江，入江口恰好在马鞍山附近的采石矶一带。从这里，可以沿水路或者陆路抵达南京。

第二条道路是从淮河进入春秋时期开凿的一条古运河——邗沟（也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到达扬州，再过长江到达镇江，因此，镇江成了进入南京的门户之一。

孙策的战略目标是：扎根于南京一带，并向南略地，占领当年吴越的土地，也就是现在的苏州、杭州一带。利用这一带的资源，形成割据局面。再从南京沿长江向上游进发，进攻柴桑（现江西省九江），获得柴桑后，再沿赣江南下占据豫章（现江西省南昌），江西的地貌是一个类似于簸箕的结构，南、东、西三面都是山，北面簸箕口朝向长江，中间是赣江冲刷的平地。这里只要开发出来，也是不错的鱼米之乡。

获得了江西的赣江平原后，再继续向长江上游前进，征服荆州，获得两湖盆地。

如果孙氏能同时获得江东、赣江盆地、两湖盆地，就占据了三大粮食基地，足以养活数量庞大的军队，与曹操的华北平原、关中平原大小不相上下。而双方争夺的区域将是四川盆地和淮河平原。孙氏退可以成为一代霸主，进可以统一全国。

更幸运的是，张竑遇到了一位行动力很强的人来执行他的战略。

为了实现目标，孙策试图向袁术借兵，他得到的帮助却极其有限。孙策大失所望，认识到袁术无法成就大事。他率领父亲的老部下周瑜、黄盖、程普等，从当涂（在现马鞍山附近）渡江后，依靠舅舅吴景的帮助，展开了统一江东的战争。

他首先击溃了盘踞在曲阿（现属于江苏省丹阳市）的扬州刺史刘繇，再长途奔袭，袭击了吴郡（现江苏苏州）和会稽（现浙江绍兴）之间的固陵（现浙江萧山区）。固陵的地理位置恰好将吴郡和会稽分开，而吴郡和会稽分别由吴郡太守许贡和会稽太守王朗占据，对孙策持敌对态度。拿到了固陵，就切断了两地的联系，随后，两地被孙策各个击破。

占据了长江下游，孙策开始顺江而上，向豫章（现江西南昌）、夏口（现湖北武汉）方向前进，经过苦战，占领了豫章。在向长江中游进军的过程中，孙策的将军们对长江的地理位置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是他们在赤壁之战中能够精确卡位，战胜曹操的关键因素之一。

孙策与父亲一样，除了骁勇善战之外，还时刻不忘恢复汉室。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恰逢中原地区曹操与袁绍大决战之时，曹操为了拉拢孙策，避免两线作战，将弟弟的女儿嫁给了孙策的小弟孙匡，又为自己的儿子曹章娶了孙氏的女儿。经过一系列的拉拢，曹操以为孙策暂时不构成威胁了。

他不知道的是，孙策一面与曹操虚与委蛇，一面又暗自厉兵秣马，他的目标很明确：进攻许昌，迎接汉献帝。

但就在孙策做军事准备的时候，一个刺客杀死了他。[5]他进军中原的梦想也随之东流，江东的江山留给了弟弟孙权。

粉面书生的千年之对

曹操坚持北方战略，先统一北方再进行南攻。孙策坚持江东战略，先统一江东，再顺江而上，夺取一个个战略要地，最后进攻北方。这两个战略都是逻辑上自洽的，如果能够得到人和与天时，都有成功的可能性。

而在荆州的小地方新野，局促的小军阀刘备正在拜访毛头小伙诸葛亮。

与刘备的坎坷经历相比，诸葛亮的前半生过得较为平静。他是山东琅琊（现山东临沂）人，由于父亲早死，他跟着叔父豫章（现江西南昌）太守诸葛玄到了任所。但随后，汉朝选择了另一个人代替诸葛玄任太守，诸葛玄带着侄儿来到荆州，投靠刘表。

古人从江西到荆州，走的是水路，顺着赣江进入长江，再溯江而上到达荆州。由于有这样的经历，诸葛亮对于从九江（柴桑）到武汉（夏口）再到荆州一段的水路也有所了解，这可能是他唯一的实际经验。

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在襄阳和南阳之间的隆中居住，等待机会。他为人高调，自比于管仲、乐毅，却由于没有实务经验而受人轻视。在刘备拜访他的当年，他虚岁也只有二十七岁。

一边是落魄军阀，一边是愣头小子，两人的相见又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历史往往就是在这不经意间完成转折。

落拓一生的刘备之所以如此颠沛流离，在于他缺乏整体性的构想。他不断地寻找可以依附的势力，辗转于战争的间隙。他很少有时间考虑如何获得一块长期的根据地，如何经营自己的势力，而不是仰仗别人的鼻息。在他前半生的绝大部分时光，他都是作为别的军阀的附属品而存

在的，公孙瓒、田楷、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人都习惯于将他看作手下来使唤。时间长了，他虽然保持着成为老大的野心，却缺乏老大的视野和能力，以及独当一面的勇气。

他唯一一次独当一面，是陶谦死时把徐州牧让给他。不幸的是，他证明了自己的确没有当老大的实力，很快把徐州输给了吕布。

当然，徐州之所以这么快丧失，也因为这里并不适合作为根据地。一个完美的战略要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拥有足够多的肥沃土地，生产粮食作为军备；第二，拥有强大的地理条件作为防守。徐州地处江苏大平原的北部，在汉末，这里河湖纵横，有利农业，符合第一个条件，但是，也正因为地处平原，徐州缺乏必要的军事屏障，反而由于富庶成了各方军阀争夺的对象。只是在首府徐州城附近有些许起伏的小山，却不足以成为定都的条件。

西楚霸王项羽的遭遇已经证明，任何占领徐州的人都无法建立王朝，刘备也不例外，就连驱赶了刘备的吕布，不管他怎样英勇，也无法守住这片土地。徐州成了众多英雄豪杰梦想的墓地。

辗转一生的刘备到荆州时，仍然是丧家之犬。在北方，强大的曹操统一了中原。在长江下游，孙权也坐稳了江山。荆州、益州（四川）两大军阀刘表和刘璋也貌似稳固。此刻的刘备仍然没有表现出战略头脑，他满脑子里想的，还是直接攻击北方的曹操。

就在他会晤诸葛亮的同一年，在北方，曹操远征北方的少数民族乌丸，刘备听说后，立刻请求刘表赶快攻打曹操的许都，被刘表忽视。

后人对刘表的评价一直不高，认为他缺乏勇气和头脑，但至少刘表知道自己占领的荆州无法和强大的中原直接对抗，如果贸然出兵，必然和吕布、袁绍等人一样，被曹操消灭，或者如刘备一样丧失根据地，成为丧家之犬。

刘备缺乏战略性思维的缺陷却由于他遇到了诸葛亮得以弥补。诸葛亮提出的建议也让人第一次见识了这个年轻战略家的风采。

与刘备念念不忘的北伐相比，诸葛亮建议他先忘掉北伐，而是掉头向南和向西，占据在当时人看来最边角的土地。他的战略包括几个层次：

第一，首先肯定曹操和孙权的优势地位，暂时不与他们争锋。

第二，曹操和孙权又是不同的，相对于曹操，孙权的南方战略刚刚完成了一半，占领了江东和赣江盆地，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占领两湖（那要打败刘表）。可以说，孙权也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是刘备的联合力量。[6]实际上，后来的历史证明，蜀国的发展依赖于与吴国的和平友好，一旦闹翻，蜀国就会立刻陷入被动之中。

第三，既然暂时不与魏、吴争锋，那么又怎么发展呢？诸葛亮战略的核心放在了两个地方：荆州和益州（四川），只要占有了这两个地方，未来就有可能进攻中原，统一全国。这两个地方只要有一个丢失了，就基本上丧失了统一全中国的可能性。

人们往往理解四川为什么重要：这是一个完美的盆地，周围一圈全是高山，要想进攻四川，在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行：一条是从荆州坐船沿长江而上，进入四川盆地；另一条是走古代的蜀道，从陕西翻越秦岭和大巴山进入四川。

但这两条路都相当难走，只要把守得当，几乎是固若金汤。

先说长江道，古代的船只只能靠人力和风力，顺水而下时容易，逆水时却非常困难，加上入蜀必须经过狭窄湍急的长江三峡地区，更增加了难度。历史上只有东汉光武帝成功地从这条路打入四川，但还是在四川被昏聩的公孙述占领的情况下。

至于从陕西出发的道路，不仅仅有古人遇到的各个峻峰险阻、玄关栈道，在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陕西地区是东汉末年受兵灾最严重的地区，根本无法供应军队粮食，曹操很难从这个方向发动持久的进攻。

另外，四川还有一个特殊的属地——汉中。占领了四川，就容易占领汉中，而汉高祖当年就是从四川和汉中起家的。

同时，四川和汉中都是大粮仓，特别是东汉时期经济发展，四川的粮食产量更加提高，使得这里成了天府之国，即便无法统一中原，也可以建立起不错的小王国过日子。

不过，如果仅仅占领四川和汉中，仍然是不够的。接下来，就要看荆州在诸葛亮战略中的重要性了。而这一点，也是人们很少了解的。

可以这样断言：四川是一个守成之地，有了它，就有了根据地，但荆州却是统一之地，有了它，才能够统一全国。

荆州的意义在于：这里是当时全国的交通枢纽，是从长江通往中原的高速公路。要想最终打败曹操，必须从荆州出发，才能最快地入侵中原。

三国时期，从曹操所在的中原地区向南到达长江流域，由于两者之间西部山岭纵横，东部河流密布，可以走的道路并不多。

在陕西与四川、湖北之间，横亘着庞大的秦岭；在河南与湖北之间，则是外方山、熊耳山、大别山等一系列的山脉；在江苏境内，虽然没有了山，却是沼泽遍布的地方，并不利于行军。如今的江苏是大平原地貌，但在一千多年前，却是难以通行的湖沼地貌。

在山脉的缝隙里，以及东部沼泽里，古人们探寻到的通道不外三条，这三条道路在本书的《楔子》里已经有说明，这里不妨回顾一下。

三条通道分别是：第一，从陕西经过汉中入蜀的道路（西线）。第二，从南阳到襄阳、荆州的道路，也被称为方城隘道或者南襄隘道（中线）。第三，淮河平原通道，这条路又可以细分为两条支路：第一条支路围绕着寿春、合肥，经过巢湖到达马鞍山附近渡过长江（东一支线）；第二条支路从徐州向南，跨过淮河到达扬州附近渡过长江（东二支线）。

这四条道路中，最具有意义的是第二条南襄隘道，也就是中原通荆州道。在东汉与三国时期，广义的荆州包括了如今的湖北和湖南。这两个省的地形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盆地：在盆地的北面，是与河南交界的一连串山脉；盆地的西面，则是秦岭、大巴山、荆山等巨大山脉，

把两湖与陕西、四川、重庆、贵州隔开；盆地的南面是南岭，与广东、广西分开；盆地的东面是罗霄山脉，与江西分界。在盆地的中央，浩荡的长江一穿而过，成了沟通东西的要道，顺着长江，西可以进入四川，东可以到达南京。

在盆地的北方，造物主形成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孔道通往中原。从荆州北上南阳后，在南阳下属的方城（现河南方城县），在万山丛中恰好有一条平坦的通道，可以到达许昌、洛阳一带，这里也就成了自古以来进入中原最重要的孔道。在春秋的楚国时期，这条孔道就已经被广泛使用。

南（阳）襄（阳）地区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南可通荆州，北可达中原，西可入关中。荆州又是下一个十字路口，南方通往湖南，东方通往江西、江苏，西可达四川。南阳、襄阳、荆州，就共同构成了进攻中原的最好跳板。

根据诸葛亮的计策，刘备必须同时拥有四川和荆州，才能利用四川为基地生产足够的军需，同时利用荆州的地理条件北伐，完成统一大业。缺乏了荆州，就只能满足于偏安一隅，无法顾及天下了。

更对刘备有利的是，在他与诸葛亮见面时，荆州和益州这两个地方恰好都掌握在软弱的人手中。荆州的刘表是个聪明人，但没有并吞天下的野心，只想如何苟活下去。他不断地摇摆着，既想保持独立性，又倾向于投靠曹操。而益州的刘璋则更是昏弱不堪，依靠着父亲的庇荫才获得了不该拥有的地位。

诸葛亮认为，刘备此时应该考虑先夺取刘表的地盘，同时和东吴的孙权保持友好关系，再向西发展，击败刘璋获得益州。另外，在汉中地区盘踞的是早期道教组织五斗米道的军阀张鲁，只要获得了四川，以四川为基地进攻汉中也是很有把握的。

如果能够将四川、荆州和汉中同时拿下，那么也就掌握了从四川进入陕西的孔道，以及南襄走廊，从这两个地方同时发兵，形成钳形攻势，就可以进军中原了。

这就是诸葛亮《隆中对》的实质。在当时，当群雄醉心于争夺中原时，只有少数人从更大的角度看待问题，发现了四川、荆州、汉中等地区在全国战略中的重要性，而诸葛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当然，四川、荆州、汉中不仅对刘备，对曹操和孙权也同样具有决定意义。在孙策拜访张竑时，张竑已经将东吴的策略说得很透彻：先占领南京一带，再向上推进占领荆州，然后进攻四川，最后向北推进，进入中原。

孙权如果能获得荆州和四川，就统一了南方，以江东平原、赣江谷地、两湖盆地和四川盆地，加上汉中小盆地的资源，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北方，足以一争天下。

而荆州和四川对曹操也有着很大的战略意义，如果曹操占领了它们，则拥有了进攻四川和东吴的交通要道，后来的西晋就是借助这样的优势击败东吴的。

江东战略和“隆中对”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南方对北方的一次战略逆袭。在此之前，北方一直是中国军事战略的重心，人们心目中的战略重点都放在了北部。自从张竑等人提出长江的价值，以及诸葛亮发现了荆州的枢纽地位，并提出从南向北发展的统一理论后，南方正式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与北方并驾齐驱了。

但是，诸葛亮的理论到这时仍然是纸上谈兵，刘备也只不过是一座小城市的守将而已，根本没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资本。

第二年，荆州刘表去世，他的儿子刘琮随即投降了曹操，使得刘备遭遇了当头一棒。不甘心落入曹操之手的他只好逃离了新野，再次开始了逃难生涯……

赤壁之战：长江防线进入历史

诸葛亮提出西进、南进战略，暂时对刘备的处境没有丝毫的改变。

这位心怀大志的流浪诸侯仍然守在新野一座孤城里。虽然他依附于刘表，刘表对他也颇为照顾。但刘表又对他充满了防备之心，避免他夺取更大的地盘。在北方就是虎视眈眈的曹操，随时准备南下统一中国。

曹操的机会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出现，这一年，刘表去世，他的小儿子刘琮继承了州牧的职位，驻扎荆州。在樊亭侯蒯越、从事中郎韩嵩、东曹掾傅巽等人的劝说下，刘琮决定投降曹操。

在投降之前，刘琮并没有向刘备说明情况，直到曹操率军到了南阳，当时守在樊城的刘备才知道南方的刘琮已经投降，仓皇逃走。

此刻，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也经历了一场最大的危机：如果荆州被曹操并吞，意味着曹操已经获得了南襄走廊的主导权，并且切断了刘备西进四川的道路。“隆中对”战略从此无从谈起，刘备毕生只能作为流寇四处逃窜。

更要命的是，刘备不合时机的义气也恰好发作了。为了挽救“隆中对”战略，诸葛亮向刘备进言，直接向南攻打荆州的刘琮，如果能够夺取荆州，那么还有可能抗拒曹操的进攻。然而刘备却认为当初刘表对自己不薄，不忍心进攻他的儿子，再一次丧失了可以据有荆州的机会。

在荆州城的百姓听说曹操到了，十多万人跟在刘备的后面一起逃走。这些百姓和士兵拥挤在一起，拖慢了刘备逃窜的速度。曹操派遣五千精锐部队以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的速度在后面追击。最初刘备还舍不得把跟随他的民众散兵抛弃，但在曹操的追击之下，到了当阳的长坂坡，刘备最终连老婆孩子都抛弃，骑马带着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几十人逃走。

然而他们能够逃到哪里去？刘备的意图是去广西投靠苍梧（现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太守吴巨，苍梧靠近广东，属于中国的边缘地带，

缺乏足够的战略空间建立强大的政权。一旦进入苍梧，也就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但这时，一位东吴的使节挽救了刘备的政治命运。这位使节就是鲁肃。

鲁肃是孙权派来吊唁刘表的。他所带的使命是：打探刘表死后荆州的动向，如果刘表的儿子能和刘备同心协力抗击曹操，就安抚他们，与他们联合。如果荆州四分五裂，东吴就乘机插手。

在鲁肃的战略中，同样把荆州看作一块要地，只要东吴获得了荆州，就可以控制南襄走廊，获得向北进军的通道；而如果丢掉了荆州，那么孙权所占领的江东也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鲁肃到达夏口时，已经听说曹操挥军南下，准备进攻荆州。他到达南郡时，得到消息刘琮投降了曹操。鲁肃连忙去见刘备，在当阳的长坂坡迎上了他。鲁肃不顾刘备狼狈的境地，毅然邀请刘备共同抗曹。

除了鲁肃之外，诸葛亮无意中的一步棋也挽救了刘备。

在刘表生前，由于他喜欢小儿子刘琮，令长子刘琦深感不安。刘琦向诸葛亮虚心请教如何自保，诸葛亮给他出主意：如果留在刘表身边，很可能会被阴谋所害，只有申请外派，离开刘表，才能自保。

刘琦按照诸葛亮的计策，向刘表申请外派到江夏（现湖北黄冈和武汉一带）担任太守，驻扎在如今叫武昌的夏口城。当弟弟刘琮投降曹操后，哥哥却决定抗曹守土。

诸葛亮与刘备，在鲁肃的陪伴下，逃到刘琦的夏口，在有了落脚点之后，开始筹划抗曹大计。

此刻，刘琦与刘备的兵力一共只有一万人，曹操的兵力有二十几万，[7]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必须与东吴军队联合，才有抗击曹操的可能性。诸葛亮和鲁肃匆匆前往东吴寻求联合。

在东吴，孙权身边恰好聚集了一批主战的将领，以周瑜、程普、鲁

肃、甘宁、吕蒙、黄盖等人为代表，诸葛亮的游说恰好点燃了孙权与这批将领心中的火焰，于是，孙刘联合成为现实，周瑜成了东吴军队的统帅。

这些将领大都参加过孙策在长江沿岸的征伐，对长江的熟悉程度远高于曹操，经过观察，周瑜将战略重心放在了武汉周边的长江地区。从如今的湖南省岳阳开始，到江西九江，长江形成了一个向北突出的三角地貌，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除了岳阳、九江之外，第三个（也是位于中间的一个）则在武汉附近。

由于曹操的军队大都来自北方，不善于走水路，这个三角形构成的陆路通道就成了东吴的东方锁钥。曹操大军可以在岳阳下游的某个地点渡江，然后走陆路横穿现今的湖南境内，到达九江后，再顺江而下攻击南京，或者顺赣江而上，进攻南昌，逐渐压缩东吴的生存空间。

在岳阳下游，最佳的登陆地点位于一个叫作陆溪口（现湖北省嘉鱼县陆溪镇）的地方，这里有一条河流入长江，形成了一小片平地。在陆溪的西南方，有一片江边峭壁，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赤壁了。

陆溪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古代的长江两岸大都是沼泽湖泊地貌，行军困难，只有陆溪口一带地形相对较为简单，又有一条通往柴桑（现江西省九江）的道路。

只要东吴能够守住陆溪口，一方面可以阻挡曹军的水军顺长江直下九江，又可以防止曹军登陆。对东吴军队更有利的是，在陆溪口的对岸，是一个叫作乌林的地方，这里遍布着烂泥塘，一旦曹军被迫在北岸登陆，就会陷入泥沼中行动困难。

除了陆溪口（和赤壁）这一个点之外，周瑜还必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防御。曹操除了从江陵（荆州）顺长江而下之外，还有一支军队从汉江上的襄阳而来，顺着汉江可以直接到达夏口（现湖北省武汉），这支军队准备直接攻击夏口。周瑜一方面抢在曹操之前占领了赤壁和陆溪口，另一方面又在夏口布防，阻挡从汉江而来的军队。

刘备则跟在了周瑜的后方，保存实力的同时又做好准备，一旦周瑜

胜利就参与进攻。

当周瑜与曹操的主力在长江相遇后，由于周瑜抢占了陆溪口和赤壁的南岸，曹操在一战不利的情况下，选择了江北岸的乌林下营。在相持中，由于发现曹操将所有战船用铁锁连接，周瑜利用黄盖的诈降，用小船将曹操的战船全部烧毁。

失去了战舰的曹军立刻陷入了江北的泥泞之中，刘备也乘机派人从小道绕到曹军的侧翼实行打击。

曹操九死一生逃回荆州后，面临周瑜和刘备的双重进攻，北撤回到了襄阳，将荆州的南部让给了敌人，而荆州北部（襄阳及其北方）则成了曹操的前线。双方在荆襄地区形成了拉锯战，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的三国模式。

赤壁之战，反映了长江防线的崛起。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长江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但随之形成的荆襄拉锯战，却反映了长江防线的另一个方面：长江防线固然重要，如果只是退缩到长江以南去防守却是极端危险的。事实上，长江防线的关键，在于一定要在江北控制足够的缓冲地，才能抵抗住北方的攻击。

在未来，守卫长江的关键在于襄阳和淮河流域，一旦襄阳和淮河流域失手，也意味着长江防线很可能会崩溃。所以，历代南北对峙政权争夺的焦点不在长江本身，而在于襄阳与淮河。

四川不再是附庸

历史上将赤壁之战视为南北战略的转折点，也是开启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模式的第一场战役。

对于刘备而言，这场战役的意义却是：它使得早已希望渺茫的“隆中对”战略复活了，荆州本来已经输给了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借助余勇，孙刘联军从曹操手中又夺回了荆州城和南襄走廊的南部。

由于诸葛亮的事先预置，当曹操战败，周瑜与曹操在江北周旋时，刘备乘机派兵将长江以南的四个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一一收入囊中，将现今湖南的南部地区变成了刘备的势力范围，加上在江夏的刘琦，刘备实际上控制了湖南、湖北的广大土地。

然而，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能看懂，实际上当时有一批人都看到了荆州所在的两湖盆地和四川的重要性。

在这些人中，对问题看得最清的是东吴都督周瑜。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周瑜被拿来反衬诸葛亮的智慧。但在实际历史中，周瑜的才智和能力却并不在诸葛亮之下。赤壁之战中，周瑜的火攻之计最终打败了曹操的水军。同样是周瑜对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有着最深刻的认识。

赤壁之战后，周瑜牢牢地将荆州的主城江陵控制在手，避免刘备在荆州的势力过大。当刘备希望获得更多的地盘时，周瑜仅仅是割了两个县给他，而战略地位最重要的江陵仍然归属东吴。

但周瑜的防范却被别人破坏了。当刘备向孙权提出要借荆州时，主张孙刘联合的鲁肃竟然力主将荆州借给刘备。于是，孙权调回了周瑜，刘备得到了荆州的主要区域。

鲁肃的目的是让刘备正面面对曹操，为东吴挡住曹操的进攻。却没有想到，将荆州借给刘备后，实际上也阻断了东吴进攻四川的通道。当年张竑提出的江东战略也不再完整，因为东吴丢失了两湖盆地，就只能

成为割据政权，无法做到统一中国了。

赤壁之战后不久，周瑜又对孙权提议分割刘备的势力。他认为，刘备是天下的枭雄，又有关羽、张飞的辅佐，必然不会久为人下。要想让刘备彻底屈服于东吴，只有把刘备迁到吴国去，给他建筑宫室，送给他美女，让他耽于享乐。同时，将张飞、关羽分开，让他们驻扎在不同的地方，置于东吴将领之间。只有这样，才能利用他们的价值，同时不会被他们所伤。而鲁肃提出的借给刘备荆州，并让他们合兵一处的做法，是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然而，孙权为了对付曹操，没有采纳周瑜的建议。

随后，周瑜再次提出了另一条战略：进攻四川。

在周瑜版的进攻四川中，将主动权掌握在东吴手中，由东吴合并刘焉，完成南方的统一，再进攻汉中的张鲁，掌握进入甘肃的道路，再与甘肃境内的马超联合，形成对陕西的大包围。夺取陕西后，就拥有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压迫中原的曹操并击败他。如果他的计策得以实现，势必意味着诸葛亮“隆中对”战略的失效。

孙刘双方围绕着到底谁来进攻四川，展开了一系列的钩心斗角。

最初，孙权提议由双方共同组成联军进攻四川。刘备认为，由于他处于中间位置，等攻下四川后，孙权很难越过他进行统治，四川必然是他刘备的，想答应下来。但荆州主簿殷观认为，孙权是想让刘备打头阵做牺牲，一旦攻打不下四川，刘备的实力势必被削弱了，会被孙权所乘机。刘备采纳了手下的建议，阳奉阴违赞扬孙权的提议，却不出兵。

当孙权准备独自攻打时，刘备开始威胁他，表示刘焉是自己的宗亲，不能放任别人伤害亲戚。他派遣关羽、张飞、诸葛亮各守要害，将所有的道路都卡死，避免吴军通过。

就算这样，刘备仍然无法抵挡周瑜并吞四川的决心。在孙权的许可下，周瑜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伐蜀行动来。

然而就在这时，上天帮助了刘备：在追击曹操的战斗中，周瑜被曹

仁的部队用箭射伤，身体一直不好，赤壁之战两年后，周瑜突然间死在了任所。周瑜死后，继任的恰好是主和派的鲁肃。东吴攻打四川的危险过去了，将四川留给了刘备和诸葛亮去征服。

与诸葛亮一样对四川重要性了如指掌的，还有刘备的军师中郎将庞统。在刘备所有的人马中，庞统是伐蜀最坚决的支持者。当刘备因为与刘璋的宗亲关系犹豫不决时，庞统却力主进军蜀地。

中原的形势再次帮助了刘备。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因为从东方进攻长江流域受阻，决定西进包抄。曹操的做法是：先进攻位于汉中的张鲁，在取得汉中之后，从北路进攻四川，一旦拥有了四川，就可以从长江上游向下游进攻。

在中国历史上，张鲁一直是一个异数。与欧洲不同，中国缺乏严格的政教合一政体。但有趣的是，张鲁却在三国的乱世中把握住机会，在汉中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他首先创立的是一个教会——五斗米教，这是一个带着黄巾精神的道教组织，再通过这个教会控制了地方政权，成了汉中的主宰。

曹操的军事行动让陕西（关中）地区的军阀产生了误解，这些军阀虽然都暂时承认了曹操的权威，却并不希望丢掉军队。当曹军借道陕西进攻汉中时，军阀们担心曹操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在马超和韩遂的旗帜下，关中军阀开始反叛。曹操用了一年时间，才击败了关中军阀，完成了关中地区的再统一。

曹操在陕西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四川刘璋的惊慌，他意识到，曹操一旦解决完陕西，就会顺势进攻汉中的张鲁，而汉中是四川的门户，一旦汉中丢失，曹军就会继续南进，拿下四川。这是秦汉以来中原和关中进军四川的常规步骤。

作为反击，刘璋必须赶在曹操之前拿下张鲁的汉中，做好防守，才能保护四川的门户。

但刘璋的军队早已习惯了四川的安逸环境，缺乏战斗力，必须引入

新的力量才能击败张鲁。别驾从事张松乘机劝刘璋借刘备的兵对付张鲁，放刘备入蜀。[8]刘璋派遣法正去迎接刘备。不想法正却做了内应，见到刘备后，向刘备陈述可以借机获得四川。

入蜀后，刘备带去数万大军，刘璋又给了他三万人，虽然庞统、法正等人力主直取刘璋，但磨不开面子的刘备还是率领着人马缓慢地向汉中进军。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出征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磨磨蹭蹭还没有到达汉中的刘备乘机向刘璋申请回军，双方开始起冲突。

刘璋杀了刘备在成都的内应张松，并下令关防不要让刘备通过。这正好给了刘备借口，他挥师向成都进军，同时命令除了关羽镇守荆州之外，诸葛亮、赵云、张飞等人都从荆州出发，沿长江进入四川，形成钳形攻势，双方的战争正式爆发。

这次战争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才告结束，刘璋出城投降，刘备占据了四川地区。在同时拥有了荆州和四川之后，诸葛亮的《隆中对》距离实现又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对诸葛亮战略的考验并没有就此结束，这次对刘备发难的不仅有老对手曹操，还包括他的盟友孙权。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就在刘备获取四川无暇顾及汉中之时，曹操对汉中发起了闪电战。这次战争从三月开始，曹操率军出现在通往汉中的陈仓道上，到七月已经攻克了汉中的中心南郑，将张鲁的军粮府库一窝端。张鲁逃往四川北部的巴中地区。

当年十一月，由于刘备对巴中的进军，张鲁再次逃窜，投降了曹操。作为一股势力，张鲁和他的五斗米道就此结束。刘备与曹操的边界也划在了金牛道的两端，曹操控制了汉中，刘备得到了巴中。

这样的结果对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是不利的。在战略中，蜀军必须占领汉中，才能以汉中为跳板进攻陕西地区，与荆州的关羽做配合

发动钳形攻势。失去了汉中，就没有了从西部北伐的落脚点。

就在曹操获得汉中的同时，东吴对刘备的发难也来了。当初刘备名义上是从孙权的手中借走了荆州，既然他占领了四川，有了根据地，孙权随即派人来索要荆州。

如果归还了荆州，刘备就丧失了从东部北伐的落脚点。由于汉中在曹操手中，荆州如果再给了孙权，统一中国就无从谈起。

为了拖延孙权的要求，刘备提出：只有当他从四川北上，获得了凉州（在现在的甘肃一带）时，才会归还荆州。

刘备的托词让孙权大怒。在与刘备打交道的过程中，孙权积累了一肚子怨气。早在进攻成都问题上，由于刘备一直欺骗孙权，孙权就气愤地咒骂："猾虏乃敢挟诈！"(9)

作为对策，孙权对刘备发动了有限攻势，派遣吕蒙向两湖盆地进攻，夺取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率军进入荆州，派遣关羽在益阳与东吴对峙。

此刻对于蜀汉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再次出现了重大考验，荆州和汉中缺一不可，而蜀汉却两面受敌，到底如何选择才能保证战略的顺利推进？

政治智慧最后一次保佑了刘备的政权。在诸葛亮、法正等人的努力下，刘备确定了继续联合东吴的政策。在荆州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以湘江为界将荆州划分成两半，其中江夏、长沙、桂阳所属的东区归东吴，南郡、零陵、武陵所属的西区归蜀汉。这样的划分既满足了一部分东吴的领土要求，又为刘备保留了北进的基地。作为南襄走廊最核心的南郡留给了他。

不过，由于湘江并非天险，以湘江划分的国界处于不稳定状态，任何一方想攻打另一方都很容易。这种不稳定的国界更加倚重于双方的和平诚意。任何一方如果另有企图，都会打破这种微妙的国界平衡，为未来留下隐患。

与东吴的纷争暂时解决后，法正劝刘备借曹魏内乱之时，向汉中进军。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是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最具有希望的一年。这一年，刘备从西部大举进攻汉中地区，而东部荆州的关羽也在准备北上抗曹。荆州和汉中这两个着力点形成的钳形攻势正在展现出威力。

第二年，刘备在汉中有了巨大的收获，曹操在汉中地区的主帅夏侯渊完败被斩，曹魏撤出汉中，刘备加冕汉中王。

这时可以将刘备与当年的刘邦做一个对比。刘邦也是封为汉王后，同时控制四川和关中，吹响了兼并天下的号角。刘备也和刘邦一样同时获得了汉中与四川。但刘邦时，天下一共有十九个王，是一团乱粥。而刘备时，天下三分，要想进攻就不容易了。

更何况这时的中原和江东都已经发展起来，要比当年的实力强大得多，四川和汉中在世界中的地位实际上下降了。

不过，刘备比刘邦多了一个荆州，也就多了一条进军中原的道路，使得他同样有希望统一天下。

与此同时，关羽以荆州南部为基地开始北伐，他的首要目标是南襄走廊上的襄阳和樊城，在这里，他水淹七军，斩魏军大将庞德，并迫使于禁投降。主将曹仁侥幸逃走。

如果攻下樊城，蜀军将径直北上南阳，打开走廊的北端，中原已经在朝着关羽招手。

钳形攻势显出了极大的威力。但就在这时，东吴的行动却让诸葛亮设计的奇谋战略功亏一篑，成为千年的遗憾……

(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2)《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英雄记曰：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

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

(3) 根据《三国志》与《后汉书》。

(4)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引《吴历》：“纮见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雠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於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

(5)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军队）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

(6)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7)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

(8)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璋曰：‘吾固忧之而未有计。’松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雠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

(9)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第六章 “隆中对”战略的失败：武侯伐岐山的是是非非（公元220—公元234年）

决定“隆中对”战略失败的，是吴蜀战略的冲突。吴国试图利用江东为基地统一南方，蜀国试图占据西南和中南，再反攻北方，这两个战略最多只有一个能够实现。当蜀国在实施“隆中对”战略时，吴国夺取荆州的计划，最终破坏了诸葛亮的全盘部署。

吴蜀虽然达成了划湘江而治的协议，但由于湘江不是天险，双方的边境是不稳定的，要么蜀国将吴国赶入赣江谷地，要么吴国将蜀国赶到四川，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边界。

丢掉了荆州，意味着蜀国北伐的钳形攻势丢掉了最主要的一钳，再也没有了统一全国的可能性。

丢掉荆州后，诸葛亮的北伐只能从汉中进攻关中。从汉中进攻关中的道路一共五条，诸葛亮的北伐就是在这五条道路中不断尝试、不断失败的过程。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选择了最西面的祁山道，从天水方向翻越陇山进入关中平原，以达到奇袭的效果。但由于马谡丢失了陇山道上著名的连接点街亭，造成蜀军无法翻越陇山，第一次北伐失败。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选择了陈仓道，仍然失败了。之后，魏国分三路进攻蜀国汉中，也失败了。巨大的秦岭对于双方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诸葛亮倒数第二次北伐，遭遇了司马懿的闭门不战。蜀军耗尽粮草，只能退军。这次退军，也证明，从四川和汉中单臂出击，几乎没有可能攻克关中。汉高祖乘三秦分裂夺取关中，只是孤例。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着重解决粮草问题，他采取了屯田的做法。但他的死亡为这次本有希望的进军画上了句号。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蜀汉的钳形攻势正撼动着曹魏的西南防线，年迈的曹操在保汉中还是保襄阳的选项中犹豫不决。这时，蜀汉的东线大将关羽收到了一位东吴年轻将领的书信，信中带着谦卑和仰慕的语气向老前辈致敬。这位年轻的将领就是陆逊。

陆逊之前，东吴的西线将官是老谋深算的吕蒙。正是吕蒙的偷袭，使得蜀汉失去了荆州东部、湘江以东的三个郡。然而，吕蒙的身体已经很差，孙权考虑到他的健康，将吕蒙调回了首都建业，用陆逊来取代他。

陆逊接替吕蒙后，立刻给关羽写信。在信中，他作为同盟，对关羽的功绩大加赞赏，将他比作晋文公和韩信，又千叮万嘱，让他小心曹军的阴谋，以求取得完胜。[(1)]

关羽收到陆逊的信，意识到东吴换这个毛孩子为将，是解除了东面的隐患。在吕蒙时，由于吕蒙是收复荆州的鹰派人士，关羽在向北进攻曹魏的襄阳、樊城时，并没有忘记在南面的公安和南郡留下大量的兵士，以防范吕蒙可能乘人之危。陆逊替代吕蒙后，由于北方战事久拖不决，向着不利于蜀汉的方向发展，关羽开始将南方的军队向北方调动，以求尽快结束北方的征伐。

随着北方战事的拉长，军队的粮草也成了大问题，关羽将南方的粮草储备也运往了北方。

但在做这些调动时，关羽并不知道东吴真正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吕蒙的病并没有严重到必须召回的程度。关羽一发动北伐，吕蒙立刻给孙权写信，主动要求召回。他这样做，正是希望关羽会放松警惕，而自己回到建业，更便于组织军队和后勤，以便完成一次奇袭。

在吕蒙回建业的途中，他遇到了一位青年。这位青年专程赶来看他，责问他为何在如此重要的关头离开岗位。

吕蒙回答：因为我病了。

这位青年立刻提议：既然你病了，关羽就会放松警惕，等你到了国都，请禀告君主，制定好计策来收复荆州。

吕蒙吃惊于青年的老练，但仍然托词说关羽英勇善战，又拥有人心，不容易攻打。

然而，吕蒙一见到孙权，立刻向他推荐这名叫陆逊的年轻人，让陆逊代替自己镇守东部。于是，诸葛亮精心设计的“隆中对”战略，在吕蒙与这位年轻人的手中拉响了警报……

蜀吴战略冲突与东线崩溃

吕蒙、陆逊等人之所以急于得到荆州，在于蜀国和吴国战略上的冲突。

在张竑和孙策设计江东战略时，取得了江东、赣江盆地后，第三步就是占据荆州所在的两湖盆地，第四步是从两湖跃进四川，从而获得整个南方地区，拥有了南部，就可以从关中地区包抄中原。

而在诸葛亮制订的“隆中对”战略中，荆州同样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意义。只有拥有荆州，才能够实行钳形战略，从双线夹攻北方的曹魏政权。

当蜀国和吴国同样把荆州当作核心战略时，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蜀国和吴国虽然达成了划湘江而治、平分两湖盆地的协议，但这个协议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由于湘江算不上天险，如果一方有图谋，很容易出其不意将对方赶出两湖地区。蜀国和吴国只要划江而治，就一定处于不稳定状态，必须随时防范对方。

对于吴国更紧迫的是：如果关羽北伐成功，蜀汉的实力就会得到极大的增强，到那时，湘江边界的不稳定将向着对蜀汉有利的方向演化，很可能未来的东吴会被迫退到罗霄山之后的江西赣江谷地之中，将两湖地区彻底让给蜀汉。

东吴要想巩固两湖地区，只有拿到了整个荆州，将蜀汉赶入三峡后面的四川盆地，依靠着雄峻的巴山阻隔，才能形成两国较为稳定的边界。

为了达到目的，孙权不惜与曹操暗通有无：一方面表示将帮助曹操进攻关羽，另一方面劝说曹操称天子。

陆逊赴任前方的同时，吕蒙在后方的建业开始准备袭蜀事宜，这是古代版本的一次珍珠港事件。大军由吕蒙亲自指挥，为了迷惑关羽，东吴的大军伪装成商船，由士兵穿上商人的白衣摇橹，其余的都伏在船舱中，不分昼夜地赶路。

关羽在长江沿岸设置了警卫哨。吴军每到一处哨卡，都利用伪装将哨内的兵士全部抓获，不让他们传出信息。

由于保密工作成功，直到吴军到达关羽的老巢南郡和公安，蜀军都没有发现吴军的到来。当吴军将江陵和公安围住时，吕蒙决定用智术取胜。他致信把守公安的将军士仁，伪称之所以能这么快、悄无声息地完成包围，就是因为有内应，如若不投降，就失去了最后存活的机会。士仁相信了吕蒙的话，在恐惧和彷徨之间选择了投降。吕蒙又依靠士仁劝降了江陵守军。

吕蒙不损耗一兵一卒，就端掉了关羽的大本营。入城后，他规定军士不得骚扰人民。对于蜀军的家属，更是优遇抚慰。关羽府邸的财宝都封存起来，等待孙权的到来。吕蒙日日夜夜拜访当地的老人、名士，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为他们看病拿药。

关羽听说大本营被端后，连忙派人前去查看，并和吕蒙有了书信往来。凡是关羽派来的人，吕蒙都丰盛地招待。这些信使看到城里井井有条，家家户户都照常过日子。关羽的军士得到家人无恙的消息，都归心似箭，再无斗志。军队还没有回到江陵，已经投降了大半。

关羽父子逃往麦城，被吴军断了后路，擒获后被杀害。关羽的头颅随即被孙权送往了曹魏。

关羽之死，不仅仅是蜀汉气运的转折点，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诸葛亮制定的战略从此残缺不全。失去了荆州，意味着蜀汉北伐的钳形攻势丢掉了那只主要的钳子。从荆州北上中原要比从汉中经过陕西，再过潼关的道路方便得多，本来是诸葛亮设想的主要进攻点。

荆州一失，对于蜀汉领土的连带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荆州是蜀汉三峡以东领土的中心，一旦这里丢失，意味着整个三峡以东领土都会慢

慢地被东吴蚕食。蜀汉必须退到四川一隅，要想从万山丛中找到东进和北伐的出路，已经不再现实了。

更麻烦的是，在关羽镇守荆州前期，对周围各地方的震慑作用已经出现了有利于蜀汉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被打断了。比如，在汉中到襄阳之间，有一条著名的水路相连——汉江。在汉江沿岸以及南侧的山地中，有一系列城市，如现在陕西省安康市在三国时期称为西城，是扼住了汉江的交通要道，在汉江以南的武当山中分布着房陵（现湖北省房县）、上庸（现湖北省竹山），都处于沟通长江与汉江的交通线上。当刘备势力在汉中地区扩张时，这些原本属于曹魏的城市纷纷投降了刘备。

一旦获得了这些城市，就可以将汉中与襄阳沟通起来，更利于从南阳方向进攻曹魏的首都许昌。

然而，关羽死后，不仅进攻襄阳成了泡影，就连荆州也失去了。西城、房陵、上庸等地都变成了蜀汉的飞地，于是矛盾立刻爆发，房陵、上庸等地相继重归魏国，从南阳进入蜀汉的道路被彻底封闭。

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称帝不久的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更为了夺回荆州的控制权，重新打通南襄隘道，率领大军从三峡进入湖北境内，向东吴所控制的荆州发起了攻击。

蜀汉群臣纷纷苦劝刘备不要出兵，都被刘备置之不理。诸葛亮、赵云等人由于不同意刘备的意见，都被留在了后方。刘备最宠爱的法正已经去世，诸葛亮事后回忆，如果法正还活着，就能劝说主公不要东行，就算一定要去，也不至于如此大败。

在准备出兵时，刘备开局不利：大将张飞被部将所杀。

此时，东吴方面的指挥官吕蒙已死，指挥权交给了年轻的陆逊。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东吴一方面继续向曹魏称臣，另一方面积极布防。

刘备出兵三峡后，首先占领了秭归，再继续东进，到了夷陵（现湖

北省宜昌），在夷陵之南的猇亭，他遭遇了东吴陆逊的主力军，双方形成了对峙。

就像赤壁之战时曹操为了图方便，将所有战船用铁链连接在一起，被东吴一把火烧光一样，刘备在这次战争中也留下了一处死穴。为了防御敌人的袭击，刘备在从秭归到猇亭之间设立了大批的军营，绵延七百里，又用树栅环绕，防止敌人偷袭。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七百里联营如同一个巨大的火把，一旦被火攻，将全军覆没。陆逊抓住了机会，火烧刘备联营，再调遣大军猛攻死打，将刘备军营一一攻破。

这次惨败，只是荆州之战的续篇。荆州之战注定了蜀汉守不住三峡以东的剩余土地，火烧连营只是实现了这个命运，让蜀汉丢掉了这些地区，重新划定了吴蜀边界。

蜀汉退回了四川盆地。从地理上讲，由于四川盆地与湖北平原之间山林密布，只有一条长江道可以通行，一旦双方把守好了边界，几乎都不可能攻入对方的领土。这里是比湘江更天然的一条边境线。

但如果放眼整个中国，就会发现，东吴与蜀汉的战争形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在中原地区，北方与南方的主要通道有三条，一条位于蜀国，是从陕西走汉中的通道；一条位于吴国，经过巢湖和淝水，中心在寿春的通道；第三条位于吴蜀冲突区，是荆州、襄阳到南阳的通道。

吴蜀战争之后，对蜀汉来说，失去了襄阳道，就失去了进攻北方一个最重要的前进据点，统一北方成了空谈。对东吴来讲，原本只需要承担巢淝通道的防御任务，现在突然要同时承担两条通道的防御，分散了兵力，加大了消耗。

其中又以蜀汉的损失更大。在战争前，蜀汉的军事策略基本上遵循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在刘备活着时，诸葛亮更多的使命是镇守成都，负责后勤工作。至于征战之事，具体实施则由刘备与关羽等驻外将军负责。刘备死后，接受了托孤重任的诸葛亮获得了掌管蜀汉政治、军事的全权。只是当他全盘负责时，蜀汉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一臂荆州，

腾挪空间瞬间局促。

可以说，到此时，诸葛亮制订的“隆中对”战略已经失败了。

汉中战争与祁山通道

荆州的丢失，宣告诸葛亮“隆中对”战略已经失败，但诸葛亮却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新尝试。

在历史上，四川是一个奇特的地方，[(2)]它物资富裕，地理封闭，是争霸天下优秀的后勤基地。但历史又告诉我们，任何人如果只想凭借四川的天险守成，不想扩张，就必然会越来越弱小，最终被吞并。

诸葛亮显然也知道四川的危险，丢掉了荆州，如果不思进取，一味防守，最终连四川也是守不住的。一旦敌人从北方或者东方攻入腹地，必然引起巨大的灾难。[(3)]

为了避免蜀汉的衰落，诸葛亮试图在狭隘的空间里重新找到一条收复中原的道路。于是，“隆中对”战略就有了修改版：在失去荆州（也是进攻的右臂）后，利用仅剩的左臂——汉中——重新制订北伐计划。汉中本来是“隆中对”战略中较为弱势的一钳，路途遥远，远离曹魏的核心区域，曹操将此区域称为“鸡肋”。[(4)]在正常情况下，汉中是作为与荆州的策动存在的，如今主要攻击点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策动点。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荆州的钳形配合，显得困难重重又软弱无力，连年兴师动众却收获有限。

在从汉中出兵之前，刘备死后留下的烂摊子还亟待处理。在东吴的攻击下，蜀汉的周边区域进入了崩塌状态，除了荆州地区失守，房陵、上庸等地归属了魏国之外，蜀汉西南方的外围区域也出现了动摇。比如，南部的益州郡（现云南昆明）、永昌郡（现云南省保山）、牂牁郡（现贵州省镇宁县）、越巂郡（现四川西昌）都试图叛离蜀汉，投靠东吴，如果不制止后方出现的叛乱，东吴很可能会继续攻入四川盆地。

对蜀汉有利的是，东吴占据荆州后，为了避免东吴势力太大，曹魏开始从背后，经过寿春和巢湖，或者走广陵（现扬州）打击东吴。曹魏的打击让孙权意识到，北方才是东吴最大的敌人。诸葛亮忍辱负重，与孙权恢复了联盟关系。此后直到蜀国灭亡，吴蜀关系经过了重重考验，

始终保持了下来。

在与东吴恢复关系后，诸葛亮率军平定了南方，攻心为上，七擒七纵蛮王孟获，换取了对方的归顺，将原本的蛮荒之地变成了蜀国的粮食基地。

蜀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在处理完内务，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之后，终于率军进入汉中地区，开始北伐。

在汉中所在的汉江盆地与关中所在的渭河盆地之间，横亘着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秦岭。秦岭的一段，从长安到宝鸡，又被称为终南山。宝鸡以西则进入了甘肃南部的山岭地带，这里树立的山脉叫作陇山，陇山之北则是六盘山。陇山之后的甘肃境内被称为陇右地区，陇右地区以高原和峡谷为主，向东有若干条峡谷通道可以下到宝鸡所在的盆地之中。

古人认为，从长安出发，穿越终南山到达汉江的大山谷一共有六处，分别是子午谷、牛心谷、傥骆谷、蓝田谷、横岭谷和褒斜谷，[5]但其实这有凑数的成分。其中牛心谷和横岭谷都只是在长安以东，蓝田道的小分支，本来不应该与其他四条同列。蓝田谷称得上是一条大道，但它通往的是南襄盆地而不是汉中地区。

秦汉以来，直接穿越终南山到达汉中的道路就只有子午谷、傥骆谷和褒斜谷三条。从北方来的人，首先进入山北的子谷、骆谷和斜谷，顺着山谷而上，翻越终南山的山脊后，进入午谷、傥谷、褒谷，下山就进入了汉江谷地。

子午、傥骆、褒斜三条山谷本来就地势复杂，特别是子午谷和傥骆谷，都不易大军前往，经过了三国战乱之后，已经衰落，很难通行。

在秦汉时期，还有一条路是绕过终南山的西面，从宝鸡向南经过大散关进入嘉陵江上游的谷地，从西面到达汉中的道路，这条路被称为陈仓道，或者故道、散关道。当年汉高祖就是利用这条路偷袭三秦，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步伐。

汉高祖利用陈仓道，是因为这条路在西汉初年还不常用，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可是到了三国时期，陈仓道已经成了大道，不具有奇袭的效果了。另外，陈仓故道由于曹操第一次撤离汉中时的破坏，也不易通行。

除了这四条之外，另一条更往西的通道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从宝鸡北上陇县，翻越陇山进入陇右地区，从陇右南下一个叫祁山的地区，从祁山进入汉江谷地，到达汉中。这条路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已经出现，光武帝就是从这条路攻击陇右的军阀隗嚣的。

三国时期，这条路还很偏僻，一直不是首选通道，却可以达到奇袭的效果。

总结起来，从汉中进攻关中，诸葛亮可以选择的道路主要包括五条：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子午道东面，原本还可以顺汉江直下，经过安康、南阳，绕过陕西直接进攻中原的许昌，在荆州没有丢失时，蜀汉曾经打通了这条路，连接了南襄盆地与汉中地区，但随着关羽战死，西城（安康）、房陵、上庸等地投降魏国，这条路已经不通了。

诸葛亮北伐之前，曾经有一次小小的转机。率领西城、房陵、上庸投降魏国的是蜀国大将孟达，由于在魏国不受重视，孟达又想率领人马重新投靠蜀国，他与诸葛亮开始通信，约定投降计划。

孟达的行为让魏国的司马懿感到紧张，他知道汉江中游的重要性，一方面安抚孟达，让他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赶往汉江。孟达以为司马懿一个月内能赶到战场，司马懿却只用了八天时间，就将孟达围在了上庸。他迅速攻城，将孟达斩首。魏国对汉江中游加强控制，彻底封杀了诸葛亮从汉江进入中原的希望。

无法从汉江进入中原，却仍然有五条道路可以使用，但这五条道路都充满了艰辛。

诸葛亮到底选择从哪里进攻关中地区呢？

寻找古街亭

从陕西省的陇县出发，向西前往甘肃省的张家川县，就是古代从关中翻越陇山到陇右的大道，古人进入甘肃天水，必经过此山。途中要经过历史上一系列著名的关隘，大震关和安戎关两道巨关，横亘在陇山之上。

从地理上看，渭河从渭源出发后，经过天水向东直达宝鸡。但由于渭河两岸的高山峡谷地貌，古人无法顺着河岸前行，反而只能向北绕路，翻越陇山，才能沟通两地。

在陇山上，有一个叫作关山草原的地方，地势在这里突然变得较为平坦，形成了一片巨大的草场，号称空中草原。过了关山草原，人们就站在了陇右的高原之上，到达现在的张家川县。

从张家川继续向西，经过龙山镇，十几公里后，就到达了一个叫作陇城镇的地方。陇城镇在一个峡谷中，一条叫作清水河的河流贯穿而过，南北两侧都是连绵的山峰。这条谷地是从天水通往陇县的一条交通要道。

在陇城镇的东南部，有一个叫作女娲祠的建筑，过了女娲祠向山上走，就会看到半山腰的一片平地上，竖立着一个低矮的汉式古亭，上面写着“街亭”两个字。

实际上，街亭古战场在哪里，在历史上曾经争论不休。除了陇城镇的街亭之外，在甘肃省天水市的麦积区，也有一个叫街亭的地方。在陇城镇被发现之前，人们曾经认为那儿是街亭古战场。但从地势上看，陇城镇所在的清水河河谷更具有战略价值，加上有一定的文物支撑，更可能是街亭的所在。

在东汉初年战争时期，街亭附近曾经有另一座著名的城池叫略阳，光武帝征隗嚣期间，曾围绕着略阳展开了攻防。略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位于天水和陇山各个关口之间，只要切断了略阳，陇山关口的守军就

失去了天水的后勤补给，变得不可守了。

到了三国时期，略阳城的名称已经被街亭取代。要想从天水进攻关中，街亭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连接点，如果天水一方得到了街亭，就可以从陇山冲下、直达关中平原：如果关中一方得到了街亭，就切断了天水的进攻路线。

不过，即便人们相信陇城镇是街亭所在，但马谡当年具体屯兵的地点却已经不可考，现在的亭子只是可能的地点之一。从亭子远望河谷，能看见对面连绵的山峰，大致上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影响了局势的战斗——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在这里失败。

在北伐之初，蜀军该从哪条路进攻长安，就有着不同的争论。争论中有两种意见最为主流。一种是魏延提出的经过子午谷和褒斜道直捣长安，他认为，魏国防守长安的主将是安西将军夏侯楙，这人以曹氏的女婿身份飞黄腾达，却没有什么本事。魏延希望能够率领五千精兵（另有粮草军五千）翻越秦岭直捣长安，诸葛亮的大军在后面配合。

为了减少在魏国地域内的时间，魏延选择最东面的子午谷。子午谷虽然地势险峻，却是到达长安的最直接通道。这一带的秦岭属于不毛之地，处于双方的控制之外，蜀军也不会被敌人发现。只有出了子午谷，到达秦岭的北侧，接近长安时，才算是进入了魏国的控制区。从这里到达长安已经不需一天，夏侯楙听到蜀军的消息后，必然逃窜，只剩下长安的太守、御史等官员守城。魏延这时可以一面围城，一面从周边搜刮粮草。而蜀军进攻的消息从长安传回许昌，再到魏帝下令派兵，赶到长安，必然要花费二十多天。在这二十多天里，诸葛亮有足够的时间率领主力部队从更加平坦的褒斜道前来，与魏延一起攻克长安城。

诸葛亮则认为，魏延的策略听起来振奋人心，却是赌博式的做法。只有做到环环相扣，才能成功，任何一环的脱节，都必然导致后面环节的失败。

比如，如果魏军恰好在子午口有一支军队，阻挡了魏延进入关中盆地，那么后面的事情都无从谈起；如果夏侯楙没有如魏延所料逃走，而

是奋力抵抗，魏延的军队很可能在诸葛亮主力部队到达前，就全军覆没了。

从安全角度出发，应该选择更加出其不意的路线。这条线路就是走陇右的祁山道到达天水，再走天水以北的陇山道下到关中地区。

陇右主要包括了如今的甘肃陇南、天水、甘南甚至兰州一带的广大的地区。这片土地既有峡谷，也有可以耕种的高原土地，进可攻，退可守。由于地处偏远，魏国的防御并不充分，要调动军队前来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一旦占领了整个陇右，借助地形的优势，可以居高临下，如水泼一般将军队泼向关中平原。

当然从陇右出发，也有它的劣势，主要问题在于许多城市还在魏军掌握之中，蜀军必须一路上逐个攻克魏军占领的城市，出兵速度相对缓慢。即便占领了陇右，具有了进攻优势，但毕竟还不是占领关中本身，要想进入关中，仍然需要较长时间。

但诸葛亮权衡之后认为，相比起劣势来，进攻陇右仍然是一种较为稳妥的方法。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初，诸葛亮利用声东击西之法，开始了北伐。他首先派赵云等人在褒斜道屯兵，造成要从褒斜道出击的假象，再从汉中向西，经过现在的勉县、略阳、成县等地，出兵祁山（现甘肃省西和县境内）。

诸葛亮的出兵果然起到了奇袭的效果，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纷纷倒戈投降了诸葛亮，北伐看上去一片光明。

但蜀汉群臣可能都低估了魏军的实力。魏延认为长安的夏侯楙是个草包将军，一战可定，可实际上，魏国在西部的军事力量比想象中要强。当诸葛亮出兵的消息传来，魏国迅速做出了军事调动，魏明帝亲自坐镇长安，派遣张郃西进、抵御诸葛亮，又派曹真在褒斜道口驻扎，防止赵云的北进。

张郃领兵后，从陇城（现在的宝鸡陇县）翻越陇山，进击蜀军。诸葛亮占领天水之后，也马不停蹄地赶往天水以北，希望尽快占领陇山的关口，以便拥有进入关中平原的通道。

双方的前锋在街亭相遇。街亭突然成了双方争夺的关键枢纽：如果蜀军能够稳定地占领街亭，就可以借助地理优势，东进直插陇山，进入关中平原；如果魏军占领了此地，就封死了蜀军前进的道路，一旦蜀军陷入了持久战，必然会由于缺乏粮食，不战自败。

在街亭，马谡捷足先登，占据了有利地形；张郃后来赶到，处于地理和时机上的双重劣势。

但就在这时，局势却突然因为马谡的错误决策而恶化了。马谡希望占据高处，选择了在山腰较高的位置扎营，一旦张郃来攻，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打击。现在的街亭纪念亭虽然不见得是当年的所在，却也设在半山腰，以符合当时的场景。

但马谡却忽略了一点：水源。在山谷中流淌着一条清水河。但在半山腰的街亭，由于山体高度不够，没有形成永久性泉水。张郃大军赶到后，封死了蜀军下山通道，蜀军很快陷入了缺水的境地，最终被击败。

街亭的丧失，让蜀军的失败成了必然。很快，粮草的困扰出现了，诸葛亮不得不撤退。不仅退出了街亭，还退出了天水、祁山，回到了攻击发起的原点——汉中。

投降蜀汉的三个郡也都被魏军夺回。蜀军的远征以徒劳无功而告结束。

在蜀军计划中，天水地区已经有了产粮条件，可以做长久支撑。但在执行起来却发现，天水仍然太偏僻了，即便可以自给自足，却无法供养大批的军队，只有回到了汉中，才能最终解决给养问题。

蜀军的失败不仅影响了士气，更提醒了魏国，在西方加强了守备。诸葛亮曾经派兵的两条线路——祁山道和褒斜道，都成了魏军加强防卫的重点，即便蜀军在未来发动再次攻击，也不会像第一次那样有奇兵的效果了。

秦岭：无法击破的屏障

在第一次伐祁山失败的当年冬天，诸葛亮再次出兵北伐。由于前一次的失败，诸葛亮已经带上了很浓的宿命论色彩，在给皇帝的信中，语气中透露出“北伐未必成功，但不北伐必然灭亡”的意思。

之所以在一年间两次北伐，在于这一年，魏国与吴国突然发生了冲突，当年曾经击败刘备的陆逊再次击败了魏军。诸葛亮希望趁这个时机，从西面进攻魏国，与吴国形成呼应。

但第二次行动比第一次失败得更快。由于第一次使用了祁山道与褒斜道，魏军都加强了防卫，诸葛亮这次选择了陈仓道进军。

陈仓道曾经是关中通往汉中的主道路，秦朝时期的关中四塞之一大散关，就在这条道路的北端，汉高祖伐关中就走的这条路。但这条路到了曹操时代就被破坏了，曹操退出关中时，对陈仓道进行了有计划的破坏，此后，陈仓道的地位被褒斜道取代。

诸葛亮选择陈仓道，也有出其不意的意图，然而北上后，却被魏国大将曹真阻拦，无法前进。随着粮食的告竭，诸葛亮只能退兵，这次短暂的北伐再次以失败告终。

随着诸葛亮对魏国的连续攻击，魏国也不甘只处于防守地位。两年后，魏军开始反击。

在大司马曹真的策划下，魏国进行了一次三面包围的进攻，从西、北、东三侧都动用大军向汉中进攻。

在西侧，以张郃为统帅，选择祁山道进军汉中。在北侧，曹真率领军队从子午道和褒斜道两条路直接进攻汉中。另外，由于从南阳到汉江的西城（现陕西安康）在魏国手中，曹真还设计了一条东道，命令司马懿从南阳出发，沿汉江谷地进入西城，再沿汉江而上到达汉中。

曹真的目的是三路大军齐发，共同包围和拿下汉中，再以汉中为基

地进攻四川。但在出发之初，他的计划就出现了问题。

在北侧和东侧，曹真和司马懿率领的主力军遭遇了三十余天的大雨，山洪暴发摧毁了道路，还没有到达，就损兵折将。而诸葛亮在各条道路的出口都进行了重点防守。于是，群臣纷纷劝谏不要进军，魏明帝只好下令召回了大军。

在西侧，情况又有不同。由于西侧的祁山是诸葛亮重点利用区域，蜀军在这里不是纯粹的防御，而是带着进攻意图。诸葛亮派出魏延等人率领一支军队，绕过张郃军，进入魏军的后方一路骚扰，由洮河谷地一直进入湟水，直达青海省与甘肃省接壤的羌中地区。

魏延的进军再次将西部的地图扩大。之前，陇右战争的中心区域在甘肃天水，而蜀军此次却将触角伸出了甘肃之外，到达了青海东部，青海这个边缘省份进入了中原的视野。诸葛亮死后，蜀国大将姜维能够去西部发展，就与魏延在西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有关。

在蜀军的防御下，魏军的攻势被遏制住了。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进行了他一生中的倒数第二次北伐。这次北伐仍然以祁山和陇右为出击目标。前几次北伐最终都受困于粮草危机，蜀汉的粮草除了一部分来自汉中之外，更多的是来自成都所在的四川盆地。

在古代，粮草运输多借助水路，进入陇右的粮草多采取从嘉陵江进入汉中地区，再沿着嘉陵江支流西汉水接近祁山一带。再往上，运输就必须走陆路，也是在这一次，诸葛亮设计了传说中的“木牛”来运输粮食。木牛的形状和制造技术都已经失传，作为合理猜测，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在山路运输粮草的车辆。

携带木牛的军队到了祁山，但这次，他们碰到了强大的对手——司马懿。

由于曹真患病，魏军临时换将，由司马懿代替曹真进行指挥。司马懿上任伊始，就展现出了魄力。由于进军关中的路有五条，魏国还不确定诸葛亮走哪一条，大臣们大都赞成对五条路分兵把守。但司马懿却认

为，分兵把守是分散了兵力，而要想获胜必须集中兵力，他没有采纳在散关、斜谷处处设防的提议，而是率领所有人马奔赴陇右。

在陇右，司马懿留下一部分兵力守住上邽（在天水旁边），稳住了天水，随即率主力南下，保卫祁山。

不想，就在司马懿主力南下后，诸葛亮却分兵北上攻取了上邽，这就截断了司马懿的后勤线，迫使他回军。

这次战斗让司马懿明白，要想击败诸葛亮并不容易，主动出击不是最好的选择。从此时开始，他采取了另一项策略：闭门不出，等待蜀军粮食耗尽，自动撤退。蜀军最大的问题不是兵力，而是后勤能力，看透了这一点，就决定了魏蜀战争的走向。

果然，在司马懿的坚守下，蜀军只好撤退。

蜀军的撤退，基本上已经证明，从四川和汉中单臂出击，几乎没有可能击败位于陕西的敌人。汉高祖从汉中的逆袭在历史上只能发生一次，却再也不会发生第二次。由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持续发展，四川的定位只能是偏安一隅。这个结论在现在如此明了，却是当年诸葛亮用血和泪尝试过，才得到的。

“隆中对”战略的最终失败

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进行了最后一次准备周密的北伐。在前几次北伐中，由于粮草问题无法解决，每一次的最后，诸葛亮都不得不饮恨退兵。

加上吴蜀之间缺乏配合，每一次都给魏国留下了单独行动，只针对一翼的机会。诸葛亮在来日无多的情况下，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做最后一次尝试。

这次北伐经过了三年的准备。为了对曹魏造成双重打击，诸葛亮联合东吴，从东西双方，对魏国形成钳形攻势。孙权率领的中路大军主攻巢淝通道，主攻点在合肥。陆逊、诸葛瑾率领的西路进攻南襄隘道的襄阳。孙韶、张承从扬州走邗沟进攻徐州。

蜀国则采取了新的进攻策略：屯田。在三国时期，曹魏很早就使用了屯田作为解决后勤的方法，而蜀汉却一直没有加以采用，直到最后一次北伐，诸葛亮才想到了屯田。

由于屯田的需要，蜀军抛弃了不适合屯田的祁山道，选择了更加直接的褒斜道。

关中的渭河流域土地肥沃，如果大军不在山区纠缠，而是快速跃进，进入关中平原，在渭河流域寻找到一个前进基地，以这个基地为核心进行屯田，就可以较少依靠翻越秦岭的后勤系统，直接从当地获得粮草。为了快速进入关中，褒斜道比起遥远的祁山道要便捷得多。

这个战略迅速取得了成功。诸葛亮大军通过了褒斜道，在道口以北的渭河岸边，一个叫五丈原的地方找到了扎营的基地。五丈原位于渭河南岸，现在的陕西省岐山县境内。这个土台东、西、北三面均为悬崖陡坡，北部宽约一公里，南北长二点五公里，是理想的扎营之地。

以五丈原为基地，还可以迅速将渭河上游与长安的联系切断。由于诸葛亮占据了五丈原，魏军就很难再西进援助陇右的守军，蜀军却可以

分兵将陇右的魏军城池各个击破，再从陇山而下，将宝鸡一带的平原攻克。如果能够完成这一步任务，那么五丈原以西就成了蜀国的领土，这不啻又一个小汉中。由于居于渭河上游，随时可以顺流而下打击长安。宝鸡一带土地肥沃，可以耕种生产粮食，在未来，蜀军就不用每次花费巨大人力来解决粮食问题了。

当蜀军战略顺利推进时，魏国西部将领郭淮却领悟到了蜀军的威胁，劝说司马懿在五丈原以西二十几里，在渭河北岸的北原扎营。这样，诸葛亮从五丈原向西进军，必然遭遇到北原的抵抗，要想打通西路，必须首先消灭北原的守军。而要向东进军，又碰到了司马懿的抵抗。诸葛亮的战略就由于北原的存在而打了折扣。

但蜀军的计划仍然在推进之中。诸葛亮一方面绕过北原，先行争取打通陇山道和陈仓道，另一方面迅速展开屯田工作，力图将粮食问题本地化。

如果诸葛亮有足够的时间，将五丈原打造成前进基地，那么未来的局势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但这次决定成败的却是最自然的因素——人的寿命。

由于操劳过度，诸葛亮的身体垮了。司马懿最先料到了诸葛亮的身体状况，当诸葛亮派遣使者到魏营时，他询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和工作情况，得出结论：蜀国丞相的工作强度太大，不会支撑太久。

司马懿坚壁清野，绝不与蜀军硬战，而是等待蜀军内部的变化。即便诸葛亮给他送来女人的衣服，都无法逼迫他出战。

司马懿的坚守终于换来了收获。当年八月，诸葛亮由于积劳成疾，死在了五丈原。诸葛亮死后，蜀国撤军，一并协同作战的吴国也被魏国击败。南方反攻北方的高潮过去了。

诸葛亮的死亡让他精心设计的“隆中对”战略彻底失败。这个战略从开始提出，显得那么天才，与张竑的江东战略一道，为南方反攻北方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江东战略与“隆中对”战略互相影响，北方一家独大，南方却双雄并立，蜀、吴每一方都无法做到集中南方所有资源与北方一战。

具体到“隆中对”战略，在孙权占领荆州之后，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只剩下残肢断臂与最艰险的道路。

诸葛亮拖着疲惫的身躯不肯认输，屡次北伐却徒劳无功。在最后一次北伐时，战略更新，更具有了实际操作性，却随着他的死亡被人遗弃。

如果更抽象一点儿，可以说，四川虽然是富庶之地，但由于它的偏僻位置和单一的道路，使得它无法担当起统一全国的重任。诸葛亮给四川加上了荆州和两湖盆地，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机动性。但两湖盆地与四川盆地之间的崇山峻岭，却注定了四川与两湖无法兼得。从这个意义上，也许东吴击败关羽获得荆州，并非是那么偶然，而是宿命使然。

(1)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逊至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原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

(2) 《读史方舆纪要·四川》：“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3)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引《汉晋春秋》：“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4)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九州春秋》：“时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脩便自严装，人惊问脩：‘何以知之？’脩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

(5) 《读史方舆纪要·陕西》。

第七章　西晋：北方反击战（公元234—公元280年）

三国时期最被低估的军事家是邓艾。邓艾的奇袭不仅灭亡了蜀国，也为后来人们进攻蜀地指出了一条道路，使得人们可以绕过狭窄的金牛道，从西部直捣成都。

在灭蜀战争之前二十年，邓艾就要求魏国必须为十万大军准备至少五年的粮草，才可以言战。邓艾选择的军粮基地在寿春一带。粮草的充足，为后来魏、晋灭蜀、吴奠定了物资基础。

魏国兵分五路，进军汉中。围困了蜀国在汉中最重要的两个城池：汉、乐二城，并迫降了通往蜀道的门户阳安关。但随着蜀军在汉寿（剑门）的加强防守，魏军无法突破进入四川盆地。如果没有邓艾，伐蜀将以失败告终。

邓艾发现，桥头与四川盆地只隔了一座摩天岭，只要寻找伐木的小路翻越摩天岭，就可以绕过汉寿，直插四川盆地，奇袭成都，逼迫蜀汉投降。他的发现是灭亡蜀汉的最关键因素。

从邓艾以后，四川不再是天险，随着大量西部道路的发现，北方政权可以更加方便地进军四川。

四川丧失了独立地位后，却成了南北对峙的胜负手。如果北方政权占领四川，就可以借助上游优势打击位于下游的江东；如果南方政权占据了四川，就足以与北方抗衡。

西晋灭吴是一次充分利用了地图宽度的大规模协同作战，为后来的南北对峙战争指明了方向。

总结曹操赤壁之战的教训，西晋认定如果把兵力集中在一点，双方展开对决，容易放大北方军队不习水战的劣势。必须采取多线路的协同作战，才能避免劣势，并放大自己的人数优势。

西晋伐吴的军事战略可以总结为五纵一横，即利用南下建业（南京）的五条南北道路，同时向南进军，对吴军形成压倒性攻势，再利用在四川境内囤积多年的水军舰船，顺长江直下，分别经过这五路大军的防区，直达建业。

六路大军中，达到奇袭效果的是第六路，沿长江的横向进攻。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领巴蜀的水军，浮江而下，先后经过纵向五路的战区，直捣建业，完成灭吴。

东晋以后，北方对南方战略的基本模式是：充分利用地图的宽度，将南方的四川、两湖、赣江谷地、江东四大单元逐个剥离，再兵分数路集中于江东。这个战法至今有效。

蜀汉兴元元年、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国的征西将军邓艾接受了一项牵制任务。这一年，魏国在司马昭的组织下，开始对远在四川的蜀汉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

在远征中，担任主力的是镇西将军钟会，他率领了十二万大军从长安出发，进攻汉中。钟会出兵时，蜀国已经在庸君和宦官的共同作用下变得无比衰落，却仍有一人让钟会感到担心，他就是蜀国大将姜维。

不过姜维并不在成都，为了躲避宦官之祸，他率领军队屯驻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叫作沓中。沓中的位置与一千年后蒙古人进攻云南的起点达拉沟很接近，也是位于四川、甘肃交界地带，在白龙江的上游。

这里距离成都和汉中都很遥远，很难对魏军构成威胁。但姜维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曾经率领人马七次与魏军征战，是司马昭最忌惮的蜀国将领。

为了防止姜维千里跃进驰援汉中，司马昭下令在陇右地区的征西将军邓艾出兵，主动进攻姜维，将他拖在陇右地区，不要阻挡钟会的大部队。

邓艾并不同意司马昭的计划，他认为，要想征服一个国家，必须等这个国家内部出现了叛乱，才能征服它。蜀国虽然弱小，却并没有出现内部的纠纷，征服这样的国家得不偿失。

不过，作为军人，他忠实地执行了司马昭的命令。

这一年九月，邓艾并分三路：一支从狄道（现甘肃省临洮）南下，进攻沓中的东部；再有一支军队从洮阳（现甘肃省临潭）出发，直接打击沓中的北部；而另一支军队绕道西面的高原地带，从沓中的西面进军。这三路大军形成包围之势，指望将姜维围困擒获。

邓艾正要进攻时，钟会出兵汉中的消息也传到了蜀国军队，姜维恍然大悟，连忙率军向东方撤退，前往汉中。邓艾在后面紧追不舍，不断地袭击并打败了姜维。

不幸的是，姜维虽然战败，却乘机逃走了。邓艾拖延姜维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姜维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摆脱了邓艾，魏国却为他准备了双保险。司马昭怕仅仅靠邓艾无法拖延住他，又暗地里派遣另一位大将、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三万人马，在武街（现甘肃省武都境内）和一个叫桥头的地方等待姜维。

在三国时期，沓中所在的甘肃南部是一片蛮荒之地。要想去往沓中，必须从金牛道上的汉寿（现四川省昭化）并入嘉陵江的支流白龙江，从白龙江绵延数百里，经过武街进入白龙江上游，这里就是沓中。

在白龙江谷地的南北两侧，分别是迭山和岷山两大山脉，逼仄的峡谷如同一条地缝，将进攻者和守卫者都局限在这一脉的地盘上。而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两个地点，一个是位于现在武都的武街，另一个是位于白龙江和其支流白水江上的一座桥，这里因为这座桥得名桥头。

白水江在白龙江以南，经过一座叫作阴平的城市（现甘肃省文县），在桥头汇入白龙江。白龙江则先经过武街，再到达桥头。

从阴平也有一条小道直达沓中，叫作阴平道。从沓中去往桥头既可以走白龙江道，也可以走阴平道，两道在桥头汇合成一条。

姜维没有走白龙江道，而是选择从阴平道撤离沓中，到达阴平后，再顺着白水江前往桥头。当他还没有到桥头时，突然听说，诸葛绪的军

队已经在桥头布防等着他了。后方的邓艾也正在赶来，与诸葛绪前后夹击，要将他歼灭在白水江上。

情急之中，姜维决定冒险翻山。在白水江和白龙江之间，隔着一座巨大的山脉——岷山，在岷山之间有几条山谷小道，很难行军。姜维强行穿过岷山，从一个叫作孔幽谷的地方北上进入白龙江流域的武街，再顺白龙江而下，从背后打击诸葛绪的军队，试图打通桥头要道。

这时，诸葛绪犯了一个错误。当他听说姜维的军队消失在白水江畔，进入白龙江时，害怕武街的防卫空虚，连忙撤离了桥头，向上游的武街赶去。这样，桥头这个最重要的防御地点就被放弃了。

姜维打听到诸葛绪已经离开桥头，他并没有去武街，而是挥军返回，通过了无人把守的桥头，率军东下。

魏军用了两员大将、六万人马，也没有拖住姜维，让他成功逃出，去解救汉中。

到这时，这场斗智斗勇的大戏看上去以姜维的胜利而告结束。如果姜维能够守住汉中，必然成为三国时期最重要的军事家被人铭记。

但就在这时，在后面追击的邓艾却采取了关键性的一步险棋，直捣成都，让姜维的努力功亏一篑。邓艾，这个最被低估的军事战略家，也以这一次冒险而被记入了史册。

魏国政治斗争中的伐蜀议题

在司马昭对蜀国发起总攻之前二十年，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三月，魏国大将军曹爽就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征蜀运动。

曹爽是大将曹真之子，魏明帝去世时，将年幼的儿子齐王芳留给了曹爽和司马懿，令二人辅佐新皇帝，稳固魏国江山。曹爽随即与司马懿发生争权，将司马懿排挤出权力核心，大权独揽。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和地位，曹爽制订了伐蜀的计划，如果能够征服蜀国，那么大将军的权势将变得稳固，没有人再质疑他是无功受禄。

当年，曹爽在长安征发了十万军队，又从周围调拨了大量物资，出发了。在选择进军汉中的道路时，他选择了一条平常很少有人走的路——傥骆道。

汉中与长安之间的秦岭，主要道路有三条：子午道、傥骆道和褒斜道，在秦岭之西，还有陈仓道和祁山道。诸葛亮的北伐多使用祁山道、陈仓道和褒斜道。而子午道和傥骆道因为更加险峻，被排除在外。

以傥骆道为例，傥骆道的北口叫骆谷，南口叫傥谷，谷道长四百二十里，其中险峻的山路八十里，有八十四盘，中间有三大险要的关口，分别是沈岭、衙岭和分水岭。在南口则有著名的兴势山，是个易守难攻的地点。

当时，蜀国在汉中的守军只有三万，如果能出其不意，汉中的确有可能在曹爽大军的碾压下分崩离析。

但由于过于兴师动众，无法保密，魏军的行动很快被蜀国知悉。在蜀国大将王平的布防下，蜀军在南口设立了防守，将曹爽阻截。

粮食和军备问题随之突显出来，十万大军的军粮也要通过狭窄的谷道运输，大批的牲畜死亡。到最后，曹爽不得不退兵。在退兵时还遭到了蜀军的截击，差点儿回不去。

这次魏国的出兵可谓损兵折将，也凸显了伐蜀的难度。

曹爽的失败加速了他的灭亡，在与司马懿的争斗中，曹爽被俘获斩首。

曹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秩序都被内部争斗所打乱，国与国之间的互相攻伐虽然不少，但主流的矛盾已经转换成内部群臣之间的斗争。

以魏国为例，司马懿剿灭曹爽后，司马氏就取得了魏国的主导权，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废掉了魏国的两任皇帝。司马氏的秉政引起了魏国许多大将的不满，而反抗最剧烈的地区，则是与吴国接壤的寿春一带。这里属于前线地区，统兵将领的权力更大，也更加忠实于曹魏政权。司马氏必须将这些将领的权力收回，将他们换成自己的心腹，才能控制住整个魏国政权。

在寿春，先后有三大诸侯王凌、毌丘俭、诸葛诞造反，最终被一一镇压。

与此同时，吴国孙权死后，诸葛恪、孙先后担任权臣，屡次出兵魏国却鲜有收获，反而引起了朝野的内乱，削弱了吴国。

而在蜀国，造成国力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蜀国后主刘禅声色犬马，依靠宦官黄皓等人，内政混乱；二是以姜维为首的将领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屡次北伐却徒劳无功，消耗了蜀国的国力。由于宦官势力的增大，为了避免被宦官迫害，姜维被迫离开成都，前往遥远的沓中地区，离开了权力中心。

蜀国在汉中的军队也衰弱到无力进行全面防守的地步。在之前，在汉中的防守以守卫边境各个险要地带为主，也就是说，对于秦岭的各个孔道，都在险要地方设防，以期第一时间发现和阻拦敌人，不让他们进入汉中平原。

但随着军队的衰弱，蜀国已经无法做到这种撒网式的防守策略，不

得不把兵力收缩，放弃各个险要关口的守卫，而将兵力集中在诸葛亮建立的两座城市——汉（现陕西省勉县境内）、乐（现陕西省城固县境内）二城。

当魏国进攻时，可以通过各条道路直达汉中平原。蜀国守军龟缩在汉、乐二城内，等待魏军找不到足够的粮食，自动撤兵。如果魏军越过汉中平原继续向蜀地前进，那么汉、乐二城里的守军就袭击魏军的粮道。

这种定点式的防卫，实际上是实力减弱的一种无奈之举。事后证明，魏国恰好利用了这一点，快速地占领了汉中。

邓艾：被低估的军事天才

在三国历史上，邓艾是一位最被低估的将领。他是孤儿，年少时给人放牧为生，还有口吃的毛病。如果不是出于乱世，被司马懿发现，在东汉时期近乎板结的社会结构中，必然只能当一个下等人。

历史上的名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只管行军打仗，在战术上百战不殆的将才；另一类是运筹帷幄，从全局上筹划战争的帅才。前者只管打仗，后者除了对于兵法的精通之外，还需要对政治、经济、地理有一个全盘的了解。

在三国时期，符合帅才的人寥寥无几，邓艾就是其中之一。军阀混战时，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士兵，而是经济和财政。只要有粮食，就能招足够的兵来替自己卖命。很多小股部队不是被击溃，而是被饿散了。

在所有军阀中，最重视粮草问题的是曹魏。曹操之所以能够统一北方，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屯田工作做得最早，解决了后勤问题，当其他的军队只能靠掠夺来筹集辎重时，他已经有了固定的税收来养活武装。

曹魏的众多谋士中，对于经济与军事的联动理解最透彻的人里就有邓艾。

魏齐王正始四年（公元243年），距离蜀汉灭亡还有整整二十年，距离东吴灭亡还有三十七年，邓艾就看到了统一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粮食。

他为司马懿筹划时，写了一篇《济河论》，认为如果要统一全国，必须在财政上做好准备，具有了压倒性的财政优势，才能动用军队，并将对方的军事实力消耗光。当初曹魏之所以能够占领半壁天下，就是因为屯田积累了足够的粮食。[1]

根据邓艾的计算，如果要征服南方，至少需要准备好十万大军，用

五年的时间。如果准备不充分，就会耗费巨大的财力却空手而归，不如不战。要供应十万大军吃五年，意味着必须有三千万石的粮食储备。[2]

但问题是：怎么才能储存三千万石粮食呢？

邓艾环顾曹魏的土地，发现最大最肥沃的没有被利用的土地，出现在寿春地区[3]。寿春地处魏国和吴国之间的中间地带，虽然被魏国占领，却常常受到吴国的军事骚扰，这里曾经是肥沃的土地，却由于河湖纵横，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变成了一片灾荒之地。

在邓艾看来，寿春仿佛是一个天赐的粮食基地。他认为，如果合理地开凿运河进行灌溉，土地产量可以提升三倍。只要五万士兵参与耕田，加上水源充足，就可以每年上缴五百万石的稻谷作为军粮，经过六七年后，就可以凑够三千万石之数，为战争做好准备。

邓艾的提议被采纳，曹魏在寿春大修水利，兴兵屯田，南方的气象也为之一变，在这里官田和民田交错其间，一片繁忙景象。东吴发现邓艾计策的威力后，曾经长期以破坏寿春的农田为目的发动骚扰战，却仍然无法击碎魏国的财政能力。

邓艾的计策为司马氏的统一奠定了物资基础。财政成为西晋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4]

除了对战争资源有着深刻的认识之外，邓艾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也恰到好处。吴国的孙权死后，诸葛恪掌握了吴国的权力，他为了巩固权力，树立权威，立刻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北伐，令魏国朝野震动。当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失败退军后，魏国群臣都担心他还会回来，只有邓艾对司马师说：诸葛恪不会回来了，他的灭亡马上就要到来。

邓艾的理由是：孙权刚死，大臣都还没有归心新主，特别是吴国有很多江东本土的大户人家，都有私人军队，依仗着武力与中央对抗。诸葛恪新掌权后，不是先对内巩固根基，而是想靠对外侵略立威，驱赶着大批的士兵，随意地驱使人民。但兴师动众不仅没有攻克合肥，反而死了上万人，这样的人必然会被立刻推翻。诸葛恪回去后，果然如邓艾所言，被政变所杀，夷灭三族。

另外，除了帅才之外，在指挥打仗上，邓艾也同样擅长，他与姜维在西部周旋十数年，没有让姜维占到便宜，直到最后完成了伐蜀奇功。

当人们谈论三国时期，总是提到关羽、张辽等人，却忽略了为人低调的邓艾，的确是一种历史的不公平。

击穿金牛道

蜀汉兴元元年、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就在邓艾进攻沓中，诸葛绪试图在路上阻截姜维的同时，魏国的主力军队在镇西将军钟会的领导下，兵分五路向汉中进军。

这次的进军几乎利用了所有的通往汉中的通道，数路兵马分别从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进军。同时，还动用了从南阳经过安康的汉江通道直上汉中。

与邓艾不赞成攻打蜀国不同，钟会却是进攻蜀国的最主要支持者。

钟会出身于官宦世家，是司马氏的宠臣。在司马氏平定毌丘俭和诸葛诞的叛乱中，钟会表现抢眼，声名鹊起。随后，他更加积极地支持司马氏向南进军，剿灭蜀国。实际上，在魏国的内部争论中，除了司马昭和钟会之外，大部分人并不支持伐蜀，这使得司马昭对钟会更加信任，委派他担任主攻将领。相比较而言，邓艾只是一方的偏将，负责协同作战而已。

如果诸葛亮仍然在，钟会的兵分五路出击必然被迅速粉碎。在诸葛亮时期，蜀国的防守策略是把守各个要道，将敌人阻挡在关口之外进行痛击。但诸葛亮死后，随着蜀国的疲惫，汉中的防守策略有了很大改变，守军龟缩在汉、乐二城，而将各个通道拱手让给了魏军。这就让钟会捡了个大便宜。魏军兵不血刃就进入了汉中盆地，随后，对汉、乐二城展开了猛攻。

除了汉、乐二城之外，蜀国的另一个防御地点在金牛道（从汉中通往四川的通道）口的阳安关。虽然魏国五路大军看上去很威武，但不管走哪条路，都只能到达汉中，如果要从汉中继续进入四川，必须走金牛道，经过阳安关，这里是个绕不过去的地方。

蜀国的防御策略是：死守汉、乐二城和阳安关。只要守住了阳安关，魏军就无法顺着金牛道南下蜀道进入四川。当魏军在阳安关口感到

疲惫时，蜀军就利用后方的汉、乐二城，对魏军进行打击。

这个策略从表面上看显得颇具智慧，但唯一缺陷是：它要求非常严格的执行力。首先，阳安关必须严防死守，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能投降，一旦投降，蜀道洞开，敌人不需要攻克汉、乐二城就可以南下进军四川；而汉、乐二城也不能投降，一旦汉、乐二城失手，即便阳安关仍在，但整个汉中地区却再也无法收复，持久下去，阳安关也必定丢失。

三城必须相互配合，有一方松动，都会让另外两方的压力突然间爆炸，将整个汉中平原乃至蜀国丢失。

但是，到了蜀国后期，已经不可能再有如此强的执行力了。这是钟会捡的第二个便宜：当他率军到达阳安关下，阳安关将领蒋舒竟然率军投降了魏军，这个最重要的关口竟然在两天之内就被攻克。

阳安关的失守，让汉、乐二城成为孤军，被攻克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即便蜀军能够借助更南方的几个关口防住金牛道，也不可能收复汉中了。

阳安关失守后，下一个战略点是金牛道上的剑门关（剑阁）。剑门关在现在的四川广元，在三国时期叫作汉寿，这里位于嘉陵江和白龙江的交汇处附近，不管从陇右还是汉中，都必须经过剑门关才能进入四川盆地。但它也已经是进入四川盆地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失手，就门户洞开了。

阳安关失守时，从四川盆地来的蜀国援军已经北上，听说来晚了，只好退守剑门关。与此同时，姜维的部队也从桥头退回到剑门关，将这里变成了守卫四川盆地的最后防线。魏军则一面围困汉、乐二城，一面南下在剑门关与蜀军对峙。

随着姜维对剑门防守的加强，魏军捡便宜的时机过去了。钟会大军的粮食问题凸显了出来。对于魏军来说，最可能的结局，是守住阳安关，逐渐消化汉、乐二城，保住汉中的果实。至于前进四川、攻克成都，已经不再可能。

到这时，魏国的灭蜀战略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基本上是整体失败

了。

但历史往往是被一些偶然的人和偶然的事件所推动的。

邓艾在前面的战争中都只是牵制性的边缘角色，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间打破了双方的战略平衡。

当姜维逃脱了邓艾的追击时，邓艾的战略使命本来已经以失败告结束。但他在姜维身后紧追不舍时，却打听到，在四川盆地北部的群山之中，还有其他道路可以不经过剑门这个“必经之路”，直插成都。

人们常走的正路是从阴平城经过桥头，从桥头往东去剑阁。但实际上，桥头到四川盆地只隔着一座巨大的摩天岭，如果能够找到一条伐木的道路，翻越摩天岭，就可以不经过剑门，直接进入四川盆地。

邓艾率领大军从这里向南，没有路的地方就凿山通道，没有桥的地方就架桥，途径了七百余里的无人区。这里山高谷深，艰险异常，又由于缺乏粮食，部队屡屡进入险境。到了没路的地方，邓艾率先裹着毛毯从高处滚下，将士们在山崖上攀着树木，鱼贯前行。

翻过了摩天岭，就是四川盆地内的城市江油，由于魏军出现太突然，蜀国的守将马邈立刻投降，邓艾获得了在四川盆地内的第一个立足点。

魏军的出现震惊了四川盆地，接下来阻挡邓艾去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连忙在绵竹摆开阵形等待邓艾大军。在这里，邓艾经历了进军四川最严峻的一战，如果失败，他的人马连退守的地方都没有，会直接被围困歼灭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

邓艾依靠着置之死地的勇气督战，甚至差点儿杀掉了他的亲儿子邓忠，才死战得胜。诸葛瞻战死。

诸葛瞻阵亡的消息传回了成都，也成了压垮蜀汉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蜀后主刘禅不顾众人的劝阻，出城投降。蜀国正式灭亡。姜维在北方听说后，仰天长叹，投降了钟会。[5]

蜀国的灭亡，表明四川的战略地位进一步下降。战国时代，中国其他地区进入四川只有金牛道（去成都）和米仓道（去重庆）两条路，而且必须经过汉中，造就了四川的战略优势。但到了东汉时期，除了经过汉中的道路外，长江通道已经逐渐进入了主流视野，于是从湖北也可以进攻四川了。

三国时期，随着对陇右地区的进一步探索，人们发现，原来汉中也不是陕西进入四川的必经之地，在更西部，还有很多道路可以进入四川。邓艾的奇袭，是发现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但绝不是终点。

随着这些道路的发现，进攻四川，其核心变成了如何选择一条通道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而随着通道数量的增加，守卫四川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汉高祖当年靠汉中和四川一统天下，但从三国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通过控制四川来争夺天下了。

不过，四川对于北方政权却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同当年秦统一，只要北方政权获得了四川，就拥有了打击两湖盆地乃至江东的上游优势。

当中国出现南北对峙时，如果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方政权拥有四川，就足以与北方抗衡；可如果丢失了四川，就连两湖与江东都很难守住。

接下来的东吴灭亡，恰好证明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进军东吴：最完美的战略进攻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伐吴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协同作战。它利用了中国疆域的宽度，在绵延三千里的范围内同时展开作战，最终达到战略目标。在利用马匹和自然能源（水力、风力）作为动力的冷兵器时代，能够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做到有条不紊的协同，可谓是一个奇迹。蒙古人进攻南宋的协同作战可以从晋朝攻吴找到源头。

这次协同作战也可以看作三国时期军事探索的总结性战役。从吴、蜀开始探索南方战略以来，他们借助南方的地形条件尝试了许多作战方案，基本上把南方的地理优势和劣势都摸清了。西晋恰好利用了前人的探索成果，将南方地理进行通盘考虑，充分利用南方的宽度，发动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作战方案，并取得了成功。它的成功也给后人指明了道路，未来南北对峙的战争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西晋灭吴的经验。

在灭亡了蜀国之后的第二年，魏国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一年掌握了魏国大权的晋王司马昭去世，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儿子司马炎。司马炎仅上台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将当年曹丕编写的禅让剧本再次上演了一遍，将曹魏皇帝废黜，建立了晋朝政权。

在晋朝建立的同时，位于东南方的吴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相比于同时拥有中原、陕西、四川的晋朝，吴国的江南地区过于狭小，无力抵抗。但北方的少数民族叛乱（以鲜卑人秃发树机能为首）阻碍了中国统一的进程，直到十几年后，晋朝灭亡了秃发树机能，才又腾出手来准备对吴战争。

在战争开始之前，以羊祜、杜预、王濬等人为首的晋朝将领已经开始制订战略计划，并大力推进伐吴事业。在中央，也有司空张华等人积极策划。

几十年前，魏武帝曹操进攻东吴以惨败告终，当时的人们总结认为，北方军队不习水战，所以才会失败。几十年后，东吴水军依旧，晋

朝又如何避免魏武帝式的失败呢？

晋朝总结的经验是：曹操当年的进攻以一条路线为主，双方都将兵力布置在一个点上进行角力，这样容易将北方的水战劣势放大。如果要进攻南方，必须采取多线路协同作战，这样才能利用自己兵力众多的优势，避免一个点上的失利变成全盘的失败。

东吴与北方之间，漫长的国境线上，有若干条孔道形成了进军路线。在最西侧，晋国与吴国在长江以南的分界线大致与今天的省界重合，晋国占领了四川、重庆，而吴国占领了湖北和湖南。在两国边境上是险峻的川东群山，如武陵山等，这些山脉阻碍了晋军的攻势，使得晋国很难直接进攻长江以南的湖南地区。

晋国能够利用的第一条进军路线是从四川、重庆沿长江顺流而下，经过巫山、宜昌直达吴国控制的荆州地区。更远方，晋军甚至可以从长江乘船直达吴国的首都建业（南京）。

下一条路是从西晋的南阳、襄阳，到吴国的荆州的道路，这条路是当年关羽北伐的反向，也是曹操当年入侵之路。

在晋吴对峙时代，另一条不大重要的小路也开发了出来，那就是从现在的河南信阳地区，直接翻山进攻如今的武汉地区。现在的京广铁路就经过这条路，但在古代并不是最主要的大道。

在长江中下游的江淮地区有一条主要通道，这条道又形成两条分道：一条从寿春、合肥一带进入巢湖，再顺着巢湖进入长江；另一条是从淮河经过广陵（现江苏省扬州）入江。此外，由于晋军已经占领了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晋军还开辟了第三条路，由距离吴国首都建业最近的涂中（现安徽省滁县）向长江进攻。

人们常常认为，在吴国和晋国之间，起到两者分界线作用的是长江天险，但实际上，东吴之所以能防御魏、晋几十年，依靠的却是长江以北的土地。历代的战略家谈到长江、淮河的形势时，都认为，要想保住长江，不能仅仅从长江入手，而应该进驻淮河，不让敌人抵达长江。一

旦敌人占了长江北岸，就可以随时发动渡江，即便一次不成功，也可以发动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某一次成功。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总结了这些看法，认为有淮河才有长江，如果没有淮河，那么长江以北的诸多港湾和芦苇荡中，都是敌人可以渡江的所在。杨万里则认为："固国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也。"(6)

不幸的是，在吴国与北方的对峙中，吴国虽然占领了一部分北方地区，却始终没有将淮河以南完全收入囊中。魏国和晋国始终牢牢地占据了淮河以南的一系列战略要地，如涂中、合肥、六安、广陵等地，作为进攻吴国的基地。正是在这种基调下，吴国虽然能够坚持几十年，却始终处于下风。

在晋国制订的伐吴战略中，就充分利用了这些战略要地作为前进基地，迅速推进到长江北岸，让吴国君臣闻风丧胆。

晋国的军事战略可以总结为五纵一横，即利用南下建业（南京）的五条南北道路，同时向南进军，对吴军形成压倒性攻势，再利用在四川境内囤积多年的水军舰船，顺长江直下，分别经过这五路大军的防区，直达建业。

伐吴的六路大军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彼此的协调。由于地理广阔，在古代几乎很难做到协同作战。然而，由于晋军上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做了长期准备，形成了成熟的决策和信息传递链条，使得协同不仅没有成为问题，反而成了优势所在。

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晋军的征服行动开始，五纵一横大军集结完毕，齐头并进向晋吴边境挺进。在中央层面上，起到统一指挥和协调的是大都督、太尉贾充，冠军将军杨济是贾充的副手。

纵向五路大军分别为：镇军将军、琅琊王司马伷从晋军占领的前线城市涂中出发，直接向建业（南京）以北进军，威胁南京的正北方长江；安东将军王浑从江西（现在的安徽长江西岸）出发，向巢湖进发，并试图攻克马鞍山附近的采石矶，这条线是历史上进出江东最成熟的线

路之一，也是战斗最激烈的线路；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这两路大军主要目的是占领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城市，便于进一步机动；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也就是从襄阳到荆州的线路，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关口，为晋军的舰队打通通路。

除了纵向五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沿长江直下的那路横向大军：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领巴蜀的水军，浮江而下，先后经过杜预、胡奋、王戎、王浑、司马伷的战区，与陆军配合。

六路大军一共动用了二十万人。

为了统一指挥权，不至于出现混乱，当王濬到达杜预的战区后，就受杜预的指挥，经过王浑的战区时，就受王浑的指挥。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初，双方的大军开始接触。陆路的五军中，司马伷、王戎、胡奋的部队任务相对简单，而战斗最激烈的，是王浑和杜预指挥的部队，他们面对的是沟通南北的最主要道路，受到的抵抗也最多。杜预为了征服荆州地区，甚至不得不调动了进攻夏口的胡奋部队。而王浑则直接遭遇了吴国丞相张悌的精锐部队三万人。

在张悌率军北渡之前，吴国将军沈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敏锐地觉察到晋军最可怕的部队不是五路陆军，而是从上游顺水而下的王濬水军。他认为，为了防御水军，吴军不应该过江，而是应该在南岸等待水军到来，再拼死一战。一旦击败了晋国的水军，其他的军队都会退却。

但张悌却仿佛知道东吴躲不过此次灾难，带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担心如果军队不过江，王濬水军没到，吴军已经丧胆溃散了。他宁肯北渡一战，用吴国的国运赌一赌。(7)

张悌毅然率军北上，不出意料，在陆战中吴军溃败，丢失了最后的精锐，张悌本人也死于阵中。

张悌的死亡和吴国精锐部队的丧失，注定了吴国灭亡的命运。然而，王浑战胜了吴国的主力军后，却并没有立刻渡江，他害怕独自承担

责任，担心万一渡江攻打建业失败，必然受到耻笑和惩罚。虽然部下都劝他赶快过江抢头功，但他却坚持，收到的命令只是打到江边，然后等待王濬的部队，再水陆联合一起进攻建业。与王濬一同作战，即便失败，责任也是共同承担。

王浑在江边等候时，王濬的水军已经杀了过来，他从成都一路南下，进入长江，到达江州（重庆）。再顺长江进军涪陵，在这里兵分两路，一路从彭水向东进入武陵（现湖南省常德境内），再顺水到巴陵（现湖南省岳阳）与主力会合。而主力部队七万人则继续顺长江直下。到达建平（现四川省巫山）时，由于吴军抵抗，王濬直接绕过建平，拔掉了建平附近吴军设在江中的铁索铁矛，进攻丹阳（现湖北省秭归）、西陵、荆门、夷道（现湖北省宜昌），直达江陵。

在江陵，本来王濬应该接受杜预的指挥，但杜预显然了解充分授权的重要性，写信给王濬，叫他发挥能动性，尽快赶往下游，不用等自己的命令。王濬立刻乘水而下，帮助王戎和胡奋攻打夏口与武昌。攻克两城后，王濬一刻不停，急忙向建业进发。

到达距离建业五十里的三山附近时，在长江边等候王濬的王浑发出命令，让他停船接受调遣，一同攻打建业。王濬此时已经停不下船，决定抢攻吴都，回绝说：“风利，不得泊也。”当天舰队就到了建业。

此刻，已经无计可施的吴国君主孙皓早已写好降表，分别送给了王濬和江北的王浑、司马伷，由于王濬的舰队当天就到达了建业，孙皓出城向王濬投降。

到这时，这场三国时期最大的协同作战宣告结束。虽然经历了二王争功的不愉快，但整体配合上的成功，以及时序上的精准，为未来的协同作战留下了一个不朽的榜样。

这场战争显示：南方虽然已经很富裕，但由于人口的缺乏、战略纵深的不足，仍然不足以与北方抗衡。不管是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还是张竑的江东战略，都很难在四川、两湖、赣江谷地、江东四大单元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协同，因为它们太分散了。

如果北方要攻打南方，最佳的战略方案是充分利用地图的宽度，将南方的几个地理单元逐个剥离，再兵分数路集中于江东。

在未来的一千多年内，这个战术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南方，不管是南北朝人还是蒙古人，都是在这个基本战术的基础上进行变形，获得更加机动的效果，完成了对南方的并吞。

那么，南方又依靠什么战略来进行自保呢？东晋的淝水之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

(1) 《晋书·食货志》：“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

(2) 《晋书·食货志》：“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余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3) 另一个适合屯田的地区是关中。这个地方受董卓之乱的影响最深，曾经全国最繁荣的地方早已经变成了荒芜之地。但在诸葛亮北伐时期，司马懿为了对付诸葛亮的进攻，在关中大量屯兵，为了供养士兵，只能大力发展农业。因此诸葛亮北伐的一个副产品是关中地区的农业和经济获得了恢复。

(4) 《晋书·食货志》：“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5) 进军蜀国的邓艾和钟会都没有善终。入蜀后，钟会首先污蔑邓艾谋反，后来又自己策划谋反，导致两人都被杀。一代名将邓艾看透了战争的秘密，却看不透政治的钩心斗角和自己的命运。

(6) 《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一》。

(7) 《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引干宝《晋纪》：“至牛渚，沈莹曰：‘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之。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来至此，众心必骇惧，不可复整。今宜渡江，可用决战力争。若其败丧，则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战，吴军大败。”

第八章　东晋时期的南北争霸（公元280—公元581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枢纽在寿春。寿春沟通南北的巢淝通道也成了当年的兵家必争之地。

司马炎希望靠分封诸侯王来防止吴、蜀故地的离心倾向，却由于赋予了诸侯王过大的权力，反而造成了西晋的分崩离析。

刘渊和石勒的出现，为中国军事史增添了另一种模式：如何利用山西的高原山地来统一中国的北方。

山西作为中原屋脊，有着发达的交通系统。两晋南北朝时期，山西进入陕西的通道有四条，进入洛阳地区的通道有三条，进入河北地区的通道主要有两条，还有无数小道。这些道路使得山西成了控制北方的锁钥之一。

要从山西统一中国，必须趁中原大乱之时。这是因为山西地理优势很明显，却缺乏粮食资源，当中原统一时，山西是无法抗衡的。

刘渊和石勒的策略都是首先占据山西和河北，拥有了地形优势与粮仓，再进攻洛阳，最后获取关中。这种策略成了中国北方最新版的统一路线图。

随着前秦的崛起和统一北方，加之前秦利用闪电战获得了四川，它已经控制了世界的三分之二。利用“晋灭吴”的模式，本来有机会并吞东晋，统一全国。

东晋比当年东吴命运稍好，在于它多控制了淮河流域几座城市，把战略线设在了淮河之上，而不是长江之上。

前秦完全采取了“晋灭吴”的模式，却在淝水之战失败了。它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数路大军没有有效协同，变成了各自为战；二、东晋在淮河的防守远比东吴守长江要有优势得多。

秦汉时期关中防卫中原的要塞在函谷关，魏晋之后，关中放弃了函谷关，改为在潼关做防守。之所以换到潼关，是因为潼关的山河之险更加利于防守，从此之后直到近代，潼关都是关中地区的最重要门户。

历代都是北方并吞南方，很少有南方统一北方，这一现象源于南北两方的战略纵深不同。南方由于缺乏战略纵深，一旦丢失了南京（宋代是杭州），政权就结束了。在北方由于战略点更丰富，南方政权很难通过占领单一城市而控制整个北方的局势。东晋南朝有过许多次北伐，都因为无法守住成果而失败。

2015年初夏，对寿县的拜访在大雨中进行。

前往寿县，需要从南京坐火车到淮南，再从淮南换两次汽车，到达这个淮河流域的小城。2015年淮河流域发大水，在火车上就可以看到，铁道的两旁已经变成了水的世界。大片的水面上，只有偶尔露出的高岗，许多房屋也只有房顶露出水外。

从古至今，寿县一带就是洪水的天下，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在淮河与黄河的共同作用下，和华北平原上大部分地区一样逐渐变成了沼泽地。如今，华北平原已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淮河地区却更加保留着水的特征，大面积的水域，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构成了寿县附近的主要地貌。

在从淮南去往寿县的途中，由于道路积水，甚至汽车都不能通行。寿县县城仍然保存着古代的城墙，城墙外就是那条著名的淝河。由于发水，水面已经超过了河堤，大量的水正涌出河道，倒灌进东面的城门，但路过的人们仿佛司空见惯，不带有任何的惊慌。

寿县，在三国两晋时期名叫寿春，是江淮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其重要性远超过现在的安徽省会合肥。这里经历过无数次的争夺，曹魏、东吴、两晋、后赵、前秦、北魏等国家为了抢占这个位于淮河和巢湖地区的枢纽，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拼死厮杀。

当年，曹魏正是占领了这个枢纽，并重修了著名的勺陂水利工程，将附近的沼泽改造成良田，才依靠屯田获得了对东吴的优势，在淮河流

域站稳了脚跟。灭吴之战的王浑主力军也是从寿春出发前往长江。

在寿县以北，就是著名的八公山。八公山属于大别山的余脉，只能算不起眼的丘陵，最高峰也不过只有两百多米。但由于寿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小小的八公山也成了这个枢纽地区的制高点，具有了军事价值。

八公山前流淌的淝河，就是当年淝水之战的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地理的原因，在南北争霸中往往是北方处于进攻的地位，而南方是防守的角色。北方为了进攻南方，创造了层出不穷的战术，魏晋两朝已经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利用“各个击破”和“协同作战”的方法，逐渐蚕食南方。

然而不幸的是，晋朝灭掉吴国不久，就丢掉了北方，仓皇南渡，陷入了当年吴国的境地。北方的强敌大可以学习当年西晋灭吴的战略将东晋掐死。

那么东晋王朝又是如何做到战胜北方强敌，顽强地将南方的国运延续了两百年呢？

这一切，都要从西晋王朝的失败谈起……

想巩固政权，却导致皇族内乱

司马炎建立的晋朝并没有形成稳固的根基。

晋朝是在三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三国之前，中国是统一的汉朝，但经过几十年的分裂，各国的社会已经有了不同之处。比如，魏国继承了汉代的集权制；而东吴则依靠江东的世家大族，权力更加分散；蜀汉由于地理的封闭，与其他地区相比有很强的离心倾向。

与秦朝遇到的问题一样，当中央政府将各地都统一在一个王权下之后，如何将统一的官僚制度也延伸到吴国和蜀国，形成有效的统治？

晋武帝司马炎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统一后，他随即开始了个人享乐，将问题堆积了下来。到他死前，他想到了利用同姓王侯进行统治的方法，这是借鉴了汉代的经验，却由于给同姓王侯赋予了过大的权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离心倾向。

晋朝时期，皇帝最担心的区域是四川和江东，而枢纽的位置则是荆州、淮南（也就是寿春和广陵所在地区）以及陕西（防范四川），晋武帝就设置了四个拱卫中原的大诸侯王，分别是占据关中的秦王、统领荆州地区的楚王、掌管江淮的淮王，以及占据原来曹魏故都许昌的汝南王。这四个王，再加上遍布全国的其他十几个王，共同构成了晋朝防御政变的军事体系。每一个王都拥有私人军队，其中管辖两万户以上的大国，可以有上中下三军，一共五千人；万户左右的次国，可以有上下两军，共三千人；五千户的小国也有一军共一千五百人。

为了防止王侯分裂，晋武帝最初不让各个王前往封国，而是住在首都。但在武帝晚年时，由于太子是个傻子，随着外戚势力控制了中央政府，武帝担心他死后外戚乱政，就让各个王回到封国，以便互相呼应防止外戚，这也是汉朝的经验。

但晋武帝没有想到，他建立的这套制度离心力如此之强，在他死后立刻引起了一系列的冲突。外戚、本家各王如同走马灯一样在朝廷出

入，你方被杀我登场，西晋政权也随即分崩离析。

最初干政的是晋武帝的皇后杨氏和她的父亲杨骏，接着惠帝皇后贾氏借助楚王司马玮的力量灭掉了杨氏。

随后掌握中央权力的是汝南王司马亮，以及太保卫瓘，贾后又将这两人视为眼中钉，借助楚王司马玮的力量除掉了他们。之后，贾后反咬楚王擅权，杀掉了楚王司马玮。

贾后为了巩固地位，废掉了太子，这给了另一位王侯——赵王司马伦——机会，司马伦起兵灭掉了贾后的党羽，并杀掉了反对他的淮南王司马允。

司马伦大权在握，又引起了齐王司马冏的反对，齐王联合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乂、河间王司马颙，击杀了赵王司马伦。

随后，四大王侯在政权分赃上又起了冲突，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先后杀掉了齐王司马冏与长沙王司马乂。

最后，司马颖和司马颙的统治又引得群情激奋，东海王司马越异军突起，消灭了两王。

司马亮、司马玮、司马伦、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颙、司马颖、司马越，八个王侯先后登台，除了司马越之外无人善终，他们引起的巨大战乱最终摧垮了晋帝国。

在八王之乱爆发时，原来属于蜀汉和东吴的地区，反对晋朝的武装斗争也展开了。在四川，曹操第一次进入汉中时，有一群少数民族（氐人）跟随他进入了汉中地区。到了晋朝时期，氐人继续迁移进入了四川。这支流民在李特兄弟的带领下，从顺从到反抗，最后建立了一个叫作大成的政权，在西晋的中央政府还没有崩溃时，四川就先分离了出去。

在孙吴统治的区域内，先后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最先是荆州地区一个蛮人张昌领导的反抗运动，张昌被镇压后，参与镇压他的晋朝将军陈敏随即占据了东吴的核心地区——江东，开始了新的叛乱。

幸运的是，陈敏的叛乱也被镇压了下去。司马越为了对付东吴的反抗势力，派去了一位诸侯王——琅琊王司马睿——去镇守江东，在王导、王敦两兄弟的辅佐下，司马睿在江东的统治成了东晋王朝开国的基础。

两赵之役：从山西统一北中国

八王之乱还没有结束，北方为西晋敲响丧钟的势力就出现了。刘渊和石勒的出现，也为中国军事史增添了另一种模式：如何利用山西的高原山地来统一中国的北方。

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战略基地是长安所在的关中盆地，以及洛阳所在的伊洛平原。然而三国时期关中地区遭受的巨大战乱，让这个曾经富裕的地区很难恢复过来，暂时无法与中原的富庶相抗衡。洛阳地区虽然拥有着极其险要的地理优势，却有一个克星——山西。

山西古称并州，位于黄河以东和以北、太行山以西，被黄河与太行山隔绝成一片特殊的地区。这里沟壑纵横，地貌支离破碎，地势较高，易守难攻，被称为中原的屋脊。不管从陕西、河南还是河北，想要攻克山西，都必须进入山区，顺着几条山间通道前行。而从山西进攻陕西、河北和河南，都占有着地利优势。

两晋南北朝时期，从山西进入陕西，进攻长安的道路主要有四条，分别是：

第一，从太原顺汾河而下，在河津市附近的龙门渡河，从北方进攻长安。

第二，从更南方的临晋关（蒲阪）渡过黄河，向西袭击长安。

上面这两条路都是利用所谓的河内地区，也就是山西西南方被黄河包裹的三角地，渡过黄河后进入陕西。

第三，从三门峡旁的黄河渡口太阳渡渡过黄河，到黄河南岸的三门峡（陕州），并入了长安—洛阳大道，沿渭河进攻长安。

这条路也是秦汉时期最常用的通道，直到隋唐时期仍然是连接两京的大道。

第四，从最北方的离石一带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的延安、榆林地区，再南下进攻长安。

这一条路是最偏僻的，古代较少被利用，因为它靠近山西西北部的蛮人区域。但石勒、刘渊本来就是少数民族，这条路对他们反而更加容易利用。

从山西进入河北的道路也有数条，这些路都利用太行山天然的峡谷通道进入华北平原。最著名的两条是通往邯郸的滏口道，以及通往石家庄的井陉道。两条路属于著名的太行八陉（即穿越太行山的八条通道），是八陉中最著名的。

从山西进入河南进攻洛阳的道路也有三条：一条是先进入河北，再顺着太行山东麓，南下经过荥阳进入河南境内，从东方进攻洛阳；一条是从太阳渡渡口渡过黄河，从西方进攻洛阳；还有一条是经过上党，过天井关，再过黄河孟津渡口，从北方袭击洛阳的道路。

正由于山西的地势高，道路四通八达，它成了一代枭雄寻找根据地，进而统一中国北方的最佳地点之一。如果要从山西统一中国，必须是趁天下大乱的时刻（或者弱政府时刻），因为山西本身耕地不够多，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如果中原是统一的且足够强大，即便山西拥有地势优势，仍然不足以与中原抗衡。可是一旦中原出现了乱局，就有人能够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逐渐将中原纳入手中。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将整个中原地区变成了碎片，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在曹魏时期，由于中原空虚，许多北方的蛮族人向南迁入了山西的山川之中，在这里形成了一定的聚居。比如，刘渊所在的匈奴部落就住在黄河东岸的离石地区。随着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各地的诸侯王不得不雇佣蛮人来作战。

在对抗东海王司马越时，成都王司马颖封了一位匈奴人做北单于，希望他能够帮助抗击位于北方的司马越的大将王浚和司马腾，这位匈奴

人就是刘渊。司马颖没有意识到，他的任命敲响了西晋的丧钟，将蛮人势力引进了中原。

刘渊的祖先进入山西的离石已经传承了四代，投靠过曹魏和司马氏的晋朝，到了八王之乱时，匈奴的根基已经稳固，将山西北部当作故乡，对中原也不再陌生和崇拜，反而有了一逐天下的意图。

得到封赏的刘渊并没有感激司马颖。回到离石后，他与手下商量，认为司马颖是把他当作另一个呼韩邪单于使用，当年呼韩邪单于就是西汉牵制北方蛮族的工具，而他则被司马颖用来打击政敌。他认为，大丈夫不要当呼韩邪，而应该当汉高祖，随即拉开了反晋的序幕。

刘渊的目的很明确：进军西晋的首都洛阳以及关中的中心长安，拿到两京，灭亡西晋。同时打出了复兴汉室的旗号，宣称汉高祖曾经把女儿嫁给匈奴王冒顿，从这个意义上，刘渊是汉室外孙的后代，所以定国号为汉。

刘渊的出发地是他的家乡——山西的左国城（现山西省离石），最终目标是洛阳和长安，但他并没有立刻西进，而是以河北为中间目标，看上了河北的广袤平原。为此，他派遣了二十位将军，十位从离石进入山西北部，再顺着太行山的井陉道进入常山（现河北省石家庄），再南下进攻邺城。另十位将军走山西中部的长子（现山西省长治），出滏口道，攻击朝歌（现河南省淇县）和邺城。

这次进攻实际上利用的是山西进攻河北的两条主道：井陉道和滏口道。

占据了山西、河北之后，刘渊就有了进攻洛阳的基地。随后，他派遣大军从三方面打击洛阳：一路大军从山西西部的安邑渡过黄河，从西面进攻洛阳；另外一路从长子直接南下；最后一路从河北进入河南，从东部打击洛阳。

这又是同时利用了从山西打击洛阳的三条通道。

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继续父亲的战略，攻克了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刘聪随即转向进攻长安，攻打了三次，才真正获得了长安，俘虏

了晋愍帝。西晋灭亡。

但刘聪政权并没有来得及稳固下来。东晋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刘聪病死，大司空靳准作乱，杀死了刘聪的儿子刘粲。最终，刘渊的族子刘曜登上了王位，改国号为赵，历史上称为前赵。

前赵本有机会统一中国北方，但刘氏战略中的一些小漏洞，却产生了致命的作用，使得前赵政权没有平定整个北方，反而被后赵并吞。这些漏洞是：在他们每一步的军事行动中，都没有把事情做踏实，留下了不少的军阀势力，到后来无法扫平。

比如，在山西扩张时，山西太原一带始终有一个忠于晋朝的军阀刘琨。而进攻河北时，河北的北方也有另一个忠于晋朝的军阀王浚。刘琨和王浚的实力都很强，前赵一直无法将其歼灭，反而养成了大患。而位于山东的青州，还有另一个军阀曹嶷。

到了后来，从前赵内部又分出了许多军阀势力，最典型的就是后来的后赵皇帝石勒。

当前赵以洛阳和长安为目标进军时，却忽略将这些军阀剿灭，到最后，处处都有反抗者。前赵的力量又不足以对付这些内部的反抗力量。更何况在南方，东晋已经占领了寿春、襄阳等地，如果不是晋元帝司马睿软弱，甚至可以收复中原。

在这重重的压力之下，前赵的君主无力消解，最终将统治权拱手让给了后来兴起的石勒。

石勒曾经是刘渊手下的将领，在攻克了洛阳之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直到完全占领了山西、河北之后，才与刘曜脱离了关系。

石勒统一北方、建立政权的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刘氏开基的翻版，也是从河北、山西开始，以进攻洛阳和长安两京为最终目标。但石勒的做法与刘氏又有一定的不同，这些不同决定了他能够取得更大

的成功。

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决定独立的石勒开始寻找自己的根据地。他放眼全国：在南方是后来的东晋元帝司马睿，洛阳已经被前赵占据，而在山东、河北、山西，除了一部分归属于前赵之外，还有几位强大的忠于晋朝的军阀占据的地盘，唯一能够占领的地方，是长江、淮河之间的一部分领土，以寿春为中心。他最初的目标定在了寿春一带，并以此为依托，要进攻江南。

司马睿发现了石勒的意图，连忙派大军进驻寿春，击败了石勒。在江南的大雨中，石勒军队饥寒交迫，损失大半。这也是石勒的命运最危险的时刻。

就在石勒走投无路时，他开了一个参谋会议，请求将领们提出各自的看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去哪儿？众人七嘴八舌，有人提议去河朔，有人建议先往高处避水，有的建议痛击司马睿的部队。

在众说纷纭中，谋臣张宾提出了一个建议：北上河北地区，在那儿寻找根据地。[(1)]这个提议开创了石勒的事业。他率军北上，当年便占领了位于现在河北省邢台的襄国城，并以这里为首都。

但在当时，襄国并非是一个理想的都城，在它的西方和北方，有两个强大的军阀势力，分别是并州的刘琨和幽州的王浚，在东部的青州则是另一位军阀曹嶷。在幽州、并州和青州的压迫下，小小的襄国城如同危卵一般随时可能被挤碎。

但在危机之中，石勒却看到了机会：如果他能够将幽州和并州各个击破，就占领了山西战略要地，并辅以河北的粮仓，这两个地方足以成为进攻洛阳的基地。当年刘渊也是靠山西和河北起家。而石勒要做得比刘渊更彻底，刘渊在没有清理完山西和河北时，就贸然南下，导致背后的根据地并不稳固，石勒则希望完全并吞之后，再行南下。

为了迷惑敌人，他首先向王浚和刘琨示弱，降低他们的敌意，然后，再以王浚为首要目标，北上幽州，王浚以为他是来效忠的，开城门请他进入，被石勒所杀。

除掉了王浚，石勒翻越太行山进入并州，赶走了刘琨，再返回幽州，消灭了王浚死后乘机盘踞在幽州的段匹磾。

占据了幽州和并州，是石勒事业的关键。但小心谨慎的他不想重新犯错，在进攻洛阳之前，先向青州进军，并吞了曹嶷。巩固了北方之后，方才南下攻击洛阳。在攻击洛阳的同时，又将东晋占领的兖州、豫州一带相继占领。

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石勒在已经巩固了洛阳周边的情况下，攻占了洛阳，第二年顺理成章占领了长安。

在前赵时期，当长安被占领后，北方各地还有大量的军阀存在，使得前赵虽然建国，但实际控制区域却是支离破碎的。而石勒的后赵从攻克长安那一刻起，就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帝国。中国北方除了凉州之外都已经在石勒的控制之下。第二年，凉州也向石勒称臣，虽然凉州政权一直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名义上，后赵已经统一了北方。

在石勒统一北方时，在南方的东部是东晋政权，四川则是氐人建立的大成政权，实际上又形成了一次三国鼎立的局面。只是，这一次的三国鼎立没有形成稳定结构，而是迅速分崩离析了。

石勒的国家也是短暂的。他可以建立一个帝国，表面上也消灭了敌对势力，但在将这个支离破碎的帝国从表面上捏到一块之后，却无法让它生长出筋骨变成真正的整体。只有帝国内部取得足够的经济发展时，才会产生足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蛮人的石勒懂得厮杀，却并没有完成后一步。

后赵攻克长安二十年后，再次陷入了内乱，一个叫作冉闵的将领夺取了皇权，建立了短命的冉魏政权。一年后，冉魏政权被北方崛起的慕容氏燕国所灭。北方再次陷入了分崩离析的混乱之中。

前秦：从关中到北中国

东晋永和六年（公元350年），一支氐人的部队在首领苻健的带领下完成了一次千里跃进，从位于后赵首都襄国南方的枋头城（现河南省浚县）迁往关中地区。这次迁移也成了前秦统一北方的第一步棋。

最初，氐族居住在甘肃天水一带，在苻健的父亲苻洪时期，恰逢北方乱世，苻洪先后投奔过刘渊的前赵政权和石勒的后赵政权。在后赵君主石虎时期，石虎为了保卫首都襄国，将大量的胡人从关中地区调往了中原内地，苻洪和他的族人也被石虎调走，驻扎在枋头城。

随后，后赵发生了内乱，石虎为了巩固统治，将原来守卫东宫的一批守卫（号称东宫力士）废黜，送往西面的边关。这些东宫力士走到雍城（现陕西省宝鸡）时，在梁犊的率领下发生了叛乱，迅速聚集了十万人，回头进攻洛阳。石虎派遣两员大将前往关中，镇压了梁犊。这两员大将中，一员是苻洪，另一员是姚弋仲，后来分别成了前秦和后秦的开国鼻祖。

借助镇压梁犊，苻洪回到了关中。但这次停留并不长久。

石虎死后，后赵进一步陷入了内争，最终掌握了大权的是权臣石闵（又称冉闵，石虎的养孙，后取代后赵建立大魏国，史称冉魏）。石闵意识到，苻洪回到关中地区，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要想防止苻洪叛乱，必须把他调回中原。

石闵的调令让苻洪愤怒不已，但他仍然遵守了调令，率领人马回到了枋头城。他开始与东晋政权接触，投靠了东晋，被封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

机会对这支氐人部队非常有利。在苻洪投奔东晋时，后赵政权已经进入了垮塌期，在后赵的南方和北方，两股势力夹击着要取代它控制中原。

在南方的势力就是东晋。永和五年、六年、八年（公元349年、350

年、352年），东晋权臣殷浩组织了三次北伐，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也占领了一部分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土地。

在北方，是一支新兴起的鲜卑族人，他们号称慕容氏，在如今的燕山以北建立了政权，号称大燕，历史上称为前燕。

慕容氏的燕国最终敲响了后赵的丧钟，在燕王慕容儁的策划下，前燕分三路大军从燕山以北向南挺进。他们首先的目标是燕山以南的蓟城（现北京），再以蓟城为基地南下攻取后赵的首都邺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京以北的战略地理进入了中原的视野。[(2)]

公元350年，燕王慕容儁率三路大军南伐，只用了一个月就攻克了蓟城。在这一年，石闵（冉闵）也终于废掉了后赵的君主，取而代之，改国号为魏。

两年后，冉闵被燕王擒获斩首，冉魏灭亡。前燕国定都邺城，成了占据中国北方东部的大国。

在东晋和前燕南北夹击灭亡后赵（冉魏）时，苻洪和他的儿子苻健却决定离开中原的是非之地，回到曾经占据的关中地区。

苻洪是位颇具战略眼光的统帅，他率领十万之众，要击败当时的几个对手，取得天下，难度并不大。[(3)]而最重要的是寻找一个“形胜”的根据地。他的军师麻秋认为，这个形胜之地就是关中。但真正实现占领关中，却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儿子苻健完成的。

苻健兵分两路：一路从孟津过黄河，从黄河南岸经过潼关入关；另一路走黄河以北，经过轵关，从蒲坂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从起兵到占据长安，只用了三个月。

前秦获得长安后，北方最主要的敌人是东部的前燕。[(4)]就在这时，东晋的一次征伐帮助前秦统一了北方。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东晋大将桓温北伐前燕，以失败告终。[(5)]但这次征伐却削弱了前燕，给前秦留下了机会。

公元370年，前秦大将王猛从关中出兵，首先占领了洛阳，将敌人吸引到南线，再派人经过山西走北线渡过黄河进攻晋阳（现山西太原）。当敌人两头无法兼顾时，王猛再从洛阳出发进攻上党。通过夹击，前秦获得了整个山西，从而具有了打击河北的地理优势。前燕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了。

前燕灭亡后，前秦获得了中原腹地，将长安、洛阳、邺城（前燕首都）三个战略要地都掌握在手，接下来就是由近到远收拾那些北方的小政权了。

首先要对付的，是处于关中平原上游的仇池国。仇池山位于甘肃省西和县西南，在当年诸葛亮北伐的祁山以南，是从汉中进入陇南地区的要道，也是进入四川地区的跳板之一。要想征服汉中和四川，仇池是一个很好的战略高地。

仇池国同属于氐族，其中一个杨氏首领趁晋末的混乱占据了仇池山，建国已经几十年。为了生存，他接受各个政权的封号，却顽固地保持着事实上的独立性。前秦时期，这种做法终于失效。在灭燕的第二年，苻坚派兵并吞了仇池国。

两年后，前秦击败东晋凉州刺史杨亮，获得了汉中地区。就在东晋政权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前秦大将杨安立刻率领三万人马从剑阁进入了四川盆地。[6]从双方在汉中交兵，到占领整个四川，前秦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当年曹魏费尽心机才占领的四川，被前秦轻松拿下。

除了拿下四川之外，公元376年，苻坚派出两路大军进攻位于河西走廊的前凉。大军分别从金城（现甘肃省兰州）出发，一路北上姑臧（武威），另一路沿湟水进入如今的青海西宁以东，再向北折入扁都口，直接到达张掖以南，截击凉军的后路。在夹攻下，前凉国主张天锡投降。

在北方，还有一个叫作代国的小国，它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魏的前身，但在前秦时期，代国只是一个偏僻的小国。就在攻克前凉的同年，苻坚以帮助匈奴人刘卫辰抗击代国为借口，发起攻击，代王投降。到这

时，前秦王苻坚已经彻底统一了北方。

前秦统一北方时，东晋却由于丢失了四川，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性。前秦随时可以从四川派军顺流而下，借助地理优势进攻东晋的湖南和湖北一带，乃至直接顺江而下进攻首都建康，当年西晋就是在这样的优势下进攻东吴得手。

在前秦没有获得四川时，双方显得势均力敌，各据中国二分之一的领土，获得四川后，前秦已经有了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领土。只要按照当年“晋灭吴”的模式，利用地理优势发起进攻，东晋的灭亡也指日可待。

但接下来战争的进程却并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式进行，东晋不仅没有被灭亡，还在淮河流域创造了新的神话。

那么，到底东晋是怎样抵抗住强大的前秦呢？

淝水之战，让人们更加意识到，决定南方命运的防线不在长江，而在淮河……

淝水之战：淮河防线成关键

东晋太元三年、前秦建元十四年（公元378年），前秦王苻坚怀着统一全国的野心，向东晋发动战争。

此刻，前秦已经获得了汉中和四川，将西面的边境线推到了三峡一线。但在下游地区，东晋却借助着北方恶斗的机会，占领了秦岭、淮河一线的大量战略要地。

在南襄隘道方向，东晋手中保留了南阳、襄阳、荆州等要地，占据了几乎整个南襄隘道。在河淮地区，东晋占据了彭城（现徐州）、下邳、淮阴、寿阳（即三国时期的寿春）等地区，将防守线推到了如今山东与江苏的边境上。

前秦要想进军江南，必须首先清理这些战略要地，将它们作为中间目标。只有获得了这些中间目标，才可能继续南下进攻东晋首都建康。

苻坚的军事部署也在东西两方面同时进行。在西面的荆州方向，以进攻南阳、襄阳为首要目标，主要军力共十七万人。在东面，则以淮阴、盱眙为目标，以便占据淮河。

这次战争的结局对于前秦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前秦占领了若干处战略要地，特别是在西部，攻克了南阳和襄阳，打通了汉江通往长江的通道，并在荆州对东晋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而在淮南地区，前秦却在初期的成功之后遭遇了惨败。最初，前秦顺利攻克了淮北重镇彭城，打开了进军淮河的通道，接着攻克了战略目标点淮阴和盱眙，获得了淮河上的立足点。最后直捣长江上的广陵（现江苏扬州）。但随后，晋军反扑，将秦军赶回了淮河以北，秦军最终只获得了彭城。

战争结束后，双方的地理分界线已经南移。南阳、襄阳、彭城等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城市进入了前秦的疆域。这些城市的易手，让东晋的防御捉襟见肘起来。对东晋来讲，它此刻的处境与当年灭亡前的东吴已经

极其相似。

在公元280年西晋伐东吴的战争中，西晋占领了四川、陕西和中原，在湖北的分界线也是以襄阳为界，东吴占荆州，西晋据襄阳。东晋与前秦的分野也同样划在了这里。

东晋唯一比当年东吴强的是在淮南地区。当年西晋占领了寿春、淮阴等地，将边境打在了淮河与长江之间，而如今寿春（寿阳）和淮阴仍在东晋的掌握之中，没有被前秦夺走。所以，东晋的战略纵深比当年的东吴稍强。

但就是这一点点区别，造就了淝水之战的奇迹。

东吴之所以速亡，在于它没有足够的纵深来进行防御，它的防御线就设在了长江之上，一旦长江失手，政权立刻崩溃。东晋由于多了一点儿纵深，战略防御设在了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虽然防线只比东吴北移一两百公里，但不要小看这一点儿距离，即便到了现在，寿春周围到了雨季也是泥泞不堪，在当时更是河流密布。这种地形对于北方军队来说就是死地，一旦陷入其中，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苻坚终于下决心完成一次规模巨大的协同作战，其作战方略基本上照抄了西晋伐东吴的策略。

前秦的兵马分成了四路大军：第一路是从四川沿长江而下的水军，试图模仿当年王濬顺江而下直捣建业的壮举；第二路是在襄阳集结的陆军，这一路军进攻荆州境内的据点，并配合第一路水军完成从西面的进攻；第三路是苻坚率领的主力军，负责从中原南部的项城（现河南南部）进攻寿阳（寿春，现安徽省寿县），从寿阳沿巢淝水道可以到达东晋守卫的历阳重镇（现安徽省和县，在马鞍山以西的长江对面），再在当涂附近过江进攻建康；第四路部队来自河北，他们从彭城而下，沿泗水进入淮河，直指广陵，直下建康。

关于前秦军队的人数，史书告诉我们有慕容垂率领的二十五万前锋，再加上长安的骑兵二十七万、步卒六十余万，绵延千里。苻坚的主

力部队已经到了项城，凉州兵才到达咸阳。就连运输辎重的船舶都有上万艘，沿黄河、汝水、颍水直达淮河流域。作为比较，当年西晋伐东吴动用的军队不过只有二十万人，苻坚以几倍的数量作战，必然能够产生更大的动力。

在东晋方面，抵抗力并不比当年的东吴强。为了对抗苻坚，晋军分成了东西两翼，西翼以荆州为中心，由桓冲指挥；东翼以江淮为中心，由谢安指挥。

更无望的是，东晋的军队是错配的，其中西翼有十万人，而东翼只有八万人。人数更少的东翼却要抵挡前秦的主力大军。

虽然前秦从实力到战略都处于优势，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个弱点在于协调能力。当年西晋部队之所以能够攻克东吴，除了复杂的战略、数路并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协同。西晋的五路大军与王濬的水军必须在时间上配合好，从各个方向共同挤压东吴的防线，直到将其压垮。为了协同，西晋专门设了司令官贾充，负责处理数路大军的协调工作。

苻坚既然模仿了西晋的战术，也必须在协同上慎之又慎，要求各路大军能够同时发起进攻，并协调作战。特别是由四川而下的水军，如何与其余各路相配合，也是一个难点。当年西晋作战时，依靠杜预的宽宏大量，对王濬充分授权，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苻坚刚刚统一不久，他的军队是由各个征服地域抽调的，缺乏协同能力，在战争中无法做到有效的协调。更致命的是，苻坚本人就是一路军的总指挥，当他离开了大本营之后，各路大军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下命令协同的司令官，结果，一旦出发，立刻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

其中，苻坚自己率领的攻寿阳部队在他的督促下，按时到达了战斗位。从襄阳出发的慕容垂也较早赶到，投入战斗。其余部队却拖拖拉拉，不知所措，形不成配合。结果从出发开始，前秦模仿的西晋战略就变了味，向着失控滑去。到最后，变成了其他各路在观望，只有苻坚的主力军在战斗的局面。

当其余各路无法协同时，苻坚领导的主力军将秦军的第二个缺点无限放大：淮河流域的泥沼起作用了。

由于地形复杂造成的移动过慢，在进军寿阳的过程中，苻坚等不及后续军队的到来，突然决定速战速决，在大军还没有集结完毕时，就率领一部分军队向寿阳快速行军。这样，秦军人多势众的优势被削弱了。对于晋军而言，最大的机会则是趁秦军集结未稳，尽快发动进攻，将苻坚一举击破，形成震慑效应，逼迫其他部分退军。

双方在淝水河边相遇。

交战时，晋军指挥官谢玄向苻坚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建议：希望秦军暂时后退，让晋军能够渡河作战。这个提议让苻坚欣喜不已，认为可以让晋军渡河之后，形成背水阵，没有退路时，再将晋军完全歼灭。

这本身是一个没有问题的策略，但苻坚没有想到，他的部队由于缺乏必要的协同能力，竟然连整体后撤的动作都无法完成。在秦军集体后撤时，晋军降将朱序乘机大喊："秦军败了！"随后，秦军的阵形彻底散掉，从后撤变成了逃跑，苻坚再也无法有效指挥部队，被晋军掩杀。

苻坚主力败退后，各路大军在没有到位时就开始撤离。更为复杂的是，前秦由于刚刚统一北方不久，各地仍然弥漫着对前朝的记忆。当秦军败后，各地迅速开始了重新独立运动。于是，中国北方再次碎成了小块，并且破碎得比以前更彻底。

在东方，慕容氏的后裔建立了后燕，在西方还有一个小小的西燕存在，曾经占领了长安，最后定都长子。前秦的西部关中平原则被姚苌占据，建立了后秦，苻坚也被姚苌俘获杀死。苻坚的大将吕光在河西走廊地区建立了后凉。鲜卑人的代国也重新复国，后来改为魏国，是为北魏。

南方东晋的疆界也达到了分裂后的极致，北达黄河边，将荥阳、洛阳等重镇收复。原来丢掉的四川、襄阳等地也尽数取回，只有汉中地区仍然掌握在北方的后秦手中。

淝水之战的胜利，让人们意识到，西晋灭吴式的胜利不是北方的必然。西晋之所以胜利，包含了几个条件：第一，获得四川；第二，在淮河以南获得立足点，尽量将防线压到长江上，减少南方的纵深；第三，各条战线协同作战。

一旦这三个条件无法同时满足，北方的军队可能会陷入淮河流域的泥沼之中，那就是南方的机会。

但接下来，东晋遭遇的是另一个问题：守住了南方之后，它必然选择北伐收复中原。那么，南方北伐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不管是诸葛武侯还是张竑都曾经提出了南方北伐的战略，却都没有成功。东晋在同时获得了江东、赣江谷地、两湖盆地和四川这几个地理单元后，终于有机会北伐了。

它能成功吗？

尴尬的北伐

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东晋大将刘裕组织了东晋南朝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北伐。北伐的对象是盘踞在关中、洛阳地区的后秦。

在东晋后期刘裕掌握朝政后，这位能量充沛的平民将军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除了北伐之外，还包括镇压反叛的一系列内战。在内战中，他先是剿灭了篡位的桓玄，又镇压了孙恩和卢循的起义。在桓玄篡位中，四川脱离了中央政府，另立了一个叫谯纵的新王，刘裕还组织了征伐四川、剿灭谯纵的战争。除此之外，刘裕还和当年一同反对桓玄的兄弟们反目成仇，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压活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篡夺东晋政权做好了准备。

在这一系列的征伐中，最著名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北伐。

刘裕的北伐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讨伐南燕的战争。当北魏灭亡了后燕，燕国的一部分残余在如今的山东境内建立了南燕国，定都在距离齐国古都临淄不远的广固（现山东省青州）。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率军走水路，在广陵（现江苏扬州）经过邗沟向北进入淮河的淮阴，再从淮阴顺淮河直上，到达泗口（泗水入淮河的河口），经过泗水到达下邳。在下邳弃船登岸，向琅琊（现山东省临沂）进军。占领琅琊后，再经过莒县，翻越沂山，进军广固，灭亡了南燕。

南燕灭亡时，曾经向后秦求救，从那时开始，刘裕心中就种下了对付后秦的念头。在处理完内部问题，获得了东晋的绝对控制之后，公元416年，做过精心准备的刘裕亲自率军进行第二次北伐。

在制定进军线路时，刘裕特别注重战争的可持续性，最主要的自然是后勤问题。他参考了前面几次北伐，认为，进军关中的道路无非就三条，分别是：从四川、汉中地区北上翻越秦岭的道路；从南阳走武关、蓝田，直接进入关中的道路；以及从东面的河南境内走三门峡、潼关进入关中的道路。

但刘裕并不相信前面两条道路，第一条曾经被蜀汉丞相诸葛亮多次尝试，却徒劳无功，这条偏僻的道路一是太难走，二是后勤问题无法解决。在前几次东晋的北伐中，也曾经尝试过走汉中，却都以失败告终。

至于第二条，武关—蓝田路，同样由于山路过险，后勤问题突出，历次北伐凡是直接采取这条路的，也都失败了。

如果要解决大军的后勤问题，只有选择第三条路，也就是走黄河、渭河进入关中的道路。在大军前进时，辎重部队沿着河流跟随，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军队士兵手中。

基于这样的考察结论，他放弃了第一条四川—汉中道，对第二条道蓝田—武关道，也只派遣了一支小部队，由将军沈田子率领，起到牵制和骚扰的作用。

至于大部队，都安排在了第三条路上，也就是从洛阳向西，进入三门峡地区，走潼关进入关中。

在秦汉时代及以前，连接长安和洛阳的关口主要设在了如今河南省灵宝市境内的函谷关，这条路修建在一条巨大的峡谷中，人走在其中如同进入箱子里。但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关中的防卫者发现了一个更加显眼的、可以设立屏障的地方，这就是函谷关以西百里左右的潼关。

潼关位于黄河边的一个小土塬上，土塬睥睨着远处的黄土地，四面都是高耸的崖壁，如同一座天然的堡垒，让人肃然起敬。更难得的是，在潼关以南紧挨着土塬，有一条天然的大沟——禁沟。这条大沟长三十里，深达百米，两岸的宽度只有十几米，禁沟东西两侧的人可以隔着禁沟聊天，但如果想一块儿去下棋，却要顺着近乎垂直的沟壁下到沟底，再从另一边爬上去。如果有人率军从东方攻打潼关以西，仅仅一条禁沟，就需要折腾半天才能通过。

潼关也是后秦防守的最关键所在。在刘裕的计划中，为了攻打潼关，大军必须先在洛阳进行休整、集结完毕后，再西进潼关。

当时洛阳也不掌握在东晋手中，而是被后秦占领。于是，东晋的战略就成了这样：首先派遣各路大军从不同的道路赶往洛阳，在洛阳集结

完毕，再一同西进潼关。

派往洛阳的部队走的路线也各个不同，其中先锋部队由龙骧将军王镇恶和冠军将军檀道济率领。先锋之外，另一支陆军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领。接着是建武将军沈林子和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的水军，他们从黄河顺水而上。

在这些军队之后，是刘裕亲自率领的主力。大军从江南出发，沿淮河和泗水赶往彭城，利用位于现山东省巨野的一个大湖巨野泽（沟通了黄河与泗水）进入黄河河道。水路的运输能力，既能保证大军的运输，也保证了后勤补给。

大军出发后，最初的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王镇恶、檀道济顺利攻克了洛阳。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达成。

两位将军应该等刘裕的大军前来，再一并兵发关中。但王镇恶和檀道济被前面的胜利所激励，没有等刘裕的大部队到达，就率军西进，直达潼关脚下。在这里，他们遭遇了后秦的顽强抵抗，虽然突破了潼关，但秦军随即退到了距离潼关不远的定城，在这里，两军陷入了僵持。

先锋已经陷入苦战，刘裕的大部队却由于绕远，迟迟无法到达。加上当时黄河的两侧属于不同的国家，北面是北魏的领土，南面则被东晋占领。由于担心晋军“假道灭虢”，北魏派出大军边设防边骚扰晋军，拖慢了刘裕的速度。刘裕于几个月后，才到达了河南与陕西交界的陕县，与两位将军距离不远了。

就在人们揣测接下来战争应该怎么打时，突然间，一条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原来，刘裕曾派遣沈田子率领三千人马进军武关，希望对敌人进行骚扰和牵制。不想，当后秦在潼关一带投入大军抵御王镇恶时，却漏掉了对沈田子的防御。沈田子不仅攻克了武关，还率军直达蓝田的青泥关，已经进入了关中平原，距离长安还有百里之遥。

仓促之间，后秦皇帝姚泓不知道沈田子的部队有多少人，连忙将征召来防守潼关的大军派往青泥关对付沈田子。而刘裕却知道沈田子人手不够，只有三千人而已，连忙派遣士兵从华山翻山而过，走险峻的小道

去支援沈田子。

沈田子的出现吓破了后秦将士的胆，在随后的战斗中，沈田子以极少的兵力击溃了后秦军队。这次决定性的胜利也帮助了潼关一带的将士。在王镇恶的率领下，晋军一路掩杀，直达长安，敲响了后秦政权的丧钟。

这次北伐帮助刘裕获得了黄河以南的中原，以及整个关中地区，本来可以成为一次历史教科书式的远征。但是，当军事成功之后，事情却变得更加复杂。

由于在建康安插的心腹死亡，刘裕急忙赶回了江南，去稳固自己的势力并组织禅让，从东晋皇帝手中接过政权。他把关中留给了未成年的儿子刘义真（时年十二岁），并让大将王镇恶辅佐刘义真。王镇恶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在关中地区有着很高的威望，他的辅佐有利于稳固关中。

但刘裕又不放心王镇恶，害怕他寻求独立，于是又安排沈田子来监督和牵制王镇恶。不想他离开后事情随即恶化，沈田子害怕王镇恶谋反（这可能是子虚乌有），先下手为强杀死了王镇恶。另一位大臣王修以沈田子滥杀大臣的名义，诛杀了沈田子。随后，刘义真又杀掉了王修。

王镇恶和沈田子，两位在北伐中功劳最大的将领就这样死于非命。

更严重的事情来自外部。在北方，一位叫作赫连勃勃的匈奴人建立了一个政权号称大夏，对关中地区早已虎视眈眈。当他听说刘裕退兵后关中闹起了内乱，立刻率军进入关中。他采取了“关门打狗”的战略，进攻潼关，同时封锁了武关以北的两座要塞青泥和上洛。这三个地点的封锁，让关中的晋军没有退路，要想直接回中原和江南已经回不去了。之后，赫连勃勃对长安发起了攻击。

刘裕一看事态恶化，连忙召回儿子，让大将朱龄石负责关中事务。但由于王镇恶的死亡，关中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晋军，朱龄石掌握军权后，关中人民也跟着赫连勃勃一同反对晋军，朱龄石逃跑时被抓获斩

首。

刘裕北伐进军关中虽然获得过阶段性胜利，最终却一无所获，折损了数员大将和大量的军队，却为别人作嫁衣，将关中让给了赫连勃勃。

这次北伐的命运，也是其他历次北伐的一个缩影。在整个东晋南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所有南方政权发起的北伐大都虎头蛇尾，以失败和得不偿失告终。

比如，在东晋刚建国时，旅居在京口的祖逖就曾率军北伐，表示不收复中原不回头，他攻克了江淮间的某些地方，最后以寿春为基地进行抗战，直到死亡。祖逖的弟弟祖约卷入了苏峻的叛乱，死于内战之中。这次北伐没有跃出淮河流域，更别提收复两京。

东晋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开始，东晋以殷浩为首组织了三次北伐，第一次以彭城和长安为目标，第二次以后赵的首都邺城为目标，第三次到了许昌，最后全都吃了败仗而回。

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东晋权臣桓温以长安为目标发起北伐，到达灞上，距离长安只有一步之遥，但仍然失败而回。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以前燕为目标发动北伐，再次失败。

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后，北方大乱，本来是收复中原的好时机，但东晋的进攻仍然只能停留在黄河以南，最多只是在如今的山东境内更向北一些。

刘裕的北伐最接近于成功，但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即便刘裕攻克了长安，却无法持久占领。人们设立了许多假设来证明刘裕已经成功，比如，如果刘裕不回去争夺皇位，而是留在北方，也许长安就不会丢失；东晋大将如果不出现纷争，就没有赫连勃勃的机会，等等。但这些假设即便应验，南方仍然很难守住长安。

进入南北朝时期，仍然有北伐，比如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文帝的北伐，一举打到了黄河沿岸，占据了数个战略要塞，但最终仍然

败还，留下了“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千古遗憾。

到了后来，南朝的政治越来越糟糕，实力越来越弱，就只有等待北朝南伐的命运了。

如果把历史界限放宽，就会看到，从蜀汉时期开始计算，直到元代，都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案例。明太祖朱元璋第一次利用元朝末年的混乱，投机取巧成功了，但这个特例并不能改变南弱北强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南方的北伐大都以失败告终，无法取得持久的成就呢？答案隐藏在中国的战略地理之中。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政治地理中心在长江边上的南京，一旦南京失守，就宣告南方政权的结束，所有的抵抗也会慢慢终止。皇帝即便想逃也没有地方可逃：在当时浙江杭州一带仍然属于边缘地带，政治影响力不足，蛮人多，逃到那儿就基本上丧失了对中原的影响力；荆州一带虽然是战略要冲，但由于它四面临敌，如果实力不足，逃到荆州就等于陷入了死地；湖南和江西如同两个布袋，一旦进去就难以出来。所以，南方政权就相当于南京政权，北方攻克南京，就等于大功告成。

而北方的政治地理却要复杂得多。在北方缺乏一个一旦占领，就能让所有抵抗土崩瓦解的中心。

比如，刘裕可以暂时攻克长安，但是在山西、河北、甘肃仍然可能会有大量的抵抗力量，一旦刘裕松懈，这些力量就会将他赶走。在洛阳也是如此，如果不获得山西的控制权，仅仅占领洛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山西的敌对势力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攻洛阳。在东面，仅仅占领河北也没有意义，同样是山西的存在，使得占领成本太高，无人能够承受。

所以，南方政权如果要北伐成功，必须控制洛阳和长安；为了稳定控制洛阳和长安，必须获得山西；而为了获得山西，必须进攻塞外，环环相扣，到最后，没有人能够完成如此众多的任务。

历代历次北伐行动，只有刘裕完成了攻克长安这一步，而大部分甚至连洛阳都没有攻克，就已经结束了。更多的则陷入了在淮河流域或者荆襄地区，对某一个具体城市的争夺，在耗尽了军事资源之后，就回军

了。

最终，秦岭—淮河就成了中国军事地理的分界线，如果南方政权能够控制秦淮一带，就能暂时稳定住，但他们最多也就是达到秦淮一线，无法继续向北。只有北方政权能够一举而下，冲破秦淮防线，攻克南京，统一中国。

直到近代，热兵器的普及、机械化的使用，才有可能改变南方的命运，但即便如此，北方在战略地理上的优越性，可能仍然无法改变。

(1) 《晋书·石勒载记》：“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

(2) 关于北京地区的防御形势，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有详细介绍。

(3) 《晋书·苻洪载记》：“洪谓博士胡文曰：‘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俊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

(4) 在北方还有几个小国。在西北的凉州（河西走廊），前凉曾经向后赵称臣，后赵灭亡后，前凉又独立了。在北方的河套地区，出现了另一个少数民族国家——鲜卑人的代国（也就是北魏的祖先开创的国家）。在陇南的仇池山区，还有一个氐族人建立的仇池国，这个小国既接受东晋的封爵，也接受前秦的封爵，却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

(5) 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桓温曾经北伐前秦，以失败告终。这次北伐前燕同样以失败结束。

(6) 四川盆地此时已经归属东晋。公元346年，大将桓温从荆州沿长江而上，进入岷江攻陷成都，结束了四川的大成政权。

第九章　南朝：长江混沌战（公元307—公元581年）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内战，是围绕着两座城市的战争。长江下游的建康（南京）与长江中游的荆州组成了一个长江轴心，形成了两极争霸，主导了东晋南朝的政局。

在轴心的一端，是以首都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两岸，这里是皇帝所在，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区域；在轴心的另一端，是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和襄阳盆地，这里往往由一个权臣所占据。由于占据了荆州这个仅次于建康的经济中心，这个权臣的实力足以和中央对抗。

围绕着这条轴心，南方的内乱常常是荆州与建康的对抗，工具就是水军，道路就是长江。

南方的“建康—荆州”权力轴心，在三个方向上会发生变奏。三个方向分别是：第一，首都建康北面，长江、淮河之间地区，这里也是南北政权交战的主战场；第二，首都建康东面苏州、杭州一带，这里是建康的粮仓，稳定首都的关键；第三，江西赣江谷地和湖南湘江谷地，顺赣江和湘江可以直达两广地区，是长江的重要侧翼。

要想理解南方的军事行动，必须记住一个轴心，两个重点区域（建康和荆州），三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四条江（长江、汉江、湘江、赣江），五座城市（镇江、马鞍山、九江、岳阳、武汉）。

东晋开国时期王敦与晋元帝的关系，为后来东晋南北朝的“皇帝—权臣”模式提供了样板。南朝在这个模式中颠簸了三百年，才被北朝灭亡。

东晋的第二个权臣是位于荆州的陶侃，但他本人野心不大，不想篡夺皇位，只想守住权力。陶侃帮助东晋击败了叛乱者苏峻，帮助东晋稳定了政权，并获得了南方人士的承认。

从重庆通往成都的河流主要有三条，分别是内水（涪江）、中水（沱江）、外水（岷江）。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盆地内的战争，往往从

三条河流中选择进攻线路。

桓温、桓玄父子作为第三代权臣，虽然没有完成改朝换代的步骤，却为接下来的刘裕提供了榜样。刘裕作为第四代权臣完成了改朝，建立了南朝宋。

卢循是中国历史上从广东进攻北方的开创者。从广东进入北方的主要通道是赣江谷地和湘江谷地，北伐往往是从这两条路中进行选择。

南朝梁末年荆州的丢失，决定了南朝再也没有能力与北方抗衡，下一个统一时代即将来临。

在南京老城城西，有一处叫作石头城的地点。如今的石头城被开辟成一个国防园，还放了一些飞机大炮等武器供游人参观。这个身份倒是很符合石头城的历史地位。

历史上，石头城曾是南京最险要的要塞，也是南京城的拱卫之一。

石头城如今已经是南京城墙的一部分，但在历史上却是单独的一座小城池。孙权时期，为了守卫首都建业城，在建业城旁边毗邻秦淮河的清凉山上修建了一座城，由于整座山是一座石头山，城池就命名为石头城。

石头城的建立就是为了屯兵和守卫首都。从东吴开始，到东晋南北朝，各个在南京建都的朝廷对于石头城的守卫都特别重视。那些企图进攻首都的人，也都知道，要攻克首都，首先要占领石头城这个制高点。

直到明代，修建新的南京城墙时，才将城市面积扩大。石头城也包括在新的城墙以内，整个石头山就成了城墙内的最高点。在修建城墙时，有一块岩石过于突出，无法包在城墙内，于是城墙外就露出了一块大石头，如同巨大的鬼脸，人们因此称它为“鬼脸城”。

由于石头城并入南京，久而久之，南京就有了石头城的别名。

从东晋南迁开始，到陈朝灭亡，首都建康成了南方最大的战场。这里除了经历过历次改朝换代的战争之外，那些企图篡权的野心家也时常

率军来到这里。从东晋建立伊始的王敦、苏峻、祖约，到南朝将近结束时的侯景，都进攻过这座长江边的城市。

南方政权纷纭扰攘，却给北方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每一次内战都削弱了南方的实力，北方借此逐渐蚕食着南方。从南朝开始，南方的国土面积在逐渐缩小，从最大时期抵达黄河南岸，到最后丢失了四川、荆州和长江以北的所有地区。

陈朝建立时，南方只剩下了江东地区与赣江谷地，丧失了淮河流域的一切战略据点。到这时，被北方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当长江流域的南朝发生内战时，除了建康这一个战略地点之外，还有另一个点同样重要，那就是位于西面的荆州。如果一个朝廷能够同时控制这两座城市，就控制了南朝的政局；如果朝廷只拥有建康，而将荆州让给了另一位权臣，那么朝廷就陷入了巨大的不稳定。

长江混战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两座城池的控制权争夺上。荆州和建康也因此见证了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时光的血雨腥风。

荆州与建康的两极争霸

如果我们要根据地理来总结战争模式，那么南方比北方要相对单调。在北方，最重要的几个地理特征是：黄河、关中平原、山西山区、洛阳盆地、南襄隘道、秦岭、太行山、华北平原、淮河；次一级的地理特征包括：固原盆地、河套地区、陇西、汉中、太行八陉、渭河、汾河等。任何一个制订战略的人都必须吃透这些地理要素，才能制定出万无一失的战略模式，来指导军事行动。

但在南方，由于山区太多，直到魏晋时期仍然发展得不如北方，使得人们大都居住在河谷地带。具体而言，南方的居住区主要在建康所在的长江中下游（江东）、九江和南昌所在的赣江谷地、两湖盆地、四川盆地这几个地方。两湖盆地还可以细分，包括长沙和岳阳所在的湘江谷地，以及以荆州（江陵）和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

这几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交通主要顺着几条河流沟通，分别是：长江、赣江、湘江和汉江。南方的战争模式，也主要围绕着这几条河流展开。

在东晋南朝时期，几乎所有的南方内部冲突中都包含了一条明显的哑铃状的权力轴心，这条轴心由两个区域所界定：在轴心的一端，是首都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两岸，这里是皇帝所在，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区域；而在轴心的另一端，是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和襄阳盆地，一直延伸到武汉一带，这里往往由一个权臣所占据。由于占据了荆州这个仅次于建康的经济中心，这个权臣的实力足以和中央对抗。

连接建康和荆州这两大中心的是长江，于是建康、荆州和长江，共同构成了东晋（包括南朝）的权力轴心地带。

围绕着这条轴心，南方的内乱常常是荆州与建康的对抗，工具就是水军，道路就是长江。双方的战争形式也较为简单，就是率领水军沿长江而动，不是你把我赶到长江头，就是我把你逼回长江尾。

另外，这条巨大的权力轴心地带还有几个小小的分支：围绕着建康，上游的马鞍山一带是一个巨型渡口，下游的镇江地区是另一个巨型渡口，这两个地方也都有通道可以进入淮河一带，所以，人们除了争夺建康之外，也利用这两个地方的淮河通道进行军事行动。

另外，在建康东南的江浙一带，主要是苏州和杭州这两个地方。这些地方由于地处偏远，政治势力有限，却是建康的粮仓，如果要保有建康，这两个地方也是不能丢弃的。

围绕着荆州（直到武汉），也有若干种变化，比如，从武汉可以顺着汉江直达襄阳，而从襄阳可以从陆路到达荆州，于是，襄阳、荆州、武汉组成的三角地域以内，又是一个军事行动密集的地区。

除了两头之外，在中间的岳阳和九江、湘江和赣江汇入长江。顺着湘江和赣江向南，可以直达南岭地区。同时，湘江谷地和赣江谷地也是出产粮食的好地方。于是，人们在争夺哑铃两端的建康和荆州时，又往往将湘江谷地和赣江谷地当作中间目标。

除了这些要地之外，其余的地方覆盖着山脉和森林，很难展开作战。所以，要想理解南方的军事行动，必须记住一个轴心，两个重点区域（建康和荆州），三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四条江（长江、汉江、湘江、赣江），五座城市（镇江、马鞍山、九江、岳阳、武汉）。理解了这些重点区域，也就可以看透纷繁复杂的南方战争了。

王敦："皇帝—权臣"模式的开创者

永昌元年（公元323年）闰十一月初十，东晋开国五年之后，晋元帝司马睿死在了宫中。[1]他死前已经心灰意冷。虽然他是东晋的建立者，却作为失败者死去。

在半年多以前，他的大将王敦刚发动了一次针对皇帝的战争，攻克了首都建康，杀死了他倚重的尚书令刁协，赶走了镇北将军刘隗。

王敦占领首都后，晋元帝只好写信给他说："如果你心里还有晋朝，就息兵让天下安定一会儿吧。如果你心里已经没有了，我就回我的琅琊（晋元帝当皇帝前，是琅琊王），退位让贤。"

王敦暂时没有废黜晋元帝，却开始为禅让做准备。半年后，晋元帝离世，将不确定的未来留给了继任者。

王敦与晋元帝的关系，也为后来东晋南北朝的"皇帝—权臣"模式提供了样板，在这种模式下，权力从皇帝的手中转移到了众多的地方霸权者手中，并在这些霸权者之间形成一种脆弱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产生出一个超级巨头，这个巨头的权力比皇帝还要大得多，到这时，就变成了超级巨头与皇帝的对抗。如果对抗成功，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如果对抗失败，那么皇帝周围就会产生新一批霸权者，等待着下一次机会。

在东晋时期，前几次超级巨头与皇帝的争夺都是失败的，但为后来的人积累了经验，直到刘裕出现后，取得了成功，推翻了东晋建立了南朝宋。刘裕的榜样又带来了接二连三的跟随者，直到最后一个超级巨头侯景出现。侯景的叛乱打碎了梁武帝时期的繁荣，由于破坏性太大，导致南方政权疲弱到再也无力抵抗北方政权。北方政权的统一战争结束了南朝的"皇帝—权臣"模式。

不过，王敦在最初并不是晋朝的敌人，反而是东晋开国的功臣。

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当西晋帝国在蛮族的打击下解体时，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看到北方已经乱成一团，派琅琊王司马睿到江东地区镇守。司马睿邀请了一位叫作王导的人做他的亲信，帮助他治理江南。而王导的堂兄弟王敦则被司马越任命为扬州刺史，随后王敦为司马睿所用，成了东晋开国的另一位元勋。

于是，东晋从开国伊始，就形成了权臣掌权的局面，其中王导在首都建康和中央政府层面制定政策、安抚民心。而王敦则使用武力，从扬州出发，将上游不肯听从司马睿指挥的各个州郡一一征服。

在最初，司马睿连首都都无人听从，后来逐渐征服扬州，再向上游夺取江州（治豫章，即江西省南昌）、湘州（治长沙）、荆州（治襄阳），成就了东晋的江山。二王功勋卓著也大权在握，被称为“王与（司）马，共天下”。

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固，晋元帝也开始考虑削夺权臣权力的问题。自从汉代以来，皇帝就享有着近乎独裁的权力，直到西晋八王之乱，这种权力才告松动。既然已经恢复了半壁江山，晋元帝开始考虑整理内部。

为了对抗王氏兄弟，他开始重用中书令刁协、侍中刘隗，并疏远了王氏兄弟。在两兄弟中，王导为人洒脱，不在意功名，并没有太多抗议。而王敦则不仅加强了防备，还为堂弟鸣不平。

当王敦表现出不满时，皇帝与超级巨头的对抗，就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危机。王敦的不平让皇帝当成了反叛的信号，开始加紧削夺他的权力，皇帝的进一步削权，又让王敦担心皇帝要拿自己开刀，不得不备战将来。

王敦与皇帝的部署，也代表了未来斗争的样式。皇帝的基地在建康，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而权臣的基地则设在了权力轴心另一端的荆州，双方各据基地，在长江上寻找战场。

在晋元帝与王敦的对抗中，这条权力轴心更偏向于王敦一些。如果要让两边平衡，那么权力轴心的中间点应该在从江西九江到湖北武汉之间的某个点上，一人占据东部，一人占据西部。而王敦的实际控制区域

却是在芜湖一带，距离建康已经很近了。从这里出发进攻建康可谓易如反掌。

皇帝的控制区除了建康之外，还包括江北的淮阴和合肥一带，依靠这两地作为补给基地，才勉强维持了独立性。

但这种独立性在王敦的进攻下立刻粉碎。公元322年，王敦轻而易举攻陷建康的堡垒石头城，随后进入建康，控制了皇帝本人。晋元帝忧郁而死。

不过，让晋室感到幸运的是，王敦并没有比晋元帝多活太久。元帝死后，王敦也得了重病，加上他本人没有后嗣，只有一个养子，这就失去了创立一代王朝的必要条件。

王敦病重时，其余的人看见了出头的机会，他们团结在了晋明帝周围，开始制订反对王敦的计划。

王敦虽然在死前试图扶养子上位，却有心无力。在他死时，讨伐大军已经与他的军队开战了。这次的大军主要来自建康北方的江淮一带，也就是从马鞍山到镇江这段长江的北方，皇帝控制的主要城市是寿春、临淮（又名盱眙）、广陵（扬州），这些地方也是建康常用的后方基地，在历次内战中都能起到关键作用。

王敦的反叛被平息，使得东晋渡过了第一次危机，但是，“皇帝—权臣”的模式、“建康—荆州”的权力轴心，都已经出现，这注定着东晋南朝是不太平的朝代。

陶侃：力挽狂澜

讨伐王敦战争后，在中央政府担任权臣的人换成了庾亮。王导在控制中央的时期，由于不在乎个人得失，做事公允，政策宽容，得到了人们的好评。即便他的堂兄王敦作乱，王导也一直忠于皇帝，帮助皇帝一同对抗王敦。

但到了庾亮时期，情况却变了。庾亮的妹妹是晋明帝的皇后，晋明帝死后，庾亮借助太后势力成了权臣。但与王导相反，庾亮做事毛糙、性格偏激，很快就引起了朝内大臣和朝外权臣的不满。

庾亮的敌人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位居上游荆州的陶侃，当王敦死后，陶侃占据了原本王敦的位置，成了下一个超级巨头。另一个则是实力较小，却距离首都更近的苏峻。苏峻在征讨王敦的战争中功勋卓著，被封在历阳（现安徽省和县），与军事枢纽马鞍山仅一条长江之隔。

庾亮最初防范陶侃时，并没有把苏峻放在眼中，但在他清理政敌的过程中，由于牵连到了苏峻，庾亮决定对他进行讨伐。

苏峻得知此事，不得不先发制人。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他从历阳起兵，向建康进发。

苏峻起兵后，各地纷纷表示要帮助朝廷镇压叛乱，远在荆州的陶侃也愿意提供帮助。但庾亮估计错了形势，他把陶侃当作更大的敌人，担心陶侃会乘机占领首都，于是拒绝了帮助。首都就变成了朝廷军队的孤军奋战。

朝廷没有帮手，苏峻却找到了帮手。在淮河流域的寿春，是豫州刺史祖约的地盘。祖约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祖逖。在西晋末年的大乱中，祖逖率军北上，在长江中“中流击楫”，发誓不收复中原不再南渡。但最终，由于实力不足和缺乏支持，祖逖只是占据了寿春地区，成了一个小型的军阀。他死后，弟弟祖约继续盘踞。祖约对庾亮在中央的政策也极为不满，听说苏峻起兵后，也跟着发兵攻打建康。

叛军进攻时，庾亮却一再犯错。在首都的上下游，各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重地，分别是上游的姑孰（又名当涂，在现安徽省马鞍山）以及下游的京口（镇江）。苏峻出发的历阳就在姑孰西面的长江彼岸。在他进攻时，姑孰除了有军事地理上的战略重要性之外，还储存着大量的粮食。如果中央军守住此地，不仅可以避免粮食落入敌人之手，还可以牵制敌人，不要让他们过快进攻建康。

但姑孰被庾亮放弃，苏峻占领姑孰后继续前进，他没有走水路，而是从建康以南的陆路直接打击首都。

在苏峻、祖约的联合攻势下，东晋政权遭受了第二次首都之围，并很快沦陷。庾亮逃走了。

对于东晋王朝来说，幸运的是，与王敦相比，苏峻的叛乱更缺乏政治目的，纯粹是对庾亮政策的一种应激反应。另外，与王敦不同，苏峻并不是权臣中的超级巨头，以实力而论，他比占据荆州的陶侃要小得多，也没有能力征服陶侃。因此，攻陷建康的那一刻，就是苏峻真正危机到来的一刻。

此刻的“超级巨头”陶侃并非是一个野心家，而是更乐于维持现状的中庸分子，只想保持自己现在的地位，对东晋的皇权不感兴趣。苏峻破坏了这种现状，就成了陶侃的敌人。于是，“建康—荆州”这条权力轴心有了新的变奏：这一次忠于朝廷的不是建康这个首都，而是荆州这个次中心。

被苏峻赶走的庾亮放下架子向位于荆州的陶侃求救。陶侃也放弃了对庾亮的防备，决心出兵攻打苏峻。

陶侃没有犯庾亮的错误，他率军东进时，首先攻击了姑孰，切断了苏峻（在建康）和祖约（在历阳）之间的联络，造成了祖约的后勤无法解决。

陶侃先击败祖约后，再继续前进，围困了建康。此刻，苏峻的败局已定，剩下的只是挣扎多久的问题了。

苏峻、祖约之乱被平定后，陶侃又平定了发生在江州（九江）的另一次小叛乱——郭默叛乱。陶侃的出现，让东晋进入了一个平静期，他位高权重又不图谋帝位，由他镇守权力轴心的上游，让东晋能够尽快稳定下来，也避免了另一个超级巨头的产生。

这次稳定，也让南方人终于对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产生了信心，不再排斥它，把它看作外来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陶侃击败苏峻起到了力挽狂澜的效果，挽救了东晋政权，也避免了南中国重陷军阀混战。

但这样的好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由于地理上的不平衡，十几年后，另一个权臣已在路上了。

颠覆东晋的权臣父子

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一位叫作桓温的将军率领晋军从荆州西进，目标直指在四川的大成国（成汉）。

桓温并非出身于著名的世家大族，却在东晋乱世中崛起。这一年，担任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的桓温，听说成汉与北方后赵准备联合伐晋，决定先下手为强，向四川进军。这是东晋历史上第一次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四川盆地。

桓温的军队从荆州出发，顺长江直上，经过三峡进入四川盆地。在晋代，随着中国人长江航行经验的丰富，从三峡向西进攻成都的水路已经非常通畅。

从三峡到达重庆后，通往成都方向的河流主要有三条，分别被称为内水、中水、外水。

所谓内水，指的是嘉陵江的支流涪江，这条江水可以到达成都东方的德阳（现遂宁，并非现在的德阳），或者成都北方的涪城（现四川绵阳），从德阳或者涪城走陆路直插成都。

所谓中水，指的是沱江，这条江北上经过成都东面。

所谓外水，指的是岷江。岷江在历史上曾经被人们当作长江的主干道。顺外水北上可以到达成都南面的彭模（现四川彭山），或者成都西面的都江堰，再改走陆路。

三条水路各有优劣，其中外水的登陆点距离成都最近，水路却最迂远。内水的劣势是登陆点距离成都较远，却可以抵达成都北方的绵阳，与北方的金牛道相呼应，形成两方的联动。

桓温此次选择的是外水航道，直达彭模向成都进军。成汉政权一触而溃，从此四川进入了东晋的版图。后来，四川在桓温的儿子桓玄之乱中，曾经短期脱离过东晋政府，由一个叫谯纵的人割据。东晋大将朱龄

石再次征服成都，朱龄石选择的仍然是外水航道，但他在内水做了一次佯动，又向中水派遣了一个支队。

四川的征服增加了长江混沌战的复杂性。在之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建康—荆州”权力轴心。现在，在荆州的西部又出现了四川，是否权力轴心也变成了“建康—荆州—成都”了呢？答案是，成都虽然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但这种复杂性并不能高估。

作为中央政府抵抗荆州分离倾向的工具，建康的朝廷总是希望向四川派遣可靠的人，让他从上游对荆州施压，避免离心力。但四川由于距离荆州太远太险，对荆州的压力有限，甚至本身也有很强的离心力。在大部分时间里，四川作为一个单独的地域而存在，对东部的纷争影响力不大。

桓温占据了长江中游的荆州、江州（九江）等地，而下游的建康（南京）则是围绕在皇帝周围反对桓温的基地。到了晚年，桓温曾经有篡夺政权的企图，却由于几次失败的北伐而威望下降，加上在建康主政的谢安对桓温采取了拖延战术，直到桓温死去，仍然没有完成改朝换代的手续。

桓温死后，他的儿子桓玄太小，权力被交给了桓温的弟弟桓冲。幸运的是，桓冲对于晋朝的忠心超过了他的权力欲，他决定与在建康的谢安合作，东晋王朝渡过了这次改朝换代的危机。

前秦南侵的淝水之战时期，桓冲负责以荆州为核心的长江中游防务，建康为核心的下游防守则交给了谢安。东晋王朝在这种权力分配机制下变得较为强大，击败了前秦的进攻。

但是淝水之战后，桓冲和谢安相继死去，东晋的政治分裂就越来越明显。先是东晋宗室司马道子在建康擅权，司马道子的胡作非为又引起了荆州刺史殷仲堪和青州、兖州刺史王恭的不满，两者联合起兵，却兵败被杀。

在两刺史起兵的过程中，原本失去了实力的桓温之子桓玄却突然间

坐大，成了统治西部地区的最大军阀。

在中央政府的一再退让下，桓玄除了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还都督荆州、司州、雍州、秦州、梁州、益州、宁州、江州这八个州，(2)以及扬州、豫州所辖八个郡的军事。加上其他桓氏家族成员还占据了诸多的官职，桓玄已经权倾朝野。

东晋元兴二年（公元402年），桓玄率军从荆州出发，顺江而下，到达姑孰（现安徽当涂），以此为基地兵分两路讨伐东晋，攻克了首都建康。

第二年，晋安帝禅位给桓玄，桓玄建国号大楚。这是南朝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如果桓玄能够将政权稳固，就可以成为新王朝的开国之君。但可惜的是，占领了建康之后，桓玄放松了警惕。他以为从荆州到九江，再到建康都已经是他的势力范围，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建康以东的京口、广陵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镇江和扬州一带。

这里由于有一条古运河——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又可以控制吴越，也就是现在的苏杭一带。加之京口距离建康很近，更是一个容易出事的区域。

当桓玄将这里忽略时，有一个人却抓住了机会，他就是刘裕。

刘裕家境贫苦，与东晋时期担任权臣的世家大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出身于行伍，从低级军官做起，逐渐成长为著名将领，拥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

刘裕一眼就看到了桓玄棋盘上的漏洞，决心利用这个漏洞起兵反对桓玄。在他的号召下，扬州一带的城市纷纷起义，提供了士兵和物资，让他得以向建康挺进。在到达建康时，桓玄甚至都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匆匆决定率军撤离，逃往西部。

于是，篡位者从西方赶来篡位不久，就又向着西方匆匆逃去。这也成了东晋南朝战争的模式：将军们在长江上一会儿上行，一会儿下行，

他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往往一场战斗就决定了他们向哪个方向走。

桓玄逃亡西部时，四川也反叛了，一位叫作谯纵的人获得了四川，建立了一个新的蜀国，史称谯蜀。它只存在了九年，就被刘裕的大将朱龄石灭亡。

谯蜀的建立，让桓玄又丧失了进一步西逃的可能，当刘裕最终占领荆州时，桓玄以及他的桓氏后继者的命运就走到了尽头。

赣江、湘江变奏曲

在东晋的“建康—荆州”权力轴心中，偶尔会有一些变奏曲的存在，使得战争的范围超过了长江，而进入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这些区域主要发生在三个方向：一是首都建康北面，长江、淮河之间地区，这里也是南北政权交战的主战场；二是首都建康东面苏州、杭州一带，这里是建康的粮仓，稳定首都的关键；三是在江西赣江谷地和湖南湘江谷地，顺赣江和湘江可以直达两广地区，是长江的重要侧翼。

在这三种变奏中，发生在东晋义熙六年（公元410年）的卢循叛乱就是第三种。发生在南朝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的晋安王刘子勋叛乱中，建武将军吴喜对吴越等地区的进攻则属于第二种。南朝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导致南朝彻底衰落的侯景之乱则属于第一种。

这里只说卢循叛乱（以及其前奏孙恩叛乱）和赣江、湘江的作用。

卢循叛乱是一次政策失误造成的。在东晋大臣司马道子执政时期，曾经试图削弱士族门阀的权力并增加兵源。在当时，许多人为了不当兵和成为官奴，纷纷跑到世家大户手下充当佃客。一旦成了世家的佃客，就不再承担国家义务，不用服兵役，也不用出国家租税了。由于国家人口不足，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决定将这些“佃客”从世家大族中清除出来，送到首都供政府指使。

这项政策不仅引起了那些佃客的不满，也引起了拥有佃客的大户的不满。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琅琊人孙恩乘机起兵反对东晋政府，获得了当地许多人的支持。

东晋政府先后数次起兵攻打孙恩，孙恩后来逃到了东海中的海岛上，以海岛为基地，对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在打击孙恩的数次军事行动中，有两个人的功劳特别突出，一个是东晋大将刘牢之，另一个则是正在崛起的刘裕。

在东晋政府的一系列讨伐之后，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孙恩

兵败投海自尽。

不过，孙恩的起兵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妹夫卢循将残部集结起来，渡海南走，进入了广东地界，在南海郡（治所番禺）盘踞下来。

随着东晋政府在桓玄之乱中疲惫不堪，卢循也受到了招安，摇身一变成了广州刺史、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

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刘裕率军北上并吞南燕，卢循以为得到了机会，在他的姐夫徐道覆的劝说下，展开了北伐东晋的军事行动。这是秦汉之后，广东再一次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在地理上，长江中下游与广东、广西之间隔着一条山脉——南岭。南岭在历史上称为五岭。所谓五岭，指的是江西省大余县与广东省南雄市之间的大庾岭、湖南省蓝山县和广东省连州市之间的都庞岭、湖南省郴州市和宜章县之间的骑田岭、湖南省江华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之间的萌渚岭，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北面的越城岭。

在秦伐南越的时候，曾经在五岭开辟了五条通道。到了后世，较为常用的通道变成了两条主道，以及由主道分岔形成的若干支道。

所谓主道，指的是由五岭而下的两条长江支流——湘江和赣江。这两条河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南岸最重要的支流，一条从南岭北上穿过整个湖南地区，在洞庭湖一带流入长江；另一条是江西的主动脉，从南岭北上贯穿江西，最后从鄱阳湖流入长江。

赣江道没有支道，从古至今人们都是顺赣江而上，在大庾岭上一个叫作梅岭关的地方翻越南岭，进入广东南雄，再经过韶关进入岭南低地，直达广州。

而湘江道却有若干支道，最著名的支道是一条水路——灵渠，由秦朝官员史禄开凿。当年，史禄观察到，从南岭发源的两条河一条向北流，另一条向南流，分别是湘江（向北流流入长江）和漓江（向南流流入珠江），这两条河道的上游距离很近，只有几十里，湘江的水位比漓江稍微高一点儿。于是史禄就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河水从湘江流入漓江，这就是灵渠。有了灵渠之后，人们就可以方便地从湘江经过水路进

入漓江，再汇入珠江直达广州。这条路便于物资转运，使得大规模的军事辎重运输成为可能。

但这条路却有一个缺点：太远。由于漓江向西转了个弯，先要进入广西，再折入广东，这就拉长了旅行的距离。为了抄近路，可以从广东韶关或者连州北上翻山进入湘江谷地。所以，从两广进入湘江的道路就有了两条主要支路：水路更远却运输量大，陆路更近却险峻。

除了河道之外，人们还可以走海路到达岭南，海路在东吴时代开通，但一直不够安全。东晋南朝时期，如果是小规模的海盗，还可以考虑走海路，如果是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仍然以陆路和内水为主。几条道路之外的大片山地，还覆盖着原始森林，无法通过。

卢循从广州攻打东晋，也采取了湘江和赣江两条水路。

两路大军的出发点都在广东的始兴，在这里，卢循率军从湘江下长沙，经过巴陵（现湖南岳阳），向长江上游的江陵进军，而徐道覆则从赣江过豫章（现江西省南昌），经过寻阳（现江西省九江），向建康进军。如果能攻克江陵和建康这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也就拿下了东晋江山。

一路上，两支军队的进展都颇为顺利，徐道覆按计划攻克了豫章、寻阳，沿长江向建康挺进。卢循在经过长沙、巴陵之后，原计划是向江陵进军，突然听说，东晋大将刘毅率领大军从姑孰赶到，害怕徐道覆一人应付不了，就改变计划，顺江而下，与徐道覆合兵，共同击败了刘毅。到这时，建康的防线已经向卢循洞开，这位当年的海盗即将成为一个帝国的主人。

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干扰了卢循的计划。在他们制订战略时，就指望刘裕还在北伐燕国的途中，没有办法南下救援。他们不知道的是，刘裕已经攻克了南燕，听说南方有威胁，马不停蹄从北方赶回，在建康加强了防守。

在建康，刘裕占据了石头城巨防，加固了城墙，加强了守卫，卢循

快速占领首都的计划失败了。

经过几场拉锯战，卢循损失了不少人马。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军粮跟不上了，整个建康地区已经坚壁清野，让他无法获得粮食。

情急之下，卢循决定退守寻阳，再按照原来的计划进攻荆州，试图占据长江的上游，对下游形成持久的压力。他派遣徐道覆率领三万人马进攻江陵，却再次遭到了失败。

最后，卢循只能率领人马按照来时的道路向南逃窜，由于路远，选择长沙和湘江的道路已经不可能，只好从豫章沿着赣江回到了广东。由于他战败的消息已经传回广东，根据地也不再稳固，卢循在一路逃窜中被杀，结束了他的帝王梦。

卢循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借助广州向北进攻的军阀被记入史册。在此之前，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一直是中华的附庸，缺乏军事地理的重要性。每一次岭南战争大都是北方侵略广州，轮不到广州主动侵略。但卢循的探索却为将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广州虽然地处偏远，却并非毫无价值。一旦中原内乱，群雄割据，从广州出发，也不是没有逐鹿中原的可能性。

卢循之后，陈朝开创者陈霸先、唐代末年的黄巢，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的孙中山，都有过成功从广州北伐的经历。

南方帝国的衰落

南朝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废黜了晋恭帝司马德文，灭亡了东晋，建立了南朝宋。

刘裕一生南征北战，除了篡晋之外，还灭掉了南燕和后秦，重新掌握了四川，将南朝的领土扩张到最大。宋武帝、文帝时期，也是南朝发展的巅峰。这个时期，南朝的疆域一直扩张到了北方黄河的南岸，与北朝相对峙。而作为中部战略据点的彭城、下邳、寿春、南阳、南郑等地都掌握在南朝手中。

除了与北朝在中部地带厮杀之外，在南方沿着长江的内斗仍然是主旋律。南朝宋第二个皇帝宋文帝由于想改立太子，被太子刘劭杀死于宫中。随后，武陵王刘骏在长江中游西阳（现湖北省黄冈）起兵对抗，获得了荆州集团的支持，率军沿权力轴心进攻建康，杀掉了刘劭即位，史称宋孝武帝。之后荆州集团又拥立南郡王刘义宣起兵反抗孝武帝，被镇压。

孝武帝死后，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子业继位。由于刘子业（前废帝）声色犬马和倒行逆施，最终被刺杀。这时，在权力轴心的两侧出现了两个皇位竞争者。

在下游的建康，继位的是明帝刘彧，而在权力轴心的另一端，则是镇守江州的晋安王刘子勋。刘子勋是孝武帝的第三个儿子，而宋明帝刘彧只是孝武帝的弟弟、宋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从继承世系上来说，刘子勋更有资格取得皇位。

刘子勋的起兵也更早，在前废帝还在位时就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不过，由于前废帝是在建康被杀的，刘彧就乘机登上了皇位，占据了首都的先机。

但形势对刘彧却非常不利。全国大部分的地方官员都选择了支持刘子勋来对抗刘彧。徐州、冀州、郢州、豫州、益州、湘州、广州、梁州

等地都是刘子勋的支持者。而刘彧获得的，只有首都建康，以及丹阳、淮南等几个郡而已。当大部分的州郡都选择支持对手，而所有的粮食都不送往首都，刘彧的处境就很危急，陷入了几乎必败的境地。

为了说明刘彧处境的危急，我们可以通过权力轴心体系来看。在以往的对抗体系中，战争的双方往往各据权力轴心的一端，一方占领荆州及其周围，另一方占领建康及其周围，而战场往往设在江西九江到湖北武汉之间，并逐渐向战败的一方境内推移。在刘彧与刘子勋的作战中，刘子勋占据了权力轴心的中间位置（九江），整个权力轴心的上游（荆州方向）都是他的支持者。除此之外，从江西赣江、湖南湘江直到广东，也都支持刘子勋。更致命的是，在以往，首都建康以东往往是建康方面的支持者，特别重要的是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杭州一带，这两个地方是首都的巨大粮仓，但这一次，吴越地区也加入了刘子勋的队伍，将建康从东面包围了起来，使建康方面成了孤军。

刘彧唯一的机会，就在于能够平定吴越，将这个后方的粮仓收回，才有可能集中兵力西向，沿着权力轴心向九江、荆州进攻。但在四面楚歌之下，到底谁有能力完成这件逆天的任务呢？

一位叫作吴喜的人出现了。东晋南朝时期，受重用的往往是武将，而吴喜却是个典型的文人，掌管图书、卖弄刀笔，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此刻，吴喜却要求刘彧给他三百人马，前去平定吴越。由于要求不高，刘彧强压下各方的质疑，将吴喜派往东南战线。

虽然吴喜是文人出身，却出使过几次吴越地区，他做事公道，性情平和，得到了当地人的信任。当他进军时，各地纷纷望风而降。

吴喜从太湖西岸掠过，直插钱唐（现浙江省杭州），再进攻会稽（现浙江省绍兴），并派另一支人马进攻吴郡（现江苏省苏州），于是整个东方被迅速平定。

东方的安定，使得刘彧有机会西进与刘子勋在长江决战，扭转了败局，成为皇位竞争的胜利者。

吴喜的平吴之战，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长江攻防战的另类样本：当苏杭地区不稳定时，对建康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如果想对外作战，必须首先平定东方，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的支援基地。

事后来看，宋明帝刘彧的掌权对于南朝并非福音。宋明帝性格猜忌，心狠手辣，杀掉了所有威胁他的宋室王侯，让南朝宋本来就不稳固的执政基础变得摇摇欲坠，为萧道成的篡权做好了准备。对功臣，他也绝不手软，就连立了大功的吴喜也被杀死，原因仅仅是他太受欢迎，对皇太子不利。

明帝死后，萧道成逐渐掌握了大权，并以首都健康为基地，消灭了反对萧道成、占据了上游荆州的沈攸之。最后，萧道成篡夺了南朝宋的皇位，建立了齐国，这是南朝的第二个朝代。

只不过，经过了太多厮杀的南朝越来越弱小，并逐渐丧失了北方的土地。最先丢失的，是如今山东境内黄河以南和以东的土地，随后在中原地区的势力也逐渐缩水，到后来，不仅黄河流域全部丢失，就连淮河流域也丢失了一半，也就是淮河以北的地区大都被北朝占领。到这时，南朝已经越来越无力与北朝对抗了。

而对南朝衰落影响最大的，除了宋明帝以来的内乱之外，另一个则是梁朝时期的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与南朝末日

南朝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南方又回光返照，进入了经济和文化的一个好时代。

在位的皇帝是梁武帝萧衍，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在南朝皇帝中最为高寿。

萧衍之前，南齐皇朝变乱不断，皇帝任意诛杀大臣，北方的外患不已，江南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颠簸。南朝齐中兴二年（公元402年），萧衍取代了齐和帝，建立了梁朝，之后的四十多年里，南朝在这位老皇帝的率领下变得富裕和平，形成了一次中兴，享受了最好的时光。

萧衍厉行节约，推行文化，尊崇佛教，在乱世之中形成了一片礼仪的孤舟。甚至北朝人都对此羡慕不已，开创东魏和北齐的权臣高欢就说过：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3]

公元548年，已经接近萧衍统治的晚年，做了一辈子皇帝、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老人本有希望在安详中死去。但就在这时，一场出人意料的灾难出现了。这场灾难令人猝不及防，不仅让萧衍失去了皇帝的荣耀，也造成了整个南朝的衰落，为将来的北朝统一打下了基础。这场灾难就是侯景之乱。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收留敌国流亡者的传统。比如东晋开创之初，王敦发生叛乱进攻晋元帝时，晋元帝最倚重的大臣是刘隗。在皇帝一方败北后，刘隗逃向了北方，投奔了后赵的石勒，官至太子太傅。

南北朝时，各方的大臣更是交流频繁，战场上的叛变层出不穷，两边的朝廷也都习以为常。只要对方的将领接洽投降，能够带来一定的军队，或者贡献一两个城池，就会被接受。至于他的忠心有多大，并不重要。投诚的将领也绝不是因为忠诚而投降，只是因为成了斗争的失败者

而已。

萧衍统治的晚期，北方的东魏发生了一次权力更迭，东魏权臣高欢去世，他的儿子高澄继承了职位。高澄的继位让高欢手下的一员大将感到不安，他和高澄一直不和。这位大将叫侯景，于是率军投靠了南方的梁朝。

侯景是少数民族的羯族人，曾经在北魏权臣尔朱荣手下效命，当高欢征讨尔朱氏时，他又改换了门庭，效命于高欢。最后又叛离了高澄，率军向南方投诚。

侯景的投诚在南朝引起了震动。要了解这个震动有多大，就要明白侯景的权力有多大。在他叛逃时，他是东魏的太傅、大将军、河南大行台、上谷郡公，统治着东魏的整个南方，也就是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按照侯景自己的说法，是“函谷以东，瑕丘（现山东省兖州市）以西，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黄河南边仅有青、徐数州或许不曾包括在内。

这片地区在南朝宋时期，曾经归属于南方，后来被北方逐渐吞噬。这里是南北方的主战场，谁占有了它，就占据了南北战争的主导权。

自从南朝宋后期丧失此地之后，历代南朝皇帝费尽心机北伐都无法取得这片土地，却被侯景一股脑儿送给了梁武帝，可见诱惑之大。

经过与大臣的讨论，梁武帝决定接受侯景送出的大礼，封他为河南王，并派遣军队从悬瓠（现河南省汝南）出发接应侯景。

梁武帝光看见了利益，却没有想到获得利益的难度。发现侯景叛逃后，东魏的高澄立刻派兵日夜兼程向侯景进攻。这时，南方的接应还没有到，也无法与东魏的军队抗衡，侯景在远水无法解近渴的胁迫下，又向北方的另一个政权——西魏——求救。西魏的首都在长安，根据地在关中地区。侯景将河南地区靠近西魏的土地又许给了西魏，换取西魏来解救他。这些土地就成了“一女二嫁”。

但此刻，侯景仍然向梁武帝保证，割让给西魏一部分，是为了获取西魏的救助以活命，而剩下的部分仍然要割让给南朝梁，他的最终归宿也是南方。梁武帝接受了这种说法，继续帮助侯景南归。

谁知，西魏获得了侯景的部分土地后，又与侯景闹翻。而梁军与侯景合兵后，遭到了东魏的进攻，最终，将侯景所辖的土地丢失得一干二净。南朝没有捞到任何实惠，只捞到了一个大麻烦——侯景本人。

侯景丢失辖地后，需要新的落脚点，他率领残余人马来到梁军据守的寿阳（又名寿春，现安徽省寿县）一带，强行将此城攻占，变成自己新的基地。于是，南朝梁不仅没有任何收益，还赔上了寿阳。侯景只是名义上属于梁朝，但寿阳的行政权已经脱离了梁的控制。

梁武帝做了亏本买卖，却从道义上同意让侯景继续盘踞寿阳。但梁军与侯景的摩擦随即而起，让侯景意识到，寿阳并非久居之地。

这里位于东魏和梁的中间地带，又是各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如果只占领这一个地方，用不了多久，就会遭到兵灾而陷落。只有占据了更广阔的基地，才能保证此处的安全。

侯景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一种，向北攻东魏，占据现在的山东省作为新基地，变成另一个南燕；另一种，向南攻梁朝，占领建康一带，变成另一个梁朝。他选择了更加软弱、容易攻打、好处更大的梁朝作为目标。梁武帝萧衍本来以为占了大便宜，最终却发现接了杯毒酒。

公元548年八月，侯景向南方发动进攻。梁武帝最初并没有把他当回事，认为这只丧家之犬虽然善于打仗，却无法和一个帝国对抗。他派出了四路大军，从四个方向寿阳集结，准备包围和消灭这支实力并不算强的部队。

出乎意料，就在南朝大军向寿阳进发时，侯景却采取了一条铤而走险的道路：迅速向首都建康跃进，经过历阳、采石、姑孰，直捣首都。经过长期围困后，攻克了建康。

梁武帝成了侯景的阶下囚，这位八十六岁的老皇帝本来可以安度晚年，却由于一次错误的决策，在白发之年暴死，与他一起被埋葬的还有南朝的黄金时代。

侯景的叛乱线路，代表了从淮河流域入侵首都建康的经典案例，战争局限在“建康—荆州”权力轴心的一端，并没有进入荆州一极。

按照侯景的设想，当他把建康占领，控制了梁朝的皇帝时，就可以一面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方面逐渐消灭各地的反抗。但他没有吃透南方的权力轴心，也不理解南方的皇帝权威并没有那么大，在权力轴心另一极的荆州，也不会听他的调遣。

反抗侯景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轴心的另一极荆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南方的广州。广州的领袖是始兴太守、西江督护陈霸先，他从广东出发，经过大庾岭北上进入江西的赣江，从赣江直指寻阳（现江西省九江）进入长江。荆州的领袖是湘东王萧绎，他派出大将征东将军、尚书令王僧辩向东顺江而下。

此时，侯景的机会只有一个：先不管广州北上的敌军，迅速击败荆州，获得整个长江轴心，再回头从东西两方夹击陈霸先的部队。

但侯景并没有这么做，他分散了兵力分别对付两支敌军，结果一支被陈霸先击溃，另一支则被阻于巴陵（岳阳），也随即被击败。

巴陵一战成了这次战争的转折点，侯景失败后掉头东逃，回到首都。随后又被逐出建康，流落在江东一带，直到被杀。

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继位称帝，是为梁元帝。由于元帝的权力基础在荆州，“建康—荆州”权力轴心暂时向荆州倾斜。

侯景给南朝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一次叛乱，它实际上是南朝衰落的转折点。在它之前，南朝在梁武帝的治理下，虽然问题重重，却又有着小康的家底。在侯景之乱后，疆土迅速缩小，许多战略要地先后丢失。

首先出现的是两帝争立。除了在江陵的梁元帝之外，在四川，另一位皇室成员武陵王萧纪在成都称帝，于是梁朝出现了两位皇帝。更致命的是，两位皇帝距离位于关中的西魏太近，成了西魏插手的机会。梁元帝为了消灭四川的竞争对手，决心向西魏求助。于是，西魏的军队先是攻占了四川，再以四川和武关为基地，攻克了江陵。(4)

对于梁朝来说，江陵的失去意味着“建康—荆州”轴心不再完整，荆州已经成了敌国的领土。丧失了四川和荆州，也意味着长江中游防线崩溃了，孤立的建康再也没有力量保护自己了。

这次领土的变迁甚至改变了北方两大政权的实力对比。在这之前，东魏和西魏的争夺中，西魏是弱势的一方，它的领土主要在关中地区，而东魏则由于占据了广阔的华北平原和黄淮地区，资源更加丰富，兵力更充足。但自从荆州和四川归了西魏，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变，西魏已经获得了如同秦朝和汉高祖一样的优势地位，不仅占据了荆州、四川两大粮仓，还占据了一系列的战略要点。

如果说，在梁朝内乱之前，东魏更可能并吞西魏，那么梁朝内乱之后，以西魏为基础统一全国，成了更有可能的选项。

在西魏从南朝夺取大量土地时，东魏也从南朝夺走了长江、淮河间地，将战线推到了长江边，东魏与梁隔江相对。丢失了淮河流域的南朝已经失去了防御的完整性，加上长江上游的丢失，灭亡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梁绍泰元年（公元555年），镇压侯景叛乱的两大功臣陈霸先和王僧辩发生冲突，陈霸先击斩王僧辩。

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陈霸先取代了梁静帝，篡位称帝，建立了陈朝。但陈朝的领土已经只局限在长江以南到洞庭湖的狭小区域内，苟延残喘。在北方的两个大国北周（取代了西魏）和北齐（取代了东魏），谁能并吞另一方，谁就可以顺势而下统一中国。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时代在南朝衰亡的基础上进入了尾声，唐宋时代即将来临了。

(1) 《晋书·元帝纪》。

(2) 东晋南迁后，设置了很多侨郡，即在南方安置北方人口时，将北方某郡的人口安置在一起，名字则沿用北方的郡名，所以司州、雍州、秦州等地并不一定就是其实际所在，而可能只是侨郡所在的地方。

(3) 《资治通鉴·梁纪十三》。

(4) 之后，西魏在江陵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史称后梁。后梁后为隋所灭。

第三部　失衡时代

（公元384—公元907年，隋到唐）

第十章　北朝：从黄河到长江（公元384—公元589年）

南朝刘宋时期，北方的鲜卑人统一了北中国，建立了北魏。北魏文明程度虽然落后于南方，却从一张白纸之上建立了新的制度，避免了南方积累了几百年的弊端，在国力上逐渐压倒了南方。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虽然暂时没有显出太大的用途，但从战略上，却意味着北朝将战争重心转移到了南方，为将来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玉壁古战场位于汾河以南的台地上，诉说着当年东西魏的厮杀，也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东西对立。此后，随着江南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分裂模式往往变成了南北对立。

玉壁城正好卡在从汾河进入黄河的岸边，这座城市的存在，让东魏不敢越过黄河进入关中平原，从而保证了关中的安全。

西魏对东魏的打击主要针对中路的洛阳，却由于河阳三城与虎牢关的存在，让西魏即便占领了洛阳，也无法越过洛阳进攻豫东和太原。

西魏乘南朝内乱，获得四川与荆州，这两个超大粮仓成了改变战争局势的胜负手，使得原本弱小的西魏一跃成为中国最强大的政权。

隋唐时期，长安和关中平原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中心，随着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关中盆地虽然还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却已经成了中原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定都长安，导致中国在军事战略上进入了一个失衡时代。

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后，七拼八凑的前秦帝国崩溃了，另一支少数民族政权却正在复国。

在如今山西省北部，曾经存在着一个鲜卑人的小国——代国。它地理位置偏远，国土面积也不大，与中原接触不多。前秦王苻坚统一北方

的过程中，在兼并其他地区的空隙中，顺便将代国也并吞了。

前秦在淝水之战失败后，各个北方少数民族纷纷独立。代国前首领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乘机崛起，重建了代国，定都盛乐（现内蒙古和林格尔）。后又改国名为魏，史称北魏。在随后的扩张中，北魏重新获得了山西北部地区，又跨过黄河，拥有了陕西以北的河套地区。

在拓跋珪扩张时，中国北部的前秦已经消失，地图上换成了占据关中的后秦（定都长安），以及拥有中原的后燕（定都中山）。此外，在山西的长子还有一个小国西燕（也是前燕王室后裔所建），在甘肃河西走廊是前秦大将吕光所建立的后凉。

这些敌人中，最直接和最具威胁的是同处于北方的后燕，两国只隔着一座太行山遥遥相望。相比起北魏，后燕位于平原之上，缺乏制高点，这给了拓跋珪机会。

不过先发制人的是后燕，北魏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后燕王慕容垂派遣八万大军，从中山出发，越过太行山的井陉关口，进入晋阳（现山西省太原），再从晋阳北上经过平城（现山西省大同），出雁门，向北魏的首都盛乐进发。

事实证明，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地区并不适合闪击战，当后燕大军到来时，北魏迅速向西方撤退，一直撤退到千里之外的河套地区。后燕由于无法保障后勤，进退两难，被机动性更强的拓跋珪击败，[(1)]大部分降卒被坑杀。

第二年，拓跋珪再次击败了燕王的部队，并投入了反攻。

拓跋珪占领的地区主要是山西和内蒙古地区的草原地带，要想通往华北平原，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从北京以北的军都陉（现居庸关）穿过燕山山脉，进军幽州（现北京）；另一条从山西北部南下，经过马邑（现山西省朔州），攻克晋阳（现山西太原），再从井陉穿越太行山，直达后燕的首都中山。

拓跋珪两道并进，大破燕军，灭亡了后燕。

后燕的灭亡，让拓跋珪同时获得了山西北部和河北地区。山西提供了险要的地形，河北提供了粮仓。之后，北魏将首都迁往了平城（现大同），成了北中国的豪强。

北魏灭后燕时，恰好也是南朝宋刘裕向北扩张时期。南朝最远占据到黄河南岸，北魏则拥有黄河北岸，双方以黄河为界对峙。

与此同时，在北中国的西部，关中平原上的主人已经从后秦换成了匈奴人赫连勃勃。当年刘裕北伐关中，灭亡了后秦，但他攻克长安后却匆忙南返，位于陕西北部的匈奴人赫连勃勃乘机进入长安和关中，建立了夏国。

对北魏而言，后燕灭亡后，北中国只有一个强大的敌手就是夏国，其余的小地方政权已经不构成威胁。

即便是夏国，实力也无法与北魏相比。北朝时期的关中地区由于常年战乱，早已不再是富庶之地，无法与华北相抗衡，北魏只需要采取蚕食战术，就可以慢慢将夏国消灭。从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6年）九月开始，到公元431年，北魏用五年时间灭亡了夏国。

之后，北魏击溃了位于辽东的慕容家族残余势力北燕，并击败了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柔然，统一了中国北方。

北魏统一北方时，南方的刘宋仍然处于巅峰时期。但随后，南朝进入了绵绵的衰落期。与之相反，蛮族建立的北魏却启动了建立国家制度的过程，将一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部落变成了定居的国家。一系列制度确立，政权更加文明化。

于是，此消彼长之间，天平已经向北方倾斜。

定都洛阳的利弊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乘南齐武帝逝世的时机，魏孝文帝率军从首都平城（现山西大同）向南进发，准备攻击南朝齐。

但天公不作美，大军到洛阳后，一直淫雨绵绵，将士们疲惫不堪，不想继续向南。孝文帝不得不屈服于将士们的意志，但他提出一个要求：如果此次不进行南伐，就必须迁都洛阳。

大部分大臣都留恋平城的偏安，迁都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安逸的生活，千里迢迢带着家眷，随孝文帝来到洛阳重建家园。但是，相比起南伐，他们宁愿选择迁都，于是，迁都洛阳就成了魏孝文帝的既定政策。

大臣们没有料到，所谓迁都，其实只是孝文帝南伐的一个步骤而已，迁都洛阳之后，与南方政权的军事冲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加，进入了一个战争连绵的时期。

魏孝文帝时，北魏的制度建设已经进行了数十年，历代皇帝将一个半游牧半开化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与汉人政权在文化上不相上下的国家。

特别是在孝文帝时期，由文成文明皇太后冯氏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更是成了历代改革的范本之作。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北魏实行了官员的班禄制改革。在这之前，北魏的中央官员都没有俸禄，官僚阶层依靠许多不正规的手段，如战争劫掠和霸占土地获得收入。随着战争的远去，官僚阶层没有了战利品，更多地依靠骚扰民间来获得收入，太后决定给官员发薪水，发薪水的钱则来自从民间征收的一笔特别税。

为了从民间征税，太后又在第二年启动了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人民去耕种，建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直到唐代仍然继承的土地制度。

分地进行得并不顺利。要向人民分发田地，必须掌握人民的户籍资料。可是北魏的统治者还不知道怎么去统计和管理户籍。太后在秘书

令、南部给事中李冲的建议下，她开始建立社会基层组织，在县以下建立三级村民机构（三长制），由这些机构负责基层的户籍和税收管理。

班禄制、土地改革、三长制，如同环环相扣的一出大戏，让北魏的官僚制度成了当时最先进的范本。

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北魏也同样从落后到反超。北魏历代皇帝都很重视佛教的发展，开凿石窟，发扬佛法，南朝的佛教往往注重繁文缛节和奢侈豪华，而北朝的佛教则更注重义理和修行，在影响力上丝毫不比南朝差。

北魏还是一个尊崇儒教的国家，由于对汉族文化的尊崇，儒教在皇家的扶持下逐渐成了气候，并主导了一系列神化皇权、加强仪式感的运动。而在南朝，儒教却呈现衰落状态，到了唐代，当人们再次想回归儒教的时候，只能从北朝的传承中去学习。

在政治上，北朝的各个皇帝都很在意制定一套符合时代的法律。由于南朝继承了两汉魏晋时期的社会制度，许多利益集团已经彻底把持了政治，任何改革都不再可能。北魏却是从一块白板上新建立法律制度。结果，北朝的法律制度很快超过了南朝，不论从公平性，还是从统一性，都成了后代的样本。

北魏的改革高峰随着冯太后的死亡告一段落。当孝文帝独立行使权力时，他想继承改革，却总是改得不是地方。为了表现出比冯太后更加汉化，他加强了意识形态特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改汉姓、穿汉服、禁胡语等。这些改革看上去很激进，却意义不大，只是激起了鲜卑族人与中央政府的对抗。正是这些对抗，导致了北魏的分崩离析。

虽然魏孝文帝其他措施不尽如人意，却有一项改革意义非凡，那就是迁都洛阳。

人们往往把迁都洛阳也作为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迁都之事不是为了汉化，而是服从于战略需要。

北魏平城时期，人们只要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南北两大皇朝之间的地理错位。南朝的首都设在了长江边上的建康，而北朝的首都却在遥远的平城（大同）。

之所以定都平城，与北魏建国初的政治形势有关。在建国初，北魏的对手一直是柔然、燕国、夏国等北方国家，与南朝的交往并不多。

但随着北魏统一北方，北魏的军队却发现，如果要南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出兵的战线太长。

以孝文帝的南伐为例。孝文帝在平城组织军队，亲自率军南下。平城位于现在的山西省北部，已经属于中原帝国的边缘地带。从平城南下必须首先经过太原，再从太原南下上党，渡过黄河，进入洛阳地区。到洛阳时，士兵们已经翻山越岭走了一千五百多里路，就算是没有大雨，也必然疲惫不堪，而此刻军队连国境还没有出去。

因为首都太靠北，北魏已经吃过一系列的亏。在北魏灭亡后燕后，燕国流亡者在如今的山东境内建立了一个小国南燕，如果北魏的首都在洛阳，就很容易沿黄河向东灭亡南燕，但由于首都距离太远，出兵不便，反而让刘裕乘机北上夺得了山东。这是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政权边境最靠北的一次，甚至威胁到了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

而北魏历次与南方的作战，虽然拥有着兵力优势，却大都因为距离太遥远，指挥不便，而不得不半途而废。

孝文帝此次迁都的目的，不是因为大雨被迫留在这儿，而是希望借助迁都来巩固北魏的南疆，并以此为基地，出发打击南朝，节省一千多里的道路。

孝文帝迁都两年后，再次开始了向南进军。这次进军以失败告终。更为严峻的是，虽然这是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决策，却由于与孝文帝一系列不必要的改革混在了一起，成了保守集团攻击的对象。在保守集团分裂倾向越来越严重时，北魏的政治被撕裂，从而影响了军事。北魏分裂了。

但孝文帝的迁都，却为后来的东魏和西魏打下了基础，也是从这时

开始，北方从更短的用兵线出发，将战线南移，获得了绝对优势，为后来的统一做好了准备。

最后一次东西对峙

山西省稷山县是一座在汾河北岸的城市。汾河水向南经过临汾后，继续经过襄汾和新绛，然后折向西方，经过稷山、河津，最后汇入黄河。如果从黄河出发，汾河就成了进入山西，特别是临汾、太原的一条最便捷谷道。

除了沟通长安和太原之外，从汾河谷地的新绛县向东南翻越中条山，可以经过垣曲到达济源，这是另一条沟通汾河与黄河的道路。从济源既可以渡河去洛阳，也可以在黄河北岸继续向东去往河北。

两条路的交叉，赋予了汾河谷地（新绛到河津段）以特殊的意义。稷山县恰好就处于这一段河道上。

从稷山县向西，在汾河北岸行走两公里，再向南渡过汾河，继续前进两公里左右，就来到了一个叫作白家庄的村庄。这个不起眼的村庄在东西魏时期却是大名鼎鼎，即便到了现在，仍然保持着古战场的形态。

在白家庄村外的西方，有一个巨大的黄土台地，顶部平坦如桌，边缘垂直如削，在台地四周还可以看到一圈古人修建的土墙遗迹，这就是当年的城墙。台地顶上，古代的瓦片、骨片俯首可拾。西缘有一条巨大的冲沟，将整个台地刻成了“凹”字形（那一凹，就是冲沟的位置）。在冲沟边缘的土墙下，依然可以看到厚厚一层完整的人类骨架，大腿骨叠压着脊椎骨，下颌骨上的牙齿显示死者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当地人称这里为万人坑。

这些骨架，都是一千四百多年前死去的战士，可能达到数万具之多，后来被集体埋葬于此。除了人的尸骨之外，还可以找到马的尸骨，说明当年战争的惨烈。

在台地上，还能看到地道的痕迹，这些地道是当年攻城者挖掘，希望能够从地下攻入城中，却又被守城者放火封锁。一千多年后，地道犹存，甚至在地道口还可以找到大量的骨片，可能就是攻城者留下的。

这座城市叫玉壁城，是当年西魏楔入东魏的最深入堡垒，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围困和攻击，却依然屹立。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类活动明显，历史上的古战场大都不能保持原样。但玉壁却由于位于临河的台地上，且人口相对较少，躲过了人类活动的破坏，向我们诉说着当年的杀戮。

魏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王朝，经历了一系列的内部纷争而衰落。北魏末年，一场席卷北方的大骚乱打乱了这个刚刚文明化的王朝。

北魏时期，除了与东、西、南三方的敌人作战之外，在北方还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强大对手——柔然。太武帝拓跋焘曾经大力打击柔然，将蛮族赶向了更北方。为了防止柔然回来，他在黄河以北、大漠以南，沿阴山山脉建立了六个军镇，分别是武川（现内蒙古武川）、抚冥（现内蒙古卓资山）、怀朔（现内蒙古五原县）、怀荒（现内蒙古乌兰察布境内）、柔玄（现山西省天镇县境内）、沃野（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境内）。在六镇中担任将领的大都是鲜卑贵族，士兵以鲜卑人为主，也有来自中原的汉人。由于六镇起着保卫首都平城的作用，在北魏的军事和政治中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方的重要性在北魏朝廷中降低了，六镇也不再感觉到皇权的照耀。

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沃野镇和怀荒镇首先举起了造反的大旗，随后，从关西到河北地区都发生了叛乱。

为了镇压这一系列叛乱，北魏政府不得不借助于另一位军阀，位于秀容（现山西省忻州境内）的尔朱荣。于是，尔朱荣就成了北魏版的董卓，被政府邀请进入了洛阳，获得了大权，另立了皇帝孝庄帝。尔朱荣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北魏政权，他镇压叛乱的同时，却大肆杀戮不服从的官员。

不肯充当傀儡的孝庄帝杀死了尔朱荣，却又被尔朱荣的从弟尔朱世隆所杀。此刻，尔朱家族的权力已经遍布天下，许多家族成员都身居要

职。但最终，尔朱家族被以高欢为首的另一个武装集团消灭。

在一系列的纷争过后，北魏形成了以高欢为首、以晋阳和邺城为核心的东部集团，以及以贺拔岳为首、盘踞在关中的西部集团。贺拔岳死后，西部权力落在了他的手下宇文泰手中。

高欢和宇文泰并没有称帝，而是从北魏皇族中选择不同的人担任皇帝。于是，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高欢和宇文泰死后，他们的后代分别篡位，成立了北齐和北周。

在中国历史早期，当中华文明仍然以黄河流域为主时，不同政权大都是以崤山和黄河为界的东西对立，到了后来随着江南的发达和关中的衰落，就变成了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北对立。东西魏（北齐、北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东西对立。

双方大致以关内和关外的传统分界线作为国境线，也就是以现在陕西和山西之间的黄河为边境。边境线从黄河到蒲坂后，离开了黄河，经过潼关，南下武关，在襄阳西北与南朝梁的国境接壤。

唯一的一点例外在陕北地区靠近内蒙古的地方，这里在黄河以西有一座城市叫统万城，曾经是夏国的首都，被东魏占领。

双方国境线决定了，不管是东魏进攻西魏，还是西魏进攻东魏，都主要沿三条路线进攻，这三条路线从战国时代以来就一直是沟通关内外的主要通道。

以率先发起进攻的东魏为例。东魏军队可以从晋阳（太原）沿着汾河谷地，经过临汾、稷山等地，从龙门或者蒲坂渡过黄河进攻西魏（北路），也可以从洛阳出发进攻潼关，然后再向长安进军（中路）。除了这两条之外，第三条路线并不常走，即从南面的武关进攻上洛、蓝田，直捣长安（南路），这条路过于遥远，山路难走，对补给要求高，往往只是作为协同而使用。

在进攻中，东魏的高欢喜欢两路并进，一路从太原沿着汾河谷地过

黄河（北路），另一路从洛阳进攻潼关（中路）。这两条路中，使用北路更多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山西地区是高欢曾经的辖地，也是重兵布防的所在，出于调兵方便，常常走北路。

西魏的宇文泰则喜欢在北路持守势，而在中路使用攻势，数次派出大军经过潼关直捣洛阳。由于西魏掌握了潼关天险，又逐渐占据了位于现在三门峡的陕县一带，从中路进攻到达洛阳，已经相对容易。在历次征伐中，西魏都能顺利地到达洛阳，并继续向北，企图突破黄河直插山西的晋阳，或者向东进攻位于河北的东魏首都邺城。

但西魏在洛阳东北的黄河边，却总是遭到决定性的失败。

在洛阳以东，有两个决定战争走势的军事据点，一个是位于汜水的虎牢关，距离如今的河南省会郑州只有几十公里。虎牢关地处黄河边，在秦汉时期，虎牢关附近就是著名的荥阳城，在楚汉相争时代刘邦和项羽围绕着荥阳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到了北朝时期，人们在荥阳旁的黄河边上修筑了一座关口，就是虎牢关。

虎牢关位于黄河南岸，这里全是黄土构成的悬崖台地，台地之间沟壑纵横，几乎无法通过。只有一条叫作汜水的小河汇入黄河，如果沿着小河而上，就可以进入一个如同大肚宝瓶一样的谷地，谷地的四周都是峭壁，即便老虎进入这里，也如同进入了笼子。虎牢关就卡住了笼子的入口。如果西方的军队要向东前往豫东地区，只有占据了虎牢关，才敢于向东方进军，否则就会被虎牢关从背后卡住脖子。

另一个决定走势的据点是距离洛阳更近的河阳三城，位于洛阳东北的黄河渡口孟津不远。这里的黄河中心有一座小岛，在岛上和黄河两岸，各筑有一座城池，加起来一共三座，三座城市用浮桥相连。西魏在占领洛阳后，如果要渡过黄河向北进攻上党（现山西省长治一带）、晋阳，那么必须将河阳三城拿下，才能顺利渡过黄河并且没有后顾之忧。

西魏的军队就在虎牢关和河阳三城这两个据点屡屡遭受失败，无法占领。虽然它每次都可以进攻并占领洛阳，但最后由于军粮耗尽，无法防守，只能退出洛阳盆地，回到陕县或者潼关。

西魏在中线的进攻无法得手，在北线的防守却总是非常成功。在如今的山西运城地区，有一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三角地带，夹在黄河、汾河之间，在古代称之为河内地区。这个三角地带是北路和中路交会的中间地带，如果东魏占领了这里，就可以沟通北路和中路，形成策应，共同打击敌人。如果西魏占领了此地，就如同一个打入敌人七寸的楔子，让敌人不敢越过黄河进攻关中。

在这个三角地带，西魏大将王思政发现了一个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这个地点在如今稷山县西南五公里的地方，在汾河南岸的一个高高土台上。这个土台四面绝壁（只有东面相对高差一些，但是这里筑有坚固的城墙），顶部平坦得像一张桌子。在土台的西壁，又有一个巨大的冲沟，使得整个土台变成向西的“凹”字形。

如果在这个土台上筑城，就等于扼住了汾河的咽喉，东魏如果派兵从汾河进入黄河，就必须从玉壁城下经过。由于地势险要，东魏将士几乎不可能打下玉壁。如果东魏将士想要绕过去继续前进，玉壁城的守军就会从后方掐断他们的补给线。

王思政认为，只要占有了玉壁，就防守住了北路，让东魏无法通过此路进攻关中。唯一的难度是，这里在黄河东岸，已经深入东魏的境内，对于西魏来说，要守住这样的城市，也有很大的难度。

幸运的是，西魏在黄河南岸占有了潼关和弘农（陕县），这两座城市与玉壁恰好构成一个三角形，潼关和弘农就是三角形的两个底角。“潼关—弘农—玉壁”三角正好与“黄河—汾河”三角重合，西魏占据之后，东魏就很难从中路和北路进攻关中了。

自从建立之后，玉壁城就成了两魏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场。高欢每次率军进攻西魏，都必须首先要进攻该城。他利用地道、攻城车，所有的武器都尝试过，却留下了数万具尸体，被迫撤回。

正是有玉壁的存在，西魏才巩固了北部的边防，有力量组织军队，对洛阳实施打击。西魏本来就比东魏弱小，却能在历次战役中不落下风，得益于玉壁这座城市的杰出防卫作用。

对西魏更加有利的是，梁朝的侯景之乱改变了南北方的实力对比。在东西对抗的同时，西魏（北周）还腾出手来夺取了南方的四川和荆州地区，获得了两个超大的粮仓。于是，北方双雄的胜负手已经悄然变换。原本资源处于劣势的西魏已经成了中国最强大的政权，在经过了多年的鏖战之后，西魏的大反攻来到了。

统一与失衡

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一场针对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的阴谋正在进行中。

斛律光是北齐名将，甚至可以说是北齐当时唯一的依靠。他的父亲斛律金同样是名将栋梁，他女儿是当朝皇后，更难得的是，斛律光本人毫无野心，忠心耿耿地服侍着北齐皇帝。

但这时，民间突然传出了很多民谣，比如“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如“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在古代的计量单位中，一百升就是一斛，而明月则是斛律光的字，北齐的皇族姓高。这些民谣所指向的都是斛律光，暗示他有野心，要篡位。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北方政权在学习汉文化时，往往以汉代为蓝本，而汉代流行天人合一的谶纬，对民谣中蕴含的各种暗示都充满了警惕。这些民谣的出现，必然令北齐的统治者感到慌张。

在民谣的助推下，另两位权臣祖珽和穆提婆开始构陷斛律光，劝说北齐君主高纬杀掉斛律光。

高纬以奖励斛律光一匹马的名义，召他前来谢恩。毫无心机的斛律光没有丝毫怀疑。高纬的卫士刘桃枝从背后偷袭并杀死了他。斛律光在死前故意不做反抗，表示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朝廷的事。

斛律光的死，与当年南朝宋的名将檀道济一样，成了自坏万里长城的典范。檀道济是军事名著《三十六计》的作者，也是帮助宋武帝刘裕打天下的人，却由于宋文帝的猜忌而被杀。檀道济临死前说：你在毁掉你的万里长城！他死后，北魏君臣弹冠相庆，庆幸南方再也没有能够打败他们的将领了。斛律光死后，北齐的对手北周则庆祝得更为夸张，北周武帝得知后，干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大赦，庆祝一番。

斛律光之死除了是奸臣所害之外，还是北周大臣韦孝宽的计谋，那些民谣就出自他的手。韦孝宽一辈子为北周立下两宗大功：一宗是守卫

玉壁，气死了当年的东魏权臣高欢；而第二宗就是除掉了北周的最大对手斛律光。

在斛律光执政的最后年代，强大的北齐由于制度的失灵已经衰落。弱小的北周得到荆州和四川后，却变得强大起来。只是由于斛律光等人的拼死搏杀，才保持了相对的均衡。

在斛律光死前九年，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北周曾经发动过一次激烈的统一战争。这次战争中，北周选择了与突厥人联合，试图从一条北齐意想不到的线路进攻。

突厥人和北周大将杨忠从山西的正北方，向晋阳（现山西省太原）进攻，而另外两支部队则沿着传统的北线和中线，分别进攻平阳（现山西省运城境内）和洛阳。但这次拼凑的进攻以失败告终，特别是在北线和中线，斛律光先是在平阳阻击了北周军队，又驰援南方逼退了洛阳的敌军，可谓居功至伟。

斛律光死时，北周武帝的下一次战争已经在准备了。

这一次，他决定不再像上次那样分散兵力，而是集中在一个方向进行重点攻击。到底选择北路，还是选择中路，就成了战略决策的焦点。

北周武帝希望选择中路，他亲率大军直攻洛阳，再以洛阳为跳板，过黄河，进攻北齐的首都邺城。这条路接近于当年武王伐纣的道路。有三位大臣却建议走北路，从汾河进攻晋阳，以晋阳为中间目标，再越过太行山进攻北齐的首都邺城。这条路近似于当年韩信袭击赵国的道路。

北周武帝经过衡量，仍然被洛阳古都的气质所吸引。不过，他对计划也做了变通，不准备直接进击洛阳，而是顺河而下，先进攻洛阳东北黄河上的河阳三城。

北周武帝的军队长驱直入，攻克了位于黄河南岸的河阴城，阻止北齐军队从山西前来救援洛阳。然而，虽然占领了河阴城，位于河水中间的中潬城和北面的河阳城却久攻不下，洛阳城也一直在坚守，不肯投

降。山西方向北齐的救兵又快到了。

北周武帝只好撤军。由于选择进攻方向的错误，他丧失了第一次机会。

事实证明，在从陕西向东进攻河北时，中路之所以不如北路，在于中路的战略中间点洛阳处于平地之中，从洛阳打击河北，缺乏制高点，也过于遥远。如果平地作战，必须有足够的机动性，打闪击战，但黄河的阻隔让进攻者的机动性也丧失了，快不起来。

对手却占据了山西的高地，反而可以很容易地实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北周的进攻就只有失败一条路了。

一年后，北周武帝再次伐齐。这次，他吸取了前面的教训，选择了北路。与中路相比，北路虽然位于山西的崇山峻岭之中，却由于一直顺着汾河谷地前进，比起洛阳道的形势更加简单。

山西地区的晋阳（太原）由于位于各条山脉的中心，拥有居高临下的气势，有着控制河北、河南的作用。所以，北周武帝此次的目的，是利用晋阳从高处控制华北，再居高临下对北齐首都邺城进行打击。

这次的策略奏效了，在北周的打击下，北齐灭亡。

随着北周统一了北方，南方的陈朝小政权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建立了隋朝。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为了给伐陈做准备，文帝废除了位于江陵的傀儡国家后梁，进一步部署军事计划。

公元588年底，占据了四川、荆州和整个长江北岸的隋文帝开始安排一次类似于西晋伐吴的军事协同行动。

隋朝大军兵分八路向陈朝猛攻。在西面，隋军经过一个月战斗，占

领了长江中游地区，而在东面的进攻选择了春节时。由于在春节期间陈朝将领们纷纷请假回家过年，士兵也没有防备，隋军顺利渡过长江。二十天后，首都建康城破，陈后主被俘。

经过了两百八十年的乱世纷争，中国再次统一在了一个政权之下。

中国历史上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大分裂，中间只经过西晋的短暂统一，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南北对峙状态。三国时期，曹魏统一了北方，南方的蜀、吴分别制订了北伐战略，却由于南方的分裂，无法集中资源完成北伐。

东晋之后的南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统一状态，而北方却分分合合，一直不够稳定，这本来是南方反攻北方的好时机。

但事实证明，南方反攻北方的难度比诸葛亮和张竑想象的要大。南方之所以难以反攻北方，在于北方的地理特征过于纵深。南方即便攻克了洛阳，未必能攻克由潼关保护的长安；南方即便进入了长安，抵抗者仍然可以退到山西，借助地理优势居高临下打击入侵者。

北方进攻南方时，只要攻克了建康，战争就算结束；而南方进攻北方时，即便占领了华北平原、洛阳和长安，战争也只是刚刚开始。

不过，即便从南方很难完成统一大业，但东晋南北朝的大分裂丰富了南方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内，南方政权在发展经济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开发出一条“荆州—建康”轴心，长江也成了战略调兵的通衢大道。同时，广州也进入了战略视野，卢循和陈霸先两次利用广州为基地进攻长江流域，前一次失败，后一次却取得了成功。

南北对峙下，淮河流域的战略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要守长江，必守淮河”已经成了南方政权的魔咒，在未来一直受到了遵守。任何守不住淮河的政权必然丢失整个国家。

最后一次实验这个魔咒的是国民党政府。公元1949年，蒋介石虽然在长江上布满大军，却禁不起解放军的一次集体冲击，就是明证。

分裂虽然不利于人民的生活，却是发展战略的最佳时机。南北朝之后，中原的战争战略基本已经定型，只有向外扩张时，才由于新的地理因素的引进而有所发展。

但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由于北周是从长安起家的，它的后续王朝隋和唐也都定都长安。在隋唐时期，长安和关中平原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中心，这里已经供养不起一个帝国的体量。随着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关中盆地虽然还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却已经成了中原的附庸。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选择定都长安，必然引起新一轮的失衡，不管是和平时期供养长安物资，还是战争时期保卫长安，都必须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于是，中国在军事战略上进入了一个失衡时代。

(1) 拓跋珪同时使用了堪称经典的计策：由于燕君离国家太远，传递信息不便，拓跋珪派兵封锁燕军交通线的同时，招降燕军传信兵，将燕王去世的假消息传递给了燕军，从而扰乱了军心，击败了燕军。

第十一章　唐代建国：关中的最后辉煌（公元589—公元622年）

隋炀帝组织了上百万人（号称两百万）的东征高丽行动，由于无法在如此庞大的军队中进行有效协同而告终。历史证明，军队不是越多越好，超过需要的军队无法组织协同，还会把军粮吃光，反而成了失败的根源。

隋朝的崩溃在于财政机器太高效，将高于民间承受能力数倍的税收从民间抽走。由于财政收入来得太容易，刺激了皇帝的野心，修建了一系列的大工程，并发动了数场耗资巨大的战争，拖垮了隋朝。

在各地叛乱时，隋炀帝本应该留守北方镇压叛乱。但他却选择去战略地位远不及北方的扬州，实际上放弃了北方，这也宣告隋朝的统一结束了。

隋末杨玄感起义时，李密向杨玄感提出上、中、下三策，其中进攻洛阳是必败的下策。不想杨玄感却采取了下策，兵败身死。当李密成长为隋末最重要的领袖时，又一次面临着进攻关中还是进攻洛阳的选择，不想他仍然选择了进攻洛阳这个下策，从而耽误了机会，被唐王李渊捷足先登，占据了关中。

李渊进攻长安最大的障碍不是军事，而是安抚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李密，趁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完成自己的作战目标。李渊利用低姿态迷惑了他们，从而完成了军事计划。

李渊是最后一次利用“关中—四川”模式统一全国的开国君主。他的策略是：首先从山西借助汾河谷道进入关中地区，获得四塞之地，再将汉中、四川收入囊中，并平定甘肃、山西内的反抗势力，拿下所有对关中可能产生威胁的战略点。

一旦关中安全，就东进洛阳和华北平原，取得这个巨大的粮仓和后备基地。获得北方后，南方由于支离破碎，已经无力抵抗北方的攻击。

唐代之后，关中的地位继续下降，依靠关中就不可能再取得整个国家了。

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是一年一度百戏大会的日子。

自从大业二年开始，为了炫耀国家的富裕和强大，隋炀帝每年都会组织庞大的欢会和游行活动。在会上，会集了海内外数万人的乐工和舞者。政府只要听说哪里有好的歌舞表演者，都会邀请到东都。

这场集会从春节开始，持续十五天。鼋鼍龟鳌，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各种戏法，应有尽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

春节还是万国来朝的时期，大量的外国人拥入，在戏场上来回穿梭，惊叹于中国的富裕和繁荣。

公元610年春节，突厥的启民可汗与许多小国的国王一同前来东都。这一年的百戏大会设在了天津街。朝廷拿出了上万亿的经费来组织。各种奢侈的器玩，华丽的衣服，缀满了珠宝金银，修饰着锦绣罗绮，蜡烛火炬映红了天空，让外国人目不暇接[(1)]。

但在欢乐的背后，隋炀帝却在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远征。他向天下的富人加税，购买马匹，又下诏征兵，向北方的涿郡（现北京）集结，准备东征高丽（现朝鲜和韩国北部）。

在隋代，一共开通或者疏浚了五条运河。隋文帝时期修建了一条从首都大兴城（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河，当粮食从中原地区经过黄河运送到潼关附近时，就可以转广通河直达首都。

隋炀帝时代则建立了三条，并疏通了另外一条已有的。第一条是从洛阳到淮河南岸的山阳（现江苏省淮安）的通济渠，这条河从洛阳引谷水和洛水入黄河，再引黄河水入淮河。第二条从淮河到长江，则采用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修建的邗沟旧道，进行了加宽，这条河从山阳直到江都（现江苏省扬州）。第三条是渡过长江之后，从江都对面的京口（现江苏省镇江）到余杭（现浙江省杭州）的江南河。

这三条运河构成了“洛阳—杭州”运河的主航道。

另外还有第四条运河，是向北连接的永济渠，从黄河北岸延伸到涿郡（现北京）。这条河将洛阳与北方连接了起来，直达现在的北京附近。

涿郡也就此成了北伐的转运中心，不管是物资还是士兵，都会首先运到涿郡，再经陆路朝东北出发。

第二年，征伐高丽的军事行动继续准备，皇帝下令建造三百艘海船集结在东莱海口（现山东省烟台），作为从海上打击高丽的基地。官兵们日日夜夜造船，甚至为了赶工期不敢上岸，腰部都生了蛆。

炀帝本人则在四月抵达涿郡，随后下令建造五万辆运输车，送到高阳（现河北省高阳县，位于保定东南），再由士兵拖往前线。七月，江淮以南的民夫开始将大量的粮食从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黎阳仓运送到涿郡，运河中一时挤满了船只，上千里不绝，路上奔波的运输工达到了数十万，死亡的不计其数。

所有的粮食运送到涿郡后，就无法使用水路了。接下来，要由民工用牛车运到下一站——怀远（现辽宁省阜新境内）。由于东北地区较少开发，一路上坎坷泥泞，又造成了大量的死亡。

到这时，许多人禁不起折腾，已经走上了逃亡或者叛乱的道路。沿着运河各地，小的叛乱此起彼伏，炀帝只好命令各地政府进行镇压。

那么，如此折腾的运输，到底组成了多大一支军队呢？答案是：一共征发了正规部队二十四军，加上御营军，一共凑了三十个军和十二卫，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两百万人。

这两百万人又分成水军和陆军，其中水军以东莱为基地，渡海直接打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陆军则从陆地经过三道防线，进攻敌人首都。

其中第一道防线是在辽东（现辽宁省辽阳）的辽河防线，第二道是现在中朝边境的鸭绿江防线，第三道是在如今朝鲜境内的萨水（清川江）防线。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二，隋炀帝终于下达了出发的命令。每天出发一军，每军相隔四十里，一共花了四十天，所有的军队才出发完毕。隋军在绵延上千里的进军线路上旌旗招展，蔚为壮观。

隋炀帝动用如此庞大的军队去征服一个弹丸小国，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实际上，许多人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支号称两百万的部队，这个庞大的部队必然导致协同的不畅，引起效率的低下，被敌人各个击破。

即便不会在战场上失败，吃饭的压力也最终会压垮补给线，造成军队的分崩离析。

在进攻过程中果然问题不断。最合适的进攻方法是由段文振提出来的：为了避免军需压力，应该水陆并进，快速打击，直接进攻首都平壤，速战速决。

但是隋炀帝并没有采纳这个提议。于是，这支笨拙的大军就以每天四十里的速度向高丽的边境爬行。

三月十四日，隋炀帝到达辽河，开始准备渡河事宜。为此需要搭三道浮桥，但工部尚书宇文恺造的浮桥却比河短了一丈有余，结果士兵们上了桥仍然无法到达彼岸，只好撤回，丢下了大量的尸体。十天后，隋军才终于渡过了河。接着，隋军的任务是攻克河对岸的辽东城。这件看似不麻烦的任务又耗去了隋炀帝两个多月时间。

辽东城曾经多次想要投降，可炀帝要求将军们不能自作主张，必须向他汇报。可每一次将领们找到他，报告完毕，又经过他决策之后，敌人已经重新安排好守备，继续抵抗了。

到了六月初，隋炀帝嫌攻城太费时间，于是分出了九个军共三十万五千人先行东向，渡过鸭绿江进攻平壤。这支由于仲文和宇文述领导的部队本来要和水军会合，可是由于陆军行动太慢，水军已经被高丽先期击败，退走了，陆军只好单独出发。

到了鸭绿江，高丽派遣大臣乙支文德前来商谈投降事宜。将军们在自作主张和听从皇帝之间摇摆不决，又耽误了不少时间，还放走了乙支

文德。

最后终于开始了攻城行动。

但就在这时，宇文述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隋军的粮食吃光了。出发时，本来每个士兵带了百日的粮食，可由于粮食和武器装备太重，士兵们偷偷把粮食都遗弃了。结果，围困平壤还没有开始，最先感到饥荒的反而是隋军。

宇文述只好退军。但在士兵们渡过萨水不到一半时，高丽人发起了进攻。活着的隋军向鸭绿江奔逃，庞大的三十万大军只有两千多人逃回。

这次远征，是一次军事协同作战的巨大失败。在本来需要协同的任何环节，都出现了极大的失误。但实际上，以当时的技术能力，任何人都不可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要想获胜，就必须减少士兵人数，降低后勤难度，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协同性。军队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合适。

进攻高丽，也是隋朝崩溃的开始。这次远征刚开始，运河沿岸的人们就已经开始造反。随后，炀帝又进行了第二次远征。第二次远征刚上路，就经历了大臣杨玄感的叛乱，结果，所有的军事准备、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都白费了。

大业十年第三次远征以高丽王表面服从而告终，但这时，隋朝社会已经失控，中央政府再也无力挽救局面了。

隋朝崩溃于大跃进

隋朝建国后的政策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古代版的“大跃进”。

隋文帝本人生活节俭，为人刻薄，特别重视财政，并以财政来衡量民间的富裕程度。隋代由于经过了长期的分裂，刚刚统一，隋文帝的雄心壮志也造成了同样的问题。为了表现盛世繁荣，隋文帝很重视户籍和土地的增长情况，他一方面加大对人口的核查力度，将每一个不纳税的逃籍户都找出来；另一方面加大对土地的丈量和分配，务必让全国没有隐藏的土地。由于隋代的税收是根据土地、人口、户数三方面进行征收的，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就能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

结果，隋代统计的土地和户籍数据在政府的倡导、官僚的浮夸下，出现了极大的失真。以土地数据为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根据政府的统计，隋代的土地达到了十九点四亿亩[(2)]，约合现在的二十一点三亿亩土地，已经超过了中国现代的耕地面积。而事实是，在汉唐时期，中国耕地数量在五亿亩（现代亩）左右徘徊，明代之后才大幅度攀升。[(3)]

隋代的土地统计偏离了实际数据四倍，如果按照这个数据进行征收，必然导致税率水平抬高了四倍。到了隋炀帝时期，浮夸更加严重，官员上报的数据是五十五点八五亿亩，[(4)]已经超过实际情况十倍。

人口数据虽然没有这么离谱，却也有些惊人。根据统计，恢复和平没有多少年的隋朝户数达到八百九十万户，人口四千六百零二万人。[(5)]作为对比，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时期，官方统计的人口不过三百万户而已，[(6)]相当于炀帝时期的三分之一。

正是隋代的财政丰盈，才导致隋文帝和炀帝父子两人都热衷于大规模的工程。他们大建首都宫殿楼堂馆所，开凿和疏浚了五条大运河，在洛阳附近修建了一系列大型的仓库堆放粮食。经过两位皇帝的不断消耗，民间的粮食仍然源源不断地堆满粮仓。

当财政丰盈时，对外战争就成为必然。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是除了蒙古人之外，跑得最远的皇帝之一。在他统治期间，曾经向南发动战争，进攻如今在越南中部的林邑国，也就是历史上的占婆国。又遣兵进攻了现在台湾的流求国。在北方，为了震慑突厥人，修筑了位于黄河、燕山以北的三千里御道，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而在西方，也对位于新疆和中亚的西域诸国进行了打击。

但他在东征之前最著名的远征，是向祁连山中的蛮荒谷地进军。

在如今，如果坐汽车从张掖南下去西宁，[7]汽车先是在河西走廊的干旱土地上行驶，接着就会进入山区，顺着河谷逐渐爬升，植被也从农田变成了山区林地，最后是草原，在道路的两侧，则是祁连山脉四千米高的白色雪峰。这里现在被称为扁都口，古代被称为大斗拔谷。

随后，汽车翻过山口，进入一片巨大的草场，一座叫作峨堡的古城遗址在草场上耸立，经过草场后，爬过一串雪峰，就进入了青海省西宁所在的青藏高原地带。

这条路在夏天还充满了绿草鲜花，到了冬天则白雪封路、天寒地冻。在古代，由于没有现代的道路系统，只能沿着陡峭的河边行走，对于行人更是九死一生的体验。

但这条路，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条行军道，直接连接了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它还是中国统一皇朝的皇帝（蒙古人除外）最远到达的所在。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领军队从长安出发，举行了一次著名的远征。[8]为了征伐吐谷浑，他率军从首都大兴向西出发，进入甘南，再向西北进入如今的青海西宁一带，这里就是吐谷浑的所在。

但隋炀帝并不以到达西宁为满足，他从这里北上，翻越祁连山脉，经过大斗拔谷（扁都口）。在谷地里，风雪弥漫，天昏地暗，炀帝与他的随从失去联系，士兵冻死了一大半。

翻越祁连山到达张掖后，隋炀帝接受了高昌王麹伯雅的朝见，高昌

王向隋炀帝献出了位于新疆的大片土地，皇帝在那儿设置了四个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这是隋代疆土的鼎盛时期。

从河西走廊回来后，隋炀帝就开始准备东征高丽了。在征高丽之前，隋朝的社会经济已经在巨大的财政机器下被压榨得嘎嘎直响，但这个高效的机器却又总能继续压榨，给皇帝带来巨大的幻觉。

但这种幻觉随着远征高丽带来的巨大的军事财政负担，终于破灭了。隋炀帝三征高丽结束时，全国已经陷入了持续的动荡之中，各地规模以上的叛乱达二十多处。

但即便叛乱如此之多，隋炀帝仍然有财力举行下一次征伐，他率领大军进入山西北部的雁门，要与突厥人作战，被突厥人围困差点儿被俘。

突厥解围后，隋炀帝本应该迅速从雁门回到首都大兴（长安）坐镇，指挥镇压叛乱。当时从雁门回长安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从雁门走北方的河套地区，从陕北直达长安；另一条是经过太原，走汾河谷地，渡过黄河回长安；最后一条，也是最远的一条是经过东都洛阳，再走潼关回长安。

炀帝本来应该走前两条，以最快的速度回去，但他先是贪恋洛阳（军队、大臣的家人大都在洛阳），决定走最后一条路。到了洛阳之后，又决定不回长安，而是前往南方的江都（现江苏省扬州），这就把整个中国北方抛弃了。

江都虽然富裕，但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却远低于北方。当中国北方陷入战乱时，隋炀帝想学习东晋的做法，在江都建立首都。这种做法更加失策，这是由于：第一，北方统一南方容易，南方反攻北方却非常困难，隋炀帝的做法实际上是放弃了北方；第二，皇帝的部下大都是北方人，且有家属在北方，他们开始表达不满。

这时，大臣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乘机杀掉了炀帝，率军北归。

隋炀帝的死亡，意味着隋朝的统一已经不再，各地分成了几十个小政权互相作战，局势向着另一次乱世滑去。

李唐：低调示人的黄雀

在隋朝的所有反叛者中，最有希望继承正统的是李密。

隋炀帝第二次东征期间，在黎阳（现河南省浚县）督运军备的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爆发了叛乱，导致东征失败。

在隋代，围绕着东都洛阳，中央政府曾经在各个河口交汇处建立了一系列的大型仓库，便于全国的税收（当时以粮食为主）调拨。其中比较重要的几座是：位于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洛口仓，围绕着东都洛阳的回洛仓、含嘉仓和河阳仓，以及主要负责北方粮食的黎阳仓。杨玄感占据了黎阳仓，也就切断了北方隋炀帝的军事补给。

杨玄感的知交李密从长安赶往黎阳，加入了叛乱。对于叛军何去何从，李密给杨玄感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从黎阳向北方进军，占据北京，然后出兵临榆关（山海关），与高丽前后夹击攻击隋军。由于杨玄感断绝了隋炀帝的粮道，不用多久，就可以战胜炀帝。这样做，皇帝几乎不可能逃过被击败的命运，叛军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中策是：从黎阳向西进军，尽快占领关中地区和长安，利用关中的地形进行守备，再逐渐统一全国。这样做必然可以获得关中地区。但由于关中的地位在全国已经下降，获得了关中不一定能够统一全国，叛乱头子很可能成为地方军阀。

下策是：进攻距离黎阳最近的东都洛阳，因为出征将士、百官的家属大都在这里。但洛阳的防卫也极其稳固，易守难攻，如果叛军在百日之内无法攻克，等到各地勤王的军队都来到了，就是叛乱者的败亡之日。

出乎意料，杨玄感却选择了下策，他的盘算是，先占据洛阳，把在洛阳的官兵家属当作人质，让隋炀帝的军队瓦解。

事实证明，李密的预测是对的。叛军对洛阳久攻不下，各地勤王军纷纷到达，杨玄感的军队处于绝对劣势之中。他被迫转向中策，向关中进击。但此刻改弦更张已经过晚，加上进军路上犹豫不决，屡屡为城池所累，最后叛乱被平定。

杨玄感失败后，李密改名换姓踏上了逃亡之路，他逃到了一个叫瓦岗寨（现河南省滑县境内）的地方，加入了一伙强人，头儿是一位叫作翟让的人。

由于李密是文化人，逐渐成了瓦岗军的首领。这支军队离开瓦岗之后，向南占领了恒山南方的阳城（现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境内），在这里，李密制订了进军洛口仓的计划。在当时，洛口仓位于洛河与黄河的交界处，粮食储备是隋代几大粮仓中最为丰富的，又地处交通要道，封锁了洛口水路，就截断了东都最主要的补给线。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二月，李密率军从嵩山西面擦过，经过轘辕关进攻洛口仓，乘机占领了这里。

此刻，李密突然间面临着与当年杨玄感同样的局面：在洛口仓获得了粮食之后，他有两种选择：要么向西进攻关中和长安，要么就近进攻东都洛阳。

当年李密给杨玄感制订计策时，将进攻关中作为中策，而把进攻东都洛阳当作下策。(9)

李密的部下也向他提出进攻长安，获得关中四塞的天险，利用关中来平定全国。

此刻成为统帅的李密却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认为，进军关中的确是最好的方法，可是考虑到自己手下的素质，却无法做到。李密的兵大都来自翟让领导的乌合之众，他们更看重眼前的胜利，不在意全盘的形势。如果连东都都攻不下，没有人肯相信李密，跟着他去攻打长安。

从公元616年到公元618年这三年时光，这支隋末最重要的底层军事组织就耗费在进攻东都洛阳的战役之中。隋朝派来了大将王世充与李密对峙，虽然王世充败多胜少，却成功地阻止了李密的西进。

与此同时，在江都杀掉了隋炀帝的宇文化及率军北上，希望回到关中地区，却被李密在黎阳击破，宇文化及辗转于河北、山东一带，被另一支叛乱军队窦建德所杀。王世充也乘着李密战胜宇文化及之后的骄傲与疲惫，击溃了李密。

就在李密与王世充缠斗，失去了进攻关中机会的时候，却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另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乘机向关中进军。这支力量就是唐王李渊和他的三个儿子。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就在李密与王世充在东都对决时，在晋阳（现山西省太原）担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已经忍不住了。

李渊是北朝贵族世家，在隋代担任唐国公，也曾多次担任地方长官。后来由于隋炀帝猜忌，被召回了炀帝的身边。但随着天下大乱，炀帝被突厥人围困，李渊再次被起用，赴任太原镇守山西重镇。

李渊赴任时，社会局势已经乱到了极致。李渊作为朝廷命官，又有数千人马随行，当他率领人马沿着汾河谷地前往太原时，竟然遭到了一位民间叛乱分子甄翟儿的袭击，被围困在山西介休一带的雀鼠谷中，如果不是儿子李世民及时相救，差点儿遭遇了不测。

到达太原后，李渊在儿子们的帮助下，迅速平定了太原周边。

此刻，隋朝江山已经分割成了无数小片，除了李密之外，在河北有窦建德，河南有卢明月，鲁郡（现山东省兖州）有徐圆朗，马邑（现山西省朔州）有刘武周，朔方（现陕西省横山县）有梁师都，榆林有郭子和，陇西有薛举，河西有李轨。

在李渊身边有一群人敏锐地认识到，即便想回到隋朝也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只是到底谁能脱颖而出，统一全国的问题。

此时，李渊已经五十二岁，他的几个儿子都已经成年。这个年龄已经接近老年，但对古代的开国帝王来讲却是黄金年龄。

虽然人们谈论年轻人的冲劲更足，但在开创一代新王朝上，年轻人

往往不够成熟。群雄灭秦之时，刘邦已经四十岁，而项羽只有二十六岁，刘邦积累了足够的人脉，得到众多的帮手来完成多方出击的战争。过于年轻的项羽却无法获得人才优势，只能依靠单方面的打拼，他走到哪儿，就胜到哪儿，但他照顾不到的地方，却屡屡吃败仗。

刘邦之后的历代开国者大都是年长者开国，只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个例外（三十岁称帝）。还有几个依靠禅让的朝廷，在父亲打好基础后，由年轻的儿子完成禅让的最后一步。

李渊太原起兵时，也积累了足够的人脉资源，有阅历来处理与部下将领的关系，形成多头出击。令人羡慕的是，他的三个儿子都野心勃勃、能力出众，弥补了他作为老人的体力和胆量的不足。

更难得的是，李渊同时是一个合纵连横的高手，围绕着最终目标，在螳螂和蝉争斗的时候，只是静静地行动，绝不打扰他们。当其他人缠斗完毕，回头一看，才发现李渊已经占据了先机，到这时，他的优势已经不能动摇了。

公元617年，在儿子和属下的鼓动下，李渊杀掉了隋炀帝派去的副手王威、高君雅，获得了绝对的权力，随后在太原起兵，向西南方向进攻长安。

虽然进攻长安是目的，但最首要的任务是保卫好自己的后方和侧翼。由于太原北方还有突厥和另一个军阀刘武周的威胁，而在南方的洛阳，势力最大的反叛者是李密，只有安抚好突厥、刘武周、李密这三方势力，才能保证在出兵长安时，太原基地不会丢失。

李渊首先派人前往突厥，向突厥人献上厚礼并称臣，表示了联合的意向。他提出，出兵之后，自己只要土地，而劫掠的财产归属突厥。突厥人接受了这个提议，并送了两千匹马作为支援。由于马邑的刘武周也是投靠突厥的，李渊搞定了突厥，也就搞定了刘武周。于是，李渊的北方边境得到了保证。

对南方，李渊则派人与李密联系，奉李密为盟主，放低了自己的姿态。李密获得了沾沾自喜的资本，而李渊却巩固了南方边界。

唐军进军关中的难度最主要不是军事上的，而是人际关系上的，当李渊以低姿态摆平了几个竞争者之后，他已经占据了先机。

这个小心翼翼的黄雀最终会让当初忽略他的人大吃一惊。

在太原与首都长安之间，最便捷的通道是向西南汇入黄河的汾河谷地。在谷地中最险的一段，是介休附近的雀鼠谷，谷地向南经过贾胡堡到达霍邑（现山西省霍州），霍邑就是李渊起兵中的第一大障碍。

从霍邑向南，经过临汾，就到达了隋朝重兵守卫的另一座城市绛郡（现山西省绛县），是为第二大障碍。

从绛郡出发向西南，当时人们最常走的路是经过河东（现山西省永济），在蒲坂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平原的道路，而河东城更是重兵把守之地，是为李渊进攻的第三个障碍。

过河之后，在渭河边上有一个巨大的仓库永丰仓，到了这里，唐军就获得了重要的补给，是为进攻长安之前的一个中间目标。

李渊出发一个月后，到达了霍邑城下，此刻守卫霍邑的是隋朝守将宋老生。隋军的最佳战略是守险不战，直到进攻者筋疲力尽再消灭它。但缺乏经验的宋老生在李渊的挑战下贸然出击，被断了后路，霍邑被轻松攻克。

霍邑的失守引起了连锁反应，李渊迅速向南推进，先后占领了临汾和绛郡，半个月后，唐军已经站在了龙门的黄河边。

此刻，在黄河的东岸仍然有一大威胁等待着唐军，就是位于河东的隋朝守将屈突通。河东位于黄河蒲坂道的枢纽地带，屈突通又是有经验的老将，不会轻易被攻克。李渊在尝试之后，决定采取另外的策略：从另一条稍微绕远的道路，也就是汾河与黄河汇合口附近的龙门渡过黄河，同时留下一部分人马进攻河东，避免屈突通从后面骚扰。直到李渊进入长安之后，河东据点才被攻克。

渡过黄河，李渊的唐军占领了永丰仓，获得了大量的补给。打开仓

门，开仓放粮，得到了人们的拥护。接着，他兵分数路，一面围攻长安，一面分兵在渭河谷地四下平定叛乱。两个月后，当长安城最终被攻克时，长安周边已经基本被平定。

在之后的数个月内，李渊除了攻克河东和潼关之外，还获得了汉中、四川、陕北、灵武、南阳等多个地方，到这时，秦汉时期的关中四塞基本上都掌握在了唐军手中，由于李渊还占据了四川和汉中，已经获得了秦朝和汉朝统一之前的地理优势。既有粮仓，又有险关，到这时，一条像当年秦皇、汉祖统一全国一样的道路展现出来。

但在隋唐时期，关中的优势更加衰落，中原的富庶、江南的崛起让关中的经济地位变得微不足道。李渊即便占领了关中和四川，还有没有可能搭上末班车，再一次利用“关中—四川”模式完成统一呢？

有人说，李渊比起当年秦皇汉祖的优势在于，他还掌握了山西高地，对于中原地区有压迫性。但实际上，山西也并没有全面掌握在他的手中，在山西的马邑还有另一个军阀刘武周，限制了山西的军事优势。

那么，李渊如何行动，来最大化自己的优势，从而搭上关中的末班车呢？

清理后院的战争

在夺取了关中之后，李渊接下来的最大任务是占领东都，而要占领东都，最大的敌人是李密、王世充和位于河北地区的窦建德。随着李密被王世充打败，李渊在北方最大的对手就只剩王世充和窦建德了。

与李渊相比，王世充和窦建德虽然实力强劲，可在地理上却都处于平原地区。还有一些小军阀实力不如他们，却占据了险要，如果不把他们清除掉，在唐军向东方进攻时，他们就会在背后进攻，牵制唐军的军事行动。

这些小军阀位于陇西、河西走廊和山西北部，只有清理了这些后院，才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对付位于中原和华北平原上的敌人。

这些较小的叛乱者是：在甘肃南部，以天水、临夏、兰州为中心，盘踞着军阀薛举和他的儿子薛仁杲；在河西走廊地区，是号称凉王的李轨；在山西的马邑（现山西省朔州）则是投靠了突厥人的刘武周。

另外，在如今的北京地区（幽州），还有一位军阀罗艺，李渊进入长安后，罗艺一直对李渊表现出效忠。幽州的臣服，使得李渊在遥远的北方获得了一个坚固的同盟者。

最先对李渊发难的是位于甘肃南部的薛举。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随着李渊刚刚获得关中地区，薛举也开始以天水为基地，向唐军发起了进攻。

在隋唐时期，从天水进攻关中平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最常用的（南路），从天水经过陇山，下陇山后到达如今的陇县一带，继续向东进攻扶风（现陕西凤翔县境内）。扶风位于群山之中，有五条河流（汧、渭、漆、岐、雍）交汇于此，是长安城西面的屏障。一旦获得了扶风，就拥有了从渭河上游打击长安的地理优势。

另一条（北路）是从北边绕远的道路，从天水经过六盘山，在如今的固原南面顺着弹筝峡向东去平凉，再下泾州（现陕西省泾川）。这一

条路连接固原地区，从长安去往塞外就用这条路进入固原。

薛举使用了最直接的陇山—扶风道，他的儿子薛仁杲下陇山围困了扶风，但被李世民率领的援军击败，退回了陇山之上。

当南路被唐军扼守时，薛举转而寻求从北路突破，大举进攻泾州。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薛举率军从天水出发，进入北方的泾州地区，由于泾州有唐军守卫，薛举越过泾州，击败唐军，向长安进军。

此刻，也是李渊的唐王朝最危急之时，如果丢失了长安，就意味着关中地区的混乱。即便未来唐军能够夺回长安，却由于失去了时间，东部群雄可能已经整合完毕，不容易进攻了。

但是，幸运的是，薛举突然死了，他的儿子薛仁杲威望和能力都不足，无力发动新的攻势。

同年下半年，唐军大举反攻，逼迫薛仁杲投降。

薛仁杲的灭亡，消除了唐军关中地区最大的隐患。第二年，唐军又击败了盘踞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军阀李轨。到这时，李渊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进攻洛阳来。

在洛阳地区，击败了李密的王世充已经杀掉了隋朝的傀儡皇帝杨侗，自称皇帝，建国号为郑。而在河北、山东一带，窦建德也已经称王，建国号夏。

就在唐军准备东征时，突然却传出了北方军阀刘武周入寇的消息。刘武周曾经在隋朝担任过武官。当隋末群雄大乱之时，他在马邑发动了叛乱，并依靠突厥人，占据了山西北部地区。

当李渊从太原率军进入关中，开创一代王朝时，在他的背后，还有另一个人决定全盘照搬，复制他的军事行动。

刘武周决定利用自己在山西北部马邑的地理位置，首先进攻太原，将李渊发迹的老巢据为己有，再顺着李渊进攻长安的道路向西南进军，

也完成一次进攻长安，夺取关中地区的控制权。

刘武周在大将宋金刚的帮助下率军南下。由于晋阳（太原）驻扎着唐朝的晋王李元吉（李渊之子），刘武周绕过了太原，首先进攻太原南面的榆次，再继续南下占领了平遥和介州（现山西省介休），并以介州为基地，击败了唐军的数次援军。

在如今介休东南十公里左右，有一个叫作张壁的小村子。这个村子建设在一个三面环沟的土塬之上，沟深数十米，是个易守难攻的军事宝地。如今的张壁村仍然环绕着城墙，街道两旁房屋高大、小巷狭窄，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在张壁村的地下，保留着复杂的地道，这些地道四通八达，又分为数层，是中国少有的古代地下系统。

当年刘武周就利用这些地道和坚固的堡垒，击败了唐军的进攻，切断了太原和南方的联系。由于唐军的救援无法到达，李元吉逃离了太原，将这个山西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拱手让给了刘武周。

刘武周继续南下，先后攻克了晋州（现山西省临汾）、浍州（现山西省翼城）等地，并控制了渡过黄河的龙门通道。这时，除了西南一隅（河内地区）之外，整个山西都掌握在了刘武周手中。

刘武周的南下，让李渊不得不推迟进攻洛阳，首先对付这个山西的竞争者，保证侧翼安全。为了避开敌人的势头，有人提议唐军撤出山西，退到黄河以西，再集结力量与刘武周决战。

这个提议被李世民否决，他率领军队东进，与刘武周相持在绛州一带。在如今新绛县以西的汾河南岸，有一个叫作柏壁的小村子。这个村子距离东、西魏玉壁大战的战场玉壁城只有二十公里左右，与玉壁一样，同样属于黄土台地地貌。

柏壁村的位置恰好位于几条道路的交会点附近，它西可以通黄河的龙门通道；东南可以经过垣曲县，到达济源，再过黄河前往洛阳；北可以沿汾河谷地而上，去往太原。李世民选择柏壁的意图很明确，和当年西魏占据玉壁一样，李世民只要占有了柏壁这个位于高台地上的堡垒，刘武周就不敢贸然东进进攻长安，而它在几个方向上的交通线也都会受

到柏壁的骚扰。

为了克服柏壁的屏障，宋金刚率军围困了这里。李世民一面下令运输粮食囤积在柏壁，做好长期围困的打算；一面坚守不战，以消耗敌人的物资为主。最后，再派军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造成了敌人的粮食匮乏。

半年后，宋金刚放弃了速胜的打算，由于粮食无以为继，终于率军撤走。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唐军毁灭性的打击。

刘武周进攻时势如破竹，在撤退时也崩盘得非常迅速。一路上，他放弃了占领的所有据点，包括晋阳，退回了北方的马邑，又逃入了突厥，最终被杀。

刘武周的失败，让唐军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到这时为止，影响关中地区的所有战略点都已经被唐军控制。王世充与窦建德虽然凶猛，但他们处于地理上的绝对劣势之下，唐军巩固了关中和山西堡垒之后，开始出关向最大的敌人进攻了。

关中的最后辉煌

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六月，经过多次耽搁之后，唐军进军东都的战役终于爆发。

此刻，由于唐军的迟迟不发，王世充已经借机占据了大片的领土，南方直达襄阳，东方达汴州（现河南省开封）、杞州（现河南省杞县）。在东北方向，则与另一个军阀窦建德相接，窦建德占据了河北和山东的广大地区。

唐军进攻时，王世充的主要兵力除了分布在洛阳和几个卫星城之外，还有襄阳、虎牢、怀州（现河南省沁阳）等交通要道。

王世充的薄弱点在西面的崤山、函谷关一带，由于唐军占领了从关中到河南的天险潼关、陕州（现河南省陕县）一带，王世充在西面缺乏抵御唐军的地理优势。为此，王世充采取的方法是“机动防御”与“固守首都”的结合。

所谓机动防御，指的是由于缺乏天险，只能派出机动军队，在唐军主力的方向做防守。另外，自从隋代以来，洛阳就汇集了天下的粮食，建立了一系列的粮仓，可谓兵强马壮。王世充希望在首都做防御，当唐军久攻不下，而粮食又出了问题时，就会撤军。这种思路与当年王世充和李密决战时是一样的。

唐朝大军在李世民的率领下东进，王世充采取了机动作战，派出三万人阻挡唐军的前进，却被李世民击败。他只好东撤，回到了洛阳一线，放弃了机动作战，开始认真组织洛阳防御战。

为了对付王世充的坚城防御，李世民则采取了蚕食战略。他知道一时无法攻克洛阳，就从外围入手，首先切断洛阳与周围的联系。

洛阳的南面，与江汉平原的联系主要通过龙门山（现龙门石窟所在）上的伊阙塞进行沟通，通往伊阙可以前往南阳、襄阳。李世民派军向南进军伊阙，切断洛阳与南方的联系。

洛阳的北面，是黄河和孟津渡口，黄河以北又是军事重镇怀州（现河南省沁阳），而在黄河以南则是著名的粮仓回洛仓，也是洛阳的粮食基地。李世民派军进攻怀州（沁阳），再从怀州向黄河进军，切断回洛仓与洛阳的联系。

洛阳的东面是另一大仓库洛口仓，也是李密当年进军洛阳的基地。李世民同样派军占领了洛口仓。

李世民本人则率领大军继续进攻洛阳城。

在唐军的节节进逼之下，王世充退入了越来越逼仄的空间之中，大批的军队投降了唐军。外围的据点逐渐被清理干净，洛阳越来越成为孤城。

然而，对唐军来说，这样的策略也有巨大的风险：在唐军与王世充对垒时，位于河北、山东地区的另一个军阀窦建德的走向令人关注。如果他乘机加入反对唐军的一方，必然导致唐军的腹背受敌，陷于危险。

为了拉拢窦建德，李渊在进攻洛阳之前，就与窦建德取得了联系，约定建立同盟关系，共同出击王世充。但在实际战争中，由于窦建德忙于平定东部的另一个小军阀孟海公，并没有参与对王世充的军事行动。

当王世充逐渐失去领土，而唐军也因为食物匮乏，出现了厌战情绪时，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救。此刻，窦建德突然间明白了，如果他继续与唐军联合，那么等王世充灭亡后，下一个目标就会是他。

窦建德及时改弦更张，开始与王世充联合。他首先派出使者，希望双方罢兵。窦建德的提议让唐军感到紧张，因为唐军也到了强弩之末，很难再抵御新的敌人。

但李世民决定孤注一掷，坚决不撤兵。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窦建德大军呼啸西进，荥阳、阳翟（现河南省禹州）等地应声而下，大军直达虎牢关东面的东原。东原在历史上以广武而知名。在楚汉相争时期，广武城分为楚国占据的东广武和汉军占领的西广武，两个广武城中间是一条深深的大沟，即鸿沟的所

在。

在西广武的西面二十余里，就是著名的虎牢关。李世民占据了虎牢关，与窦建德的东广武遥遥相对。唐军主守势，窦建德被阻挡在虎牢关以东，无法救援洛阳。

此刻，窦建德的下属提出了一个“围魏救赵”的建议：既然无法前往洛阳，就应该率领大军向北渡黄河，沿着黄河北岸向怀州、河阳进军，越过太行山到达上党地区，再进入汾河谷地，向关中进军。这样一方面可以占据山西的高地，居高临下监视洛阳；另一方面又可以震慑关中，逼迫唐军放弃洛阳，回关中守卫长安。

窦建德想采用此计，却又禁不住王世充三番五次的求救。他的犹豫不决直接影响了士气。在这之前，处于两方夹击之中的唐军显得更绝望。但随着时间的拖延，窦建德军队士气下降，唐军的地位又开始好转了。着急的反而成了窦建德，他必须尽快打一个胜仗，才能解决军队的士气问题。

到双方真的在战场上相见时，李世民利用了窦建德急于决战的心理，故意拖延布阵，让布好了阵的窦建德军从辰时足足等到午时，方才利用对方人困马乏之际展开战斗。这次战斗的结局是：唐军一举击溃了对方，俘虏了窦建德。(10)

李世民虽然一战封神，却带有很大的侥幸。在双方上战场之前，都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在地理上也没有一方具有绝对优势。可以说，胜面只是五五开。但心细胆大的李世民却孤注一掷，利用一切机会拖延和消耗敌人，将敌人的心急和厌战情绪尽量放大，这才取得了胜利。

虎牢关一战同时解决了唐军最难缠的两个对手，窦建德被俘后，王世充见援军没有了，只好举城而降。

唐军占领了东都和山东，幽州的军阀罗艺一直是唐朝的友军。整个北方已经为唐所有，到了收拾南方的时候了。

在中国的南方，割据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家。

占据荆州地区的是南朝梁的皇室后裔萧铣，他乘隋末大乱，占据江陵，希望恢复南朝的统治。当唐朝占据了襄阳和四川后，在三峡和襄阳与萧铣对峙。

占据如今江西省地域的是军阀林士弘，他定都豫章（现江西省南昌），自称楚帝。

而盘踞江淮一带的则是军阀杜伏威。在李渊称帝后，杜伏威与北方幽州的罗艺一样，一直是唐朝的忠实盟友，并称臣于唐。当唐平定南方时，杜伏威为了防止唐皇的猜忌，主动要求进京交出兵权。但他离开后，大将辅公祏却举起了造反的大旗。

这三家互不隶属，由于地盘不大，本身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唐军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原则，先兵分三路，灭亡了萧铣。之后进攻林士弘。最后平定辅公祏。

当最后一个军阀被唐王朝平定时，一个足以比肩汉朝的庞大帝国，第二次屹立在中国大地。这一次，它存在了二百八十九年。

李渊最初起家于山西，他的策略在于首先从山西借助汾河谷道进入关中地区，获得四塞之地，再将汉中、四川收入囊中，并平定甘肃、山西的反抗势力，拿下所有对关中可能产生威胁的战略点。

一旦关中安全，就东进洛阳和华北平原，这里是巨大的粮仓和后备基地。获得北方后，南方的支离破碎，仍然无力抵抗北方的攻击。

但这已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利用陕西统一全国了。唐朝之后，关中的地位进一步下跌，人们发现，如果同时占据了山西和华北平原，依靠山西的地势和华北的粮食，已经远远超出了关中地区的实力。

唐朝的统一已是关中的最后辉煌。

(1) 《隋书·音乐志下》。

(2) （唐）杜佑：《通典·食货二》。

(3) 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

(4) 《隋书·地理志》。

(5) 《隋书·地理志》。

(6) 《新唐书·食货志一》。

(7) 新通车的从西宁到张掖的高速铁路也经过这一著名的山区，最高海拔在两千米以上，是中国高速铁路巨大成就的体现。

(8) 《隋书·炀帝纪》。

(9) 当年的上策已经失效，此时皇帝已经不在北方，也就无法北上进攻皇帝了。

(10) 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后来继续抗唐，三年后被平定。参考《新唐书》。

第十二章　安史之乱：缺乏制高点的叛乱（公元622—公元763年）

安史之乱初期，当安禄山占据洛阳后，由于叛军缺乏制高点，唐军本有望通过侧翼进攻的方法，在河北一带切断叛军，击败安禄山，但这个机会被杨国忠等人浪费。

在杨国忠等人的压迫下，唐军将领哥舒翰不得不搁置自己死守潼关的正确战略，率军出击。哥舒翰被击败后，安禄山突破关中，逼迫唐玄宗逃走。

节度使的出现是由于唐代财政问题的恶化。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财政收入不够养兵，节度使就是为了解决军事财政问题而一步步出现，直至彻底失控的。

安禄山的军事计划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保住河北和北京的大本营；第二，由于出征的距离遥远，要想获胜，必须保证军事补给线的畅通；第三，必须尽快破坏敌人的军事补给线，让敌人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战争的消耗；第四，出其不意，迅速占领两京，瓦解唐王朝的指挥中枢。

保护自己的补给线，掐断敌人的补给线，这两条充分展现了安禄山的军事智慧。

唐代首都长安一直是失衡的，它只是政治中心，却必须靠江淮的物资来养活。江淮到首都的通道包括两条，一条走大运河，另一条走武汉、汉江到汉中，再翻越秦岭到达长安。安禄山成功地封锁了第一条通道，在封锁第二条通道时却失败了。

由于忽略了山西，安禄山的军队被困在了反“L”形的平原之内。缺乏制高点，无法应付侧翼攻击，这是他战略上最大的失误。

郭子仪打通朔方到太原的通道，使得唐军掌握了一条从侧翼进攻安禄山后方的道路，这条路在整个安史之乱时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长安失陷前，唐军采取关门打狗战略：将安禄山限制在北京到洛阳的平原地带，将四周封死，利用山西高地，打击敌人的侧翼，直到安禄山疲于奔命。但这个战略由于杨国忠等人的干预而失败。

运河失守后，唐朝建立的第二物资转运线成了支撑战争的生命线。这条线路是：江南和江汉的粮食汇集在荆州、襄阳一带，沿着汉江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向北翻越秦岭，绕过长安，从西面直达宝鸡一带，再继续北上，经过固原送往北方前线。

长安失陷后，李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暂时不收复两京，而是借助两京拖垮安禄山，再从北方塞外出奇兵直捣他的老巢，将其击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想象力的战略之一，却没有被皇帝采纳。唐军虽然收复了两京，却无法彻底击败叛军，造成了更长久的破坏力。

为了镇压永王和安史之乱，设立的内地节度使，种下了唐中期藩镇割据的苦果。安史之乱结束时，全国已经有了三十六个节度使。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中，起兵造反的安禄山第一次尝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此刻，他已经占领了唐朝的东都洛阳，并在这里称帝。

然而，唐军的顽强抵抗也让他始料未及。按照计划，他从幽州（现北京）发动叛乱，挥师南下，经过河北，渡过黄河，占据洛阳之后，应该一面率领军队过潼关占领唐朝首都长安；另一面则派人继续南下，从淮河、襄阳两个方面切断唐朝南方的税收，彻底瓦解唐帝国。

大唐是一个失衡的帝国，它的政治中心在长安，但经济和税收中心则转移到了江淮一带，一旦切断了税收线，整个帝国就如同缺血一般陷入困境。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安禄山的意料。他的大军占领洛阳之后，却在三个方面都遭受了挫折。

在西面，由哥舒翰率领的唐军据守潼关，挡住了西进的道路，他无法在短期内突破哥舒翰的阻碍。

在东南方向，安禄山的大军也同样遭受了激烈的阻挡，两座不起眼

的小城挡住了叛乱者的大军，这两座小城叫雍丘（现河南省杞县）和睢阳（现河南省商丘）。一位叫作张巡的小人物血战不屈，先是据守雍丘，后来退到睢阳，致使安禄山的大军无法越过睢阳而占据江淮的粮仓。

在西南方向，南阳太守鲁炅也在叶县设防，后来又退到了南阳继续防守，阻挡了安禄山占据南襄隘道。张巡和鲁炅两人的顽强抵抗，起到了阻止战局恶化的作用，为唐军争取了反击的时间。

唐军的抵抗，将安禄山压制在了一个反“L”形的平原地带，这个反“L”形以幽州（北京）为顶点，伸向郑州附近的平原区域，在这里转折向西，到达另一个顶点洛阳。

这个反“L”形区域位于富庶的中原地带，是唐朝领土的中间位置，将剩余疆土隔得四分五裂。

可安禄山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高地，也就是战略防御点。这个反“L”形的四面都有唐军对其形成压迫，最重要的地点在太行山背后的山西，这里是高原地带，具有高屋建瓴的作用，却由唐军牢牢掌握。

如果安禄山不能突破这个反“L”形区域，迟早如同风箱中的老鼠，在唐军的攻击下疲于奔命。

果然，事情向着恶化奔去。就连安禄山的老巢也遭受了唐军的打击，局势变得越来越艰难。安禄山起家时，担任着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同时担任河北道的采访处置使，是整个中国东北部的最高长官，他的根据地在幽州和河北一带。

当他进攻洛阳后，根据地却逐渐陷入了混乱，先是有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在河北地区反抗安禄山，宣布效忠唐朝。其后，李光弼和郭子仪先后率军从太原方向打击河北，要切断安禄山军队在洛阳与根据地幽州的联系。

安禄山忧心忡忡，在留守洛阳还是返回幽州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至于进军关中，占领长安，早已经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了。

此刻也是安史之乱的第一个关键点，如果唐玄宗能够把握好时机，继续让哥舒翰、张巡、鲁炅等人死守，同时让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从背后打击安禄山，那么反叛者的部队很可能会溃散，这场叛乱在两年之内就会被迅速剿灭。如果是这样，大唐的江山也不至于伤筋动骨，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基础犹在。

但突然间，朝廷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让安禄山的命运柳暗花明。他不仅没有退回幽州，反而占据了长安，将唐玄宗逐出了关中。

错误的缘由来自唐朝内部的争斗。担任宰相的是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在唐玄宗后期，两位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擅权，引起了人们巨大的不满。有人劝说驻守潼关的天下兵马副元帅哥舒翰，让他率军首先进长安把奸相杨国忠清理掉，再去处理安禄山的问题。哥舒翰拒绝了，但杨国忠却担心有朝一日哥舒翰会重新想起这个提议。他一方面建立效忠自己的部队做防范，另一方面则催促皇帝，命令哥舒翰不要留在潼关以西，而是赶紧出战。他的情报显示，安禄山在潼关以东的兵力薄弱，如果哥舒翰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

哥舒翰、郭子仪等人都主张不要与安禄山硬拼，在潼关取守势，在敌人的背后（河北）进行打击。这种侧翼迂回攻击的效果远大于正面对抗。但在杨国忠的一再催促下，哥舒翰别无选择，他大哭一场，率军上路。

果然，杨国忠的情报是错误的，那些战斗力不强的老弱病残只是诱饵，当唐军进入山谷之中时，被敌人从山上扔下大石块砸死无数，敌人随后又放火焚烧，唐军大败。

在哥舒翰之前，唐玄宗由于听信了宦官边令诚的谎言，杀掉了镇守潼关的大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换上了哥舒翰。此时哥舒翰失败后，为了避免遭遇高仙芝同样的命运，他投降了安禄山。

结果，原本陷入绝境的安禄山竟然交上了好运，享受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胜利。他的对手唐玄宗在潼关陷落后闻风丧胆，向四川境内逃跑。

一场更大的灾难席卷了大唐江山，盛世再也不复返。

都是藩镇惹的祸

要想看清安史之乱的根源，就必须追溯到唐代初期建立的制度。

唐代继承了隋代和北周的军事制度，建立了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军事制度。所谓府兵制，指的是士兵以府为单位聚居，他们既负责打仗，在打仗之余也要种粮食养活自己。

之所以要让士兵自我谋生，与唐代极其简化的财政制度有关。唐朝的前两位皇帝都不重视正规的财政税收，而是想建立一套自我经营的养官体系，不用太多的税，就能让官员和士兵自我生财。

简单来说，就是划出一部分土地给士兵和官员，士兵种地供应军费，而官员分得的土地叫职分田，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出租这些职分田，获得收入作为俸禄。就连官府的办公经费也不依赖于正规税收，而是由中央政府划拨一部分土地出租，来作为办公经费，这些土地称为公廨田。

除了土地之外，中央政府还一次性给每一个政府机关一笔钱，让它们放高利贷，把利息作为办公经费，这些钱叫公廨钱。

唐高祖和唐太宗认为，这个架构完成了政府机关的自我维持，不需要中央政府划拨太多的财政拨款，就可以照常运转。由于对财政税收依赖小，唐代前期的税收一直不正规。

然而，这套“自我维持”手段却被证明是失败的。虽然府兵们有土地，可是随着惰性的增加，士兵并不乐于种地，而划拨的土地也不够维持他们的军事行动经费，最后只能靠政府拨款。

官员们的职分田也引起了麻烦，许多官员理财不善，收不上足够的租金，最后政府只好再发一份俸禄。

充任各级政府办公经费的公廨田和公廨钱也都失败了，特别是公廨钱，由于官员不会管理公家财务，放出去的钱收不到足够的利息，甚至

出现了亏本，到最后，只好采取强买强卖，把钱硬是贷给一些富户，强迫他们按照年率百分之百给政府交钱。不过即便这样，办公经费仍然不够，中央政府还是得调拨经费。

就这样，一方面自我维持系统失败了，另一方面，政府的财税体系又没有建设好，造成了唐代财政一直处于紧张之中。

财政收入不够的同时，财政支出却越来越大。唐代恰好处于一个周围的少数民族都很发达的时代。唐朝皇帝们要对付蛮族，除了传统的突厥人之外，还必须与薛延陀、回纥、吐谷浑、高昌、龟兹、高丽、百济、奚、契丹、突骑施、吐蕃、大理作战，甚至最远到达了中亚地区，与穆斯林直接发生了冲突。

如此庞大的战争需求对不健康的财政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随着府兵制的恶化，到了玄宗时期，已经没有办法依靠正规财政来供应军队需求了。

唐玄宗执政初期，是两种思想的碰撞时期：一种思想认为，要解决财政问题需要节省开支；而另一种思想坚持，要解决财政问题，在于增加收入。

这两种思想区分了两个集团，可以分别称为“贤相集团”和“聚敛集团”。在玄宗执政前期，贤相集团在朝廷占据优势，但随后财政的恶化，聚敛集团逐渐兴起。玄宗后期，聚敛集团已经将贤相集团排挤走，控制了朝政。这样，中央政府就被一群以聚敛为目的的技术性官僚所控制。他们执政唯一的目的，就是以财政为目标来考虑政策，任何能够带来财政收益的都是好手段。

在聚敛集团的主导下，唐代的军事制度出现了巨大的变革。

唐代采取的府兵制中，全国各地设有总管府（都督府），这些府本来只管军事，不负责民事，地位在民事的各州之上。有的都督府驻扎在一个州内，但是又节制周边的数个州，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结构。但基本上而言，军事与民事是分家的，而军事又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不参与

地方财政。

唐高宗时期，由于军事行动中需要协调各方关系，高宗给一些军事官员（都督）授予了节度使的称号。他们由中央派出，带着皇帝的令符，负责节制当地的军事。这时的节度使并不是一个官职，只是临时性的称号。

唐睿宗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给凉州（现在的武威）都督贺拔延嗣了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作为官职正式出现。

所谓节度使（藩镇），既不同于之前的都督，因为都督只负责军事，不参与民事；也不同于地方的州刺史，因为刺史不管军事，只负责民事。它还不同于观察使，因为观察使只有监察权，没有军事和民事权。节度使是将所有这些权力都合而为一、权力高度集中的官职，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权，同时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任命权和监察权。(1)

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和直接长官结成非常强烈的忠诚关系，皇帝反而边缘化了。

为什么要设立节度使？因为军事财政的需要。唐代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养兵，府兵制的战斗力又太差，设立节度使的意图就是，将军们除了带兵之外，还负责地方财政，从地方上直接搜刮钱财养兵，而中央政府不再管这事了。

由于士兵们脱离了劳动，节度使的兵战斗力更强，当他们守卫边关时，对蛮族的威慑力更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项有利于军事作战的改革。但问题在于，以前的兵都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而现在由于节度使搜刮钱财养活士兵，士兵们就认为自己是节度使的私家兵，对节度使的忠诚逐渐替代了对唐朝政府的忠诚。

由于节度使士兵的战斗力更强，又不用花中央政府的钱，唐朝政府开始削减其他士兵，到最后，边关地区的藩镇兵已经占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造成了严重的失控。

玄宗时期，围绕着唐代边关，北方、西南、东南，一共设立了十个节度使。

表4　唐玄宗时期的十节度使[2]

名称	治地	统摄	兵力
安西节度使	龟兹	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	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衣赐六十二万匹段
北庭节度使	北庭都护府（现新疆乌鲁木齐）	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	兵二万人，马五千匹，衣赐四十八万匹段
河西节度使	凉州（现甘肃省武威）	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	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匹，衣赐岁百八十万匹段
朔方节度使	灵州（现宁夏灵武）	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	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四千三百匹，衣赐二百万匹段
河东节度使	太原	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	兵五万五千人，马万四千匹，衣赐岁百二十六万匹段，军粮五十万石
范阳节度使	幽州	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	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匹，衣赐八十万匹段，军粮五十

		阳、唐兴、横海等九军	万石
平卢军节度使	营州	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	兵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
陇右节度使	鄯州（现青海省乐都）	以备羌戎，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	兵七万人，马六百匹，衣赐二百五十万匹段
剑南节度使	成都	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	兵三万九百人，马二千匹，衣赐八十万匹段，军粮七十万石
岭南五府经略使	广州	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	兵万五千四百人，轻税本镇以自给

唐玄宗时期的另一个错误，是对节度使的控制力太弱。最初，为了保证节度使的忠心，皇帝还特别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员，比如请一些退职和没有退职的宰相来担任或者兼任节度使。

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帝国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掌握。这些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为了打击政敌，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

责放给那些失败者（退职宰相）。

玄宗后期，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经过数次演化后，落入了蛮族之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外族名将就掌管起了庞大的唐朝军队。

李林甫时期，依靠着个人魅力和手腕，能够保证这些蛮人节度使的忠诚。但他一离任，这种平衡立即打破。

李林甫的接任者杨国忠不仅没有魅力，还立刻与节度使们起了冲突。他首先要对付的，是兼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此刻，安禄山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地步，如果他想叛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

杨国忠想削弱节度使的职权，但他的削藩举动又进一步激起了安禄山的疑心。双方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大，到这时，一场叛乱已经不可避免了。

安禄山的智慧与失误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长安城内发生了一次秘密搜查行动。这次行动由宰相杨国忠授意，他首先派门客四下打听，又派人搜查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抓捕了他的两位食客李超、安岱，叫人在御史台将这两人勒死。接着，杨国忠把安禄山安插在京城的亲信贬出了长安。

杨国忠之所以这么做，有几个目的：一是为了动摇安禄山在首都的根基；二是寻找证据让唐玄宗醒悟；三是激怒安禄山，让他露出马脚。

可惜的是，杨国忠的策划并没有让唐玄宗醒悟，反而让安禄山铁定了心发动叛乱。他打出的名义就是诛杀皇帝身边的奸臣杨国忠。声名狼藉的杨国忠没有想到，当安禄山打出这个招牌时，大部分人竟然拍手称快，持观望态度。

安禄山最初的计划，是以献马的名义，派精兵护送马匹到洛阳，一举拿下洛阳后，再进攻长安。这个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河南尹达奚珣识破。随后，安禄山制定了另一个更加可靠的战略。

安禄山占据的土地是卢龙、范阳和河东三地，具体说来包括三部分：一是现在北京附近，二是北京以西的辽东地区，三是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

与安禄山势力范围接壤的地区中，山西太原在唐军手中，而黄河以西的河西地区，则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地盘。幸运的是，唐朝由于掌握了山西与河西，无意之间占有了战略地理上的优势。只要能够守住山西太原及其以南地区，就把控了华北的屋脊，将叛军压缩在平原地带，这一点决定了后来的战局。

在河北地区，安禄山由于是河北采访处置使，也拥有着较强的控制力。但在河北道所辖的二十五州，仍然由各州的民政长官控制，安禄山只有监察权。安禄山必须依靠自己的权威，首先镇住河北，才能巩固北方基地。

综合上述形势，安禄山制订了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战略才能，另一方面又展现了他的不足。

安禄山的计划可以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保住大本营；第二，由于出征的距离遥远，要想获胜，必须保证军事补给线的畅通；第三，必须尽快破坏敌人的军事补给线，让敌人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战争的消耗；第四，出其不意，迅速占领两京，瓦解唐王朝的指挥中枢。

他对于“保护自己后勤”和“破坏敌人后勤”这两方面的强调，尤其显示出一个军事家的智慧。

针对上述四个目标，具体的计划是：

第一，安禄山的大本营主要是大同、幽州、辽东一带，三地又以幽州最为重要。而对幽州造成最大威胁的，是唐军在太原的基地。从太原到幽州，中间只隔着一座太行山。为此，安禄山一方面在太行山主要通道井陉布设了军队，防止太原唐军从这里过境；另一方面，派遣大同的军队进攻太原，期待攻克这座城市，彻底保证侧翼的安全。

第二，安禄山的基地是幽州，要进攻的第一目标是洛阳。从幽州到洛阳最重要的通道是隋炀帝开通的运河永济渠。为了保证这条运河的安全，安禄山在运河沿线设下了重兵进行防守。

第三，在唐代，首都长安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唐代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江淮一带，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虽然在秦汉时期是巨大的粮仓，可到了唐代，关中的产量已经无法供应庞大的首都人口，只能依靠从江淮地区转运粮食来维持首都的消耗。

从江淮转运粮食到首都，有一条主要通道和一条次要通道。主要通道是从淮河通黄河的通济渠（大运河），一旦通济渠被截断，长安的粮食就会立刻陷入紧张。次要通道则是利用长江将物资转运到武汉地区，在武汉转入汉江，经过襄阳地区，最后到达陕西汉中，再从汉中走陆路，翻越秦岭，到达长安。次要道路需要经过陈仓道或者褒斜道，都是古代重要的通道，却并不好走，在翻越秦岭时必须放弃水路而走陆路，所以并不经常使用，只是作为应急道路。

安禄山为了掐断首都长安的粮食供应，在进入黄河流域后，就派人出发去攻占江淮，以切断主要通道；同时又向襄阳进军，以封锁次要道路。

如果这两条通道得以封锁，时间持续久一点儿，长安可以不战而溃。

第四，当军队到达黄河后，打闪击战，尽快攻克洛阳和长安。

但百密一疏，安禄山作为军事家又是不合格的，他虽然制定了复杂的计划，却轻视了一点：山西。之前，不管是后汉光武帝还是刘渊和石勒，他们在打击洛阳之前，都必须首先考虑山西。由于山西地处高原，不先拿下或者结盟山西，当进攻洛阳时，就很容易受到从山西发动的侧翼进攻。

安禄山必须考虑首先拿下山西的太原盆地、长治盆地和临汾盆地，才能够封锁住侧翼进攻线，否则，即便攻下了洛阳，唐军只要仍然控制着山西，就随时可以从高处调兵打击叛军。

安禄山并非不重视山西，只是由于最初的进攻过于顺利，起兵不到一个月，就已经过了黄河向东都洛阳进逼。当进攻东都迫在眉睫时，山西问题被搁置了。

山西被搁置引起的问题暂时不会显现，但时间长了，叛军始终在反“L”形的平原内活动，随时被山西压迫，这时想起来当初的决策，才会发现失误有多大。

叛军进攻洛阳时，唐玄宗仓促任命了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前往东都招兵。封常清飞驰到洛阳，紧急招兵六万人，开赴虎牢关。安禄山已经攻克了荥阳。在两军对峙中，由于封常清的士兵没有经过训练，缺乏战斗力，被安禄山击溃。当年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占领了洛阳。

洛阳的占领达成了一个重大目标：长安的交通命脉被切断了。洛阳控制了从江淮地区到长安的水路，这也是唐代最主要的粮食运输道路（也就是长安、江淮两条交通道的那条主道）。洛阳一失守，长安就陷入了恐慌之中，道路被封锁后，时间长了，必然会导致物资和粮食的匮乏。

封常清撤退到陕州，与唐玄宗仓促任命的副元帅高仙芝会和，两人商议退守潼关，凭借天险阻挡安禄山进攻长安。高仙芝与封常清都是唐代名将，在唐代边关征战多年。特别是高仙芝，近代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在中亚探险时，曾经探访了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境内一系列的高山峡谷。这些峡谷在一千多年前，曾经被中国将军高仙芝征服。高仙芝曾率军从现在的新疆西南部出发，进入喀喇昆仑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完成奇袭，征服了小勃律，即便是现代人借助现代机械，仍然很难到达。

高仙芝与封常清退守潼关是个军事上非常正确的决定，一方面，将安禄山关闭在从洛阳到幽州的低地上；另一方面从侧翼袭击他，在正面战场却暂时不与他作战，以免他攻破了战线进入长安。

但固守的做法在政治上却很难被采纳。一方面，由于安禄山断绝了长安的粮食运输线，皇帝担心长安会缺乏粮食，希望能够尽快打通交通线；另一方面，宫廷内斗使得更多的人质疑将军们坚守不战的做法。

大宦官、监军使边令诚利用了这种质疑，乘机上告皇帝要求诛杀两位将领。唐玄宗竟然批准了这个请求。(3)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死亡显示了唐军的混乱与皇帝的昏庸。

但就在这时，安禄山却遇到了第一次转折点：他的好运似乎就要结束了。

唐军的关门打狗战略

就在安禄山制定策略进攻两京，并破坏了中央政府的经济交通动脉时，唐军也逐渐适应了战争的特殊时期。局部反攻的时候到来了。

反攻的最关键地点就在安禄山忽视的山西太原。虽然安禄山也试图从大同出兵进占太原，甚至派人渡黄河打击位于陕北和宁夏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但由于战略没有落实，真正将山西利用起来的，反而是唐军将领郭子仪。

郭子仪一面组织人马击败了来犯的敌人，另一面派遣了大将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人出兵向大同反攻，占领了中途的马邑、雁门一带。虽然大同仍然掌握在叛军手中，但马邑和雁门却有一条路通往太原，这样，郭子仪就掌握了从朔方到太原的关键性道路。唐军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路支援太原，再从太原出发，通过井陉进入河北地区骚扰安禄山。安禄山的后院开始受到威胁，他千方百计确保的交通线和后勤线不再稳固。

当郭子仪从山西高处打破了叛军的战略意图时，河北也有了抵抗。在河北率先起事的是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

颜氏兄弟都在河北道任职，颜杲卿担任常山（现河北省正定）太守，颜真卿担任平原（现山东省平原）太守，本来都受安禄山节制。特别是颜杲卿所在的常山，就在井陉口的东侧，与太原隔太行山相对，是安禄山阻击太原的前线。

安禄山叛乱后，率军从河北掠过，南下进攻洛阳，在背后的颜氏兄弟则先后起兵效忠唐朝。在二颜的鼓动下，河北各郡纷纷响应。

河北二十五个州郡中，一共有十七个郡反正归唐，真正铁心效忠安禄山的只有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等少数几个郡。到这时，形势开始对唐朝有利。

为了对付二颜在河北的起兵，安禄山派大将史思明从北方赶来，加

入了混战。颜杲卿战败被杀，颜真卿继续抵抗。

当河北战局再次向安禄山倾斜时，唐玄宗派李光弼出井陉，过太行山进入河北地区，加入战团，击败了史思明。山西的战略地位再次得以显现。

李光弼出兵后，安禄山在河北的困境并没有出现根本变化。

河北大乱时，南方也并没有按照安禄山的战略顺利进行。按照计划，一旦占领了东都洛阳，叛军就要兵分三路：一路向西攻打长安；一路向东南方向进攻，经过淮河到达长江，占领江淮地区的大粮仓，彻底破坏唐代的军事财政系统；另一路则向西南进攻南阳盆地、襄阳和荆州，夺取长江中游。

但这三路的进军都遭到了抵抗。在西路，唐玄宗虽然杀掉了高仙芝和封常清，却又任命了另一位边关悍将哥舒翰担任守将。哥舒翰同样继承了高仙芝的战略，在潼关坚守不战，以消耗叛军的锐气。

在叛军截断了大运河到黄河的物资运输线之后，唐王朝匆忙间搭建了另一条物资运输线（也就是原南北交通的次要道路），沿长江而上，到达武汉，再转汉江，过襄阳，沿着汉江进入陕西汉中地区，再从汉中走陆路送往长安。这条路虽然非常绕远，却避开了叛军占领地界，让唐王朝勉强可以维持战争财政需求。

要想截断这条新的运输线，必须向西南进攻南阳、襄阳，从襄阳断掉唐朝的运输船队。安禄山第三路军正是要攻打襄阳。

叛军到来后，南阳太守鲁炅（升职为南阳节度使）率军北上叶县，抵抗两个月后退守南阳，在南阳又抵抗了整整一年，随后弃南阳保襄阳。这种有计划的抵抗和撤退，始终没有让叛军摧毁襄阳的运输线。

而在东南，安禄山的军队在小城雍丘（现河南省杞县）和睢阳（现河南省商丘）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雍丘令张巡和睢阳太守许远坚决阻止敌人南进，一共抵抗了二十一个月，直到叛军势头过去，已经无力南

侵，才告沦陷。

到这时，安禄山的军队正式被限制在一片广大的反“L”形平原地带：从现在的北京向南，抵达华北平原，但在“南阳—许昌—睢阳”一线被唐军阻止，无法继续南进；在西面则被阻于潼关；他虽然占领了山西北部的大同，但在以太原为中心的山区直到黄河北岸，也就是所谓华北屋脊地带，仍然由唐军占领。

唐军战略也已经成型，可以归结为“关门打狗”战略：把安禄山逼在一条狭长的平原通道内，将四周的门封死，你打一下我打一下，让他四处乱窜直到最终被消灭。

唐军的战略，是几员大将不经意间配合的结果：哥舒翰负责关上潼关的门，李光弼负责骚扰安禄山的北方基地，同时，郭子仪则开始在太原囤积军队，准备从上党地区南下黄河，进攻安禄山占领的洛阳，完成对他最后的击破。

但就在这最紧急的关头，由于宰相杨国忠的私心，他逼迫潼关的哥舒翰出战，被安禄山乘机利用，攻破了潼关，冲破了唐军设下的“牢笼”，形势瞬间直下。

李泌奇谋空叹息

潼关失陷的当天，消息已经传到了长安。一天后，宰相杨国忠提议西逃四川。第三天，皇帝召集百官商议，所有的人惊慌失措，却无人提供对策。第三天晚上，大量的官员开始逃亡，到了第四天上朝时，剩下的十无一二。第四天晚上，皇帝也开始做逃跑的准备。第五天一早，唐玄宗带着皇子、皇孙、妃子、近臣踏上了逃亡之路。

在长安西面的马嵬坡，跟随皇帝的将士发动叛乱，杀死了宰相杨国忠，逼迫皇帝绞杀了杨贵妃。

将士们希望皇帝不要进入四川，因为四川是偏安一隅的地方，一旦去了四川，就失去了对北方的控制权。唐朝即便没有完全灭亡，也会变成一个龟缩在四川的小政权。

安禄山虽然攻入了关中平原，但关中四周的险要（除了潼关之外）都还掌握在唐军手中，皇帝并没有丧失希望。特别是在北方，以灵武和太原为中心，已经是反击安禄山的核心，随时打击敌人的侧翼。

灵武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地界，他是唐军最坚强的后盾。如果皇帝能够撤向灵武，无疑是对唐军的一大鼓舞。

但灰心丧气的唐玄宗没有接受这个提议，撤向了四川的大后方。他的太子李亨决定留在北方，与父亲分道扬镳后，前往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

肃宗前期，是唐王朝最艰难的时期。潼关的失守，导致歼敌的大好形势瞬间反转。郭子仪和李光弼被迫离开了河北，撤回到太原和朔方。在河北一直抵抗的颜真卿等人被迫转移，将整个河北留给了叛军。安禄山占据了长安后，获得了两京的控制权。

安禄山占据了华北和关中，唐朝控制的领土却显得七零八散。西北的朔方和太原是主要的军事集结地区，但这个地区却缺产粮食，必须从外界运粮救济。江南、江淮、江汉和四川地区虽然有粮食，但运河交通

线被敌人破坏后，如何把这些粮食运到北方，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江南地区，唐朝的宗室永王李璘也发生了叛乱。由于南方的租税粮食大都囤积在江陵（现湖北省荆州）一带，驻扎在这里的永王决定自立门户，不再听从北方唐肃宗的领导，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南方政权。

永王沿江东下，直取江东。为了对付永王，唐政府不得不继续分权，新设立了几个节度使，让高适担任淮南节度使、来瑱担任淮西节度使、韦陟担任江东节度使，由他们镇压永王李璘。

节度使的随意设置，让唐王朝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为未来的藩镇割据打下了基础。

所幸的是，唐朝危急的时刻，安禄山也犯了错误。

占据长安之后，他本应该继续以长安和洛阳为基地，迅速将关中周边的关塞，以及山西南部平定，如果能够有效控制北方的制高点，就形成了有效占领，唐朝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但安禄山此刻却出现了战略空白期，除了继续向江淮和江汉用兵之外，在关中却缺乏合理的战略，导致叛军盘踞在长安不知所措。出了长安不远，就已不在叛军的控制之中。

长安西面的扶风地区（现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本来是长安的侧翼，仍然掌握在唐军的手中。唐军利用扶风、宝鸡地区，形成一条新的通道，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

这条通道是这样的：江南和江汉的粮食汇集在荆州、襄阳一带，沿着汉江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向北翻越秦岭，绕过长安，从西面直达宝鸡一带，再继续北上，经过固原送往北方前线。

这条路虽然极其绕远，却勉强解决了唐军的后勤问题，使得肃宗能够继续领导将军们抵抗安禄山。

在山西地区，史思明在潼关陷落后，向太原发动了进攻，太原却被李光弼死死守住。保住了太原，也就能继续从太行山后出兵，从侧翼打击河北地区。

在南方，张巡、鲁灵的抵抗仍在继续，确保了江南的安全。

与此同时，一个叫李泌的人进入了肃宗的幕僚团队。李泌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士之一，他才思敏捷，声名远播，当年玄宗有意让他入仕，却被拒绝了。李泌以布衣的身份与当时的太子李亨结交。后来为了避开杨国忠的迫害，他隐居于湖北。

肃宗即位后，李泌再次前来，却坚持不要官，仍然以布衣的身份帮助皇帝，成了皇帝的首席幕僚。

针对当时的形势，李泌敏锐地观察到安禄山的困境并不比唐军少。唐朝的地盘虽然分散，却以大包围的形势将安禄山裹在了当中。安禄山南过不了淮河，北占不了太原，虽然占领了长安，但长安城外几十里就是唐军的势力。留给他的，只有长安和洛阳之间的一条通道。

针对这个形势，李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暂时不收复两京，而是借助两京拖垮安禄山，再捣毁他的老巢。

这个战略具体的内容是：

第一，派遣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扰乱安禄山控制的河北地区，由于北方是安禄山的老巢，李光弼的出兵可以拖住安禄山在河北的大将史思明和安守忠。

第二，派遣郭子仪从冯翊（现陕西省大荔）渡黄河进攻河东（现山西省永济），由于河东在潼关以北，威胁潼关、华阴，郭子仪的出兵可以拖住安忠志和田乾真。安禄山拿得出手的大将除了这四位之外，只有阿史那承庆。

郭子仪在占领河东之后，不需要进攻潼关和华阴，给安禄山留一条在洛阳和长安之间的通道。由肃宗、郭子仪和李光弼轮流在长安以西、长安与洛阳连接部以及河北三地打击叛军，让安禄山率领阿史那承庆四

处救火，如风箱里的老鼠在三地间奔波，直到把士气消耗完。

第三，再派肃宗最英勇善战的儿子建宁王李倓率军从北方塞外出发，绕过河套，从燕山以北进入北京地区，与李光弼南北夹击，把安禄山老巢端掉。当叛军失去了老巢，位于两京的叛军就无处可去，就只有灭亡一途了。

李泌的战略有两点最值得称道：第一，出其不意，从大北方绕道北京以北，进行大包围，直捣安禄山老巢。这条路虽然在隋代就已经打通，但是在军事上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李泌时期，北方道路才进入战略视野，并在未来宋、元、明、清的战争中成为一条战略要道。

第二，肃宗曾经认为这个战略过于麻烦，不如率军直捣两京来得痛快，何必放着眼前的两京不打，反而千里迢迢去攻击遥远的幽州？李泌说出了这么做的好处：如果直捣两京，的确可以把敌人赶走，但是不能把敌人歼灭。即便唐军收复了两京，安禄山必然率军逃回老巢，事后还将卷土重来。

肃宗最后采纳了李泌战略的前两步，派遣郭子仪、李光弼分别进军河东和河北，但是拒绝了最关键的第三步，他还是选择了直接进攻两京。

事情果然如李泌所料，在经过几次尝试后，唐军在回纥人的帮助下占领了两京，而此时，安禄山已经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退出两京后，率军回到了河北的邺城。

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投降了唐军，却由于李光弼试图除掉史思明，逼迫史思明再次叛乱。

史思明的叛军南下救助被围困在邺城的安庆绪，获得优势的唐军派出了九位节度使组成的大军将邺城团团围住，却被史思明击溃。

史思明进入邺城，杀掉了安庆绪取而代之。

唐肃宗没有采纳李泌的策略，导致唐军无法彻底剪灭敌人的老巢，

史思明父子代替了安禄山父子继续叛乱，给唐朝造成了更多的伤害。

在中国历史上，李泌奇谋与当年秦取四川统一中国、蒙古借道云南包围南宋一样，是最具想象力的战略。如果肃宗不急于夺回两京，而是选择从北方夺取幽州，那么战争后中央政府仍然可以重树权威，唐朝可能不会陷入后来的藩镇割据局面。但由于皇帝没有采纳，这个奇谋只剩下了一声叹息，留在了历史的夹缝里供人讨论。

安史之乱的后半段已经变成叙利亚战争式的消耗战。史思明已经失去夺取全国的可能性，但唐王朝却一时无法消灭他。

唐军邺城战败后，战线再次被拉回了洛阳一带。史思明乘机占领了汴州（现河南省开封）和洛阳。统率唐军的李光弼（郭子仪为战败负责被撤职）再次以山西为依托，开展了对史思明的骚扰作战。他不急于进攻洛阳，而是占据了洛阳北面、黄河上的河阳城。如果史思明向西攻打长安，李光弼就从河阳出兵，在背后攻击他。如果史思明进攻河阳，李光弼就采取固守的策略，利用背后的山西支援河阳。

只有在叛军完全疲劳之后，李光弼才会从山西出发，对河北、洛阳的敌人分别进行打击和切割，各个消灭。

但李光弼的作战意图仍然没有实现，干扰他的还是皇帝和太监。太监鱼朝恩游说皇帝，逼迫李光弼出兵洛阳，导致唐军在洛阳北面的邙山下再次惨败，还丢失了河阳城。形势再次变得对唐军不利。史思明厉兵秣马，又准备进攻长安。

幸运的是，这时叛军再次起了内乱，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杀掉了父亲篡位，叛军内部的风雨飘摇让他们对长安的进攻无疾而终。

经过了长期的拉锯战，叛军的力量终于开始削减。唐军在新统帅仆固怀恩与回纥兵的帮助下，最终收复了洛阳，把战线推回到了河北地区。

在收复河北的过程中，仆固怀恩为唐朝留下了最后一个隐患：为了

尽快结束战争，仆固怀恩认为，应该争取史朝义的几员大将反正。除了对他们叛乱的经历既往不咎之外，还由朝廷委任他们为当地的节度使。

在仆固怀恩的安排下，史朝义的大将薛嵩、李宝臣（原名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都成了唐朝的节度使，继续统治着河北地区。这些河北的节度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角，是中央政府支离破碎的罪魁祸首。新的叛乱种子已经种下。

安史之乱结束时，全国已经有了三十六个节度使，这些节度使有些是以前的，有些是为了镇压叛乱，在临敌的前线临时设置的，还有河北的降将们。

节度使们拥有着地方统治的全权，又有兵权，控制着地方财政，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力被逐渐消解，最终产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有的节度使甚至对抗中央，完成了世袭制。当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以为战争结束了时，却发现，现在的唐王朝早已经面目全非。

(1) 《新唐书·兵志》：“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2) 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一》。

(3) 封常清在死之前仍然上书皇帝：“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

第十三章　藩镇的群狼谋略（公元763—公元820年）

唐代后期，每一个藩镇都是一个小军阀，他们不能独活，却又抱团取暖顽强地存在着。中央政府无力消灭藩镇，只能孱弱地活在几十个军阀的夹缝里。

节度使并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他们只是为了自保。为了自保，他们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抱团，二是世袭。保证皇帝无法将他们调走，又能通过联盟关系对抗皇帝的“军事入侵”。

唐朝中央政府虽然失去了地方控制权，藩镇却由于过于碎片化，必须依赖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授权，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中央政府与藩镇争夺最激烈的是征税权，谁控制了征税权，谁就有能力组建更强的军队。最初征税权被藩镇拿在手中，在唐宪宗时期，收回了部分征税权，达成了一定的平衡。

唐德宗时期，最危险的藩镇有六个，分别是位于河北地区的河北四镇，以及位于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和位于许州（许昌）的淮西节度使。六镇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河北与江南的税收路线，成了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

皇帝征召藩镇的军队，必须付给藩镇三倍的军粮作为补贴。这导致藩镇出工不出力，拿到了补贴，却作壁上观，或者谋求自我利益。中央政府在战争中花费巨大却成果有限。

唐德宗时期的泾原兵变显示出藩镇战争的复杂性。为了镇压淮西，皇帝动用了泾原的军队。但由于皇帝付不起军费，泾原军发生了叛变，将皇帝赶出了长安，一场局部战争变成了全面战争。

泾原兵变表明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越了财政能力，由于军事财政无法得到保证，又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和崩溃。

唐宪宗依靠武力收回了一部分藩镇权力，但这也耗空了唐朝国库，使得唐宪宗的中兴变成了昙花一现，并且再无力阻止唐朝的分崩离析。

代宗时期的藩镇周智光，代表了唐后期藩镇的风采。

周智光出身卑微，在军队中服役时，靠巴结太监鱼朝恩上位。

在代宗时期，吐蕃人成了唐朝的心腹大患。由于中原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平叛无暇他顾，吐蕃从青藏高原下来，占领了新疆南部，以及整个陇右（甘肃南部）和河西走廊地区。另外，从川西到云南也是吐蕃的势力范围。

代宗继位不久，吐蕃军继续向东，下了陇山进入了关中地区。代宗一看大事不好，连忙抛弃了长安，逃难去了。这是唐朝皇帝第二次逃离首都。吐蕃进入长安大肆劫掠一番，由于无法形成有效统治，只好撤离。

代宗时期，吐蕃并不是唯一的威胁，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仆固怀恩也出了岔子。由于功高震主，仆固怀恩与中央政府之间无法建立信任关系，他担心成为政府的打击对象，决定先下手为强，勾结吐蕃和回纥进攻唐朝。

为了对付仆固怀恩，唐代宗派出了各路节度使组成的联合军队北上抵抗，其中一支部队就由同华节度使周智光率领。这位节度使由此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虽然被征召，但周智光并没有认真对付叛军，而是夹杂了大量私货。他在攻击吐蕃人时，率军到了忠于朝廷的鄜州（现陕西省富县），当时的鄜州属于鄜坊节度使杜冕，刺史是张麟。周智光与杜冕有仇，乘机攻下了鄜州，杀死了刺史张麟，并把困在城里的杜冕家人八十一口全部活埋。

鄜坊节度使被灭门，这样的事情朝廷竟然毫无办法，只能听之任之。当军事行动结束后，周智光继续担任他的同华节度使。

所谓同华节度使，主要是镇守长安东方的同州（现陕西省大荔）和

华洲（现陕西省华县），华州是从关中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而同州则是通往山西的必经之路。正是两座城市的战略地位，让周智光成了唐代宗时期的一霸。

他聚集了大量的无赖子弟，随意地截留送往关中地区的漕粮，掠夺各级官员的财物。按照传统，到长安赶考的学子，在去往京城的一路上要到每个地方的官府里点个卯，但他们听说了周智光的所作所为，赶赴京城时都悄悄地通过同华地界，避免惊动他。周智光听说学子们故意避开他，勃然大怒，立刻率军袭击他们，造成了大量的死伤。

就连朝廷官员，一语不合，周智光也一样随意杀伐。陕州（现河南省陕县）本来与同华节度使的地盘相邻，但周智光与陕州刺史皇甫温翻了脸，于是将皇甫温的手下张志斌杀死做成了菜。

周智光如此猖狂，就连皇帝拿他也没办法。当皇帝听说周智光杀了杜冕一家八十一口之后，根本不敢主持公道，只是悄悄地把杜冕送到远处的南郑躲起来，免得被周智光发现。

周智光听说后，立刻出兵想截住前往南郑的杜冕，但没有成功。随后，他向皇帝讨要陕州、虢州、商州、鄜州、坊州五个州，皇帝不答应，他就立刻出兵自己去拿。

皇帝之所以拿周智光没有办法，是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孱弱到无法镇压藩镇的地步了。

最后，皇帝实在忍无可忍，只好偷偷地下令让郭子仪出兵干掉周智光。他不敢明着下令，因为同华距离首都太近，万一郭子仪没赶到，周智光却先进攻长安了，皇帝的命都难保。

周智光只是藩镇的代表之一。他虽然灭亡了，但唐代中央政府的孱弱地位却很难改变。

这样的藩镇在唐代有几十个，他们大权独揽，名义上属于中央，却有相当的独立性，甚至职位都可以世袭。他们如同一个个土皇帝，收税、招兵、截留皇帝的收入，将中国变成了一盘散沙。

那么，既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唐代为什么无法回到开元、天宝年间的稳定，反而陷入藩镇割据之中呢？

这其中既有中央政府的失误，又有藩镇的私心。他们共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由于各地充斥着犬牙交错的小型军阀，他们每一个都无法独活，却又依靠抱团取暖，大部分都顽强地生存着。

正是由于每一个军阀的力量都不够大，孱弱的中央政府才能在夹缝中继续存在着，起起落落，又维持了一百多年，才最终被取代……

割据，是为了自保

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原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的死亡，让唐代的地方将领感到心寒。

来瑱是安史之乱中著名的大将，镇压过永王李璘的叛乱，阻止过安禄山军队的南侵。他守卫的南阳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南阳丢失，那么中央政府建立的汉江运输线就会断掉，而唐代之所以能够组织起对安禄山的反攻，这条运输线又是必不可少的。

正因为来瑱的功劳巨大，他先后担任过淮南西道节度使、河南节度使、山南东道节度使、陕虢华等州节度使等重要职位。

安史之乱临近结束，皇帝担心这些节度使的独立性太强，会学习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开始削弱他们的权力。来瑱也被调回了中央，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虽然仍然兼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却不再赴任襄阳，而是留在了长安。

这时，会揣摩皇帝意图的人来了，大太监程元振以前曾经请求来瑱办事，遭到了他的拒绝，一直怀恨在心。他发现皇帝对来瑱充满了警惕，立刻上告来瑱谋反。唐代宗采纳了程元振的说法，将来瑱贬到贵州，又在路上下诏赐死。

来瑱的死亡让所有的将领感到寒心。一位太监在皇帝面前呼风唤雨，就能决定功臣的生死。他们意识到，此刻的朝廷已经不再可靠，任何人离开了手里的军队，被调回长安，都可能遭遇与来瑱一样的命运。

来瑱死亡最直接的冲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之乱第三号功臣仆固怀恩的叛乱，二是来瑱所在的山南东道的变局。

在安史之乱后期，由于皇帝想遏制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声名，派出仆固怀恩担任战争的总指挥。仆固怀恩在平定叛乱后，功劳巨大，一家四十六口死于王事。但关于仆固怀恩的功高震主的谣言也越传越烈。他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处境。

从后来的情况看，皇帝并没有干掉仆固怀恩的意图。但在皇帝与将军之间，却无法建立起一条互信的管道让将军放心，而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也让仆固怀恩寒心。

由于镇压叛乱动用了回纥军队，加之仆固怀恩是回纥可汗的老丈人，在他送回纥兵出境时，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在太原故意把他们当敌人一样防范，不给补给，不犒劳军队，惹得仆固怀恩上书控告。

为了解开两者的矛盾，朝廷派太监骆奉先前来调查。但骆奉先吃了辛云京的贿赂，仆固怀恩却不知道送礼，骆奉先回京后继续造谣说仆固怀恩反叛。皇帝与将军的正常沟通渠道已经不存在了，只能依靠一些太监从中传话。

恰好此时，来瑱的死变得尽人皆知。不管皇帝如何安抚仆固怀恩，都无法再让他放心。仆固怀恩终于与回纥、吐蕃人联合起来，对抗唐朝。

仆固怀恩病死于反叛的前线，他死后，唐朝借助郭子仪的名声与回纥达成谅解，并击败了吐蕃人，躲过了一场新的劫难。

但躲过了外来的灾难，内祸却无法避免。来瑱死后，他的部下、山南东道裨将梁崇义立刻抓住机会，杀死了唐朝在襄阳的官员，自封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不仅继承了来瑱的职位，也大声为来瑱喊冤。他给来瑱立庙烧香，声称来瑱是无辜的，要求惩罚罪犯和凶手。

皇帝只好找替罪羊，借机贬斥了程元振，并承认了梁崇义的篡权，册封他为正式的山南东道节度使。

这件事让人们突然间意识到皇帝原来已经这么虚弱。梁崇义明显的篡权行为不仅不受惩罚，反而得到了承认。只要节度使不去京城长安找死，紧紧手握地方兵权，就可以为所欲为。节度使的命运戏剧般地两极化了：要么待在驻地称王称霸，要么回到长安被皇帝处死。

那些身居最紧要地位的节度使从这时开始考虑如何进行长久统治的

问题，他们大部分并没有灭亡唐朝的野心，仅仅靠一个节度使管辖区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保。

为了自保，节度使们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形成互保联盟，在节度使之间进行通婚，依靠婚姻关系形成复杂网络。一家有难，其他家立刻来帮忙，哪怕是对抗朝廷也在所不惜。这很像是一种群狼战术，一只狼在自然界很难生存，可一旦结成了群，战斗力立刻发生质的变化，让狮子都不敢小觑。

第二，谋求世袭制，脱离中央政府的官员任命体系，不准中央政府任意调动他们的职位，再将职位传给子孙。世袭制一形成，士兵就有了归属感，不用担心节度使死后秋扇见弃，对节度使的忠诚感加强了。

唐代宗时期，藩镇（节度使）已经遍布全国。在玄宗后期，只在边关设了十个节度使。在安史之乱时期，为了对付安禄山和史思明，原来民事、军事和财政分家的地方政治体系已经不适合保卫领土了，中央政府必须在与叛军接壤的地区设立大量的节度使，只有同时掌握了财政、军事和民事全权，才能协调足够的资源来守城和抵抗。

这个时期，在华北、江淮、江汉一带都有大量的节度使出现，他们大的控制十几个州，小的控制三四个州，代宗时期节度使有三十六个，以后又增加到四十多个。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已经不可能回到民事、军事、财政分离的体系去。

对中央政府来说，最可行的方法是：保留节度使，承认他们在地方上的全权，但同时设法让节度使不要世袭，而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只要中央政府能随时调动节度使，他们就无法发动叛乱。

到这时，中央政府和藩镇的目标有了极大的冲突。中央政府的目标是把节度使变成“流官”，也就是随时可以调往别处的官员，而节度使的目标却是世袭，永远不离开自己的领地。

当目标矛盾时，两者的冲突就爆发了。

唐德宗：失衡的关中与高昂的军费

代宗死后，唐朝又迎来了一位雄心勃勃的皇帝——唐德宗李适。童年时在玄宗宫廷成长的德宗试图恢复唐朝的开元盛世。为了实现目标，必须首先把不听话的藩镇干掉，让中央政府能够控制藩镇的辖地。对中央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权力是税收权，只有能够从全国征税，中央政府才能建立更加强大的军队来实现实质上的统一。

在唐朝，首都关中地区不再是经济中心，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转移到了华北和江淮。不幸的是，经济中心却掌握在各个藩镇的手中，藩镇又控制了征税权，让皇帝无法从这些发达地区获得足够的收益。

全国的藩镇中，最危险的有六个，分别是位于河北地区的河北四镇，以及位于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和位于许州（许昌）的淮西节度使。

为了让安史之乱尽早结束，仆固怀恩建议唐朝接纳了几个史思明的大将，让他们留任河北地区的节度使。这些降将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但由于担心遭到仆固怀恩、来瑱的命运，他们不理会中央政府的征召，拒绝离开驻地，又通过婚姻、联保等各种方法，达成了互相支援的协议，一家受攻击，另外几家都要出兵帮助。

这些藩镇号称河北四镇，分别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他的儿子李纳继任），他是河北四镇中规模最大的，最初下辖淄、青、齐、海、登、莱、沂、密、棣九个州。在代宗时期发生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叛乱，李正己帮助皇帝镇压叛乱时又获得了德州。后来在汴宋节度留后（代理节度使）李灵曜的叛乱中，获得了曹、濮、徐、兖、郓五个州。这时，李正己一共统治了十五个州。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他的儿子田悦继任），下辖魏、博、相、卫、洺、贝、澶七个州。田承嗣曾经在代宗时期反叛，皇帝无法通过军事解决他，只好达成了和解。这次和解也让河北地区的藩镇看到了皇帝的虚弱。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下辖恒、易、赵、定、深、冀、沧七个州。

幽州节度使朱滔，下辖幽、蓟、妫、檀、莫五个州。

河北四镇控制了最繁华的华北地区，让中央政府几乎无法从华北收税，也就无力镇压他们。更糟糕的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另两个节度使地处交通要道，分别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他们的辖区分别位于淮河地区和汉江地区，唐代税收的转运主要依靠淮河、运河与黄河，从扬州一带转运到长安，必须通过淮西节度使的辖区，一旦淮西节度使把运河封锁，长安就会出现饥荒。

如果不走运河，从扬州一带向长安转运粮食，还有一条备用路：从武汉走汉江到襄阳，继续沿汉江到达汉中，再转运长安。山南东道节度使的辖区恰好封锁了这条备用路。

一旦淮西节度使和山南东道节度使同时反叛朝廷，江南的税收就无法进入长安。如果六个藩镇一同反对长安，那么江南与华北两大粮仓的粮食就都被截断了。

六镇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对皇帝充满了戒心，也不肯轻易服从中央。当胸怀大志的唐德宗开始削藩，试图增加中央政府权威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失衡的地理，以及孱弱的中央。长安的地理弱点，也让唐朝成了最后一个定都于此的全国性政权。唐朝之后，看清了长安劣势的开国皇帝们纷纷避开了这里，选择距离经济中心更近的华北地区定都了。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他的儿子李惟岳按照传统请求接任。但这次，唐德宗试图打破世袭的规矩，拒绝了。李惟岳随即与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发动叛乱。

在这次叛乱中，幽州节度使朱滔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初选择支持皇帝，派兵协助镇压叛乱。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地盘，不是为了帮助皇帝。特别是李希烈，从一开始就对准了山南东道，试图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流域。

在皇帝的指挥下，各路大军纷纷赶来参与了对四个叛乱军阀的战争。然而，这场战争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按照规矩，中央政府征调藩镇的军队，必须支付开支。在皇帝与藩镇间，军费的分配如下：如果藩镇只是在自己的统治区里调动军队，那么军费由藩镇负担；如果藩镇的军队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离开了他的统治区，那么从离开的那一天起，皇帝必须支付给藩镇一笔丰厚的军事补贴，叫出界粮，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1)

许多藩镇为了拿补贴，故意把军队派出境外，却作壁上观，不打仗专门拿津贴。中央政府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花费高昂，却效果有限。

以李希烈为例。当他进攻山南东道时，皇帝必须支付给他三倍的军粮，而一旦攻克了襄阳，李希烈本人却想占据襄阳不走，把山南东道也纳入他的藩镇之中。皇帝负责开支，利益却归藩镇，显然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幽州节度使帮助皇帝打仗，也是为了从成德、魏博的手中获得足够的利益。

这场战争起先规模并不大，几个月后，李希烈已经打败了梁崇义，占据了襄阳。一年后，在幽州朱滔的帮助下，三个叛乱的河北藩镇也岌岌可危，眼看就要失败。

但就在这时，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李希烈原本想占据襄阳，皇帝却并没有给他。朱滔指望获得更大的利益，皇帝也不能满足他。于是，李希烈和朱滔转身加入了叛乱者一方，形势瞬间急转直下。

在河北地区，由于马燧、李抱真等名将的参与，中央逐渐控制了局势，将朱滔赶回了幽州。但在淮西地区，事情却越来越麻烦，直到彻底失控。

泾原兵变：回到原点

在镇压淮西时，最初皇帝从附近的藩镇调兵，都被李希烈打败了。为了继续镇压，必须从更远处寻找兵源。调兵的半径也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遥远的陕西西部。

在长安的西面，有一个泾原节度使辖区，管泾、原、渭、武四州。由于距离淮西太遥远，如果皇帝不是迫不得已，是不会调动这么远的军队的。

随着战局的拖延，德宗终于命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经过长安，再向东去援助在襄城被围的唐军。但调兵的同时，皇帝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付泾原军的出界粮。德宗的官员们只好采取了拖延战术。

泾原军的士兵却并不知道此情，他们远道而来，满怀着对丰厚赏赐的憧憬。

泾原军到达长安附近时，遭受了第一次打击：皇帝不仅不让他们进入近在咫尺的长安玩耍，还没有给他们一丁点儿赏赐。直到从长安城外走过，到了东部的浐水时，京兆尹王翃才匆匆忙忙为他们准备了吃的，且全是粗茶淡饭。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让士兵们拒绝前行，一阵阵的谣言在军队中传播，说长安城里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皇帝一个人享受着荣华，却置士兵的死亡于不顾。[(2)]

唐德宗大惊失色，赶快下令对泾原军进行安抚，派人前去犒军。这次的赏赐是每人两匹帛。当赏赐下发时，士兵们更加被激怒了，他们感觉皇帝如此吝啬，不仅不值得替他卖命，还应该把他推翻，换一个大方的。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只能任由士兵转头前往长安，怀着对财宝和劫掠的渴望，冲向了帝国的首都。泾原兵变爆发。

泾原兵变是一个复杂的产物，表明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越了财政能力；军事财政无法得到保证，又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和崩溃。

在唐德宗仓皇逃离首都，前往长安西面的奉天避难时，造反的泾原军却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既无法建立稳定政权，又不能投降。

最后，他们把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哥哥朱泚抬了出来。朱泚本来是幽州节度使，皇帝为了防范，将他调离，居住在长安。朱滔造反时，曾经试图联络哥哥一同反叛，信件却被唐德宗截住。德宗认为朱泚并不知道弟弟的消息，没有追究。

但对叛乱者而言，朱氏兄弟却是最有可能建立新政权的人物，弟弟掌握幽州，哥哥占据长安，控制了北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在士兵的拥立下，朱泚称帝，率军攻打德宗所在的奉天，却失败了。

朱泚的失败说明，唐朝中央政府虽然失去了地方控制权，藩镇却由于过于碎片化，必须依赖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授权，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时的唐朝很像春秋时期的周王朝，周王的权力逐渐缩小，却又必不可少，屹立不倒。

不过，屹立不倒并不意味着没有困境，唐德宗在奉天不得不发出“罪己诏”，向天下人承认错误，宣布改过自新。这份罪己诏除了对皇帝本人大加贬斥之外，还总结了战争为什么失败的根由。皇帝认为，自己轻率地发动战争，没有考虑到战争成本，是失败的根源。(3)

由于低估了战争消耗，德宗本来以为对四镇的征伐是很容易的事，却没有想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被征调，影响早已超出了河北和江淮一带，整个中国都要承受战争成本。军饷需要从千里之外运到，士兵也要大量换防。人力不足，造成了大量的田地荒芜，战争引起的社会动乱已经初现端倪。

实际上，在泾原兵变中，长安城里的人们因为德宗皇帝的苛捐杂税太多，不是支持皇帝，而是迅速与叛军合流了，因为叛军进城时只想掠夺皇帝的宝库，对社会却是免税的。

到这时，德宗的战争已经不可能再打赢了，他必须缩小规模，对一些叛乱分子进行安抚，把有限的财力运用到最主要的叛乱方，才有可能回到长安。

在罪己诏中，德宗皇帝宣布大赦，大赦范围之广超乎想象。在最初的叛乱四镇中，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已经灭亡，成德节度使李惟岳也被灭了，这两人不牵扯到赦免问题。而淄青节度使李纳（李正己之子）和魏博节度使田悦都得到了赦免。后来加入叛乱的李希烈，以及代替了李惟岳的王武俊也都得到了赦免。

更难得的是，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哥哥朱泚已经在长安篡位称帝，是大逆不道，应该灭族的罪行，但皇帝仍然赦免了朱滔，继续让他担任幽州节度使，只对称帝的哥哥朱泚进行追究。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想将大部分叛军争取回中央政府阵营，因为皇帝已经打不起仗了。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些节度使仍然耀武扬威地控制着自己的地盘，不听中央的命令，统一帝国继续向着四分五裂滑去。

这场战争以朱泚的被杀、皇帝回到首都为结局。叛乱的各个诸侯命运也各不相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不肯投降，还自称大楚皇帝，由于皇帝的罪己诏已经团结了大部分人，李希烈被李勉等人击败。

不过李希烈死后，淮西节度使的职位又落入了军阀吴少诚手中，吴少诚和后代继续抗命中央，一直持续到唐宪宗时期。

河北四镇中，田悦的弟弟田绪杀害了哥哥，继任了节度使，王武俊和李纳都得到了赦免，继续把持本部。朱滔被赦免后不久就死了，幽州的大权留给了部将刘怦和他的儿子刘济。但总的说来，四镇擅权依旧，朝廷毫无办法。

德宗皇帝浪费数年，花费无数，换来的结果既没有更糟，也没有更好。这就是唐代藩镇割据的实质：每一个藩镇都想保护好自己的土地，但每一个藩镇都没有实力一争天下，不管哪一方付出巨大的努力，到最后都回到原点，对全盘形势没有太大的改善。

德宗在位后期，想尽一切办法积攒财政，为未来唐王朝的中兴做准

备。他期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获得全国的控制权。他的搜刮的确积攒了大量的军费，有了重新统一的资本，但他没有见到那一天，就孤独地死去了。

中央王朝的回光返照

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清晨，唐朝宰相武元衡正准备从位于首都的家里去往皇宫上朝。当他骑上马，带上侍从，刚刚从静安里东门出来时，突然间有人呵斥他们把蜡烛熄灭。随从由于跟着宰相，有恃无恐，也朝对方呵斥。

就在这时，突然从暗中飞出一支箭来，射在了武元衡的肩膀上。在阴影里冲出几个人，将他的随从驱散，另一个人则用棒子击打武元衡的左股。当随从都逃走后，这群人拉住武元衡的马向东南方向走了十几步，然后将宰相杀害，将他头颅割下带走了。

随从们带着救兵回来时，发现无头的宰相躺在血泊中。他死亡的地点，距离家的东北角只有一墙之隔。

当时黑夜还没有过去，路上大都是上朝骑马的官员和随从，这些人呼喊着四下传播，都说宰相被杀了，声音一直传到了朝堂上。文武百官面面相觑，不知道哪个宰相死了（唐朝宰相不止一个）。武元衡的马还按照既定路线，一路走到了上朝的地方，看到了马，人们才知道死的是谁。

皇帝上朝时，走到紫宸门，才听说了武元衡的死讯。他惊讶万分又沉痛不已。这次宰相遇刺事件中，另一位官员裴度也遇刺却逃过了一死，说明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

事后，人们查找杀死武元衡的凶手。在当时，中央政府正与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发生战争，武元衡和裴度都是坚定的主战派，他们的遇刺一定与吴元济有关。

吴元济的帮手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两人有可能是王承宗刺杀的。可后来，人们又认为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刺杀的。

宰相的死亡虽然成了悬案，却给了唐宪宗清理藩镇的最佳借口，也是唯一的时机。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忍辱负重的唐德宗去世，太子继位后由于身体有病，又让位给了儿子李纯，是为唐宪宗。

唐宪宗时期，全国节度使增加到了四十九个，但与德宗相比，由于财政状况的好转，中央政府已经有了更强的实力去平定诸侯。雄心勃勃的宪宗发起了剪除不听话的藩镇的斗争。

与德宗一样，宪宗的目的仍然不是为了废除节度使制度，它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唐代的官僚制度之中，不能动摇了。宪宗想做的，只是：第一，将不肯听话的藩镇拿掉，换上听话的人；第二，在做到第一步后，再有限地剥夺藩镇的财权和兵权，让他们没有实力与中央抗衡。

与德宗时期相比，随着藩镇的世袭化，节度使们也丧失了当年的锐气，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决心大大削弱，军队实力也不如当年，甚至有的藩镇决定投靠中央，这是对皇帝有利的一面。

除了当年的河北四镇和淮西节度使之外，宪宗时期决心与中央抗衡的藩镇还有两处，分别是位于四川西部的西川节度使，以及位于现在江苏省镇江的镇海节度使。

宪宗的策略是，从容易的入手，先将不听话的外围藩镇收复，树立中央政府的威信，然后再对最难解决的河北四镇动手。

与河北四镇的互相勾结、形成联保不同，西川和镇海都处于孤立状态，在它们四周都是服从于中央的地区。特别是西川节度使，虽然位于四川地区，而四川自古以来就有着易守难攻的特质，但此时的四川被分割成了东川和西川两部分，从关中去往四川的蜀道大都在东川境内，所以，西川并没有天险可以防备中央的进攻。

公元805年，宪宗刚刚继位，原本镇守西川的节度使韦皋去世，韦皋对中央忠心耿耿，但在他死后，他的副手刘辟夺取了西川，最初他只要求皇帝册封，随后又想攫取更多的土地，与中央形成了对峙。

继位的第二年，皇帝派神策军使高崇文率军平定西川。高崇文从褒

斜道进入汉中，再过剑阁，一路过关斩将，用了八个月时间就平定了西川叛乱。

这次平定刘辟，给了皇帝极大的威望，人们开始憧憬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能够恢复当年的盛唐气魄。

第二年皇帝对镇海节度使李锜的镇压，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李锜除了担任镇海节度使外，还担任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在唐代后期，盐铁转运使是最有油水的职务，相当于中央外派负责财政的专员，管辖各地的国有企业，并将它们的利润转运到中央。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结余收入，供转运使本人支配。

但李锜的好日子结束了。宪宗为了加强中央权威，将财政权力回收，只给他保留了镇海节度使的职位。李锜心怀不满，不服从中央命令，被宪宗抓住把柄，派兵征讨。皇帝的军队只用了一个月，就将李锜平定，送往长安腰斩。

宪宗征讨藩镇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亡，他的儿子王承宗希望继承父亲的职位。

但这次宪宗却不同意世袭，成德立刻以反叛回应。

在征讨成德时，唐宪宗选择了一个宦官吐突承璀担任讨伐军的总指挥。在宦官的指挥下，政府军徒劳无功。不过，吐突承璀却暗地里与王承宗议和，让他上表归顺，皇帝也顺水推舟将节度使授予他。

议和的结果，是中央权威再次下降，各地藩镇又各自为政，宪宗的集权努力眼看就要失败。但突然间，魏博节度使辖区发生的变局，让中央再次感到了柳暗花明。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他的儿子太小，亲戚田兴（也叫田弘正）逐渐掌握了权力。与其他节度使不同，田弘正已经嗅到了变天的气息，他力排众议，决定投靠中央政府。在以后

的历次平叛中，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中央一条阵线。

田弘正的反正，如同一枚致命的楔子，插入了河北四镇之中。在魏博的配合下，皇帝开展了数次平叛战役。

首先是对付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由于得不到皇帝的册封，吴少诚的儿子吴元济发动叛乱。这次叛乱一直持续到公元817年，才在名将李愬的努力下平定。李愬雪夜袭蔡州，也成了唐朝平定藩镇叛乱中最有名的战役。

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后，为了替宰相报仇，除了与吴元济继续作战外，中央还展开了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战争。当吴元济平定后，四面楚歌的王承宗也决定投降，中央保留了他节度使的位置，却让他的两个儿子入朝当作人质。

由于后来查明武元衡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杀的，公元816年又展开了对李师道的讨伐。三年后，李师道被杀死。淄青节度使辖区是河北四镇中最大的，最多时曾经下辖十五州，即便在宪宗时期，也有十二个州。为了便于管理，李师道死后，皇帝将淄青辖区分成了三份，防止未来这个藩镇再出问题。

公元820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亡，他的弟弟王承元被调任别地，朝廷将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调任成德节度使，再派遣名将李愬担任魏博节度使。这样，原本世袭的职位变成了由朝廷任命的流官，也就不会再成为坐地虎了。

这一年也是幽州节度使结束盘踞的日子，原节度使刘济的儿子刘总曾经毒杀了他的父亲，看到周围的节度使们都一个个倒下，刘总也意识到好日子结束了。他决定弃官去当和尚，落发之后不知所终。中央政府的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也消失了。

历史上习惯于把唐宪宗称为中兴，除了他平定了各个反叛的节度使之外，还由于他想从机制上约束所有的节度使，不管是顺从的还是不顺从的。

唐宪宗推出了两个改革来限制节度使的权力。元和四年（公元809

年），唐宪宗针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前，地方上缴中央的财政是上贡式的，州政府征税后，留一部分给自己，剩下的交给节度使，节度使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才会上缴（或者进贡）给中央。

唐宪宗试图限制藩镇的征税权。由于每一个藩镇（节度使）都下辖几个州，藩镇选择其中的一个州作为驻扎地（直辖州）。皇帝规定，节度使驻扎的那个州（直辖州）征税完全交给节度使支配，中央不再指望这个州的财政。但是对于其他的非直辖州，其财政则完全上缴中央，不再经过节度使。(4)

中央政府这种自断一臂，保全身体的做法，其实将节度使的权限减少了。之前的节度使可以对下辖的几个州财政全部插手，现在只能插手一个州。相当于将节度使的财政降到了和州同样的级别。

十年后，皇帝再次推出了另一项制度：针对藩镇的军事制度，采用与财政制度类似的规则。节度使直辖州的军事完全归节度使统辖，而非直辖州的军事权力被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辖军队也不再听从节度使的调遣。(5)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将军事权交给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强了地方分权，但由于削弱了节度使的军事权力，藩镇对中央政府的反抗能力大幅度减少。

但唐宪宗的军事征服和改革已经是唐朝的回光返照。宪宗本人依靠他的祖父德宗积累的中央财政，完成了重新统一。但军事行动消耗了大量的财政，又再次让社会付出了代价。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雄才大略的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庆谋杀。他死后，各地的藩镇又陷入了和中央政府的摩擦之中。只是这时候，中央政府已经没有钱，很难再组织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获得藩镇的归顺了。

当黄巢的叛乱兴起后，唐朝在黄巢的军事打击和藩镇的割据之下，终于分崩离析。

(1) 《新唐书·食货志二》：“是时，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亿。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旧唐书·德宗纪》：“凡诸道之军出境，仰给于度支，谓之食出界粮，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

(2) 《旧唐书·姚令言传》：“泾师离镇，多携子弟而来，望至京师以获厚赏，及师上路，一无所赐。时诏京兆尹王翃犒军士，唯粝食菜啖而已，军士覆而不顾，皆愤怒，扬言曰：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

(3) 《旧唐书·德宗纪》：“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

(4) 《新唐书·食货志二》：“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

(5) 《旧唐书·宪宗纪》：“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此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其有边于溪洞连接蕃蛮之处，特建城镇，不关州郡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章　黄巢：最漫长的长征（公元859—公元907年）

由于经济中心的转移，唐代之后长安再也没有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相继成为首都的洛阳、开封、南京、北京都在东部。但东部诸城市却缺乏长安的形胜，使得中国的军事战略也出现了变化。唐代之前军事行动主要依托于战略地理，守住城池是战争的关键因素；宋代之后，机动战的特征更加明显，守城逐渐让位给了野战和机动战。

黄巢的流窜作战提供了一个机动战的样本，并为后来的军事流窜作战做出了榜样。它的特征是：以运动战和流窜的方式，寻找中央帝国的薄弱点进行打击，利用机动性拖垮帝国的财政，从而造成帝国的分崩离析。

唐代末年，一群思乡的士兵在庞勋的领导下，在桂林发动起义，展开了流动战，千里跃进向徐州进军。成功到达徐州后，他们守住徐州的努力却失败了。庞勋起义打开了一条可贵的战争经验：在中央政府控制力已经腐朽时，运动战比起守城战，更适合实力弱小的起义者。黄巢、李自成、中国工农红军都借鉴了这条经验而取得成功。

唐末王仙芝前期由于坚持了机动战，成了唐朝的心腹大患，但后期却放弃了机动战，被唐王朝击败身死。与此同时，黄巢却坚持机动战的打法，他转战数万里，活动范围从山东到广东、陕西，利用运动战拖垮了唐王朝。

黄巢从广州数千里跃进，直到攻克了唐朝首都长安。但此后，黄巢也陷入了运动战和守城战的悖论。运动战意味着可以通过劫掠来获得给养，而保卫战却必须在固定的地盘上来解决粮草问题。随着机动性的丧失，黄巢灭亡了。

即便到现在，黄巢也是中国长征距离最远的军人。那些更加出名的后来者不管如何，从距离和难度上，也都无法超越这位前辈。

唐代的繁荣和社会发展把关中的地理劣势暴露得一览无余。关中在

秦汉时期仍然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并拥有着地理上的战略优势，在函谷关（潼关）、武关、大散关和萧关的保护下，易守难攻，是成就帝业的基地。

然而，经过了东吴、东晋、南朝的拓殖，到了隋唐，长江下游地区已经成了新的经济引擎和粮食基地，其产量和经济活跃程度超越了关中。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下游地区曾经是湖沼遍布的泥泞土地，随着湖沼的干涸，变得更加适合作物生长。与这两个粮仓相比，关中地区已经不再具有经济上的优势。

唐代时，关中本来已经不再适合成为首都。以唐为例，首都长安发展成了一个超级国际大都市，这里充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官员，以及从中亚来的大量外国人，众多的非生产性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来养活。在西汉，依然可以通过关中平原的生产来满足长安的粮食需求；到了唐代，狭小的关中平原即便把所有作物都贡献出来，依然无法满足长安的口粮。

隋代时炀帝已经看到了类似的问题，他的解决之道是在更靠近全国粮仓的洛阳和扬州设立新的中心城市，并修建运河将各个行政中心连接在一起。

但在修筑运河过程中，通往关中地区的河道仍然是最困难的。隋唐时期，江南的粮食需要集结在扬州，再沿着古邗沟北上进入淮河，再沿着通济渠（大运河）进入黄河，从黄河进入渭河体系，或者进入与渭河平行的广通渠到达长安。最困难的河道有两段，一段是从运河进入黄河时，由于黄河水每年有荣枯，只有数月能够通船，运输粮食的船只在黄河口往往需要等待很久。另一段是进入黄河后，最艰难的是三门峡河道，这里河道中间有数座巨大的礁石山，沉船无数，充满了艰险。

重重困难导致从江南向长安运输粮食极其不易。即便运粮成功，也由于路途遥远而时间漫长，形成了巨大的统治成本。

作为首善之地，首都必须更靠近经济中心，而长安已经不再适合这个角色。

在安史之乱中，叛军切断运河通道造成的首都粮食恐慌还历历在目，让人们看到了关中的软肋。秦汉时，守住关中四塞，就能利用形胜而获得军事优势，但在唐代，只要切断中原通往关中的粮道，就能让关中变得羸弱不堪。

唐代到宋代，正是这种趋势的强化时代。唐代之前，长安是历代皇帝心目中理所当然的首都。唐代之后，长安就再也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统一王朝的首都。与此同时，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地相继崛起，它们距离中国的粮仓更近，也更加容易完成后勤补给。

不过，在军事地理上，不管是洛阳、开封还是南京、北京，与长安相比都有地理上的劣势。开封是四面平原的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最不适合做首都；南京、北京、洛阳虽然也有天险可守，但四面的关防却缺乏长安的完备性。

随着行政中心的转移，中国的军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长安时代，最常见的军事战略，是借助地理上的战略枢纽，固守城池，将进攻方拖疲，最后依靠反攻来取得胜利。

唐代之后，由于东方区域缺乏长安这样的形胜之地，战争双方越来越多地依靠机动战来取胜，城池的重要性减弱，野战和闪击战却大幅增加。

这种趋势，在唐末已经得到了体现。唐末的两次底层叛乱，都带有很强的军事流窜特征。由于东部河网纵横，平地千里，缺乏有效的山脉阻隔，叛军在东部流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后来的模仿者，为中国军事史上的机动作战提供了战略样本。

在唐代之前，除了西汉末年的赤眉军短暂地利用流动作战攻克了首都，大部分情况下，要想获得政权，首先必须考虑在一个战略要地扎根（通常为长安或者山西高地），再以此为基地并吞周围的平原地带，稳扎稳打获得胜利。唐朝末年的黄巢却不建立战略基地，而是在大半个中国之内流窜，依靠闪击战攻城略地，不断壮大，直到攻克了首都长安。

黄巢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国内防守的脆弱性，并确立了另一种

作战风格：当中央政府控制力衰退时，以快速行军为基础，不断寻找中央政府防守最薄弱的地区，攻城略地，并快速转换作战阵地，直到中央政府在军事和财政上完全无法承受而垮台。

前奏：思乡武士叛乱记

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一场爆发于桂林的兵变吹响了唐王朝解体的号角。这场兵变最初只有八百人，却转战千里，为后来的黄巢提供了经验借鉴，也展现了唐代末年运动战的魅力。

这场兵变的缘由可以追溯到云南的大理王朝。在唐代，位于云南洱海边的南诏国一度强盛，成了西南方除了唐朝和吐蕃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南诏国长期依附于吐蕃，后来改为依附唐朝。但在安史之乱前，南诏国由于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的不法，起而反叛，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将鲜于仲通出征南诏大败，战死六万人，三年后，唐将李宓率军七万攻打南诏，又全军覆没。

现在的大理下关有两座巨型古墓，号称千人冢和万人冢，据说就是当年唐军将士的集体墓葬。虽然战争过去了千年，大理人仍然通过集体记忆，记得当年唐军将士进入洱海盆地后，在龙尾关外的平地上被全歼和埋葬，他们死亡之地现在成了下关市中心区，但附近的街道仍然被当地人称作“战街”。

这两次战役让唐朝的军事情况更加失衡。由于主持战争的是宰相杨国忠，也从侧面助长了他与安禄山对抗的可能性，导致了安史之乱。

唐代晚期，南诏再次展开了对唐代边疆领土的进攻，主要的进攻点除了兵向四川、贵州、广西之外，还向现在的越南河内（交趾）一带进攻。为了对付边关寇乱，唐政府派出高骈去收复交趾，并在内地大肆征兵戍边。

征兵命令传到徐州境内，这里分配了两千名的征兵名额。被征集的新兵统一前往南方集散地。在南方集散地，又有八百人被二次分配到桂林。

按照规矩，戍边三年后，士兵就可以调回原籍。然而由于兵源的缺乏，地方政府并不能很好地执行中央定下的规矩。三年期满，突然徐州

的行政长官决定延长服役期三年。军队中开始出现牢骚，但士兵们仍然服从了政府的命令。

公元868年是戍卒们六年期满的日子，但这时又传来了命令，徐泗观察史崔彦曾再次命令戍卒们延长服役一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戍卒迭代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这牵扯到从徐州招兵，再把士兵派往数千里之外，同时把远方的士兵调回去。运输、军供成本大都由地方财政承担。士兵们就成了政府节省经费的牺牲品。

士兵们这一次再也不愿等待了，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反抗，政府会将他们无限期搁置在边关，永远离开父母老婆和孩子。他们哗变了。

哗变的领导者是一位叫庞勋的人，他是这支部队的粮料判官。庞勋率领士兵杀掉了主将，开始了归家之路。

与普通的叛乱不同，士兵们并没有多少野心，他们的诉求只不过是回家看亲人。中央王朝的庞大规模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已经显露无遗：大理、交趾距离徐州有五千里，而桂林距离徐州也有三千多里。为了遥远的大理和交趾的争端，徐州的士兵必须远赴三千里之外的桂林。当他们起义后，又必须跨越三千里，才能回到家乡。其间需要经过无数城市和节度使辖区，处处都有军队可能拦截他们。这区区的八百人能够跨越地理上如此遥远的距离，与亲人见面吗？

幸运的是，唐末的另一个特征帮助了这群思乡的武士，让他们不仅没有被吞没，反而逐渐壮大。这个特征就是节度使制度。

唐代的节度使一度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宪宗时期，开展了对节度使的一系列战争，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兵权，又承认了他们一定的独立性。到了唐末，藩镇制度继续异化，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命令在藩镇的领地内都会打折扣；另一方面，藩镇本身也老化了，不仅中央政府兵力不足，就连藩镇本身也没有太多可用的兵。有的城市只有几十人、数百人，且大都无法作战。

当战争威胁传来，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打仗，而是自保，或者

把起义者引入别家地盘，只要不威胁自己就可以了。

在这种特征下，庞勋的归家士兵们很少被阻拦，甚至受到各州县的款待，只求他们尽早离开。

从桂林前往徐州的路是这样的：在桂林北上严关，可以到达灵渠，这里是长江（湘江）流域和珠江（漓江）流域的分界线，顺着漓江南下可以进入珠江水系，而顺着湘江北上则进入长江。庞勋的士兵们进入湘江后，顺流而下，直达潭州（现湖南省长沙）、岳阳，进入长江，再顺长江而下，到达大运河的长江起点扬州，顺运河进入淮河，转泗水进入徐州。

随着离家越来越近，庞勋的士兵担忧起自己的命运来。他们通过起义实现了见到亲人的愿望，可之后又该怎么办？他们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原谅吗？由于地方官员的错误，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发生兵变，但中央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声吗？实际上，地方政府早已在报告中将他们当作彻头彻尾的叛乱分子了。

这时，庞勋和他的士兵们开始密谋如何获得中央政府的承认。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循：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徐州节度使崔群被他的部下王智兴发动兵变驱逐，由于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无法镇压，只好承认了王智兴的合法地位。庞勋认为，只要他们武力攻打下徐州，并能巩固住地盘，中央政府就会被迫承认他们的地位，士兵们不再是叛乱分子，还能统治自己的家乡。

按照计划，他们顺利地打下了徐州，并以徐州为基地，向四面扩张，希望控制淮河、泗水、运河流域的土地。

庞勋的计划看上去完美，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唐末，当一个流寇比当一个坐寇要有利得多。由于地方的守备不足，流寇可以一跃千里，向政权的薄弱处渗透。可一旦他想以某个地方为基地停留下来，立刻就侵犯了周围各个藩镇的权力，也为中央政府不容。

在历史上，徐州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控制着黄河、淮河之间地带，四周平原物产丰富，历代政权都将徐州视为必须控制的地区。这使得任

何一个想控制徐州的军阀都要花费比别人多数倍的努力，还大都以失败告终。

庞勋选择以徐州为基地，就意味着这支小小的部队凶多吉少。果然，为了夺回徐州，唐政府派出大军，在周围藩镇的配合下，对起义者发动了进攻。士兵们虽然竭尽全力支撑了一年，最终仍然被政府军剿灭。

庞勋以失败告终，却为后来的起义者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与普遍的认知相反，如果起义者力量还不够强大，就不要在一个地方死守，而是应该打运动战，流亡四方。在流亡的过程中不仅不会被政府的军队消灭，反而会越来越壮大。另外，打运动战应该向政权力量薄弱的地区去发展，直到实力足够强时，再突然间跃进中原，甚至进攻关中，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守住徐州也许是比攻克长安更加艰难的任务。

庞勋的经验被黄巢付诸实现。

王仙芝：失控社会的流窜作战

庞勋起义对唐朝政府的打击，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财政上的。由于唐政府动用了大量军队参与镇压，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平衡被打破，民间经济越过了能够承受压榨的临界点，唐代也随即进入了起义频发的末期状态。

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在山东地区的濮州（现河南省濮阳境内），有一位叫作王仙芝的人借助饥荒开始造反，第二年，冤句（现山东省曹县）人黄巢也加入了王仙芝的队伍。这次起兵是西晋末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民间运动，也向世界展现了运动战的魅力。

不管是王仙芝还是黄巢，都充分发挥了起义军擅长的游击战。由于唐末地方政府的盘踞分隔，几乎很难对持续运动的军队形成有效打击。唐代中央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只能仰仗地方割据势力。而战争制造的流民又源源不断加入起义队伍，使得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当起义规模超过了地方藩镇势力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直捣关中了。

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王仙芝的死亡作为分界点。在前个阶段，起义者的活动范围还有所收敛，被政府军围困。而到了后一个阶段，黄巢开始了极为大胆的长征，在唐代的边境地区穿插发展，使得政府无力再应付。

最初两年，两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如今的山东西部一带，以濮州、曹州为中心，并向东南方进攻沂州（现山东省临沂）。为了镇压起义，唐代中央政府派出了周围的五路节度使军队，分别是镇守郓州、曹州、濮州的天平节度使，镇守江都（现江苏省扬州）的淮南节度使，忠武节度使（现安徽省淮阳），宣武节度使（现河南省开封），义成节度使（现河南省滑县）。后来又动用平卢节度使宋威参与救援。

但政府军犯了一个错误，宋威率军将王仙芝、黄巢在沂州城击败后，以为两人已经死亡，就上奏中央罢兵了。罢兵之后，要想再次召集

军队，势必引起更大的不满，甚至士兵的哗变，对于镇压更加不利。

王仙芝、黄巢兵败后，离开了他们的老家根据地，开始了更加广泛的军事机动。从这一刻开始，唐朝传统的镇压方法变得不再灵光，因为藩镇兵不愿离家太远，无法跟上起义者的行军速度。

王仙芝的下一站进入了现今河南境内，很快攻克了阳翟（现河南省禹州）、郏城（现河南省郏县）等八县，这些城市都靠近现在的许昌、郑州一带，距离洛阳已经不远，威胁到了唐王朝的东都，变得更加危险。

唐朝政府被迫部署东都的防守，并派人守住了潼关，避免王仙芝流窜进入关中平原。此刻，王仙芝的军事实力还不够强，虽然能够攻克一系列的城市，引起东都巨大的震动，却无力攻打东都。他在政府军的逼迫下，继续向西南方机动，寻找薄弱点。

王仙芝寻找的薄弱点是洛阳南方的邓、唐一带，以这里作为跳板向汉江流域的南襄平原进军。南襄平原是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在湖北的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湖北、湖南的跳板，占领了这里，就扼住了两湖与中原之间的最主要通道。

王仙芝与黄巢在南阳、襄阳地区攻城略地，攻克郢州（现湖北省钟祥）、复州（现湖北省仙桃）、随州、安州（现湖北省安陆）等地，又派人向东面的淮河、长江流域渗透，攻打申州（现河南省信阳）、光州（现河南省潢川、光山）、寿州（现安徽省寿县）、舒州（现江西省安庆）、庐州（现江西省九江）等一系列地区。如果这些地区丢失，意味着从中原到长江流域交通的阻滞。唐朝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只有南襄隘道、武汉以北的义阳三关、寿州以南的巢淝故道以及大运河四条路可以走，王仙芝活动区域扼住了前三条通道，只有最后一条道尚没有触及。

唐朝的地方官员为了自保，纷纷闭关不出，也不参与讨伐。中央政府第一次感觉到无力镇压，于是开始考虑封赏和招降王仙芝。

在王仙芝和黄巢之间，也有了矛盾，王仙芝不排斥招降，而黄巢则

是更加坚定的起义者。

第一次招降虽然没有成功，却分化了王、黄两人，此后，黄巢北上回到了山东根据地，并在山东、河南、湖北的宽广区域内来回流窜，而王仙芝的活动范围则主要在湖北中西部、河南西南部。

到这时，两人的命运也有了区别，黄巢仍然把军事机动贯彻到底，攻克州县是为了劫掠，不是长期占领。如果碰到绝对优势的敌人，就明智地避开。王仙芝由于受到招降的影响，开始寻找根据地，他的目光盯在了湖北西部。他攻克了鄂州（现湖北省武昌），但随着盘踞意识的增强，机动性大大下降，随着伤亡的积累，军队也逐渐被削弱。

当军队被削弱后，唐王朝的招安意识也越来越淡，更倾向于武力镇压。

在南襄地区无法立足的王仙芝决定向荆州进军，企图夺取荆州作为基地，但进攻失败。他的军队实力、士气等都受到了严重打击，最终在黄梅被杀。

王仙芝早期的成功，在于他的机动性作战原则，使得唐朝调动军队的能力已经超出了极限，不得不对他招降。王仙芝要么接受招降，要么坚持机动性，但他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丧失了机动性的他不得不承受失败的代价。

在王仙芝兵败被杀后，他的搭档黄巢却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胆的机动行军，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壮大，直到拥有了推翻唐王朝的实力。

黄巢：最漫长的流窜

在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深山里，藏着一条古代进出福建的主要道路。如今的人们要到达这里，必须先从福州坐火车前往一座叫作建阳的小城，从建阳乘坐汽车到达浦城，这是一座深藏在武夷山中的小城市。武夷山横亘在江西省与福建省之间，自古以来将福建与其他省份隔绝开，如同一处巨大的桃花源。

从浦城再坐车向浙江方向前行，在一个叫作达坞村的小村子下车，再步行前往一个叫作龙井的小村庄。这座村庄在半山腰，过了村子，就是前往仙霞岭的古道。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要想前往福建，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从浙江进入福建的，从杭州沿钱塘江（浙江）经过金华、衢州、江山，再翻越仙霞岭，进入福建的浦城、建瓯，进入闽江流域，这一条是主路。另一条是从江西翻越武夷山，从上饶地区进入福建的武夷山市，这一条路在后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两条路距离并不遥远，都位于如今福建省的西北角。

在仙霞岭主道上，至今依然保存着古代的卵石路面，从福建翻山进入浙江后，在北侧的山坡上，有一座现代人树立的武士像，他就是黄巢。

当年，黄巢就是借助仙霞岭进入福建地区的。通过仙霞岭后，他率军进入了福建沿海，并凿山开路，从福建进入广东。

在唐代，虽然海上交通已经发达，但从浙江到福建、广东一带，仍然属于偏僻的边疆区域，就像现代人看待四川、云南、甘肃的山区一样。

在黄巢之前，叛乱者一旦向边疆逃窜，就意味着进入衰亡期，不再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只有黄巢是个例外，当他消失在茫茫武夷山中时，皇帝一定松了口气。不想随后更强大的黄巢却从广东杀了回来，变

得坚不可摧了。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王仙芝死后，黄巢的境遇也危险起来。此刻，他盘踞在家乡附近的沂州（现山东省临沂），政府的军队正从四面八方赶来，试图剿灭这支叛乱者的最后武装。

黄巢决定跳出包围圈，向东都洛阳所在的河南进军。但唐王朝调拨部队守住了洛阳和潼关，击败了黄巢。

这时的黄巢和唐王朝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军事财政已经崩溃，政府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钱财来组织战争，只能听任各个节度使和地方政府自己组织抵抗。

中央政府临近崩溃时，黄巢也已精疲力竭，无力打仗。到底谁能首先缓过劲儿来组织最后的打击？

黄巢决定以退为进，他率军南下，渡过了长江，向中国的边缘地带撤退。他进入了如今的江西，到达了饶州（现江西省上饶），上饶已经在武夷山的北端，属于江西、浙江、福建的三角地带。从上饶，他率军进入了浙江，想劫掠绍兴所在的太湖平原。这时，他遇到了此生一大对手——高骈。

在唐末，朱温、李克用等人崛起之前，高骈是唐朝最强的战将。他前往交趾对付过南诏，又担任荆南节度使镇守边关。唐朝政府为了对付黄巢，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治所在镇江）。他不负众望，击败了黄巢。

黄巢认识到，浙江仍然不够偏远，他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休整，于是向南撤退，进入了武夷的茫茫大山之中，经过仙霞岭到了闽江流域，在福州等地劫掠。

高骈在黄巢身后紧追不舍，黄巢看到福建仍然不够遥远，继续撤退，他沿海岸线前进，再经过福建与广东边界的山区，进入了广东，并围困了广州。

此时，他已经跳出了高骈的辖区。按照规矩，节度使出辖区是要经过批准的，高骈只好上报中央政府，请求越区打击，但遭到了皇帝的拒绝。

在唐朝，广州已经成了著名的大城市，也是面向东南亚的巨型海港。这里云集着众多的海外商人，据说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等聚集了十几万，是中国少有的国际型城市。黄巢攻克广州后，士兵将这座城市的财富劫掠殆尽，并杀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外国人。

广州的休养，让黄巢获得了足够的财政支持。休养过后，他决定率军北返。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唐朝政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休养，财力没有恢复，士兵疲于奔命。

黄巢没有考虑按照来时的路返回，因为这条路过于偏僻。在唐代，从广州北返的通道除了福建之外，还有两条：一条是翻越梅岭进入赣江的通道；另一条是经过桂林和严关，进入湘江的通道。后一条路是庞勋所走的路，黄巢也选择了这一条。湘江通道可以直达湖北和湖南，距离洛阳和长安这两个政治中心更近，离黄巢最大的敌人高骈更远。

黄巢从广州沿珠江（西江）和漓江直上，攻克了桂州（桂林），顺湘江直下，到达了潭州（现湖南省长沙），并北上攻克了荆州。就在一帆风顺的黄巢自信满满继续向两京靠近时，第一次打击来到了：他在进攻襄阳时，被唐军击败，被迫南撤。

他收集了残军，撤往了鄂州（现湖北省武昌），并再次转战江西。到这时，他不得不再次面对敌人高骈。

幸运的是，此刻的高骈也陷入了唐王朝内部争执之中。由于高骈抗巢有功，已经升任了天平、淮南、镇海、西川、荆南、安南六镇的行营兵马都统，权力更大。但妒忌高骈的人也越来越多，他本人也更加防范其他将领与他分功。

黄巢利用高骈的心态，先是宣称要投诚，骗取高骈将其他各路军队都遣返回去。威胁解除后，他再次出尔反尔，击败了高骈的大将张潾。随着高骈与朝廷矛盾的激化，他干脆自保一方，只要黄巢不入境，他也

不再出击。

高骈态度的改变，让黄巢安全通过了他的辖区，渡过了淮河向北挺进。唐朝的主力军队主要由高骈领导，分布在江淮地区，一旦黄巢渡过了这个区域，在茫茫的北方，就很少有部队能与之抗衡了。

黄巢的大军横扫了安徽、河南，攻克了东都。此刻，在长安的唐僖宗终于意识到，他的敌人比他还强大，于是匆忙间率领百官逃往了兴元（汉中）。黄巢随即攻克潼关，占领了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

然而，占领了长安的黄巢却突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此前他以运动战击溃了唐朝，可一旦占领长安之后，却立刻从运动战变成了守城战。

运动战意味着可以通过劫掠来获得给养，而保卫战却必须在固定的地盘上来解决粮草问题。另外，唐王朝虽然失去了首都，大部分的藩镇对唐朝也并没有太深的感情，但藩镇们又感觉到，相比起草莽起家的黄巢，宁肯接受唐王朝的领导。

黄巢控制了长安及其周边，却无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建立统治。藩镇在回过神之后，决定恢复一个孱弱的唐王朝。他们组织了一个大联合，除了各个藩镇兵马之外，还请来了少数民族沙陀人的骑兵，共同对付黄巢。

于是，运动战专家黄巢突然间变得笨拙，不知所措，被唐朝军队围困，最终失败。他率军逃离了关中，退回了河南，直到被围困、击毙。

缩短的分裂期

黄巢起义之后，一个统一的唐王朝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

在这种分崩离析的模式下，虽然还有皇帝，却不再受到尊重。节度使几乎都拥有了独立的权力，他们之所以还承认中央政府，是因为每一个节度使的实力都不够强大，无法统一全国，在无政府状态下也无法保证自己不被别人蚕食。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选择，莫过于维持现状，维持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却不用遵守中央政府的规则。

但是，暗地里取代唐朝中央政府的努力却开始了。节度使们互相吞并，从小变大，直至产生出最后的胜利者。

在众多的节度使中，有几位强大的候选人。

最强大的一位是宣武节度使朱温（治汴州，即开封）。朱温曾经是黄巢的将领，后来投靠了唐朝，获得了封官。朱温不学无术，却懂得扩张的重要性。他以汴州为基地，并吞了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湖北的大片地区，最后又进攻关中，获得了关中长安一带的控制权。

与朱温针锋相对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治晋阳，即太原），李克用是少数民族沙陀人，在镇压黄巢的反叛中荣立首功，分封到了太原。他以太原为基地，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分，他也学西晋时期的刘渊和石勒，想同时掌握山西与河北，于是向东扩张进入河北，却被朱温击退。

他的地盘虽然小一些，也没有平原地区富庶，却由于控制了山西的形胜之地，是朱温最大的威胁。与此同时，朱温地盘面积虽然更大，却由于缺失了山西这个制高点，显得危机重重。

在幽州，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地界。刘仁恭最初依靠李克用起家，随后又投靠了朱温，他的实力较小，没有能力统一，只有能力割据。

在关中的凤翔地区，是陇右节度使李茂贞的地盘，他控制了陕西西部地区，直到甘肃南部区域。他曾经与朱温联合，在朱温称帝后又与李克用联合反对朱温。

在江淮地区，是高骈的部将杨行密的天下。高骈被他收留的黄巢降将毕师铎所杀，部将杨行密击败了毕师铎，获得了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控制权。从控制面积上来说，杨行密是仅次于朱温的第二大军阀。

在湖南省长沙一带，由一位叫作马殷的将领控制。在湖北省荆州一带，则是高季兴的势力范围。盘踞两广的是军阀刘隐。四川盆地则由王建控制。在福建，王潮成了名副其实的主人。浙江沿海的吴越地区，则由一位叫钱镠的人控制。

唐朝末年的军阀割据，基本上是地理形势的自然延伸，由于中央控制力不再，节度使们从自己辖区向外扩张，直到地理形势不允许他们继续。

只有在北方的中原地区，由于这里是巨大的华北平原，形成了一个超级军阀区，谁控制了这个区域，谁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权力。而其他区域则分裂成了一个个的小政权。

所谓五代十国，就是这些军阀控制区的自然演变。那个巨大的超级军阀区换了五次控制人，于是就有了梁、唐、晋、汉、周五代的更替。五代无法控制的小区域内，小军阀们纷纷独立建国，就构成了十国的基础。

最初控制超级军阀区的是朱温。朱温获得关中后，废掉了唐朝皇帝，建立了后梁王朝。不过，后梁王朝控制的领地只有河南、河北、山东大部，安徽、湖北一部，其余地方仍然是割据的。

后梁只存在了十六年，就被盘踞在山西的李存勖（李克用之子）所灭。后梁只在华北和关中平原地带，没有山河之险。李存勖充分利用山西的形胜，在后梁强大时，可以与它分庭抗礼；当后梁衰弱时，就从高地下来灭亡了朱家王朝。

李存勖建立了后唐。后唐的领土稍大，除了继承自后梁之外，还包括了山西、北京（他击败了幽州的刘仁恭父子），同时，关中的李茂贞也向后唐臣服。在大将郭崇韬的努力下，又并吞了四川。

在内乱和契丹人的联合攻击下，后唐也灭亡了。

后唐灭亡后，这个超级军阀区又相继出现了后晋和后汉，两者的国土面积中又减去了四川。后汉又被后周篡夺，后周让位于宋。之后，宋朝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步伐。

在超级军阀区之外，则是各个小军阀独立后的国家。幽州军阀刘仁恭被李存勖的后唐灭亡。陕西李茂贞服从于后唐，没有单独成国。除此之外，王建在成都建立了前蜀，前蜀被后唐灭亡后，后唐大将孟知祥又盘踞四川建立了后蜀。

杨行密在江淮地区建立了吴国。他死后，吴国被将领徐知诰（即李昪）篡夺，建立了南唐。高季兴建立了荆南国。刘隐建立了南汉国。钱镠建立了吴越国。王潮建立了闽国。马殷建立了楚国。另外，在后汉被后周取代后，后汉的残余势力盘踞在晋阳（现山西省太原）建立了北汉。

吴、南唐、前蜀、后蜀、荆南、楚、吴越、闽、南汉、北汉，就构成了十国。

从原因上来讲，五代和十国都只是唐王朝崩溃之后的小碎片。它们要么努力自存，要么吞并别人。但在走向统一的道路上，五代十国都成了失败者。

直到宋代，才又重新将中国捏合成一个整体。与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不同，这次分裂时间不过五十几年，也说明中国统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进入中央帝国模式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分裂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过了这个时段，随后的王朝更迭中，分裂的时间都很短就结束了。即便是清朝之后的“中华民国”，由于统治民族的更替和外来冲击的影响，维持了较长时间，但清政府崩溃三十八年后，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就

接管了全国。

分裂时间的缩短，除了说明人们已经习惯了统一带来的巨大好处，也是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进步的体现。随着全国地图的打开，人们对于山川地理有了全面的了解，军事行动更加坚决和快速。

秦代对于中原地理，三国对于长江形胜，都摸索了足够长的时间，才彻底了解了新的区域。隋唐时期的战争已经将几乎所有信息都汇集起来，战略显得更加完整和丰富，战争的速度也加快了。安史之乱骚扰了大半个中国，黄巢之乱更是席卷了全国，但这种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都可以在短短的数年间完成。五代时期，中国分裂成如此众多的小碎片，把它们捏合起来也不过只用了几十年。

时间虽然缩短，但战争的破坏性却并没有减少。事实上，随着技术和战略的发展，战争带来的平民和军人死亡都大幅上升。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军事财政的消耗也呈几何级数般上升。

在海外，两次世界大战都被称为“绞肉机”；在中国，抗日战争虽然打了十四年，但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却比历代任何一次战争都大，也是战争提速的最新例证。

第四部　中原时代

（公元907—公元1279年，五代到宋）

第十五章　后周世宗：新王朝的奠基人（公元907—公元979年）

后周与北汉的初次对决，决定了中国的大方向。如果周世宗获胜，就可以制订统一全国的战略；如果北汉获胜，依靠契丹人的北汉只能建立另一个弱政权，拖延中国统一的时间。

作为合纵连横的高手，后梁太祖朱温从汴梁出发，将华北地区和山东地区的军阀一一剿灭，成了一代霸主。但由于山西制高点掌握在对手李克用手中，朱梁一直无法统一北中国。在南方，朱梁也被位于江淮的杨行密击败，江淮也因此成了五代的边界。

后唐李存勖借助山西的形胜，灭亡了后梁，并击败了北京的割据势力刘仁恭父子。在获得了关中的臣服后，进军四川灭亡前蜀。但李存勖没有解决扩张之后的稳定问题，在进攻江淮前，在内乱中被杀，浪费了五代时期第一次统一的机会。

后晋和后汉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北中国少了对北方游牧民族最重要的战略防御点。后晋和后汉还丧失了四川，后周比起后汉又少了山西。柴荣的统一之路并不平坦。

由于后周缺乏天险，周世宗在继位初期，首先获得了陇右地区，以防止来自四川的进攻，又夺取了南唐的淮河流域，将防线压到了长江，这两步确定了后周的战略安全。之后，世宗并没有立刻灭亡南唐，而是让南唐帮助维持南方的稳定。他首先向北开战，夺取燕云十六州。他始终知道，对于中原威胁最大的，是契丹所占据的燕山以南土地。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为了避免下一次兵变，改革了中国的官僚制度。简单说，宋太祖的制度变革，就是加大官员和兵员的冗余度，让这些冗官和冗兵互相制约，互相监督，避免任何人有过大的权力来发动政变。

周世宗想首先解决十六州问题，再统一南方政权。赵匡胤大部分思路继承了周世宗，却做出了一点改变：先解决南方，最后再对付契丹和

十六州。这点改变，决定了北宋永久性失去了十六州，因为一旦获得了南方，需要投入精力维稳，也就缺乏足够的锐度去进攻北方了。

宋朝虽然统一了全国，但有几个地区却被排斥在外，除了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归属于契丹，南方的安南（现越南北部）也在这时获得了独立，云南全境和四川西南部也有大片地区成为外国。

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在当年秦赵长平之战的战场上，又发生了一场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争的双方是刚刚失去了开国君主的后周，以及前朝余孽北汉。

三年前，后汉隐帝刘承祐大肆杀戮功臣，被大将郭威追杀身死，郭威立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刘赟是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的儿子，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

刘赟称帝不久，郭威在率军讨伐契丹的途中，在澶州（现河南省濮阳）突然被士兵披上黄袍，来了一次兵变。郭威回军汴梁，杀死了刘赟，自立为帝，建国号周，历史上称为后周。

刘赟的父亲刘崇听说儿子身亡，在晋阳（现山西省太原）称帝，继续称汉，历史上称为北汉。

刘崇为了给儿子报仇，挥师南下，被郭威击败。三年后，后周太祖郭威逝世，继承皇位的是养子郭荣（一名柴荣）。刘崇听说郭威死去，再次起兵进攻后周，试图夺回江山。这次战争就成了对年轻的柴荣的第一次考验。

刘崇的军队从太原，到达上党地区后继续南下，准备渡河袭击汴梁（后周首都）所在的大平原，柴荣则派兵北上天井关，双方大军在高平相遇。

这是一场充满了偶然性的战争：如果柴荣获胜，这位年轻有为的君主将凭借着战争建立的威望，制定统一全国的战略；如果刘崇获胜，由于他勾结契丹，只能建立另一个儿皇帝政权，推迟中国统一的时间。

幸运的是，这次战争的胜利方属于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胜利后，

他率军围攻太原，但由于这次战争他是被迫应战，没有准备好进一步行动的计划，最后只得撤兵。

撤兵让周世宗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就很难有远虑去击败对手，乃至统一全国。

为了给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他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编了军队，增强了战斗力，并建立了面对契丹的北方防线，防止在战争中遭受契丹的骚扰。同时，他鼓励粮食生产，治理水患、发展漕运。为了逼迫人们从事生产，他甚至开展了灭佛行动，减少寺庙数目，强迫僧人还俗从事生产性活动。

在他的努力下，经过五代混乱的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人们开始幻想重新统一。周世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大战略。

与唐代的统一不同，后周（和宋）是中国第二次从中原出发开展的统一战争。之前的统一往往从关中开始，[(1)]只有后汉光武帝利用关中的混乱，捡漏式地从中原完成了统一。

周世宗时期，关中已经失去了重要性，中国的重心转移到了东部，最大的两块领土是后周所在的华北地区，以及南唐所在的江南地区。光武帝依靠王莽引起的混乱而统一，可在五代时期，各地军阀却牢牢地掌握着手中的地盘。华北的地形也并不算有利，因为这里是大平原，缺乏战略制高点。

北方的制高点是山西，如果周世宗拥有了山西，那么会更加容易发动南方战争。可山西却掌握在与后周敌对的北汉手中，随时准备从后方袭击，这样的地理条件明显不利于后周。

周世宗如何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完成新的统一呢？

五代时期的军阀整合

自从唐朝经过黄巢之乱，破碎成十几个小块后，把中国重新捏合成一个整体的努力就在不断尝试之中。

最初做出尝试的是梁太祖朱温。朱温的根据地是汴梁（现河南省开封）。在黄巢灭亡后，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的军阀势力是这样的：黄巢余党秦宗权占据了河南的西部地区，并向朱温所在的汴梁进攻；兖州一带，是天平军节度使朱瑄和泰宁军节度使朱瑾两兄弟的领地，兄弟俩分别以兖州和郓州为基地；徐州，是武宁军节度使时溥的地盘。在北方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地带，则是魏博节度使罗弘信的辖区。在山西，是朱温的死敌李克用。

朱温是一个解读形势的高手，他知道自己一时无法消灭李克用的山西，便将精力主要放在了并吞秦宗权，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上。只有这样，才能让朱温的国家有足够的厚度来承受来自山西的冲击。

为了并吞几个猎物，朱温一方面对李克用严防，一方面联合魏博节度使罗弘信。秦宗权选择主动出击朱温，是最先要对付的对手，朱温不惜联合朱瑄、朱瑾，击败了秦宗权。

随后，他决定先解除南方的威胁，出兵进攻时溥的徐州，将徐州拿下后，从北、西、南三面形成了对朱氏兄弟的夹击，最终击破了朱氏兄弟。

到这时，朱温已经获得了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江苏北部。他接下去试图对付江淮之间的杨行密（即后来的吴国），但以失败告终，江淮地区也就成了五代时期的南北分界。

既然南下不成，朱温转而北上。

在现在的河北省中部，山西的李克用已经翻越了太行山，占据了邢、洺、磁等州。如果朱温不出击，那么很可能整个河北就成了李克用的天下。一旦李克用借助山西高地又获得了河北平原，就形成了对朱温

的全面优势。

朱温率军北上，将李克用赶回了山西。他甚至对山西发动了进攻，虽然没有占领太原，却让李克用暂时无力对抗自己。

北伐让朱温获得了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北京地区仍然在军阀刘仁恭的手中，暂时无法得到。

朱温接着向关中地区进军，进入了唐代首都长安。他成功地控制了皇帝，完成了禅代，建立了梁朝。但他撤军后，关中地区仍然在军阀李茂贞的控制之下。

朱温最后的征伐是针对山东省东部的淄青节度使王师范，在剿灭了王师范后，后梁的疆域达到了最大，包括如今的河南、山东全境，以及河北的中部和南部、江苏北部。但由于缺乏制高点，朱温虽然东征西讨，后梁的形势却一直打不开，无法冲出低地的束缚。

后梁之后，轮到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进行新一轮的并吞了。在朱温扩张的高峰期，李克用被死死地压在太原一隅。但在朱温死后，李存勖首先巩固了晋南，然后越过太行山进入了河北，开始扩张。

在北京，是幽州节度使，后来称燕王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的领地，刘氏父子投靠过李克用，也臣服过朱温，他们的首鼠两端让李克用死前叮嘱儿子一定要灭掉刘氏父子。在大将周德威的攻击下，刘氏父子被消灭，李存勖获得了北京地区，并顺利地进入河北，将战线推进到了黄河，获得了对后梁的全面优势。

双方在黄河展开了拉锯战，为了阻滞敌人，梁军不惜掘开黄河，制造黄泛区。李存勖利用大将郭崇韬的计策，避开了梁军的正面，从东面绕过了黄泛区，经过郓州（现山东省东平）、中都（现山东省汶上）、曹州（现山东省菏泽），直取汴梁。从出军到灭梁，一共只用了十天时间。

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后唐时，除了囊括后梁的疆界外，还包括了

山西和北京一带。关中的李茂贞死后，他的儿子李继曮归属了后唐，使得后唐拥有了陕西和甘肃南部。

由于控制了几乎整个北中国，统一全国的契机第一次出现了。在郭崇韬的建议下，后唐军队大举进攻前蜀的王衍（王建的儿子），灭亡了前蜀，拥有了四川境内。到这时，只有江淮地区的吴国（杨行密）、荆州地区的荆南国、位于湖南的楚国、位于浙江的吴越国、位于福建的闽国、位于广州的南汉国仍然游离在外。不过，这些国家中，只有吴国是大国，其余国家都只是割据势力，一旦吴国灭亡，都将顺应形势回归中央。

一切就绪，后唐的内乱却爆发了。李存勖杀死了功臣郭崇韬，又在内乱中被杀。继位的新皇帝李嗣源忠厚老实，却缺乏动力，后唐扩张的高峰期过去了。

在五代时期，最有可能统一中国，也最遗憾的就是后唐。如果能够巩固新获地域，保持政治的稳定性，中国有可能更早获得统一。但李氏并没有能力解决快速扩张带来的整合问题。

在后唐的内乱中，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决定借兵北方蛮族契丹来夺取江山。契丹人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皇帝李从珂，建立了后晋。

随着后唐的灭亡，位于四川的后唐大将孟知祥立刻脱离了中原统治，建立了后蜀政权。到这时，后唐时的领土又开始分裂。

为了酬谢契丹，石敬瑭在从山西到辽东的北方国防线上，划出了十六个州送给契丹，这就是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丢失了十六州后，中原失去了北方屏障，契丹人随时可以大举南下，对处于平原地区的首都汴梁形成致命威胁(2)。

后晋很快就尝到了燕云十六州丢失的危害。建国十一年后，两国反目成仇，契丹军队立刻大举南下，灭亡了后晋。但由于契丹社会和政治上过于落后，无法在中原建立有效统治，位于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机南下，恢复了中原政权，建立了后汉。

后汉时期的疆域与后晋相当，由于这一朝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更无力策划统一中国。随着郭威取代了后汉，建立了后周政权，后汉的残余又回到了太原，是为北汉。于是，后周的领土又比后汉少了山西。

后周皇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谋划重新统一中国。

周世宗的命题作文

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周世宗突然下了道奇怪的命令，让他的臣下必须写一篇命题作文。[3]

在现代社会的考试中，考生们最怕的就是所谓命题作文。老师出一个刁钻古怪的题目，考生们无所思考还必须装作若有所思，写出言不由衷的文字，希望老师能网开一面给个高分。

这一年出题人却是皇帝，考生则是他的以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为首的二十位大臣。题目有两篇，分别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由于周世宗的地位已稳固，他开始考虑接下来如何避免后唐和后晋时期的混乱，并乘机平定南方。他希望大臣们帮助他思考，如何制订战略，才有可能做到统一。

与现代考生一样，大臣们大都只求稳当，对皇帝的题目并不感兴趣，也没有想明白皇帝为什么要让他们写。

不过，大臣中也有个别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些人包括陶𥱧、窦仪、杨昭俭、王朴等，其中又以王朴的《平边策》最著名，让皇帝叹服。抛弃其中关于民心的陈词滥调，从技术上说，王朴认为统一首要目标是南方，而南方目标中，又以南唐为重。

在所有国家中，除了后周之外，南唐的地方最大、资源最富裕，与后周接壤的边境最长。王朴希望先施行骚扰策略，利用少量兵力疲敝南唐，再夺取长江以北的土地（淮河流域和长江、淮河间）。一旦失去了长江以北，南唐就失去了屏障，后周大军就随时可以大举平定了。

南唐如果灭亡了，那么剩下的南方国家都不构成威胁。一旦平定了南方国家，就可以兵向北方，夺取山西和幽州，完成全国的统一。

周世宗对王朴的作文非常感兴趣，他未来制订的统一策略，就是采取类似的措施。

具体而言，周世宗的策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自保；第二，平定南方；第三，平定北方。

世宗继位时，后周的江山是五代中第二小的。后梁占据了天下七十一州，地域上只是在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地带。后唐的疆土最大，为一百二十三个州。后晋由于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最大时疆土为一百零九个州。后汉疆土一百零六个州，而到了周世宗初期，只有九十六个州。

与后汉相比，后周缺乏了山西地区；与后唐时期相比，更是丢失了燕云十六州的北方屏障。这样，后周的土地只限于华北平原、山东半岛和陕西的一部分领土。

从地域上来说，这片土地是没有天险可守的。以往在北方，燕山是中原的屏障，可是自从丢了燕云十六州，契丹人在北方控制了燕山以南，随时可以长驱直入进攻首都汴梁。

山西的刘崇也虎视眈眈，希望从太行山上下来，夺回江山为儿子报仇。

在南方，江淮地区有一大部分是在南唐的手中，从淮河进攻汴梁，只需要从水路直上就可到达。

在西部，后蜀控制了汉中地区和陇右地区，要攻打关中也很方便。可以说，后周控制的是一片军事价值薄弱，随时可能遭受攻击的土地。

周世宗首先要做的，不是如何统一全国，而是如何守住这片土地以自保。他战略的第一步，是将国境线推到安全线以外，通过构造天险实现存活。

要想守住中原，如下土地是必需的：第一，在西部的陇右之地，如果要想防止四川的后蜀进攻，只有占据了陇右的高地，遏制住陇山通道和故道（陈仓道），才能保证关中的安全；第二，对南唐，必须占领淮河流域，将国境线定在长江，以长江为天险，才能保证南唐无法进攻首都汴梁；第三，必须攻克契丹的燕云十六州，特别是位于燕山以南的几个州，防止契丹人从北方进攻。

夺取了上面的土地，才能保证这个国家长期稳定存在。其后，再按照王朴所说，从南方开始逐个消灭敌对政权。当南方统一后，再对付北汉和契丹，统一全国。

在历史上，山西一直是中原和陕西的最大威胁，可周世宗却决定将山西留在最后解决。原因在于，山西必须与关中或者河北结合起来，才具有最大威胁。如果刘氏只是占据了山西，虽然拥有形胜，却没有足够的物资，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

另外，刘氏也并没有获得整个山西，后周控制了山西南部的上党地区，实际上已经塞住了刘氏进军洛阳的通道，山西已经很难制造麻烦了。

周世宗定好了战略，开始了他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

最初的战争在与后蜀的边界爆发。这是一次小规模的战役，不以进攻四川本土为目的，只求占领陇右的土地，最多再试图占领汉中，使得后蜀无力从四川对中原形成打击。

战争攻克了秦州和凤州，保障了关中地区的安全，基本上达到了战略目标。

之后，周世宗对南唐的战争打响。此次战争的目的是占领长江以北的土地，特别是淮河流域。从淮河进攻首都汴梁，只需顺淮河的支流涡水（涡河）直上即可。要想保证首都的安全，必须将淮河全境占领。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从公元955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958年初，共经历两年五个月。

在淮河流域，南唐最坚固的堡垒是寿州（现安徽省寿县）。淮河最大的支流颍水（颍河）从嵩山发源之后，经过周口、阜阳，在寿县境内汇入淮河。周世宗的军队顺颍水而下，进入淮河后，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寿州。

南唐从寿州开始，沿着淮河大量布军，直达东面的楚州（现安徽省

淮安）。作为西面起始点附近的城市，如果寿州无法攻克，必然成为淮河上游的威胁，即便周军攻克了下游的城市，也随时可能遭受到来自上游的攻击。

除了沿淮河一线之外，在五代时期，从寿州还有陆路可以直达东面的定远、滁州、六合、扬州，到达长江北岸，威胁南唐首都金陵的安全。

然而，寿州的南唐守将、节度使刘仁瞻让周世宗大吃苦头。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他屡屡挫败了周世宗的进攻，让这座战略要地始终屹立。

由于久攻寿州不克，周世宗只好退而求其次，绕过寿州，一方面派兵向淮河下游进军，在涡河河口附近大败南唐的援军。涡河是淮河的另一大支流，顺涡河直上，可以直接抵达后周的首都汴梁，打通了涡河河口，也算部分实现了保障首都安全的目标。

另一方面，他分出另一支兵马，由殿前都虞侯赵匡胤率领，离开淮河，经过定远、滁州、六合，直达长江边上的扬州、泰州，与南唐江南重镇润州（镇江）隔江相望。

即便如此，寿州仍然没有攻克。由于寿州的威胁，周世宗南下的军队也数次撤回，无法形成进一步的成果。一年后，刘仁瞻得了重病眼看就要断气，他的下属才偷偷地投降了后周。进入寿州城，周世宗亲自下令封刘仁瞻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以示对这位不屈守将的褒奖。然而，刘仁瞻在当天就去世了。

获得寿州后，后周军队沿淮河大举东进，攻克了泗州、楚州，并沿运河线南下占领了扬州，直捣金陵。这次军事行动逼迫南唐后主李煜割让长江以北的土地，并纳表称藩。

周世宗控制了长江北岸，从此，南唐已经成了囊中之物。但周世宗并没有借机灭亡南唐，而是接受了李煜的称臣，甚至鼓励他修整甲兵，维持一方治安。为什么他不一举灭亡南唐呢？

因为统治难度。

周世宗始终知道，对于后周最危险的敌人在北方，只要燕云十六州仍然在契丹人的掌握之中，汴梁就随时有可能受到攻击。当年后唐并吞了前蜀，却被北方人的契丹所灭，这样的教训不能再次重演。

为了进攻契丹，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如果消灭了南唐，后周必须拿出大量的精力来维持南方社会的稳定，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叛乱，南方和北方同时受敌。与其浪费精力，不如暂时维持一个稳定的南唐。也因为后周已经获得了江北的土地，南唐不再构成威胁。当后方稳定之后，就可以放手向北进攻，夺取失去的十六州了。

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开始了北伐，目标：收复燕云十六州。

但不幸的是，在刚刚收复了最靠南的瀛州、莫州之后，周世宗突然得病身死。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再也没有时间来完成他的统一战略了。

赵匡胤的军事变革

后周太祖郭威永远想不到，他一手导演的兵变大戏会被别人“依样画葫芦”，用同样的手段篡夺了他的江山。

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率军北伐的郭威在澶州突然被士兵们披上一面黄旗当作黄袍，挥军入京取代了前朝。九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大将赵匡胤的身上。这次，赵匡胤更加等不及，走到距离首都不远的陈桥驿，就让士兵披上了黄袍。

当上了皇帝的赵匡胤意识到，既然郭威和自己都可以通过兵变当上皇帝，那么，在现有的体制下，一定会有下一位权臣利用机会登上帝位。要想防止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只有从制度上来遏制。

五代时期最大的制度特征，仍然是以节度使为代表的武将控制政局。节度使们成了每个地方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军队，从地方收税来养兵，甚至有自己的官僚系统。

宰相赵普向赵匡胤提出了三点计策：在政治上，削夺其权；在军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钱谷。

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外，加上了许多附属性的监管措施，来防止官员擅权。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宋代设置了副宰相（参知政事）。又将兵权分出去，划归了枢密院。同时将财政权力分出去，设置了三司使。

在地方官制上，财权、军事、行政权力也各个分离，官员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牵制。[4]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最复杂的朝代，各种官僚盘根错节，任何人想要反叛，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

军事上，五代时期为了对抗节度使的权力，形成了枢密院领兵制度。为了限权，除了枢密使之外，还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组成的三衙。这三衙统领全国的禁军和厢军，负责军事训练。

三衙负责练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而打仗时还要另设将帅领兵。路、州、县各个地方政府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职务，负责当地驻军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工作。

不管是官员还是军队，都没有独立的财政权。中央对地方和军队的制约，表现在财政上的“制其钱谷”。宋太祖剥夺了地方的独立财权，派遣了大量的使职官僚下去。他规定，财政官员直接向中央负责。地方财政事务都由中央政府设立的转运使掌握，而地方长官（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留后、刺史等）均不掌握财政事宜。通过这个做法，皇帝就架空了地方机构的财政权力。

在中央层面上，皇帝设立了三司使，专管财务。三司与宰相、枢密院并立，号称计相。财政官员的地位提升，并独立于行政之外，皇帝更加掌握了对于财政的控制权。[5]

简单地说，宋太祖的制度变革，就是加大官员和兵员的冗余度，让这些冗官和冗兵互相制约，互相监督，避免任何人有过大的权力来发动政变。

这样做的结果，是如此复杂的制度经过自然生长过后，其复杂度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到最后，就连皇帝都无法控制事态。北宋中后期，冗官和冗兵如同巨大的肿瘤生长在社会肌体上，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去掉。

为了养活冗官和冗兵，宋代不得不生成了极端复杂的财政体系，从国有企业、专卖制度、金融体系等各个方面，从民间抽取财富，即便这样，仍然无法满足政府的需要。

与此同时，士兵的战斗力却得不到保证，将军们由于没有足够的权力，处处受到制约，在战争中败仗连连。

可以说，宋太祖在防止内部叛乱上极端成功，却以牺牲了对外作战能力为代价。这个特征，决定了宋代的战争大都是对外的，而内部的叛乱规模小，也容易镇压。

但在宋代初年，这些弊端还都没有显现，宋太祖仍然可以借助后周

的余勇来统一全国。

柴规赵随统一全国

幸运的是，后周虽然被取代，历史却没有重演当年后唐的一幕。后唐庄宗李存勖差一点儿统一了中国，却由于内乱而身死国灭。周世宗制订的战略，在他死后被宋太祖赵匡胤继承了下来。宋代的统一，基本上继承了后周的思路。特别是在南方，完成了周世宗当年没有完成的统一。只是在北边作战上由于战斗力不强，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而已。

赵匡胤取代后周后，在数个月内接连发生了两次忠于后周的军事官员起义。其中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所辖区域为潞州（现山西省长治）、泽州（现山西省晋城）、沁州（现山西省沁县），位于山西南部的上党地区和黄河北岸，是山西进入河南和洛阳的交通要道。在地理上，从河南进入上党，需要翻越太行八陉之一的天井关，也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在山西省太原地区还盘踞着北汉政权，如果李筠和北汉联手，意味着整个山西都站在了宋的对立面上。

在南方的淮南军节度使李重进则控制了扬州、楚州（现江苏省淮安）、滁州、和州（现安徽省和县）、寿州（现安徽省寿县）、庐州（现安徽省合肥）、舒州（现安徽省怀宁）、蕲州（现湖北省蕲春）、黄州（现湖北省黄冈）、安州（现湖北省安陆）、沔州（现湖北省汉阳）这十一个州，从淮河直到长江，从扬州直到武汉，这里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场区域，中原政权和江南政权的主要交锋区域就在这里。当年，后周世宗与南唐战争争夺的就是这个区域。

如果李筠和李重进联手，再借助北汉、契丹和南唐的力量共同进攻赵匡胤，那么宋这个新兴的朝代必将腹背受敌，经历第一次重大危机。幸运的是，这五方力量虽然有心联合，却又各自为政。赵匡胤利用各方无法协调的空当，发动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灭掉了李筠，随后挥军南下，乘李重进犹豫不决之际剿灭了他，渡过了第一次危机。

在解决了内部兵变之后，赵匡胤继续了周世宗的战略，依次解决各个割据政权的问题。不过，他对周世宗的战略做了一定的调整。周世宗去世时，契丹成了他想解决的首要问题，赵匡胤却把契丹问题当作最后

要解决的，把首先的打击目标放在了各个弱小的南方政权上。

这点改变，让北宋永久性地失去了十六州。因为一旦解决完南方，就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维持当地的治安，以北宋的架构，很难再有余力夺回十六州了。

在南方，最强大的政权是盘踞在南京的南唐，其次则是四川的后蜀。江南和后蜀因为它们的富裕，处于一东一西两极，而在它们的中间和南方，则有南平（中心在荆州）、湖南、吴越、闽国（在福建）、南汉（在广东）。

其中湖南此刻由周保权占据。湖南原来是马殷所建立的楚国，尽管楚国已经被南唐灭亡，但南唐无力直接控制这里，导致政权几次易手，最终落入大将周行逢之手，又传给了儿子周保权。

南唐、后蜀之外的五个小国并无力抵抗宋军。征服五小国，可以将南唐和后蜀隔开，便于各个歼灭。宋太祖最初将位于南唐和后蜀之间的南平、湖南列入了打击对象。

恰好这时，湖南的周行逢去世，未成年的儿子周保权无力控制局面，大将张文表乘机反叛。北宋以平叛的名义，借道南平，进入湖南。南平王高继冲知道不借道凶多吉少，借道也是灭亡，决定把居民、土地、册籍都上交给宋朝，并入大宋。宋朝也乘机南进，将湖南合并。

并吞了南平和湖南，向南可以进攻广东的南汉，向西可以进攻四川，向东则可以进攻长江下游的南唐。

宋太祖首先对四川的后蜀用兵，兵分两路，分别从陕西的汉中地区，以及湖北的荆州地区，进军四川。后蜀王孟昶无法抵挡宋军，选择了投降。

宋军占领四川后，对四川进行了严苛的经济掠夺。在宋代，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每一个区域实行的经济制度是不一样的。以基础性的货币制度而论，北宋大部分地区流行铜钱，可是四川却是铁钱，原因在于北宋初期北方一直缺乏铜，形成了钱荒。在四川，孟氏政权则既发行铜钱也发行铁钱。北宋征服四川后，为了解决北方的钱荒，就把四川的铜钱

全部运走，只剩下铁钱留在了当地。久而久之，四川就成了著名的铁钱区。于是，四川的经济依然保持繁荣，可是金融却显得极为荒诞，由于铁钱太重，携带不便，四川人只好创造性地发明了纸币交子。

另外，压榨过度也导致了四川人的反叛，这就是著名的李顺、王小波起义。

平定四川后，南方唯一的大政权就是南唐了。为了孤立南唐，宋太祖决定从湖南南下广东，先将南汉拿下，断绝南唐的后路，形成包围之势。

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宋军开始攻伐南汉，几个月后，南汉投降，岭南地区也进入了北宋的边界之内。

由于与北方的北汉发生冲突，攻打南唐的计划被搁置了几年。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宋军开始进攻南方最重要的敌人南唐。由于南唐失去了淮河地区的保护，北宋又占据了上游地区的荆州，这次攻打的难度并不大。南唐仅仅抵抗了一年，就投降了。

南唐灭亡后，仅剩小国吴越和福建。在此之前，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南唐挡住了宋军的进路，到这时，也纷纷表示献地给宋朝。赵匡胤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

赵匡胤去世后，宋太宗从河北、河南两路进攻北汉，获得了山西太原地区。到这时，北宋的统一宣告完成。

但是，北宋的统一又遗漏了哪些地区呢？

最著名的是北方燕云十六州，这些曾经属于唐朝的州郡被契丹人占领，没有再回归。在南方，曾经的安南（现在的越南河内）也是唐朝交州的领地，唐朝灭亡后，交州进入割据状态，与南汉发生了长期的战争，甚至杀死了南汉的太子刘弘操。

宋朝灭亡南汉时，统治越南的是丁桓所建立的丁氏王朝，后丁朝又被黎桓建立的黎氏王朝取代。但丁朝和黎朝都只向中国纳贡，不再受中

央政府领导，这就是越南独立的起点。

在西南，由于唐代与大理地区的南诏国有过长期的战争，宋太祖在地图上用玉斧画线，表示大渡河以外不再是中国领土，导致云南省和川西南的大片土地被排除在外。

所以，宋代疆域是唐朝疆域的缩小版。但在宋国境内，由于信用的扩张和政府对于贸易的鼓励，经济发达程度却超过了唐代。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宋朝的文化修养也高于唐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是中国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1) 唐代虽然从太原起家，但也首先抢占关中。

(2) 十六州问题见下章。

(3) 《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

(4) 《宋史·职官志》。

(5) 《宋史·职官志》：“三司之职，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之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其恩数廪禄，与参、枢同。”

第十六章　十六州忧思（公元936—公元1125年）

燕山作为游牧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起到了保卫农耕文明的作用。一旦游牧民族在燕山以南获得据点，无险可守的华北就处于危险之中。

十六州之所以重要，在于围绕着幽州的数个州已经位于燕山以南，丧失这些山前州，意味着无法防范游牧民族对华北的进攻。

中国北部每一个城市作为首都都有弱点。长安（唐代以后）由于不够富裕，无力承担和平时期首都的责任。开封没有险阻，无力承担战争时期首都的责任。洛阳比长安富裕，比起开封又四周环山，但它在两方面都只能算平庸，只能算是折中的选择。

北宋定都开封，无险可守，使得北宋一代必须有大量的军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与女真、蒙古相比，契丹是一个汉化严重、失去了锐气的民族，正因为此，北宋才能抵御住辽国的进攻，在签订澶渊之盟后，又与辽国和平共处了一百多年，成就了双方的盛世。

为了保卫无险可守的河北平原，宋代在河北的各个城市堆积了大量的冗兵。但由于北宋与辽国长期保持和平，如此众多的冗兵非但没有起到保家卫国的作用，反而吃垮了宋国的财政和经济。

从北京出发向北数十公里，经过昌平，再向西北方向进入山区，就到了著名的居庸关。这里也是中国气候和文明的分界线。

从北京向南，是与华北平原相接的平地地貌，在北京的西侧和北侧，横亘着一条著名的山脉——燕山山脉。从地理上看，燕山更像是太行山的一条余脉，但燕山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却显得非常重要。

在燕山以南，是适合耕种的平原区域，燕山以北则画风一变，进入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世界，农耕文化让位给了游牧民风，这里也成

了农耕社会保卫文明的前线。

在古代，人们常说太行山中有八条通道，连接了太行山内外两侧，号称太行八陉，其中最后一条其实在燕山山脉与太行山交界地带，叫军都陉，在军都陉设立的关口就是居庸关。

从居庸关向西北方向，经过官厅水库，就到了河北省境内的怀来县和宣化县，这里在宋代被称为妫州和武州，都位于燕山山脉所在的山区。

如果继续向北，可以到达河北省张家口市。从张家口向北，经过著名的野狐岭，地势突然从绵延不绝的山地变成了平坦的高原草甸，也就出了燕山，进入了北方草原的范围。

在宋代，这片区域更加著名，因为它就是燕云十六州的所在。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大将石敬瑭与契丹签署协议，以十六州为代价请契丹出兵灭掉后唐。两年后，十六州正式交割给了契丹人。

除了十六州，还有三个州必须提到。在石敬瑭之前，契丹人已经从刘仁恭手中获得了营州（现河北省昌黎县）、平州（现河北省卢龙县）和滦州（现河北省滦县），这些州也都位于燕山山脉以南、河北省的东部，契丹人占领了这里，就意味着可以从燕山以南出兵直接打击中原。石敬瑭又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契丹就尽数占有了北京和山西北方的重要战略地，随时可以进军中原了。

所谓十六州，是从山西到河北的北方边境线上，事关战略生死的十六座城市和附属土地，大约处于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境内。属于现在北京的有四州：幽州（现北京）、檀州（现北京市密云）、顺州（现北京市顺义）、儒州（现北京市延庆）；属于现在天津的有一个州：蓟州（现天津市蓟州区）；属于现在河北的有六个州：瀛洲（现河北省河间）、莫州（现河北省任丘）、涿州、新州（现河北省涿鹿）、妫州（现河北省怀来）、蔚州（现河北省蔚县）；属于现在山西的有五个州：云州（现山西省大同）、应州（现山西省应县）、寰州（现山西省朔州市马邑）、朔州（现山西省朔州）、武州（现山西省神池县）。

这十六州的重要性又各不相同，其中幽州（也称燕）和云州最重要，分别是从北方进入河北和山西地区的主要通道。幽州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云州则是面向山西的基地。山西北部的大同（云州）和太原分别在两个小型盆地之中，两个盆地中间夹着一座雁门山（古代称为句注山，或者勾注山），著名的雁门关就设在这座山上。北方历次进攻山西的部队都是在云州集结完毕后，再乘机南下雁门关，向太原进攻。

按照十六州的地理位置，又可以将其分为山前诸州和山后诸州。所谓山前州，是指位于燕山山脉以南和太行山以东的几个州（幽、顺、檀、蓟、涿、瀛、莫）[(1)]。剩余的山后州则位于燕山、五台山、雁门山等山脉的北面。

对于北宋政治中心华北平原来说，山后诸州还没有那么迫切，只要把守好居庸关和雁门关，还可以阻挡敌人入侵。可山前诸州的丢失却是不可忍受的，一旦丢失了这些州，就再也没有稳固的战略要地可以防守，敌人以山前州为基地，可以一马平川泼向华北平原，直至北宋首都汴州（开封）。

除了幽州之外，瀛洲和莫州的地理位置已经非常靠南，接近于中原的腹心，在周世宗的北伐中，这两个州被收复，解除了一定的威胁。但随着周世宗的死亡，其余州仍然掌握在契丹人的手中。这时，人们又把契丹控制的山前的景州（现河北省遵化）和易州（现河北省易县）加进去，又凑够了十六州之数。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了南方之后，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就提上了日程。但北宋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围绕着十六州的争执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双方亡国方才结束……

东京汴梁的功与过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北宋朝廷发生了一次争吵。这次争吵的主题是：应该把都城设在哪里？

在此前一年，随着灭亡了南唐，宋太祖赵匡胤命人到唐东都洛阳查看。此刻的洛阳由于战乱的影响，破烂不堪。当年的宫殿、城防早已损坏，城里的人民也都走散，至于官衙宫庙，更是不见了踪影。太祖命人赶快对宫殿进行了抢修。

第二年，太祖率领群臣从汴梁来到洛阳。汴梁是前朝（后周）的首都，也是宋太祖暂时的都城，而洛阳是他心仪的想要迁都的地方。但在洛阳，人们纷纷进谏宋太祖不要迁都。

其中起居郎李符的上表最为具体，他总结了迁都洛阳有八点难处：京邑凋敝、宫阙不备、郊庙未修、百司不具、畿内民困、军愿不充、壁垒未设、盛暑扈行。

还有人提出，汴梁是各大运河交汇的所在，由于交通方便，粮食不会匮乏，如果迁都洛阳，则意味着要改造运河系统，工程量大，劳民伤财。

甚至连太祖的弟弟、后来的太宗赵光义也说不便迁都。

但宋太祖不为所动，甚至认为，迁到洛阳只是第一步，等以后还要想办法迁到长安去。如果太祖能够活长久一些，那么迁都也许会成为事实。但随着对北汉战争的准备，迁都没有成为现实，当年太祖就死去了，迁都的争议也正式被搁置。

那么，为什么宋太祖坚持要把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呢？这要从开封的地理位置说起。

在历代古都中，北宋首都开封的命运最为曲折。现在如果前往开封，会看到巍峨的城墙和雄伟的开封府，将人们带回北宋当年的繁华。

但这只是幻象，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产物。事实上，与洛阳、西安等相比，开封很少有宋代的遗迹保留下来。现在人们看到的城墙是清代后期修建的，那座巍峨的开封府更是现代人的产品。至于宋代的开封，只存在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之中，以及十多米深的地下。

开封处于黄河改道南下后的河道旁，地势平坦，成了黄河最大的受灾区之一。历代的黄河泛滥将原来的文化层深深埋没。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的一次黄河决堤，泥浆就产生了三米厚的地层，宋代开封府也相应地下移了三米。

“开封城、城摞城”的历史，也反映了这座古老都市的命运：它处于河南东部的广大平原之上，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也是数条河道交汇之处，最著名的是汴河。这条河流早期是战国时期魏国开凿的鸿沟，一直是沟通淮河和黄河的人工运河，之后的隋唐大运河也是就着汴河的河道开掘的。除了运河，这里还有淮河支流涡河，以及改道之后的黄河。

河流环绕，没有险阻，使开封成了一个经济富裕却四方争夺的地方。所以这里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都城的。

战国魏曾把大梁（开封）作都城，但魏国随后成了齐国、楚国、秦国争夺的战场，不管从北、南、西方，都可以轻易地到达开封，这导致了魏国后期的孱弱。

战国魏之后，开封一直作为一个重要城市，却非战略城市存在。直到唐代末期，后梁太祖朱温做节度使时，由于封到了汴州（开封），在开国之后，就把首都定在了这里。

后唐灭亡后梁后，又跟随当年唐朝的做法，把首都迁到了洛阳，成了五代时期唯一把都城设在洛阳的朝代。后唐被契丹人灭亡后，洛阳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后晋、后汉、后周三代只好跟随后梁的做法，将首都设在了汴梁。北宋又取代了后周，开封就这样阴差阳错成了这个著名王朝的首都。

宋太祖统一全国之后，意识到五代之所以短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定都不当。除了后唐是内乱之外，其他朝代由于都城在汴梁，几乎

都无法经受北方的打击。只要契丹人从北方而来，一路上经过的全是华北的广袤平原，几天之内就可以到达黄河岸边。而黄河作为防卫开封的唯一屏障，由于过河地点多，线路复杂，需要大量的士兵来守卫，一旦疏忽，就会被攻破。

如果要让朝代稳定，必须将首都迁出开封，到一个有险阻可守的地方。不幸的是，在整个华北地区，除了北京有险阻可守之外，其余的地方都不够险，而北京还被割让给契丹人了。

洛阳算是一个不坏的选择，它四面环山，又有黄河之险，中国古代许多朝代选择洛阳，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但洛阳周围的山并不算高，到了宋代，随着游牧民族充分发挥了机动性，洛阳也并非不可攻破。

宋太祖认为洛阳至少比开封强，他甚至想最终迁往长安，就是担心洛阳也不够稳固。

但长安也有长安的问题。从地理上讲，长安的确是四塞之地，但由于陕西的经济落后，这里已经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口。如果说，开封是在战争时期无法承担首都的职责，那么长安是在和平时期都无法承担首都的职责。毕竟和平的时间更长，因此，长安也不再符合要求。

总结而言，在华北地区，每一个城市都不是完美的，但相比较而言，还是洛阳的优势最大。

在与弟弟的辩论中，宋太祖提出：之所以要迁都，是为了利用山河的险固，来减小军队的规模。军队规模减小了，又可以减少财政需求，从而刺激民间的发展。

赵光义则学究气地回答：在德不在险。试图从道德的角度寻找答案。

最终这次迁都未成，宋太祖因此发出感慨，定都汴梁，未来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冗兵问题。果然，终宋一世，冗兵一直如同鬼魅一般缠住了北宋王朝。

由于北方没有燕云十六州的险阻，宋代与辽国的边境几乎是顺着平

原上的几条小河划界；又由于首都无险可守，辽军可以随时进军，所以为了对付辽国，宋代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堡垒，构筑了三条防线，这就需要庞大的军队。

而士兵太多，又对财政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持军费，宋代开始从各个方面找钱，建立国有企业、开展特许经营、搞金融投机等，最后拖垮了社会经济秩序。

更可怕的是，即便有如此众多的士兵，仍然没有办法解除北方的威胁。金国灭亡北宋之前，著名将领种师道曾经提出了汴梁的危险性，认为这里无法抵御金国的进攻，宋钦宗必须立刻离开汴梁，迁到长安固守。在当时由于洛阳也成了前线，同样不安全，将首都迁往长安是个保险的举措。

但种师道的提议被宋钦宗的大臣们否决了。于是，在下一轮战争中，金人长驱直入进攻汴梁，宋钦宗开门投降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从这个角度看，当年决定定都汴梁时，就注定了北宋最后的命运。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但只要北宋无力抵抗北方进攻，对方迟早会赶到汴梁城下，演出擒贼擒王的历史大戏。

要想避免历史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一个办法：收复十六州（特别是山前州），将防线重新推回到燕山之后，利用燕山的险阻来完成防守任务……

宋太宗：失败的收复战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刚刚征服了北汉的宋太宗赵光义率军从太原回到了太行山以东的镇州（现河北省正定）。他决定乘胜率军迅速北上，直指辽国在燕山以南的中心城镇幽州。

宋朝大军用十天就攻克了涿州，直达幽州城南，在如今北京西直门外的高梁河驻扎。

到达幽州后，宋太宗一面围城，一面派兵向北进军。在幽州北面的得胜口（现昌平境内，距离居庸关不远）还有一支辽军，由南院大王耶律斛轸率领。宋军暂时阻止了耶律斛轸的南移，防止他援助幽州。

如果宋军能够做到彻底阻止契丹援军，通过围城迟早可以攻克幽州。然而，由于不熟悉地形，宋太宗并没有将辽国与幽州的另一条主要通路——古北口封锁。在北宋时期，从关外进入关内一共有五大关口，从西往东分别是：位于现河北省易县的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现河北省宽城县西南）和榆关（即山海关）。其中紫荆关和居庸关位于太行山，剩下三个位于燕山。

居庸关和古北口是距离北京最近、最常用的关口。现在，北京通往承德的公路就经过古北口长城。

居庸关沟通的是北京向西北方向，与河北、内蒙古的交通，而古北口沟通的是北京向东北方向，与河北和东北的交通。由于东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开发晚，古北口的开发也比居庸关晚，南北朝时期的慕容氏燕国建立，才有人开始注意它。到了辽、金和清代，由于敌对势力已经转移到了东北，古北口的重要性超过了居庸关。

宋初，人们的关注点仍然在太行八陉，对古北口重视不够，宋太宗也因此忽略了古北口。故他虽然封锁了居庸关，但辽国的援军却可以通过古北口进入北京盆地，支援幽州的守军。

果然，在宋太宗攻打幽州城时，辽国派出了大将耶律沙和耶律休哥各自率军前来援助。由于宋军没有封锁古北口，两支军队先后到达了幽州城外。

耶律沙与宋军先开战，宋军赢了。但就在宋军已经感觉疲惫时，耶律休哥的军队突然来到，他们每人持两个火把，联合耶律沙的残兵，加上耶律斛轸和幽州城内的守军，终于冲垮了宋军的战线。

赵光义乘坐驴车一直逃到涿州，又担心涿州守不住而继续南逃。臣下因为找不到他，以为他阵亡了，甚至考虑另立皇帝。

此次战败，标志着北宋收复燕云十六州计划的复杂化：宋朝进攻过后，该契丹人反攻了。

与宋军单路出击不同，北方（辽国和后来的金国）进攻南方，往往同时选择两条线路进攻。一条是从北京南下河北，另一条则是从山西的大同经过雁门关，南下太原，再从太原经过上党高地直达河南。两路大军隔着太行山，还可以通过太行山的几条通道互相联系。最主要的通道是通往石家庄的井陉，以及通往邯郸的滏口陉。

高梁河战役几个月后，辽军在元帅韩匡嗣的率领下，经过幽州向河北进军，在河北省满城境内遭到失败。另一支辽军从山西北部向雁门关进攻，也被宋将杨业击退。

在河北地区，宋辽交界形成了以益津关（现河北省霸州）、瓦桥关（现河北省雄县境内）、岐沟关（现河北省涿州西南）为前线的交界线。与其他的关口相比，河北三关都设在平地上，依靠不大的河流进行防守，使得防守难度加大。

第二年，辽军在耶律休哥的率领下，进攻瓦桥关，宋军以极大的损失阻止了辽军的前进。第三年，辽军再次进攻，又被宋军击败。

宋军之所以能够守住河北、山西防线，与其说是宋军的英勇，不如说是辽军进攻能力的不足。

与后来的女真人、蒙古人相比，契丹人是一个汉化程度较高、战斗

力不强的民族，当它所建立的国家重心转移到北京一带时，它便已经失去了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偏北，缺乏大规模粮食生产能力，契丹人的军队很难做出长时间的远程打击。

辽国的进攻模式往往是这样的：辽国进攻宋境，在攻克了前几个据点后，受阻于某一个城池之下无法前进；由于机动能力不足，很难越过据点进行远程打击；粮食辎重不足，又很难演化成长期进攻；已经占领的据点，由于无法建立有效统治，也无法固守；最终，在大肆掠夺之后辽军向北撤退，回到传统边界之后。

到了女真人和蒙古人时期，随着机动性的增加，骑兵可以一跃千里，实行更加远程的打击，北宋的厄运才真正降临。

由于辽军进攻能力不足，加之辽国内部的权力更迭，宋辽休战了几年。宋太宗认为应该重新尝试一次夺回燕云十六州。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宋军开展了一次协同作战，利用山西和河北两个方向，向辽国进攻。

宋太宗对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派遣了五路大军，从河北和山西的基地进攻辽国，五路大军的最终目的，是会师幽州。

这是一次颇具现代化的战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采取了旋转策略，在法德交界的南方地带以防守为主，甚至可以主动撤退一点儿，拖住法国的军队，而在北方则发起进攻，闪电进攻法国北部。整个战局如同一个巨大的旋转臂，按照逆时针旋转，北方朝法国境内旋转，而南方朝德国境内旋转（撤退诱敌）。

宋太宗制订的战略与德国的战略有很大相似之处，简单来说，就是“西方主攻，东方主守”。在东方的河北境内，天平军节度使曹彬负责进攻涿州，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从雄州（现河北省雄县）出发北进。不过这两路大军主要的任务是拖住敌人，不要快攻，而是慢攻，牵制敌人的兵力，让敌军远离幽州和山西。

在西方的山西、河北交界，以及山西境内，宋太宗派遣了三路大军

负责进攻。第一路是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他的基地在河北的定州，按照命令，他必须走河北、山西的交界地带，出太行山上的飞狐口（飞狐口南面就是紫荆关，沟通关内外五条道路的第一条，也是最西面的一条），进攻幽州东面的蔚州（现河北省蔚县），从侧翼包抄幽州。第二路是太原的忠武军节度使潘美（评书《杨家将》中的潘仁美），他一面防守太原，一面从五台山出军，与田重进一起打通蔚州。第三路是云州观察使杨业（评书《杨家将》中的杨继业），他从北方的雁门关出发，以收复山西北方的四州为目的，再转而东向，与其他各路一起进攻幽州。

当西面的军队攻克了既定目标之后，东方的两路大军再转为积极攻势，兵向幽州，五路大军共集结在幽州城下。

从战略上讲，宋太宗的部署颇有新意，与上次仓促北伐不同，这次的行动只要执行得当，的确可能成功。

但问题就出现在了执行层。

战争开始后，西方三路军进展顺利。杨业在潘美的帮助下，很快攻克了山西北方的诸州，包括战略意义仅次于幽州的云州（大同）。田重进的大军挺进飞狐口，顺利占领了蔚州。潘美则与田重进会师于蔚州。辽军损失惨重。

东路军本来应该采取缓慢进攻的策略，等待西路军布置到位，占领了各个城池后，再快速进攻。然而东路军统帅曹彬却犯了抢功的错误，一路进攻，连下数城，快速推进到涿州城下。这从战术上看是一种胜利，但从战略上，让辽军过早地明白了宋军的意图，将重兵收缩到幽州一线，对蔚州的防守强度也大大增加，对于整个战局来说非常不利。

当辽军在蔚州加强防守后，田重进、潘美的部队被阻挡在了蔚州一线，无法按照预期越过太行山，会师于幽州。到这时，曹彬就只能孤军与辽军作战了。

曹彬的宋军和辽军对峙于涿州城南的岐沟关一带。指挥战争的辽军统帅耶律休哥袭击了曹彬和米信的粮道，导致东路大军的崩溃。

东路军的崩溃又影响了西路军。辽军随后对蔚州的田重进和潘美发动进攻，宋军在被围困后，突围撤退，在撤退中损失惨重。

杨业攻克的山西北部四州也无法独存，只能把居民撤离，留下空城还给辽国。在撤退中，由于潘美（他是杨业的上司）的指挥错误，杨业兵败被俘，绝食三天而死。

当年底，辽军大举进攻，大败宋兵于君子馆（现河北省河间市境内）。

岐沟关和君子馆的惨败，让宋军再也没有能力去谈收复燕云十六州，辽国随后的进攻也没有成功，双方又回到了均势，维持了十几年。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去世，他的儿子继位为真宗，辽国又借机发动了南侵。

买来的百年和平

在二十四史中，元代丞相脱脱主持编撰的《宋史》是规模最大的一部。虽然规模庞大，编撰此书却只用了两年半时间，从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始，到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结束。

因为时间短，《宋史》显得庞杂混乱，讹误众多。但也正因为缺乏精心剪裁，书中反而保留了许多非常活泼的文字，足以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宋宰相寇准的传记就有这样的特点。特别是在描写澶渊之盟的章节中，寇准的苦口婆心、皇帝的惊慌失措都跃然纸上，如同小说一般精彩。

宋真宗继位的前几年，辽国认为真宗皇帝占位未稳，是进攻宋国的好时机，先后发动了三次南侵，对北宋的土地进行了大肆劫掠，但最终都由于无法形成长期固守而撤退。

辽人的入侵对宋代君臣形成了巨大的精神震慑，甚至产生了谈辽色变的气氛。有的大臣甚至建议，首都汴梁和河北都无法待了，最好还是撤退得远远的，避开辽军的势头。

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军的骑兵部队再次在北宋境内骚扰，但这些部队却有意不和宋军接触，宋军一进攻，他们就撤退。当边将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皇帝时，宰相寇准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辽军在搜集军事情报。寇准立刻建议皇帝开展战备。

辽军的进攻一般选择在秋冬季节。半年后，辽军果然开始进攻。当其他大臣如坐针毡时，寇准似乎胸有成竹，边关的求救文书一天来了五封，全被他扣押下来不交给皇帝，他饮食自如、谈笑自若。

第二天上朝时，寇准的同僚们终于有机会见到宋真宗，将辽国入侵的消息上报给了皇帝。皇帝也立刻陷入了恐慌之中，问寇准该怎么办。寇准徐徐回答，如果要对付入侵，其实只需要五天时间就足够了。他请皇帝御驾亲征，坐镇澶州抵抗辽军。

他的同僚们一听说寇准让皇帝亲征，立刻想托词离开，避免与皇帝一起送死。他们的托词被寇准挡了回去。皇帝也想溜进后宫，寇准对皇帝说，陛下一旦回到后宫，就肯定躲着不见我了，到时候就大事去矣，请陛下留步，把亲征的事定了再说。

在寇准的软磨硬泡之下，皇帝和群臣极不情愿地答应出征，但具体的措施仍然没有决定。

通过这样的描写可以看出，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北宋的群臣都恐慌到了什么程度。

事实也证明，这次辽国的军事行动规模比以往都要大。在以往，辽军往往只能推进到幽州以南数州，就会被宋军阻拦，很难到达黄河沿岸（黄河是北宋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多能够派出一支偏军打破封锁，到山东、河北南部掳掠一番，就回北方。而这一次，辽军却成功地突破了河北诸州，直捣黄河北岸，如果突破了黄河防线，北宋江山就可能易主。

澶州城在黄河岸边，由于防御的需要，这里设置了两座城市分居黄河两岸，中间有吊桥相连接，是从宋都汴梁到北方的最主要通道。按照以往的作战经验，宋军总是兵败如山倒，敌人还没有到达北岸，南岸的士兵就都逃光。寇准把皇帝放在澶州，就是想避免出现这样的崩盘，借助皇帝的权威来稳定军心。

当敌人向澶州进发时，首都汴梁的君臣仍然在争吵具体的行动。这时，又有人跳出来宣称皇帝不应该向北进攻，而是应该向南撤退。比如，作为副宰相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他就主张宋真宗应该学习晋朝的经验去金陵（现江苏省南京）避难并准备反攻，把首都留给辽国去掠夺。而另一位四川大臣陈尧叟则主张皇帝应该学习唐玄宗的经验，跑到四川成都去。

皇帝犹豫不决，询问寇准这两个人的看法，寇准佯装不知是谁提的，大声说：出这些馊主意的人都应该直接砍了！

皇帝终于怏怏不乐地上路了。等他们到达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后，宋真宗再次不想走了。大臣们心领神会，劝说皇帝停在这里，查看军势。寇准连哄带骗请求皇帝继续上路，表示如果皇帝不过黄河，就是对胜利没有信心，士兵们看见了会心寒。再说，黄河以北还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对付辽军，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士气。

皇帝仍然不肯前行，寇准只好私下里找到太尉高琼，请他帮忙劝说。高琼在皇帝面前也赞同寇准的言论。皇帝这才心怀忐忑地过了河。

过河后，皇帝登上北城的门楼，让远近的士兵都能望见御盖。士兵们踊跃欢呼，让契丹人感到惊愕害怕。

由于宋军的顽强抵抗，辽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辽国的统军元帅萧挞览被宋军射死。当辽国皇帝发现进攻无望时，决定派遣使者，商谈议和条件。宋真宗立刻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决定与辽国议和。

按照寇准的观点，希望一次性从辽国手中夺回幽州，哪怕和谈也要以幽州为条件。只有把辽军推回到燕山之后，才能保证河北不受到骚扰，进而保证首都的安全。

但宋真宗已经吓破了胆，他派遣曹利用与辽人和谈。谈判策略则是以金钱换土地。宋方的要求是不割地，但可以赔钱。在私下里皇帝告诫曹利用，只要是每年一百万以内的赔偿都可以接受。而寇准则偷偷告诫曹利用，赔偿必须控制在三十万以内，否则回来等着被斩首。

曹利用最终达成条件：每年给辽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当他回到宋营向皇帝汇报时，伸出了三个手指头。宋真宗大惊失色，惊叹说：怎么会三百万！过了一会儿，又转口说如果三百万能够息兵，也值了。

宋太宗时期，北宋的财政收入大约是两千万。宋真宗后期，则涨到了一亿五千万以上。[2]三十万在整个财政盘子中，即便按宋太宗时期的标准，也只有百分之一多一点儿。以这样的代价换取两国的和平，对于北方防线孱弱的北宋来说，的确是值得的。

这场以金钱换和平的协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到了三十多年后的庆历年间，由于北宋和西夏的开战，辽国威胁重开战争，要

求增加上供，于是北宋的上供又增加了十万两白银和十万匹绢。

不过，辽国与北宋的确实现了相对和平，为北宋河北和长江地区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辽国之所以愿意拿钱不愿意打仗，还是与它本身并不算强大的军事实力有关。拿钱息兵，对于辽人来讲，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从这个意义上讲，澶渊之盟并不公平，却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双方的受益，也维持了北宋核心地带一百年的和平，打造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盛世。

无险可守的边境线

回顾一下北宋与辽国的边境线。

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北宋与辽国之间缺乏天险，在河北广大的平原地区，形成了一条几乎无法守卫的边境线。

澶渊之盟签订后，北宋与辽国进入了和平状态。但为了防范未来的风险，巩固北方防线，北宋政府采取了广修城堡的策略，在边境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的堡垒。辽国如果要进攻北宋，必须突破这些堡垒群，才能到达黄河地区。过了黄河，才可能接近北宋的首都汴梁。不过，由于地势过于平坦，一旦敌军突破了黄河，首都基本上就没有了保卫的价值。

在北宋的防御体系中，可以分出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紧贴辽国占领区，在山西，以恒山、句注山为界，两国之间最著名的三个关隘是宁武关、雁门关和平型关。在河北，北宋在大清河、拒马河构筑防线，在河畔有益津关、瓦桥关和岐沟关三关。在霸州、雄州、易州、定州、保州（现河北省保定）、祁州（现河北省安国）等地，则设立了大量的堡垒驻军。

如果辽人攻克了第一道防线，则会遭遇北宋以滹沱河为中心构建的第二道防线，这条防线上有瀛州（现河北省河间）、沧州、冀州、贝州（现河北省清河）、邢州（现河北省邢台）等城池，可在受到进攻时互相援救，形成互保。

宋代的第三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就是黄河防线，其中著名的城市是大名、滑州、澶州、濮州、郓州（现山东省东平）、博州（现山东省聊城）、棣州（现山东省惠民）、齐州（现山东省济南）等地。

宋太祖当年为军队的冗兵感到忧虑，但直到北宋灭亡，仍然无法解决冗兵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北方防线无险可守，只能靠人来堆积。

即便是和平时代，由于河北地区需要守卫的城池太多，军队仍然无

法削减。河北平原本来是北宋的粮仓，但当它成为两国边境，需要投入重兵进行防卫时，其农业和经济价值也受到了影响。也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正式超越了北方。

当和平到来后，辽国的军事能力也在退化。由于长期不用打仗，加上地理位置过于偏北，辽国的经济一直无法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到最后，随着蒙古人和金人的崛起，辽国显出了颓势，无法应付更加北方的敌人了。

从战争和对抗程度上看，对北宋造成最大危害的不是辽国，而是西北的西夏。北宋与辽国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几年就告结束，之后双方维持了一百年的和平。但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却进行了一百多年，直到北宋被金灭亡，与西夏不搭界了，双方的战争才告结束。

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北宋的财政步入了危机，皇帝开始四下找钱，却始终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北宋在河北的冗兵既拖累了财政，也没有起到保家卫国的目的，可谓得不偿失。

(1) 关于燕云十六州有不同的说法，有时人们将营、平、滦三州算入，就变成了十九州。营、平、滦也位于山前。当瀛州、莫州被周世宗夺回后，人们又常把景州（现河北省遵化市）和易州（现河北省易县）加进去，仍然构成十六州。宋徽宗时期，与辽、金交涉时的十六州指的就是后者。

(2) 《宋史·食货下一》：“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而赢数不预焉。”

第十七章　西北争夺战（公元982—公元1085年）

保存至今的好水川战场上依然尸骨凌乱，诉说着当年宋夏百年战争的残酷。

北宋在与西夏边境一共设置了六个（行政区划）路，六个路中，一共形成了四条进攻线路，其中鄜延路和泾原路境内的两条进攻线是最常用的。

宋仁宗时期的宋夏战争，均以北宋惨败收场。其中发生在泾原路的一系列惨败让皇帝痛定思痛，决定改革。但只坚持了一年改革就不了了之，停战后，皇帝和大臣又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宋夏战争还导致了一种新型货币盐钞的产生，由于政府总是缺钱，只好以政府垄断的盐为信用，设计了复杂的机制发行纸质凭证。盐钞在北宋曾经作为纸币使用，到末年却由于政府发行过量而沦为废纸。

宋神宗时期最大的一次对夏协同战有过成功的可能性，一共动用了五路大军，沿着宋、夏四条交通道（前两路共用东部通道）发起进攻。却由于宋军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而拖延、失败。

与西夏的战争消耗了北宋大量的财政，却总是徒劳无功。西夏对于北宋的拖累远超辽国。

清晨，士兵们正在做饭。他们在一个红色小山岗的侧面支了灶。灶火上，陶罐里正冒着热气，小米粥的香味引得人食欲大开。

就在这时，四周突然响起了号角，西夏人如同水泼一般从小山的背后冒出来，借着地形优势从高处冲下。正在做饭的士兵们手忙脚乱地寻找着武器，面对凶恶的敌人，准备不足的他们经历了一场大屠杀。

很快，宋军士兵就溃散了。他们的尸骨七零八落地散布在这座小山周围。陶罐里还在冒着热气，灶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只是，再也没有人

回来享用了。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这个战场很久都没人收拾，那个陶罐就一直放在那里，直到里面的粥都干了。尸骨和陶罐被埋在地下破成了碎片，干了的粥继续碳化。

直到九百七十四年后，我来到了古战场，发现了那个破碎的陶罐。在碎片内部，有一些非常轻的黑色物质，经过仔细辨认，能确定那就是当年没有喝完的粥。在陶罐旁还散落着许多尸骨的碎片，它们属于那些死去的宋军战士。

公元2015年，我前往固原去寻找一个新发现的宋夏战争古战场，虽然经过了一千年，北宋将士的尸骨仍然历历在目。

从甘肃省东南的平凉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有一条从关中通往西北的大动脉。从平凉向西，就进入了充满黄土台地和沟壑的六盘山区。泾河通过一个叫作弹筝峡的峡谷奔流而下，先是向南，遇到六盘山后改为向东经过平凉。

在秦代，这里有著名的关中四塞之一——萧关。

秦代萧关的具体位置已不可考，但大致位置就在弹筝峡形成的河谷某地，现代人在泾河拐弯的附近修筑了一个类似于关口的建筑，算是一种纪念。

过了这个现代人修建的萧关，有一座秦汉时期著名的朝那古城，如果继续向前，则是现代的固原城。固原曾经是秦代的边关，著名的秦长城就在这里通过，至今仍然保留着其庞大的身影。

从固原坐车向西到达西吉县，这个县和北方的海原，加上固原，在现代被称为“西海固地区”。由于雨水稀少，是著名的贫困区，进入了联合国名册。对于古迹，雨水稀少反而是一种幸运，正因为这样，固原地区才保留了如此众多的古迹。

西吉县向南，一条叫作葫芦河的河谷经过一个小镇——兴隆镇。新发现的古战场在距离镇政府南方两公里的张家堡子。葫芦河与一条支流

（名叫好水川）在这里相遇，两水交叉处的旁边有一座红色的小山，被当地人称为红岗。

红岗在近一千年前曾经目睹了一场大屠杀。当年，西夏王元昊把指挥中心设在了红岗之上，宋军从好水川谷地西行，在进入葫芦河谷之前，与西夏人遭遇，大败。

这场战役之后，红岗再次变成了一座无人过问的荒山。甚至人们都不知道当年战场的具体位置。直到现代人发现了大量的枯骨，才意识到这就是当年好水川战场的所在。

如今，在一面现代人掘土产生的断崖上，能看到大量的白色人骨，头盖骨、股骨、脊椎骨散乱地丢弃在地上。在战场所在的地层上，随眼可见大量的陶器和瓷器的残片，或许当年的宿营地就设在这里。

那个破碎的陶罐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本章开头的战斗场景来自我的想象，历史记住的只是：宋军全军覆没。没有人关心他们在死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把陶罐残片、黑色物质以及将士的尸骨搜集起来，拍了照片，用土简单埋葬，纪念这些死于近一千年前的戍边战士。

在好水川战场北方数十公里，还有另一处宋代的遗迹——黄铎堡。在北宋时期，它叫平夏城，是当时的边关要地之一。在平夏城遗址附近曾经出土过西夏士兵的尸骨，与几十公里外的宋军尸骨一并诉说着战争的残酷。

除了好水川和平夏城，北宋著名的定川寨之战也发生在附近某地，但现代人已经不知道定川寨的具体位置了。

这些当年的古战场，只是一场百年战争的一部分。西夏作为北宋最难对付的敌人，从建国开始就与北宋纠缠厮杀，直到北宋灭亡，才因为双方不接壤了，不得不落幕。

西夏战争是陕甘宁地区近代之前最后一次影响全局的战争。北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转移，陕西、甘肃已经落后成为华北和江南的附属

品，但小小的西夏却依靠着凶猛的战斗精神和对于战略的精准把握，硬是成了北宋（在女真人出现之前）最难缠的敌人。

宋夏的四条进攻线

谁也没有把一个小小的叛乱分子当回事。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党项人李继迁打出造反的大旗时，没人想到他会成为北宋王朝的心腹大患。

西夏的起源，按照史书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的皇族拓跋氏。实际上，它可能与川西甘南地区的羌族人有血缘关系。在唐五代时期，党项人一直是活跃在西北的一支重要势力，分布在如今的陕西西北、宁夏等地。

宋太宗时，党项首领李继捧向宋称臣，留在了京师。宋朝派遣官员统治党项人的居住地。

李继捧归顺宋朝时，他的弟弟李继迁居住在银州（现陕西省米脂县境内），宋朝派员接收银州时，李继迁不合作，率领几十人逃往了茫茫北方。在如今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有一个巨大的沼泽地，叫地斤泽，这里成了李继迁的根据地。

李继迁和他的儿子李德明或战或降或叛，在不经意之间，攻克了宁夏、甘肃、内蒙古境内，以及陕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在西北形成了割据。北宋前往讨伐的军队即便能够暂时获胜，却无法阻止李继迁的渗透。对于宋军来说，他们的进攻是点状的，而李继迁在西北的势力则是面状，以点控面，最终必定无法成功。

和北宋边界稳定后，党项人已经将北宋西北的土地尽数掠走。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带，在灵州（现宁夏灵武）和兴州（现宁夏银川）地区，也就是如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腹心地带，向西占据了河西走廊，向东到延安以北和以西地区，向南则抵达宁夏固原以北，以及甘肃兰州附近。

在青海地区，分布着一些吐蕃族的部落，他们保持着与北宋的友好关系，为了切断吐蕃部落与北宋的联系，夏人还进军到甘南地区，这里也就成了西夏人入侵的最南端。

当西夏的崛起成为事实，宋军开始采取守势，在西北边境地带建立了一系列的堡垒进行防御。

北宋在陕西地区（包括甘肃、宁夏）主要有六个路，每个路以管辖的两个最主要城市命名，分别是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兰会路、熙河路、秦凤路。

鄜延路以鄜州（现陕西省富县）和延州（现陕西省延安）为中心，是对夏的最东部的前线地带。环庆路以环州（现甘肃省环县）和庆州（现甘肃省庆阳）为中心。泾原路以泾州（现甘肃省泾川）和原州（现甘肃省镇原县）为中心。兰会路以兰州和会州（现甘肃省靖远）为中心。熙河路以熙州（现甘肃省临洮）和河州（现甘肃省临夏）为中心。秦凤路以秦州（现甘肃省天水）和凤州（现陕西省凤翔）为中心。

在这六路中，又实际上包括了四条宋夏对峙的军事线，也就是西夏攻打宋军的线路。

第一条在鄜延路境内，也就是从陕西的正北方，以延安为中心，经过陕北的大沙碛（北宋称为旱海）进攻银川。

第二条在环庆路，以环州为中心，从青刚川（现环江，黄河支流）直下，向黄河挺进，进攻银川。

第三条是从泾原路出发，经过镇戎军（现宁夏固原），沿鸣沙川（现清水河，黄河支流）向黄河挺进，到中卫再向北进攻银川。

第四条在兰会路境内，从兰州出发，沿黄河直捣银川。

至于秦凤路和熙河路，相对更靠南，从这两路前往西夏，往往要先经过泾原路或者兰会路，所以陕西六路一共有四条进攻线。

离开这四条线，从西夏到北宋的边界就要经历一系列的山脉和沙漠。在北方河西走廊，是巨大的祁连山将西夏与北宋、吐蕃隔开；黄河与河西走廊之间则是广大的沙漠地带，无法通行。在南方则有六盘山、横山组成的陕北山脉，将关中平原与陕北沙碛隔开。在机器时代之前，这些地方除了固定的山口之外，人类要想穿越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在这四条进攻线中，尤其以鄜延路进攻线和泾原路进攻线用得最多，这两条路开通得最早，也是西北通往关中平原的最主要通道。在面对西夏所在的银川地区时，更是千里跃进的最佳位置。宋夏战争的发生地，大都在鄜延路和泾原路所在的范围内。

引发改革的惨败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起用一位刚从战场上回来的重要朝臣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并由他负责组织宋代第一次重要改革——庆历新政。这位大臣就是范仲淹。

在仁宗时代，北宋的经济发展恰好达到了最高峰，皇帝也个性宽容，生活节俭。那么，到底是什么动力让仁宗下决心推动改革呢？

原来，五年前，北宋经历了一次战争危机。危机所带出的问题，使得仁宗痛下决心进行改革。

这次军事危机，就是由西夏王李元昊引起的宋夏战争。

在宋真宗、宋仁宗时代，北宋和西夏的关系有过一段时间的缓和。当宋辽澶渊之盟达成后，北宋社会和平稳定，经济高速发展。

但是，到了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西夏人的领袖已经换成了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与祖父和父亲不同，李元昊更加果敢大胆，他不仅进攻甘南，切断了北宋与吐蕃人的联系，还大胆地要求与宋、辽平级，自称皇帝。

李元昊割据时，北宋还能够接受和忍耐，他一称皇帝，立刻触到了北宋的忌讳，双方爆发了严重的军事冲突。[(1)]

西夏最初的军事攻击点设在了鄜延路所在的延州（现陕西延安）附近。公元1039年和1040年，接连两年，西夏大军虽没有攻陷延州，却屡次击败宋军，俘虏宋将。北宋在屡屡吃亏之后，派出了一批较为能干的大臣守边，包括泾原秦凤路缘边经略安抚使夏竦，以及他的副手韩琦和范仲淹。

由于延州是西夏打击的首要目标，所以范仲淹前往延州组织军事。他加强了军事管理和训练，改掉了以前边关将士散漫的作风，又重视军粮的征集和运输，为战争打下了后勤基础。北宋习惯在国境线上修筑大

量的堡垒，形成链条互保，守卫边境。范仲淹也整顿和修整了各个堡垒，加强了边关的警戒和防卫。

经过范仲淹的大力整治，延州的防御有了较大的改观，西夏人从延州进攻，已经很难再占到便宜。这时，李元昊改变了进攻方向，开始频繁地向固原所在的泾原路进攻，由于环庆路距离泾原路较近，也受到了进攻的波及。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下半年，转而进攻泾原路的李元昊再次战胜了宋军，这次的战争地点在三川寨，三川寨位于镇戎军附近，夏军的进攻杀死了宋军五千人。

为了应付夏军的进攻，宋仁宗决定采取攻势。但宋军的攻势却由于皇帝直接插手指挥权，以及各个将领之间的协调失误，屡屡无法推出，反而是李元昊的反攻接踵而至。

宋太祖为了防止将领擅权，将军事训练和指挥权切割成碎片，授予不同的将领。这种传统让宋代的军事行动总是迟缓，将领们互相成为对方的负担，在战场上无法做出快速响应。

李元昊进攻泾原路，这里归韩琦负责。韩琦派遣镇守环州的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率领九万八千名宋军从环州出发，前往镇戎军，与泾原军配合作战。这批士兵肩负着截断元昊后路的重任，等元昊回师时将其击破。

任福率军来到了六盘山区，他的军队顺着两条平行的谷地前进，两条谷地相距数里，各有一条小河流淌其中，其中一条就是好水川。

任福率军沿好水川前进时，西夏王李元昊已经率领精兵等待着宋军的到来。任福原想出其不意打伏击，却落入了对方的伏击圈中。此刻，由于长途奔袭，宋兵已经人困马乏，粮食不继。

就在任福率领先锋军来到好水川和葫芦河交汇的河口时，突然间，有人发现几个泥盒，里面有响声。任福打开盒子，从里面飞出百十只鸽子。随之西夏的伏兵四起，任福才知道中了埋伏。宋军在仓皇间拿起武器迎战，却无法阻止事情变成一场大屠杀。

葫芦河是一条从如今西吉县流向南方的河流，好水川是它的一条支流。在好水川口，红岗小山如同堡垒般镇守在这里，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西夏士兵十万人埋伏在红岗的两侧，在旗帜的指挥下，从山后冲出，顺着地势从高处冲下，将宋军阵营击溃。

在屠杀中，任福身中十余箭，换了三次马，最终死于阵中。他死后，夏军转而攻击宋军的后续部队。整个战斗结束时，宋军死亡一万零三百人。

好水川之战，是宋夏战争中最令人震惊的屠杀。在好水川之前，宋军还有士气与西夏决一死战，并寻找主动出击的机会。屠杀过后，宋营里的求和声逐渐高涨，并最终取代了主战派，成为主流。

好水川之战后，李元昊转兵东方，从北方绕过了范仲淹所在的延州，想去进攻与山西交界处、极北方的丰州、府州和麟州。这三州都在陕西、山西交界处，位于黄河几字弯的右上肩部，是从北方前往山西的要道，也是宋、辽、西夏三国的边境地带。

在夺取了丰州后，乘着北宋调兵遣将时，李元昊又千里跃进，转回泾原路，继续在固原盆地进行打击，在固原以北的定川寨击败了宋军，杀死将近一万人。宋军指挥官、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也被杀。

定川寨与好水川，成了宋夏战争中起到决定意义的会战。到这时，宋朝已经没有决心继续打仗，双方的议和随即展开。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条约以类似于宋辽的方式，由北宋支付一定的钱款换取与西夏的和平。最终议定北宋每年送给西夏银七万两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

与此同时，辽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经过谈判，北宋对辽的岁币在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基础上，再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2)

由于战争的屈辱，宋仁宗决定重用范仲淹，发起了著名的庆历改

革。改革的重点是：减税、减少冗兵冗官、提高军事和行政效率。

然而，由于宋太祖设计制度时，就从基因中注入了防范官员反抗的机制，这个机制本身必然产生相互制约和冗官、效率低下。所以范仲淹的改革措施得不到官员的真心拥护，庆历新政持续了一年就失败了。

新政的失败导致了朝廷上下普遍的失望感，也丧失了渐进式改革的最佳时机。随后上台的王安石开始了激进化改革，所引起的党争最终毁掉了北宋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仁宗时期的军事危机，成了北宋改革和失败的催化剂，从而改变了历史轨迹。

与西夏的战争还引起了另一项影响人类的重大变革——盐钞。为了作战，北宋政府需要大量的钱财充作军费，但朝廷又拿不出这么多钱。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一位叫范祥的太常博士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困扰中央政府的军事财政问题。(3)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各种专卖制度的高峰，盐、茶、香药、奢侈品等都只能由政府专卖，类似于现代的国有企业。而专卖的钱，就作为政府财政的补充，用来养官和打仗。

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只能由政府买卖，就成了社会都乐于接受的商品。但是，即便是大商人也很难搞到盐，因为政府不允许。

范祥提出，可以由政府配给商人一部分盐，让商人去卖。不过这是有条件的，要求商人帮助政府解决军事后勤问题，把军队急需的钱、粮食等，自己组织人力运送到边关，由边关发给凭证（可以称为盐票），证明他送过来多少货，就发多少盐票。商人再拿着这个盐票到山西运城的盐池里去换盐。

由于商人们都很喜欢盐，他们都乐于通过向边关输送物资来换取盐票。后来，人们就给这种盐票起了个名字，叫盐钞。再后来，盐钞甚至可以当钞票使用。有盐钞的人不一定要去换盐，他们只要用这张纸，就可以换来所需要的其他商品。这样，盐钞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纸钞。

当北宋政府发现盐钞可以当纸币使用后，就偷偷地发行了很多。结果，盐钞的数量超过了人们对盐的需求，造成了盐钞的贬值，这就是北宋的通货膨胀。北宋灭亡时，盐钞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

不过，盐钞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特殊的纸币实验，仍然值得现代人研究和借鉴。这也是宋夏战争带来的一个副产品。

失败的协同战

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最后一次大战，发生在宋神宗改革的时代。皇帝为了扭转积弱的现状，利用王安石发起变法运动，对财政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由政府控制各个经济命脉，并以计划经济、国家参与的方式，来谋求财政最大化。王安石认为，当经济中加入一定的计划因素，由政府控制之后，能够提高生产率，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作为现代计划经济的鼻祖，王安石的改革也以失败告终，并形成了内部官僚系统的党争，使得中央政府的分裂倾向更加明显。为了增加内部凝聚力，宋神宗决定对外发动战争。

早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在宋国将领王韶的策划下，宋军从西夏人手中收复了甘肃省西部和南部的河州（现甘肃省临夏）、岷州（现甘肃省岷县）、宕州（现甘肃省宕昌）、洮州（现甘肃省临潭）、叠州（现青海省同仁）。这些州是当年李元昊为了切断北宋和青海吐蕃人之间的联系而攻克的。当宋军夺回五州之后，就断掉了西夏的右臂，也恢复了与青海的联系。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宋神宗制订了详细的北伐策略，这次策略以五路大军，从不同的方向进攻西夏的灵州，待会师之后，再进攻距离灵州不远的西夏首都兴州。

在北宋历史上，这次进军是最有可能获得胜利的对夏进攻。它的战略完备，利用了几乎所有与夏相接的通道，动用大军三十多万，民夫也使用了十多万，执行力度也达到了北宋能够组织的极限。

五路大军分别是：第一，在东面，由著名将领种谔率领鄜延路的士兵五万四千人，再加上另外三万九千人，从延州出发，向西北方的灵州进军。

第二，由于担心种谔兵力不足，又派遣了另一路人马，由大将王中正率领，共六万人，从山西省太原出发，越过黄河进入陕西北部，与种谔会合后一同进攻灵州。

第三，在中部的环庆路，派遣大将高遵裕率领八万七千人，沿着环江向北直接攻击灵州。

第四，在环庆路西面的泾原路，派遣大将刘昌祚率领五万人北进。根据命令，刘昌祚应该受到高遵裕的节制，与高遵裕会合后，再一同进攻灵州。

第五，在最西面，由李宪率领熙河路和秦凤路的士兵，向兰州和会州进军，沿黄河北进，进攻灵州。

这五路大军将宋夏之间的四条道路都囊括在内，又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和配合关系，让敌人顾此失彼，从而达到共进的目的。

在进攻初期，虽有一些意外，但整体的进军情况又令人满意。所谓意外，指的是东面两路大军的遭遇。种谔本来应该直接进攻灵州，向西北方前进，但是，为了与从太原出发的王中正配合，他不得不首先向北进攻银州、夏州等地，这就偏离了向灵州的方向。

但令人欣慰的是，种谔虽然偏离了方向，在进攻米脂寨（现陕西省米脂）的过程中却斩首夏军八千人。夏军溃败时，尸体充斥着城外的无定河水。这是北宋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大捷，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种谔也乘机兵进夏州东南方向的石州。

在最西面，李宪的推进也极为顺利，他率领的大军兵向兰州和会州，并顺利地攻克了会州。

宋军的另一次大捷是泾原路的刘昌祚带来的，他率领人马北上，沿着清水河谷，到达磨脐隘后，遇到了西夏的军队。由于西夏军队预料到宋军会从环庆路和泾原路方向进攻，所以在这里布下了重兵。刘昌祚不惧与西夏的主力作战，一番鏖战后获得了胜利。在如今的宁夏，沿着清水河从固原前往中卫的路上，还有一个地名叫大战场，就是当年宋军与西夏交锋的地方。

在五路大军中，最不利的是从太原进军的王中正，以及从环庆路进军的高遵裕。

王中正率领的太原军到达陕北时，已经落在了种谔的后面。种谔一路上大砍大杀立功很多。由于将士们的军功主要靠砍人头的个数计算，外快则主要来自掠夺，王中正晚到后，既找不到人头，也没有战利品，于是开始四处出击，以掠夺为目的作战。这不仅耽误了进攻灵州，还导致了军粮匮乏，士兵开始饿肚子了。

高遵裕本来是刘昌祚的指挥官，节制环庆和泾原两路军队，但刘昌祚在磨脐隘获胜后，继续北进，进攻了鸣沙（现宁夏中卫），获得了大量辎重，然后进攻到灵州城下，距离最终目的地兴州已经不远了。刘昌祚是第一个进攻到灵州的将领。高遵裕落在了后面，既缺乏粮食，也无力作战。同时，他还怕刘昌祚提前攻克了灵州，抢了他的军功，又下令刘昌祚慢慢攻打，刘昌祚被迫在灵州城外等待上司的到来。

在等待中，电光火石之间，机会已经过去了。

由于超过了预定时间，把粮食吃光了，东路军还没有接近灵州，就出现了食物匮乏。首先崩溃的是王中正从太原而来的部队，这支部队纪律最坏，四处掠夺，却仍然无法解决粮食问题。随后，种谔的部队也被王中正拖垮了，两支东路军在饥饿中被夏军击溃，成为溃军奔向延州。

李宪顺利到达了兰州和会州之后，接下来的进军却无法前行，被阻止在会州一带。

高遵裕继续北行，与刘昌祚会和。然而，高遵裕首先想的不是打仗，而是如何与刘昌祚争功。两人冲突越来越大，高遵裕甚至差点儿将刘昌祚斩首。在内斗中，攻克灵州也成了空话。不仅无法继续进攻，还只得撤回。

这次协同战以不协同而告结束，也反映了北宋军队中复杂的关系，一个将领要应付的不仅仅是战场，还包括与同僚的争执。在某些时候，最凶狠的敌人不在战场的对面。

接下来的两年，西夏的反攻让宋军丧失了灭夏的可能。于是，双方再次回到了打打和和的地步。这种偶尔间断，又一直处于摩擦中的状态持续到北宋末年。大量的物资被消耗在宋夏前线。

直到最后，金国的出现结束了北宋的痛苦，接手了与夏的国境线。

(1) 《宋史·夏国传》。

(2) 《宋史·仁宗纪》《宋史·富弼传》《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3) 《宋史·食货志下三》。

第十八章　变换的北方防线（公元1115—公元1208年）

宋高宗放弃北方四都的那一刻，也就放弃了整个北中国，注定只能成为偏安的南方政权。由于地理的制约，一个王朝一旦退到南方，几乎没有再回中原的可能。

与辽国不同，金人和蒙古人有意避免完全汉化，希望保留好战的血统，对中原文化虽然向往，却有很强的防范之心。

金灭辽的过程中，北宋本应该帮助已经文明化的辽国防御金军，让辽国当作中国的北方屏障，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冲击。却由于童贯等人的主张，北宋采取了海上之盟，与金人瓜分了辽国。

海上之盟包括两部分：明的条约与暗的口头协议。即便条约能够遵守，口头协议却在不断变化。这也预示着双方不可能完全遵守条约。一旦金国了解了十六州的价值，协议必然无法执行。

毁约的首先不是金人，而是北宋，这给了金国更多的借口，在攻灭辽国之后转而进攻北宋。

金国的进攻策略：西线从大同经过太原、上党直下河南，东线从幽州经过河北直下汴京。两路军之间通过太行山孔道进行协同，并在汴京完成会师。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尽快赶到北宋首都。

汴京之围和北宋灭亡，更凸显了北京和太原的重要性，表明这两点是中国防卫北方民族的关键点，一旦失去，就要受到惩罚。

宋高宗撤往南方后，在宋、金的政治核心区域之间，有一千多里的空白区域（从北京到扬州的距离），金军实施打击，必须首先克服地理上的距离，当他们行军一千多里后，已经进入了疲劳期，难以完成致命一击。金军由于政治落后，无法在空白区域内形成有效占领，导致他们不可能缩短进攻线，也无力灭亡南宋。

一旦国家内部出现困难，就容易借助对外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但由于内部矛盾必然导致无法组织起高效的战争财政，这样的战争也必然以失败告终。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国将领金兀术（完颜宗弼）进行了一次令人吃惊的远程进攻。此时，金朝已经灭亡了北宋，是对宋高宗赵构建立的南方政权进行打击的时候了。

此时宋高宗赵构的宫廷还没有来得及撤到后来的杭州行在所，而是在长江北岸的扬州停留。

金人灭亡北宋后，由于无法控制庞大的疆域，曾向北方撤回了兵力。其实际控制区只到达河北地区和山西太原一带。至于东京汴梁、西京洛阳，以及江淮等地都还在宋军手中。宋高宗的大臣们曾围绕着一个问题争吵不休：到底皇帝应该留在北方，还是南下躲避？

宋高宗没有受制于大臣，他认定开封、洛阳都不能待下去，选择了南方的扬州作为落脚点。扬州地处长江北岸，是大运河的重要停靠点，进可以去淮河流域，退可以渡过长江图保江南，是个不错的选择。

金人撤往北方整顿完毕，再次挥师南下，他们派出三路大军，分别从陕西、山西和河北出击，向南方进军。其中东路军在完颜宗辅的率领下，从河北进入山东劫掠，与宋军大战于山东地区和淮河以北。

鉴于形势，宋高宗的大臣们开始讨论皇帝撤往江南的可能性。但由于战线还在淮河以北，朝廷迟迟没有行动。

但突然间，完颜宗辅派出一支五千人的骑兵部队，由金兀术指挥，昼夜兼程向扬州进袭。

正月二十七，金军从东平一带出发，三十日，五千骑兵已经到达了淮河上的临淮（现安徽省泗县境内）。金军都戴着白毡的斗笠，与宋军装束完全不同。但宋军的守军并不认识金军的装束，还以为是山东地区的溃军。直到抓到了几个骑兵，才发现是金兵。守将一面派人向扬州汇报，一面阻止金兵渡河。但哪能阻止得了，金兵当天就渡过了淮河，继续南下。

也是在当天，宋高宗得到了汇报，皇帝命令大臣开会讨论。大臣们带着不相信的神色，嘲笑着情报。但不管怎样，朝廷终于动起来了，开始搬运行李，为向江南逃跑做准备。

二月初一那天，宋高宗乘着御舟在运河上转了一圈。突然间，人们发现了皇帝，以为他要逃走，整个城市如同爆炸了一般。为了平息民情，高宗决定暂时不离开，而是派人偷偷地把国库的三分之一搬上了船。从扬州上船后，必须先走一段运河，到达瓜州渡口，才能进入长江。虽然长江宽阔，但运河里只能容下一艘船的宽度，大量船的涌入，立刻拥堵了河道，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二日，金兵到达天长以北，宋军闻风而逃。三日，金兵终于逼近了扬州。此刻，宋高宗还在派人侦查金兵的动向，当侦查人员带回消息说金兵已经到达时，他连忙穿着甲胄骑上马，抛开了臣下，向扬州城南逃去。

在路过城内街道时，有人认出了皇帝，大喊官家跑了！城内大乱。大臣黄潜善是当初力主逃到扬州的人，人们对黄潜善恨之入骨，想乘机杀了他，却错杀了另一位大臣司农卿黄锷。

由于运河河道堵塞，皇帝先从陆路向长江上的瓜洲渡口逃窜，再登船直入长江，终于在金兵到来之前上了一艘小船，赶到了长江对岸的京口（现江苏省镇江）。京口的军民听说金兵来了，也逃得精光。由于没有被子，皇帝夜间只能睡在一张貂皮上。

当晚，金兵追到瓜州，由于无船渡江，才不得不目送宋高宗离开。

在扬州的运河中，由于船只的阻塞，大量的宫廷物资无法及时运出，都被金兵截获。瓜州长江岸边，十万民众聚集着等待过江，近半的人死在了江中，即便侥幸渡江，也都支付了昂贵的费用。金兵来后，更有人相拥投水而死。长江边上也堆满了金银珠玉，被金兵掳掠。

在扬州城内，则是另一番景象。那些不打算逃走的人为了存活，早已忘记了宋朝的故事，张灯结彩欢迎着金兵的到来。

欢呼的另一面，是那位越逃越远的皇帝，他不敢在六朝古都的南京

停留，继续向东南方，逃到了临安（现浙江省杭州）才收步，收拾这残破的江山。而遥远的北方，早已经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了……

是是非非海上盟

北宋与辽和平共存了一百多年，原因在于契丹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从唐代开始，契丹就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中原充满敬畏。即便五代分裂时期，契丹人也更多是中原的帮手而不是对手。

在与石敬瑭达成的燕云十六州交易中，契丹人承诺通过帮助石敬瑭取得中原，来获得十六州的统治权。在达成协议后，契丹大军从太原南下，帮助石敬瑭击溃了后唐在山西南部的守军。还没有过黄河，契丹君主就对石敬瑭说：大局已定，就不陪你进军河南了，作为异族人如果前往河南，会引起当地百姓的惊骇。

他们承诺会待在山西继续观察战局，一旦石敬瑭河南战线不利，就挥军去救他。直到石敬瑭获得了洛阳，他们才北返。北返前，还嘱咐“世世子孙勿相忘”。

从这些举动来看，契丹并没有野心并吞中原。在宋辽战争过后，一旦与北宋达成了和解，就满足于每年获得那些岁币，不再南下。

与契丹相反，北方的女真人和蒙古人都没有对中原政权报太多的尊敬。他们对北宋的评价采取了另一个标准，崇尚马上打天下，对于所谓的经济和文化更加轻视，甚至认为文化会使一个民族软弱。

从完颜阿骨打祭起对辽国反叛大旗的那一天，女真人的顽强和野蛮就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从北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女真反叛，到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金灭辽国，只用了十一年时间。

辽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不稳定。在燕山以北的关外地区，女真人对地理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辽国，而在燕山以南，辽国只有幽州周边的数个州，也容易探查。

辽国的国防线以防卫北宋为主，是朝南的，在幽州和云州（大同）以南布置了重兵堡垒，而在辽阔的关外北方，控制力却很弱。

金兵在关外扫荡时，辽国的重兵仍然在北京和大同，即便这两个点对北方的防御也是薄弱的，特别是大同，由于处于塞外，从北方到大同没有太多阻隔。北京由于有燕山阻挡，相对进攻难度大一些，成了辽国最后的守卫地。一旦北京失守，辽国就只能向西北方逃窜了。

金国作战的顺序是，首先从阿骨打起兵的最北方——松花江嫩江流域进攻辽国的宁江州（现吉林省扶余），占据了如今吉林和黑龙江境内的北方领土，再南下辽宁，进攻辽东，随后转向辽西。

辽国设立了五个都城，分别是：东京辽阳府、上京临潢府（现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中京大定府（现内蒙古赤峰境内）、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现北京）。金国人从东向西，首先攻克东京、上京，再获得了中京，将辽人压往了与汉人地区接壤的西京和南京。

在最后两京中，由于燕山山脉阻隔，金军首先进攻西京，最后再兵向南京。辽国残余部队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逃往了如今的新疆西部和中亚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西辽（也叫喀拉契丹）。西辽最终被蒙古人的敌人屈出律灭亡，又成了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当金军灭亡辽国时，北宋朝廷却经历着一场大辩论：到底是与金军一同瓜分辽国，还是帮助辽国防御金军？

主战派以当时的枢密使童贯为代表。童贯的主战可以追溯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当年北宋派员出使辽国，出使的大臣是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和大太监童贯。童贯虽然是太监，却掌管枢密院，是朝廷的军事重臣。在辽国，童贯认识了一位叫作马植的人，因为在辽国受到排斥，马植结交了童贯，谋求对辽国的报复。他透露辽国已经很孱弱，建议北宋做好攻伐辽国的准备。

童贯将马植带回北宋后，马植改名李良嗣。到了金人开始攻辽时，李良嗣通过童贯向皇帝建议，与金国联合进攻和瓜分辽国。他的提议得到了童贯的大力支持。

由于宋金不搭界，北宋使臣必须从渤海坐船，才能到达辽宁境内金

国的领土，所以双方的结盟称为海上之盟。

双方约定从南方和北方共同夹击灭亡辽国，北宋把给辽国进贡的岁币转给金国，金国同意将燕云十六州交还给北宋。

主战派的提议受到了主和派的反对。

在主和派中，比较典型的是一位叫作安尧臣的官员（他是前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同知枢密院安惇的族子），他上书表示，一个国家的祸端，往往是从和平走向战争的那一刹那。北宋之所以不和契丹争燕云十六州，也是考虑用土地换和平。既然已经维持了上百年，一旦重启战端，往往会得不偿失，让原本已经疲惫的民间更加无法承受。

另外，辽国已经是一个开化、爱好和平的国家，与北宋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个国家虽然称为帝国，其实却是北宋的北面屏障。一旦辽国没有了，换成更加野蛮和勇猛的女真，那么北方就再也没有和平可言了。

宋徽宗最初同意了安尧臣的看法，但随后，在蔡京、童贯等人的主导下，皇帝再次偏向了战争。

就在金军进攻时，金人东面的高丽国派人来求医，宋徽宗派了两名医生去提供帮助。医生带回来的消息：高丽全国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认为女真（金人）是虎狼之国，必须赶快做准备。建议北宋皇帝千万不要和女真交往。

最后，对于收复北方领土的渴望还是影响了宋徽宗，他决定与金人联合。李良嗣（后改名赵良嗣）出使金国，与金军签订了夹攻协议。

其实海上之盟在一开始就有无数的问题。

金国之所以同意这个要求，不是经过认真考虑，而是无知的结果。金国地处偏僻，对辽国充满了仇恨，但对十六州的价值却了解不深，眼中只有辽国北方领土。

可也正因为这样，一旦它了解了十六州的价值，就很难遵守协议。更何况，所谓协议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着的框架，另一部分则是口头协议。十六州中燕山以北的诸州都是以口头协议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口头协议被遵守的可能性更小。

宋金协议如果要执行，只有一个办法：北宋迅速进军，利用金国的无知，加上金军没有反应过来，就收回了十六州。否则必然陷入更大的纠纷之中。

然而这个办法，却在北宋军队的拙劣表演中葬送了。童贯所领导的宋军仅仅攻占了涿州和易州，就被辽军阻挡，无力北进。反而是金人“解放”了大部分十六州。

以幽州为例，这个州原本划归北宋去解放。按照协议，金军不过燕山，燕山以南的州都交给宋军处理。但在进军幽州时，宋军却屡吃败仗，只好求助于金军。金军这才进入关内，兵不血刃获得了幽州。

但到这时，金军仍然是守约的。辽国灭亡后，金国首先交割了幽州和其他六个州（蓟州、景州、檀州、顺州、涿州、易州）给北宋。

只是在守约的大前提下，又勒索了北宋一笔钱作为赎城费。且金国在撤出之前大肆掳掠，带走人口，只留下了空空如也的城市。在山西方面，朔州、应州和蔚州守将向北宋投降，金国还将武州还给了北宋。

但致命的是，通过与宋国打交道，金国已经逐渐了解了天下的广阔和十六州的价值，也知道了赵宋君臣的懦弱与无力。

这个战斗的民族本来还比较严肃地对待政治协议，反而是北宋在许多方面屡屡破坏协议，给了金国足够的借口。

就这样，事情起了变化……

靖康之变：物质文明遭遇部落战争

辽国灭亡后，北宋原本占有了幽州，将防御线推进到了燕山。但由于无力在新获得的几个州实施有效统治和占领，所以宋金战争一开，北宋新获得的各州立刻被金军占领。

原本辽国与北宋对峙的边境线就成了宋金的新边防线。

北宋的防御线主要是依托于河北地区的河流大清河、易水，以及山西地区的山脉恒山、管涔山、句注山，辅以城市防御。河北地区的战略点在霸州、雄州、保州、定州、真定，其中定州和真定是主要驻军区；山西地区的防线设在了蔚州、代州和岚州，最主要驻军区在太原。

如果敌人攻克了这道防御线，北宋就会退到黄河一线。在河北方向，有一系列的城市（大名、澶州、浚州、滑州，以及黄河北方的瀛洲、深州、冀州、邢州、磁州、洺州）作为防御，在山西地区则是隆德府（现山西省长治）、怀州、河阳等黄河北方地带。

宋辽对峙时期，辽国进攻南方的线路主要有两条，分别是从山西大同直下太原、长治，渡过黄河进攻河南的西线，以及从北京出发，进攻河北，渡过黄河进攻北宋首都汴梁的东线。

辽国人在进攻时还往往犹豫不决，到底是选择其中一路，还是选择两路并进？即便两路并进，也总是协调不好两路的关系，无法完成协同。

但金国从一开始，就坚决地选择了两路齐头并进的思路。这一点也展现了金国军事比辽国更加强大，也让北宋猝不及防。

在战略上，金国与辽国也有明显不同。辽国深受中原影响，在战争中强调有效占领，尽量不要在战线背后留下没有被攻占的城市，他们虽然偶尔也采纳纯粹的掠夺式进攻，派军队进入敌人的后方大肆劫掠一通就撤回，但大部分情况下，仍然以占领为目的。

这种战略让辽国倾向于稳扎稳打，不会孤军深入，也缺乏了锐度，无法一击致命。

金国由于是新兴的国家，战略体系还没有成型，反而能够打出孤军深入的经典战役。他们不惜在身后留下众多没有攻克的城市，冒险直达最远方。这种冒险性战略属于部落战争的典型打法。在部落战争时期，只要孤军深入将敌人的部落首领抓住，整个部落随即臣服，战争结束。

金国对北宋采取了类似的打法，却意外地获得最大化的收获：由于北宋皇帝怕打仗，一旦金国孤军深入直捣首都，皇帝就会吓得和谈甚至投降，并主动压制驰援首都的军队；北宋的其他区域虽然屯有大量军队，但很难快速行军救援首都。

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在灭亡辽国的当年，金军兵分两路，分别从东线河北和西线山西进攻北宋。其中进攻河北的左路军（东路军）由南京路副都统完颜宗望（又名斡离不，宋人称之为二太子）率领，进攻山西的右路军（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又名粘罕，宋人称之国相）指挥。

完颜宗望率领的东路军首先进攻的目标是现在北京所在的燕山路（原来的幽州、辽南京）。自从金人将燕山路割还之后，北宋政府就在这里驻扎了大军防卫。如果军事部署能够起到作用，金人就很难越过燕山，从河北南下。

然而，金人从燕山进入檀州、蓟州之后，燕山路守将郭药师（原来的辽人降将）在白河与金人大战失利后，投降了金人，致使北京地区沦陷。

北京沦陷后，完颜宗望长驱直入河北。他们进攻中山（定州），无法攻克。但金军没有像当初辽军一样与宋军相持，而是继续南进，直指北宋首都汴京。经过庆源府（现河北省赵县）、信德府（邢州，现河北省邢台）、邯郸、浚州，到达黄河北岸。

宋军听说金军已经向黄河进发，出现了大溃逃。金军到达黄河北岸

时，不仅北岸溃军已经无影无踪，南岸的士兵也烧毁浮桥逃走了。金军在没有防卫的情况下，花了五天时间，用能够找到的所有小船将骑兵全部渡过黄河。如果宋军能够固守南岸，金军根本没有机会渡河。

金军渡河后，宋军最后的屏障已经失去了。

在完颜宗望兵围汴京时，金军的西路军却在太原受阻，无法与东路军会合进攻汴京。围攻汴京的只有东路军的六万人。北宋以士兵数量著称，常在一百万以上，只算在金兵围城期间，从各地赶来的勤王大军也有十几万人。

最著名的是北宋西北边将、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以及位于西北泾原秦凤路的武安军呈宣使姚平仲。最坚决的主战派则是朝内大臣兵部侍郎李纲。

从数量看，宋军更具优势；从防守看，北宋首都汴梁也有着完整的防御系统；从后勤上看，金军长途奔袭，本无后勤保障。

但宋钦宗却急于与金军达成和议，以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条件，换来金兵北归（三镇并没有完成交割）。完颜宗望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偿，心满意足。

如果皇帝与群臣能够取得一致，坚决抗敌，那么不用多久，金兵如果不北归，也必然会因为孤军深入而崩溃。

东路军撤离后，金军的西路军继续围困太原，围坚打援，击溃了北宋数次援军，并最终攻克了太原。

太原的失守使得金国在西路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在第一次南征中，由于东西两路大军配合出了问题，且西路受阻于太原，无法完成攻克汴京的战略目标。

但由于获得了太原，在第二次进攻时，他们的战略必将更加成熟。

宋钦宗以为金军北归，事情就结束了。但事实上，东路军获得了大

量的赔偿，必然让西路军更加心动。金国的军队还不是兵饷制，而是掠夺制。表面上，皇帝征召军队都是不出钱的，由各个部落自己组织军备，这样使得皇帝基本上没有养兵成本，在财政上极其灵活。但皇帝必须允许士兵在攻克城池后进行掠夺，获得战争收入。东路军在第一次战争中获得了太多的收入，西路军却一无所获，于是完颜宗翰率领的西路军成了坚决的主战派。

不到一年时间，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在完颜宗翰的推动下，宗望和宗翰分别率领东、西两路大军，再次进攻北宋。

他们仍然采用快速打击、略过坚城、闪击首都的方法。

与第一次相比，他们特别注意两路大军的协调，避免像第一次那样，当东路军赶到时，西路军却无法会合。

西路大军首先在攻克太原后，从长治方向过天井关渡过黄河，与此同时，东路大军仍然采取上次的线路进军汴京，两支大军渡过黄河后在汴京城外会合。

北宋朝廷中，此刻主和派又占了上风。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中立了大功的李纲已经被贬到南方任职，另一员大将种师道已经死亡。在死前，他预计到金兵还会再来，向皇帝提出迁都陕西长安，利用潼关天险进行长期抗战。这个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好方法被钦宗否决。

汴京之围，也表明了北京和太原在防卫游牧民族袭击中的重要性。它们只要掌握在南方王朝手中，就封死了北方的进攻线路，一旦两城丢失，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游牧民族直达黄河了。

在一片慌乱中，东京围城战持续了一个月。由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崩溃，外界的援军很难有效组织。加之城内的指挥失误，金军最终攻克了汴京，北宋灭亡了。

金军进攻北宋的两次战役，也诠释了汴梁作为首都的不足。当足够强势的北方军队南下时，由于缺乏天险，对方可以快速渡过黄河，对首都形成围攻。闪击战之下，全国可能来不及救援，首都就已经陷落。

在灭亡北宋的过程中，金军还表现出虚虚实实使诈的天才。即便在宋钦宗投降之后，天下的大势也并没有确定。各地勤王的部队虽然缺乏有效组织，在数量上并不少，康王赵构也举起了反金复国的大旗。

但金军一直给宋钦宗以希望，仿佛他们掠夺过后就会撤退，将江山还给赵氏。满怀希望的宋钦宗配合着金军完成了投降之后的交接工作，甚至压制对金人的反抗。

直到最后，金军才告诉徽、钦二帝，要一网打尽，将两位皇帝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女妃嫔都带回北国。除了已经逃脱的康王赵构之外，两位皇帝的子女全成了俘虏。

金军的做法在部落战争中并不稀奇，胜利者战胜一个部落，便将首领一家带走，换另一个傀儡当首领。失败首领的儿子被迁到受监视的偏僻之地，女儿嫁给战胜者。

根据这种做法，金军把赵氏全部带走，换上他们认为听话的张邦昌当皇帝。两位皇帝和他们的儿子们都可以保全性命（除非死于疾病），被分送到北方各地居住，他们的女儿和妃嫔则嫁给金军将领，或者充当官妓。

但中国并不是一般的部落，皇帝也不是部落首领。在一般的部落里，首领家族并不大，一般几个人几十个人足够了。但要将整个北宋皇族迁走，却造成了一次近两万人的大迁移。在部族传统中，女人嫁给胜利者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华夏民族而言，皇室子女死的死，卖的卖，有的成了蛮人的小妾，有的进了洗衣院（可能是面向皇帝的带有妓院性质的妇女储备中心），却是奇耻大辱。

靖康之耻留给汉人的，不仅仅是失去了两个皇帝，而是华夷失序所带来的哲学崩溃，这种创伤远远超过了徽、钦二帝的寿命，直到现在，仍然被称为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之一。

逃往海洋的皇帝

历史习惯于将徽、钦二帝被金人掳掠当作北宋灭亡的标志，但实际上，两位皇帝被俘并不一定意味着灭国之灾。

虽然金军攻陷了首都汴梁，但要想把占有的土地都消化，却显得困难重重。

作为新兴民族，金国出征时并没有想到，它要征服的是一个面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更没有费心考虑如何去统治这个大国。他们对这片土地和社会都处于极其无知的状态。

两位元帅获得了首都汴梁，却由于无法建立有效统治，只有树立傀儡这一条路可以走。

金国树立的傀儡叫张邦昌，曾经是宋代大臣（担任过少宰和太宰，都属于宰相）。金人北还后，将广大中原留给了摇摇欲坠的傀儡政权。

但在一个拥有着强烈君臣观念的社会，人们对张邦昌的认可甚至还不如对金人。张邦昌也很识时务，他放弃了帝位，迎接唯一没有被带走的徽宗皇子康王赵构当了皇帝。在当时的人看来，除了两位皇帝北狩之外，大宋江山又恢复了，甚至连汴梁和洛阳两个首都也都回到了汉人手中。

金国实际控制的中国土地是极其有限的：在北方，燕云十六州归了金国；在山西，宋朝丢失了太原（含）以北地区；在河北，金国借助占领了燕京的势头，逐渐南向渗透，但实际控制地依然只在北京以南数州，其余地区要么依附于宋，要么处于半独立状态。

宋朝仍然控制了山东、河南全部，山西、河北南部，以及陕西南部（其北部是西夏，不是金控制），所失去的领土并不多。北宋除了首都汴京之外，还有三个陪都，分别是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现河南省商丘）、北京大名府。这四京之地都掌握在宋朝的手中。

在高宗君臣的讨论中，大都贯穿着如何利用大半河山完成抗敌，甚至收复山西、河北北部地区。但有一个核心问题无法绕过：是否迁都？

由于北方领土的损失，汴梁已无险可守，太容易受到打击，不迁都很容易遭受徽、钦二帝的下场。但如果迁都，又影响了士气，意味着放弃了北方。

围绕着迁都问题朝臣分成了若干派别，比如宗泽主张不要迁都，以东京为基地进行抗战；李纲借鉴了种师道的主张，认为可以迁都，但最好迁往陕西地区，利用陕西的天险与金国抗衡。还有人主张迁都应天府（即商丘），商丘是宋高宗即位的地方，仍然属于北方地区，不至于影响士气。

这些人的主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皇帝不要离开北方。不管是东京、长安，还是应天府，都在抗金的前线。皇帝只要留在北方，那么未来收复北方失土就是有望的。

朝廷中还有另一派人主张南迁，他们有的主张迁往东晋南朝的首都建康（现江苏省南京），有的主张迁往湖北的荆州。主张南迁的人一个始终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当朝廷距离北方边境过远时，很可能意味着北方领土的永久丢失。一旦皇帝离开，金国将重新蚕食中国北方，宋金将形成以淮河流域为边境的新边界。到那时，所有的北伐都会成为空谈。

但南迁派手中又有一个王牌：皇帝的安全。宋高宗赵构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经过靖康之变后，皇帝首先要防止的是成为下一个宋钦宗。

争执过后，宋高宗决定迁都南方。他首先退到了扬州，将扬州建成了暂时的首都（在宋代，皇帝暂时驻扎的地方称为行在所，或者简称行在）。这次搬迁也决定了宗泽、李纲等主战派的疏远。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由于在汉境树立的傀儡张邦昌退位，处于军事极盛期的金军再次南下。

此刻，更加了解南方地形的金军兵分三路，对长江以北三个最重要地带进行打击：西路军从山西进入陕西，试图征服这个地处西北的战略要地；中路军在元帅完颜宗翰的领导下，从山西南下，渡过黄河后向洛阳进军；东路军的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和他的弟弟完颜宗弼（又名金兀术）从北京出发，向河北、山东地区扫荡。东路军和中路军又负有另一个使命：南进后，他们将合势再次进攻东京汴梁。

这次，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西路军攻克了长安；中路军攻克洛阳后，继续南向到达襄阳、房州、邓州，并向长江流域施压；东路军则掳掠了山东地区。

但在东京汴梁，老将宗泽成功地组织了东京保卫战，阻止了金军的继续南下。后由于金军的后勤出了问题，三路军都不得不退军，将所侵略的领土尽数让出。战争以宋军的战略胜利而告结束。

这也是金军第一次显出疲态。由于金国是单一民族武装的国家，女真族人口不多，这支武装具有足够的锐度，却缺乏厚度，可以迅速奔袭，却无法维持占领。

当宋高宗撤到南方后，在双方的政治中心之间留下了庞大的空白地带，从河北地区直到黄河，再到淮河、长江之间，直线距离有一千多里，金军每一次发动袭击都必须首先跃进一千多里，才能抵达宋代的新政治中心。而完成跃进后金军已经开始疲劳，进入了衰竭时期。

如果要想克服此处不利，金国必须将前进基地迁往南方靠近淮河流域的地方。但由于金国的政治过于落后，无法形成有效统治，所以很难建立起稳定的政权来控制黄河、淮河地区。

对于金军来说，唯一的机会就是实行闪电战，派出军队进攻宋朝皇帝，迫使他迅速投降，利用皇帝的权威让全国归顺。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守卫东京的老将宗泽去世，金军随即开始了第二次南侵。这次南侵除了与第一次一样兵分三路，分别进攻陕西、河南和山东之外，还增加了机动性要求，在各个将领分兵掠地时，

东路军的完颜宗弼则率领人马直捣扬州，试图在宋高宗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兵围扬州，擒获皇帝。

于是，就有了本章最初的一幕，皇帝在金兵到来之前仓皇渡江，逃过了被俘的命运。由于金兵没有准备渡江，缺乏器具，只得第二次撤军。

但是，此次偷袭扬州将宋高宗吓破了胆，他不仅不再考虑将首都迁回北方、收复旧土，甚至连长江沿岸都认为不再安全，将首都迁往了更加遥远的杭州。

宋高宗迁都杭州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金军的作战臂长很难到达杭州，这也决定了宋金战争将演变成长期的对峙；第二，北宋的彻底灭亡，随着皇帝南迁杭州，北方领土由于过于遥远，相继沦陷。陕西的关中平原，河南的东京汴梁、西京洛阳，河北、山东全境，逐渐被金国占领。双方对峙线向淮河地区南移，形成了以淮河流域为主体的新防线。

由于金国无力统治如此广大的领土，在山东、河南地区又设立了一个新的傀儡——号称齐国的刘豫政权。直到公元1137年金国的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后，才废掉了伪齐政权，对中原实行直接统治。

在宋金对峙转化成长期之前，金军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冬，金将完颜宗弼以山东为基地兵下寿春，向江南扑来。在到达寿春后，又兵分两路：一路向江西境内扑去，追袭位于洪州（现江西省南昌）的隆祐太后（宋哲宗的第一位皇后，也是汴京围城时唯一没有被金军带走的当过皇后的女人）；另一路则走传统的巢淝故道，兵下采石矶，渡过长江后进攻建康（现江苏省南京），再从南京向高宗所在的杭州地区进军，意图一举消灭南宋王朝。

与完颜宗弼大军相配合的，还有西路进军陕西和东路进军淮河岸边楚州的军队。然而，对南宋真正形成威胁的还是完颜宗弼率领的中路军。

扑向江西的金军顺赣江而上，直扑洪州，却由于隆祐太后的南走，没有成功，最后从江西绕道湖南，从潭州（现湖南省长沙）、岳州（现湖南省岳阳），经过襄阳北归。

而完颜宗弼亲自率领的军队，在采石矶渡江，击溃了建康的防务后，迅速南下。一路上由于进军太快，守将根本无法完成防务。当地人即便看到金军，也以为是宋朝的溃军，直到金军射箭进攻，才意识到是金军来了，纷纷逃走避难。

金军到达杭州时，高宗已经逃走，到了东海边上的定海（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在这里，他乘船出海，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第一次为了逃难而到了海上。与唐明皇逃到四川不同，茫茫大海上无法保证后勤，稍有不慎就是死路。由于船只不够，大量的士兵和家属都被扔下，如同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一样。金军一直追到了舟山群岛上的昌国，才由于对海洋准备不足遭到了失败。

这次著名的逃亡，成了南宋挫败金国速胜企图的最后努力。如果金国失败，必定无法再组织起下一次如此巨大规模的远征，双方将进入均势状态，以淮河为界各自统治一半中国。

完颜宗弼撤退时，在如今南京附近的黄天荡遭到了韩世忠的阻击，韩世忠以八千人围困了金兵十万人达四十八天，金兵才由于另掘新的河道而逃走。这次战役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破除了金军不败的神话，也终结了金国军事的上升势头。

金国对河南地区的经营几经波折。由于经营不善，甚至想将汴梁、洛阳、长安地区还给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40年）。由于元帅完颜宗弼的力争，金国才没有这么做。最终，金国不得不在征服的土地上开展政治建设，消化中国北部，即便不情愿，也走上了汉化之路。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2年），宋高宗以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为代价，与金朝议和，维持了以进贡换和平的传统。此前，宋金之间的拉锯战又维持了十年，才以淮河为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新国界。金国获得了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在内的北方地区。这是双方军事实力再平衡的产物，一旦进入均势，就很难再打破。

公元1161年，新夺取帝位的金国海陵王完颜亮率军南侵，试图从采石矶过江灭亡南宋，却遭到了决定性失败，海陵王也在兵变中身死。这时的金国已经如同当年的辽国一样，无力对南宋构成决定性的威胁了。

又到尴尬北伐时

南宋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底，一位饱经风霜的词人匆匆赶往首都临安（杭州）。他满怀激情与希望，因为当朝宰相韩侂胄召他去参与讨论一项重大的事件——北伐。

这位词人叫辛弃疾，出身于山东沦陷区的他在海陵王南侵时曾经参加过敌后游击队。来到南方后，又以激烈的主战姿态著称。

海陵王南侵失败后，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南宋孝宗乘机组织了一次北伐。这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宋金达成了隆兴和议。隆兴和议比起高宗时期的绍兴和议进贡有所减少，却被割去了商州（现陕西省商洛）和秦州（现甘肃省天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后，宋金进入了和平时期，辛弃疾也受到了排斥，不得已回家务农。

四十年后，亟须树立权威的宰相韩侂胄再次祭起北伐的大旗，立刻吸引了辛弃疾的注意。当时，金国北方的蒙古人已渐成气候，金国除了考虑南方的南宋，更要防备北方的蒙古人。韩侂胄显然想利用金国战略地位的削弱，来先发制人。

辛弃疾首先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半年后，皇帝又任命他镇守江南重镇京口（镇江）。在离开绍兴之前，辛弃疾拜访了隐居在绍兴的另一位主战派词人陆游。

陆游此刻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辛弃疾也已六十三岁。在起用辛弃疾之前，韩侂胄首先起用陆游担任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但陆游很快看到韩侂胄军事准备的仓促和花哨，心灰意冷，便离开了朝廷继续隐居。

陆游并没有用自己的情绪影响辛弃疾，而是鼓励他上路。到达镇江后，心怀壮烈的辛弃疾登上了镇江的北固山。

如今的北固山已经成了著名的风景区，这座在长江边上的小山是三国时期孙刘联姻的所在，也是历代长江攻伐的见证者，在山上还有吴国大将太史慈的墓葬。

距离北固山不远，就是著名传说“水漫金山”的金山所在。从山上向下望去，长江如同一条巨大的飘带横亘于北方。站在山顶上的北固亭里，辛弃疾写下了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了对于北伐的渴望，又表达了对于韩侂胄北伐仓促的忧虑：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显然，他也和陆游一样，看到了韩侂胄北伐中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韩侂胄之所以想北伐，是为了用这个不世功业来替自己涂粉。但所有人都被他的草率与仓促吓住了。

韩侂胄一方面大搞内部政治斗争，排除异己；另一方面，却没有做太多军事准备，将帅任用不当，士兵没有经过严格训练，马匹不足，军事后勤工作也没有做，山寨堡垒都处于荒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北伐必然引起极大的麻烦。

即便辛弃疾和陆游这样的主战派，最后也被排挤，不受重用。于是，这场北伐的效果就可以想象了。

不过，即便脱离当时人们的思维局限，从更大的战略角度出发考虑，也会发现，即便充分准备，南宋仍然没有成功的可能。很大原因，就在于从南往北进攻的难度太大，南方缺乏地理上的战略支撑点，而北方只要占据了关中地区、山西、北京，就很容易在华北平原地区和淮河流域拖住南方的进军步伐。

如果要想克服这个地理上的劣势，必须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而南

宋根本称不上军事优势。虽然金国的军事能力也因为北方蒙古的崛起而大受影响，但仍然优于南宋。更何况，由于韩侂胄的内政，南宋的经济和金融正处于困难时期，更加大了北伐的难度。

最终，开禧北伐成了一场儿戏，宋军还没有打到中原地区，在淮河和襄阳一线就崩溃了。

为了满足金人的议和要求，宋宁宗不得不杀掉了韩侂胄。幸运的是，这次和议，金国只要求增加岁贡和战争赔偿，没有要求割地。这使得南宋政权又苟延残喘了七十年才最终消失。

金人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他们想及早结束与南宋的冲突，好把力量用在北方与蒙古人的对抗上。金国虽然获得了对南宋的胜利，但它只存在了二十六年，就被蒙古人灭亡了。

第五部　帝国时代
（公元1179—公元1911年，元到清）

第十九章　成吉思汗眼中的世界（公元1179—公元1449年）

蒙古人是世界上最擅长迂回和奇袭的民族，在历次战争中，将迂回攻势运用到了极致。比如夺取金国中都（现北京）、灭金之战、迂回大理进攻南宋、迂回布哈拉包围撒马尔罕，都属于迂回战的最高境界。

蒙古本土的地理由三座山脉组成，自东向西分别是肯特山、杭爱山和阿尔泰山，这三座山脉之间有许多山间盆地，适合各个部族居住。成吉思汗在蒙古的统一，就是依托于一个超大型盆地，将其他盆地并入统一旗帜下的过程。

西部的克烈部、乃蛮人、吉尔吉斯人，东部的塔塔儿、卫拉特、蔑尔乞、洪吉喇，以及属于蒙古本部的泰亦赤乌人、札只剌部，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拦路石。

由于蒙古地形，成吉思汗先统一了平坦但是拥有足够纵深的东部，再进攻西部两个巨型谷地（盆地），统一了蒙古地区。

成吉思汗在东方崛起时，花剌子模恰好在西方崛起，双方的战争就成了决定谁是世界霸主的战争。

花剌子模与蒙古的对决，是两种战争模式的对决：花剌子模采取封建模式，士兵多从附庸国抽调；蒙古采取集权模式，每一个曾经的士兵都必须对上一级组织绝对服从，压榨出最大的战斗力。蒙古人的震撼战术也起到了作用，只要城市抵抗，就全部杀光，不抵抗的城市可以几乎不受影响地生活。

蒙古第一次西征的主要目标是中亚的花剌子模国，除了灭亡花剌子模，还获得了阿富汗、伊朗西部，最远向南到达巴基斯坦，向西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俄罗斯境内。

蒙古第二次西征（长子西征）的主要目标是：从里海、黑海以北向现在的俄罗斯地区进攻，再向西南方，越过喀尔巴迁山进入欧洲的其他

地区，特别是罗马尼亚、匈牙利地区。

蒙古第三次西征的目标回到波斯和中亚，彻底灭亡了巴格达的哈里发国，并扫平了当年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哈萨辛派（刺客派）。

西藏归顺蒙古人，给蒙古带去了佛教作为国教。蒙古人则把西藏并入了中央帝国，并帮助藏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现代中国的南方界限是由蒙古人划定的。之前有许多地区还属于外国，但之后，那些被蒙古征服并入中央帝国的国家在未来大都成了中国的领土，而蒙古人没有征服的地区，现在大都成了外国。

一个落后民族占领了更加先进的地区后，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保持传统，却无法保持占领地的控制力，最后由于占领地的反抗而退走；二、被同化，从而丧失原来的民族性。元朝在这两条路中摇摆不定，国家也在摇摆中解体成了碎片。

明朝之所以能完成历史上唯一一次从南到北的统一，并不是自身的强大，而是蒙古政权分崩离析后的无力造成的。

明朝时，蒙古人的旁支卫拉特人统一了中国北方。明朝为了限制卫拉特人，断绝了北方的正常贸易，却又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卫拉特人以进贡的形式开展贸易。这种贸易产生的冲突导致了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卫拉特人（瓦剌人）俘虏。

元太宗窝阔台二年（公元1230年），蒙古人开始准备一次天才的进攻。这次进攻发生在本书《楔子》描写的征服云南之前，但采取的方式却近乎一致：大迂回。

蒙古人进攻的目标是金国。此前蒙古人夺取了金国在北京、河北、山西地区的土地，金国也将都城从中都（现北京）迁到了当年北宋的首都汴梁（现河南省开封）。金国主要的领土是河南地区，以及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

根据经验，要想从北方进攻开封，一般有两条路，从山西直下上党地区，过黄河进入河南，或者从河北直下黄河。金国对这两条路都非常

熟悉，金军灭亡北宋时，就选择了从这两条路齐头并进，利用钳形攻势夹击汴梁。

但这两条路有一个缺陷：无法防止南方政权继续向南逃窜。比如金军攻打汴梁虽然成功了，却留下了隐患，让宋高宗逃到了南方，金国无法完全将宋朝消灭。

在金国时期，南方还有南宋政权，本来无处可逃。但如果仅仅从一面压迫，也容易引起困兽犹斗。蒙古人显然是不会这样随便进攻的，必须利用一次奇袭将金国彻底歼灭。

为此，窝阔台大汗设计了一次经典的大迂回攻击。

他派遣拖雷从山西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地区。由于金国的兵力不足以同时防守陕西和河南，拖雷很快占领了关中平原。

在获得了关中平原后，窝阔台兵分三路向汴梁进军，试图将金国残余势力包围起来。前两路采取了传统的攻击线路：一路从山东、河北地区向汴梁进攻；另一路由窝阔台亲自率领，从山西渡过孟津，迫近汴梁。令金国感到震惊的是拖雷所率领的第三路军，这路兵马只有三万人，却在对金战争中起着关键作用。

拖雷的兵马从陕西出发，沿着进四川的道路，经过大散关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顺着汉江而下，经过安康、襄阳，到达唐州和邓州一带，从南方抄后路进攻汴梁。

在中国历史上，蒙古人是第一次利用汉江进行大迂回的军队。当时的汉中、安康等地都属于南宋的领土，蒙古人选择这条路，实际上已经深入了南宋的地界，仅仅以三万人挑战两个国家，可谓大胆的冒险。

为了防止腹背受敌，拖雷的军队进入汉中地区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南对蜀道进行骚扰，避免南宋派军队从四川截断蒙古人的后路；另一路则顺汉江而下，到达光化（现湖北省老河口）一带。

蒙古人从光化花了四天工夫渡过汉江，与金兵遭遇。两兵接触之后，蒙古人突然退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金兵感到迷惑不解。实际上，

蒙古人就躲藏在光化对岸的树林里整整四天，白天不吃饭，晚上不下马，让金兵以为他们离开了。

四天后，蒙古人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金军面前，将其击败。金国溃兵进入了邓州城死守。

由于暂时无法攻克邓州，拖雷略过了邓州城向北方前进。泌阳、南阳、方城、襄城、郏城等地相继被蒙古人攻克。拖雷进军神速，金军在堵截中疲于奔命，顾此失彼。

双方的主力在钧州（现河南省禹州）以南的三峰山相遇。此刻，正值冬天，大雪纷飞。金军中有女真人，也有汉人，对寒冷的天气并不适应。蒙古人采取接连不断的骚扰战术，让金军得不到休息，又冻又饿，被全歼于三峰山。

至此，拖雷的大迂回取得完胜。由于蒙古人已经获得了金国北方、西南方、西方、东北方，而金国的东南方又与宋接壤，已经没有了后方基地可以利用，灭亡已成必然。

蒙古人作为世界上最擅长迂回和奇袭的民族，在历次战争中，将迂回攻势运用到了极致。在夺取金国中都（现北京）的战役中，蒙古人从山西迂回紫荆关，抄中都的后路。灭金之战中，又从陕西经过汉中进入湖北，迂回到金国以南。在与南宋的对峙中，又迂回到云南大理，以图对南宋实行全包围。在对中亚花剌子模的战争中，又先迂回到更遥远的布哈拉，将首都撒马尔罕包围。

蒙古人的闪电奇袭，加上杀人无数的震撼战略，使得蒙古人成了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霸权。

这个霸权在创立之初，只不过是亚洲北部一个小山谷里的一群牧马人而已。那个小山谷，曾经是一个叫作铁木真的孩子眼中的整个世界。当他死亡时，他的世界却突然暴涨了数百倍。在他的一生中，这个世界是怎样扩张的？他又采用了什么步骤，一点点获得了他的家天下？

我们首先回到蒙古草原去寻找他的发迹之路。

从流亡者到蒙古之主

公元2013年，我骑车穿越了整个蒙古国的西部地区，对于蒙古的地貌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也理解了成吉思汗是如何从这个沙漠、草原、湖泊、山脉遍布的荒凉之国崛起的。

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国境内是由许许多多的大小部落组成的。这些部落分别居住在蒙古地区众多的山间盆地之中。

打开蒙古地图，对于军事地理最重要的是三列山脉：

在如今首都乌兰巴托之东是肯特山（Khentii Mountains），这座山没有明显的走向，而是一群山峰的聚合，所以也可以称为肯特山丛。

在乌兰巴托之西、蒙古中部偏西的位置，是杭爱山（Khangai Mountains），这里也是汉代远征匈奴最远到达的地区，在杭爱山东侧的草原上，也是匈奴、突厥等民族曾经的王庭所在。

蒙古西部与中国新疆、俄罗斯交界处则是阿尔泰山（Altai Mountains），这条山脉是蒙古的天然西界。中国新疆最著名的旅游景区喀纳斯湖，就深藏在阿尔泰山之中。

除了这三列主要山脉，蒙古境内其余的山脉大都可以看成这三列的延伸或者余脉。

三列山脉（丛）中最高的是阿尔泰山，密布着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峰。其次是杭爱山，它的主峰接近四千米，夏天时峰顶只有少量的积雪。肯特山最低，最高峰亦不超过两千米。但不要小看了最低的肯特山，从蒙古文明发展的重要程度而言，最矮的肯特山却是最著名的。

肯特山和蒙古东部高原融为一体，在这个山丛南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河谷平原，平原上有三条河流过，分别是克鲁伦河（Kherlen River）、图拉河（Tuul River）和斡难河（Onon River）。这个河谷平原就成了整个东部地区最好的草场，也是成吉思汗成名之前所居的土地。

除了三河河谷之外，整个东部由于地势平坦，生活着许多部落，这些部落又由于地形关系，更容易被统一成一个整体。成吉思汗统一东部后，就在肯特山区南面，一个叫作库库诺尔（Khokh Nuur）的小湖旁边加冕成为蒙古人的头领。

西部的两条山脉由于更加高大，从战略地理上来看，这样的山脉形成了若干易守难攻的战略地点。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之后，西部的重要性逐渐上升。

在乌兰巴托西面四百公里的地方，位于杭爱山的东麓，有另一片著名的河谷地带——厄尔浑谷地（Orkhon Valley），这片谷地曾经是匈奴和突厥人的王庭所在，可能是蒙古西部最大的谷地，后来成了蒙古古都哈拉和林（Kharkhorin，或者Karakorum）的所在地。

继续往西越过杭爱山，在杭爱山和阿尔泰山之间，又有一个巨大的盆地，这个盆地中间有着两个超大型湖泊吉尔吉斯湖（Khyargas Nuur）和乌布苏湖（Uvs Lake），由于气候干燥，乌布苏盆地宜居度远不如东部。但这里却是进攻西方的前进基地。如果继续向西，越过阿尔泰山，就进入了新疆北部，也就是准噶尔盆地所在。

除了这几个巨大的河谷盆地之外，在蒙古还有许多小型的盆地，特别是中部和东部，每一个小盆地都可能是一个游牧部落的居所。

这些盆地都环绕着一圈山峰，部落只要占据了四周的制高点，就可以随时发现入侵者，至于盆地中间，则是上好的马场，也是妇女儿童的居所。这样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游牧部族居住，一个小盆地正好可以养活一个部落，部落的大小由盆地的大小决定。只有少数几个超大型盆地，可以容许几个部族共同使用。

至于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是在盆地之间发生，大的部落并吞小的部落，其实就是把对方的盆地攻打下来。超大型盆地内部的战争更加频繁，直到出现一个超级部族占据了全盆地，这个超级部族由于占据了大型盆地，对于周围小盆地的小部族就有了优势地位。

成吉思汗的任务，就是依托于最大的三河谷地（平原），首先将东

部大草原上的各个部落统一起来，变成超级部族，再向中部和西部扩张，将中西部的部落也都纳入统一的旗帜之下。

与地理相对应的是成吉思汗早期的蒙古部落分布。

在如今蒙古国最东部、靠近中国东北兴安岭的地方，居住着洪吉喇部，这个部族是成吉思汗妻子的部落。紧挨着洪吉喇部的西面，克鲁伦河以南，居住着强大的塔塔儿人。在成吉思汗时代，塔塔儿一直是金国的重要盟友，与蒙古人对立。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就是被塔塔儿人毒死的。

塔塔儿的西北方，在克鲁伦河、图拉河和斡难河的河谷，就是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地域。不过，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死后，蒙古人的另一支系泰亦赤乌人与成吉思汗支系分裂了，成吉思汗所在的部族影响力已经微不足道。除了泰亦赤乌人，蒙古人的札只剌部也是成吉思汗的敌人，这个部族有一个领袖叫札木合，他曾经是成吉思汗的安达（拜把子兄弟），最后却成了统一蒙古的竞争对手。

蒙古本部的北方还有两支不容小觑的势力，分别是分布在最北方贝加尔湖北岸的卫拉特人，以及南岸的蔑尔乞人。

蒙古人（包括与成吉思汗敌对的泰亦赤乌人、札只剌部）、塔塔儿人、卫拉特人、蔑尔乞人和洪吉喇部，就构成了整个蒙古东部的政治版图，也就是如今乌兰巴托以东的地带。

杭爱山和阿尔泰山所在的蒙古西部，则有另两个强权。最大的强权属于一个叫作克烈部的部落，克烈部的首脑叫脱忒邻勒，后来以王罕著称于世。脱忒邻勒（王罕）是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的安达。克烈部居住在杭爱山以东地区最肥沃的土地上，蒙古最著名的厄尔浑河谷就处于克烈人的控制之下。

克烈部以西，也是杭爱山以西，则是更加凶狠的乃蛮人。乃蛮人几乎是一切蒙古部落的敌人，在成吉思汗之前，他们不被认为是蒙古人。乃蛮人的中心在现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带，也就是杭爱山与阿尔

泰山之间。

从文化上来说，克烈部和乃蛮人比成吉思汗那些人要先进得多。克烈部是一个信奉基督教（景教）的民族，乃蛮人也有不少基督信徒。

蒙古以外，在如今的新疆境内，则居住着畏兀儿人，也就是古代回纥人，现代维吾尔人的祖先。回纥人原本居住在蒙古，后来被吉尔吉斯人赶走，在唐代时进入了新疆。克烈部的景教信仰，就是从畏兀儿人那儿传过去的。

除了克烈部和乃蛮两个相对开化的种族之外，在他们的北方、现在的俄罗斯境内，还有一部分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人是突厥人的一支，在唐代时，它赶走了强大的回纥人，成了蒙古中部的主人，可后来又逐渐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在蒙古的西北方游荡。

西部的克烈部、乃蛮人、吉尔吉斯人，东部的塔塔儿、卫拉特、蔑尔乞、洪吉喇，以及属于蒙古本部的泰亦赤乌人、札只剌部，就成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拦路石。

由于东部地势相对平坦，西部更加陡峭，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采取了先统一东部，再并吞西部的策略。

他之所以崛起，得益于与两个部落的联盟关系，这两个部落分别是西部的克烈部（首领王罕）和东部的札只剌部（首领札木合）。在成吉思汗年轻时，他的妻子曾经被蔑尔乞人抢走，就是在这两个部落的帮助下把妻子抢回来的。

在统一东部的过程中，成吉思汗首先瞄准的是蒙古人的公敌塔塔儿人。塔塔儿人是较为开化的游牧部落，一直依附于金国，承担着帮助金国守卫边疆的责任。但由于塔塔儿人帮助金国镇压其他部落，成吉思汗惩罚塔塔儿人的战争得到了众多部落的支持。他甚至让金国人相信塔塔儿人背叛了金国，与金国联合夹击，消灭了塔塔儿。

塔塔儿人灭亡后，随着铁木真变得强大，东部的敌对势力都聚集在了札木合的旗帜下。札木合曾经是铁木真的安达，他和铁木真同样拥有统一蒙古东部的雄心，这两个人迟早要发生冲突。

在与札木合的决斗中，成吉思汗得到了克烈部的帮助。他们联合打败了札木合、泰亦赤乌人、蔑尔乞人。

洪吉喇部一直是成吉思汗的盟友，而卫拉特部远在北方，也逐渐被蒙古人所征服。王罕地处西部，在位置上与新征服领土距离较远。就这样，整个东部就成了成吉思汗的天下。

统一东部后，成吉思汗与王罕的克烈部发生冲突，双方各进行了一次奇袭。首先是王罕发动攻击，将成吉思汗赶到了蒙古与中国东北地区交界地带。但蒙古东部的后方却有极大的纵深，成吉思汗通过撤退避开了打击。蒙古人善于通过迂回打击敌人，截断敌人的退路，更善于通过纵深避开敌人的打击，避免被敌人截断退路。王罕由于进攻臂长超过了补给能力，不得不撤回，将蒙古东部还给了成吉思汗。

东部有纵深，王罕所在的西部却没有足够的撤退空间，在他的背后，还有乃蛮人顶着，不可能无限制撤退。当成吉思汗发动奇袭式远征，王罕由于没有纵深，被击败了。

王罕的灭亡，让成吉思汗势力扩张到了杭爱山东部，巨大的厄尔浑谷地成了蒙古人的跑马场。人口增加，放牧地数倍增长，使得成吉思汗拥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去对付蒙古本土的最后一个敌人——乃蛮人。

乃蛮人处于蒙古西部，在杭爱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甚至扩张到了新疆北部地区。成吉思汗翻越杭爱山，击溃了位于乌里雅苏台地区的乃蛮人塔阳汗。

到这时，蒙古全境都并入了成吉思汗帝国的版图。平定了乃蛮人之后，成吉思汗一面继续平定位于蒙古的其他小部落，一面开始准备对外战争了。

蒙古的帝国时代

成吉思汗对于蒙古之外的地理是逐渐认识的。

在他统一蒙古时期，只知道在东南方向有一个大国：金国。塔塔儿人就是金国的附庸。

金国为了防范蒙古人，曾经修筑了一条长达数千里的长城，从黑龙江直达山西大同之外。蒙古人和金国的边界以大兴安岭、苏克斜鲁山（大兴安岭南段）、阴山为界，金国在这条界线上修建了一连串的长城和堡垒，防止游牧民族侵入。

除了金国，成吉思汗认识的第二个国家是西夏。在击败乃蛮人的过程中，乃蛮人曾谋求与西夏合作对抗蒙古。虽然西夏没有出兵，却被成吉思汗当作劲敌。蒙古人与西夏边界在阴山、贺兰山区。

再向西，则是畏兀儿人和西辽（喀拉契丹）的地界。成吉思汗击败塔阳汗时，塔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先是逃往了畏兀儿人处，由于畏兀儿人投靠蒙古，屈出律继续逃窜，到了西辽，被西辽国王耶律直鲁古收留。屈出律取代了耶律直鲁古，篡夺了西辽。这次篡权使得西辽进入了蒙古人的视野。

在西辽更远方，则是位于中亚地区的大国花剌子模（Khwarezmid）。花剌子模除了是一个国家名字之外，更常见的是作为一个地区的名字。花剌子模地区位于中亚咸海南岸、里海东岸，花剌子模国最早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小国家，以此为基地进行对外扩张，最大扩张时期囊括了整个中亚。

巧合的是，当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时，花剌子模也恰好处于扩张时期，刚刚统一了中亚。

关于花剌子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塞尔柱突厥（Seljuqs）统治中亚的时代。在塞尔柱之前，从阿拉伯半岛到波斯、中亚的广大领土都属于阿拉伯人建立的哈里发帝国。随着哈里发国家的衰落，从中亚出发的塞

尔柱突厥人攫取了帝国的守卫权，他们表面上仍然尊奉哈里发，实际上哈里发却只是傀儡，塞尔柱人以苏丹（这个称号是低于哈里发的）的名义统治着伊斯兰世界。

塞尔柱苏丹时期，一位官员的奴隶由于勤奋和精明，在朝廷中担任了官职。塞尔柱朝的官职与封地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官职对应着一片封地，官员靠封地的出产来供养自己。这位名叫讷失的斤（Anush Tigin Gharchai）的人封地在咸海南岸的一个叫作花剌子模的地方。后来，这个地方就成了王朝的名字。

他的儿子获得了花剌子模沙（Khwarezm-Shah）的封号。他的孙子阿即思（Atsiz）已经强大到可以和塞尔柱苏丹对抗。

随后的几代经历了混乱，直到一位叫帖乞失（Tekish）的人在喀喇契丹（西辽）的帮助下登上了花剌子模沙的位置。帖乞失先是和弟弟苏丹沙（Sultan-Shah）缠斗多年，之后开始南征北战的征服历程，他的铁骑到达过中亚的每一寸土地，将大部分的城池划入了花剌子模的势力范围。

公元1200年，苏丹帖乞失死去时，花剌子模已经有了帝国的架构。接替苏丹帖乞失的就是他的儿子苏丹摩诃末（Muhammad II）。摩诃末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归并了伊朗和阿富汗大大小小的政权，从山区的古尔王朝，到里海南部诸国，都统一在苏丹的手中。

在弱小时，花剌子模曾经是契丹人建立的喀喇契丹（西辽）的附庸。摩诃末强大后，决定对西辽作战。西辽当时占领了中亚最富裕的河中地区（Sogdiana），那儿有历史名城撒马尔罕（Samarkand）和布哈拉（Bukhara）。借着和乃蛮残部屈出律的联盟，两家共同瓜分了西辽。

在当时人看来，花剌子模是比蒙古还强大的国家，也是西部首屈一指的大国。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并不了解，也不够自信，最初的野心只是针对西辽、西夏和金。

他首先选择了进攻西夏王朝。西夏位于金国和西域中间，从军事角

度讲最为重要，是包抄金国的很好进攻点。公元1205年到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攻打西夏，迫使西夏国王求和。

保证了西夏的归顺之后，成吉思汗开始对金国用兵。公元1211年开始，成吉思汗挥兵南下金国，从山西、河北、辽宁三方面用兵进入金国的领地。蒙古兵虽然取得了无数胜仗，却始终无法攻入重兵把守的北京城（金中都）。

几年后，金国求和，金国皇帝在取得和平后，主动将宫廷撤出中都，重新定都开封。这给了成吉思汗机会，他再次挥兵南下，从已经丧胆的守将手中夺取了中都。这里注定成为蒙古人未来的政治中心。

但就在蒙古人要灭亡金国时，突然从西方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由于蒙古人靠掠夺和贸易来获得军需，他们对商人特别友好。公元1218年，当一群蒙古商人（四百五十人）到达讹答剌城（Otrar，位于现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Chimkent附近）的时候，该城的主帅得到了花剌子模沙的默许，将蒙古商人尽数杀死。只有一个人逃离了灾难，把悲惨的消息带给了成吉思汗。

这件事就成了两大强权之间对决的起点，也是蒙古人西征的开始。

在战争起步时，人们更看好花剌子模，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蒙古人却一直隐藏在历史阴影之中，鲜为人知。但双方的战术却又迥然不同。

花剌子模继承的是中亚和波斯人的战法，即：战争中的军队以联军为主，兵力从各个附庸国抽调，指挥形式相对松散。在打仗的同时，主要运用政治手段同时打击敌人，利用合纵连横之法引诱敌人的盟友背叛。

成吉思汗却创建了一套崭新的军事架构。这个架构依靠对他的绝对忠贞来进行指挥。每一个将领对大汗本人都绝对服从，而二级将领又完全服从于一级将领。在兵员上也采取了全民皆兵的方式，蒙古社会完全按照出兵的数量进行划分，设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进行统治。

大汗一旦下命令出兵，蒙古虽然看上去是松散的游牧人群，却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从社会上压榨出最多的兵卒，并保持对于君王的绝对忠诚。他们会尽自己的全力去争取胜利，不会背叛，更不会逃避。

另外，蒙古人在进攻西夏、金的时候，摸索出了一套心理震撼战略。进攻城市时，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进攻，而是制造恐怖。将抵抗的城市夷为平地，将人口全部灭绝，对不抵抗的城市给予优待。最温顺的城市几乎不会受任何影响，蒙古人只派一个人去担任象征性的最高长官，真正负责行政管理的政治架构都不改变。

西征首先解决了盘踞在新疆一带的乃蛮人残部，也就是屈出律取代西辽后的政权。在蒙古大将哲别的打击下，屈出律未及交锋就落荒而逃，被捉住后送给蒙古人处死。

解决了屈出律，蒙古大军兵分四路向中亚扑去。在蒙古本部与中亚之间，是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盆地的东侧靠近蒙古，隔着著名的阿尔泰山，而在盆地西侧，经过天山余脉和伊犁河谷，与中亚著名的两河流域（河中地区）相连。这两条河流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冰川之中，汇入中亚地区咸海内陆湖，东边的河流叫作锡尔河（Syr Darya），西边的叫作阿姆河（Amu Darya，在成吉思汗时期，阿姆河可能汇入咸海西面的里海）。

锡尔河和阿姆河所在的河中地区，与伊拉克两河地区，中国的长江、黄河地区一样，依靠两条河流，在河流中间地带形成了繁荣的文明。文明的中心有三个，分别是：东南方的首都撒马尔罕，在撒马尔罕西侧、靠近阿姆河的布哈拉，以及在阿姆河下游的玉龙杰赤（Kunya-Urgench，在土库曼斯坦境内）。其中玉龙杰赤是花剌子模的发源地，撒马尔罕、布哈拉一直是中亚最著名的两座城市。

成吉思汗的目标是：兵分数路越过东面的锡尔河，向撒马尔罕进军，灭亡花剌子模。为了达到目标，他首先派出哲别向南从疏勒（现新疆喀什）进攻两河的上游浩罕（Kokand），让花剌子模以为蒙古人要从这里进军。但实际上他派出大军从更北方的伊犁向西进入锡尔河谷。在

这里，他再将大军一分为四：

由二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率领一支部队进攻战争的挑起城市讹答剌，就是这座城市杀害蒙古商人导致了战争。

长子术赤率领另一支大军顺锡尔河向下，一路厮杀，目的地是下游城市毡的。

另外一支部队向锡尔河上游进军，进攻费尔干纳、浩罕等地。

成吉思汗则亲率大军越过锡尔河，向布哈拉进军，从后方包围撒马尔罕。

与成吉思汗亲征相比，摩诃末却在后方指挥，依靠着各地的将军们各自为战。

蒙古大军摧枯拉朽般扫到了锡尔河沿岸。在讹答剌，守城的哈尔只（也是杀害蒙古商人的守将）坚持了五个月。这座城市分成外城和内城，外城由他的部下守卫，最后，部下乘夜间逃走了，蒙古人占领了外城。哈尔只在内城又坚持了一个月，拼到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个人才被俘。

在费尔干纳首府苦盏（Khujand），守将帖木儿蔑里在河中沙洲上建立了堡垒，蒙古人的攻城器械和投石器伤害不到这里。而他却时常派出船只去骚扰蒙古人。当守军的人数终因消耗过大而越来越少的时候，帖木儿蔑里意识到除了逃走没有别的办法。他把辎重、财务搬上了七十艘船，自己率人登上一艘大艇，燃起火把，如同闪电一般顺流而下。

蒙古人先是在岸上跟随着他的船队，被他用弓矢打退了。当船队顺着河流到达下一个城市费纳客忒时，这座城市已经被蒙古人占领了。为了拦住他们，蒙古人拦江拉起了铁链。但帖木儿蔑里将铁链斩断，继续前进。

下游的两座城市毡的和巴耳赤刊都已经被术赤占领。术赤在毡的拉了一排船，在船上架好了火炮，专门等待这些逃亡者前来。帖木儿蔑里上岸奔逃，一度只剩三支箭，他被三个蒙古人追上。用一支钝箭射瞎一

个蒙古人的眼睛，又对另外两个蒙古人说：“我还剩两支箭，舍不得用，却刚够你们二位消受。你们最好退回去，保全你们的性命。”蒙古人退走了。帖木儿蔑里抵达花剌子模，重新准备战斗。

但不管花剌子模的将军们如何英勇，蒙古人荡平了锡尔河岸之后，中亚名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也相继被攻克。苏丹摩诃末逃往了南方的呼罗珊地区（Khorasan伊朗、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交界地带）。

成吉思汗再次分兵，让他的儿子术赤、窝阔台、察合台向北进攻花剌子模的老巢玉龙杰赤，他本人率兵南下，去进攻花剌子模的阿富汗领地，他的小儿子拖雷向西南前进，征服呼罗珊，而两位大将速不台和哲别则率兵向更西方前进，追击逃窜的苏丹摩诃末。

蒙古人在路上杀人无数，荡平了大量的城市，让中亚变成了一片血海。这次西征彻底击溃了花剌子模，占领了花剌子模在中亚、伊朗、阿富汗等地的领地，直达印度（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

在消灭对手的同时，成吉思汗又打听到了更远处的消息。

原来，哲别和速不台追击敌人时，竟然来到了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高加索山（Caucasus Mountains）一带。高加索山脉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也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山脉之一。

哲别和速不台通过了高耸的高加索山，绕过了里海，向北进入了现在的俄罗斯境内。他们打败了当地的土著钦察人（Kipchaks），并击败了一次俄罗斯联军。

大胜之后，因为作战距离太长，哲别和速不台撤回。但他们带来的消息就构成了蒙古人第二次西征的主要内容。

第一次西征后，成吉思汗回军继续处理西夏和金国的问题。拥有了攻城经验的蒙古人首先灭亡了西夏。在进攻西夏时，成吉思汗去世。

西夏灭亡后，蒙古人采取了本章引言叙述的战略，借道南宋，迂回进攻金国。灭金战争中，南宋决定与蒙古人合作进攻金国。两国的军队

合力攻克了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现河南省汝南）。

由于南宋急于在灭亡金国后抢夺失地，与蒙古发生冲突，随之而来的是南宋与蒙古的战争。

但在叙述宋蒙之战前，先看看蒙古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西征。

由于哲别和速不台在第一次西征越过了高加索山到达了欧洲，加上成吉思汗把他的大儿子术赤（以及术赤的儿子拔都）封在了靠近欧洲的金帐汗国，蒙古人决定对欧洲境内发动一次新的远征。

这次远征并非由大汗窝阔台亲征，而是交给了四大支系的长子们，所以称为长子西征。辅佐长子们的是老将速不台，利用他第一次西征经历和战争经验来保证西征的胜利。

这次西征的主要目标是：从里海、黑海以北向现在的俄罗斯地区进攻，再向西南方，越过喀尔巴迁山进入欧洲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罗马尼亚、匈牙利地区。根据俄罗斯人自己的史书《诺夫哥罗德编年史》[(1)]记载，公元1223年哲别和速不台第一次远征时，一群语言未知、名称未知、种族未知、信仰未知的人突然从东面的黑暗中冲出来，打败了俄罗斯人的邻居钦察人。俄罗斯人组织了庞大的援军与蒙古人作战，他们懒洋洋趾高气扬地上马，以为是去解决个小问题就回家。但俄罗斯援军被蒙古人彻底击溃，满脸酒气的基辅公爵没有回家，反而被抓住折磨死了。

就在俄罗斯人战战兢兢等待蒙古人继续进攻时，哲别和速不台却撤退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俄罗斯人在忐忑中等了近二十年，几乎忘掉了蒙古人，突然间，第二次打击到来了。蒙古人的到来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实行的，他们派来了一个巫婆和两个随从到俄罗斯的梁赞公爵那儿，要求俄罗斯人向蒙古人进贡。公爵回答："只有当我们一个不剩的时候，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的。"（Only when none of us remain then all will be yours.）

蒙古人采纳了公爵的提议，俄罗斯草原几乎经历了一次恐怖的毁灭，蒙古人攻陷了一座座城池，把城里的居民全部杀光。这是一次系统

的灭绝行为。

上演了多次屠杀之后，蒙古人稍微休息了两年，再次开始了进攻，他们攻克了俄罗斯人的政治、文化中心基辅（Kiev）。基辅遭到了毁灭。接着，蒙古人从俄罗斯人的土地上经过，进入了东欧，他们在波兰打败了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联军，进入了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奥地利，甚至到达了达尔马提亚，前行到地中海附近。

就在这时，窝阔台大汗逝世，由于蒙古人没有很好地解决继承问题，各个长子要回去争夺大汗之位，第二次西征结束。在蒙古人回军时，他们最远到达的达尔马提亚与西欧世界的中心罗马只有一海之隔，直线距离不到五百公里。

第二次西征使得术赤的儿子拔都成为俄罗斯草原的主人，金帐汗国的领土到达了顶峰。

在进攻了欧洲后，蒙古人第三次西征再次回到了波斯和西亚。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之后，随着蒙古军队的撤出，花剌子模的后代扎兰丁又夺取了波斯的部分地区。蒙古派出了搠儿马罕去重新收复波斯，扎兰丁在搠儿马罕的紧逼下节节败退，最后死亡。搠儿马罕得到了波斯和阿塞拜疆，他的继任者拜住则迫使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地区臣服。

搠儿马罕和拜住的征服为第三次西征创造了条件。当蒙哥进攻南宋时，他同时派出了弟弟旭烈兀进行西征。

第三次西征的地域中，有两处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第一处是一个叫作阿拉木特（Alamut）的堡垒，这座堡垒在里海的南岸，属于一个奇怪的小教派哈撒辛派（Assassins），这个教派是什叶派下的伊斯马仪派的一个小分支，在历史上以刺客闻名。

旭烈兀第二个打击目标是巴格达的哈里发。蒙古人之前，阿拔斯朝的哈里发统治世界已经五百年了，即便哈里发早就失去了真正的权力，如同明治维新之前的天皇一样成了政治的摆设，可是没有人敢于废黜他们。不管突厥人还是波斯人，他们最多敢称为苏丹，却不敢僭越哈里发的称谓。

在蒙古人的打击下，巴格达的哈里发王朝正式结束。蒙古人一直打到了如今的叙利亚境内，继续向南扩张时，才被埃及的马木留克（Mamluk）王朝击溃。这也是蒙古人扩张的极致。

西藏、大理与蒙宋战争

在蒙古人征服的地理范围内，有两个特殊的地区值得提到：大理和西藏。

公元1247年，在西北的凉州（现甘肃省武威），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这时恰逢蒙古人派兵越过四川进军大理的前期，蒙古将领、王子阔端在这里会见了一位来自西藏的高僧萨迦班智达。这次会见史称凉州会盟。

萨迦班智达之所以来凉州，是代表西藏商谈投降条件的。当蒙古人征服了西域和中亚，并扩张到欧洲、西亚之后，西藏如同一个巨大的楔子横亘在蒙古人的统治地域中间。在蒙古人获得了中国北部之后，当时西藏到中原的道路经过藏东北的昌都地区，向北过无人区到达青海湖的东侧，[(2)]这里比邻蒙古人控制的陕西与甘肃，已经进入蒙古人的战争范围。

在宋代，大理对于中国仍然是不折不扣的附属国，保留着相当的独立性。而西藏在唐代（公元七世纪）时，曾经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国家吐蕃，由历代赞普进行统治。安史之乱后，吐蕃人一度成为唐朝最强大的对手，占领了西部地区，直达新疆，甚至攻陷过唐代的首都长安。

最初赞普政权是一个带有当地宗教苯教性质的世俗政权，松赞干布做赞普时，从尼泊尔和中国内地引入佛教。佛教地位抬升，成了国教。

数代之后，由于佛寺占了社会过多的资源，世俗政权的税收大幅度减少，吐蕃政府吃不消了。赞普朗达玛选择了灭佛，由此引发了严重的教派、宗派斗争。唐朝末期，统一的吐蕃也分崩离析，藏域的佛教归于消亡。

一个多世纪后，一位印度的僧人阿底峡再次把佛教带回了雪域高原，佛教重新在西藏兴盛。但此时西藏并不统一，各地由许多小型的世俗政权所统治，即便有的小国君皈依了某个教派，但由于存在众多的政

权竞争，很难说当时的政府是政教合一的。

当蒙古人进攻西藏时，西藏由于没有统一政权，群龙无首，甚至连个与蒙古谈判的人都不好选。这时人们突然想到了在藏域威望最高的僧人——萨迦班智达，决定请他出山与蒙古人谈判。

萨迦班智达属于西藏萨迦地区的一个佛教小支派——萨迦派（俗称花教），萨迦班智达出使蒙古，表面上是将西藏地区和平地移交给蒙古人，实现了蒙古人在西藏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却意外地让蒙古本部皈依了藏传佛教。

西藏和蒙古的合流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蒙古人从此有了国教，变成了宗教化的民族；其次，蒙古帮助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虽然经过波折，却一直保留；再次，蒙古人在西藏建立了官僚制度，这也是历史上西藏并入中央帝国纳入管辖的起始阶段；最后，西藏的归附，也让蒙古人获得了足够的信息，经过吐蕃人的土地对大理发动了一场堪称经典的远程打击。

蒙古人与南宋的冲突，开始于蒙古从金国手中获得河北、山东地区。由于与南宋有了小部分的接壤，两者产生了零星的冲突。

但双方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则是在蒙军与南宋联合灭亡金国之后。由于蒙古人口少，制度落后，无力在已经征服地区维持稳定的政权，在灭亡了金国之后，将大军撤回了北方，在黄河一带留下了大量的空城。

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后，获得了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南部的唐州、邓州地区，但南宋念念不忘的三京（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都在蒙古人的掌握中。南宋决定乘蒙古人北归，袭取三京，却遭到了惨败。蒙古以此为借口，开始对南宋进行大举征伐。

南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在金国灭亡的第二年，窝阔台大汗开始南征宋朝。在本书的《楔子》中已经详细谈到，当时，蒙古人与宋朝交界主要有三条通道，分别是西方陕西、四川交界的蜀道，中部河南、湖北交界的南襄隘道，以及东部江淮地区通道。

窝阔台派次子阔端经过蜀道攻打四川，三子阔出走襄阳，大将口温

不花和史天泽进攻江淮。

在三路大军中，阔端率军从大散关进入汉中地区，击溃了宋军的重重抵抗，直入四川盆地。在接下来几年内，四川遭受了蒙古军队的大范围蹂躏。蒙古人甚至直达长江口，进逼湖北，只是由于蒙古人没有能力建立稳定政权，四川才能在蒙古人蹂躏过后，重新被南宋控制。

中路军在攻克了襄阳后，被宋朝大将孟珙阻挡，随后，孟珙发动反击，取得了在中路的主动权。

东路军虽然在江淮地区烧杀掳掠，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极端凋敝，却被名将杜杲阻挡，无法渡江。

公元1241年，随着大汗窝阔台的死亡，蒙古人对南宋进攻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虽然南宋在对辽、金的战争中表现得极其糟糕，在对蒙战争的初期，却表现了极高的军事技巧。蒙古人撤退后，四川在名将余玠的镇守下，在关键地带建立一系列的城堡，利用步步防守来牵制蒙古人的进攻；荆州地区则在孟珙的领导下，建立了完备的防御体系。在各位名将的主持下，南宋成了蒙古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大汗蒙哥即位后，利用将领郭宝玉几十年前提出的计策，选择实施远程攻击，利用吐蕃人的信息进攻大理，再从大理、陕西、湖北、江淮对南宋实行多重夹击。

于是就有了本书《楔子》中那一幕。公元1253年，忽必烈大军兵分三路灭亡大理。大理平定后，忽必烈北归，留下镇守云南的大将兀良合台率军向西北方向，降服了云南全境，并以云南为基地，向南进攻越南北部（安南），迫使安南国王称臣。

在获得了西南地区之后，蒙哥命令南北夹击，组织新一轮征宋。这一次征宋本应该成功，却由于蒙哥大汗在钓鱼城下突然死亡，南宋又逃过一劫。

蒙哥死时，蒙古人的凝聚力已远不如第一、第二代大汗时期，各个支系都争着回去选举大汗，联合攻宋计划也随之被放弃。

从战略上讲，蒙宋战争的战略高峰是这次蒙哥的进攻，他利用了整个中国的宽度，从陕西到大理，再到越南、广西、湖南，加上常规路线的配合，也是中国军事战略史上的一个巅峰，却最终功亏一篑。

但进攻所造成的冲击力让南宋王朝也到了尾声。为了应付蒙古人的进攻，首先垮掉的是南宋的财政。为了筹集军事款项，南宋政府往往依靠滥发纸币获得财政收入。但由于军事需要过大，纸币出现了与国民党在公元1948年造成的法币灾难同样的情况，纸币已经形同废纸。南宋政府又想靠土地来解决财政问题，进行地权改革，但改革的结果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崩盘，到这时，政府再也没有钱来进行大规模的作战了。

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获得了大汗之位的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大将阿术（兀良合台之子）从中路进攻两湖地区，蒙古人开始了对襄阳持续数年的围困。公元1273年，蒙古人攻克襄阳。到这时，南方的大门终于打开。

一年后，鄂州失守，又过了一年，建康失守。年底南宋首都临安被围困，并于第二年元月被攻陷，南宋灭亡。

蒙古人最终以最不擅长的消耗战获得了对南宋的胜利。

蒙古帝国塑造的现代中国

在中国人看来，元朝只是一个如同唐、宋、明、清一样的朝代而已，但蒙古人却认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中国只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他们把元朝看作是对汉地的征服，而不是对汉人政权的继承。

不管谁是谁非，有一点却是明确的：蒙古对现代中国疆域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甚至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南方界限是由蒙古人划定的。之前有许多地区还属于外国，但之后，那些在蒙古征服中被并入中央帝国的国家在未来大都成了中国的领土，而蒙古人没有征服的地区，现在大都成了外国。

最典型的是西南方的西藏和云南。在宋代，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放弃了大渡河以外的领土，使得云南被排除在宋朝疆域之外，而西藏在唐宋时期也一直保留着较强的独立性。经过蒙古征服，这两个地方正式进入了中国的统治范围，直到现在仍然保持在政权之内。

在宋代，与西藏、云南类似独立的还有东南亚的众多国家，这些国家与大理一样，属于附属国却有独立的统治权，蒙古人也试图征服这些国家，却失败了，导致它们现在仍然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并吞南宋时，蒙古人的扩张已经进入尾声，版图边缘的各个小国对蒙古人的抵抗越来越有成效。全世界似乎联合起来对付蒙古。

蒙古人在东南亚遭遇了数次惨败：他们试图入侵越南南部的占婆，但海上的入侵行动被占婆人坚壁清野拖住了。他们又试图借道越南北部的安南进攻占婆，当时统治安南的是一个陈姓王朝（越南人称为陈朝），陈朝皇帝知道唇亡齿寒和假道灭虢的道理，派遣著名将领陈兴道两次击败了蒙古。陈兴道也成了越南人最尊崇的武圣，其地位高于胡志明。

蒙古入侵过缅甸和泰国，都无法在那儿建立长久的统治，只得撤

回。蒙古人进攻爪哇也没有成功。

这些蒙古人没能建立统治的国家（越南、缅甸、泰国）就永久性地成了外国。由于明代继承了元代的版图（又有缩小），清代也以蒙古为蓝本来规范版图，使得中国的疆界逐渐稳定，从帝国圈形成了更加稳定的归附性政治体。

除了东南亚之外，蒙古人在东亚也遭到了失败，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都以失败告终。朝鲜虽然暂时被征服，但其反叛力量始终没有被消除，无法像其他地区一样形成有效统治。

唯一例外的是蒙古本土，按照这个划分，蒙古本土也应该包括在现代中国领土之内，却在民国时期独立了出去，成了独立的国家。

除了亚洲东部之外，在其他地区，蒙古的扩张也遇到了阻碍，进入了衰退期。

在南亚，蒙古曾有机会征服印度，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时，就进入巴基斯坦境内（当时属于印度），却没有形成有效统治。成吉思汗死后，西部的蒙古人一直处于严重的内争之中，察合台汗国和波斯汗国之间长期敌对，察合台汗国还和忽必烈打仗，使得他们腾不出精力来对付这个广阔的次大陆。后来蒙古人终于有时间对付印度了，印度却进入了繁荣期，一个伟大的国王阿拉乌德丁（Alauddin Khalji）毫不留情地把蒙古人击败，把蒙古士兵的头颅割下来垒起了金字塔。阿拉乌德丁也成了印度人的英雄。

在西方，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成了穆斯林的英雄，战胜了蒙古，遏制了蒙古的扩张，埃及从此成了伊斯兰教的中心。

在俄罗斯，蒙古始终无法接近波罗的海，他们停留在距离港口城市（也是北方文化经济中心）诺夫哥罗德（Novgorod）数百公里的地方。俄罗斯的王公们逐渐恢复了生气，积攒着实力，他们虽然臣服于蒙古人，却又保持着独立性，等他们足够强壮时，将从蒙古人手中接管领土，建立同样庞大的俄罗斯帝国。

帝国分崩离析时

公元1368年八月，朱元璋的军队攻陷了元大都，元顺帝率军撤往了关外的上都，之后继续逃窜，撤回了蒙古的故地，在那儿建立起了残余的北元政权。北元所控制的人口只有百万左右，与动辄上亿的元帝国无法比拟。大汗国（即元朝）这个蒙古汗王之首，建立不过百年（从忽必烈算起）就在风雨飘摇中倒台。

在元朝倒下之前的十一年前，蒙古的另一个巨大汗国——波斯汗国已经倒下。波斯汗国在一百零一年间换了十六位汗王，可见其内部斗争的激烈和不稳定。当旭烈兀打下江山之后，历任汗王都眼睁睁看着埃及人在跟前挑衅，却无法将其征服。

准确地说，在公元1335年，波斯汗国就解体了，许多个地方政权崛起，将旭烈兀的后代们变成了傀儡。最后的汗王甚至已经没有了记载，只能从发现的古钱上辨认他们。

位于中亚和新疆南部的察合台汗国存在的时间更久，这个汗国本有可能征服印度，但它的汗王们更热衷于与北面的窝阔台汗国、西面的波斯汗国打仗，甚至与金帐汗国、元朝发生冲突。结果印度还在那儿，察合台汗国却分裂了。

它曾经兼有中亚的河中地区和新疆，但随后汗国分裂成了两部分，西面的河中地区突厥化了，他们自称突厥人，东面的新疆地区仍然自称察台人（即察合台人）。接着，成吉思汗之后突厥人帖木儿（Amir Timur）在河中的兴起，彻底抹掉了西部的记忆。帖木儿还扫净了波斯汗国的残余，再次将中亚统一起来。

帖木儿之后，一个从血缘上是帖木儿（父系）和成吉思汗（母系）双重后代的人——巴布尔（Babur）——终于挥兵印度，将这颗最璀璨的明珠收入囊中，建立了伟大的莫卧儿（即蒙古）帝国（Mughal Dynasty）。莫卧儿帝国直到英国人进入印度才逐渐消亡，对印度影响深远，可以算是蒙古人难得的遗珠。

察合台的东部汗国存在到公元1570年，被同属于察合台世系的叶尔羌汗国所灭。不过，蒙古人仍然是新疆的主宰，直到他们被清朝的军队击败。

金帐汗国存在了两百多年。俄罗斯的王公们先是服从于蒙古人，再逐渐积攒力量，到了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时代终于击败了蒙古人。金帐汗国分裂成了喀山、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几个小汗国，这些汗国有的存在到18世纪晚期才被俄国人并吞。

蒙古帝国之所以解体和消失，源于蒙古人口稀少、社会和制度落后。这样的民族占领了更加先进的地区后，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保持传统，却无法保持占领地的控制力，最后由于占领地的反抗而退走；二、被同化，从而丧失原来的民族性。

蒙古人在汉族区域的统治可谓两种选择的摇摆，一会儿希望保持独立性，一会儿又不得不汉化，内斗和外部反抗同时摧毁了蒙古帝国。

元朝后期，由于蒙古人无法控制如此庞大的社会，结果元朝不是突然间死去，而是如同一个麻风病人，身体逐渐溃烂、脱落、解体。

由于对南方的统治始终薄弱，最先脱落的地方从南方开始。随着元末统治的削弱，在山东、河南一带出现了汉人反抗蒙古人的运动。但最大的反抗还是出现在原本南宋的地域内。

这里分裂出了许多不听从蒙古人的小碎片，这些小碎片拥有着军队武装，驱赶着蒙古人的统治。他们分分合合，互相竞争，试图取代蒙古人。由于无力派军南下，蒙古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碎片并吞壮大。

其中最强大的几个碎片都位于长江流域。在上游的四川、重庆地区，是一位叫作明玉珍的军阀，他定都重庆，建立了一个称为大夏的政权。在中游的江州（现江西省九江）和武昌，是军阀陈友谅的天下，他建立了大汉政权。明玉珍和陈友谅原本都属于红巾军徐寿辉的部队，徐寿辉起家于湖北，最终被陈友谅所杀。

在陈友谅的下游，是一位前和尚的地盘。朱元璋在集庆（后来的应天府，现江苏省南京）建立了大吴政权（朱吴）。朱元璋曾经从属于郭子兴，郭子兴死后独立，他眼光独具，认准了南京这个古都，并以此为基地开始向外扩张。

但在朱元璋刚刚定都应天府时，他的位置却并不是特别有利，遭受了来自长江上游和下游两个方面的压力，上游就是陈友谅的大汉政权，下游占据苏州、杭州、上海一带的，是另一个与朱吴同名的政权——张士诚建立的大吴政权（张吴）。

在张士诚南面的浙江南部，还有一个军阀方国珍。

在方国珍的南面，如今的福建一带，是军阀陈友定。广东是军阀何真控制的地区。这两个军阀忠于元朝，却无法左右政局。

真正的竞争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的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和方国珍之间。特别是陈友谅和朱元璋，两人胸怀大志，任何一人击败了另一方，都会立刻北伐中原，取代元朝。而次级军阀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更多采取了割据的做法，无力统一全国，却又不想被统一。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南到北完成统一的战争，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做到逆规律而行，其原因更多是由于元朝势力的薄弱，如果北方政权足够强大，朱元璋并没有机会完成统一大业。

朱元璋统一的战略是：

一、首先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首当其冲的是盘踞在江西和两湖的陈友谅，之后则是盘踞苏杭一带的张士诚。一旦获取了这两个地方，就得到了中国的粮仓。

二、完成第一步之后，再通过地理优势压迫浙江南部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和广东的何真，将南方掌握在手中。到这时，整个中国南方只有四川的明玉珍和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仍然在控制之外了，不过，这两个地方并不影响统一的大局。

三、掌握南方后，再进行北伐。北伐从与江苏接壤的山东开始，由

山东进入河南，这两个地区被占领后，也就获得了进攻元朝首都以及河北地区的基地。

四、北上进攻元朝首都，将河北地区收入囊中。一旦完成了将蒙古人赶出大都的任务，把守住了燕山关口，元朝就象征性地落幕了。这时，再派军扫荡其他地区。

五、扫荡其他省份的步骤是：从河北进入山西，从山西进攻陕西，从陕西和湖北两方面进入四川，再从湖南和四川（重庆）两道进入云南，完成最后的统一。

如果不是蒙古的分崩离析，朱元璋要想反攻北方，会在华北平原遭到来自山西的压迫。从南方进攻北方，暂时性获得平原并不难，但北方只要不放弃山西、豫西、北京以北的高地，就总可以利用暂时的撤退加大南方进攻的臂长，当他们疲惫时，就是反攻的时机。

但蒙古人早已不似当年，缺乏战斗力，又得不到统治区汉人的拥护，才让朱元璋完成了近代之前唯一一次从南到北的统一。

土木堡：蒙古旁支的逆袭

在河北省怀来县城东面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叫土木堡。这里曾经耸立着一座城堡建筑，可所有的防御设施都已荡然无存。土木堡看上去只是北方农村一个最普通的小村子。

如果仔细打听，可以找到一个电信发射塔下的小院子，现在是个卫生所。小院的角上有一座小庙，庙门紧锁，水泥的门楣上写着：显忠祠。整个建筑小到让人无法相信它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由于有了公路和汽车，从北京到土木堡只需要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向北出了北京城，经过居庸关，一过官厅水库，就到达了土木堡，公路距离不到一百公里。但这段微不足道的距离，在明代却成了一位皇帝无法走完的行程。

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大太监王振的怂恿之下，明英宗御驾亲征与属于蒙古人远支的瓦剌人（现在叫作卫拉特人）作战。二十万明军在太原附近与瓦剌人一接触，就感觉大事不好，连忙向北京撤退。

在北京的西方和北方，自古以来有两条路沟通了北京与北方草原，最著名的一条是从北京向北经过居庸关到达河北的怀来、张家口；另一条不那么有名，却也属于“太行八陉”之一，是从北京西面的易县翻越紫荆关，前往蔚县（也就是战国时期的代地）和大同。

明英宗从居庸关出兵去往大同，却在回师时犹豫不决。当皇帝最终选择了居庸关时，已经晚了。大军撤退到土木堡，被瓦剌人团团围住。此时，明军距离居庸关只有百里之遥。

土木堡处于高地之上，水资源缺乏，皇帝的大军饥渴难忍，掘地两丈都找不到水。瓦剌人的首领也先佯装撤退，皇帝立刻中计，以为是逃跑机会。当明军放弃了防守，拔营向南撤退时，也先杀了回马枪，将明军彻底击溃，二十万大军在瞬间消失。大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等大臣

死难。

皇帝在太监喜宁的陪同下，向也先投降。这就是历史上令人震惊的土木堡之变，也是蒙古人对中原王朝的又一次打击。

自从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建立了明朝，新王朝的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如何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明太祖和明成祖进行了多次得不偿失的北伐，以消灭蒙古人残余势力为目标。

真正让蒙古衰落的，不是明朝的进攻，而是内部的纷争。由于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即所谓的黄金家族）不断内斗，沉浸在光荣的过去无法跳出，反而是蒙古人的一个旁支卫拉特人得以壮大。

卫拉特人最早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他们就是广义蒙古的一支重要力量，那时候他们被称为斡亦剌。由于蒙古人居住在草原，而卫拉特的地方属于森林，卫拉特就是“林木中人”的意思。

草原上的居民已经进入了畜牧业时期，森林中却仍然以打猎为生，生活方式更加落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过程中，卫拉特人并非主角，却先后参与了扎木合的大联盟，以及乃蛮人塔阳汗的联盟，对抗成吉思汗，这两次联盟都遭败绩。

当成吉思汗将塔塔儿、克烈部、乃蛮人一一击破，卫拉特终于顺应了潮流，承认了成吉思汗的领袖地位，卫拉特人因此成了蒙古人的一支。由于他们很配合，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对卫拉特人也格外优待。在蒙古人的各个汗国中，卫拉特人出了不少皇后和妃子，也出了不少驸马。比如，在早期，卫拉特的首领就娶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女儿和术赤的一个女儿，他的女儿也嫁给了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当贵由成为第三任大汗时，这个女人就成了地位显赫的皇后。

由于扩大领地的需要，卫拉特人也从贝加尔湖岸的森林中走了出来，向西迁移到了蒙古的西北以及邻近的俄罗斯地方，居住在萨彦岭和唐努乌梁海一带，那儿有条大河叫叶尼塞河。

这里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带，在它的北侧是吉尔吉斯人，南侧是曾经的乃蛮故地。蒙古各大汗国扩张时，卫拉特人恰好居住在西南的察合台汗国、西方的金帐汗国、东方的元朝和蒙古本部之间，是各个汗国拉拢的对象。卫拉特人也在各个汗国之中服务着，不时帮助这个攻打那个，又帮助那个对抗这个。

元朝灭亡时，位于中亚和新疆的察合台汗国也处于衰落之中。明朝的军队始终不够强大，无法占据关外的广大地域，只能用长城锁链死守中原。卫拉特的各个部族乘机向四面扩张，他们进入了蒙古西部地区，占据了新疆的北部和俄罗斯、哈萨克的一部分，变得愈加强盛了。

当黄金家族的蒙古人被明朝击败后，卫拉特人甚至占据了乌里雅苏台到哈拉和林一带的蒙古中部，成为明朝不可小视的力量。这时的蒙古已经分裂成了以卫拉特人为代表的漠西厄鲁特蒙古（西蒙古）和以黄金家族为代表的东蒙古。为了对付蒙古人，明廷采取了合纵连横的方式。当东蒙古强大的时候，就支持卫拉特人，当卫拉特人强大的时候就支持东蒙古。但由于东蒙古从地理位置上夹在卫拉特和明朝之间，在三者的博弈中逐渐处于下风，地域广大的卫拉特部越战越勇，大有统一之势。

公元1418年，一位叫作脱欢的卫拉特人继承了父亲的首领地位，并统一了卫拉特各部。公元1434年，脱欢又战胜并杀死了东蒙古的首领阿鲁台，统一了东西蒙古。这是北元衰亡后，蒙古本部第一次获得了统一。只是权力已经不掌握在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手中，而是落入了卫拉特人之手。

由于遵从黄金家族成员才能称大汗的传统，脱欢并没有称大汗，他把一个叫作脱脱不花的黄金家族成员扶上了汗位，自己满足于“太师”的职位。

脱欢死后，他的儿子也先继承了太师之位。也先南征北战，卫拉特蒙古人的势力从朝鲜半岛起，联合了东北的女真人，横越整个蒙古大陆，包含了新疆北部地区、甘肃省的北半部、内蒙古的长城以北，直达中亚的楚河、塔拉斯河一带。

从地域上看，卫拉特人创造的大帝国足以和匈奴人、突厥人、柔然

人，以及蒙古帝国早期相媲美，一个新的游牧帝国正在冉冉升起。

最不愿看到这一幕的是位于中原的明朝皇帝们，他们把卫拉特人称为瓦剌，心怀惴惴地望着北方日益狰狞的邻居。但在如何对抗卫拉特人的策略上，明朝政府却采取了自伤和掩耳盗铃的做法。

一方面，明朝政府知道卫拉特人的强大，为了遏制他们，政府关闭了与卫拉特人的边贸，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方法。在明代，各个边境城镇出于税收和繁荣经济的目的是乐于设立集市的，但明廷认为，如果贸易过于繁荣，卫拉特人从中原得到更多的物资，会变得更加强大，威胁明朝的安全。他们下令限制与卫拉特人做生意，除了武器、金属等战略物资之外，甚至茶叶等生活物资也不准买卖。

明廷没有意识到，贸易永远是对双方有利的，限制对方的同时，也限制了己方的发展。正因为这个，明朝的边关永远只是不发达的边关，以军事目的为主，军人们生活艰苦，谁也不愿意长久待下去。

但明朝的禁止并不会消除卫拉特人的贸易，只会逼迫他们转向西方和南方，从西方获得金属和武器，从南方的藏区直接获得茶叶，将贸易链条绕开了明朝控制的区域。

绕开明朝的做法，又让明廷感到不安。北京政府不得不在禁止贸易的同时，开辟新的口子采取怀柔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进贡制度。

在明代，进贡对于外藩来说，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买卖。每次对方纳贡时，朝廷给他们的赏赐总是要超过纳贡的价值。外藩纳贡越多，获得的回报越丰厚。由于明朝禁止中外贸易，纳贡就成了外国人和中国做买卖的唯一机会，而且是有利可图的大机会，所以，外藩都抢着纳贡，而朝廷则要限制外藩纳贡的规模和次数。

比如，资源贫乏的日本为了获得明朝的奢侈品，就接二连三向中国皇帝进贡工艺品、木材、刀具等皇帝并不需要的东西，来换取奢侈品。由于日本进贡太频繁，来人太多，皇帝只好对日本做出限制，一方面对日本的贡品大幅度压价，甚至只给到日本人希望价格的六分之一；另一

方面规定日本人不得频繁地进贡，每十年进贡一次，每次只允许两艘船、两百人。

结果，这些限制根本无法满足日本人的贸易需求，日本就只好发展海盗行动，这就是倭寇时期。(3)所谓倭寇，并不纯粹是日本人的贪婪造成的，也是明朝政府限制贸易的结果，导致许多沿海居民与日本人勾结起来，对抗中央政府错误的贸易政策。

与日本人一样，卫拉特人也发现进贡可以赚钱。卫拉特的朝贡队伍也越来越庞大，最初一次的朝贡只有几十人，后来则达到几百人，最后有数千人之多。蒙古人还从朝贡次数上做文章，以前一年一次，后来则一年两次、多次。每次来人，一路上各个地方衙门就要出人出力提供马匹车辆、楼堂馆所，地方政府也叫苦不迭。朝廷在赏赐上的花费也越来越高，即便富有天下的皇帝也受不了，只得变相地允许蒙古人在边境处做一部分贸易，不用把所有的贡品都带往北京。即便这样，还是有大量的人拥入，随着卫拉特的强大，局面越来越失控。

公元1448年，当也先又派了一个号称三千五百人的大型朝贡团前来的时候，明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一面叫人严格核对人数，发现贡团实际上只有两千人；一面叫人按照实际人数以及蒙古人希望价格的五分之一付账。

明英宗的做法激怒了也先，第二年，他派出了庞大的骑兵开始进攻明廷。明英宗在宦官的怂恿下决定亲征，这才有了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后，也先乘机进攻北京，被于谦挫败。

这时，卫拉特人的势力达到了高峰，甚至人们开始担心它又会形成另一次帝国时代。但就在这时，情况却发生了逆转。也先的傀儡大汗——黄金家族的汗王脱脱不花——不再甘心受人摆布，开始反抗也先。也先只能杀死他，自己当上了大汗。

根据蒙古人的规矩，只能由黄金家族的人担任大汗，也先遭到了部下的反对，被部下杀死。

也先死后的卫拉特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威慑力，但没有人再能够统一

蒙古。黄金家族的人再次被拥立为汗王，却并不掌握实权。直到属于黄金家族的达延汗即位后，形势才有了改观。

达延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将卫拉特人赶出了蒙古的东部和中部。从此，卫拉特人开始定居在如今的新疆北部。只是，达延汗可以统一大漠南北，却无力再向中原扩张，蒙古人的时代过去了。

(1) Nevill Forbes, Robert Michell, A. A. Shakhmaton, Charles Raymond Beazley: *The Chronicle of Novgorod, 1016-1471*, BiblioBazaar, 2009.

(2) 这条路现在被称为唐蕃古道。

(3) 《续通考》卷二六：“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

第二十章　清帝国的新疆域（公元1618—公元1911年）

山海关不是明长城的终点，明代为了防范女真人，还修建了一条以山海关为起点，向东北到鸭绿江边的辽北边墙，因此，长城的终点在丹东市东北虎山南麓鸭绿江畔。

清朝之所以能够把漠南蒙古牢牢控制，是因为它建立了一套牢固的政治制度，将蒙古人分成了八旗二十四部，这些旗部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就这样，漠南蒙古的游牧民族就被中央集权化了，无力再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由于在漠北喀尔喀蒙古无法建立强大的控制，只好仍然采取招抚模式，这导致清朝灭亡后，两地出现不同的归宿。

清朝初期，蒙古人已经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其中漠西厄鲁特蒙古属于卫拉特人，也是清朝的劲敌。清初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清和准噶尔的碰撞史，且只能有一个赢家。

噶尔丹从新疆出发，攻克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并借道漠北喀尔喀蒙古进攻北京，被康熙皇帝击败。在噶尔丹之前，漠北喀尔喀蒙古不愿归顺清朝，但在噶尔丹的逼迫下，他们不得不依靠清朝对抗噶尔丹。清朝降服喀尔喀蒙古，可以说得到了噶尔丹的“帮助”。

准噶尔人为了进攻西藏，翻越昆仑山，纵穿了西藏北部的羌塘无人区。这个无人区至今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也是生命的禁区。

清朝击败了准噶尔人，获得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设立了驻藏大臣。又是准噶尔人帮助了清朝。

乾隆帝时期，下令平定了准噶尔人，使得这个割据势力除了留下一个名字，其余什么都没有剩下。清朝由此获得了北疆地区（准噶尔盆地）。

清军征服南疆，除了用军事手段之外，还运用了经济和政治手段：在征服地区使用当地人，进行怀柔统治；在未征服地区，以贸易的形

式，用布匹换取当地的马匹和粮食，从而削弱了大小和卓的叛乱力量。

清代的改土归流运动，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彻底并入了中央集权模式，成了现代政权的蓝本。

大小金川之战后，清朝从扩张帝国转换成一个内敛的朝代，在当时的地理和经济、科技条件下，中国已经达到了允许的最大边界。

西方人到来之前，中国的战争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陆地地形的把握，只要掌握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就可以依据地理条件来进行防御或者攻击；第二，注重战略，不注重武器。千百年来，中国战争武器的进步非常有限，很难有一方在武器上有绝对优势。

西方人到来打碎了这两个战略，他们从海上发起进攻，并利用坚船利炮获得速胜，对于中国而言都是颠覆性的。海权时代到来了。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明朝万历皇帝仍然沉浸在太平盛世的美梦中，在中国东北，一位女真人将领却发出了进攻明朝的宣言。

这份宣言列举了所谓“七大恨”[1]，表明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受到了明朝的七重伤害。实际上，宣言中所指的事件，只有第一条（明军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的确是巨大的伤害，其余的只能称为边境上的小型冲突。关于明军杀死他的祖父和父亲，还属于误伤，事实上，明朝与两人的关系很不错，他们是给明军带路时被误伤的。

所谓七大恨，带着很强的拼凑痕迹，与其说是双方已经陷入了不可原谅的仇恨之中，不如说只是一种战争的借口而已。

发表檄文后，兵马强壮的努尔哈赤在战争中屡屡获胜，明军陷入了彻底的被动。明代在辽东的疆域主要在辽宁省境内。我们常以为明长城是从西面的嘉峪关到东面的山海关，但实际上，为了防范东北的蛮人，明代还从山海关出发，向北方和东方修建了一道长城，起于辽宁省绥中县境内的锥子山，历经葫芦岛、锦州、阜新、盘锦、鞍山、辽阳、沈阳、铁岭、抚顺、本溪等市，直达丹东市东北虎山南麓鸭绿江畔，这道长城有另一个名字：辽北边墙。明代的疆域就在这道边墙之内，墙外是蛮人居住地。

努尔哈赤先是征服了墙外如今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广大地区，然后开始进攻墙内的抚顺和铁岭一带。他在抚顺以东的边墙外（现新宾县）建立了首都兴京，随后，以兴京为基地，在萨尔浒挫败了明朝的围剿。

明清之际，从北京前往辽宁地区的主要通道是山海关。这条路靠近海边，一面是松岭—黑山山链，另一面是大海，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连接辽宁的沈阳地区与北京，称为辽西走廊。在更遥远的古代，这里曾经是海边的烂泥地，唐宋时期，随着海退，人们开始利用这条通道，明代已经形成了坚实的土地，成了连接关内外最重要的孔道。

努尔哈赤经过了几次胜仗，已经接近了辽西走廊，却在这儿与明代锦州、宁远、山海关的守军对峙，无法前进。

努尔哈赤死后，儿子皇太极数次绕道进攻北京地区。除了山海关的辽西走廊之外，古代要进军北京，可以走河北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穿越燕山中的长城，到达河北和北京地区。这条路是山路，不便于进军。皇太极入关后只能形成骚扰战，劫掠一番就撤回关外，无法占领北京城。

皇太极进攻北京虽然失败了，他的进攻却已经造成了蝴蝶效应，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让明朝在内部崩塌了。

明朝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要对付清军的入侵，还要动用更多的军队。明政府只能靠加税来筹集军费，民间的税负普遍增加了一倍，社会经济的垮塌制造了大量的流民。

为了节省财政，甚至把驿站人员（驿卒）裁撤，这些走投无路的驿卒都变成了民间哗变的一部分。明朝的士兵由于兵饷不足，也频繁地闹事。

更意想不到的是，当清军进攻北京与河北地区时，从各地来的勤王军也纷纷造反。与清军作战的明军被打败后，逃兵们也加入了劫掠的队伍。

明朝就这样被大大小小的叛乱吞噬了。

叛乱分子经过多次整合之后，变成了两支著名的起义武装：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进攻四川建立了政权，而李自成更是从陕西进入山西，最后进攻北京得手，灭亡了明政权。

李自成进北京后，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随即投降了清廷，使得清廷获得了辽西走廊的控制权。一个政权的内部垮塌竟然如此彻底，对清廷而言，天险得来全不费工夫。

对于历史学家，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金国灭亡北宋之后，宋王室随即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并存在了一百多年。为什么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在南方却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南明政权呢？

这同样和明朝坍塌的形式有关。北宋虽被灭亡，但社会结构仍然存在，即便在北方区域内，也有着大量的自治势力组织民众与金人对抗。在南方，也形成了坚强的抵抗核心，并不时有北伐的举措。

明朝的坍塌却是来自内部，由于王朝过于集权化，当清人入侵后，随着民间反叛的兴起，集权式政府就彻底失灵了，它的失灵又导致了社会的崩塌。当清军占领北京后，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竟然没有成型的反抗力量。

另外，由于明朝的集权化过于严重，官僚们的能动性更小，不敢自己当家做主，没有了主子，就要赶快再找一个主子。许多地方不仅不反抗，反而在等待着清军的南下和占领。他们没有反抗意识，更没有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和对清朝的愤恨。

在南方，虽然明朝的宗室也建立了南明政权，但内部的不协调与纷争毁掉了南明政权的抵抗能力。结果，清军南下势如破竹，各个击破，南明的残余势力兵败如山倒，只能一次次南逃，从江淮地区撤到了浙江、江西，再继续退往广东、福建、云南。清军压境云南时，又只能从云南撤往缅甸。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缅甸人交给吴三桂杀害后，明朝宗室领导的抗清活动就彻底消失了。[(2)]

在元代，由于元政府在南中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和税收机构，导致南方分崩离析。在清代，皇帝对汉族区域的控制要比元朝彻底得

多，也造就了清朝两百多年的江山。清政府是中国中世纪制度中最完善的，它采取了经济上宽容民间，但政治和思想上强力控制的方式，保持对社会的牢牢掌控，却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不是外来入侵，清朝也许还会多维持一两百年。

清朝的统治给现代中国也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我们现在的地理基础就是清朝打下的。在中国，完全帝国模式的王朝只有两个，除了元朝之外就是清朝。明朝是一个内敛的国家，其有效疆域大都限于如今汉人主导的地区，清朝的帝国主义传统却将西藏、新疆、蒙古、川西的广大地区纳入了中原的有效统治，这些区域占现代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

作为本书的结尾章，我们不去追究清军在中原的作战，因为它利用的山川地理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无数次涉及。本章只对清军在汉域之外的征服进行回顾。

黄金家族的黄昏

清朝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是对中华帝国外围地区的控制，这些地区人口稀少，却拥有着巨大的地理价值。在孱弱的朝代，它们独立成为一个个小国，即便在强大的朝代面前，它们虽然称臣，却保持着一定的独立行政权。

清朝不仅控制了这些地区，还通过改土归流将许多地方变成了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在其余的地区也派去了驻军，使得它们再也无法从中央帝国分离出去。

在所有的地区中，最早被清朝人征服的是如今的内蒙古地区。

满洲时期，蒙古人已经分化成了所谓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个部族。明朝时蒙元王室后裔回到漠北，传承了数代，被卫拉特人脱欢和也先所取代。但也先强盛过后，蒙古黄金家族再度复兴，成吉思汗的后代达延汗成了蒙古人的首领。达延汗死后，蒙古本部被划分成了漠南和漠北两部分。漠南继承了大部分的人马，由达延的长子统治，而漠北则留给了小儿子。这就是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的来历。

卫拉特人衰落后，向西方逃窜，进入了如今的新疆北部地区和青海省，构成了漠西厄鲁特蒙古。

这三个蒙古再继续划分，在漠南蒙古又分为察哈尔部、科尔沁部和喀尔喀部，察哈尔部就是达延汗的后代，是漠南蒙古的主体。科尔沁部靠近东北地区，是比达延汗更早的移民。喀尔喀部则是元代大臣的后裔，位于科尔沁部和察哈尔部之间。在距离满洲人较近的地方，还有满洲人（杂有蒙古人血统）的扈伦诸部，包括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等部族。

漠北喀尔喀蒙古分成了三个部分，从东到西分别是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清招降漠北喀尔喀蒙古时，又增加了一部叫作

三音诺颜部，构成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四部。

在漠西厄鲁特蒙古，卫拉特人也分成了四部，分别是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和硕特部占据了新疆乌鲁木齐一带，随着准噶尔部的崛起，又被排挤到了青海地区。土尔扈特最初在新疆塔城一带，后来被准噶尔人排挤，迁往了欧亚边界的伏尔加河地区。杜尔伯特部在北疆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准噶尔部最初在新疆伊犁河流域，后来扩张征服了杜尔伯特部，赶走了土尔扈特部，将和硕特部逼往青海，并征服了南疆的维吾尔人，成了新疆地区的霸主。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除了进攻明朝、降服朝鲜之外，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这些蒙古部族上。最先被收复的是同属于满洲人的扈伦诸部，其次轮到了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

科尔沁部与满洲人关系密切。虽然两者曾发生过战争，可是，当从正统的察哈尔部诞生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林丹汗时，情况出现了变化。科尔沁人发现，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度，与其接受林丹汗的统治，不如与满洲人结盟对抗林丹汗。这样，蒙古科尔沁部就成了满洲人最早和最忠实的盟友，在历次作战时都能看到科尔沁人的身影。

收服了科尔沁部之后，满洲人要对付的是漠南蒙古的喀尔喀部。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在努尔哈赤与明发生战争时，喀尔喀部的首领参与了纷争，被努尔哈赤擒获。

这次失败并没有让喀尔喀部完全臣服，它不时发动叛乱。但这部分蒙古人夹在几大势力之中，一面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一面是满洲与科尔沁联合体，另一面则是南方的明王朝，在三方势力的压迫下，喀尔喀部最终投向了努尔哈赤。

到这时，蒙古境内只有强大的林丹汗能够与努尔哈赤对抗了。林丹汗的统治中心在元代的上都、忽必烈当年所建的开平。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率领科尔沁、喀尔喀联军向林丹汗进军。林丹汗的暴虐导致了内部的叛乱，更削弱了他的力量。他被赶出了蒙古故地，向青海境内逃窜，死在路上。

清朝之所以能够把漠南蒙古牢牢控制，是因为它在蒙古建立了一套牢固的政治制度。在历代对付蛮族人时，总是无法将中央集权制度推行到蛮族，只能满足于对方的臣服权，但行政权仍然保留给了对方。一旦中央政府控制力下降，对方立刻反叛。

清政府却在漠南蒙古推行了一套与满洲类似的旗人制度，将蒙古人分成了八旗二十四部，这些旗部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就这样，漠南蒙古的游牧民族就被中央集权化了，无力再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

但这套制度在漠北喀尔喀蒙古实行得却并不彻底。清朝在征服了漠南蒙古之后，漠北喀尔喀蒙古也顺势归顺。但清朝对漠北喀尔喀蒙古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招抚上。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部表面上归顺于清政府，行政权却相对独立，清政府的控制并不牢靠。

直到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被打败之后，漠北喀尔喀蒙古才彻底归顺，但是独立性仍然大于漠南蒙古，融合的时间又不够长。清朝灭亡时，漠北喀尔喀蒙古也分离了出去。

清朝取代了明王朝，又征服了漠南蒙古，臣服了漠北喀尔喀蒙古之后，有一个人却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自认为是又一个成吉思汗，拥有着建立新帝国的野心，与清政府对抗了一辈子。但他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正是他帮助清朝获得了新疆、青海、西藏，并迫使漠北喀尔喀蒙古彻底投靠了清朝。

这个人就是准噶尔人噶尔丹。

准噶尔：最后的蒙古帝国

在如今蒙古西部，阿尔泰山和杭爱山之间，有一个叫作科布多盆地的平原，盆地的中央至今耸立着一座数百年的兵营废墟。

废墟在现代科布多城的北面，只剩下了一圈残破的泥土城墙。城墙的残高不超过三米，变得处处豁口，有些墙体已经夷平不见，但整体还能看出是个方形。

城墙里的建筑一概不剩，只是偶尔能在地面上看出一点点隆起，那可能是当初的官衙。根据记载，城区曾经有一座官衙和七座寺庙，现在都不见了踪影。另外还有一些几何形的土垄，那或许是建筑残存的墙体，或许是菜地的痕迹，而直线形的凹陷就可能是水渠。

曾经熙熙攘攘的城门也变成了一片土堆，在这里生活过的士兵们早已成了尘土。城墙里残存的大树或许来自当年的中国人，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树下，牛在吃草，孩子们在玩耍，一切显得和平安详。

整个古城区除了北部的数顶帐篷之外，没有任何持久性的建筑。在北面的城墙外，紧挨着城墙，当地居民建设了一批房屋，低矮、破旧，建造房屋的泥土可能就取自城墙。

城北方是巍峨的红羊山，整座山体都是红色的，形状奇特，让人产生敬畏。

这座城市在民国时期被一个叫作假喇嘛的军阀所焚毁，当地居民在古城的南部又建起了大片的建筑，就是现在的科布多城。

如今的科布多城属于穆斯林和佛教徒的混住区。这里有哈萨克人，也有卫拉特蒙古人。距离古城不远处是一座带着金顶的清真寺，清真寺马路对面，有一个不起眼的佛教寺院。对比巍峨的清真寺和渺小的佛寺，可以看出，占据主流的宗教已经变成了伊斯兰教。

科布多的市中心耸立着一座小型的剧院，旁边是苏联式的政府大

楼。大楼的前面竖立着两座雕像，其中一座，是为了纪念一位卫拉特将领，在他的雕像基座上写着：噶尔丹，1644—1697。

噶尔丹是最后一个蒙古帝国的建立者。他属于卫拉特人中的准噶尔部。

科布多曾经是一座准噶尔人的城市，但现在这里住的却不是准噶尔人。清代的乾隆皇帝平定了准噶尔割据势力后，把另一支卫拉特人杜尔伯特部迁到了这里，科布多就变成了杜尔伯特人的大本营。

不过，杜尔伯特人仍然记得噶尔丹，建造了这座雕塑来纪念他。

在清朝征服了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时，西方的新疆地区还有一个足以与清朝掰手腕的漠西厄鲁特蒙古政权。漠西厄鲁特蒙古属于曾发动土木堡之变的卫拉特蒙古人。

在土木堡之变后，卫拉特人衰落了，从漠北蒙古迁移到了新疆北部，并分成了四部，分别是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起初和硕特部最强盛，但随后被准噶尔部取代。准噶尔部逼走了土尔扈特部，降服了杜尔伯特部，并将和硕特部赶到了如今的青海省境内。随后，准噶尔人又征服了南疆的维吾尔人，将整个新疆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其影响力直达中亚。

准噶尔和清朝分别占据了中国北方的东、西两端，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建立更大的帝国。幸运的是，清廷最终获得了中原。如果是西方的准噶尔人获胜，很可能建立一个更偏向于西部的政权，放弃中华传统。

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年轻时曾经在西藏学习佛法，他的一位同学叫桑结嘉措，后来当上了西藏的摄政王（第悉），噶尔丹本人也获得了达赖喇嘛的封赏，形成了准政教合一的体制。他拥有蒙古人的身份，又占据了新疆，持有西藏的信仰，这种背景很可能让他建成一个横跨蒙古、新疆、西藏的大帝国，并向中原和中亚扩张。

即便他不占领中国，只要他统一了蒙、疆、藏三部，那中国就被封

锁在东亚地区，从陆路上与中亚相隔绝，丧失了与丝绸之路上各国的联系。

清廷征服漠南蒙古、中原，并让漠北蒙古臣服之时，恰好也是噶尔丹扩张的高峰时期。作为蒙古人，统一了新疆之后的噶尔丹首先想到的，是继续统一蒙古各部。噶尔丹最魂系梦萦的就是成吉思汗发源的漠北蒙古地区。

噶尔丹的大军从新疆进入蒙古西部，横扫了漠北蒙古四部，获得了漠北蒙古的控制权。

漠北蒙古的喀尔喀人属于黄金家族，并不想接受支系的噶尔丹统治，他们宁愿逃到清朝求救。漠北蒙古的求救给了清政府机会。四部与清朝原本只有松散的宗主关系，清朝想插手他们的内部事务，会立刻遭到反对。但噶尔丹入侵后，四部已成丧家之犬，只好彻底臣服于清朝，让清朝拥有了干预行政的权力和驻军权。

获得漠北蒙古后，一个新的计划也在噶尔丹的头脑中形成：借道漠北蒙古，从漠北蒙古东部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再南下北京进攻清王朝。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意味着准噶尔人将成为中国新的主人。

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噶尔丹借口清剿喀尔喀人，从漠北蒙古东部到达了位于中蒙边境的呼伦湖，从呼伦湖南进，越过贝尔湖，进入察哈尔部的属地。他击溃了漠南蒙古的部落联军，向北京前进。

为了抵御噶尔丹，康熙皇帝派遣大军从喜峰口和古北口北进，迎击噶尔丹，相遇在了如今赤峰附近的乌兰布通。

两个处于扩张期的游牧民族战斗力都很强，幸运的是，双方的火力水平却决定了战争的成败。

在与明军的交战中，清军已经火器化了，在清朝的部队中有了专门的火炮部队，使用的是威力巨大的红衣大炮。噶尔丹由于地处内陆，仍然以传统的骑兵为主，他赖以扬名的是大量的骆驼组成的驼兵部队。

在与其他部族交战时，骆驼兵的快速行进和吃苦耐劳成了准噶尔胜利的保障。但当噶尔丹的骆驼兵碰到清军的红衣大炮时，立刻处于劣势。在炮兵营的轰击下，骆驼阵崩溃了。噶尔丹沿着来时的路退回了漠北蒙古境内。

在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和中国时，在他的老巢新疆，一位年轻人——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了针对他的叛乱，控制了新疆地区。策妄阿拉布坦为了对付叔叔，立刻承认了清政府的权威。

当噶尔丹退回漠北蒙古时，发现已经无法回新疆了。他试图以武力进攻策妄阿拉布坦，却以失败告终，这位野心勃勃的君王拼尽一生，却发现无家可归了。他盘踞在漠北蒙古西面的科布多城等待机会。

更糟糕的是，康熙皇帝为了对付他，决定御驾亲征。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只有明成祖和清初诸帝能够进入北方茫茫的草原。双方在如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南面的昭莫多遭遇，并展开了大战。这次仍然是清军的火器决定了成败，准噶尔人留下如山的尸堆，逃走了。噶尔丹最后的根据地也失去了。

离开漠北蒙古后，噶尔丹试图回新疆哈密地区，却被拦截。他只好南窜宁夏，试图经过青海，回到他曾经学习的西藏。这一次，他又被清军所阻。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自杀。

他死后，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却继承了他的野心，准噶尔人的战乱仍然没有结束。

西藏并入帝国疆域

在明代，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归顺附属关系，中央是西藏的宗主，实际的行政管辖权却有限。到了清代，最初中央政府也仅仅保留了象征性权力。

当准噶尔人把和硕特部赶到青海之后，和硕特部与西藏的关系密切起来。西藏正处于教派的内斗时期，达赖喇嘛虽然经过几次转世，但仍然只是众多的活佛之一，并没有掌握西藏的行政大权。

五世达赖为了控制西藏，邀请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从青海前往西藏，帮助他统一西藏。

和硕特蒙古由此和西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联，从理论上，达赖喇嘛是军事和民事的最高领袖。但实际上，却是由和硕特部的汗王出军队保卫西藏，而西藏的民事则掌握在达赖喇嘛任命的一位摄政王的手中。通过这种安排，和硕特部就在西藏拥有了极高的地位。

噶尔丹时期，他的同学桑结嘉措当上了摄政王，勾结噶尔丹杀掉了和硕特部的车臣达延汗（固始汗的儿子）。这时，拥有极高威望和权力的五世达赖喇嘛也去世了。摄政王桑结嘉措为了继续掌握权力，故意隐瞒了达赖去世的消息，迟迟不任命六世达赖，自己掌握了政权，代替死去的达赖喇嘛进行统治。

噶尔丹死后，和硕特部的拉藏汗见桑结嘉措没有了靠山，乘机从青海进入西藏，杀掉了桑结嘉措，和硕特部再次掌握了西藏的控制权。

取代了噶尔丹的策妄阿拉布坦同样野心勃勃，妄图建立庞大帝国。由于西藏掌握了蒙古人的信仰，他首先征服的目标就是西藏。

策妄阿拉布坦组织了一次极端大胆的攻击。[3]在清初，从外界进入西藏的常用道路只有三条，分别是从四川进入西藏的炉藏官道、从青海进入西藏的蒙元大道，以及从尼泊尔进入西藏的蕃尼古道。最后一条路是通外国的道路，不做讨论。

另两条路中，炉藏官道从四川西部的打箭炉（现四川省康定）折向北方，经过道孚、炉霍、德格、昌都、洛隆、边坝、嘉黎，最后到达拉萨，大略相当于从康定折向川藏北线，在昌都再走游人稀少的川藏中线到达拉萨。蒙元大道则由蒙古人开辟，从青海西宁出发，向南到达玉树地区，再折向西南，经过黑河（现西藏那曲）到达拉萨。和硕特部进攻西藏，大都走蒙元大道。

除了这三条常走的道路之外，在西部的阿里地区，还有一条与新疆喀什地区连接的克里雅商道，但由于过于艰险，很少有人使用。在克里雅商道与蒙元大道之间，则是一千多公里长的羌塘无人区。以昆仑山为界，山南是西藏高原的羌塘，山北则进入了新疆塔里木盆地。在历史上，羌塘无人区是令人谈之色变的死亡地带，几乎有进无回。

策妄阿拉布坦派出大将策凌敦多布进攻西藏，恰恰选择了这个不可能路线。策凌敦多布先是跨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南疆，再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昆仑山，进入了西藏羌塘无人区，一路向南到达拉萨。由于他选择的道路过于惊世骇俗，拉藏汗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出现，于是战败被杀，准噶尔人占据了拉萨。

策凌敦多布占领拉萨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康熙帝派遣大军一万三千人从青海（走蒙元大道）进入西藏，援助西藏人驱赶准噶尔人。大军进到了藏北的那曲地区，与准噶尔人遭遇。由于地处高寒，粮运困难，加上地形不熟，清军被准噶尔人袭击了粮道，弹尽援绝，支撑了百余日之后，全军覆没。这是清军在西藏地区的最大损失。

康熙帝听说大军失败，立刻决定再次起兵。他吸取了前次的教训，决定从四川和青海两方面同时进军。大将岳钟琪率军从四川沿炉藏官道直扑拉萨，与此同时，大将延信的军队从蒙元大道也到达了那曲地区。

准噶尔人由于在拉萨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受到了西藏人的反对，他们立足不稳，在岳钟琪的打击下，向北逃窜，在那曲地区又被延信击溃，狼狈逃走。

赶走了准噶尔人之后，清朝乘机在西藏地区建立了统治基础，设立了驻藏大臣。虽然日常行政工作仍然由当地政府负责，但驻藏大臣拥有否决权和重大事务决定权。清政府还规定了达赖喇嘛的转世规则，除了由当地人寻找达赖转世之外，还规定必须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仪式，加强了喇嘛转世的监督。同时，清政府开始扶持另一个大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并将后藏的部分地区划给了班禅，试图在达赖与班禅之间形成平衡。

经过了改造的西藏虽然仍然有很大的独立性，却已经嵌入了清政府的制度框架之中，形成有效管理，与其他更遥远的属国区分开来，西藏的特殊架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基础。

西藏归附后，准噶尔人或叛或附，仍然是清政府最大的敌人。康熙帝之后，雍正帝和乾隆帝都曾经为征服青海和新疆的蒙古人殚精竭虑。

直到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才最终平定了不驯服的准噶尔人。此时距离清朝建国已经一百多年，花了几代人的工夫才最终将西部和北部的巨大疆土收入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中。

作为独立性最强的准噶尔人，在乾隆时期遭到了灭顶之灾。这个部族曾经控制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却只有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4)乾隆皇帝对这个民族恨之入骨，必让这片土地上不剩一个准噶尔的后代。(5)曾经的庞大帝国，以种族灭绝而告终。

在新疆的土地上，只留下了一个准噶尔盆地的地名，却再也没有了当年那个英勇的种族。

南疆的臣服

在准噶尔与清王朝争夺霸权的斗争中，现在新疆南部的维吾尔人地区最初从属于准噶尔人，当清廷获胜时，又成了清朝的附庸。

维吾尔人在唐朝时称为回纥人，居住在蒙古境内。在回纥人之前，蒙古居住着突厥人，随着突厥帝国的崩溃，回纥人占据了突厥人的领地。在唐末，回纥人又被吉尔吉斯人击败，逃往了河西走廊地区和新疆东部。随着蒙古人的兴起，回纥人继续南迁来到了现在的南疆地区，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各个绿洲上，选择了伊斯兰教作为他们的宗教。

当北疆的准噶尔帝国扩张时，维吾尔人地区由于信奉了伊斯兰教的不同支派，分成了白山派和黑山派两大势力。由于黑山派占了上风，噶尔丹以支持白山派为借口入侵南疆，扶持了白山派的首领，建立了傀儡政权。

随着准噶尔的灭亡，南疆表面上臣属于清朝。领导南疆的是两位兄弟布罗尼特和霍集占，当地人尊称他们为大和卓、小和卓。出于对独立的渴望，他们发兵对抗清王朝，于是大小和卓之乱爆发。

大和卓的基地在喀什，小和卓的根据地在叶儿羌（现新疆叶城）。兄弟两人起兵从南疆出发，沿塔里木盆地的西北沿，向中部重镇库车进军。但兄弟两人却被清军击败，被围困在库车城内。只是由于清军将领的疏忽，他们才逃回了南疆。

大小和卓出兵失败后，就轮到清军出击了。为了彻底征服大小和卓，清朝将军兆惠率军向南疆两和卓的老巢进军。兆惠首先进攻了叶儿羌，不想这次他又被围困在了叶儿羌，情况危急。

三个月后，清朝才发兵解救了弹尽援绝的兆惠，撤回了库车。

经过了此次围困，兆惠等人意识到，由于地理广阔，仅仅依靠战争是不可能获得南疆的。

由于大小和卓在战争筹款时，对当地人进行了严苛的压榨，加上用人不当，已经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兆惠展开了政治战和经济战。

一方面，在已征服地区进行减税，并任用当地人担任首领；另一方面，将南疆奇缺的物资如布匹运送来，与当地人交换粮食和马匹。南疆虽然缺少布匹，但布匹并不是必需的军事物资，而粮食和马匹却是战争最不可或缺的。清军利用这种隐蔽的措施，逐渐削减了大小和卓的军事优势。

兆惠再次发兵时，大小和卓已经很难抵抗清军的入侵。他们逃往了境外的巴达克山（现阿富汗境内），被当地人杀死后送给清军。

大小和卓的灭亡，让清政府获得了新疆的最后一块领土——南疆，也是新疆地区最富裕的所在，最终彻底统一了新疆。

清政府征服南疆的过程也预示着在未来统治新疆的思路。作为不随意屈服的民族，维吾尔人并不害怕战争，却又有着过好日子的渴望。只有理解和支持了他们的愿望，采取怀柔的政策，避免高压，才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同与支持。

作为最后一块征服的土地，新疆仍然是不稳定的。清代后期，新疆还发动了一系列的叛乱，但每次叛乱都作为契机，反而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即便在沙俄手中丢失了部分领土，但作为主体的新疆最终保持了下来。

大小金川：帝国扩张的极限到了

除了新疆、西藏、蒙古等新获得的领土外，清政府在一些内属的领土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在中国历代的历史地图上，人们往往习惯于夸大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比如，秦代已经在广东地区建立了郡级行政单位，但实际上，秦只能控制广州等城市周边很小的区域，而出了城市，进入广大山区之后，这里的山区居民并不归秦管辖，秦也不熟悉山区的地形和社会结构。广东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央帝国，却充斥着化外之地。

明代，在南方和西方各省仍然存在大量的化外之地，比如湖南、湖北西部，贵州、广西、云南的山区，以及四川西部。这些山区的居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仍然过着近乎独立的生活。

中央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的控制力，往往满足于给部落首领加封一个官职，委托他进行统治，算是“归化”了他们。但实际的行政权仍然由首领们单独行使，中央政府无权干涉。首领死后，权力归他们的子女，不能由中央政府撤换。这些首领就是所谓的土官（或者土司）。

清代是对这些山区居民征缴最激烈的朝代，基本上将位于湖南、湖北、广西等地的山区飞地消灭，废除了土司制度，设立了行政区划，派遣外地的官员前来管理，这些官员就是所谓的流官。

即便在贵州、云南等更加偏远的地区，改土归流运动也在进行之中。中央政府习惯于把少数民族不服从中央称为叛乱，但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对原本近乎独立地区的合并运动，将它们整合到中央集权统治管理的框架之下。

在清代发动的所有的合并行动中，四川的大小金川反抗是规模最大的两次。

在北京西北方，颐和园通往香山的香山路上，路的北面是一排连绵的小山，这些小山北邻百望山，东临香山，南面则是玉泉山。在小山里，有许多成为废墟的石头堡垒。堡垒的墙壁异常高大，如同体格巨大的房屋，带着如同城垛的牙豁。这些堡垒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

在四川西部的金川、小金和丹巴县境内，则有众多的碉楼，这些碉楼是石头所砌，高达几十米，如同巨大的烟囱三五成群地屹立在群山之中。

人们很难想象，北京的废堡垒与四川的碉楼实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两者长得不怎么像，但北京的堡垒是四川碉楼的仿制品。当年乾隆皇帝在攻打四川西部大小金川失利后，知道当地的碉楼是清军行动的最大障碍，特别在北京仿造了碉堡，用来练兵。直到现在，北京山中的堡垒仍然作为当年大小金川之战的遗迹而存在。

在四川省西部，有一条重要的长江支流叫大渡河。大渡河上游，在丹巴县附近由两条河汇聚而成，分别是东面的小金川与西北面的大金川。四川省现在有两座县城，金川县和小金县，分别坐落在两条支流上。

大小金川总人口只有几万人，但从大金川第一次叛乱，到第二次被征服改土归流，一共经历三十年（从公元1747年到公元1776年），其中热战时期也有十三年。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当地表现强势，欺凌周边，清朝派遣川陕总督张广泗前往镇压。由于大金川位于川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易守难攻，加上碉楼的保护，张广泗竟然吃了败仗，被乾隆帝斩首。

皇帝再次派遣名将岳钟琪前往，大金川才投降。这次战争经历了三个年头，以莎罗奔投降、皇帝赦免而告终。虽然只是一个小土司，清朝却一共花费了白银两千多万两（相当于鸦片战争的赔款额）才镇压下去。

公元1766年，乾隆帝再次联合当地九名土司征讨大金川。但这次征

讨让当地土司们意识到，如果他们土著人不团结，清廷会将他们一一击破，土司未来的权力只会更小。于是，经过时断时续的战争状态后，原本与清廷结盟的小金川反而加入了大金川的叛乱。

这次叛乱直到公元1776年才告平定。清军动用了六十万人，花费了七千万两白银。由于地域狭小，具体的战争并不复杂，大多数时候是清军对堡垒的围困，却无法攻克。

大小金川之役以当地的改土归流而告结束，却预示着中央帝国的边界已经扩大到了极致。由于地理的限制，清廷哪怕想再往外扩展，都由于群山的阻隔，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一个数万人、数百里的小地方在借助了地理优势之后，都必须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用如此长的时间才能攻克，那么，在更广阔的中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几乎不再具有扩展空间了。

从这时开始，清朝从扩张转换成一个内敛的朝代，在当时的地理和经济、科技条件下，中国已经达到了允许的最大边界。它带着更大的野心，却服从了客观条件的限制。皇帝们不知道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到来。

海权时代的来临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在通州与北京之间一个叫八里桥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改变中国战争观念的血战。

通州是古运河的终点站，漕粮从南方运到通州后，再经过一条细小的河流通惠河运往北京城。八里桥就在通州与朝阳区交界的通惠河上。

这一年，骁勇善战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三万骑兵和两到三万步兵，在八里桥一带布防，准备迎战从海上来到的英法联军。

在之前一年，僧格林沁在天津的大沽口打败了英法联军，击毁击沉了英国四艘舰船，打死打伤英法士兵五百多人。

然而第二年，卷土重来的英法联军依靠着阴谋诡计从大沽口北面的北塘登陆，绕到了大沽口炮台的后面进行攻击。炮台的大炮都是固定的，只能对海上射击，无法覆盖后方的陆地。英法联军攻克了大沽口，并占领了天津。

随后，联军向通州挺进，接近中国的首都北京城。在八里桥作战三天之前，僧格林沁已经在通州的张家湾与英法联军发生了一次遭遇战，战斗以清军撤退告终。

外国人的进攻之路是一条全新的、看上去充满了风险的路线。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依靠陆地，借助山川之胜进行防守。以北京为例，自古以来，北京的威胁大都来自北方和西方的游牧区域。在游牧区域与北京之间，隔着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只要把守好燕山和太行山上的几条孔道，就基本上保证了北京的安全。

有时候北京也会受到南方的威胁，北京之南是华北平原，千里平原不容易防守，必须借助平地上的几条小河，在保定到沧州之间建立防御型的城寨，驻扎大量军队，依靠军队的机动性进行防御。

如果北方、南方、西方的兵力部署得当，北京就可以保证安全无

虞。

在古代的军事家看来，最不可能出事的是北京的东南方。原因很简单：北京东南方的天津面朝大海，而海洋对古人就是一面无限高度的墙，没有人会从海上进攻北京。因此，这里是不用设防的。

西方人的到来终于打破了这条铁律，他们第一次从海上进攻中国。但清朝将领们似乎并不担心英法联军的到来。海上进攻看起来是出其不意，但船只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英法联军能够运送上岸的不超过一万人。北京和天津之间是一马平川，缺乏战略地形，进攻部队即便登上了岸，也是背水而战，没有退路，很可能被拥有优势兵力的防守方消灭。

僧格林沁为了准备八里桥歼灭战可谓下足了功夫。张家湾之战虽然清军撤退，但这只是大战的前奏，战后，清军的主力不仅还在，甚至还得到了加强。

在八里桥布防时，僧格林沁投入了华北地区最精锐的部队，包括蒙古科尔沁、察哈尔部的野战骑兵。在清朝，除了与太平天国打仗的湘军、淮军之外，蒙古骑兵是最骁勇善战的部队。

英法联军总数不超过一万人，僧格林沁用六倍的兵力进行决战，拥有了必胜的把握。

英法士兵们并没有意识到清军已经做了埋伏。早上七点左右，他们从村子里出来列队上路，显得很随意。就在这时，突然从树林冲出了许多蒙古骑兵，他们目标分成了两个：第一，从正面冲击敌人；第二，企图绕到侧翼冲击敌人的后方。另外他们还布置了二十多门大炮，对英法阵地进行轰击。

一方是准备充分，另一方是仓皇上阵。谁胜谁负是可以预期的。

但战争的过程却超出了清军的理解。侧翼的包抄确实让英国军队中的印度部队慌了阵脚，一度距离敌人只有二三十米。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十米却成了无法突破的障碍。蒙古人的马刀无法落到敌人的脖颈上，就被枪炮撂倒，无法前进。

正面冲击也同样无法奏效。英勇的蒙古人一茬一茬倒下，又一茬一茬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英法联军只能无奈地一次次装填子弹、射击。

战斗结束时，最英勇的蒙古骑兵部队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有的死亡，有的溃散。通往北京的大门敞开了。咸丰帝听说了战斗的结局，立刻决定逃往热河避难，将北京城留给了联军去劫掠。

西方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战争哲学。在这之前，中国的战争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陆地地形的把握，只要掌握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就可以依据地理条件来进行防御或者攻击；第二，注重战略，不注重武器，千百年来，中国战争武器的进步非常有限，很难有一方在武器上有绝对优势。

但西方人到来后所展现的却是另一种战争的可能性：依靠科学技术，跨越地理障碍，从原本不可能的方向发动袭击；利用先进武器，可以达到以一当百甚至当千的作用。僧格林沁的战术没有问题，但落后的武器系统却让任何战术都无法奏效。所谓战术，必须在双方武器基本对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施展。

一旦以前的战争规则都失效了，海洋不再是屏障，反而成了最危险的所在，武器的差距之大让军事家失业了。这意味着，敌人可以从海岸的任何地方实施打击，并且都能获胜。清末的主战场已经从秦岭、太行山这些地理要素转移到了广州、天津、大连这些海滨地区。

海权时代到来了。

直到清朝灭亡，整个国家都没有从海权冲击的休克中缓过神来。

但是，海权时代的到来，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都成了废纸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一旦武器再次获得了均势，一旦防守方将海防也纳入了战争考量，以往的经验会再次复活。

清朝之后的陆地战争又回到了旧的地理限制之中，当日本人侵略中

国时，国民政府与八路军分别选择了中国西部的高山地区进行机动。日本人虽然从海洋出发，占据了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平原地区，却由于缺乏制高点，始终无法完全征服中国。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类似于黄巢机动作战的翻版，依靠机动寻找薄弱地区，等待对方政权财政失衡引起崩溃。长征在路线选择上，与当年蒙古人进攻大理有很大的重合，蒙古人顺着川西、甘南向南进攻，如果把路线倒过来，就是红军北上的线路。

当公元1949年国共双方在长江对峙时，仗还没打，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告诉我们，南京地区的命运不在长江，而在于淮河。淮海战役失败后，国民政府丢失了淮河，已经注定无法坚守长江了。

未来的战争如果在海外发生，制空权与制海权依然是最重要因素。可战争一旦回到本土，或者到了占领土地与建立政权的阶段，决定性的，仍然是那千年不变的山川地理。

(1)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顾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此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此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留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遗书诟言，肆行凌辱，此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

(2) 清朝建立后，发生了三藩叛乱，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号召北伐。但这次北伐更多是异族统治和削藩引起的官僚阶层的反抗，与对明朝的忠贞无关。由于吴三桂选择从四川、陕西进军（类似于蜀汉的诸葛武侯北伐），道路遥远，对华北地区没有形成有效威胁，叛乱很快就失败了。三藩叛乱的结束，更帮助清政府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南部。

(3) 这次战争成了本书作者的小说《告别香巴拉》的历史背景之一。郭建龙：《告

别香巴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4) 魏源《圣武记》卷四："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

(5) 魏源《圣武记》卷四："一激再激，以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殁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附录　全国战略要地简述

地 名	地理位置	重要性描述	战 例
关中平原	现陕西省以西安为核心的渭河平原	秦汉以前，关中平原是中国兼具了形胜和富饶的核心区域。它北面有北山山系和陕北高原，西面是六盘山和陇山，南面是秦岭，东面是崤山和黄河。著名的关中四塞保护着它的安全。如果同时拥有了关中、汉中和四川，就有了从上游统一全国的资本。但东汉以后，随着中原更加富裕，以及长江流域的开发，关中的重要性降低。唐代是最后一个立足于关中的统一王朝	秦借助关中统一全国。刘邦以关中为基地击败项羽。唐朝从山西攻克关中后建国
洛阳盆地	洛阳周围，伊河与洛河形成的小平原	秦汉以前，洛阳的重要性仅次于关中，它西有崤	光武帝先取洛阳，再入关中。隋末李密与王世

		山、北有邙山、东有恒山、南有龙门，也是个典型的四塞之地。洛阳盆地虽然不大，却与中原腹地联系紧密，可以借助中原粮仓。同时，它比中原又拥有更多的地理优势。在水路交通上，可以通过洛河和黄河与中原相连接。东汉以后，关中衰落，洛阳更是成为中国的军事中心，直到宋代，仍然是中国最具价值的战略要地。宋代以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成了中国最大的威胁，洛阳的地位被北京取代	充在洛阳的鏖战
函谷关	河南灵宝市境内。位于关中到洛阳的古代大道上	秦汉时期崤山以西，连接关中与洛阳的必经之路。关口在群山中的一个谷地里，行在其中如同行在箱子里。	秦统一六国。刘邦出兵中原

		函谷关是关中与中原的必争之地，哪一方占据了这里，就封死了对方的进军通道。汉代之后，人们在函谷关以西发现了另一个更加有利防守的地方（潼关），函谷关逐渐废弃	
武关	陕西丹凤县境内。从关中穿秦岭直达襄阳地区的道路上	连接关中与湖北的关键关口。战国时期秦楚交界地带。自古以来，从湖北进攻关中，或者从关中进攻湖北，武关是最佳路线。至今仍然是连接湖北和陕西的关键通道	刘邦进军秦朝关中地区
大散关	陕西宝鸡境内。散关以南就是关中通往汉中的陈仓道（故道）	大散关一直是关中通往汉中的最常用通道，从汉中可以继续前往四川。守住了大散关，就守住了南方的进攻线路，保证了关中地区的安全	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萧关	宁夏固原以南的泾河上。连接陕	要从西北方进攻关中，最便捷的	西夏进攻北宋

	西与西北的重要通道	通道是先到达固原盆地，再翻越萧关和六盘山，顺着泾河进入关中盆地。这条路是西北游牧民族最常用的道路，也是关中四塞里防卫西北的关口	
潼关	陕西省潼关县老潼关	秦汉之后，函谷关的重要性让位给更靠西的潼关。潼关位于一座平顶的小高地上，北临黄河，南面是一条巨大的天然冲沟（禁沟），形成了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直到近代，潼关都是关中的门户和天险，在每一次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史之乱哥舒翰守潼关
汉中盆地	夹在四川盆地和关中平原之间的关键性盆地。汉江的上游	汉中是连接四川与陕西的关键地点。在历史上，陕西和四川谁得到了汉中，谁就拥有了军事优势。秦汉时期，如果能同时拥有了关中、汉中和	秦灭蜀。刘邦从汉中起家。张鲁经略汉中。刘备和曹操争夺汉中。蒙古借道汉中灭金

		四川，就有了统一全国的资本。即便到了后来，汉中仍然是历代王朝在西方争夺的关键性地点之一	
金牛道	从汉中前往四川成都的通道。古人所称的蜀道就指这里	从汉中经过剑阁进入四川的通道，在秦汉时期是关中（乃至中原）唯一进入四川的通道。金牛道极其险阻，由此获得了蜀道难的称号。直到三国时期，由于新的道路的开发，以及长江通航，进入四川才有了其他道路。但金牛道始终是关中进入四川的第一选择	秦夺取四川。刘备进攻汉中。唐玄宗入蜀
米仓道	从汉中翻越南面米仓山进入重庆的通道	米仓道的名气比金牛道小，却是一条不经过金牛道和成都，直接向南进入重庆地区的通道	张鲁从汉中退入四川盆地。蒙古人进攻重庆
阴平道	从甘肃南部的文县翻越摩天岭直达四川盆地	三国之前，人们认为进入四川只有走金牛道。但	邓艾灭蜀

		三国之后，金牛道以西的若干条道路都被开发了出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阴平道。阴平道等道路开发出来后，进入四川就有了多种选择	
子午道	从长安向南经过子午谷进入汉中的道路	子午道是进入汉中的最捷径，却是最难走的一条路。由于靠东，经过它既可以去汉中，也可以去安康	刘邦入关中烧毁的就是子午道
傥骆道	从长安经过傥谷和骆谷进入汉中的道路	与褒斜道和陈仓道比起来，傥骆道由于险峻也并不经常使用，却始终是进入汉中的选择项之一	钟会入关中的道路之一
褒斜道	从长安经过褒谷和斜谷进入汉中的道路	除了陈仓道之外，从关中进入汉中最常用的道路。秦代时伐蜀通道，三国时期魏蜀相攻的主要道路之一	秦代灭蜀。诸葛亮进军五丈原
陈仓道（故道、散关道）	从长安经过大散关，进入汉中的道路	陈仓道是从关中进入汉中最常用的道路。这条路最远，却最容易	刘邦暗度陈仓

		通过，自从开通，就是入蜀的首选通道	
祁山道（街亭）	从汉中经过甘肃天水，翻越陇山进入关中的通道	祁山道是连接关中与汉中最西面的道路。事实上，它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关中翻越陇山进入天水的陇山道，另一部分是从天水经过祁山前往汉中的祁山道。前者是从西方打击关中的主要通道，后者是从天水监控汉中的最佳通道	光武、隗嚣之战。诸葛亮出祁山。马谡失街亭
汉江通道	从汉中顺汉江直下湖北的通道	由于汉江沿岸过于艰险，历史上利用汉江通道并不多。但这条通道也是唯一一条直接沟通汉中与湖北的通道，如果利用得当，会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三国时蜀国曾经想利用这条通道沟通荆州与汉中，被魏国挫败。蒙元时利用汉江通道包抄	诸葛亮《隆中对》。蒙元灭金

		金国，则是成功的案例	
固原盆地	宁夏固原所在的盆地	要想从西北方保卫关中，必须守住萧关。要想守住萧关，必须占领萧关以北的固原。一旦固原丢失，萧关必然是守不住的。固原也是连接关中和西北的最重要道路，是游牧民族进入华夏区域的第一站。在战国秦时，固原是秦国的边境。在北宋时，固原是宋夏战争的主要战场	宋夏战争
太行山	山西与河北、河南的界山	太行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条山脉，其重要程度超过了秦岭。山的一侧是河北平原，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粮食基地之一；另一侧是山西高地，是整个华北地区的脊梁，俯瞰河北、河南。同时占据了山的	光武中兴。刘渊起兵。李唐开国。金灭北宋

		两侧，就拥有了帝王的开基资本。北方民族打击中原，也必须在山两侧同时进军，才具有最大的威慑力	
太行八陉	沟通太行山两侧的八条通道	分别是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由于太行山的重要性，这八条路沟通了山的内外两侧，就成了兵家必须吃透的最重要地形。下面几条，对八陉中最重要的几条进行单独说明	见下
天井关	位于太行陉上，在山西与河南交界以北的太行山中	天井关是从洛阳渡过黄河后，翻越太行山前往上党高地和山西北方的重要通道。这条路称为太行陉，天井关是太行陉最险要的所在。自古及今，都是沟通河南与山西的最重要通道	光武帝遏制山西进攻洛阳

滏口陉	连接山西上党与河北邯郸的通道	从山西打击邯郸，最便捷的通道是滏口陉。滏口陉是仅次于井陉的沟通太行山东西（山西与河北）的通道	秦赵战争
井陉	连接山西太原与河北石家庄的通道	井陉是沟通太行山两侧最重要的通道，也是山西下高原进攻河北的最佳路线，为历代军事家所重视。	韩信背水阵
紫荆关	河北易县西。在太行八陉的蒲阴陉上	从北京到大同的重要通道。宋代叫金坡关。除了蒲阴陉，也控制着飞狐陉通道	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金国。土木堡之变的辅助路线
居庸关	北京北面，军都陉上	防卫北京最重要的关口	金灭辽。土木堡之变
山海关	沟通北京与东北地区的主要通道	由于海退，山海关在唐宋之后才具有了重要意义。北宋末年，已经成了宋金连接的最主要地点。到了明清时期，是连接关内外的最重要通道	吴三桂引清兵
燕云十六州	位于燕山南北和句注山以北的汉人居住的土地	由后晋的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人。包括：幽州（现	宋辽战争

北京）、檀州（现北京市密云）、顺州（现北京市顺义）、儒州（现北京市延庆）、蓟州（现天津市蓟州区）、瀛洲（现河北省河间）、莫州（现河北省任丘）、涿州、新州（现河北省涿鹿）、妫州（现河北省怀来）、蔚州（现河北省蔚县）、云州（现山西省大同）、应州（现山西省应县）、寰州（现山西省朔州市马邑）、朔州（现山西省右玉）、武州（现山西省神池县）。

后周收复了瀛州和莫州。后人将景州（现河北省遵化市）和易州（现河北省易县）加入，仍然是十六州。

十六州又以燕山

		为界，分成山前诸州（幽、顺、檀、蓟、涿、景、易）和山后诸州。山前州在燕山以南，更是河北的巨大威胁	
北京	北京	防守燕山的锁钥，游牧民族进攻中原的第一站。在燕山和太行山的保护下，面向北方易守难攻。一旦失去北京，就意味着华北无法守住。但北京无法防止来自南方的攻击	宋金战争。李自成战争。清军入关
大同	山西大同	游牧民族在山西方向进攻汉文化的第一站。也是十六州云州的所在，山后诸州的中枢	宋金战争
营平滦三州	营州（现河北省昌黎县）、平州（现河北省卢龙）和滦州（现河北省滦县）	契丹人从刘仁恭手中获得的三州。不属于十六州，但同样处于燕山山脉以南，位于河北省的东部。金军灭亡辽国后，获得了三州，也获得了从	宋金战争

		燕山以南出兵直接打击中原的基地	
雁门关	大同与太原之间的关口	从大同盆地进入太原盆地，必须经过雁门关。这里就成了守卫山西的兵家必争之地	宋辽战争。宋金战争
太原盆地	太原所在的盆地	华北脊梁上的枢纽。北从雁门通大同，东过井陉去往河北。西走汾河谷地去往陕西，南向上党去往河南。得到太原，就得到了山西最重要的基地，具有四通八达的打击途径	李唐开国。后晋起家。宋金战争
汾河谷地	从太原去往陕西地区的最便捷通道	不管是从陕西进攻山西，还是从山西进攻陕西，汾河谷地都是首选通道。从太原沿汾河而下，经过临汾，到达侯马之后，可以有若干条分线路，最北方继续沿汾河，从龙门附近渡过黄河。或者经过运城，在蒲	北齐、北周大战。李唐开国。李自成灭明

		阪过黄河。或者向南经过茅津渡，在三门峡附近过黄河。后一条路还可以进入河南	
玉壁城	山西稷山县南白家庄附近	位于控制汾河谷地的一个制高点上。关中的部队占据了这里，就卡住了从山西去往关中的道路，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理想堡垒	北齐、北周大战
（黄）河内地区	黄河最后一笔大拐弯内侧。山西与河南、陕西交界地带	河内地区曾经是战国魏的首都，也是河南、山西、陕西交界地带。它南有中条山和黄河，西有黄河，北有汾河，东有太行山、王屋山，经济上有供应整个北方食盐的盐池。占据了河内，就控制了三省通道	秦晋崤之战。秦魏战争。韩信灭魏。李唐起兵
上党	山西南部的太行山北侧。以现长治为中心的高地	上党地区作为一个突出部，南可以出天井控制河南地区，东可以出滏口下太行进	长平之战

		攻邯郸，是山西南部最重要的地理特征，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虎牢关	郑州西北黄边的汜水镇	虎牢以东是大平原，以西则进入了山地。北面过黄河，就是通往天井关和上党的大路。虎牢关地形如同牢笼，是防守从平原来的敌军的重要堡垒	李世民大战窦建德
河阳三城	洛阳东北黄河中，跨黄河南北两岸与河中岛上建立的三座城市	在东西魏时期，河阳三城是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不管是防止从洛阳来的军队，还是抵抗从山西来的军队，三城都可以通过调整防务，起到关键性作用	东西魏大战。隋末战争
荥阳	在郑州与虎牢关之间	虎牢关建立之前的秦汉时期，荥阳是防守东面军队的最佳位置之一。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守住荥阳，是防止项羽西进的关键	楚汉战争。七国之乱
鸿沟	位于荥阳	魏国修建的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人	楚汉战争

		工河。后来成为楚汉的边境线。但实际上，从这里划分边境对楚国极其不利，因为楚国占据的鸿沟以东无险可守，而汉国占据的以西却处处是险	
嘉峪关	关口在甘肃嘉峪关市西	敦煌控制的丝路南道逐渐不通后，从西域北道进入中国的最重要关口。明长城起点	
凉州	甘肃武威	汉武帝所建武威郡。河西走廊的中心，历代地方小政权割据的都城	十六国时期诸凉王朝的割据
大斗拔谷	祁连山扁都口	沟通青海西宁与甘肃张掖的翻越祁连山的通道。沟通河西走廊与羌藏地带的捷径	隋炀帝西征
南襄隘道（方城隘道）	南阳、襄阳	中国地理中心，也是古代沟通中国南北的正道。在中国中部，由于秦岭到大别山一系列山脉的阻隔，中国南北被	光武起兵。三国荆州之战。襄阳保卫战

		分成了两部分，这两部分之间只有三条通道。其中，从河南省方城有一条隘道进入南阳盆地，再向南过襄阳，进入两湖盆地的范围。是为三条道路的中道。 南襄隘道的南面是荆州，共同构成了这条中华的中轴线	
荆州	湖北荆州	中国地理中轴线的南端。荆州上可连河南，下可进湖南，东西连接了从四川到江南的广大地区，是不折不扣的连接点	赤壁之战。《隆中对》
长江三峡	湖北、重庆交界	在东汉之前，由于水势太险，三峡很少成为交通通道。但从东汉开始，三峡成了沟通四川与湖北的要道。到了三国时期，围绕着三峡摸索出了一系列的战术。东晋南朝时，三峡	吴蜀猇亭之战。晋灭吴之战

		已经成了通衢	
南京	江苏南京	除了南宋之外，历代南方王朝的首选都城。南京面向长江，三面皆山，是南方不可多得的都城选项。但南京的地理劣势在于纵深不足，一旦敌人渡过长江，南京就很难守住。要守住长江和南京，必须守住淮河。南京的左右拱卫是镇江和马鞍山，一般进攻南京是从这两个地方渡过长江	晋灭吴。东晋南朝内战。太平天国
扬州、镇江	扬州、镇江	扬州、镇江隔江相望，所谓京口瓜州一水间。这里是防守南京的东面通道。从淮河经过大运河可以直达扬州，再渡江进攻京口，就可以包抄南京了	金宋战争
邗沟	大运河	春秋时期吴国修建的人工运河。隋朝将其纳入大运河的一部分，	金兀术长途奔袭扬州

		即现在的扬州段。大运河长期以来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	
寿春	安徽寿县	寿春位于巢淝通道的中心位置。巢淝通道是连接江淮的最重要通道之一，通过巢湖可以直达长江和县一带	曹魏屯田。淝水之战
马鞍山	安徽马鞍山	经过巢淝通道到达长江后，江对岸就是马鞍山和当涂。当涂作为防卫长江的重要城市之一，在历代南北对峙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晋吴战争。东晋南朝内战
湘江谷地	湖南省境内	湖南省东西两侧皆山，南侧是南岭，只有一条湘江从南向北汇入长江，形成一条长长的谷地，如同一个布袋，形成了一条肥沃的河谷。湘江谷地还是从中原进入两广地区的最主要通道，顺湘江直上，经过灵渠转入漓江，进入	太平天国进军湖南

		两广	
灵渠	广西北境	灵渠是秦代开凿的人工河，连接了湘江与漓江，是沟通湖南与广西的连接点。由于水路运输载重量大，成了军事要道	南北朝内战。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赣江谷地	江西省境内	与湖南地形类似，江西的地形也是东西两面皆山，南面高，北面临长江，中间一条赣江从南向北汇入长江。赣江还是另一条连接中原与两广的通道	南北朝内战
梅关	江西省大余	从赣江向南，在梅关翻越南岭，进入广东省南雄境内。这条路在明清时期成为入广东的主道	
仙霞岭	福建与浙江之间的古道	从浙江进入福建的主道	黄巢起义

参考书籍

本书可以视为中国进入大一统帝国之后的战争通史性作品，但这也意味着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战争，不能留太多的篇幅。

在写作时，出于兴趣，我将北宋末年的汴京之围单独抽出成书，并加入了经济、政治和外交层面，作为本书的一个衍生品，也可以视为围绕单独一场战争的全面总结性作品。

在未来，我还有可能对明末清初、海通、民国等资料比较齐全的时期进行类似总结。这里列的参考书籍，不仅针对本书，也包括了我对本系列作品的整体规划与研读。

书单中也只列出了史籍性作品，对于笔记等其他史料，没有列出。

最后，掺杂一句与本书无关的话：如下所列的参考书籍，除了两本之外，都已经躺在我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龙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却因为半生漂泊，将所购书籍都散得精光。如今终于有了稳定的小规模藏书，每天醒来，到书架中寻觅一番，既满足了好奇心，也更明了人生的意义。

纪传表志类：

（汉）司马迁著，《史记》

（汉）班固撰，《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

（晋）陈寿著，《三国志》

（唐）房玄龄等主编，《晋书》

（梁）沈约撰，《宋书》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

（南朝）姚察、姚思廉撰，《梁书》

（南朝）姚思廉撰，《陈书》

（北朝）魏收著，《魏书》

（唐）李百药撰，《北齐书》

（唐）令狐德棻主编，《周书》

（唐）李延寿撰，《南史》

（唐）李大师、李延寿撰，《北史》

（唐）魏征主编，《隋书》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

（宋）宋祁等撰，《新唐书》

（宋）薛居正等主编，《旧五代史》

（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

（元）脱脱等撰，《宋史》

（元）脱脱等撰，《辽史》

（元）脱脱等撰，《金史》

（明）宋濂等主编，《元史》

（清）柯劭忞撰，《新元史》

（清）张廷玉等修纂，《明史》

（清）张岱撰，《石匮书》

钱海岳著，《南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5月。

（清）赵尔巽主编，《清史稿》

（民国）佚名撰，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

编年类：

（春秋）《春秋左氏传》

（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

（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清）黄以周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宋）陈均撰，《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宋）李埴撰，《皇宋十朝纲要》

（元）《宋史全文》

（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

（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刘时举、王瑞来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

（宋）《续编两朝纲目备要》

（元）《宋季三朝政要》

（明）谈迁撰，《国榷》

（清）夏燮撰，《明通鉴》

（清）蒋良骐纂修，《东华录》

（清）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

（清）朱寿朋编纂，《光绪朝东华录》

纪事本末类：

（春秋）《国语》

（战国）《战国策》

（清）高士奇编著，《左传纪事本末》

（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

（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

（清）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

（清）李有棠撰，《金史纪事本末》

（清）韩善徵撰，《蒙古纪事本末》

（明）陈邦瞻撰，《元史纪事本末》

（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

（清）杨陆荣撰，《三藩纪事本末》

其余史书：

（宋）王益之撰，《西汉年纪》

（汉）荀悦、（晋）袁宏撰，《两汉纪》

（汉）班固等撰，《东观汉记》

（晋）习凿齿撰，《襄阳耆旧记》

（唐）许嵩撰，《建康实录》

（唐）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

（唐）樊绰撰，《蛮书》

（清）吴任臣撰，《十国春秋》

（宋）胡恢、马令、陆游撰，《南唐书》

（宋）曾巩撰，《隆平集》

（宋）确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

（宋）赵甡之撰，《中兴遗史》

（宋）岳珂撰，《鄂国金佗稡编续编》

（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

（清）周春撰，《西夏书》

（金）《大金吊伐录》

（宋）宇文懋昭撰，《大金国志》

（元）《元朝秘史》

（清）萨囊彻辰撰，《蒙古源流》

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

（明）五世达赖喇嘛撰，《西藏王臣记》

（明）《明本纪》

（明）俞本撰，《纪事录》

（明）陈建撰，《皇明通纪》

（清）计六奇撰，《明季北略》

（清）计六奇撰，《明季南略》

（清）徐鼒撰，《小腆纪年附考》

（清）徐鼒撰，《小腆纪传》

（清）阿桂撰，《满洲源流考》

（民国）孟森撰，《满洲开国史讲义》

（民国）孟森撰，《清朝前纪》

（民国）孟森撰，《明元清系通纪》

（清）易孔昭等撰，《平定关陇纪略》

台湾三军大学编撰，《中国历代战争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7月。

典制会要：

（民国）《二十五史补编》

（唐）杜佑撰，《通典》

（宋）郑樵撰，《通志二十略》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

（清）黄本骥编，《历代职官表》

（清）顾栋高撰，《春秋大事表》

（清）姚彦渠撰，《春秋会要》

杨宽、吴浩坤主编，《战国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清）孙楷撰，《秦会要》

（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

（宋）徐天麟撰，《东汉会要》

（清）钱仪吉撰，《三国会要》

（清）朱铭盘撰，《南朝宋会要》

（清）朱铭盘撰，《南朝齐会要》

（清）朱铭盘撰，《南朝梁会要》

（清）朱铭盘撰，《南朝陈会要》

（五代）王溥撰，《唐会要》

（唐）长孙无忌撰，《唐律疏议》

（五代）王溥撰，《五代会要》

陈述、朱子方主编，《辽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

（清）徐松编，《宋会要辑稿》

（宋）《宋大诏令集》

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12月。

（元）《元典章》

（元）《通制条格》

地理类：

（唐）李泰撰，《括地志辑校》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

（清）乐史撰，《太平寰宇记》

（宋）王存主编，曾肇、李德刍修撰，《元丰九域志》

（宋）祝穆撰，《方舆胜览》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

（清）顾炎武撰，《肇域志》

（清）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

（清）徐松编撰，《唐两京城坊考》

（南北朝）《三辅黄图》

（明）李濂撰，《汴京遗迹志》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

外国记载：

［意］若望·柏朗嘉宾著，《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法］纪尧姆·德·鲁布鲁克著，《鲁布鲁克东行纪》

［意］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行纪》

［波斯］拉斯特主编，《史集》

［伊朗］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

米尔扎·穆罕默德·海达尔著，《拉失德史》

［法］勒内·格鲁塞著，《草原帝国》

［法］勒内·格鲁塞著，《蒙古帝国史》

后记

为了写作本书，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在国内游走，访问历史上的战略要地。我认为，只有通过亲自观察，才能了解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成为战场，它的地理逻辑在哪里。

写作时，许多访问时的场景总是在眼前闪现，其中最难忘的有三个。

第一个场景发生在我走访燕国故地时，看到的满地古代战士的头颅。

在河北省易县，这里是著名的燕下都所在。县城之南，当年的都城还有迹可循。最令人感慨的还是燕下都南面的几座高大土冢。这些土冢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旁边，两千多年来没有人在意，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土冢之下一共埋藏着数万颗人类的头颅。

在中国古代，人们有利用战败者的头颅垒金字塔的传统，这些金字塔有一个名字：京观。河北易县的土冢可能是国内唯一保存完整的京观。这些人头属于战国时期的燕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不幸的是，当我来到现场，却发现这些土冢都遭到了盗掘。在土冢的周围，散布着大量的人类头骨碎片，大部分都碎了，但很多还能看出来圆圆的形状。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碎片都变成了软绵绵的一团，用手一碰就会粉碎。随着被盗掘，保存两千年的遗迹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唯一能够长久保留的是人类的牙齿。在现场还散布着大量的牙齿，它们依然坚硬，混合在一起的还有一些简陋的陶片。除了陶片、牙齿和碎骨，没有别的，大概战败者的人头墩中不会陪葬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对于盗墓者而言，最没用的物品也许就是人类本身。一个箭头、一把剑，甚至一个陶片都比一具骨骸更有价值。人头骨与牙齿被掘出后随

即扔在了地上，任由消失。对于考古工作者，数量庞大的骨头也没有什么价值，他们只是采集了几个样本，剩下的就任它自生自灭了。

感慨万千的我随手捡了一把牙齿，从磨损程度看，它来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战争中死去，被当作战利品埋葬在这里。

第二个场景发生在另一座古战场。

当我到达山西汾河岸边的玉壁古城遗址时，在一片黄土台地上，当地人指给我一个叫作万人坑的地方。

玉壁古城是中国保留比较完整、没有受到过多扰动的古城，这座城市专门为了打仗而建。当年东西魏的战争中，西魏为了封锁东魏的汾河进攻路线，在汾河南岸的台地上修建了玉壁城。当东西魏战争结束，玉壁也就慢慢荒废了。由于没有人类大规模居住，才保留到了现在。

从地貌上看，玉壁城如同是一座天然的巨大平台，高高耸立着，它三面是悬崖，只有一面较为平坦，守军在这一面修建了城墙进行防卫。在城市内，还能看到当年攻城者挖掘的地道痕迹。

在断崖上，白色的人类、马匹的尸骨、牙齿俯首可拾。

所谓万人坑，实际上是在悬崖上一个密布着人类骨骸的地层。人骨之密集，令人产生毛骨悚然之感。

在悬崖之下，也散布着许多脱落的人骨。随着悬崖的剥蚀，崖下的人骨竟然也铺了一层。可能是由于年代短了一半，且气候更加干燥，这些属于一千多年前东西魏大战时西魏将士的遗骨保存情况要比燕国京观的骨殖更加硬实。

最后一个场景在宁夏固原的好水川战场。这个新发现的古战场属于北宋与西夏战争时期。

战场在一座红色的小山坡侧面，同样由于地处偏僻，在近千年后，

战场几乎还保持着刚刚打完仗之后的原貌。唯一的不同是，当年裸露在外的将士尸骨都被岁月埋在了浅浅的地下，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它们。

在一个断层处，我发现了一个破碎的瓦罐，看上去像是士兵们煮粥用的。在瓦罐里竟然还有许多非常轻的黑色物质，经过辨认，应该是小米粥干掉、炭化之后的痕迹。也许在那天，北宋的士兵刚刚做好饭，还没有来得及吃，就遭遇了灭顶之灾。

瓦罐里的粥不知道放了多久，慢慢变干、炭化，被浮土埋没。瓦罐在土下埋了很久才破碎，当我发现时，虽然碎成了几块，却并没有零落，仍然可以拼得严丝合缝。

在瓦罐的不远处，有一个人类的头盖骨。再远一点儿，断层里星星点点露出几片白色的痕迹。我用手轻轻一抠，发现竟然是人体的第一到第四块颈椎。它们必然属于一位北宋的士兵。

这位士兵被杀后，就一直留在了原地，直到积土将他埋葬，又被风雨从土中剥出、散落。当我看到它们时，只剩下了四块脊椎，其余都不知去向。

除了这三个场景，还有许多都能让我立刻穿越到过去。它们共同陪伴我写完了书稿。每一次我的思路停顿时，都回忆着那一幕幕鲜明的记忆，诅咒着该死的战争。

但战争就是人类的一部分，隔一段时间，总会有野心家冒出来，希望通过战争来满足他的私欲。战争和税，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的两种事物。和平时期，决定人类社会演化的最根本力量是经济和财政；到了混乱时期，决定演化的则是战争。

如果要想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课题。

我们谴责战争的残酷，却必须了解战争不会远去，做好理论上的准备，以免受人宰割。

本书追寻了从秦统一到清末这两千年的战争逻辑，以中国地理要素为中心，逐渐展开，叙述了各个朝代的大战略。

在秦朝统一时，中国的地理还局限在关中地区、洛阳盆地、华北、淮河、两湖地区、四川这几个单元。到了清代，已经扩张到了新疆、西藏、云南、蒙古，随着地图的打开，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的军事战略也发生着一定的变化。但变化中又有着持久的要素，因为中国的地理是不变的。

读者读完本书，可以理解中国疆域的形成，以及历次战争背后的逻辑性，从而更加热爱现在的和平与繁荣。

在写作过程中，我脑海中不时需要将我游走观察的现场图景与历史中的记载相印证。比如，当我叙述蒙古人进攻大理时，想到的是滔滔的大渡河水、白龙江两侧高耸的山脉，以及壤塘广阔的草原图景，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蒙古人策划了一次多么大胆的行动。

本书是“帝国密码三部曲”之一。2017年，我出版了《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其中提到除了“财政密码”，还有两部《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和《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正在写作之中。实际上“财政密码”写成于2015年春天，在那之后，我已经开始了剩下两部的写作，按照计划，首先写完的应该是“军事密码”，最后才是“哲学密码”。但由于“军事密码”的复杂度更高，反而是先写完了“哲学密码”，最后才完成了本书。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说声抱歉的是，本书原本附有几十张地图。事实上，我在地图上花费的时间并不少于正文。但考虑到出版的复杂度，经过出版社与我再三慎重考虑，还是暂时将地图拿掉后出版。我明知道这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但在目前，这是本书出版的最好方法，请读者体谅。

关于地图，读者可以参考的包括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册部分。两种图册各有特色，但均有不足，所以，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还可以准备一张现代的全国地图，最好是带地形的，这会对理解本书内容非常有用。

未来，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再想办法将地图传递给读者。

在体例上本书也和“财政密码”“哲学密码”有所不同。两书大都附了详细的注释文字，加上附录中的参考书籍。而本书的内容主要出自中国的史书，书目见附录的参考书籍，我都视之为常规文献，因此，不再一一注明出处。书末的参考书籍也是我目前还在研读的书，其中一部分并没有在本书中得到反映，却是我长期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前两本书相比，本书的特点是更注重实际地理的考证。

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副产品。在写作到宋朝时，我突然意识到，北宋与辽、金的交往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展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最佳融合样本，于是将这部分抽出，查阅了上百种宋人文献，形成了一本新的书《汴京之围》，已经交给出版社进行处理，在此做一个说明。

在未来，时机合适时，我可能还会对明末、清初、清末、民国等各个时代进行类似的考察。但是时间未定。

感谢文学锋的帮助，我曾经在广州你的家中住了一年，本书的写作计划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感谢周杭君，大学里的友谊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并必将持续终生。进入中年，我们是仅剩不多仍在为理想拼搏的同学之二。周除了拼劲儿十足之外，还保持着最活跃的思维，在一个月前，她在饭店的外卖袋上免费印上了我的《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的广告，让这本书成了世界上第一本在外卖袋上打广告的哲学书。所有订她饭店外卖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郭建龙的人能吹一点儿哲学之水。在此，我也利用新书替周做一下宣传：在北京牡丹园和上地，各有一家叫上下亭的米粉店，在那儿，你能吃到最地道的湖南米粉。

感谢我的编辑雷戎、董曦阳所领导的整个团队，如果没有你们的鼓励，我很难坚持下来写稿，我们一直是配合最好的团队，本书是我们共同完成的。

感谢秦旭东、张赋宇、王力，写作过程始终得到了你们的鼓励。

感谢我的祖父母，他们将“理想”这个词深深地注入了我的灵魂。我多希望，他们的在天之灵随时都能看到，我仍然为了理想而不肯妥协。

感谢梦舞君的陪伴，让枯燥的写作充满了温馨。

此外，本书完成后，豆瓣网友麟狩提出了非常专业的意见，指出了本书的几处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他特别从古地理的角度对本书陈仓道的叙述提出意见（见三国部分），认为在汉初以前，古汉水流经陈仓故道，可以溯水而上直抵陈仓。但汉初武都大地震后，汉水不再流经陈仓道，断绝水路后的陈仓道军事运力比韩信时代大打折扣。这是诸葛亮不选择陈仓，而选择祁山道的主因（祁山道相对平坦，可以依托西汉水向陇西运粮）。我将他的话附于此处，便于读者理解。

本书构思于广州锋子居。本书的初稿写于大理才村走青春客栈。本书修改于云龙梦君庐。本书的终稿完成于大理风吼居。